



#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上册)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 著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上册)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 著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 目 录

[上]

作者致谢..... 1

导言..... 1

第一章 破晓..... 15

百万富翁之子费利克斯·韦尔建立了一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希望有朝一日将它献给胜利的德意志苏维埃政权..... 15

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格吕恩堡建立了以研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为目标的研究所..... 34

哲学家霍克海默成为研究所主任。新规划：通过将社会哲学和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熔铸于一炉来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48

霍克海默和他的助手：传记全景..... 54

    马克斯·霍克海默..... 54

    艾里希·弗洛姆..... 67

    弗里德利希·波洛克..... 76

    列奥·洛文塔尔..... 81

    西奥多·魏森格隆德—阿多诺..... 84

    赫伯特·马尔库塞..... 122

政治—学术政治—学术工作..... 136

第二章 逃离..... 179

第三章 在新世界（上）：从事社会批判研究的独立研究所..... 207

权威与家庭研究：集体的“推进研究”片断	207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重新合作	215
1930年代研究所从事的其他经验研究项目	225
辩证法项目	240
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街》——研究所和阿多诺	257
意识形态的批评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列奥·洛文塔尔论艺术	288
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深度跨学科研究错失的机会	293
阿多诺、拉萨斯菲尔德和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	309
在行动和犹豫之间平衡	321

#### 第四章 在新世界（下）：

##### 在理论多产中没落

“基金的使用条例绝不是专为经营研究所而定的”	353
与埃里希·弗洛姆决裂	358
计划	368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争论	375
洛杉矶的私人学者分部——研究所在纽约的残余——与诺伊曼和马尔库塞分道扬镳	390
辩证法研究项目的工作	402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431
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理性之蚀》	451
反犹主义研究计划	461

#### 第五章 渐归

怀着对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勃勃雄心——对哲学工作的渴望——没有必要建立起一个理论家共同体——走访殖民地	511
《偏见研究》	511

## [下]

<b>第六章 重建社会里的批判性装饰</b> .....	573
参与战后重建—对于西德公众政治意识的研究 .....	573
霍克海默——一夜之间的功成名就 .....	586
阿多诺关于批判的经验社会研究的构想—研究所的危机—马尔库塞的梦想 .....	595
研究所的稳固——返回法兰克福后最先出版的两本书：《社会学》(Sociologica)、《组群实验》 .....	614
告别独立自主：对曼内斯曼公司的研究——阿多诺退出经验研究 .....	630
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爱欲与文明》 .....	649
<b>第七章 处于争论中的批判理论</b> .....	671
作为独立的跨学科研究者——走向偶然音乐，以及其他领域中的相应方法 .....	671
文学笔记 .....	685
通向一种无需担心缺乏基础的哲学 .....	699
于尔根·哈贝马斯——研究所最后一位社会理论家，受阿多诺赏识却被霍克海默认为太左 .....	708
实证主义争论 .....	742
保守主义争论 .....	761
海德格尔批判 .....	772
<b>第八章 剧变时代的批判理论</b> .....	789
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延续：《否定的辩证法》 .....	789
批判理论家和学生运动 .....	804

哈贝马斯走向社会交往理论——阿多诺遗著《美学理论》..... 835

后记..... 863

参考文献..... 868

档案和征引文献目录..... 868

I. 档案:..... 869

    社会研究所在各类小册子、备忘录、报告和信函中的

    计划书..... 869

    文件..... 870

    通信..... 871

    社会研究所研究报告..... 872

II. 研究所出版物, 研究所最重要的合作者的出版作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版物..... 875

III. 二手材料..... 915

IV. 有关背景的著作以及构成背景的组成部分的著作..... 924

索引..... 941

译后记..... 980

## 作者致谢

我要向许多人表示谢意。1979年米夏埃尔·克吕格尔 (Michael Krüger) 和卡尔·汉斯 (Carl Hanser) 出版社准备提供一份有关法兰克福学派整体历史的研究合同并对研究提供资助。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 (Herbert Schnädelbach) 使得此项研究在一个合理的时限内完成成为可能, 他以令人鼓舞的意志推荐这个研究项目争取德国科研协会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的研究基金。为期两年半的访美之旅一半的经费来自德国科研协会, 而另一半则由我妻子提供。

我还要感谢以下几位, 我有幸和他们进行了重要而富于激发性的讨论, 其中一些讨论几次反复进行, 使我受益匪浅, 他们是: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 (Wolfgang Abendroth); 英格兰利兹市的威廉·巴尔达姆斯 (Wilhelm Baldamus); 布莱斯高弗莱堡的魏特瑙的瓦尔特·迪尔克斯 (Walter Dirks);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 (Ludwig von Friedeburg); 科隆的乌尔利希·格姆巴尔特 (Ulrich Gembardt);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帕特霍姆堡的维利·哈尔纳 (Willy Hartner);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彼得·冯·哈塞尔贝尔格 (Peter von Haselberg); 英格兰哈索克斯的凯莫尔的玛丽·雅胡达 (Marie Jahoda); 科隆的勒内·柯尼希 (René König);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费尔迪南德·柯拉摩尔 (Ferdinand Kramer); 美国柏克利的列奥·洛文塔尔 (Leo Lo-

wenthal); 纽约的爱丽思和约瑟夫·迈尔夫妇 (Alice and Joseph Maier); 韦斯巴登的库尔特·毛茨 (Kurt Mautz); 美国圣地亚哥的爱莉卡·舍尔奥弗尔 - 马尔库塞 (Erica Sharecover-Marcuse); 汉诺威的维利·施特塞尔莱维茨 (Willy Strzelewicz);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鲁尔夫·梯德曼 (Rolf Tiedemann); 纽约的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英国剑桥的莫西·I. 费莱利 (Moses I. Finley) 以通信形式解答了我的几个问题, 在此向他致以谢意。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霍克海默档案馆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它收藏了非常之多的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文件。除了大量汇集成册的收藏之外, 档案馆尚保存有 20 万页的信件、手稿及其他材料。甚至在完成编目之前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Alfred Schmidt) 就慷慨地让我使用这些档案了。冈兹林·施密德·诺艾尔 (Gunzelin Schmid Noerr) 友善地并不将这看作是对他编目工作的打扰, 我还得以就编目工作中一些细节和难下定论的评价问题与他进行了讨论。在此谨对以下机构和人员表示谢忱: 伦敦科学和研究保护协会、牛津鲍德雷安图书馆; 布达佩斯卢卡奇档案馆; 卡斯滕·维特 (Karsten Witte) 和马尔巴赫德国文献档案馆手稿收藏处;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市档案馆; 社会研究所图书管理员莉泽洛特·莫尔 (Liselotte Mohl), 哲学博士学位委员会主席兼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档案管理人鲍姆 (Bohme) 教授; 西奥多·W. 阿多诺档案馆主任罗尔夫·梯德曼 (Rolf Tiedemann) 及其助手亨利·洛尼茨 (Henri Lonitz); 以及马尔库塞档案馆负责人巴巴拉·布里克 (Barbara Brick)。

我没能获准进入法兰克福大学档案馆。时任大学校长的哈特维希·赫尔姆 (Hartwig Helm) 教授的理由是, 从文献保护的角度看我所需的文件尚未处理好, 必需的资料上架工作因人员短缺而无法完成, 这样就拒绝了我查阅与社会研究所相关材料的要求。黑森州文献保护官员施皮洛斯·希米提斯 (Spiros Simitis) 教授支持我的要求, 他断言我想要查阅的大学档案文献并不在文献保护法限制范围之内, 但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格达·施图赫里克 (Gerda Stuchlik) 的书《褐衫党时代

的歌德：法兰克福大学（1933—1945）》（*Goethe im Braunhemi-Universität Frankfurt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4）从各个方面使我受益良多，可就是缺少法兰克福大学的档案。乌利克·米格达尔（Ulrike Migdal）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历史》（*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1）对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历史有详尽描述，其中也细致地讨论了许多关于研究所的法兰克福大学档案，该书以及保罗·克鲁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基金会大学》（*Die Stiftung-s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 1973）中社会研究所那一章成为本书的替代性材料来源。

弗里德里希·W.施密特（Friedrich W.Schmidt）在许多次晚间讨论中与我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思想——如对自然的模仿与支配、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与形而上学等——进行了讨论。在爱根哈德·霍拉（Eginhard Hora）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善于助人而眼光敏锐的编辑。她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没有她这本书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 1 引言

“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这些词汇不仅能让人想起社会科学中的某种范式，而且它们还能让人联想起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开始的一串名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 1960 年代的学生运动、“实证主义论争”，还有文化批评——也许还有德国流亡者、第三帝国、犹太人、魏玛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显然，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流派，不仅仅是一段学术史。

第一代和第二代批判理论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性的提法，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和 20 世纪 70 年代后由之发展而来的新一代相区别。<sup>[1]</sup> 这使我们至少在一开始就能推迟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来发展及其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等问题的讨论，便于给学派确定一个时限，从而不使之过于模糊。本书以阿多诺的谢世为时限，他是老一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在法兰克福和社会研究所中都非常活跃。

“法兰克福学派”的名称是 1960 年代由局外人贴上的标签，但是最后阿多诺本人也非常自豪地使用了这个名称。一开始，这个名称指一种批判社会学，它将社会视为一种对抗的总体性，那时这种社会学还没有将黑格尔和马克思排除在它的思想之外，而是相反自视为他们的继承者。但是这个标签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变得庸俗且无所不包。马尔库塞在媒体上声名远扬，和马克思、毛泽东以及胡志明一道成为了造反学生的偶像，这也给法兰克福学派赋予了某种神话般的地位。1970 年代早期，

美国历史学家马丁·杰伊 (Martin Jay) 让这种神话返回了地面，返回了其历史事实的基础，而且澄清了“法兰克福学派”标签后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实际情况。然而标签本身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了它所标示的思想的影响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个影响史已经超出了我们在严格意义上讨论一个“学派”的范围。

这里有一些所谓“学派”的某些典型特征，有些比较固定，而有些则是暂时的，或者仅仅出现过几次。它们是：

1. 一个研究机构：社会研究所，在整个时期内它都存在着，即便有时候是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存在着。

2. 一个思想上的超凡 (charismatic) 人物，对新理论范式抱有信心，能够，也愿意和够格的学者合作：马克斯·霍克海默作为一个“管理型学者”经常提醒他的同伴们意识到，“理论”的未来发展就掌握在他们这些被拣选的几个人手中。

3. 一份宣言：霍克海默 1931 年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现状和摆在社会研究所面前的任务》<sup>[2]</sup>。研究所后来一再回过头来重新领会这个演说，而霍克海默本人也一再援引这个演说，比如说在 1951 年研究所重新运作的庆祝典礼上。

4. 一种新范式：关于社会一般进程的“唯物主义的”和“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典型特征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将精神分析、叔本华、尼采、克拉格斯 (Ludwig Klages)<sup>[3]</sup> 的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的某些思想系统地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批判理论”这个标签一直保留了下来，即便它的不同使用者对它有着不同的理解，即便霍克海默本人后来也改变了早先的“批判理论”观点。

5. 学派研究工作的杂志和其他出版物：《社会研究学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它的发行者都是素有声望的：先是莱比锡的 Hirschfeld，后来是巴黎的 Felix Alcan。

这些特征中的大多数只适用于研究所的霍克海默时期的头十年——

即 1930 年代——和它的纽约时期。整个纽约时期在美国环境下，研究所可以说处在某种“辉煌的孤独”状态。只有霍克海默、波洛克和阿多诺在 1949 年到 1950 年返回德国。他们三个人当中，也只有阿多诺保持了理论上的多产，也只有他既出版旧东西也出版有新内容的著作。战后就不再有学刊了，继而代之的是“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Frankfurt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的系列出版物，它们不如早先的学刊有特色。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 1960 年代开始时在这个系列中出版过一次他们自己的讲座和讲演的选集。

对我来说那里没有连贯统一的理论。阿多诺写些文化批评的文章，发表一些对黑格尔的讨论。他表现出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就这些。<sup>[1]</sup>

3 于尔根·哈贝马斯，1950 年代晚期阿多诺在研究所的助手这样回顾。1960 年代的确形成了“学派”的印象，但“学派”中既有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提出的社会学批判理论的思想，又有早先研究所在霍克海默指导下那段时期的极端社会批判、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且不论其他因素，仅研究所历史的外部环境的极端不平衡就决定了不要太严格地对待“法兰克福学派”这个称号才是明智的做法。还有其他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尽管霍克海默是个“超凡”人物，但他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关键性逐渐在减退，而且也越来越不适应一个“学派”的构成。其次，有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如果将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 40 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能将现在所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全部要素都包括进去的某个统一范式或者范式转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两个领军人物是在相同的领域内，从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出发去开展研究的。霍克海默作为发展着的、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创造者登上舞台，最后却放弃担当管控世界（administered world）<sup>[2]</sup> 批判者的角色——在这种被管控的世界中，自由资本主

义作为已经失败的文明，它的历史的最后据点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而阿多诺正是作为永恒思想 (immanent thought) 的批判者和新的、被解放了的音乐的鼓吹者登上舞台的。对于他说来，有关已经失败的文明之历史的哲学已经成为多方位的非同一性 (non-identity) 理论的基础，更确切地说，也成了可以考察非同一性的各种思想形式的基础——这有点悖论色彩。阿多诺提出了一种微观逻辑学—弥赛亚思想，这使他同瓦尔特·本雅明 (本雅明在阿多诺的帮助下成了《社会研究学刊》的撰稿人，最后成为了研究所的成员) 有了紧密的联系，也同希格弗里德·克拉奥尔和恩斯特·布洛赫有了联系。《启蒙辩证法》<sup>[6]</sup> 虽说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二战”最后几年共同写作的，但该书的理性批判并没有改变阿多诺的思考。但霍克海默却在他和阿多诺合撰那本书之前的几年中就同社会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以及专精于法学和国家理论的理论家弗朗茨·诺伊曼 (Franz Neumann) 和奥托·科尔施海姆分道扬镳了，并因此实际上放弃了他试图建立跨学科的一般社会理论的计划。完成《启蒙辩证法》之后，合作者纷纷离他而去。但是，就像他凭着社会学家的能力回过头检视自由主义时代的独立实业家们一样，他也凭借哲学家的才智回过头开始考察那些讨论客观理性的伟大哲学家。霍克海默本人认为，在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他的重要性因他早年文章所具有的激烈的马克思主义调子而不断提升，而且他还眼看着自己被人们与马尔库塞那进攻性日趋激烈的“大拒绝” (Great Refusal) 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形成对照的是，阿多诺写出了他的两部微观逻辑学—弥赛亚思想的伟大作品——《否定的辩证法》和《美学理论》。<sup>[7]</sup> 这两本书在那时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另一方面，瓦尔特·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成分那时刚刚被发现，他开始成为唯物主义的艺术与媒体理论的关键人物。阿多诺逝世 15 年后，后结构主义最重要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说：“如果我能及时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我肯定会节省很多劳动。那样我就不会说一大堆废话了，也不会为了避免迷路而尝试那么多错误的途径——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把道路清理出来了。”<sup>[8]</sup> 福柯把自己的计划描述为“对理性的理性批判”。阿多诺确实在 1962 年一次探讨

哲学术语、描述哲学任务的讲座上使用过这个词。阿多诺说：“哲学应该用某种理性上诉的能力来质询理性。”<sup>[9]</sup> 显而易见，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是不断变化着的，因而它的这个或那个论题总是同现时代相关，而且这些论题最后却证明是一些未完成的、急需深入推进的论题。

那么，是什么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团结在一起的——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团结仅仅是暂时的？他们所有人都有着某种共性吗？第一代法兰克福成员组成了一个整体，他们要么是犹太人，要么大都是迫于纳粹的压力而恢复信仰犹太教的人。无论来自于上层社会的家庭，还是像弗洛姆或洛文塔尔那样来自于不那么富有的家庭，他们中最幸运的人也免不了有过社会局外人的经验——他们甚至在 1918—1933 年的那段时期也无法幸免。他们最基本的共同经验是：再恭顺也无法使自己成为社会庇护下的一分子。正如萨特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 (1946) 中所说：

他（犹太人）……接受了他周围的世界，他加入了游戏，而且遵守所有那些礼仪，和其他人一起跳着那种可敬的舞蹈。而且，他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是允许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的自由公民；所有社会荣誉和政府职位都向他开放。他可以带上荣誉骑士团的勋章，他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律师或者内阁大臣。然而就在他达到法制社会的巅峰的时刻，另一种无形的、弥散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片刻之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且将他拒之门外。即使是最伟大的成功也无法让他进入那自认为是“真正的”社会的时候，他对荣誉和未来之虚幻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强烈啊！作为一个内阁大臣，他将是一个犹太内阁大臣——既是尊贵的“阁下”同时又是贱民。<sup>[10]</sup>

5 犹太人肯定已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感受到：布尔乔亚—资本家群体同工人阶级一样，在生活中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处于一种被疏远的(*alienatedness*)、不真实的状态。尽管犹太人总体上比工人阶级有特权——这甚至是一种让犹太人无法逃脱其犹太性的特权。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说对争取

到特权的“工人们”而言，要争取到更多的特许条件要遇到更多困难，可他们至少还可以让他们的下一代不再当工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连接点，在这一点上把犹太人挥之不去的社会疏离感与作为比较尺度的工人所体验的挥之不去的社会疏离感联系起来。这不一定会让犹太人和工人团结起来，但至少可以引发一种与工人的客观利益相一致的彻底的社会批判。

从霍克海默 1937 年发表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sup>[11]</sup>的文章开始，“批判理论”就成了霍克海默圈子里的理论家们用来描述自己的主要标签。这个标签下面掩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它更多地反映了霍克海默和其同仁的某种主张，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不是其教条形式作为他们的原则——那种教条形式执著于从经济基础、从依赖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在于对被异化并产生着异化的社会条件进行一种特殊的批判。批判理论家们本人的理论来源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工人运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青年马克思的经历。对艾里希·弗洛姆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来说，对青年马克思的发现决定性地坚定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认为他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出版<sup>[12]</sup>促使马尔库塞在弗莱堡成为海德格尔圈子的成员，因为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本真存在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正确的处理。正是在马尔库塞阅读青年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sup>[13]</sup>的时候，对他而言马克思才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的重要性。在他眼中，青年马克思实现了正确的哲学，而且证明了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危机，而且是威胁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的大灾难。因此，急需的不是政治的或经济的改革，而是总体革命。弗洛姆也是如此。在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团体的早期，他是继霍克海默之后的最重要的理论天才。他在读了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之后确信，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关键在于对人类真正的本质进行反思。但对阿多诺来说，青年马克思并不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尽管如此，阿多诺还是在他讨论音乐的第一篇长文——发表于 1932 年《社会研究学刊》的

“音乐的社会地位”<sup>[11]</sup>——中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封死了所有的道路，人在左冲右突，希望冲出看不见的藩篱，所以说人类尚未达到其本真的存在。<sup>[12]</sup> 生命缺乏生机 (Life is not alive) ——这个青年卢卡奇的论题是青年批判理论家们的驱动之源。马克思主义能成为他们的灵感来源，首先在于它就是以这种经验为中心的。只有霍克海默的思考主要是从对强加于被剥削和被损害者之上的不公正的愤怒中汲取力量的。(这种情况在本雅明身上出现得比较晚，在马尔库塞身上则出现得更晚。) 另外，对霍克海默来说，对以下事实的愤怒可能是最关键的：布尔乔亚一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最广大公众负责的理性行动及其可以预计的后果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特别具有特权的个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也是相互疏离的 (alienated)。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说霍克海默代表了这个圈子的社会的和理论的良好良知，他不断地敦促他们的共同任务是拿出一套研究社会整体和现时代的理论，这种理论的主题应该是人类本身——这里的人类是他们自己历史性生活形式的产物，而且是一直以来和他们自身相异化的生活形式的产物。

“理论”是霍克海默1930年代热情关注的问题。从1940年代开始，他逐渐对其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没有放弃这个根本目标。他和阿多诺的合作被认为最终产生了研究现时代的理论，尽管这一合作在“哲学断片”这个暂时形态之后就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了。然而这种“理论”还是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招牌。不管他们怎样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二战”之后还都同样相信，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拜物教特性的批判传统中，理论必须是理性的，同时也必须给出正确的词语，来打破那种使一切事物——人类、对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听命的咒语。这两种要求的结合激起了持续的热情，从而使理论可能得以发展——即使是在日益非理性的社会环境下，理论陷于停滞，对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不断增长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访谈中，哈贝马斯说：“当我第一次见到阿多诺，看到他是那样激动地突然开始谈商业拜物教，看到他是怎样将概念运用于文化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的时候，立即被震撼了。随后我想：试着去做吧，就仿佛(阿多诺以同样正统的方式在谈论的)马克思和

弗洛伊德都是同代人。”<sup>[16]</sup> 他初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时候也是这种反应。这种理论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都让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充满了某种特别的理论使命感：虽然被疑虑和悲观主义所包围，但它依旧激励、激发他们去通过知识和探索寻求救赎。这种期待既没有变成现实，但也没有被背叛——它延续着。除了他们——因为属于人们所称的“犹太人”团体，他们注定成为布尔乔亚社会的“局外人”——之外，还能有谁延续这种期待？

7  
本书所探讨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前史及其历史长达半个世纪。这段历史经历的几个地点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日内瓦、纽约、洛杉矶、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贯穿历史的时代背景是：具有“黄昏特征的”<sup>[17]</sup> 魏玛共和国及其向纳粹主义的过渡；美国的新政、战争时期和麦卡锡时代；反共背景下的重建；以及西德的抗议和改革时期。在其历史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制度形式有：独立的研究基金会，为社会急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资助；作为集体存在的研究所的残余形式，它曾向许多无公职的学者提供过保护；一所依靠国家基金的研究所，或者说和批判社会学和批判哲学的背景反差极大的一所研究所。就“理论”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化而言，那范围就太广了，而且这些演变不能按照时序来描述，因此要把“法兰克福学派”划分成几个阶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能采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后来发生游离的各种趋势进行探讨：理论游离开了实践，哲学游离开了科学，理性批判游离开了对理性的拯救，理论性工作游离开了研究所的工作。本书的不同章节都对应这种游离的不同阶段。同时，如果从上下文来看批判理论，就能发现它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所暗示的可能的危机。最后我们将论及批判理论的两极——即阿多诺的和霍克海默的思想方式——在年轻一代批判理论家那里所取得的成果卓著的延续和发展。

长时间以来，只有马丁·杰伊的那本书大范围地对法兰克福学派史进行了探讨。但那本书写到研究所 1950 年返回法兰克福就打住了。杰伊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它不仅以已出版的材料为基础，而且也建立在和研究所以前的成员的讨论、洛文塔尔提供的大量信息，以及洛文塔尔

收集的一部分研究所的信件、回忆录和研究计划书的基础之上。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不仅建立在杰伊的那本书的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自杰伊以来陆续出版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些具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基础之上（比如杜比勒、艾尔德、洛文塔尔、米格达尔和泽奈尔等人的著作<sup>[18]</sup>），建立在法兰克福学派新出版的著作的基础之上（包括弗洛姆对第三帝国前夕工人阶级的研究 [沃尔夫冈·邦斯编并作序]，本雅明的《选集》[鲁尔夫·梯德曼编辑，并进行了大量的注释]），也建立在霍克海默身后在其《选集》中新发表的作品的基础之上（这些作品自1985年以来陆续由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和冈兹林·施密德·诺艾尔编辑出版）。<sup>[19]</sup>另外本书还建立在讨论的基础上，这一讨论是在作者和社会研究所以前和现有的合作者之间，和它的当代研究者之间展开的。

8 最重要的是，它建立在档案材料的基础上。特别要提到的是，霍克海默档案中保存的研究计划、备忘录，以及他与阿多诺、弗洛姆、格罗斯曼、科尔施海默尔、拉萨斯费尔德、洛文塔尔、马尔库塞、诺伊曼、波洛克之间的通信。以下材料也很重要：阿多诺和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Siegfried Kracauer) 之间的通信——它们和克拉考尔的其余未发表材料保存在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的德意志文献档案馆中；阿多诺和学术资助委员会之间的通信——保存在牛津的鲍德雷安图书馆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哲学系的私人档案；法兰克福城市档案馆收藏的关于社会研究所及其成员的档案材料；还有社会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研究所工作报告。

最后顺便说一句：如果不是阿多诺突然逝世，我将在他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当时他已经同意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 注释：

[1] Cf. Jürgen Habermas, 'Drei Thes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n *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Folgen*, ed. Axel Honneth and Albrecht Wellmer (Berlin, 1986), pp. 8–12; and William van Reijen, *Philosophie als Kritik*.

*Einführung in die Kritische Theorie* (Königstein, 1984) .

[2] Max Horkheim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37 (Frankfurt am Main, 1931) .

[3] 路德维希·克拉格施 (Ludwig Klages [1872~1956]),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 活力论运动 [1895~1915] 的领袖。所谓的活力论运动认为, 物理的、化学的法则本身不能为生命提供完满的解释。

[4] “Dialektik der Rationalisierung”, 于尔根·哈贝马斯和阿克塞尔·霍耐特 (Axel Honneth)、艾伯哈特·克纽德勒尔-邦特 (Eberhardt Knödler-Bunte) 以及阿尔诺·维德曼 (Arno Widmann) 的谈话,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45/46 (October, 1981), p.128.

[5] 阿多诺在1957年《美国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第二卷 (第82页) 对“管控世界” (verwaltete Welt) 这个德语词进行了解释: “被行政部门所控制的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 ‘verwaltete Welt’ ”。

[6]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1947);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London, 1973) .

[7]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1966);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London, 1973); and *Ästhetische Theorie*, ed.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70); *Aesthetic Theory*, trans. C. Lenhardt (London, 1986) .

[8] Michel Foucault, ‘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nft die Wahrheit? Ein Gespräch’, *Spuren*, 1 (1983), p.24.

[9]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73), vol. 1, p. 87.

[10] Jean-Paul Sartre, *Anti-Semite and Jew*, trans. George J. Becker (New York, 1965), pp.79-80.

[11]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6 (1937), pp. 245-94; in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86), pp.188-234.

[12]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1927);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Oxford, 1973) .

[13] Karl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trans. Gregor Benton, in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1975), pp.279-400.

[14] Theodor W. Adorno,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ZfS*, 1 (1932), pp.365-78.

[15] 见 1933 年 1 月阿多诺致克拉考尔的信。

[16] Habermas, Interview,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p.128.

[17] 这是卡尔·迪德利希·布拉赫尔 (Karl Dietrich Bracher) 在他的《魏玛共和国的解体》(*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Königstein, 1978) 一书中所使用的描述。

[18] Helmut Dubiel, *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ische Erfahrung. Studien zur frühen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Rainer Erd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Gespräch über Franz. Neu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Leo Lowenthal, *Mimachen wollte ich nie. Ein autobiographisches Gespräch mit Helmut Dubiel* (Frankfurt am Main, 1980), trans. as 'I never Wanted to Play Along: Interviews with Helmut Dubiel', in Martin Jay (ed.),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Berkeley, 1987), pp.15-159; Ulrike Migdal,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1); Alfons Söllner, *Geschichte und Herrschaft. Studien zur materialistischen Sozialwissenschaft 1929-1942* (Frankfurt am Main, 1979) .

[19] Erich Fromm,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 am Vorabend des Dritten Reiches. Ein Sozial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 ed. Wolfgang Bonss (Stuttgart, 1980), translated as *The Working Class in Weimar Germany: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trans. Barbara Wenberger, ed. Wolfgang Bonss (Leamington Spa, 1984) .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1974- ) .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achtzehn Bänden*, ed. Alfred Schmidt a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Frankfurt am Main, 1985- ) .

百万富翁之子费利克斯·韦尔建立了一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希望有朝一日将它献给胜利的德意志苏维埃政权

当罗伯特·维尔布兰特 (Robert Wilbrandt) 游历到柏林的时候，德国刚刚发生 1918 年的“十一月革命”。维尔布兰特当时 43 岁，从 1908 年起就已经是图宾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了。他是当时德国为数很少的信仰社会主义的大学教师之一，作为一名极左派，他对他的大学同事颇为厌烦。

他在柏林度过了一个革命的冬季。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天上午都为“遣散办公室”工作，这个机构主要负责把从战场上涌回的士兵安置到经济生产的岗位上去。下午，他协助“社会化委员会”进行工作。“主要的事务就是去临时准备马上就能派上用场的物资，特别是足够安抚人民的物资，使工业能够投入生产，解决组织生产上的种种问题。”<sup>[1]</sup>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政党都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腐朽垮掉之后的必然结果，而不可能“按照施舍未来的粥场的烹饪法提前烹调出来”（考茨基的说法）。它们在 1918 年突然发现它们自己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而脑子里却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基本概念。从“十一月革命”以来，“社会化”这个词已经家喻户晓。但它只是一个充满了歧义的口号，甚至连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Alfred Hugenberg) 这样的右翼分

子也能用它——他在 1919 年 8 月的《南德报》上解释他所支持的那种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人利益分配形式时，就使用了这个词，然而他之所以将这种分配形式称为“社会化”只是为了让“这种分配形式所涉及的人用上他们熟悉的词语”。<sup>[1]</sup>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去认真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成为某种切合实际的实践。维尔布兰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大学教师社会主义者中马克思主义成分最突出的，他在图宾根教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课程常常人满为患，因此不得不占用大学中的大礼堂上课。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和“实践的社会主义”的最早人物了。他在 1919 年春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者真正够得上社会主义者吗？》中这样抱怨道：

我不理会那些中产阶级和“祖国之友”，前者认为我有变成妖怪的危险，而后者在祖国危急的此时此刻，却对建设事业表现出了绝望的情绪。我向社会主义者们呼吁，是的，你们是忠诚的！你们忠诚于那个预言：因此你们在时机成熟之前一直在等待着。因此你们（还有面包师和屠户们）极其成功地谈着“已经成熟到可以社会化的公司”，相反你们不相信让它们成熟的时机已经到了！你们没有像实践的社会主义、合营和公社社会主义已经做的那样，在合作经济的果酱锅里把没熟的果子煮熟。你们听从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因而不去为自己探索新的形式——他们禁止你们去探索！……只有社会化，有计划地、正确地按部就班地完成向社会主义状态过渡，才能保证不让我们陷入一种（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经结束，而另一种（社会主义企业）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境地。现在急需的是保护公司，把它们转化成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这很清楚地说明了每个公司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这也能鼓励合营，为协作经营留出余地，同时可以将利润分配给全体人民，分配给那些在公司工作的人，从而让他们和自己，和全体人民建立起来一种内在的责任，激励他们去工作，让他们满足于可能的事物。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布尔什维主义”将以另一种方式完

成这个任务。它将鼓动起激情，人为地制造失业大军……它显然要求罢工和更多的罢工，认为可以通过使旧有的一切难以为继的方式来催生新的世界。<sup>[3]</sup>

社会化委员会的命运表明政府没打算要满足人民社会化的要求。政府甚至根本不准备以经济改革的方式做出象征性的让步，即使要进行经济改革也只是为了杜绝更为激进的要求。由社会民主党（SPD）和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成员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只赋予社会化委员会类似顾问的角色，而且将它的所有席位分派给来自不同派系的代表。在社会化委员会中，有两个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鲁道尔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卡尔·考茨基。考茨基还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其余成员包括，两个社会民主党成员、一个工联主义者、一些中产阶级改革家和一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大学教师：除维尔德布兰特之外，还有柏林政治经济学教授卡尔·巴洛特（Karl Ballod）、来自海德堡的讲师艾弥尔·勒德雷尔（Emil Lederer）、来自奥地利的格拉茨的教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umpeter）。委员会采取了某种折中的方案。生产资料的<sup>11</sup>社会化只能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来进行。社会化先从“所有权关系中垄断资本主义条件已经得到了发展的”那些经济领域开始。但是甚至在这一框架许可范围内的行动，也给官僚机构阻挠破坏了。关于采矿工业社会化、保险和渔业公有化和国有化的提案和暂行规定不仅没被公开发表，政府的经济部还试图修改它们。1919年4月初发生这事情之后，社会化委员会的成员们递交了一份抗议政府态度的辞职信，集体辞职。维尔布兰特十分沮丧地回到图宾根他的教师岗位上。

费利克斯·韦尔是他在图宾根1919年暑期班上的学生之一。这个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21岁的大学生在十一月革命期间穿着一套军礼服，和他的大学生互助会的同学好友一道自愿接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领导。他来到图宾根特地要参加这个社会主义教授的课程。韦尔写了一篇“社会化的本质和方法”发表在柏林的《工会》（*Arbeiteratt*）杂

志上；后来他接受了维尔布兰特的建议把这篇文章发展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是他在1920年才获得博士学位（由法兰克福大学授予），这是因为1919年10月他因社会主义行为短期被捕，被图宾根大学当局开除并被驱逐出符腾堡州所致。“社会化：在概念基础上的尝试，兼对社会化方案的批判”<sup>[5]</sup>这篇论文作为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编辑的“实践的社会主义”丛书的第七卷（也是最后一卷）出版。那时卡尔·柯尔施还是耶拿大学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sup>[6]</sup>柯尔施一直是维尔布兰特在社会化委员会的助手，早就开始在他自己的“实践的社会主义计划”之下发表题为“何为社会化？”的系列文章。战前他在英国的两年逗留期间，就是英国费边社青年小组的成员，他希望他的这些系列作品可以像费边社的通讯小册子一样，为那些“才智卓越之士”提供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理解，并能鼓励他们共同努力去实现正确的社会主义规划。

要么马上坚决地采取决定性的社会化措施，要么就决绝地放弃所有这方面的努力——这就是费利克斯·韦尔的博士论文的主旨。“这是肯定的”，他这么写道：

12 眼下这个样子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今天商人们不敢大胆地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因为罢工、高工资、重税、相互猜忌、对社会化的恐惧，这些使得他们心惊胆战；与此同时，德国的经济生活逐渐枯竭了。

是返回自由市场，还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个问题。

那么回答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当下最大的任务吗？<sup>[7]</sup>

韦尔的这个说法不仅仅是策略上的让步（虽说韦尔的博士论文的主题的确得服从教授们的意愿，他们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者），对他而言还有实际的含义。这个观点反映了韦尔这位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和他父亲这个大商人之间的立场冲突。这种冲突虽说在犹太家庭中比在非犹太家庭中要常见，但是还不至于激烈到使儿子不顾一切而与他父亲的

世界断然决裂。对犹太人来说，财富可能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怨恨的根源，但同时也是抵抗这种怨恨的一种保护；因此财富激励他们认同于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只要能够使未来得到保证，捐弃财富就也是一种换取保护的形式，那时财富就不再必要了。1919年2月被暗杀的巴伐利亚共和国总理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以前就被人在报章上一再攻击，说他是个“加利西亚人”，是个“东欧的犹太人”，一个“外国人”，“来自莱姆贝格的”原名叫“所罗门·柯斯曼诺夫斯基”的间谍。

对韦尔来说，“是返回自由市场，还是走向社会主义？”这句话也有着特殊的含义。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商人的儿子。他的父亲，赫尔曼·韦尔（Hermann Weil）出身巴登州的商业家庭，1890年21岁时远赴阿根廷，那时他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谷物公司的职员。1898年的时候，赫尔曼·韦尔就和自己的两个哥哥合伙开始经营自己的商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自己的公司成为阿根廷最大的谷物公司之一，做的都是几百万的生意。但是后来这个百万富翁患上了一种疾病，有逐渐瘫痪的危险，于是在1908年返回了德国。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和萨哈希洛·哈塔（Sahachiro Hata）1909年在法兰克福研究出一种名叫“撒尔佛散”的药物，用以治疗梅毒。赫尔曼·韦尔和他的妻子、女儿和儿子（费利克斯·韦尔1898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定居在法兰克福。尽管如此，赫尔曼在法兰克福依然是个积极而出色的商人，把他的商业活动扩展到了财产投机和肉类生意的领域。直到1927年去世，赫尔曼一直生活在法兰克福<sup>[8]</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尔曼也曾经努力为国家事务效力。他凭着多年的阅历和众多关系研究分析世界市场的行情和战争中互相对抗的各个国家的谷物市场和粮食行情，并把分析结果提交给了柏林的政府部门。皇帝威廉二世很喜欢他报告中的乐观主义和对胜利的十足把握。但是赫尔曼对击沉同盟国粮船的后果估计过于乐观了，这一乐观的估计使得这场无谓的战争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他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潜水艇战争之父”的角色最终看起来是灾难性的。好在阿根廷

13

和德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战后马上和德国恢复了经济上的关系，因此赫尔曼的进口生意又很快发展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在这之后，他才成了法兰克福大学以及其他几个慈善机构的慷慨赞助者，并因其对社会研究所的捐资而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科学系的荣誉博士学位。

作为赫尔曼的儿子，费利克斯有他父亲这样的自由企业家作为成功的榜样。但是，这种生活对费利克斯来说并不具有什么吸引力。他和他姐姐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的，当初在那里的时候，父母都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时间；他们是由女家庭教师和仆人们带大的。到了法兰克福之后，直到他父亲的大别墅尚未建成的这段时间，费利克斯开始是住在祖母家，后来和家里人又住在一家饭店里面。也许是因为没有给孩子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投注太多的父爱而感到愧疚的缘故，赫尔曼并不坚持让费利克斯从事商业或者任何金融行业。费利克斯·韦尔不是天才的商人，不是天才的学者，也不是天才的艺术家，而是左派的赞助人（自他母亲 1913 年去世之后，他就继承了 100 万阿根廷金比索<sup>[9]</sup>）和一名业余学者。当时的青年人受战争和十一月革命所激励而投身于政治，他们坚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得多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实践性和优越性，这些青年们因而投身于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以便尽快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秩序中占据领导地位。费利克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他在献身于这一目标的时候，自己也同这个目标保持了一段距离。作为一名“沙龙布尔什维克”（在 1973 年社会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纪念会的讲演中他这么形容自己），韦尔的活动可划归德国共产党（KPD）右翼的范围。虽然他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保罗·弗勒利希（Paul Frölich）的密友<sup>[10]</sup>，而且他的岳父也是蔡特金的一位好友，但他始终不是一名德共党员。他还是柏林的马立克（Malik）出版社的主要赞助人，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版正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他还资助格奥尔格·格罗茨（Georg Grosz）这样的左翼艺术家。他第一次向格罗茨提供帮助的时候是在 1920 年代初，当时德国仍然是极度贫困的，而且当时格罗茨和他素未谋面。韦尔资助格罗茨

夫妇进行了意大利之旅，并用事先慷慨租下的波多菲诺的布劳恩城堡酒店的客房来招待他们。他还资助过德国共产党前领导人恩斯特·迈耶尔(Ernst Meyer)及其夫人，出资供他们长期旅游，当时迈耶尔已经失势，而且身在病中。

但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方面的努力也使他同德国共产党(KPD)建立起一些联系。德共在其早期阶段，对苏联或者“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没有太大的兴趣。德共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翼运动发展而来的。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德共的起源不是俄国革命的结果。“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不来梅激进左派”)在1919年初合并成为德国共产党。在合并之前，斯巴达克同盟的全国会议在柏林举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李欧·约吉谢斯(Leo Jogiches)在会上主张新党的名字应该叫“社会主义党”。他们认为，这个名字才符合实际，因为现在党的任务就是要在东方的革命者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应该在党的这一目标下争取西欧的广大群众。但是最后在党的成立大会上，还是极左派和空想主义的极端分子占了上风。从一开始，德共就只能在既有工人组织之外的边缘性工人阶级团体中吸收党员，这是它的难题。这些党员渴望行动，但是缺乏政治经验。

1921年3月，普鲁士秘密警察处发起解除工人武装的行动，这一行动遭到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抵抗，德共利用这一机会动员总罢工，并要求工人武装起来。为了刺激工人们行动起来，党决定采取在它的各个党支部，在柏林胜利纪念柱附近制造炸弹袭击的手段，但是最终失败了。这与1919年的柏林一月斗争中的情形很相似，也与后来1923年的“德意志十月”运动的惨败很相像。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谴责为“煽动的暴动”，但是在年轻而缺乏耐心的左派眼中，也可以把这看作是党愿意投入革命行动的证明。另一方面，德共努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合作，贯彻党的“联合阵线”政策，这些也表明党有能力在实际合作中明智地进行协调。

1920年代早期，苏联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NEP)，苏联在西方引发革命的尝试失败之后，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暂时妥协”已现端倪。但是在德国，全球革命的危机阶段以及对全球革命的期待仍在继续。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还没有开始，表面上看起来还有在党内进行争论和理论探讨的余地。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尝试着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性质和作用进行反思。

在这些努力中就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周”(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这个“研究周”选择在1923年的圣灵降临周开始，地点选在格拉贝尔格(Geraderg)的一个饭店，在魏玛西南的伊尔梅瑙附近，图林根森林的边  
15 上。研究周的发起人是费利克斯·韦尔和卡尔·柯尔施。整个活动由韦尔提供资助，而在此前几年，柯尔施就在图林根组织过几期“暑期班”。除了这两个发起人和他们的妻子，参加研究周的共有24个人，其中包括格奥尔格·卢卡奇、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和罗泽·魏特夫(Rose Wittfogel)、弗里德利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朱莉安·库姆佩尔茨和黑德·库姆佩尔茨(Julian and Hede Cumperz)、理查德·左尔格和克里斯蒂安娜·左尔格(Richard and Christiane Sorge)、爱德华·路德维希·亚历山大(Eduard Ludwig Alexander)和格特鲁特·亚历山大(Gertrud Alexander)、贝拉·福加拉西(Béla Fogarasi)和福本恒夫(Kuzuo Fukumoto)。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大多拥有博士学位。他们也都同共产党有联系。除了柯尔施、卢卡奇和亚历山大之外，他们都还不满30岁。黑德·马辛(Hede Massing)在她的回忆录里，意味深长地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sup>[11]</sup>研究会上引发讨论的问题，全部来自柯尔施和卢卡奇就一些论题所准备的讨论稿，这些论题和他们同年出版的著作中的论题是一致的。<sup>[12]</sup>柯尔施的研究以种种激进的关于社会化的民主主义观念为基础而展开，而卢卡奇的研究则从有关文化的观念——这种文化是被社会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文化——而展开。但是他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寻找一种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这种无产阶级看世界的眼光将不再是考茨基式的革命观，也不再是允许资本主义无休止地存在下去的改良派观点，而

是充满黑格尔辩证法精神的唯物主义的史观。柯尔施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结尾，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verwirklichen），就不能够消灭（aufheben）哲学。”<sup>[13]</sup> 这个引文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意味着同无产阶级结盟的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里不存在“疗救”无产阶级智力的问题，相反，必须把他们的智慧传送到无产阶级中去。“资优者（the Gifted）的教育和提升与劳动分工”是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研究周的一个论题。<sup>[14]</sup>

在格拉贝尔格举行的知识分子集会只出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边缘空间，而不可能发生在共产党的架构之内。它已经预见到了随后会出现的重重困难，即当最后的要务就是准备革命，而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开始既不信任据称是他们所代表的广大群众，也不信任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勇于自我批评的成员的时候，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有组织的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就紧张了，这些关系将会使这些困难暴露出来。但是在格拉贝尔格聚会的那段时期内，一切看上去还都是可能的。柯尔施从1920年3月开始就已经是耶拿的一名编外讲师，而且在同一年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表现出了一种其他人少有的尝试的愿望，他想通过学术和知识来证明一种开放的革命态度。几次都没有通过授课资格答辩（Habilitation）<sup>[15]</sup> 的卢卡奇，自1918年起就已经是匈牙利共产党党员了。与柯尔施不同，卢卡奇强烈希望他的才智能得到共产党官方的运用和承认。理查德·左尔格是地下共产党员中的活跃分子，同时还是经济学教授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Kurt Albert Gerlach）的研究助手。作为共产党员，左尔格在学术活动的掩护之下开展党的工作。几乎半数以上的格拉贝尔格聚会参与者，后来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社会研究所发生关系。实际上，格拉贝尔格聚会就是社会研究所“理论研讨班的最早形式”，<sup>[16]</sup> 也是费利克斯·韦尔作为左派赞助人所完成的最惊人、最重大的工作。

韦尔希望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制度化。这一愿望超越了中产阶级学术圈子的兴趣，也超越了德国共产党狭隘的意识形态考量，并且和理查德·左尔格的朋友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的计划不谋而合。

格拉赫是一名学术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彻底消除贫困和压迫所带来的实际好处之一就是学术自由。格拉赫 1886 年生于汉诺威，他的父亲是一位工厂经理。1913 年格拉赫在莱比锡通过了授课资格答辩，他提交答辩的论文是“论保护女性工人之措施的重要性”。<sup>[17]</sup> 此后，他在基尔供职于世界经济和航运研究所。“一战”期间，该研究所的全部任务就是解决战时经济的种种难题，费利克斯·韦尔的父亲那个时候给该研究所提供过财政、情报和出版等方面的帮助。从 1918 年起，他在他的居所组织学生举行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会，他从此成了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分子。1920 年，他在亚琛成为一名讲授经济科学的正式教授，而且成为给社会政策协会（Verien für Sozialpolitik）就大学中政治科学研究改革的问题提供咨询的专家，并且是那些专家中最年轻和最激进的一位。1922 年法兰克福市为他提供了教席，同时他也获得了与韦尔共同创办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研究所的机会。

格拉赫和韦尔兴致勃勃地开始他们的计划，这时候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有利：

1. 一个富有的父亲。他想作为一名大慈善家在法兰克福市青史留名，而且想获得荣誉博士的头衔。1920 年他就曾为此而努力过：捐赠基金以鼓励“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雇佣法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基金使用条例这么说），改善科研机构并资助“为实现社会安宁而努力科学地解决社会问题的”优秀学生 and 青年学者。但这种努力不太成功。老韦尔甚至想按照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模式为左派提供资金，以创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他这么做纯粹是想表现他的社会良知，也是想为他儿子的学术事业开路。那时费利克斯已经表现出某种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当然，老韦尔这么做可能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希望它有助于打通他的公司和苏维埃乌克兰之间的贸易关系<sup>[18]</sup>。

2. 法兰克福：这个城市和其他德国城市相比，犹太人的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也是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犹太聚居区。在这个城市，上层社会尤其热心于捐资兴建同社会研究、社会政治研究或经济学研究

相关的教育机构。(法兰克福大学在“一战”前就开始接受外界捐资的基金,这所大学没有大学通常都有的神学系,相反,它很早就有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在这个城市,中产阶级内部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表示同情。这里的沙龙和咖啡馆共同形成了中产阶级自由生活的一块灰色地带,在其中你很难分清谁是彻底同他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决裂的,谁又不是的。

3. 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文化部<sup>[19]</sup>一直有意于对棘手的大学进行改革,因此也很乐意提供帮助,只要你想努力在未来教育中提高社会研究的地位。

4. 格拉赫本人是一个有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教授,而且在基尔的世界经济和航运研究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个研究所是德国在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研究所)。他对在改革后的大学中推行社会主义研究和教学的可能性深信不疑,而且已经就自己的专业领域起草了初步的方案。

韦尔和格拉赫实施他们的计划时采用了两个步骤。在同法兰克福大学取得联系之前,他们先与柏林的普鲁士科学、艺术和教育部通了气。韦尔将他的计划向部里和盘托出,可是在与大学谈判的过程中却没有这么做。在1920年代末韦尔写给部里的一封信当中,双方就如何安排接替卡尔·格吕恩堡(Karl Grünberg)担任研究所主任的继任者人选发生了分歧,韦尔在信中这么说:

在我同他最早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枢密院官员温德(Wende)先生对我所说的就已经心中有数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我和我已故的朋友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教授)希望建立一个研究所,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并拓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当我们看到给大多数科学,甚至给那些直到那时还被认为“与大学不相配的”分支科学(商业管理、社会学等等)提供了那么好的工作条件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想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该得

到同样的鼓励……我已故的朋友，前任部长康拉德·黑尼希 (Konrad Haenisch) 完全支持我们的努力，而且，我们的努力完全符合普鲁士科学、艺术和教育部的精神，这一切都加快了谈判的进程。<sup>[20]</sup>

由格拉赫起草的备忘录构成了与大学谈判的基础。但是在这一备忘录中，马克思主义仅被顺带提了一下：

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无视最广泛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及其研究在科学和实践方面所显示的重要性。经济基础、政治和法律诸方面，直到共同体和社会中精神生活 (intellectual life) 最终的各个分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生活这个非凡的网络。只要想想国际工联主义、争取提高工资的破坏行动、罢工和革命运动、作为社会问题的反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德国的贫困化这些现象就够了。经验科学方面的理论家们如果离开充满活力的现实生活几乎无法开展研究，与此相同，仅就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人来说，他若没有训练有素的思维，若不使用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去把握经济和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构成的整个网络的话，要想生存下来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经济和社会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在长达几十年的方法论争论之后，它已经具备了充分严格的科学条件和科学方法，因而可能通过大量的客观事实开展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无论最终彻底摆脱价值判断的束缚这一难题是如何解决的。当指导纯粹研究的原则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或社会政治状态，而是要判断它们的价值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还想顺带说一下，数据材料的收集现在已经成为一项庞大的工作，再也无法单凭个人之力去完成了。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组织才能完成——说到底，社会阶层间关系的复杂性要求学术研究上的协调合作。因此，急需建立致力于上述任务的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的建立有助于填补既有大学机构范围内持续存在的空白。<sup>[21]</sup>

对普鲁士文化部的官员来说，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研究合在一起可能也不为错。而对自 1920 年代以来就完全支配普鲁士政治方向感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以现代科学研究的形式让马克思主义能跟上时代也是他们为大学制定的规划之一。因此从一开始，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 (Karl Heinrich Becker) 就基本上同意韦尔和格拉赫的意见——他在整个 1920 年代都是普鲁士和德意志文化政策部的部长。尽管他本人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员，而且魏玛时期之前还是个坚决的君主主义者，但贝克尔还是被社会民主党人所称道，因为他一直致力于改革，而且自 1919 年以来他不断强调要缩小大学中的专业分化，并鼓励引入跨专业学科。他对社会学尤其强调，因为这一学科完全是“由学科间的综合而形成的”，因此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工具：“在各个大学急需设立社会学教席。这里说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学，它应包括对政治科学和当代历史的学术研究。”<sup>[22]</sup> 几位既有专业领域的教授试图将社会学歪曲为“纯粹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对表明，社会学在当时还是一门有争议的、依然被庸俗定义的学科，它最初只在非大学的继续教育机构（成人教育中心和职业技术学院）中才被允许正式地设立。

除了文化部门表现出的善意和给予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保证了韦尔和格拉赫能够成功地实现他们创立研究所的规划——这个研究所既要和大学挂钩，又要独立于其外，直接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这个重要因素就是德国在贫困和财政拮据的时期所收到的大手笔的捐赠。韦尔家族愿意出资提供研究所的建筑和设备；而且愿意为研究所每年提供 12 万马克；并将研究所大楼的底层让与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后来甚至出资为研究所主任设立隶属于该系的教授职位。虽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很不满意研究所如此独立，可是还是同意了，因为当时学生人数迅速增长，而系里的教学空间极其紧张——这种压力促成了社会研究所的迅速建成。可是像大学教务主任这样一些研究所的对头们，还是害怕有人出于党派目的而滥用研究所的场所；尽管他们百般刁难，但最后也只得认输。最后，只是在法兰克福市和

社会研究协会 (Society for Social Research) 之间订立的协议之上附加了一个条款——其大意是, 除非得到市政当局的书面许可, 社会研究所的建筑除了用作社会研究之外不得挪作他用。1923 年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作为法兰克福大学学术机构, 同时也服务于该大学的教的社会研究所”。3 月研究所大楼破土动工。

20 法兰克福研究所在德国是继设在科隆的社会研究所之后的第二个社会科学研究所。科隆社会研究所分为两个部门, 即社会学部和社会政策部, 该研究所从 1919 年起开始运转。科隆社会研究所由科隆市建立。创建的具体负责人是克里斯蒂安·埃克特 (Christian Eckert), 他也是成立于 1919 年的科隆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和法兰克福大学一样, 科隆大学是在既有的商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且在强调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这方面有别于其他传统大学。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是继基尔世界经济和航运研究所和科隆社会研究所之后的又一重镇。基尔世界经济和航运研究所是战前由伯恩哈德·哈姆斯 (Bernhard Harms) 创立的。这三个研究所今天还都存在。它们有共同的决定性特征 (尽管科隆社会研究所这方面的特征要少一些)。它们都在大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是又独立于大学行政之外, 直接向所在城市的文化部负责; 都把研究活动放在首要地位; 都愿意发挥大规模组织的优越性; 研究所与大学是这样一种关系: 一方面, 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研究所所在大学的正式教授, 另一方面, 大学里的研究生也参与研究所的科研工作。

这三个研究所在它们的财政和总体目标得以确立的方式方面, 又有着显著的差异。基尔研究所的资金最初全部由一个赞助团体提供, 该赞助团体成立于 1913 年。这个赞助团体在“一战”开始时由 200 人组成, 1920 年代末扩展到了 2,500 人。而且赞助团体对研究所怎样使用基金并不干涉。这些基金被捐作校产, 但是得由赞助团体决定研究所主任的人选。这种传统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 基尔研究所本身就是作为“基尔克里斯蒂安·阿尔布莱希特大学航运和世界经济皇家研究所”而建立的, 而且由显赫人物提供资助。这些资助者中就有大军火商克虏伯

冯·波伦－哈尔巴赫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 正是由于他的帮助, 研究所才能在 1918 这“要命的一年”(该研究所的建立者伯恩哈德·哈姆斯这么说) 要求在基尔湾附近大兴土木建设研究所大楼。由于基尔研究所和商务、政府文职部门和政治方面的领军人物有紧密合作, 这使得该研究所的世界观无法超越一般德国大学所具有的通常范围。

科隆研究所是由城市提供财政支持的(头一年的预算: 12 万德国马克)。“学院体系”和“态度严肃的学者们由于世界观差异而形成的和而不同的”富于成果的协作(埃克特在描述研究所时这么说)相结合, 这使研究所两个部门各自对自己所属的政党负责。<sup>[23]</sup>符腾堡地区政府前总理胡戈·林德曼 (Hugo Lindemann) 是该研究所社会政治部主任, 他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学家。而社会学部主任则是列奥波特·冯·维泽 (Leopold von Wiese) 和马克斯·舍勒 (Max Scheler), 前者是有自由主义背景的社会学家, 后者是天主教知识传统的代表(他应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 的要求担任该部门主任)。

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建制使得它能够把基尔研究所和科隆研究所的政治视野扩展到左派范围, 这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独特之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和航运研究所有一个研究会, 与此相似, 法兰克福也有一个注册的研究会为韦氏基金会提供资助。韦氏父子是这个仅由几个人组成的社会研究会的主席, 而其他成员也都是韦尔父子的朋友, 比如格拉赫、左尔格、霍克海默和克特·韦尔 (Käte Weil) 等人。研究所主任是由城市文化部和在社会研究会协商之后任命的, 因此费利克斯·韦尔就可以决定主任由谁担任。韦尔通常可以通过他的力量来干预任命, 因此他也可以决定支配研究所的意识形态路线——只要这是人力能做得到的。

对韦尔来说, 格拉赫是最理想的主任人选: 他年轻、在大学里事业有成, 而且是个“来自上流家庭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格拉赫 1922 年 10 月 36 岁上死于糖尿病, 当时的医学对这种病还束手无策。当时有两个熟人也对韦尔的研究所计划给予了鼓励和支持, 他们是弗里德利希·波洛克和马克思·霍克海默。“他们比一般的大学生都要大得多, 因为

他们本打算要从事商业生涯，接手他们父亲的工厂”，他们是“法兰克福大学 1923 年惟一以最优 (summa cum laude) 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两名学生”。<sup>[21]</sup> 然而，他们那时还不是社会研究所主任的考虑人选。格拉赫去世之后，韦尔意欲邀请居住在柏林的 51 岁的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迈耶尔 (Gustav Mayer)，并与其商谈此事。迈耶尔以前是一位记者，因写过一部一卷本的材料翔实的恩格斯传记而出名。他也是一个犹太人，1920 年代成为了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但是很快韦尔就明白了，迈耶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同他的不同。对韦尔来说，“为着一个共同目标”“相互理解、相互合作”恰恰是建立一个能达到其目的的研究所的前提。韦尔很幸运，他找到了格吕恩堡。

22 格吕恩堡 1861 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弗萨尼的一个犹太家庭。弗萨尼位于东喀尔巴阡山东麓的丘陵地带。他 20 岁时赴维也纳学习法律。罗伦佐·冯·施坦恩 (Lorenz von Stein) 和安东·门格尔 (Anton Menger) 是他最重要的两个老师。罗伦佐·施坦恩是个保守的立宪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使得为个人自由提供了所能达到的极限，因为在国家的帮助下，社会改良将迫使有产者阶级放弃不公正的要求。安东·门格尔则是一位极端的律师和社会主义者。他在论法律社会学的著作中从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出发对私有财产制度进行批判。格吕恩堡 1892 年改宗罗马天主教，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在 1893 年注册为律师并在 1894 年作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编外讲师开始他的大学生涯。京特·内宁 (Günther Nenning) 的格吕恩堡传记是现在能见到的第一部材料详尽的传记，这部传记中这样说：

在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帮助的情况下，从家乡来到维也纳开始了他的学习。他独自承担了学习所需费用，并且还资助他的弟弟。他弟弟是和他一起来到维也纳的，而且当时也在学习法律。他作见习律师对他的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无多大助益，因此四年后他为了一个法院官员的职位而放弃了见习律师的差事，虽然这个职位薪

水微薄，但是笔固定的收入<sup>[25]</sup>。

在这几年中，格吕恩堡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塞尔维亚地区农民的解放和庄园农户制度的废除》，这部论文篇幅近千页。这个论文题目受到了格奥尔格·弗里德利希·克纳普 (Georg Friedrich Knapp) 的启发。格吕恩堡 1890 年至 1893 年间曾跟随克纳普学习，后者是青年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这段时期格吕恩堡还发表了其他作品，一篇篇幅 50 页、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为 1898 年出版的路德维希·埃尔斯特 (Ludwig Elster) 经济学辞典撰写的“无政府主义”词条。<sup>[26]</sup>

1899 年末，他在社会主义者学者奥根·冯·菲利波维奇 (Eugen von Philippovich) 的帮助下，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临时教授。这使他得到了一笔有保障的收入，于是他放弃了一切法律实践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1910 年他创办了一份名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文献》(*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的杂志。用内宁的话来说，格吕恩堡是个“学究式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 (Max Adler)、卡尔·伦纳 (Karl Renner)、鲁道夫·希法亭、古斯塔夫·埃克施泰因 (Gustav Eckstein)、弗里德利希·阿德勒 (Friedrich Adler) 和奥托·鲍尔 (Otto Bauer)。但格吕恩堡的学术和理论活动并非仅限于学院圈子。他是维也纳成人教育中心和社会主义教育协会的创办人之一。但是格吕恩堡直到 1919 年之前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因为他从他的同事历史学家卢多·莫里茨·哈尔特曼 (Ludo Moritz Hartmann) 那里吸取了教训，后者是社会民主党员，因此只能当编外讲师。直到 1912 年，格吕恩堡 51 岁的时候才被任命为正式教授，对他的任命很多人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教授职位总体上说还不是政治经济学教席，而是新近设立的经济史教席。直到社会民主党人奥托·格吕克尔勒 (Otto Glöckel) 担任教育部主管的时候，格吕恩堡的教席才转为政治经济学，同时格吕恩堡也被任命为政治学研究所主任。

23 格吕恩堡 1919 年建议奥托·格吕克尔勒在维也纳成立一所“巴黎社会研究院 (Paris Musée Social) 式的科研机构”，并让卡尔·考茨基出任主任。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感到以他们的力量很难实现这个计划。当费利克斯·韦尔请他出任法兰克福研究所主任之职的时候，格吕恩堡觉得这是个好机会，首先能使他的计划得以实现，同时还可以让他摆脱他在维也纳正式或非正式的过于繁重的工作担子。就韦尔这方面说，他看重的是，格吕恩堡既是一个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立即同意格吕恩堡出任研究所主任，并于 1923 年 1 月初以投票方式一致同意提请文化部授予格吕恩堡由社会研究协会资助的教席。

尽管柯尔施和卢卡奇曾打算担当法兰克福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但是对韦尔来说，只有格吕恩堡这样的学者才合他的心意。因为柯尔施和卢卡奇都是政治上积极的共产党员，若他们担任主任将会招致大学界的公开反对。像维尔布兰特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者显然达不到韦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期望。维尔布兰特原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过高水平的阐释，但后来转而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并趋向一种消极顺从的态度，这些都和革命的冬天之后魏玛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有关。另外两个当时在德国大学里占据教席且有名的“社会主义者”——弗兰茨·奥本海默 (Franz Oppenheimer) 和约翰内斯·普兰格 (Johannes Plenge) ——更难符合韦尔的要求。奥本海默原先是医学博士，既而成为一名经济学科学家，1919 年在法兰克福成为社会学和经济理论的正式教授。他的教授职位是德国社会学的第一个社会学教席，这个教席是由法兰克福领事卡尔·科岑贝尔格 (Karl Kotzenburg) 博士为奥本海默本人设立的基金资助。卡尔·科岑贝尔格本人是奥本海默的朋友。奥本海默提出将社会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有效的一般办法就是打破“田产壁垒”，也就是说废除大规模的私有田产，他认为大规模的私有田产产生城市移民，造成城市工人的过剩。普兰格 1913 年在明斯特成为政治科学的正式教授，在那里他建立了政治科学教学研究所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Unterrichtsinstitut)。他由于在战争期间并在战

时经济中受到了民族团结的鼓舞，非常支持有组织的民族（national）社会主义形式，这种社会主义形式能够使劳资之间产生民族共同体认同感。

当格吕恩堡在法兰克福工作时，尽管革命和共产主义还是当时争论的主要论题，可是革命时期看上去的确是暂时过去了。1923年是个大危机的年头，到处是罢工，左派和右派都跃跃欲试夺取政权。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在州和地区选举中日益增长，即使在1923年11月各党力量受到控制达到平衡之后，即使是在1923年和1924年之间的冬天德共被暂时取缔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在扩大。在1924年国民议会的普选中，德国共产党得票370万，得票率为12.6%，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为20.5%）、德国国家人民党（得票率为19.5%）和中部/巴伐利亚人民党（得票率为16.6%）。德国共产党在1923年10月尝试发起暴动以惨败而告终，随后就是被取缔，但是这些事实根本无法毁掉它的形象。德国共产党于1924年4月7日至10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九大，虽说当时已经取消了对党的禁令，但是针对很多党的官员的逮捕令仍然没有撤销，因此党的这次大会还是非法的。由于当时法兰克福举办一个商品交易会，因此党的163名代表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当警察（当时由对共产党同情的社会民主党人控制）4月得知的时候，共产党的大会早在一个宗教青年招待所内开完了。这样的事情只能加强德国共产党激进行动的党派形象，让它显示出比它实际党员的总和要强得多的影响和力量。

罗莎·迈耶尔-莱文娜（Rosa Meyer-Leviné）回忆说：“韦尔的夙愿是创建一个类似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基地，这个基地的全体工作人员构成应该是教授和学生，还应该配备图书馆和档案馆，他想有一天把这个基地赠送给德国苏维埃共和国。”<sup>[27]</sup>

## 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格吕恩堡建立了以研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为目标的研究所

1924年6月22日，星期日上午11时，社会研究所成立庆典在法兰克福大学礼堂举行。研究所大楼是个四方形的建筑，建筑内外设计得功能齐备。在此次庆典上，格吕恩堡有机会发表演讲，大致阐明他的计划。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之声》(Volkstimme)说他的讲演“精练而感人至深，清晰而勇气十足”，但是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这个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报纸看来，这个讲演“生动而具有自我批判精神”。这些报道几乎都没有提到格吕恩堡对大学这种教育机构所作的议论——他认为大学是培养保守文化官僚(mandarin)的教育机构，是通过大众化的教育为社会生产未来官员的工厂。这些报纸也没有提到这个事实，即格吕恩堡在比较了众多研究所的特征之后，着重指出法兰克福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这一特征将使它独树一帜。<sup>[28]</sup> 这些报纸更没有提到格吕恩堡对学院体制的研究所和社会研究

25 所所做的比较，格吕恩堡指出，在社会研究所里“所谓的主任独裁”是行不通的。报纸对讲演的报道是有侧重的，首先侧重格吕恩堡关于他将如何努力发挥研究所长处的那部分内容：

不管怎样，在我们研究所内我同大家，尤其是同那些在意识形态观点、方法论观点有分歧的同仁共同行使领导权，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在对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我们要保持一致，而且只要是在我任期之内这一点就一定要得到贯彻。为了说明研究所实际预期的科学研究任务的性质，首先必须提请诸君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中的每个人每天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有那么一些悲观主义者，他们在巨变过程引起的毁灭中惊惶恐惧，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曾经让他们怡然自得、给他们带来好处、

他们也衷心喜爱的事物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仅视这种毁灭为他们的世界的毁灭，而且视其为世界本身的毁灭。对他们来说他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些由历史决定的、发展而成熟并因此注定毁灭的事物的消失。这一切对他们毋宁说就是死亡和毁灭本身。他们所真正缺乏的恰恰是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实际上，更根本地说，他们缺乏生活的意志。因此他们不能成为我们的老师或者向导，尽管他们可能非常愿意……

另外，与这些悲观主义者恰成对照的是，还有那么一些乐观主义者。他们既不相信西方文化的没落——或总体而言的文化的没落，也并不对这种没落的前景有所警觉。凭借某种历史经验，他们眼中只看到了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却没看到那是一种没落的形式。他们坚信：*magnus ab integro saeculorum nascitur ordo*，时机成熟之际新秩序将会应运而生。对他们来说，他们要求过时的事物应该给新生事物让路，以便让新生事物更快地成熟。

还有许多人，他们的队伍日益壮大，影响日益增长，他们不单单相信、期盼和希望，而且还以科学方式强有力地证明：将要形成的新秩序是一种社会主义秩序；我们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途，我们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向社会主义前进。我想诸位都知道，我也支持这种观点。我也反对历史传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法律秩序，而且我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30年前，我还曾想过要质疑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唯物主义史观。但是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发展教育了我，现在我不再疑惑。<sup>[29]</sup>

26

就这样，格吕恩堡认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这种历史观念自1880年代以来在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和演说中屡见不鲜。这里格吕恩堡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就是某种乐观的历史决定论，这难道不是跟追求科学客观性的学术要求公开唱反调吗？

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党派政治意义上

的，而纯粹是科学意义上的。它就是一个运用于经济体系自身的，用来描述某种意识形态的，用来清楚地描述方法论的术语……事情早就清楚了，唯物主义史观并不想对永恒范畴进行思辨，也不想去探究“自在之物”。它的目的不是揭示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永无休止的变化着的、永远在更新转化着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存在才是它的目标所在。这种转化的最终原因（如果它们是能被察觉得到的）和转化过程所遵循的法则才是它的考察对象。我们已经发现，正是那些在经济生活中有组织地起作用的各种物质利益，以及它们彼此的冲突所一同引发的驱动力，促成了社会从低级形态向更完善形态的有规律的发展。从唯物主义史观来看，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现象都是经济生活的当代形式的一种反映，同样，所有的历史——原始社会除外——都显现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史观自信有能力说明并解释社会主义是人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目标——但是也仅此而已。至于如何具体建成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它将怎样履行其职能等问题，则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阐释的方法论范围，这些问题必须要探讨，否则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阐释将脱离现实并迷失在预言和乌托邦幻想之中。

- 格吕恩堡认为他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是无可怀疑的，
- 27 因为他分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不同，并且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描述为晚近出现的历史学派的目的论历史观的一种变体。为此他还谈了对多元主义的看法：

直到现在，我们德国的大学界还普遍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点与国外大学界的态度截然相反，甚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一直也只是被勉强容忍罢了。在这所新成立的研究所中，马克思主义从此算找到了自己的家，就像自由主义的、历史学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信条在其他大学都有它们的家一样。<sup>[30]</sup>

与这段话一样直截了当的是，他试图用评论打消别人对他的怀疑——有人怀疑他是独断论者。每个人都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意识形态是科学研究的特定动力。但是这里需要的是“不断的自我检讨，以便发现是否犯了错误，在研究起点和目标的选择上，在从起点到目标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所遵循的方法方面，即研究过程的方法等方面难免会犯错误。”科隆社会学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埃克特以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他写道：“每一种研究工作都是从某个既定观点出发的，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研究者必然依赖于这种世界观，它是引导他生活方向的路线。但是，研究者通过某种自我约束经常能使自己养成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保持警觉和批判的态度。”<sup>[31]</sup>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在他 1904 年接手《社会学和社会政治文献》杂志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的时候，就曾经概略性地讨论过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难题，其他学者也曾谈过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悬而未决。无论是格吕恩堡还是埃克特，他们都没有反问一下自己：社会民主党人所实践的自我检讨也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奉行的自我约束也好，究竟能否与他们的研究结果兼容，或者它们与研究结果之间能否达成一种科学知识意义上的相互理解。格吕恩堡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即，社会存在的转化规律的研究——的目的，就是加速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诞生；那么，对他这样的学者来说，“自我检讨”意味着什么呢？埃克特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或者“对相互依存的社会存在的法则和形式以及它们的前提条件的真正洞察”的目的，就是“对我们所继承的东西有所提高”，“不是将我们继承的种种历史条件无情地抛弃，而是要对其进行社会重建”；那么，对埃克特这样的学者来说，“自我约束”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暂且搁置德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社会学研究所的代表性人物——格吕恩堡和埃克特——之间的争论。显而易见，他们心照不宣的是，即使对那些功成名就的学者来说，“实践利益 (practical interest) 的

28

至高‘价值’”决定着“文化研究领域中有组织的思想行为所选取的方向”（韦伯语），因而富有成果的相互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科隆的社会研究所遇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的时候，它的包容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也会变成沉默抵抗，就算这些代表性人物只是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和格吕恩堡，就算他们已经从众人尊敬的教授们那里学会了按照规矩从事他们的学术研究，情况照例如此。

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教授们可能会公开指出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差别，他们还能指望确立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他们的某些观点还可以被他们的同行视为“科学的”。相反，对于一个投身于社会主义的教授来说，这个范围在大多数教授看来则要狭小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格吕恩堡不想地通过费利克斯·韦尔认为可能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中赢得“背地里的”尊敬；他也不愿意像马克斯·韦伯希望的那样去公开地讨论问题。相反，格吕恩堡所做的就是充满自信地向那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些要求自然也是提供给其他学者的，希望他们不要外在地将他们的世界观当成衡量学术严肃性的标准。

格吕恩堡的自信是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培养起来的。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共产主义立场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有一定的势力。这种自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属于学术专业领域，社会改良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几十年来在这个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个领域中，19世纪中期以来就存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尽管他们必须不断地进行争取承认的斗争。直到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体系，并且要求对这一理论的探讨不应仅限于学术圈子，而且要把这种理论作为信条和指南推广到“下层人民”中去，才算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一战之后，社会民主党党员身份就不再是阻挠拿政府俸禄的限制条件（Berufsverbot）了。但是这种有身份的学者仍然注定要当局外人，注定要忍受同行的敌意。

当格吕恩堡公开承认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那不过是对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与这种意识形态截然相反，从来没有超出过中产阶

级社会改良主义的范围。同样，对格吕恩堡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起着准则作用的概念，但是他的实际研究工作却与这种观念相反，也从来没有超出历史方法的边界。在他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献》第一期所写的前言中，<sup>[32]</sup>他认为1910年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当时这一点是信奉历史方法、代表了普遍观点的学者们所否定的。《文献》杂志作为专业理论期刊，服务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格吕恩堡曾经致信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监”考茨基，希望他能参与该杂志的工作。为了避免让考茨基产生《文献》杂志是在同他对着干的印象，格吕恩堡特别强调他不会涉及对工人运动领导问题的理论专题探讨，而只涉及运动及其理论的历史。尽管《文献》为卢卡奇和柯尔施这样的撰稿人辟出了地盘，在1923年发表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但是其总的态度无非是历史学家的态度，就是去探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使得这个杂志的研究课题像文本批评那样十分繁琐。格吕恩堡对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认，在正确的方向上提供了对抗偏见的反偏见，从而使专家们在将其他课题视为当然的同时，还有可能以同样的审慎态度对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课题。

研究所就是《文献》杂志的一面镜子：这个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就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史及其批判。它为此类研究创造条件。它自己从事这样的研究，而且也支持其他学者从事这样的研究。

它所具备的便利条件在一开始就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这里有一个专业图书馆，1928年的时候馆藏已近37,000册图书，340种学术期刊和37种德国及国外报纸。它在同一年还已经具备一个可供5,000人使用的大阅览室。据波洛克发表于1930年的一篇介绍研究所的文章，这里还有一个档案馆，“收藏着很多文献材料，这些文献涉及1918年革命的历史、涉及对随后几年的工人运动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们在今天的同类材料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档案馆还收藏有“不计其数的小册子、招贴、请愿书、传单、汇报材料、通信和照片”。<sup>[33]</sup>研究所还为机构成员

和博士生设有 18 个小办公室——研究所给其中一些博士生授予学位。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符合该所所长的意识形态和研究兴趣。弗里德利希·波洛克和亨利耶克·格罗斯曼 (Henryk Grossmann) 是格吕恩堡的两位助手。波洛克于 1923 年在法兰克福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格吕恩堡未赴任之前担任过研究所的临时主任。格吕恩堡邀请他为合作研究员 (research associate) 时，他立即同意。格罗斯曼 1926 年加入研究所，也是应格吕恩堡之邀，担任合作研究员。格罗斯曼 1881 年生于克拉劳，是一个犹太矿主的儿子。格罗斯曼在维也纳学学习过一段时间法律和政治科学之后，成为了格吕恩堡的学生。在一战后期，由于重新划分波兰，格罗斯曼被迫成了波兰公民，因此他不得不放弃他在维也纳的博士后研究计划和他在维也纳的事业，转而接受华沙中央统计局的任命。最后，他在华沙成为经济史、经济政策和统计学的教授。<sup>[31]</sup> 但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他 1925 年失去了教授职位。

真正算得上研究所第一批助手的人还有罗泽·魏特夫，她担任图书管理员。她和格拉赫的前助理理查德·左尔格，以及左尔格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左尔格一起工作，直到左尔格夫妇俩 1924 年 10 月突然消失。后来才知道左尔格成了苏联的间谍。左尔格和他妻子后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合作研究员在莫斯科重新出现。1925 年罗泽·魏特夫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也成为了研究所的正式合作研究员。在研究所筹建时期，韦尔和格拉赫曾经邀请他帮助研究所。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曾是漂鸟协会 (Wandervogel)<sup>[45]</sup> 的积极分子，后来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表现积极，再后来从 1921 年起加入共产党。1920 到 1921 年间他和柯尔施一起执教于 Schloss Tinz 的无产阶级成人教育中心，从那时起，他就和柯尔施认识了，而且积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工人教育”。他既关心社会学，也对中国研究感兴趣，而且致力于社会主义教育。这些都很合格吕恩堡的心意。1933 年以前在“社会研究所丛书”中出版著作的作者们，都是这个由前面提到的助手们所组成的团体的成员：格罗斯曼，《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规律及其崩溃》(1929)；波洛克，《苏联计划经济中的实验 (1917-1927)》(1929)；魏特夫，《中

国的经济与社会》(1931)。<sup>[36]</sup>

这个团体中与研究所保持联系的其他人很难一一详细列举。他们中有博士生和奖学金获得者(有些后来还成为了研究所长期的合作人员),也有为《文献》撰写评论的研究所的支持者。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 Mandelbaum)和希尔德·魏斯(Hilde Weiss)是从格吕恩堡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他们俩同研究所及那份刊物的工作关系一直保持到1930年代。他们的论文分别是:《1895年至1914年帝国主义问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的探讨》和《阿贝与福特:资本主义乌托邦》;<sup>[37]</sup>1927年,保罗·马辛(Paul Massing)、朱莉安·库姆佩尔茨和海因茨·朗格汉斯(Heinz Langerhans)来到研究所撰写他们的学位论文。他们的论题都集中在社会主义史、工人运动史和经济状况史的领域。这些人物在后来——霍克海默时期,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研究所保持着联系。直到1930年代之前,他们要么本人 31 就是共产党员,要么对共产党抱有好感。

比如说吧,保罗·马辛在法兰克福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19世纪法国土地状况和各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土地规划》,<sup>[38]</sup>他后来在1928年成了莫斯科国际土地问题研究所驻柏林联络员,1929年又成了莫斯科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助理。1931年他返回柏林投入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他一度被拘捕到奥兰尼恩堡(Oranienberg)的集中营,后来他逃至法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奔走。在这之后,他1937年到1938年之间还回到过莫斯科,冒着生命危险公开声名和党脱离关系。1940年代期间他又开始在美国为社会学研究所的项目工作。

朱莉安·库姆佩尔茨是一位犹太工厂主的儿子。他的父亲30岁时移民美国,成了百万富翁,一战之后又回到了德国。库姆佩尔茨从1919年开始担任《对手》(*Der Gegner*)杂志的编辑,后来成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戏剧”顾问委员会的代表,1929年春访问过苏联,1927年来到研究所的时候他还是《红旗》(*Rote Fahne*)杂志的编辑之一。他以论文《资本主义土地危机理论:试析美国农业结构的变迁》<sup>[39]</sup>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研究所大迁移的那段日子,他自始至终都留在研究所当助

手，在此期间他最终还是告别了共产主义而变成了一个证券经纪人。

格吕恩堡在任期间，只有一个例外的人物，他的研究在研究所那些带有统一性的论题中显得与众不同。他就是列奥·洛文塔尔 (Leo Lowenthal)。自 1926 年起，他就一直拿研究所的奖学金，从事他的博士论文《19 世纪德国中短篇小说中的社会学》<sup>[10]</sup> 的写作。这部作品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事实充分证明，它是一部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的作品，在写作它的时代几乎没几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格吕恩堡之所以欣赏洛文塔尔，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在大学教学之余还积极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其他教育活动（详情见后）。

研究所在第一次尊重历史、仔细考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筹备工作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也具有象征性，象征了研究所的学术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超然于大学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控制之外。恩格斯将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全部未出版的著作作为遗产全部托付给爱德华·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和奥古斯特·倍倍尔 (August Bebel)，或者说全都托付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把这些作品的编辑工作托付给伯恩斯坦、梅林和考茨基等人，却不曾下功夫去系统地、仔细地考订校阅这些作品。他们却不惮于在马恩信件的编辑中大删大改，因此马恩信件的这个版本很不完善。早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员的大卫·梁赞诺夫 (David Ryazanov)，在一战前就曾经就当代政治问题参考过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未发表的作品。在倍倍尔的帮助下，他曾编辑过一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20 年 12 月在莫斯科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他认为这所研究院的任务应该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和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发展和传播”。<sup>[11]</sup> 在与伯恩斯坦联系之后，梁赞诺夫获得了在俄国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权利。

多亏有法兰克福研究所在其中扮演中介的角色，这一切才能顺利进行。研究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莫斯科研究院之间进行协调，在两者之间起到了政治上的缓冲作用。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身后未发表的作品收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的档案馆里，而编纂全集又非得要这些作品不可，因此工作的第一步应该从柏林开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要负责对这些作品的每一部分进行摄影拷贝，而且要尽可能细心地全部记录下原件无法再现在摄影拷贝上的一些特殊特征。<sup>[12]</sup>

莫斯科研究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合作，只有通过社会研究所这一中介才可能进行，并在社会研究所的推动下合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在1924年，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一方面和法兰克福研究所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谈判，希望在多方谅解的基础上在法兰克福市建立一个学术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将利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档案馆中收藏的手稿，出版4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sup>[13]</sup>

当社会研究所向法兰克福市提出申请，要求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社”纳入研究所编制之内，让费利克斯·韦尔和弗里德利希·波洛克担任该出版社业务经理的时候，遭到了法兰克福大学校长、教务主任和前任校长的抗议。他们认为这个出版社的名字和本大学的精神相抵触，按照这种大学精神，大学就应该独立于党派政治进行学术科目的教学，不应该有倾向性。政治警察接手了这个案子，调查了研究所的背景，并对几个人进行了审问。格吕恩堡就在这几个人当中。波洛克的名字很早以前就上了警察局的材料，这次警方对波洛克的“裁决”只能说明，这种靠着暗探罗致政治罪名的审判是多么的荒唐自大。波洛克和作为社会研究所负责人之一的韦尔，早已“同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买下了原属德国共产党的档案，并在慕尼黑苏维埃时期发挥过无法估量的作用”。<sup>[14]</sup>格吕恩堡向审问者担保，他既不知道他的合作者同“德国共产党柏林秘密档案”之间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的研究所里有什么“共产主义阴谋”。

33

最早对这些怀疑有所察觉的人是作为外国人的格罗斯曼。他申请授课资格，但是被拒绝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的这个做法让格罗斯曼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系主任 1926 年就曾向大学董事会汇报说，法兰克福警察局长“以前就反对（这绝不是针对格罗斯曼博士本人的）他在校注册为编外讲师，原因就一条，即格罗斯曼博士支持极左势力——尽管他本人还没有在政治上意识到这一点”。<sup>[15]</sup>但是出版社的事务还是排除一切阻碍地进行着，因为文化部长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会研究所撤回了将出版社纳入自己编制的申请，同意出版社留在研究所外。但是最后人们还是发现出版社是设在研究所内部的，这时候，反对者们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出版事业的真正学术性是明摆着的。右翼自由主义报纸《法兰克福消息报》(*Frankfurter Nachrichten*) 1934 年 1 期发表了以“反阶级斗争”为题的社论，说：“我们要坚定地丢弃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它是注定要衰落的——但是我们不会反对托马斯主义。”就像这个文章说的，实际的阶级斗争实践注定要受到谴责。但是在那个稳定的年代里，实际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失去它的重要性了。192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 Marx-Engles Gesamtausgabe*) 12 卷，还出版了一个两卷本的杂志。这个杂志除发表了俄国马克思研究者的文章之外，还发表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及马克思和维拉·沙苏利奇 (*Vera Zasulich*) 的通信。

34 格吕恩堡 1928 年由于中风而不得不停止工作之后，还继续在法兰克福待了三年半。其实自从他当初来到法兰克福之后，他的健康就每况愈下，他为建立研究所并使它确立牢固基础而耗尽了自已最后的力气。中风后他又活了 12 年，心智和肌体经受瘫痪的折磨，于 1940 年去世。

他在法兰克福营造了德国学术界内独一无二的学术环境。在这个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在大学里得到研究，只要他愿意，任何人都可以以该领域内的论题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在法兰克福有一个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教授，他公开信奉马克思主义。这里有一个挂靠在大学的研究所，它被规定的特殊任务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研究工

人运动，而且卡尔·柯尔施与马克思·阿德勒、弗里茨·阿德勒和奥托·鲍尔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这所研究所里开讲座。弗里德利希·波洛克和亨利耶克·格罗斯曼，这两位研究所的助手当时还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授课，在系里格罗斯曼1927年还通过了授课资格答辩，波洛克随后也于1928年通过了授课资格答辩。1930年格罗斯曼被任命为该系教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编辑工作实际上也被看作是法兰克福大学工作范围内的一项学术任务。

对一个挂靠在大学的研究所而言，还有一个条件是绝无仅有的，那就是该机构的学术助手和博士研究生绝大多数人都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们属于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当时都不在共产党内了。比如说吧，这里有科尔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都赞成共产主义，但都拒绝承认苏维埃俄国的发展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这些人中有海因茨·朗格汉斯、库尔特·曼德尔鲍姆和瓦尔特·比哈恩（Walter Biemann）。这里还有布兰德勒主义者（Brandlerians），他们支持和社会民主党联盟，采用权宜的解决办法；这些人中有恩斯特·弗勒里希（Ernst Frölich）和克里姆普特（Klimpt）。这里还有共产党员，他们（仍然）依照党（有时候党是斯大林化的）的方针路线或党的方针路线的变化而行动；他们中有弗里茨·绍尔（Fritz Sauer）、保罗·马辛、威利·施策勒维茨（Willy Strzelewicz）和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1929至1930年之间，法兰克福的这种特殊的学术环境的优势已经显而易见了。就在这时，发生了关于格吕恩堡继任者的争执。法兰克福大学在1928年到1932年之间发展很快。“许多出类拔萃的学者接受法兰克福大学教席。法兰克福大学众多研究所拥有许多成员，他们配备有先进现代的设施，这些研究所要么是开先河地首次创立，要么就是同类研究所中的佼佼者——这与当时法兰克福大学的进步精神是相一致的。”1928年当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接受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的教席的时候（该校没有神学系），他认为法兰克福大学是当时“大学中最自由、最现代的”。<sup>[16]</sup>这种优势环境不仅仅要归功于社会民主党和中产阶级的民主精神，而且要归功于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的文化

政策。他从 1925 年以来在普鲁士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长，而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员身份的首相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领导并由所谓的魏玛大联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联合）的党派代表组成。由于魏玛联合在普鲁士比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持续得更久，因此那里的状况也比德国其他地方更加稳定。

在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 1920 年代末几乎和在十一月革命后那些年一样受到尊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法兰克福富有家庭子弟们尤其具有吸引力。当时《法兰克福报》的领导层也有对社会主义同情的左派人士，即使这样他们也和理查德·默顿（Richard Merton）这样的法兰克福名流一样，抱怨说“社会主义者”和“赤色分子”在进行“渗透”。在 1929 年格吕恩堡作为荣誉退休教授退休。他的退休意味着他的那个教授位子空了出来，尽管按照合同他 1932 年之前一直是研究所的主任。当 1929 年就格吕恩堡继任者问题发生争议的时候，费利克斯·韦尔坚决捍卫自己的立场，此时他的态度甚至比创立研究所的时候更为坚决。在给科学、艺术和教育部部长的一封长信中，费利克斯·韦尔特别强调他将研究所的工作和他的参与看作是他的终身事业。他没有取得正式授课资格（这是他自己的打算），而且也只承担过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但这完全是因为他要时间来负责家里生意上的事务——虽然他对生意根本不感兴趣，另外还要花更多时间照料父亲的病，后来还要料理父亲的后事。尽管研究所的任务自始至终就是要服务于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是

创立它时进行的谈判、格吕恩堡教授所发表的就职演讲、我们的出版物和研究所的科研及教学活动都证明了，它作为一所服务于一般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研究所是毫无问题的——尽管在研究所的名称或章程上没有特别体现这一点。

研究所的任务在当初同政府部门最初谈判时，早就谈得很清楚了。

1924年6月22日在大学礼堂举行了研究所成立庆典，科学、艺术和教育部部长和高级部长（Senior President）的代表出席了，市长和市府以及州政府当局的其他官员也出席了。当着他们的面，我本人，特别是格吕恩堡教授在它的讲演中，都公开地、纲领性地否定了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任何误解和敌意都无法阻碍研究所——“当今世界这类研究所只此一家”——在未来继续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并扩展到绝对的政治中立领域。重新任命其他人接替格吕恩堡的教席对韦尔来说还不是很急的事情。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找到接替格吕恩堡担任研究所主任的合适人选。这个人应该在“研究所成员圈子里选举产生”。使他感到不好办的是，政府部门不顾他的要求，在他能够“从我们的圈子里推举一个在年龄和成就方面都不会招致反对的候选人”<sup>[17]</sup>之前，就提出了该教席的重新任命问题。但韦尔最后还是成功地使政府修改了1923年制定的研究所组织章程，原来的章程规定，研究所主任的任命应经过与社会研究协会的“协商”，现在改为“应取得社会研究协会的同意”。

另一方面，学院的反对意见也公开化了。法兰克福一位经济学理论教授弗里茨·施密特（Fritz Schmidt）1930年7月致信普鲁士文化部抱怨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用人标准是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上的，“很多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许多人是外国人）”近来汇集在研究所旗下，其具有蛊惑力的煽动性与日俱增。他又颇具威胁性地补充说：“政府部门对这种情况绝不能坐视不理，因为现在对国家抱有敌意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普鲁士理应受到控诉。”<sup>[18]</sup>在这里他即暗指普鲁士政府1930年6月的一项规定，即作为公务员加入纳粹党（NSDAP）和共产党都属非法，同时也是在利用这一规定作借口，好通过政治手段来更为根本地压制学术争论的继续。

## 哲学家霍克海默成为研究所主任。新规划：通过将社会哲学和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熔铸于一炉来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1930年10月，弗里德利希·波洛克（自1925年以来他就是费利克斯·韦尔的代理执行人）代表社会研究协会的赞助团体同两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的马克斯·霍克海默签署了合同。合同第三段如下：

37 霍克海默教授自今日起担任研究所主任之职。一旦格吕恩堡教授从严重的疾病状态康复到能重新担任主任之职的程度，霍克海默教授则应该努力与他达成相互的理解共同分担主任的职责。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霍克海默教授至迟也应该从1932年2月10日起全权负责研究所。<sup>[49]</sup>

格吕恩堡作为荣誉退休教授退休之后，社会研究协会的赞助团体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系无法就接替他的教席的人选达成一致；这个人选原则上应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对社会研究协会的赞助团体来说，这个人选只有作为格吕恩堡在研究所的主任职位的继承者才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双方达成如下妥协：即使格吕恩堡的教席在其他教授职位空出之前一直由系里认可的人接替，但是社会研究协会的赞助团体仍然同意继续资助。新教席（也是研究所主任资格）设在哲学系，1930年7月末，霍克海默被任命为该教席教授。多亏了蒂里希（他和格吕恩堡的直接继任者阿道尔夫·洛威 [Adolph Löwe]<sup>[50]</sup>一样，是一位宗教社会学家）和来自文化部的压力，霍克海默才能在这所他取得授课资格的大学被破格任命为教授。但是，哲学系也强调这个教席不是作为哲学和社会学，而仅是作为社会哲学而设立的。

霍克海默能成为格吕恩堡主任职位的继承者，这里面存在着意外因素。他不属于费利克斯·韦尔1929年11月给文化部的信中所提到的那种与研究所“走得很近的研究合作者”。在研究所出版的系列作品中

打头阵的波洛克和格罗斯曼，与研究所的关系要比霍克海默近得多。霍克海默 1930 年之前只发表过一篇不起眼的博士后论文和三四篇评论其他学者的文章。他也谈不上跟研究所有什么更深入的合作。起初作为哲学编外讲师，他曾经在研究所主持过几期关于社会哲学的研究班，另外就是他的一部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被列入了研究所丛书下一辑的第六卷，韦尔曾经在给文化部的备忘录中提到过这件事情。后来霍克海默在给费利克斯·韦尔的一封信里是这么描述他的任命的：“出于纯粹技术性的考虑，我们决定应该由我来担任研究所的主任，仅仅因为这比弗里茨或者你来担任要好通过的多。”他说的是事实：波洛克和格罗斯曼在政治上受到怀疑，而霍克海默则没有。但是，直到那时在研究所几乎没什么位置的霍克海默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成为主任人选，主要还因为波洛克出于友谊的原因撤出了参选。因为霍克海默几乎没有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教授职位，因此他汲汲于获得主任的位子，这样就能为他打开使他的学术事业半功倍的前景。洛文塔尔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当时我们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霍克海默《资产阶级精神哲学的起源》(*An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的完成，后来它于 1930 年出版成书……似乎可以说，1929 年研究所的大部分活动都致力于制定战略规划。我们成功了：霍克海默成了教授并且当上了研究所的主任。

哲学系之所以能接受对他作为社会哲学教授的任命，是由于他“极高的天赋、广博的知识、在认识论方面的良好训练、非凡的教学才能”，以及“他作为一名教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sup>[51]</sup>

1931 年 1 月 24 日，霍克海默作了社会哲学教授教席和社会研究所主任上任的就职报告。这个报告是充满个人风格的杰作，它的思想可以大致作如下概括。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史在黑格尔的社会哲学中达到其顶峰。按

照黑格尔社会哲学，个体的存在意义取决于其所属的整体的生活。这种整体根本不关心人类个体的幸福与善，但是唯心主义的思辨使得人们有可能看到那些隐藏在这种漠不关心背后的意义与理性。在整个 19 世纪，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进步，人们开始发现社会整体的形成过程对个体而言越来越少了任意性和不正当性，相应地，人们也较少希望出现转变。但是这种希望破灭了，转型的迫切性再次浮现。今日社会哲学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满足这种转变的需要。但如今的社会哲学基础却是已不再稳固的哲学观念。当代的知识状况要求不断地将哲学和科学的各种分支熔铸为一体。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哲学对社会进行讨论，同样存在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即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和文化领域变迁之间的联系。然而，这是一种用当今的方法和提问方式对旧有哲学问题——特殊理性与普遍理性、生活和精神（Geist）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做的阐述。为了在这里获得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就应该被放在一个更为严格的基础上来讨论，充分考虑到各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

39 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集团就是工人阶级。问题应该从这个集团入手。因而，对一个熟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社会哲学家来说，现在有机会来领导大规模的经验研究机构（apparatus），并且开始“在我的帮助之下”运用这套机构“去建成一个即便规模极小，但能与社会理论中的哲学思考（philosophical construct）和经验主义相并列的有计划的工作领地”。这就需要一种“依据当代的哲学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研究”规划的严谨方法，“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够在这些当代哲学问题当中形成紧密的合作。”<sup>[52]</sup>通过这种方式，霍克海默含蓄地断定，19 世纪的这项运用科学、技术和工业来使社会整体对个体更少任意性和不正当性，相应地人们也更少希望出现转变的规划，将会被重新执行，而且会以当今更先进的方法继续进行，也会有更好的成功前景。

这传达出一种新的口吻，完全不同于格吕恩堡早先所见证的那种对于“迅速发展时代中”生活意义的理解。这种新口吻没有丝毫的忧郁

之情，而霍克海默在他的这个演讲中曾提到，忧郁之情正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没有转变特性（non-transfigurative character）的“惟一现代哲学著作”——所阐述的“个体的存在哲学”最典型的特征。相反，霍克海默的口吻充满希望，他希望与转变意识形态相反的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能够通过为这个世界带来意义和理性的方式服务于人类。这是一种介于青年马克思和晚年弗洛伊德之间的口吻——青年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行动来实现哲学；而晚年弗洛伊德则推进了一种最为谦逊的科学进步，这种科学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新颖的，1927年弗洛伊德在《一种幻觉的未来》中这么写道：

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让人懂得人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之外别无他法。因此他可以学会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放弃对其他世界的期待，通过把以这种方式解放出来的一切能量全都聚集到人的世俗生活中，人类才能成功地达到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文明再也不会压迫任何人。<sup>[53]</sup>

显然，研究所的这个新主任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比他所鄙视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彻底地离开了一个他随后特别提到的主题：即哲学家们漠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在他后来出版的一个哲学警句格言集《破晓与黄昏》（*Dämmerung*, 1934）\* 当中，霍克海默谴责了哲学家对人类苦难的漠视。霍克海默最初的活动似乎已经表露出他的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他是某种革命信息的传达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排除一切危险，妥善地保存这一革命信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格吕恩堡和韦尔已经公开承认了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此时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必须，而且各种引起争议的革命信息也可能在研究

---

\* 在德语中“Dämmerung”一词有破晓和黄昏两种意思，该书的英文本即译作《破晓与黄昏》（*Dawn and Decline: 1950-1931 and 1950-1969*, New York, 1978）。——中译者注

所内找到听众。霍克海默的就职毕竟对研究所有利：研究所现在有了一个新主任，而且这个主任在他大学同事的眼里看上去比格吕恩堡更靠得住。各种因素的有趣联合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霍克海默尝试克服马克思主义危机的途径是利用“资产阶级”科学领域的现代发展；他将卢卡奇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揭示出来的哲学因素与舍勒在哲学中引入大量经验知识的综合工作联系起来——他做这样的结合依据的是这样的学术背景：即马克斯·韦伯和海德格尔均反对思考在世的前存在意义和人类的超历史本质。

霍克海默领导下的研究所，并没有改变支持青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生及同类性质学术的政策。例如，约瑟夫·杜纳尔（Joseph Dünner）是共产主义“红色学生团”（Rote Studentengruppe）的成员，经柏林的魏特夫推荐，研究所为他在法兰克福撰写关于国际工会主义运动的博士论文提供每月130马克的资助。

研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并不意味着要与格吕恩堡已经确立的传统决裂，也不意味着要与那些依然秉承他的精神工作的同事们相决裂。实际上，正如霍克海默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所说的，“理论经济学、经济理论和工人运动史等领域的个人研究的独立工作”和集体研究工作一起都在继续进行着。另外，《社会研究学刊》取代了格吕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献》（1930年出版了最后一期），但是从出版者和内容来看，都还反映出了一定的连续性。这个新杂志加大了文章的分量，收入了更多系统的评论，而且为讨论格吕恩堡时期那些论题的人以及在他的《文献》工作的人均留出了空间。然而，由于研究所工作的重点从社会史向社会理论的转移，原来那些高居于垄断地位的论题和观点逐渐趋于沉默。因为集体工作有了新的中心，原来那些论题也就和其他论题一样，只是兴趣范围不同罢了。对于那些不理解将他们原先的合作研究纳入更大框架的人来说，这可能有点让他们有蒙羞的感觉，也可能是一种背叛吧。

这种在某种意义上对格吕恩堡的所谓背叛，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向研究所草创时期——格拉赫时期的一种回归。格拉赫甚至在写研究

所备忘录之前，就写过一份论政治科学改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必须重新组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迫切需要哲学和社会学之间更大的统一性，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专家之间的协调合作。他强调学科间的“广泛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这些广泛的接触才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来自“生活的全景”的意义。<sup>[54]</sup>

由领域扩大引起的这种重心转移，也明显地表现在给研究所定调子的研究人员圈子的变化上。1929年2月16日，德国西南部精神分析协会的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成立，地点就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在的同一座大楼里。列奥·洛文塔尔的老朋友，艾里希·弗洛姆就是这个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成员。而且自1930年至1931年的冬季学期起，“弗洛姆博士（柏林）”就上了社会研究所教学人员名单，跻身于“教授霍克海默博士”、“教授格罗斯曼博士”、“编外讲师波洛克博士”当中。<sup>[55]</sup>

从一开始，西奥多·魏森格隆德（Theodor Wiesengrund）就是《社会研究学刊》的重要合作者，那时他写了一篇音乐批评。他有时候也用正式注册的两个姓氏称呼自己：魏森格隆德—阿多诺。他是霍克海默、波洛克和洛文塔尔的老朋友。他最早希望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是霍克海默和波洛克没有同意。这可能是因为霍克海默反对阿多诺所支持的“解释”哲学，但也可能还因为他们不想给阿多诺提供经费赞助——阿多诺的家人可以为他提供优厚的资助。

1932年，洛文塔尔首次在法兰克福认识了赫伯特·马尔库塞，互相进行了多次讨论，这使得马尔库塞被研究所接纳——在这之前，霍克海默最早就曾经隐约表示过有意为研究所带来“里茨勒（Reizler）推荐的海德格爾的一个学生”。<sup>[56]</sup>

与霍克海默一样，这些人物代表了魏玛文化的另一面，它与1920年代研究所的合作者们所代表的那一面截然不同。

## 霍克海默和他的助手：传记全景

### 马克斯·霍克海默

“我生于1895年1月14日。作为实业家莫里茨·霍克海默的独子，从我出生的第一年起，我就被期望成为我父亲的接班人，去接管一个实业公司。”1924年，霍克海默为申请授课资格答辩填写履历的时候是这么开头的。他的父亲莫西·霍克海默（被叫做莫里茨）是一位商人，他的祖父也是。他父亲工作兢兢业业，直干到拥有了斯图加特附近楚芬豪森（Zuffenhausen）的几家纺织工厂。当时斯图加特还是符腾堡王国的首府。霍克海默双亲都坚定信仰犹太教，而且一直（至少是在他们儿子的童年时期内）按照“一种严格的——我不愿意说教条的，但至少是保守的犹太方式”生活。<sup>[57]</sup>他的父亲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不仅因为其商业上的成就，而且还因为他资助艺术，并为慈善事业和爱国捐助慷慨解囊，尤其在战争期间也是如此。1917年，巴伐利亚国王为表彰他“在每个可能的社会福利领域内的慈善活动”而授予他“商务顾问”（Kommerzienrat）头衔，这是给杰出商人的荣誉称号。1918年，他还获得了楚芬豪森小城的市民权。霍克海默的父亲自视为一个标准的德国人，即使1933年他被迫出售了他的“犹太产业”，后来甚至连别墅都要放弃，他也拒绝离开德国，直到1939年。他给已经到美国的儿子写信说，毕竟，比起希特勒先生的家来说，他们家在德国生活的时间还要长一些。

莫里茨·霍克海默的父亲权威由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了加强：中产阶级家庭结构，他作为商人的成功和犹太传统。这个男孩按照家里的计划在毕业前一年就被带出学校，1910年在他父亲的商业事务中开始了学徒期。次年，他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了弗里德利希·波洛克。他比霍克海默长一岁，是一位早已脱离犹太教的皮革制造厂厂主的儿子，相应地他从小受到的是非犹太教的教育。所以，波洛克对霍克海默来说，成了促使他反抗他保守家庭背景的第一个刺激因素。他们的这次相遇是将要持续一生的亲密关系的开始。具有严格限制的默契保证了这种友谊：

他们知道他们之间在某些时期的争论应该怎么进行、进行多长时间、在什么时机下进行又在什么时机下得出结论。他们之间的默契使得这种友谊成为了一种“人类批判激情的表达，人类大团结的创造的表现”。<sup>[58]</sup>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某种努力的明证，这种努力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想要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坚固堡垒，使他们能够开展同现实之间的战斗。他们一起阅读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左拉这些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主义批判者的作品；一起阅读投身于充满了苦行主义和博爱的生活的托尔斯泰和克鲁泡克金的作品；一起阅读叔本华的《生活智慧格言录》<sup>[59]</sup>和斯宾诺沙的《伦理学》；一起阅读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杂志《火炬》(*Fackel*)；一起读反对战争、反对战前欧洲资产阶级世界的文学杂志——政治观点激进的弗朗茨·普芬费尔特(Karl Pfemfert)编辑的《行动》。这些阅读更加让他们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霍克海默的父亲看到儿子健康很差，而且被内心的矛盾折磨得苦不堪言，于是就决定为儿子提供富有之家传统采用的康复办法：送他出国做一次长途旅游。同波洛克一起，霍克海默的这次旅游度过了一战之前的18个月。在这期间，他最初是在布鲁塞尔接受治疗（其间有几次巴黎探险的经历），后来又去曼彻斯特和伦敦继续治疗。当“一战”爆发的时候，霍克海默刚刚成为他父亲公司里的一名助理经理(Junior Manager)。这使他暂时免于卷入这场战争——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反对这场战争。即使这段做经理的经历也让他产生了一种愧疚的心理，常常想起工人们和战场上士兵们的悲惨境遇。在他的日记里，在他的小说里（他直到晚年才在《长大成人》[*Aus der Pubertät*]\*总标题下发表了这些小说），他试图向自己解释：那些有着富有的父母却却受烦恼折磨的孩子们的内心到底是被什么驱动着的，那些尽管成功可是心灵冷酷的父亲们的内心到底是被什么驱动着的，那些被迫在非人条件下过着单调乏味生活的工人

43

---

\* 直译为“我的青春期以来”。——中译者注

施泰勒》(Leonhard Steirer)中有这么关键的一幕,似乎显示了他给这些问题所找到的某种答案。工人莱昂纳德·施泰勒震惊地发现他不忠的女友投入了老板儿子的怀抱,他就杀了老板的儿子,迫使女友和他一起逃走。在这一幕中,莱昂纳德痛苦绝望地告诉女友:

如果像他这种人都可以说是“好人”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魔鬼——他们的享乐、他们的教育、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我和他之间惟一的不同就是,我必须行动,我有勇气和力量,而他则能坐享其成,从来看不到他的享受的代价是什么——他所享受的一切都沾满了鲜血。他并不比我高贵,但他可以享受他的每一天,享受每一种快乐,而且享受这一切的同时还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他认为他理应这样生活,他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和快乐,并不因此而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谴责,没有一丝一毫罪恶感。而我则必须把生活的重担扛在肩头,这担子压弯了我,使我显得粗鲁卑贱;永远都是这样,那些对他来说是好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不好的。约翰娜,如果你不是那么冷酷残忍的话,就回到我身边吧,就像你曾经投入他的怀抱那样!……

约翰娜·埃斯特兰德不禁想起了这个死去的人曾跟她谈过的生活、他的痛苦、他隐约之间感到的模糊而神秘的罪恶感。她以前从来没理解过那些话,总认为那仅仅是他的病理反应……她现在发现,莱昂纳德·施泰勒基本上是对的:与这个实业家之子比起来,他既谈不上更配得到她的爱,也谈不上更不配得到她的爱。一霎时她看到了世界的本质——通过一双张大的、惊恐的眼睛——她看到了一切有生之物残酷的无法餍足的贪婪,一切生物无可逃避的命运,欲望中的挣扎。欲望一直在燃烧着、撕扯着,它就是永远无法被扑灭的万恶之源。<sup>[60]</sup>

这个段落混杂了激进的社会批判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也反映了霍克海默从这些理论资源中为自己的行为所下的结论:既追求爱的力量,也

为身为特权阶层的少数人而感到愧疚。

1916年，霍克海默和他父亲的私人秘书罗泽·里科尔（Rose Rieker）开始了一段情感关系。她不是犹太人，比他年长8岁，是个贫穷的旅馆老板的女儿。从霍克海默这方面来讲，开始这段关系意味着希望得到一个普通女人的温柔，同时也是对一种具有混合特性的象征的追求，这个象征指向在社会上无特权阶层和工人阶层那个世界。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他们一定要对压迫满怀激愤，而这压迫正是来自于像他父亲这样的商人们；他们一定要起来进行“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将使他们达到一种全新的存在，将使他们进入真正的文化”，他在1916年的一篇小说《劳动》（*Arbeit*）中这么写道。在小说中这段话是题献给麦顿（Maidon），即罗泽·里科尔的。他的这位女友失去了工作，父子之间几乎长达10年的矛盾冲突也随之开始。

1917年霍克海默应征入伍。经过体格检查之后，他被列入“永久性不适合兵役”的名单，因此也就没被派上前线。他在慕尼黑疗养院的病床上目睹了德国的崩溃和十一月革命。

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在慕尼黑一起参加了被推迟的中学毕业考试，那时他仍旧是他父亲心目中的接班人。1919年春他开始了大学生活，学习心理学、哲学和经济学。“别相信关于慕尼黑的谎言……疯狂和不公绝对不是时代的秩序”，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期间他写信给他的女友这么说——他是以一种矜持的态度来看共和国的。一个学期以后，他和波洛克转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在和格哈德·莱恩（Gerhard Rein）的谈话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说这是因为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瓦解之后，他被误认为是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sup>[61]</sup>在那里他一度曾遭逮捕，慕尼黑的生活对他来说变得太危险了。1920年夏天他写信给麦顿说：“我们面临着分裂、毁灭和决定性的斗争——距离形成一个新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船只在我们身后已经被烧毁了……当代哲学以及对这种哲学近期发展的认识将作为一种向导为我所用。”他大学头一年与麦顿暂时分离，但是她随后终于来到了离法兰克福不远的陶努斯山脚下惟一能定居下来的小镇科隆堡，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在

那里买了一所房子，里面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法兰克福的教授中对霍克海默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心理学家舒曼 (Schumann)，另一位是哲学家汉斯·柯奈留斯 (Hans Cornelius)。舒曼和埃德玛尔·戈尔布 (Adhémar Gelb)、沃尔夫冈·克勒 (Wolfgang Kohler, 1921 年前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马克斯·韦特海默 (Max Wertheimer, 1918 年前, 1929 年后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 等人一起, 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而且还被认为是当时理论最先进的心理学家之一。法兰克福是他们产生影响的第一个中心。这些心理学家在格式塔心理学 (gestalt psychology) 中实施不同方向的实验研究计划, 试图证明和解释格式塔不同于个体心理感知元素及它们的组合, 而是作为完整整体独立存在的。柯奈留斯生于 1863 年, 1910 年来到法兰克福, 此后 15 年之内一直是这所成立于 1914 年的大学的惟一的哲学正式教授。同样, 他也是作为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而出名的。他在奥伯乌尔泽尔 (Oberursel) 的“柯奈留斯别墅”中主持关于认识论的讨论, 其中最重要的讨论伙伴就是马克斯·韦特海默尔。奥伯乌尔泽尔和科隆堡一样, 也是位于陶努斯山脚下的一个小镇。柯奈留斯积极地扮演艺术家、艺术教师、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等各种角色。他在哲学中支持认识论和心理学上的某种新康德主义学说。柯奈留斯摆脱依旧存在于康德哲学中的独断论残余, 坚定地支持一种“关于经验可能性之条件的理论”, 并认为这种经验可能性的条件就“植根于我们意识的统一性之中”。他还特别强调感知经验的作用, 看重决定着感知经验一般有效性的感知主体所扮演的角色, 因而他也确信他克服了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事态 (Sachverhalte) 直观 (Erschauen) 理论中的神秘因素。1924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举行的康德纪念会上, 他所做的讲演反映了他的一些社会政治观点。他期待仅仅借助知识澄清迷误的作用, 借助哲学, 遵循“天才共同体的成员们”所遵循的方向就能消除贫困, 这些天才们“对他们中, 他们脚下爬行着的那些侏儒置之不理, 跨越几个世纪一直在进行精神之间的交流”。<sup>[62]</sup>

但是舒曼和戈尔布的格式塔心理学也好, 柯奈留斯的新康德主义

变体也好，都没有将人类存在的转型当作它们的目标。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认为那是一个问题。他们对“一战”后显得特别紧迫的日常生活问题并没有做出明显的回应。柯奈留斯让霍克海默带上他的一封推荐信，到弗莱堡跟随胡塞尔学习两个学期，霍克海默在那里遇到了胡塞尔的助手马丁·海德格尔，后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结束了弗莱堡的学习，返回来继续他在法兰克福的学业的时候，他写信给麦顿说：

哲学越吸引我，我就越发现我离这所大学里所谓的哲学越远。哲学不是认识的形式法则，那根本无关紧要，而是对我们的生活及其意义的实实在在的证明，这才是我们必须追求的。我现在知道了，海德格尔在教导我的那些人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与他一致吗？当我确切地得知，对他来说从事哲学的动机不是知识上的野心或是先入为主的理论所驱动的，而是由他自己的每日经验不断激发更新的，我又怎么能与他一致呢。<sup>[63]</sup>

霍克海默的父亲当时仍旧逼迫他从事商业，并强迫他同罗泽·里科尔一刀两断。霍克海默还没开始在法兰克福写博士论文，他的主攻方向是心理学，论文题目是《眼睛盲点色盲区的格式塔变形》。但这个计划最终被迫取消，因为哥本哈根已经出版了一部几乎完全相同的著作。柯奈留斯随后鼓励霍克海默——这个他器重的学生跟他做哲学方面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目的论判断的自相矛盾》，<sup>[64]</sup>并在霍克海默得到学位之后为他提供了一个助教职位。从这时候开始，霍克海默才决定作为一个哲学家投身学术生涯，并最终决意和他父亲的商业事务告别。

霍克海默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他这一决定一样，都经过了长时间的延宕和仔细考虑。这或多或少属于他的私事，更何况他与波洛克很不一样，作为研究所的合作者他并不那么突出。柯奈留斯的另一个学生西奥多·魏森格隆德——阿多诺在1920年代早期就结识了霍克海默，1924年夏天拜访了霍克海默和波洛克，想让他们为他的心理学口试帮忙，因为那时打算在短时间内准备这次考试。阿多诺写信给他的朋友

洛文塔尔说：

为了让材料充实起来，我到科隆堡已经十天了，在这儿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尽最大可能友好地招待我，并在舒曼心理学方面给了我严格的训练——他们俩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顺便说一下，他们俩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一起充满激情地探讨唯物史观，在讨论中我们双方都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做出相互让步。<sup>[65]</sup>

1925年霍克海默以论文《康德〈判断力批判〉作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间的纽带》通过了他的授课资格答辩。这篇论文严格限定在对一个问题的讨论（讨论的基础性前提是从格式塔心理学和柯奈留斯先验哲学中引申出来的）上，这个问题就是：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自然中的形式目的性、审美对象的目的性作为一方面，本原对象的目的性作为另一方面，都说明不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偶然而神秘的相合。相反，存在着“必然由我们意识连通性产生出来的事态”，它们能够通过纯粹认识论的方式被把握，因而也就是说观念世界和自然界从根本上并不是分离的。<sup>[66]</sup>

47 霍克海默直到1925年5月2日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题做编外讲师就职讲座的时候，以及1925年至1926年冬季学期第一次开“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大课的时候，才开始走出格式塔心理学和柯奈留斯先验哲学所设定的范围。成为编外讲师后不久，霍克海默就和罗泽·理科尔结了婚。1928年1月他受聘讲授现代哲学史并因此有了一笔固定的工资收入。霍克海默当时有个心理障碍，使他难以胜任不需教案的讲座课程。后来他的这个心理障碍被参与创建法兰克福精神分析协会的神经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卡尔·兰道尔（Karl Landauer）用心理疗法给成功地矫正了。柯奈留斯当时希望霍克海默接替他哲学教授的席位，但是没能实现。他的位子先是被马克斯·舍勒占据，舍勒去世后，又指派给了保罗·蒂里希。这些年中霍克海默所开设的课程表

明，通过逐渐扩大他在现代哲学中的考察范围，他在小心翼翼地将他最开始感兴趣的那些论题通过哲学表达出来——1928年夏季学期：“历史哲学导论”；1928年至1929年冬季学期：“现代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1929年至1930年冬季学期：“黑格尔和马克思”；1930年至1931年冬季学期：“英国和法国的启蒙”。

霍克海默1926年至1931年所做的一些笔记清楚地反映了他看自己的方式。1934年流亡瑞士期间，他以“海因里希·雷吉乌斯（Heinrich Regius）”的笔名，以“破晓和黄昏”<sup>[67]</sup>为题出版了这些笔记。它们反映了对这样一个男人的基本看法：他本性优柔寡断，却一门心思地追求一帆风顺的学术生涯，那种追求同后来法兰克福核心圈子的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不同。这些笔记中既包含一些与他早期的小说集《长大成人》中的思想相类似的评论和反思，也包含着后来出现在他第一批公开的理论声明中的一些观念。所谓第一批理论声明包括：《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1930）、《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观念？》（1931）和《社会哲学现状和摆在社会研究所面前的任务》（1931）<sup>[68]</sup> 这些作品。在《破晓与黄昏》中能找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角色的反思，也能找到一个中产阶级左翼个人主义者对自己身份难题的反思——霍克海默后来的其他作品再也没有如此公开地反映这些问题。

对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愤慨一直是他的最关注的内容。霍克海默在这里是从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的亲身体验出发而产生愤慨的，因此没有人能够怀疑他在这愤慨里面包藏着嫉恨。就像巴洛克画家在生物美丽的外表下洞见那些躁动不安的颓败的扭曲线一样，霍克海默看到：

所有那些高贵的夫人和绅士们每时每刻无不在扩大着他人的悲惨境遇。他们还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惨境，为的就是靠它过活，他们还将不惜流光所有人的血来维护这一事态……当这位夫人打扮停当准备赴晚宴的时候，也就是她所依靠的人们开始夜班的时候；当我们因为这位太太头痛而亲吻她那优雅的小手的时候……三等医

院六点后已经不在收治病人，即使这个病人命在旦夕之间。<sup>[69]</sup>

同时，他搜寻具有震撼力的、具有表现主义意味的词语来描绘工人和穷人的悲惨境遇。社会的那层“地下室”无非是个“屠场”。“大多数人生下来就等于被投入了监牢”。

没有钱，没有任何经济保障，我们任人摆布。这当然是一种可怕的惩罚：每一天的折磨把你弄得筋疲力尽，你杂物缠身，日夜提心吊胆，你还不得不仰仗那些最卑鄙的人。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必须为之负责的人把我们投入这每日的苦役。我们成了蠢行和虐待狂的牺牲品。<sup>[70]</sup>

霍克海默这样评论特权者的卓越品质和穷苦劳工们的无望而悲惨的处境：

百万富翁，或他的妻子可以显露出公正高贵的品格，他们可以尽可能地发展每一种公认的品质……而小制造商们在这方面也是处于劣势的。他为了生存只能发展那些投机钻营的个性品质。一个人在整个生产中的品级越低，他的“道德”就越低劣。

一个人生活在越高的地位，他就越容易发展他的才智和其他各项能力……不仅对实现社会成就来说是这样，对培养一个人所能具有的各项其他能力来说也是这样。在权力不能让那些男男女女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并为他们提供发展的条件的地方，他们就只能在廉价消遣中追欢逐乐，只能为占了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只能去不着边际地为自己算计，只能因虚荣和敏感而变得可笑。

霍克海默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一致，他也坚持认为，过去因作为进步手段而颇具效力的不平等，在现在的时代条件下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了。下面这个看法也许曾经是有道理的：加速物质文明发展的

那些成就只能建立在少数人拥有大量特权，而多数人必须做出牺牲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情况似乎是，特权不仅没有带来特别辉煌的成就，而且还在阻碍客观上已有可能的对于贫困的消除。

为了让那些利己主义的人们能够屈尊掌管雇佣劳动者大军，你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小汽车、漂亮女人、住宅和无以复加的保障。但是要想让他们在精神和心理方面自己垮掉，从而能够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下到矿井里去劳动，那就给他们保证稀汤寡水，一周吃一次肉，这绝对就足够了。多么奇怪的心理学啊！<sup>[71]</sup> 19

但在其中又有谁来宣读并执行对这个社会秩序的判决呢？处在上层的人们能够发展他们一切可能的能力，他们意识不到支撑着他们的悲惨世界，也更谈不到压抑这种意识。处在底层的人被压榨折磨得迟钝麻木，他们也意识不到这种不必要的悲惨达到了什么程度，意识不到他们的客观可能性和集体利益，也更谈不到压抑这些意识。而处在中间的人们则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爬向上层，或至少努力不要再次堕入底层。霍克海默甚至没有提到任何经济崩溃的趋势，也没有提到无产阶级这方面产生集体意识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具有历史可能性……但是它不是通过历史内在逻辑实现的。它的实现只能靠经过理论训练的并决意去达到更好的 [生存] 条件的人，否则将是不可能的。”<sup>[72]</sup> 但是在分析中，霍克海默又指出，通过理论去认识 [生存] 条件和决意去达到更好的 [生存] 条件是两码事。他把以技术的不断创新应用为典型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看作是无产阶级持续分化的原因：一部分分化为被雇佣者，他们的日常生活枯燥乏味，而且他们将失去的不止是锁链；另一部分分化为失业者，他们的生活是地狱，而且他们根本不可能受到教育或是被组织起来。<sup>[73]</sup> 这一点决定了霍克海默做出的另一区分：“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是一回事，而“对这种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 总体非人性的体验”和“对变革的迫切需要”又是另一回事。

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们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世界不是学术环境，而是在工厂和工会中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一系列纪律措施、一系列政党内或政党外的无耻的争论、一系列关押判决和非法活动……革命者的生活中没有宴会、荣誉的头衔、专注的研究和教授的薪水，相反他要忍受悲惨、羞辱、忘恩负义和可能永无释放之日的监禁，这些只有靠几乎超人的信念才能忍受得下来……在像今天这样的环境下，革命信念和对现实的伟大知识很可能实际上并不一致。我们现在很可能在那些没有良好素质的男男女女身上发现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需的能力。<sup>[71]</sup>

但是，在霍克海默看来，在理论和痛苦统一起来的地方，又无法期待革命行动和无所畏惧的投入。“尽管人们都希望过上好日子，可是许多人却生活在贫困当中，这一事实使得用谎言来毒化公众的心灵成为必须，同时也将这个社会秩序推向崩溃。”然而在那些受到毒化之害的人中，霍克海默只认为在那些特权阶层中心灵敏感的人才能在下面这些事实中看出罪恶：人和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有机的关系；每个人所作的贡献都得不到充分的承认；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往往对有些人来说却变成了最坏的事物。霍克海默本人正是特权阶级中心灵敏感的人们中的一员。他是怎么看他的任务的呢？对他来说同情那些参与当前斗争的人是显得草率的。“[比起天主教神职人员]我们资产阶级道德要更为严厉。如果有人心底里藏着革命的观念，那么他就被责成大声地说出来，即便这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正因为毫无意义才要让他大声地说出来——这样才能迫害他。”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他的一些同行：“用学院化风格来转译马克思主义，尤其在战后，是一种打消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意志的尝试。”教授们，即“代表整个人类的专业知识分子们”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将阶级冲突的根源转变成了一般化的问题，并且使得人们认为现实的罪恶情有可原。“他们在一本本有教养的书里，在一篇篇文章里以‘科学’的语言讨论着社会主义社

会理论和其他问题，但讨论完了之后他们又充满怀疑地退回到现时代的事务中去——他们就是这样维护着现有的体系的。”<sup>[75]</sup>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行动方式吗？

霍克海默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基本目标：那就是保持对“现世事物的一切秩序”的不满（这种不满原来掩藏在宗教之中），通过批判、通过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科学的社会理论”而同一切新的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伪装划清界限。这种方式将使霍克海默有可能——至少是在理论层面——把现实层面由于工人阶级的分化而产生的分裂弥合起来。这种分裂就是：“实际的知识”与“对这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总体非人性的体验”以及“对变革的迫切需要”等等“根本原则的理解”之间的分裂。<sup>[76]</sup>

霍克海默对面临的任務所做的这种阐释，确定了他对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同事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批评的指导原则。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正是霍克海默第一篇长文的中心论題，此文1930年发表在格吕恩堡主编的《文献》杂志的最后一期上。<sup>[77]</sup>霍克海默批评曼海姆固守着某种无力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变体——以作为形而上学实体的“成人（becoming human）”为基础，并认为依此建立知识社会学能够澄清关于这一形而上学实体的种种问题；他还批评曼海姆把由历史和社会决定的所有真理都说成是一样相对的，并因而是意识形态的。知识的被决定性和局限性恰恰为知识本身赋予了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去改进对它起决定和限定作用的那些条件：这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主义的立场（尽管霍克海默没有这么称呼它），在《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一书中，霍克海默对这一立场也是持同情的支持态度的。倘若科学完全无视它的时代的苦难、悲惨和局限，那么它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了。谁要是以思想观念乃是被历史决定的这一点为由，徒劳地证明思想观念的相对性和模糊性，而没有看到这一点恰恰证明了思想观念本身就是与当时人类利益紧密相关的，这只能说明他对那些真正的问题——即，同日常生活强加给他们的巨大痛苦斗争的普通人所关心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

51

霍克海默既没像马克思和卢卡奇那样去进行大胆无畏的理论建构，也没有像他们那样认为，在历史发展的驱动下无产阶级会发展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借助自我意识并在自己的阶级领导下继续发展已有的一切成就（尽管以往是通过异化方式实现那些成就的），继续完成社会的再生产。霍克海默的重点只是要阐明：那些生活在悲惨世界中的人们完全有理由选择物质利己主义，而且认为“通过对人类生存条件更有益的建构来改善物质生存”乃是“现今世界的第一要务”也并不是什么低级庸俗的想法。在这种改善的基础上，不仅使“人类的基本需要——最基本的和现实的目标——得到更好的满足，而且也让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和观念价值得以实现”。<sup>[78]</sup>

在上述思想中，我们听到了他在 1931 年的就职演讲中没有发出的声音，听到了关于受造物（creature）之有限性、肉身性及其利益一致性（solidarity）的某种叔本华主义观念的回声，相反，感受不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那种激进主义的悲悯。在一定程度上，霍克海默似乎给这种对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和短暂性的意识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先验哲学的存在主义改造在这里被再一次改造，从而获得了社会历史的方向。海德格尔的立场是：“此在的本质规定不能靠列举关乎实事的‘什么’ [eines sachhaltigen Was] 来进行……它的本质毋宁在于：它所包含的存在向来就是它有待于去是的那个存在，并且将此作为自身。”后来萨特的立场是：除了“自我造就的人类之外”，根本就没有人类本质这种东西。霍克海默的观点则是：“当社会学家曼海姆谈到‘存在的’大写人（其发展是通过或在文化形式之内得以完成并得到表现的）的时候，几乎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历史没有目的，甚至历史的发生也不来自于对它进行筹划和决定的人类有意识的目的。”<sup>[79]</sup> 霍克海默认为自己站在贯穿了康德、法国启蒙、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条线的延长线的一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捍卫者。但是，在这个自 1930 年起坐上研究所主任位子的主任的办公室里，却挂着叔本华的画像。当你看到霍克海默站在这个画像前面，当你听到他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叔本华的时候，你也许会想到柯尔施《马克思

主义和哲学》里面的一个段话。柯尔施说，人们不得不（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包含任何哲学上的特定立场，因为“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个人哲学生活中也不是不可能成为阿图尔·叔本华的追随者的”。<sup>[80]</sup>当时的威利·施策勒维茨是研究所奖学金的获得者之一，他1928年夏天来到研究所，1931年以论文《科学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的界限》<sup>[81]</sup>获得博士学位。同许多青年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充满了热情，并因此推迟了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决定。霍克海默给施策勒维茨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中产阶级哲学家，亲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还有些半康德主义半实证主义；一个教师，乐于公开讨论，很少点名提到马克思，既不关心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关心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解释”哲学。

## 艾里希·弗洛姆

他整日坐在他开的赖以为生的小店里研究《塔木德》。有顾客来的时候，他总是不情愿地抬起头看看，并说道：“您看看还有别的小店可去吗？”这就是艾里希·弗洛姆为我们讲述的他祖父赛里格曼·弗洛姆（Seligmann Fromm）的故事。赛里格曼·弗洛姆在家中德高望重，在弗洛姆心里是个理想化了的偶像。艾里希·弗洛姆1900年3月23日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双方都出自拉比之家，而且都是正统的犹太人。弗洛姆的父亲是个水果酒商，但深以自己的行当为耻，而宁愿做一个拉比。在法兰克福度过大学中的两个学期之后，弗洛姆1919年来到海德堡开始潜心研究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在那里他在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指导下以论文《犹太律法：也论犹太人大流散的社会学》<sup>[82]</sup>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同时，私下里也专注于对《塔木德》的研究。法兰克福最大的犹太教堂的拉比尼希米·诺贝尔（Nehemiah Nobel），以及跟随一个犹太俄国革命者一起流亡到海德堡的出身于哈西德教派家庭的拉比萨尔

曼·巴鲁赫·拉宾考 (Salmann Baruch Rabinkow), 都为弗洛姆做出了  
53 活生生的榜样——他们证明了怎样将保守的犹太教和人道主义相结合,  
怎样将宗教信条和生命本身相结合。

在 1920 年代早期, 弗洛姆在自由犹太人读书之家 (Ereies Jüdisches Lehrhaus) 任教。他在创立犹太成人教育组织 (即读书之家的前身) 时也出了不少力。在读书之家前面冠以“自由”是因为, 只要交了听课费, 没有任何参加的限制; 除了教师和学生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干预教学计划。它的第一任主管是弗朗茨·罗森茨威格 (Franz Rosenzweig), 他是被同化的犹太人中边缘群体里的一员, 当时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都赞成归宗犹太传统。这种归宗是对当时社会实际的一种反应: 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 大多数犹太人群体起码体验到了一种名义上的平等, 即使十一月革命之后犹太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因反犹主义情绪的增长变得岌岌可危。反归犹太传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或者采取犹太复国主义 (锡安主义), 或者制定在巴勒斯坦或苏联的犹太人定居计划, 在生活方式上遵守犹太教食物禁忌, 遵守安息日和犹太教其他宗教节日, 或者通过犹太神秘主义改造哲学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观念。罗森茨威格希望自由犹太人读书之家可以带来犹太知识分子圈子的复兴, 希望这个读书之家作为犹太社区的核心能在犹太社区和犹太经典文本之间建立生动活泼的关系, 并因而激励犹太人的生活。

这成为了一项颇具影响力的任务。1920 至 1926 年之间, 读书之家共计举办了 90 次讲座, 组织了 180 个研究小组、研讨会和讨论班, 有 64 位教师参与了这些活动。在读书之家的鼎盛时期, 在一个有三万人组成的犹太社区的小城市里, 就有 600 名在校大学生参与读书之家的活动。诺贝尔拉比 (于 1922 年 1 月去世) 和自 1922 年以来就积极投身读书之家活动的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分别为各自的课程吸引来 200 名学生。另一方面, 在研究小组里大学生们小范围地聚在一起潜心研究。举个例子来说吧, 格尔绍姆·朔勒姆 (Gershom Scholem) 在 1923 年移居耶路撒冷之前曾经在法兰克福逗留了几个月, 在这期间他和几个同仁组成了一个不多于十二人的小团体, 一起阅读和阐释希伯

来原文的神话、预言和叙事文本。弗洛姆就是这个小团体的成员。

但是罗森茨威格的许多愿望都没有实现。举办讲座课程原来的目的一则是为小型的、更专精的研究小组筹措资金，一则是为那些对犹太生活有严肃兴趣的人们提供介绍性的入门，可是在1920年代后五年中，大讲座的吸引力开始逐渐下降。虽说其他许多城市纷纷在此时效仿读书之家的计划，但这个计划还是破灭了，直到1933年才又作为对纳粹上台的抗议复兴了起来。

弗洛姆1920年代中期通过另一家正统犹太机构开始学习精神分析。1924年犹太精神分析师弗丽达·赖希曼 (Frieda Reichmann) 在海德堡开设了一家私人精神分析诊疗所。恩斯特·西蒙 (Ernst Simon) (他和弗洛姆与洛文塔尔一样都是海德堡的大学生、同时也是自由犹太人读书之家的教师和弗丽达·赖希曼的“门诊病人”) 回忆说：

54

犹太人的“生活节奏”是 [这个诊疗所] 集体里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纯然犹太性的。在进餐时人们祈祷并摘读犹太圣经里面的段落。安息日和犹太节日也被认真遵守着。这一切使得这个诊疗所获得了“托拉疗法诊所”的绰号。在那时，这很对弗洛姆的胃口。<sup>[83]</sup>

弗洛姆被培训成一个精神分析师，并与弗丽达·赖希曼结婚，于1927年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深层心理学的长文《安息日》(Der Sabbat)。弗洛姆后来断言自己“在整个大学期间都是个真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sup>[84]</sup> 在一篇文章中，他得出结论说“安息日起到了对弑父获母 [这一原罪] 的暗示作用；勿工作的戒律是通过回归前性器欲期 (pre-genital stage) 而实现的对原罪及其重演的忏悔”<sup>[85]</sup>。他在宗教社会学和心理分析方面的知识，以及对佛教、巴霍芬 (Bachofen) 和马克思的了解意味着，弗洛姆将能够比他的这些人道主义犹太法师榜样们——诺贝尔和拉宾考——更进一步，他将摆脱正统的犹太教，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早期

的弗洛姆和威尔海姆·赖希 (Wilhelm Reich)、西格弗里德·伯恩费尔德 (Siegfried Bernfeld) 一样, 是一名左派弗洛伊德主义者, 首次尝试着将弗洛伊德本能驱动理论和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sup>[86]</sup> 另外, 他还是在柏林担任精神分析师、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的讲师, 还是社会研究所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助理研究员。

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建立, 实现了以弗丽达·赖希曼为中心的海德堡圈子在 1926 年制定的计划。这个精神分析研究所的第一任主任是卡尔·兰道尔和海因里希·门格 (Heinrich Meng), 弗丽达·弗洛姆 - 赖希曼和艾里希·弗洛姆都在该研究所担任讲师。由于艾里希·弗洛姆、弗丽达·赖希曼、列奥·洛文塔尔、马克斯·霍克海默和卡尔·兰道尔之间人际交往的关系, 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 (这是德国第二所精神分析研究所, 第一所在柏林) 获得了社会研究所大楼里的几间办公室。这也意味着在精神分析和大学之间首次建立起了联系 (即便这种联系是间接的), 在这之后的 1930 年就发生了法兰克福市将歌德奖颁发给弗洛伊德所引起的巨大争论, 但最终法兰克福公众承认了这位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精神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之间共有的理论前提, 也使得二者之间建立了机构上的联系。

55 弗洛姆是 1929 年 2 月 16 日精神分析研究所正式成立大会的发言人之一。他作了《精神分析在社会学和宗教研究中的运用》的报告。在这个简短的、规划性的报告中, 他认为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是必需的, 对研究那些最重大问题尤为必要, 并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就是研究“人类的社会发展 (尤其是经济和技术发展) 与人类心理机能的发展 (尤其是人类的自我构成 [ego-organization])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sup>[87]</sup> 他大致勾勒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历史人类学观念, 后者为威尔海姆·赖希和西格弗里德·伯恩费尔德已经开始尝试的用心理学范畴书写历史的事业赋予一种普遍的、历史唯物主义形式。这其实已经预示了霍克海默随后将在《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中发展起来的那些观点。为了给心理学提供参与社会学问题研究的原则上的合法性, 弗洛姆在报告的结尾引用了“一位最卓越的社会学家”的话: “历

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sup>[88]</sup> 这是《神圣家族》中的一段话，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要保卫费尔巴哈“真正的人道主义”，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他人所支持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幻想。<sup>[89]</sup> 弗洛姆对青年马克思的引用很符合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核心就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去考察一切经济和社会现象，从而脱去这些现象的拜物教式对象化的假相，重新把它们看作人类本身创造的结果，即使这些结果多少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掌握。但是，弗洛姆的报告，还回应了另外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是像保罗·蒂里希这样的宗教社会学家所支持的。保罗·蒂里希就曾强调，为了能够实现完满的人的存在，就必须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变革。他们都以某种青年马克思为参照系，认为青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就是要对被经济思想优先性遮蔽了的人的本质进行反思。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另一位主任海因里希·门格，曾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们的讲师们和神学家保罗·蒂里希之间保持着私人的、在学术上富有成效的接触。比如，他所讨论的一个论题就是‘青年马克思’。他在发表的成果中和进行的讨论中，证明了马克思曾经多么坚定地强调过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sup>[90]</sup>

在随后的几年中，弗洛姆的著作可以被视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威尔海姆在内的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sup>[91]</sup> 弗洛姆将正统的精神分析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研究设想——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一设想的结果却令人悲观。他写出了研究专著《基督教义的发展：宗教的社会心理功能研究》，反对西奥多·里克（Theodor Reik）所代表的在观念史基础上对基督教义的精神分析阐释。里克曾是弗洛姆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老师之一，他的文章“教义和强迫冲动”（Dogma und Zwangsideoe）发表在1927年的《意象》（*Imago*）杂志上。弗洛姆对里克的批判很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同代的“唯灵论”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56

他把群众的同一性 (uniformness) 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并没有试着去根据他们所处的客观生活情境去考察他们……相反, 他拘泥于由群众创造出来的观念和意识形态, 而从来不关心表述着这些观念的真正的人——活生生的人类——和他们的具体心理情境。他并不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的产物。相反, 他从他们的意识形态去重构人类。<sup>[92]</sup>

与此同时, 霍克海默在对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中也采用了相同的模式。他批评知识社会学“对人类的客观斗争以怎样复杂的方式决定着他们的观念未加探讨, 就考察起精神史”, “把客观存在的矛盾再阐释为两种观念之间的”、“思想风格”和“体系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sup>[93]</sup> 不管是弗洛姆那里还是霍克海默, 均将批判的核心放在关注下层阶级被压迫及其悲惨生活之类的条件因素上, 认为正是这些条件因素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观念、世界观和宗教。他们进而证明, 任何关于精神现象的研究观点, 如果不从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出发, 不从社会的阶级分化出发, 必然会延续不断地抑制人们对于悲惨境遇和不公正的种种意识 (awareness), 而这些意识恰恰是精神现象基础。即便这种研究观点换上精神分析或是知识社会学的外衣, 它还是会起这样的抑制作用。

弗洛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弗洛伊德思想所产生的理论, 解释了阶级社会的稳定性, 但似乎又暗示: 这种悲惨的不公的世界将会永固长存。弗洛姆为弗洛伊德赋予阶级斗争学说的框架, 其核心思想就是: 阶级社会的权力结构为服从的人们复制了婴儿期情境。这些人们在体验中认为他们的统治者是有权力的、强大的和可敬的。反抗统治者没什么意义, 倒是通过爱和服从来换得统治者的保护和善意相对理性一些。关于神的观念要求人们 (即便是成人) 具备这样一种心理, 那就是自愿服从父亲形象并理想化地看待统治者。

里克把人子和天父本体上同一种本体同一论 (homoousian) 观念  
57 (公元 325 年尼西亚会议所确立) 看作是反抗父亲的这种倾向的胜利;

这种观念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强迫性神经症状的类似现象。但是弗洛姆将这种观念看作是对反抗父亲态度的放弃，看作是几百年来适应过程的结果，这种适应过程并不影响个体全部的心理结构，而仅仅影响到每个个体所共有的那部分心理结构。这是一种对存在的现实社会情境的适应过程，在那种情境中不存在对统治阶级灭亡和自己阶级胜利的希望，甚至“从精神的角度看，坚持早期基督教无产者的那种典型的‘憎恨’态度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划算的”。以人类的生活和命运为基础来思考观念，这构成了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方法采用的基本步骤。他坚持认为，宗教观念不可能通过与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个体心理作类比而被还原为种种病理症状，而是应该将它们视为“正常”人的集体幻想，即“现实对于人类整体的精神情境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强于对那些神经症患者的影响”。<sup>[91]</sup> 弗洛姆的方法步骤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他研究中的种种洞见，虽然从表面看上去充满了对群众日益增长自我否定和精神异化的义愤，并因这种义愤而深化，可实际上弗洛姆非常严格地坚持了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弗洛姆一般性地断言（没有建立在更多的例证之上）在任何集体中，仇父和爱父心理必定会伴随该集体的客观生活状况交替地起支配作用，并由此推断各种宗教观念也完全与各种客观生活状况相对应，所起的作用也只是以一种完全功能性的方式复制各种客观生活状况。对穷人和受压迫者来说，针对统治阶级的暴力反抗和无力的仇视以及自虐性的自我否定，似乎都是同等有效的行为方式，每种方式都是在心理上对于情境的合理反应。弗洛姆的整个推论逻辑如下：神经症个体患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婴儿期童年情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结束的。这种心理疾病的完全消除是可能的，对患者的治疗是有目的可循的。然而阶级社会将大部分成员宣判在婴儿期，却是一种稳固长存的现实，反叛这种社会虽说是可以理解，但似乎在心理上接受它更理性一些，这正如孩子反抗父亲虽说是可以理解的，但肯定还是尊重父母更在社会上行得通一样。因此，造反是得不到支持的。

弗洛姆把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还用于研究当代德国工人阶级这一

社会群体，所采用的方式与他在研究基督教义发展的历史现象时所采用的方式多少有些相同。他与社会研究所合作开展这项工作。研究所已于1930年任命他为本研究所社会心理学部的主任，这个主任位置没有期限限制。在1929年11月1日给科学、艺术和教育部部长信中，费利克斯·韦尔就已经将“工人阶级过去及当前的状况”列入了研究所计划长期开展的六个研究领域之一。目前已在开展的两项计划中较大的一个，其第一阶段的完成至少需要5年时间，就是要：

尽力收集关于工人阶级这个重要社会阶层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的材料。这项工作不仅利用现成的印刷或（社会保险）文件材料，而且也已经采用了大规模独立研究的方式。我们确信专家之间以及和工人的领导组织之间的合作将使得这项工作得以完成。

含有271项调查内容的3300份问卷调查表，已经于1929年底下发到工人手中。这项关于工人阶级的研究结果在研究所逃离纳粹之后，也就是在最后证明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无能之后的那段时期才能出来。然而，依据弗洛姆同一时期所做的其他研究以及这项问卷调查本身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推测，他到底想要在这项他负责起草和发起的研究项目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弗洛姆归纳了他对基督教教义发展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新教已经站在一个社会新纪元的门槛上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群众有可能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与中世纪那种婴儿式消极的态度截然相反”。在中世纪，天主教带着“掩藏的向母祖（Great Mother）宗教的退化”，为完全被婴儿化的人群提供了一种被母亲宠爱的婴儿式的幻想型满足。<sup>[95]</sup>当弗洛姆开始研究工人的真实情境、精神结构和政治信念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可以认为他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当成了最早期基督徒的革命宗教观念的现代对等物。考茨基在《基督教之基础》中就已经说过，“就阶级仇恨而言，现代无产者也未必能达到基督教无产者当时所达到的那种程度”。<sup>[96]</sup>这样的类比不也暗示着拥有革命的观点就能替代

参加革命斗争吗？革命斗争并没有发生这一事实，在弗洛姆看来难道不意味着拥有革命的观念正是工人阶级为适应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客观社会情境而采用的充分形式吗？1920年代晚期使得很多职业消失的合理化工业标准和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否强化了工资劳动者的无力感，而不是增强了他们对生产力的进步解放作用的信心，这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除了这一点，当时的客观社会情境依然表现为阶级分化，弗洛姆认为正是阶级分化在群众中起到了复制婴儿期情境的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即便弗洛姆希望他的研究可以为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会被迫革命这个观点提供确证（而这恰恰与他所遵循的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所暗示的内容相反），但揭示无意识的情感冲动和精神结构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方式。比如，对参加俄国革命的那些人，对参加慕尼黑或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那些人的社会精神分析，就一定能显示出他们大多数支持对孩子进行不加体罚的教育，就能显示出他们支持已婚妇女工作吗？或者，就能够显示出他们所持有的另外一些观点就一定是深刻的反权威主义吗？诸如此类的疑虑马上就会在心里面产生，这一事实正说明那种认为经验研究（无论多么精深）可以揭示革命前景的观点是多么的荒谬。

在一篇发表于1931年、名为“政治与精神分析”（Politik und Psychoanalyse）的文章中，弗洛姆提到了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给梅林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批评了一种忽视经济基础的思想方法：即忽视具体的政治、法和其他意识形态均源于基本的经济现实。弗洛姆在他的文章中称赞精神分析，说它最终提出了一种方法，可以“沿着一条从经济决定论出发，经由人的内心和精神，直接进入意识形态总结的道路”。

精神分析在这里对社会学大有帮助。因为社会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并不仅仅是由那些机械的和理性的事实（来自国家权威和共有的自我利益的强制等等）所构成和保证的，而且还是由存在于社

会中的，尤其是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成员之间的一系列利比多关系所构成和保证的（试比较，将小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连接起来的婴儿期纽带，以及由此而来的理智上的胁迫）。

弗洛姆以一种即使面临明显的悖论也毫不畏缩的坚定性坚持认为，经济决定着人类的命运。“群众的类神经症行为是他们应对无法逃避的、有害的、无意义的生活条件的正常反应，因此，这种行为无法通过‘分析’而被‘治愈’。”只有通过改变并根除这些生活条件，这种行为才能得到“治愈”。<sup>[97]</sup> 尽管他不承认，但实际上这种表述将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简约成了荒谬的东西。首先，这种观念表明：严密的社会机制不允许在生存条件方面有任何根本的变革。既而，它又说只有生存条件的根本变革才能改变群众的行为。但是，如果发生了这类变革，也只会导致新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产生——“这是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这样看来，对弗洛姆这样坚信所有人都可能实现生命完满的人来说，肯定会转向弥赛亚人道主义，因为后者可以使人们即刻逃离存在与意识的无尽锁链。

### 弗里德利希·波洛克

32岁的弗里德利希·波洛克对卡尔·马克思表现出的真挚的、无限的热情几乎无人能够比拟，虽说有些笨拙和朴实。波洛克认为，30岁的时候马克思就“清楚地确定了自己的哲学、社会和政治观点，终其一生，没有什么可以让改变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不顾任何阻碍，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sup>[98]</sup> 他在1926年发表了关于维尔讷·宋巴特(Werner Sombart)《无产者的社会主义》(*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一书的商榷文章，在文中表达了对马克思的这种忠诚。宋巴特以前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曾和恩格斯保持过通信关系，可是1920年代期间转而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形式，成为反犹主义者，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约翰·普兰格和奥特马尔·施潘(Othemar

Spann) 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sup>[99]</sup> 波洛克坚持经验研究的重要性, 而反对宋巴特对现象学“本质直观”(Wesensschau) 的依赖。<sup>[100]</sup> 宋巴特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赞成的是一种“平民主义”的“基本价值”, 这是波洛克强烈反对的, 相反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波洛克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是无产阶级历史形而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说法, 他援引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辩证法的普遍有效性坚信不疑。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波洛克的典型特征。他 1894 年生于弗莱堡。和霍克海默的情况一样, 家里本来希望他接替父亲的生意。波洛克对犹太教以及那些犹太习俗的漠不关心, 他的潜藏着的反抗品质和简单、冷静的性格, 这些都给 16 岁的霍克海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此开始了一段持续终生的特殊友谊。波洛克很少像霍克海默那样表现出对社会不公的厌恶, 但是他也很少像霍克海默那样表现出对公开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犹豫不安: 1919 年 5 月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瓦解的时候, 他将自己的护照给了一位希望逃离出境的俄国人; 这个逃亡者最后被抓住了, 而波洛克也惹上了被捕的麻烦。尽管波洛克也像其他人那样研究哲学, 可是这只是他专业兴趣之外的业余领域。他的专业是经济学, 1923 年他以关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论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 1928 年在格吕恩堡的《文献》中发表了论文“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文中他还对“马克思体系中经济和哲学要素的不幸分离”表示了不满。<sup>[101]</sup> 其实他终身都对哲学理论保持着一种庸俗的 (philistine) 轻视态度, 并固守着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信条。

61

应大卫·梁赞诺夫之邀, 波洛克 1927 年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他的《苏联计划经济中的实验 (1917—1927)》一书就是这次访问的成果之一, 1928 年他还以此书参加了授课资格答辩。这本书是研究所系列出版物“社会研究所丛书”(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中的第二本著作, 整部书的写作风格同卡尔·格吕恩堡惯有的那种风格相似, 后者被马克斯·阿德勒<sup>[102]</sup> 在其七秩华诞纪念文集中称为“研究社会存在的历史现实主义大师”。在该书的前言中, 波洛克坦

言从他“父亲般的朋友、老师卡尔·格吕恩堡教授”那里受惠颇多。读者们从前言第一句话中得知“在随后的作品中将要对材料进行理论分析”，可是这根本没有兑现。波洛克对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各种非常不利的条件，对他们所面临的艰巨而长期的困境，对他们所犯的常常是很明显的错误，对他们指导方针的不断变化以及频繁的改组等情况进行了描述。在篇幅最大的一章，也就是倒数第二章“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及其工作”中，他用上面提到的那些描述来证明，虽然在一开始计划的制定非常不充分，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但是后来逐渐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冷静地描述范围广泛的材料，这是全书的特点，可是本书也流露出波洛克 [对苏联计划经济的] 同情、理解和幻想，甚至流露出他对那些“计划经济的英雄先烈”的钦佩，流露出对他们为通过不同的计划创造出一个“充分完整的计划”所进行的不懈努力的赞扬之情——这个“充分完整的计划”如果“发展到最充分的阶段，将会自觉地在整体上将整个经济过程联成一体”，并逐渐为“有意识地协调整个经济过程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提供保证。<sup>[103]</sup>

波洛克相信，他对俄国实验的描述证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是一派胡言，尽管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方法是禁不住推敲的。与格罗斯曼不同，波洛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弱点不在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在于各种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在导言中，他指出：

62           一切社会主义理论都认为，与“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经过计划的，必须是有计划可循的。但不能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惟一特性，要是这样，那么法老治下的经济、重商主义经济、德国战时经济，以及完全由卡特尔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等等这些千差万别的经济系统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了。

波洛克因此下了一个定义：“如果要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划出范围，它不仅要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而且也要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条

件（无阶级社会，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但是在本书中，他还是决定“把政治放在一边”，<sup>[101]</sup>他的整个想法实际基本上是围绕“自由市场 / 计划”的对比展开的。他的立场所反映出的逻辑如下：（1）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论题；（2）以苏维埃俄国的经济为例证，证明计划和指导经济是可能的；（3）由此得出结论，肯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能性。

他的这种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特有的东西“完全放在一边”的思考，不同样可以，或者更能证明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也是可能的吗？他怎么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呢？他的这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描述毕竟基本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有针对性的公告的基础上的。他引用了托洛茨基在 1920—1921 年间苏联首次尝试建立有计划的、免除市场限制的（market-free）经济的那段时期所发表的讲话，讲话说：“如果我们愿意严肃对待计划经济，如果劳动力可以按照经济计划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情况来实现就业，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过那种游牧式的生活了。工人阶级就会像军队那样，必须得到重新配置、实现再就业，重新回到工作岗位。”<sup>[105]</sup>但波洛克自己得出结论说：“如果这些实验不能基本保持食物生产的稳定，如果十分有限的工业产品供应—工业条件无法满足全部人口的需要（那样的供应水平和工业条件在人口密度很大的其他工业国家里是根本不行的），那么进行这类莽撞的实验将是不可能的。”波洛克本人还明确地说过，“从马克思以来直到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都曾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sup>[106]</sup>这些都在暗示，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意味着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或一种不受阶级支配的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虽然怀着种种疑虑，波洛克还是认为，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似乎更接近社会主义。霍克海默跟他的观点相同——尽管没有特别公开地表示——而且也希望人类“以无阶级的、计划的经济来替代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斗争”。在写于 1930 年的一则笔记中，霍克海默表达了如下的观点：

谁看到了帝国主义世界毫无意义的、根本不能用技术无法改进现状来解释的不公正，谁就会把苏联发生的事件视为试图克服这些令人惊悚的不公而进行的连贯的、痛苦的尝试。至少，他会怀着怦然而跳的心情去询问这一尝试该不该进行下去。如果表面现象显示的是相反情况，那么他也会守护着纯洁的希望，就像癌症患者要牢牢抓住那些可能被发现但并不确定的癌症疗方信息那样。<sup>[107]</sup>

但是，一般所说的已被苏联发现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疗方呢？比起有众多工人政党参与的国家，由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党所垄断的国家会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吗？波洛克在他的书中，报告了192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并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提到了“社会工程师的技艺(art)，他们的职责就是去重建整个社会基础”。波洛克也注意到，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领导班子24位成员中有13名工程师。对此他所作的惟一反应也只是说，工程师需要让“‘专家和理论家们密切地参与到他们的研究中’，从而获得合法性，尽管专家和理论家们的工作往往是被忽视的”。<sup>[108]</sup>通过专家和理论家们而获得合法性的社会工程形式，不是像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当成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样成问题吗？

波洛克和霍克海默先是接受以布尔什维克方式组织和控制经济的必要性——所谓布尔什维克方式，就是让具有主动性的少数人对国家实施权力垄断，这种方式对共产主义者来说理所当然，但却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憎恶，后来他们兜了个圈子，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最终又回到了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观点。1927年鲁道夫·希法亭<sup>[109]</sup>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内的任务”一文，同年将它提交给了社会民主党在基尔召开的会议。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替换为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有计划的、经过有意识地指导的经济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服从社会的有意识的干预，也就是说

更能服从在社会中唯一支配着强制权力的那种自觉组织的干预，即国家的干预。<sup>[110]</sup>

波洛克在1930年格吕恩堡的《文献》最后一期上就几本讨论资本主义前景和俄国实验前景的书发表了一个长篇书评。在这篇书评中波洛克抱怨说，现在没人——即使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结构转型做出分析。<sup>[111]</sup>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波洛克和霍克海默继续对俄国实验抱有希望。对苏联境内发生的事件抱有的善意态度必定使他们的注意力聚焦于潜藏在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灰色地带里的经济和政治机会。但是在转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时，他们心里很清楚在社会主义到来之前资本主义（即使在它当前的危机中）究竟能为这些机会的实现留出多大的余地。

霍克海默在两个人中更有天赋，也更具野心，相反波洛克更温和，对自己作为行政人员和经济学家的身份也很知足。因此，尽管波洛克是格吕恩堡的副手和韦尔的密友，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研究所的成员，可最后当上研究所主任的不是他，而是霍克海默。波洛克发表的作品和他的行政才能都是四平八稳的，因此没人会对这样的结果提出反对，或者说没有一条反对理由起码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到了1930年代波洛克就这样稳步地确立了自己作为研究所行政和财政主管、社会研究所行政工作主持人的角色。

## 列奥·洛文塔尔

列奥·洛文塔尔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他将艾里希·弗洛姆带进了研究所。在后来成为霍克海默圈子成员的那些人中，洛文塔尔是在整个1920年代和犹太教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人之一。和弗洛姆一样，洛文塔尔也是1900年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他的父亲是一名中产阶级医生，后来成为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追随者和坚定的科学力量的信仰者，这完全跟他自己的父亲，一个严格正统的犹太人的做法背道而

驰。这位医生鼓励他的儿子阅读达尔文、黑克尔<sup>[112]</sup>、歌德和叔本华。每个下午，列奥·洛文塔尔都同那些来自富裕犹太家庭的学校好友们一起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巴尔扎克和弗洛伊德。他先在学校通过他们共同的良师益友——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识了阿多诺，后来又通过先做柯奈留斯的研究助手，终于与当上社会研究所主任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继续保持关系——洛文塔尔与阿多诺之间建立起来的是持续一生的爱恨交织的关系。

“一战”最后几个月中，洛文塔尔参加了战时特殊的离校考试之后，应征入伍，在法兰克福附近服役。战争结束时，他在法兰克福、吉森和海德堡开始了大学生活，“没有固定的目标……除了医学什么都学”。<sup>65</sup>对他来说，转向社会主义和对犹太教的复归是一起进行的。1918年，他和弗朗茨·诺伊曼、恩斯特·弗兰克尔 (Ernst Fränkel) 还有其他一些人一起，在法兰克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生团。1920年代初在海德堡，他也组织起了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学生。与此同时，他开始为法兰克福的自由犹太人读书之家工作。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为《拉比诺贝尔博士五十岁寿辰纪念文集》一书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魔力：否定的宗教哲学论纲”。<sup>[113]</sup>当时他“最亲密的私人的和思想上的良师益友”<sup>[115]</sup>克拉考尔批评了这篇文章。在克拉考尔看来，这篇文章中的某些地方是在缅怀布洛赫，缅怀布洛赫哲学中被马克思·舍勒比喻成“对上帝无节制的疯狂”的那种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洛文塔尔却受到了布洛赫本人的热情赞扬——他和布洛赫是在海德堡相识的。1923年洛文塔尔以论文《弗朗茨·冯·巴德尔的社会哲学：宗教哲学难题一例》获得博士学位。<sup>[116]</sup>巴德尔使洛文塔尔着迷，他将巴德尔视为对抗世俗化了的中产阶级的教会和下层阶级联盟的代表。这篇论文也充满了布洛赫那种精神。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出版于1918年，在这部书中他勾画了一个由等级制构成国家整体的乌托邦蓝图，这个国家：

将消除一切混乱和引起悲惨结果的事物，整个国家将采用物  
资生产的公有制形式，确立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形式，私人的经

济活动将被废除。同时，这也将使精神上的痛苦、焦虑和所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暴露出来——它们都无法通过社会途径得到解决，而只能求助教会所施的伟大的、超人的神恩。必然地、超验地说，教会的摆位仅次于社会主义。<sup>[117]</sup>

洛文塔尔的第一任妻子就是一位锡安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从1924年起，他们在海德堡就是以弗丽达·赖希曼的“托拉疗法诊所”为中心的圈子里的成员。此外，洛文塔尔还为法兰克福东方犹太难民咨询中心工作。当时这些东方犹太难民常常处于困境之中，而且由于他们与犹太教有着显眼的联系，西方犹太人也拒绝接受他们。1920年代中期，他和恩斯特·西蒙一起编辑《犹太人周刊》。同艾里希·弗洛姆一样，洛文塔尔把对犹太教、社会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关注混合在一起，到了1920年代末，这种混合性的关注使他投身于一种新的理论计划。

从1926年起，洛文塔尔和阿多诺一起竞争柯奈留斯主持的授课资格答辩的机会。在这期间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师，在社会民主党人民剧院担任助手，而且还是社会研究所的奖学金获得者。克拉考尔和霍克海默都没有给柯奈留斯施加影响，以决定是这一位还是那一位，最后他们谁也没有从柯奈留斯那里获得授课资格的认可。但是不管怎么说，两篇申请授课资格的论文还是写出来了，一个是阿多诺的《先验心灵学说中的无意识概念》，另一篇是洛文塔尔的《爱尔维修的哲学》。<sup>[118]</sup>

1930年，洛文塔尔成为了社会研究所正式的助理研究员。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民议会大选中，纳粹党继社会民主党之后，获得票数最多，得到了107个席位。费利克斯·韦尔、马克斯·霍克海默、弗里茨·波洛克和列奥·洛文塔尔聚在一起商议未来的对策，洛文塔尔曾力劝韦尔：“你必须把钱为我们集中起来，在日内瓦开设分部。我们绝对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我们必须准备移民。”<sup>[119]</sup>洛文塔尔以前的工作领域太多了，但是他的主要职责后来还是筹备和编辑《社会研究学刊》，这是研究所的新刊物，替代了格吕恩堡的《文献》。

## 西奥多·魏森格隆德 - 阿多诺

“此时此刻的他完全同卢卡奇合为一体了”，这是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1921 年 12 月在写给他另一个宠爱的学生洛文塔尔的信中谈及西奥多·魏森格隆德时说的一句话。在这一年之前，魏森格隆德已经被批准参加了离校考试，并被免于口试，17 岁的魏森格隆德在法兰克福开始了大学生活，学习哲学、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

他也许缺乏你所具有的对哲学的爱欲。在他那里有太多的东西来自智力和意志，而不是来自本性的深度。但他拥有我们俩都无法比拟的优长，极佳的物质生活和令人着迷的自信品格。他真是个优雅的人物；即使我对他的未来多少有点怀疑，可是他目前的状态还是令我很欣慰。<sup>[120]</sup>

西奥多·魏森格隆德 1903 年 9 月 11 日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魏森格隆德 - 阿多诺是他出生时他母亲要求登记的名字，也是他在魏玛时期从事音乐批评时使用的名字。1943 年流亡加利福尼亚期间，他的官方登记名字就变成了阿多诺，而“魏森格隆德”只以大写开头字母“W”代替了。他的父亲奥斯卡·魏森格隆德（Oscar Wiesengrund）是一位德国犹太人，在他儿子出生前不久改宗新教，而他的儿子也在新教教堂接受了洗礼。奥斯卡·魏森格隆德是一家 1922 年建于法兰克福的大型造酒企业的拥有者。西奥多的母亲本名叫玛利亚·卡尔维利 - 阿多诺·德拉·皮亚纳（Maria Calvelli-Adorno della Piana），是个天主教徒，是出身于科西嘉贵族家庭的法国军官的女儿。在结婚之前她就是个成功的歌唱家了。她的妹妹是个知名的钢琴家，一直生活在她的家里。

阿多诺在严格的保护之下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的整个这段时期都打上了他的“两个母亲”和音乐的烙印。在 16 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高中生，并在高等音乐学校学习了。西奥多的作曲教师是贝尔纳德·赛克莱斯（Bernhard Sekles），“一战”前保罗·

欣德米特 (Paul Hindemith) 就曾跟随他学习。比他年长 14 岁的良师益友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与阿多诺在一战结束时相识, 在理论教育方面对阿多诺十分关心。他们好几年都在每个星期六下午一起以非传统的方式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克拉考尔的指导下, 阿多诺在这部书中体验到的并非某种认识论学说, 而是某种被编码的写作, 精神的历史条件可以通过这种写作方式得到破译, 而且在这种写作方式中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本体论和唯心主义都加入了战斗。1921 年是他高中的最后一年, 在这年春天, 他发现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克拉考尔也为法兰克福的《艺术与文学杂志》(*Blätter für Kunst und Literatur*) 写了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文章, 评论这部“具有伟大诗史形式的历史哲学作品”, 认为它出色地揭示了“经典诗史”与小说的区别: 前者是对充满众神与意义的世界的“自足文化 (closed culture)”进行描绘的诗史写作方式, 后者是对被众神和意义所抛弃的世界中成问题的文化、对完全罪恶的时代进行描绘的诗史写作方式。在克拉考尔的眼中, 卢卡奇发现了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使“希望之焰”继续燃烧, 对“已消失的意义”重生希望。阿多诺对布洛赫与卢卡奇的密切关系早已有所耳闻, 这一年他也读了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在回忆中, 他写道:

这本深棕色的书有 400 多页, [字] 印在厚厚的纸张上, 似乎为人允诺了他希望从中世纪书本里得到的东西, 而它为我许诺了一个孩子能从猪革装订的《英雄宝藏》(*Heldenschatz*) ——一本近年出版的论述 18 世纪以来的魔法的书——里感受到的东西……它是一种哲学, 却可以与最出色的文学比肩而立, 它从未把人引向一种对方法的可鄙的顺从。像“内心的历程” (*Abfahrt nach innen*) 这样的概念, 由于恰恰处在魔法 (magic formula) 和理论命题之间的狭窄分界线上, 就是这一情况的明证。<sup>[21]</sup>

所有这些事情合在一起, 促使阿多诺变成了一个早熟的年轻人, 而在此之前, 他对战争、政治和劳工生活一直没有体验, 就像他后来在《伦理

随想录——对被毁损的生活的反思》(*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sup>\*</sup> 中的自我批评格言中对自己的称呼那样,是“温室里的植物”。

多亏了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阿多诺才能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哲学和当代分析非常熟悉。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生于1889年,是法兰克福一位商人的儿子。克拉考尔从童年时期起就经受着明显的语言障碍的痛苦。由于父亲的早逝,克拉考尔由他的叔父带大,他的叔父是法兰克福慈善学校(Frankfurt Philanthropin)的教授,是一位专攻法兰克福犹太人史的历史学家。克拉考尔最早为了事业上的打算和为生计考虑,以建筑学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而哲学和社会学只是副科。他那时无法听从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sup>[122]</sup>的建议完全投身于哲学。1921年他放弃了建筑行业的工作,转而成为了《法兰克福报》文学副刊的编辑之一,这是一个他能欣然接受的折中之举,这可以使他利用职业上的便利涉及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论题。

在战后和1920年代前五年那段时期,克拉考尔用来批判性地为自己确立思考方向的哲学立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美尔的相对主义及其在理论上显得浅薄的“生活哲学”,连同马克斯·韦伯对价值相对主义和科学客观性两者所做的明确区分;另一方面是马克斯·舍勒对天主教的赞扬,或毋宁说对有宗教倾向的现象学的赞扬,以及格奥尔格·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对俄罗斯精神的赞扬——他认为俄罗斯精神是对充满意义的世界的渴望的实现。他从这些哲学家那里多方吸取他们对于时代的分析,把它们当成是对这个世界、对人类之间关系以及对科学的无能的一种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并将这种去神秘化视为走出当前危机的出路。在他的第一部书《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认识论探讨》中,他大致提到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提到了将会阐发得更为清

---

\* 此书德文原名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英译名为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国内一般译为《最低限度的道德》,此译法参考了海外华裔学者的最新提法。——中译者注

楚的认识论内容。第一章是这么开头的：

在一个被意义充塞着的时代，一切事物都指向神圣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之内科学方式所构想的那种空洞的空间和空洞的时间都是不存在的。相反，时空构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封膜，把与意义具有各自特定关系的所有物质都包裹了起来……我、你、所有对象和事件都从这个神圣意义那里获得了它们的意义，并被层置于多重结构性的宇宙之中……这些石头正是神圣存在的证明。

当意义失落的时候（在西方，这是由于天主教权力的转让造成的），当简洁的信仰愈来愈被当作束缚所用的教条，被当作令人懊恼的理性的桎梏而被加以保存的时候，被意义粘合在一起的宇宙解体了，世界自身分裂为存在着的事物的多样性和面对着这种多样性的主体。这个主体以前内在于那些充塞于世界的各种结构的运动之中，可现在因混乱而降格为精神的惟一担当者，在主体面前展开了一个无法测度的现实领域。主体被弹射到空洞时空展现的冷漠的无限性之中，发现自己面对着已被剥去了一切意义的物质。主体必须依照自身内心具有的那些理念（这些理念是从有意义的时代保留下来的）来加工和塑造这种物质。<sup>[123]</sup>

对克拉考尔来说——甚至同样对包括瓦尔特·本雅明在内的诸多相关的思想家来说，康德的认识论批判变得无比重要，因为那是形而上学的导论，而不是大多数新康德主义形式那样的对形而上学的怀疑拒斥。把思辨理性限制在经验领域在康德看来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它能防止将经验世界的范畴扩展到其他每一种可以构想出来的领域并因而无法给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留出余地。以此类推，克拉考尔致力于为那种宣称自己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划定界限。因此，仅在内（主观）领域有效的范畴将不会绝对化而致使其他那些适用于社会化的人的超验领域的范畴因此受到限制。

这部著作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在高度超验的条件下，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现实，它使世界和自我在同一个范围内统一为一体。因而本著作的意图也就是尝试对每种内在哲学形式（主要是唯心主义思想形式）做出批判，从而在小范围内为转化做好准备——这种转化其实已经是随处可见的了，它将引导迷失的人类重新回归到有上帝充塞于其间的既新颖又古老的现实王国。<sup>[121]</sup>

克拉考尔不像舍勒和卢卡奇，他可以赞赏但决不会具有他们的“宗教冲动和形而上的激情”<sup>[125]</sup>；他也非常不同于布洛赫，他曾经在洛文塔尔面前将布洛赫树立为一个应引以为戒的“私通上帝”的榜样。克拉考尔也是“那些处在期待之中的人们”（Those Who Wait）当中的一员。1922年，他以此为题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了一篇充满尼采式风格的文章，在该文中他大致描画了一些道路，许多人沿着这些道路走下去的时候确信他们找到了新的精神家园，（他确信）这与其说是出于对“现时之混乱”的应对，不如说是出于对“世界深层意义的缺乏而致的形而上痛苦”的应对。有代表性的思想就是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的人类学学说、恩斯特·布洛赫等人的弥赛亚共产主义、格奥尔格圈子对结构的信仰，以及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中给共同体（community）重新赋予的意义。给克拉考尔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态度是怀疑论者对信条和思想暴徒（intellectual desperado）所持的怀疑态度，而马克斯·韦伯正是具有这一态度的代表人物。但是，克拉考尔本人为之辩护的则是这样一种怀疑主义，它不会陷入一种信条式的怀疑主义，而是具有不偏不倚的开放胸怀、在犹豫之中有期待的怀疑主义。那些期待之中的人们不会像暴徒那样“通过否定他们所期待的东西来迁就当前不如意的情况，他们也不会将自己轻易地托付给奔涌的期望之流，后者也许会让它们失去头脑，被吸引到那些懂得某种虚假完满的人那里”。<sup>[126]</sup> 此处尚不清楚的是，通过这样的努力——从力图实现“理论自我向现实人自我的重心转移，从由无形力量、意义缺失的维度所构成的单子化的、非现实的世界向现实世界以及它所包容的领域的返

归”——他究竟能够推导出什么。惟一清楚的是，克拉考尔把拒绝一味超前，把要求严肃对待当下此刻、对待世俗事物和表面事物的倾向，看作是“完美进入”和体验真正现实的前提条件。

直到1920年代，克拉考尔还一直批评社会主义运动，说它除了经济承诺之外没有宗教承诺。只有到了1920年代中期，他才认为当代真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代表了这样一种信念：将物质和世俗的事物当成根本宗旨是能够避免的，如果能首先把物质和世俗的事物严肃地当成最根本事情的话。

卢卡奇、克拉考尔和布洛赫都不在学院圈子之内，因此光靠他们阿多诺并不能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很大的进展。由于阿多诺是个早熟的年轻人，他对学术界的蔑视要更强烈一些。1924年，他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事物和意向之先验性》<sup>[127]</sup>在柯奈留斯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24年7月他给洛文塔尔写信说：“5月中旬我计划好了博士论文，26日我把有关的主要想法报告给柯奈留斯，得到了他的认可。我于6月6日写完论文。本来说11日上交论文，可是到了14日才交上去。”<sup>[128]</sup>在博士论文中阿多诺为自己确立的任务是，解决胡塞尔对象一事物(Ding)理论中先验观念论因素和先验实在论因素之间的矛盾。他从柯奈留斯的“纯粹内在哲学”<sup>[129]</sup>观点出发，断言这一矛盾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从而完成了这项任务。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将事物视为一种由规律控制的表象关联，并服从于经验的修正和个人意识统一性的构造，从而认为事物既是观念的又同时是经验的。在他给洛文塔尔的信中谈到他的博士论文时，阿多诺说：“即便对我来说，它的可信度比它应该具有的要弱——也就是说，它是柯奈留斯主义的。”

差不多在阿多诺开始学术研究的同时，音乐批评和音乐美学也成了他的现实研究领域，在这里，他可以作为卢卡奇、克拉考尔和布洛赫的学生积极从事各种研究活动。从1921年到1932年，他发表了百来篇讨论音乐批评和音乐美学的文章。与之相较，他直到1933年才发表了第一篇哲学作品，那是他为授课资格答辩而准备的论克尔凯郭尔(Ki-

erkegaard) 的论文。

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就涉足这样一种音乐圈子：对现代音乐抱有非同寻常的包容态度，甚至以勋伯格派或赫尔曼·雪亨 (Hermann Scherchen) 的追随者而自夸——赫尔曼·雪亨曾经是法兰克福博物馆音乐会的总指挥。有些在克拉考尔看来是表达某种存在主义观点的东西，在阿多诺看来却是对某种音乐形式的合理性的证明。在阿多诺的第一篇评论中，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就已经是核心参照点了。这篇评论 1921 年发表在法兰克福《艺术与文学新杂志》(Neue Blätter für Kunst und Literatur) 上，主要论题是他的作曲教师贝尔纳德·赛克莱斯创作的一部歌剧。也就是在当时的那几年中，勋伯格刚刚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尽管这些赞誉主要授予他早期的印象主义作品。1922 年初阿多诺为在法兰克福上演的《月光下的皮埃罗》(Pierrot Lunaire) 撰写了评论。他这样描述勋伯格：这位作曲家“降生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因而在《皮埃罗》一剧中“为我们灵魂的无家可归的状态而吟唱”；在他那里，“曾经一度是创造性作品的形式前提的事物，现在成为了作品本身的实际存在和内容”；他靠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用严格的、外在限定的，却又是在整体上活泼的 (durchseelt) 形式”成功地创造出了音乐结构。<sup>[130]</sup> 尽管阿多诺接受并赞赏另一位作曲家菲利普·雅尔纳赫 (Philip Jarnach) 对“形式的肯定”——并认为那是“无政府的、碎片化了的时代中对于艺术最基本的精神状态”，但还是告诫他说：

人们不可能通过将主体性转化为建立在各种形而上学的、美学的和社会学的前提上的异化形式而获得客观性……惟一可能的是，让自我从自我本身，从它的实际决断开始成长起来。我们周围不存在客观的帐篷；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建造我们的家园。<sup>[131]</sup>

在一篇对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的《士兵的故事》(*Histoire du Soldat*) 的评论中，阿多诺批评斯特拉文斯基是在实践达达主义——据说在这部作品中，“无形的灵魂”在被毁坏的旧形式的废墟之上尽情

狂欢。同时他又称赞了另一位作曲家鲁迪·斯特凡 (Rudi Stephan), 欣赏他那“创造形式的疲倦热情”。<sup>[132]</sup>

所以说, 从一开始, 阿多诺就对艺术作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它们必须提供充满灵感的 (beseelte) 形式。对他来说, 现实显然无法提供安顿灵魂的家园。对他来说,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 尽管所处的是这样一个世界, 可在艺术领域内去拥有活泼的形式还是可能的: 勋伯格的作品就是这一点的证明。在给另一位作曲家作品的演出所写的评论 (1923 年发表在《音乐杂志》[*Zeitschrift für Musik*] 上) 的结尾, 阿多诺附带说道:

它与勋伯格的《格奥尔格浪漫曲》(*George-Lieder*) 比起来显得很逊色, 后者伴以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的击打节拍, 猛然进入到市面正在上演所有其他音乐中间。它们甚至离开了作为它们基础的诗, 让这些诗成为它们下面的阴影。在一篇草就的评论中要说清楚这些浪漫曲的性质及意义是不太合适的; 我目前还不能站到离它们更远的地方对它们进行审视。<sup>[133]</sup>

1928 年 5 月, 他在《音乐》(*Die Musik*) 杂志发表了关于勋伯格的《小单簧管组曲》的评论。在这篇评论中,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表达: “在今天不可能对勋伯格作品有任何的批评; 真理本身在这些作品中得到确证。对它的思考应该只限于材料分析去揭示它们已经达到的认识深度。”<sup>[134]</sup> 勋伯格因此正好符合阿多诺起初从他最重要的老师赖因霍尔德·齐克尔 (Reinhold Zickel) 那里学来的东西, 他的这位老师是个顽固的国家主义者 (而后来则成为顽固的纳粹主义者), 是一战老兵、教师和诗人。从这位老师那里, 阿多诺学会了去抛弃文化自由主义, 转而支持一种超越了一切自由放任主义形式的客观真理观念。<sup>[135]</sup> 72

1924 年是阿多诺面临重大危机的年份, 正是在这一年, 他有了这样的想法: “通过天主教的祈祷历书 (ordo) 也许可以来拯救这个已经日渐倾斜的世界”; 也正是在这一年, 他开始“倾向于改宗”天主教, 想要

“公开迈出坚实的一步，以成为高尚的天主教母亲的儿子”。<sup>[136]</sup>这一年的6月，他第一次在法兰克福德意志音乐社团（Allgemeiner Deutscher Musikverein）的音乐节上听到了贝尔格（Berg）的歌剧《沃采克》（Wozzeck）的三个演出片断。《沃采克》是一部真正在音乐中体现表现主义典型特征的作品，而且也是勋伯格流派最成功的作品。在阿多诺看来，这些片断“一下子把勋伯格和马勒（Mahler）联为一体，在我心里这是地地道道的新音乐”。对他来说，勋伯格和马勒一下子联为一体意味着：一种建构起渴望的音乐，一种对于已消逝的意义的渴望，一种对摆脱邪恶的、同时又自鸣得意的世界的渴望。在与贝尔格商定之后，他获准可以尽快到维也纳去做贝尔格的学生。1925年初，阿多诺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去了维也纳，踌躇满志地要做一名作曲家和乐团钢琴师。

当我来到维也纳的时候，我认为勋伯格圈子应该同格奥尔格圈子一样，多少是有组织的。但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婚后的勋伯格住在默德林（Mödling）；他那年轻优雅的妻子多少已经使他（或者在保守派看来是这样）同他的那些老友们隔绝了。魏伯恩（Webern）远离城市，住在玛利亚·恩泽尔斯多夫。人们相互之间并不经常见面。<sup>[137]</sup>

阿多诺很幸运地遇到并结识了勋伯格圈子里的很多重要的人物，因为1925年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去了柏林，1926年1月勋伯格也前往柏林之后，这个圈子最后就散了。在费卢西奥·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去世之后，勋伯格在柏林成功地接替了他在柏林艺术研究院（Berlin Akademie der Künste）的职位。

阿尔班·贝尔格教阿多诺作曲，爱德华·施托伊尔曼（Eduard Steuermann）——勋伯格圈子里一流的演奏家——教他钢琴，同时还跟  
73 随勋伯格的内弟小提琴家鲁道夫·柯里什（Rudolf Kolisch）学习。贝尔格是勋伯格圈子中最友善、最大度的人，他教给阿多诺的东西“无疑是

‘我们这个流派’中的金科玉律”。<sup>[138]</sup>“勋伯格主义的一切都是神圣的”，阿多诺写信给克拉考尔说，“在当代其他音乐中只有马勒还算得上一家。无论是谁，只要反对勋伯格，都将被击得粉碎。”他在与勋伯格能说话之前，曾经见过他几面。他这样描述勋伯格本人：

他的脸是一张阴郁的人、甚至是邪恶的人的脸……在这张脸上没有任何“安详”可言（完全没有年龄特征），它彻底充满了困惑。他有一双几乎玻璃一样的大眼睛和一个有力的前额。他的面颊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尤其是他想对你示以安慰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贝尔格曾经把他【对这张脸的】的分析写下来给我，我不要，因为那分析看上去太像我本人了，当时我不知道那写的是谁的脸，可是我立即就看得出来在这张脸上追寻搜索和沉着镇定同时并存的那种特征。整体上来说，我认为他基本是健康的。<sup>[139]</sup>

阿多诺在这个他认为与自己有着某种同一性的人面前退缩了，与此同时，阿多诺从来到维也纳伊始，似乎就想从这种夹杂着毫无顾忌的勇敢又渴望得到承认的混合体，从这种陈腐和妄想、名誉和贫困的结合体中退回来；而伟大艺术，这个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的东西，却恰恰是在这样的混合体中发展起来的。

阿诺德·勋伯格在参加毕业考试之前就离开了中学。当他由于公司歇业而失去了银行职员职业时，他把这看成是一种解脱，从此他可以完全献身于音乐了。勋伯格1874年生于维也纳，是一位犹太小业主的儿子，8岁时就开始演奏小提琴了。9岁时他就开始作一些小曲子了。一位朋友教给他一些和声的基本知识，他也从迈尔的《百科辞典》（*Konversationslexikon*）<sup>[140]</sup>的“奏鸣曲”词条中学会了怎么创作出他的第一个弦乐四重奏曲。这部《百科辞典》是他和他的朋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来的。他听的音乐会都是军乐队在公园里演奏的。在失业之后，他在“圣歌女神”（*Polyhymnia*）弦乐队里结识了长他两岁的亚历山大·冯·

齐姆林斯基 (Alexander von Zemlinsky)。齐姆林斯基成为了他的朋友和老师。他把“勃拉姆斯风格”的勋伯格介绍给了瓦格纳 (Wagner)，并在1898年组织筹划了勋伯格作品的首次演出。演出非常成功。但是当勋伯格的一些歌曲在同一年被搬上音乐会演出时，最早的“丑闻”发生了。“从那时起”，勋伯格后来对他的一个学生说，“丑闻就没有断过！”<sup>[141]</sup>

74 财政上的困难一再阻碍着勋伯格的音乐事业。很多年中他不得不在弦乐队里演奏别的作曲家的小歌剧。《古雷之歌》(Gurrelieder) 是勋伯格第一部真正成功的作品。他最先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应征1899年的作曲奖，但是由于不断的中断和分心旁骛，直到1911年才完成。从1901年到1903年、从191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26年到第三帝国的兴起，他怀着改善他的经济状况的希望，怀着为他的音乐找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并能够使之更好地为人所承认的希望，曾三次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建筑师阿道夫·鲁斯 (Adolf Loos) 是他在维也纳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这位建筑师1919年还编辑了一本刊物，标题为《他者：旨在将西方文化引入到奥地利的论文》(阿道夫·鲁斯著)<sup>[142]</sup>。勋伯格本人不断做着那些对维也纳文化状况深感不满的人所做的事情——他(照着绘画界“维也纳分离主义者”的样子)发起了一个俱乐部。1914年他和齐姆林斯基一起创建了音响艺术家创作协会 (Verein schaffender Tonkünstler)，古斯塔夫·马勒担任该协会的名誉会长和主持人；1918年他又创立了私人音乐演奏协会 (Verien für musikalische Privatauf-führungen)。勋伯格反复强调，这种作曲家组织旨在将艺术家和公众从音乐会承办人和演出公司那里解放出来，那些音乐会承办人和演出公司总是将不大可能保证经济上成功的节目从它们的节目单上排除，“它们那些一成不变的、千篇一律的节目单已经造成了音乐趣味的普遍衰退”。大量而经常的一流演出将会让人们对新音乐的熟悉成为可能。这是一切新音乐鉴赏得以发展的前提，同时，他认为，随着新音乐的日益复杂，批评鉴赏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必要性。

自勋伯格1904年在维也纳开设课程以来，具有作曲天赋的人几乎没有谁去听课，因此勋伯格最终放弃了这种公众教育形式，代之以招收真正具有天赋的学生，给他们进行私人授课。这些学生中就有安东·魏

伯恩 (Anton Webern) 和阿尔班·贝尔格。贝尔格是自学成才的。直到他的家庭条件有所改善之前, 勋伯格一直为他免费授课。1919 到 1923 年, 他也一直为另一个自学者汉斯·艾斯勒免费授课。艾斯勒是他的第二批学生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免费授课的动机完全源于他对真正的艺术家, 对有创作冲动的艺术家的尊敬: “他一直感觉到, 他所做的是他必须做的事情。事情看上去似乎是, 他是在出于某种冲动, 或是出于他心里说不上来的其他动机在做这件事。”<sup>[143]</sup> “艺术家就是天才” 这种观念说明了他一直对人隐瞒着的动机, 而那个时代读过叔本华的艺术家的都是很熟悉这种观念的。就勋伯格而言, 这种动机中还夹杂着断定音乐永远在进步、“当艺术家深而又深地探入无意识的黑暗王国取回统一的形式和内容的时候”, 他们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这样一种信念<sup>[144]</sup>。勋伯格的《古雷之歌》1913 年在维也纳上演并大获成功的时候, 他早就告别了晚期浪漫派的音乐世界了, 此时他尚处于漫长但并非不多产的危机之中。在他发现了为他的作品连续统一性提供保证的那个新观念之后, 自由的无调性危机时期从 1905 年差不多一直持续到 1920 年代的头几年——这个新观念就是用十二音阶来作曲的方法, 每个音阶只在两两之间相互联系。他“对于表现的需要”, 使得他能够在他之前试图自由地打破调性作曲法的那些重要艺术家止步的地方继续走下去。通过十二音阶技法, 他创造出了他“仿佛在一个‘可理解’、可控制的梦境中听到”的各种音乐形式。<sup>[145]</sup>

75

尽管吸引阿多诺的是贝尔格, 可勋伯格才是阿多诺眼中至关重要的作曲家, 才是阿多诺在最早的一篇音乐评论中对音乐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的实践者: “惟一可能的是, 让自我从自我本身, 从它的实际决断开始成长起来。我们周围不存在客观的帐篷; 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建造我们的家园。”这个充满激情的 22 岁的年轻人再清楚不过地感觉到, 他不可能从勋伯格那里获得认可。阿多诺根本不是有什么创作冲动的多产的艺术家的, 而且他在技术分析上还是很笨拙的, 而那在勋伯格派看来非常重要。“极其热情”却还“背着哲学包袱”<sup>[146]</sup>的阿多诺给勋伯格

留下的印象是，他既非一个作曲家，亦非一位音乐美学家。

阿多诺曾描述过他与另一位大人物格奥尔格·卢卡奇相遇时的场景，后者一直是他年轻时代的光辉榜样。这个描述也表露出某种矛盾复杂的反应。1925年6月，通过贝尔格的另一位学生佐玛·摩尔根施泰因（Soma Morgenstern）的介绍，阿多诺拜见了当时作为流亡者住在维也纳的卢卡奇。阿多诺写信给克拉考尔说：

我的第一印象是强烈和深刻的。一个矮小、柔弱、不太协调的金发碧眼的东方犹太人，他有着塔木德式鼻子和一双奇妙而深不可测的眼睛；他穿着一件条纹亚麻运动衫，非常有学者的风度，他的言谈举止透射出一种不拘俗套、极其明快而柔和的氛围，他的身上宁静地表露出某种羞怯。他代表了那种不张扬的典范，当然也是一种难以把握的形象。我立即就觉察到，他甚至超脱于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之外，在我们长达三小时的讨论过程当中，我相机行事并且处处退守。

但是他也发现讨论本身是相当严肃的。卢卡奇“首先全盘否定了他的小说理论，理由是它是‘唯心主义的和神话学的’。他比较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自己的小说理论在赋予历史以内容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卢卡奇还强烈反对布洛赫对他的“不可知论”的解释。在连载于1923年10月至1924年3月的《新墨丘利》（*Neuer Merkur*）<sup>\*</sup>上的发表对于

---

\* 德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三份文化政治博物的名称都带有“*Merkur*”一词。*Merkur*（墨丘利）在罗马神话中是传译信息的神使，后来也被称作商业之神，以它作为刊物之名，意在突显文化智慧的传播和交流。此处的 *Der Neuer Merkur*（《新墨丘利》）是指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份文化政治刊物，1914年创刊，1925年停刊（1916—1919年有中断）。之所以称“新墨丘利”，是因为140年前（1773年）著名作家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曾创办过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 *Der teutsche Merkur*（《日耳曼墨丘利》）或《日耳曼信使》，该刊1790年后又改为 *Der neue teutsche Merkur*（《新日耳曼墨丘利》），1810年停刊。该刊之所以用罗马神话中的信使之神墨丘利来命名，旨在推动对启蒙主义的宣传。另一份杂志是创办于1947年的 *Merkur*（《墨丘利》），目前已经成为第一流的德语文化政治类刊物，发表文章以散文随笔为主。——中译者注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评论，布洛赫将卢卡奇对精神（inwardness）和形而上学的反驳描述成一种“英雄式的”、“初步的和辩证的不可知论”，并认为它“以一种完全负责任的方式，在通向超验的路途之中设置了诸种障碍”，并且表达了对“过于草率地使用标签的所有自我建构的形而上学的厌恶”，“布洛赫视为‘麸皮’的东西对他来说却意味着整个世界”。卢卡奇还猛烈抨击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适用于‘泛逻辑主义地误解了自身’的黑格尔，但是不适用于被提纯了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黑格尔……他是（在这里他以平常的那种方式充满憎恨地说）正在消失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卢卡奇在一点上让阿多诺感到震惊：“他告诉我说，在他与第三国际的冲突中他的对手是对的，可他又说他对辩证法的正确而辩证的处理方式是绝对必要的。他的人格的伟大和突然颠倒辩证法的悲剧就蕴藏在这种疯狂之中。”<sup>[147]</sup>

这就是阿多诺初会卢卡奇时卢卡奇留给他的印象。卢卡奇在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上被认为有左倾偏向，稍后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因其“唯心主义的”和“神秘”倾向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批评。卢卡奇似乎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融入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党。克拉考尔在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和之后都严厉地批评《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书对他来说，就像对布洛赫和本雅明一样，整个就是通过对外部世俗世界的分析来取代神学的一种尝试。在克拉考尔看来，疲惫的唯心主义在卢卡奇的著作中并没有得到超越，相反却是得到了发扬，而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被现实所充实，相反却由于运用了某种无能的、疲惫的哲学而削弱和剥夺了它所有的革命能量。<sup>[148]</sup>

银行主管约瑟夫·冯·卢卡奇的独子1908年23岁时就以其《现代戏剧发展史》<sup>[149]</sup>获得了布达佩斯基斯法卢迪协会（Kisfaludy Society）的大奖。约瑟夫写信给儿子说道：

我对你的希望，因而也是对我的希望是，即使在你的朋友

面前，你也应该向外界证明你对这样一种高度是能够保持冷静的，有时是近乎严厉无情的客观性的。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放手让你自由发展，让你自主选择。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因为我绝对相信你，并且无限地爱着你——我牺牲了一切，就是为了能够看到你成为了了不起的人物、获得认可和名誉——如果人们会对我说我就是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父亲，那么这将是我可以得到的最大幸福。<sup>[150]</sup>

卢卡奇的父亲，这位外省犹太手工艺工匠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布达佩斯加速工业化时期进入了高等中产阶级阶层。在世纪之初他还获得了贵族的头衔。伴随着这些成功的是他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对艺术的慷慨资助。他这个原来被期望走父亲老路的儿子在修完法律和经济学之后获得了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并在匈牙利皇家商业部获得了一个职位。但不久之后，他放弃了这个职位而去继续进行他的研究，这时他完全投入到文学、艺术史和哲学之中去了。父亲就是儿子的赞助人。而他，就像经历了社会迅速进步、已被同化的诸多上层中产阶级犹太家庭的儿子一样，背叛了父辈得以赚钱的那个世界，变成了一位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家。

在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和西美尔的影响之下，卢卡奇 1906 年至 1907 年在柏林研究期间写下了《现代戏剧发展史》的第一个版本。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希腊城邦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比较：在希腊城邦这种历史上的社会构成之中，文化与日常的现实很接近；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无政府式生产和竞争产生的异化劳动使得社会纽带愈来愈抽象和复杂，并使得个体愈来愈封闭，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也不再可能了。在这个受西美尔《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 启发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借鉴滕尼斯 (Tönnies) 对共同体与社会两种范式所作的区分来展开对现代性的诊断，卢卡奇将现代戏剧的时代描绘为资产阶级走向衰落的英雄史诗时代。在布达佩斯，作为戏剧批评家的卢卡奇曾尝试着给几家杂志当撰稿人；作为一家自由剧院的支持者，他还试图

将现代西方文化引介到他的家乡——他认为他的家乡总是有着外省的习气。他做这些的终极标准就是他对“大规模的、纪念碑式庞大的艺术”形式的艺术理想。<sup>[151]</sup>

如其父亲所愿，儿子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他也保持了那种近乎严厉无情的客观性。他有这样一种信念：由于他本人对生活的无能和他对他伟大工作的责任，他必须离弃女画家伊尔玛·塞德勒 (Irma Seidler) 这个向他展现了具体生活的女人。在她自杀之后，他通过他的对话体作品“论精神的贫困”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了下面的话：“她只有死去，这样我的工作才能完成，因此这个世界留给我的东西，只有我的作品。”他的《心灵与形式》就是献给她的回忆。在这部作品所包含的文章中，他抱怨说，在非本质的生活中，无论是本质生活还是那些渴望本质生活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都是不可能的。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从通常的角度看是“不可理解的和被误解的”，这就是：“没有质量的生活 (unlived life)”一方面是从生活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有着伟大心灵的、对异化生活不抱任何幻想的英雄们“构造的生活”。<sup>[152]</sup>

在遍游柏林和佛罗伦萨之后，卢卡奇 1913 年应布洛赫之邀定居在海德堡。他是通过西美尔认识布洛赫的。在那些年中，卢卡奇和布洛赫之间的共性在于，他们都彻底否定了异化了的、没有文化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他们都尝试着勾画出一副固守千禧年主义的、宗教性质的乌托邦蓝图。与布洛赫相反，卢卡奇同时还考虑到要通过技术哲学来解释美学问题，考虑到要在方法论上解释艺术作品中的社会和美学关系。这种综合考虑使他对马克斯·韦伯发生了兴趣并与之产生了共鸣。他原先就是和韦伯的圈子是有联系的。

卢卡奇从一开始就反对“一战”。他对这场战争的回应，就是中断了他的美学著作的写作，转而开始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期研究，卢卡奇将他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都包含在这项研究之中。他希望通过他的这项工作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能够超越德国唯心主义，并且能够以德国唯心主义补充德国古典作家和浪漫派的那种方

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性作品进行哲学上的补充。费伦克·费艾尔 (Ferenc Fehér) 曾概要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概况以及卢卡奇对陀氏作品所作的注释和笔记,他说:

“俄国”,这个进行革命、应诺并显现了“共同体”的地方:它是卢卡奇为“西欧”提供的神话式的、激进的答案——西欧在客观精神和个体存在问题方面的思考已经陷于停滞,战争的事实也清楚地证明了西欧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里。对“西欧”来说,“俄国”代表了“未来的光明”。<sup>[153]</sup>

可这项研究只完成了导论部分,这一部分最后以《小说理论》为题发表。卢卡奇将这部分书题献给和他在1914年结婚的第一任妻子叶莲娜·格拉本科 (Yelena Grabenko)。她是一个俄国人,以前曾是在监狱里度过许多年的俄国恐怖主义者。在他的朋友贝拉·巴拉兹 (Béla Balázs) 看来,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的一个极佳的样板”,她是卢卡奇的“一间实验室,是他的难题和道德律令的人化现实”。<sup>[154]</sup>

在匈牙利共产党于1918年12月成立后不久,由“伽利略学圈”的左翼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的杂志《自由思想》(Szabadgondolat)就发了一期讨论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号。这期专号中就包括卢卡奇的一篇《作为一个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在这篇文章里,他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由是(震惊于有人竟然赞美黑贝尔 [Hebbel] 笔下的犹滴 [Judith] 所说的话——“既然上帝在我与我必须做的事情之间设置了罪孽,我从中偷偷逃走我是谁呢?”很伟大),他不能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这样一种信仰,即专政、恐怖主义和阶级统治的最后(因而也是最无情的)形式将会终止一切阶级统治。他也不能同意“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形而上学式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总是说:“善是通过恶产生出来的,或者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拉祖米金 (Razumikhin) 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通过谎言通向真理 (one can lie one's way to truth)。”<sup>[155]</sup> 12月中旬,在海德堡大学刚刚通知他的授课资格答辩申请

被驳回——理由是他是个外国人——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以库恩·贝拉（Béla Kun）为首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于1919年2月被捕之后，卢卡奇本人也成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还是党的报纸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在中产阶级政府于3月自愿将权力交给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盟之后，在从3月到8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期间，卢卡奇成为了人民教育部副部长，后来他还担任匈牙利红军第五师政治委员之职。

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后所写的第一批文章，表现出他从一位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通过某种连续性的进步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表现出他主动积极地将共产主义运用于他的观点——几乎到了消极服从的地步。他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完全成了对共产主义极端变革的文化革命阐释。他此前不久提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时候（最近的就是那篇“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批评说社会主义秩序在伦理和历史哲学方面缺乏“充实整个心灵的宗教伟力”，而它的那些目标又是彻底意识形态性的。但卢卡奇现在宣称，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核心。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阶级意识的形成将会使得全部社会发展历程进入意识；日常生活将被本质生活所充实；而人类将成为真正现实中的积极的承担者。在1919年6月的青年工人大会上，卢卡奇宣称，在实现苏维埃专政之前，教育和文化的斗争只是众多斗争目标当中的一个目标。现在最终目标是：

经济生活中有罪的、邪恶的独立性将被消除，而且经济生活和生产将会服务于人性（博爱）、人道主义理念和文化。正如你们从经济斗争中脱颖而出并投身于文化一样，你们也正在致力于成为社会调控的组成部分，并将为未来的社会创造出核心的思想。<sup>[156]</sup>

作为文化教育副部长，卢卡奇努力使艺术家从他们作品的销售状况中摆脱出来，从而克服艺术品的商业性质。对艺术的控制交还到了

艺术家的手中。举个例子，一个由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佐尔丹·柯达依（Zoltán Kodály）和恩斯特·冯·多纳尼（Ernst von Dohnányi）组成的音乐理事会被建立了起来。如果艺术能够摆脱其商业性质，如果经济能从文化的目的出发来进行、如果武装保卫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功了——这也许是三十四年来一个革命夙愿，那么本质生活至少会再次成为可能。

由协约国支持的罗马尼亚的武装进攻导致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卢卡奇逃亡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流亡者中，他首先是匈牙利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和第三国际在东南欧的官方喉舌《共产主义》（*Kommunismus*）杂志的首席编辑。该杂志在1921年10月被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不够忠诚为由责令停刊。卢卡奇抽取出他发表在该刊物上的几篇文章，补上了以“物化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的几篇文章之后，于1923年出版成书，题目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80 在卢卡奇看来，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基本上总结了他的那种尝试：试图将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构想成为旨在消灭无灵魂的社会秩序并代之以有灵魂的社会秩序的一种规划。这本书的标题点出了贯穿着其中几篇文章的一条红线。“历史”是指社会结构的表面上刚性的、本质的、物化的因素都会在其进程中被消解的一种过程。“所有限定都退化为幻想恰恰就是历史的本质：历史就是塑造着人的生活的客观形式不断被颠覆的历史。”“阶级意识”则是指对历史总体性主体的发现，这一主体能够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非物化关系”。

只有阶级才能以一种实践的革命方式和现实整体发生联系。（“种”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无非是已经被一种思辨精神神话化和程式化了的个体。）当阶级能够通过既有现实世界的物化对象性看到也是它自己的命运的那个进程时，它将能够控制现实整体。

在卢卡奇的眼中，只有一个阶级有能力实现这种黑格尔主义的思

想母题：无产阶级。“工人生活中纯粹抽象的否定性在客观上是对物化最典型的证明，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基本构成类型。但正是因此，它在主观上也使得这一结构进入意识成为可能，也使得这一结构被打破成为可能。”<sup>[157]</sup> 对卢卡奇来说，关键的因素不是由认识指导的并由愤怒激发的彻底变革的过程。关键要有这样一种认识，它作为认识却具有实践性，它是一种获得意识的行为，而这种意识本身就是行动。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与空想的阶级斗争历史哲学的这种结合，使“物化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了在全书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文章。

许多共产党人都欢呼《历史与阶级意识》表现了一种革命的、行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比如，这些人当中不仅当然地包括卡尔·柯尔施，而且在卢卡奇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受到官方批判之前还包括魏特夫。在随后的几年中，这本书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成为了继续留在那时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的共产党之内，或者首先是加入共产党，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种理由。威利·施策勒维茨（1933年之前社会研究所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还记得，对他来说有两位哲学家是最重要的：卢卡奇和海德格尔。他们两人都把异化摆在了哲学讨论的中心位置；都严肃地将哲学看作为起到了它的作用因而正在终结旧有形式的某种具有新形式的事物，看作实现新的、真实的生活的关键要素。

在克拉考尔看来，卢卡奇那里的新形式还不够新，而且在那里唯心主义还没有得到足够地改造。“今天的道路应该沿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直接走下去”，他在给布洛赫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那几封信的答复中这么说。<sup>[158]</sup> 克拉考尔自己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观望的立场，这种立场把他引向了一种几乎类似于蒙太奇的经验主义，这使他拒绝那些理论构造。但是阿多诺在卢卡奇那里发现了一种思考历史的哲学方式，后者成为1920年代晚期阿多诺关于音乐及其进步的哲学的灵感之源。然而，阿多诺于1925年拜访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甚至根本不准备为自己早期所作的那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内容紧跟

81

时代的黑格尔化努力做辩护。

阿多诺显然更适合写有关音乐的东西，而不是创作音乐，他也感觉到他不大可能被勋伯格圈子所承认，对他谴责为经济落后、文化轻浮的维也纳也颇有不满。他对法兰克福思乡成病，非常想回到他的朋友克拉考尔那里。1925年夏天，他回到了他的家乡，在这之后只去过维也纳几次。虽然他还没有彻底放弃成为一名音乐家的希望，可是他的条件越来越强烈地促使他希望以哲学家作为学术职业，或许会重点关注美学。不管怎么说，在维也纳的逗留最终确立了维也纳新音乐在阿多诺美学和哲学思想中的关键地位。作为《音乐杂志》、《音乐》、《乐谱架与指挥棒》(Paul und Taktsstock)以及《破晓音乐报》(Musikblätter des Anbruch)等重要刊物的撰稿人，他还是勋伯格派的支持者。但他一直有这样一种基本的感受，那就是，像勋伯格这样只对文化感兴趣并信仰君主政体和贵族制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在音乐中引发一场革命。

1927年夏，阿多诺完成了对《先验心灵学说中的无意识概念》的扩展研究，<sup>[130]</sup>他打算用这篇论文在柯奈留斯那里进行他的授课资格答辩。他毫无保留地再一次把柯奈留斯的先验哲学当成自己的基础。这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这么考虑肯定是对的。1923年他通过克拉考尔结识了本雅明，后来在本雅明造访法兰克福期间他们经常见面。1925年本雅明在法兰克福没能以他的论文《德国悲苦剧的起源》通过授课资格答辩。柯奈留斯是以他作为艺术学者的能力来审查本雅明的论文的，他给这个论文的作者写了封信寻求帮助，问他是否能就这个作品的艺术史方面的问题做出解答。最后，甚至连善意对待这部作品的柯奈留斯，以及他的助手霍克海默都将它判定为是一部不可理解的作品。阿多诺做出把自己拴在柯奈留斯先验哲学上的决定，也不仅仅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且出于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他写信给曾建议他在马克斯·舍勒的指导下做音乐哲学的论文的克拉考尔所说的那样）：他还无法确信自己能“拿出一部名副其实的成果作为授课资格答辩的论文”。

82 尽管阿多诺写这篇论文时没有感受到多大的乐趣，并且强迫所有内容都完全恪守柯奈留斯的认识论，但他毕竟清晰地展露了是什么激

发了他：这就是追求“意识第一性”、追求广泛包容的理性观念的一种热情。他一方面认为无意识概念是对认识的一种限定，另一方面又将它解释为是对那些可以同意识联系起来而无意识事实的一种描述。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一种关于无意识的经验科学，这种经验科学可以填充到由先验哲学所提供的框架当中。“我们之所以会认为精神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对无意识的研究并不需要负载任何不相称的形而上学悲情，还因为它的研究旨在消除无意识状态，并因此为反对任何方式的对本能的形而上学化、对单调的有机生命的神圣化提供了重要的武器。”

克拉考尔的影响在这种追求拓展了范围的唯理观念的热情之中，再一次凸显了出来。从1920年代中期以来，阿多诺的这位良师益友就已经看出，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还不够理性化，它停留在适合于开发自然的态度上，并从理性观念中排除了“生活的真实内容”。克拉考尔1927年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的装饰”的文章，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这一观点。

阿多诺的这篇论文在结论处相当令人惊奇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说道，他所批判的无意识学说正在起到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粉饰着支配性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转移人们对这种经济秩序的注意力。以“经济竞争”和“帝国主义倾向”为所体现的这些社会条件，限制了启蒙的进程。总之，尽管没有挑明，可他还是表达了自己坚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柯奈留斯并没有接受这篇论文。在读了这篇论文的前三分之二后，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虽然点缀了很多词汇”，可它不外是“对他从我本人的课程和书中得到的东西的简单重复”。阿多诺主要是被霍克海默所激怒，撤回了他的授课资格答辩的“请求”，因为他怀疑霍克海默因为论文对他来说还不够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下足够工夫帮他的忙。在后来填写新的授课资格答辩履历表的时候，他把这些事情一笔带过：“1927年曾写过一部未发表的、拓展认识论研究著作。”

同时，由于能得到他慷慨大度的父亲的资助，他继续从事他的私人

研究，并仍旧希望作为一名音乐批评家干一番事业。自1927年以来，他常常去柏林。他的女朋友格雷特尔·卡尔普鲁斯（Gretel Karplus）就住在柏林，她和本雅明也很熟。在柏林，阿多诺经常与本雅明、布洛赫、布莱希特、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和洛特·莱妮娅（Lotte Lenya）交往。他曾经试图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所属的《柏林先驱报》（Berliner Zeitung）谋求一个音乐批评家的职位，可是没有成功。

83 这个时候，本雅明对于阿多诺来说，可能已经变得比克拉考尔还要重要了。无论是本雅明到法兰克福还是阿多诺到柏林，他们总要见面。

“威克斯多尔夫（Wickersdorf）在既有的现实世界中是个保持清醒的避难所”，17岁的瓦尔特·本雅明给他的同辈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东方犹太文学的翻译家路德维希·施特劳斯（Ludwig Strauss）——写信这么说。威克斯多尔夫的“自由师生社团”（Freie Schulgemeinde）1906年由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等人创建。维内肯是当时青年运动最突出的领导人之一，尽管实际上青年运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追随他。他的思想用三言两语就能概括——青年、青年文化和青年领导。1895年生于柏林的本雅明在图林吉亚豪宾达（Haubinda in Thuringia）的寄宿学校上学的那两年（1905—1907），就开始和维内肯保持联系。维内肯一度在那所学校任教。由于本雅明当时上文科高中（Gymnasium）有些困难，于是就被送到了豪宾达的这所寄宿学校。作为一个被倍加呵护的孩子，本雅明以前只是通过家庭教师和由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们组成的圈子接受教育。家庭教师的教育要比以训练学生考入文科高中为目的的预科学校高一个台阶。本雅明的父亲认为预科学校的教育看上去与他们的家庭状况是不相宜的。本雅明的父亲出身于普法战争后移居到威廉帝国蒸蒸日上的首都柏林的一个商业家庭。他作为一家艺术品拍卖行的拍卖人和股东进入了上层中产阶级社会。从1910年起，瓦尔特·本雅明开始为鼓吹维内肯思想的青年杂志《开端》（*Der Anfang*）撰稿，“维内肯主义者”本雅明这样写道：

信任青年吧，他们现在可以开始学着去劳作，去严肃对待自己，去自我教育，这样人类也就是在信任它自己的未来、信任它惟一能去敬畏的非理性——青年，他们不仅有更多丰富的未来精神，而且确实在智力和精神方面都非常丰富——青年，他们在自己身上就能感受到新文化代表的快乐与勇气。<sup>[182]</sup>

本雅明从1912年起，开始先后在布雷斯高的弗莱堡 (Freiburg im Breisgau) 和柏林研究哲学、德国文学和心理学。在为《开端》撰稿的同时，他还是柏林“青年演讲厅”(Sprechsaal der Jugend) 的参与者——这是一个提供有关家庭和学校、艺术与性爱方面的资讯和讨论的青年中心。他还是“自由大学生协会”(Frei Studentenschaft) 的成员，这个组织代表了那些不参与提倡决斗的学生社团的成员。他往来于犹太人占很大优势的那些社交圈子。这不仅是因为别的组织要么拒绝，要么不太情愿接受犹太人，而且部分地是因为犹太学生也发现那些组织是不太令他们满意的。本雅明感到，“在我可以倾诉我的思想的那些人中，基本上只有犹太人同我在智力和实践上可以相互交流。”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犹太主义“绝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传递媒介，是精神生活的代表”。<sup>[163]</sup>

84

他的另一篇写于1912年的文本“关于今日宗教虔信的对话”(一直没有发表)，显然与像青年卢卡奇这样的现代世界的其他批判者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渴望能使文化、精神和宗教生活统一起来的那种力量的复兴。除了犹太人之外，他还将“文人”(Literati) 看作是文化的代表，他这么写道：

他们想成为最诚实正直的人，他们想展现他们对艺术的热情，对“最遥远的事物的爱”，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他们本人在某种病态的自我消解之中去扑灭他们自己身上一切太人性的、为芸芸众生所需的东西。希望给他们生活赋予意义的人们采用的这种方式却使他们成为习俗的麻烦；我们的虚伪谴责他们是局外人，谴

责他们太滥情，并迫使他们变得思想贫乏。如果我们不想用我们的个人才智去填充社会生活的这些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把才智注入到习俗之中。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文人和新宗教可以帮助我们。宗教赋予日常生活和习俗以新的基础和高贵性。它将成为一种崇拜和礼拜的形式。它难道不是我们渴望着的一种思想的、礼拜的习俗吗？<sup>[161]</sup>

1915年本雅明因维内肯对战争的狂热而与之决裂。这也是使他在1914年与《开端》杂志疏远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该杂志的政治化使他无法与纯粹思想保持一致。战争与青年运动的失败，也为他献身青年事业的行动画上了句号。但是他对精神生活的献身投入和对腓利士人式的无教养的鄙视则是愈来愈甚。他的朋友格尔绍姆·朔勒姆曾经描绘过这两种因素在他身上相结合而形成的态度：

在他身上有一种纯粹和绝对的东西。他完全投身于精神生活，就像个生在另一个世界的犹太经文抄写者，一直在寻找着他的“经文”。我与他接近并必须承认这种东西具有某些缺陷，这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危机……本雅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太狂放恣肆，太虚无主义，让我都受不了。他只承认他教养出身的那个生活领域和知识界的道德。……本雅明宣称，像我们这样的人只应该对我们的同类人，而不应该对我们所弃绝的那个社会的规则负责。<sup>[165]</sup>

1918年至1919年期间在柏林，格尔绍姆·朔勒姆与本雅明及其妻子住得很近，那时本雅明为了躲避战争逃到那里，并希望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在朔勒姆看来，本雅明认为自己未来将会成为一名哲学讲师。在发表于1915年的“大学生生活”一文中，本雅明就着重强调，真正的哲学并不是“范围狭小的学院专家哲学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而是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浪漫派和尼采的那些问题”。<sup>[166]</sup>这些观点在一份写于1917的“未来哲学论纲”的手稿中得到了更为确切的表达。曾一度赞颂青年一

代“冷静而浪漫”的本雅明，现在心里所想的就是把康德的冷静——他并不将青年对深刻性的要求拒于哲学之外，而且写作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同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即强调使有限与无限达成和解，并出于对最高存在之物的考虑，决不准备单单依赖情感来进行。在本雅明看来，康德已经建立了一种简约化了的关于经验的概念。而现在要做的就是，“运用典型康德风格的思想在认识论上创立更完善的关于经验的概念”，这种概念的确立“不仅能使机械经验，而且能使宗教经验在逻辑上成为可能”。<sup>[167]</sup>朔勒姆回忆，在这一时期本雅明最极端的一个提法就是：“无法清楚地解释并包容用茶叶渣算命的可能性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sup>[168]</sup>这明显与布洛赫也展现过的那些玄奥晦涩的思想有某种大胆的联系。本雅明1918年在柏林会见过布洛赫。

本雅明1919年写作的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就是实施这一论纲的第一步。这项研究的主题——艺术批评的概念——就是作为更完善的经验形式，作为冷静反思的某种形式被呈现出来的。在论文开始的段落中，他写道：

当哲学史通过康德明白简洁地宣告可以构想出智性直观 (intellectual intuition)，但同时又宣告它在经验王国中是不可能的 (尽管这不是第一次了) 之后，立即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几乎是狂热的努力，它们都想为哲学争取到这个概念以作为哲学最高主张的担保。这种努力始于费希特、史莱格尔、诺瓦利斯和谢林。

与费希特不同，早期浪漫派认为艺术作品 (而不是自我) 才是反思的绝对媒介。“在艺术品对象”、“意识的精细化表达”之中“……展开反思”就是浪漫派所说的艺术批评的任务。批评就应该不多不少地去“揭示作品自身的秘密结构，实现其隐藏的意图……使其完整。显而易见：对浪漫派来说，批评与其说是对一部作品的判断，不如说是一种使它完善的方法。”本雅明以下面这段话为论文作结：

使艺术品得以完善的这种批评过程，可以被描绘成一个在作品周围制造一种光晕的过程。这种光晕——冷静之光——使得艺术品的多样性逐渐消失了。它是理念。<sup>[169]</sup>

本雅明在《未来哲学论纲》中暗示他要表述的东西，在这里最终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86           在康德体系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与经验概念相符的认识概念，在这样的经验概念中认识本身即理论。在这种认识概念更为普遍的领域，这样一种哲学要么被描绘成神学自身，要么可以优于神学，因为它包含了历史和哲学的因素。<sup>[170]</sup>

此处神学教义式的口吻是典型的本雅明风格。这使本雅明能够使用一种他本人对其用途和可靠性尚存疑问的思想资源（apparatus），以一种富于成效的激动人心的方式进行工作。在1929年9月14日给克拉考尔的信中，阿多诺将本雅明形容为“神设下的一个让人眩晕的陷阱”。

《歌德的〈亲和力〉》和《德国悲苦剧的起源》是1920年代本雅明发表的篇幅最长的两部作品。它们与本雅明论艺术批评的书在基本精神上是相同的。发表它们是为了参加授课资格答辩，同时他还想借此劝说他那一直坚持让儿子从事中产阶级职业的父亲，希望他能长期资助他过私人学者的生活。

《歌德的〈亲和力〉》是本雅明“完全通过作品内部来阐明作品”<sup>[171]</sup>的一种尝试，或者说是实现与黑格尔传统所谓的“内在批评”紧密相关的浪漫派所谓的“完美”或“完成”的一种努力。出于这一目的，本雅明将这部小说中的四对男女和这部小说中包含的一个故事“任性的青年邻居们”中的一对恋人作比较。他认为小说中的四对男女生活在自然和法则的神话式力量所统治的世界之中。面对行将瓦解的婚姻所表现出来的冷漠；笼罩着全部风景的暗淡的光；本书人物名字出现得

如此之少；大量的预示的和平行的情节；“相同事物的永恒复生”；纯粹物质的东西的重要含义——本雅明将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为体现神话的自然观念的象征，人类无处不体现着这一自然，体现着这种“将活生生的本性封闭在有罪与忏悔的惟一结构之中的命定的存在形式”。相反，任性的青年邻居们的故事却充满了不顾一切真心相爱的人的“明亮的光”、“柔和的光”。<sup>[172]</sup>在这种大胆的类比阐释之中，本雅明以他自己的那些神学和哲学概念作为前提，就好像它们毫无疑问是真实有效的教义似的；这些概念集中在这么几个关键词之上：自然、语言、救赎和上帝。他说，被那个少年搭救免于溺水身亡的那个少女的毫无遮掩的裸体超越了美的领域（美将理念之神秘而不是将理念本身变得可见，即使在艺术品中也是这样）而指向了上帝的理念——在上帝面前无物神秘。这对年轻邻居的爱情，违背习俗并将生命置于风险之中；通过这则故事，这篇小说指明了“在作品中相当超自然的事物和具体可感的事物”达成的和谐。在歌德那里，中心点是奥蒂利的“温柔的、被遮掩的美丽”。但是她也正是“歌德通过毫不留情的艺术手法”对“沉入自身的黑暗、神秘的自然”的反映。奥蒂利没有清楚地说出来，在本雅明看来，她的自杀不是出于道德决断，而是一种本能冲动的结果。多亏本雅明对这部作品的“完善”，哲学替代了神话可以成为解释作品的指导原则。通过把作品中“错误的、被误解的整体”化约为作品未完成部分的状态，完成过程（即批评过程）可以通过作品的独特性和惟一性将其作为“真实世界的碎片”而拯救出来。<sup>[173]</sup>

87

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将“拯救式批评”运用于德国悲苦剧以及作为其内部典型特征的寓言（allegory）性质。德国悲苦剧常常被谴责为对古代戏剧的拙劣模仿，而寓言常常被看作是低于象征（symbol）的艺术表达方式。在他的“认识论前言”中，本雅明试图将康德主义认识论理论与他自己的语言神学结合起来，以便对哲学反思进行一般描述。这像往常一样又要从一开始就花费很大力气投入到特殊而离奇的事物之中，并通过概念分析去对它进行仔细研究。“正是通过概念的作用现象才能聚拢到一起，由于理智的分辨能力在这些概念中

得以进行的区分，则是最重要的，因为区分一下子完成了两件事情：拯救了现象，呈现出了理念。”因此，关键不是通过建立关于世界的普遍概念去获得安全（比如说，因为几部文学作品具有共性，就把它挑选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将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概念，从而建立起某种关于世界的普遍概念），而是去构想那些在本质上，或作为一种理念之呈现的示范性的东西，不管它是多么独特和碎片化。这样概念就被剥夺了概括的作用，而是起到将基本现象组织为星群的作用，星群“并不会使相似的东西成为同一，而……会在两个极端之间达成一种综合”，在其中，“个体……都成了差异的存在：一种总体性。”<sup>[175]</sup>

本雅明注意到全然不同的各种很多的理念是可以找到的，并依此尖锐地反驳了归纳推理和演绎式的概念联接。他用语言学的和神秘化的柏拉图回忆理论来回答所有这些理念来自哪里的问题。在哲学沉思中，“理念从表现为词语的现实（reality）的核心释放出来，并行使它的赋名权”。<sup>[176]</sup> 哲学家是这部现实经书（scripture）的读者或阐释者。现实是用原初的亚当语言为哲学家书写下来的——正如在《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一文中他暗示性地承认的那样，本雅明本人坚持认为这种原初的语言是“最终的现实，只可在其现象上感知，但又是不可说的和神秘的”。<sup>[177]</sup>

凡是在理念可以从现实的最深层迸发出来的地方，哲学沉思的眼睛就能找到理念的起源。“起源 [Ursprung] 尽管完全是个历史范畴，可是它却与发生 [Entstehung] 根本无关。起源一词并不是用来描述存在成为存在的过程，而是描述从形成到消失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存在。”在文本的主要部分对悲苦剧的分析表明，悲苦剧在哲学史中有对应的位置，后者通过浪漫派（对他们来说，“寓言……已发展成了一种自我沉思的形式”）引导哲学回过头思考巴洛克时期的悲苦剧——作为对衰败时期的反应，回过头思考那种疏离于上帝的生活体验。本雅明提到了这种情形不可避免的内在本质，说它的生命已经“陈腐”了，成了“一个虚空的世界”，就像在丢勒的《忧郁》（*Dürer's Melencolia*）的背景里一样，在这个世界中，“闲置在地板上的忙碌生活的盆盆罐罐，成了沉思

的对象”。<sup>[178]</sup> 这让人想起了卢卡奇提到小说在哲学史中的位置和“第二自然”、“异化”、“物化”等范畴时所使用的描述方式。悲苦剧将历史呈现为上帝受造物的短暂的自然史。寓言阐释的核心，就是要领悟到历史作为“世界的激情”只有“在衰落的境遇中”才显得更有深意。“由于在象征之中，毁灭被理想化了，于是被美化的自然之容在救赎之光的照映下迅即显出原貌；而在寓言中，观察者会与这样的历史碰面，它一脸‘希波克拉底相’（Facies hippocratica）\*，像是一片呆滞原始的景象。”“古典主义因其本质而看不到自由的匮乏、缺陷以及物理的美丽自然界的衰竭。可是就在它夸张其辞的铺张扬厉之下，却恰恰潜藏着巴洛克寓言以史无前例的强调所宣称的东西。”<sup>[179]</sup>

巴洛克不仅对古典主义的调和性，而且对艺术自身的调和性来说，都是一种拨正，这一点表现得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还要明显。正是因为如此，悲苦剧的理念才来自于对17世纪德国巴洛克悲剧的哲学反思。“对无限性的信仰中汲取灵感的浪漫派在批评上强调了对于形式的和理念的完美创造，因此，对寓言的深刻洞见会把事物和作品一下子转变成躁动活跃的写作。”<sup>[180]</sup> 像蒂克（Tieck）的讽刺戏剧或让·保尔（Jean Paul）粗糙的小说这类浪漫派讽刺作品，都悖论性地试图“通过某种瓦解的过程、通过在作品中展示它本身与理念的关系而成为创造性的”，<sup>[181]</sup> 但是它们都被巴洛克悲苦剧宣布为徒劳——悲苦剧的寓言结构从一开始就给出了“有意识地被构造出来的废墟”，这废墟恰恰就是等着哲学真知去认识的。<sup>[182]</sup> 哲学沉思（这也是本雅明对他本人的作品所寄予的希望）“将……在表现主义者们的伪造物面前……复原真相”，<sup>[183]</sup> 将通过对寓言的解救来彻底强化对艺术难题的当下意识，并以此带出对真实世界的体验。

通过他对于青年、犹太人和作为智性代表的“文人”所进行的思考的发展进程，并且通过他对象征性艺术作品的揭露和对寓言性艺术作

---

\* “Facies hippocratica”，西医学语。指双眼深陷，双颊、太阳穴下凹，嘴唇松弛、肤色铅黑的病容。通常有这种相的一般都是长期患严重疾病接近死亡的患者。——中译者注

品的强调这样的思想，本雅明站到了某种唯物史观的起点之上，这种唯物史观与克拉考尔和布洛赫也在这几年中达成一致的那种唯物史观是有联系——本雅明曾与他们两人讨论过这些想法。在他写作论悲苦剧这部书期间，有一些萦怀于心的理论难题——比如，艺术品与历史之间是何种关系，对于历史的哲学沉思与对于艺术品和自然的哲学沉思相比有何特殊性，<sup>[184]</sup> 这些问题使得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本雅明来说成了一本“非常重要的、甚至专为我而写的”书。<sup>[185]</sup> 他对共产党员、导演、演员和教师阿西娅·拉西斯 (Asja Lacis) 的爱，也强化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趣。他是1924年在写作论悲苦剧的书期间与她在卡普里 (Capri) 相识的。他对她的爱，也成为他于1926—1927年冬天前往莫斯科旅行背后的原动力。他出版于1928年的格言录《单向街》也是题献给这位女性的。这本书是一个万花筒式的小篇什合集，记录了一个男人的经历：他打算获得授课资格可失败了，还寓居在父母别墅的一个小间里，他的父亲并没有准备为他所向往的私人学者生活提供资助，他现在是个从事文学批评的自由职业者，是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作家和播音员。

本雅明现在的希望，就是成为德国一流的文学批评家。正是超现实主义小说家们 (从1926年起他就频繁游历巴黎) 使他对现代文学在像他所处的这样一个衰败时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构想充满了信心。但是他在哲学方面的雄心也丝毫没有消减。他的《拱廊街》(*Passagen-Werk*) 计划源于一篇论十九世纪巴黎拱廊街的随笔。这个《拱廊街》占据了此后的整整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打断这项研究去从事更能挣到钱的工作，又不断地返回到这项研究，但他最终也没能使这项工作超越零散的片断阶段。他想“通过哲学上的福丁布拉 (Fortinbras) \* 的绝对权力来占有超现实主义的遗产”，并想看看“它在哲学史的语境中可以‘具体’到什么程度”，“对一个时代来说”它最可能达到的“极限具体性”又是什么。<sup>[186]</sup>

\*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剧中的人物，挪威王子。——中译者注

《拱廊街》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的是同一类问题：力图了解资本主义。但是本雅明在给资本主义下定义时使用的概念——自然、梦、神话——来自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思想模式。<sup>[187]</sup>《拱廊街》也是本雅明与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和柯尼施泰因进行的那些讨论中的关键点——当时霍克海默、格蕾特·卡尔普鲁斯和阿西娅·拉西斯也时常加入讨论。对本雅明来说，这些讨论为“粗疏的拟古、简单的哲学化”时期画上了句号。“这是狂想曲的天真的终结。这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方式已经被突如其来的进展超过了，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对其他不同的思想方式甚至连最微弱的观念也没有。”<sup>[188]</sup>可能是受到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影响，或是受到了布莱希特（他自1928年以来就成为了柯尔施的朋友，本雅明1929年春结识了他）的影响，1930年初本雅明告诉朔勒姆说，为了想继续他自己的研究，他将不得不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某些方面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某些部分。<sup>[189]</sup>得益于“柯尼施泰因那些难忘的讨论”，<sup>[190]</sup>阿多诺很快就熟悉了本雅明那些新的母题与范畴：比如奢华舒适（plushness）、内在、时尚、广告、卖淫、收集者、游手好闲者（flaneurs）、赌徒、厌倦、光怪陆离（phantasmagoria）等等。这些讨论为阿多诺展示了新的思考视野，这些新视野是本雅明那不循惯例的艺术哲学和历史哲学开拓出来的，这种哲学通过社会日常生活的全景去寻求唯物主义的方方面面，并完全专注于对细节的阐释之中。

1920年代末，阿多诺开始首次大胆运用从克拉考尔、卢卡奇、勋伯格、布洛赫和本雅明那里学来的东西。《论十二音阶技法》（*Zur Zwölftontechnik*）、《反动与进步》（*Reaktion und Fortschritt*）是他出色的文章。它们发表在1929年和1930年的维也纳音乐刊物《破晓》上，而他也是该杂志的合作编辑。卢卡奇从历史哲学观点出发的黑格尔化的阶级意识理论、克拉考尔对不真诚的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批判、本雅明在神话（虚构）自然与救赎的冷静之光之间所作的比较，所有这些都与阿多诺结合起来，以论证勋伯格音乐中的革命的正当性。他把这种革命表述为对“借助最先进的意识来净化它自身溃烂肌体腐败物质的历史强

制力所下的一个理性的死刑判决”。<sup>[191]</sup> 音乐素材的历史条件被无调性音乐展现为它的最具典型性的形式。就它本身而言，无调性音乐是转向以母题和变奏为基础的完整通节歌曲式（Durchkonstruktion）<sup>[192]</sup>、转向半音阶（和声）丰富性的历史趋势所产生的结果。在十二音阶音乐中，音乐素材的历史条件获得了意识——或者用阿多诺几年之后在一篇论“辩证作曲家”勋伯格的文章中的话说，在勋伯格那里“艺术家同他的材料之间的辩证法获得了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通过十二音阶技法，勋伯格创造了一种组织材料的新观念，就像在发展的前一阶段通过调性观念对它进行过的系统化编排一样。通过与调性相比较，阿多诺认为十二音阶技法意味着“欧洲音乐理性化过程”和“去神话化（demythologizing）音乐”过程中取得的进步：

事实也许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贝多芬的或甚至是巴赫的那种庄严之作已经彻底被排斥了……音乐素材已经越来越明快和自由，永远从由泛音音列和调性和谐所指导的数的神话限制解放了出来。我们一度可以那么清晰地勾画出的被解放的人类形象，显然可以被压制在今日的社会之内——这一形象挑战着这个社会的神话基础。但它永远不可能被遗忘和毁灭……那在本质上不可被改变的东西也许就被那么放着，让它自己照看好它自己。而在它能被改变的地方，我们就要立即改变它。但是，一种倔强地坚持着自己那忧郁而悲伤的方式、不得不躲避明亮而温暖的意识之光的自然状态，肯定是要受到怀疑的。在真正的人道主义艺术中没有它的位置。<sup>[193]</sup>

91 完全掌握自然的思想，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解放的观念与本雅明在《单向街》最后一则格言中所勾画的有节制地掌握自然的观念之间模棱两可地游移。这种观念在新音乐上的运用，使得阿多诺能够作为先锋派、揭露者、社会实践的代言人或代表去开展作曲实践，有可能去追求一种将它本身表述为马克思主义音乐理论的音乐理论，尽

管它并不试着去对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具体社会学中介进行分析。

1929年夏，保罗·蒂里希作为（已去世的）马克斯·舍勒的继承人，接替了柯奈留斯的哲学教席。长布洛赫和卢卡奇一岁的蒂里希，是一位年轻的新教神学家。与“辩证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和弗里德利希·戈伽尔登（Friedrich Gogarten）相似，他也在1920年代致力于重新反思基督教信仰。蒂里希的独特性在于除了神学领域之外，他的兴趣涉及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1919年，他加入了围绕卡尔·孟尼克（Karl Mennicke）形成的“柏林学圈”，这个“学圈”在1920年至1927年间还出版过《宗教社会主义报》（*Blätter für religiösen Sozialismus*），后来在1930年至1933年间继续出版过《宗教社会主义新报》（*Neue Blätter für religiösen Sozialismus*）。蒂里希将社会主义视为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力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由于要服务于对物质世界的理性控制而受到了束缚，并因而失去了其与永恒事物的联系。他一心想将社会主义运动从资产阶级化的危险中，也就是说从那种把它本身限于改善无产阶级物质条件的限制中解救出来，加强它的超验因素。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才接受了像格奥尔格·卢卡奇、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sup>[101]</sup>这样的人物，才接受了青年运动的影响——他本人就是该运动的成员。

蒂里希的到来对阿多诺来说是个机会，这使他能够运用他朋友那种从神学中获得灵感的唯物主义，不仅将它运用于音乐，而且也运用于哲学，并且能让学术界容易接近它。1931年，他在蒂里希指导下通过了授课资格答辩，在这之前他实际上就是蒂里希的研究助手了，他的授课资格答辩论文是《克尔凯郭尔美学的建构》。这篇论文经深入修改之后，以《克尔凯郭尔：美学建构》<sup>[105]</sup>为题在1933年出版成书，题辞献给“我的朋友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1920年代中期，本雅明以他的论悲苦剧的论文申请授课资格答辩，论文经德国教授弗朗茨·舒尔茨（Franz Schultz）、哲学家柯奈留斯教授和霍克海默审阅，但未能通过。可阿多诺却以他的论文大获成功，他的这篇论文是由神学家、哲学家蒂

里希和当时已是社会哲学家的霍克海默审阅的。这本书受惠于克拉考尔，也同样受惠于本雅明；阿多诺本人谈到这本书时说，在某种意义上它介于卢卡奇和本雅明之间，试图用一个来修正另一个。当他写作此书时，他致信克拉考尔：

92

霍克海默已经读了第四章的全文而且很高兴，只不过发现它异乎寻常地难读，比论巴洛克的那本书还要难读。对此我无能为力，这是论题的性质决定的，我已经解释了克尔凯郭尔存在概念的神话—魔力特性，如果这不能被理解为施瓦本马克思主义(Swabian Marxism)的话，我就没办法了。<sup>[196]</sup>

阿多诺在他的授课资格答辩论文中分析克尔凯郭尔的方法与本雅明分析歌德的《亲和力》的方法相同：即以—种破坏性批判态度努力保存那些可以拯救的东西。他试图在—种唯物主义和神学理论的框架下“完善”他归之为晚期唯心主义形式的克尔凯郭尔哲学。他认为克尔凯郭尔对中产阶级家庭内景意象的无意识使用显示出—种“无对象的内省”(objectless inwardness)，后者呈现为克尔凯郭尔哲学的最显著特征。他将这种无对象的内省解释为克尔凯郭尔哲学中显现精神自我满足的—种特定历史形式克尔凯郭尔。这种精神将—切超验性都拖入内在性之中，因而无法使它本身切断与神话的自然观念的联系。运用本雅明在论《亲和力》与悲苦剧的书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阿多诺希望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找到逃脱神话自然魔力的出发点。他在美学概念中看到了这一出发点，而这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是人类的最低存在层次，即受到感观奴役的存在层次。“美学建构”对阿多诺来说意味着将克尔凯郭尔那里多种多样的基本要素(克尔凯郭尔本人很少在意的—些要素)排列成某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美学自身呈现为—种明显的和解。

“倘若你不得不说你无法忍受这个世界了，那么你就必须开始去寻求—个更好的。”“伦理的”的代表们在这里轻蔑地指责美学

家狂妄自大 (hubris of greatness), 恰恰是在描绘他最好的特性。正是他那里孕育出的唯物主义萌芽在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绝不梦想般地为了忘却当下世界, 而是要通过一个形象的力量向它提出挑战。这种形象, 总体来看的确可能会“按照最抽象的尺度被勾画出来”, 但它的架构将在每一个辩证时刻中得到明确而实质性的充实。克尔凯郭尔的“美学领域”正是这些形象的体现。<sup>[197]</sup>

当他完成了这本书之后, 他写信给克拉考尔说: “我进入神学范畴的程度比我打算的还要深入, 我害怕我会对拯救,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和解是不是强调得有点过分了。”<sup>[198]</sup> 为此书的出版所作的修订, 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改动。作为将神学母题历史唯物主义具象化的尝试, 它首次提示了一个将会成为阿多诺思考中心的观念: 社会已经将盲目自然力的观念内化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即为了逃避自然的强迫, 它只需适当召回 (recall) 它自身的自然就足够了。 93

蒂里希在他的审阅人意见书中赞赏了论文复杂而“理路交错的”品质, 在论文中魏森格隆德努力将克尔凯郭尔从存在哲学和辩证神学中剥离出来, 并通过他对克尔凯郭尔的“美学拯救”通向了他人未来哲学的发展路向——这种哲学的“真理存在于对每个历史时刻最细小的剖面的阐释之中”。<sup>[199]</sup> 霍克海默作为第二审阅人, 同意蒂里希的评价, 他承认, “这篇授课资格答辩论文呈现给我们的哲学关注方向、思考方式和语言形式, 与我本人的那些哲学热望是不同的。如果说魏森格隆德认为他已经使克尔凯郭尔思想中一切事物克尔凯郭尔重新获得了希望与和解, 那么他也因而表达了一种基本的神学信念, 指向与我截然不同的哲学意向, 而且这一点在论文的每一句话中都能看得出来。但是我知道, 这部作品背后潜藏的不仅仅是强烈的哲学求真意志, 还潜藏着在诸多意义重大的方向上推进哲学的力量。”<sup>[200]</sup>

1931年5月8日星期五, 也就是霍克海默接受社会哲学教席, 就任社会研究所主任并发表就职演说 (《社会哲学现状和摆在社会研究所面前的任务》) 之后大概三个月, 阿多诺也作为哲学编外讲师发表了他在

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状（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他说，鉴于曾有人提出了某些异议，他现在要详细阐明一种新的理论，“到现在为止我从事的实际的哲学阐释都依照着”这种理论。<sup>[201]</sup>然后他阐发了本雅明在论悲苦剧那本书的前言中提出的认识论批判的某种变体。鉴于这种认识论批判一直被“整理为一种理论”，<sup>[202]</sup>现在阿多诺的理论则呈现为与唯物主义和科学相关的理论。

仅从现阶段的各个科学学科之中，哲学就能获取大量的材料和使问题具体化的新方法。但是它决不会将自己凌驾于各门科学学科之上，甚而将它们的结果”视为既成事实并保持一种安全的距离去审视它们。毋宁说，哲学问题总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地——隐藏在各门科学学科最专门的问题当中。

94 阿多诺把社会学说成是对哲学来说最重要的一门科学。他着重指出，较之于纯粹“科学的”思考方式，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同他对哲学当代任务的理解甚至更容易产生矛盾。另外，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更为确切的定义将表明，哲学应该通过“一种恰当的想像方式”把握那些特定科学门类之成果，这种想像性

严格限制在科学为它所提供的材料范围之内，但是它又在它的处置方式的一些精细的方面超越了科学——诚然，这些方面必然源于科学。如果我业已提出的哲学阐释观念是正确的，那么它也可以被表达为不断去思考由现实而产生的问题的要求，通过把一种想像形式运用在这些问题上，这种要求得以呈现，其想像对问题的要素进行重组，但又不会超出这些要素的范畴。这种想像的恰当性可以通过问题的消失来衡量。<sup>[203]</sup>

显而易见，这——也就是对细小的、表面上看或多或少无意义的那些细节进行阐释性的重新组织——在阿多诺看来就是唯物主义的。而且他认

为他的理论是辩证的，因为哲学阐释并不是在封闭的思路中进行的，相反，那些拒绝使它们自己接受解释的现实存在，以及源于主体间真理的那些反对意见总在打断这种哲学阐释，并使它处于“一种断续交替的辩证法”之中。阐释总是不得不重新开始。

阿多诺的就职演讲看上去是在霍克海默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但最根本的核心是受到本雅明和克拉考尔启发的神学—唯物主义计划。没人喜欢他的这篇讲演——霍克海默不喜欢，曼海姆不喜欢，韦特海默不喜欢，甚至克拉考尔也从柏林写信给他说，在一篇描述计划的演讲中将自己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家在战术上是笨拙的，因为它丝毫没有进行真正辩证法意义上的质询，或者说它刚刚说到能使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推论进入，或者说“刺入”那些教授们的心灵的时候就打住了，并没有与他们形成对抗和交锋。阿多诺本打算发表这篇讲演并将它题献给本雅明，但最后没有发表，因而他想借此向本雅明表达的敬意也没能公开。

阿多诺一直很认真地对待这个计划。实际上它首先意味着把本雅明的思想引入学术领域。在1932年至1933年之间的冬季学期，本雅明告诉朔勒姆说，阿多诺已经“在主持第二个学期的研讨班了，作为上个学期研讨班的继续，讨论的就是论悲苦剧那本书……但这一点没有在课程表上清楚地反映出来”。<sup>[204]</sup>1932年7月，阿多诺给康德研究会（Kant Society）法兰克福分会作了一场关于“自然史观念”<sup>[205]</sup>的讲座。他把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和本雅明的《德国悲苦剧的起源》当作这一概念的理论资源加以援引。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讲座是对海德格尔1929年1月在法兰克福作的关于“哲学人类学和此在的形而上学”<sup>[206]</sup>那场讲座的答复。它也是对“法兰克福讨论”（阿多诺本人这么称呼它）的一个答复，库尔特·里泽勒尔（Kurt Riezler）在这场讨论中捍卫海德格尔。和阿多诺一样，里泽勒尔也属于所谓的“小聚会”（Kränzchen）成员。这个“小聚会”是法兰克福的一个讨论小组，蒂里希、霍克海默、波洛克、曼海姆、阿道尔夫·洛威和卡尔·孟尼克也都是该小组成员。在他的讲座中，阿多诺捍卫了这样一种立场：为了避免误解，他不说“历

95

史存在论”，而更愿意用“历史”和“自然”的概念来定义它。海德格尔式的历史存在论借助历史性这个范畴将历史贬低为新存在的场所，但自然史概念将会揭示历史的全部，将它呈现为必然地与自然相勾连的在场，呈现为由“囚禁人类原始本质的那些不断变换的历史囚牢”<sup>[207]</sup>所组成的场景。同时，这个讲座还提出了一种在历史与自然之间进行和解的思想，历史通过这种和解以自然史形式出现，将成为本质的新存在的场所。“自然史”，阿多诺在他的讲座中说，“是整体观念（perceptive）的变换”。<sup>[208]</sup>正是这种整体观念的变换形成了一种敏锐感观，既可以在新的中辨别什么是旧的，又可以在旧的中辨别什么是新的。真正是新存在的存在将会通过使精神（Geist）意识到自身乃是自然的一个方面而超越它与自然的联系。在这个激进的自我意识（self-recognition）理论之中，阿多诺其实就是在支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发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但他脱离了这种立场的阶级考虑，而将它作为毫无愧疚之意的思辨来支持。与此同时，阿多诺毫无疑问地抛开了这一事实，即在这几年音乐批评领域的某些创作中，他是阶级斗争学说的追随者，也是哲学工作和艺术工作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这一观点的追随者。

### 赫伯特·马尔库塞

对赫伯特·马尔库塞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两位专论异化、物化和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的伟大哲学家——都在1920年代声名鹊起，他们就是格奥尔格·卢卡奇和马丁·海德格尔。马尔库塞1898年7月19日生于柏林。他的父亲，一位来自博拉美尼亚外省的犹太人，跟随他哥哥来到柏林，努力工作，成为一家纺织厂的股东，最后又同一位建筑师合营，创建了一个名叫“弗里登塔尔和马尔库塞”的建筑公司。他能够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提供上流社会生活的舒适和特权。马尔库塞从1918年初开始作为空军预备役军人服兵役，而且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太积极的党员；他的父亲对这个党是瞧不起的，因为那是工人的政

党。同年 11 月，他开始大学学习生活之后，还当选为柏林雷尼肯多尔夫（Reinickendorf）地区的士兵委员会成员。他还是巴伐利亚临时总理库尔特·恩斯特（Kurt Einst）明确提出的那类社会主义政策的拥护者。

军队中很多军官随后被选入士兵委员会，这激怒了马尔库塞，他因此而离开了这个委员会；他也不满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批评它是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同谋，并因而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一心一意投入到他的研究之中。他开始研究德国现代史，先是在柏林学习，后来在布萊斯高的弗萊堡学习，而且同时辅修哲学和经济学。1922 年他以论文《关于艺术家的德国小说》在弗萊堡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卢卡奇的《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以及黑格尔的《美学》。这篇论文依据维京人文化（Viking culture）和古代文化背景，在这种背景中艺术家和总体性的生活形式融为一体——生命与精神、生活与艺术在那里是一回事。借着这个背景，马尔库塞将关涉艺术家生活的众多德国小说描述为一个时代的表达，艺术与生活的统一瓦解于这个时代，曾经“在形而上学方面向往理念及其实现”的艺术家在这个时代被封闭在“现实生活形式的整体性的琐碎和空虚”之中。论文总结说：

伟大的欧洲文学中有关艺术家生活的小说只在一种文学中才不是作为意识形态冲突出现的：那就是俄罗斯文学。在这种文学中真正存在着生活—形式的统一体：艺术家和人民之间的深层统一。在这种文学中，艺术家也是苦难中的一个兄弟，是他的人民的安慰者、先知和唤醒者。在关于艺术家的德国小说中，艺术家和人民之间的互利并非是一个既定事实，而是某种已经被抛弃了的东西。仅通过下面这些文学史难题就可以瞥见人类历史之一页：德国人为了建立新共同体的斗争。<sup>[209]</sup>

已于 1924 年完婚的马尔库塞，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继续回到柏林生

活。他的父亲为他提供了住宅，并给了他一份出版业和古旧书业的股份。这时马尔库塞还发起了一个左翼文学沙龙，马克思主义学说、格式塔心理学、抽象绘画和资产阶级哲学种种潮流都是这个沙龙讨论的论题。<sup>[210]</sup>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刚出版不久，他就和他的密友们开始研究讨论它，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都一致认为这本书关注的正是（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主导精神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忽视的东西：存在要素、该书所采用的以异化的日常生活形式为其出发点的那种方式，以及它对本真的人的存在问题的澄清。马尔库塞决定返回弗莱堡。他以前就在那里毫无兴味地听过胡塞尔的讲座。他下了决心，要作为哲学家开始学术生涯。马尔库塞偕妻带子于 1928 年动身前往弗莱堡，并被任命为海德格尔的助手。海德格尔那时刚刚成功地接替了胡塞尔的教席。

马尔库塞所朝觐的这位哲学家的事业生涯显然与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以及克拉考尔的大不相同。海德格尔的思考已经深深打上了神学的烙印。但是他的神学中又全然缺乏任何安全、和解和救赎的前景。另外，他幽居于安全的学术界之内，对任何与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东西都十分厌恶。

马丁·海德格尔 1889 年生于巴登州的梅斯基尔希镇 (Messkirch)，是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箍桶能手兼本教区教堂执事的儿子。他先是在康茨坦地区的一所耶稣会书院上中学，后来 1909 年到 1913 年间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开始时研究神学和哲学，后来则主修哲学，辅修数学和自然科学。1913 年，他在天主教哲学家阿尔托·施奈德尔 (Arthur Schneider) 的指导下以论文《心理主义中的判断学说》获得博士学位。<sup>[211]</sup> 这篇论文是对指导他论文的那位信守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新经院主义教义的导师的心理主义 (psychologism)，也是对他的另一位论文导师——新康德主义价值理论家海因利希·李凯尔特 (Heinrich Rickert) ——的批判。

按照海德格尔后来 1950 年代回忆时所说的，“一战”前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些事，包括“几乎达到第一版篇幅两倍的尼采《权力意志》第二版、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译本，对黑格尔和谢林，对里尔克和特拉克尔（Trakl）的诗以及狄尔泰《选集》不断增长的兴趣”。<sup>[212]</sup>

在被证明不适合服兵役之后，他1916年在李凯尔特那里通过了授课资格答辩，提交答辩的论文是《邓斯·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sup>[213]</sup> 在论文中主要探讨了中世纪的思辨术（speculative grammar）概念，并在结论中说，在他看来形而上学乃是哲学的真正任务。1919年他成为编外讲师，并被任命为李凯尔特的接替者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助手。1913年出版的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sup>[211]</sup>一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先验主体性”这一现代概念，它“通过现象学到达了一个更为本原、更为普遍的领域”。<sup>[215]</sup> 胡塞尔用来表示想建立作为纯粹科学的哲学，并以不容辩驳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警句“回到事情本身！”对舍勒说来，而且现在同样对海德格尔说来，成了一种激励，激励他们重新获得对本真的、具有重要性的哲学的信念，激励他们坚信“现象学的观看”乃是主体向形而上学事物的一种敞开。

海德格尔所开的课程和研讨班，很快使他自己获得了一个杰出哲学家的声誉。尽管自他写了授课资格答辩论文之后十多年来几乎再没出版过任何东西，可这并不曾影响他的声誉。对于那些听过他的课的人（霍克海默也是其中之一）来说，他就像是活生生的证明，证明了哲学对生活来说意味着某种东西——某种在个体那里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布洛赫和本雅明也以与此相同的方式影响了阿多诺。“海德格尔思想推进之中那种可感的紧张度和晦涩不明的深度，”胡塞尔的学生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在回忆时写道，“使得其他事物变得苍白无力并因而失去意义，并诱惑着将我们离开胡塞尔那对最后的哲学方法的单纯信仰。”<sup>[216]</sup> 与布洛赫和勋伯格一样，海德格尔以一种表现主义方式，将自己视为是一种更高必然性的最适合的中介（instrument）。他1920年致信给卡尔·洛维特说，他关心的是“生活在今日革命形势之中的我‘必然’会体验到的那些东西，而不考虑是否从其中会产生出一

98

种‘文化’，是否会加速毁灭”。在1921年，他写道：

我所做的都是我必须做的，而且是我认为必要的事，我以我可能的方式来做这事——我并没有为了让它适合某种普遍的“当今”而粉饰我的哲学工作……我工作的基础是我之“所是”和我的……事实本原 (factic origin)。存在因这种事实性而充满激情。<sup>[217]</sup>

1923年，他被派到马堡 (Marburg)，获得了一个私人教席。马堡当时还是新康德主义重镇，虽说这个思想流派已经趋于没落了。他和鲁道夫·布尔特曼成为了朋友，后者是新约研究方面的教授，与卡尔·巴特和弗里德利希·戈伽尔登一样，是“辩证神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布尔特曼捍卫如下立场：将天主圣言 (Word of God) 神学同自由主义新清教神学的“人—神”说对立起来，并认为基督信仰是一种冒险，人类与上帝双方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的，并认为如果一旦能够断言神学本真性的话，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神学之间的分离就未必会持续下去。

1927年春，《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发表在胡塞尔编辑的《现象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这个刊物上，这部著作同时还以书的形式出版。它一下子使海德格尔声名鹊起，巩固了他作为谈论生活中某种基础性事务的哲学家所获得的声誉。这部书不仅仅只是将胡塞尔现象学运用于历史和当下，它所关心的还有这一事实，即人类已经被存在所抛弃，虽然它依赖于存在；这是一部严肃对待存在者与时间、存在者与此在 (Dasein) 的著作。海德格尔从“存在问题的优先地位”出发，并将这一追问存在存在人类那里，也就是说在此在那里的意义问题的出发点看作现实存在 (existent being) “在自体存在方面所呈现出如下的特征”，即“在真正的存在中，存在才是一个与其相关的问题”。由于此在的这种基础性角色，他把对此在存在的结构分析称为“基础存在论”。<sup>[218]</sup> 海德格尔并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即从此在出发——当然，如果这种选择不是任意的——是否意味着存在不仅仅是被此在理解着的，毋宁说它就是

被此在建构着的，也就是说是否意味着存在以此在为基础。无论是《存在与时间》的第二部，还是第一部的第三编“时间与存在”，都没能完成。这说明了海德格尔在尝试着进行调和时感到了困难——他试图使由《存在与时间》已发表部分中的论点典型地勾勒出来的存有主义（这个“存有主义”就是后来一般而言的存在主义，即取消了对人类存在之分析）与关于万物发生之源的存在的观念协调起来。

对海德格尔来说，将此在当作出发点使他有在对学院哲学领域很少涉及的现象进行描述时获得某种具体感，并有可能获得一种方法，使他能够处理好那些看上去可能是派生的，甚至是无意义的标准哲学难题。《存在与时间》的这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本书赢得了声誉。具体的，被“抛入”世界的人类存在取代了康德或胡塞尔所关心的纯粹意识。与纯粹意识类似，这种存在与最高层次的事务相关，而且为这些事务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本真生活或非本真生活的问题。“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重视从它本身的可能性——是它自身或不是它自身——来领会自己本身。”

此在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只有当它就其本质而言可能是本真的存在者时，也就是说，可能是拥有本己的存在者时，它才可能已经失去自身，它才可能还没有获得自身。<sup>[219]</sup>

海德格尔在本书第一篇中进行的描述，大多是对卢卡奇、布洛赫、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等人通过历史哲学加以描画的那个时代进行的形而上学诊断。用胡塞尔使其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来说，这是一种生活世界（Lebenswelt）分析。从胡塞尔这方面讲，他也从海德格尔那里汲取了灵感。海德格尔捍卫着这个生活世界，使其免遭科学世界图景的理论化和绝对化的侵害，但同时也揭露了这个生活世界的非本真性。

闲言与两可，一切都见过了，一切都懂得了，这些东西培养出自以为是，此在的这样随手可得的与占统治地位的展开状态似乎能够向它保证：它的一切存在之可能性是牢靠、真实而充分的。常人的自信与坚决传布着一种日益增长的无需乎本真地现身领会的情绪。常人自以为培育着而且过着完满真实的“生活”；这种自以为是把一种安定带入此在；从这种安定情绪看来，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中”，一切大门都敞开着。沉沦在世对它已起到引诱作用同时也起到安定作用（beruhigend）。

非本真存在的这种安定却不是把人引诱向寂静无为、而是赶到“畅为”（Betireb）无阻中去……多方探求的好奇和焦躁不安的“一切皆知”冒充为一种对于此在的普遍理解。归根到底却仍然没有确定而且没有诘问：究竟要加以理解的是什么？仍然没有理解：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能在，这种能在唯有在最本己的此在中才会必然变成自由。当这种得到安定的、“理解”一切的此在拿自身同一切相比较的时候，此在就趋向一种异化（Entfremdung），在这种异化中，最本己的能在对此在隐而不露。<sup>[220]</sup>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此在通过“畏”而在此种沉沦中得到拯救。而决定着在世存在的畏，尽管只是潜在地作为一个法则，也是人类之生存、他们与存在关系的本质证明之一部分。畏使得熟悉的日常世界呈现为一种“不熟悉”状态，并且使此在直接面对“它为它存在的本真性，为这种本真性作为此在一直所是的可能性而呈现的自由状态”。此在感受着本真性的召唤，它永恒不变的基本特征就是操心。海德格尔在死亡中看到了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没有人能从另一个人那里偷窃其死亡。在这个意义上说死亡乃是它最本己的经验。它指向“生存之根本不可能之可能性”。<sup>[221]</sup>它甚至是终极的可能性。在接近死亡的过程中，此在承当其被限定性。海德格尔从这种向死的接近之结构出发，解释了本真性生存的存在论结构：它的未来性特征。当下源于已经在那儿的未来。也就是说，我乃是我从我本己的可能性出发而已经创造的。此在乃

一有限的事件，但又绵延于未来、过去和当下之中，而未来、过去和当下全部被此在本身时间化。这种时间性的有限性——这是海德格尔向“历史性”的过渡——使此在成为历史的。

在本真的和非本真的历史性生存间的区分中，死亡也被海德格尔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只有自由地为死存在，才干干脆脆地把目标给予此在并把生存推入其有终性之中。溺乐、拈轻避重这些自行提供出来的近便的可能性形形色色、无终无穷，而生存的被掌握的有终性就从这无穷的形形色色中扯回自身而把此在带入其命运的单纯境界之中。我们用命运来标识此在在本真决心中的源始演历；此在在这种源始演历中自由地面对死、而且借一种继承下来的、然而又是选择出来的可能性把自己承传给自己。<sup>[222]</sup>

海德格尔在本真的和非本真的历史性生存之间做出的区分是很难理解的。这两种生存样式都是在世存在之“被抛性”和过去所决定的。但是在一种情况下，过去被说成是本真生存的一种可能性，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却仅仅是一种残迹。在一种情况下，它被说成是一件决然接受的事，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恰恰相反，它却又被认为仅仅事关保存。作品给读者的信息是不清楚的。如果读者想要成为那些本真的生存者的一员，那么当下对他们来说就必将呈现为非本真的、异化了的、受“常人”支配的世界；为了有可能建立起一种此在的构造必须废黜当下这个受“常人”支配的世界，而这种此在构造在过去之中从未被洞察到的，尽管它早就清清楚楚地存在着。但是，由于“常人”被视为一种“生存质 (existenziale)”，<sup>[223]</sup>那么，比现存的此在构造更为本真的此在构造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如果最本真的可能性乃是一种承当而没有关于被抛入最本己之“此”(Da)的任何幻想，那么对于“常人”(属于被废黜的一部分)的废黜又怎么能够带来本真性的增长呢？剩下的只是对现存条件的喑哑无声的抗议，这种抗议不曾描画出那些条件的原因，

101

这种抗议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一种对于英雄宿命论的情感领悟。

1928年，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继任者返回弗莱堡。翌年7月，他在那里作了他的就职报告——“形而上学是什么？”，这个报告在1929年出版。他将这篇文章视为以思考无的途径来思考存在的一种尝试。<sup>[221]</sup>海德格尔早期的存在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达到了顶峰。他将哲学和逻辑的以及理解的科学相比较，把哲学视为“惟有通过本己的生存的一种独特跳跃，即本己的生存跃入此在整体的基本可能性之中的独特跳跃，才运转起来”的某种东西。<sup>[225]</sup>就像对卢卡奇来说无产阶级成了真正的历史哲学家，对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哲学家就是生存着的人类。“只要人生存，人就以某种方式进行哲思”。通过理解去把握所存在的整体是不可能的。情况常常是，所存在的整体往往卷入情绪之中——比如说在“无聊”中就是这样。“这种深刻的无聊犹如寂然无声的雾弥漫在此在的深渊中，把万物、人以及与之共在的某人本身共同移入一种奇特的冷漠状态中。这种无聊启示出存在者整体。”他特别强调了作为一种特殊情绪的畏，这在《存在与时间》中是个普遍的主题。“畏使我们漂浮，因为畏使存在者整体脱落了。”<sup>[226]</sup>在畏中，此在体验到它自身被带离而进入无，在那里生存向它展现为完全别样的，它进入了一种绝对陌生之中，这种陌生是它迄那时为止一直在遮蔽着的。作为“无的场地的守护者”，人从根本上超越、超逾了作为整体的存在者，人天生就是形而上学的。<sup>[227]</sup>在科学、逻辑和理解的领域当中，否定恰恰就是一种弱化了虚无化形式。“起主导作用的虚无化 (nihilating) 行为”表现在“固执的对抗和激烈的指责”之中，表现在“难堪的失败与无情的禁止”之中，表现在“痛苦的匮乏”之中。被畏的气息以一种持续的方式所震颤的人们是一些“勇者”，他们“为那个支持他们的东西耗尽心血以求因此保存此在的最终伟大”。<sup>[228]</sup>

在他的就职报告中，海德格尔找到了一个探讨无这一问题的进路，而关于无的问题看上去既有些像狡辩，又有些像空想，完全建立在文字游戏的基础上。维也纳新实证主义哲学圈子里最著名的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 就曾用这样的文字游戏例子来证明形

而上学问题是无意义的。这个就职报告表明，人类或多或少是脆弱而易受攻击的。摆脱了可能被神圣化为理性的一切东西之后，他们必须准备着把他们自身献祭给另外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最为人所知的地方就是它需要朴素和匮乏——可是这一点是怎么被人所知却未曾得到解释。

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后的那几年中，这种哲学为海德格尔那些无数的工作讲演和聚会讲演提供了材料。这些讲演的高潮就是他和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之间的辩论。恩斯特·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而这场辩论就发生在1929年3月在达沃斯举办的大学演讲上。在这场辩论中海德格尔主张，哲学的任务就是“撇开人类的一切自由不谈”，“通过一些人误用的观点”为人类展现“它的此在的无”，“这些误用者仅仅用学术著作将人类抛回到命运之严苛性当中”。<sup>[229]</sup>

102

当马尔库塞1928年来到弗莱堡加入海德格尔圈子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计划，并且对海德格尔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想法。他的计划就是“具体哲学”。他对海德格尔的想法就是，海氏作品代表了这样一个关键点，在这个点上“资产阶级哲学可以从内部被超越，并且在一种新的‘具体哲学’的方向上运动”。<sup>[230]</sup>在1933年流亡瑞士期间，他写作了一篇研究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 的作品——《失败哲学》——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是在德国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人之生存的历史性本质规定应该使哲学重新获得它久已遗失了的具体化的敏锐性，重新把握到人类事务的最终严肃性，在这种严肃性中一切事情都是真正生死攸关的，尤其是当下即刻必需之事就是最重要的事的时候。”<sup>[231]</sup>马尔库塞从他一开始发表哲学著作以来，就批评海德格尔，因为虽然海德格尔的确关怀“现时代及其形势”，但他却并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具体的本真生存是什么？它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可能的本真生存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并没有进入“使具体此在生存的具体历史条件”；他没有促进决断的行动，而是落入了孤独的此在。<sup>[232]</sup>

在马尔库塞那里，“行动”以及对“现时代及其形势”进行思考都是一些含混不清的观念，他本人在政治上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积极的。他将理论视为最高的实践形式，在1930年代他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是撰写“黑格爾的存在論和一種歷史理論的基礎”，<sup>[233]</sup> 他想用這篇論文在海德格爾那里通過授課資格答辯。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可以想見，除了上面提到的缺乏具體性之外，馬爾庫塞原則上並沒有與海德格爾有什麼理論沖突，1933年海德格爾公開他的納粹信念，這使馬爾庫塞完全惊呆了。如果說馬爾庫塞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忠於海德格爾，這也僅僅是因為他發現了其他的哲學家，他們“卓絕的具體化”要勝過海德格爾的具體化：他們就是狄爾泰和黑格爾。但是當馬爾庫塞發現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後所有這些哲學家就都處在馬克思的陰影之中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932年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一部分首次發表。馬爾庫塞1932年在希法亭編輯的刊物《社會》(Die Gesellschaft)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歷史唯物主義基礎的新來源”。在這篇文章中，馬爾庫塞就這份巴黎手稿給出了一種開拓性的闡釋。他在這些手稿中看出，“為經濟學打下了哲學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理論革命”，<sup>[231]</sup> 也就是說他看到了馬克思的存在論——如果我們將這篇文章和他論黑格爾的那篇文章比較一下就會這麼稱呼它了。按照馬爾庫塞的說法，馬克思的存在論與黑格爾的存在論不同，  
103 因為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存在論是“以生命及其歷史性的生存論概念為指歸的”，<sup>[235]</sup> 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存在論總是歷史性人類之存在論。同時，馬爾庫塞還試圖解決使歷史必然性和特殊生存形式的更高價值相互聯繫起來的問題：即，“為歷史必然性的自由存在”為什麼會成為向“存在之真理”前進的一種手段。

在馬克思那里，本質和真實性、本質的歷史之情境和實際的歷史之情境不再是各自無關的分离的領域或層面：人的歷史性就包含在他的本質決斷之中……但是對人本質的歷史性之揭示並不意味着人的本質之歷史和他的實際的歷史是相等同的。我們已經听

说过，人从来都不是直觉地“进行生命活动的类”，毋宁说他使自己与这样的类相区别并与之“相关”。在这里本质和生存是截然不同的：他的生存是实现他的本质的“手段”，或者，在异化的情况下，他的本质是实现他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如果本质和生存以这种方式继续分离，那么与此同时在能够达到的程度上使这两个方面重新统一，就是人类实践的真正无条件的目标，既而，如果说真实性在完全颠倒人类本质方面一直在进步着，那么彻底废黜这种真实性就成了最高目标。对人的本质的毅然决然的预见必将成为通向彻底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境中不仅仅只存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问题，而且存在着人类本质大灾难的问题——这一发现宣告了一切仅仅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进行的改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并无条件地要求通过总体革命以毁灭性的方式废黜现有的实际条件。<sup>[236]</sup>

关于人类本质的历史性及其完全颠倒的谈论，遭到了一种诉求的抗拒，后者期待确立关于人类本质的坚定观念，这种观念牢固地形成于对一切实际颠倒的洞察，而且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生存存在论者的马尔库塞当成了不可动摇的标准。存在论人类学，即关于一个未定的有限的人而被抛入世界之中的理论，被马尔库塞当作这样一种观念加以消解：人类只能间接地实现与他们本己的本质之相符。马尔库塞反对他自己最早希望的那种哲学，那种哲学只是一种人类的“‘自我沉思’、只是对世界历史当下形势的一种沉思，这种当下形势总是被回想起来并被向前推进的”——“被理解为关于存在者可能性和必然性、关于浮现于此形势之中的行动和变化之沉思的沉思”。<sup>[237]</sup> 与此不同，他获得了这样

104

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以扫荡一切的气势宣称现时代正是由非人的资本主义生存形式构成的，只有通过总体革命才能使它符合人的本质——看得出来，这种哲学得益于青年马克思。

正如马尔库塞在后来与哈贝马斯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他当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新的马克思，他“是真正具体的，并且超越了那些政治党

派持有的那种僵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和理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再也不认为他必须依靠海德格尔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哲学基础，相反他认为马克思本人提供出了最好的哲学基础。正是在这之后，他开始发现他的授课资格答辩计划是不现实的，因此他就不带任何目的地发表了他这部论黑格尔的书。按照马尔库塞本人的说法，这事情大概发生在1932年，因为那时一个犹太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可能参加授课资格答辩了。<sup>[238]</sup>然而，从胡塞尔写给里泽勒尔的信件——后来西德战争赔偿程序依据这封信受理了马尔库塞本应该按照正常程序参加授课资格答辩而成为教授的赔偿申请。——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授课资格答辩实际上，或者说特别受到了海德格尔的阻挠。胡塞尔为马尔库塞在里泽勒尔跟前说项，而里泽勒尔又请霍克海默帮马尔库塞的忙。可是最初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直到1933年，马尔库塞与列奥·洛文塔尔会谈之后，经由后者在霍克海默跟前大力举荐，才加入了流亡瑞士日内瓦的社会研究所。

这种传记式的综合描述表明，霍克海默圈子里的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是积极的；也没有一个人出身于工人运动或马克思主义；他们所有人都来自犹太家庭，虽说他们的家庭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非常多样化——有的是完全同化了的家庭，有的又是正统犹太教家庭。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对反犹太主义的认识与他们的学术活动相较显得不那么重要。只有在霍克海默那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命运的恐惧才是思考的根本性的刺激因素。对于其他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仅仅是因为它看上去允诺了对似乎无法解决的那些理论难题的解决办法，或者说它看上去是对异化了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惟一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既在理论上成熟老练，又没有失去和现实的联系。就霍克海默的交叉学科计划而言，他们形成的这一群体组合注定是一个没多大希望的组合。他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熟悉哲学，可除了弗洛姆和波洛克之外他们都不是某个科学学科里的专业人士，科学学科间的合作就是打算推进社会研究所里进行的社会理论研究。

在他们能够扮演独立思想家的重要社会角色的时期，他们的思想都返回了他们青年时期切身经历的革命性转变。“尽管名字被改了，但为什么还仍旧是‘破晓’(Anbruch)呢？”1928年的音乐刊物《破晓音乐报》(从1928年开始阿多诺就成为了它实际上的主任编辑)在为新标题下出版的第一期所撰写的编辑导言中这么问道。

我们从来都是忠实于名称的，因为我们忠实于它所代表的东西。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么多页中为之辩护的新音乐，就其最出色的代表作品而言，属于转变了的、彻底转变了的意识状态；我们相信为新音乐而辩同时也意味着为这种新的、转变了的意识而辩。我们并没有在战后被平复稳定下来的客观精神中看到这种意识；我们充满疑虑地发问，我们在其中谈论破晓与黄昏的这个备受责骂的新时期，是与转变了的意识有更大关系呢，还是与当下形势有更大关系——在当下形势之中人们非但不创造意识的转变，甚至不再迫切需要意识的转变了……我们希望“破晓”[Anbruch]能为音乐形势——也不仅仅是音乐形势——的向前推进带入一种新开端的推动力，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我们不想沦为最可怕的反动倒退——即在良心上自鸣得意的赶时髦——的牺牲品，那么推动力就是绝对必需的。<sup>[239]</sup>

当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30年代改弦更张的时候，这个推动力的确是极其强烈的。在霍克海默的圈子渐渐接近一个新的开端之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也愈加腐朽衰败，法西斯主义狂飙突进，而社会主义陷于停滞。

## 政治—学术政治—学术工作

只要你留心一下人们的行动方式，那么你将会发现那些掌控巨量财富和巨大权力的人，无一不是通过欺诈就是通过暴力而获得它们的；接下来，他们通过给欺骗或暴力侵占的东西加上了一个欺骗性的名字——收益回报，从而掩盖了获得行为的丑恶，并使得这些获得变得体面而得体。而那些不是因为不精明就是因为太愚蠢而规避这些行为方式的人，则总是在奴役和贫困中困厄而死。因为忠信的仆人总是仆人而好人总是穷人。<sup>[240]</sup>

106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借一个充满激情、经验丰富的革命者的口说出了这些话。霍克海默在《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一开始就引用了这段话。<sup>[211]</sup> 这话与霍克海默一生所坚持的观点是相符的：“对那些取得了权力的人来说，有更多的人会突然变成追在他身后与他为善、向他表示支持的一群。而对绝对的无权者——比如说动物吧——来说，同样追在它身后的只是牲口贩子和屠夫。”这是《破晓与黄昏》中“性格相对性”一章的结论。<sup>[212]</sup> 那些想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人需要权力。可那些想帮助他人的人更需要权力。那些获得了权力，或者说掌握着权力的人则必须不带任何幻想地着眼于现实，必须能够跟上权力游戏的进程。阿多诺在他 70 岁生日给霍克海默的一封信“公开信”中说：

你不仅知道生活是多么艰难，而且知道它有多么复杂。你是一个能够恰切地洞察事物背后驱动力的人，一个想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安排这些事物的人，也是坚决果断并毫不低头坚持自己立场的那种人。批判性地看待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原理，却又能撇开这一点，尽力让自己超越于藉此获得的知识而获得自我保存——你身上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这一悖论。

霍克海默想得到，并已经得到的是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既要以探究关于社会的学问为目标，又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得舒适的生活方式。他与波洛克之间的那种伙伴关系的典型特征，在以下两个方面都有体现：一方面使波洛克的服从角色——有点受虐色情狂的意味——被牢固地确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强调实现更美好的共同生活乃是这一伙伴关系的明确目标。“圈内总是优先于圈外”，<sup>[243]</sup> 1935年霍克海默在《对基本原则进行重新阐释的一些材料》中写道。他总是不时写一些东西来重新阐释他与波洛克之间的协作原则，这篇东西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圈内”指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的目标就是探求知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欢乐、勇敢、高傲（gaiété、courage、fierté）。”研究所是这对伙伴的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霍克海默在他的《一些材料》中，在“共同的生活”标题下写了这些话：

共同的生活应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欢乐与共、忧愁与共当中，而不仅止体现在对一些大得多的难题的共同思考上。比如，对研究所、对其工作及其合作者所抱的态度。这个研究所，不是“公司”，不是“研究所”，而是一个有着共同态度和目标的集体。大家有必要共同留意，让研究所核心成员尽可能地保持同调，在选择较密切的合作者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然而，不管怎么说，人们恐怕还是得警惕“高估了”研究所。虽说研究所尽可能按照“圈内”的价值体系而被建立起来，但也仅仅是圈内人所使用的工具。 107

“圈内”集体投身于与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但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那个世界的侵蚀。反资产阶级的表现主义的哀歌成为了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的发源地，这一点在他1930年代那些自传文本和自我批评文本里面都能得到证明。

缺乏自豪感，对自己或别人缺乏乐趣，缺乏自信，沮丧，犯罪感

(尽管已出于某些特定的原因做出了某种特定生活的决断)——所有这一切在资产阶级的本能结构里都有它们的根源,这个结构是由我们的教养形成的(总是被阻止去做有趣的事情)。有意识的高傲使我们的伙伴关系的权利和价值与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相对立,也只有这种意识才能帮助我们克服这种本能结构,正是这种本能结构不断地使我们怀疑“欢乐”和“勇敢”的座右铭。

在《一些材料》里面,霍克海默理解的世界就是一种权力斗争,并由此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只是部分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种对世界的理解一方面是由犹太人的集体经验唤起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与他自己的和他父亲的事业相关的那些条件进行的清醒冷静的估量而形成的。

如果你一直都关注如下事实,那么看待社会的正确态度就会形成了:在今天的社会里,人类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被扭曲了,最终没有什么贯穿在友谊、支持、善意这整个范围内的东西能被当真了。惟一能被当真的事情就是阶级内部的竞争斗争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所有友好的表示都不是给哪个人的,而是给他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一——当同一个人由于斗争条件(股票交易、对犹太人的迫害)中或主要或次要的变化而失了势,这一事实就会极其残酷地暴露出来。这里的问题不是得出抽象的结论。相反,你必须经常意识到,当包围着你的那些善意好心的人发现你已经没有权力了,你本人就得受他们摆布。结论:不要和监禁者们保持一致步调;永远和受害者团结起来。(注意:在这个社会中,除了它的科层官僚,也还存在着人类,尤其在妇女中。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比一般想像的还要稀有!)

有一种关系仅次于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马克思·霍克海默和他的妻子麦顿之间的爱的关系和兴趣上的一致。这是

一种令人愉快的、自然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也的确为霍克海默增添了过度的担心，使他一心想要获得某种契约上的担保，为他们的婚后生活争取到有利的物质基础。由于波洛克是费利克斯·韦尔及其继承人的执行代理人，所以霍克海默通过波洛克在1930年10月聘任协议的条款之外又获得了更多的附加条件（依照这些条款，虽然研究所主任职位是作为名誉席位设立的，但是凡是与他的这种学术指导身份相关的一切对外活动、调研旅行以及其他义务皆由研究所社会研究会承担费用，且没有任何限制，也不需任何收据）。例如，1932年1月，添加了如下的一项附加条款：

如果您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失去了作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的薪俸，我们将负责连本带息支付您的全部收入，并将按照您将应得的普鲁士大学教授最高生活费的标准支付你的养老金。

1932年2月又添加了如下条款：

为了保证您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持续稳固的物质基础，我将代表我和我的继承人保证向您提供终生月薪，金额为 RM 1500（一千五百帝国马克），或 Frs SS 1875（一千八百七十五瑞士法郎），或 Hfl. 900（九百荷兰盾），或 Frs Fcs 9000（九千法国法郎）、或 \$ 375（三百七十五美元）。货币的选择和支付地点由您而定。您从普鲁士国家获得的、或以您作为社会研究所主任的身份获得的收入将从这一总数中扣除。

霍克海默本人就是他在《破晓与黄昏》一则格言中语带心酸地描绘的那种“奇怪的心理学”的典型一例。但研究所的确找到了一个在艰难时刻既能创造外部条件也能创造内部条件从而使得学术研究顺利展开的年轻学院管理者。霍克海默经常抱怨波洛克，说他在研究所的学术事业上并没有表露出足够的兴趣，反而只是表露出对独裁研究所事务安

排的兴趣。霍克海默对两个方面都感兴趣。

109 在政治领域和在学术政治方面对研究所的捍卫，是同时连在一起进行的。1930年到1932年这几年间，他们不再对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以及民主党之间的议会合作体现的阶级妥协心存幻想了。共产党员在人数上增长了，尽管这种势头是不稳定的，是建立在知识分子和失业者的支持基础之上的；同时，纳粹势力发展迅猛。纳粹在意大利也隐约有同样的发展：那里发生了纳粹“革命”，这一“革命”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也没有招致中产阶级政党的任何反对，保守主义政党和国家机关或多或少也对它持一种善意的容忍态度。早在1928年，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保障同盟的领导人尤利乌斯·多伊彻（Julius Deutsch）就发表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调查，宪法学家、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去意大利做了六个月调查，为他下一年出版的《欧洲和法西斯主义》一书收集资料。这本《欧洲与法西斯主义》是最早在广泛的欧洲范围内进行考察这种“复兴运动”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详尽分析之一。<sup>[211]</sup>直到那时，法西斯主义也只在意大利掌握着权力。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摧毁资产阶级文化为代价排除了无产者的要求，保护了“自由”经济。但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存在的，只是受到了许多政府的控制，尽管这些政府中集权政府要多于民主政府。

在1930年9月的大选之后，纳粹党以107个席位成为了国民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在投票的前十天，仅在普鲁士就有24人被杀，285人被打伤，并发生了几十起炸弹袭击事件。这些都促使研究所的管理层——霍克海默、波洛克、费利克斯·韦尔和列奥·洛文塔尔——决定开始着手筹划应对方案，以便在研究所万一必须撤离的情况下有所准备。在霍克海默的建议之下，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在日内瓦开设研究所的分部。研究所官方声明，这纯粹是为了方便研究工作，使用设在那里的国际劳工局的档案材料。早在1930年12月，霍克海默就致信黑森—拿骚省高级部长、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州代表，要求在本学期或者下学期准许他离职“三或四次，每次四到五天”。

我自今年8月1日以来担任研究所主任，研究所现准备对工人阶级上层的社会文化立场做一系列广泛的研究。为了这一目的，研究所必须和日内瓦国际劳工局建立充分彻底的合作关系，因为它的学术研究人员和在那里搜集起来的资料有助于我们自己的学术计划的顺利完成。有些特殊材料需要经过我们社会学研究人员在劳工局严格监督之下做出专业分析。因此社会学研究所决定在日内瓦设立长期的研究工作站。因此，我，作为研究所主任，必须和劳工局建立必要的联系并要经常获悉我们研究所人员研究的进展情况。<sup>[215]</sup>

1931年研究所主任在日内瓦获得了一套公寓，研究所的指导者们也将研究所的基金从德国提出，转移到了荷兰。“在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里，我们只有一张作为研究所每月开销的虚假凭证的信用证。”<sup>[216]</sup>研究所图书馆的所有权最早被转让给了苏黎世社会学研究会，它也是研究所的一个分支机构，继而在1932年末或1933年初又被转让给了伦敦经济学院。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研究所开始重新确定研究工作的方向。新方向的确定发生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全盛期。在1930年代初，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们包括：哲学家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经济学家阿道尔夫·洛威、教育家卡尔·孟尼克（他们三个人都是宗教社会主义者）、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法律社会学家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宪法理论家和社会学家赫尔曼·黑勒（从1932年起）、金融经济学家威廉·戈尔洛夫（Wilhelm Gerloff）、犹太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文学史家马克斯·科默雷尔（Max Kommerell）、历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这后两人和格奥尔格圈子渊源甚深<sup>[217]</sup>]、古典语言学家瓦尔特·弗里德利希·奥托（Walter Friedrich Otto）和卡尔·赖因哈尔特（Karl Reinhardt）、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尔，以及社会心理学家亨德利克·德·曼（Hendrik de Man）。这一时期的一名学生，卡尔·考恩（Karl Korn）在他的回忆录

里回忆了法兰克福那些年的学术和思想氛围：

有了这些名字和人物，我们想像我们能与海德堡或其他大学相匹敌了，它们都有着同样的声望，我们甚至不仅在声望上超过了它们，而且比它们有更让人振奋的学术和政治环境。

那时法兰克福大学有两个系——日尔曼研究系和社会学系已经成为了思想讨论和政治讨论的中心……一方面是哲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另一方面是日耳曼和古典研究系的哲学家们，他们相互之间都认识，聚在一起，一同展开讨论。这两派都有一点排外。如果你作为学生想要加入所有这些讨论，那么你就不得不“熟悉其中的情况”，这样才能知道聚会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开始。但是关键点在于，实际上最开始相互都是朋友的格奥尔格圈子和在社会学家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主要的中心，这个中心牢牢地固守着学术生活的老传统，并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这起到了很有益的作用，限制了那些常常是趋炎附势的精明的局外人，使他们不敢在学术上不严肃。当时各种各样的左翼思潮也都汇聚在哲学系，这些思潮对那些专攻人文学科的人们来说，尤其是对文学方面的教授和大学生来说有着某种吸引力——不管怎么说这种吸引力都是有益的。可要是认为可以把这些思潮统统简单地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那就错了……那整个是一个万花筒……

111

要是有人想在1930年前后哲学系发展起来的知识左派那里找出一种共同点的话，那么他肯定会这么说：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第一次在这里成为了一个系统的论题，也就是说，在最广泛意义上所说的观念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社会基础都将会在这里得到考察。<sup>[218]</sup>

知识左派是由以卡尔·曼海姆为首的社会学系、以霍克海默为首的社会研究所，以及在保罗·蒂里希周围形成的团体组成的。曾一度到过法兰克福担任曼海姆助手的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后

来接受法兰克福市颁发的阿多诺奖时发表的演说中强调说，实际上社会研究所和社会学系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尽管社会学家们都在研究所大楼的底层办公。但是，曼海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确都属于一个“圈子”，他们都随时准备和蒂里希周围形成的团体进行合作。只要看一下这一时期的课程表，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知识左派相互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团结的组织，而且就霍克海默的学科间社会学学说理论计划而言，支持他的也不乏其人。霍克海默和蒂里希一起开设一些课程：1930年夏季学期，开设了“哲学文本阅读”<sup>[219]</sup>的研讨班；1930年至1931年冬季学期开设了关于洛克的研讨班；1931年夏开设了关于哲学著作家的研讨班。而且蒂里希和魏森格隆德也联合授课：1931年至1932年冬季学期开设了探讨黑格尔的哲学史选篇的研讨班；1932年夏开设了“莱辛：《人类教育》”的研讨班；1932年至1933年冬季学期开设了“西美尔：哲学主要问题”的研讨班。蒂里希、里泽勒尔、戈尔贝和韦特海默尔联合在一起在1930年夏还开设了一个研讨班课程，并于1931年夏天举行了一个哲学讨论会。从1931年至1932年的冬天直到研究所1933年疏散，曼海姆、洛威、贝格斯特莱泽尔（Bergstraesser）和诺阿克（Noack）还一起组成了一个社会史和观念史研究小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计划的第一个联合课程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宪法理论”，预告是1933年夏季学期开始，可实际上一直没有开起来。

科隆大学社会学系在列奥波特·冯·维泽的领导下，社会学被搞成了一种枯燥无味的关系学说，其开展的一些经验研究也被限制在偶尔出外进行实地考察这一方面。曾经的德国社会学中心海德堡大学，自从曼海姆离开去了法兰克福之后，也失去了它最成功的社会学家。这样一来，在1930年代早期，法兰克福已经成了所有关注社会理论的思想的汇集之地——这一点在当时的德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霍克海默在学术政治上的成就则在于，他让社会研究所的工作有了明晰的特性，同时使得研究所的工作免受一些人的防御性攻击的干扰，这些人认为他们的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受到了研究

所重新定位的威胁。当着法兰克福大学公众的面，霍克海默很恰当地对他的计划的现实性和他提出的“强大的经验研究工具”进行了宣传。同时，他也以这种方式使自己与德国社会学中存在的人文主义和形而上学趋势区别开来。考虑到专业化的社会学及其捍卫者，霍克海默强调说他决不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专业课题，他提出的“仅仅”是把社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的计划。对那些试图把社会学建立一个单独学科的人来说，霍克海默的计划肯定显得是妄自尊大的，而且看上去就是把社会学当作一门无所不包的科学的观念的回归。这种规划显然并非将自己构想为一种“社会学”，但是它将专业化的社会学看作是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们其实不必认为这样的规划可能会损害他们做出的努力。列奥波特·冯·维泽此时担任作为德国第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隆社会学系的主任，还是这个部门的学术刊物的编辑。这个刊物的内容全部是专注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从1923年以来开始出版德国社会学学会通讯。作为这一学会的主席，他在当时德国社会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霍克海默将列奥·洛文塔尔派到维泽那里，向他说明《社会研究学刊》绝对无意于同《科隆社会学季刊》(Kölnner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Soziologie) 竞争。因此，霍克海默完全能够使研究所不卷入社会学领域内的争论，并能使研究所按照它本来那个样子存在下去。

尽管霍克海默并不像保罗·蒂里希那样为社会主义辩护，也不像胡戈·辛茨海默或赫尔曼·黑勒那样属于公开的民主党人并公开反对纳粹主义，但是让研究所不卷入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也是不可能的。自从1930年纳粹在选举中获胜以后，政治冲突，甚至是在中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当政的法兰克福市（纳粹称之为“法兰克福约旦河边的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政治冲突，也上升成为肢体冲突。9月选举之后的一天，一群穿着制服的救世军出现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个大门前，唱着“豪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这首歌是全德国纳粹在游行时都要唱的。在研究所的一个奖学金获得者约瑟夫·迪奈尔 (Joseph Dünner) 看来，这种情况为红色大学生团 (Rote Studentengruppe) 的成

员、犹太教和天主教学生俱乐部的成员、劳工研究会和工会的成员组织起一个自我保护的团体提供了绝好的理由。“直到 1933 年最初的那几周”，迪奈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道，“纳粹在法兰克福大学才知道，如果他们想占据主要的大门，或者要在校园里和左翼学生或者犹太学生挑起争端，他们肯定会头破血流的——当时这样的大学在德国只有很少的几所。”“纳粹——顺便说一句，<sup>[250]</sup>他们都是些勇敢的家伙——近期以来常常用暴力的方式拜访我们”，“格奥尔格主义者”马克斯·科默雷尔 1932 年夏天在某个主要大学的主建筑里受到纳粹攻击之后这么承认。“也许这一事实触怒了他们：歌德大学，至少就其哲学和社会学领域而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微生物的温床……遗憾的是，纳粹可怜的思想装备还是够用的！”<sup>[251]</sup>甚至在法兰克福大学，左翼与右翼之间的自由争论在这些年中也终止了。卡尔·考恩回忆说，社会学甚至被说成是“犹太科学”。<sup>[252]</sup>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所展开了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研究。这一研究计划由弗洛姆起草，霍克海默宣告它是研究所的长期经验研究规划的第一步。当时的环境在法兰克福甚至要更糟，但正是在这一环境之下，研究所于 1932 年夏自霍克海默成为主任以来第一次发行了它的出版物：《社会研究学刊》。<sup>[253]</sup>

工人阶级研究的最初目标是要揭示手工劳动工人和非手工劳动工人的体质结构是什么样的。前期的工人阶级研究引发了他们深入研究这一论题的兴趣。在这个领域开展的研究背后隐藏的事实是，在被雇用者中白领工人同比增长迅速，而蓝领工人 1925 年所占比例就已经低于 50%，并且比例在继续下降，甚至在像手工劳动工人仍是主要人群的重工业和矿业领域，情况也是如此。这一研究领域中最重要作品包括：艾弥尔·勒德雷尔的文章“危机之前资本主义中无产阶级和阶级之间社会阶层的变化”，<sup>[254]</sup> 1929 年发表在《新评论》(Neue Rundschau) 上；还有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研究专著《白领工人：一份来自德国的最新报告》，以连载形式于 1929 年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后于 1930 年出版成书。<sup>[255]</sup> 勒德雷尔在两个基本假设之间犹豫不决。第一个假设：

所有的自我决定权残余的消失，以及工人对于争取在更大范围控制那些更易理解的生产过程的体验，终将在某天会使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联合为一体，他们都尝试着从根本上重构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又注定使得他们都依赖于它。勒德雷尔的第二个假设：与蓝领工人相比，在“无力自主经营”的那些个人当中，白领工人和公务员所占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就此而言，社会存在这一个日益分化的趋势：统治者数量越来越少，而依附于他们的人群数量将越来越大。与此相应，这一趋势将支持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经过强烈捍卫的身份差异将在所有尚未发展完全的形式中被固定下来。

克拉考尔那篇精到的报告出色地说明了他的唯物主义学说观念完全是通过经验材料体现出来的。他的报告对第一种假设提出了置疑性的争论。他的全部叙述都在揭示，为了过上白领工人满意的生活要付出的超常代价和要维持的表面上舆论认同——所谓白领工人的生活就是由沉闷老套的工作和沉闷老套的资产阶级生活点缀构成的。

就在各个工厂进行合理化调整的同时，这些场馆设施 [也就是“祖国宫”(Haus Vaterland)，柏林的“莱西影院”(Resi-Kino)，也叫“京都影院”以及“默凯福地”(Moka-Efti) 咖啡屋等等] 也把提供给非手工劳动工人的娱乐合理化了。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以批量方式为大众提供这种娱乐时，一个职员悲伤地告诉我说：“因为人们的生活太糟糕了，他们甚至无法再进行和自己的判断力有关的任何事情了。”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大众的确在这些组织设施里、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团体里面感到很自在。这不是出于对公司所有者的商业利益的考虑，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无意识的无能感。他们在相互之间汲取温暖，相互慰藉，因为他们无法摆脱他们作为纯粹成员数量的命运。他们周围高雅的、华丽的环境使得他们仅作为一种量的单位还可以感到更好忍受一些。<sup>[256]</sup>

资本主义看上去再也不能按照它的老样子继续下去了，而且它的支持

者甚至也开始讨论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性了——因为他们看到了经济危机和集权主义政府的出现。但是高层雇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缺乏对新经济秩序的要求。对白领工人“未被注意到的极其恶劣的道德生存状况”<sup>[257]</sup>的补偿就是在工作外增加娱乐活动，这种娱乐既五光十色又可起到转移注意力的作用。这似乎成了蓝领工人一心向往的生活理想，另一方面白领工人似乎不大可能越来越接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尽管大公司里的白领工人也是1925年到1928年的那段合理化时期所推行的机械化和流水线工艺的牺牲品。

在霍克海默那里也存在着这两种相互矛盾的预期。一方面他观察到，服从阶级缺乏独立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得到的食物很少”，而且因为他们被限制在虚假的思想精神状况之中，还因为“他们是他们的监禁者的拙劣的模仿者，他们崇拜他们囚牢的象征，不是准备着去攻击他们的看守者，相反，谁要试着把他们从看守那里解救出来，他们就会把谁撕得粉碎”。<sup>[258]</sup>另一方面，他认为

115

社会发展正在将……社会各个阶层里，首先是底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里的健康家庭，这个人与人直接关联的惟一所在毁灭掉。自然群体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对群体是没有意识的，而这种群体近代以来解体的产物就是小家庭，但小家庭现在也正濒临消失——社会发展使得某些无产者群体内部形成了建立在追求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新的、自觉的结合……这种无产者联合形式的出现也是那毁灭家庭的同一过程的结果。<sup>[259]</sup>

马克思也曾试图说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的觉醒和恐惧感。觉醒和恐惧感被认为是工作的非人化和悲惨条件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劳动力的随处可得则被认为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原因。如果说以往旧经济方式中被忽略了的那些活动预示了某种新的、高级的经济方式，那么这种解释听上去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是蓝领工人从事的工作，还是白领工人所从事的工作都无法用这一观点来解释。用

类似的说法解释家庭生活、文化生活等等领域的情况听上去也是不可信的。雷德勒尔、克拉考尔、霍克海默和弗洛姆，他们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似乎不相信现在服从的这些人们会是未来高级的经济方式和未来高级的生存方式的代表。这样势必让他们返回头去思量在一心追求特权条件的无产阶级大众和一小部分进步组织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就革命意识而言，这些组织也不见得比进步的中产阶级团体强多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的信仰、坚信生产力正在松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观念，是霍克海默对革命前景所抱的最根本的信念，他不大相信某个特殊阶级能实现革命。但是，即便大众不是革命的，他们至少能和进步组织保持一致么？就这个问题，霍克海默甚至连一个暂时的答案也不想给出来，因为“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一个行将朽烂的颓败的社会也还在履行着将人类生存维持在某个层面使之得以为继的功能——尽管代价是不必要的痛苦”。<sup>[260]</sup>

116 总共发下去了 3300 份问卷，\* 1931 年末全部反馈回来。但是对这些问卷的分析做得不是太细致，一方面是因为霍克海默和弗洛姆长期患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仅缺乏经验研究的经验，而且也缺乏对问卷结果所透露出来的征兆做出反应的经验。西奥多·盖格 (Theodor Geiger) 1931 年在社会民主党刊物《社会》上发表了“工人心理学研究批判”一文，文章从批判的观点提到了当时进行的工人阶级社会心理学研究所采用的几种主要形式。<sup>[261]</sup> 但社会研究所对工人阶级的调查和这些形式是不同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研究所的调查有个缺点，那就是为了保证有代表性，调查对象的圈子只限于和调查者认识的那些人，但由于财政原因调查者也无法与被访者进行心理分析式的深入交谈。调查试图以问卷的方式部分地补偿这方面的不足。由 271 个组成部分构成的问卷非常易于理解，问卷里包含的一些问题看上去近乎愚蠢，但这些问题恰恰有助于对潜藏着的人格特征和态度做出结论。接受调查的人做出的回答反映出来的总体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检验了这些结论。

---

\* 此处英文为“1100 份”，但前面提到是“3300 份”，恐有误。——中译者注

读过弗洛姆的《基督教义的发展》(*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gma*)的人都不会对这次调查的结论感到吃惊。左倾的政治态度被证明只是为工人提供满足的各种形式中的一种。如没有这种观点,工人就会完全在心理上认同于阶级社会。大多数政治上左倾的工人在性质上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成员是相同的。即使将这一结论以具有科学严格性的形式公开发表出来,它也不大会使左翼更警觉或更团结一致;相反,这只能证明右派的胜利。出于这种原因,更是应该对方法上的一些不当之处和一些不确定的结论持严格的保留态度。分析了这种情况之后,霍克海默很快转变了看法,倾向于认为首次调查是有意义的:调查本身发展起来了一套方法工具,只需再作深入研究并扩大其经验基础就可以将它的结论公布出来。

在新主任治下,《社会研究学刊》也成了研究所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能力的最好的文字说明。与交叉学科的研究计划一样,这份刊物也是霍克海默的创意。这份一年出三期的刊物的编辑主任是列奥·洛文塔尔。由于他在研究所的工作排得很满,因此他放弃了教学,不再承担大学里的事务。洛文塔尔将自己的全部工作能量投入到了研究所,尤其是《社会研究学刊》之中。这样的情形差不多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这本期刊与格吕恩堡的《文献》是同一个发行人(莱比锡的赫尔施菲尔德),而且形制也相仿,除此之外这份期刊与它的前身有着显著的区别。刊物的论文部分几乎全是由研究所成员的文章构成的(在研究所搬出德国之后,这部分更是由清一色研究所成员的文章构成),因此刊物看上去就像研究所的“机构刊物”(在1938年出版的那份研究所简介就直截了当地这么描述这份刊物)。关于社会史和经济史的作品,尤其是档案材料情报(这一直是《文献》中的一大板块)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探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前形势的文章。评论部分都是由小文章构成的。这一部分被分作以下几个领域:哲学、普通社会学、心理学、历史、社会运动和社会政策、专业社会学以及经济学(每两期安排一次“文学”类评论)。这一点说明了他们严肃认真地做出了“不间断地审视各科学学科之工作”的努力。这是由霍克海默1937年在刊

117

物第六期上提出来的。

第一期（两期合刊）论文类板块的组织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是具有指导性的。除了霍克海默写的一篇总论之外，这期文章板块包含有两篇经济学论文、两篇心理学论文和两篇探讨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文。文章的安排没有按照常规按类型归类的方式编排。而是作了如下安排：先是霍克海默和他的首席助手及实际代理人波洛克的文章，然后是弗洛姆的文章，专论分析学派的社会心理学并点明了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实质；然后是格罗斯曼的文章——作为一个多年来享有声望的研究所研究合作者和老成员，作为一个不可能被忽视的，研究所也不想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克海默也说他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们的观点”<sup>[262]</sup>），格罗斯曼代表了研究所的某种老传统；然后是洛文塔尔的文章——对霍克海默来说，作为研究所中一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多面手，作为刊物的主任编辑，洛文塔尔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最后是当时还不是研究所成员的魏森格隆德—阿多诺的文章——音乐，他的这个专业领域在一个社会研究刊物中显得有些风格突兀。但是阿多诺的才华给霍克海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还是接受了这篇对刊物来说篇幅长得出奇的文章，并在下一期刊物上刊出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

这样的安排准确地反映出研究所的重新定位，也反映出了格吕恩堡传统现在仅仅是研究所研究的一个方面。在这样的安排中有一个人被漏掉了，他就是魏特夫。研究所的几个负责人本来为他提供了一个去中国访问的机会，并每月为他提供资助，以便他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该书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的后续研究打下基础。可是魏特夫鉴于当时德国的危机态势，决定完全投身于政治斗争当中去。研究所的负责人也接受了他的选择，而且继续为他提供一笔“不是很多但是固定的薪水”。<sup>[263]</sup> 这里面有霍克海默的策略考虑因素，共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魏特夫在研究所的支持之下，可以独立于研究所的机构继续围绕反犹主义和纳粹的社会和经济成因以及纳粹在大众中的胜利等等问题进行写作或发表讲演，而另一方面《社会研究学刊》对这些问题只字不提，而且刊物中即使有几篇文章探讨当时灾难性的经济和政

治事件，也只是采用“危机”、“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中立概念来进行表述。

第一期里收入的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不如说是为唯物史观和经济史观而作的辩护词，它们都是这些观念在极其不同领域内的应用（这些概念当时被广泛运用，警觉的研究所成员也不忌讳）。除了波洛克和格罗斯曼这两个格吕恩堡的前助手，所有作者都在他们的文章中简要地对历史唯物主义勾勒了一番。这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霍克海默、弗洛姆、洛文塔尔和阿多诺都感觉自己是他们各自领域中唯物主义的开路先锋——他们都和格罗斯曼和波洛克不同。格罗斯曼和波洛克是经济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至少是接受作为学科史的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才是关键。

对霍克海默、弗洛姆、洛文塔尔和阿多诺来说，唯物史观代表了一种对既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权力结构进行分析的能力，是一种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霍克海默在他的“论科学与危机”中认为，唯物史的历史就是解放生产力和解放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科学的基础。<sup>[264]</sup>波洛克在他“资本主义的当前形势和计划经济的前景”一文中认为，唯物史历史就是通过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重组经济中的生产力从而使其摆脱桎梏的过程。弗洛姆在他“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一文中认为，唯物史的历史就是自我管理和服从能力的扩展过程，就是性器欲性格特征的膨胀过程。而阿多诺在他“音乐的社会地位”一文中认为，唯物史历史就是指音乐创造性摆脱桎梏的过程。<sup>[265]</sup>所有这些作者似乎都感觉到他们被历史这辆火车载着一路向前，这就像格吕恩堡1924年在研究所成立典礼上做的就职讲演时所说的一样。和格吕恩堡的情形一样，他们似乎只有在解释进步中的停滞现象时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绝对不会因为非教条性、假说性、有待经验检验的特征而受到损害。这些特征正是洛文塔尔和霍克海默共同强调的。

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波洛克认为“世界经济的计划组织方式的前提”已经“在现有的经济体系内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

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由规模庞大的批量生产、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集中化过程，以及完成经济集中化所必需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构成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但是对其生产力仍持相当的保留态度。而波洛克却毫不怀疑地认为，仅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个危机”（世界经济危机）“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得到克服，而且在目前无法预计的很长时间以内‘垄断’资本主义还能够继续存在”。在波洛克看来，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样是可能的，前者只是在政治方面是成问题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决不会甘愿使自己降格为食利者。对他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景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景好。在计划经济中能得到客观利益的那些阶级很少表现出对计划经济的主观兴趣。<sup>[266]</sup>在一年之前，波洛克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政治期待给资本主义计划经济让步了。“资本所有权退化成纯粹的投资收益权将使得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无法被人接受——这是我们以前所持的观点，但这一观点作为反对意见已经不再有效了，因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控制大众的能力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归根到底，“总是不断地成为无法被改造的桎梏的生产关系”终有一天“不再同生产力要求相抵牾”——这一观点仅仅是一个预言，而且似乎只是出于一种义务才不得不提到这个预言。<sup>[267]</sup>与格罗斯曼不同，波洛克并不相信，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资本主义体系中致命的结构性缺陷。波洛克认为关键的难题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在受国家保护的顽固的大型生产领域已经无法再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得到控制了。但是，就资本主义体系内所能允许的计划经济是否能达到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或消除由此产生的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失调的程度这一问题，波洛克并没有做出任何说明。

弗洛姆给《社会研究学刊》第一期所撰写的稿子，谨小慎微地涉及关于性格发展的一个观念——性格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发展的。在他第一篇稿子中，他提到了本能冲动和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式交换”，这种交换按着某种趋势改造着人本身，总的来说这种趋势就是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以及服从限度的相应增长。在他为第三期撰写的稿

子“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一文中，他提到了一个难题：就无产阶级而言，能在什么意义上说其性器欲性格特征（不同于与早期发展阶段相对应的肛欲性格特征和口腔欲性格特征）增长了，同样，就资产阶级客观上最先进的那部分成员而言，又能在什么意义上这样说。<sup>[268]</sup>无产阶级的性格和中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那部分成员的性格在性器欲发展上都是按照先定的发展模式展开的，他们的性格会使他们适应于要求解放的生产力，或者使他们适应于更高级的社会环境，而且这种高级社会已经从旧有社会的母体中浮现出来了——这只是一个很难站得住脚的大胆观点。这种观点或许可以增强一种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进步观，但恰恰和在弗洛姆看来最有道理的功能主义观点相反。这种功能主义观点认为，所有社会阶级的力比多结构都适应于仍处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都适应于人类实际的生存条件。在弗洛姆那里，下面这种观点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信条：社会里客观矛盾的增长也意味着力比多冲动的作用不再是社会的黏合剂而是炸药，将会催生新的社会构成结构。<sup>[269]</sup>

在他的“论科学与危机”一文中，霍克海默说“科学由于其古典时期的局限而为自己划定的范围”应该受到质疑并最终被打破，这样才能解放“科学中固有的理性因素”。因此，必须通过搞清楚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通过一种“关于当前社会形势的理论”来了解科学的危机。科学的桎梏是由社会决定的。只有“在历史实践中改造科学的真正条件”才能打破这一桎梏。<sup>[270]</sup>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丰富性和高素质工人的数量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学者们却徒劳地在等待着科学的真正条件的转变。这一事实说明现在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心理学，迫切需要霍克海默在他给第一期学刊撰写的第二篇稿子里所提出的“历史学 and 心理学”。他所说的这种心理学将研究“各种心理机制是怎样形成的，正是这些心理机制使原本可能由于经济因素而公开化的阶级矛盾隐而不显”。霍克海默强调说，“各种各样的人类力量和由对抗自然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陈旧的社会形式之间形成的辩证关系”代表了“历史的动力”，这一观点不是可以取代具体研究的

万能的结构图，而仅仅是“符合现有知识的历史经验公式”。然而他不会去回顾性地研究“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总是不断地取代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真正原因”。<sup>[271]</sup>相反，他的兴趣集中在探讨理论领域的进步和理性化。在谈到他坚信理论应该起一种确定步调的作用时，他写道：“要揭穿当前危机的伪装，就得让有助于实现更好的人类条件的那些力量，甚至是理性的、科学的思考方式本身负起责任来。”<sup>[272]</sup>说完了这一点之后，他只是附带地谈了谈只有通过真正的革命性变革才能实现科学生产力的解放。

阿多诺从一开始接受唯物史观的时候，就把进步和理性的信仰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抛弃了。在他为刊物撰写的关于勋伯格的文章中，他说道：

现时代最进步的作曲作品，恰恰是它们自身难题展开的内在冲动的产物。这些作品通过作曲活动为自己设置的基础不仅是创造性的个性及其灵魂的表现、私人感觉和被启蒙了的心灵世界，而且是资产阶级那些范畴。它们让极其理性和清晰的作曲原则发挥着它们的作用。虽说这种音乐注定是和资产阶级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虽说这种音乐还不能被视为“无阶级性的”，还不能被视为未来的新音乐，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音乐形式——这种音乐极其严格地履行着它的辩证法和认识功能。

## 勋伯格已经

使私人的、资产阶级个人的表现性音乐按照自身的逻辑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并因而使它发展到了必须被取代的地步。他已经创造了一种形式迥异的音乐。我们无法给这种音乐形式指派任何直接的社会功能，实际上这种音乐已经将它与听众之间交流的最后联系完全切断了，而且首先在其内在性、音乐特质上，其次在它物质化出来的辩证法的启蒙性上，将同时代的其他音乐形式远远地

抛在身后。这种音乐是绝对理性的，而且是被完美地构造出来的，这种情况意味着它同现存的社会建制之间毫无调和的可能，而这种社会建制正在无意识地借助所有显而易见的关键图像(critical figures)捍卫自身，并在“自然”那里寻求帮助以对抗我们从勋伯格音乐那里体验到的意识的攻击。在勋伯格那里，意识也许在音乐史上第一次抓住并掌握了音乐的自然物质性。

但是，阿多诺也确切地意识到，有必要

坚持这样一种观点：音乐与社会的疏离，所有狂热的、理性上落后的音乐改良主义祸害，如个人主义和艺术性、技巧性的深奥艰涩，本身就是个社会事实，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正因这样，这种情形不可能在音乐内部得到修正；而只能通过社会的改变得到社会性的修正。<sup>[273]</sup>

阿多诺客观地说在社会中无法预见任何变革的可能性。通过这段评论，122  
他暗示，人们对当前存在着的这类变革趋势重视不够。他本人恰恰认为音乐领域和理论领域内的持续的“合理化”过程就是缺乏重视的表现。

阶级统治为了自保而提倡的日常社会的经验意识陷于狭隘和蒙昧之中，甚至还停留在神经质的愚蠢的阶段，这种意识……根本无法被当作判断属人的音乐形式的标准，这里的“人”是不再异化的、自由的人。政治对这种意识状态无法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而政治又是社会辩证法的核心要素。科学认识也无法与这种意识状态划清界限，因为科学意识所运用的意识状态也是由阶级统治所决定的，而且即便科学认识的意识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也因为阶级机制而带上了阶级统治的烙印。<sup>[274]</sup>

在仅仅接受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观念的同时，唯物史观的本质构成部分在这里被抛弃了吗？所有这些文章中沒有一篇像阿多诺的文章这么经常地使用“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词。从当时的共产主义信条出发，他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他就是这么称呼它的（在所有人中也就只有他提到了这个概念）——是被垄断资本主义所控制的。<sup>[275]</sup> 这让人产生了一种印象，那就是，他宣称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以及思想进步的观念，其实是借此试图为自己对现代音乐的阐释——为他本人，也是为左派——创造有利的声势。他本人是想从左派那里获得更多的对新音乐的支持的。

在他们当中，只有洛文塔尔在他的文章“论文学的社会地位”一文中是将唯物史观当作一个现成的概念来使用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并由此出发要求对文学作唯物主义研究。这种文学研究，相对于当时已经或多或少形而上学化了的研究方式而言，应该以19世纪的历史研究和实证主义研究为基础。“真正解释性的文学史应该是唯物主义的文学史。也就是说，它必须按照基础的经济结构在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样子来分析它们，而且必须分析解释文学作品——如果从唯物主义角度解释的话——对经济主导的社会的影响。”他举出了他运用新方法得出的几个结论。“当古茨科（Gutzkow）尝试性的对话反思着德国刚刚形成的尚处在初始阶段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团体的时候，斯皮尔哈根（Spielhagen）的技巧已经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胜利了，而印象主义也为资产阶级的危机提供了意识形态伪装，或者说承认了它的某种混乱状态。”“施托姆（Storm）的小资产阶级灵魂为自己而哭泣的时候，迈耶尔（Meyer）以其强力为世界带来了他的人物形象，他为1870年左右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幻想提供了满足。”“当斯达尔夫人还是拿破仑的资产阶级贵族的小说家时，古斯塔夫·弗莱塔克（Gustav Freytag）就已经为本世纪中叶的德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唱赞歌了。”<sup>[276]</sup> 洛文塔尔仅仅将文学看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附属品。他没有探讨可能和社会发展处于紧张关系状态的那种文学进步过程，而阿多诺是试图从这一角度来探讨音乐领域的相似问题的。洛文塔尔也没有探讨也许为无产

阶级或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提供支持的社会进步过程，这和弗洛姆是不同的。他惟一感兴趣的方面似乎是可以将唯物史观运用到文学研究上的科学进步。

如果从总体上看，霍克海默圈子成员所写的，发表在学刊第一期上的这些文章表现出了某些显著的共同特征。他们所有人都热情地宣布自己信仰唯物史观，他们所说的唯物史观正是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sup>[277]</sup>和《德意志意识形态》<sup>[278]</sup>论费尔巴哈部分所包含的一般结论。可是他们中没有人对无产阶级寄予希望。波洛克就在工人阶级那里发现了对社会变革主体性愿望的缺乏。当霍克海默提到“底层的阶级”的时候，他也是指出他们易于得到各种各样的满足。阿多诺也断然对工人阶级能扮演进步角色予以否定。只有弗洛姆在他头一篇文章中把“那种领导他的阶级并完全与本阶级相认同且为服务于它的各种愿望的无产者”同“那种以强人、以扩大化的家庭里的有权力的家长面对群众发号施令的领导”区分了开来。他在第二篇文章写道，“无产阶级”——与大商人阶层相类似——“似乎并没有明显证据说明他们与小资产阶级具有相同程度的肛欲性格特征”，但是他并没有深入探讨产生这类现象的可能的动力机制。<sup>[279]</sup>他们所有人没有对法治的福利国家、魏玛民主制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论题进行探讨。但是他们都不怀疑，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然而，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对资本主义应付危机的政策和计划经济的分析逐渐地瓦解了这种乐观主义。这些分析研究是由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波洛克、库尔特·曼德鲍姆（Kurt Mandelbaum，即库尔特·鲍曼 [Kurt Baumann] 的化名）以及格哈尔特·迈耶尔（Gerhard Meyer）——开展的。他们对当前形势都十分关注。“如果不研究社会中存在的向计划调控经济过渡的趋势”，霍克海默在他为学刊第一期撰写的前言中说道，“如果不对这一点所连带的种种难题进行研究”就不可能认识当代社会，“这些难题在今日之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和文化史研究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必须特别予以注意”。在当时甚至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一些人都对计划经济的实现有很大的信心。托马

124

斯·曼于1932年3月曾在柏林普鲁士艺术研究院举行的歌德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做了名为“作为资产阶级时代代言人的歌德”的讲演，在这篇讲演中他说：

在新社会的世界里，在团结和计划的有组织的世界里，人将摆脱低级状态，摆脱不必要的痛苦，摆脱这些使理性不快的事物——这种世界即将到来，它是绝对的节制的产物，对腐朽的、乏味的小资产阶级多愁善感深恶痛绝的所有人，所有那些伟大人物都对此深信不疑。这种世界将要到来了，它会具有公开的、理性的秩序，而且适合于人类精神所达到的这个阶段。这一世界必将被创造出来——就最坏的情况而言，它将通过暴力革命而得以创生，而且真正的情感也将因此重新获得它存在的理由，人类的良知、人的意识也将因而复苏。<sup>[289]</sup>

但是，波洛克、迈耶尔和曼德尔鲍姆截至1935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使得那些相信当代社会具有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趋势的想法越来越捉襟见肘。波洛克认为，资本主义所执行的一套是对计划经济的曲解，这一点已经日益明显。迈耶尔和曼德尔鲍姆只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概念，他们也相信他们完全可以论证计划经济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同时他们也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应付危机采用的都是政治措施，而且根本看不到有对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趋势。霍克海默圈子中的这些作家们都认为（计划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可能性有赖于某些政党在上层建筑方面所发挥的先锋作用，虽说这些政党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独立性，但是它们毕竟是和高度发展了的生产力保持一致的。尽管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节节胜利表示绝望，正是这一想法使他们还对社会主义抱有希望，也正是这一想法使他们避免了一些尴尬的问题：他们可以对无产阶级、苏联社会主义、西方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等等问题避而不谈。

学刊第一期中还有一篇最重要的文章没有提到，这就是弗朗茨·

伯克瑙 (Franz Borkenau) 的“机械论世界观社会学”。这篇文章是他《从封建的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过渡：制造业时代哲学史研究》一书的缩节。伯克瑙出身于维也纳一个上层阶级的“半犹太家庭”，从1921年起加入德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中期成为红色大学生团的全国性领袖。部分出于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策略的厌恶，他公开宣称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的敌人，因此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受到卢卡奇“对物化有穿透力的研究”<sup>[281]</sup>的启发，伯克瑙尝试依据社会存在的转变来解释17世纪的新思想形式和现代世界观的出现，这种世界观的认识论革命是与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新观念的形成同时完成的。他认为制造业的工序过程就是对一切有形之物进行的无所不包的抽象范式。此外，他的阐释依据的就是“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首先在新生产方式出现中表现出来”。<sup>[282]</sup>伯克瑙遵循的研究座右铭是：“理解一个思想家，只有通过他所投入的斗争来理解他，才能说得上真正理解了他。”<sup>[283]</sup>例如，理性主义拜物教的笛卡尔被伯克瑙视为法兰西贵族的意识形态专家，而霍布斯则被视为“土地贵族最先进那部分人的意识形态专家”。与洛文塔尔论文学相似，伯克瑙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在给不同的阶级或者阶级的不同阶层分派思想形态，划分出先进或滞后、乐观或悲观、进步或退步、或优柔寡断。与洛文塔尔和弗洛姆一样，这些解释让人困惑的主要问题就是它们天衣无缝的功能主义。最后伯克瑙也偏离了他的座右铭，他认为用几段引文，特别是用几段帕斯卡尔 (Pascal) 的引文就能概括他所研究的这个时期——这个帕斯卡尔正是“在无望救赎的世界中”表达了“对救赎的抽象渴望”的人。<sup>[284]</sup>但是在伯克瑙看来，作为“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帕斯卡尔自然只是把这种渴望看作是人类自身的本质，而不是他的时代的本质。

此外他还从历史和社会角度出发解释了许多自然科学家的“发现”，而且他的观点与显然崇拜自然科学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其苏维埃变体也截然不同，这一点使得伯克瑙的这部著作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构成部分。伯克瑙的著作是早期批判科学史的一个代表。然而，当这部开创性的著作初次在研究所丛书系列中出版时，霍克海默被



## 注释：

[1] Robert Wilbrandt, *Ich glücklichen Augen. Lebens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47), p. 337.

[2] Felix Weil, *Sozialisierung. Versuch einer begrifflichen Grundlegung nebst einer Kritik der Sozialisierungspläne* (Jena, 1922), p. 85.

[3] Robert Wilbrandt, 'Seid die Sozialisten Sozialistisch genug?', *Sozialismus und Kultur*, 3 (Berlin, 1919), pp. 11, 25-6.

[4] 'Programm der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 vom 11. Dezember 1918', in E. Schraeppler (ed.)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Berlin, 1958), vol. 3, pp. 33-4.

[5] Weil, *Sozialisierung*.

[6] 这是在德国大学中讲师的一种，他们已经通过了授课资格论文的答辩 (Habilitation)，虽然有资格授课，但是在学校里没有正式的教席。

[7] Weil, *Sozialisierung*, p. 83.

[8] 关于赫尔曼·韦尔 (Hermann Weil)，参阅 Ulrike Migdal,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1)；以及 Robert Helmuth Eisenbach, 'Millionär, Agitator und Doktorand. Die Tübinger Studentenzeit des Felix Weil (1919)', in *Bausteine zur Tübinger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3 (Tübingen, 1987)。

[9] 这是费利克斯·韦尔 (Felix Weil) 自己的说法，参见他未完成的“回忆录” (*Erinnerungen*)，转引自埃森巴赫 (Eisenbach) 的著作。

[10] 克拉拉·蔡特金 (1857-1933)，从 1920 到 1933 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妇女杂志《平等》 (*Die Gleichheit*) 的编辑，1919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0-1933 年担任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保罗·弗勒利希 (1884-1953)，德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但 1928 年被开除出党，1928-1930 年担任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他是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的著作的编辑者。1932 年加入社会主义劳动党 (SAP)，1934 年以后在流亡中继续领导该党。1950 年返回德国，重新加入他在 1908 年退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11] Hede Massing, *Die gross Täuschung. Geschichte einer Sowjetagentin* (Freiburg, 1967), p. 69. 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周”，参见 Michael Buckmiller, 'Die "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 1923', in *Grand Hotel Abgrund. Eine Philosophy der kritischen Theorie*, ed. Willem van Reijen a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Hamburg, 1988), pp. 141-79.

[12]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 Fred Halliday (New York, 1971).

[13]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 trans. Gregor Benton,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1975), p. 250. 中文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 页。

[14] Migdal,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p. 35.

[15] 在德国大学体制中, 只有通过授课资格答辩才能有正式授课资格, 进而才能有获得教授职称的资格。

[16] Buckmiller, 'Die "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 1923', p. 35.

[17] *Die Bedeutung des Arbeiterinnenschutzes*.

[18] 彼得·冯·哈塞尔贝尔格 (Peter von Haselberg) 这么推测。

[19] 指德国各城市政府中负责教育机构的部门。这一部门直接在行政上控制着各个大学。

[20] 韦尔 1929 年 11 月 1 日给科学、艺术和教育部部长的信。康拉德·黑尼希是第一位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文化部部长, 在任上大力推行激进改革。

[21] *Denkschrift über die Begründung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附有费利克斯·韦尔 1922 年 9 月 22 日致法兰克福大学校董会的信。

[22] Karl Heinisch Becker, *Gedanken zur Hochschulreform* (Leipzig, 1919), p. 9.

[23] *Kölner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Soziologie*, 1 (1920), pp. 16–17; Ludolph Brauer,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Adolf Mayer and Johannes Lemcke (eds), *Forschungsinstitute. Ihre Geschichte, Organisation, und Ziele* (Hamburg, 1930), vol. 2, pp. 290–1.

[24] Ernst Herhaus, 'Institute für Sozialforschung', transcript of the tape recording of a report by Pollock in 1965, in Ernst Herhaus, *Notizen während der Abschaff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pp. 41 and 48.

[25] Günther Nanning, 'Biographie', *Indexband zum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Graz, 1973), p. 43.

[26] Carl Grünberg,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ie Auflösung des gutsherrlich 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 (Leipzig, 1894);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and 'Anarchismus', in *Wörterbuch der Volkswirtschaft*, ed. Ludwig Elster (Jena, 1898), 2 vols, vol. 2, pp. 527–76; vol. 1, pp. 66–71. 格吕恩堡还写了一篇论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 vol. 2, pp. 509–27.

[27] Rosa Meyer-Leviné, *Im inneren Kreis. Erinnerungen einer Kommunistin in Deutschland 1920-1933*, ed Hermann Weber (London, 1977), p. 101. 罗莎·迈耶尔·莱文纳是奥根·莱文纳 (Eugen Leviné) 的妻子, 奥根·莱文纳因为参与德国第二个共产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曾于 1919 年 7 月 5 日被行刑队执行枪决。她后来嫁给了恩斯特·迈耶尔, 他曾是德国共产党 1921-1922 年间和 1926-1927 年间的领导人。

[28] 格吕恩堡在这里实际上是因势利导, 顺势发挥。他原来的讲演稿上称法兰克福研究所为教学机构, 但是招致了系里的强烈反对, 后来就把这段从讲演稿上划掉了。

[29] Carl Grünberg, *Festrede, gehalten zur Einweih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am 22. Juni 1924*,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20 (Frankfurt am Main, 1924), pp. 8-9.

[30] *Ibid.*, pp. 10-11.

[31] *Ibid.*, p. 12; Christian Ekert, 'Des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Köln', in Brauer et al. (eds), *Forschungsinstitute*, vol. 2, p. 291.

[32]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献》Leipzig, 1911-30; repr. Graz, Austria, 1966-73.

[33] Friedrich Pollock, '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in Brauer et al. (eds), *Forschungsinstitute*, vol. 2, p. 352.

[34] Cf. Migdal,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pp. 94-5.

[35] 漂鸟协会是创办于 1895 年的一个德国青年运动组织, 他们的理念来自于 19 世纪末期的文化批判, 希望通过为年轻人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克服城市文明化的影响, 远足、野营、民族歌曲和民族舞蹈是这种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组织 1933 年被纳粹取缔。

[36] Henryk Grosman, *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Friedrich Pollock,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tunion 1977-1927*, (Leipzig, 1929); Karl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

[37] Kurt Mandelbaum, *Die Erörterung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über das Problem des Imperialismus 1895-1914*; Hilde Weiss, *Abbé und Ford. Kapitalistische Utopien*.

[38] Paul Massing, *Die Agrarverhältnisse Frankreichs im 19. Jahrhundert und das Agrarprogramm der französischen Sozialistischen Parteien*.

[39] Julian Gumperz, *Zur Theorie kapitalistischen Agrarkrie. Ein Beitrag zur Erklärung der strukturwandlungen in der amerikanischen Landwirtschaft*.

[40] Loe Lowenthal,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Novelle im 19. Jahrhundert*.

[41] 爱德华·伯恩斯坦 (1850–1932), 1872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1902–1928 年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 在流亡伦敦期间和恩格斯建立了友好关系; 奥古斯特·倍倍尔 (1840–1913)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 从 1867 年直到牺牲一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 I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5 (1930), p. 417.

[42] Marx-Engels Archiv, vol. 1, p. 462.

[43] Note by Carl Grünberg in D. Rjasanoff [David Borisovich Ryazanov],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1 (1924), p. 400.

[44] Cf. Migdal,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pp. 100–1.

[45] 系主任格洛尔夫 (Gerolff) 1926 年给校董事会的信。Cited in *ibid.*, pp. 104–5.

[46] Lecture Guide (*Vorlesungserzeichnis*) (Frankfurt University, 1972–3), p. 5; Paul Tillich, 'Autobiographische Betrachtungen', in *Gesammelte Werke*, vol. 12 (Stuttgart, 1971), p. 69.

[47] 费利克斯·韦尔 1929 年 11 月 1 日, 致科学、艺术和教育部部长的信。

[48] 弗里茨·施密特 1930 年 7 月 25 日致该部主管里希特的信, 引自 Paul Kluge, *Die Stiftungs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 1973), p. 504.

[49] 按照对格吕恩堡任命的规定, 格吕恩堡的主任任期截至这个日期, 这天是他 71 岁的最后一天。

[50] 1926 年至 1931 年阿道尔夫·洛威在基尔接替滕尼斯 (Tönnies) 的经济理论和社会学教授职位, 成为世界经济研究所科研部主任。这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宗教社会学家是霍克海默的好朋友, 他们儿童时代在斯图加特就是好友。

[51] 1942 年 3 月 10 日霍克海默给韦尔的信; Leo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Berkeley, 1987), p. 53, 1930 年 6 月 26 日哲学系给科学、文化和教育部部长的信 (Horkeimer personnel file in the archive of the former Faculty of Philosophy, J. W.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am Main).

[52] Max Horkheim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37 (Frankfurt am Main, 1931); repr. in Horkheimer,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ed.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1972), pp. 41–2.

[53] Sigmund Freud, *Gesammelte Werke*, vol. 14 (Frankfurt am Main, 1963), pp. 373–4; [cf. the translation by Angela Richards in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Freud, *Civili-*

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Group Psychology,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and Other Works, Pelican Freud Library, 12 (Harmondsworth, 1985), p. 233.] 中文版参考杨韶岗译、彭运石校《一个幻觉的未来》，见《弗洛伊德文集》(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1页。此处译文有改动。

[54] In Ignaz Jastrow (ed.), *Die Reform d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n* (Mnich, 1920), pp. 92–3.

[55]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这是一篇可能发表于1931年的简介性文章。

[56] 1963年12月8日霍克海默给马尔库塞的信。里茨勒是外交部政治处德国事务顾问，1919年坚决支持针对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武力干涉；从1919年起他还担任月刊《德意志民族》(*Die Deutsche Nation*)的副主编，并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评议会执行主席和名誉哲学教授。1930年要授予弗洛伊德法兰克福歌德奖的时候，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曾试图将他的朋友海德格尔调入法兰克福大学，未果。

[57] ‘Das Schlimme erwarten und doch das Gute versuchen. Ein Gespräch mit Professor Dr. Max Horkheimer’, in Gerhard Rein (ed.), *Diastagesgespräche mit Zeitgenossen* (Stuttgart, 1976), p. 151.

[58] Cited in Helmut Gumnior and Rudolf Ringuth, *Max Horkheimer* (Reinbek bei Hamburg, 1973), p. 16.

[59] Arthur Schopenhauer, ‘Aphorisms on the Wisdom of Life’, in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Short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 E. F. J. Payne (Oxford, 1974), Vol. 2, pp. 311–497.

[60] Max Horkheimer, *Aus der Pubertät, Novellen und Tagebuchblätter* (Munich, 1974), pp. 196–7.

[61] 恩斯特·托勒(1893–1939)，政治家、作家。他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是慕尼黑苏维埃政府成员。共和国瓦解之后，他被判五年徒刑；1933年移民美国。

[62] Hans Cornelius, in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en*, 20 (Frankfurt am Main, 1924), pp. 196–7.

[63] 1921年11月30日霍克海默给麦顿，即罗泽·里科尔的信。

[64] Max Horkheimer, *Gestaltveränderungen in der farbenblinden Zone des blinden Flecks im Auge. Zur Antinomie der teleologischen Urteilskraft*.

[65] 魏森格隆德1924年7月16日给洛文塔尔的信；in Leo Lowenthal,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Frankfurt am Main, 1980), pp. 248–9.

[66] Max Horkheimer, *Kants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als Bindeglied zwischen theore-*

tischer und praktischer Philosophie (Stuttgart, 1925), pp. 62–3.

[67] 'Heinrich Regius', i. e. Max Horkheimer, *Dämmerung. Notizen in Deutschland* (Zurich, 1934), in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Alfred Schmidt a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Frankfurt am Main, 1985-), vol. 2, pp. 309–452. Trans. Michael Shaw, in Max Horkheimer, *Dawn and Decline: 1929–1931 and 1950–1969* (New York, 1978), pp. 15–112. 这个英译本将原书中 136 条格言漏译了 28 条, 也没有译出它的题记 (莱瑙 [Lenau] 的六行诗句), 只对标明日期为 1933 年的前言说明做了部分摘译。

[68] *An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Ein neuer Ideologiegegriff?', and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69] Horkheimer, *Dämmerung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 425. [new translation, cf. *Dawn and Decline*, p. 98].

[70] Ibid. pp. 380, 356, 351 [*Dawn and Decline*, pp. 67, 47, 43].

[71] Ibid. pp. 319, 356–7, 426 [*Dawn and Decline*, pp. 21, 47, 43].

[72] Ibid. p. 344 [*Dawn and Decline*, pp. 37].

[73] Cf. *ibid.*, pp. 373–8; 'Die Ohnmacht der deutschen Arbeiterklasse' [ '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Dawn and Decline*, pp. 61–5].

[74] Ibid. p. 377, 378, 348 [*Dawn and Decline*, pp. 64, 65, 41].

[75] Ibid. p. 416–17, 383, 392, 343 [*Dawn and Decline*, pp. 92, 96, 75, 37].

[76] Ibid. p. 371, 377, 378 [*Dawn and Decline*, pp. 58, 64, 65].

[77] Max Horkheimer, 'Ein neuer Ideologiebegriff?'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5 (1930), pp. 33–56.

[78] Horkheimer, *Dämmerung*, p. 419 [*Dawn and Decline*, pp. 93–94].

[79]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Oxford, 1973), pp. 32–33 [中译本参见《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校, 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第 15 页]; Jean-Paul Sartre,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Paris, 1970), p. 22 (L'homme n'est rien d'autre que ce qu'il se fait), Max Horkheimer, 'Ein neuer Ideologiebegriff?', pp. 40, 45.

[80] 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1 (1924), p. 55.

[81] *Die Grenzen der Wissenschaft bei Max Weber*.

[82] *Das jüdische Gesetz. Ein Beitrag zur Soziologie des Diasporajudentums*.

[83] Ernst Simon, *Erinnerungen an Erich Fromm*, Stadtarchiv, Frankfurt am Main .  
[恩斯特·A.西蒙(1899— ), 宗教哲学家和教师, 马丁·布伯的助手, 与弗洛姆合作编辑过《犹太人周刊》(*Jüdisches Wochenblatt*), 后来在耶路撒冷成为教育学教授; 据洛文塔尔说, 西蒙当时“在法兰克福犹太人圈子里很有影响”。(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p. 22.) ]

[84] Interview in *Die Zeit*, 21, March 1980, p. 52.

[85] Erich Fromm, Gesamtausgabe, ed. Rainer Funk (Stuttgart, 1980—1), vol. 6.  
p. 9.

[86] 约翰·雅克布·巴霍芬(John Jacob Bachofen, 1815—1857), 苏黎世罗马法教授, 发展了对古代神话和象征的浪漫主义阐释, 被认为发现了古代世界中母权制度的存在; 威尔还姆·赖希(1897—1957), 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家, 后来发展了“生命原动力”理论; 西格弗里德·伯恩费尔德(1892—1953), 是弗洛伊德的弟子, 社会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的教育家; see Bernfeld,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und Psychoanalys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d. Lutz, von Werder and Reinhart Wolff,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9—70)。

[87] Erich Fromm, ‘Die Anwendung der Psychoanalyse auf Soziologi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tische Pädagogik*, 3 (1928—90), p. 269.

[88] Max Horkheimer, *A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30), p. 270.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118页。

[89]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 唯物主义哲学家和黑格尔的批判者, 《基督教的本质》(1841)的作者, 该书“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改造为激进的人道主义”并认为“宗教是人类自身权力的异化, 是人类的创造物后来对人类自己的统治”。(David Fernbach,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Harmondsworth, 1973), p. 11)。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92), 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 马克思的同事,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

[90] Heinrich Meng, *Leben als Begegnung* (Stuttgart, 1971), p. 78.

[91] Jürgen Habermas, Silva Bovenschen et al., *Gespräche mit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p. 15.

[92] Erich Fromm, ‘Die Entwicklung des Christudogma . Eine psychoanalytische Studie zur Sozialpsychologischen Funktion der Religion’, *Imago*, 16 (1930) pp. 305—73; repr. in *Das Christudogma und andere Essays* (Munich, 1965), p. 83.

[93] Horkheimer, 'Ein neuer Ideologiebegriff?', pp. 54 and 56.

[94] Fromm, *Das Christendogma*, pp. 91, 65, 15.

[95] *Ibid.*, p. 91.

[96] Karl Kautsky,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Eine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Stuttgart, 1908), cited in Fromm, *Das Christendogma*, p. 44. 卡尔·考茨基 (1854—1938),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伦敦时期曾是他们的助手, 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 曾帮助社会民主党起草艾尔福特纲领 (Erfurt programme, 1891)。1917年之后, 他反对暴力革命和左派独裁, 暂时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 (USPD) 成员。1922年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 并为之起草了海德堡纲领 (Heidelberg programme, 1925)。考茨基的这本书的英文版是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A Study in Christian Origins*, trans. Jacob W. Hartmann (London, 1925)。

[97] Fromm, *Gesamtausgabe*, vol. 1, pp. 34, 36.

[98] Friedrich Pollock, *Sombarts 'Widerlegung' des Sozialismus, Beihefte zum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3, ed. Carl Grüner (Leipzig, 1926), pp. 53—54.

[99]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1880—1936), 《西方的没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1918—22, English trans. 1926) 的作者, 认为在未来时期内西方将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他的观点与纳粹的某些信条相似, 但是他也受到了纳粹的批评, 从1933年直到他去世一直生活在孤独之中。约翰·普兰格 (1874—1949), 1933年之前一直是明斯特的社会学教授。奥特马尔·施潘 (1878—1950), 奥地利经济学教授, 1938年被开除教授职位, 他的反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奥地利保守主义和奥地利法西斯主义中颇具影响。

[100] On 'phenomenological intuition', see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he Hague, 1982), pp. 104—5.

[101] Friedrich Pollock, 'Zur Marx'schen Geldtheorie',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3 (1928), p. 203.

[102] 马克斯·阿德勒 (1873—1937), 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 维也纳的社会学教授。他试图综合康德和马克思, 力图提出一种真正社会主义的文化生活形式。

[103] Friedrich Pollock,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 (Leipzig, 1929), pp. 382, 288, 291.

[104] *Ibid.*, p. 2 and note 4.

[105] *Rede Trotzki's auf dem 9. Kongress der KPR*, April 1920, cited in *ibid.*, pp. 57—8.

[106] Ibid., pp. 365, 366.

[107] Horkheimer, *Dämmerung*,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p. 361, 386. [*Dawn and Decline*, pp. 51, 72].

[108] Pollock,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pp. 316, 278, note 116, and p. 323.

[111] 鲁道夫·希法亭 (1877-1941), 政治和医学博士, 生于维也纳, 是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前进报》(*Vorwärts*) 编辑,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脱离社会民主党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 (USPD), 担任该党报纸《自由》(*Freiheit*) 编辑。后来复又加入社会民主党, 1924 至 1933 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和财政部长。

[110] Rudolf Hilferding, 'Die Aufgaben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Republik', in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tags 1927 in Kiel* (Berlin, 1927), p. 168.

[111] 这是在旁敲侧击地批评亨利耶克·格罗斯曼和他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 他的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三卷《资本论》的阐释的基础之上的。

[112] 恩斯特·黑克尔 (Ernst Haeckel, 1834-1919), 耶拿的生物学教授, 是达尔文主义热情的捍卫者。

[113] Lowenthal, *Unmastered Past*, p. 43.

[114] Leo Lowenthal, 'Das Dämonische: Entwurf einer negativen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Gabe Herrn Rabbiner Dr. Nobel zum 50. Geburtstag* (1921).

[115]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p. 49.

[116] *Die Sozialphilosophie Franz von Baaders. Beispiel und Problem einer religiösen Philosophie*.

[117] Ernst Bloch, *Geist der Utopie* (Munich and Leipzig, 1918), p. 410.

[118] 'Der Begriff des Unbewussten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Seelenlehre' and 'Die Philosophie des Helvétius'.

[119] Lowenthal,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p. 67; cf. *An Unmastered Past*, p. 54.

[120] Kracauer to Lowenthal, 4, December 1921 [translated in part in Leo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p. 203].

[121] Theodor W. Adorno, 'Henkel, Krug und frühe Erfahrung',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70-86), vol. 11, pp. 556-7.

[122] 格奥尔格·西美尔 (1858-1918), 先在柏林, 后在斯特拉斯堡任哲学教授; see Rudolph H. Eisingartner, *Experience and Culture: The Philosophy of Georg Simmel*, Middletown, Conn., 1960.

[123] Siegfried Kracauer, *Soziologie als Wissenschaft.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 (Dresden, 1921), in Kracauer, *Schriften*, ed. Karsten Witt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vol. 1, pp. 13–14.

[124] Ibid. p. 11.

[125] 克拉考尔 1921 年 12 月 4 日给洛文塔尔的信; cited in Lowenthal,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p. 245.

[126] Kracauer, 'Die Wartenden', *Frankfurter Zeitung*, 12 March 1922, repr. in *Das Ornament der Masse. Essays* (Frankfurt am Main, 1977), p. 117.

[127] *Die Transzendenz des Dinglichen und Noematischen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128] 阿多诺 1924 年 7 月 16 日给洛文塔尔的信; cited in Lowenthal,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p. 247.

[129]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 11.

[130] Adorno, *Neue Blätter für Kunst und Literatur*, 6 (1921–2), pp. 88–9. [将 durchseelt 译为“活泼泼的”(animated)的译法, 见 Adorno, 'Spengler Today', *SPSS*, 9 (1941), p. 322.]

[131] *Neue Blätter für Kunst und Literatur*, 1 (1922–3), 18 September 1922, pp. 11.

[132] *Zeitschrift für Musik*, 11 August 1923, pp. 315–16.

[133] Ibid., p. 49.

[134] *Die Musik*, 20 (1928), p. 322.

[135] Theodor W. Adorno, 'Gedichte von Reinhold Zickel', *Akzente*, 3 (1958), pp. 275–6.

[136] 阿多诺 1934 年 10 月 7 日给克赖内特 (Krenct) 的信。

[137] Theodor W. Adorno, *Berg, Der Master des kleinen Übergangs* (Vienna, 1968), pp. 24, 44–5.

[138] Ibid., p. 49.

[139] 阿多诺 1925 年 3 月 8 日, 以及 4 月 10 日给克拉考尔的信。

[140] 一部很著名的百科全书。

[141] Cited by Willi Reich, *Arnold Schoenberg oder Der konservative Revolutionär* (Munich, 1974), p. 17.

[142] *Das Andere. Ein Blatt zur Einführung abendländischer Kultur in Österreich. Geschrieben von Adolf Loos*.

[143] Arnold Schoenberg, *Harmonielehre*, 7<sup>th</sup> edn (Vienna, 1966), p. 497.

- [144] Arnold Schoenberg, 'Franz Listz Werk und Wesen' (1911), in *Stil und Gedanke. Aufsätze zur Musik*, ed Ivan Vojtech (Frankfurt am Main, 1976), p. 171.<sup>115</sup>
- Schoenberg, 'Komposition mit 12 Tönen', in *ibid.*, p. 75.
- [146] Adorno, Berg, p. 45.
- [147] 阿迪诺 1925 年 6 月 17 日给克拉考尔的信。
- [148] 克拉考尔 1926 年 5 月 27 日给布洛赫的信。Cited in Ernst Bloch, *Briefe 1903–1975*, ed, Karola Bloch et al. (Frankfurt am Main, 1985), vol. 1, pp. 274–5.
- [149] *A modern drama feijldőésének története* (Budapest, 1911) .
- [150] Éva Fekete and Éva Karádi (ed.) *Gorge Lukács. Sein Leben in Bildern, Selbstzeugnissen und Dokumenten* (Stuttgart, 1981), p. 33.
- [151] Georg Lukács,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Dramas*, ed. Frank Benseler (Darmstadt, 1981), p. 359.
- [152] Georg Lukács, 'Von der Armut am Geiste' and *Soul and Form*, trans. Anna Bostock (London, 1974) .
- [153] Ferenc Fehér, 'Am Scheideweg des romantischen Antikapitalismus', in Agnes Heller et al., *Die Seele und das Leben* (Frankfurt am Main, 1977), p. 301.
- [154] Cited in Fekete and Karádi (ed.), *Georg Lukács*, p. 62.
- [155] Georg Lukács, 'Der Bolschewismus als moralisches Problem', *BrechtJahrbuch* (1979), p. 18.
- [156] Georg Lukács, *Werke* (Neuwied/Berlin, 1968), vol. 2, p. 81.
- [157]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 186, 237, 193, 172.
- [158] 克拉考尔 1926 年 6 月给布洛赫的信, in Bloch, *Briefe*, vol. 2. p. 283.
- [159] Theodor Adorno, *Der Begriff des Unbewussten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Seelenlehre*, first published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 [160]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p. 91, 222, 320.
- [161] 柯奈留斯 1928 年 1 月 8 日给他一位哲学系同事的信; Theodor Adorno file of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 [162] Walter Benjamin, 'Die Schulreform, eine Kulturbewegung' (1912),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ud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1974–85), vol. 2, p. 839. 'Dialog über die Religiösität der Gegenwar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 839.
- [163] 本雅明 1912 年 11 月给施特劳斯的信, cited in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 839.

- [164] Walter Benjamin, 'Dialog über die Religiösität der Gegenwar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p.28-9. [文中出现的尼采的话,原文是:“我劝告你爱你邻人(Nächstenliebe)了吗?毋宁说我劝告你逃离你的邻人去爱那最遥远的(Fernsten-Liebe)。”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Everyone and to No-one*, trans. R. J. Hollingdale (Harmondsworth, 1961), p. 87.]
- [165] Gershom Scholem,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London, 1982), p. 87.
- [166] Walter Benjamin, 'Das Leben der Studenten',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 82.
- [167] Walter Benjamin, 'Über das Programm der kommenden Philosophie', in *ibid.*, pp. 160, 164.
- [168] Scholem, *Walter Benjamin*, p. 77.
- [169] Walter Benjamin, *Der Begriff der Kunstkritik in der deutschen Roman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3 paperback edn), pp. 15, 63, 113.
- [170]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 168.
- [171] Benjamin, 'Drei Lebensläuf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6, p. 218.
- [172]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p. 138, 169, 186.
- [173] *Ibid.*, pp. 184, 186, 147, 181.
- [174] 本雅明仔细区分了古典悲剧 (Tragödie) 和巴洛克时期德国悲苦剧 (Trauerspiel), 英译本虽然在题目中没有使用“悲苦剧”这一德语词,可是在文本中这么做了。
- [175] Walter Benjamin,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1977), pp. 35, 41 (cf. p. 35), 46.
- [176] *Ibid.*, p. 37.
- [177] Walter Benjamin,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Language of Man", in *One-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London, 1979), p. 114.
- [178] Benjamin, *Origin of Tragic Drama*, pp. 45, 138, 139, 140.
- [179] *Ibid.*, pp. 166, 167.
- [180] *Ibid.*, p. 176.
- [181] Benjamin, *Der Begriff der Kunstkritik*, p. 81.
- [182] Benjamin,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p. 182
- [183] 瓦尔特·本雅明 1924 年 12 月 22 日给格尔绍姆·朔勒姆的信, in Benjamin, *Briefe*, ed. Theodor W. Adorno and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 am Main, 1966),

p. 366。

[184] 本雅明给朗格 (Rong) 的信, 1923 年 12 月 9 日, *Briefe*, p. 332。

[185] 本雅明给朔勒姆的信, 1924 年 6 月 13 日, *Briefe*, p. 350。

[186] 本雅明给朔勒姆的信, 1928 年 10 月 30 日和 4 月 23 日, 1929 年 3 月 15 日, *Briefe*, pp. 483, 470, 491。

[187] Cf. Rolf Tidemann, 'Einleitung', in *Passagen-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p. 21。

[188] 本雅明给阿多诺的信, 1935 年 5 月 31 日, *Briefe*, p. 663。

[189] 本雅明给朔勒姆的信, 1930 年 1 月 20 日, *Briefe*, p. 506。

[190] 阿多诺给本雅明的信, 1938 年 11 月 10 日, *Briefe*, p. 783。

[191] Theodor. W. Adorno, 'Zur Zwölftontechnik', repr. In Adorno and Ernst Krenek, *Briefwechsel*, ed. Wolfgang Rogge (Frankfurt am Main, 1974), p. 168。

[192] 参见 *The New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ed. Stanley Sadie (London, 1980), vol. 18: “通节歌曲式 (德语 durchkomponiert)。该词一般指这样一组音乐, 其中每一小节音乐都是不同的, 不像分节反复中那样这一节的音乐还会在下一节中重复。因而这样的音乐形式并不必然由诗节所决定, 但通过与诗节中的思想、形象和情境建立起微妙精细的对应关系, 这种音乐形式也具有某种连续性。它当然并未排除主题性母题的复现。” 又见 *The New Oxford Companion to Music*, ed. Denis Arnold (Oxford, 1983), vol. 2: “通节歌曲式……任何不出于其形式设计的目的而依赖音乐小节的重复的作曲方式都可以被称为通节歌曲式。但是该术语常常用来指其中每一小节的乐曲都不同的歌曲。”

[193] Theodor W. Adorno, 'Reaktion und Fortschritt', in Adorno and Krenek, *Briefwechsel*, p. 180。

[194] 古斯塔夫·兰道尔 (1870—1919), 德国作家和政治家。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 他投身于非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非暴力无政府主义。1919 年他是慕尼黑黑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员, 后被义勇军 (*Freikorps*) 成员暗杀。

[195] Theodor W. Adorno,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Ästhetischen* (Tübingen, 1933; repr.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96] 阿多诺给克拉考尔的信, 1930 年 7 月 25 日。

[197] Adorno, *Kierkegaard*, (1974 edn), p. 234。

[198] 阿多诺给克拉考尔的信, 1930 年 8 月 6 日。

[199] Paul Tillich, 'Gutachten über die Arbeit von Dr. Weisengr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esthetischen* [sic] bei Kierkegaard', in the Theodor Adorno file (1924—68),

Philosophy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m Main.

[200] Max Horkheimer, 'Bemerkungen in Sachen der Habilitation Dr Wiesengrund', February 1931, in *ibid*.

[201] Theodor. Adorno, 'Die Aktualität der Philosophie',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 342.

[202] 本雅明给朔勒姆的信, 1925年2月19日, *Briefe*, p. 372.

[203]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p. 334 and 342.

[204] 本雅明给朔勒姆的信, 1933年1月15日, in *Walter Benjamin-Gershom Scholem, Briefwechsel 1933 - 1940*, ed.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 am Main, 1980), p. 36.

[205] "Die Idee der Naturgeschichte".

[206] See Hermann Mörchen, *Adorno und Heidegger* (Stuttgart, 1981), p. 13.

[207] Adorno, *Kierkegaard*, p. 111.

[208]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 356.

[209] Herbert Marcuse, *Der deutsche Künstlerroman*, in *Schriften*, vol. 1 (Frankfurt am Main, 1978), pp. 16 and 333.

[210] Cf. Barry Katz,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1982), p. 55.

[211] *Die Lehre vom Urteil im Psychologismus*.

[212] *Jahreshef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57 - 58* (Heidelberg, 1959), p. 20, cited in Winfried Franzen, *Martin Heidegger* (Stuttgart, 1976), p. 25.

[213] *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

[214] Edmund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vol. 1 (1913).

[215] Martin Heidegger, 'My way to Phenomenology', in *On Time and Being* (New York, 1972), p. 77.

[216] Karl Löwith, 'Curriculum vitae' (1959), in Löwith, *Sämtliche Schriften*, ed. Klaus Stichelew and Marc B. De Launay, vol. 1 (Stuttgart, 1981), p. 451.

[217] Cited in Paul Hühnefeld, *In Sachen Heidegger. Versuch über ein deutsches Genie* (Hamburg, 1959), p. 51, see also Franzen, *Martin Heidegger*, p. 26.

[218] Martin Heidegger, *Time and Being*,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Oxford, 1973), p. 21, 32, 34, 中文版参见《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王庆节

译, 熊伟校, 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第 3 页、第 14 页、第 16 页。

[219] *Ibid.*, p.33 and 68. 中译本见第 15 页和第 50 页。

[220] *Ibid.*, p.222. 中译本见第 206 页。

[221] *Ibid.*, p.233, 232, 307. 中译本参见第 216 页、第 217 页和第 301 页。

[222] *Ibid.*, p.435. 中译本见第 434 页。

[223] [“常人是一种生存论环节并作为源始现象而属于此在之积极状态”, *Time and Being*, p.167, 中译本参见第 150 页 (原英译作者给此句加了着重号)。“生存论性质”是对此在之“存在特性”的一种规定, 和“范畴”相对, 范畴是“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规定”(英译本第 70 页)。

[224] Martin Heidegger, ‘Was ist Metaphysik?’, in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1967), p. 22. 这里指的这一是在海德格尔 1949 年为“形而上学是什么?”所作的导言里, 并没和“形而上学是什么?”译在一起, 见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ed. and trans. David Parrell Krell (London, 1978), pp. 94–112. 中文版参见“形而上学是什么?”, 《路标》, 孙周兴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138 页。

[225] 参见“形而上学是什么?”, 《路标》, 孙周兴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141 页。本段引文皆见该文。

[226] 《路标》, 孙周兴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127 页、第 129 页。

[227] 《路标》, 孙周兴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137 页。

[228] 《路标》, 孙周兴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135 页、第 136 页。有改动。

[229] ‘Davos Disputation’, in 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4th.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73). 这个版本第一次收入达沃斯辩论, 在英文本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并不包括达沃斯辩论的译文,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 James S. Churchill (Bloomington, 1962) .

[230] Marcuse, *Schriften*, vol. 1, pp.358 and 385.

[231]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ie des Scheiterns. Karl Jaspers’ Werk ‘Unterhaltungsblatt, der Vossischen Zeitung’, 14, December 1933.

[232] Herbert Marcuse, ‘Beiträge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 ‘Contribution to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published in the *Philosophische Hefte* of his friend, the Husserlian Maximilian Beck (special issue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1928), pp.45–68, *Schriften*, vol.1, pp.364–5.

[233] Herbert Marcuse,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1932)

[234] Herbert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

- mus', *Die Gesellschaft*, 9 (1932), pp. 136–74, in *Schriften*, vol. 1, p. 509.
- [235] Marcuse, *Hegels Ontologie*, p. 3.
- [236] Marcuse, *Schriften*, vol. 1, p. 536.
- [237] *Ibid.*, p. 486.
- [238] Cf. Karz,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 p. 84.
- [239] Cited from the reprint of the editorial introduction which appeared in the *Frankfurter Zeitung*, 25 January 1929.
- [240] Niccolò Machiavelli, *Florentine Histories*, trans. Laura F. Banfield and Harvey Mansfield (Princeton, 1988), p. 123. (Book 3, chapter 13).
- [241] Marx Horkheimer, *Anfäng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30).
- [242] Marx Horkheimer, 'Zur Relativität des Charakters', *Dämmerung*,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 449.
- [243] Marx Horkheimer and Friedrich Pollock, *Materialien für Neuformulierung von Grundsätzen*, (New York, August 1935) (MHA: XXIV 97).
- [244] Julius Deutsch, *Faschismus in Europa* (1928); Hermann Heller,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Berlin, 1929).
- [245] Horkheimer to Senior President (*Oberpräsident*) of the Province of Hessen-Nassau and State Commissar of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m Main, in Kassel, 4 December 1930.
- [246]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p. 54.
- [247] “格奥尔格圈子” (*George-Kreis*) 是一个作家、画家批评家组成的团体, 兴盛于 1890 年代。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是诗人斯泰凡·格奥尔格 (Stefan George, 1868–1933)。他们的目标是复兴德国文学语言。许多知名作家都属于这个圈子并为它的刊物《艺术报》 (*Blätter für die Kunst*, 1892–1919) 撰稿。它的成员除了科默雷尔和康托洛维茨之外, 还包括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Hugo von Hofmannsthal) 和哲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 (Ludwig Klages)。
- [248] Karl Korn, *Lange Lehrzeit. Ein deutsches Leben* (Munich, 1979), pp. 115–16.
- [249] 讨论莱辛的《人类教育》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它的一个批评性读本由 L. F. Helbig 编辑, 于 1980 年在柏林出版。
- [250] Joseph Dünner, *Zur Protokoll gegenben. Mein Leben als Deutscher und Jude* (Munich, 1971), pp. 65–6.
- [251] Kommerell to Heusler, 10, July 1932, in Max Kommerell, *Briefe und Aufzeich-*

nungen 1919–1944, ed. Inge Jens (Olten, 1967), p. 26–7.

[252] Korn, *Lange Lehrzeit*, p. 134.

[253] 此外还有魏特夫 (Karl Wittfogel) 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 该书是“社会研究所丛书”的第三卷。

[254] 'Die Umschichtung des Proletariats und die kapitalistischen Zwischenschichten vor der Krise'.

[255] Siegfried Kracauer, *Die Angestellten. Aus dem neueste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30).

[256] Kracauer, *Schriften*, vol. 1, pp. 285–6.

[257] *Ibid.*, p. 298.

[258] Horkheimer, *Dämmerung*, p. 412. [*Dawn and Decline*, pp. 88–9.]

[259] *Ibid.*, p. 439 [引自格言“Menschliche Beziehung”, 这一格言在英译本中被删掉了。]

[260] *Ibid.*, p. 333. [*Dawn and Decline*, pp. 29.]

[261] Theodor Geiger, 'Zur Kritik der arbeiter-psychologischen Forschung', repr. in Geiger, *Arbeiten zur Soziologie* (Berlin, 1962).

[262] 霍克海默给波洛克的信, 1934年8月12日。

[263] Karl August Wittfogel, cited in Mathias Greffrath, *Die Zerstörung einer Zukunft. Gespräche mit emigrierten Sozialwissenschaftler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9), p. 316.

[264] Max Horkheimer,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ZfS*, 1 (1932), p. 1; 'Remark on Science and the Crisis', in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86), p. 4.

[265] Friedrich Pollock,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in *ZfS*, 1 (1932), p. 19; Erich Fromm, 'über Method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ibid.*, p. 47; Theodor W. Adorno,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ibid.*, p. 123.

[266] Pollock,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pp. 21, 20, 16, 27, 17.

[267] Friedrich Pollock, 'Bemerkungen zur Wirtschaftskrise', in *ZfS*, 2 (1933), p. 349.

[268] Erich Fromm,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 *ZfS*, 1 (1932), pp. 275, 276.

- [269] Erich Fromm, 'Über Method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in *ZfS*, 1 (1932), p. 51.
- [270] Horkheimer,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ZfS*, 1 (1932), pp. 4, 7, 6.
- [271] Max Horkheimer,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ZfS*, 1 (1932), pp. 136, 131–2, 133. 131.
- [272] Horkheimer,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p. 2.
- [273] Adorno,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ZfS*, 1 (1932), pp. 106, 109–10, 104.
- [274] *Ibid.*, p. 106.
- [275] *Ibid.*, p. 116.
- [276] Leo Lowenthal,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 *ZfS*, 1 (1932), pp. 93, 97, 98, 99.
- [277]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y Benton (Harmondsworth, 1975), pp. 424–8.]
- [278]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trans. C. Dutt, W. Lough and C. P. Maggill (London, 1965) .]
- [279] Fromm, 'Über Method und Aufgabe', p. 52;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p. 276.
- [280] "Goethe als Repräsentant des bürgerlichen Zeitalters", *Neue Rundschau* (April, 1932), repr. In Thomas Mann, *Schriften und Reden zur Literatur Kunst und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1968), vol. 2, pp. 88–9.
- [281] Franz Borkenau, *Der Ü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urgerlichen Weltbil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n der Manufaktur periode* (Paris, 1934), p. iii.
- [282] Franz Borkenau, 'Zur Soziologie des mechanistischen Weltbildes', *ZfS*, 1 (1932), pp. 312, 313.
- [283] Borkenau, *Der Ü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urgerlichen Weltbild*, pp. 323, 355.
- [284] Borkenau, 'Zur Soziologie des mechanistischen Weltbildes', p. 21.
- [285] Fromm,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p. 267.
- [286] Max Horkheim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ZfS*, 1 (1932), p. 44.

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共和国总理(Chancellor)。在这之前，兴登堡显然出于对纳粹一党专政危险的考虑一直拒绝这么做。就在同一天，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位于科隆贝尔格(Kronberg)的住所被纳粹冲锋队(SA)没收，并被变成了一座兵营。<sup>[1]</sup>霍克海默及其妻子在收到警告之后已经搬到了一家靠近法兰克福火车站的旅馆里。在那一学期剩下的日子里，霍克海默专门为自己雇用了私人汽车，每周一次从他在日内瓦的寓所前往法兰克福授课。在该学期所剩不多的几周内，自由概念成了他在自己开设的“哲学导论”课上讨论的惟一主题。《破晓与黄昏》一书是在1933年2月底完成于德国的，1934年才在瑞士出版。该书的序言这样写道：

这本书是过时的。它所包含的思想都是在1926年到1931年之间间或记下的断想偶得……它们总是不断地批判性地指向“形而上学”、“性质”、“道德”、“人格”和“人的价值”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它们的那种指涉方式似乎表明在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时期里这些概念还是有效的。

由于它们属于纳粹最终取得胜利之前的那个时代，因而参照的是在今日看来已经过时的那个世界。社会民主党的文化政策、同情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还有一度曾经创造了一种思想氛围的学

术马克思主义胜景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都消失了。但这本书的作者（就生活方式而言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曾经有过的思想也许在日后能引起人们的兴趣。<sup>[21]</sup>

128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时，魏特夫正在瑞士进行他的巡回讲座。他不顾此时已移居瑞士的波洛克的警告于2月返回柏林。3月2日最后一名留守的研究所正式助教洛文塔尔离开研究所和法兰克福。阿多诺那时既非声名远扬的“马克思主义重镇”，在政治上也不活跃，他“仅仅”是被留下来的“半个犹太人”。他后来在给霍克海默的一封信中抱怨说根本没有人通知他研究所最后迁至日内瓦，而且在“研究所未就该去哪里或该怎么应对作任何通知”<sup>[21]</sup>的情况下他被留了下来。

尽管当时恐怖主义盛行而且官方认可了独裁专制，可在3月为第八届国民议会做准备的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联合统治也只是赢得了51.8%的选票。但是这样的票数足够使希特勒借以提出继续扩大纳粹统治范围的要求——中产阶级的重要政党的屈从也为这一情况提供了方便，它们于3月24日通过授权法使国民议会自我解散合法化了。

3月13日警方开始调查并关闭了研究所。5月研究所大楼一层的房间全部开放，使用权归纳粹学生团所有。位于柏林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秘密国家警察（Gestapo）办公室于1933年7月14日发来通知如下：

致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社会研究所

根据1933年5月26日关于没收共产主义分子财产的法案第一条和第三条之规定，鉴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社会研究所一直鼓励种种妨害国家的行为，现为保护普鲁士自由国家之故查封并没收该研究所。

签名：全权代表 李希特－布卢姆博士

研究所唯一一位落入纳粹之手的重要成员是魏特夫。3月中旬他在试图穿越欣根的德国边界时被捕。他先后被送往好几个集中营，后于1933年11月被释放之后设法通过英格兰移民美国。

4月14日《德国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报道了为贯彻4月7日通过的“关于文职专业公务人员的重新调整”法案而采取的种种措施。这项法案的意图完全就是要把文职公务员中的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员清除出去。“第一批嫌疑分子”(这一年期间很快就会被开除国家公职和停薪)中包括黑勒、霍克海默、洛威、曼海姆、辛茨海默和蒂里希等法兰克福市的教授。这份报纸报道说：“文化部长鲁斯特博士(Dr. Rust)想要直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文职公务员法第三条款)。可以肯定，更大规模的人员变动将会在5月1日之前完成，这样可以避免扰乱新学期的开学。”与在全德国发生的情况一样，法兰克福大学从来就没有向被它清除和迫害的那些雇员伸出过援手。4月3日，法兰克福大学董事会向文化部提出申请，要求中止“我们大学和‘社会研究所’之间现有的合作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一直是松散的”。1932年10月就任校长的威廉·戈尔洛夫在任职伊始就发出过反对“沙文主义纳粹主义”的警告。1933年5月，当他被公开信奉纳粹的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提前接替的时候，他没有提交通常都要有的述职报告。<sup>[4]</sup>在4月3日就中止大学和研究所的合作关系提出的申请中，他在谈到其理由时，这样说道：“研究所的实际发展以及它的来访者圈子所依循的路线有悖于本大学的意图，在这样的事务上大学也根本无法对其施加任何影响。”<sup>[5]</sup>

129

在新政治制度最初的“革命”时期内，全国平均有14%的大学人员和11%的教授被清除出去。根据文化部的统计，在纳粹夺权后的五年中，有45%的任期内的学术职位被重新分派。<sup>[6]</sup>法兰克福是开除大学人员第二多的城市，仅次于柏林。有三分之一的法兰克福市的大学教师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像德国大学体系这样特别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保守机构是服从这种大规模清洗运动的，只要考虑到希特勒和纳粹对一切和理智相关的事物，对所有不直接为纳粹意识形态和政策服务的学术

活动的仇恨，这种情况就可以得到解释了。甚至像库尔特·里泽勒尔这样的人早在1933年也被从他的职位上清除掉了，理由是他任命不慎，“对国家不可靠”——他不仅为法兰克福引进了科默雷尔和康托洛维茨这样的“格奥尔格圈子中人”，而且也请来了社会主义者曼海姆和社会民主党人洛威。然而，里泽勒尔过去就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在1930年，他就曾经激烈地反对把法兰克福市歌德奖授予弗洛伊德，当时他说：

弗洛伊德描述的世界里的那种决定性的因果律和机械性、它的过分理性的结构、它那与人在心底深处感知的一切宇宙观念背道而驰的结构性、它把人类的不幸病态和佯装的规矩守礼作为人性的中心这一事实，都包含了大量的非歌德主义的，实际上是反歌德主义的特质……精神分析正确与否与这里的问题毫无关系。将这两个名字[弗洛伊德和歌德]放在歌德奖这个锅里做成的菜，在对这两个人各自的心灵观了然于心的公众看来，似乎只能是一道索然无味的大杂烩。<sup>[7]</sup>

- 130 在维护自己文职专业公务员的权益的时候，里泽勒尔也指出，作为负责教职任命的教务主任，他也曾任用过海德格尔、施米特、诺伊曼、鲍默勒尔等“纳粹主义代表”。<sup>[8]</sup>

“[研究所]彻底正规化”（洛文塔尔语）这一段时间之后，霍克海默3月18日从日内瓦写信给大学校长戈尔洛夫和哲学系主任洛马奇(Lomamatzsch)，提到报纸对查封研究所的报道的时候，他这样说道：

在我看来，审查的理由无可置疑。我前任的研究所主任曾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新的工人运动史文献……事实上，这些材料里面包含了许多社会主义文献。这可能会给一个局外的观察者留下政治倾向性的印象。尤其在早些年的时候，与关心工人运动问题的右翼学生相比，有更多的[研究所]学生被各种社会主义立场所吸

引，但是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我在就任研究所主任之职后，就意识到，早先的这种历史应该让研究所主任明确他的职责：务必保持研究所的政治中立性。

霍克海默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建议，告诉他该如何消除当局对研究所具有非学术倾向性的错误怀疑，而“下级的有关机构”基于这种怀疑“很可能延误，甚至阻止 [研究所] 向政府澄清有关情况”。但是，霍克海默从这两位也希望大学“正规化”的同事那里得到的答复是：非常遗憾，他们现在无法就此给出任何建议。

在报纸对他的“暂时停职”予以报道之后，霍克海默4月21日给柏林的普鲁士科学、艺术和人民教育部长去了一封将近三页的亲笔信。霍克海默是作为一名高贵而博学的市民来写这封信的。在信中，霍克海默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柯奈留斯、康德和黑格尔在他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众多的当代社会理论中，他尤其赞成用经济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的理论。

当然，我积极地运用这种理论并指出过它的认识论价值。在我看来，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必须让远离人民大众的学生学着去详尽地了解那些理论，他们将来充满激情的观点——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将源于那些理论，我认为，这乃是大学的任务之一。

他的信这样总结道：

131

就在去年的冬季学期我的课程结束时，我来到了日内瓦。研究所的许多同事都在这里与其他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他们正在就失业对家庭生活造成的影响以及与家庭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调查。上个学期州代表已经好几次准许我前来日内瓦。我暂离职位绝对与德国国内的政治事件无关。就在此期间，我负责的研究所被关

闭，我的信件被没收，最后就是在未告知对我提出的任何严重指控的情况下，对我本人采取了前面提到的那项措施——停职。我认为，这种程序对管理大学教师的高层部门来说是不相宜的。今天我不揣冒昧将我一切可能的疑虑和盘托出，因为我相信，部长先生，我应该向您呈上这份报告。

在我被任命之前或之后我从来都不属于任何政党。我试图以对哲学和科学有益的方式恪尽职责。想到要离开研究所不禁让人伤神，因为我原来一直都认为教授我的学生实在是一件幸事，我们的联系从未曾受到过任何政治风向的干扰。从历史上来说，德国大学生在全世界都数得上是最活跃最有天赋的。我不知道，当局究竟是因为断定我有罪还是因为我的犹太出身而对我采取这项措施的。当局的这两个出发点都有悖于最优秀的德国哲学传统。德国哲学要求，对它的评判必须立足于对它学说本身的评判，在哲学自身之外是不能对其学说做出任何宣判的；它们绝不是由当局任意决断的。真理无须符合统治的规则，而无论它怎么强硬、有怎样深厚的群众基础。Caesar non est supra grammaticos [恺撒也不能凌驾于语法之上]。当黑格尔说“犹太人首先是人”，“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抽象的质”时，\*他只是在表达一个哲学上的共识。发展到巅峰状态的德国古典哲学把对人类尊严的探究以及对它的信念都当成是文化上的价值标准，并认为放弃它们将会从根本上对理智生活造成伤害。对理智生活的毁败——尽管在现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既有法律没有这样谴责这种行为——最终将成为科学思想发展的桎梏。

您真诚的

马克斯·霍克海默（教授）

---

\*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4页注。——中译者注

这样的信与当时那种守法但却专政的局势一样荒谬。流亡中的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大学之间日渐增长的矛盾冲突甚至也越来越显得古怪，因为，社会研究会不得不承担格吕恩堡的退休金，而且还要为霍克海默和洛威在被开除前所占据的两个教席支付薪水，因为这两个教席是它资助设立的。<sup>[9]</sup> 霍克海默的信说不上是英雄式的，更谈不上是精明的，但却是成功的，因为它向其对手中有教养的那部分人说话，而且毫不妥协，从而以自己的方式打击了对手。作为一个流亡者，霍克海默无法取回留在德国境内属于自己的东西。对研究所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然而霍克海默写这些信的时候，他还“立即”聘请了“一位相当出色而且非常有影响的人当我的律师……他不仅成功地使当局公开表示不对研究所主任做出任何有关行为不端的起诉，而且设法使得我的全部财产得以解冻，同时获得了同意将我相当大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的许可。”<sup>[10]</sup>

1933年2月社会研究会已经被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社会研究国际协会”(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Recherches Sociales)所替代。社会研究所日内瓦分部就这样成了该研究会的官方行政总部。鉴于离纳粹德国非常近，十分危险，同时由于瑞士人对移民的态度，为学术计，日内瓦分部只能充当临时总部。在一次与赫尔穆特·杜比艾尔(Helmut Dubiel)的访谈中，洛文塔尔说：

只有霍克海默持有无限期的居留许可证，因此也只有他才能在那里拥有放置他全套家具的住所。波洛克、马尔库塞和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把我们的藏书和家具放置在日内瓦海关署的临时存放处里。我们一直只是游客。我们持有的是旅游签证，每隔几个星期我们就得穿过边境去贝莱加尔特(Bellegarde)，然后再拿着新的签证重新进入日内瓦。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困难。我们常常发现，他们对犹太移民检查得特别仔细，各种规章制度在对他们的检查中执行得极其严格。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一个信号：法西斯将要不断地蔓延到整个欧洲。<sup>[11]</sup>

研究所的领导者们特别乐于接受来自巴黎和伦敦的帮助，虽说与这两地合作开设新的研究所总部是不可能的。研究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档案中心成立了一个新的分部，当时档案中心的主任是涂尔干的弟子塞勒斯坦·布格雷（Célestin Bouglé）。1936年之前巴黎分部的事务一直由保罗·霍尼希斯海默（Paul Honigsheim）负责。他父母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法国人，而他本人以前曾是列奥波特·冯·维泽的第一任助手。在霍尼希斯海默移民之前，他一直是科隆成人教育中心的主任。伦敦方面也给研究所在伦敦社会学研究所的所在地 Le Play House 腾出了一间办公室。

巴黎分部的重要性日渐显著——它是研究所在这个城市的主要支柱，《社会研究学刊》的新出版社在巴黎分部设立了总办事处；它也是几项国际性经验研究计划的基地；最重要的是，它是研究所在欧洲的前哨。虽然耽搁了一段时间，学刊第二卷的第一版还是由原来的出版者在1933年5月发行。但随后赫尔施菲尔德告诉霍克海默说，他不再冒这个风险了。从此，学刊的印刷和发行就由巴黎的 Felix Alcan 出版社接手，这家出版社在社会学界向来享有很好的声誉。研究所向发行人认购了300册，而对方也同意在发行800册的同时加印50册。<sup>[12]</sup> Felix Alcan 出版社使得社会学刊能够继续作为学术出版物在德国发行。霍克海默在9月发行的学刊第二期第二版前言中写道：

研究所将继续投身于它的事业，将继续把社会理论作为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的科学学科而加以推进。来自几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年轻学者们组成的研究团体认为，理论乃是有益于改善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社会中的各种权力来说，概念性的思考当然有着不同的价值。从某些角度出发，概念性的思考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无益的负担，可是它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力量中又总是必不可少的。

在流亡开始六个多月之后，霍克海默还仍然像在职演说中所做

的那样，严格地对近来的突发事件和政治事件保持缄默。这是一种社会学态度，它与阿多诺在为学刊第一期撰写的谈音乐的文章中曾说的那种态度是相似的：“对它来说绝望地对着整个社会目瞪口呆是没用的，它在自己的材料和形式法则范围内将自身内部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向社会表达出来，从而更为实际地服务于社会。”霍克海默领导下的研究所一贯奉行慎重节制的政策，它不仅远离任何政治活动，而且在有组织地、以集体身份将德国事态公之于众或是向移民提供支持这样的事情上也是慎之又慎。1970年代于尔根·哈贝马斯曾问赫伯特·马尔库塞：“那么，研究所与移民中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那些组织团体有关系吗？”“那是被严格禁止的。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我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人，是哲学家和学者。”<sup>[13]</sup> 即便是对霍克海默圈子的成员这一群不幸而又万幸的人们来说，从纳粹统治之下逃离也已经使得他们真正感到惊悚不安了。然而，霍克海默圈子却也因此能够形成前所未有的团结。他们只有下更大力气去做他们以往“平时”所做的那件事情——作为怀着不被社会接受的社会目标的局外人，致力于在社会和学术体系中获得承认。研究所的领导们尽他们所能避免一切干扰，继续开展研究所的学术工作。尽管存在一系列的不利因素，可是这一努力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组成研究所核心的成员中至少有两个人都在日内瓦，他们是霍克海默、波洛克和洛文塔尔。弗洛姆当时因患结核病必须调养身体，因而在达沃斯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便这样，他仍然参与研究所的工作。从学刊在国外发行的第一期开始，马尔库塞就开始合作参与学刊的编辑，主要负责哲学评论部分。在一篇对马尔库塞关于黑格尔的书的评论中，阿多诺已经认识到，马尔库塞正在“从‘存在意义’转向对生存的阐释；从基础存在论转向历史哲学；从历史性转向历史”。<sup>[14]</sup> 马尔库塞就这样接替了阿多诺的工作，而以前哲学评论栏的文章几乎全是阿多诺在他的助手道尔夫·施坦恩贝尔格（Ddolf Sternberger）的协助下一手写出来的。（纳粹上台和研究所外迁毁了阿多诺的希望。1933年1月他还曾告诉克拉考尔说，他现在和霍克海默一道负责学刊的哲学评论栏，

这份学刊将会“成为我们的喉舌”。“我们周围的人都非常卓越”，阿多诺曾写信给克拉考尔，试图劝他加入时说，“本雅明和卢卡奇都给予我们支持，所有的哲学评论几乎都是我本人写的。而且我已经把所有不称职的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了真正有天赋的马尔库塞和施坦恩贝尔格。”)

魏特夫和格罗斯曼作为独立的研究者，他们的工作方式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魏特夫直到1934年初到伦敦之后才继续开始他的工作，而格罗斯曼则在巴黎忙于修改《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规律及其崩溃》<sup>[15]</sup>一书的法文本（实际上这本书的法文版最后没有出版）。这些都未对研究所每天都在进行着的工作造成任何影响。1932年阿多诺就为本雅明与研究所的合作铺平了道路，可直到研究所流亡瑞士期间本雅明才开始为研究所撰写文章，学刊在1934年刊出了他的题为“论当前法国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sup>[16]</sup>的文章。本雅明作为自由撰稿人靠的就是出版自由，因此像《社会研究学刊》这样的刊物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份日益重要的出版物。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33年6月写信给朔勒姆，谈到他给学刊撰写的第一篇文章（该文是他在伊维萨岛那种不利环境下写出的）<sup>135</sup>的时，说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以外的群众中发展得甚至更快。我从《社会研究学刊》就这篇谈当前法国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文章向我提出的修改建议中，可以想见瑞士的情形是个什么样子。”<sup>[17]</sup>继前一期学刊上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之后，霍克海默在头一期国外发行的学刊上发表了第二篇长文：“唯物主义与道德”。在这两篇长文中，霍克海默试图将自己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归拢到一个新确立的传统之中。他将这一传统意味深长地描述为“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学说”传统，这也正是他在许多年中对自己的立场的称呼。这种描述确立了一条线索，将某种特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与当代对社会的理解和理论洞见联系起来。

当生活从头到尾都被证明是一种幻象，对幸福的欲望被抛在一边，只剩下对幸福的渴望时，变革那些造成不幸福的外部条件，

就成为唯物主义思想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不同的历史境况下采取着不同的形态。在古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即便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也不得不面临着这样的苦恼：殚精竭虑地思索内心生活的技巧。当所有外在的手段失却效力后，灵魂的安宁便是苦难深重中惟一的退路了。相反，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唯物主义，则旨在发展对自然的认识以便获得新的控制自然和人的力量。我们本身所处的时代的痛苦是与社会的结构相联系的。因此，社会理论便构成当代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sup>[18]</sup>

这些都是霍克海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1) 一个假设：作为终有一死的、在并无“来世”可言的世界之中只能依靠相互团结而生存的人总要追求幸福——这一要求不需要任何理由，但也从未得到过满足；(2) 一个强调之点：社会历史就是人类本能结构和人类知识的演化史；(3) 一个信念：就人类控制自然的先进水平而言，人类把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实现个别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真正统一作为这种控制的目标。现在，这些观点被综合成了对一种社会理论的构想，这种社会理论对其哲学基础有着某种自觉，而且在霍克海默看来，人类通过这种理论获得了明晰的表达能力和自觉意识。他还打算出版一本唯物主义读本，把从古代到19世纪末期的西方哲学选篇收入其中。文本是否探讨“历史上的苦难和贫困、世界的无意义、不公与压迫、对宗教和道德的批判、理论与历史性实践的联系、如何实现更好的社会组织方式”<sup>[19]</sup>等问题，乃是唯物主义读本的选篇标准。

136

霍克海默确信，人类的全部愿望就是完全掌握自然，“通过理性的手段支配外部和内部的自然”。<sup>[20]</sup> 在论及黑格尔和马克思时，霍克海默将这一观念，即借助无限的理性手段完美地实现对自然的支配，描述为一种辩证的支配。在写于瑞士的“当前哲学中关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一文里，他第一次从两个方面彻底为这种支配进行了辩护。他一方面反对理性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对非理性主义。就理性主义（在霍克海默看来其主要代表形式就是实证主义）而言，它只将当代的诸种科学学科当作合法的知识

形式，认为思辨思想没有能力从整体上探讨社会问题。霍克海默因此指出，这种理性主义只是一种有缺陷的、僵死的、枯竭的理性形式。就非理性主义（在霍克海默看来，例如生命哲学 [Lebensphilosophie] 和生存论哲学等等学说就是其代表）而言，它把思考当作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加以谴责，而在面对生活中的关键问题时只会去依赖心灵和直觉的决断。因此这种思想流派更不需要什么理性。霍克海默认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时期，那些无法从整体把握事实却又高估自己能力的个人必然会表达出那种理性主义。相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大多数中产阶级也会产生日益严重的无能感，并因而产生那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形式。非理性主义，就是个体向更大的，然而也是更加难以理解的整体屈服的一种表现形式。按照霍克海默的说法，

非理性主义正确地意识到了理性主义的破产，但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它没有从如何组织起一个与人类实际可获得的资源相符合的世界的角度出发对那种片面的思想和个人主义予以批判。相反，它没有在根本上触动导致了今天的境况的那种经济法则，却在为掌握着经济权力的那些人，也就是经济力量的代表们服务，鼓励对他们的盲目的认可，要求人们服从于所谓更大的普遍利益。<sup>[21]</sup>

137 霍克海默没有把这些文章中讨论的论题进一步发展成经验研究的材料或主题。研究所在流亡瑞士期间实验研究工作重点所发生的转移，绝不是出于哲学观念的推动（霍克海默在就职演讲中提出的把哲学、科学学科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要求，也许是出于这种原因），也不是参与合作的研究者商量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转移。对特别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内家庭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的研究，取代了对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熟练工人和白领工人的群体内部物质和精神文化之间的社会心理调节机制的研究。安德里斯·施坦恩海姆（Andries Sternheim）曾写过一篇“关于失业与家庭问题的新材料”，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1933年第三期上。这份报告中

的一个注脚说：“长期失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中个体间的关系（尤其是心理、精神关系），近来社会研究所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此类问题进行有组织的调查，从而使得这种变化的程度问题得到了研究。”<sup>[22]</sup> 施坦恩海姆是一位荷兰社会学家，霍克海默说他是一个“正直、勤奋的人”。日内瓦国际劳工署向霍克海默举荐施坦恩海姆，1934年当波洛克去美国后，施坦恩海姆接任研究所日内瓦分部主任。

研究重点的转移一方面意味着研究对象规模的缩小（从阶级到家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象规模的扩大（从阶级特征明确的对象到阶级特征不明确的对象）。同时，对弗洛姆和霍克海默来说，这种变化也意味着他们长期以来都具有的那种预见现在显示了其重要性。在弗洛姆首次为《社会研究学刊》撰写的文章中，他就顺带提到过，在既有的“权威型”社会产生严重危机时，“一个社会在经济、社会、心理上越解体，把社会凝结成一整体的统治阶级的那种统一的、强制的力量越涣散，各个阶级的心理结构差异也就越大。”另外，他也还指出过在他看来随着家庭结构中阶级属性的日益增长，社会整体的发展的可能方向是什么：“情感关系，比如说资产阶级中、父系社会中的父与子的情感关系，完全不同于母系社会‘家庭’中的那种情感关系。”<sup>[23]</sup> 他在为学刊撰写的第二篇文章中谈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客观上最先进的那部分的“性器欲特征发展”前景时，也预见到了“父亲权威在心理领域中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与母亲相关的那部分性格的增长”。这些想法在他1934年撰写的“母权制学说的社会心理学意义”<sup>[24]</sup>一文中成为了中心性的观点。但甚至在这之前，罗伯特·布里富尔特（Robert Briffault）为学刊撰写的，加上了弗洛姆引言的关于“家庭情感”的文章，就已经明确地说出了弗洛姆和霍克海默的想法，指明了家庭研究中那个大有可为的新领域。

布里富尔特是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生于英国，18岁的时候移居新西兰，后来移居美国，当时住在巴黎。1927年他发表了一部三卷本的著作：《母亲：情感和制度起源研究》，试图说明，母亲和后代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以母亲为中心组织起来了最早的社会，而由父

亲主导的家庭只是后来发生的有利于个人继承私有财产的经济变化的结果。布里富尔特希望以此封住那些父权社会辩护者之口，使他们无法再说他们只是在为从来都是如此存在的社会基础而辩护。在“家庭情感”一文中，布里富尔特重申并归纳了他的这些观点，最后他提出了谴责：家庭纽带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的、父权家庭”总是要求它的子女放弃他们自己独立的发展。他在结尾时表达了一种预期，认为个人主义的、竞争型经济的严重危机不断增长将会使父权家庭走向衰落，那时不再以竞争为其典型特征的社会最终将会使社会情感能够超越狭隘的、扭曲的家庭圈子，并因而得以解放。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家庭中发生的这些变化有可能改变家庭再生产父权制特征的这种作用，但是会不会也瓦解了建立在这种父权制形式之上的无产阶级团结（霍克海默在《破晓与黄昏》中就曾思考过这种团结<sup>[25]</sup>）？直接参与经验研究的那些人中，无论是合作研究者安德里斯·施坦恩海姆、还是波洛克和洛文塔尔，似乎都没有澄清这一问题。1934年中期，那时为发表这项集体研究的结果而撰写的初稿已经写成，直到那时，已经到了美国的霍克海默和弗洛姆才有些懊恼地注意到，日内瓦方面的专家们认为关键是对一般家庭，而不是对家庭权威的研究。<sup>[26]</sup>这不仅意味着研究中责任划分不当，而且也意味着这些理论家们渐渐开始认识到权威这一主题不仅具有社会动力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且对安排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来说也应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霍克海默曾于1937年初在研究所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举行的午餐会上提交过一份报告，报告说：

我在研究所工作的最初两年全部用于此类合作（在不同科学分支之间、理论科学与经验科学之间的合作）的实验研究。我们最终为这类共同研究选取的最富有成果的论题就是探讨权威这一文化现象与经济生活从常态到大萧条转变之间的关系。然而权威问题领域太过宽泛，以至于无法穷尽式地研究。我们因此选定了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加以研究。这一机构在权威关系方面，以及与经济生

活事件相联系的方面发生的变化最容易被观察到。这一机构就是家庭……我们接着就通过各种方法，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内开始从这一视角出发对家庭展开研究。

在流亡瑞士这一段时期，研究所开始了三项各自独立的问卷调查。

(1) 1933年研究所开始在法国城市家庭中间发放一份问卷，这些家庭的男主人都是失业至少六个月以上的白领或熟练工人。问卷除了对工作环境、收入和食宿等问题提问之外，还包括关于闲暇时间的使用问题、失业引起的家庭关系变化问题，以及失业给家庭成员个体带来的有利的或不利的后果等问题。最后，这次问卷调查还试图就被调查者对一些特殊问题（比如，“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当今最伟大的人物是谁”等问题）的反应做出分析。问卷的这种设计方式使它无法由被调查者本人单方面完成，而必须靠经验丰富的调查者来完成。由于难于找到足够的完成这项任务的助手，这个问卷研究计划在最初阶段就搁浅了，后来只是作为一项在法国失业者中间进行的有关家庭和权威问题的“尝试性调查”被收入《权威与家庭研究》。

(2) 1933年末，日内瓦分部在瑞士、奥地利、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发放了一份问卷。这就是《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就权威与家庭问题给专家的问卷”。总共有589份问卷被发放到专家们手中，他们包括学院和大学里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师、少年法庭的法官、社会工作者、牧师和神父、青年工作者、中学教师和家庭监护人。问卷中有十六项问题涉及如下主题：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的权威，家庭关系中权威的变化，家庭的经济支持与权威的关系（有一个问题这样问：“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是总是和他是主要的工资收入者这一事实相关呢？”），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性格形成的影响。这些专家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观察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异也决定了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的不同。于是，调查者把收回的问卷做了归类，有99份适于对工人阶级的

分析，27份适用于对中产阶级的分析，还有24份适于对乡下农民阶层的分析。

140

这份问卷调查的报告后来被收入安德里斯·施坦恩海默和恩斯特·沙赫特尔(Ernst Schachtel)编的《权威与家庭研究》一书中。后一个编者是弗洛姆在海德堡大学时期就结识的一位好友，在研究所长期担任助理研究员。我们可以预见这份研究报告的那些结论。反馈回来的251份全部被做完的问卷表明，不同阶级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相对于工人阶级家庭来说，乡村农民家庭似乎代表了更为极端的父权家庭类型”。<sup>[27]</sup>当然还有其他结论。专家们还注意到父母权威影响力的下降，青少年独立性的增长，或者两种情况并存的现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与失业、战争、闲暇时间的使用、道德状况恶化、非宗教化等问题相关。

此外，还有一项需要做补充性问卷调查的研究计划，这个补充问卷涉及诸多问题，如失业给家庭团结带来的后果、青年关于性道德的观念等等。但是这个计划最后被取消了。

(3) 1933—1934年研究所在日内瓦分部、巴黎分部和伦敦分部就权威和家庭问题在青少年中进行调查。瑞士的调查进行得最成功，这些调查材料在后来的《权威与家庭研究》中也使用得最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克特·莱希特(Käthe Leichter)负责这份问卷的起草和落实具体调查工作。她出身于维也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犹太家庭，是卡尔·格吕恩堡的学生和朋友，曾和他一起在“奥地利社会化委员会”工作。格吕恩堡曾邀请她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他的研究助手，可是由于她当时还有别的工作，没能接受格吕恩堡的这一邀请。多尔弗斯(Dollfuss)政权1934年2月在奥地利激起的暴动失败后，她秘密移民到瑞士。在瑞士，她先后于1934年和1936年为社会研究所工作。(1938年她在维也纳落入盖世太保之手。1942年包括她在内的1500名犹太妇女被用运送牲口的大闷罐车从马格德贝尔德附近的拉文斯布律克[Ravensbrück]集中营转移到别的地方，在转移途中，她们被党卫军押

送者用“试验气体”杀死。)

1000名瑞典青年回答了这份问卷。这份问卷不仅包括与青年本身有关的问题，而且包括13个涉及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生活问题。(比如，这些问题包括：“你经常就你自己的难题向你的父亲或母亲求助吗？为什么？”；“作为孩子，你受到过体罚吗？”；还有从那次对工人阶级进行的问卷直接拿过来的问题：“当你有了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会体罚他们吗？你的教育方式可能是严厉的的还是宽松的？”，“你最敬重的当今伟人是哪一位？”)回答这份问卷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和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年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但是，在她为《权威与家庭研究》对这些材料做出分析的时候，她却就家庭结构按照社会结构分化的问题得出了下面这样的结论： 141

尽管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可是在社会心理方面却又不尽然。对工人阶级的调查已经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说工人阶级中也存在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结构。在瑞士这种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心理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差别主要是生活标准的差别。这也就是说，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只能区别经济条件好的中产阶级和经济条件差的中产阶级。我们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不想混淆不同的经济范畴，但是我们要强调说，我们在按照社会差异来区分权威结构时，则必须考虑到这一观点。<sup>[28]</sup>

因为失业仅仅从1933年以后才开始在瑞士成为问题，所以对经济危机时期家庭结构变化问题的调查成果不是很显著。保罗·拉萨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后来对一半做完的问卷进行了分析，但也没有对阶级特征明显的家庭结构变化问题拿出什么结论。

法国分部方面收回了1651份问卷，可是在法国进行的对青年的研究成果却更少。为《权威与家庭研究》草拟的报告也仅仅对法国显然未受动摇的父权家庭，对父亲是受尊敬的一家之长而母亲是可信的体

已知交这种家庭角色分别作了泛泛之论。伦敦分部 1934 年起开始发放问卷给各种组织，让它们的成员填写。而这些问卷显然一直就没有被分析过。<sup>[29]</sup>

142 这项研究缺乏广泛的基础，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调查不够系统。这次研究没有建立在精神分析阐释可能性的基础上，它惟一的新颖之处就是有关青年与他们父母之间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可能的变化的那些问题。当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之中的时候，为《社会研究学刊》1934 年夏季号撰写的那些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霍克海默圈子对纳粹胜利所做的跨学科的第一反应。马尔库塞的“反对极权主义国家观中的自由主义的斗争”、弗洛姆的“母权制学说的社会心理学意义”，以及曼德尔鲍姆和迈耶尔的“论计划经济的理论”（霍克海默作序）一起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已经全然暴露在极权主义状态之中。“自由权威主义向极权权威主义的过渡发生的基础完全就是同一个社会秩序”，马尔库塞如是说。“极权权威主义国家制造出适合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学说”，<sup>[30]</sup> 弗洛姆说：

社会的种种矛盾在限制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造成了退化性的心理发展，强化了父亲中心情结，这一点可以在反马克思主义斗争中形成的各种运动中看得出来。在理当追求全人类都应享有幸福的地方，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表征（ideological representative）却再一次把责任感放置在它们价值体系的中心位置。然而，由于经济情况的关系，这种责任感已经没有任何经济内容，而仅仅是一种空洞的要求，要求人们去履行一种英雄式的行为，要求他们为了集体而承受苦难。<sup>[31]</sup>

“现在人类在自由经济和极权国家秩序之间根本没有选择余地”，霍克海默写道，“因为前者总会转向后者，这正是因为后者在今天能够最有

效地为自由主义要求服务，使得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的私有权得以继续。”<sup>[32]</sup>曼德尔鲍姆和迈耶尔总结说：

因此，凡是想依靠中产阶级的帮助实现社会主义，并在一种并非暂时的基础上和他们达成权力和政策妥协的人，尽管他们怀有世界上良好的愿望，也仅仅只能实现某种形式的社会化——充其量也只能实现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在现在这个时代，那种社会主义实际上只能是受到国家资本主义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二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根据共同的基础组织起来的。<sup>[33]</sup>

意识形态批判家马尔库塞、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经济学家曼德尔鲍姆和迈耶尔、社会哲学家霍克海默，他们就这样一致地从共产主义角度对时代进行了阐释，这种阐释认为，法西斯主义不仅是自由主义的逻辑后果，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所采用的政治统治形式。他们诊断中的共同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这种跨学科方法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这里缺乏新发展：从不同的材料和视角中，他们没有发展出能激发他们深化或辨析理论的新东西，也没能发展出刺激他们去进行更为精确的、立意更新鲜的经验工作的新东西。尽管如此，相比之下弗洛姆仍然是研究所最具有创造性的主要研究人员。

在瑞士的流亡仅仅是暂时的。一方面，除了他们很少有同情者之外，人们都反对他们将巴黎或伦敦分部发展成研究所总部。但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则是，霍克海默圈子的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将要席卷欧洲。波洛克的研究助手朱利安·库姆佩尔茨出生在美国，是美国公民。社会研究所于1933年就把库姆佩尔茨派去美国摸清楚各方面的情况。弗洛姆以前就曾经访问过美国，1933年末又应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之邀再次访美，而此时社会研究所的未来还尚属未定之天。后来库姆佩尔茨和弗洛姆汇报的关于美国的情况使得他们顿生希望。因此，社会研究所的领导者们开始认真考虑移民美国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对新世界还心存疑虑。霍克海默希望在最终作决定之前亲自实地考察一番。在偕夫人开

143

始他的长途旅行之前，霍克海默又再一次探访了研究所的巴黎分部和伦敦分部。1934年2月10日，他从巴黎写信给当时尚在日内瓦的洛文塔尔说：“明天我们就要去老英格兰了。天气很凉爽。再见……”4月26日，他和麦顿在勒阿弗尔登上了“乔治·华盛顿”号轮船。39岁的霍克海默开始了他的北美之行，以便作出决定：研究所是不是应该落户在美国的什么地方。

一周后，也就是5月3日，这对夫妇抵达纽约，朱利安·库姆佩尔茨在港口迎接他们。霍克海默在到达不久写信给波洛克说：“由于身体原因我兴致不高，即使我可以肯定这里比欧洲情况要好——欧洲那里的一切看上去越来越黑暗。”他的妻子充满热情地写信给波洛克说：“纽约是个巨大的城市，如果你没有亲眼见过你就根本不可能想像得到它是个什么样子，简直难以置信，太美妙了——巴黎、伦敦，整个欧洲相形之下就像是非洲的村庄！”

几周后，霍克海默本人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决定，事情将会按着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已经有了眉目。他当时生了病，他的妻子也身体不适。他们都住在中央公园一家豪华的饭店里，那里比纽约的任何地方都要更凉爽、安静，也更适合他们居住。霍克海默5月27日写信给波洛克说：

从整体上说，我的印象是，与欧洲相比世界上这个地方更适合于未来几年中的平静的学术工作。那里的报纸上的消息每天都让我担惊受怕。但是必须承认，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也并不是一片大好的。实际上，这里的事情比我想像中的要糟得多。我们必须对经济局势的急剧恶化有思想准备。正是在这一考虑的基础上，我开始了解加拿大的情况。另一方面，我认为这里肯定还是能够容得下与世隔绝的学术工作的，而这很快在欧洲就会成为不可想像的事情了。

144 当然，我们是作为互不相干的私人学者去工作，还是成立一个类似于社会研究协会的组织，还是一个问题。G [库姆佩尔茨]向我担保说，这里所有人都建议我们建立组织，但实际上那不可避免

地要打上官方的招牌。

当时已经明确了一点，那就是，研究所的主要成员都要来到北美。霍克海默极其明确地意识到，纽约将会成为在美国最有利的基地（尽管他曾经希望在加拿大找一个更小、更安静的城市，在那里他们的团体可以永久地定居下来）。然而，他当时还拿不准哥伦比亚大学的态度。

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常春藤联合会的成员，是一所在美国享有极高声誉的大学。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 1855—1931）创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大系——社会学系。吉丁斯是美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1894年在哥伦比亚成为美国第一位正式社会学教授。1930年代中期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代表人物是罗伯特·S·林德（Robert S. Lynd）和罗伯特·麦克伊维尔（Robert MacIver）。库姆佩尔茨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起来的联系持续而富有成效，这多亏了林德的善意态度。自1931年以来林德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如果拿新政那一代的左派自由主义为标准来衡量，林德就是一位左翼激进分子，他还是共同体社会学的先驱之一。1929年他和他的妻子共同发表了《中型城镇》，这是一部经验研究著作，其研究对象是蒙西镇——印第安纳的一个工业城镇。这本书很快成为一部社会学经典著作。这本书对细节描述充满热情，它的研究表明，这个城镇的人口可以很明确地被划分为“工人阶级”和“商人阶级”，而城镇就是属于“那里的上层阶级”的。<sup>[31]</sup>（林德在1937年发表了《转变中的中型城镇》，对阶级矛盾的扩大和未来某种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还于1938年发表了一本名为《求知为何？》[*Knowledge for What?*]的书，这两份东西能够更清楚地证明林德与批判社会学的亲合性。）林德似乎并不认为来自法兰克福的学者们是他可能的竞争者，毋宁说他认为他们的到来将会强化他所支持的那种社会学研究。他把法兰克福的这个学术团体介绍给了他的同事、社会学系主任罗伯特·麦克伊维尔。从1927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政治科学教授的罗伯特·麦克伊维尔采纳了林德的建议，并竭力劝说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olas Murray Butler）为法兰克福的学人们提供帮助。巴特勒是个保守

主义自由派，1902年以来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还是1921年美国副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

1934年6月4日麦克伊维尔致信巴特勒：

145

亲爱的校长先生：

近悉，成立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学者团正准备落脚本国。他们的《社会研究学刊》是一份广受认可并极具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幸运的是他们把研究基金放在德国之外——就他们再也无法在法兰克福继续他们的研究这一事实而言，他们这样的一种处境是幸运的。他们急切地希望得到来自美国大学的认可。就我所知，芝加哥大学，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向他们发出了邀请。但是他们更希望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联系。正是由于这最后一点原因，我们尚不可能制定出确定隶属关系的日程表，而且在决定采取何种步骤以使他们隶属于我们之前，我们无疑还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周密的考虑。如果哥伦比亚大学可以为他们提供机构安置方面的便利条件的话，我建议，在表达最良好的善意的同时，我们可以开始与他们建立更进一步的联系。<sup>[65]</sup>

巴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么快，这么轻易地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慷慨邀请，把霍克海默搞糊涂了。在一次库姆佩尔茨安排的与林德的会晤中，霍克海默问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决策者，最主要的是校长，是否了解研究所的出版物。林德给出了极其肯定的回答。在会晤完毕之后，库姆佩尔茨向霍克海默保证，在作出关键性的决策之前，林德给有关方面传看了研究所的出版物。其实，有关方面对他们出版物的认识充其量不过是来自于对德文版出版物的快速浏览，或是对几篇英文概要的阅读。就此而论，霍克海默采取的避免马克思主义名词和惹眼术语的策略的确是有效的。

大学有关负责人还是希望从林德那里得到书面的担保，以确保如果被安排教学任务或被委以系里的任务，研究所能够按照校方希望的

方式行事。对此，林德是这样表态的：

总的来说，在这种事情上惟一可能的麻烦是，研究所支持激进自由主义。我就此已经提请麦克伊维尔注意，我知道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读了一点他们的书，也和库姆佩尔茨谈过，通过这些我知道下这样的结论是中肯的：他们是具有高水准的研究机构，而且对宣传无甚兴趣。

大学从没有从库姆佩尔茨那里收到任何文字性的要求。

我通过旁人了解到，库姆佩尔茨考虑到他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要求有可能被驳回，因此他不打算公开提出要求，倒是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主动发出邀请。这完全不难理解——只要想一下会谈从头到尾的基调就清楚了，他一直都在强调与大学的松散的隶属关系，我们政治科学系可以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为我们的人员安排一到两个职位，但是他们要保持彻底的自主权。<sup>[37]</sup>

146

校方对实际的事务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了——为“库姆佩尔茨的团体”提供三到四年的建筑使用权。但是霍克海默仍然犹犹豫豫，并委托律师对整个事情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直到七月中旬他才最终接受了哥伦比亚提供的帮助，接受了第117大道429号的为期三到四年的办公地点，当然该处的任何修缮费用全由研究所承担。

霍克海默犹豫不决，这不仅是他的过分小心，或是缺乏决断的性格造成的，而且因为他还在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地权衡：一方面想继续研究，另一方面又想从事学术事务的管理，行使权力；一方面渴望着完全的独立，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安全的保障和官方的认可。后来之所以形成了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包围下的父权制结构的孤岛式小团体圈子，实际上根源于他的这种摇摆心态。在流亡的境况之中，霍克海默的支配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他的同事们也比以往更依赖他，作为独立

的左翼知识共同体的研究所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具有吸引力。

弗洛姆曾在5月底去过美国，并逗留一月。“我经常想起这四个星期，当得知我们将能够把那样的时光延续下去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1934年7月在因健康原因前往新墨西哥位于圣达菲附近一家诊所的途中，他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这么说。返回之后，他将自己的精神分析诊所迁至纽约，并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这样他再一次地与研究所联系在了一起。尽管他自己认为，他是个不合群的人，在美国无论何时他的精神分析诊所也能够使他过不依赖研究所的独立生活，尽管当时他是那么专注于他的精神分析诊所，可是他对他和霍克海默的合作还是十分重视的。就霍克海默这方面而言，霍克海默意识到弗洛姆是独立于他的，并把他当作有着同样权利的理智上平等的伙伴来对待，因为他知道弗洛姆对研究所的理论工作和经验性工作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47 第一个与霍克海默联合的人是7月初被他从日内瓦带出来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日内瓦派不上用场，所以他来美担任霍克海默的哲学合作者，共同开展哲学讨论。霍克海默希望从哲学讨论中能够为他以唯物主义逻辑为主题的书写提供素材和灵感，他从1930年代早期就一直在筹划写出这样一本书。在那些年中，阿多诺、马尔库塞和柯尔施都时不时地为霍克海默的这个哲学计划工作。在研究所领导者看来，马尔库塞是一位能力有限的哲学文献专家。波洛克甚至说要把马尔库塞放在“助理和助手这种次要位置”上——尽管说这话是为了反驳阿多诺的意见，当时阿多诺要求把马尔库塞弄出研究所，这样他就能取而代之。<sup>[28]</sup>最主要的是，由于马尔库塞以前有过师从海德格尔的经历，所以他被视为尚待长期查看并需要学着接受正确理论的人。马尔库塞本人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1935年底为《社会研究学刊》重写他的论文“论本质的概念”时，他写信给霍克海默说：“我将在美国住满整一年了，此时我想对你说，作为这个包容宽大的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我的感受是多么强烈。我相信我学了很多，并因此要向你表达我的谢意。”<sup>[29]</sup>

接着霍克海默在8月初把洛文塔尔带了进来。因为那时他急需帮

手在新学期开始之前起草好研究所的计划书。霍克海默需要波洛克做助手，因为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霍克海默 1934 年 7 月收到了一封洛文塔尔的来信，信中说开往巴黎的火车载着马尔库塞驶出车站的时候，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当时是多么想和马尔库塞一道离开，赶紧结束他与霍克海默的分离。当时洛文塔尔的想法是，尽管还要挨过艰难的几周，可霍克海默已经能够调集一切力量要美国方面为他开具证明，也确实能够建立一套广泛而复杂的关系网了。至于对研究所的想法——波洛克此前某个时候曾把准备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联系的计划告诉了他——洛文塔尔认为应该像对国际社会研究协会的安排一样：所有职位都应该在核心成员小圈子之内来分配。当洛文塔尔最后终于可以离开日内瓦去和霍克海默会合的时候，他不得不留下他从德国革命以来开始收集的思想激进的藏书。霍克海默担心如果美国海关打开洛文塔尔的书箱子的话，研究所的成员们都得直接被驱逐出境。<sup>[10]</sup>

8 月底波洛克也和霍克海默重逢了——不过是在魁北克，当时霍克海默一家正在短途旅行，穿过加拿大，在那里歇脚。与霍克海默相比，波洛克在同意哥伦比亚大学计划之前甚至更犹豫不决。他担心他们这个密谋家集团的任务会受到影响。他写信给霍克海默说：“表面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功。但由于我们考虑周密而对这种成功抱有怀疑。利克斯[指费利克斯·韦尔]一定会为了这个成功乐得大喊大叫，如果你写信告诉他的话……但是我担心你的工作就完了，所有人的工作加起来都没有你的工作重要。”<sup>[11]</sup>当魏特夫于 1934 年 9 月底也到了美国的时候，研究所的常备军除格罗斯曼之外重又会聚一堂。整个转移的过程就算结束了。国际社会研究协会的总部还保留在日内瓦，可是纽约分部已经成为了研究所的中心，而此时的研究所也改称（用英文书写的）“国际社会研究所”，“二战”期间又去掉了“国际”二字。

148

## 注释：

[1] W. Gerloff, lawyer, to the Landg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Court of Restitution and Compensation (*Wiedergutmachungskammer*), 21 June 1949.

[2] Max Horkheimer, *Dämmerung* (Zurich, 1934) [英译本前言只收入了这一部分, *Dawn and Decline: Notes 1926–1931 and 1950–1969*, trans. Michael Shaw (New York, 1978), p. 13.]

[3] Adorno to Horkheimer, Oxford, 2 November 1934.

[4] Cf. Gerda Stuchlik, *Goethe im Braunhemd. Universität Frankfurt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4), pp. 88–89.

[5] Cited by Wolfgang Schivelbusch, *Intellektuellendämmerung. Zur Lage der Frankfurter Intelligenz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Frankfurt am Main, 1982), p. 94.

[6] Karl Dietrich Erdmann, *Deutschland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National Sozialismus, 1933–1939* (Munich, 1980), p. 171.

[7] Cited in Schivelbusch, *Intellektuellendämmerung*, p. 88.

[8] See Kurt Riezler, *Tagebücher, Aufsätze, Dokumente*, ed. Karl Dietrich Erdmann (Göttingen, 1972), p. 144.

[9] Cf. Schivelbusch, *Intellektuellendämmerung*, pp. 95–6.

[10] Horkheimer to Adorno, 16 November 1934.

[11] Leo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Berkeley, 1987), p. 56.

[12] Alcan to Horkheimer, 20 June 1933.

[13] Jürgen Habermas et al. *Gespräche mit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p. 19.

[14] In *ZfS*, 1 (1932), p. 410.

[15] Henryk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16] Walter Benjamin, 'Zum gegenwärtigen gesellschaftlichen Standort des französischen Schriftstellers', *ZfS*, 3 (1934), pp. 54–78.

[17] Benjamin to Scholem, 29 June 1933, in *Walter Benjamin-Gershom Scholem, Briefwechsel*, ed.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 am Main, 1980), p. 83.

[18] 'Materialism and Metaphysics', in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86), p. 24. 'Materialismus und Metaphysik', *ZfS*, 2 (1933), p. 14. 中文版参考《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

社 1989 年版, 第 22 页。

[19] Cf. Marcuse and Horkheimer to Bloch, 6 May 1936, in Ernst Bloch, *Briefe 1903–1975*, ed Karola Bloch et al. (Frankfurt am Main, 1985), vol. 2, pp. 674–5.

[20] Max Horkheimer, 'Zum Problem der Voraussage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ZfS*, 2 (1933), p. 412.

[21] Max Horkheimer, 'Zum Rationalismusstreit in der gegenwärtigen Philosophie', *ZfS*, 3 (1934), pp. 50–1.

[22] Andries Sternheim, 'Neue Literatur über Arbeitslosigkeit und Familie', *ZfS*, 3 (1933), p. 413.

[23] Erich Fromm, '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ZfS*, 1 (1932), p. 36, footnote 1; p. 35.

[24] Erich Fromm,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utterrechtstheorie', *ZfS*, 3 (1934), pp. 196–227.

[25] See p. 115 above.

[26]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6 July 1934; Fromm to Horkheimer, 15 July 1934.

[27]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Paris, 1936). P. 317.

[28] *Ibid.*, p. 364.

[29] *Ibid.*, pp. 449 and 445.

[30] Herbert Marcuse, '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ZfS*, 3 (1934), pp. 174–5; translated as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Mass., 1968), pp. 3–42.

[31] Erich Fromm,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utterrechtstheorie', p. 226.

[32] Kurt Mandelbaum and Gerhard Meyer, 'Zur Theorie der Planwirtschaft', *ZfS*, 3 (1934), introduction by Horkheimer, p. 230.

[33] *Ibid.*, p. 261.

[34] Cf. Ralf Dahrendorf, *Die angewandte Aufklärung. Gesellschaft und Soziologie in Amerika* (Frankfurt am Main, 1968), p. 52.

[35] Cited in Lewis S. Feuer, 'The Frankfurt Marxists and the Columbia Liberals', *Survey* (Summer 1980), p. 157.

[36] Horkheimer to Pollock, 21 June 1934.

[37] Lynd to Fackenthal, 25 June 1934, cited in Feuer, 'The Frankfurt Marxists', p. 163.

[38] Adorno to Horkheimer, 13 May 1935.

[39] Herbert Marcuse, 'Zum Begriff des Wesens', *ZfS*, 5 (1936), pp. 1–39; Marcuse to Horkheimer, 13 December 1935.

[40]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pp. 48–9.

[41] Pollock to Horkheimer, 21 July 1934.

### 第三章 在新世界（上）：从事社会批判研究的独立研究所

149

#### 权威与家庭研究：集体的“推进研究”片断

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伴们到达美国的时候，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上台刚一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似乎也快要过去了。1933年初，美国的失业人口超过了1400万。1932年至1933年从美国离境移居国外的人口比移居入境的人口多出57000人——这一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霍克海默圈子入境的这个时期，美国政府比较同情知识分子，并打算给他们委以重任。按美国标准来讲，这是一个左派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受人欢迎的政府。许多赴美团体带来了大量资金，而且他们来的时候那些为了躲避纳粹的美国入境移民人数还不是很多。在《社会研究学刊》一篇题为“美国政党系统的社会学”的文章上，库姆佩尔茨断言美国政党体系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种政党体系实践着“为既定的政治体系所要采取的措施制造认同的政治艺术”。<sup>[1]</sup>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罗斯福上台第一年，他的政府就努力用非同寻常的方法尽量减少经济危机的影响，那些措施就是人们常说的“新政”。可是波洛克却说，这个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德国政府在精神上相似，是国家资本主义介入和选举制度下的独裁。我们且不谈这些问题——霍克海默圈子毕竟又可以集中精力进行他们手头的研究了。

流亡美国的头一年，研究所就它的集体研究发表了第一篇报告书——

150 《权威与家庭研究》。<sup>[2]</sup>除了连续发行的学刊之外，研究所在以后的20年里还不断地发表这样的研究报告。霍克海默曾经一再提到“各学科的代表之间的持续合作，以及理论建构与经验方法之间的融会贯通”（他在《权威与家庭研究》的前言中又这样重申），而他所强调的这一切，都很好地体现在了《权威与家庭研究》一书中。

“马尔库塞带来的稿子似乎对我没什么用”，1934年7月初霍克海默写信给日内瓦的洛文塔尔这样说，而这时马尔库塞刚到纽约。在写完论文“德国战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sup>[3]</sup>后，洛文塔尔又打算开始着手写一篇关于唯物主义美学的论文，而此时波洛克又请他出谋划策，一起为问卷和汇报上来的材料进行分类，并委托他负责组织这个研究结果的出版工作。波洛克经常在没有与霍克海默和弗洛姆商量的情况下决定各种具体的研究主题，当时他有一个想法，希望开展有关家庭结构转型的国际合作研究。

我最近已经意识到，这里[日内瓦]搞的材料整理的出版计划对家庭研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它关心的不是家庭中权威的问题。这种出版计划把各种各样的材料都囊括进来，这不仅不科学，而且甚至更糟。就我现在的想法而言，我们目前最多只能出版250页左右的一卷本。马尔库塞可以负责撰写家庭问题在文献中的反映（利用施坦恩海默的报告和这里的图书馆），波洛克或者由他指导的经济学家可以负责撰写关于经济的那一部分，弗洛姆可以撰写关于精神分析的那部分，至于你，要和我保持联系，负责撰写一般（“社会学”）理论的部分。我们应该定期召开碰头会确定这些文章的总指导方针，文章应以形成一套关于家庭的唯物主义理论为目标，这种理论应该涵盖家庭的方方面面，应该由各种假说构成。<sup>[4]</sup>

这些假说围绕一个问题形成，那就是家庭权威乃是社会粘合剂的一种。包括问卷在内的所有其他材料将以附录的形式出现，霍克海默在后来

的一封信中说，它们可以说明“我们的观点不仅仅源于直觉，而且是在对这一知识领域的广泛研究活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sup>[5]</sup>

霍克海默原不打算作为作者之一在书中出现。他认为发展辩证逻辑才是需要自己完成的更重要的任务。但是也许因为他渐渐清楚地意识到，研究所的第一份报告对它在新世界的形象至关重要，所以最后还是自己写了一般理论的那部分。他探讨的“这许多范畴其真正意义是逻辑上的”，<sup>[6]</sup>这是他写作这部分的一个根本前提。

最后这个研究报告出成了一本 1000 多页的书，其主要部分由三篇文章组成（计划中关于经济的那篇文章最终没有写成）。这本书多出了两个部分，却没有像原来计划的那样附有附录。两部分中第一块由问卷材料组成，第二部分则是关于调查和文献的报告，这两个部分都要比理论部分篇幅大。理论部分根本没有涉及问卷材料，也没有涉及调查和文献报告，这一情况极具戏剧性地说明了“理论建构与经验方法之间的融会贯通”的范围是多么有限。同时，霍克海默和弗洛姆的通信表明，经验研究以及他们对其他各种科学学科动态的自觉了解，为研究所的这两个主要理论家充当了保护屏障。在这样的保护屏障之下，他们追求的理论一方面能够自觉地与纯哲学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能对科学的不同分支和经验研究持一种怀疑态度，并保持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性。

他们本来打算把“理论纲要”当作全书的中心，后来书的出版也是这样安排的。这些文章由三篇相关的论文组成了一个理论三重唱，实际上这样的文章也适合于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与以前发表的作品相比，霍克海默的文章几乎没有包含什么新东西。他只是尽可能地在文章中使用“权威主义的”或“权威”这样的词语。在谈到非计划的经济过程产生的难以让人察觉的作用时，他说到了“物化了的经济权威性”和“经济事实的权威性”。<sup>[7]</sup>马尔库塞论观念史的论文与书的第三部分里他所写的关于科学文献的研究报告相比，其典型作用就是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从而为其他两篇文章论资产阶级权威结构时所表现出的相同观念提供支撑——对资产阶级权威结构的分析是这两篇文章的中心内容。

书中所收的弗洛姆的论文是他所写的论文中最出色的，尽管它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发展出了什么新思想，不如说是发现了已有思想的简明表达方式。

152 他的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创造了施虐—受虐人格或权威主义人格的概念，这是他以前文章中使用的一系列概念表述的最新发展。在“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一文中，他曾指出(维尔纳·宋巴特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所使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精神”与(借自弗洛伊德和卡尔·阿布拉罕 [Karl Abraham] 的)“肛门性格”的相互联系。<sup>[8]</sup> 在“母权制学说的社会心理学意义”一文中，他也是将父权制社会、清教—父权制社会与“父权性格类型”联系起来解释的。<sup>[9]</sup> 现在，在他为《权威与家庭研究》撰写的文章中，他又将“权威主义社会形式”和“权威主义人格”联系起来。在文章中弗洛姆先对性器欲性格和母权制性格做了实证性的比较，然后又提到了“革命”性格类型。然而“革命”性格类型只提到一次，弗洛姆不仅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甚至也没有对这种性格类型做社会学分类。这篇文章没有过多地点明他已经看到的清教主义后果，因为他已经在谈基督教义发展的那篇文章的结论部分描述过了。

儿童所经验的恐惧与威胁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或她以后作为成人对社会产生的恐惧强度。因此并不是儿童生理上的无助迫使他或她对超我和本能权威产生强烈的要求；源于其生理上的无助的那些要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只要遇到一个对儿童友善的、不威胁他或她的人就可以满足。所以说，正是成人在社会意义上的无助境况给孩童的生理上的无助打上了烙印，并因而使超我和权威在孩童成长过程中具有了如此重要的作用。<sup>[10]</sup>

社会意义上的无助、恐惧和必然的对本能冲动的压抑，这些“在下层阶级中自然比在那些控制着社会权力手段的人当中要严重得多”。<sup>[11]</sup> 通过家庭组织而获得自信和自我抵抗力 (ego-strength) 的机会对下层阶级的

人来说是少而又少，必然的结果是，他们更可能陷入与无助的儿童一样的境地——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能够让他们认为他们就处在无助的儿童的那种境地的话，他们便更有可能做出类似儿童的反应。

如果有人能证明自己非常强大而且非常危险，甚至任何反抗他的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那么自保最好的方式就是服从了，或者说，如果他能证明自己非常和善而且有能力保护别人，以至于人们任何自保的行动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换句话说，如果当运用自我机能已属不可能或多余时，只要凸现自我所必需的那些机能能不能或不必要得到运用，自我也就退席了。

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人数很少的阶级越来越明显地与经济上依赖它的、任它支配的绝大多数人相区别”<sup>[12]</sup>——而且，文章还暗示说，这种社会隐匿地行使着它的权力。这样一种社会形式能使大众产生无能感，让他们易于接受深谙如何“用其两面——威胁与保护”来制造“超级权力”表象的人或运动。

弗洛姆进而能够对由这些社会经济条件产生的本能结构进行重新界定，把这些社会经济条件一方面与受虐狂性格类型（像弗洛伊德、赖希和霍尔尼 [Horney] 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都研究过这种性格类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与普遍存在于权威主义社会的关系形式联系起来。下面就是他的观察的出发点：

153

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这种非病理表现的受虐狂性格，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至于认为资产阶级是“正常人”和“自然人”的那些研究者不把它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另外，精神分析学家们都着迷于作为非正常行为的受虐倒错，它的吸引力如此巨大，以至于让精神分析学家们忽视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受虐狂性格。<sup>[13]</sup>

“性格”一词是从弗洛伊德那里，更多地是从威尔海姆·赖希《性格分析》一书<sup>[14]</sup>中借来的。现在弗洛姆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以前所说的“力比多结构”，即本能结构通过升华和形成习惯性行为来适应特定社会条件的一种结果。性格特征是被改造了的本能冲动，不同性格类型的行为方式往往都反映着已经被理性化压抑了的本能冲动的无意识满足。在谈到精神分析发现时，弗洛姆认为，包含受虐狂特征的性格结构中必然也包含着施虐狂性格特征。他对施虐—受虐性格和肛门性格概念做了比较，前一种性格的典型反应就是顺强凌弱，而后一种性格典型特征是热衷于收集、保存和占有，把这些当作目的本身，并且对同伴毫无同情心，难于和同伴相处。因此施虐—受虐性格这个概念除了适用于财产所有权不特别重要，不那么起决定作用的情况之外，更适用于权力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情况。

154 弗洛姆在谈及 1920 年代以来就在很广泛的领域内展开的关于权威主义极权国家的讨论时，他将这种国家称为权威主义社会形式。在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中，所有人一起构成了分化为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的互相依赖的体系。在弗洛姆看来，这乃是施虐—受虐性格和权威主义社会形式之间有机互动存在的前提条件。他在结论部分说：“我们已经努力表明权威主义社会结构既引发又满足着在施虐—受虐性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些需要。”<sup>[15]</sup>“施虐—受虐”和“权威主义”这两种表述在他那里成了同义词。然而“权威主义”这个术语还有一些尚待解释的地方，比如“权威主义”与本能结构以及性心理发展的关系、“权威主义”与可能形成的社会反应的限度的关系，这些都没有明确地得到说明。相反文章只把“权威主义”与国家的特定社会类型联系起来谈。

弗洛姆和霍克海默持有如下相同的看法：在现阶段，对当时历史整体至关重要的一个特殊现实已经非常明朗了。弗洛姆所列举的权威关系制造满足的方式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满足方式再加上他们的那种看法，让人觉得更是前途无望。<sup>[16]</sup>在父权制原子式家庭危机的整个过程中，阶级社会必然具有的心理服务功能并没有被剥夺掉。毋宁说，更强大的权威主义社会在它的新成员身上越来越直接地施加着

影响。按照霍克海默在他的前言里的说法，研究所的研究调查的目的就是通过类型学方式对一些问题进行分类并描述其性质，这些问题包括：“不同性格的人对国家权威和社会权威的不同态度、经济危机造成的家庭权威的衰落的表现形式、更强的或更柔和的家庭权威状况及其后果、多数公众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以及其他等等类似问题”。就最好的方面而言，可以说研究调查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父权制权威、父亲权威正在解体，同时母权制权威、母亲权威则越来越有力。但这些调查说明，就像《社会研究学刊》有些与家庭有关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父亲权威衰落与母亲地位的提升同时出现，可是这并未产生任何实际的后果——因为母权制结构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并未出现，而且国家权威也在日渐增长。

但从他的辩证观点出发，霍克海默还是强调了存在于家庭内部的、与资产阶级社会保持对抗关系的那些因素——在妇女决定着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往往保存着与世界的完全毁败相对抗的能量，而且包含着反权威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些反权威主义因素经常会成为既有境况的稳定剂，并且往往夹杂着趋向于努力服从既有权威主义关系的那种妇女品性。霍克海默提到他一度对无产阶级寄予希望，但随后马上指出，由于经济危机的关系，“众所周知，这种指向未来出路方向的家庭类型越来越稀有了；彻底的无助使得这种家庭也陷入了彻底的堕落，使它向随便一个什么主人屈服了”。霍克海默第一次表现出了用一种赞许的眼光看早期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许是在文章中一直表达的某种信念（权威主义体系终将瓦解）的基础。

在资产阶级的鼎盛期，家庭和社会之间富有成果的互动是可能的：父亲权威的基础正是他的社会角色，而社会也因为以行使权威为教育重心的父权制教育而生气勃勃。可是现在，众所周知，公认的必不可少的家庭仅仅事关行政管理程序……尽管近期的种种措施有助于稳定家庭形式，可是整个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无可挽回地在丧失——因为以往在男主人的自由职业活动基础上形成的那

155

种中产阶级独立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sup>[17]</sup>

霍克海默为了解释革命性格（他没有直接用这个词来描述这种性格）所举的那些例子更有留恋的味道，也带有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特征。他举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唐·璜为例，这些在霍克海默眼中都总是与革命领域相关的，甚至是与权威主义社会中的革命领域相关的象征性文学形象，在这个领域中个人提出了追求自己幸福的要求，提出了追求与社会命令相冲突的爱的要求。

权威主义社会如果不繁殖“富有生气的”<sup>[18]</sup>专家或权威，就无法维持自身的存在——从霍克海默矛盾重重的观点表述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最终的想法。可是这类“富有生气的”权威——权威主义社会不可能繁殖这类权威——究竟从哪里来，弗洛姆所说的在团结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理性的权威关系究竟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让“理论纲要”的作者们颇感踟蹰。

关于权威与家庭的“集体研究著作”，或者严格说，关于这一论题的第一卷合作专著完成于1935年年中。霍克海默撰写的前言标明的日期是1935年4月。他在前言结尾时这样写道：

我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在随后的研究阶段我们还将出版本书的其他各卷；因此，我们目前不把研究所收集的书目材料作为附录收入本卷。在本卷中问题已经在一个极宽泛的范围内被呈现了出来，这固然重要，可是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中把精力集中在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和析经验材料上。我们一直确信，我们所开创的方向，即各学科代表之间的持续合作，以及理论建构与经验方法之间的融会贯通，已经在现阶段的科学认识中得到了证明。<sup>[19]</sup>

156 后来的情况表明，融会理论研究经验研究的学科间合作的高潮，实际上在《权威与家庭研究》第一卷出版之后就过去了。经验研究还在继续，可是不再像完成《研究》的合作那样了，尽管那种合作也是松散

的。经验研究只是顺其自然地进行着，从中丝毫看不出有“融会贯通”的打算。

##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重新合作

《权威与家庭研究》合订本编辑工作就要在美国完成时，弗洛姆从他的度假地加拿大的路易斯湖给霍克海默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信中比较饶舌，也颇具思想的一封。在信中他谈到了许多想法：关于受虐狂的、关于唯物主义的以及关于宗教的。唯物主义和幸福的实现紧密相连，同样宗教则与受虐狂紧密相连。

对无意识地信宗教的人进行分析将是一个关键的精神分析问题，将是18、19世纪的宗教批判的继续与必然结果……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就这些问题进行合作的话，成果必定是非常丰富的。可以十分清楚地预见到，无论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结果都会发现咱们回到了相同的洞见之上……特别是现在，在这么平静安宁的环境中，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去年我们的合作是多么激动人心、多么富有成果。<sup>[29]</sup>

尽管弗洛姆当时仍然是霍克海默在流亡的合作者中发现的惟一对理论问题敏感的人，可是就在那时他已经意识到了竞争的严重性。1934年霍克海默就已经主动和阿多诺恢复了中断的联系。他责怪阿多诺从1933年3月以来就没有和他联系过。

如果说这时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是富有成果的话，你和研究所的长期合作却说不上是这样的。这仅仅是因为你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们不能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负全责。我们当时几乎不可能要求你应该离开德国到这里来和我们会合，这完

全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本来当然是可以找到某种权宜的办法的。<sup>[21]</sup>

阿多诺从他的角度出发也责怪研究所，认为它在没有通知他，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就离开了他。

157 很清楚，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行政上，我从来都没有和研究所脱离关系——你知道，我多年以来差不多像个迫切要完婚的女友一样，几次要求加入研究所——应该下决断的不是我，而是研究所……我绝不是研究所不得不养起来的局外人：正如我从你的信里面读到的那样，我会说，像你本人、波洛克和洛文塔尔一样，我是研究所的一部分和一分子。研究所应该首先为这三个人提供物质保障，因为他们是研究所最重要的生产力——你也许不会认为这是研究所对我们朋友的背叛吧……我本人也是这样的看法。<sup>[22]</sup>

蒂里希也没有提到过研究所接纳阿多诺的意思。他曾是阿多诺同日内瓦方面的沟通纽带。

这封信是阿多诺在牛津写的。因为他想“把一个拓展了的学术计划做完”，<sup>[23]</sup>便于1933年4月在德国提前取消了即将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课程。部里颁布了一项法令之后，哲学系系主任7月就通知他：“在夏季学期修假的，或是在此期间不从事教学的人，在冬季学期也排不上课。”<sup>[24]</sup>9月有关部门吊销了他的授课资格。他也看到校方很快连荒谬的托词都不再需要了，因此希望在柏林的自由主义报纸《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 谋到一个音乐批评家的职位。但是这份报纸于1934年4月被关闭了。他仍然相信可以韬光养晦，避过正在发生的一切，此时他发表的音乐评论越来越少，就在其中一篇评论中阿多诺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政治机会主义者。这篇文章就是他为赫伯特·孟泽尔(Herbert Müntzel)的《被迫害者的旗帜：改编自巴尔杜·冯·施拉赫的同名组诗的男生合唱》<sup>[25]</sup>撰写的评论，发表在很有影响的《音乐》杂

志上。当时这份杂志还没有完全被条条框框束缚住。阿多诺强调，并且是出于赞赏而强调说，这组男生合唱“因为改编自施拉赫的诗而自觉地体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唤起了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的想像”，“也许还让人想起了戈培尔大力倡导的那种‘浪漫的现实主义’”。他在评论中还称赞说，“由于这种日趋严格的创作方式，浪漫主义和谐会瓦解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恢复了充满古风和谐形式，毋宁说，它预示了一种新的和谐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包含着对位性的力量。”<sup>[26]</sup>当阿多诺 1934 年 11 月写信给霍克海默说他“在德国写了些东西，而且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时候，他也许会想到这篇假惺惺的赞美文字。此时，也就是 1934 年夏天，他开始寄希望于在英国继续他的学术生涯。事实上这比他想像的要困难，1934 年 6 月学术援助委员会给他发出了邀请，通知他可以在莫顿学院注册为研究生，这时他也松了一口气。委员会之所以能考虑阿多诺的申请，多亏了约翰·梅纳德·肯尼斯 (John Maynard Keynes)，他是阿多诺素来亲英的父亲的朋友。肯尼斯建议他在牛津读哲学博士学位，为此他必须在那里学习两年。但是拿到博士学位是否有助于他得到教职还不确定。他打算用他已经开始着手写的一部篇幅很长的专著的一部分来作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可行的题目是“现象学二律背反：辩证逻辑导言”。<sup>[27]</sup>他的导师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 (Gilbert Ryle)。阿多诺时常感觉到，由于自己来自富裕家庭，因而为解决紧急突发事件而设立的学术援助委员会忽视了他。阿多诺很苦恼，因为他担心经济上不那么宽裕的德国学者可能会被优先任命教职。除了在学期中待在牛津之外，他更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德国度过的。在结束他在牛津给霍克海默写的第一封信时，他这样描述自己在那里的境遇——就像“一个中世纪大学生的境况，这是一场梦到不得不重返学校读书的焦虑梦。总之，这是第三帝国的延续”。

在他的第二封信中，霍克海默继续老谋深算地试图争取阿多诺，让阿多诺为他自己的工作 and 研究所的工作尽其所能，同时他并没有为此做出什么让步。他再一次把终止他们合作的责任推给了阿多诺。使霍克海默不能相信的是，阿多诺会因为危难而抽身事外，结果断绝了与研究

所及其学刊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本是最适合阿多诺的。针对研究所的所有控诉都被驳回了，他们的一位同事甚至在德国被逮捕、被关押的时候还依旧为学刊撰稿。接着霍克海默利用阿多诺希望属于一个带有布道团意味的小圈子的愿望，企图在这一点上说动他：

研究所现在正试着开展一些特殊的理论工作。你仍然属于研究所里极少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你们才能为研究所提供理论上的一切——除非你彻底变了。这些人的数量，研究所目前可依靠的这些人的总数正在减少。这个圈子的人少得多了，可正是因此，可担负的责任以及未来在职务上晋升的可能就更大。我们是惟一一个这样的团体，它的存在不是建立在趋同的基础上，它可以保持已在德国形成的先进理论，并将在未来继续加以推进。<sup>[28]</sup>

159 他多次提到他自己愿意做出牺牲，强调了他的审慎态度，而且将研究所当时的情形描述为“辉煌的孤独”：“我们在美国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慷慨帮助。美国方面对我们的系列出版物、学刊、问卷研究工作有惊人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们把一个适宜工作的小型建筑交给我们使用。”在说完这些之后，他又补充道：“说实在的，目前我们还没有太多资助，因此只能开出可怜的一点薪水，我们的资金只能应付日常的开支…… [很多事情] 都是财政管理的责任，也就是说波洛克的责任，你怎么指责他都不为过……也许明年情况就会好起来。”阿多诺应该来美国作一次旅行，“尽管研究所无法为他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可是和在英国相比，他也许在这里能看到更好的前景。

在回信中阿多诺再一次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霍克海默和他们共同事业的热忱。他断言，1933年3月以来发生的种种误会无疑都应由蒂里希负责。他以前有一种印象，1933年3月之前研究所在有些事上总是对他保密，对他有所保留。但显而易见他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过错不在霍克海默，而在他的朋友波洛克。波洛克的性格总倾向于对别人有所保留，而洛文塔尔利用了他的这一倾向，通过强权手腕来反对他阿多

诺。澄清了这些之后，阿多诺表示要重新开始为《社会研究学刊》工作。他打算把他正在做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对曼海姆未发表的手稿“文化危机和大众民主”的评论，另一篇是关于胡塞尔的研究文章）修改之后投给学刊。他还说要写一篇关于帕雷托（Pareto）<sup>[29]</sup>的东西，这样“能使柯尔施派上用场”。他还告诉霍克海默说要警惕伯克瑙。他要为学刊就与精神分析难题有关的一些原理问题写一篇稿子（“在这篇文章中我会表明对错误的、表面性的劳动分工的保留态度”），他谈问题将从赖希开始，因为与弗洛姆不同，赖希坚持认为个体精神分析学不能够轻易地被转化成社会学说。

这一切正是霍克海默所希望看到的。将近1935年底，霍克海默在巴黎见到了阿多诺。随后他写信给波洛克这样说：

我感觉和阿多诺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尽管会谈中有些时候让我很懊恼，这完全是因为他的性格。除了马尔库塞之外，他是我能够与之合作完成辩证逻辑的惟一人选。由于他还要在牛津待一年或十八个月才能取得他的学位，所以具体地安排我们的合作还不是当务之急。出于种种原因，我认为纽约不合适。在与马尔库塞一道处理完大量关于手稿的工作之后，我也许会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访问欧洲。但是在此期间，泰 [指泰迪，就是阿多诺] 应该拿出提高学刊评论部分的水平的计划，这样才能证明他和研究所是一条心。也许泰还可以参与一些论文部分的工作。

160

直到1938年2月阿多诺移居美国之前，阿多诺写的长信和霍克海默的短短的回复，反映出了一种奇特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互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有所保留，另一方面他们在心理和理论上又相互依赖，只要霍克海默有分寸地、有选择地激发，阿多诺总能在心理上产生火花。阿多诺对“拯救绝望”母题所抱有的热情却根本引不起霍克海默的兴趣，那一母题是阿多诺从本雅明关于歌德的《亲合力》的著作中借来的。<sup>[30]</sup>阿多诺对他在研究胡塞尔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些看法也抱有极大

的热情，他打算“在哲学这个历史凝结物的最抽象部分击打出最持久的火花”，“把所有哲学中最不辩证的这种哲学（它无论如何都是最先进的资产阶级认识论）彻彻底底地改造成辩证的”，“从内部对唯心主义进行清算”，<sup>[31]</sup>可这种热情也引不起霍克海默的兴趣。阿多诺论胡塞尔和曼海姆的文章很让霍克海默吃惊，因为它们“乍一看上去根本没有触及当前形势的关键问题”。<sup>[32]</sup>这两篇论胡塞尔和曼海姆的文章尽管多年来经阿多诺几次修改，但始终没有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刊出。阿多诺所写的文章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是在1936年夏天，这篇文章就是“爵士乐研究”，文章署名是他的笔名海科特·洛特维勒尔（Hektor Rottweiler）。<sup>[33]</sup>直到1938年秋天署他名的文章才在学刊上刊出。

但不管怎么说，霍克海默始终都对阿多诺抱有真正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他相信只有阿多诺才有助于完成那本关于逻辑的书。阿多诺还非常适合霍克海默圈子的心理构成。他依赖于霍克海默，嫉妒其他所有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在对“我们真正的共同事业，也就是辩证逻辑”的狂喜之中，1935年2月22日他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这么说，他梦想着在法国南部的某个地方写出一本书，只和霍克海默合作。他向霍克海默保证：“要是我在你的位子上，要是我就是你，那么如果一旦觉得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地要把一些人踢出去……当然，在这里我特别指的是马尔库塞的位子。”<sup>[34]</sup>在他看来马尔库塞只是个最薄弱的环节；他同样不喜欢洛文塔尔和波洛克。

另外，阿多诺认为自己就能代表研究所的方向，并从这个角度出发衡量一切事情。他以前认为本雅明的《单向街》里有太多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因而和研究所的研究计划不相宜。可是在读了本雅明的研究概述之后他又极力要求给予本雅明经济支持，他的理由是：

我已经开始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完全可以得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辩护。书中以前那一章充满隐喻的即兴之作现在完全没有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这本书能被完全肯定（它将在我们中继

续引起现在就必然发生的争论),但是无论如何,这本书已经按照研究所的工作计划修正了自身,适合作为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就这一点而言,它是能得到肯定的。<sup>[35]</sup>

在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决定因素”<sup>[36]</sup>一文中,阿多诺看到了“对学刊路线的真正威胁”,这是因为文章批评权威很片面(如果没有权威,“列宁的先锋队和专政就是不可想像的”),而且还“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式地要求权威发慈悲。<sup>[37]</sup>在1938年3月,阿多诺在就克拉考尔论“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主义宣传”所写的报告中,这么说:

对我来说,判断克拉考尔的著作,光是用我们自己的范畴来衡量他,看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的范畴,还不够。一开始我们不能假设在理论观点上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也不能在研究方式上把他当成一个学者型的著述家。做到了这些之后,我们还要问一下他的著作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东西,能让我们在学刊编辑或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方面加以利用。

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经他阿多诺修改之后再发表克拉考尔的文章才能“不过多地在政治上损害我们”。这个计划没能奏效,因为克拉考尔拒绝发表署阿多诺名字的修订版。霍克海默先前已经同意发表阿多诺那篇关于曼海姆的文章,可是后来1938年又告诉他不发,得知此事后阿多诺写信给霍克海默说:

我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许你有你策略上的考虑。请不要把这头受伤的鹿(它就是我本人)的哀鸣当作个人虚荣的表现。我想,这哀鸣……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就要发作的创痛的症状,即使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有自制力的人受伤时也会这样。<sup>[38]</sup>

霍克海默总是为了研究所的特殊理论事业而让别人受虐，这就是一例。

162 阿多诺认为希特勒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力量与莫斯科对抗的马前卒，而且在1936年就担心“最多两年之内，德国就要袭击俄国，而到那时候法国和英国会根据它们签订的条约作壁上观”。另一方面他也发现苏联做出的示范性公审以及文化政策也是令人失望的，并且认为“此时向苏维埃联盟表忠诚的办法也许只能是保持沉默”。他还像表演情节剧那样表示，在他看来“在现在的形势下”——尽管当前形势真的使人绝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代价是什么！）捍卫原则，决不能发表任何可能损害俄国的东西”，<sup>[39]</sup>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前述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可是这一切都同霍克海默的路线相去甚远。

在霍克海默看来，阿多诺“对现有环境所具有的那种充满敌意而又尖锐的眼光”<sup>[40]</sup>和他的好斗的性格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弗洛姆也具有这些品格，1934年6月在他第一次在美国和弗洛姆会合之后，他对波洛克说弗洛姆“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他有很多有益的思想，但是他跟很多人关系都很好，这样我们就不怎么能谈得来，我感觉他讨好的人太多了”。<sup>[41]</sup>1936年底，阿尔弗雷德·索恩-雷塔尔（Alfred Sohn-Rethel）在牛津拜访了阿多诺。在这之后阿多诺热情地为他在霍克海默面前说项，要求给索恩-雷塔尔提供资助，理由是他在独立从事工作，而且工作目的和阿多诺本人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是在为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而工作。霍克海默读了索恩-雷塔尔写的《知识社会学理论》<sup>[42]</sup>之后，反应冷淡，认为尽管“被意义含量巨大的词语挤满的沉闷的句子后面”包含了非常强大的理智能量，可是这部作品“本身的历史地位，实际上和亚斯贝尔斯或别的什么教授的作品中的地位没什么区别”。“书中到处可见对马克思范畴阴阳怪气的讽刺”；索恩-雷塔尔非常成功地用曼海姆都没能想到的方法“把剥削概念的侵略性内容剔得一干二净”。作者所做的绝对说不上揭示了什么新东西，只不过对陈旧的发现“从唯心主义角度进行了一番修饰，反而使得它们无法引人注

目”。阿多诺对索恩—雷塔尔所抱有的这种热情给了霍克海默一次机会来“强调你和他两个人之间思想方式之间的巨大区别”：

如果说你那部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著作还带有唯心主义思想方式的痕迹，而你通过这部书的写作已经告别了那种思想方式的话，也可以说在书中许多地方，恰恰是你对现有环境所具有的那种充满敌意而又尖锐的眼光发现了特别值得注意的关键之处。实际上，我发现你的思想与既有的客观精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地方，也正是我对那些思想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地方。<sup>[43]</sup>

163

洛文塔尔曾经向霍克海默批评阿多诺说，与霍克海默不同，阿多诺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总是带着某种怨恨感。但是正是这一点才让霍克海默高兴。在他看来，这种富于热情的侵略性恰恰可以探测出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其他人的著作是否对资产阶级学院体系做出了让步，因此这种富于热情的侵略性应该正确地加以疏导，也就是说把它引入有利于社会理论发展的轨道。

可是对阿多诺来说，霍克海默的“施瓦本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彻底追求更加严格的唯物主义理论形式。他以前曾经为本雅明、克拉考尔、索恩—雷塔尔和布洛赫成为研究所与学刊的合作者而奔走，他的这些努力之所以失败，并不全是因为他本人的过失所致。这些努力表明他的旧梦尚存——那就是梦想着让他所持的理论和他的那些神学—唯物主义朋友们来代表学刊和研究所。但是纳粹胜利以及迁徙国外削弱了这些朋友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学刊的地位，却加强了霍克海默的地位，以至于现在他把霍克海默某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行为也看作是对研究所所有利的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反过来将克拉考尔以及其他思想伙伴的类似行为视为愚蠢的表现。1937年1月，他在一封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说：“要找到我们真正能够与之合作的人真是太困难了，六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找，结果我越来越趋向于接受你的观点，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只能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赢得这场战役”，没几天之后他又写信

说：“我尽力吸引那些进步知识分子，也不能说我的这些努力正在使研究所变成疯人院。”<sup>[141]</sup>可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认为本雅明是个例外。本雅明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了“爱德华·福赫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sup>[142]</sup>之后，阿多诺写信说：

我断定本雅明是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我也试图寻找新人，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在这之后，我认为他是那些罕见的人才中的一个。如果我们能妥善地为他提供工作，就会从他那里期待巨大的回报。因此我认为，这是个关涉研究所客观利益的大事情，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公众形象。<sup>[143]</sup>

1937年9月霍克海默访问欧洲时在巴黎与本雅明进行了第二次会晤，随后写信给阿多诺说：“与本雅明在一起的几个小时是最愉快的时光。164 到目前为止在他们所有人中，他是和我们最接近的。”<sup>[147]</sup>1937年深秋，本雅明成为了研究所的固定成员。1935年《拱廊街》已经被研究所接受，成了一项受资助的研究项目，而在1936年2月霍克海默去巴黎期间，他就已经同意为本雅明支付一份比以前工资高的定期薪水。2月之晤后本雅明致信阿多诺，说：“你也就要更密切地介入到研究所的工作中了，因此我可以看到——这不是鲁莽的乐观——将来的结果对我们的理论前景以及我们实际环境来说都会是好的。”<sup>[148]</sup>

总的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间的合作始于193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就这样在1935年到1936年之间继续着——这个合作过程是令人惊异的。霍克海默是一位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家，他在哲学上希望促成对社会整体的多学科分析，希望满足安身立命于此时此地的人都会有的对幸福的要求。阿多诺是一位阐释型的唯物主义者，他总是对与唯心主义纠缠不清的那些细小的、碎片式的、偶然的进行“建构性阐释”和说明，试图借此辩证地把能够拯救这些现象并能够产生更好的理性形式的那些因素释放出来。对种种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们对“未完成的”（霍克海默语）和“断断续续的”（阿多诺语）辩证法的共同兴趣、对

既不能通过体系也不能通过某种抽身事外的精神加以描画的活生生的事物所包含的逻辑的共同兴趣，这些都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全部努力凝聚到了一起。若非两个人立场发生了某种同化，这种紧密的合作似乎就是不可想像的。这种同化的发展方向其实很早就表现了出来，甚至在霍克海默肯定阿多诺对本雅明的赞扬之前——在这个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家（霍克海默）对阐释型唯物主义者（阿多诺）所写的论爵士乐的文章的反应中就表现了出来。霍克海默致信阿多诺说：

在我看来，论爵士乐的这篇文章是一份特别出色的研究报告。你试图用严格分析这种表面上无关紧要的现象的方式去揭示作为整体的社会，暴露它的全部矛盾。无论发表与否，它已经是一篇坚实的抵抗文字[*a pièce de résistance*]了。在这一期学刊里，它还有利于杜绝那种错误的印象，以免使别人认为我们的方法仅仅只适用于所谓宏大问题或无所不包的历史时期，只有你的表现表明，看待问题的正确方式和浅薄之辈认为的科学研究中重要紧迫的东西是不相干的。<sup>[19]</sup>

在完成的下一份计划书中，阿多诺的方法被作为研究所工作指导性方法得到了强调。在他对阿多诺的方法所抱的热情里面，霍克海默表露出，他随时乐意以开阔的视域去看待他原来的计划，去看待哲学与各个科学分支相结合、理论和经验主义相结合、“抽象科学与具体科学相结合”的计划——为不同的理论变奏留出地盘。

165

### 1930年代研究所从事的其他经验研究项目

1935年至1938年之间有四个领域的工作构成了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1. 调查女大学生对权威的态度（调查对象主要是纽约撒拉·劳伦斯学院的大学生群体）。

2. 调查失业对家庭内部权威结构的影响（调查对象主要是内瓦克、新泽西的家庭群体；研究所还打算在维也纳和巴黎展开平行式调查）。

3. 对《权威与家庭研究》所利用的问卷进行穷尽式的分析，以往对这些问卷的分析太过草率了。这些问卷能反映出欧洲各个国家里的青年人和他们父母之间的权威关系的变化。

4. 对研究所以问卷为基础的第一次调查，也就是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调查做穷尽式的分析。

对纽约撒拉·劳伦斯学院的女生对权威的态度进行调查，其目的在于揭示这些大学生对她们教授权威的态度，以及她们对她们整个学院的态度，希望明确分析出哪些观点是典型的，它们与学生所属的社会、文化以及家庭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与特定的性格结构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尽管这是个老研究项目，可是现在却被用在处于特殊环境中的青年的调查中。这项研究开始于1935年深秋，负责人是弗洛姆，但是后来一直被耽搁了，从来没有超出它的最初阶段。

关于失业给美国家庭内部权威结构造成影响的研究任务被交给保罗·拉萨斯菲尔德负责。霍克海默和研究所在整个滞留美国期间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同霍克海默相比，虽说保罗·F.拉萨斯菲尔德未尝没有一点社会批判的倾向，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他更是一个实证型的、按着方法论行事的典型“管理型学者”。当在学院地盘内为鼓吹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设立的基金尚不可能为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的时候，也只有在高度的进取精神和即兴创造的热望相互携手并乐意相互配合的情况下，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群体才能相当成功地联合起来。

166 拉萨斯菲尔德1901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维克托尔·阿德勒（Victor Adler）、鲁道夫·希法廷和奥托·鲍尔<sup>[50]</sup>都是这家

的常客。他的母亲索菲亚·拉萨斯菲尔德 (Sophie Lazarsfeld) 曾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sup>[51]</sup> 门下学习, 曾开设精神分析诊所, 而且是一系列鼓吹妇女解放的富有攻击性的著作的作者。<sup>[52]</sup> 因此他从早年就熟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非常看重的阿德勒主义精神分析。1920 年代他积极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运动, 并因此和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 (Siegfried Bernfeld) 相识, 后者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和成立于 1919 年的维也纳战争孤儿之家 (Kinderheim für Kriegswaisen) 的负责人。伯恩菲尔德的儿童自我管理理念作为一个模式给了拉萨斯菲尔德灵感, 他也在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中为青少年组织了假日营活动。拉萨斯菲尔德在成为一名数学教师之后, 听从伯恩菲尔德的建议去听夏洛特·比勒尔和卡尔·比勒尔 (Charlotte and Karl Bühler) 在维也纳的讲座, 比勒尔夫妇在 1922 年至 1923 年间在维也纳大学创立了精神分析研究所。精神分析研究所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信奉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他们都期待着获得正确的教育从而能够去干一番大事业以促生“新的人类”。卡尔·比勒尔还参与了作为社会民主党员的教育部长奥托·格吕克尔勒推行的学校改革计划; 夏洛特·比勒尔的主要兴趣则是儿童成长心理学。这样, 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相互结合着的。夏洛特·比勒尔在她《青年的内心生活》(Das Seelenleben des Jugendlichen) 一书中就曾采用过儿童日记的统计分析方法, 年轻的数学家拉萨斯菲尔德那时就被她邀请为助手。

1927 年拉萨斯菲尔德创立了“经济与心理学研究小组”(Wirtschaftspsychologische Forschungsstelle), 它是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个部分。小组为了获得资金支持曾签过一个研究合同, 根据合同要求, 该小组完成了对奥地利市场的首次调研, 并对偏好奥地利广播公司节目的听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拉萨斯菲尔德非常痴迷于方法论, 所有这些研究项目在他看来都非常有教益。比如说, 在对消费者选择所作统计分析的过程中, 他希望获得更多的东西来帮助他对人的职业选择做出统计分析。<sup>[53]</sup> 研究小组不仅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效劳一方面为社会民主党的机构工作, 而且也有它自己的研究任务。

在拉萨斯菲尔德的第一本书《青年与职业》中，有一段话能够很典型地反映出他对在“红色维也纳”的氛围中进一步得到发展的经验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态度。（“红色”与奥托·诺伊拉特 [Otto Neurath]、鲁道夫·卡尔纳普、汉斯·哈恩 [Hans Hahn] 和埃德加·齐尔塞尔 [Edgar Zilsel] 有直接的关系。）这段话出现在论述“青年工人”那一部分里面，那一部分的重点对象就是为他的研究带来马克思主义色彩的青年工人：

研究者必须贴近他生活中的问题，并从而感觉到有必要为了创造出概念的和方法的工具而进行内省反思，必须抛开他的个人成见，在科学上果敢地将他的经验转化为可供检验的数据与公式，或通过假设的因果联系表述他的经验，这些假设在原则上必须能够合情合理地解释此类现象——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有助于澄清形形色色的青春期阶段的心理问题，使它们不要像现在这样晦涩难解。<sup>[54]</sup>

1930年开始的“玛丽恩塔尔的失业者”研究比当时所有的其他研究更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一看法。按照拉萨斯菲尔德在“玛丽恩塔尔的失业者”的导言中的说法，这项研究采用了如下视角：“我们研究人员不应该以报告人或观察者的身份出现在玛丽恩塔尔，他们更应该通过承担这样那样对当地人有益的工作从而自然而然地融入当地的生活。”<sup>[55]</sup> 这项调查的微薄资助是由维也纳工会（Arbeitskammer）和由夏洛特·比勒尔、卡尔·比勒尔担任执行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的。

由于玛丽恩塔尔研究的缘故，洛克菲勒基金邀请拉萨斯菲尔德访美。拉萨斯菲尔德于1933年9月开始了这次访问。1934年2月奥地利宪法被废除，社会主义党被禁，同时在奥地利也形成了以意大利为样板的纳粹势力，而拉萨斯菲尔德的犹太家庭中大多数成员都被投入了监狱。拉萨斯菲尔德成功地申请延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1935年访问学者期限到期，他在罗伯特·林德的帮助下，在基地设立于新泽西内瓦克

大学的国家青年管理局获得了一个职位。在那里他将负责对年龄在14-25岁之间的青年填写的10,000份问卷进行分析,同时在大学里任教。在他的建议下,内瓦克大学在1936年秋建立起了一个社会研究小组,由他担任负责人。

内瓦克大学非常小,而且经济状况也不好,这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只有一半薪水,另一半得由他自己想办法。拉萨斯菲尔德不得不像他在维也纳那时一样寻求订立研究合同来维持小组的正常运转。在这种境况之中,霍克海默的研究所为他提供了帮助,霍克海默让内瓦克研究中心承担了自己研究所的一部分工作,并为拉萨斯菲尔德手下少部分工作人员的监理工作支付薪金。其实这仅仅是研究所和拉萨斯菲尔德长期合作中的一个小插曲——社会研究所曾让维也纳经济与心理学研究小组承担在奥地利青年人中进行调查的工作,那时,他们的联系就已经开始了。1935年这种合作关系依然持续,那时他对克特·莱希特为《权威与家庭研究》所进行的瑞士青年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在为《权威与家庭研究》的工作完成之后,霍克海默致信拉萨斯菲尔德:

您给予了研究所以巨大的帮助,这不仅因为您那审慎和趣味盎然的[对青年人的研究]工作,而且因为您进行这项工作的速度的确是迅速非常。

您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经验对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当我们听说您对匹兹堡大学有兴趣,我们虽然很高兴,可是想到您明年就要离开美国,我们又不禁非常沮丧……我们都认识的尊敬的朋友林德教授有个想法,想让我们研究所为您提供一个位置:您每月至少可以抽出几天从匹兹堡来纽约。为您留出的这个位置,主要目的是想让您有可能将来也能参与我们的工作。

168

拉萨斯菲尔德用英文回信说:

您当然不必怀疑,我非常赞同您的建议。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

和我的计划是相宜的。首先，我本人非常愿意和您以及您的研究所保持联系；其次，为我提供的这个位置也使我有机会和纽约方面进行交流……另外经济上的这笔账算下来也是很诱人的。<sup>[66]</sup>

拉萨斯菲尔德在内瓦克期间他们之间的合作尤其紧密。拉萨斯菲尔德和他的助手们，特别是和赫尔塔·赫左格 (Herta Herzog) ——她在维也纳就与他共同工作而且后来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都为研究所提供方法论的建议和数据分析技术的帮助。研究所也把拉萨斯菲尔德作为研究合作者列入了计划书。193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要求拉萨斯菲尔德完成一项“广播研究项目”，1938年拉萨斯菲尔德告诉霍克海默他有兴趣让阿多诺担任该计划音乐部分的负责人。这样他就给霍克海默提供了一个将阿多诺带来纽约的机会。拉萨斯菲尔德在1940年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把他的研究小组也迁往那里，他与霍克海默之间的互利性合作也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那时他们在怎样对付他们的资助人的策略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研究所流亡美国期间，拉萨斯菲尔德一直充当着研究所和那里的学术圈子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同样地，拉萨斯菲尔德和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组成的研究所的合作也给他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他并没有彻底背叛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过去，即使他当时完全融入了美国的学术体制。

关于失业对美国家庭权威结构影响的研究计划是霍克海默研究所设计出来的，他希望这一计划能够说明研究所对它所造访的这个国家是有了解的。但是正如弗洛姆1936年给霍克海默的信中所述，主要的问题是：

我们正在出于某些根本上乃是战术上的原因而进行着这项研究，想让即将离开的拉萨斯菲尔德来完成这项研究中的大部分工作；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希望研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符合我们自己的标准。由于拉萨斯菲尔德尚未足够充分地领会我们

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也无法在研究中抽身事外。从另一方面说，花太多精力在这项研究上将是一个错误。<sup>[57]</sup>

1935年以后，这项研究工作由米拉·柯玛洛夫斯基 (Mirra Komarovsky) 在拉萨斯菲尔德指导下进行。米拉·柯玛洛夫斯基是与拉萨斯菲尔德相熟稔的一位社会学家。研究问卷涉及 59 个内瓦克家庭，这些家庭的成员都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下，他们的名单是由名为“紧急救济管理局”的一个福利机构提供的。对单个家庭的一系列访谈构成了研究的方法之一。归纳问卷用上了对同类对象进行类型学分类的方法，拉萨斯菲尔德曾在一篇发表于 1937 年《社会研究学刊》上的文章中探讨过这类方法，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对社会研究中类型分类法的几点说明”。<sup>[58]</sup> 研究结果再次印证了施坦恩海默在《有关失业与家庭的最新文献》<sup>[59]</sup> 中所说的和《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所表明的东西：家庭父亲权威常常由于失业而受到削弱。孩子年龄越大，父亲权威削弱越严重，父亲权威甚至还要取决于失业前那一段时间内的家庭权威结构。内瓦克研究报告 1940 年用英语出版，是社会研究所的出版物之一。

在维也纳和巴黎开展的同步研究计划中，研究所的欧洲分部准备与玛丽·雅胡达 (Marie Jahoda) 和奥托·诺伊拉特的研究机构进行合作。雅胡达曾是拉萨斯菲尔德在维也纳的助手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是《玛丽恩塔尔的失业者》的主要作者，活跃的社会民主党员。在拉萨斯菲尔德离开之后，她就成了维也纳经济与心理研究小组的领导人。霍克海默希望在开支允许的情况下，通过与维也纳小组之间进行有计划的合作保持研究所工作的国际性特征。1936 年玛丽·雅胡达由于为社会主义者进行非法工作而被捕，1937 年被驱逐出了奥地利。

拉萨斯菲尔德的参与对深入分析关于青年人对权威与家庭态度的问卷十分关键。奥地利方面问卷材料的准备工作由克特·莱希特负责完成，她早在瑞士的问卷工作中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拉萨斯菲尔德作为她在法国从事问卷调查工作的助手，也给了她不少建议。最后将通过所有这些工作拿出来一份瑞士、奥地利和法国三地材料的比较分

析。出于这一目的，拉萨斯菲尔德希望能对瑞士问卷的另一半进行统计分析，因为他在为《权威与家庭研究》工作时没有机会见到这另一半问卷。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完成。

170 研究所与拉萨斯菲尔德的内瓦克研究小组最紧密的合作，要算是对体力工人和非体力工人的调查进行的后续分析工作了。几乎所有参与此次工作的人员都被作为社会心理学系和实地调查研究的助理列入了1938年研究所的计划书：艾里希·弗洛姆、拉萨斯菲尔德和恩斯特·沙赫特尔，以及三名助手中的两人——赫尔特·赫左格和安娜·哈尔达齐（Anna Hartoch）。拉萨斯菲尔德和这两名女助手首先是属于内瓦克研究小组的。弗洛姆希望安娜·哈尔多赫在工作上为他提供第一流的帮助，因为安娜具有“出色的心理学知识，对劳动者有丰富的文化和政治经验”。弗洛姆的“精神分析咨询费比以前有所提高”，他将用“咨询费多出的部分”直接为安娜提供每月50美元的薪金，因此“支付这笔钱并不占用研究所的开支”。<sup>[90]</sup>就保罗·拉萨斯菲尔德和赫尔塔·赫左格而言，弗洛姆认为，他们“对微妙的心理学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理解，而这些问题恰恰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使这项工作更有价值”。但是有那么多准备性工作和描述工作要完成，因此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合作还是非常有益的。

1936年初弗洛姆希望从对工人阶级的问卷分析中得出以下三个结果：

1. 分析应该呈现出1929年到1930年间德国工人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观念的图景。由于有大量的回答都非常相同，因此甚至在700份具有代表性的问卷材料的基础上就可以做出某种总结。

2. 我预期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阐明一些社会—心理类型，例如在小资产阶级“造反”性格类型与革命性格类型之间做出区分——尽管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我尚无把握。我们必须考察在不同政党人员构成中发现各种不同性格类型的可能范围是什么：例如，在共产党人中发现“造反”性格类型和革命性格类型的几率是怎样的，在纳粹党人

发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性格类型和社会性集体主义性格类型的几率又是怎样的，如此等等。在那本书 [《权威与家庭研究》] 中我曾暗示把性格类型划分成三类，但是现在有必要更细致地区分不同的性格类型。

3. 第三个可能的结果，也是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的结果是，这次成功的问卷将能够有助于说明，在方法论上，什么是可以通过问卷的方式获得的，什么又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将从方法论角度出发细致处理问卷。这些细密的方法论处理方式非常新颖，从这个观点看，它们也必然会使发表研究报告具有实用价值。<sup>[61]</sup>

在他为《权威与家庭研究》问卷部分（这一部分是他负责的）所写的 171  
的导言中，弗洛姆清晰地阐述了他方法论理念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虽然他的这些论述在单个的研究报告中并没有得到反映。他所提到的这些方面包括：试图“通过把每一份问卷的回答看成一个整体，进而推断回答者的性格结构”，系统地在问卷中纳入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预计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些回答有助于我们对受访者的无意识趋向做出结论，并进而有助于对该受访者本能结构做出结论”；结合其他回答，也就是说结合被访者的整体性格结构，“对某一回答的内涵进行阐释。那种内涵往往是被受访者掩盖着的”。<sup>[62]</sup> 弗洛姆认为，对典型性格结构的阐释应以一种“清晰的心理学学说”为基础，根据“研究本身的经验材料不断地进行调整”。<sup>[63]</sup> 所有这些方面都旨在形成一种方法，推进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各项任务的完成。弗洛姆在他为《社会研究学刊》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社会心理学的各项任务，即揭示力比多结构，把这些结构描述出来，指出这些结构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本能冲动所造成的影响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决定着各个社会阶级情感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构成的决定性因素。<sup>[64]</sup>

直到 1938 年，问卷结果的处理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着。仅就下面这一事实而言，工作是有进展的：40 年后社会科学家沃尔夫冈·彭斯 (Wolfgang Bonss) 在弗洛姆的允许之下，根据留下的两份未完成的英文

材料重新整理出了一个可以发表的文本。那两个英文材料显然大部分是由弗洛姆写的。这个文本于1980年在德国发表。写于1937年至1938年的分析文章的核心部分就是弗洛姆对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任务的阐述。第一章主要论述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在这一章中他写道：“分析的主旨在于完整地呈现个体情感的气质特征和他的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sup>[65]</sup> 如果依照弗洛姆纲领性的方法陈述，人们可以这样设想，只要由这些问卷答案构成的复杂网络体系有助于在心理学分析阐释方面训练有素的分析者推断出深层人格特征，那么他就可以事先归纳出个体主体的力比多结构，这样一来这些问卷回答就能有一个心理学基础，分析者也能对这些回答进行经验上的类型分类。这样，各种性格类型在意识中所反映出的固定政治观念和其他种种观念就可以得到解释，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对各种性格类型发展产生的作用也可以得到考察。

172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分析文章采用了非常不同的方法。一开始就是对（584份问卷组成的）抽样在性格、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整体状况的概述。根据被分析主体的职业身份，抽样又被分作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白领工人和其他类型的工人；为了避免分类过细，文章省去了进一步的划分。根据政治趋向的标准，抽样又被分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内的）社会主义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中产阶级和中央党人、纳粹党人（人数很少，只有17人）和未参与投票选举者；在两组人数最多的分类中，共产党人（150人）和社会民主党人（262人）又分别按照公务人员、参与投票选举者和不确定者进行了进一步划分。

在没有对每份问卷之间的关系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研究文章接下来就对政治观点、总的世界观、文化和审美偏好，以及对妇女儿童、对同伴和自己的态度方面的问卷回答做了描述性的分类——这种分类甚至在这一阶段就已经是阐释性的了。（这也就是说，分析者先洞悉了在问题中未直接言明的深层性格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和分类。）接下来，则是对抽样受访者的各类回答在政治群体——最主要是经济群体——中的分布情形所做的考察。

分析者最后又把每份问卷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问卷虽然没有勾

画出每一种性格的大致情况，可是也的确提供了重要的个体性格特征的一般图景。四份问卷被用来说明典型的政治态度，六份问卷被用来说明典型的深层人格结构。政治态度和人格结构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因果关联，这种关联的性质又如何，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考察。被调查主体中大多数人都被列入了三种主要性格类型中的一种。接下来分析者又分析了政治归属和职业选择在这些性格类型中的分布状况。

分析的行文组织方式和得出这三种主要性格类型的方式一样令人感到诧异。这些性格类型没有心理学根据，它们不是通过精神分析考察（例如，依据性心理发展阶段的那种精神分析考察）得出的。相反，对它们进行阐释的基础是德国“意识形态”政党所代表的那些社会政治观点之间的“理想型”差异。源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哲学”的“激进态度”代表了“理想型”的心理态度中的一种，对这种心理态度来说政治信条的作用极其重要。“有折中趋向的改良主义态度”源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哲学”，而“权威主义态度”则源自“反社会的权威主义哲学”。<sup>[66]</sup>分析还特别强调，这些态度和理想型的构成基础不是持各种政治观念的那些人的“精神气质”，而根本上就是那些政治观念。<sup>[67]</sup>分析创造出“R中心气质（激进）”和“A中心气质（权威）”这两个内涵丰富的范畴来代表激进倾向和权威主义倾向，并通过这种方式将主体与特定的精神气质联系起来。

173

研究的结论看上去像是一篇客观的报告，报告中反映出，左翼政党追随者中很少一部分人体现了理想型的激进态度，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或多或少都处于某种政治观点和人格结构之间的矛盾之中。

最重要的结论无疑就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左派和共产党人构成的]左派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在思想和感情上与社会主义路线达成一致。他们中只有15%的很少一部分人表现出在危机时刻会拿出勇气、有着作出牺牲的准备以及唤起不积极的其他人去战胜敌人所必需的那种自发性。尽管左派党在大多数工人当中赢得了政治忠诚和选票，可是它们却无法成功地将它们的

追随者的人格结构加以调整，无法使这些追随者在危机形势中也保持其可靠性。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中有25%的成员虽然不能说和他们的党保持一致，可是也没有表露出任何迹象能够证明他们的人格特征有悖于他们的左派倾向。可以说他们是可靠的支持者，但是绝不是热情的追随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得出这样一幅令人迷惑的图景：一方面，如果我们只考虑人数的话，那么乍一看去会认为左派政党是有活力的，可实际上它们的力量比看上去要小得多，另一方面，左翼政党没有一个战斗者组成的中坚组织，因而也无法在某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它们有了强有力的领导，政治时机也发展成熟的情况下——调动起缺乏战斗精神的那部分人。

我们切不可忘记，工人政党的支持者中有20%的人在他们的观念和情感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权威主义倾向。只有5%的人一贯具有权威主义倾向；15%的人模棱两可地表露出此种态度。此外，19%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明显在R回应和A回应之间摇摆不定，表露出造反—权威主义的双重态度。5%的左派具有折中调和的态度，总体上16%的人都可划入中立症候群范畴。<sup>[68]</sup>

174 在对比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不包括社会主义左派）这两类左派中最主要的群体之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人的表现明显要好得多。比如说，明确持激进态度的共产党工作人员人数比例是40%，而这类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的比例只有20%。在共产党工作人员中，没有人有明确的权威主义倾向，而5%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具有明确的权威主义倾向。<sup>[69]</sup>如果我们仔细考量这个详细的结论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分析建构中的明显弱点。只要被访者在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抱有忠诚的信念，那么分析者就不会把他列为权威主义者。例如，如果他们对“你认为什么能改善世界形势”这类问题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而对“你认为谁应对通货膨胀负责”这类问题的回答是“资本家”或“资本主义”（这类随机问题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归类的），那么他

们就不会被确定为权威主义者。但是如果做出此类回答的被访者的确被证明是具有“权威主义态度”的权威主义者或是对他们同伴表现出个人主义态度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归类为“矛盾综合体”或“造反—权威主义型”。分析者这样论述这种类型：

这些人充满了对有钱人或享受生活的人的憎恨与愤怒。社会主义方案中推翻有产者阶级的那部分纲领对这些人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自由和平等的纲领却丝毫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他们随时准备着服从他们所认可的任何强有力的权威；他们总是想控制别人，只要他们所具有的权力允许他们这么做。当把国家社会主义所主张的这类计划提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不可靠性就完全暴露了出来。这类计划不仅和他们支持社会主义计划的那种情感相符，而且更加贴近他们的本性，社会主义不仅不能满足这种本性，而且还同这种本性的无意识相抵触。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就会从不可靠的左派转变成公开纳粹信仰的国家社会主义者。<sup>[70]</sup>

因此，分析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即一个人既可以保持对共产党及其纲领的忠诚，又可以是权威主义者。同时也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人可以不公开信仰共产党及其纲领，但同时他又完全可以持激进态度的。

通过分析个体与其党派身份之间、与其性格结构之间关系的方式“为个体政治观的深层原因及其表现描绘一个图样”<sup>[71]</sup>的计划就这样得出了这个结论：工人政党的追随者对他们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支持远远不够，因此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而最进步的那部分人恰恰是由党的工作人员所代表的。只要想一想下面这个事实，这个结论就不那么可信了：很多工人一直准备着积极地通过暴力方式捍卫自身，而党的工作人员却没能调动起这种正当防卫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相互之间都视若仇敌。

175

作为第三帝国中体力工人和白领工人境况和心理的历史性见证、作为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方面一篇经验研究的开山之作，这个研究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直到 1940 年代，研究所不断地宣布计划出版“埃里希·弗洛姆（主编）”的这部《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工人》。这部有着特殊意义的著作的出版未果让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1）在很大程度上说分析已经基本完成；（2）随后的问卷也不再像初次进行的那样按照弗洛姆在《社会研究学刊》上所提出的要求是为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设计的了；（3）在这次研究过程中像弗洛姆和拉萨斯菲尔德这样的学者都花费了很大的功夫，而且（4）从此次经验研究中得出的具体结论对树立研究所的形象意义重大。可能的原因是，本来打算用英文出版的这项研究成果在霍克海默看来似乎的确是太马克思主义了，弗洛姆后来对沃尔夫冈·彭斯就是这么说的。另一方面，如果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话，它又不够“精致”。另外，霍克海默本人所寻求的思想激励从弗洛姆转向阿多诺也使得霍克海默不愿意出这部著作，尽管在这部著作中弗洛姆在经验社会研究方面的方法论成就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和他那时的妻子奥尔加（Olga）的中国研究之旅，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研究所研究领域的一部分。这次旅行始于 1935 年春（当时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开始忙于长征好几个月了，他们希望通过长征的方式避免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武装彻底歼灭），一直到 1937 年夏才结束（这时日军已经侵入华北，红军和国民党政府宣布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次学术旅行的经费由研究所和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共同承担。研究所希望此次旅行能够取得的成果是魏特夫可以拿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补卷，<sup>[72]</sup>这部书的前一卷作为研究所系列出版物已经出版，另外研究所希望他能拿出关于中国家庭的权威结构的问卷材料，可以用来与欧洲和美国的材料进行比较。魏特夫夫妇回来的时候除了得到别的成果之外，拿回来了一些对“现代产业工人”和“氏族大家庭”的访谈纪录，还有由 1725 名在校学生和大学生填写的问卷（问卷是一些关于“大”人物和好书、好电影和好报刊等等此类的问题），还拿回来了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大量丰富

的材料。

1937年11月，研究所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系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在会上魏特夫汇报了他负责的研究情况以及有待进一步开展的一些计划。在1938年的计划书上，研究所曾公布要出版《中国的家庭与社会》一书，同时计划出版三卷本的《中国：她的社会发展》——如果能找到出版资金，还将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出版八到十卷关于中国历史的原始材料。最终，除了魏特夫的研究报告、发表于1938年《社会研究学刊》的文章“东方社会理论”，发表于1939年学刊上的文章“史前中国社会”之外，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没能按照研究所计划的那样出版。1939年的这篇文章是《古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史》这本没能出版的书的第一章。在“东方社会理论”一文中，魏特夫再次为如下观点辩护：只有从分析生产力结构开始才能勾勒出东方社会运动的特殊法则，才既能解释东方社会的停滞性，又能解释西方产业社会作为历史的一种普世未来的兴起。他认为要解释中央集权官僚势力在东方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要看到这一事实：这种力量特别适合于“东方”农业生产工艺的要求。这些势力不仅见于东方社会——只要某些地方必需大规模灌溉工程，那里就会出现这些势力。依照马克思的学说，他将中国说成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造成的社会形式的高级典范，在生产关系层面上符合“东方社会”的特征，在政治关系上又符合“东方集权主义”特征。<sup>[73]</sup>这篇文章激起了人们的怀疑，也在相同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期待，可是它所预告的出版物都没能面世。

因此《权威与家庭研究》不仅一直是涉及经验研究的“集体”劳动的惟一成果，而且也一直是在研究所1930年代期间就经验研究成果所发表的惟一出版物。研究所的财政困难并不是解释这一事实的合理原因。如果研究所的负责人认为这类研究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他们还是有足够资金出版的。用美国研究标准的束缚来作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一方面，霍克海默圈子很明显地意识到了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危险就在于总是仅仅满足于收罗经验材料。美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1935年的《社会研究学刊》上也

强调了这一事实：不管怎样，一切都得以是否能把特别研究的琐细的材料塞入特定社会理论为转移。<sup>[71]</sup>另一方面，由于有弗洛姆和拉萨斯菲尔德，研究所形成了一个非常关注研究方法的研究队伍，这个队伍引领着最先进的潮流，能力超出了美国学界的平均水平。“形成社会研究方法论”<sup>[72]</sup>在研究所研究规划中是个非常明确的要点。而研究所本身所进行的经验研究对方法论陈述来说绝对是个特别合适的题目。

研究所之所以不愿意出版经验研究结果，一定别有原因。在发表就职讲演时，霍克海默就曾经要求运用“最细致的科学方法”，举例来说，受到精神分析启发的弗洛姆和拉萨斯菲尔德也在描述性分类和阐释性分类之间、在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之间做出了区分，从而构造出了细致的方法。可在霍克海默看来，研究所的工作首先要在理论层面与资产阶级科学区别开来，在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实现各个科学学科合作得出的经验调查研究结果与探讨社会整体运作方式的理论的统一。<sup>[73]</sup>另外，他们只能紧随形势来处理问卷，头脑中必须有放之任何时代而皆准的一种社会整体理论，从而必须采用一种选择性极强的方式来对待问卷。出于这种原因，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必须保持相当松散的关系，这样理论才不会受到牵制，或者说才不会在不需要经验结论的论述之处似是而非引人怀疑。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研究所的真正成就就是理论方面的。在经验研究和科学研究领域，研究所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完成了别人一样能做而没能做出来的调查研究——这仅仅是因为别人感兴趣的主体不同而已。

## 辩证法项目

霍克海默自己把他 1930 年代的作品归在了“辩证逻辑”的名称之下。1939 年 2 月，他写信给研究所日内瓦办公室的秘书法薇女士 (Mme Favez) 说：“现在，我们所有的计划就是在今后几年内撰写一部著作，而我们此前所有的研究，不管是已经出版的还是没有出版的，都只不过

是给它打下的基础。”这是一部论辩证法或辩证逻辑的著作，当他还在欧洲时就已经准备开始写作了。1934年，他把马尔库塞从日内瓦带到美国帮助他从事这项工作，马尔库塞因此成为第一个与他进行此项合作的人。霍克海默1934年7月给弗洛姆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他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细致区分，弗洛姆回信说，“我非常希望所有这些能够被写进《逻辑学》当中；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非常令人愉快的，而我们对此也充满信心。”然而接着，霍克海默认为他只能在阿多诺的帮助下撰写这部著作。1938年，他想让卡尔·柯尔施承担一些相关的任务，同年10月，柯尔施在写给他的朋友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的信中说，“几乎（小圈子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那个‘计划’”。<sup>[77]</sup>

柯尔施认为他192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只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的历史和逻辑研究”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同一年，卢卡奇把他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定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在序言中，卢卡奇提到了马克思1868年写给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信，在那封信中，马克思写道：“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sup>[78]</sup>

然而，马克思在他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理论的著作中对辩证方法仅是进行了临时性的表述，而霍克海默则恰恰相反，他在193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表明了这一点。“辩证法”工程贯穿在他关于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的工作之中，同时这一工程也是他对科学中理性的限制作用——这一点他在发表于《社会研究学刊》第一期的《论科学与危机》中就已指出<sup>[79]</sup>——及“科学主义”所造成的理性人格化所作出的回应。在各种形而上学形式中，辩证法都遭到理性主义者以科学名义的拒绝，对此，人们希望辩证法能够通过对科学的批判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对自身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进行校正。这样一来，关于社会理论的工作就隐入后台了。在霍克海默和他最亲密的同伴们的文章中经常提到社

会理论，而且霍克海默圈子也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论，而且这一理论经常被简单地称为“正确的理论”，尽管它还需要在未来加以完善。在《权威与家庭研究》的序言中，霍克海默指出，他们所探究的问题的复杂性“在其真正意义上，只能从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生活理论背景上看出”。

179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提出，作为研究所的总体要求和工作计划，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应当联合起来进行持久的合作，并应在社会研究领域把哲学理论和具体的科学实践辩证地结合起来。而这是单个人所无法完成的。这里所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哲学家和单纯的科学专家之间的合作，而是不同理论家之间的合作，这些理论家每人都熟知一门科学学科，而哲学是这些学科之一。根据认识论的哲学传统、科学理论以及传统的当代形式，很容易区分理论家们研究方法的具体特征。这种个人之间的理论和科学专业的合作至少在一开始，就没有认真地考虑“哲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持续的辩证结合”这一表述的准确含义。是否可以对这一含义作如下表述呢？即并非机械地，而是根据综合性社会理论的具体结构及该理论的当前发展状况对不同学科的方法和结论加以运用，并（像《社会研究学刊》的计划书所说）从每一学科自身的发展出发，致力于调整和扩展这一理论。面对这些问题，霍克海默认为可以用黑格尔的知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不同科学学科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1935年发表于《社会研究学刊》的《真理问题》一文中，霍克海默全面阐述了“辩证思想诸特点”：

辩证思想意识到了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并在相对的意义理解每一个孤立的、具有多重含义的定义。（从一个假定的绝对出发产生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在唯物主义之中则要利用不断获得的经验。）它并不是一个一个地罗列客体的各种特性，而是试图通过分析特殊客体的每一总体特征，表明自身所进行的这一总体化过程也同时与这一客体相矛盾，而且，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一

点，也必须考虑到该客体的相反特征及整个知识体系。接下来就达到了这一原则，即只有从完整的理论整体出发进行考察才是正确的，因此对每一项考察，应当把它的表述和理论的结构性原则与实践倾向相联系，以这样的方式对它进行概念化的理解。与所有这些紧密相关的是，尽管应当坚定地忠于基本的理想、目标及时代的历史性任务，但其表现形式应是“对立统一”而不是“非此即彼”。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自然和人类历史中，后退的冲动和前进的冲动、保护的冲动和破坏的冲动，以及具体情况下好的和坏的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当为了与现实和解而转向形而上学和宗教时，不应当简单接受具体科学中合理的分析和抽象，而应当努力把由分析所获得的概念相互结合起来，并根据这些概念重新建构现实。辩证理性的这些特征及所有其他特征都同复杂现实的形式相对应，并在细节上不断调整。<sup>[80]</sup>

霍克海默勾画了一种深入开放的、复杂的整体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和阿多诺的阐释性哲学方式不同，其原因并不在于它使不同的科学学科在严格意义上具有了多么大的科学性，而在于它赋予它所解释的现实以完全非神学的社会历史特征。和形而上学的直觉不同，社会理论不能忽视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因而，一个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性质具有洞察力，要比他是否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更重要。

现在，也许可以根据掌握知识的多寡来区分不同的人群，但这一区分不应关注人们掌握了多少学院知识，而应关注人们的某些行为迹象，这些行为表现出人们对于社会斗争的态度。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一个已经具有果断洞察力的人会运用其他领域的知识。<sup>[81]</sup>

1936年，霍克海默发表了《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资产阶级时代的人类学》一文，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和他其他少数几篇文章一样，没有涉及对其他理论倾向的批评，也没有涉及唯物主

义认识理论及其纲要。但它论述了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就社会理论的辩证方法而言，可以从这篇文章得到什么收获呢？它具有多么大的合理性和解释性呢？这篇文章是辩证的，因此，在霍克海默的批评眼光看来，资产阶级哲学人类学中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倾向，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而且是相互转化的，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悲观主义者愤世嫉俗地认为人类的天性就是罪恶的和危险的，因此必须以强有力的体系对其进行控制（并给人们灌输个体脱罪的清教主义学说，以严格的纪律使他们的本能完全服从于他们的责任）；与之相反，乐观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天性本来是纯洁的、趋向和睦的，只是被当今时代有限而败坏的环境给搞乱了。很明显，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看法都预设了同一个前提，即要坚决摒弃人类的每一种自私的本能。<sup>[82]</sup>

181 这一点被霍克海默的描述所支持，因为霍克海默证明了这一社会作用，即通过对唯我论的共同谴责，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类学倾向，可以在同等程度上发挥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竞争性的原则越多，那些深陷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人们就越是发现，为了在残酷的现实中生存，他们必须越来越多地迫使自己发挥自己天性中自私的和敌对的一面。对唯我论的憎恶可以让成功人士的成功免受质疑，而如果那些不太成功的人一旦无节制地效法他们，这种质疑便会产生。

或是断言存在着更为高贵的人类天性，或是简单地给它贴上兽性的标签，人类学以这样的方式对唯我论进行指责。但这种指责根本改变不了追求权力的强烈野心，改变不了悲惨与繁荣并存的生活，改变不了过时的、不公正的社会形式的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哲学伦理学更机巧地在这一点上做到了不偏不倚。大多数人必须学会控制他们追求幸福的要求，必须学会粉碎他们希图像少数人那样快乐生活的欲望——但更切近地审视，那些少数人

的确是快乐的，尽管快乐本身被这一方便的道德裁决断定为有罪……典型的上流资产阶级分子受到他自己阶级对社会其他阶级的道德宣传的影响，结果是，按照他的意识形态来看，剥削以及对人力、物力的随意支配根本不能给他带来快乐。毋宁说，那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公共服务，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以及对注定要接受的生活道路的履行，这样他就能够在其中融入自己的信念并对它由衷拥护。<sup>[83]</sup>

资产阶级人类学中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倾向都按照使现实所造就的人的状态漫画化的方式去把握人。霍克海默通过证明这两种倾向具有决定性的共同之处，提出了与这一共同之处相反的假说：“自由的愉悦是不能理性化的，也就是说，对它的追求不需要任何证明”，它是“绝对的快乐冲动”<sup>[81]</sup>，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好的唯我论形式。而对真正唯我论的厌恶不仅有利于造成贫富不平等，而且还会影响到唯我论本来就有的较好的方面。

对资产阶级性格来说，那些愉快的时刻并不会带来伴随终生的快乐，也不能使生命中那些并不愉快的部分也充满快乐，相反，唯心主义者对优雅风度和自我克制的鼓吹削弱了人们直接体验快乐的能力，使之变得粗俗甚至经常完全丧失。没有大的灾祸，心灵没有冲突，或者说，摆脱了内在和外在痛苦和折磨的相对的自由；还有那种不偏不倚但常常是忧郁的、并惯于在极端忙碌和无聊的单调之间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所有这些都错当成了幸福。那关于令人厌恶的“共通的”快乐的观念如此成功，以至于普通公民，如果他们允许自己耽于享乐的话，就会变得卑鄙而不是自由，粗鲁而不是文雅，愚蠢而不是明智。<sup>[85]</sup>

182

在霍克海默写的这篇文章当中，丝毫没有说明这些反唯我论的人类学信条——必须依赖于发展着的人类能力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法——

是如何产生的。他也没有指出，唯我论的固有的好的方面来自何处，其中的突变如何发生，以及它植根于何种经济和社会趋势。他只是提到类似的历史利益的代表与“天主教对某些人类反应方式的宽容”相决裂，这些“反应方式妨害了新经济秩序的引入”，提到了自由竞争原则最初的先进性，还提到了远在资产阶级产生之初文明进程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使人获得解放，一方面又使人受到精神上的奴役。<sup>[86]</sup>

在这篇论文的末尾，描述了资产阶级人类学的转变：

当前，无论是束缚和困扰大众的唯一论，还是经济方面的利己主义原则，实际上都已经变得很有破坏性。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原则只是在经济上表现出了它最野蛮的一面。如果后者得以克服，那么前者就能够在新的意义上成为生产性的力量……唯心主义道德使得这一点不为人所察知，它还不能被抛弃，但它必须被历史地认识并因而还不能绕过去。唯我论的前途命运如何？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走向死亡和毁灭”的那个答案现在受到了一种更理性的现实形式的普遍谴责。近来有些迹象都指向了这一点，并得出了与此相同的结论。某些反对主流观念的思想家，既不隐藏自己的利己主义信念、也不减弱或反对这一信念，而是支持这一信念。在一些经济学家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看来，唯我论并不表现为悲惨的、抽象的构想，相反，它表现为享乐和幸福的最大尺度，其中也包括对于残暴欲望的满足。这些思想家并未把历史给予的任何原初本能予以理想化——相反，他们揭露了官方意识形态对这些本能的歪曲……这些心理学家[享乐主义心理学家，阿里斯第帕（Aristippus）、伊壁鸠鲁（Epicurus）、曼德维尔（Mandeville）、爱尔维修（Helvetius）、德·萨德（de Sade）和尼采（Nietzsche）]自己的存在似乎就表明，从禁欲主义的道德中解放出来，连同它的虚无主义的后果，会使人性转变到与精神净化相反的方向上去。这个超越了精神净化的进程，并未使人性回到早先的精神阶段，就好像第一个过程从未发生一样。它使人性到达了

一个新的、更高的存在形式。这些思想家很少致力于使这一过程变成普遍现实；而这一过程首先是那些能把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统一的历史人物的任务。在他们那里，作为他们生活中决定性力量和理论目标的资产阶级心理学机制，在他们的历史使命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衰败时代那否定幸福的令人沮丧的时代精神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可言。<sup>[87]</sup>

这是一个呼吁，希望未被扭曲的利己主义要素能从唯心主义道德与被唯心主义道德所指责的唯我主义精神之间的对立中，从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矛盾中辩证地发展起来。这种利己主义将能把可以把握现实而不是试图美化现实的唯心主义道德结合进来。这一呼吁也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内涵，即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只有通过社会进步才能实现，而且，还应看到，无产阶级的进步理论家和进步代表已经开始着手实现这一要求。但这很难被视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型胜利，也许它所展示的只是辩证法程序本身的启发价值。霍克海默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程序，也就是说，他把概念意义的变化同这些概念的社会功能联系起来。他推测可能存在的辩证发展依赖于一个假设，即存在着这么一个过程，它可以作用于一切可能的领域，抑制或释放渴求最好人类状况的那些力量。这一点很难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决定论区分开来。

可以说，霍克海默在这里所表述的一切，依据的是他对资产阶级时代他能记起来的众多“黑暗”作家的认识，而且这些表述或多或少偏离了科学研究的特定道路。这篇文章，加上大部头的《权威与家庭研究》，以及他为1938年探讨怀疑主义功能变化而写的《蒙田和怀疑主义的功能》<sup>[88]</sup>一文，这三部作品都典型地说明了他更相信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透事物背后的东西，而不是用太多时间去孤立地研究事实本身。

在1937年的两篇长文——《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sup>[89]</sup>，霍克海默对观念和态度的功能所发生的改变进行

184 批评。1936年11月霍克海默写信给格罗斯曼说：

在研究所里，我们已经可以在下午或晚上进行讨论了，就像我们去年夏天所做的那样。这些讨论部分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是关于哲学问题的。而在后者中，所谓逻辑经验主义占了大部分。众所周知，这是当前学术圈子里最受欢迎的哲学时尚……这一路向在整个科学圈子里、尤其是在英美世界获得了成功，但它获得成功的方式却是不能被夸大的。<sup>[90]</sup>

霍克海默的批判并不温和。他把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唯名论倾向的现代代表，这一倾向现在所起的作用已经是退步的而不是进步的。专业科学由于它们在客观性和准确性观念上的转变，通过一方面舍弃与感知性的主体的联系，另一方面舍弃与旨在完全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积极的理性能力的联系，已经背叛了自由主义里的进步要素。这意味着从自由主义的反动要素中产生的极权主义正使科学面临着恐怖的情势。霍克海默考察了实证主义经验理论对实践生活的隐含意义之后，就以《破晓与黄昏》中激进的批判精神指出了实证主义经验理论中心命题的真正含义。

思想是一种了解世界的工具，而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这种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观点，却在维也纳小组的一本著作中得到了确切表达。这一点在一个表面上有着引人注目的统一和秩序、而其内部却充满了混乱和痛苦的世界上，尤其具有意义。独裁者、残酷的殖民统治者、有虐待狂癖的监狱看守，总是怀着实证主义的心理期待着到访者。如果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受到经验主义的指导，如果知识分子不再迫切地和充满信心地研究各

种错综复杂的观察结果，以发掘出关于世界的更多的情况，而不是仅仅关心我们有趣的每日新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在被动地参与着对于普遍的不公正状态的维护。<sup>[91]</sup>

例如，尽管实证主义者并不拒绝抗议极权主义政权，但这一抗议还是被看作一种超越了理性和非理性界限的“评价”。实证主义者因此就为旨在控制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过程的那些程序保留着威望，并通过思维和理性澄清这些程序。为了澄清并贯彻对社会来说是理性的过程，可以排除他们。

185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论断霍克海默没有使用：实证主义者视为实体化的计算性思想 (calculative thinking) 本身绝不是价值中立的。这一思想产生于控制自然的兴趣，就如同霍克海默所捍卫的社会理论产生于建立合理社会的兴趣一样。因此，实证主义者关于为思想设限的基本论断，也同样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思想。但是，不管霍克海默怎样理解控制自然的观念，这一概念对他来说都过于不证自明了，以至于他对此视而不见，他甚至希望将这一概念用于控制人类的天性。他根据阶级上升和衰落的模型进行了分类——“在目前凄惨的情况下，新浪漫主义形而上学和激进的实证主义同样植根于中间阶级的大部分。这个中间阶级已经放弃了所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善境况的希望，并且害怕社会体系发生彻底变革，因此它投入到资产阶级经济领袖的怀中”<sup>[92]</sup>——并且将这一分类扩展到一种与费希特《科学理论导论》<sup>[93]</sup>中那段著名段落相近的社会的和人类学的说明，在这里，霍克海默区分了两种主要的人种或人类的两个阶段：

计算性的、“常识性的”思想是那一类依然相对无权力的人所为。尽管他们具有行动的天性，但常常在重大事件上消极被动。组织和管理的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越来越多地变成最有权力者的特权，在今天被分割的世界上，这些功能比理性具有多得多的服从和狡猾的特性。由于更大范围的自发性有赖于形成一个共同接

受的主题，因此个人自身仅凭裁定绝不可能使之建立起来。形成这一自发性的一种方式……个人不应当限于记录、预测事实和单纯的计算之中，而应当学会看到事实的背后，区分表面现象和本质（当然，并不忽视表面现象），明确表达那些不是简单地对事实进行分类的概念，始终根据确定的、而不是虚构的目标来建构他的整个经验；总而言之，个人应当学会辩证地思考。<sup>[94]</sup>

独立行动的人在每一个地方都看到整体和部分，而顺从的意识把每个事物都看成是孤立的，反之亦然。<sup>[95]</sup>

186 在1937年下半年，《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发表（在同一年的《社会研究学刊》第三期上增加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文章《哲学和批判理论》<sup>[96]</sup>），由于它在标题和结构上的两分法及其概括性的特征，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霍克海默最著名的文章。在写完了他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之后，他在1937年7月写信给亨利耶克·格罗斯曼说：“我已经完成了一篇论述理论概念的文章，它实际上是一篇纪念文章。”1936年格罗斯曼就建议出版一期关于马克思或经济学的学刊，以纪念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70周年。霍克海默之所以认为他的文章是《资本论》的纪念文章，是因为，尽管在文章里他并未提及纪念一事，但文章明确提出辩证逻辑作为逻辑结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对于社会的和理论上的唯物主义来说，“批判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是社会的和理论的唯物主义的新标签，但无论是这个新标签还是旧标签“唯物主义理论”都不表明他完全接近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引人注目地把青年黑格尔的“理性的反崇高化”（哈贝马斯语）与马克思特有的理性的敏锐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积极干预世界的思考。这一批判立场的无法调和的、几乎是存在主义的特征在“传统理论”的末尾也得到了充分表达，而“批判理论”以这样的文字开始反对它：“存在着这样一种人的活动，它把社会本身视为自己的对象”，在这句话的注释中说，“在后面几页中，这种活动被称为‘批判的’活动”。正文中继续写道，“这种活

动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消除各种弊端，因为它认为这些弊端同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sup>[97]</sup>

霍克海默圈子并不想从实证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方法的体系中把各门科学学科拯救出来。相反，他们显得越来越蔑视科学和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那就更容易了，因为研究所在其全盛时期所反映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根本不能被视为专门的科学学科。弗洛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许多最具启发性的观点都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延续了资产阶级时代倾向于心理学或人类学的“黑暗”小说家传统。这是一个中心要素，它使得霍克海默及他的最重要的理论同伴认识到，通过涉猎专门学科可以获得——或者更好地获得——重要的洞察力。例如，弗洛姆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哲学家，但在1938年3月，他却能写信给霍克海默，信中并未贬低自己：“我刚刚读到一篇绝妙的评论，我会复印给你，不过可能你已经读到了：‘不管是谁，如果他进入了专门的科学学科而没有获得任何哲学知识，那么他就像是帕涅萝帕（Penelope）\*的求婚者，在无法得到女主人的时候就同女奴们调情。’”在1930年代，哲学同专门科学的关系变得有点更不可靠，尽管这对研究所活动的全景没有多少影响。 187

阿多诺的情况从一开始就不同于霍克海默。他的主要兴趣并不在社会理论，而是在当代社会中的艺术及艺术如何可能的问题。<sup>[98]</sup>有了这一兴趣，就可望规避那种使用某些历史哲学观点对艺术作品进行技术性分析的做法。在阿多诺论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出版之后，精神（Geist）与自然的和解的思想越来越成为阿多诺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表明了一种信念：在内部被理解的神秘自然和同样在内部被理解的精神，无须从外部获得拯救，而且超越性就是内在性本身所固有的。但对如何从社会的和历史的角进行阐释却并未提及。阿多诺满意地看到，在音乐中有一些东西符合他对拯救的设想。在1936年的《维也纳音乐

---

\* 尤利西斯在外历经20年漂泊，帕涅萝帕在家中苦苦守候。妄图占有她和伊达卡王国的贵族们一直试图向她求婚，但帕涅萝帕坚守妇道，在家中纺线，终于等到了丈夫的归来。——中译者注

杂志》第 23 期上，发表了阿多诺的“关于马勒的旁注”(Marginalia on Mahler)，他写道：

(马勒)对音乐的批评不可能忘记它的现实，不可能被打扮成音乐里的堂吉诃德去和现实作战。他以最严肃的方式关注着音乐的物化(reification)——严肃得以至于使之粉碎。物化的残迹以及与之相关的感情的残迹，就是他的素材；而多声部的理性对于这些残迹进行着有力和有序的控制。

但阿多诺并未尝试说明——即使是以图示方式说明——作为理性的一种自主的、主观的形式，能再现内在关系的多声部理性何以能够使自己改造为更好的并成为支配性的理性，从而使精神和自然相互补充、自由发展。惟一的线索就是晦暗不明的现象，其后可能掩藏着上升或衰落、开始或结束、崩溃或再生。

马勒让存在的东西仍居其位，但却从内部将其耗尽。现在，旧形式的藩篱与其说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不如说是对将要发生的事的讽喻……撒旦式的反抗的最后姿态——这一姿态在讽喻的崩塌中分崩离析——也许实际上意味着和解；而对那些毫无希望的人来说，在近旁燃烧的毁坏之火也许实际上是闪耀在他们头上的遥远的拯救之光。这二者也许都存在于马勒的音乐中。在《地球之歌》的结尾，美丽的雪就是这样模棱两可：就像一个孤独的人会在其中死于寒冷，雪也会消失在单纯存在的恐慌之中，但雪可能也是神圣的喜乐的白色，作为最后的存在，它使获得拯救的人拥有实在，并像希望之星一样激励那些后来的人，把他们吸引到窗前。<sup>[99]</sup>

188

这种寓言式的哲学，也恰恰同阿多诺把自己看作是受神学启发的思想家的一贯看法相一致。<sup>[100]</sup>

这一设想使阿多诺能够以一种方式处理每一件可能的事情，那就

是“打破它”并“解放”它。在他多年间写给霍克海默的那些致使他去往纽约的信件中，内在的转变是他喜欢谈论的话题。在论胡塞尔的著作中，他一次又一次强调，他正在构思从内部打破唯心主义的计划。1936年5月，他建议霍克海默写一个长篇评论，以一种“高度辩证的方式”评论“纳粹主义哲学”，从而使这种哲学和谎言从内部瓦解掉，“极大地推进到让它再不能够隐瞒真相的程度”。他还曾就霍克海默后来发表在1937年《社会研究学刊》上的“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提出了一些建议。紧随这些建议，他还补充写道：“我将最着重于从相关的两点上关注内在的驳斥：轮盘赌桌上的逻辑和无主体的经验，即，缺乏人的经验。因为，伴随着作为整体的概念体系的崩溃，这两点是真正致命的。”1936年12月他告诉霍克海默，他已经建议索恩-雷塔尔应当“让克拉格斯 (Klages) 辩证化，从而让他不仅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反动者——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要让他表现为资产阶级工作意识形态的批判者”。1937年3月，他只对霍克海默的关于实证主义的文章手稿中的一个段落提了惟一一条真正的反对意见，因为霍克海默在这一段落中说“不可能以一种内在性方式压倒逻辑实证主义”。这个说法非常站不住脚，而且和内在批判要素相矛盾，而本文正是一种内在批判。这一反对意见使霍克海默删去了那个表述。1937年4月阿多诺强烈要求对“非常棘手的克努特·汉姆生 (Knut Hamsun) 的情况”提高警惕，洛文塔尔已经打算就汉姆生写一篇文章，而阿多诺认为“要证明汉姆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是容易的，而要从中得出更富有价值的成果则要困难得多，而最棘手的就是如何从汉姆生本人那里拯救一个汉姆生”，而这恰恰是关键所在。这一警告并未阻止阿多诺给洛文塔尔那篇论汉姆生的、完全“非辩证的”文章增加一个关于J. 西贝柳斯 (Jean Sibelius) 的脚注，而这一做法如同这篇文章一样是“非辩证的”。1937年10月他绝望地再次要求自己那篇论胡塞尔的文章手稿应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刊出，但结果是徒劳的，霍克海默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理由是它在其最连贯的形式中并未对唯心主义进行内在反驳：这一反驳不是内在的，胡塞尔主义哲学不是最连贯的唯心主义形式，而且，对胡塞尔主义哲学与当前历史情

境的关系也没有清晰说明。

189

因此对阿多诺来说，辩证法，就像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表明的那样，就意味着我要进入与我对立的力量之中，并通过使已经变得模糊的、事物之间的区分重新凸显出来从而使对方的立足点自然而然地陷入矛盾。当时还是黑格尔左派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一句话：“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sup>[101]</sup>这句话让阿多诺深受启发。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接近黑格尔辩证法，尽管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不同方面的运用各有侧重。对霍克海默来说，辩证法首先意味着在相对的整体中进行思考，建立起一种关于科学的批判理论，并用其来证明存在一种可以取代各种科学学科和形而上学之狭隘思维的思想方法。对阿多诺来说，辩证法意味着一种对当代事件的广阔领域进行祛魅化（demythologizing）和祛神秘化（demystifying）的可能性。这又使他们同布洛赫和本雅明具有了关联之处。对阿多诺来说，就如同对布洛赫和本雅明一样，扬弃概念（Aufhebung）在如下意义上与神学有关：它突破各种内在关系的限制，解放那些局限于它们之内、可能逃脱的要素。阿多诺同布洛赫和本雅明的另一点相近之处在于：他确信，哲学从艺术——也就是说，从现代艺术——那里比从科学那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获。他们四个人能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对不受限制的经验 and 不受限制的理性感兴趣，他们都确信：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一系列先前被遗漏的要素，因此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还确信，跨越最广阔战线的最丰富的斗争正在进行。

布洛赫 1935 年在苏黎世出版了《我们时代的遗产》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勾勒出了这个战场的全景（他曾经提到“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更经常地提到魏森格隆德，并多次提及本雅明这位具有超现实主义思想风格的哲学家）。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一方面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对精神欣快症的利用，并对这种利用进行启蒙式的谴责，另一方面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取代精神欣快症。

不只是一个阶级革命性的兴起或它的繁荣时期，而且在它的衰落期以及这种衰亡所释放的各种内容当中，可以发现具有辩证意义的“遗产”。就其本身来看，直接可以发现，法西斯主义引人注目或者精神欣快的幻象志不在小，它们用这一幻象驱赶那些正在陷入贫困的阶级，并将他们投入黑暗之中。然而，间接地看，可以在非理性的精神欣快之中看到，从那些不仅仅只对资本主义有利的深渊中正在升腾起潜在的能量。在德国恐怖的每时每刻、每个言辞当中，透露出来的不是残酷和无言的野蛮，不是愚蠢和惊慌失措的轻信，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某种老旧的浪漫主义的反驳，这种反驳在当下生活中怀念着某种东西，渴念一种不同的但目前依然隐而不显的生活。农业工人和白领工人脆弱的境况在这里反映出了许多的情况，不仅有某种倒退，还有间或的某种真实的“时空错乱”，也就是说，某种来自早期世代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残余。当今这种时空错乱当中的矛盾仅仅有利于倒退；但这儿也有一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如何在几乎不引起任何骚乱的情况下利用这一矛盾。存在于不充分的资本主义理性（ratio）之中的非理性（irratio），只是在过于抽象的层面上被排除掉了，而没有对其进行具体地审查，也没有对这种关系本身的矛盾做出必要的明确描述。<sup>[102]</sup>

布洛赫与本雅明在如下一些范畴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基础：梦想与神话、早期和晚期以及古代的和辩证的概念都是他们共同的中心概念。本雅明也明确地考察了衰亡时期。<sup>[103]</sup>在他看来，在针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所需要的是一种权力形式，这种权力“源自历史的深处，其深度不亚于法西斯主义者的权力”。<sup>[104]</sup>本雅明把超现实主义看成是一个赢得“陶醉于革命的力量”的重要步骤。<sup>[105]</sup>他还强调必须超越“有关陶醉之本质的非辩证的超现实主义观点”。在他早期的《拱廊街》笔记中，他写道，“尽管阿拉贡（Aragon）仍沉浸在梦想世界之中，但这里现

实的情况却令人警醒。在阿拉贡身上有着印象主义的要素——‘神话学’……但在这里，‘神话学’在历史空间中却遭到消解。”<sup>[106]</sup>但是，布洛赫与本雅明的理论基调和一般看法还是很不一样的：布洛赫的理论基调是欢快的，本雅明的理论基调是痛苦的；布洛赫相信“生命”具有不能毁灭、无法控制的性质，“生命在任何时期都未能完全实现”；<sup>[107]</sup>本雅明绝望地考察克拉考尔称为“危险游戏”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只能利用越来越少的资源使更多的东西获得拯救。

1937年，在与霍克海默商量之后，阿多诺请布洛赫惠寄其著作手稿中论唯物主义问题的那部分。他和霍克海默想同布洛赫进行一种交换：他们在杂志上发表布洛赫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作为交换，布洛赫在其著作中提到霍克海默圈子的唯物主义理论。但阅读了布洛赫的手稿之后，阿多诺证实了自己的担心——他担心的不是布洛赫的“乌托邦主义”或者“党派忠诚”，而是“哲学上某种不负责任的即兴发挥”。<sup>[108]</sup>研究所从未发表布洛赫的任何东西，学刊也没有对他的书作过任何评论，只是1940年代早期的一段时间每月资助过布洛赫50美元的薪水。<sup>[109]</sup>

阿多诺期待本雅明能提出一种布洛赫和克拉考尔都无力提出的哲学（对于克拉考尔在逃往法国期间写的《雅克·奥芬巴赫 [Jacques Offenbach] 和他的巴黎时代》<sup>[110]</sup>一书，阿多诺在写给他的前任顾问的信中提出了毁灭性的批评，认为该书是旨在获得成功销售的可怜尝试），这种哲学应当既是具体的，又是超越的，应当把经验的确定性和思想的严格性结合起来，从而找到走出资产阶级固有梦想状态的途径。在1930年代，阿多诺就像一个监督者一样，尽力促使本雅明用历史唯物主义反思神学，他认为，霍克海默越来越赞赏这种反思。

霍克海默表现出既谨慎又开放的态度，就像当初对待弗洛姆加入研究所那样，他认为本雅明的研究项目是对唯物主义理论的丰富，并让研究所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尽管他是以一种研究所指导者所特有的犹豫的和无法预测的方式这样做的。（在本雅明写给朔勒姆的信中，霍克海默因为这一态度几乎表现为虐待狂，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本雅明性格上的缺点。本雅明仍然认为，为了使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他

的学术工作之中，社会必须保证他的生活。) 在本雅明看来，霍克海默在资助这样一个人——当辩证法项目 (the dialectics project) 实现的时候，他将成为这一项目实际上的指路明星。

### 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街》——研究所和阿多诺

本雅明成为《社会研究学刊》的写作成员后，他获得了每月 500 法郎的收入——但这比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水平还要低。这一收入水平让他仍然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帮助：他的前妻、阿多诺、阿多诺的姨妈和魏森格隆德家的一位朋友、他和阿多诺共同的朋友格雷特尔·卡尔普鲁斯——当时她还是柏林皮革厂的股东，还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sup>[111]</sup> 本雅明希望研究所能给他足够的收入，使他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并能使他完成他的《拱廊街》项目。写作论巴黎行政长官奥斯曼 (Haussmann) 的文章可以得到一笔钱，在金钱的激励下，本雅明于 1934 年重新开始了这一研究。但这篇文章终未写成，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完全沉浸在《拱廊街》的整体研究之中，将之当成了一个避难所，同时却没有其他可以提供预付酬金的短期资助。

阿多诺作为本雅明“监督者”的活动，首先就表现在这一时期的书信里。阿多诺不喜欢本雅明给《社会研究学刊》写的论法国作家社会地位的稿件，也不喜欢他对马克斯·科默雷尔论让·保尔的著作所作的评论，<sup>[112]</sup>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给本雅明写信。他不明的原因是明显的：本雅明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关心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他发表在学刊第一期上的《论音乐的社会地位》一文中<sup>[113]</sup>，阿多诺强调，只有当音乐不是向外盯着社会，不让自己被无产阶级的意识所阻碍，而是在其自身问题的内在发展中前进时，音乐才能最好地完成它的社会功能。无产阶级被阶级控制所损坏。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见解仅仅是他从本雅明那里学到的东西。本雅明把 1928 年出版的《单向街》题献给曾一度担任工会宣传演出导演的共产党员阿西娅·拉西斯，在这本书中，本雅

192

明写到了“马拉美在他的与世隔绝的空间中独自作出的发现”在当前的意义，“这些发现是通过预先接受我们时代在经济、技术和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所有决定性的事件而获得的”<sup>[111]</sup>。而在文章的末尾，本雅明表述了相反的观点。在任何艺术中，激进派的最为前卫和大胆的作品唯一的观众一直是上层中产阶级。关键是要对知识分子进行适当的定位——超现实主义者也认真地接受了这一点——就像通过使他们的技术服务于无产阶级而对技术工人进行定位一样，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依赖于最先进技术。阿多诺认为，这些观点显示出布莱希特，那个“疯子”（阅读了本雅明的手稿《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后，阿多诺在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这样称呼布莱希特<sup>[115]</sup>）对本雅明的影响。1934年夏天，本雅明和布莱希特一起在丹麦的斯文堡（Svendborg）流亡，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很长时间经常与布莱希特呆在一起。

当阿多诺在牛津听说本雅明已经重新开始了《拱廊街》的写作，他非常高兴。

你所提到的你的散文时期的结束，尤其是你开始写作《拱廊街》，这确实是多年来你告诉我的最好消息。你知道，我把这部著作视为已经给予我们的第一哲学的一部分，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在经过长期的和痛苦的中断之后，你能以这项任务所要求的坚定和能力来完成它。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愿意在这项工作开始之时提出我的希望，那就是：应当毫不迟疑地在那些所涉及的最极端的论题中，充实足够的神学内容及字面意义（*literalness*）。（简单来说，这一工作应当毫不迟疑地忽略掉布莱希特无神论的反对意见，这种无神论作为一种颠倒的神学，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必须去拯救它，但我们现在的任务却并非是利用它！）而且，为了它所做出的承诺，这一工作也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同社会理论在外观上的联系。因为在我看来，这一工作确实是最重要的问题和最严肃的事情，必须对其进行充分、完整的探讨，在不回避神学的情况下使之充分地概念化。我也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个决定性的层面上，我

们是大有可为的，而不只是顺从地接受它。而且，如果阶级理论仅仅是一种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那么“审美”将以一种阶级理论所无法比拟的更为深刻、更具革命性的方式触及现实。<sup>[116]</sup>

1935年春波洛克在旅行欧洲期间和本雅明谈论起着手研究工作的事情。本雅明开始草拟《拱廊街》的提纲。研究所也把薪水提高到每月1000法郎，起初只是暂时性的，后来就固定下来。然而，当阿多诺在访问欧洲期间遇到波洛克时，他提醒波洛克说，本雅明的著作将有过多的形而上学内容，不符合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就像阿多诺自己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著作那样。格雷特·卡尔普鲁斯写信给本雅明说：

我很吃惊，弗里茨 [波洛克] 对笔记感兴趣——你正在为杂志考虑论文吗？实际上，我把这视为巨大的危险，而其规模相对较小。你根本无法写出你的真正的朋友们多年来期待于你的著作。伟大的哲学著作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它只为自身而存在。但它的重要性，将会补偿你在过去几年里的遭遇。<sup>[117]</sup>

阿多诺仍然希望把他自己及他的神学唯物主义朋友的立场置于杂志的突出位置。但他显然也有疑虑，不知道对这一立场的重点推出在研究所的工作架构内是否可能。而且，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引起人们怀疑他对霍克海默和研究所的忠诚。

在1935年5月末写给阿多诺的信中，本雅明提出了他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的提纲，并竭力破除两方面的疑虑。

（令我惊奇的是）这本书与我论巴洛克风格的书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而且这一点比以前任何一个阶段都表现得更为明显。恕我直言，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一个重组过程，这一过程把所有那些起初由形而上学激起的思想整合进一种状态之中，在这一状态中，辩证概念所构成的世界可以免受形而上学带来的任何

一种异议。

在工作的这一阶段，(我也是现在首次承认)我能够平静地思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时会提出怎样的责难。但是相反，我认为我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方法的长期讨论中，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即使只是因为历史观念这一重要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当一部著作所包含的哲学不是同它的专用术语，而是同它所处理的区域相联系时，我相信这确实是菲利斯塔斯 (Felicitas) [即格蕾特尔·卡尔普鲁斯] 所提到的那种“伟大哲学著作”的纲要，尽管它目前还仅是一种我不很满意的粗略描述。你知道，我把它看作是与 19 世纪的原初史 (protohistory) 相关的事情。<sup>[118]</sup>

本雅明的提纲及信件显然让阿多诺确信：这些材料并未背离本雅明原先的计划，不过也不会适合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在把神学主题纳入唯物主义改造的秩序中这一点上，有望获得某些成果。在收到提纲一周以后，阿多诺一时冲动写信给霍克海默，坚决地支持本雅明。他已经相信

这一工作不包含任何不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检验的东西。它原先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临时创作的性质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我并不仅仅是说最终它会是积极的（这将必然导致我们之间的争论），而是说在研究所的工作范围内，对于研究的适当性来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积极的，对此它会自我调整。而且，它的优点是，它提出的问题具有创新性，而且它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学术体制内通常的研究方法。它试图运用作为辩证观念的“商品”概念把 19 世纪当作一种“风格”进行研究。

在阿多诺看来，霍克海默本人在“卡尔顿饭店 (Carlton Hotel) 1920 年代末那次有纪念意义的谈话”中就已明确表示，成为历史图景这一特征乃是商品的核心特征，因此霍克海默本人已经开始重新定位本雅明和

阿多诺的思想了。

你也许记得一两个月之前我在写给你的信中提到，我认为在社会和心理学之间起调节作用的重要概念不是家庭，而是商品特性……当时我并不知道本雅明沿着同样的思路思考——那个提纲在很大程度上祛除了我的疑虑。商品拜物教被当作意识活动的关键，尤其被当作 19 世纪资产阶级无意识思想的关键。在关于世界展示的一章，尤其是在关于波德莱尔的优秀章节中包含着这方面的重要材料。

195

他建议推迟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文化历史学家爱德华·福赫斯的研究，并且推迟对社会民主主义周刊《新时代》（*Die Neue Zeit*, 1883 年至 1922 年出版）的文化观的研究，这一刊物曾在很长一段时间获得霍克海默和本雅明的赞赏。“既然这种力量的多产性能量——我们毕竟不能因我们的生产条件而束缚这些能量——就摆在我们面前”，<sup>[119]</sup> 本雅明就不会对这些特别感兴趣。

因此，阿多诺赞成的东西恰恰是植根于他对马克思《资本论》一个段落的崭新读解的兴趣，对于魏玛时期的左派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那一段论述被认为极其重要。<sup>[120]</sup> 要考察商品世界就需要具备阐释寓言的语文学家的眼光，这种语文学家类似于美学现代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波德莱尔。在阿多诺看来，这将使这样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阐释得以形成：在物质上衰败的世界这一神学范畴将被阐释成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范畴。这种阐释并不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冲突，而是使之更为彻底，因为它把商品世界解释为一种神话式的原始图景，解释为真实世界的某种可怕的、否定的影像。

霍克海默支持这份提纲。“你的工作将会十分出色”，1935 年 9 月他写信给本雅明说，“立足于细小的、表面的症状来把握时代的方法在这一时刻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您正在取得极大的进展，以超越此前对审美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这一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存在抽象的美学理

论，只有一直同具体历史时期相联系的理论。”当霍克海默冬季去欧洲时，他与本雅明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本雅明独具特色和优点的方法所必然具有的特殊作用。“您不是在生产过程的形式及其总体趋势中，而是在具体细节中借鉴了经济因素。这些努力肯定具有特殊的解释效力和特殊的价值。”<sup>[121]</sup>

《拱廊街》项目被正式列入研究所的资助研究计划当中。在国际社会研究协会 1936 年的报告中，波洛克在“研究资助”标题下的几条信息中提到了“法国的文化历史研究”。在 1938 年出版的研究所的第二份计划书中，本雅明被列为研究人员，他的课题是“美学”。在“向德裔欧洲学者提供的资助”这一栏目的“社会学特殊领域”类别中列有 20 多部书稿，而本雅明的《19 世纪巴黎的社会历史》就列在第一位。

霍克海默让阿多诺对本雅明的纲要细节进行考察。这一考察仅仅是两人之间一直持续到本雅明去世的长期讨论的第一个阶段。这一讨论以书信、文章的形式进行，也（在研究所发起的一系列会议上，从 1936 年初的巴黎会议到 1937 年末 1938 年初的圣利摩会议）口头进行。本雅明在 1930 年代后半期的所有较长的研究文章都由《社会研究学刊》发表，并或多或少地成为《拱廊街》研究的一部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 年）准确地指出了当代的历史时刻，它构成了本雅明转向 19 世纪历史重构的转折点。<sup>[122]</sup> 在《爱德华·福赫斯，收藏者和历史学家》（1937 年）<sup>[123]</sup> 中，本雅明最终完成了他的推迟了很长时间的的研究，并有机会把自己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编年的构想与文化史的构想相对比，后者是由福赫斯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的，而本雅明在这里则对之提出了批判。《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939 年）<sup>[124]</sup> 是本雅明的《拱廊街》中围绕波德莱尔那部分内容的第二种表述（第一种表述是，《波德莱尔的第二帝国的巴黎》，阿多诺认为“分量太轻”）。《历史哲学论纲》没有发表在杂志上，而是发表在 1942 年研究所油印的合订本《纪念瓦尔特·本雅明》<sup>[125]</sup> 上。这一文本包含着一系列思考，它们对深入研究波德莱尔具有基础性作用，本雅明打算把它寄给研究所用于讨论，而他的去世则使之成为他留给研究所的遗产。通过发表在

《社会研究学刊》上的文章，本雅明体现了他与阿多诺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关系模式，即一方面他们之间有紧密无间的团结，另一方面他们共同对抗作为意识形态批评家的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这是两个阵营的对峙，一个是根据美学的现代性经验建立起来的历史哲学阵营，另一个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使用古典唯心主义艺术观的阵营。

本雅明《拱廊街》的注释涉及的范围很广，对于本雅明来说，这些注释既是一种思考的过程，同时也保存了一些当时更短小的研究。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考察本雅明的这些注释来追寻他 19 世纪研究的意图，我们就会发现大量无法协调的表述，例如：

抓住（他的同时代人和总体上属于他的时代的）童年世界。<sup>[126]</sup>

使 19 世纪的虚华达到其临界点。<sup>[127]</sup>

找到一种能把人们从 19 世纪唤醒的方式。<sup>[128]</sup>

197

调查以下这些东西的表现性特征：最早的工业产品，最早的工业建筑，最早的机器以及最早的小商店和广告等等。<sup>[129]</sup>

把经济活动看成是清晰的、基本的现象，这些现象显示出巴黎拱廊街道上的（因而也是在 19 世纪的）所有生活。<sup>[130]</sup>

搞清楚从 19 世纪的内部装饰发端的技术之最早的引诱和威胁的方面。<sup>[131]</sup>

把 19 世纪看作是原初史的最初形式。<sup>[132]</sup>

表现出深层属于 19 世纪的波德莱尔。<sup>[133]</sup>

把 19 世纪艺术的历史命运和当代进行对比。在当代，艺术已

经到了最后关头。<sup>[131]</sup>

把越来越多的清晰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联系起来。<sup>[135]</sup>

然而，这些和其他一些规划性的注释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它们要表现出，19世纪的历史图景作为自发的记忆，在危急时刻是如何展现在历史主体面前的；以这种方式，它们要使过去的这一部分免于传统的物化(reification)；并因此给予当前时代以力量，使之能够把技术改造成人和宇宙进行交流的中介。

本雅明的两个核心观念构成了这种思想的基础。第一个观念与方法有关。从梦想和狂喜的典型经验中，本雅明力图总结出一套超出日常学术研究工作范围的感知方法的原理：即对意识进行冷静扩展的原理。他首先在克拉格斯、普鲁斯特和超现实主义者们那里找到了对这些原则的重要洞见。

1920年，本雅明写信给路德维希·克拉格斯，询问克拉格斯的文  
198 章《论梦意识》的进展情况——这篇文章发表于1914年，克拉格斯曾寄给本雅明一份。这组文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克拉格斯不想解梦的内容，而只是关心梦的形式，即梦中空间与醒时空间、梦中时间与醒时时间之间的特性差异。这一形式分析不仅适用于狭义的梦，也一般地适用于由以下各类刺激引起的梦的情绪：

当我们在夜晚的寂静中听到汽车驶过，它的声音慢慢消失的时候；看到烟火渐渐远去，或静静地闪耀的时候；也许，经历了风雨人生，多年以后归家的时候；或者相反，感到异常陌生的时候；……经常乘火车旅行，和另一个人在一个车厢里相处的时候；以及这样一些罕见的情景，在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感到绝望的悲伤和巨大的痛苦的时候，或者刚刚服用了麻醉剂的时候。<sup>[136]</sup>

克拉格斯强调了梦的三个方面：第一感知被动性——任印象自由放纵，

这只有在摆脱或者冲破感知的传统形式之时才是可能的；第二，远逝感——这种感觉甚至可以与近在手头的东西联系起来，所以它是一种对距离的印象；第三，飞离感——可以是看到火车车窗外风景的向后疾驰，也可以是看到夜晚汽车（它在经过我们之前就已经很难靠近我们了）的飞驰，或者，是我们通过凋落的叶子、飞腾的烟雾、不断消失的泡沫，抑或是通过参照百年的树木、千年的金字塔或远古时期的山脉那样的持续不变的面貌而感受到的自身生命的飞逝。

在1922年初版的《宇宙化生的爱欲》(*The Cosmogonic Eros*)中，克拉格斯在考察狂喜的本质的同时，继续讨论了他所称为“意识的沉思状态”的特性，这一状态与“梦的情绪”几乎相同。

一个倾向于做区分的观察者甚至可以把遥远的东西看成仿佛近在手边，并且为了能把对象分成一个一个点去把握，也就是说为了把对象分开来把握而放弃被沉思的形象。相反，陷于沉思之中的人的凝视，甚至是对近旁目标的凝视，则摆脱了所有隐含的目的，因而完全被此目标呈现的形象所支配。至少，这意味着被一种形式所支配，这种形式不在既定的界限之内，而在一个由那些毗邻的形象所构成的整体当中。并不是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而是观察的性质决定着它是在近旁还是在远处；没有人可以否定接近的逼真性或距离的鲜活性。<sup>[137]</sup>

克拉格斯把被作为原型注视的事物里蕴含的距离性称做它们的“灵晕” (aura) 或“光晕” (nimbus)。他所提到的这种距离性就是世界的灵魂，它首先存在于我们和远古世界之间的暂时性的距离之中。沉思状态“使”我们进入“那种无法进入的境界”，进入已经逝去的事物的本源世界之中，或者……把我们带回到那些早已消逝的事物的“精神”之中。“世界的命运在启蒙的时刻显明了；对于时空的深邃性来说，任何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不管它消逝得多么快，都会从其景象中获得信息和意义。”<sup>[138]</sup>

199

忽视这些景象就意味着忽视世界的灵魂和鼓励人性的堕落。1913年，克拉格斯为在霍尔·梅斯奈尔（Hoher Meissner）举行的“自由德国青年”的世纪庆典而写作了论文“人性和大地”，这也许是他最著名的文章。<sup>[139]</sup> 其中写道：

在中世纪被作为一种苦修而内在地养成的对于各种观念的憎恨，一旦达到了其目的，即摒弃人与大地灵魂之间的联系，就会向外在方面发展。在人类对其他生物的残酷斗争中，人类只是结束了先前被加之于自身的东西：为了那种脱离世界的人类智能的毫无根基的优越感，而牺牲掉了观念的多样性和生命的无尽财富……我们提出，人类的独特性并不在于通过实验去窥探自然，也不在于使自然成为机器的奴隶，或运用自然自身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也许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说，人们本应厌恶这样的做法。树木和泉水，峭壁和树荫，对于他们来说充满了神圣的生命。在高高的山顶上有着神灵的敬畏（这一敬畏并不缺少“对自然的感情”，这就是他们并不登上这些山峰的原因！）。雷雨和冰雹打断了战争游戏，带来了威胁或是希望。希腊人过河时，会请求河神原谅人类的专横，请求给予方便；在古代德国，故意毁坏树木会付出血的代价。今天，一个不解行星运动的人，把所有这些只是看成是幼稚的迷信。但他忘记了，这些想像性的解释像是树上正在枯萎的花朵，是内在生命的表现，同所有的科学比起来，其中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知识：这是关于世界创造的知识，并和那种把所有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能力相交织。只有当这种爱在人性中重新生长时，人类智能对人性所造成的创伤才有可能开始愈合。<sup>[140]</sup>

200 1926年，本雅明就一本关于巴霍芬的书<sup>[141]</sup>写了一篇评论，其中表达了对克拉格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宇宙化生的爱欲》一书中提出的有关衰败的有力预言的敬意。但是，他也批评了克拉格斯“对现存的‘技术的’、‘机械化的’世界的拒绝是毫无希望的”，<sup>[142]</sup>

他看到，这一拒绝来自于一种神学核心，并向朔勒姆强调了对这一神学核心进行彻底分析的必要性。甚至在1930年代，本雅明和阿多诺认为急需同克拉格斯及其形象理论进行全面的辩论，以澄清他们各自的立场及辩证想像（dialectical image）这一概念。

对本雅明来说，路易·阿拉贡一定是克拉格斯的衰落预言的一位积极的、现代的反反对者。在1926年出版的《巴黎的农民》一书中，阿拉贡明确提出要创造一种现代神话。<sup>[113]</sup> 本雅明在1935年5月写给阿多诺的信中提到，在他开始写作《拱廊街》时就读到了这本书，“每天晚上在床上只能读两三百页，因为我的心跳非常剧烈，直到不得不把书放下”。<sup>[114]</sup> 在这本书的两个主要部分《巴黎歌剧院的通道》和《自然在比泰—沙蒙公园里的意义》中，阿拉贡写了一个城市居民，在靠近即将坍塌的巴黎歌剧院的路口的破旧的商店、酒吧和其他场所之间游荡。他不会为任何确定的意图而分心，也没有任何目的和兴趣，他发现了“神秘、未知的地方”，发现了“难以关闭的通向无限的大门”，看到了“无限的真实”<sup>[115]</sup>——这就像那三位超现实主义所发现的一样，当时，他们在比泰—沙蒙公园的角落里游荡，公园中人工湖上横跨着“自杀大桥”，直通向自然峭壁，他们游荡的地方离游客常去的景点很远，人迹罕至，阴沉晦暗的春日傍晚让他们十分疲倦。“未知的”、“无限的”、“神秘的”、“神话”——文章用这些令人吃惊的词语对一般被认为是贫乏、单调的日常生活进行感人的、动情的细节描绘。这篇文本整篇充斥着对贫困的华丽描绘和对理智的谴责。阿拉贡的方法就是要让现象以形象的形式得以保留，尽管他知道这些形象是虚幻的，尽管他知道这些形象终将在现实面前崩解，可他就是要以在露天市场摊位上叫卖的方式陈列这些形象：

一种新的恶行产生了，人类陷入了有组织的混乱之中：那就是黯淡和疯狂之子，超现实主义。向前，向前！从这里开始，就是转瞬即逝的王国。

被从一千零一夜的奇迹和狂喜的梦境中唤醒的人们，会多么嫉妒你，现代的大麻吸食者，因为你不需要辅助，就能产生令人惊

讶的喜悦，一直持续至今，并能使自己拥有这种超越世界的想像力……尽管有优雅干净的双手，但理性和自我保护的直觉，都不能阻止你过度吸食……那种叫做超现实主义的恶行由对药物想像的无节制的热情运用构成——或者说为其自身起见，由想像的无节制的刺激构成……光荣的毁灭！效用性原则变得依赖于所有那些实施这一自负恶行的人。他们的精神将完全终止。他们会看到精神的界限，并同那些被视为空想者、贪婪者的人一起陷入麻醉之中。年轻人会放纵热情投入到这种危险无益的游戏中。这将扭曲他们的生活。<sup>[116]</sup>

本雅明试图参照利用克拉格斯和阿拉贡等人提出的这类扩展意识的方法。这类方法和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所运用的文学方法类似，也和普鲁斯特本人使用药物的经验一样，具有反智力特征而且无关于历史和社会现实，并不以解决当前迫切问题为务。但本雅明抓住了这些方法里面的核心，并在《单向街》的结尾首次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这也成了他的一个中心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技术要么在人民大众手中变成表达总体世界欣快经验的客观工具，否则即将来临的便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可怕的大灾难。这正是要努力辨别的技术革新的负面影响，本雅明相信，这会使人们的洞察力深入到一直延续至今的史前恐怖之中，也会深入到前述建设性倾向之中，这一倾向提出了清除魔力的方法。要么技术变成奴役的工具，要么根本不存在奴役。它能为清除魔力而效力，否则将无法从这些魔力中摆脱出来。

在本雅明看来，当今危机是由“对技术的不当接受”所构成的破坏性后果引起的。这种不当接受突出表现在19世纪，因为19世纪在接受技术时忽视了如下事实：“技术服务于社会只针对商品生产”。实证主义在“技术发展之中”看到的“只是科学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的退化……而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当中的实证主义者则没有看到技术的发展使无产阶级越来越难以掌握技术——而对技术的掌握显然被视为越来越必需”<sup>[117]</sup>。资产阶级以及构成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成员的实证主义者

对于技术的观念，基本上都来自《园中凉亭》(*Die Gartenlaube*)<sup>[148]</sup>。

这个世纪的资产阶级所喜欢的那种舒适安逸究竟是不是源于那种从未对生产力发展有切身体验的某种糊里糊涂的满足感，这的确值得怀疑。而那种经验被留给了接下来的世纪。人们日益发现，交通速度同人们在读写方面的复制能力一样，已经超过了人的需求。一旦技术发展超过自身的界限，其能量就是破坏性的。它会首先用于发展战争的技术，进而用于战争宣传。<sup>[149]</sup>

202

在这些条件之下，技术的产物，甚至直到今天在那些从原型角度把它们看作神话事件的人们眼中，也显得像各种神秘的事件：

在古希腊，人们指出了通向地狱的入口。我们清醒时的存在状态也是一个景象，这里有一些通向隐蔽之处地狱之门的入口，这里也充满了梦境所流动到的那些不明显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充满信心地走过这些地方；但是，只有当我们迅速地折向它们，并沉迷于它们黑暗的通道之中时，睡眠才会来临。市镇中错综复杂的建筑，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像意识一样。在白天，拱廊（它们指向了市镇过去的存在）伸入街道并不引人注目。但到夜晚，在建筑物的巨大阴影中，拱廊的更深的黑暗令人恐惧地出现了，迟到的行人匆匆经过这里，除非我们已经鼓动他穿过一条狭窄的巷道。

但是，巴黎还有另外一个地下的系统：地铁。这里到了夜晚，灯就开始发出红色的光芒，这些灯指示着通向地狱的道路名称。战斗 (Combat) —爱丽舍宫 —乔治五世 —埃蒂纳·马塞尔 (Etienne Marcel) —索尔费里诺 (Solférino) —荣军院 (Invalides) —沃格拉德 (Vaugirard)，这些名称后面已经不用连着可耻的“马路”、“广场”了，这里，灯光穿透了黑暗，到处都是尖声的哨音，这些名称已经变成阴沟的畸形的神灵，变成了陵寝中的妖精。在这座迷宫里，隐藏了不是一头、而是一打瞎眼的、横冲直撞的公牛，每天早

晨，不是一个周岁的底比斯少女，而是数千位贫血的办公室女性和疲倦的商店职员要把自己投入它们的口中。<sup>[150]</sup>

203 这是以寓言的手法对资本主义展开的批判。他清楚地说明，发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祛神秘化并未减弱包围着每个人的黑暗恐怖，而只是压抑着并延宕着这种黑暗恐怖。虽然神话正在失去桎梏心灵的力量，可还是以已衰变了的形式沉入了日常生活的基层，仍然继续强有力地塑造着人们的行为和环境。人与技术之间错误的关系已经导致了日常生活的神秘形式，并进而使人和世界的毁败成为了可能。在这个危机时刻，才有可能回望过去那些阶段（准确地说就是 19 世纪那些阶段），在那个时代，技术似乎还可以打破那些守着自己私人财产的人们的安慰感和乏味的满足感。在那个时代，艺术形式似乎并没有忽视已然成为 19 世纪背景的技术发展，而是力图将它们时代的巨大技术装备变成人的真正神经。

从赛格弗里德·吉登 (Siegfried Giedion) 的著作《法国建筑，钢铁建筑和强化混凝土建筑》中，本雅明为他的 19 世纪原初史观念汲取了重要灵感。吉登的广泛研究从工程开始，并同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Heinrich Wölfflin) 一道研究艺术史，一道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在国际现代建筑学会的一个重要时期担任总书记，这一学会是由他帮助建立的。这一组织的领导成员是葛劳皮乌斯 (Gropius)，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和阿尔瓦·阿尔托 (Alvar Aalto)。吉登是“新建筑”的热情支持者，在魏玛共和国里，没有其他的组织像这一组织那样，典型地体现出对简洁、透明和建设性的理性的热爱，这些特点本雅明同样也具备。吉登的著作是这样开始的：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过去时代的无比的复杂性中，找出那些开启未来时代的因素。

无论是在哪个领域，19 世纪都把它的所有新的创造隐藏在历史的面具之下——在建筑领域也像是在工业或社会领域那样。新

的建筑方法被创造出来，但同时却引起人们的恐惧，人们一致同意在石制的表面限制它们的使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充满了19世纪的向前的冲力……当清除了报纸上的数十年的灰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被讨论了，并且仍未解决。

同时，还可以看到……今天被称为“新”建筑的是整个世纪发展的一个合理部分……“新”建筑起源于183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当时是从手工劳动向工业生产过程转变的时期。我们根本上很难把我们获得进步的冒险精神同19世纪相比较。当代的任务是：把19世纪那种只能以一种抽象的建筑方式——这在我们看来，在精神上是十分单调的——表现出来的东西，用一种熟悉的方式加以表现。<sup>[151]</sup>

本雅明想要把这些19世纪的观点同该世纪的产品中魔幻神秘的特性结合起来，对这一特性，超现实主义者和像朱利安·格林 (Julien Green) 这样的作家做过阐释。通过这一结合，本雅明得出了一种19世纪的原初史观念，这一观念指出，新的创造和生活方式，首先是那些由商品生产决定的方式，并没有产生出新的社会形式，也没有带来自由发展，只是取得了一种被物化的文化概念狭隘地限定了和误导了的发展，这种发展同时伴有千变万化的景象。<sup>[152]</sup> 204

19世纪的大胆创造使自身呈现为千变万化的景象，这一事实使这一时代具有了传奇性。因此，谈到19世纪的原初史，不仅仅意味着让歌德的基因类型概念“脱离开自然的异教语境，进入犹太的历史语境之中”。<sup>[153]</sup> 同时，它还指出了时代的黑暗面，即它的恶魔般的、晦暗的、无法补救的特性。“19世纪的原初史”也形成了世俗启蒙，后者从这段历史传奇性的因素中产生出来，并只能从其中产生出来——例如，每天的新奇感，就使得采光良好的建筑结构成为现实。《拱廊街》的一个注释中写道，“在辩证想像中，尽管清除了神话，但房间仍然用来制造‘梦境’。”<sup>[154]</sup>

在关于某一时代的原初史的辩证想像当中，当前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与过去的时代相关，当代所宣称的某种全新的事物也与过去相关。由这种僵局而产生了新与旧之间的关系，本雅明在提到“停滞中的辩证法”时涉及了这一点。这一表述并未涉及辩证法中的僵局，而是涉及了在停滞状态中才开始起作用的辩证法。这是“当前”在事物中的表现，<sup>[155]</sup>对本雅明来说，这是辩证的——这并不是像在阿多诺或黑格尔那里那样，是一种转移或突然的变形，而是从同质的时间转变成满足人愿的时间，是历史连续性的断裂，它突破了那种伴随着神秘的冷酷性不断走向消逝的进步，但却没有决定性的方向。本雅明把这些想像称为“辩证的”，认为它们是对过去的记忆，因为它们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由连续的、同质的事件流程组成的各个瞬间，而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瞬间关系形态。<sup>[156]</sup>被遗忘和被忽视的过去在现在可以被认识和接受。现在所挖掘出的过去也可以使现在摆脱其自身的限制。

205 本雅明希望辩证想像，以及对技术的圆满的关系成为可能，而这需要把灵晕已经被破坏的艺术形式与以顺从方式听任艺术作品灵晕被破坏的大众联合起来。他在1930年《文学世界》(*Literarische Welt*)上发表的《巴黎日记》中，描述了对于他的艺术理论发展来说非常关键的经验。书商阿德里奈·莫奈(Adrienne Monnier)和法国重要的先锋作家有紧密联系，她反驳了本雅明原先对绘画摄影所持的那种激烈而保守的偏见——决不应该对绘画进行摄影复制。

当我继续把这样一种处理艺术的方式称之为不幸的和令人恼怒的事情的时候，她变得很固执，说道：“伟大的艺术品不能被看作是个人的作品。它们是集体性的东西，它们是那么大，因此只有缩小它们的尺寸才能让它们被人们欣赏，这几乎是必然的。机械复制方法则是在尺寸上缩小事物的基本技术。这种技术使人们对作品的掌握程度大大提高，而没有这一点，人们是谈不上欣赏作品的。”因此，我用一张她在我们见面伊始便答应给我的《斯特拉斯

堡的聪明女子》的照片，换回了一种对我也许具有更大价值的再生产的理论。<sup>[157]</sup>

在1931年《文学世界》上发表的“摄影小史”一文中，本雅明用从事物的灵晕中解放事物的概念概括了他本人关于对伟大艺术品的化简、对绘画作品和建筑作品的灵晕的破坏的思想。这篇文章是他那篇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文章的先兆。在“摄影小史”中，他以一种更为清晰的方式，把听上去充满怀旧意味的灵晕定义与他对这种定义必然瓦解的乐观评论进行了鲜明的对照：

灵晕实际上是什么？是对时空的新颖的编织；是对距离的独特表现或者呈现，而不管目标离得多么近。在夏日的正午休息，描画天际的群山，或者向观察者投下阴影的枝条，直到这一时刻或这成为它们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领略高山、枝条的灵晕。<sup>[158]</sup>

他接着又谈到当代热衷于通过大量复制方式尽可能地控制艺术作品，并把这种情形看作是伟大向粗劣下滑的过程，但同时他也认为这有助于消除令人窒息的灵晕氛围，而灵晕只能以人工制造的方式得到延续。这里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或者说，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看法：复制技术中缩减尺寸的效果与一种有益的异化和明晰化（salutary alienation and plainness）有紧密的联系；先锋艺术家们的观念与人民大众的看法有紧密的联系。

由维利·哈斯（Willy Haas）流亡布拉格时编辑的杂志《语词中的世界》<sup>206</sup>，于1933年末发表了本雅明的“经验与贫乏”一文，本雅明写道：

布莱希特是否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财富的分配，而是贫穷的分配，或者现代建筑的先驱，阿道夫·罗斯（Adolf Loos）是否宣称过“我只为那些具有现代感觉的人写作……我不为那些思慕文艺复兴或者洛可可艺术的人写作”，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那些像画

家保尔·克里 (Paul Klee) 一样复杂, 像罗斯一样程式化的艺术家, 都拒绝那些由过去的存留所装扮起来的人性的传统的、著名的、高贵的观念, 旨在转向那些像新生儿那样在襁褓中尖声啼哭的、赤裸的同代人 (naked contemporary)。<sup>[159]</sup>

本雅明对“赤裸的同代人”的描绘表现在他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拱廊街》的各种注释之中。他把建立在复制性基础上的大众与现实、与艺术品的关系描述为这样一种关系——呈现为由梦的感知形式所构成的种种因素。而在有的地方, 他断言那些沉迷于大麻的人对类似性有着更敏锐的感受, 在后来他那篇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文章中, 他强调这一特征与大众有关系。在第一篇讨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 他认为心不在焉地、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想和忧虑之中那般在城市中游荡, 乃是成功表现大城市的先决条件 (例如狄更斯)。如果大众还没有提供这种大城市的图景, 而且似乎现在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图景, 这也决不能否定如下的假设: “在经历过的阶段所构成的暗室中形成的意象”<sup>[160]</sup>, 在大众回想起它们之前还一直未被大众所察知。当本雅明提到集体梦意识时, 这个提法暗示了对大众的赞赏, 因为在他们当中发生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 只有艺术家、哲学家和理论家才多多少少对这些事件的片段有所察觉。当他把街巷当作集体居住地来谈论时, 他也就承认了, 大众正在以无意识方式实践着他所赞成的新建筑主张——街道和居住地的合而为一。<sup>[161]</sup> 他坚持认为, 大众趣味能够从最落后的反应 (如对毕加索的看法) 突然转向最进步的反应 (如对查理·卓别林的电影的看法),<sup>[162]</sup> 在这么说的的时候也就是在表明, 他尊重与有格调的、古典的、严肃或高雅的东西相对的那种伤感而滑稽的东西。可以这样说, 以这种方式展现典型特征的人民大众, 拥有了一种对过去的知识, 尽管这知识可能还只是无意识的知识,<sup>[163]</sup> 且不关注连续性, 但却包蕴那些记录了各种重大时刻的本能记忆的意象。

本雅明寄希望于大众, 希望他们能用那些灵晕已被毁坏的艺术形式, 即, 邻近的、可触及的、能作为消遣和娱乐来欣赏的艺术形式, 去

取代那些富有灵晕的艺术形式，即，那种有距离的、不可触及的、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在个体梦境中欣赏的艺术形式。这种取代，就是用某种为了人性目的而能够占有技术的梦意识来取代对技术的那种“《园中凉亭》式的”<sup>[164]</sup>关系，被这种梦意识支配的技术也就是前卫艺术家在他们的建筑、绘画和人性故事中呈现的技术，它“尽其可能地保存着文化”<sup>[165]</sup>。

是绒毛还是钢铁，是对于历史踪迹的内在散播还是没有任何踪迹的透明状态，是“收藏家或古物专家的行李”还是“新的、肯定性的野蛮概念”<sup>[166]</sup>——本雅明总是使自己不必要地屈服于这种粗糙的二元选择，难道不是吗？像“经验与贫乏”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样的文章可以同另一些文章，如“普鲁斯特的肖像”、“弗朗茨·卡夫卡”或“讲故事的人”相协调，并进而构成这样一种文本，它将展现人类如何把已成为其重负的财富甩落在后并与之相搏斗的情况，这样做有可能吗？从最低限度之处重新开始，就一定意味着要重新开始与过去同化吗？摆脱被复制的传统，是否真的就涉及要适应那些跨越我们生活路径的事物，就涉及要完全躲过那吹打我们遗忘的风暴吗？<sup>[167]</sup>本雅明并没有像克拉格斯那样谈论“人民”，而是谈论“大众”、“人群”；不是谈论“想像”，而是谈论“辩证想像”；不是谈论“史前史”，而是谈论“19世纪的原初史”。克拉格斯认为，最高的价值就是感受到史前时期的气息，而本雅明则认为应该是感受到即将到来的黎明的气息。在《拱廊街》的一个注释里，他写道：

每个真正的艺术品都会有一个独特之处，能够使每位可以投入到这一点上的欣赏者本人感受到一股像是从即将来临的黎明吹来的冷气。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通常被认为与进步没有什么联系的艺术，实际上可以有助于说明什么是真正的进步。进步并不在于时间进程的连续，而是在于对这种连续性的阻碍，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只要有真正崭新的东西让它自身第一次感受到黎明的清醒，进步就在这种阻碍之中。<sup>[168]</sup>

但是，在本雅明所认为的那种必然会产生出与技术的良好关系的社会关系内部，有那些可以把未来的黎明之风吹入历史连续性的真正的艺术品的地盘吗？可以设想在贫乏、摆脱了灵晕的艺术与对技术的吸收之间建立某种合理的联系吗？本雅明对如下难题——如何使神学一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使自己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和政治的这两极进入某种具有说服力的关系——是有所意识的。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这一难题取决于三个基础性要素的正确性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首先，本雅明把如下事实——即使已经被技术普及化了的真正艺术作品，也很难为大众所获得——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贫乏。其次，他还阐明了一种“在政治上起作用的美学”<sup>[169]</sup>纲领能使工人阶级写作和审美先锋派相协调，并能使历史的连续性向未来黎明之风敞开。最后，他指明了人民大众对于新媒体的着迷显示出人们总是愿意利用技术设备的。

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这个“瓶颈”观念——人类只能携带最少量的行李才可通过——转变对形势的误判，而当时的形势已经越来越失控了。最后，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本雅明看待问题的整个方式以及通过联系他那多样的核心主题推断的思路，都显得很不合时宜了。

本雅明的《拱廊街》的大纲计划写六章：《傅立叶或拱廊》、《达古勒或立体透视图》、《格朗维耶或世界展览会》、《路易·菲利浦或室内布景》、《波德莱尔或巴黎的街道》、《奥斯曼或街垒》。拱廊、立体透视图、世界展览会、室内布景作为集体梦境的腐烂的建筑残迹，同作为能够唤醒历史开放空间的景象的街道和街垒相对立，也同能够产生辩证想像的梦意识相对立。但是，本雅明只是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波德莱尔的那部分，因为研究所坚持要求，在不久的将来要有东西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关于波德莱尔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38年的夏天和秋天，当时他和布萊希特在斯文堡。第二篇文章写于1939年春的巴黎。第一篇文章“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包括“放荡不羁的人”、“浪荡子”和“现代主义”三部分，这篇文章被看作是关于波德莱尔的著作中的核心部分，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拱廊街》的缩影。他把第二篇文

章——“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看作是第一篇文章第二部分的另一版本。但实际的情况是，“在这个起初被设想为重写‘浪荡子’的讨论中，游手好闲者已经被明确地排除在外”。只有这一部分中的大众的主题被保留下来，并同关于艺术作品和“讲故事的人”的论文中的重要主题相结合。在论波德莱尔的头一篇文章中缺乏使“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具有其特性的那种要素，也就是说缺乏对新建筑学的那种同情理解，在第二篇文章中则连那种同情理解的踪迹都没有了。本雅明从他两年前对电影院常客的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反映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一文中，但只是作为一种回顾性的滑稽模仿。他写道，这些花花公子们“把一种非常迅速的反应和一种轻松的，甚至是懒散的行为和面部表情结合起来”。<sup>[170]</sup> 本雅明认为这种面相就是波德莱尔笔下扭曲的面部。然而，作为诗人，波德莱尔是现代性的英雄，但他是隔绝于熙攘人群的英雄，这些人群虽则让他感到激动兴奋，可这人群中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也使他高度警觉。

波德莱尔是现代性的诗人，他自己在1859年创造了“现代性”这个词，他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为敏锐地提出了现代诗人的问题：在技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诗如何才能为诗？他的诗和他关于诗歌理论的著述给出了答案：现代诗歌必须“足够灵活，足够具有抵抗性，以使自身适应灵魂的热情刺激，适应梦的波动和意识的震惊”。<sup>[171]</sup> 当波德莱尔享受到由他所诅咒的工业化和他所诅咒的进步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特殊气氛时，当他不仅感受到了人性的败坏，也感受到了一种至今在大城市的残破的荒郊中未被发现的、神秘的美——这显示出了在一个没有尊严的时代寻找尊严的努力。

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根本没有“新建筑中的欢乐”或“向大众传递博爱”这样的论题。这篇文章，比第一篇严谨得多、有特色得多，主要研究的是现代性的代价（cost）。本雅明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作了：“在震惊体验 [Erlebnis] 已成为体验之常态的情况下，抒情诗如何使体验 [Erfahrung] 成为它的基础？”<sup>[172]</sup> 这类表述。“震惊的形象”现在更多被认为与波德莱尔的“接触大都市的人群”有内在的联系。而这些

“大都市的人群”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大众规训过程来说，现在仅仅被描绘为自反的（reflexive）、难以定型的原料。与他以前论述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文章不同，摄影现在不再被认为是一件迫不得已必须从中找优点的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机遇，相反，被纯粹认为是一种贫乏的表现：“对于双眼来说，绘画是它们永远看不厌的东西，但摄影则像饥饿时的食物或是干渴时的水一样”，只解一时的饥渴。他一度曾寄希望于气定神闲，而现在只提及一种丧失：“在关切性的眼光中，根本不会做着白日梦跟随遥远的事物去远游。这甚至会使一个人在这种任性的堕落中体验到某种快感。”<sup>[173]</sup> 本文以“虎跃入往昔”忧郁地结束全文：

210

人群因其流动和自身的灵魂而闪烁着让浪荡子感到眩晕的光彩，但这种光彩对于他来说已经日益黯淡无光……由于这些仅剩的盟友都背叛了他，波德莱尔就以一种迎风斗雨式的狂怒向大众宣战。这就是体验 [Erlebnis] 的本性，波德莱尔赋予它以全部经验 [Erfahrung] 的分量。他暗示，现代人的感觉可能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在震惊体验中灵晕消解。他因为赞同这种消解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这正是他的诗歌的法则。<sup>[174]</sup>

本雅明在这种黯淡的痛苦中似乎走向了阿多诺的立场，但这种痛苦仍然反映出，他确信，启蒙要么是公开的启蒙，要么就根本不存在，要么只有大众文化，要么根本就没有文化。

霍克海默建议并赞成删去这篇讨论艺术作品的文章的引言部分。本雅明在这里明确提到了马克思的分析和预言方法，他提出，他的工作的目标就是在当前的生产条件下，推进关于艺术发展趋势的研究。同样是霍克海默，根据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总体思考，建议并赞成缩短关于爱德华·福赫斯的论文的引言部分。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表述，被“极权主义学说”、“人性中的建设性力量”之类的其他表述所取代。这些删减的原因同样就在霍克海默留给阿多诺的话当中，他 1938 年初在伦敦社会学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到，“从极其科学的意

义上说”，“没有一个词能够被政治性地解释”，“甚至要避免像‘唯物主义’这样的表述……为此不惜任何代价”。<sup>[175]</sup> 作为“一个科学组织”或一个科学机构，杂志和研究所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陷入任何政治性的宣传讨论之中”。<sup>[176]</sup> 霍克海默保留了他自己对于研究所政治和理论定位的根本意见，以便使他能够以一种同研究所相配的方式提出这些意见。

但是，作为本雅明的盟友，阿多诺反对的是本雅明这部作品的哪个方面呢？阿多诺又提出了怎样的观点来抵消他的这种反对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本雅明所说的阿多诺的那些“长信”中找到。那些长信是阿多诺在本雅明写完论卡夫卡的文章之后，也是阿多诺本人在1930年代后半期《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了的那些文章之后写成的，专门评论了本雅明的作品。而阿多诺的那些文章本身就构成了与本雅明论文之间的对话。阿多诺的“论爵士乐”、“论音乐中的拜物教特征和聆听的退化”是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反驳。“论瓦格纳”则可以视作与本雅明头一篇论波德莱尔的文章针锋相对的论文；而本雅明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的论波德莱尔的第二个版本则是进一步对阿多诺文章的回应。

阿多诺的“长信”<sup>[177]</sup> 清楚说明了诸多最重要的问题。阿多诺看到，211  
他同本雅明在“核心的哲学论点”上是一致的。在他看来，这由以下事实所构成，他们两人都用一种辩证的结构来整合神话和历史的关系，从而对神话进行了辩证地自我分解；他们两人都基于一种“反”神学，这种思想是从已经获得救赎的观点来看待现世的生活，并把被物质扭曲了的生活要素看作是希望的象征。

阿多诺对本雅明的批评基于三种复杂的因素：(1) 在重要问题上，他觉得本雅明太保守，或者太拘泥于神话，缺乏足够的辩证超越性，完全不够辩证。(2) “艺术的祛神秘化”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神话的辩证自我分解，在这个问题上，阿多诺指责本雅明，认为他一方面低估了自治的艺术的技术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灵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低估了日常艺术固有的非理性，以及观众、大众，包括无产阶级的“自反性”特征。(3) 另外，他认为，本雅明把一系列的事实看成与历史哲学无关，

看成某种“集体性的主观现象”，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此，在阿多诺看来，本雅明无法解释商品拜物教的客观力量，他所运用的非马克思主义心理研究已经危险地靠近了荣格（C. G. Jung）。这使他无法获得对商品拜物教的正确、全面辩证的分析，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艺术作品的社会协调作用。

当本雅明感谢阿多诺对他的思考抱有强烈的兴趣，并强调阿多诺已经准确理解了他的意图时，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对他所依赖的、支持他的人的礼貌。尽管阿多诺并没有完全理解本雅明所有的想法，但他确实要比朔勒姆，或是布莱希特，或是其他人理解得更多，正是他以最引人注目进入的方式进入了本雅明的思想之中，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吸收了本雅明的思想。本雅明在谈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之前，特别强调了两人之间深刻的一致性。这听起来像是哀求，阿多诺在这里看到了本雅明是多么孤独。在大多数情况下本雅明宁愿在私下会面中摆出他们的差别，但在信中谈到的这些差异还是非常启发性的。总体上说，这些差别表明，与阿多诺的研究相比，本雅明围绕他的中心难题展开的研究要困难得多。无论是大众艺术及其与自治艺术的关系问题还是艺术与社会关系问题，同样，无论是神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能力或其有效性限度问题，本雅明的研究思路要复杂得多。

212 本雅明在论述他自己关于艺术的论文同阿多诺的“论爵士乐”（1936年）、“论音乐中的拜物教特征和聆听的退化”（1938年）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就像阿多诺清晰地阐明了问题的消极方面那样，他试图清晰地指出积极的方面。他提出，这也许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是正处于研究之中的事物的差异：“要让听觉感知和视觉感知中的革命性转变以相同方式实现，根本没有必要。这也许与这一事实有关：你的文章在结论中希望扭转聆听的行为，这对于那些不能理解马勒的人来说，并不完全清楚。”<sup>[178]</sup> 在这里，本雅明提出了许多谦恭的建议。阿多诺关心的是彻底的辩证化以及完全地拯救那些物化最严重的东西，他宣布爵士乐和大众艺术是无法拯救的，这就显得有些武断，而且源于一种与本雅明对

电影的肯定观点同样片面的否定性观点。在他的“论音乐中的拜物教特征”一文的末尾，阿多诺提出，退化的聆听也许最终会“突然好转，只要艺术与社会一起，可以离开永远同一的路线”，而且继续指出，“不是流行音乐，而是古典音乐创造出了这种可能性的模型”——然后，他提到了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名字。<sup>[179]</sup>这似乎也非常武断，并且源自于那种只考虑自治艺术的期望而不关心大众艺术期望的观点——不管阿多诺在最低级的和最高尚的现象中运用了多少辩证法。<sup>[180]</sup>

本雅明在《拱廊街》的注释中最为坚定地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无论多么理想化，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更高的艺术形式上赢得大众。只有在某种比较接近大众的艺术形式上才可能赢得大众。显然，问题的难点正好在于，需要以如下方式——可以问心无愧地宣称它就是更高的艺术形式——来创造这种艺术形式。而这一点几乎不需要考虑资产阶级先锋派所散布的思想就可以完成……相比较来说，那些真正不断生长的、有活力的形式，包含了某种温暖的、有益的和最终令人振奋的东西。辩证地看，它们接受了“媚俗”，因此使得它们自身更接近大众，但随后征服了大众。今天，也许只有电影能完成这一任务；至少，它更容易接近这一任务。<sup>[181]</sup>

这一洞见使本雅明不再到那些根本没有希望找到答案的地方——即，自治的艺术——去寻找答案。另一方面，阿多诺也正好在自反的大众与自治的艺术之间存在的鸿沟中看到了对于后者的挑战，即只要大众是自反性的这一鸿沟就会持续存在——而且，今天在艺术中要做的事，一个合理的社会以后将会当常规来做的事。对他来说，问题不是如何把艺术与大众结合起来，而是如何为使自治的艺术成为这样一个场所——在其中承认社会的重要问题，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救赎模型——提供可靠的条件。

阿多诺希望详细讨论这一问题的兴趣，表现在他关于编辑一组

“面向大众消费的艺术 (Art for Mass Consumption)”的论文计划上。这项计划想把本雅明关于艺术作品的论文，他自己关于爵士乐的论文，同克拉考尔关于侦探小说的社会理论文章，以及布洛赫和其他一些人探讨诸如建筑和画报的文章结合在一起，同时加上霍克海默写作的一篇重要的导言。它要展现“如何第一次把理论具体地（而不是俄国理论家那种纲要式地）运用到所谓‘文化’的当前形式上”。<sup>[182]</sup>由于有许多其他计划，这一计划根本未能落实。同许多其他的事情一样，这项计划的问题意识和探讨问题的要求，比后来的出版物所能显示的要强烈得多。

阿多诺对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首篇文章提出的批评，除了别的以外，直接针对本雅明采用的方法：“把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语用 (pragmatic) 内容直接归因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史的相关方面，尤其一种经济本质的相关方面。”因此他自己的这些文章必然被视为探讨如下问题的模型，即他是如何考虑“通过考察时代的社会经济总趋势”来完成“对于文化特征的唯物主义决定”<sup>[183]</sup>这一任务的。

在“论爵士乐”一文中，他以如下的方式着手做这项工作。通过一种可称之为技术性的分析，阿多诺强调了爵士乐的各种特征，特别是它的切分音——这种切分音形式当中恰恰保持了基本的拍子记号。在这种切分音形式中存在着某种幻想性的突破，某种对僵化东西的革新，但这些突破和革新意味着来得太早了。阿多诺把这些看作是爵士乐社会意义的展现。他拓展了这些特征的涵义拓展：把“来得太早”看作是精神分析意义上因忧虑造成的性高潮的提前 (premature orgasm)。残损的个体所产生的虚弱的、蹒跚的、纯粹虚幻的突破，被视为集体所具有的那种主导力量的确证。可以把爵士乐看作是对于标准化的商品性所赋予的表面上很个性的格调，看作是一种不得不既发展又抑制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的反映。在“论爵士乐”一文的摘要中，阿多诺指出爵士乐乃是一种展现自我向集体屈从的僵化的仪式。阿多诺结合爵士乐的其他特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此同时，爵士乐维护了对句 (couplet) 和叠句 (refrain) 之间关系的原始涵义，并且将这种涵义又一次融入自身当

中：把歌手或是舞者当作人性这种祭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尽管这只是一种替代性的祭品。”<sup>[184]</sup>

在论述瓦格纳的著作中，阿多诺指出，之所以把瓦格纳音乐的社会意义解释成一种将革命歪曲成简单造反（即弗洛姆所说的顺从权威的那种造反）的背叛，原因就在于它具有那种把革命和退化联系起来的畏缩不前的姿态。这一结论在阿多诺论瓦格纳的书<sup>[185]</sup>（当时，其中只有一少部分在《社会研究学刊》上以“瓦格纳片论”的题目发表）中是作为美学分析和技术分析的结果而提出来的。但与爵士乐不同的是，阿多诺正好在瓦格纳音乐中各种退化环节中看到了某些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一种对于自我的并非纯粹受虐狂式的放任：这种自我放任的许多方面指向了物化了的的存在之外。但他又指出，控制着瓦格纳音乐的结构法则就是用产品外观掩盖生产过程的法则，因而他认为这种音乐也具有商品特征。其商品特征不仅包括购买者一方纯粹欺骗性的愿望满足，同时也包括了对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的掩盖。<sup>[186]</sup>

阿多诺的方法并未提供一套在整体的社会和经济过程当中调节文化特征的思想模式。相反，他在讨论艺术品的各个方面之时，才提到那些可以泛泛地说与社会相关的事情。技术分析极端简略，因为基于内容分析、接受历史、传记和社会心理的那些阐释一直纠缠着阿多诺，直到他的概念和主题的整个模板充分完善为至。然而就这些分析本身而言，它们在谈及物化、异化、商品性和反身个体之时浅尝辄止不能深化，这是其消极方面；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分析形成了理智拒绝权威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又是其积极的方面。阿多诺在他对于艺术作品的分析中，乐意并愿意向所有的人承认商品和拜物教的特征，并且相信可以证明其中某些东西——当然是指自治的艺术——已经完全辩证地消除了它们的物化。这样，尽管已经诊断出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祸因，但他仍然可以把自治的艺术描述为已经脱离了这种祸因的东西。

神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以及它们所面临的机会，就像自治艺术和大众艺术的社会功能和面临的机会那样具有争议和尚未

解决。阿多诺就本雅明的第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的主题写信给本雅明说：

215

你同研究所保持一致，对此没人比我更高兴，这也使得你开始推崇马克思主义，你的推崇确实并非是要奉承马克思主义或是你自己。以上帝的名义，只有一个真理。如果你的思想力量以范畴的形式抓住了这一真理，即使从你的唯物主义观念来看，这一真理似乎是不足信的，然而与你用那种你每次接触时手都会产生抵抗的心理禀赋来武装自己相比，你仍然可以通过这些范畴对一个真理有更多的理解。毕竟，这一真理会更多地存在于尼采的《道德的谱系》而不是布哈林的《ABC》（布哈林和布里奥布拉任斯基 [E. A. Preobrazhensky] 的《共产主义 ABC》）当中。我想，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个命题没有人可怀疑为是随意而为或调和折衷的结果。与酒税\*和文学增刊作家行为的光怪陆离的演绎相比，《亲和力》和论巴洛克的书是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这里，你可以相信，我们准备把你理论上的最极端的试验当成我们自己的试验。<sup>[187]</sup>

在研究所对本雅明的期望中，这显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变所带来的挑战。阿多诺最初建议不资助《拱廊街》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一计划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但随后，他又非常热情地推荐支持这一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一计划摆脱了形而上学，而且它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都是全新的。他对霍克海默强调说，他在巴黎和本雅明的讨论取得的一个最为确定的成果就是，“他们两人都清楚地看到，必须避免对神学概念的任何明确使用”。<sup>[188]</sup>但在与霍克海默的通信中，阿多诺一次又一次地坚持神学主题的理由，并试图证明霍克海默在他自己的文章《论西奥多·海克尔 (Theodor Haecker)：基督徒和历史》中，明确使用了神学

---

\* 在《拱廊街》计划论波德莱尔的文章“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里，本雅明曾分析说波德莱尔关于醉酒的名诗《拾荒人的酒》(The Ragpickers' Wine) 是对酒税的回应，阿多诺认为本雅明在这里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的滥用，故有此说。——中译者注

概念——这一使用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抗议。<sup>[189]</sup> 1938年，阿多诺已经成为研究所在美国的专任合作者，并可以对霍克海默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叔本华主义者的容忍限度做出可靠的判断。也许，他想重新让本雅明（现在正接受研究所的资金资助）认识到，“在最极端的论题中所有的神学内容和文字”都不会考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何“外在的类似”。很显然，他在本雅明身上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他能像勋伯格在音乐中所做的那样，转回到社会，运用自己具有含蓄的神学和秘密意味的那些材料去创造革命：社会理论领域带有悖论性色彩的革命。

阿多诺认为，与本雅明相比，自己有些方面稍强，有些方面稍弱。一方面，他更加自觉地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神学主题，另一方面，他在神秘思想和神学思想方面显得不如本雅明激进。但本雅明却反对阿多诺赋予他的角色。在谈到阿多诺和格雷特尔·卡尔普鲁斯（Gretel Karplus）两人赴美之前阿多诺与他的最后一次会见时，本雅明写道：

如果说我在那种情况下拒绝从我自己创造兴趣（productive interests）的考虑出发而任由我的思想向神秘方面发展，以致照常进行研究而不考虑辩证唯物主义或研究所的兴趣的话，归根到底这并不仅仅是出于我与研究所的团结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忠诚，而毋宁是出于我对最近十五年来我们都具有的那种经验的忠诚的缘故。因此，这也是关系到我自己创造兴趣的事情。我并不否认，这些兴趣会时不时地同我原先的兴趣相冲突。在这里存在一种对立，我希望它能存在一千年。战胜这一对立构成了工作中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这一对立。<sup>[190]</sup> 216

从他作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作家的经验和担负的工作来看，本雅明实际上应当比阿多诺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真的更有能力去实践他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写的东西吗？——即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获得神学的帮助，就能很容易与任何人相结合，而据我们所知，这一点在今天被压制和被忽视了”。<sup>[191]</sup> 在对第一篇论波德莱尔的论文的批评

中，阿多诺根据本雅明自己的高标准，正确地要求本雅明，应当再次仔细检查论述商品和浪荡子的段落，“给予最大的关注，尤其要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章节与之对照”。杂志“正确地断言，在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是绝对可以胜任的”，而且，在论述音乐拜物教特征的文章中，他自己也重新表述了关于交换价值的替代物的段落，“同马克思一起去应对无尽的问题，改掉草稿里莽撞的地方”。<sup>[192]</sup>

但在后来的工作中，本雅明放弃了他对马克思胜任能力的坚持。第二篇论波德莱尔的文章遵循着他从更早的那篇“讲故事的人”总结出来的方式写作。虽说这种方式或许可以被视为向阿多诺所珍视的那种思想趋势的回归，被视为向本雅明那些特有的范畴的回归，但是总体上来说以下特征是很明显的：调和神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本雅明真正关心的事情，而且它抑制着而不是鼓励着他思想中核心原创性论题的展开。本雅明在1940年2月29日写给阿多诺的回信（阿多诺在前一封信中高度赞扬了第二篇论波德莱尔的论文，但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批评）中说：“我清楚地想起了 [你] 关于瓦格纳 [的手稿] 的第五章里的那个段落”，

217 可即便灵晕是某种“人性的、但是已被忘记”的东西，它也不一定就是在我的著作中出现的東西。树木和灌木，它们的形象可以被借用，但它们不是人造的。因此，事物中必然会有某些人的因素，但事物不是由劳动创造的。但这里我最好打住。<sup>[193]</sup>

在阿多诺认为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方式解决了本雅明的一个难题的地方，本雅明却看到了对这个难题的简化，这个问题在其未被删改的形式中仍然是一个谜。

较之本雅明而言，阿多诺在许多方面对这一难题进行了简化。他指责本雅明有保守偏见，但他自己在运用辩证超越性时却太过粗心。他到处贴上“神话的”、“拜物教的”、“物化的”、“异化的”这样的标签，在他

看来，勋伯格圈子的音乐是一个典范，“将对象彻底地辩证化”，相信热烈的、清晰的意识能力。与此不同，对本雅明来说，他曾在1912年所写“关于当代虔敬的对话”一文里的那些东西仍旧非常重要：“我们对自然性的那黑暗面的有力洞见”应归功于浪漫主义，“这个黑暗面本质上不是善的，它是陌生的、恐怖的、令人恐惧的、可怕的。这就是说……浪漫主义所发现的就是对慢慢进入我们生活中的那些令人恐惧的、无法感知的和粗俗的东西的欣赏”<sup>[194]</sup>。尽管本雅明比阿多诺更加怀疑意识的力量及其进步，但他同时也比阿多诺更为慎重地评价神话及其被理性征服的能力。

本雅明的不少观念看上去让人有些难以理解：人类通过某种技术形式可以与总体世界相结合；通过大众媒体可以训练人去掌握已经失控的技术形式；通过历史意识可以让未来从过去中绽出。但是关键性的问题恰恰就藏在他所说的这些论域之中，而不在由“负责任的”自治艺术品中“善意理性（benevolent rationality）”的进步所构成的那种纯净化的氛围之中，也不在先锋音乐对于自然的善意支配所达到的那种自然与心灵的和谐之中。让阿多诺感到高兴的是，本雅明在他第二篇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已经写出了“自反特性（reflexive character）的原初史”，而阿多诺本人自从来美国之后所有关于唯物主义人类学的思考都是围绕这一原初史展开的。<sup>[195]</sup>但他没看到的是，本雅明也许不会太轻易地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因为本雅明和阿多诺一样并不信任自治艺术的善意理性。另一方面，本雅明在阿多诺论音乐拜物教特性的那篇文章的末尾注意到对进步概念的保留性评价，而进步概念正是本雅明本人特别留意的，于是本雅明说：“目前，你只是就‘进步’这一术语的历史证明了这一保留在过去的合理性。我将从根本上接受它，在其起源上考察它。”<sup>[196]</sup>

尽管本雅明和阿多诺之间的差异是多方面的，但他们都同意祛魅不可避免，甚至是有益的，而且，重要的是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新咒语会使它晦暗不明了。就目前世界的情况而言，只有在传统艺术的持续衰败之中才存在着机遇。任何无法从这一衰败和祛魅中被拯救的东西，自然也

218

无法从过去被认为——甚至现在依然被认为——是不能祛魅的、完全和  
谐的或古典特性必须具有的东西中被拯救出来。阿多诺写道：“在‘神圣  
和解的衰败’中，我（以使音乐变得滑稽的方式）看到某种确实积极的  
东西，我的文章当然与你对复制的研究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比任何时  
候都要紧密。如果这一点在文中还没有得到清楚表明，我将认为这是个  
严重的缺陷。”<sup>[197]</sup>

## 意识形态的批评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列奥·洛文塔尔 论艺术

当本雅明和阿多诺在欧洲忙于讨论关于现代艺术和文化之形式和  
功能的合理观点时，纽约的霍克海默圈子也没有停止唯物主义美学领  
域内的工作。1937年，学刊上发表了马尔库塞的论文“文化的肯定  
性”和洛文塔尔的文章“科纳特·汉姆生：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史前  
史”。<sup>[198]</sup>（此前洛文塔尔发表了关于康拉德·费尔迪纳特·迈耶尔  
[Conrad Ferdinand Meyer]、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易卜生的文章，而这篇关于汉  
姆生的文章不仅是洛文塔尔关于资产阶级古典文化系列论文中的最后  
一篇，而且也是他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两  
篇文章似乎完全没有受到本雅明和阿多诺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  
的“论音乐的社会地位”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之中所提观点  
的影响。它们既没有反映出应该专注于作品本身及其艺术手段和意义  
层面的要求，也没有反映出这一事实，即现代主义从19世纪中期以来  
已经获得了发展——现代主义的特性之一就是艺术美化功能的衰退。

洛文塔尔给《社会研究学刊》的这最后一篇文章体现了他本人与  
马尔库塞的一致性，马尔库塞就高度重视汉姆生。洛文塔尔此文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阶级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他区分了资产阶级对  
自然的感情的较早和较晚的形式。较早的形式是积极的，对人性循序渐  
进地控制自然充满信心，而这来自于自由资本主义中已经适应了物质

进步的大多数领域阶层的乐观态度。较晚的形式是消极的，对显得有些混乱而难以驾驭的自然充满了盲目的忠诚，而这来自于小资产阶级中的受虐狂式的态度：面对垄断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变得迷惑，他们顺从形势、崇拜权力。在这些介绍性的比较之后，洛文塔尔开始分析汉姆生的小说：“汉姆生的作品揭示了那种意识形态”——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洛文塔尔的分析看上去甚为突兀，他指责汉姆生缺乏社会理论上的清晰性因而对社会的非理性持鼓励态度。这一分析在方法论上是成问题的，它不认为汉姆生的小说具有文学特征，只是将其小说当作某个原始权威主义意识形态专家的宣言，而且这种分析只以纯粹的内容分析为基础去阐释汉姆生小说的社会作用。

经过这样一种分析，对汉姆生作品的接受只能被设想为对他的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或接受，而无法被视为多义的艺术作品通过其多样性的意义层面而得到理解的持续过程，也无法被视为批评家可以借以表达他们自己对艺术的一孔之见的批评过程。爱德华·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就汉姆生的《神秘》说过这样的话：“即便对话的不连贯，情境的不连贯，整个小说情节——如果还能说那是情节的话——的不连贯不是由作者的平庸和神经质造成的，它们也一定能使读者变得平庸和神经质。”<sup>[198]</sup> 洛文塔尔援引了“当时仍然坚定的伯恩斯坦”的这—“明确立场”。<sup>[200]</sup> 在洛文塔尔看来，这一评论表明在这里汉姆生小资产阶级的、原始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被拒绝了，尽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汉姆生就被《新时代》捧上了天。伯恩斯坦的这—说法除了表明他更喜欢古典叙事形式，更关注社会意识，以及对他的趣味而言汉姆生太现代了之外，还可以怎么理解呢？而后来《新时代》不再批评汉姆生“空洞的情绪”和“纯粹神经质的刺激”，却转而称赞其小说“对生命和灵魂令人激动的写照”，倘若我们事先没有确认哪些是对同一些小说较早的看法而哪一些又是较晚的看法，伯恩斯坦的说法又可以怎么理解呢？在这儿又有什么可以表明这些说法是对汉姆生同一种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反应，而不是对同一部艺术作品里不同意义层面的感知反应呢？在读了洛文塔尔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后，本

雅明问他：

220

这种德国式的接受方式能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挑战吗？从这篇文章的角度来看，还能构想其他接受的方式吗？……对我来说——尽管我很长时间都没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了——这些问题似乎比你显得更开放。我认为可以这么来想，恰恰在你的心理分析观点所通往的该作品的各个隐秘的角落，可以找到某些催化剂，它们不能被等同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总之，可以这么来想，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要以这个行将消亡的阶级而终止。<sup>[201]</sup>

他对洛文塔尔对于汉姆生作品的解释也持同样的反对意见。

马尔库塞的论文方式像洛文塔尔的一样，也忽视了艺术本身及其历史。而霍克海默则认为马尔库塞的论文“非常成功”，<sup>[202]</sup>并在学刊第6卷的导言中，把此文形容为研究所工作的典范。“与探讨实证主义的文章一起”（也就是霍克海默的“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sup>[203]</sup>），“对肯定性的文化概念的分析”已经“从共同的讨论中”形成，这种分析以一种肯定的（positive）方式显示出形而上学的梦想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在理论层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即，把对形而上学范畴的批判同历史理论的具体运用结合起来。“这篇文章表明了这种有效的思想方式，尽管实证主义一直都在威胁要我们完全摆脱这种方法。”<sup>[204]</sup>

马尔库塞接受了有教养的阶级对文化的经典定义——真、善、美，并把肯定性的文化定义为西方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这一时代认为真、善、美代表着一个包括了所有人的精神的、智力的，或是内在的世界。<sup>[205]</sup>马尔库塞重复了那个源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最为尖锐的宗教批判的传统主题：通过给罪恶世界提供一种“神圣的补偿”，真、善、美促成了这一事实，即，现在的世界是值得忍受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真、善、美不是产生对现存世界的满足，而是产生对它的不满，并唤醒希望以改造现实世界，使之更接近于

真、善、美。这也符合马克思极其尖锐地提出过的如下主题：通过实现 [verwirklichen] 哲学来消灭 [aufheben] 哲学。<sup>[296]</sup> 可以说这些理想是模棱两可的：它们既能产生满足也能产生不满，既能促使人们接受现实，又能促使人们意识到现实与理想也许是完全不同的。

在他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马尔库塞考察了肯定性文化那种法西斯主义的表面上的超越，并把它和非肯定性文化中的真正超越相对立。肯定性文化的法西斯主义的表面上的超越，实际上纯粹只是对自我合理化的那部分构成因素的加强，结果它们既成了人类勇武的表现，也是对人类蔑视的表现；而在非肯定性文化的真正超越中，美就是指现实的快乐经验。因此，对马尔库塞来说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法西斯英雄主义的肯定性文化，要么是现实形式的文化的真正超越，在其中人们将“在火山上舞蹈，在悲哀中欢笑，同死亡嬉戏”。然而在这两者之中，文化都不可能具有自觉批判性。肯定性的文化，它们表现为真、善、美的形式和灵魂、美、人格的观念，是极端脆弱的、几乎不可捉摸的构造物。马尔库塞一直认为它是“大资产阶级艺术”，其典型作用就是一方面对痛苦、悲哀、艰难和孤独加以强化而使它们成为形而上学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对带着来自此世的灿烂色彩的极度幸福加以渲染。<sup>[297]</sup> 在这儿不可能有现代艺术中那些因素，不可能有对敌对社会以不和谐方式进行反抗的那些因素。在马尔库塞看来，那种替代法西斯主义艺术和文化的选择，因其牢记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古典艺术的典范，因而是一种希望在实践中实现那种伟大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些理想的尝试。

221

这样一来，马尔库塞的文章招致了阿多诺的反对。在阅读了这篇文章后，阿多诺写信给霍克海默：

关于马尔库塞的文章，你像往常那样准确地估计到了我的反应。尽管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所有那些比我们承担着更多的学院化“观念史”遗产的人当中，马尔库塞在这篇文章中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的保留意见仍然很多……特别之处在于，你提到了肯定性

的文化概念，而马尔库塞所提出应加以考虑的却是文化的肯定性特征，也就是，文化的内容，而且首先完全是艺术的内容。——我认为他本来可以更深入，而且，如果他能坚持文化概念，关注文化的形成与功能，坚持对把这一功能发展成所谓“文化批评”的方式进行分析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他已经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考察了观念史上一个被准确界定的概念，这件工作就更适合他去做。然而事实上，他现在陷入了那些只能通过极其慎重、甚至极其严格的努力才能接近的领域。他的艺术观念似乎本质上是魏玛古典主义的；我想知道他是怎样解释《危险关系》、波德莱尔、勋伯格或是卡夫卡的。我似乎觉得，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艺术还有一个完整的、至关重要的层面：也就是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科学无法获得意义上的知识和发现的层面。“生活中到处都是玫瑰”——这种事确实只对第六种形式来说是足够好的。关于不愉快的现实的艺术与关于理想的艺术相对立，这种辩证的对立主题太过浅薄，无法接近明确的艺术效果。这对应于那种惊人的天真，凭着这种天真，他把当代大众艺术的某些感觉主义的方面作为积极的方面加以接受。

222 一旦涉及那些具体现象中的问题，比如纳粹对于文化意识形态的看法，这篇文章就是非常出色的，而且文章也成功地评述了文化衰败和文化拜物教化之间的一致性。

但是，正如你所说，它确实“太粗略了”，准确地说，太唯心主义了。例如，这也可以在如下事实中发现：古典主义美学被想当然地当作前提，而没有受到如下质疑：体现古典主义美学的最杰出的代表——我想到了歌德或贝多芬……——所运用的方法是否与赫尔德（Herder）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反思》、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或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有关；就在艺术之中，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分裂是否无足轻重，也就是说，古典主义美学是不是并未否认在《亲和力》或《浮士德》第二部中实际出现的东

西。马尔库塞认为这些都是同样的方式，这一事实表明，他受到了唯心主义的欺骗；无可否认，他很容易摆脱这一点。<sup>[208]</sup>

尽管霍克海默对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在意识形态批评中的立场非常感兴趣——毕竟，文章是在与霍克海默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写出来的——但《社会研究学刊》以后再也没有发表他们关于艺术或唯物主义美学的文章。讨论的主题被本雅明和阿多诺所垄断。1938年研究所(用英文)发表了一份计划书：

社会学研究的另一分支已经致力于各种不同的文化领域。研究所的工作来自于这一假说：依据适当的社会理论对具体的科学或艺术作品进行分析，经常可以提供有关社会实际结构的深刻洞察，就像许多领域通过多种多样的人员和资源所进行的研究那样。我们在文学和艺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一直就集中在那些对于欧洲专制世界观 (authoritarian Weltanschauung) 的传播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和艺术品上面。

在写这段话——这确实是洛文塔尔和阿多诺的工作——的时候，研究所也为自己在两种阐释艺术作品的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之中做选择留有余地。这两种模式一个是指洛文塔尔的研究，另一个则是指阿多诺的研究，前者以资产阶级的文化概念为中心，后者以审美现代主义为中心。但是最终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立场在社会研究里得到了认可，正是这个立场使审美现代主义在经验上成为了社会批判观念的基础。

### 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深度跨学科研究 错失的机会

223

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到纽约甚至要早于阿多诺。他

们在逃亡中就已经开始为欧洲的研究所工作了。研究所给这两位学者的待遇，生动地体现了这些特别着眼于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研究计划的研究所领导是以何种方式制定并贯彻他们的人事政策的。研究所的领导们并未全力争取专业学科史专家的合作；<sup>[209]</sup> 他们也从未给作为法律、政府和政治方面专家的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提供过全职工作。

弗朗茨·诺伊曼是政治流亡者，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了第二个研究生学位，导师是哈罗德·拉斯基 (Harold Laski) 和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他们在德国和霍克海默同时被从学术岗位上停职。诺伊曼被研究所接纳——或许是由于拉斯基的推荐，或许是曼海姆的推荐——去管理研究所的图书馆，图书馆的所有权已经被转移给了伦敦经济学院 (LSE)，目的是使图书馆能离开德国。

弗朗茨·诺伊曼受研究所之聘处理它的法律事务。但对于霍克海默希望有一个同类研究助手圈子的想法而言，诺伊曼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直到 1933 年，他还是贸易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的律师，只是在逃亡中他才成为一个专业学者。他的立场非常接近哈罗德·拉斯基，后者是劳动党首要的改革派理论家。

诺伊曼 1932 年法律博士论文后附的履历开头是这么写的：“我，弗朗茨·列奥波德·诺伊曼，1900 年 5 月 23 日生于卡托维兹。我是犹太人。”<sup>[210]</sup> 他是西里西亚的卡托维兹的犹太体力劳动者和店主的儿子（卡托维兹现在属于波兰），当时该地属于德国。他在柏林、莱比锡（1918 年他在这里与士兵和工人一起在街垒里作战）、罗斯托克和法兰克福（他在这里和列奥·洛文塔尔一起，成为社会主义学生组织的创建者）学习法律、哲学和经济学。在法兰克福作为实习办事员接受法律训练的时候，他与社会民主党员胡戈·辛茨海默一起工作，后者是德国雇佣法的建立者，是魏玛宪法的创建者之一。诺伊曼主要受到辛茨海默的影响，同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尔也对他产生过影响。诺伊曼持社会民主党的改革主张，并发表了关于雇佣法文章。他

还在法兰克福劳动学院 (Labour Academy) 任教, 并给工会培训班授课。在所有这些活动中, 他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清正廉洁的、几乎狂热的工作者, 一个既不情绪化也不诙谐风趣的敏锐的逻辑思想家, 一个只要有可能就决意寻求社会承认的人。

1928年, 诺伊曼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和恩斯特·弗兰克尔 (Ernst Fraenkel) 在一起, 开始了法律活动。后者和他一样, 都是辛茨海默的学生, 是犹太人以及社会民主党员, 而且后来写了一本关于纳粹主义的重要著作《双重国家》。诺伊曼成为建筑业工会的律师, 后来是其他组织的律师, 他在莱比锡的国家劳动法庭上出庭, 在超过500案例中为劳动诉讼提起上诉。他发表了关于雇佣法、工业法、出版法、卡特尔和垄断法, 大部分文章发表在工会报纸、社会民主党的学术期刊《社会》(Gesellschaft) 以及其他多少具有左翼色彩的报纸上。他在政治学院就雇佣法发表演说, 并参与了赫尔曼·黑勒和卡尔·施米特的研讨班。<sup>[211]</sup>

在工会的年轻一代和社会民主党的律师中, 诺伊曼是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在强烈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 他们由于信仰而坚强, 他们被魏玛共和国越来越明显的危机所激励, 这些年轻的律师用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 在魏玛宪法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之间寻求妥协, 反对对社会主义因素的方兴未艾的抑制。诺伊曼持改革派和法律派的立场。1930年9月, 工会杂志《劳动》(Die Arbeit) 发表了诺伊曼的文章“魏玛宪法中基本权利的社会意义”, 文章结论是:

社会主义宪法法律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魏玛宪法第二部分中积极的社会方面, 并以确定的形式提出它们……社会主义法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对基本权利进行社会主义的解释, 以防止它们在资产阶级宪法理论中复活。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基本权利。当辛茨海默在他的题目中问道, “魏玛——之后呢?”, 他接近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方式, 而回答只能是: “先试试魏玛!”<sup>[212]</sup>

1932年夏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任命诺伊曼作为全党的官方律师。1955年，恩斯特·弗兰克尔在一次纪念诺伊曼的谈话中回忆说：

以那种身份，他作为一名宪法律师，以拼死的勇气，与出版限制、解散会议、逮捕、解雇在任官员的行为作斗争，与巴本（Papen）政府、施莱舍尔（Schleicher）政府和希特勒政府的类似专制行为作斗争。尽管他在政治上处境危险，作为犹太人还受到威胁，他还是坚守在他的职位上，一直到1933年5月2日。1933年5月2日纳粹冲锋队占领了阿尔特·雅各布大街五金工人大楼里我们的律师所。在德国要再做什么已属不可能了。我当时和他在一个律师所，我们有着超过15年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努力。他离开我时说：“我已经看够了世界历史。”一个充满荣耀的行业被败坏了，让社会接受雇佣法的斗争已经失败，宪法国家已然坍塌，民主遭到破坏……弗朗茨·诺伊曼身无分文地到了英国。<sup>[213]</sup>

225 或许要感谢拉斯基，劳动党的理论领袖，他当时仍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进行思考。有了他的调解，诺伊曼才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助学金，并受到犹太组织的资金帮助。他作为一个失败的改革派和法律派到达英国。1933年末的《政治季刊》发表了“德国民主的衰退”，这篇文章是他流亡时期发表的第一篇东西，在其中他分析了形势：“制度体系在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基础上被建立了起来，只要没有经济危机的干扰，它就能维持。”而当经济危机到来时，

所有反动的政党都致力于一个目标：破坏作为工人解放的宪法讲台的议会民主。他们成功了，因为宪法大纲和实践使得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魏玛体系的惟一的保卫者，被削弱了。<sup>[211]</sup>

改革派的失败就像自残那样不可避免。

在英国，诺伊曼先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上以笔名撰写文章，努力鼓励德国本土的反抗者。但是不久他就放弃了政治活动，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徒劳。这位劳动运动的律师和理论法学家，成了政治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名学者，他正努力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他并没有轻视法律和宪法的作用，只是现在，他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框架中看待这一作用。

1936年，诺伊曼在英国完成了他的政治科学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法规统治：竞争社会中政治理论、法律体系和社会背景间关系之研究》。这本书在方法论上受卡尔·曼海姆、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很多影响，在内容上受哈洛德·拉斯基的影响，它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思想史，诺伊曼从如何看待国家的统治权和个体自由之间关系的角度，考察了从托马斯·阿奎那到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在第二部分中，他重构了19、20世纪英国和德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所针对的问题是，在评估法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国家统治和个体自由之间进行调解的机会的大小时，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结论可归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合法的功能主义概念：在合法的理论和合法的实践中，最需要思考的是，在通行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一种理论或解释是否履行了一种“进步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诺伊曼认为自由宪法国家放弃了某些进步要素，而这些要素是任何严肃对待个体自由的国家的基本构成因素：

因此，法律的普遍性、法官的独立性、分权学说，因保护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而使自己的功能超越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需要。法律的普遍性和法官的独立性掩盖了社会中一个阶层的权力：它们使交换过程可以计算，也为穷人创造了个人自由和安全。所有这三项功能都是有意义的，它们不仅仅是像自由主义批评家所坚持的那样，使经济过程可以计算。我们重复一遍，在竞争性资本主义时期，所有这三项功能都实现了，但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

有人没有认识到这些区别，而且在法律的普遍性之中，只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那么当然他会和卡尔·施米特一起推断，资本主义灭亡时，普遍性法律、法官的独立、分权一定会被废止。<sup>[215]</sup>

这只是温和的结论。如果自由主义经过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法西斯主义的过程，就像诺伊曼看到的那样，被看作一个维持生产方式私人所有权的统治、连续而有效的转换过程，那么，如何可以设想，能够重新建立那些在竞争性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利用的、自由政体的旧有的好的方面？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作为具有社会进步性而被保卫的合法的理论和阐释，如何可以想像？如果某种类似于自由宪政国家的体制能够得到重建，而其统治阶级又不敢采取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的话，也可能存在希望。尽管现在诺伊曼是在社会—理论分析的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思考，但他仍像他的老师拉斯基那样，是一位政治改革主义者，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样一种政治改良的基础之上：即只要重建了宪法条件，就可促进工人运动组织的政治发展。

1936年初，在他完成他的政治科学研究之前，诺伊曼遇到了霍克海默。一到欧洲，霍克海默就访问了研究所在欧洲的办公室，并会见了诺伊曼，后者是研究所图书馆的律师。诺伊曼从他在法兰克福时就记住了霍克海默，但此前一直未引起霍克海默的注意。这次会见之后，诺伊曼则从仅仅是研究所的律师，成为研究所在英国的宣传者。例如，他努力分送《社会研究学刊》，组织关于《权威与家庭研究》的讲座课程。在与霍克海默会见后不久，诺伊曼写道：

227

明天我要和拉斯基一起喝茶。我非常确信，我将获得他对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研究学刊》的完全支持。报告见后。非常高兴能在这么多年后重新见到你（或者，是开始认识你），并希望能再次看到你的那些用英语汇集和出版的文章，以在某种程度上清除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混乱。

几天后他写道：“拉斯基说他也很愿意以书评或者文章的形式同《社会研究学刊》合作。他保证以各种方式支持研究所，只要它‘坚守马克思主义’。”同一年，为避免移民限制，研究所提供给诺伊曼一份雇佣合同，送他去了美国。拉斯基把诺伊曼介绍给了他在旅行期间结识的许多著名大学的朋友。其中有哈佛法学院的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后者是罗斯福智囊团成员，1939年被派往最高法院供职。诺伊曼的第一印象——1952年回忆时，诺伊曼认为这次经验对他决定性的——就反映出他的观点与霍克海默圈子的观点之间有巨大的差异。

我相信留下了三个印象：罗斯福新政、人民的品格以及大学扮演的角色……罗斯福新政向一个好怀疑的德国人表明：自1917年以来就在宣传的威尔逊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宣传的产物，而且的确就是现实。它表明，一种自卫型民主（militant democracy）能够正好解决那些曾经毁灭了德意志共和国的问题。<sup>[217]</sup>

诺伊曼在美国大学任职的机会并未出现。相反，他基本上负责研究所的法律和行政事务。他来到美国之前，研究所领导派他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个月，处理费利克斯·韦尔（Felix Weil）的一个案件。1936年10月，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写信给霍克海默：

三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够重新“正常”工作，一旦机会来临，我就不再搞这些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厌恶的事务。我非常希望能去授课。我还从来没给学生们上过课，以前只给工人们上过。我很怀疑，大学生是否会像德国工人那样对我讲的东西感兴趣。<sup>[218]</sup>

这里提到的是研究所承担的哥伦比亚大学推广部1936—1937年冬季学期的系列讲座，讲座的主题是极权国家，诺伊曼也是主讲人之一。诺伊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负责的案件成功胜诉——对费利克斯·韦尔来说，

228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了——之后，讲座课程如期进行。

从那以后，他定期为研究所授课，他的课在学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尽管他在处理研究所的图书馆事务中并不成功，他仍是研究所的法律顾问。比如，在对研究所的诽谤案中，在研究所与研究所奖学金获得者格奥尔格·卢舍（Georg Rusche）的争讼中，诺伊曼都出了力。他几乎无法从事学术著述。除了一系列书评外，诺伊曼只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1936年至1942年之间他几乎未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过东西）。第一篇文章“资产阶级社会法律体系中法的功能的转变”，<sup>[219]</sup>发表于1937年，或多或少是诺伊曼那次英语讲座第二部分的简要叙述。第二篇文章“自然法类型”，发表于《社会研究学刊》的短期替代杂志《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则是对他的讲座第一部分的简要叙述。<sup>[220]</sup>此外，诺伊曼还写了1918—1933年德国工人的社会史，这是对研究所关于工人阶级研究的出版物的导论，同时诺伊曼还忙于不同项目的准备性研究。直到1939年夏天他才开始《巨兽》（Behemoth）的写作，后者成为研究所对纳粹主义的主要分析。

研究所于1936年为诺伊曼争取到了紧急委员会提供的“2000元津贴”，以保证诺伊曼将会成为全职研究员，1938年的研究所简章，开始把诺伊曼列为全职研究员。然而，像对其他大部分人那样，研究所并未与诺伊曼签订正式的雇佣合同。研究所的领导认为，诺伊曼作为学术外交家、律师和实践顾问，要比他作为长期合作的、具有法律和政治科学资格的社会理论家更具价值。1939年夏天，诺伊曼感觉到霍克海默和波洛克正在认真考虑削减研究所的“外部成员”。9月初，他被告知必须在1940年10月1日前离开研究所。稍后，他写信给霍克海默：

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因为我非常支持研究所的工作及其理论基础，因此，要解除与研究所的联系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在美国的机构中，我的理论态度和政治态度很难维持长期的雇佣关系，尤其是在这里不断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像你总是对自己强调的那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地抑制了我们这类

人的期望。

早先我并未寻求另一个职位，因为你和波洛克都经常告诉我和其他成员，我是研究所的永久成员。我仍记得去年夏天在伍德兰同波洛克的谈话，当时他告诉我，会为我减薪。在那时，研究所处于非常危急的时刻，他对我说，研究所里的团结是最重要的，而且研究所的永久成员不会被完全放弃。

然而，我在美国的机构中谋求职位同样很艰难，因为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属于研究所，我一直做着行政工作。这既不符合你的意图，也不是我的愿望。在我被任命时，是你要我成为合作研究者。事情发展得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我并不怨恨任何人。但是结果我的学术作品非常少。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向美国的机构展示。就像我已经告诉你的，我试图从某个第三方获得足以支持我在研究所的职位的资金。我已经请求斯佩尔曼基金支持我的雇佣法的理论基础的项目，我还要向古根海姆 (Guggenheim) 申请一笔年金以支持我对自然权利复兴问题的研究。所有这些论题都已经引起有关组织的特殊兴趣，并予以接受。我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基础的研究所做的准备性工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位出版商。

另外，我已经设法去争取美国大学的职位。尽管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将利用所有的关系以获得任命，减轻研究所的资金负担。如果情况需要，我将接受波洛克的建议，年内去华盛顿或其他大学。

但是，如果我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如果你能考虑到我所提出的情况，考虑到我的人事职位，从而改变你的决定，我会非常感激你。<sup>[221]</sup>

结果研究所做出让步，延期解聘，延期到 1942 年底。在此期间，诺伊曼完成了他的《巨兽》。这部著作成了他离开研究所进入成功职业生涯的

通行证。

研究所的领导对奥托·基希海默采取的政策像对诺伊曼采取的政策一样奇怪，尽管这两人的情况非常不同。基希海默在流亡巴黎期间，通过时间长短不一的研究合同，进入了由国际社会研究协会支持的年轻学者的流动圈子。这些合同，部分是用来帮助年轻学者进行深造，部分是用来保证独立的学术工作得以开展。

230 “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但对实践政治最终的确不感兴趣”，这与弗朗茨·诺伊曼恰好相反——这是奥托·苏尔的妻子回忆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时对基希海默的评价，当时弗朗茨·诺伊曼、奥托·基希海默、恩斯特·弗兰克尔以及其他左翼律师经常到苏尔的家中拜访。<sup>[222]</sup>奥托·基希海默1905年11月11日生于黑尔布劳恩的一个犹太家庭。1924—1928年，他先在明斯特学习哲学和历史，接着到了科隆、柏林和波恩，在马克斯·舍勒、卡尔·施米特、赫尔曼·黑勒、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sup>[223]</sup>等人指导下学习法律和社会科学。1928年，他在卡尔·施米特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宪法理论》。<sup>[224]</sup>这是对施米特的魏玛议会民主批判的左翼激进回答。基希海默在其中看到了现代规范民主的典范。由于在现存的各种力量之间总是有着精确的平衡，彼此冲突的阶级最终获得了这样的默许：“只要存在平衡，选举和偶然的大多数就能决定谁上台。”对政府权力也进行了精确限制，以使“那些认为他们控制了国家事务的人……发现他们受法律过程的制约”。<sup>[225]</sup>

像诺伊曼一样，基希海默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但他属于其中青年社会主义派别，相反诺伊曼属于中间偏右的派别。基希海默的博士论文清楚地表明，他鄙视社会民主党对议会民主和宪法的尊敬，追慕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他用施米特的统治权和敌人的概念指出该立场的特点。在基希海默看来，社会民主党相信“双重发展”，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会随着人性教育的进步而一同进步。但是列宁已经用全面、总体斗争的学说取代了这一学说。社会民主党人迷信国家，这种国家无非就是靠某个

确定的敌人而得以界定自身的主权国家或曰宪法国家。然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它宣布阶级是一种主权利力，因而支撑起了世界革命这个有直接效果的神话，这一神话绝非什么理性乌托邦，它还具有一个至尊的专政概念和一个绝对的敌人概念。

完成了法律学习后，基希海默成为埃尔富特和柏林的普鲁士法庭的一名职员。同时，他1930年前就在工会学院授课，在论述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宪法状况的犀利文章和著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对诺伊曼和他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同伴恩斯特·弗兰克尔、奥托·卡恩·弗莱文特 (Otto Kahn-Freund) 和马丁·德拉特 (Martin Draht) 来说，重要的是利用魏玛宪法提供的可能性。但对基希海默来说，重要的是理解，宪法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个陷阱。宪法模糊了这一认识：获得宪法保证的资产阶级财产的利益要高于获得宪法保证的工人阶级需求的利益；它削弱了工人实现需求的意愿；当统治阶级恢复它们的权威时，宪法鼓励对事件的消极考察。

《魏玛——之后呢？》(1930年)<sup>[226]</sup> 是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紧急警告：当他们坚持宪法和议会，把全部力量投入其中，而这时统治阶级早就使自己不受宪法的约束了。他们正在利用由宪法的双重性和阶级力量的暂时平衡所造成的官僚政治的繁荣。基希海默认为，认为有可能通过宪法改革，即通过使已经恶化的状况规范化和合法化而阻止衰败的希望是完全错误的。在1929年基希海默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每次大选结果一再向德国资产阶级表明：为什么绝大多数大众并不真的希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条件发生改变，但他们却拒绝现有的宪法立场并为了资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基希海默的回答是，资产阶级“希望革命——因为他们在决断性的一刻，所缺乏的就是终极安全和最终确定性”。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为了资产阶级政治的目的，对国内的所有力量进行绝对可靠的集中和控制”<sup>[227]</sup>。

在《剥夺的界限》(1930年)<sup>[228]</sup> 中，基希海默出色地说明，魏玛宪法所保证的基本权利怎样一点一点地被法律判决和法律力量暗中破坏，宪法中的旧的资产阶级要素怎样把其他要素排挤到一旁。魏玛宪法

中的平等原则和关于剥夺的条款——许多社会主义者希望用它们使资产阶级国家合法地发生彻底变革——已经被德国最高法院变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保障。基希海默在这里表现的批判敏锐性可以与霍克海默在《破晓与黄昏》格言集中的那种敏锐性相提并论。基希海默以此敏锐性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勾勒了法律机构及其作用方式何以发生了改变，并以此为背景分析了资产阶级宪法国家的反社会的复兴。

那些明显成为经济上更强大的阶级的累赘的法律，在正义的名义下被武断抛弃，这并不符合魏玛宪法。显然，满足对正义的要求的这种明显的非正义，就包含在魏玛宪法的社会体系中。显然，当平等被认为是一种实质价值时，必须认识到，在社会平等创造出条件，使法律能够真正平等地运用于所有人之前，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仅仅是一项纸上的权利……一个宪法国家会创造某些外部条件，无论好歹，会用它们控制个体或单个的阶级。它只能那样做。例如，它会确保，一个有钱人的儿子，骑摩托车三次违反交通规则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会像一位有四个孩子的司机一样，被吊销驾驶执照。这一事实，一个人失去了一种形式的欢乐，另一个人却失去了他的生计，在法律看来是毫不相干的。就在社会平等必须开始的地方，宪法国家无所作为，听任事情或许是永远处于不完善中。使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进入资产阶级宪法秩序已经消失的世界中，就是以平等自身的名义禁止平等。<sup>[229]</sup>

232

然而在这里他坚持“感觉”和“意图”，可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宪法是惟一可以获得支持的阶级力量，他没能避免这个绝望的悖论。但是他确实认为，十年来，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不断削弱，而统治阶级的力量却同时不断加强，并部分地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得重构。

在他最终的政府机关考试后，基希海默定居柏林成为一名律师。像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年轻律师一样，他经常参加赫尔曼·黑勒和卡尔·施米特的研讨班。在纳粹上台之前，基希海默和他的同事纳坦·莱特斯

(Nathan Leites) 发表了对卡尔·施米特 (Carl Schmitt) 《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全面批判。基希海默明确表示, 他并不认同施米特的如下信念: 民主在多样化的社会中根本行不通因而必须予以摒弃。他是不是也因而抛弃了他早先和施米特对非主权 (non-sovereign) 国家共有的蔑视呢? 施米特想的只是卢梭有关极端民主的思想和议会讨论这种理性乌托邦, 目的在于用使这些观念变得可笑的现实来比照这些观念, 目的在于取消这些观念, 目的在于让这些观念与民主的所有形式和解决政治难题的理性方式一道变成荒谬, 基希海默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吗? 基希海默的立场已经变得模糊了。这一批判以一种逃避性的看法结束: 重要的是考虑到“宪法发展可能性的丰富性, 而这一丰富性并不来自于宪法领域自身, 而是来自其他领域”。“情况似乎是, 宪法理论只能通过某种为期尚远才能出现的普遍性质的综合表述, 因而也只能通过与几乎涉及所有社会领域研究的其他学科的紧密合作, 才能为这些难题提供解决。”<sup>[230]</sup>

1933年夏, 基希海默去了巴黎, 主要从事由伦敦经济学院资助启动的刑法研究。1935年他以“赫尔曼·塞茨 (Hermann Seitz) 博士”的笔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第三帝国的国家结构和法律》。<sup>[231]</sup> 这本小册子被伪装成“今日德国”系列丛书的第十二册被偷偷带入德国。而这套丛书的编辑就是卡尔·施米特。施米特当时追随获得胜利的纳粹, 成为普鲁士政府的议会议员, 是德国法律学会的成员, 还是保护法律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大学教师团的国家领导团的成员。<sup>[232]</sup> 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德国法学报》的厌恶性反应, 这学报也是由卡尔·施米特担任编辑。该学报认为这是试图暗中破坏德国争取国际理解的努力的“恶毒煽动”, 正无望地挣扎在两难境地之中, 试图“同时使用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论据, 以反对对法律体系的国家社会主义重构”。<sup>[233]</sup>

基希海默受研究所资助的中心研究论题是刑法和法国宪法。他为《社会研究学刊》写了关于许多法国书的书评。1937年, 他也开始想办法去美国。霍克海默为此写了一封信, 就像他在前几年为诺伊曼提供的雇佣合

233

同一样，旨在于配额之外帮助基希海默去美国。这封信（原信是英文）说：

我们的诺伊曼博士从欧洲回来，报告说您有意在不远的将来在纽约加入我们。我们为您的决定而高兴，同时希望能早日欢迎您的到来。

诺伊曼博士已经告诉您，现在我们不能为您提供全职工作，但在大学暑假之后，我们将考虑给予您全职工作。因此，我们相信，在至少一年时间里，我们会邀请您作为兼任的合作研究者，薪水每月 100 美元，从您到来的时候算起。<sup>[234]</sup>

从 1937 年冬天到 1938 年夏天，基希海默一直忙于修改格奥尔格·卢舍 477 页的著作手稿《劳动力市场和刑罚体系》(Arbeitsmarkt und Strafvollzug)。这部手稿是研究所从 1930 年代就开始资助的、由卢舍主持的研究项目的成果。卢舍凭借 1930 年在《法兰克福报》上的文章“监狱暴动还是社会政策？”<sup>[235]</sup>，引起了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高度注意。1933 年，卢舍论“劳动力市场和刑罚体系”的一篇文章作为他的研究中后期报告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sup>[236]</sup>研究所称之为审查员的两名美国犯罪学家建议对此文进行修改，尤其是关于美国感化院体系的批判性段落。卢舍当时已经去了巴勒斯坦，他答应很快组织这些段落，但是直到 1937 年夏天卢舍再未提起此事。基希海默认为非常必要的费力的修订工作，结果却导致了有关版权的诉讼，诺伊曼在此次诉讼中代表研究所的利益作法律辩护。

1939 年，卢舍和基希海默发表了《惩罚和社会结构》——这是研究所自《权威与家庭研究》以来发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并且是用英文首次发表。在前言中，霍克海默称这本书是研究所出版物的“新美国丛书的开端”。在专论 20 世纪情况的那个章节中根本未提及东道国美国的情况，而根据序言和导言，美国的惩罚体系由基希海默写作。很明显，这是过分谨慎的结果。在其他方面，基希海默可能还增加了法律和政治内

容，以适应新的标题《惩罚和社会结构》，这比原来的标题更具综合性。在定稿中，尤其是在基希海默用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的论据的那些章节，这本书表明，惩罚政策对犯罪率没有影响，而且，旨在阻止的严厉政策和旨在进行人的品格改革（character reform）的温和政策，都不能使人们适应无法忍受的条件。而且，本书作为整体借以展现其材料价值和历史方法的那部分说明，犯罪的性质和程度以及监狱政策的范围完全取决于社会秩序，而现有社会秩序是敌对性的，只有改变其经济和政治形式才能改变其敌对性。本书得出的结论是：

只要社会意识还不能理解刑罚进步进程和普遍进步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以这一理解指导行为，刑罚改革的任何进步的成功都将是可疑的，而且如果失败，就会把失败归因于人类天性的邪恶而不是社会体系本身。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回到那种悲观的学说，即人类的邪恶本性只能通过把入狱标准降到自由阶级的最低标准之下才会得到驯服。严厉的惩罚和残酷的处置也许会无数次地被证明是无效的，但只要社会无法解决它的社会问题，人们通常就会接受这种不费力的方法。<sup>[237]</sup>

这本书在理论主张上是温和的，并从总体上避免了精神分析的思考方式，因此，它几乎没有给霍克海默留下任何印象，后者表述冷淡的前言证实了这一点。这件徒劳的工作并没有给予基希海默任何发展他自己才能的机会。他仍是研究所的一名兼职合作者，承担着经济统计的任务，要么就是——比方说吧——被波洛克要求去编卡片索引。他也辅助费利克斯·韦尔进行研究——韦尔有时为研究所去哥伦比亚大学推广部上讲座课并参加研究所“内部”讨论会。1939年8月霍克海默因没有基希海默的地址（这是在假期），就致信诺伊曼，要他通知基希海默，“我将高兴地支持每一项挽留他的措施。他在这里期间，我已经认为他具有出色的学术能力。”<sup>[238]</sup>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产生的结果，非常类似于随后在诺伊曼那里发生的结果。基希海默被研究所任意使用但拿

的钱却非常少，而且没有固定合同，但却从霍克海默那里获得了自信，同时不断地从霍克海默那里获得工作推荐和津贴申请推荐，尽管多年来这些推荐无一成功。

235 基希海默的三篇文章发表在1940和1941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由于战争爆发，《社会研究学刊》停刊近一年后在美国以英文重新出现，《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这份杂志就是《社会研究学刊》的继续，在霍克海默看来，它只是对本应尽可能再次抛弃的学术体系的让步。在魏玛时期，霍克海默没有注意到基希海默的光辉，而在美国，基希海默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光辉。霍克海默在基希海默所写的那些文章中看不到自己迫切关心的理论的任何运用，这更加确证了霍克海默对学刊的看法。

1940年夏天基希海默发表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刑法”强调，法律体系从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转换成一个行政性的官僚机构，这是自1933年以来德国司法体系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然而，这一官僚机构司法领域已经被行政权威在数量上的巨大增长严格限制了，后者有它们自己的刑罚惩罚的权力。

基希海默的“政治妥协的结构转型”，发表在杂志1941年第二期上。先是纽约的阿多诺，然后是洛杉矶的霍克海默，他们都试图以出版物的形式刊出该文。基希海默为此在1941年10月致信霍克海默说：“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您为通读我的文章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您的修改使主要观点得到了更好的表述；我希望我今后的作品也能从您的关注中获益。”<sup>[24]</sup> 自由主义，其特征是，把钱作为普遍的交换媒介使用，在个别议员和政府、议员和政府之间谋求妥协，它之后是“大众民主”，其特征是，存在能同政府竞争的中央银行，在统治集团、资本、劳工以及它们的附属组织之间缔结自愿的契约。在基希海默看来，法西斯主义，作为前两个阶段的继承者，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系统，这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证明：在一种极端的形式中，个人权利被并入集体权利，而这一点被国家所认可。因此，国家获得了对劳动力的垄断，而国家权力也伴随着工业的私人垄断。“因此，组织卡特尔的过程就在私人

权力和公共组织的合并中达到了它的逻辑终点。”然而，只有通过法西斯主义的领土扩张计划，那些妥协中的不同的合作者——垄断者、军队、工业、农业以及党派官僚政治的不同层次，它们的利益才能具有一个公分母。<sup>[211]</sup>基希海默论述政治妥协的文章和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表在杂志的同一期上。<sup>[212]</sup>基希海默的文章之所以被收入这一期之中，只是因为霍克海默看来“它的材料可以丰富”本期杂志的论题，而如果放在下一期里就不那么合适了。霍克海默并不认为它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论题而言是“根本性的”，也并不认为它是代表研究所的立场的研究成果。

基希海默的第三篇文章“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发表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1942年的最后一期上。<sup>[213]</sup>该文是他在1941年圣诞节前承担的研究所为哥伦比亚大学推广部开设的系列讲座的讲稿。其中心论点是，个人被社会分化和国家官僚机构所监视，集体的官僚机构的权威同政府给予它的行政责任的数量在不断增长。这些论点通过如下评论而构成了本文的高潮：某种形式的技术理性控制将变得无所不在，这种理性只对拥有权力的人而言才是“理性的”。

若没有基希海默这样材料丰富、以普遍观念和概念为中心的研究，社会理论就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霍克海默也无法想像没有这类研究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可是，霍克海默同其他专家在社会理论方面合作的愿望和能力，以及在经验性专门学科研究中进行大范围合作的愿望和能力，都是不足的。他无法抵抗的诱惑是，他可以通过忽略对具体材料的（与抽样分析不同的）系统分析而摆脱这一挑战。最终，他的轻视占了上风。他和基希海默的关系从来都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相遇，冷淡而有礼貌。

## 阿多诺、拉萨斯菲尔德和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

1937年10月，斯泰凡·茨威格（Stefan Zweig）邀请阿多诺写一本

关于勋伯格的书。不久以前，阿多诺为一本意外获得成功的关于阿尔班·贝尔格 (Alban Berg) 的书写了其中大部分，而这本关于勋伯格的新书也将由同一出版商出版。阿多诺 10 月 19 日致信霍克海默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多年来他一直在考虑写一本关于勋伯格的书。1936 年 2 月到 4 月，阿多诺利用做他的主要工作——论爵士乐的文章和论胡塞尔的书的主要部分——的空余时间，完成了关于贝尔格的那本书中他所承担部分内容的写作。由于有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细致研究，因此有望在两年的空闲时间里写完关于勋伯格的书。

237

最终我确信，一旦我写出一本关于勋伯格的书，它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表现在它的内容方面 [也就是说，除了研究所从中获得的良好宣传效果外]。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倾向于从弗洛伊德和卡尔·克劳斯的观点来看待勋伯格的成就，并且，以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资格，把他的目标看成是我们自己的目标。阐明这一点将是这本书的主要任务。<sup>[244]</sup>

写下这些话时，他正忙于写作论瓦格纳的书、论胡塞尔的书，并在为获得牛津的博士学位作准备。

第二天，10 月 20 日，他就收到了霍克海默的电报：“你到美国的可能性即将出现如有兴趣可以兼职两年进行普林斯顿大学新广播项目每月保证 400 美元行期确定即告我……祝好霍克海默。”在霍克海默发出邀请时，阿多诺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首次到了美国，度过了六月的几周。他两天后发电报答复说：“高兴并原则接受去普林斯顿工作希望即刻去困难是 18 个月的协议……和从德国搬家望尽快回电祝好泰迪。”很显然，阿多诺认为他获得博士学位是非常轻松的事，而且获得这个资格对他来说无足轻重。通过接受霍克海默已经交给他的工作，阿多诺并没有完全坚持最初的想法：如果在研究所或是大学有一个全职岗位，就从英国去美国。但是他不肯定，是否有一天他会完全失去他父母的资金供应，是否会爆发战争，这种不确定使事情变得紧迫——尽管他和霍克海

默都认为，西方民主和纳粹德国，都是资本主义的傀儡，不会发生相互战争。霍克海默鼓励阿多诺说：

同拉萨斯菲尔德的研究项目的合作，不仅提供了某种资金保证，而且也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你能同学术圈子和其他对你重要的圈子开展接触。当然，不用说，我们愿意你在我们中间，另一方面，希望你为你的生活争取到充足的物质基础，你理所当然应该追求这种物质基础，而且即便你不只依赖研究所也可以获得。我确实认为，对你和格蕾特尔来说，过真正的上层阶级生活的机会就在美国。<sup>[215]</sup>

拉萨斯菲尔德给阿多诺介绍工作，不只是一要报答研究所，因为他知道研究所想送阿多诺去美国。他非常想与他十分尊敬的、在《社会学刊》上发表“论音乐的社会地位”一文的这位富于见解的作者成为同事，并与之进行合作。一旦阿多诺同意，拉萨斯菲尔德将迫不及待地同他一起开始工作。

亲爱的魏森格隆德博士：

238

在最后的几天里，我和我的合作者讨论了我们希望从您和我们在一起的未来的工作中获得什么。请让我告诉您一个扼要的观点，以便我们能在您来这个国家之前就可以就此观点开始通信……可以说，我想使音乐的部分成为“欧洲方式”的猎场。我说这话要表达两点意思：其一是指对所研究的问题持更理论的态度，其二是指对技术进步工具持更悲观的态度。

尤其是第一点，我希望能引起您的注意。我们的项目确实是经验研究。但我和您一样相信，通过广泛的、初步的理论思考，对事实的发现能够获得极大改善。例如，我看了您发表在研究所刊物上的文章之后对情况有了如下理解：这正是我们希望从您那里获得的东西，但它必须在两个方面得到推进：

- (1) 针对经验研究问题；
- (2) 针对这一领域工作的实际执行。

拉萨斯菲尔德要求阿多诺给他寄去阿多诺本人认为特别重要的问题清单。

我有意没有给你任何在广播和音乐领域里我自己已经形成的具体问题和观点，因为我认为，让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同时不受我们的影响，这对我们来说更有益处。<sup>[216]</sup>

阿多诺从他的立场强调说：

我的理论态度并不厌恶经验研究。相反。“经验”概念，在准确的意义上，正在越来越接近我的思考的核心……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有一种相互关系，我们称之为辩证方法……我认为，音乐在广播上经历着某些质的变化，这为对音乐的感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基础。<sup>[217]</sup>

239 必须首先对生产进行分析。必须“搞清楚，并确证这一事实，广播中音乐现象之技术性质代表着其社会意义的关键”。一旦对生产的技术分析理解了“音乐广播的图示性”和其他可能的特性，“就可能发展出分析它们与听者的‘相互关联’的方法”，他给拉萨斯菲尔德写了一封六页的信，信中所有观点都围绕一份16页的《问题和论题》大纲，大纲同样富于见解。在《问题与论题》的15点讨论中，他勾画出“广播的辩证理论”和“广播的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并批评广播的现有形式抑制了广播所包含的进步趋势。

带着些许的吃惊，拉萨斯菲尔德在回信中强调：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这样一种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分析，也许必

须从对音乐生产的分析开始。这恰好可以作为开展任何研究之前进行理论分析的根据地，我期待你来这里开展这些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你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对听者的实际研究上，尽管在很多情形下，仅仅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不得不停止对于理论问题的表述，对于回答听众的技巧的讨论。<sup>[248]</sup>

此时阿多诺已经完婚。阿多诺夫妇再次去圣利摩度假，并遇到了本雅明，后者住在前妻的客房里。阿多诺夫妇要在那里度过三到四周的自由时间。1938年2月16日，阿多诺一家从卡普兰（Champlain）前往纽约。2月26日，阿多诺和拉萨斯菲尔德就将要展开的工作进行了第一次讨论。现在阿多诺是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的音乐部分研究的负责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的全称是“广播对于各类听众的实质价值”。

负责这一项目的两个领导是心理学家哈德莱·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和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前一位同他著名的同事戈登·阿尔波特（Gordon Allport）几年前就写了一本关于广播心理学的书，后一位当时是哥伦比亚广播体系（CBS）研究的领导。两人为该项目写了最初的草案，借此草案，普林斯顿大学在1937年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相当可观的资助：在两年期间提供67000美元的资助。罗伯特·林德热情推荐拉萨斯菲尔德担任研究首脑的职位（薪水是他难以置信的，一年6000美元）。在一封他为拉萨斯菲尔德提供职位的信中，坎特里尔写道，“我们试图最终确定，广播在不同类型听众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心理学上广播对人们所具有的价值以及他们喜欢广播的不同原因。”<sup>[249]</sup>坎特里尔和斯坦顿认为，需要两年的时间发展一种方法论，在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用这一方法论获得“最后的答案”，为此他们希望（准确地说，最终）获得额外的资金。

拉萨斯菲尔德在内瓦克他自己的研究所内成功安排了这一项目的实际管理工作。这个小研究所的整个预算不及广播研究项目的三分之一，因此，它获得了一份巨大的合同。在拉萨斯菲尔德自己给坎特里尔

240

和斯坦顿的备忘录中，他写道，“我们认为自己本质上就是服务组织，它并不设定目标，而是希望帮助选择和实现目标。因此，我们的研究计划就只能这样，我们的结果要适合实际政策的多样性。”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或者说很好地隐藏了批评的意思。当拉萨斯菲尔德提到商业广播和非商业广播的区分时，他谈到了“销售效果”问题之外还强调了“教育者”的作用——人们是否听到了教育者在广播上推荐的东西，或者说人们是否去了他广告推荐的博物馆。“教育者想要比商业赞助者在长得多的时期内以普遍得多的方式影响听众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广播仍然是相对新颖的并因而富于争议的媒体。根据这份备忘录，重要的是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技巧去处理那些在有关讨论中反复提出的多种多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广播中听新闻和在报纸上读新闻，二者以什么样的方式相互影响？广播有助于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吗？广播所造成的新的听觉效果会影响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吗？研究的中心应是广播节目设置的四个主要领域：音乐节目、有声读物节目、新闻和政治。但是拉萨斯菲尔德很快就把音乐当作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广播应该放在美国文化与社会普遍背景下来考察，而且拉萨斯菲尔德认为，这一分析必定带来的争议性结果如果是从音乐基础分析而来的将会容易被接受得多。<sup>[250]</sup>

阿多诺后来回忆起他对建立在废弃的啤酒厂上的内瓦克研究中心的第一印象。

根据拉萨斯菲尔德的建议，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和同事们交谈，听到“喜欢或是不喜欢研究”、“一个计划的成功或是失败”这样的话，起初我对此无能为力。但我对此非常理解：它涉及资料的收集，这被认为有益于大众传媒领域的计划部门，也就是说无论对文化工业本身或文化咨询委员会及类似团体都是有益的。我第一次看到了“行政研究”。现在，我不记得是拉萨斯菲尔德使用了这一术语，还是我自己惊奇地在一种被特别定向的科学种类中使用了它。确实一点都想不起来了。<sup>[251]</sup>

这些印象并不完全准确。拉萨斯菲尔德的真正特点是他对专用技巧 (technicalities) 的喜爱——表现为在集体性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可以运用多种方法解决那些曾经被简化为检验项目 (checkable items) 的问题——使他易于调节他自己学者化的兴趣 (虽说这些学者化的兴趣非常特别) 与他的客户及学术系统对他的期望之间的关系。

在与阿多诺合作一周以后, 拉萨斯菲尔德从他的立场, 在备忘录中向领导坎特里尔和斯坦顿报告说: “他看来完全是你所想像的那种非常心不在焉的德国教授, 他的行为很有外国味, 以致我感觉就像是五月花协会 (Mayflower Society) 的一员。然而, 当你和他交谈时, 他会有大量有趣的观点。”这种陈述是善意的, 而且很具策略。几年后, 当拉萨斯菲尔德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时, 他的朋友塞缪尔·斯托弗 (Samuel Stouffer) 写信给任命委员会:

尽管他已经在这个国家居住了 7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还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相貌和浓重的口音。这是一些人反对他的偏见, 而我认为某些人有着更深的偏见, 因为他们觉得, 在他的态度中时有傲慢。实际上, 保罗是最温和的人之一, 只是他以一种特别德国的方式提出论点, 而这会让某些人觉得, 他是在提出论点不如说是建议让他们和他一起去克服困难。我想这些批评有时是对的, 但我能从经验证实, 在他们的塔尔山 (them thar hills)\* 里有大量真金。<sup>[253]</sup>

拉萨斯菲尔德因此尽力使阿多诺这位欧洲理论家融入美国的研究体系。拉萨斯菲尔德尽管略微被自己在维也纳时期那段开创社会革命事业的回忆所困扰, 但他毕竟还是可以接受美国的体系。

---

\* “他们的塔尔山 (them thar hills)”: 1934 在美国上映的一部特别流行的黑白喜剧电影的名称。——中译者注

作为国际社会研究所的合作者，阿多诺完成了在英国开始的论瓦格纳的著作，并写了文章“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和聆听的退化”。作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的合作者，他研究了听众给广播电台的信，主持了访谈节目（“我……仍记得，当我亲自为了我自己的倾向指导一系列当然是非常随机和不成体系的访谈时，我是多么高兴，我从中学到了那么多东西”<sup>[254]</sup>），并且和广播业界人士交谈（“他对广播工业从业者的访谈招致了不少抱怨，抱怨说问题具有倾向性而回答也随之受到歪曲”<sup>[255]</sup>）。阿多诺也和音乐家谈话（“后者觉得，他们在向美国的高中生传播文化”——据拉萨斯菲尔德的说法，阿多诺告诉他们“他们是多么蠢”<sup>[256]</sup>），他还写备忘录：例如关于1938年5月作曲家联盟举办的电声乐器演出晚会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也许能把电声乐器和广播结合起来，这样人们就可以不再通过广播“播放”而是直接“演奏广播”了。“对自然音响和广播音响之间差异的取消满足了我对被复制的音响进行清算的要求。”但在1938年春天和夏天，他主要忙于写一份关于“广播中的音乐”的长篇备忘录。拉萨斯菲尔德本来希望让这篇备忘录在各类专家中传阅，以回击此前各个方面对阿多诺的批评，从而确保委员会支持他的工作。可是，阿多诺的这份备忘录却迫使拉萨斯菲尔德写了一封批评性的长信。

只是因为你表达了新颖而富于挑衅性的观点，你应当尤其小心不要受到合理的攻击，而我很抱歉地说，你的备忘录的许多部分确实没有达到理智清晰性、规范和责任的标准，而这些对积极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来说是必需的。我希望你把我的坦率看作是帮助你的工作达到它应有的成功的一种最为诚挚的努力。

我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以下三点上：

I. 你不应该详论你自己陈述的逻辑取舍 (alternative)，这样结果就是，你所说的很多东西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根据的、有偏见的。

II. 你对经验研究工作没有充分的知识，但却以权威的语言来

写，这样，读者就不得不怀疑你在自己的音乐领域的权威性。

III. 你攻击其他人是拜物教、神经质和多愁善感，但你自己却清楚地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用阿多诺备忘录里的大量例证讨论了这些反对意见之后，拉萨斯菲尔德继续写道：“你似乎是用右手给予我们你的观点，但由于在你的表述中缺乏训练，你又用左手把它们拿走了。”

拉萨斯菲尔德的无害的批评触及了阿多诺的关键的弱点。阿多诺当时 35 岁，只比拉萨斯菲尔德年轻两岁，他拒绝了这一批评。他在某些地方有理由地保卫自己，他并不固执己见，但却不能或是不愿利用重要的机会去学习，实际上没有其他人会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我想你只需要看看我发表的一篇文章，例如对爵士乐的研究，看看你用以指责我的那些事实，它们并不是任何内心混乱的结果，而是实践上混乱的结果。”<sup>[257]</sup> 在阿多诺看来，他的论爵士乐的那篇论文是从包含着“已经确证的论点”的手稿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完全属于经验研究。因而情形变得非常奇怪：阿多诺完全接受拉萨斯菲尔德的要求，并认为自己也完全符合这些要求。他同意拉萨斯菲尔德的观点，赞成应该得出听众类型学，这样就能使用问卷去评估不同类型的数量分布。但他继而又描述了听众的情感类型，比如，他主张哭喊是分析音乐情感方面的最具意义的因素之一。对拉萨斯菲尔德来说，这等于是拒绝进入对听众的具体研究，而他在第一封信中就给阿多诺强调过具体研究的重要性。 243

经验研究的价值问题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与应该进行改良还是革命这一问题有了关联。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以当前广播的组织方式，如何使好的音乐吸引尽可能多的人的问题，对阿多诺来说毫无意义。他写的音乐研究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 1940 年 1 月的《各办公室间的备忘录》中，当时洛克菲勒基金负责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的官员约翰·马绍尔 (John Marshall) 写道，阿多诺似乎“凭借他辨别缺点的能力，正忙于从心理学方面进行音乐广播研究，这使他寻找补救方法的努力变得可疑”。要指望从阿多诺那里得出富于成果的东

西，似乎就得有这样的条件：“应该有个人去与他合作，这个人既要代表现有体制，又要有足够忍耐力去包容阿多诺判断何者对体制有益的那种立场，并且能把这一切解释给必定无法容忍的人们听。”<sup>[258]</sup> 拉萨斯菲尔德确信，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但是，即使是1940年6月拉萨斯菲尔德和阿多诺对马绍尔的私人拜访，也没能改变马绍尔终止资助音乐研究的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任何成果能够有助于矫正目前广播音乐的缺陷。因此，1940年夏天，阿多诺和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的合作就终止了。

拉萨斯菲尔德认为，阿多诺的广播音乐研究文章中，只有一篇适合发表在该项目的出版物中，这就是“广播交响乐”。这篇文章于1941年发表在由拉萨斯菲尔德和斯坦顿编辑的《1941年广播研究》中。这篇文章是他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进行的研究的延伸；在其中，阿多诺采取了这一立场：广播中的交响乐仅仅表现了现场演奏的幻象，就像戏剧的胶片仅仅是生活幻象一样。为此原因，广播业向大众传播严肃音乐的要求从根本上就是可疑的。

244

交响乐所剩下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室内交响乐……了解未被歪曲的原作的听众越少（尤其是那些被广播傲慢地邀请参与音乐文化的听众），他们对广播声音的依赖就越强，就越无力地受到它的中性化的影响，对此他们却毫无意识……惟一能够敏感地使用广播的人就是专家，对他们来说，从音乐厅的庄重和紧张中获得净化的交响乐，被放大了，就像透过放大镜看原文一样。有了总谱和节拍器，他们就无法抗拒地跟随音乐的表现并暴露出其错误。但是，这当然不是目的。<sup>[259]</sup>

阿多诺进行广播音乐研究的另外三篇文章有：“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最初是1939年对广播项目全体职员的演讲），它包含了阿多诺的基本观点，发表在1945年的 *Kenyon Review* 上；“论流行音乐”，发表在1941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SPSS*）上；以及一篇研究NBC音乐

欣赏时间的未发表的文章，此文后来部分收入以德文发表的一篇论“受人欣赏的音乐”的论文当中。<sup>[260]</sup>所有这些论文都包含对美国广播和美国社会体系的强烈批判。“论流行音乐”是阿多诺文章中最清晰、最简明的之一，甚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受到称赞。像其他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是和阿多诺的“编辑伙伴”，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合写的。回头看看，阿多诺说，辛普森使他“第一次试图用美国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我的特殊成果”。<sup>[261]</sup>使用与“恒量”、“新奇”概念相关的主题，阿多诺从他和本雅明的讨论中，获得了对流行音乐（他暗暗地把这一概念作为轻音乐的同义词使用）及对其成功背后的策略的精辟分析。

发行者想要的音乐，既要从根本上同目前所有其他成功的表演相同，同时又要从根本上与之不同。只有当它相同时，它才能自动地被销售，而不需要费力去影响顾客。只有当它不同时，它才能和其他歌曲区分开来——这是被记住和因此获得成功的条件。

可以说，歌曲成功的标准化通过塑造听众的听力而牢牢地控制了他们。就伪个体化这方面来说，它通过让听众忘记他们将要听的音乐已经有人替他们听过了——或者说“预先消化”过了——这件事，从而把听众牢牢控制起来。<sup>[262]</sup>

在对流行音乐的产品、销售和结构等客观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245阿多诺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听众理论”。这包括一系列中心“论题”——例如，在欣赏“优秀的严肃音乐”中理解总是超越认识，总是能把握某种完全新颖的东西，然而在听流行音乐的过程中，理解充其量只是对片段的识别；还有：

实际工作所具有的疲惫和厌倦导致了人们在闲暇时间里逃避努力，而这些闲暇是获得真正新的经验的惟一机会，作为替代，他们渴望一种刺激。流行音乐提供的就是这种刺激。它带来的各种刺激正好迎合了某种无法在永恒的同—（ever-identical）上赋予努力

的无能感……赏识的时刻也就是毫不费力感动的时候。附属于这一时刻的突然关注会立即瓦解自身，并把听众转移到疏忽和精神涣散的状态。一方面，生产和广告宣传的环节预先假定听众是精神涣散的，另一方面又生产这种精神涣散。<sup>[263]</sup>

在结束的部分，他对大众对待音乐及流行音乐的行为反应所体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心理模式进行了区分。阿多诺认为，在年轻人中通常能看到“节奏服从型”的人，尽管乐曲中有许多切分音但其中基本的节奏会紧紧抓住这种类型的人，并进而让他们在服从中表达自己的快感。这种看法与他论爵士乐的文章的观点有关，在那篇文章中，爵士乐迷被看成受虐狂式地服从于集体权威。相反，“情感型”则是利用情绪化的音乐摆脱情绪——首先是不愉快的情绪。在阿多诺看来，这两种类型都顺从于它们的社会境况，尽管第一种类型表现为强迫行进（marching），而第二种类型表现为哭泣。

如果把阿多诺这些文章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可以说，尽管其中有对社会的尖锐批判，但都表明了一种立场，即对他所批判的社会结构的受害者本身进行谴责的立场；他对这些受害者下了一道判决，但却并未试图立即或事先找机会向他们宣读这道判决。阿多诺一直不停地对那些受害者借以表达自身的方式进行否定性的阐释，从而使自己受到了拉萨斯菲尔德的批评：由于他把对这一问题的所有逻辑可能性的解释都看作是多余的，从而任由他自己坚持自己的偏见。在阿多诺看来，很多人以歪曲方式用口哨吹出他们熟悉的旋律，这与虐待他们的宠物狗的小孩子是一样的。而这也许是对一个主题的变奏，也许是出于某人自己的目的以一种无礼的方式利用熟悉的东西，阿多诺认为这两个明显相似的可能性是不值得探讨的。因此用经验方法去检验他的设想的想法完全不会出现。阿多诺的文本充满了类似的情况。

246 有一种观念诱使阿多诺对他所分析的人类对象所具有的愉快方面持一种傲慢的冷漠态度。这种观念有规律地出现在他对于自己的思路、从内部突然打开事物、突然转变以及思想波动的推论当中。“论流行音

乐”关于听众的理论以这样的句子结尾：“为能被改造成昆虫，人类也需要有能使它成功改造为人的力量。”<sup>[261]</sup>但是，一种远离其探讨话题的看法，与那种缺乏任何社会批判背景、无所顾忌地只通过问卷或事先设计的实验情境来证明话题自身的主张一样，都是可疑的。

## 在行动和犹豫之间平衡

当拉萨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中试图使阿多诺这个欧洲人的观点服从拉萨斯菲尔德自己在最佳时期提出的美国经验研究一合同研究时，经验研究在国际社会研究所内部已经完全停止了。被草拟为《权威与家庭研究》后续的、各种各样的关于家庭、权力、失业的项目，也慢慢停止了。霍克海默 1935 年在《权威与家庭研究》前言里所宣布的、对经验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也没能进行。没有证据表明，为了集体研究工作的继续，霍克海默在前言里宣布的计划有任何发展。“把建设性的方法和经验方法结合起来”在实践上似乎已经完全被抛弃了。“不同专家之间的持续合作”已经成为临时结合，通常变成了通过经常的私人联系和非正式的编辑会议等方式对论题的交流。在纽约为霍克海默担任多年秘书的爱丽思·迈尔（Alice Maier）回忆说：

我们在纽约的工作地点是 117 西大街 429 号，这里一度是私人公寓。每一层有两个房子。第一层没有办公室，只有厨房和负责卫生和照看物品的穆尔道西太太的卧室。在第二层，马尔库塞住在前面的房间，诺伊曼住在后面的房间。在第三层，波洛克住在前面，洛文塔尔的卧室连同杂志的编辑室都在后面。霍克海默先生在第五层的前面房间工作，另外一位秘书和我在这一层的另一房间。在顶层有三、四个更小的房间。我的丈夫【约瑟芬·迈尔（Joseph Maier）】住在其中一间，奥托·基希海默住在另一间。<sup>[265]</sup> 247

弗洛姆不在他的咨询室时，就总是在家工作，1938年和1939年，他因为健康原因在瑞士呆了很长时间。两个“共产主义者”，魏特夫和格罗斯曼，在研究所也没有办公室。魏特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波特勒图书馆有一个房间，并在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小有名气。格罗斯曼作为由社会研究所资助的学者，就住在家里。他的冗长的、沉闷的手稿根本无法满足研究所领导的期望，而且，他过着非常不幸福的生活，生活极其困窘。阿多诺有时在内瓦克工作，有时在家工作。

这些是构成研究所工作背景的物质条件。“不同专家之间的持续合作”变成了只能与研究所相关的诸多限制一起使用的一句话，而较之于以往“建设性方法和经验研究的融会贯通”的努力也越来越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是什么？这是怀疑大规模的集体研究的持续意义的结果吗？这是在流亡中人们迷失方向的结果吗？这仅仅是重新定向的中断吗？

《权威与家庭研究》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但在这个阶段性成果完成之后，不仅对研究所的领导，而且对依赖于他的整个研究所而言，似乎开始了一个怀疑、犹豫和迷失方向的阶段。作为研究所集体研究出发点的观点是这样信念：权威处于衰落过程之中，至少从长远看来是这样的。在1930年代后半期，几乎无人怀疑纳粹主义的生存能力，而家庭的削弱和失业的持续减少看上去也符合个体应该服从于权威主义社会条件的这一要求。因此，这些条件恰恰无法支持研究所原来的那种观点。同时，美国的罗斯福时期也表明，即便是在非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里，权威主义的（或逆来顺受的）思想和行为甚至从长远看来也没有衰退，相反却是在不断增长。罗斯福本人也谈到过“权威主义实验”。例如，托马斯·曼1940年11月在BBC为德国听众所作的一篇广播演讲中主张：

欧洲的破坏者，所有人权的侵犯者，正好在罗斯福身上看到了他们最有力的对手……在大众的时代——领导者的观念就属于这一时代，应该由美国来创造一个现代大众领袖的欢乐景象，这个领

袖追求良善和智慧，追求真正属于未来的一切，他乃追求和平与自由之人。<sup>[266]</sup>

这正是罗斯福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德国移民中相当普遍，也常常伴随着对罗斯福本人的支持和热情。<sup>[267]</sup>

罗斯福新政加强了工会，有时鼓励、有时限制大企业。它使犹太人和左翼人士首次进入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岗位，使所谓“红色十年”、“反抗三十年”得以可能。但是，它的意图和后果都不包括改变经济结构。1938年的衰退使失业人数回升到一千万，罗斯福在一次公开声明中承认，摆脱衰退的惟一方法就是刺激军工企业。这明确表明了，美国的发展虽然要比欧洲更少罪恶，但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先兆。得到加强的工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等级制的游说组织。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许多负责管理的部门，也是具有新政特色的一项措施。这一举措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花样百出的人道组织中的某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实施干预——罗斯福的“炉边闲谈”广播伴随着轻柔的背景音乐透露出暂时性权威主义福利国家的先兆。

在欧洲法西斯主义接连胜利的阴郁背景下，要对此进行准确评估并不容易。到1930年代末，研究所要在欧洲和美国同时进行经验研究都不再可能，它只能局限在美国。要认清复杂的社会危机难题需要时间。这些难题既是美国状况的反映，同时也是研究所奉行的小心谨慎的策略的根据。霍克海默越来越没有耐心去从事对各科学学科的批评，但在指认哪种理论和哲学倾向是对社会无批判的、是作为对既有状况的接受和认可的形式而在美国大获成功的这个方面却表现得日趋严厉。这也许能部分地说明经验和集体研究何以在研究所完全停滞的原因，也能部分地说明拉萨斯费尔德却代表了研究所至今仍在沿用的研究方法的原因——尽管从1930年代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认定拉萨斯费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而且，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学刊继续发行，而且是以德语继续发行的原因。也只有在学刊上才能让研究工作以欧洲人的方式继续开展。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1938年10月，霍克海默写信给研究所的日内瓦办公室的秘书法薇女士说：

249           11月1日我们准备搬家。我们要搬去的地方是叫斯伽尔斯达勒 (Scarsdale) 的郊区。那是一套小房间……地处多树木的地区，我想我会在这里工作得很好。所以我将能够最终开始写作关于辩证哲学的著作。我只能每周去一次研究所，因为每周的那天我都有课。同一天我还要在研究所主持关于斯宾诺莎的小型研讨班。<sup>[268]</sup>

在霍克海默的想法里，已经有了完成他的著作的更为详细的计划。这个珍藏多年的、同阿多诺在法国南部共同写作的计划，在1939年由于欧洲的状况而无法实现，霍克海默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完成这本书。1938年夏天他和妻子到达加利福尼亚，并在靠近好莱坞的圣莫尼卡，热情地致信洛文塔尔：“这里的风景，有时甚至是建筑，真的很漂亮——天气也有疗养作用。如果1939年秋天我们只剩下一分钱，而且不可能去法国，我们就来这里。你知道，这里很便宜……住在东部是愚蠢的，除非绝对必要。”<sup>[269]</sup>他之所以最终决定开始进行这项严肃工作，进行他眼中的这项主要研究任务，同时也是最必要的研究任务，他之所以最终决定通过辩证法著作进行理论拓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财政考虑。

研究所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组织。1938年，它的永久成员，除了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就是弗洛姆、格罗斯曼、库姆佩尔茨、洛文塔尔、马尔库塞、诺伊曼、阿多诺和魏特夫。研究合作者年年在改变，但奥托·基希海默和弗里茨·卡尔森 (Fritz Karsen) 却长期名列其中，同时还有6—8个短期成员。这里还有4—6个秘书。还有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莫西·芬克尔斯坦因 (后来改称芬莱 [Finley]) (Moses Finkelstein) 和本雅明·纳尔森 (Benjamin Nelson)，他们是翻译者和编辑助手。另外还有一些有关经验研究的短期和兼职岗位。研究所的花费情况是：根据波洛克的估计，在1933—1942年十年间，大约有二十万美元用

以资助移民学者，以个人奖学金的方式资助了约 130 人。<sup>[270]</sup> 这一组织，被研究所的两个领导以复杂的感情看作是“外部的”，而且突然好像危及到了辩证法项目。这是为什么呢？

确实，国际社会研究协会的资产，在 1937 年就已经从 390 万瑞士法郎降至 350 万瑞士法郎，资本也第一次被挪用。<sup>[271]</sup> 尽管有这些不好的情况，但也并未违背韦尔的捐赠计划，韦尔提出，钱不能作为资本，而应当长期逐渐花掉。1938 年的衰退并未带来任何改善，但却带来了一场急剧的恶化，对此，波洛克自己承认负有责任。他的办公室的一面墙被用作股票交易行情表，但是他在投资上并不幸运。本来开始也许只是研究所巨大资产的临时减少，但这绝不是使经验研究项目慢慢停止，同时开始新的集体研究项目的充足理由。减少的资金足以应付比《权威与家庭研究》更少雄心抱负的经验研究的数据收集工作。

研究所这个机构对于辩证法项目来说已经呈现出一种危险，同时辩证法研究项目也越来越脱离于研究所原有的促使经验研究、专业研究与思辨研究相结合的规划，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一个明确的原因。这正是霍克海默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大笔充足的资金可供使用。这种担心使霍克海默在《破晓与黄昏》的格言中对资产阶级提出了一些最严厉的批评，然而同时，这种担心也使他 and 上面提到的社会研究协会建立起古怪的联系。1940 年夏天，在去洛杉矶定居的途中，他写信给洛文塔尔，“在整个途中我始终看到：‘金钱是最好的保护，金钱是最好的保护，金钱是……’”<sup>[272]</sup> 通常容易看到事物的阴暗面的波洛克加重了这种担心，他提醒霍克海默，鉴于越来越不安全的资金形势，关于辩证法的著作必须被放在首位。

但是，担心也有一种重要的动机：把研究所的工作保持在一个尽可能令人敬畏的水平上。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庇护下，研究所是一个重要的保障；没有它，霍克海默就会觉得完全像是在社会中流亡的被抛弃的个体，在社会中，如同他所看到的，只有强大的组织提供着保障，而个人和他们的财产都处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有被操纵的“意外事件”的掌控之中。他在理论领域对成就的需要并不低于他对自尊的需要，而后一

种需要正是通过他作为科学机构的管理专家和主管的角色得到满足的。这种内在的冲突形成了一种妥协，那就是，研究所的业务继续维持，但却没有任何特殊方向。从1938—1939年冬天开始，研究所（非常半心半意地）试图获取官方基金并吸纳对其整体或个别研究活动有兴趣的私人身份的公民参与进来（研究所1938年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书对此有简单说明），其目的还是获得基金。（霍克海默写信给本雅明说，“与你想像的一样，我们的工作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更易被认为是一种奢侈——至少用这种语言中介来表达，它是奢侈的，而就我们工作的特殊性质而言，这项活动在我看来的确不好开展。”<sup>[273]</sup>）许多职员，被或多或少的关于研究所就要财政崩溃的秘密迹象，被费解的减薪搞得  
251 得很困惑和缺乏信心。霍克海默急于赶快写完他关于辩证法的书，但总是腾不出时间来。他带着轻视和屈尊的态度来看待研究所对哥伦比亚大学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同时还在思考如何让哥伦比亚大学方面明白：他们并没有对研究所表达应有的感激。

1930年代晚期研究所失去方向，这迫使它采取一些平衡措施。虽然说研究所历来在搞平衡，比方说在适应其学术环境方面搞平衡，但现在做起来则更为困难。研讨班实际上是研究所的合作者的讨论团体，美国学生只是偶尔参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把简章上介绍的讨论会变成他们私下的讨论，这样他们会觉得多少安全一些。研究所举办了以下这些研讨班：霍克海默“逻辑史中的选择难题——以社会史基本概念为参照”讨论班（1936—1938），库姆佩尔茨和波洛克“商业周期理论”讨论班（1936—1937），韦尔“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生活标准”讨论班，以及阿多诺“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的社会背景”讨论班（1938）。当“霍克海默博士和国际社会研究协会全体成员”自1936年开始给哥伦比亚大学推广部开设系列讲座的时候，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他们的私人圈子。这些讲座题目大同小异，探讨的都是欧洲权威主义思想和权威主义体制。比方说，在1937年到1938年，霍克海默的讲座是哲学导论，而马尔库塞主讲支配和服从的思想史，稍晚些时候，洛文塔尔则主讲文学中的权威问题，诺伊曼主讲权威主义国家，弗洛姆主讲

现代性格结构。至少对霍克海默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对实际工作令人愤怒的干扰。他不想在其中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尤其对学生们所热衷的问题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在推广部做无关乎研究主题的这种很难投入的讲座，从长远来看，无益于增加他的声望。在1939年到1940年，不是霍克海默而是诺伊曼——他作为大学教师非常成功——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的教授，这时，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和阿多诺都认为，这对研究所来说是一个耻辱。<sup>[271]</sup> 这就是霍克海默和他的支持者认为他们正在面临的两难境况的典型反映：他们想和学院体制保持距离，但同时还想被视为以指引方向的姿态参与其中的人。

另一种平衡行为体现在如下努力之中：竭力不背叛左派事业，但同时又使自己避免被怀疑为左派——竭力避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本人指责别的知识分子的那些缺点。当阿多诺有可能与巴黎伽利马（Gallimard）出版社的出版商伯纳德·格勒图生（Bernard Groethuysen）——一位居住巴黎多年的本雅明的熟人——一起出版法语版的霍克海默文集时，就表达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眼中的两种忧虑：“首先，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朋友来说，你的书恐怕太学术化了。第二，恐怕官方大学的人觉得它太马克思主义了。”<sup>[272]</sup> 霍克海默引申了这一观点：

252

官方对我们的厌恶仍可以看作是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背后潜藏着某种力量——的后果，尽管这种潜藏的力量正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可悲地萎缩了。对所有“学术”的厌恶……仅仅是那种对于批评的惊慌失措的恐惧造成的，这种批评把思想本身看作是可疑的……这两种对立的力量却很相似，两者两次相互结合成一股力量只是时间的问题。思想正在日益变成公敌……实际上我们在法兰克福就见证了这一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现在普遍化了，而且正在把那些一度相互对立的团体团结起来。<sup>[276]</sup>

霍克海默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对内把对“马克思主义友人”的立场称为激进思想的立场，而对“官方大学的那些人”则把这种立场称为在人文

学科和哲学中忠于欧洲传统的立场。

但实际上，把欧洲知识分子传统当幌子的这种做法，并无助于使研究所在这个国家里摆脱怀疑。在这个国家里，社会研究差不多就应该是经验研究，而且，习惯上要同研究委托人保持紧密合作，要有研究成果连续出版。1943年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声明以解除某些怀疑——而且这不是研究所第一次发表声明（尽管声明文件也许从来没有达到过解除怀疑的目的）。在这份声明中，霍克海默说：

另一个错误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称作研究所而不是基金会或捐赠基金，对此我负有部分责任，但它也许可以从我们的背景获得解释。当我们到这个国家时，我们的想法是，用我们带来的资金，帮助那些由于独裁抬头而失去职位的欧洲学者继续他们自己的工作。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一些美国朋友希望社会科学研究所能够参与到对有关的社会问题、实地调查工作和其他经验调查的研究中时，我们也尽力满足这些要求，但我们内心所专注的还是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个体独立研究和对文化的哲学分析。

253

自从我们不再依赖外部资金，我们就认为，欧洲老式的人文学科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家园而又在其他国家无以树立，因而保存发展这类人文学科的某些典型研究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这个目标体现在研究所工作的内容、方法和组织之中。这也是我们在长时期内仍以德语和法语继续出版刊物而并不关心大量出版著作的原因所在。<sup>[277]</sup>

几年中，《社会研究学刊》是研究所工作的惟一出版物，1939年在其中还有《权威与家庭研究》的整页广告。在1937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举行的午餐会上提交的一份文件中，霍克海默表明了要以德语为主要语言继续出版学刊的坚决态度。对根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延续着德国哲学和社会学的传统，而这种讨论，以“我们国外的朋友们”的观点来看，较之于用难以令人满意的英语和法语进行而言，用德

国的本土语言进行当然是更好的。

我们相信，在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语言的过程中，从德语到英语或者从英语到德语，其意义差别的细微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哲学、社会学和历史中，翻译的过程本身总是包含着简化和泛化的危险。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避免了这个困境。今天，《学刊》是在我们的科学领域里，惟一一个以德语出版的、完全独立的出版物。

霍克海默一贯坚持清晰明白的表述方式，《社会研究学刊》的撰稿者，除本雅明和阿多诺之外，几乎所有其他人的作品在语言上基本极少修饰，因此这种语言上的敏感性并不具有说服力。战略上的考虑也是决定性的。用德语出版杂志，这是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和弗洛姆都同意的。这将尽可能少地给试图“干预”或“控制”它的那些人提供机会。<sup>[278]</sup>而且，以德语出版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副作用就是，研究所促进了德国人当中的思想抵抗（intellectual resistance）。日内瓦办公室的秘书法薇夫人，1938年问霍克海默，她是否能以低价向一群德国学生提供几卷《社会研究学刊》，这些学生逃到巴塞尔，他们长时间以来都高度赞赏研究所的工作，而且现在想要学习这种研究工作的方法。霍克海默非常高兴，“甚至今天，我们的工作并不完全是徒劳的”，<sup>[279]</sup>霍克海默大为高兴，并引用了一封移民挪威的德国教授的信，对他和他德国的朋友来说，这份杂志是“思想堕落和荒芜中的一片绿洲，它今天支配着德国的哲学和智力生活”。

尽管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的担忧和警惕经常好像是夸张和荒谬的，但这些担忧和警惕未必没有原因，或者说至少渐渐有了一些充分的根据。在1930年代末，他们在流亡中所经历的一些情况，让他们想起了在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里的处境。1930年代后期，当新政停止之时，红色十年也行将结束。左派曾经在政治、行政和媒体中占据突出的位置，或者说后来被指责是这样的，然而随着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引发的

254

觉醒，情况为之一变，出现了一股确定无疑的反共产主义的力量。1930年代，甚至对那些无法容忍移民的美国成功人士来说，左派立场也是可接受的。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庇护之下的左派移民最有安全感。哥伦比亚大学是这样一类大学之一，它们的教授大多是左派自由主义者，对新政和罗斯福本人（或至少其中之一）持友好态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共和党保守派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也为他的下属进入罗斯福政府这一事实而自豪。

1930年代晚期的这种政治气候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研究所日益受到某种暧昧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是由持不同信仰的移民团体煽动起来的。研究所和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关系非常紧张。<sup>[280]</sup>新社会研究学院一战后由一批自由主义者建立，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学术界进步知识分子的中心。例如，托勒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直到1927年一直在那里授课。1920年代，在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的领导下，学校开始变得保守，并成为依赖财政津贴的、进行成人教育的普通机构。1930年代，“流亡大学”与新社会研究学院合并成一所真正的大学，而新社会研究学院也成为了在美移民学者最大的聚集地。洛克菲勒基金非常爽快地同意了约翰逊为100个教授职位提出的资助要求——但实际上新社会研究学院这100个教授职位从来没有实现过满额。1934年，约翰逊为移民学者办了一份杂志《社会研究》。反马克思主义的阿道夫·洛威和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斯·韦特海默都是新社会研究学院的成员，他们是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时就打过交道的老熟人。汉斯·斯皮尔（Hans Speier）也是反弗洛伊德主义者，1936年他在《社会研究》上写了一篇针对《权威与家庭研究》的高高在上的、屈尊俯就的书评。受到约翰逊特别照顾的艾弥尔·勒德雷尔（Emil Lederer）直到1939年去世之前一直扮演着新社会研究学院中移民学者领袖的角色。勒德雷尔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是新政的反对者。勒德雷尔把沃尔夫冈·豪尔嘉登（Wolfgang Hallgarten）的《论帝国主义》手稿原封不动地寄回了在法国的作者手中，就因为他认为作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但洛威与霍克海默之间私交甚笃，而且蒂里希与这两个社会研究团体都有联系，并且汉斯·艾斯勒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也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执教，这些情况造成了令人费解的战略困境。

新社会研究学院的一些成员，以及想让研究所在美国基金组织面前丧失信誉或只是想以煽动怀疑发泄愤恨的其他一些移民，到处放风说研究所内有共产主义者或研究所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是某种前哨机构。面对这些怀疑，研究所的领导者们不得不有所应对。1940年7月30日，在大学假期中，两名警察来到了研究所。当时只有洛文塔尔和一名秘书在场。洛文塔尔向霍克海默报告说：

在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他们对包括一名美国人在内的几个职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情况，调查了他们在这里工作有多长时间，并且记下了他们的家庭地址和度假地地址。正在写作的论文的标题、我们的小册子 [1938年简章]、卢舍和基希海默的书、新杂志 [指《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研究学刊》的英文延续刊物] 的标题和目录以及社会研究所里的所有东西，这些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sup>[281]</sup>

这次来访据称是对外国机构的一般性检查的一部分，但洛文塔尔发现在学术圈子里没有其他机构受到检查。

很难坐实地说研究所正经历的困境就是由被怀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这一情况所造成的。1940年代初，当研究所正在寻求支持两个计划的研究资金时，诺伊曼同卡尔·约阿钦姆·弗里德利希 (Carl Joachim Friedrich) 进行了一次谈话，后者是一位著名的、非常繁忙的政治学教授，早在1921年就移居美国并在哈佛大学执教。1941年8月诺伊曼向霍克海默报告说：

我问弗里德利希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文化面面观”项目的意见，他说，如果由“适当的、无偏见的、非教条主义的学者”来实

施，这会是一个出色的项目。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立刻发现，弗里德利希认为研究所纯粹是马克思主义机构，所以不相信我们可以无偏见的态度实施这一项目的研究。惟一的问题就是应采取何种策略给以回应，在那种情况下我一时冲动作了决定。我可以愤怒地在这种隐含的指责面前捍卫自己，也可以半挑明地与之周旋。我选择了后者。于是我坦率地问他，他是否是在说研究所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认为研究所的教条主义无法保证客观地实施这一项目的研究工作。他回答说“是”。我对他解释说，首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有差别，其次，说研究所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并不准确。一些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些则不是。无论如何，它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共产党。此后是半小时的讨论，我向他解释了研究所的理论基础和我們相信我们必须落实的任务。最后，我问他是否仍坚持他起初的看法，回答是“不”。<sup>[282]</sup>

像这样澄清事实的小小成功肯定行之不远，而且最终被如下事实所阻挠：霍克海默的这个研究所不由自主地显得更为左倾——仅仅是因为与其他更多如今不再守旧的流亡者相比，他们撤离原有观点的速度慢了一拍。而从当时德国移民所持种种观点的背景来看，霍克海默在论文“犹太人与欧洲”第一页上的声明显得非常大胆。由于使用的是英语，这段清晰的表达更是冒着大风险：“没人能要求流亡者拿着镜子在他们得到庇护的地方照出一个制造着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谁不愿谈论资本主义，谁就应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sup>[283]</sup>

在表述这种观点的过程中，霍克海默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利用研究所的独立性说出真理的人，而其他移民，至少如果他们还没有失去判断力的话，是不敢说出的。实际上，原来的宗教社会主义者保罗·蒂里希和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mann）已经同时转向了如下这一看法：法西斯主义不可能一定具有阶级特性，或在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能一定有重要联系。<sup>[284]</sup>《新日记》（*Neues Tagebuch*）的编辑，利

奥波德·施瓦茨齐尔德 (Leopold Schwarzschild), 是一位前左派, 他认为对希特勒的支持, 更多的是来自工人阶级, 而不是资产阶级。新社会研究学院的阿尔托·费勒 (Arthur Feiler) 和他的同事, 意大利移民马克斯·阿斯考利 (Max Ascoli) 在 1938 年出版了《谁的法西斯主义?》, 认为纳粹主义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德国形式。弗朗茨·伯克瑙, 一位前共产主义者和一段时期内研究所的奖学金获得者, 在 1939 年他的《极权主义敌人》中写道, “纳粹主义就是褐色布尔什维主义, 就像布尔什维主义可以被称为‘红色法西斯主义’一样。”艾弥尔·勒德雷尔的《大众国家》, 出版于他死后的 1940 年, 该书以这样的句子开始, “现代独裁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保卫战……也不是中产阶级针对他们衰落的反抗。”他把极权主义独裁看作是“废除历史”。“废除历史”这一浪漫的、启示录式的提法是赫尔曼·劳施宁 (Hermann Rauschning)\* 极力提倡的。劳施宁在 1936 年与希特勒决裂之前一直是纳粹的领导和但泽 (Danzig) 参议会主席。劳施宁把纳粹主义看作“虚无主义的革命”。劳施宁以此为标题的著作 1938 年以德文在苏黎世出版, 一年后以英文在纽约与他的《毁灭的声音》一起出版, 该书成为在美移民对纳粹主义所做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阐释。

从此开始, 到美国的移民倾向于保守, 而共产主义的移民更多地集中在莫斯科。<sup>[285]</sup> 占在美德裔移民总数 90% 以上的犹太移民大部分是政治难民。他们是纳粹政策的牺牲品, 而实际上又不隶属于任何反对党。许多被所有或多或少都有点反犹倾向的右翼分子推向政治左派的人, 在美国又能够返回到那种更适合他们的偏右翼立场。这些人中有很多是上层犹太人, 他们曾尝试着尽可能地在纳粹统治下继续活动, 后来才移民美国。与此相应的是, 他们中反法西斯主义者人数非常之少。

以此为背景, 霍克海默的“犹太人与欧洲”所具有的冲击力才能得到充分认识。这是他第一篇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文章, 是自 1933 和 1934

---

\* 赫尔曼·劳施宁 (Hermann Rauschning, 1887-1982), 纳粹党前领袖, 1936 年与希特勒决裂后, 流亡国外, 成为纳粹的坚决反对者, 并通过《与希特勒的谈话》、《虚无主义革命》、《毁灭的声音》、《保守主义革命》、《民主的救赎》等著作揭露希特勒纳粹的本质。——中译者注

年波洛克和马尔库塞的文章发表以来，霍克海默圈子第一篇论法西斯主义的文章。此外，此文也是在霍克海默时期的研究所所显示出的某种独特的政治表态。本文发表之前，与通常情况相比，霍克海默犹豫了很长时间。文章于1938年底写成，但是直到1939年9月初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签署以及一周后德国入侵波兰之际才交付印刷。文章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最后一期上。这期学刊也是研究所最后一份德语杂志。在这一期上霍克海默没把他的长文放在卷首发表，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对此文章进行了仔细的斟酌，文章是在这些斟酌的基础上改定的。例如，有关俄国的段落经过多次删削以减弱其力度，而一则关于俄国的寻找遗产的注释则被完全删掉了。尽管如此，霍克海默还是担心逃脱不了可能会引起的怀疑。

文章采用的观点是，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因而文章在表面上看是忠实于“法西斯主义就是大商业的代理者”这一共产主义理论的。但实际上，文章本质上已经超越了这一理论，因为它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权威主义国家形式，这种国家形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后果，而且只要哪里有“以物质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为基础的少数统治”、哪里为了克服社会矛盾而使经济权力集中变成了有组织的暴力、哪里的官僚体系享有决定生死的大权，哪里就会有这种国家形式。<sup>[286]</sup>（早在1938年，当《社会研究学刊》发表魏特夫的“东方社会理论”时，霍克海默关于研究所和研究所工作的一个演说的文本就已经指出，研究所关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研究已经特别关注中国。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有官僚社会等级制，而从欧洲的一般发展，首先是德国和俄国发展的观点来看，这种等级制有着不断增长的理论重要性。这表明，简单地把历史分成古代奴隶经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种分期方式必须通过对中国进行理论上的基础研究而从根本上进行详细的论证，尽管历史哲学长期以来都是这么分期的”[这里的历史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委婉说法]。）在霍克海默看来，民族和种族的观念已经变得非常不现实，而且德国人实际上已经不再相信这些观念了。通过这种听起来比较乐观的论述，他表面上似乎在证明共产主义

理论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衰亡前的最后挣扎。但实际上他又采用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否认了所有此类希望。这种社会心理学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正在发生某种人类学根本转变，它能使人类在没有文化幻想和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笃信的条件下顺从并逢迎他们的统治者。

个人将服从于新的选择性教养形式，这将影响社会人格的建立。把 19 世纪受到压迫的失业工人变成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服从者的转变，在其历史意义上，让人想起了通过宗教改革把中世纪的工匠变成新教市民的转变，或是把英国乡村的穷人变成现代产业工人的转变。<sup>[287]</sup>

这一看法不仅仅是霍克海默使用来明确表明其“长时段经济展望”的表述，而且也以暗示的方式承认了法西斯主义的长时段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形成和政治未来。

这种观点一定会冒犯支持资本主义的民主人士，支持苏联、中央集权制和计划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所有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那些移民，他们担心，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有利预测会强化美国的不断增长的孤立倾向。魏特夫的第二任妻子，奥尔加·朗格 (Olga Lang)，时常在研究所工作，她的著作《中国人的家庭和社会》就是由研究所资助在 1946 年出版的。1940 年 4 月，她写信给霍克海默说：

我希望许多人能理解这篇文章，尤其是因为它的论证不仅是直接针对犹太人，而且也是针对支持资本主义、希望自由主义复兴的整个移民群体的……但我也希望没人能理解它，希望哥伦比亚大学的人仅满足于读懂它的摘要。<sup>[288]</sup>

霍克海默也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了严厉的评判。他批评“流亡知识分子”似乎不仅失去了公民权，而且还有他们的思想。在这一时刻，“资本 259

主义社会中，社会和谐和进步的可能性已经成为幻想，这一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评家一直在说，因为尽管有技术进步，但危机，就像预测的那样，已经成为永恒，自由企业的继承者只能通过废除国内自由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但在这样的时刻，这些人松了一口气，抛掉了“一度从伦敦进入德国左派的‘犹太—黑格尔主义术语’”（这是霍克海默首肯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婉转说法），他们回到“新人文主义，歌德的个性，真正的德国以及其他这样一些文化财富”。他批评犹太移民说，他们一度倚重或者说甚至仍在倚重“与每个具体阶段的特定实用性条件格格不入的某种理性……这种理性正在变得危险和难以为继”。他还批评在美国获得成功的犹太移民，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恐怖的条件下，家园的观念……对每一个在幸福时代经历过这样的家园的犹太人来说，必定是谎言和嘲弄的象征”。在霍克海默看来，不仅那些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已经看透了”犹太人想要返回的那种状态的“脆弱性”而比他所批评的人更开明，而且“那些德国人，他们绝望地表达对元首的信念，而且较之于那些称希特勒为疯子却称俾斯麦（Bismarck）为天才的人更明白地看透了元首”，<sup>[290]</sup>这类德国人也比他所批评的人要开明。

霍克海默给犹太人的建议是：他们应当回到“抽象的一神论，拒绝信任幻象，拒绝使有限的东西成为无限”。<sup>[290]</sup>对把自己美化为神灵的存在毫无敬意，乃是“在‘铁后跟’的欧洲从未放弃过投身于建设更好世界的人们的宗教”。<sup>[291]</sup>因此，霍克海默建议犹太人采取神学—唯物主义态度。它所预示的前景就是“向自由的飞跃”。<sup>[292]</sup>考虑到计划经济和國家干预的法西斯主义因素，所以文中不再明确表达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这一观念。计划经济，霍克海默一度总是用来描述更好社会的这个概念被偷偷去掉了。反过来，他使用自由概念，然而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一概念一开始就被“自由主义”玷污了。

在文章末尾，霍克海默嘲笑道：

进步力量已经被击败，法西斯主义能永远存在的观念使知识分子不知如何思考。他们认为，任何起作用的事物都一定有某些好

的东西，并且得出结论说，法西斯主义因此不能起作用。但是确有这样一些时期，生存状况因其具有的力量和效果而变得极其不幸。

哪些观念使霍克海默本人没有“不知如何思考”呢？1938年12月，霍克海默写信给法薇夫人，

人们还能对人性感到高兴的惟一的安慰就是，这个也许仍会持续数十年的可怕的混乱时代，像古代的衰落那样，也会播下新的、更完美的文化的种子。只有非常少的种子，而且每天有更多的在消失。但最终，如果没有对人类产生影响，这种经验就完全不能持续。专制和奴隶制在古代创造了关于个体灵魂、怜悯和兄弟般共同体的无限价值的观念。甚至极权主义的大众歇斯底里也要让位于比从前更为具体的自由观……夜晚不会永远持续，这一事实甚至对那些在其中死亡的人也是一种安慰。<sup>[293]</sup>

研究所用书面担保——用作移民当局的参考——和资助方式帮助了許多人从旧世界逃到新世界。例如，卡尔·柯尔施1936年到纽约和妻子团聚，一开始就从研究所获得每月100美元。路德维希·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曾受研究所邀请写一个关于“体育之父”扬恩的专论的纲要，<sup>[294]</sup>但后来被拒绝了，他甚至在没有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就于1938年春获得了研究所的书面担保。当他1939年复活节到达纽约，等候在码头之时，“一位‘社会研究所’的朋友，就已经为我预定好了房间”。<sup>[295]</sup>1938年以前，西奥多和格雷特·阿多诺一再邀请瓦尔特·本雅明去美国。他比路德维希·马尔库塞犹豫的时间更长，对移民美国的想法甚至更加警惕，本雅明本想去新世界以外的其他地方，因为新世界对他与其说是新的，不如说是可怕的，因此，本雅明的逃离变得更加困难；他的死亡并不是研究所不加帮助的结果。1938年，霍克海默的父母到了瑞士，当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但是他们仍然受到很好的照顾。阿多诺和洛文塔尔的年长的父母，则经过古巴到达美国。

## 注释：

- [1] Julian Gumperz, 'Zur Soziologie des amerikanischen Parteiensystems', *ZfS*, 1 (1932), p. 300.
- [2]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Paris, 1936) .
- [3] Leo Lowenthal, 'Die Auffassung Dostojewskis im Vorkriegsdeutschland', *ZfS*, 3 (1933), p. 343–82.
- [4]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6 July 1934.
- [5] Horkheimer to Pollock, 3 August 1934.
- [6] Horkheimer to Adorno, 15 March 1935.
- [7]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p. 35, 39.
- [8] Erich Fromm,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 *ZfS*, 1 (1932), p274.
- [9] Erich Fromm,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utterrechtstheorie', *ZfS*, 3 (1934), p222.
- [10]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p. 117, 131, 100.
- [11] *Ibid.*, pp. 103, 101.
- [12] *Ibid.*, pp. 107, 133.
- [13] *Ibid.*, p. 113.
- [14] Wilhelm Reich, *Charakteranalyse. Technik und Grundlage für studierende und praktizierende Analytiker* (Vienna, 1933); *Character Analysis*, trans. Theodore P. Wolfe, 3<sup>rd</sup> edn (New York, 1949) .
- [15]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p. 67–9, 72–3, 75.
- [16] *Ibid.*, pp. 123–4.
- [17] *Ibid.*, pp. 67–9, 72–3, 75.
- [18] *Ibid.*, p. 75.
- [19] *Ibid.*, xii.
- [20] Fromm to Horkheimer, 17 July 1935.
- [21] Horkheimer to Adorno, 25 October 1934.
- [22] Adorno to Horkheimer, 2 November 1934. Horkheimer had mentioned 'starving

- friends' whose claims on assistance from the Institute took precedence over Adorno's.
- [23] Wiesengrund to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Lommatzsch, 5 April 1933.
- [24] Lommatzsch,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to Wiesengrund, 19 July 1933.
- [25] Herbert Müntzel, *Die Fahne der Verfolgten. Ein Zyklus für Männerchornach dem gleichnamigen Gedichtband von Baldur von Schirach*.
- [26] *Die Musik* (1934), p. 712.
- [27] 'Die phänomenologischen Antinomien. Prolegomena zur dialektischen Logik'. Cf. Adorno to Kracauer, 5 July 1935.
- [28] Horkheimer to Adorno, 16 November 1934.
- [29]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 (Vilfredo Pareto, 1848–1923), 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精英循环”理论对法西斯意识形态有很大影响。
- [30] Adorno to Horkheimer, 25 February 1935.
- [31] Adorno to Horkheimer, 24 November 1934, 25 February 1935, 25 June 1936.
- [32] Horkheimer to Adorno, 2 January 1935.
- [33] Theodor W. Adorno, 'Über Jazz', *ZfS*, 5 (1936), pp. 235–59.
- [34] Adorno to Horkheimer, 13 May 1935.
- [35] Adorno to Horkheimer, 8 June 1935.
- [36] Erich Fromm,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 *ZfS*, 5 (1936), pp. 235–59.
- [37] Adorno to Horkheimer, 21 March 1936.
- [38] Adorno to Horkheimer, 28 January 1938.
- [39] Adorno to Horkheimer, 21 March, 26 October and 28 November 1936.
- [40] Horkheimer to Adorno, 8 December 1936.
- [41] Horkheimer to Pollock, 4 June 1934.
- [42] Alfred Sohn-Rethel, *Sozialistische Theorie der Erkenntnis* (first published Frankfurt am Main, 1985).
- [43] Horkheimer to Adorno, 8 December 1936.
- [44] Adorno to Horkheimer, 21 and 25 January 1937.
- [45] Walter Benjamin, 'Eduard Fuchs; der Sammler und der Historiker', *ZfS*, 6 (1937), pp. 346–81.
- [46] Adorno to Horkheimer, 23 April 1937.

[47] Benjamin to Adorno, 13 October 1937.

[48] Benjamin to Adorno, 7 February 1936, cited in Benjamin, *Das Passagen-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Frankfurt am Main, 1982), p. 1152.

[49] Horkheimer to Adorno, 23 October 1936.

[50] 维克托尔·阿德勒 (1852—1918),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 的创始人。鲁道尔夫·希法亭, 见第一章注释 109, 110。奥托·鲍尔 (1882—1938), 奥地利社会主义政治家, 《工人报》编辑,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51]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1870—1937), 心理学家。他于 1911 年与弗洛伊德学派决裂另立门户, 把对金钱、权力和承认的追求视为最主要的心理冲动。

[52] Cf. Knoll et al. 'Der österreichische Beitrag zur Soziologie von der Jahrhundertwende bis 1938', i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pecial issue, 23, pp. 90—1.

[53] Paul Lazarsfeld, 'Eine Episode in der Geschichte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Talcott Parsons, Edward Shils and Paul Lazarsfeld (eds), *Soziologie—autobiographisch* (Stuttgart, 1975), p. 155.

[54] Paul Lazarsfeld, *Jugend und Beruf* (Jena, 1931), p. 63.

[55] Marie Jahoda, Paul F. Lazarsfeld and Hans Zeisel,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Ein soziographischer Versuch über die Wirkungen langandauernder Arbeitslosigkeit. Mit einem Anhang zur Geschichte der Soziographie* (Leipzig, 1933; repr. Frankfurt am Main, 1975), p. 28.

[56] Horkheimer to Lazarsfeld, 16 May 1935; Lazarsfeld to Horkheimer, 27 May 1935.

[57] Fromm to Horkheimer, 10 January 1936.

[58] *ZfS*, 6 (1937), pp. 119—39 [in English].

[59] Andries Sternheim, 'Neue Literatur über Arbeitslosigkeit und Familie', *ZfS*, 2 (1933), pp. 413—20.

[60] Fromm to Horkheimer, 10 January 1936.

[61] *Ibid.*

[62]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p. 235, 237, 236.

[63] *Ibid.*, p. 235.

[64] Cf. *ZfS*, 1 (1932), pp. 53 and 40.

[65] Erich Fromm, *The Working Class in Weimar Germany: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

- ological Study*, trans. Barbara Weinberger, ed., Wolfgang Bonss (Leamington Spa, 1984), p. 42.
- [66] *Ibid.*, pp. 208 and 210.
- [67] *Ibid.*, pp. 208–9.
- [68] *Ibid.*, pp. 228–30.
- [69] *Ibid.*, p. 229.
- [70] *Ibid.*, p. 43.
- [71] *Ibid.*, p. 61.
- [72] Karl August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
- [73] Karl August Wittfogel, '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 *ZfS*, 7 (1938), pp. 91, 120, 102.
- [74] Cf. *ZfS*, 4 (1935), p. 65.
- [75]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port on its History, Aims and Activities 1933–1938* (New York, 1938), p. 5.
- [76] Cf. Wolfgang Bonss, *Die Einübung des Tatsachenblicks. Zur Struktur und Veränderung empirische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2), esp. p. 182; and Bonss and Schindler, 'Kritische Theorie als interdisziplinärer Materialismus', in Wolfgang Bonss and Axel Honneth (eds), *Sozialforschung als Kritik. Zum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Potential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1982), p. 57.
- [77] Karl Korsch, 'Briefe an Paul Partos, Paul Mattick und Bert Brecht', ed. Michael Buckmiller and Götz Langkau, in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2 (1974), p. 188.
- [78] *Marx-Engels Werke*. Vol. 32, p. 547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xlv]. 中文版可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535页。
- [79]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ZfS*, 1 (1932), pp. 1–7, in Mar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86), pp. 3–9.
- [80] Marx Horkheimer,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ZfS*, 4 (1935), pp. 321–64; 'On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1978), pp. 432–3.
- [81] Marx Horkheimer, 'Zum Rationalismusstreit', *ZfS*, 3 (1934), p. 49.
- [82] Marx 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ur Anthropologie des bürgerlichen Zeitalters)', *ZfS*, 5 (1936), pp. 164–5.

- [83] Ibid., pp. 168, 170–1.
- [84] Ibid., pp. 167, 171, 170.
- [85] Ibid., pp. 172.
- [86] Ibid., pp. 165, 172.
- [87] Ibid., pp. 229–30.
- [88] Max Horkheimer, 'Montaigne und die Funktion der Skepsis', *ZfS*, 7 (1938), pp. 1–54.
- [89] Max Horkheimer,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ZfS*, 6 (1937), pp. 4–53, and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6 (1937), pp. 245–94, in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pp. 132–87 and 188–243.
- [90] Horkheimer to Grossmann, 27 November 1936.
- [91]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p. 151;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ZfS*, 6 (1937), p. 21. The Vienna circle work cited by Horkheimer was: Hans Hahn, 'Logik, Mathematik und Naturerkennen', in *Einheitswissenschaft*, ed. Otto Neurath et al., vol. 2 (Vienna 1933), p.9.
- [92]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p. 140; *ZfS*, 6 (1937), p. 11.
- [93] *Erste Einleitung in die Wissenschaftslehre*.
- [94] Horkheimer, *ZfS*, 6 (1937), pp. 46–7; cf. *Critical Theory*, p. 181.
- [95] Ibid., p. 31; cf. *Critical Theory*, p. 163.
- [96] Max Horkheimer and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6 (1937), pp. 625–44. [霍克海默对该文的“附记”收入《批判理论》，pp. 244–52.]
- [97]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6 (1937), p. 261; *Critical Theory*, pp. 206–7. 中译参见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见《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56 页。
- [98] Cf. Theodor W. Adorno, 'Offener Brief an Max Horkheimer', in *Die Zeit*, 12 February 1965.
- [99] Theodor W. Adorno, 'Marginalien zu Mahler', 23, 8 June 1936.
- [100] Cf. pp. 92–3 above, and also, for example, Adorno to Kracauer, 14 March 1933, and Adorno to Horkheimer, 4 September 1941.
- [101] Karl Marx, *Early Writing*, Gregor Benton trans., Harmondsworth, 1975, p. 247.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102] Ernst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Zurich, 1935; expanded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62), p. 12.

[103] Benjamin, *Passagen-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p. 1023.

[104] Walter Benjamin, *Understanding Brecht*, trans. Anna Bostock (London, 1973), p. 120.

[105] Walter Benjamin, 'Surrealism: the Last Snapshot of the European Intelligentsia', trans. Edmund Jephcott, 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1979), p. 237.

[106] Benjamin, *Passagen-Werk*, p. 1014.

[107]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p. 121.

[108] Adorno to Horkheimer, 22 September 1937.

[109] For details of the dishwasher story, see Ernst Bloch, *Brief 1903–1975*, ed. Karola Bloch et al. (Frankfurt am Main, 1985), vol. 2, pp. 443–4. 布洛赫写信给阿多诺, 感谢研究所从前给他的 100 美元资金, 但他称, 他已经被迫做洗碟子的工作, 并且因为太慢而被解雇。他现在正在做每天 8 小时的包裹打包和运送的工作, 已经中断了他的著作。这些都不是事实, 但研究所还是立即给予他六个月、每月 50 美元的资金。

[110] Siegfried Kracauer, *Jacques Offenbach und das Paris seiner Zeit* (Amsterdam, 1937) .

[111] Cf. Rolf Tiedemann, in Benjamin, *Passagen-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p. 1097; and Gershom Scholem, in *Walter Benjamin- Gershom Scholem, Briefwechsel 1933–1940*, ed.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 am Main, 1980), p. 301, note 1.

[112] Walter Benjamin, 'Zum gegenwärtigen gesellschaftlichen Standort des französischen Schriftstellers', *ZfS*, 3 (1934), pp. 54–78, K. A. Stempflinger (i. e. Walter Benjamin), 'Der eingetunkte Zauberstab' (review of Max Kommerell, *Jean Paul* [Frankfurt am Main, 1933] ), *Frankfurt Zeitung*, 29 March 1934, Reichsausgabe, p. 10.

[113]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 *ZfS*, 1 (1932), pp. 103–24.

[114]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London, 1979), p. 62.

[115]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Glasgow, 1973), pp. 219–53.

[116] Adorno to Benjamin, 6 November 1934, cited in Benjamin, *Passagen-Werk* .

P. 1106.

[117] Karplus to Benjamin, 28 May 1935, cited in *ibid.*, p. 1115.

[118] Benjamin to Adorno, 31 May 1935, cited in *ibid.*, p. 1117–18, and in Walter Benjamin, *Brief*, ed. Theodor W. Adorno and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 am Main, 1966), p. 664.

[119] Adorno to Horkheimer, Oxford, 8 June 1935.

[120]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1976), pp. 163–77.

[121] Horkheimer to Benjamin, New York, 18 September 1935.

[122] Walter Benjamin, 'L'oeuvre d'art à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on mécanisée'. *ZfS*, 5 (1936), pp. 40–68. in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p. 219–53; Benjamin to Horkheimer, Paris, 16 October 1935, in Benjamin, *Briefe*, p. 690.

[123] Walter Benjamin, 'Eduard Fuchs, der Sammler und der Historiker', *ZfS*, 6 (1937), pp. 346–81. In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pp. 349–86.

[124] Walter Benjamin, 'üb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 *ZfS*, 8 (1939), pp. 50–91, in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p. 157–202.

[125] Walter Benjamin,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ed.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Los Angeles, 1942), pp. 1–6; in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p. 255–66.

[126] Benjamin, *Passagen-Werk*, p. 490.

[127] *Ibid.*, p. 500.

[128] *Ibid.*, p. 571, 580.

[129] *Ibid.*, p. 574.

[130] *Loc. cit.*

[131] *Ibid.*, p. 496.

[132] *Ibid.*, p. 579.

[133] *Ibid.*, p. 405.

[134] Benjamin to Horkheimer, 16 October 1935, in Benjamin, *Briefe*, p. 690.

[135] Benjamin, *Passagen-Werk*, p. 578.

[136] Ludwig Klages, 'Vom Traumbewusstsein', in *Sämtliche Werke* (Bonn, 1974), vol. 3, p. 162.

[137] Ludwig Klages, *Vom kosmogonischen Eros*, 2nd edn (Jena, 1926), pp. 128–9.

[138] *Ibid.*, p. 142–3, 126.

[139] 自由德国青年 (Freideutsche Jugend) 是构成当时青年运动的学生组织, 它于 1913 年 10 月在黑森山的高原——豪尔·梅斯奈尔 (Hoher Meissner) 举行了第一次自由德国会议。本雅明的老师维尼肯 (Wyneken) 一度想成为自由德国青年的领导者, 但并未成功。在豪尔·梅斯奈尔的会议上, 公布了组织的纲领, 所谓的“梅斯奈尔规划”, 它促进了年轻人在自我决定、自治、内在真理和内在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的观念。会议禁止烟酒。1919 年组织解散。

[140] Ludwig Klages, 'Mensch und Erde', in *Mensch und Erde. Zehn Abhandlungen* (Stuttgart, 1956), pp. 22-3.

[141] 约翰·雅克布·巴霍芬 (John Jacob Bachofen, 1815-1857), 苏黎世罗马法教授, 发展了对古代神话和象征的浪漫主义阐释, 被认为发现了古代世界中母权制度的存在。

[142] Benjamin, *Gershom Scholem*, vol. 3 (Frankfurt am Main, 1972), p. 44.

[143] Louis Aragon, *Le Paysan de Paris* (Paris, 1970), p. 145.

[144] Benjamin to Adorno, Paris, 31 May 1935, in Benjamin, *Briefe*, p. 663.

[145] Aragon, *Le Paysan de Paris*, pp. 19-20, 20, 144.

[146] *Ibid.*, pp. 82-4.

[147] Walter Benjamin, 'Eduard Fuchs, Collector and Historian', in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pp. 357-8.

[148] 发表感伤作品的一份 19 世纪德国杂志。

[149] *Ibid.*, p. 358.

[150] Benjamin, *Passagen-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p. 136.

[151] Siegfried Giedion, *Bauen in Frankreich, Bauen in Eisen, Bauen in Eisenbeton* (Leipzig, 1928), pp. 1-2.

[152] Walter Benjamin, second summary, 1939, in *Passagen-Werk*, p. 1256.

[153] Benjamin, *Passagen-Werk*, p. 577.

[154] *Ibid.*, p. 1174.

[155] *Ibid.*, p. 1034.

[156] Cf. *ibid.*, pp. 576, 578.

[157] Walter Benjamin, 'Pariser Tagebuch',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4 (Frankfurt am Main, 1972), p. 582.

[158] Walter Benjamin, 'A Small History of Photography', trans. Kingsley Shorter, in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p. 250.

[159] Walter Benjamin, 'Erfahrung und Armu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 (Frankfurt am Main, 1977), p. 216.
- [160] Cf. the notes on Proust and Baudelaire accompanying 'Zum Bilde Prousts', in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 63.
- [161] Benjamin, *Passagen-Werk*, pp. 467, 533, 534.
- [162]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Frankfurt am Main, 1974), p. 459.
- [163] Benjamin, *Passagen-Werk*, p. 572.
- [164] 见上面注释 148。
- [165] Benjamin, 'Erfahrung and Armu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 219.
- [166]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p. 961, 215.
- [167] *Ibid.*, vol. 1, p. 438; vol. 4, p. 579; vol. 2, p. 436.
- [168] Benjamin, *Passagen-Werk*, p. 593.
- [169] Bernd Witte, *Walter Benjamin*, (Reinbek bei Hamburg, 1985) .
- [170]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1973), p. 96.
- [171] Baudelaire, in the dedication to the *Spleen de Paris*, cited by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p. 67; 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in *Illuminations*, p. 167.
- [172]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p. 110;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 164.
- [173]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 167, 189, 193.
- [174] *Ibid.*, pp. 195-6.
- [175] Horkheimer to Adorno, 24 December 1937.
- [176] Horkheimer to Benjamin, 18 March 1936; cited in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 997.
- [177] 17 December 1934, on Benjamin's Kafka essay; 2 August 1935, on his first prospectus for the *Passagen*; 18 March 1936, on the essay on the work of art; 10 November 1938 and 1 February 1939, on the first Baudelaire essay; 29 February 1940, on the second Baudelaire essay. The letters are collected in Theodor W. Adorno, *über Walter Benjamin*, e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70) .
- [178] Benjamin to Adorno, 9 December 1938; Benjamin, *Briefe*, pp. 797-8.
- [179] Theodor W. Adorno, '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rens', *ZfS*, 7 (1938), pp. 321-56; cited, with minor alterations, from the translation '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in Listening', in Arato and Gebhar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p. 298.

- [180] Adorno, *über Walter Benjamin*, p. 129.
- [181] Benjamin, *Passagen-Werk*, pp. 499–500.
- [182] Adorno to Horkheimer, 23 November 1936.
- [183] Adorno, *über Walter Benjamin*, pp. 138 and 139.
- [184] 'Hektor Rottweiler' (pseudo. of Theodor W. Adorno), 'über Jazz', in *ZfS*, 5 (1936), pp. 256, 254.
- [185] Theodor W. Adorno, *In Search of Wagner*,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81). Cf. Adorno to Horkheimer, 19 October 1937.
- [186] Theodor W. Adorno, 'Fragmente über Wagner', *ZfS*, 8 (1939), pp. 46, 17, 21, 22.
- [187] Adorno to Benjamin, 10 November 1938, in Adorno, *über Walter Benjamin*, p. 141–2.
- [188] Adorno to Horkheimer, 21 January 1937.
- [189] Max Horkheimer, 'Zur Theodor Haecker: Der Christ und die Geschichte', *ZfS*, 5 (1936), pp. 372–83; cf. Adorno to Horkheimer, 25 January 1937.
- [190] Benjamin to Adorno, 9 December 1938, in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 1103.
- [191]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p. 255.
- [192] Adorno to Benjamin, 1 February 1939, in Adorno, *über Walter Benjamin*, p. 154.
- [193] Benjamin to Adorno, 7 May 1940, in Benjamin, *Briefe*, p. 849.
- [194] Walter Benjamin, 'Dialog über die Religiösität der Gegenwar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p. 22, 24.
- [195] Adorno to Benjamin, 29 February 1940, in Adorno, *über Walter Benjamin*, p. 158.
- [196] Benjamin to Adorno, 9 February 1938, in *Briefe*, p. 798.
- [197] Adorno to Benjamin, 1 February 1939; the 'text' Adorno refers to is his essay 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 [198] Herbert Marcuse,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ZfS*, 6 (1937), pp. 54–94; Leo Lowenthal, 'Knut Hamsun. Zur Vorgeschichte der autoritären Ideologie', *ZfS*, 6 (1937), pp. 295–345, translated as 'Knut Hamsun', in Arato and Gebhar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pp. 319–45.
- [199] Knut Hamsun, *Mysteries*, trans. A. G. Chater (New York, 1927); Eduard

Bernstein, *Die Neue Zeit*, 2 (1893-4), p. 376, cited by Lowenthal in 'Knut Hamsun. Zur Vorgeschichte der autoritären Ideologie', p. 340. [论伯恩斯坦, 见第 663 页, 前注 41。]

[200] *Ibid.*, p. 340.

[201] Benjamin to Lowenthal, 1 July 1934, in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p. 978-9.

[202] Horkheimer to Adorno, 22 February 1937.

[203] Max Horkheimer,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in *ZfS*, 6 (1937), pp. 4-53, in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pp. 132-87.

[204] Max Horkheimer, in *ZfS*, 6 (1937), pp. 1-2.

[205] Marcuse,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p. 56.

[206]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 页。

[207] Marcuse,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p. 90, 91, 63.

[208] Adorno to Horkheimer, 12 May 1937.

[209] 发表在学刊上的惟一一篇专业历史学家的作品是“对希腊诗歌的社会学考察”,*ZfS*, 6 (1937), pp. 382-99, 作者是莫里斯·伯拉 (Maurice Bowra)。他是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得到了阿多诺的举荐。

[210] Cited by Alfons Söllner, in Rainer Erd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Gespräche über Franz L. Neu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p. 30, for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see in particular Söllner's introduction to Franz Neumann, *Wirtschaft, Staat, Demokratie: Aufsätze 1930-1954*, ed. Alfons Söllner (Frankfurt am Main, 1978).

[211] 赫尔曼·赫勒 (Hermann Heller, 1891-1933), 社会学家, 1928-1932 在柏林, 1932-1933 年在法兰克福担任宪法法教授。流亡中死于马德里。卡尔·施米特 (1888-1985), 政治理论家和柏林的政治学教授, 1933 年纳粹上台后加入该党。

[212] Franz Neumann, 'Die Soziale Bedeutung der Grundrechte in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in *Wirtschaft, Staat, Demokratie*, p. 74.

[213] Ernst Fraenkel, *Reformismus und Pluralismus. Materialien zu einer ungeschriebenen politischen Autobiographie*, ed. Falk Esche and Frank Grube (Hamburg, 1973), p. 175.

[214] Neumann, *Wirtschaft, Staat, Demokratie*, pp. 109-10.

[215] Franz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ed. Matthias Ruete (Leamington Spa, 1986), pp. 285, 257.

[216] Neumann to Horkheimer, 15 and 19 January 1936.

[217] Neumann, *Wirtschaft, Staat, Demokratie*, p. 415.

[218] Neumann to Horkheimer, 5 October 1936.

[219] Franz Neumann, 'Der Funktionswandel des Gesetzes im Rech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ZfS*, 6 (1937), pp. 542–96.

[220] Franz Neumann, 'Types of Natural Law',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8 (1940), pp. 338–61.

[221] Neumann to Horkheimer, 24 September 1939.

[222] Cited by Alfons Söllner in Erd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P. 42.

[223] 马克斯·舍勒 (1874–1928), 1920年代早期在马丁·海德格尔之前, 是现象学运动中次于胡塞尔的重要人物。鲁道夫·斯门德 (1851–1930), 巴塞尔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神学教授。

[224] *Zur Staatstheorie des 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225] 'Zur Staatstheorie des 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an excerpt from *Zur Staatstheorie des 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in Otto Kirchheimer,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Fasch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6), p. 35 and 37.

[226] Otto Kirchheimer, *Weimar-und was dann? Entstehung und Gegenwart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Berlin, 1930).

[227] 'Verfassungswirklichkeit und politische Zukunft der Arbeiterklasse', in Kirchheimer,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Faschismus*, p. 75.

[228] Otto Kirchheimer, *Die Grenzen der Enteignung. Ein Beitrag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s des Enteignungsinstituts und zur Auslegung des Art. 153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Berlin, 1930).

[229] Otto Kirchheimer, 'Die Grenzen der Enteignung', in *Funktionen des Staats und der Verfass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2), pp. 257–8.

[230] Otto Kirchheimer and Nathan Leites, 'Bemerkungen zu Carl Schmitts *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 in Kirchheimer,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Faschismus*, p. 151.

[231] *Staatsgefüge und Recht des Dritten Reiches*.

[232] *Reichsgruppenwalter der Reichsgruppe Hochschullehrer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chtswahrerbundes*.

[233]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15 September 1935, p. 1004.

- [234] Horkheimer to Kirchheimer, 16 February 1937.
- [235] 'Zuchthausrevolten oder Sozialpolitik' .
- [236] Georg Rusche, 'Arbeitsmarkt und Strafvollzug', *ZfS*, 2 (1933), pp. 63–78.
- [237] Georg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1939), p. 207.
- [238] Horkheimer to Neumann, 10 August 1939.
- [239] Otto Kirchheimer, 'Criminal Law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PSS)*, 8 (1940), p. 462.
- [240] Kirchheimer to Horkheimer, 15 October 1941.
- [241] Otto Kirchheime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SPSS*, 9 (1941), pp. 280, 276, 288.
- [242] Frederick [sic]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SPSS*, 9 (1941), pp. 200–25.
- [243] Otto Kirchheimer, 'The Legal Order of National Socialism', *SPSS*, 9 (1941), pp. 456–75.
- [244] Adorno to Horkheimer, 19 October 1937.
- [245] Horkheimer to Adorno, 24 December 1937.
- [246] Lazarsfeld to Adorno, 29 November 1937.
- [247] Adorno to Lazarsfeld, 24 January 1938.
- [248] Lazarsfeld to Adorno, 3 February 1938.
- [249] Cited in Paul F. 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2 (1968), p. 305.
- [250] Cf. David E. Morrison, 'Kultur and Culture: the Case of Theodor W. Adorno and Paul F. Lazarsfeld', in *Social Research*, 45 (1978), pp. 339–40, 342. .
- [251] Theodor W.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trans. Donald Fleming, in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2 (1968), p. 342–43.
- [252] 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p. 301.
- [253] Cited in *ibid.*, p. 301.
- [254]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43.
- [255] 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p. 323.
- [256] Morrison, 'Kultur and Culture', p. 348.
- [257] Adorno to Lazarsfeld, 6 September 1938.
- [258] Cited in Morrison, 'Kultur and Culture', pp. 347 and 348.
- [259] Theodor W. Adorno, 'The Radio Symphony: an Experiment in Theory', in

- Paul F. Lazarsfeld and Frank Stanton (eds), *Radio Research 1941* (New York, 1941), pp. 110–39,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5, pp. 378–9.
- [260] Theodor W. Adorno, 'A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Music', *Kenyon Review*, 8 (1945), pp. 208–17; 'On Popular Music', *SPSS*, 9 (1941), pp. 17–48; 'Die gewürdigte Musik', in Adorno, *Der getreue Korrepetitor. Lehrschriften zur musikalischen Praxis* (Frankfurt am Main, 1963), repr.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70–86), vol. 15.
- [261]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51.
- [262] Adorno, 'On Popular Music', pp. 27–8, 25.
- [263] *Ibid.*, pp. 33, 38–9.
- [264] *Ibid.*, p. 48.
- [265] Alice Maier, in Erd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p. 99.
- [266] Thomas Mann,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vol. 3 (Frankfurt am Main, 1949), p. 189.
- [267] Joachim Radkau offers convincing evidence of this in his work on *Die deutsche Emigration in den USA. Ihr Einfluss auf die amerikanische Europapolitik 1933–1945* (Düsseldorf, 1971), which is in every sense extensive.
- [268] Horkheimer to Favez, 13 October 1938.
- [269]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21, June 1938.
- [270] Friedrich Pollock, *Memorandum for P. T. on Certain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43), in the Max Horkheimer Archive, IX 258.
- [271] Friedrich Pollock, *Rapport Annuel sur le Bilan et le Compte de Recettes et Dépenses de 1937, présenté à la 8ème Assemblée Générale Ordinaire du 9 avril 1938*, Max Horkheimer Archive, IX 277. 7.
- [272]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25 July 1940.
- [273] Horkheimer to Benjamin, 17 December 1938.
- [274] The appointment only came into effect after the war, however.
- [275] Adorno to Horkheimer, Oxford, 12 October 1936.
- [276] Horkheimer to Adorno, 22 October 1936.
- [277] *Statement of Prof. Dr Max Horkheimer, Research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on June 9, 1943. Re: Certain Charges made agains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Max Horkheimer Archive, IX 63.
- [278] Fromm to Horkheimer, 19 December 1935.

- [279] Horkheimer to Favez, 13 October 1938.
- [280] On the following, see in particular the section on the 'University in Exile'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Radkau, *Die deutsche Emigration in den USA*.
- [281] Lowenthal to Horkheimer, 4 August 1940.
- [282] Neumann to Horkheimer, New York, 13 August 1941.
- [283] Max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8 (1939), p. 115.
- [284] On this and the following, see Radkau, *Die deutsche Emigration in den USA*, pp. 232, 234 and 241–2.
- [285] On this too, see *ibid.*, p. 287 and *passim*.
- [286]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pp. 121, 122, 128.
- [287] *Ibid.*, p. 118. The 'new form of selective breeding' lay in the creation of totalitarian domination by one particular interest group over the whole population.
- [288] Lang to Horkheimer, 15 April 1940.
- [289]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pp. 115, 130, 131, 135.
- [290] *Ibid.*, p. 136.
- [291] 《铁后跟》(*The Iron Heel*) 是杰克·伦敦发表于 1908 年的一部小说的标题。在这部小说中, 经过几个世纪斗争而最终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组织中一名成员手中的一些文件让人想起了当初“铁后跟”长达几世纪的统治建立伊始的情形。“铁后跟”也就是随时准备动用赤裸裸的暴力的资本主义的隐喻。这部小说给杰克·伦敦招来了他的社会主义同伴的批评, 他们指责这部小说宣扬失败主义。
- [292]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p. 135.
- [293] Horkheimer to Favez, 6 December 1938.
- [294]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恩 (Friedrich Ludwig Jahn, 1778–1852), 德国体育运动的创立者。
- [295] Ludwig Marcuse, *Mein zwanzigstes Jahrhundert* (Zurich 1975), p. 253.

### “基金的使用条例绝不是专为经营研究所而定的”

研究所的危机依然继续。研究所的领导人专断而秘密地把研究基金挪为己用，是造成危机的部分原因，更是加剧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对那种宣称研究所代表了社会批判理论家组成的一致共同体的观点的嘲讽。

当捐赠资金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缩减的时候，霍克海默盘算最多的事情，是尽可能早地保留足够多的一部分财产，为自己的学术工作提供一个长期保障。洛文塔尔以“基金”托管人的身份可以分配资金，有一次他要求从基金中抽出50000美元的专款汇给霍克海默，后者成为这笔钱的惟一受益人。洛文塔尔后来通过正当理由拨出了这项专款，却暗示重复了以往的一种银行转账程序。

在霍克海默看来，就算真的不开设研究所，资金的使用也可以满足韦尔基金的使用条例。他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打算把研究所改造成“这样一个机构，它可以提供四到五个私人研究合作项目……基金的使用条例绝不是专为经营研究所而定的。相反，推进社会理论才是问题的关键”。<sup>[1]</sup> 由于霍克海默始终将韦尔基金看成是推进社会理论的物质基础，而他本人就是这种理论的主要化身，因此在共同基础上为了共同目标来使用基金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研究所的财政状况从来没有以可

以查对的账目形式公布出来，甚至对正式研究人员也没有公布过。真正明白个中情形的人就是“核心成员”的代表：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尽管洛文塔尔担任着类似秘书的职务，可对财政状况也是一知半解。霍克海默的策略——在必要的时候也是洛文塔尔的策略——就是把对财政事务的管理看作是波洛克的份内之事，他们会说，波洛克像个“资产阶级大商人”那样在经营着。就波洛克这方面而言，他总是通过私下方式武断地阻止所有有疑虑的人提出的置疑，或者让打探此事的其他人碰一鼻子灰——他这样做，一半是出于本意，一半是因为自己也不了解情况。从他的职责方面说，波洛克本人就是负责评定工资等级的，或者说就是决定减薪的人。他在这时采取的手段就是在个人切身利益上影响研究所的成员，他们尽管偶尔对财政分配的不公有所怀疑，但也因上述原因而甘愿对此类事务闭目塞听，不闻不问。根据洛文塔尔的回忆，工资

经由霍克海默和波洛克讨论决定，然后再告知我们。我们总会猜测这样一种情况——这些人真是幸运的家伙……如果马尔库塞或我在1938年时说“我不愿意这样。我不想一个月只拿350美元，我要500美元一个月，否则我就走了”，回答肯定是：“好吧，走吧。”可我们又能去哪儿呢？<sup>[2]</sup>

当人们开始抱怨的时候，抱怨往往总是指向洛文塔尔。而他会把这些抱怨（以及他所做的一切）汇报给霍克海默，以便让他采取稳定人心的措施。全体成员中每个人都很信赖霍克海默，而霍克海默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私交甚笃的印象，也常常故意给他们每个人散布一些相互抵触和矛盾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是运用俗语所说的“分而治之”策略的绝佳范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危机根本没有可能在共同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决。解决危机的结果肯定会不必要地极大伤害人们的感情，危机最终只能按照如下原则来解决：必须要求一些人为另一些人，为能让另一些人完成理论工作而做出牺牲。自1939年以来，定时炸弹的滴答声就已经

在研究所里响起来了——尽管那时研究所在很多方面都说得上是流亡中的一座绿洲。

流亡中的种种难题、猜度的和实际的财政困难、研究所领导人的武断作风和优柔寡断，再加上霍克海默对自身保障的要求，这些在研究所内部产生了难以名状的不安感，研究所里没有一个成员能忍受得了这种感觉。1939年霍克海默告诉本雅明说：“我们尽了力，可是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某一天我们还是不得不告诉你，尽管怀着世间最美好的愿望，可是我们无法再把与你订立的研究合同续下去了。”<sup>[5]</sup> 1939年春波洛克告知弗洛姆，从那年10月起研究所将不再为他支付工资了（每月330美元）。弗洛姆给霍克海默的一封信表明，波洛克也曾向朱利安·库姆佩尔茨发出过同样的警告。1939年初，波洛克通知诺伊曼说他必须在1940年10月1日前离开研究所。1940年8月，洛文塔尔向霍克海默——当时霍克海默总是去西海岸，一去就是几个星期，在那里寻找适合自己工作的地方——建议研究所可以在纽约再维持一年。在这期间霍克海默将能够决定“我们去向何方”，如果霍克海默开始仔细考虑甩开诺伊曼的话，这期间他也能摆脱掉他，而且还能给马尔库塞施加足够大的经济和道德压力，迫使马尔库塞离开研究所去某所大学任教，因为从1941年秋天开始，其他单位就已经给马尔库塞支付每月1200美元的薪水了。洛文塔尔经常向霍克海默汇报诺伊曼和马尔库塞所说的一些关于他的不敬之辞——诺伊曼和马尔库塞是很好的朋友，洛文塔尔对马尔库塞的私下看法肯定掩藏不了多久。洛文塔尔希望看到马尔库塞1941年春出版的论黑格尔与社会理论起源的《理性和革命》一书<sup>[6]</sup>能对研究所和马尔库塞起点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起到让马尔库塞离开研究所的作用。马尔库塞从诺伊曼那里听说，霍克海默在去西海岸之前就说过马尔库塞将继续帮他写作辩证法的书的话，也曾说过马尔库塞应该试着在大学里找个职位找点课代。可是霍克海默本人亲口告诉马尔库塞说他希望和他合作写那本书。然而阿多诺的说法却是，霍克海默想同他阿多诺合作写书。马尔库塞是第一个到西海岸与霍克海默会面的。可是他刚到达，就被告知他的工资待遇将很快就要被下调了。甚至他们那本

263

书的合作已经开始之后，马尔库塞还是要返回纽约处理与哥伦比亚大学磋商事宜，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争取按期支付的授课费。在一封给他的信中，霍克海默写道：“就这件事我想得越多，我越确信我们能够把我们三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sup>[5]</sup>与此同时，阿多诺却建议霍克海默把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上一两年见习助教，这样一方面能够减轻研究所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能让哥伦比亚大学确信研究所的善意。

当问题涉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谁能跟随霍克海默去西海岸的时候，尽管洛文塔尔和阿多诺是那么服从，可他们还是感觉到他们的的确确是被出卖了。1941年9月，洛文塔尔与波洛克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谈完过后洛文塔尔含泪离开，因为波洛克向他和盘托出了为他的未来设计的那些很伤感情的计划，而且是用一种不友好的方式告诉他的。阿多诺也是忧心忡忡，担心在几个月内所有事情都没有眉目了。波洛克写信给霍克海默说：

观察我们研究所成员的举止是件有意思的事情。马尔库塞想到五年之后可能成为另一个君特·施坦恩（Güther Stern）就害怕得不得了，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想维持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泰迪完全只考虑生活，只想尽快能成为西海岸一名有闲绅士，至于其余人的情况如何，他是一点也不操心的。诺伊曼多少感到无论最后讨论结果是个什么样子他都是安全的，但他当然也非常强调同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的重要性。惟一忠心耿耿的人就是——“说起来令我遗憾”——洛文塔尔。这是你也可以想见的。因为他一直确信，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抛下他。<sup>[6]</sup>

由于有了这样的领导人，研究人员们对研究所和霍克海默的热忱奉献越来越没什么希望，而且在这些年中学术生涯的前景也特别暗淡。但即使对那些倍感受辱的人来说，研究所还依然具有吸引力。研究所不仅表面上还是一个能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权威，不管这种保护和帮助再

怎么专断而短暂——它毕竟还能提供金钱、出版机会、举荐和权威认证——而且也还是仅存的能容得下理论工作的一个重镇。理论工作还在继续，尽管气氛有些特殊，尽管人事摩擦不断。

通过出版著作来努力引起学术和科学市场的注意，从而有可能在没有研究所的情况下也能从事研究，这很快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而且这个念头不仅仅是诺伊曼一个人的。被迫离开研究所的重要研究人员，差不多都在1941年和1942年间出版了他们自己很有分量的作品，而且都是用英文出版的。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都于1941年面世，诺伊曼的《巨兽》则出版于1942年春天。相反，尽管当时霍克海默已经不再为自己的生活操心烦恼了，可直到1944年才完成了与阿多诺合作的《哲学断片》。这是一个非常难读的文本，而且是私人出资油印的，因此它的读者范围也非常之小。1941年阿多诺完成了一篇《新音乐哲学》(*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的扩充论文，他本来没有打算出版，只是为研究所内部讨论之需在整理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写作了这个文本。他曾给几个局外人看过这个东西，这些人中包括托马斯·曼和达高伯特·D.隆内斯(Dagobert D. Runes)，后者是《美学杂志》的编辑，而且对用英语出版这篇东西很热心。但是这篇文章基本上成了《哲学断片》的重要准备性材料，后来在他回到德国扩展深化后出版的那些作品，也受到这篇文章的很大影响。基希海默作为研究所里的兼职研究员每月领取120美元——“多亏我妻子还有工作，我也偶尔能得到一些额外的进项，这些使得我那微薄的收入能维持我们紧巴巴的日子”<sup>[7]</sup>，他最终也没能完成他计划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宪法理论》。

尽管也有一些犹犹豫豫，可是研究所负责人的基本意图还是清楚的。对霍克海默来说，“兼学者与研究所主任于一身的双重身份”<sup>[8]</sup>让他不堪重负，因为正如他在“崖滩手记”(Notes from Beach Bluff)中所抱怨的那样，他总是“把相同的力比多投入每件事情之中”，他“口述一封信……都要投入和写作一篇学术论文一样大的精力”。他在纽约的秘书爱丽思·迈尔回忆说，“霍克海默先生对每字每句都要斟酌再三，有时

265

候两个小时内还记不下一个字……霍克海默先生口述，我速记，然后再经他成十遍地修改每一处。”<sup>[9]</sup>从现在开始，霍克海默就将学术论文的写作放在优先位置了。为此；他需要一到两个长期助手或合作者。研究所必须在规模上缩编，尽管在外人看来它还继续存在，但是实际上它很难再得到什么经费开支和人力投入了。

实际上，由于霍克海默通常表现出的那种犹豫和矛盾，这种情况势必要求采取以下策略。从1939年开始，研究所的领导人就已经想办法甩掉包袱了，而且同时试图为研究计划搞来新的经费支持。一方面他们为霍克海默的理论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安排他去西海岸，他可以在那里待很长时间，从学术体制中抽出身来。另一方面，他们同时注意制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研究所运转正常。1941年研究所获得了机会，可以向哥伦比亚大学院系派遣享受工资待遇的正式讲师，而不是向“推广部”派遣无工资待遇的讲师。在这之后，研究所的前述策略倾向更加明显了。大学甚至还提供了一个出任教授的机会。最后，研究所领导人在利用研究资金做私人研究的同时，相当成功地缩减了研究所的规模，自筹很少的经费让研究所继续运转。同时，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获得了进入学术世界的极其有利的条件，他们可以在将来某一天不再要研究所提供的经费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学者继续他们的理论工作。

战争爆发，学刊出版地从巴黎迁到了纽约，这也就是说《社会学刊》在后来改成《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继续发行之前的中都处于停刊状态，这也为各种研究计划草稿和书稿的写作腾出了时间。

## 与埃里希·弗洛姆决裂

与埃里希·弗洛姆的决裂是研究所与其研究人员最早、也是最激烈的一次决裂。这次决裂的原因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那时弗洛姆正在从芝加哥到他的休假地圣达菲的途中，在纽约稍事停留会晤了霍克海默），霍克海默就曾写信给波洛克说，尽管弗洛姆思想很丰富，可

是他特别不喜欢他，因为弗洛姆总是试图讨好太多的人。这是对如下这种批评的一次预先警告，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一次通信中谈到索恩—雷塔耳时所提出的那个批评：他没有“针对普遍接受的环境的那种充满敌意的锐利眼光”，这也正是弗洛姆所缺乏的。甚至当他们还在法兰克福的时候，阿多诺就对霍克海默和弗洛姆之间的合作瞧着不顺眼了，他把弗洛姆称为“犹太手艺人”。<sup>[10]</sup>阿多诺对弗洛姆发表于1935年《社会研究学刊》上的“精神分析疗法的社会决定因素”一文<sup>[11]</sup>的批评与霍克海默的论调相同。在这篇文章中，弗洛姆批评了弗洛伊德，其理由是“许可”“漠不关心的”和“冷酷无情”的精神分析师，在这背后其实掩藏着对资产阶级社会禁忌的尊重，而那些社会禁忌恰恰是让患者产生压抑的主要原因。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或多或少无意识地暗藏着权威主义的父权中心态度。但是，精神分析要达到它的目的，它就绝不该只要求“中立性”：它必须无条件地认可患者对幸福的要求。分析者的“技巧”和“好心”，正如山德尔·费伦茨（Sandor Ferenczi）所强调的那样，乃是精神分析不可或缺的真正特点所在。弗洛姆非常看重费伦茨的意见，指出只有当患者消除了对分析者的恐惧，感受到了与分析者的“平等”时，分析才能得出它应该得到的结果。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阿多诺于1936年3月写信给霍克海默，说弗洛姆使自己处于

一种为弗洛伊德辩护的悖论之中。文章太感情化了，一开始就陷入了错误，混合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表现出了辩证法观念的严重缺乏。他轻易地否定了权威概念，而如果没有权威，列宁的先锋队和专政就是不可想像的。我强烈地建议他去读读列宁。反对弗洛伊德的反教皇主义者说了什么呢？【弗洛姆一直把格奥尔格·格罗多克（Georg Groddock）和山德尔·费伦茨说成是发展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如果要从左的方面批判弗洛伊德——就像我们所从事的批判那样，那么就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所谓“仁慈缺乏”的愚蠢论断。这种论断恰恰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拿来反对马克思的伎俩。我必

须告诉你，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对学刊路线的真正威胁，如果你能让我对弗洛姆的这些反驳以你认为合适的任何形式得以传播开来，我将非常感谢。我只要求把它们刊行出来。<sup>[12]</sup>

267 阿多诺对于弗洛姆的批评，一直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他在194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格言集《伦理随想录》中，也在重申这些观点。他批评弗洛伊德——在这里他和弗洛姆是一致的——有一种总的看法，即，认为社会目标比性目标、比个人对幸福的要求远为重要。可是他也绝不认为弗洛伊德的态度是缺乏慈悲心的表现——这种缺乏仅仅靠仁慈就可以得到缓解。确切地说，弗洛伊德的态度尽管是压抑的，可是这种态度并没有给幻想留下余地，那种幻想往往认为仅仅靠分析者的慈悲心就可以改善病情，或者说分析者的慈悲心就可以减弱那种追求满足的冲动。只有那些想缓和这种冲动要求的人，或那些准备掩盖社会对于个人强行剥夺之真相的人，才会生出这种想法。“如果说弗洛伊德在人道同情心方面存在不足的话，那么在他恰恰在这一点上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站在了一起，这要比与泰戈尔或韦弗尔（Werfel）站在一起好得多。”<sup>[13]</sup>阿多诺依照他“从内部爆破那些想法”的观念，这样来构想如何从左的方面对弗洛伊德进行批判：

宣泄疗法如果不求成功适应和经济成功，就应该有以下两在目标。其一，让人们意识到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的个人的不幸，且个人的不幸与普遍的不幸密不可分；其二，就是要打消人们虚幻的满足感，正是后者才使得可憎的秩序不仅从外部牢牢地箝制人们，而且控制了人们的内心生活，让人们受制于这个令人憎恶的秩序。如果人们想获得对于自己经验的理解，就不得不再满足于虚假的快感，就得厌恶林林总总的商品，他们还得朦胧地意识到，即使真有幸福的存在，也是不足够的——更不要说在有些时候，这种幸福还是通过放弃对它的真实替代品（positive surrogate）的所谓病态的抗拒而买来的。<sup>[14]</sup>

阿多诺、波洛克和马尔库塞是研究所成员中没有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的三个人，而与之相对，弗洛姆、洛文塔尔和霍克海默都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阿多诺所想的精神分析应具有的正确形式与弗洛姆所想的不同，他认为精神分析不应该让患者按照事物应该是的状态去体验事物；他所想的精神分析正确形式也和弗洛伊德所规定的不同，认为不应该将患者当作现实法则的一个有容忍心的代表 (tolerant representative) 来对待。相反，面对患者的精神分析者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可以把现实原则推向极端，他可以把患者带入黑暗，并让希望之光在黑暗中开始闪耀。阿多诺并没有反躬自问一下，那些在美学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方面可能是正确的结论，是否能够在不给个体临床治疗添加麻烦的情况下适用于精神分析。“慈悲心”会导致幼稚的盲从，这种危险至少与让患者产生极度幻灭、导致病情加重或使患者成为愤世嫉俗者的危险一样严重。

此时霍克海默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只能加以猜度，因为他把弗洛姆的这篇文章作为“主打”文章在学刊上发了出来（和其他所有文章一样经过了仔细审查），而且对阿多诺的批评未置一辞，至少在他的信中是这样的。霍克海默一度曾这样写道：“不要相信所有那些总宣称要么给予任何人以帮助，要么就根本不帮助他人的人。这种谎言总是出自这样的人之口，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想帮助别人，他们总是用宏大理论为了一己之私给自己开脱责任。他们把他们的残忍合理化了。”<sup>[15]</sup> 他曾经说到过，同情乃是当今可与政治并列的适当的道德形式。<sup>[16]</sup> 他是叔本华的支持者。对叔本华来说，通过幻境得以疗救与践行爱的工作其实是一回事。<sup>[17]</sup> 如果他认可人类对幸福的要求和他们的本能本性，如果他强烈地谴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像这样一种人难道还能对“慈悲心”抱有异议吗？可以确定，弗洛姆的思想引起了霍克海默的兴趣，因为在他看来，它是在叔本华主义和佛教精神启发之下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融为一炉的一个样板。

霍克海默先是在《破晓与黄昏》这部箴言集中，后来又在 1938 年发表的“蒙田与怀疑主义的作用”一文中，批评精神分析成了一种盲从

268

因循的手段，它总是想以责备的方式把那些神经症患者、不服从者和那些反对派的好斗倾向暴露出来，总是试图把他们改造成在充满威胁和不公的世界里能像个自然的、无拘无束的人那样行动的人，就仿佛他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一切事物都挺不错的。在一封写于 1935 年的致本雅明的信中，霍克海默就曾提到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缺乏正确的历史方向感，他的著作“从学术性的担忧 (professorial unease) 这一角度”表达了“对既存现实的绝望”。<sup>[18]</sup> 因此弗洛伊德对既存现实的批判在霍克海默看来还不够猛烈，也说不上具有足够的攻击性。尽管阿多诺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全然不顾精神分析理论和精神分析疗法之间的关系，可是也正是这个批评，促使霍克海默像阿多诺本人对待自己的神学母题那样去对待像慈悲和同情这样的范畴：把它们悬搁起来，只让它们含蓄地显现。

在波洛克 (和麦顿) 的影响下，霍克海默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整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的反对，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假的，那种最无私的友谊是不存在的；与霍克海默一样，阿多诺也认为自己处于相同的境地。在两个人中，尽管霍克海默性格更强势一些，可是阿多诺的猜疑要比霍克海默重得多。阿多诺的世界观和他的理论观念混合在一起，让他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厌世遁世观念。

如果一个人想探究人类的可能性，那么要对一般大众 (real people) 保持善意态度就会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已经证明，善意实质上正是恶意的指标……善意中的恶意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慈悲只提供了一种托词，它恰恰赞成人类自身存在那些基本元素——人们依此证明他们不仅仅是自己的牺牲品，而且实际上还是自己的刽子手。<sup>[19]</sup>

269 从内心爆破观念、冷酷地把冷酷贯彻到底——阿多诺热情鼓吹的这些主题，向霍克海默表明，叔本华主义和佛教的思想元素在他的思想中如何可能“悬搁”起来，尽管这些思想在弗洛伊德那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

出来。

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弗洛姆、卡伦·霍尔尼（Karen Horney）——另外一位德国移民精神分析医师——与倾向于行为主义的美国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萨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一起，组成了一个脱离纽约精神分析师系统的独立小组。他们立志将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像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这样的文化人类学家都加入了这个小组。<sup>[20]</sup>霍尔尼的《我们时代中的神经症人格》和《精神分析新方法》分别于1937年和1939年出版（后一本书的前言中有对霍克海默的致谢），这些书是面向广大群众而写作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阿多诺看来，霍尔尼的书说明他对弗洛姆的批判是对的。<sup>[21]</sup>她的这两部集中论述文化和人际关系的书却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受到了恩斯特·沙赫特尔的赞扬——他本人也是个新派分析师。就《精神分析新方法》一书，他这么写道：

这部书最主要的部分采取了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生理主义和本能主义倾向（力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死本能、把女性精神分析确立在解剖学差异的基础上）的立场，同时也反对他的机械进化论（重复的强迫冲动、通过儿童早期经验确定心理创伤的原因）……此书主要根据人在其中成长并生活的具体的人际关系来解释人的性格和人类的行为，而且坚决地否定了这样一种假设：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固定的力比多阶段。因而，此书能够以非常明晰的写作线索，为社会心理学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路标，能够推进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能够让它更确切地理解社会环境在心理方面产生的种种作用。<sup>[22]</sup>

这段评论点出了贯穿于霍尔尼著述的批判主题，但是它却没有注意到霍尔尼在论述中通过某种方式把整个精神分析中性化了。

卡伦·霍尔尼生于1885年，曾受训于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受卡

尔·亚伯拉罕和汉斯·萨克斯 (Hanns Sachs) 影响, 他们俩都是弗洛伊德圈子里的人。1933 年之前, 霍尔尼就已经就女性精神分析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尽管她对弗洛伊德相当忠诚, 可是她也在她的文章中对弗氏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并与之产生了分歧。弗洛伊德一直试图把女性心理发展和女性性格看作是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在心理上引起的后果。相反, 霍尔尼强调制度、文化规范、教养方式以及社会整体的父权性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对之作出生理主义和人类学判断的女人恰恰是生活在这个社会整体之中的。把社会因素与童年之后的经验看得同生理因素和童年早期经验同等重要, 这意味着为女性提供了挣脱男权限制的枷锁从而塑造自我形象的机会。<sup>[23]</sup>

本能结构是由生存条件造成的, 弗洛姆的这个假设使他认为, 由于占据统治地位的生存条件是嵌入本能结构中的, 因此占统治地位的生存条件会无限期地持续存在。对霍尔尼来说, 对社会现实与社会规范构成性特质的洞察成为了一种理论的出发点, 这种理论并不认为一切形式的行为、观念和思想都决定于它们的本能结构, 而是结合把理论优先性赋予社会因素的决定作用, 为女性行为的再定义和重塑留出了空间。可是, 她把生理决定论的前提说成是纯粹意识形态, 这种批评却发展成了一种忽视社会条件对本能结构有扭曲作用的观念, 在这种观念看来, 更好的教养方式和更好的分析疗法有望为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各种困境提供某种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霍尔尼最热销的书指出, 西方文化中的种种矛盾就是竞争与兄弟情谊之间、欲望刺激和满足受阻之间、表面上的个人自由与加于这种自由之上的限制之间的矛盾, 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更强烈地感受着这些矛盾, 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时需要帮助与支持。然而, 她所说的这些矛盾, 却只触及社会冲突以及个人与社会冲突的表面现象。

弗洛姆的立场显然比霍尔尼的立场和“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更具批判性——尽管阿多诺忽视了这一点。弗洛姆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 坚信这种社会需要革命性的转变, 坚持认为那些不是太悲伤也不是太愤怒的人、那些自我调节很好的正常人往往比神经症

患者还不健康。他之所以与阿多诺合不来，也和霍克海默合不来，是由于他那种对问题的传统的、唯心主义的表达方式——他的批判标准还是传统的。弗洛姆在他的《逃避自由》中说，人类进步过程中形成了种种可能性，要争取实现它们，这些可能性就是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复杂情感和敏感的经验带来的乐趣、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精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一切形式的自发行为（spontaneity）都看作是增加苦难的毁灭行为，霍克海默甚至比阿多诺更坚决地预言了个体的彻底毁灭。可是虽说弗洛姆很少在西方文化中发现有价值的自发行为，可毕竟还是认为其中有相当一些自发冲动可以作为解决基本难题的精神起点。

但是较之于弗洛姆的立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立场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1940年代期间阿多诺和弗洛姆把“生物唯物主义”当作精神分析拒绝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核心，<sup>[24]</sup>试图将社会批判的基础确立在生理基础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他们有一个假设：在本能结构中存在着乌托邦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假设和弗洛姆对自发冲动的信任是一样成问题的。尽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立场比弗洛姆的立场激进，可是，这种立场更隐讳，因为它根本没有指明乌托邦可能性得以实现的那种方式。<sup>[25]</sup> 271

然而他们没有试着去共同充分完善所有这些立场，因此也没有可能形成任何可使弗洛姆观点中与新精神分析保守观点相反的那些社会批判方面得到加强的理论发展。1939年末弗洛姆和霍克海默之间产生了许多大的争论，这时两人之间也产生了嫌隙，而且还有人故意制造两人之间的矛盾。1939年春波洛克告诉弗洛姆说10月份以后研究所将不再支付弗洛姆的薪水，波洛克对弗洛姆的那种说话方式让弗洛姆非常生气。按照弗洛姆的说法，波洛克根本没有问他如果没有工资怎么办，而仅仅只是明确地说10月1日之后研究所不能也不会再给他支付薪水了。“我立即说这就是解雇，而他回答说：‘是的，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sup>[26]</sup>弗洛姆提出要让他同意中止他的聘用合同，研究所必须支付20000美元的补偿金。

研究所就这样与它的一个成员分道扬镳了，这个成员很长一段时间

间以来对它的理论工作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35年以后，他仅仅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弗洛姆写于1937年的“论原理”一直没有发表，至少是没有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即使弗洛姆认为霍克海默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想在霍克海默批评的基础上对文章进行修改。弗洛姆对工人阶级进行的研究一直没能进行到霍克海默同意发表的阶段。在那段时间里弗洛姆常常生病，需要接受治疗。弗洛姆看上去似乎更接近于同战斗的社会理论没什么关系的那些精神分析师和社会学家，而不是霍克海默的圈子。<sup>[27]</sup>就在阿多诺到纽约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弗洛姆对那些理论领域已经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了，而在霍克海默看来1930年代的后五年中弗洛姆在这些领域内已经失去他的理论多产优势。霍克海默所希望的——他希望弗洛姆中止与研究所的聘用合同，放弃工资要求，同时又与研究所保持联系，可由研究所支配——没有变成现实。弗洛姆后来询问过关于工人阶级的研究情况，研究所只给他寄去了一份研究报告的副本。至于霍克海默，他只在1946年10月，纽伦堡审判（对纳粹战犯）做出死刑审判之时，给弗洛姆寄了一封短信。信中，他回忆他与弗洛姆在纽约听到1934年6月30日事件时曾为这些象征着纳粹德国的人物的一朝覆灭而庆祝，如今他又在施特莱西尔（Streicher）及其同党被处以极刑前一天的这个星期二，在精神上向弗洛姆举起了庆祝的酒杯。<sup>[28]</sup>

《逃避自由》出版于1941年。这是一部对“权威主义国家里的人”的精神分析研究专著。这本书是被列入研究所1938年计划书的研究项目之一，于1936年到1940年之间由弗洛姆完成，这也是研究所出版范围广泛的计划中真正成书的不多的成果之一。尽管这样，这本书还是在独立于研究所的机构出版的，弗洛姆在书中对他以前与社会研究所的合作只字未提，只是在一个注脚中提到了霍克海默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三个座右铭性质的词，很符合弗洛姆本人的人文主义信仰。

这部书勾画了个体从中世纪的社会束缚中挣脱这一充满矛盾过程的历史草图，以此为背景，将弗洛姆参与《权威与家庭研究》时所建立

起的那种社会—心理功能主义与逃离恶性循环的思想结合了起来。弗洛姆归纳了三种主要的逃避方式：权威主义、破坏和“自动适应”，弗洛姆这样总结，

本书的主题是，自由对现代人来说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意味着，他摆脱了传统权威，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与此同时，他也会变得孤独而软弱，变成外在于自己的目标的工具，与自己与他人相疏离；更有甚者，这种状态伤害了他自身，削弱并威胁他，使得他愿意屈服于种种新的枷锁……惟有人掌握了社会，使经济机构为人的幸福服务，惟有他积极地参与到社会过程中去，才能克服正使他陷入绝望之中的东西，即他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只要依靠民主不停地向人们灌输人的心灵可以拥有的最强烈的信念：对生命、真理，以及对作为个体主动的、自发的自我实现的自由的信念，民主……将战胜各种虚无主义力量。<sup>[29]</sup>

但是，尽管弗洛姆坚持相信心理学的关键问题乃是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因而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尽管他用人格结构这一概念取代了本能冲动的概念，尽管他在“文化与人格”的争论中、在文化、社会和人格之间关系上采取了（偏重社会性的）立场，可是这些都没能有效地证明他对自发行为的支持以及那种生活的信念的合理性。例如，他不再像正统精神分析所做的那样，把积攒金钱和其他物件的冲动当作根源于忍住粪便的无意识欲望的冲动来解释，相反他用排便过程所引发的某种人际经验来解释这种冲动。仅凭这些说法，无法为完全扭曲了人际经验的社会提供任何乐观主义基础。在这本书的诊断和分析部分，弗洛姆之所以支持自发行动，是因为他把自发行动当作一种“意外之神”（*deus ex machina*）。他不仅在一段题辞里引用过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而且不断地用杰斐逊的话强调说，有些品质是人“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成了人的“与生俱来的”品质。这些品质就是：“成长和发展的趋向以及实现人们

273

已经开发出来的种种潜能的趋向。”<sup>[30]</sup>

像霍尔尼的书一样，弗洛姆的书针对的也是极广泛的读者群，它不仅作为大众读物，而且作为学术著作受到了极高的赞扬，获得了成功。他的朋友沙赫特尔为此所写的赞扬性评论，甚至发表在1941年的研究所学刊上。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弗洛姆，此时，霍克海默已经视他为研究所的对手了。在霍克海默看来，弗洛姆很有可能和格罗斯曼、库姆佩尔茨、魏特夫以及其他感觉受到了研究所不公正待遇的人组成一个团结阵线。

## 计划

早在1938年，研究所就开始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它应该努力从美国方面搞来一些基金，不仅用于资助研究所中的个人研究者和被保护人，而且也用于资助研究所自身的科学研究。1939年，研究所开始为此做最初的努力：例如，它试着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制定的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来吸引基督教组织和犹太人组织或私人资助者的兴趣。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1940年4月，在研究所顾问委员会（麦克伊维尔、林德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会议上，霍克海默提交了两项计划供会议讨论，希望知道这两个计划中的哪一个在美国的研究前景会更好一些，哪一个更能为他们争取到资金支持。两项计划中的一项是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是要探究反犹太主义是怎么一步一步地获得如此超常的影响力的；另一项是“现代德国文化”的研究计划，旨在重构1900年至1933年这段时期内德国经济、社会、政治、哲学、文学的发展，希望借以回答纳粹是怎么形成的这一问题。顾问们都支持后一个计划，可是研究所继续同时进行这两项研究计划。1940年7月10日，霍克海默写信给诺伊曼说，他前天偕夫人前往西海岸为研究所的迁移和他那本辩证法书的写作寻找合适的地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已将他们的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搁置了起来，理由是这个计划中的材料仅

仅集中在描述和批评上，有鉴于此，霍克海默就让阿多诺起草一个关于纳粹反犹主义政策及其引发的国内外影响的研究草案。“与我们其他的研究计划不同”，霍克海默写道，“这个计划必须仔细策划准备……我想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假期，有许多事似乎可以在这个假期里安排就绪，为了在秋天能获得资金支持把一切都安排好。”<sup>[1]</sup>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阿多诺和诺伊曼担负起了主要的任务，制定两项研究计划的新计划书：反犹主义研究计划，他的妻子也特别参与了这个计划的制定。尽管这个计划有其实际的侧重点，即保护犹太人免受反犹主义的侵害，它的研究范围还是被规划得非常广泛和新颖。8月，霍克海默从西海岸写信给洛文塔尔，信中指示阿多诺也应该参与关于德国的那项新计划书的制定。“他能够保证它的‘质量’。”

阿多诺对于有关德国的新研究计划草案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文化”和“文化危机”那两个部分。几周后，霍克海默草拟了一封给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的信。霍克海默猜测哈钦斯可能会同情他这个圈子的理论计划，他希望从哈钦斯那里为研究所的计划争取来财政支持。这封英文信这样说：

我们试图从理论上理解纳粹的兴起，不仅从造成它的社会经济客观力量的角度去理解它，而且从人、人类的角度，或更确切地说，从使它变成可能的非人性思潮的角度去理解它。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是“心理学的”，无论是我，还是与我合作筹划这一计划的研究所同仁都不是社会心理学家。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时代里，人所发生的深层转变远非心理学所能展现。人的本质本身似乎是随着我们社会基础的转变而转变的……然而，中产阶级的宗教解放、非人化的力量，大多总是，或过去大多总是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我们见证了这一转变，人变成了应激反应的被动发出者，变成了“习惯性反射”的主体，因为他们的自发性没有确定的中心，他们的行为没有确定的范围，他们没有任何超越他们最直接的欲求、需要和欲望的东西。一切事物的总体发展都将人化简、损害成他们

275

今天所表现的这个样子，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您将在“文化危机”这一部分找到这一趋势 [原文如此] 的某些线索。

对宗教和文化的中立化与人类学转型之间密切关系的强调，表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和弗洛姆是多么相近，也表明他们和诺伊曼是多么不同。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赖以构成的（除生产方式外的）关键性因素不存在于宪法之中，也不存在于工人运动组织之中，而存在于宗教和文化之中，存在于对它们的正确超越之中；存在于个体以这种超越性为基础所确立实现理性的潜能之中。在偏重于心理学方法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哈罗德·D.拉斯维尔（Harold D. Lasswell）所写的推荐信中，这项关于德国的研究计划被冠以特殊的名称：“国家社会主义文化面面观”。1941年初，这个计划被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审议。

1940年秋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决定，无论是否能从外面搞到研究基金，他们都要继续开展关于反犹太主义的论题的研究。大力提倡这么做的人正是阿多诺。在起草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神学家赫尔曼·施坦恩豪森（Hermann Steinhausen）的著作。他写信给霍克海默说：

尽管他的确可敬，可是他也成了那种迷信犹太人有神秘他性的观点的牺牲品。特别受到来自德国的最新消息的影响，我开始感觉到，我不能再中辍对于犹太人命运的思考了。我常常觉得，我们以往从无产者角度所看到的那一切，现在非常可怕地全部集中体现在犹太人身上。无论在我们这个计划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自问，我们是否不应该说出我们真正想就犹太人问题所说的话——犹太人当下正处在权力集中的对抗一极。<sup>[32]</sup>

阿多诺不断贡献出来的想法和建议中有一个思想，依据这个思想，阿多诺概括出一句简单扼要的、可以激励他和霍克海默后来共同开展这项

研究的说法，这就是：犹太人是启蒙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无产者，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于1941年春发表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这份研究计划提供了“批判的社会研究”理念的一个实例。拉萨斯菲尔德曾写过“关于行政交际和批判交际研究的几点说明”，把“批判的社会研究”理念首次介绍给了美国公众。这项研究计划的目的是“表明反犹太主义是所有近代文化（形态）中固有的众多危险之一”。其中包括对十字军以来的群众运动的研究以及对伏尔泰和康德这些人道主义代表的研究，这些研究将说明反犹太主义的根——即使在表面上看来无可怀疑的地方——扎得有多么深。整个研究程序（例如采用摄影方式）将会把隐含的反犹太主义暗流暴露出来，从而勾画出一种类型学，这样就能提供一种工具，去探测极其隐秘地深藏于潜意识中的反犹太主义的强度和性质。研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尽早与各种反犹太主义展开斗争。

阿多诺考虑到一般犹太人组织可能会看重研究计划的实用性，于是就略去了关于反犹太主义理论的那些思想。但是，他在1940年9月给霍克海默寄去了一份样稿，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份样稿里包含着大胆的设想，旨在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解释反犹太主义。这份样稿有两页半稿纸，整篇都充满了典型的阿多诺风格。在一段短小的描述之后附有一个眼界开阔且充满思辨性的长篇理论解释，这个解释说，德国民间传说中那个“远方来的姑娘”尽管一直被确信是犹太人，可其实绝不是这样，而另一方面，德国民间传说想像中的犹太人所具有的流浪、古旧、行骗等品性，却超出了单纯的外来者所具有的品性：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犹太人不属于从游牧状态转变成定居的居民，还继续过着游牧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历了不充分的转变，发展出了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形态。我们应该据此对圣经故事作详细的分析。对我来说，这里面到处都是答案的线索。圣经故事中最主要的就是以下几段：出埃及及其前奏，应许流奶与蜜之地，还有简短地提到犹太人的国和它内在缺陷的地方……犹

太人中残余的游牧习惯不仅为犹太人自己的本性提供了解释，也为反犹主义提供了解释。在人类历史上，放弃游牧习惯似乎是一种最艰难的牺牲。西方的劳动观念，以及劳动所需的所有本能压抑，非常符合定居的发展进程。犹太人的形象就是不知劳动何所指的那种人类状况的形象，后来对犹太人寄生而贪婪的本性的所有攻击都因此有了合理的理由。犹太人是这样的人，他们拒绝“归化”，拒绝接受劳动的优先性。因此他们得不到原谅，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成了阶级社会中的一个争端所在。我也许还可以说，他们决不同意自己被赶出天国，即使被赶了出来，也极不情愿。附带说一下，摩西对流奶与蜜之地的描述也就是对天国的描述。这种对最古老的幸福想像的坚守就构成了犹太人的乌托邦。游牧生活状态实际是否幸福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很可能情况是，那并不幸福。但是定居的世界，也就是劳动的世界制造的压抑越多，早期的那种生活状态就越发显得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形式，尽管那种生活形式是不被允许的，有关于它的一切想法都当禁绝。这一禁令正是反犹主义、排犹行动以及实现和模仿天国中对犹太人的驱逐的尝试的起源。

由于这几个研究计划的缘故，也由于在纽约已经动员起来的许多人为研究计划申请资金带来了更多成功的机会，霍克海默尚未决定是否在1940年迁往西海岸。8月在好莱坞他还一直在想，在做出共同决定，定下如何继续推进这几个研究计划之后，他要在9月份返回西海岸。“洛一家、马一家和霍一家在10月初可以一起用两辆车搬来西海岸。”<sup>[35]</sup>此时，哥伦比亚大学流言四起，都说研究所打算撤走，因此，为了等待时机，以便在合适的时候尽可能不张扬地撤离，霍克海默在纽约又待了六个月。最后他于1941年4月离开纽约前往西海岸，当时他只和他的妻子一起离开，这样可以尽量使得他的离去看上去不那么显眼，显得只是暂时离开的样子。

4月底，洛文塔尔给他拍电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否决了“国家社

会主义文化面面观”的研究计划。他所做的一切——几个月来为这两个计划进行各方面的人力动员工作、继续维持研究所的“正常”运作、迟迟不动笔写作关于辩证法的那本书——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在收到洛文塔尔拍给他的电报之后，他从洛杉矶写信给诺伊曼说“我想我们已经尽了力”。

我不认为我们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在我看来，合作照会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它收入的参考书目。可能交涉的程序出现了失策 [faux pas]，这可能是蒂里希那份仓促的推荐书造成的。递交了照会之后，我们的提议很快就被否决了，这就说明原因。我要特别感谢你，因为没有你，计划不会以它现在这个样子存在，实际上，这是它可能具有的最好的形式。你为我们争取到了安德森 (Anderson)，他一直为我们提供帮助，直到我们拿出最后一份照会，你为我们争取到了俄尔勒 (Earle) 的认可，从那时起，你一直承担着最重的担子。<sup>[34]</sup>

可是别人，尤其是诺伊曼并不认为这个否决就是终审。他和波洛克为了得到一些更详细的信息，就走访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得到的说法是，该计划的构想不适合社会研究所去独立研究，但最多可以作为别的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让社会研究所来做。 278

诺伊曼在研究所的未来全系于这两个研究计划中的一个在今后的进展情况，所以他赞成申请其他的研究基金，立即着手来写拟交纽约基金会的申请。就霍克海默这方面来说，他惟恐别人说他没有把他们所能做的一切都周周全全地做到。他也害怕以一种平庸的方式中止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因此他比以往更积极地支持继续递交申请，而且不把他们就要一去不返的念头向外界透露一丝一毫。他想把保持一切如常的政策继续贯彻下去。而此时社会学系主任麦克伊维尔又让研究所研究人员看到了给社会学系授课的希望，同时让霍克海默圈子的人看到了至少能争取来一个教授教席的希望，这更加强了霍克海默的那个想

法。霍克海默写信给波洛克说，一切的关键在于，千万不可引发哪怕是最轻微的怀疑，让别人怀疑研究所里面有某种愤懑情绪。另外，希望下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产生不愿意与研究所打交道的想法。应该给拉斯维尔和麦克伊维尔这样的同事造成一种印象，让他们觉得“这些人非常努力地在融入美国生活，勤勤恳恳地在奉献着。这样我们的机会就会很快到来”。<sup>[35]</sup>

尽管霍克海默迫使自己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可是让它起作用却实属不易。1941年6月中旬，阿多诺的个人津贴申请被驳回，6月末马尔库塞和诺伊曼两人的个人津贴申请也被驳回。难怪霍克海默开始猜想，一定有人在津贴评审团的评议会议上说了什么，评审团受到了他们在法兰克福时的老对手所说的话的影响，这些人肯定指责研究所圈子的那种模棱两可的品质：没法证明研究所在那里从事着真正的社会研究；没有迹象表明研究所的这些人真的想融入美国生活方式；研究所的这些人从来不想入乡随俗，依照这里的习俗，一个研究所的主任也好，成员也好，都得在名义上和实际上仰赖于由知名商人组成的某个董事会。在那次申请被驳回后，霍克海默给阿多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他看来，即使没有他们的老对手散布流言，研究所的处境也是令人绝望的。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背后隐藏的就是：

279 垄断社会的普遍法则。在这样一种社会里，甚至学术研究也被那些代理人所控制，他们与既是经济权威又是精英的那些人同声同气……凡是丝毫不服从垄断的事儿就是“野路子的”冒险事业，而且必被摧毁，即使这么做必然要付出很多牺牲。指责初来乍到者是邪恶的，这种指责的基础恰恰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社会环境，因为，当一种曾被蔑视的人际关系转变成具有社会特征的关系形式之后，它的特征也会成为确定判断标准的东西。当谈论“保护”别的国家、控制欧洲或控制工业和国家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嘲笑那些口若悬河的空想家。这些事情的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品性。科学应该满足于那些使客观精神的广播员和守卫者感到

满足的东西吗？就是在这里，我们试图逃脱这种控制，保持独立性……而且，我们甚至想自己决定我们的创造内容及其范围！这就是邪恶。另一方面，那些循规蹈矩者总能找到机会夸大，甚至是在政治上夸大这种邪恶……与在其他情况中一样，在这里，融入首先意味着让步、更多的让步、更多、更多、更多的让步；提供物质帮助则可以确保使屈从变得冠冕堂皇，确保造成永远的、无法反悔的屈从。所以，就算我们从别处获得了基金，我们的努力也都是无望的——这些基金表面千差万别，实则性质相同，因此我们在别处谋求基金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sup>[36]</sup>

当麦克伊维尔宣称他将支持研究所并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情况对霍克海默来说变得更为复杂了。研究所被并入大学是一回事，研究所能给社会学系上课又是另一回事，对前一件事，要采取缓兵之计拖下来，而后一件事则越快办成越好。但是，要在不触怒校方的情况下把这两件事分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此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一方面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诺和洛文塔尔对这个思想表示出很大兴趣，可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和诺伊曼则不以为然。如果研究所并入大学，马尔库塞和诺伊曼等人就会获得更多机会开始他们的学院生涯；与之相反，霍克海默和那些指望研究所为他们提供物质保障的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研究所的独立性受到任何限制。“瓶中信”的想法在马尔库塞那些人中引起的是厌恶，但却得到了霍克海默这部分人的欢迎。所谓“瓶中信”是阿多诺常在书信中使用的一种表述，指的就是批判理论——在他看来批判理论没有收件人的地址，注定在可预见的未来“沉寂无声”。

##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争论

280

研究所的特殊气氛，使得他们在对纳粹的正确阐释上产生了前所

著作构成的语境当中，又显得有些武断。神学母题和弥赛亚母题直到那时还一直都不是他所关心的论题。而且，他本人对于自己所提出的希望的某些方面并不满意。在一封给阿多诺的信中，他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仍然必须把这些积极的表述加以细化。它们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论权威主义国家的这部著作的结论”。<sup>[42]</sup>

因为文章在政治上太具有爆破性，在理论上尚欠考虑，霍克海默决定1942年暂不发表此文，而是压下来，登载在一册油印的本雅明纪念文集中，这个文集的读者限于一个很小的圈子。拿到未删去“权威主义国家”一文的新版纪念文集的读者圈子更小。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和限度”一文于是成了专门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那一期专刊里的重头文章。这一期发行于1941年夏，本来打算用霍克海默的文章作本期的领头文章。<sup>[43]</sup>这一期专门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学刊原来拟收的文章除了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论文外，还包括：诺伊曼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的工人运动”<sup>[44]</sup>；基希海默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宪法构架”；古尔兰德（Gurland）的“经济结构转型”；奥托·莱希特的“官僚科层体制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作用”；费利克斯·韦尔“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资本配置”。

波洛克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但诺伊曼以他一贯的方式直接地或公开地批评他，而且，除波洛克以外的那些属于研究所“核心圈子”的人——包括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和阿多诺——也对他提出了批评，当然，是礼貌得多的批评。霍克海默在读了波洛克就“国家资本主义”这篇文章所写的提纲之后，就写信给波洛克说：“如何避免支持‘极权主义的解决方式’这个错误，将是一个难题。”<sup>[45]</sup>波洛克曾将文章前36页稿子给阿多诺看过。在霍克海默提出批评一个月后，阿多诺写信给霍克海默表达了对此文的疑虑：

我可以这样来总结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它是对卡夫卡的一个颠倒。卡夫卡把官僚等级体系描述为地狱。在这篇文章中，地狱被改造成了官僚等级体系。另外，文章的表述风格像胡塞尔所说的

主义国家里仍旧生产着剩余价值，而且剩余价值虽然在国家的控制下得以分配，可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以其原来那个名字——利润——流入了工业寡头和土地所有者的钱箱。“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组织被干扰和破坏。”霍克海默将改良主义国家、布尔什维主义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都看作是权威主义国家形式；如果说法西斯主义国家被描画为一种混合国家形式的话，那么，在霍克海默看来，也只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改良主义不过是它的变体。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霍克海默则将之视为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它的成熟形式将是国家主义，可能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并有可能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而取代社会主义。霍克海默不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视为一种退步，而是视为“力量的加强”，“在没有种族主义条件下”是“可以存在下去”的。<sup>[10]</sup>

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分析中，也包含着一些有些让人惊讶的带来希望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这篇文章中比在“论犹太人与欧洲”一文中更加显著。他批评说工人运动的群众组织促进了国有化观念，这基本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化。因此他断言将会出现“孤独的个人”，每个人都被孤立了起来，权力并不直接指向他们，他们也受权力的保护，可是他们本身却也构成了一种权力。孤独的个人所能运用的惟一武器就是言论，这种武器虽然“在极权国家中是无力的”，可是其威胁性甚至比威廉二世时代的党派集会更大。霍克海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有时候是对无阶级社会的一种拙劣模仿，他的这一观点与通过否定而通向真理的这个哲学母题相符。同样，基于这个哲学母题他做出了如下陈述：“人们为了互相团结起来去处理他们的事务，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本性，当然这种改变比他们曾经被法西斯主义强行改变的程度要小得多。”接着，他对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表示了赞同，这个论纲的思想曾部分地反映在论爱德华·福赫斯的那篇文章当中，霍克海默写道：“剥削的最终结局……不是进步的再加速，而是脱离进步维度的一种质的飞跃。”<sup>[11]</sup>他对孤独的个人的强调，在这里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但似乎有点令人惊奇——因为这种强调在霍克海默这篇文章与其他

未有的观点分化，在有关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方面也产生了奇特的争论。

波洛克 1933 年在他“论经济危机”一文中，概略地分析了发生在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的事件，他把这些事件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干预新阶段”<sup>[37]</sup>的体现，同时承认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景也许是好的。1938 年，霍克海默似乎受到了魏特夫关于东方社会的那些思想的影响，在研究所举办的一次讲座中，他说“权威主义国家，即使是资产阶级时代中的权威主义国家，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毋宁说，它只是以自由主义为中介的权威主义形式重演，这些形式起源于绝对主义国家……支配 20 世纪巨大生产资源的权力必然要求某种新的权威主义机器，它与 16 世纪到 19 世纪中的那种权威主义机器当然是不同的。”在他于这一年开始写作的“犹太人与欧洲”一文中，他提到了一种由工业寡头、军队和公务员，以及由行政、法律和政治机器构成的新秩序。<sup>[38]</sup>总的来说，这篇文章从两个不同方面给出了一个综合的论述。一方面，霍克海默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应该被构想成为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人们分化成单个的原子，造成了小规模的企业和巨大的组织，因此这一过程也使得持续存在的专制得到了平稳的发展。另一方面，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借助暴力和分赃来进行统治的强盗政体；它将一切文化上的欺骗和幻想都戳穿了，因此可以确信的是，一旦这种政体所代表的那种反人民联盟不再能够成功地运转，它很快就会被推翻。1940 年，霍克海默在另一篇文章中深化了他的思想。这篇文章最早的题目是“国家资本主义”，后来改成了“权威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这时他明确地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继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新阶段，社会组织也达到了新的阶段，此时“官僚系统已经控制了经济运行机制，而后者已经脱离了资产阶级的纯粹利润原则”。<sup>[39]</sup>

霍克海默把“整体国家主义（integral statism）或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最一贯的权威主义国家形式，这种国家形式自身已经完全摆脱了对于任何私人资本的依赖”。这是他称呼苏联的特有方式：他从来不对苏联直呼其名。相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只是一种“混合形式”。在法西斯

太不证自明、太居高临下，因此就全然缺乏紧迫感，相当一部分 (à part, 原文如此) 来自一种非辩证的假设：在充满对抗的社会中有可能存在一种无对抗的经济方式。<sup>[6]</sup>

这篇文章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毁了波洛克自己的名声和研究所的名声。阿多诺自己那篇论斯宾格勒的文章是不适合发表在这样一份专刊上的。他们用不着讨论也知道“诺伊曼那篇受林德启发而写的论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性的文章”所谈的东西。阿多诺因此建议霍克海默改写波洛克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论点是从“权威主义国家”那里借来的，可是文章把它们过度简化了，而且表述得太不辩证，甚至把它们转向了反面。如果文章的改写稿在专论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一期上刊出，应该署上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两个人的名字。

可是霍克海默不希望这样。他高兴地看到他最亲密的朋友这么多年后终于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这位朋友再次参与研究所学术工作的一个证明。阿多诺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尽管在他看来波洛克的基本思想的悲观主义方面是对的——波洛克认为，权力在它的当下政治形式之中永恒延续的机会要比逃出政治形式掌握的机会大得多。波洛克文章的错误就在于它的“乐观主义，甚至是为他人张目的那种乐观主义：使自身永恒化的东西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理性的状态，相反，它是无休止的一连串灾难，是在无法预见的很长时期内的混乱和恐怖，尽管人们都认为逃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文章却用一种埃及人的眼光过于简单地对待这一切”<sup>[7]</sup>。此时，霍克海默也重申了他在读完波洛克手稿之后产生的相同的焦虑。他赞赏文章醒目的主题，即经济发展已经逐渐在世界各地表现出发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与私人资本主义相比，国家资本主义是在经济方面更有效、更切合时代的形式，而且就这种资本主义而言，它完全可能以某种非极权主义方式存在。但是，他也同样强调一定要避免误解，“不要错误地认为我们因此应该对国家资本主义抱有同情态度”。“如果要我表述我的基本想法，我希望文章应该更为清楚地表述这些现象，

283

把它们的相关性说得更清楚一些……不要总是从严格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谈这些现象。”<sup>[48]</sup>

波洛克抵达西海岸后就遵照霍克海默提出的意见修改了文章。在他抵达西海岸后，霍克海默写信给诺伊曼说：“时间现在很紧，因此无法作更细致的改动。我比较烦恼，我觉得这么一个有待于细致分析的重要论题是这篇文章不能胜任的，因为这篇文章的写作环境从一开始就很艰难——时间很紧。我现在正忙于写一个短小的前言。如果我得知你赞成这两个东西一起发表出来，那我将非常感谢。”<sup>[49]</sup>

显然，除了其中一些细节之外，诺伊曼拿到的波洛克的这篇文章与后来出版的那个文本基本一致。尽管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和限度”，可是，文章却把它说成是这样一种系统：它不仅比陈旧的资本主义公司先进，而且也根本没有任何特别的、内在的限度。波洛克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决定性起因在于市场的自主性，而市场的自主性在垄断的压力下不仅日益无法有效地发挥自我调控的经济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造着无政府主义和经济混乱。在波洛克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废黜市场自主性将会取消危机的决定性起因。他只是干巴巴地断定国家资本主义优于陈旧的资本主义企业，并在文章快要结尾的时候同样干巴巴地断定人们面临着在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抉择。但是，他弱化了对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赞扬。这是因为他听从了阿多诺的建议：这种赞扬应该暗含在将来的研究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和难题之中。

284 诺伊曼收到的前言，除了一些细节之外，也与后来发表的文本一样。在这份前言中，霍克海默试图在不触犯波洛克的情况下从一开始为文章定下一个正确的调子。他的论述依据的是他一贯坚持的那种标准，即认为社会应按照“人类需要和潜能”被建立起来，另外，避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他认为“权威社会”是一个应该受谴责的、自相矛盾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受控于“极权主义组织、大工业”也就意味着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中，这一体系不仅将自己的计划强加给它以往的竞争者，而且它还命令大众工作，同时并不把他们当作自由缔结契

约的一方来对待；在这一体系中，“有计划地浪费智力、废弃幸福、耗费生命取代了由市场体系引起的摩擦和危机造成的无计划的浪费”。在这种体系中，原先阶段那种“非理性的理性”“变成了有步骤的疯狂”；在这种体系中，整个过程的矛盾作用将会一直发展，直到发展到毁灭的地步。<sup>[50]</sup>他没有考虑阿多诺的建议。阿多诺认为至少应该更清楚地说出“不仅异化，而且还有它的对立面，也许都能够在法西斯主义中发展起来”。<sup>[51]</sup>无论霍克海默谈得如何激烈、如何“辩证”，他没有谈到任何可以被看作认可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最后他只是在结论中将法西斯主义表述为旧世界在“国际范围内的死硬对手”，各个老的世界强国现在必须想办法对付它。最后他说，波洛克的文章是一个警告，有助于打消幻想——认为法西斯主义很快就会因为它的经济困难而垮掉的那种幻想；它也是一个刺激，刺激人们去思考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对民主架构的影响会比对法西斯主义架构的影响更有效。

诺伊曼赞同霍克海默的前言，只是批评它在结尾部分掩盖了研究所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而且对美国的民主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尽管从政治形势的角度说这个评价还是可以接受的）。他对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仍然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没有改变他对波洛克当面提出的那些批评意见。这些批评直接针对以下两点。首先，波洛克所说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可能代表了一种千禧年，并可能因此彻底把人类推向完全绝望的境地。这是个策略性的反对意见。这个意见只在针对波洛克分析的精确性的时候才是有效的——波洛克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个概念根本没有注意到它所分析的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虽然这些矛盾使得这个系统岌岌可危。诺伊曼在他的《巨兽》中为了揭示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是一个矛盾概念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的，这些努力意在说明根本不可能有一种能够避免危机的资本主义形式。奇怪的是，诺伊曼并没有想过要构想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社会形式，一种“整体国家主义”（integral statism），这也许是因为他认为那种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第三种可能性的想法，在欧洲近乎妄想，根本不切合现实。

诺伊曼对波洛克提出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波洛克既没有一套说明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理论，也没能提供——比如说，根据对德国的切实分析——能够证明德国是具有国家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任何证据。实际上，恩格斯也好，布哈林、列宁也好，他们在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的时候也没有形成一套过渡理论。布哈林也只是在他出版于1918年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中有一次提到过这样的可能性。德怀特·麦克唐纳德（Dwight Macdonald）曾在他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这本书的一个段落。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资本主义的终结”，1941年发表在《党派评论》上——该杂志为在美国讨论和解释法西斯主义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论坛。这段引文如下：

如果生产的商业性消失了——比如说借助这种方式：把世界经济全部组织起来，由一个巨大的国家托管，尽管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证明这种方式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既然商品生产已经消失了，那么这种经济形式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可它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权力仍然保留着（而且甚至更强大）。这种经济结构，从根本上说，很像是没有奴隶市场的地方的奴隶所有制经济。<sup>[52]</sup>

纳粹德国帝国主义的自给自足政策，似乎让这种想法看似相当合理地转移到了一个国家或一种权力体系之上（尽管这和布哈林想说的差之甚远）。因此，诺伊曼所提的反对意见的最后部分是相当关键的，这是整本《巨兽》要强调的重心之所在：“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研究德国的经济进程。直到现在我还没找到一点证据能够证明德国具有哪怕一点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sup>[53]</sup> 霍克海默对此答复说：

我绝对信任你就德国经济进程所作的研究，因此我也相信你的论断：德国哪怕一点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仍然无法摆脱恩格斯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显然正向着那种阶段发

展。所以我必须说，这个阶段的到来仍然在威胁着我们。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波洛克作品的价值。抛开一切缺点不说，它为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sup>[54]</sup>

在这一点上，诺伊曼和霍克海默两人抱着不同的目的在交谈。霍克海默是讨论整合的国家主义的理论家，他是从历史哲学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诺伊曼是关注极权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他是从改良主义道路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在《巨兽》结论部分诺伊曼对国家资本主义观念提出的批判，在他看来完全是一个事关存在意义的事情：“本书作者没有接受这种特别乐观的观点。他相信，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仍然在德国起着作用，发展到了更高的，并因而更危险的阶段，尽管这些矛盾冲突现在被官僚科层机器和人民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掩盖着。”<sup>[55]</sup>他的这种实际判断也可以解释他在写给霍克海默那封信里面所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在信中，他认为波洛克的文章“彻底同研究所的学说”相矛盾；它“明显背离马克思主义”；它“实际上只是对曼海姆社会学的新表述，特别是对曼海姆的新书《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的复述”。<sup>[56]</sup>霍克海默强烈反对他的这些批评。

286

几个星期之后，诺伊曼完成了《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实践》的稿子，这是一个一千多页的打字稿。他把主要讨论魏玛民主制崩溃原因的原来有300页的导论压缩到了60页。他写信给霍克海默说：“我必须把大块的其他理论分析压缩掉，这样才能尽可能让这本书具体一些。”<sup>[57]</sup>霍克海默道贺：

尽管我只能靠着所记忆的那些东西来理解它的内容，这些记忆来自你的讲座，来自迪耶特勒之夜 (Dieterle evening)，来自你的各种言论，可是我可以确信这本书的重要性。我是最早敦促你写这样一本书的人之一，除非是我记错了。必须承认，你在这本著作中投入的精力是我始料未及的。它的出版证明了，我们的理论仍旧是当今社会环境这个大迷宫的最好向导。它会激励那些认为理论由于

理智的衰落而走到了尽头的人。激励我们不少的朋友。<sup>[58]</sup>

287 阿卡迪·古尔兰德 (Arkady Gurland) 在经济学方面为本书提供了帮助, 诺伊曼大量引用了古尔兰德的论文“资本主义中的技术趋势和经济结构”<sup>[59]</sup>, 此文是专门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那期专刊而撰写的。诺伊曼这本书基本上还是采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构: 它从所谓的政治上层建筑开始 (“第一部分: 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 继而介绍经济基础 (“第二部分: 极权主义垄断经济”); 然后介绍阶级结构, 并以之作结 (“第三部分: 新社会”)。此书把将社会作为整体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式与对宪法的形式分析结合了起来。诺伊曼之所以将他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的考察称作《巨兽》, 是与霍布斯有关的。霍布斯在他的作品《巨兽; 或长期议会》中认为英国内战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一种无国家状态, 把这种状态非常不适宜地与《利维坦》, 与还残留着法律和秩序的强大国家相对立。<sup>[60]</sup> 以这种方式, 书的标题就解释了本书的一个中心论题: “国家社会主义是——或者将要成为——一种无国家形式”; “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社会形式, 在这种社会形式当中, 行使统治权力的群体直接控制着其他的人, 而并不需要国家这个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理性而强制的机器作中介。”<sup>[61]</sup>

这种发展趋势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大公司。纳粹统治直接通过掌握权力来增加他们的利益, 纳粹实行的政策有利于卡特尔, 但是却以牺牲小型和中型公司为代价。这个体系的典型特征就是将私营企业和“政府经济”混合起来, 这种混合所起到的作用从来都是为那些最主要的公司提供方便。那些由公司控制的各种自我管理组织, 因为日益卷入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 其权力得到了显著的增长。比如, 一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著作中说, 必须在 1933 年 7 月强制施行卡特尔化: “有国家权威的协助, 强制命令赋予卡特尔 (德国工业协会 [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一种权力, 使它不靠自愿也能存在下去。”<sup>[62]</sup> 战时经济也进一步强化了大公司的地位, 比如说, 它们掌握了那些当时被

德国委以政治重任和经济重任的组织，控制了原材料的配置。诺伊曼依据他给出的一些证据，得出如下的结论：

如果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不废黜缔结契约的自由，那么卡特尔体系就会崩溃。如果劳动力市场没有被权威主义措施所控制，那么垄断体系就会受到威胁；如果原材料、供给、价格控制、合理化措施、信贷部门和调控交易部门都掌握在反对垄断的力量手中，那么利润体系就会崩溃。这个体系已经被全部垄断了，以至于它对周期性变化能够非常灵敏地做出反应，因而那种混乱能够被避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治必须对资金、信贷、劳动力和价格施行垄断。

总之，民主会威胁这种总体垄断的体系。因此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稳定和加强垄断体系。当然这不是极权主义体系的惟一作用。国家社会主义党一心想建立起来千年统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只能保护垄断体系，这种体系为他们的政治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sup>[63]</sup>

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是统治阶级的另外两个联盟伙伴。就官僚机构而言，诺伊曼认为它越来越不重要。这四个集团\*因为恐惧而团结在一起，因为政权的瓦解就是这几个集团的共同末日。与他们相对的则是“被统治阶级”。诺伊曼以工人阶级为例考察了被统治阶级的境遇。

288

工人阶级原有的自发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自己的官僚组织和由私人垄断所掌控的标准化的大众文化所剥夺，轻而易举地被纳粹捕获而成为牺牲品。由于经历了民主阶段，大众因而是无法被忽视的，可是纳粹能够很有效地操纵他们。纳粹瓦解了工人组织，限制或者取消了组织运动的自由，甚至动用了恐吓和宣传的手段。同时，纳粹利用《凡尔赛条约》所激起的德国民族自豪感，为工人提供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例如

---

\* 指（纳粹）政治权力集团、大公司、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中译者注

“通过欢乐而获得力量” [Kraft durch Freude] 的活动<sup>[64]</sup>) 和全体就业, 尽管工资水平仍旧很低。

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在全体就业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体就业是它给大众的惟一礼物,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它的影响力。商业周期既没有停止, 经济体系也没能摆脱它的周期性收缩。但是国家对信贷、资金和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使经济收缩不再采取大规模失业的形式。即使战后生产的不景气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无法引导资本回流为消费品,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把妇女送回厨房, 给无劳动能力者发放抚恤金……如果必要的话, 就采取分配工作、减少劳动时间、暂缓技术发展的手段, 甚至采取压低工资抬高物价的手段。权威主义国家可以采用很多这类手段……

与全体就业相伴随的是一套精细的社会保障计划。这套在魏玛民主制发展起来的体系变得更精简并完全被权威所控制。失业救济、健康保险和意外保险以及残疾人、老年人抚恤金, 所有这些都使大众暂时对国家社会主义持有一种消极容忍的态度。社会保障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宣传口号, 但它是事实根据的, 这个口号也许是它整个宣传机器中最有效的一个武器。<sup>[65]</sup>

诺伊曼提供的材料让读者完全相信纳粹主义将会在很长时间以内成功地履行它的职能——将群众整合到“新秩序”之中。既然它能有效地对付工人阶级, 那么对付其他“被统治阶级”就不在话下了。

289 诺伊曼对政党、国家、武装力量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分析, 说明他与波洛克之间的不同基本上只是词语上的不同。诺伊曼清楚描述出的那种发展与波洛克所说的发展方向基本相同, 波洛克只是用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令人不快的术语来指代它罢了:

操纵暴力的人渐渐成为商人, 而商人也渐渐成为操纵暴力的

人。许多大实业家都成了纳粹党卫军 (SS) 的高级领导人……许多恐怖主义者如今在工业领域身居高位……操纵暴力的人的权势因此内化于现代社会所见证的最剧烈的垄断之中，成为它与生俱来的构成元素。由强大的工业、金融、土地寡头组成的一个小团体逐渐与政党寡头团体融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专门的集团，控制着生产工具和暴力工具。<sup>[66]</sup>

波洛克也许会把“生产”和“暴力”颠倒过来表述，但是其论述方式与诺伊曼是完全一样的。

九年后，诺伊曼在“研究政治权力的几个途径”一文中说，政治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已经越来越独立于经济权力。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明确地同意波洛克的坦率立场。霍克海默曾给波洛克的论点提供了很多修改。在某种情况下，政治的这种独立性甚至能被拓展成一种“政治至上”：

苏联 [为这种“政治至上”] 提供了一种明晰的边际情况 (marginal case)：政治权力不仅使自身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成为了所有经济权力存在的根源。从另一点来说，纳粹德国的情况则展示了一种过渡情况 (transitional case)。无疑，纳粹党是在德国大工商寡头所提供的财政帮助和政治帮助之下上台掌权的，那些寡头们无疑希望利用该党为他们自己牟取更多的利益。但是，纳粹党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从商业控制中解脱出来，它的政治权力具有了自主性……我们可以相当可靠地设想：如果没有发生战争，如果纳粹获得了胜利，苏联模式早就成了主流模式。<sup>[67]</sup>

诺伊曼读了霍克海默给那一期论国家资本主义的专刊所撰写的前言之后，并没有产生误解，他指出这篇文章的表述非常出色，而且有许多地方与他书中的观点相似。他们两人都曾以相同的方式指出过纳粹体系的种种现象所具有的交织性和含混性，指出过纳粹体系的悖论特

征。他们两人都试图对它那种非理性的理性、那种否定国家的国家特征、它创立的秩序所包含的混乱总体性加以揭示。与波洛克不同，他们两人都很明确地意识到这种体制的恐怖面。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诺伊曼坚持认为纳粹体系的属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并因此主张，所谓前所未见的新社会形式业已浮现、带来人类的根本转变且领先社会主义、超越于过去数十年人们所提出的所有希望之说，早就站不脚了。可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却支持整合的国家主义理论和“一种新的、批判的人类学——一种关于非人道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Inhumane）”，<sup>[68]</sup>霍克海默后来将整合的国家主义替换成“管控社会”（the administered society）一词。《巨兽》出版之后，霍克海默写信给诺伊曼，附上了几则批评意见：

如果说我们两人之间存在什么真正的理论差异的话，那么这个差异主要是由于你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造成的。这种乐观主义不仅表现在你期望的那种更好的管理形式当中，也表现在诸如像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的一些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上，还表现在一些人类学论题上——其中一个就是你曾经在那“让人不快的备忘录”中提到的那个人类学命题，你认为“人格分裂”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我认为，有可能消除由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体系造成的“人格分裂”这样一种乐观的想法，并没有反映出你真实的思想。事实上，自我分裂——你也知道，这也是我在《理性的终结》中谈的主要问题之一——有很漫长的史前史。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自我分裂的这一趋势的彻底实现，这一趋势在整个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自我分裂不仅体现在理论真理和科学真理的传统分裂中，而且也完全体现在劳动和闲暇的分裂、私人道德和商业原则的分裂、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分裂之中，也体现在既有秩序数不清的方方面面之中。法西斯主义在人格方面所做的，只不过是有意地、巧妙地利用了那一分裂，这种分裂的根基正是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sup>[69]</sup>

通过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探知霍克海默对诺伊曼这本书的真正态度：这是一本好书，材料丰富，好过已出版的同类作品，可是，在理论层面却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关键的“文化—人类学”问题。

诺伊曼对那些探讨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没能证明他们为之做出诊断的这个体制将会衰落，现在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在德国起作用，而且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些矛盾发展到了更高的，并且因此更危险的阶段。他引用大家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或批判理论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来这样论述：

在德国工业生产力、它改善人民的福利的能力和它的实际成就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还在不断深化。过去八年来持续扩大的巨型工业不过是在为毁灭做准备。政府给大众的  
291  
许诺当然是甜蜜的，但是其中很多许诺已经成为泡影，纳粹党的那种福利计划已经基本破产。大众肯定已经感觉到了这种矛盾，他们不仅是林中宝贝 (babes in the woods)，他们背后还有着—个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让他们充满了批判精神，并使他们意识到，现代文明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种矛盾：—种经济为了福利可以进行大量生产，但这样生产只能导致毁灭。<sup>[70]</sup>

无论是霍克海默还是波洛克对这种观点都不是很陌生。但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之上的种种希望，在此时看起来却似乎是成问题的，而诺伊曼并没有通过分析来给这些希望提供任何的支持。他所引证的其他—些矛盾——例如，宣传的神秘特色与社会的彻底理性化和非人格化之间构成的矛盾——也—样如此；另外，他参照那些对于纳粹德国诸多事件的观察者而提出的推测也是—样，即，现在已经到了—个新的阶段，此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领袖和共同崇拜对象的真实面目就是空话连篇”。——<sup>[71]</sup>这种并置状态的存在，似乎正好体现了纳粹统治制度的典型特征。

霍克海默圈子中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可能性和现状”的背离。问题

在于大众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在某种条件下能够起来拒绝现状。对这个问题，诺伊曼只能说：“如果我们相信人在其本质上就是悲惨的，如果我们相信惟一能够激励人的只有个人主义，那么前景就是非常黑暗的。但是，人不是坏的，也不是好的，他是由他的文化和政治经验塑造而成的。”<sup>[72]</sup> 可是，在诺伊曼本人看来，纳粹也能毫不费力地控制这种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经验”。从那时起，这种构成性的“文化和政治经验”就成了纳粹主义。

诺伊曼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使他能够对纳粹主义做出独到的具体分析，尽管这种分析没有为社会主义的希望留下任何地盘，可是却有助于美国政府官员去理解纳粹体系的运作方式，有助于他们去估量那些参与纳粹的人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

## 洛杉矶的私人学者分部——研究所在纽约的残余——与诺伊曼和马尔库塞分道扬镳

292 霍克海默甚至在 1941 年 4 月到达洛杉矶以后，也没有立即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理论哲学著作。当时他已经 46 岁了。他和妻子于 6 月份搬进了他所建的一所带走廊的平房公寓，他还为波洛克专门留出了一个房间。太平洋—帕里萨德 (Pacific Palisades) 是一个由平房公寓和别墅组成的小镇，坐落在洛杉矶和大海之间，离好莱坞不远。霍克海默的左右近邻是两位成功的德国移民：托马斯·曼和莱昂·福伊希特万格 (Lion Feuchtwanger)。<sup>[73]</sup> 此时，在好莱坞和好莱坞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德国移民的聚居区。许多人都是冲着好莱坞来的，他们都是演员、作家和音乐家，参与着或希望参与那里的电影工业。米高梅和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就与许多作家——例如海因利希·曼 (Heinrich Mann)<sup>[74]</sup>——签订了有名无实的合同，使他们能拿到签证，而且获得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被放逐到天堂”。路德维希·马尔库塞回忆说：

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中期，我就定居在那里了，和我一起在那里定居的还有赖因哈特、耶斯纳、科特纳和多伊彻；后来还有托马斯·曼、贝尔特霍尔德·费尔特尔和布鲁诺·弗兰克……每年都有更多的文学家来到这里，因此我们很快就聚齐了，就像不久前在萨纳里一样。如果你被一群同为外国人的朋友所包围，那么你肯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即便他们里面有几个人算不上朋友，可也绝对不是敌人。我在这里几乎感觉不到是在美国。我想，一个穷人在洛杉矶的境遇要比在纽约好得多。<sup>[75]</sup>

7月，布莱希特从莫斯科，经过西伯利亚和马尼拉抵达洛杉矶。福伊希特万格劝他留下来，因为住在洛杉矶要比住在纽约花费小得多。于是布莱希特留了下来，搬进了朋友为他租的房子中。他对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感到非常失望，好多其他的移民也是这样。1942年春，汉斯·艾斯勒（Hans Eisler）也从纽约来到了洛杉矶，同样是因为这里有电影工业。勋伯格从1934年以来就生活在这里，成了一位没有听众的作曲家，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当了教授，这所大学的许多学生都选修音乐。尽管霍克海默有许多保留，尽管他还感受着那种“辉煌的孤独”，可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也成了这个移民聚居区里面的一分子。<sup>[76]</sup>

马尔库塞一家于5月和6月陆续搬来，波洛克一家则是7月搬来的。霍克海默为安顿马尔库塞一家而奔波，就把别的一些事情耽搁了，他没法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那期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专刊准备他的稿子。对于辩证法项目的研究还停留在准备性研究阶段，他还像以前一样在为此做规划和做笔记。事情暂时只能按照这种方式进行。8月霍克海默写信给洛文塔尔说：

前几周，有太多的事情让我分神；这只是暂时情况，在9月上旬这种情况就会有所改观。总体来说，我很高兴——我的生活全部就是为了工作。我再没做其他事情。我们的外部条件和其他人的外部条件都一样，这些外部条件成了摆在特殊问题面前的背景因素，

293

决定着稿子和笔记的处置方式……我不想在一封信里面谈细节问题，因为对我来说那样会很仓促，会歪曲一些东西，但我认为我的方法是对的。如果以后几年中能有更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那么我们搬来西部的决定就是正确的。这个想法让我非常高兴。Nota bene [注意]：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自然风光更美，气候也更好，你做梦也想像不到。<sup>[77]</sup>

三天之后，他向诺伊曼道贺，祝贺他完成了《巨兽》一书。言语之中，他一方面表明自己给予此书的赞赏和传达的某种使命，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努力向这些人表达善意，尽管研究所的领导们想方设法要解除负担他们经济要求的义务。霍克海默核心圈子成员们越来越确信弗洛姆、魏特夫、格罗斯曼和那些对研究所失望的人正串通一气制造阴谋，如果研究所的领导人没办法在不引起争端的情况下解除负担他们经济要求的义务，那么诺伊曼、基希海默和古尔德兰也会参与这个阴谋。诺伊曼手稿的完成为霍克海默圈子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可以让他们彻底解决诺伊曼在研究所里的地位问题。可是在研究所的领导们看来，诺伊曼是一个非常急需的人物，因为目前他不仅承担着纽约分部的主要学术任务，而且正谋求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打开局面，而且还带着研究基金，这些情况霍克海默在1941年10月给洛文塔尔的信中也提到过。如果他的努力成功了——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么诺伊曼无疑应该成为研究所纽约分部的主任。由于害怕引起争端，研究所把确定诺伊曼在研究所名分的这件事一推再推。

1942年1月，核心圈子最终放弃了得到授课资格的所有期望，他们得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在他们提出的许多建议中只同意将诺伊曼的课程列入系里的计划。波洛克要求诺伊曼签署一份声明，声明从1942年9月30日之后将不再向研究所提出任何经济要求。诺伊曼向霍克海默表示抗议，但却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的确不知道研究所的管理方式，而且，正是霍克海默本人强烈要求他必须在1941年10月之前签署这份协议。霍克海默是这样劝说他的：

我很清楚，这些年来研究所在财政上每况愈下，我们还要忍受其他难以忍受的事情，同时观点分歧也层出不穷。你在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忠诚于研究所的，我要为此向你致谢。我们搬到这里——你是不同意我们这么做的——使情况变得更为严峻了。但是抛开这些完全有道理的保留意见不谈，你应该相信我，我要说，我的那几个观点是经得起批评的。我们谁对谁错，只有时间可以评判。

你多少以正式身份暂时为我们充当了在系里的代表，这时波洛克显然确信自己有必要为他自己，也是为研究所澄清一点，即以以后的工资支付将遵从自愿的原则……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应该从别处找到资金支付你的酬劳，这不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次要，而是因为我们对其他人员负有更大的责任。因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努力，试图得到新的资金进项，尽管这种尝试没有一次成功过，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了你的一边。我相信波洛克的这一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后期限的后延不是一种义务，后延取决于对你的成就的尊重，也取决于你同我们保持理论联系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美国当前困难情况的掌握程度。

霍克海默补充说，如果诺伊曼求诸法律，那不仅将毁掉研究所，而且也将对他本人不利，因为研究所还会给他提供授课机会和其他的东西。“我知道，我们仍然可以相互合作，而不是互相对着干……我很难想像你将来与之合作的那些人能像我们——不止我本人——一样对你持绝对肯定的态度。”<sup>[78]</sup>

诺伊曼在短期内还无法在大学里取得谋生的职位。三个月后，他成功地在经济战争事务部申请到了一个职位。1941年夏末，后来发展为战略事务局（OSS）的情报协调署的组建者威廉·J·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绰号“野蛮的比尔 [Wild Bill]”）就已经与研究所有所接触了，他打算聘用诺伊曼和霍克海默；在他看来这两个人是分析纳粹报章杂志的最出色的专家。1941年12月，日本袭击了珍珠港，随后美国对

日宣战，接着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美国成了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美国希望学术界和思想界提供对战争有利的帮助；华盛顿为素受学术训练的人提供了大量的职位。诺伊曼那时被任命为经济战争事务部的首席顾问，这样诺伊曼成了研究所对其无财政义务，而其工作又可被视为研究所为战争所做贡献的第一个研究所成员。1942年7月，诺伊曼又被任命为美国高级军事参谋部智囊团的首席经济学家，为此霍克海默向他道贺说：“我对此尤为高兴，因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知识，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 [原文如此]，在实际领域中也可以同新学院所提供的那些东西相竞争。”<sup>[79]</sup>

诺伊曼和研究所之间的合作关系暂时还继续着。美国犹太委员会之所以在1942年秋决定资助研究所的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主要还是因为诺伊曼的努力。诺伊曼后来提出他还想继续留在研究所工作，但是必须为他支付每年1200美元的每周咨询费，并为他作为兼职研究员所承担的半周工作支付每年2400美元的薪金。霍克海默对这个提议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个计划并不是未来的可靠保障的基础。这个打算不是一个长期的计划，行之不远。霍克海默表示，如果他本人鼓励诺伊曼放弃在经济上最好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放弃在华盛顿的正式工作，那将是对诺伊曼和研究所不负责任的行为。自此之后，诺伊曼和研究所的联系就日渐稀少了，但也没有彻底断了联系：1946年3月诺伊曼与波洛克会晤，告诉波洛克说他本人还是想回到研究所从事他的本职工作，随后他还给霍克海默写过一封信。

现在，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的合作要比诺伊曼与后者的合作紧密得多，马尔库塞本人也比诺伊曼对霍克海默要顺从得多。那么，马尔库塞目前的情形如何呢？马尔库塞一家于1941年5月跟随霍克海默来到了西海岸，马尔库塞也是第一个在这里同霍克海默会合的人。他来到洛杉矶之后，霍克海默为此写信给波洛克说应该尽快地把马尔库塞的月薪从330美元减少至280美元。他又给马尔库塞解释说，下个月马尔库塞可以领到300美元；至于以后怎样则要取决于研究所的一般状况和他与波洛克的安排。

马尔库塞搬入靠近太平洋—帕里萨德的圣摩尼卡 (Santa Monica) 一所租屋中。霍克海默则建议他买一所房子,可是马尔库塞由于背负债务而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且他刚刚获悉他要减薪,他未来的收入还很不确定。马尔库塞原先在圣摩尼卡附近看上了一所房子,那周围聚集着很多学者;霍克海默也认为他的想法非常有利于研究所。霍克海默写信给波洛克说,马尔库塞可以在那里建起来“一个体面的办公室,搞起一个藏书室并举办研讨班。格罗斯曼也可以住在那里……我们还可以在那里挂上牌子:社会研究所,洛杉矶办事处——尽管它地处圣摩尼卡”。<sup>[80]</sup>他还计划,除了马尔库塞之外,阿多诺和波洛克,还有洛文塔尔都应该来洛杉矶,如果可能的话,再加上基希海默——可是后者像以前一样,只能是从研究所领取最少薪水的研究员,而且这份薪水也不会固定。霍克海默对未来的打算还包括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取得联系,谋求在这所大学里开展他们的事业。但是这些计划听上去有些混乱,而且他在各种信件和讨论中所说的这些计划部署也不尽相同。 296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并没有立即开始一起写作那部关于辩证法的书。霍克海默决定应该把哲学而不是舆论定为1941年第三期《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论题,因为哲学这个论题在当时的局势下更少一些风险,因此他和马尔库塞要为这一期撰写关于进步问题的哲学文章。霍克海默写信给阿多诺说:“我要搞清楚,本雅明论纲<sup>[81]</sup>提及的那些关键问题是否能在将来为我们所用,正如我现在看到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文章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进步及其与个体发展的关系,而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技术和实验心理学方面。”<sup>[82]</sup>马尔库塞当时主要研究思想史问题,他们之间的这种劳动分工已经成了惯例。但是在同马尔库塞讨论的过程中,霍克海默的兴趣转向了对理性原则和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因此,他接受了撰写讨论“理性”的文章的任务,而马尔库塞则承担了关于技术话题的研究任务。

他们两人在撰写各自的文章过程中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研究所让马尔库塞承受着经济压力,并同意他在别处找一份工作,这样可以使他在不向研究所提出经济要求的情况下为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的这

个策略看来是有效的。霍克海默希望马尔库塞能去纽约，而马尔库塞本人也特别希望去，这样就能得到麦克伊维尔的照应——麦克伊维尔对马尔库塞评价很高，还可促使关于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授课事宜的谈判获得圆满的结果。如果说马尔库塞的确有在大学里开展事业的机会，那也绝不是加利福尼亚这些很反动的大学里，而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是继诺伊曼之后最受尊敬的研究所研究员。尽管社会研究所从来没有打算过要真正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合作，而且即使对他们中最友好的人也十分冷淡，但是作为研究所成员的马尔库塞还是可以以个人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霍克海默从太平洋一帕里萨德写信给在纽约的马尔库塞、波洛克和洛文塔尔时，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特别表达了希望谈判早日成功的迫切希望，他说：

297

我们必须给 [哥伦比亚大学的] 这些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都是些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众所周知我们又相互影响，相互合作，例如在反犹主义问题上表现的那样。我们认为这个国家里的研究所更像是某种捐赠基金或基金会，而不是研究机构。一半是出于礼貌，一半是出于对我们自己利益的考虑，我们自己助长了这种误解，因此，我们现在务必要记住，即使各种谈判失败了，也应该去清除这种误解，以防止此类冲突在未来再度发生。<sup>[83]</sup>

哥伦比亚大学的事务在进行着。马尔库塞当时认为自己只是暂居纽约，而霍克海默给他的指令也摇摆不定，一会儿想让他返回西海岸，一会儿又想让他留在纽约。有时马尔库塞会在研究所的沙发上过夜，在这些时候他就设法零敲碎打地写作自己的文章。按照波洛克的要求，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推广部的系列讲座中承担了“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国家与个人”的讲座。马尔库塞打过头阵之后，古尔兰德讲了“国家社会主义管理下的私有财产”，诺伊曼讲了“德国的新兴统治阶级”，基希海默

讲了“国家社会主义中的法律和司法”，而波洛克的讲座则是“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吗？”

研究所原打算将这些讲演稿出版成书，作为它对战争工作的一份贡献，但未果。计划中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哲学”专号后来改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专号，其中除了霍克海默讨论理性的那篇文章和阿多诺论“维伯伦（Veblen）对文化的攻击”一文之外，还收入了马尔库塞、基希海默和波洛克三人讲座的修改稿。霍克海默写信给马尔库塞说：“让我的文章更具体地针对国家社会主义一点没有困难。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正好是被怀疑主义所净化的理性的胜利。”几天后，他又写道：

我的思路非常简单。理性表面上似乎被法西斯主义搞得信誉扫地。但这不对。法西斯主义仅仅扫除了那些与理性主义相关的形而上学范畴。理性总是一套自我保卫的机制，从最残酷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法西斯主义所依赖的基础。然而，在法西斯主义那里，理性主义的最终幻想表现为：终生有组织的自我与个人的完整统一。自我一直在萎缩。这种萎缩的趋势恰恰同剥夺中产阶级的过程完全一致。由此推断出的结论就是文化的衰落，德·萨德和尼采都曾经对此有过预言。既而则产生了通过恐怖行为以阻止这种衰落的草率想法，引发了对于从个体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到全体一致的种种变革前景的试验。<sup>[84]</sup>

马尔库塞最终于1942年1月返回洛杉矶。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院系里面开设课程并能为研究计划争取资金的各种期望看来彻底破灭了。美国的参战以及这个事件给大学生活带来的相应变化，使得外国人，甚至是入了美国国籍的外国人获得有保障的学院岗位的机会也更少了。当马尔库塞返回他那里时，霍克海默正忙于写作他那篇论理性的文章，忙于在一份一百多页的“混乱的、难以辨读的草稿”<sup>[85]</sup>的基础上完成一份三十多页的手稿。这项工作是霍克海默在阿多诺的紧密配合

298

下进行的。几个月前，阿多诺那份“新音乐哲学”的手稿使得霍克海默大为激动，霍克海默甚至写信给阿多诺这样说：“如果说我生平激动过的话，那就是在读你的这篇东西过程当中……这项研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了我们共同努力的基础。”<sup>[86]</sup>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他与阿多诺的合作十分紧密，因此霍克海默甚至打算以他们两人的名字来发表它。可是实际上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刊出的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只署着霍克海默的名字。<sup>[87]</sup>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发表以后，其更明晰的德文版又刊登在为本雅明所编的纪念专辑当中，<sup>[88]</sup>可是这个德文版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人将要写作的那本关于辩证法的书的简介。

马尔库塞的文章“现代技术的社会意义”还遵循着1930年代《社会研究学刊》上的主要文章所采用的那种久经考验的模式，接近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所特有的那种常见的空想无政府主义。他认为，个人理性在自由主义时代已经被“技术理性”所取代。“技术理性”也是基希海默和诺伊曼使用的一个词。自由主义时代是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和技术高度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体现在个体对于机器的适应方面，体现在效率和设备上。令马尔库塞震惊的不是技术的进步和合理化，而是“技术进步得以组织起来……的那种特殊方式”。<sup>[89]</sup>正是技术进步与统治阶级利益的结合危害技术进步本身。以民主方式控制的官僚科层制与私人控制的官僚科层制不同，前者将能够杜绝人们对技术的滥用，并表明机械化和标准化也可以成为一种手段，满足人们对物质必需品的需求。个体性的各种新形式将会成为可能——那将是一种“自然的”个体性。

相反，霍克海默论理性的文章似乎相当反传统，相当尖锐和激进，这篇文章对理性的自我毁灭以及对于自我超越的理性的残酷推进有其自身的看法。霍克海默本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对以前研究的某种总结，它同时还导向了一组新的原则性问题。<sup>[90]</sup>一开始，马尔库塞也参与了这些原则问题的提出。“阿多诺负责研究大众文化，马尔库塞负责研究语言，我则研究启蒙思想”，霍克海默1942年8月写信给基希海默时这样说。

“当然，这三个部分是密不可分的。”<sup>[91]</sup>

由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在延迟出版了那期论纳粹主义的专号之后要停刊，所以他们计划在一个年鉴上发表这些研究的第一批成果。美国的参战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只是促成这一决定的附带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霍克海默日益确信期刊目前的出版形式只是让步的产物，这与当初设想的宗旨完全相左。根据《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最后一期的公告所言，因为战争的持续，研究所将改出年鉴。这个计划被严格地执行了，霍克海默一再催促基希海默和诺伊曼要为他提出的主题——欺诈社会理论 (theracket theory of society) ——撰稿。这项计划的执行同时也受到了如下实际情况的阻碍：研究所的很多重要成员都接受了华盛顿的正式岗位，这就使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早早交出分配给他们写的文章。另外，他们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还有许多限制条件，这也妨碍了计划的执行。马尔库塞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撰写了最后一篇稿子之后，又写了论“操作性思维和社会统治”一文，计划在年鉴上刊出。这篇文章是后来出版的《单向度的人》的思想雏形，可是他没能写完这篇文章。最后出版年鉴的计划未能完成，这也意味着马尔库塞的名字绝不会出现在辩证法研究项目的合作者名单当中。

1942年秋，研究所的领导们为财政困境制定的策略已经很成功了，甚至马尔库塞本人也感觉到有必要从别的什么地方搞一点额外的收入。诺伊曼认为无论对自己来说，对研究所的其他成员来说，在华盛顿获得政府职务的希望很大。马尔库塞因为没有参与过战时服务的工作，所以有可能被征募入伍，对此他很担心，因此马尔库塞就去了华盛顿，希望在圣摩尼卡找到能够维生的工作，但在此同时，他还继续着与霍克海默的合作。可是一旦在纽约投入了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的工作，他就很难去东部了。当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大体上已经同意支持这项研究计划。

1942年11月10日，霍克海默在洛杉矶收到了马尔库塞的一封电报：“如果直到周三我的态度不发生变化的话，战争情报办公室就会提供一份在华盛顿的工作，薪金4600。”第二天，马尔库塞又寄出了一封

信，解释说，这个工作要求他必须去华盛顿，因为这个工作要求研究欧洲报纸的微缩胶卷、短波广播和领事汇报，若无政府的允许这些材料是无法得到的。他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些在报纸、电影和宣传中描述敌人的方法。

300

所有领导都同意了给我这个职务，尽管委任还要经过人事部门和联邦调查局（FBI）的日常程序，遗憾的是，毫无疑问委任还要接受审查……正如我告诉过你的那样，我不会接受这个职务。我想我能逃避这个委任，同时不会受到多大的伤害，也不会造成不良的印象（让别人认为我不想从事战时服务），我会说我要先在洛杉矶完成我的研究，这项研究也是战时服务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想让我尽快开始工作（甚至是在手续办完之前），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可是，波洛克劝他不要草率下决定：研究所的预算只够再维持两年或三年，而他的，也就是马尔库塞的未来是很危险的。<sup>[92]</sup>

甚至当马尔库塞写信的时候，霍克海默对电报的回复就已经很直接了。“你失算了，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委任的话，你很快也就没法子和我在这里一起工作了。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职位可以帮助你逃脱你所担心的那些事情。”<sup>[93]</sup> 研究所不良的财政状况使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推掉实际上可以接受的职务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这份职务还可以训练知识和能力，将来能为研究所所用。当然，如果马尔库塞决定不再在洛杉矶从事他的那项工作，或至少暂时中止那项工作，这也会使霍克海默失望。

哲学是一个慢活。可我认为我们是最合适的人，我们有着正确的传统，有经验，非常热爱我们的事业，这些都证明，在这段时间里为把这项事业坚持下去而冒的诸多巨大的实际风险是应当的。当我旅行归来，我有一种特别好的预感，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实

现理论上的推进，你在我旅行期间所做的事情又巩固了我的这种感觉。在这份新手稿中，我看到了那种我们共有的精神，我感觉到我们现在能够让我们最近几年的努力开花结果。

可是如果马尔库塞真的能得到一份可以接受的职业，而他也相信他能胜任这份职业所要求的一切的话，那么拒绝这份职业将是不负责任的。

你的参与，对我来说，其价值无法衡量，这种情况出现了，比我想像得要早。可是当你问我你是否可以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无论出于现实原因还是个人原因我都不能说不。即使你的工作将会在非常不愉快的环境中中断两到三个月，我又能说什么呢！<sup>[94]</sup>

马尔库塞还是选择了对生活保障的需要，但同时又强调自己对理论是 301  
有热情的，并表达了自己对研究所的兴趣，认为自己还能在未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人员为它工作，因此他在回信中说：

我知道，很不幸，所有“理性的”论点都在要求我接受华盛顿的职位。但是在我看来，你有些低估了我把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工作继续下去的热情……尽管我对你的一些观念不同意，可我无论如何从来都没有隐瞒过我的信念，我相信在今天再没有（比我们的努力）更接近真理的努力，没有别的什么地方（比研究所）更能鼓励人思考。在现在这种时候也许只能这样说，只能告诉你我不会忘记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出于对研究所财政状况的考虑，你说（我们的）这种关系将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结束，我在华盛顿的这个职位将能够让我在相对短时间的中断之后重新继续我们的共同工作，既然你这么说了，这种理性的论断也就让我“非理性”的愿望得到了安慰，我只是想继续我们的理论研究。<sup>[95]</sup>

于是，事情实际上就这么决定了。联邦调查局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马尔库塞成为了战争情报办公室下属的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师；稍后，他又调入诺伊曼已在那里供职的战略事务局。

马尔库塞没有诺伊曼自信，而且对霍克海默也要顺从得多，因此他与他的朋友相比，与研究所保持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研究所的领导人在马尔库塞那里寄寓了更多的希望，而对诺伊曼则不寄什么希望，诺伊曼只是个不再给研究所增加财政负担的人，只是个“感觉上仍是我们集体中的一员”<sup>[96]</sup>的人。

到了1943年，研究所全部成员中大概有六人以正式或兼职形式为政府工作，并通过这种方式明显地投入到了战争服务当中：诺伊曼是战略事务局中欧处代理主任、经济事务局顾问；马尔库塞是战略事务局的高级分析师；基希海默和古尔兰德也是战略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洛文塔尔是战争情报办公室的顾问；波洛克是司法部反托拉斯立法部门的顾问。剩下的也只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两位最重要的理论家了。

302 霍克海默数次答应洛文塔尔，说他可以迁到西海岸来，参与他们的理论工作；但是现在又必须先留在纽约。只有在参与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时候，洛文塔尔才获准在西海岸待上几周。除此之外，洛文塔尔还得在纽约坚守研究所余部的阵地。维持研究所纽约余部的运行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只要维持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只要证明研究所还正式存在着就行了（尽管它没有兑现自己之前的大部分承诺）。

## 辩证法研究项目的工作

“如果说我生平因为什么激动过的话，那就是在读你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搬入太平洋一帕里萨德的公寓后两个月，霍克海默写信给阿多诺这样说，当时他刚读了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sup>[97]</sup>当时一种幸福的感觉充满了霍克海默的全身。阿多诺借以感受音乐的那种顺从的力量，现在必须直接指向“社会本身”；他的那些理论范畴现在必须直面

现实。我们不能满足于对针对文化现象中的各种流行趋势而出现的反击音乐 (riposte music) 的批判性描述,还必须亲自发出这种反击。<sup>[98]</sup>阿多诺热情地予以响应:

在我看来,你的批评和我的反思似乎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即,我们是否真正能如我们所愿,把我们的关注焦点继续放在对于艺术的研究上,或者说,我们究竟最终应不应该开始谈论社会本身。当我写这篇讨论音乐的文章时,我也越来越强烈地产生这样一种感想——这些论述隐含着一种向艺术理论的告别,至少在写作的大部分时间内是这样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仅同意将关注重心转向这类社会问题,而且同意正是一种对艺术的认识使得这样一种“转变”成为必然。<sup>[99]</sup>

阿多诺的这篇文章似乎把他思考的所有重要的主题都集中了起来,可是这种看上去可行的方式却是以某种代价换来的——即,将音乐过程与社会过程直接等同了。“应该承认,在我看来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层面等同起来是没有说服力的”,霍克海默在对阿多诺这篇稿子的评论的批评部分这样说,“与我在阅读时感受到的一样,你在写作过程中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同一性哲学的危险,也就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危险。在我看,这种危险尚未得到彻底的克服。”<sup>[100]</sup>阿多诺将自己的主题都集中在一点,其目的是想以批判社会对自然的统治为背景,考察音乐的功能,特别是音乐与人类主体本性的密切相关性。在这一背景下,他还希望考察社会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关系同主体与自己内在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可是实际上,阿多诺所做的只不过是所有主题都一同塞入了一种对于勋伯格及其最亲密的学生们所创作的音乐的解释之中,并将这种解释看作惟一可公正评断音乐素材之当下现实可能性的解释。这实际上夸大了论题,将普遍包含在特殊之中。

阿多诺这篇文章集中讨论十二音阶音乐技法。他对这种技法的哲

303

学阐释结合了一种伴随西方文明发展线索的人类发展观念。这是一种浪漫—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我们可以这样来阐释这种观念：在起初，人类面对的是至高无上的强大的自然。在历史过程中，人类学会了如何变得比自然更强大，学会了怎样控制自然。这意味着，人类越来越不把自然视为某种由至高无上的、任性的和不可预知的力量所指导的事物，而越来越多地把自然视为某种遵从各类法则的东西，视为某种通过巧妙利用这些法则可以为人类所用的东西。人类似乎还处在对至高无上的自然的古老恐惧之下，他们还是把让自然屈服作为他们的最高目标。可是他们没有成功地摧毁自然那无上的权力；相反，自然在人类之中仍然保持着优势。自然虽然被人类废黜了，但即使在人类用尽心思击败了自然之后，人类也没有成功获得过对自然的无畏的尊重：尊重自然当中的某种东西，它潜在地促成了一种以人道方式来化解自身蛮横粗暴的手段。

这种观念与阿多诺对于音乐发展的看法——将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勋伯格看作音乐发展的转折点——只在有些方面是吻合的。这种联系的最接近之处就在阿多诺的乌托邦想法之中：

就像音乐的目标超越了意念的范围、意义和主体性的范围，音乐的起源也是如此。音乐的本源与姿态 (gesture) 的本性有关，尤其与流泪的天性有密切关联。它是一种释放的姿态。面部肌肉的紧张，这种既让表情随环境而变化又让它远离环境干扰的紧绷状态，得到了释放。音乐与眼泪打开了裂口，让被捕获的人类得到了释放……让自己泪流满面的人，或者说通过一种音乐方式让自己在各方面不再与自己相像的人，同时也让所有令自己情绪反常的事情，所有被控制在客观世界之墙背后的事物通过他而倒流回来。一个哭泣或歌唱的人，走入被异化的现实……一个人返回的姿态，而不是等待者的期待状态，可以描述所有音乐的表达，即使是在一个应该消失的世界中。<sup>[161]</sup>

这里，音乐代表了对自然统治的终结，因为音乐使精神与自然和解<sup>4</sup>。这种和解为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统一预铺了一条道路。

而在其他的一些段落中，这种联系只表现在表面上。在下面的情况中尤其如此：他将“物质（音乐中的素材）”等同于自然，并将作曲家基本上描述为社会劳动者整体中负责声音领域的构成成员，为社会控制外在自然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另外，从控制自然这一视角构想的人类历史被视为一个长时段的经济周期，而西方音乐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相对短暂的发展周期最终被覆盖在它之上。接着，文章就从传统与自由、惯例与自发性、客观秩序和主观姿态、祛神话化和理性等方面考察了这个封闭的周期。这样，阿多诺又重新拾起了他在早先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那个关于音乐的问题：现代作曲家是怎样获得各种明确的音乐形式的？这个问题只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的一个特例：当所有的传统标准和规范都开始崩溃的时候，人类将怎样获得明确的秩序？在这种上下文中，阿多诺认为“物质（音乐中的素材）”这个概念就是指“第二自然”——也就是早已发展成桎梏的传统。

阿多诺还精彩地描述了自贝多芬以来音乐表演在形式和功能方面发生的变化，在这种描述中，他试图既解释音乐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合理性，又试图对这种理性化提出批评。

在贝多芬那里，当然也是在勃拉姆斯那里，对母题和主题的统一性的开掘，是在主体动力与传统——“音调”——语言的一种平衡当中实现的。主体的组织迫使传统语言再次言说，并未着手去改变它作为语言的存在。语言的改变是伴随浪漫主义—瓦格纳主义这条线索完成的，付出的代价是音乐自身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丧失。这种变化已经消解了《浪漫曲》中母题和主题的统一性，而代之以主题音乐（leitmotiv）和标题音乐（programme music）。勋伯格本人第一个在新的、主观性的、被解放了的瓦格纳素材中发现了普遍统一和节约的各种原则。他的作品证明了这个事实，越是一以贯

之地追求由瓦格纳引入的音乐语言中的唯名论，这种语言就越容易任由理性控制。<sup>[102]</sup>

理性的控制意味着惯例的毁灭，也意味着可用于作曲的素材和主体性的解放；因此阿多诺欢迎理性的控制。但是这种理性控制也意味着对于一种主体性的肆无忌惮的统治，而这种主体性自认为相对于那些看上去根本无意义的素材，自己是自主的；因此他也批评这种理性的控制。

305 十二音阶技法是在音乐中的一整套支配自然的体系。它与资产阶级时代之初就浮现出来的一种渴望相一致：渴望着“领会”一切声音并让它们有序化，以人类的理性消解音乐的神秘本质……从两个方面对自然提供的素材作有意识的配置：一方面让人类在音乐中实现解放，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让自然屈服于人类的目标……然而，征服自然的专制性的要素（oppressive moment），自身会反过来转而反对主体的自主性和自由——而对于自然的统治正是以主体自主性和自由的名义才得以完成的。<sup>[103]</sup>

然而，那种渴望有一种音乐从惯例和传统中解放出来并通向有别于人类之境的乌托邦幻想，这个时候似乎已经变成了现实。“自由无调性”、“自由创作”、“有鉴别力的耳朵之自发性”<sup>[104]</sup>最初就得出了从惯例中提纯音乐的结论。“十二音阶音乐可能没有惟一的法则，这种音乐不是必然靠作曲家的经验、靠对音乐的自然素材的逐步阐明就能产生的。而这种经验的特征是那种防卫的特征”（《新音乐哲学》的出版本增加了“由于其主观的敏感性”这几个词）。

在音乐吸纳其他所有的音调之前，不应该重复单一的音调；如果一个音符不具备整体结构中的母题功能，它就不应该出现；如果和弦不能够证明自己在那一时刻的适用性，它就不能被采用。所有

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音调、音符和和弦）的真实性，全赖于它们与它们适合的具体音乐形式的不断碰撞。它们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做，而不是如何去操控这种事情。<sup>[105]</sup>

阿多诺通过这种上下文为“素材”一词赋予了新意。以前，这个词要么指自然、指对音调的盲目支配，要么指在传统限制中被发现的第二自然，或已经丧失资格的、自身无意义的素材。现在，它被用来指代“那不可掌握的东西”，“难以驯服的声音”。<sup>[106]</sup> 致力于那“正在浮现的音乐”的作曲家关注的正是这类声音。他自己潜心于这类声音，这类声音也听命于他。<sup>[107]</sup>

然而，“十二音阶技法的刚性装置 (apparatus)”正好针对“因调性衰退而出现的那些既自由又必然的东西”。<sup>[108]</sup> 阿多诺解释这种发展的时候说，“大多数作曲家完全被束缚住了”，以至于他们必然会禁止自己去享受那些无法被约束的事物带来的快乐；他们太软弱了，甚至不敢让自己参与任何被禁止的事物。<sup>[109]</sup> “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年音乐家——特别是在美国，这里根本缺乏十二音阶音乐的基本经验——准备用‘十二音阶体系’去创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发现了调性的替代物之时才会出现那样欢呼雀跃的场面，好像即使在美学上也不能容忍自由，以至于必须秘密地用一种新的顺从形式来替代这种自由似的。”<sup>[110]</sup> 阿多诺从心灵与自然之间那种不成熟的和谐——在无调性的音乐中形成——中提取出他的批评标准，但是他甚至没有试着从社会理论角度去解释这种和谐的形成和发展。他公开赞扬无调性音乐这个阶段所带来的真正的“进步”力量，认为将会从一个表现主义表达的阶段转入一个客观性的阶段。他为十二音阶技法辩护，认为它是一种“精细的训练，如果音乐不想成为偶然性之祸的牺牲品，就都得经受这种训练。”<sup>[111]</sup> 既然自由作曲似乎已经变成了现实，既然十二音阶技法已经被公开谴责为一种音乐支配自然的体系，一种逃避自由的症状，因此阿多诺将它解释为真正自由的作曲方式出现的前提条件，因为客观精神正是朝着它“向前进步”了。这是一种看待音乐进步的辩证观点，它引发

306

了一种猜疑：它给一个音乐流派的成长带上了辩证必然性的各种庄重仪式。

另一方面，阿多诺承认十二音阶作曲法是一种进步，但这迫使他要更确切地说清楚：在自由匮乏的社会条件下忠实于自由作曲法将意味着什么。他写道，就这类艺术作品而言，“它一会儿让人注目，一会儿让人易忘。它让步，但也变得更僵化。它保持自立，或者牺牲自己以智胜命运。”<sup>[112]</sup>正是从这些方面，他认为勋伯格的晚期作品既通过十二音阶技法达到了全盛阶段，同时又对抗十二音阶技法。“说它“通过十二音阶技法”，是因为只有通过它，音乐才能适合于冷酷无情地表现这种现实”（在《新音乐哲学》的发表文本中，此处有“在衰败之后”一语）。“说它‘对抗十二音阶技法’，是因为创造出这种技法的心灵还能充分地控制它自己直接穿越它自己的建筑、梁柱、螺母和螺栓，还能指挥它自己将自己全部点亮，好像他准备最终要完成全部技巧绝伦的杰作并让它在灭顶之灾中毁灭似的。”<sup>[113]</sup>可是，能让这个心灵依然可以控制它自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音乐感知的自发性把一切成规置之—旁，也抛弃了一切习得的东西，—任想像力去横冲直撞。这种遗忘的力量、这种憎恨艺术的野蛮阶段，使得音乐文化的协调功能因其反应的直观性而随时受到置疑。也正是这一点平衡着对技巧的娴熟操控，并为技巧保存着传统。<sup>[114]</sup>

307 因而，阿多诺认为，正是那种野蛮的因素命令精神（Geist）去控制自身以抗拒自身行动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这种对象化是与精神相疏离的。精神因此能够以钢铁般的武装面对严苛的社会，同时又能向自身内不可把握的自然敞开。实际上，每个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的：与不可把握的东西的联系，保护精神免于被刻板的对象化所制伏，同样，精神由于在那种僵化的社会中持存着自己的刚韧性，才忠于那些不可把握的东西。<sup>[115]</sup>

勋伯格认为艺术家在传统面前是遵从他自己本能的鉴赏家；托马斯·曼认为艺术乃是野蛮与知性主义相统一的结果；布洛赫和本雅明要求野蛮和陶醉的那种力量应该为“革命”服务。他们的这些看法在阿多诺的思想中均有回应。但是，阿多诺的观点可以说至少在两点上是成问题的。第一，他谈论某种不可把握的东西，但却没有澄清应该理解哪些方面——特别是在有可能澄清像“野蛮”和“自然”这些概念的时候。这两个概念作为同义词出现，既可以理解为肯定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否定的意义；否定的意义相对清晰一些，而肯定的意义依然比较晦涩。第二，如果说能使精神免于陷入疯狂自我美化的手段就是抓住其与那些不可把握的东西的联系，那么同时相信僵化的社会过程会带来有益的恶化效应（beneficial exacerbation）——本雅明的寓言哲学以同样的方式支持那种通过毁坏而产生的建设——就是成问题的。由于阿多诺这些令人深思的悖论反复诉诸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如“有理解力的耳朵”、<sup>[116]</sup>“专注的耳朵”、<sup>[117]</sup>“乐于尝试的耳朵”、<sup>[118]</sup>“批判的耳朵”、<sup>[119]</sup>“现代的耳朵”，<sup>[120]</sup>等等，因此，这些悖论最终似乎没有什么讨论结果。带着这些受过教化的自然形式，人类哭着、唱着进入异化世界的那种图景，不就是没有意义的感伤癖吗？

阿多诺所理解的现代音乐乃是支配自然的一种形式，又是逃避支配自然的异化形式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这种解释可以接受的话，那么紧接着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样一种解释能否产生一些可用于对各种支配自然的非音乐形式进行批判和矫正的思想方法？更确切地说：从主体——他（她）可以冲破藩篱、哭泣和歌唱——的精神而言，有没有可能完全免除对自然的支配或文明化的对待？支配自然的各种手段能够凭借人们在控制它们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野蛮的”、“自发的”因素而“熠熠生辉”吗？对多少已经被文明化了的自然的进行文明化的对待，在如下的情况——以无调性来类推，一般来说未被驯服的对象总是可以被控制，并意味着对象的本质和用处可以被接受——下有没有可能？在阿多诺的手稿中，为如下两种选择——僵化主体的孤独或实际上主体的自我分解——还留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对于音乐

308

领域还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在其他领域中，有没有对待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方式，有没有主体相互之间打交道的方式，而且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别于对待自然之非人因素的方式？

霍克海默正是在阿多诺文章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即阿多诺谈到让人自己流泪、并进入音乐的部分，看到了可以证明如下事实的强有力的证据——这个事实就是：尽管他与阿多诺分处两地，但他的思想体系与阿多诺的思想体系正在神秘地趋向一致。霍克海默将这个段落视为一个契机，可以让他往其中灌注有关反犹太主义的一些思想。他援引曾写给阿多诺的内兄埃贡·维辛（Egon Wis-sing）的一封信，说道：

在反犹太主义者（而不是从事实上）看来，犹太人对惟一神（One God）的可笑的信仰使得他们既笨拙又危险。对犹太人的屠杀之本质就是杀掉疯人。

当然，把一神教的感受视为一种小小的愚行，实际掩藏着对它的深层敬畏，或更确切地说，掩藏着一种对自身的错误或堕落行为的迷信式的恐惧。疯人不会像正常人那样容易被当今人们所遵从的那些目标和意图所蛊惑。这就使得他们成为了邪恶的目击者，他们必须被剪灭。如果见证人被杀掉，那么恶行就可以被消除。

在这里，痛苦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疯人似乎在远处，站在局外，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远离当下的限制。痛苦召唤我们回来进入当下（想想从睡梦中唤起人们的多种多样的方式！），并使人们做出防卫反应，并把逃离痛苦当作他们的一个目标，痛苦将他们与这个目标捆绑在一起。那种认为异教徒应当放弃他们信仰的观念，只是把对他们的折磨理性化了而已。在更深的意义上说，他们要变得与折磨他们的人相等同：也就是说，他们将通过自身的肉体亲身体实践目标的至高无上。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自由是不可能的。

对反犹主义所做的考察将我们引回神话学，并最终引向心理学。<sup>[121]</sup>

那些让自己进入哭泣状态和进入音乐的人，以及那些似乎站在远处的、作为局外人的疯人或犹太人，他们就是赦免的象征。阿多诺就曾经认为，犹太人被迫害就是因为他们是以以前快乐游牧生活的代表。这一点与霍克海默的思想很类似。在他们两人看来，犹太人代表了一种不能达到完全与社会系统同化的无能，而那种社会系统的典型特征则体现在极端的自我持存 (self-preservation) 和完全的目的理性 (purposive rationality) 上。犹太人代表了一种幸福生活，摆脱了生存竞争、劳作和目的性的牵累。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社会理论、“神学讨论”和关于反犹主义的理论，似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其中一位，那位深思的唯物主义者向另一位，那位支持含蓄使用神学范畴的捍卫者提出了警告，说在他精美的、有时甚至是庄严的风格中，他正表达一种与实证的、神学的事物相关的关系，而且没有以否定为中介。因此它还不是正确的表达。阿多诺通过他的理论克服了艺术中的心理主义，他认为艺术品而不是作者具有知识，但是这种克服却也是以“某种同一性哲学和乐观主义”换来的。“这直接导致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神学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工作都将取决于我们在这里寻求共同表述的能力。”<sup>[122]</sup>

在此之后不久，在纽约焦急等待前往西海岸的阿多诺又一次重申了他一年之前提出过的建议：

如果明确了围绕反犹主义来写……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将会是什么样呢？这将使它具体化并有明确的限定范围，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这个。这个题目还可能激发研究所成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去思考，但如果我们以个体这个范畴为判断依据写下了一些对于当前的批判，我最害怕的就是马尔库塞会进而证明个体范畴从资产阶级早期以来就包含着既进步又反动的因素。其次，反犹主义的确是当今主要的不公，我们的面相学观察形式 (form of physiogno-

my) 必须关注这个反犹太主义最丑恶嘴脸完全暴露的世界。最后,反犹太主义的问题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关于它所写的东西极易找到一种有效的上下文,而且不会因为这种上下文而丧失任何东西。即使不借助于任何幻想式的乐观主义,我也可以想见,这种著作将会以有助于我们的方式把握住外部世界。就我这方面来说,我会毫不犹豫地用几年时间投入这项研究。<sup>[123]</sup>

310 这个建议与霍克海默一拍即合。几个月前,霍克海默在写给拉斯基的信中,提到了一篇曾刊载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关于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的稿子:“正如我们只有通过研究我们的社会才能理解反犹太主义一样,在我看来,我们同样只有通过研究反犹太主义才能真正理解当今的社会。反犹太主义以少数人為例来证明多数人同样将会遇到的事情:人可以变为被管控的对象。”<sup>[124]</sup>

在阿多诺写这封信之前几天,德国政府颁布命令,规定凡六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佩戴大卫六角星标志,并且禁止了犹太公民移民。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在占领区,大屠杀开始了。人们可以在《当代犹太人档案》长长的“编年纪事”栏目中看到关于大屠杀的新闻。这个《档案》(Archive)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出版的。在美国的主要大报上也可以找到欧洲可怕事件的相关消息。“从欧洲生活中彻底铲除犹太人已经成为了德国的既定政策”,10月28日的《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它报道说,犹太人被装载在货车上,正在运往西部。国外权威人士通过大使和外交官们了解到一些驱逐犹太人的信息和其他一些迹象——希特勒1939年1月30日就预言过的要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行动计划正在真正付诸施行。可是美国严格的移民政策没有丝毫的松动。

纳粹反犹太主义通过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得到了持续的强化和恶化,而大多数人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并不相信有这些行动。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提出坚决的抗议,也没有提供大规模的援助。苏联则是例外,但它在希特勒对它发起进攻之前还是希特勒的盟友。由于受到这些

事实的影响，霍克海默的兴趣最终从革命缺席的理论转向了文明缺席的理论。

1941年11月，除了霍克海默之外，研究所其他所有的成员要么依旧留在纽约，要么已经返回那里，这个时候阿多诺的机会才终于到来了。他在启程之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顺便说一下，由于我生病，甚至研究所为我开的告别聚会我也没能参加。”他还提到给系里开的讲座和研究项目的支持经费问题：“如果这里现在真出什么问题，我们会心平气和地说：这正是你希望的那种方式。请原谅我的放肆和鲁莽。我真的无法抑制住自己的高兴。”稍后，在他信中第一次出现了在信中展现其丰富的想像力，并第一次写下了后来成为他们合写著作的标题的那个短语：“我刚读完格勒尔（Gorer）论萨德的那部书，我想到了许多事情，我想它们对我们是用得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涉及启蒙辩证法，或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sup>[125]</sup>

这段话也再次表明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到底是以谁为指路星的。这个指路星就是本雅明。本雅明一直拒绝从旧世界逃到没有文化和传统的新世界，尽管旧世界的文化已为野蛮所充斥。当他翻越比利牛斯山失败之时，本雅明便于1940年9月26日在西班牙边陲小镇布港镇（Port Bou）自杀了。几月前在布港镇穿过法国和西班牙边界的汉娜·阿伦特于1941年6月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手稿转交给了阿多诺。本雅明指定阿多诺为他的文献执行人。当阿多诺给霍克海默寄去复本的时候，他在附信中说，尽管本雅明本人曾在给格雷特尔<sup>[126]</sup>写的一封信中否决了出版此论纲的一切想法，可这个稿子还是应该发表出来：

本雅明最后的那些思想都包含在其中。他的死使得任何保留都没有必要了，尽管保留的原因是担心出版出来可能是不成熟的。从总体来看，它无疑具有广阔的考察范围。另外，在本雅明的所有著作当中，这一部与我们的意图最为接近。这首先涉及它将历史视为永恒灾难的那种观念，涉及对进步和掌控自然的批判，以及对文化之地位的批判。<sup>[127]</sup>

霍克海默对此毫无保留地表示了赞同。

你因我们得到了本雅明的历史论纲而高兴，我也是这样。这些论题能让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忙上一阵，他也会一直同我们在一起。顺便说一句……野蛮和文化的同一性是……我最后和他进行的那几次交谈的论题之一。我们在靠近加雷·蒙巴纳斯（Gare Montparnasse）的咖啡馆进行了那几次交谈……将阶级斗争视为普遍之压抑的观念，揭露历史编纂是对统治者的同情的观点，都是一些洞见。我们必须把这些洞见当成我们的理论公理。<sup>[128]</sup>

研究所为了表达对本雅明的敬意，打算出版一个油印本的小册子，其中收入《历史哲学论纲》和霍克海默、阿多诺及布莱希特的文章。可后来又最终决定不收布莱希特的文章。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霍克海默不打算将本雅明的论纲印在这个册子的前面部分，阿多诺和洛文塔尔也建议这么做。“我们不敢改动它的术语，可这种术语太没遮拦了。”这话大概既指论纲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也指论纲的理论术语。纪念文集于1942年出版，除了收入本雅明的论纲之外（这篇论纲的一部分曾见于他的《爱德华·福赫斯》一文），还包括阿多诺1939年到1940年之间所写的一篇讨论《格奥尔格和霍夫曼斯塔尔》的文章以及霍克海默的两篇文章：《权威主义国家》、《理性与自我持存》。<sup>[129]</sup>在介绍这些文章并署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人名字的导言中，有两句话事实起了误导的作用：“为了纪念瓦尔特·本雅明，我们献上这些文章。它们讨论的是历史哲学，并在本雅明后期的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霍克海默手里拿到这个纪念文集的人都认为《理性与自我持存》和《格奥尔格和霍夫曼斯塔尔》是本雅明写过的最出色的作品——这两篇都比《历史哲学论纲》要好。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一种证明，说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对进步和保守立场的批判中吸收了神学的基本原理，后者是解脱（release）、无效（uselessness）和自我放弃（self-abandon-

ment) 等范畴的理论支柱。

1941年11月底，阿多诺抵达了洛杉矶。他和夫人一起搬入租来的住所，这个住所离霍克海默的住所只有几分钟车程。这里足够辟出他的小型藏书室，也可以容纳下他华丽的三角钢琴。他为最后一期《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修订后的《维伯伦对文化的攻击》的全文。这篇文章和在前一期学刊上刊出过的《今日斯宾格勒》一文，探讨的都是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这个主题。斯宾格勒作为新野蛮主义的帮凶而声名狼藉，阿多诺试图剖析他作品中的野蛮因素，因为这正是针对文化的哲学母题。至于维伯伦，他是一个“持专家治国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像达伦道夫 [Dhrendorf] 所说的那样），他的思想一直是拿有闲阶级来同管理型专家作对比。在维伯伦那里，阿多诺尝试保护文化中那些未被阐明的因素——使之摆脱“毫无梦想可言的对现实的调节与适应”，<sup>[130]</sup>他在那些因素中看到了正在突围的自然力之必然性，看到了从目的王国解放出来的必然性。只需一个例子就可以充分地说明，阿多诺对维伯伦的文化批判的否定无非涉及如下事实：这种批判要求应该延迟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行动。维伯伦“注意到了城堡和火车站之间暂时的不同，但是没有发现这种不同后面的原理。火车站呈现出城堡的外表，而这种外貌就是它的真相。只有当科技世界成了被支配的直接仆从，它才能摆脱这种外表伪装。只有在法西斯主义之中，它才是它本身。”<sup>[131]</sup>但是，在社会理论领域，通过让野蛮因素服务于真正的文化进步，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与阿多诺对勋伯格音乐的看法很类似，但他对此并没有讨论。

由于阿多诺的所有批判都旨在提出“（上帝）内在性”（immanence）的证明，因此他的批判目标只能被称之为超验性（transcendence），简言之，就是解脱——进入超验领域，进入一个摆脱了意图的王国，进入新的、无限制的、开放的、非同一性的世界。“全部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就是“新鲜事物的可能性”，他在论斯宾格勒的那篇文章中这样说。<sup>[132]</sup>阿多诺在写给此文译者的信中，首次使用了非同一性这个概念，其目的是要澄清他的那个论断的含义，他说过，自由——绝对地看——

将成为生存本身的牺牲品。他建议附加上一句话：“自由的前提是某种非同一般性事物的存在。”在信中，他解释道：“非同一般性因素不仅仅只是自然，它还可以是人类。”<sup>[133]</sup>

313 阿多诺的文章最后总是以对救赎的前景的概览作结。有时候他把内在性关系的瓦解归因于这种关系本身的总体化，归因于这种关系自身的基础在由这种总体化所造成的非同一般性存在中的彻底毁灭。有时候他又认为这种关系的瓦解是由于无法实现其自身对于总体性的要求而产生的失败。在作这种概述的时候，思想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功能？这些思考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吗？这些思考只是一些哲学母题，它们缺乏与社会分析的任何联系，并因而仅仅成了思辨，难道这不是事实吗？阿多诺一推再推，很长时间没有在以大量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框架中对自己的思想——不仅涉及论音乐哲学的文章，而且涉及论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文章——进行充分检验。

霍克海默的情况也很类似。他那篇关于理性的文章是一些思想碎片的集合，其中有两个主题还是清晰可辨的。首先是社会学母题，评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所有中介日渐消失的趋势。其次是与历史哲学相关的母题，评述了思想通过排除理性来完善自身的趋势。

霍克海默对社会学母题的阐发，好多年来都是在“关于欺诈社会理论”（a racket theory of society）这个题目下进行的。欺诈的社会在这里是指极权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个体只能作为合作团体、团队的一部分才能生存；个体为了保全自己，“在所有的地方”都必须“埋头苦干，并作为团队的一分子同其他人一起工作，准备并能够去做任何事情”，时刻“保持警惕，做好准备，总是瞄准某些当前的实用目标”。<sup>[134]</sup>

而他对历史哲学相关母题的阐述，则是在理性由于工具化而自我毁灭这一理论标题下进行的。阿多诺斥之为对精神支配自然感到自命不凡的东西，霍克海默则称之为理性通过排除深思和道德来进行的自我完善。但这又是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霍克海默的设想呢？他设想有思想的、道德的理性正在把思想和道德推离它自身吗？为什么会这

样呢？显然，霍克海默在这里使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理性概念来开展他的工作。首先，把理性等同于思想——这相当于霍克海默后来在《理性之蚀》中所说的“客观理性”；其次，把理性又视为服务于自我持存的工具——“主观理性”，《理性之蚀》中也是这么命名。那么，工具理性与深思理性相互有冲突吗？工具理性把理性当中人文的和合理的那部分，即思想的、道德的理性当作“万物有灵论的残余”而扔掉了吗？但是，如果确实是那样，那怎么可以说理性自我毁灭呢？又怎么可以认为——像在《理性与自我持存》中所说的那样——自我已然超出了自我持存所能达到的限度之外，合理的文明（rational civilization）正因理性的完善而趋于死灭呢？

在阿多诺将无限性和非同一性作为自己的批判维度的地方，霍克海默提到了他的那些以超越既有现实为指向的思想，提到了超越利己主义和私利的那些思考，提到了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象征的那种爱，提到了在一个经济独立、有责任感、有思想的公民的想像和记忆之间所瞥见的那种景象。霍克海默批评过阿多诺论音乐哲学的文章有唯心主义的残余，但在他这里难道就没有残余的唯心主义在起作用吗？最后，我们不由得要问：他在社会学和历史哲学这两个领域中做出的观察描述，假设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霍克海默继续会提到的经济自主性与理性中发生的自我毁灭进程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些都是有待解答的问题，而霍克海默也是这么认为的。“在这篇新作中提到的大多数问题还有待于在那本书中去解决”，1942年2月他写信给洛文塔尔时这样说。三个月之后，他已经给准备性的研究提出更清晰的大纲：

第一章（当然，这现在还是严格保密的）将讨论启蒙这个哲学概念。在这里，启蒙就是指资产阶级思想，不仅如此，而且指一般的思想，因为最适合讨论的正是城市之中的思想。主要论题如下：  
启蒙与神话、启蒙与统治、启蒙与实践、启蒙的社会根源、启蒙与

神学、事实和体系、启蒙及其与人道主义和野蛮的关系。第二章将包括对实证科学与各种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这一章与你的研究是紧密相关的。一共可能五章，但是最后三章还非常不确定。<sup>[135]</sup>

从写于这一年中的《哲学家们无法完成的洛杉矶研究计划的分工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指导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有马尔库塞(他最初参与了辩证法研究计划的早期研究工作)的总路线是什么：

315 研究计划作为一个整体，主要涉及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在这里，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指意识，还指现阶段的人类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humanity)，因而也指一种人类学，即《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一文中所使用的那种人类学概念。研究尤其要关注实际的、“现实的”精神——实用主义对之做出了哲学的表述——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然而，这不是一个对理论进行检验的问题。启蒙和实用主义中的解放因素被证明无非是一些压迫因素。在对那些决定性的学术界和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当中，都应该向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发起进攻。这些分析要取得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对那些有关最新经济发展的具体洞见的判断。这项工作作为一个整体，其目标就是克服政治上的停滞。<sup>[136]</sup>

哲学家并没有期待他们东海岸的合作者能对当代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作出全方位的陈述。“相反，经济部分应该集中在与阶级理论相关的某些重要的特殊问题上。”比如说，他们所关心的特殊问题有：无产阶级在垄断—法西斯阶段有何变化？资本家阶级有何变化？而官僚科层是不是一个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探讨及非学术讨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垄断对大众文化是如何施行其控制的？

这份备忘录清楚地表明，霍克海默仍然坚持学科间合作的必要性；他一直认为经济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他的书”应该是探讨时代一般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是，“学科间合作”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

经济分析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部著作自称为“意识形态批判”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所有这些问题依然不很清楚。这里的表述方式公开表明了自身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的坚信，同时也提出了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出来的假象的批判，一种对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矛盾本质的揭示（presentation）。

根据他在就职报告中、在《社会研究学刊》和《权威与家庭研究》中简要描述的计划，霍克海默一直打算在一群各门科学学科领域训练有素、在哲学方面有相当高的素养的社会理论家中间建立起合作关系。这一直是他的梦想。1942年3月，就在他开始写这本书之前几周，他写信给费利克斯·韦尔：

实际上，弗利茨（波洛克）和你本人确实应该在下个月底来这里，这样好开始写作本书的经济和政治部分，那样一来，接下来的六个月我们就不再做任何别的事情了。绝不要因为弗利茨、格罗斯曼和古尔兰德不能达成一致，或因为自由讨论这类问题有这样的妨碍，就认为我们可以把那些关于经济重要性的问题和政治抵抗方式的问题搁在一边。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替我们来挑这个重担，因此，即使你们许多人时不时用缺乏天赋来为你们的放弃找理由，这个理由也是不体面的……我认为，将来弗利茨和你应该每年在这里度过四到五个月，在纽约花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来为理论研究计划工作。你在这里的时候，可以参与著作主要部分的确认和制定，而你在那里的时候，则可以细致地完成经济学部分，这样几年之后，我们的著作就可以完成了。就算我和泰迪合作，我也无法为著作赋予它必要的精确性和具体性。在它必需的地方应该添加历史的和经济学的细节，否则它看上去就只是思辨。<sup>[137]</sup>

316

这是一种对于学科间真正实现合作的构想，希望把经济学分析、政治分析和具体的、材料充实的理论全部纳入其中。对波洛克和韦尔来说，它一直都只是一种构想。他们都表示他们不适合这项工作。他们既

没有为《权威与家庭研究》撰写文章，也没有为1937年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的那期讨论经济的专刊撰写过文章。波洛克和韦尔的性格和生活带来的诸多难题，也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这种情形的希望。波洛克曾在太平洋一帕里萨德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于1942年10月返回了东海岸投身于“外围”的工作，为此霍克海默向他抱怨以前几年中他们的亲密合作是多么富有成果，而现在要是“我们不仔细讨论，不把它们整合进我现在正在详加阐发的理论”，<sup>[138]</sup>波洛克留下的两篇稿子的命运就很难说了。既想得到别人强有力的支持，又想保持“辉煌的孤独”，在这两极之间犹犹豫豫的霍克海默其实并不是特别反对波洛克的主张。波洛克打算不再待在洛杉矶，而想到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工作，并试图在外围对[研究所]做出贡献。波洛克一如既往地希望霍克海默不要分心，一心一意地完成他伟大的理论任务。波洛克回信时，这样说：

我担心，即使我们能在洛杉矶成功地确立物质基础，我也不能在那里长待下去。如果你不在纽约或华盛顿的话，你就失去了与所有权力中心的联系（可以说我们与这些中心的联系一直是不够的，是不稳固的），你就彻底地置身于孤独之中了。你要是不知道你在东海岸有了个好的看守者，我就不能肯定这会不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sup>[139]</sup>

317 当波洛克和其他人应邀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一道在白宫共进晚餐的时候，霍克海默实际上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波洛克将这件事汇报给他之后，他回信说：

我想告诉你，你引以为荣的这次被邀请对麦顿和我都是极大的安慰。你知道，我也没有高估这次聚餐所取得的成功，它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真诚地认为我们应该心存感激。这是一次了不起的经验，无论它的结果如何，你都有理由为此而骄傲。我曾不止一次地对你说过，如果我能得到

侧身于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会谈的机会的话，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你的被邀请多少让我的希望变成了现实。<sup>[140]</sup>

因为霍克海默一直致力于让理论家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形成一个专注于研究的小圈子，所以波洛克和韦尔的离去给他造成了更大的困难。一方面大概因为这个梦想无法实现所带来的苦楚，一方面因为他的想法时刻都在变化，他偶尔也赞成与他给韦尔所写的信中概述的那种路线相反的思路。

蒂里希详细分析了本不打算公开发表的《理性与自我持存》之后，建议霍克海默在以后的工作中完成一部“富有争议、材料翔实的书”。可霍克海默回信说，他不必通过他们的合作来完成。很明显，蒂里希在尽量友好地提出建议，一方面为读者考虑，让他们要受到更为“民主地”对待，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作者在公众中的未来命运。

但是，除非你采用新奇的论题，否则你本人也不能预料这种出版物是否能与同类文学争论相区别。但是这又是一些怎样的论文啊！我们的论文，就像成功出版物中那些最出色的主要篇章那样，至多也只是给五彩斑斓的烟火束（bouquet of rockets）增添了一层新的油彩罢了。我清楚地意识到了你绝对是一片好心。但是，难道只要不是汲汲于成功的思想就都得排除掉吗？

霍克海默引述了他以前所写的“关于欧洲形势的简要探讨”，以此来暗示他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

理论的风格将变得更为简洁。这仅仅是因为，这种风格将展示它的朴素性，有意识地使朴素性成为对野蛮化过程的反思。这种理论风格将借憎恨之力让自身融入诈骗者（racketeers）当中，并因而成为他们的对立面。这种理论风格的逻辑与他们的司法一样简约，与他们的谎言一样卑劣，与他们的代理人一样毫无顾忌——

318

而且，通过对野蛮的反驳，理论风格将变得明确、精确和严谨……当哲学略去了那个使人性损伤相对化的从属句（subordinate clause），它也就承认了恐怖的绝对性，绝对性正是恐怖的结果。欲望中最细微的差别对哲学也是宝贵的。但是由于缺乏对机制的细致描述，缺乏对灾难发生的原因、时间和方式之间的句法连接（syntactic links）的说明，所谓绝望之夜的说法——所有受害者在此时都完全相同——就会在哲学上变得更有雄辩力。科学固然可以向统计学求助；但是，就理解而言，一个集中营就够了。<sup>[141]</sup>

这段话勾画出了一种设想，那就是，霍克海默将遵循他所欣赏的资本主义时代的那些“忧郁”作家和“黑色”作家所采用的思路。这种设想也一直是霍克海默的一个梦想。但是，那样一来就不再需要学科间的合作，也无需完成那种需要大量材料来证明的关于时代一般趋势的理论了；还会导致面很窄的哲学工作和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之间的巨大分歧。霍克海默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实际上，他又想出了第三种工作方法，这种方法部分依赖专家协助，部分依赖哲学家自己——他们有时把自己培养成为专家。这种方法所要解决的两个论题是关于欺诈理论和反犹太主义问题。

这种欺诈理论是霍克海默以论文形式对“备忘录”里所提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在垄断—法西斯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有何种变化？旨在延续学刊而出版的年鉴，收入了基希海默、诺伊曼和古尔兰德等人关于欺诈理论的文章，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我们收集到的材料越具体”，霍克海默写信给马尔库塞说，“我们的理论视角就会越多地获得实在的品格。在新年之初，我们应该就这个主题写出一篇稿子。这是个生疏的主题，但是我有个感觉，这个计划的完成将是迈向提出一套批判理论的第一步，这种批判理论再不仅仅是哲学理论了。”<sup>[142]</sup>

阿多诺为阐发这种欺诈理论已经做了辛苦的准备性工作，他的工作被（霍克海默）视为是辩证法研究计划的政治—经济部分。他用一张

“欺诈范畴”表来从希腊文化史中收集材料，主要依据的是雅克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的《希腊文化史》。<sup>[143]</sup> 霍克海默前往纽约期间，阿多诺在他们以前讨论的基础上写出了《阶级理论的反思》。阿多诺坚持了霍克海默、波洛克和他本人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即政治支配经济的论点，他指出，“事实上并不是交换法则创造出了适合于现阶段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最新的权力形式”，

相反，旧的权力形式会不时地撤回到经济机器之中，企图在完全掌控经济机器之后彻底摧毁它，好让自己存在下去。在以这种方式废除阶级的过程中，阶级统治却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近代经济发展阶段的图景表明，历史就是垄断史。由当今这些有和平倾向的劳资双方领导人所造成的这些带有明显篡权色彩的图景，表明历史就是集团斗争的历史，就是帮派行径和欺诈的历史。<sup>[144]</sup>

霍克海默稍后与阿多诺合写了一篇“阶级关系社会学”，后者与阿多诺的那篇“反思”差不多。他还向基希海默、马尔库塞和诺伊曼等人征求过他们对于这篇文章的意见。例如，基希海默就提出了如下问题：工人阶级是否已被改造成了“实用总体”，生产过程是否已经成了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前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被视为混乱的、缺乏任何真正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合法化系统的统治体系。

基希海默是最后一个以接受华盛顿的正式工作这种方式替研究所从事战时服务的人。他也是惟一个在1943年就完成他的文章——“主权问题”——的人，在这篇文章里，他简要地提到了欺诈的概念，但却没能令人信服地论述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基希海默的这篇文章于1944年发表在《政治学学报》上。而霍克海默那部分工作的文章后来收入了《理性之蚀》。<sup>[145]</sup> 欺诈的理论一直只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构想的一个未完成的理论。这个理论中最重要的那些思想，后来被整合进了《启蒙辩证法》，诺伊曼、基希海默或其他同仁均没有通力合作，没有对其中依据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材料而提出的那些极其尖锐和广泛

的设想进行检验。同样，他们一直没有对大量证据所提出的论题进行过具体的处理。

320 最后，反犹太主义研究成了惟一被关注的有希望突破的研究点，围绕反犹太主义在辩证法研究计划框架下似乎可以实现学科间的合作。但是，在最初写作那本辩证法书的几个月，这个反犹太主义的研究重点还很不起眼；“备忘录”对此也只字未提。情况似乎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仍然在论题上很犹豫，或者说他们开始只是让它在整个工作中作为一个核心的隐蔽点来起作用。最后一些出人意料的考虑让这个点成了研究工作的中心论题。当美国犹太人协会同意为研究所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提供至少一年的财政支持的时候，1943年春霍克海默告诉感到吃惊的马尔库塞（他认为霍克海默参与这个计划是对他真正工作的不负责任的偏离，霍克海默真正的工作应该是从事那本哲学著作的写作）说：

实际上，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打算将我们花在哲学难题上的时间每天减少到一个到两个小时，可常常落空。但是你要记得，你和我一开始在这里定居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可以满足如下两项必要条件的论题：第一，使我们的思想可以面对更为广泛的关注面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抽象的形式；第二，为我们在更具体的材料中展开某些思想提供机会。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表达我们的理论思想，同时将我们塑造成对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有专攻的专家。你那时说民主是个好题目，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抛弃了这些可能性。但是，我也不希望离开这个题目的相关问题太远，这种强烈的意愿推动泰迪和我已经准备了大量的材料，甚至已经就德国沙文主义写了一部分备忘录，我认为这个备忘录都能出成一本书了。我现在想写的不是论德国的书，而是关于反犹太主义的书，为此我们不会仅用一半时间去写，而是要投入大部分时间。我不知道委员会是否会喜欢我们在洛杉矶完成的这部分工作。可我知道，我们的投入对完善我们共同的理论来说将不会是没有价值的。<sup>[146]</sup>

这说明将论题限定在反犹主义题目上是有外部激励的——和犹太人协会签订合同必将，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利于研究。首先，霍克海默似乎认为，辩证法研究计划和反犹主义研究计划是相互关联的两个不同的论题，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后者只是前者那种抽象理论的具体运用，或者这种关系类似于黑格尔逻辑学和黑格尔历史哲学、法哲学和美学之间的关系。这难道不是把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在程序上的区别，转变成了暗中让理论高高在上地思辨，并使之独立于适用于科学的经验主义吗？这不是否定了经验研究作为反思经验的思想维度的地位，并使之降格为图解理论的工具了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决意投身于反犹主义研究计划了，他们认为反犹主义研究项目应该与辩证法研究计划保持极大的相似性，他们好几次强调反犹主义问题应该在他们时代的理论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但是没有具体解答哲学研究和反犹主义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如何、哲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另外尚不清楚的是，他们对理论的热情，以及他们对专门科学学科领域研究的低评价，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他们本人的爱好和气质；而这些——特别是当外部影响强迫他们必须真正兼顾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的时候——是否会影响到他们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及其结果。

“备忘录”不仅表明辩证法研究工作将以学科间的合作为基础，而且表明刚开始制定的章节重点和实际写出来的完全不同。这项研究对启蒙和实用主义的解放特征与压迫特征给予了同等程度的阐述。1942年底，当书的第一章完成的时候，霍克海默却对马尔库塞这样说：

最近几天来我把每一分钟都投入到这几十页关于神话学和启蒙的稿子中，这篇稿子很可能在这周完成。恐怕这是我写过的最艰难的文章。此外，它读上去多少是消极的，我现在试图克服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像那些对实用主义的作用感到绝望的人们那样。可是我也不情愿简单地加上些积极的段落，用悦耳的音调说“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还不是那么坏”。第一章中完成的毫不妥协的分析，本身就是对理性思想（rational intelligence）的积极作用的一种更

有效的肯定，这比为了淡化对传统逻辑 [原文如此] 及其相关哲学的攻击所能做的任何辩护都更有效。<sup>[147]</sup>

322 神话问题的命运也是如此。霍克海默认为神话是与启蒙相对的一个概念，尽管在“备忘录”里对这个概念只字未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遗留的神话残余中的超验观念、神话中的乌托邦契机的超验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规定着深思理性的概念，规定着积极的启蒙理念这一概念。在一开始写论理性的论文的时候，霍克海默就给马尔库塞汇报说，“我们的思想先辈（就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长久地关注史前史，这并不是他们比我们笨。你也应该读一读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方面的有用之书。我们这里现在有巴霍芬、赖因纳赫（Reinach）和弗雷泽的书，也有罗德（Rohde）和列维—布留尔的书，而马林诺夫斯基的书和洛维（Lowie）的《文化人类学》则是我们所掌握的最新文献。但我们没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sup>[148]</sup> 在为写作此书作背景准备的过程中，霍克海默研究了一些与他本人研究及其相关概念有关的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文献。正如他在 1942 年 7 月 18 日写给诺伊曼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他的目标是将此类概念中至今还包含着的一种古代因素的超验性拿来与那些排除了“万物有灵论残余”的核心观念的“精华”来做对比，就像他曾在《理性的终结》中对事物所做的批判性考察那样。直到写作《理性之蚀》的时候，这些概念才被霍克海默赋予了优先地位。而在《启蒙辩证法》这部合作出版物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要关注的还只是确定的否定概念——一种否定形式，它指的是起解放作用的启蒙，而不是神话的延续。

第二章的主题是大众文化，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文化工业’这部分甚至比其他部分更为零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后来在《启蒙辩证法》的导言中特别这么强调。他们在 1944 年本书的油印本中说过一句话，后来在出版时又删去了：“很早以前就写过一些扩展的片断，它们还有待最后的编辑。在这些片断中，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大众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或者说大众文化的积极形式的发展，是

阿多诺和汉斯·艾斯勒 (Hanns Eisler) 合作完成的《电影作曲原理》这部著作的主题。任教于新社会研究学院的艾斯勒争取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来资助电影音乐的研究计划。)

这些情况都表明了一种开放性和未完成品格。它那显得忧郁的导言使得后来的读者很难想像这种未完成性——特别是因为 1947 年给这部书撰写的这篇导言删去了油印本的一大段, 在那个长段中, 他们曾描述过全部研究工作的复杂性。而“哲学断片”只是那些全部工作中的一些选段, 只不过他们是以“它们的内在关联性和语言统一性”为选择标准来选编出来的罢了。

霍克海默在一封写给蒂里希的信中, 对自己在集中撰写辩证法著作期间的每日工作活动做了描述。写这段话的时候, 马尔库塞尚在洛杉矶同他一道工作, 而波洛克和韦尔都还在那里间或会住上一段时间:

我的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早上我和波洛克一道散一会儿步。散步之后, 我开始为方法论研究工作做笔记并写草稿; 中午, 我常常去看泰迪, 同他商定最终成形的篇章。我也偶尔和马尔库塞一起就他所负责的那部分进行讨论。夜晚则是属于波洛克的, 有时候则属于韦尔。下午和晚上之间的那段时间有讨论会并处理研究所的实际事务。将近两个月以来, 我可以说我们是在写作真正的书稿……写了一些很好的预备性笔记, 但是它们的最终成形尚需几年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存在着客观的困难: 阐发辩证法哲学的任务非得有对近几十年的体验不可;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还缺乏常规性, 有太多东西要思考, 缺乏对要点的清晰把握, 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克服的。<sup>[149]</sup>

323

根据托马斯·曼的回忆, 霍克海默这里所描述的上层阶级的生活氛围颇切合他给他的工作自命的那种阶级品格。在一封给波洛克的信中, 霍克海默说:

我现在从事的研究正在把我们年轻时候梦想成为我们存在理由的事情变为现实，无疑，这项研究没有十年、二十年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不是在为写成一本书诺伊曼或其他人写的那样的书而劳碌，他们是在生存之需和竞争的压力下而写作，我并不想让我的书成为对当今立马有益的东西。胡塞尔花了十年时间写他的《逻辑研究》，又花了十三年时间写成了他的《纯粹现象学导论》[原文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更有名的哲学著作和相关的论题了。如果你考虑我有限的的能力、学养和任务，你就会理解我的境遇了。<sup>[150]</sup>

但有时候，也有事情让他感到烦恼，比如，尽管他努力工作了，可还没有东西能出版成书，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令人惊叹的东西可以展示。“尽管这些章节和稿件都准备好了 [原文如此]，对此主题不是很了解的人从这些文档中也根本看不到我这段时期做出的理论进步。想想利克斯 [即费利克斯·韦尔] 面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时会是什么反应吧，他肯定会非常失望。”<sup>[151]</sup>

但是第一章还是在1942年脱稿了。1942年夏末，就在霍克海默去纽约期间，阿多诺不仅写作了《阶级理论反思》，还准备好了关于大众文化的那一章的初稿。除此之外，他们两人还仔细润饰了霍克海默为第一章撰写的附录，即有关康德的启蒙概念给实践哲学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的那篇附录。阿多诺还完成了那篇对荷马《奥德赛》进行阐释的附录。<sup>\*\*</sup> 霍克海默在给波洛克的信中这样谈及此篇附录：

324 我们决定这个工作必须完成，因为《奥德赛》是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或者说，理性启蒙意义上的——人之人类学的第一份文献。我们从这项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对 [反犹太主义] 的研究计划也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奥德修斯试图克服的仪式献身 (ritual sacrifice) 观

---

\* 即第一章的附论二：“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中译者注

\*\* 即第一章的附论一：“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中译者注

念，可以在反犹主义心理学之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sup>[152]</sup>

最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准备好了论人类学那章的部分草稿之后，又忙于写作格言警句，这些格言可以作为思路范例被合并到此书后面的章节发表出来。这样看来，直到那时也只有反犹主义那一章的草稿还没有依据后来构成《启蒙辩证法》一书的那些材料写好。此外，从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把这一章当作辩证法研究成果首批出版物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只认为它是反犹主义研究项目的理论研究。

有时，霍克海默还想把大众文化那一章单独出版，他一直认为这一章可以独立成篇——他强烈要求出版他们合作研究的最初成果。他甚至想雇一个译者，这个译者可以给他提供指导，从而使他能够用英语开始写作。这只是另一个一直没能实现的计划，但它能说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多么地想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出人头地。对大众文化那一章的修订缓慢而艰难地进行。霍克海默的意图主要是想在年底出版一个油印的小册子，将这本书中的可用的一些研究成果都收进来。“所有这些篇章”，霍克海默1943年中期写信给波洛克说，“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文字材料，在我看来，这个整体能够让我们有可能得到一本名副其实的书。——我认为，这些片断包含了我们可以立足的、真正有原创性的哲学原理。”<sup>[153]</sup>

1943年中期以来，一边修订和编辑这些思想片断，一边也进行着反犹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而且有关后者的论题越来越占去更多的时间。洛文塔尔参与了后来作为《启蒙辩证法》前三章出版的那些论文的合作。1943年夏天，他在西海岸度过了几个月；这次短住可能让他下定决心在西海岸长期住下去，而这正是霍克海默一次又一次向他建议的。反犹主义的那些论题，最终在写作方式上与《启蒙辩证法》其他大部分章节的写作方式相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这部《启蒙辩证法》共同题献给了格雷特尔·阿多诺。

洛文塔尔曾经写信给霍克海默说，阿多诺的口头表达和书面创作所具有的那种强度和容量让他感到震撼。波洛克尽管继续在进行辩证

法项目的研究，但他作为阿多诺正式的助手也参与了反犹主义研究项目的策划工作，他告诉霍克海默说，所谓依照正常标准应做的全职工作，对于阿多诺的工作能力来说也只是小菜一碟。阿多诺非常能创作，而且他的妻子几乎以一个全职秘书的职责来帮助他开展辩证法和反犹主义的研究，这一切都使得霍克海默最后不得不在阿多诺几个月来不断提出的提薪要求方面做出让步。1944年初，阿多诺的工资提到了每月400美元。

1944年2月，一件事让霍克海默感到非常满意——他将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讲座了。讲座的名称是“社会与理性”。他打算以大众化的形式讲授他们合作研究的成果；《理性之蚀》正是在讲授这些讲座课程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本书后来出版于1947年。在授课开始之前，油印本中收入的所有材料也都准备停当了。因为当时没条件出版第一年的反犹主义研究成果，而且他们也希望继续扩充增补，所以有关反犹主义的研究文章也就被并入了辩证法的油印卷里，成了这本书中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反，有关辩证逻辑——霍克海默一直认为这一概念应该在他筹划的这本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探讨片断，却未收入那个油印本里。1944年5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终于在波洛克50岁生日那天将完成的文稿交给了他。在这一年底，一卷本的有纸板封面装订的胶版油印册子，作为社会研究所的出版物面世了。这个册子一共印了500本。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题：“哲学断片”（*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霍克海默自打开始从事这个册子的写作工作以来就打算为它出一个英译本。但是这个想法没有付诸实施。后来，加入了关于反犹主义的一篇定稿，并对许多地方的反资本主义词汇做了弱化处理。迁到美国来的阿姆斯特丹奎里多（Querido）出版社，将这本经过修订的《哲学断片》出成了一本正规的书，不过，题目换成了《启蒙辩证法》（这其实是油印本第一章的标题）。在1944年版的导言结尾处，他们说：“如果有幸可以不受令人苦恼的当下目标之压迫，继续可以就此类问题展开研究的话，我们就有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全部完成这一工作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后来从1947年版的导言中删去了这句话。甚至晚至他们返

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后，他们仍旧希望可以继续这项工作。他们在1946年10月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希望通过这些讨论来澄清如何拯救启蒙、如何发展正当的理性这个概念。但是这些讨论表明他们对这些问题已经感到非常困惑了。<sup>[154]</sup> 由于导言删去了前面提到的这段话，以及继续这项研究工作未果这一事实，使得实际出版的这本书与它原来最早打算出成的样子完全不同：它成了一个完整的片断，提供了一份记录，只是零零星星地反映了它的作者必须出的东西。在为油印本打的广告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说，它是由“进行之中的”哲学“工作”的断片组成的，该书的完成尚需几年时间。他们也强调了他们所呈现的东西的独立品格：在解释他们思想的过程中，他们采用了蒙田和尼采这一传统的散文文风，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与他们从事的“探索迄今尚未被勘查过的思想领域”的研究工作是相宜的。

###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如果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作为理论家的发展这一角度来看，阿多诺开始撰写这本关于辩证法的书，显然代表了他在理论探索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开始撰写有关唯心主义、内在性、自我满足的智性 (self-satisfied intellect) 和专横的主体性的史前史，这与本雅明撰写19世纪史前史的计划恰成对照。阿多诺的计划涉及对神话与现代主义、自然与历史、旧事物与新事物、不变性与差异、衰退与复兴等因素的布局进行考察，并试图证明，他在“瓦格纳片论”（《社会研究学刊》，1937）和“新音乐哲学”（1940—1941）<sup>[155]</sup> 这两篇论音乐进步辩证法的专题文章中体现的那些思想，都与社会理论和历史哲学相关。至于霍克海默，他则想把自己对于实证主义和资产阶级人类学的批判置于更广阔的语境当中，继续探讨他对于宗教问题中压抑的批判以及他对于本雅明有关残酷进步的批判的接受所包含的深层意义。霍克海默一直不断地强调，非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正确地承认了理性主义的破产，

但是却从这一点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能否搞出一个规划——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超越来发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于如何能更清晰地勾画出一些更贴近当下历史事件的正确结论。

327 “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两位作者在前言中这样描述他们合作研究的目标。<sup>[156]</sup> 他们两人都是 [某种意义上的] 启蒙的热情支持者。霍克海默支持揭露社会伪善和社会不公的法国启蒙，而阿多诺也一直支持对本能之物、低贱之物、难以名状的、意识把握不了的事物等等这一切加以澄清并进行解释的思想。他们都支持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社会—经济前提的分析。晚至 1941 年才在《社会学和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大纲这样说：“作为抽象思维结果的那种思维水平是真正人性意义上的世界发展的前提，因为那种思维类型将摆脱各种人际关系及其禁忌，并将它们带入了理性王国。因而犹太人一直站在为民主与自由而战斗的最前沿。”<sup>[157]</sup> “启蒙辩证法”这个提法表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想将婴儿连同洗去血污的水一同倒掉，也表明他们只想揭示启蒙思想的含混之处。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的一段话似乎变成了他们的研究动机：“我们现在对正在经历的事情‘还’会在 20 世纪发生感到惊诧，这种惊诧并不是哲学性的。因为，它不是知识的开端，它还没有认识到它由以产生的历史观本身是站不住脚的。”<sup>[158]</sup>

《启蒙辩证法》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sup>[159]</sup> 中对启蒙解放作用的批判进行了概括，并以此为背景在其核心部分安排了两个奇特地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论题。但是，书中并没有提及以论述这两个论题而著称的代表性人物，既没有提到专论现代理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没有提到对现代支配自然进行哲学批判的路德维希·克拉格斯 (Ludwig Klages)。<sup>[160]</sup> 其中第一个论题认为西方文明就是理性化的进程，韦伯用“祛魅”这个概念已经把这种理性化进程的双重性——既是对神秘符咒的破除又是从咒语中的逃脱——说得很清楚了。第二个论题则把每个发展阶段的世界状态同人与自然之间或和谐、或敌对的关系对应起来。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相信，他们可以将这两个论题相互关联起来，更好地解释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比沿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要更为有效。本书末尾所附“笔记与札记”里有一篇“论历史哲学批判”，以故事的形式极其简洁明快地提出了他们的问题观念的核心之所在：“对世界历史做出的哲学解释，必须说明理性对于自然的支配是如何克服了所有的偏差和障碍而逐步取得成功的，是如何把人类所有特征统合为一体的。各种经济形式、法则和文化形式也都会源自这一立场。”<sup>[161]</sup>

第一章“启蒙的概念”以震撼的方式提出了第一个中心论题，其中又包含了第二个论题：“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确立自身的独立自主权（sovereignty）。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这一论断在说，这样的启蒙导致了灾难。依照本雅明—阿多诺的传统，这两位作者认为灾难就是神话统治的同义词。“启蒙转变成了神话”<sup>[162]</sup>因而也成为他们论题的另一种表达。但是他们同样想表明，神话一直就是启蒙。这个论题的关键点在于，在那种情况下，启蒙没有从外部摧毁神话；毋宁说，神话早已是不成功地摆脱自然的第一步，并因而早已为启蒙的自我毁灭铺平了道路。

328

也许可以这样完整地表述这个论题：迄今为止的所有文明都是由这样一种启蒙构成的，这种启蒙困陷于神话的内在性（immanence），并把一切试图逃离神话内在性的努力都扼杀在萌芽状态。

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程中，每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都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就仅仅是一种信仰，最终，精神概念、真理观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原则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看作是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这种原则一旦被形式逻辑的严密性所限定，那么它就不仅控制着西方哲学的所有理性主义体系，而且也支配着体系的结果：这些

体系肇始于众神的等级制度，并在偶像的黄昏中把对不公正的愤慨当作同一性内容而传承下来。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sup>[163]</sup>

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这个不可抗拒的思想运动的概念所作的世界历史的解释，而黑格尔曾经用 18 世纪的启蒙来说明这个概念。他们还明确地提到了他们时代的政治难题，认为“启蒙是极权主义的”。他们对那种体现这种不可遏制的运动之特征的权力做了如下定义：“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sup>[164]</sup>然而，在第一章中他们还不能断言他们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勾画论题大纲的范围。因而，接下来的章节就要为论题大纲提供证据。

329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让他们的论题合理化，试图合理地论证神话一直就是启蒙、启蒙的每一次进步都更深地陷入了神话这类主题，但是他们却不是通过对某些“专业原理”（specialist axioms）的批判和扩展（他们在此书“前言”中认为这样的探索已经陷入死胡同），也不是通过对西方历史或人类整体的事实材料进行解释来进行的。相反，他们根据自己的标准选取几部主要的文学作品进行考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他们所持的标准是促成文明进程的关键构成要素。这种根据艺术作品对于历史哲学的意义来对其进行阐释的程式——这也是卢卡奇在《小说理论》<sup>[165]</sup>中所使用的方法——在这里被用来确定如下的历史行进方式：人们对待他们自身的天性、对待外在的自然、对待身体和对待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在这种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改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关注的作品都与堕落有关：《奥德赛》中神话的破碎，以及萨德的《朱莉埃特的故事》和《朱斯蒂娜》中宗教、形而上学和道德的退化。

第一个附论，“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按照前言的说法，意在为神话一直就是启蒙这个论题提供说明；但是这个说法和实际情况并

不相符。实际上，整篇附论都是在揭示启蒙——甚至从其早期阶段开始——一直在向神话还原。除此而外几乎不可能再有对《奥德赛》的别的解释了。《奥德赛》的作者让他笔下的人物深信神话，但他本人却一直同这些神话保持着一种反讽的关系、一种启蒙了的关系，而且他笔下的中心人物也趋向于类似的关系。霍克海默称，《奥德赛》为现代意义上作为理性启蒙存在的人的人类学提供了第一个证据；而阿多诺则以自己的独创性试图揭示这个已被多次阐释过的文本中的某些新方面，在他揭示启蒙的实现要付出代价之时，这种独创性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奥德修斯通过自我施予的困苦、无所顾及的献身和自我锤炼，只想确立自我以抗拒神话的权力。

狡诈者的代价就是梦想的破灭，因此，狡诈者必须像外部力量一样，祛除掉自己的神秘，才能使自己苟且存活下来。实际上，奥德修斯从未占有一切；他总是要等待和忍耐，总是要不断地放弃。他从来没有尝到过莲子的滋味，也没有吃过太阳神许珀里翁(Hyperion)的牛，甚至在他穿越海峡的时候，还必须得计算被斯库拉从战船上掠走的船员数目。奥德修斯披荆斩棘，奋勇直前；战斗就是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他的伙伴所获得的荣誉只能证明，他们只有通过贬低和祛除他们对完整而普遍的幸福追求，才能够最终赢得英雄的头衔。<sup>[166]</sup>

他献出了自身活生生的生命要素，为的是将自己拯救成坚毅的自我。神秘的权力已经被他机智地战胜了；但牺牲品最终以不同的形式被献祭给了同一性的自我——它们被内化为一种放弃。

阿多诺运用牺牲理论试图表明神话一直就是启蒙，他的这种思路遵循的是卡尔·克伦尼(Karl Kerényi)和C.G.荣格所开创的一种阐释方法：

一旦所有人的牺牲被有条不紊地付诸实行，那么所有这些牺

牲所造就出来的神就会受到欺骗：它们让神服从于人类的首要目的，并以此瓦解了神的权力，而且他们对神的欺骗同时也会很顺利地转变成为那些根本没有信仰的神甫对信仰者的欺骗……在奥德修斯那里，只有牺牲中的欺骗因素——也许还包括神话虚构中完美无瑕的理性——才能被提升为自我意识。这样的发现，必定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经验：通过牺牲这种方式与神祇之间的象征性交往是很不实际的事情。尽管通行的非理性主义很时兴，但它极力宣扬的祭祀的表现作用，是与人的牺牲的神圣作用分不开的：即通过将生命中注定的牺牲者奉为神圣，像祭祀那样把死亡合理化，从而进行欺诈。这样的诈骗活动，将脆弱的个体提升起来，使他获得一种作为神圣实在的载体所享有的地位，因此，这种诈骗活动通常在自我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就是说，自我往往把其自身的实存归结为此时此刻通向未来的牺牲。<sup>[167]</sup>

阿多诺这样一来既不承认牺牲者具有任何真正的超越性，也不承认神话具有什么真正的超越性。在有限世界中履行的仪式为牺牲者确定了有限存在中到处都是牺牲这一事实，而且对这样的世界不加置疑，也不加谴责，更不要求摆脱牺牲的一个新世界。

根据导言的说法，附论二“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的主旨是以康德、萨德和尼采为例去解释启蒙向神话的倒退，而正是这些人物坚持不懈地完成了法律和道德领域的启蒙进程。说启蒙向神话倒退让人产生迷惑，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直在证明：祛神话化的进程自神话时代以来，或者说实际上自前神话时期以来就存在着。启蒙向神话的倒退过程，不是返回到旧有的顺从自然的神话形式，而是指向一种非神话的顺从自然的方式，指向一种非神话的神话态度。

但是一切早期的社会变迁，从前泛神论到巫术，从母系文化到父系文化，从奴隶主的多神论到天主教的等级制，都用新的启蒙神话代替了旧的神话，用群神代替了母祖，用对耶稣的崇拜代替了对

图腾的崇拜，在启蒙理性的照耀下，所有声称为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客观信仰形式，都被作为神话而遭到摒弃。<sup>[168]</sup>

霍克海默之所以赞赏萨德和尼采，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掩盖这一事实：在他们看来，根本无法用理性创造出一种单一的基本理据去反对谋杀；他们没有遮遮掩掩，相反，他们却公开宣布了这一事实。神话牺牲者和仪式化谋杀被新出现的邪恶的、理性化了的、冷漠的谋杀所取代；神话快感和仪式化的向自然献身被新出现的闲暇、假日和娱乐之类乏味的、理性化了的快感所取代。“朱斯蒂娜和朱莉埃特的那些长期被提及的丑闻奇事 (*Chronique scandaleuse*)，连同它的生产线式的叙述方式，以及它颇具预见性的带有 19 世纪恐怖小说 (*shockers*) 和 20 世纪大众文学特征的 18 世纪写作风格，成了最后一部被剥去神话面纱的荷马史诗般的作品：思想史变成了统治的工具。”<sup>[169]</sup>

但是，这只是表述所采用的思路中的一种。第一章中的关键点就是启蒙的自我毁灭性。如果一切启蒙从一开始就是顺从自然的、如果“历史进步的循环本质”<sup>[170]</sup> 这一表述是认真提出来的，那么启蒙的自我毁灭又意指什么呢？谈论“启蒙的自我毁灭性”，不就是预设了如下的前提吗？这前提就是：最初有真正的进步，它已经超越了对自然的屈从，但随后却因各种原因——比如说，由于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死抱住那些不再进步的方面——迷失了方向。历史不就是被视作是一场赌光了一切机会的、一直持续的豪赌吗？不就是不断地失去机会的过程吗？就这种情况而言，除了显在的历史之外，一定还存在着一种地下历史，其可能性一直被压抑和排除的历史。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被理解为类似于通过交换而实现的价值增长，尽管整个历史的意义还将取决于这样的交换能否在某一日真正兑现。

这两种思想都可以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看得到。在他们看来，“理性概念中”存在着“秘密的乌托邦”。用不可抗拒的祛神话化进程观念无法说清的那些历史状况，可以用下面这种表述来解释：在那些历史情况下，在显在的历史内部得以展现的启蒙的反权威主义倾向，仍可以

与“理性概念中的乌托邦”保持联系，“尽管 [这种联系] 只能以地下方式”<sup>[171]</sup> 进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犹太教、在自由主义、也在他们本人那里看到了真正的，即，自我克制 (self-possessed) 的启蒙形式。但是，如何解释这些形式的来源呢？就算有充足的历史—物质条件可以让启蒙形式与理性概念之内的秘密乌托邦保持着的联系——这种联系通常受压制，而且这种联系可以暂时塑造显在的历史（例如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家庭所代表的那种情况），但问题仍然存在：秘密的乌托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它还能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构想的不可抗拒的祛神话化进程中得以保存？

《启蒙辩证法》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一封信中，霍克海默似乎透露过一个简单的答案，这封信写于他为计划出书而对那些片断进行修订和编辑期间。当时波洛克在纽约曾与保罗·蒂里希和阿道夫·洛维 (Adolph Löwe) 就朱利安·本达 (Julien Benda) 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进行讨论，这封信就是给波洛克记录的讨论备忘录的一个答复。他在信中说：“我们不得不理解这种发展 [即不可阻挡的启蒙进程]，但是，我们心里只有存在某种不屈从于这种发展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它。这种态度体现在你的每一个讨论记录当中，尤其当你处于某种绝望的守势，而无言应对其他两位对话者的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sup>[172]</sup> 阿多诺就霍克海默在纽约的系列讲座“社会与理性”（这是《理性之蚀》的底本）向洛文塔尔提供修订和编辑意见时，他发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个为时过早的阶段是无法忽视的：

本书，特别是第一章，依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启蒙的描述，把理性的形式化和工具化过程描述为一个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过程。但是，在做了这样的描述之后，本书的内容仅仅是对这种理性形式的批判。批判的观点和被批判观点之间的关系未在理论上得到澄清。在首先确定了主观理性必然会发生之后，我们似乎又经常在某种程度上“武断地”公开承认客观理性。实际上，有

两点必须要搞得特别清楚：第一，不存在绝对的“解决办法”，想提供一种与主观理性完全对立的哲学是不可能的；第二，对主观理性的批判只有在辩证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也就是，只能通过揭示主观理性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并通过它自身限定的否定来超越它。我在这里只是泛泛而谈，但是这本书如果不想成为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那就至少必须得给它具体设计一个范型。一般地说，最后一章必须明确地回答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即使只让这些问题的不可回答性变得更加明确也是一种解答。否则，两种哲学立场——一方是不可抗拒的、专横的主观理性，另一方是与其相对的真理——就会相互直接对立，形成一种非常令人不满意的理论风格。<sup>[173]</sup>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似乎并没有为这个难题找到解决办法，而且不知为什么又一次忘了这个问题。他们只能把这个问题往后推，所以说这本书作为第一部发表的研究成果的片断，在一个明确的启蒙概念做准备。<sup>[174]</sup>另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没有从术语上对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进行区分，而是含糊地使用了启蒙这个概念——启蒙概念有时候是在否定意义上被使用，有时又在肯定意义上被使用，有时在主观理性意义上被使用，有时又在客观理性意义上被使用。

本书中包含着两种启蒙概念。就第一种概念而言，这种启蒙的目标一直要确立人类的统治权；这种启蒙形式现在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彻底启蒙的世界已经笼罩在了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另一种概念意义下的启蒙，其目标是弱化统治权的要求，启蒙世界是通过消解权力来实现的。这两种启蒙概念似乎被强硬地塞进了《启蒙辩证法》，给人造成的第一个印象是，启蒙无法自救，只能自我毁灭。再读之后，人们却可以在这背后发现一个主张——但却是未被肯定表达的主张——错误的启蒙阻止真正的启蒙的胜利，而只有真正的启蒙才能消除错误启蒙造成的种种致命后果。那个油印本的内容说明上说：“本书的总目标

可表述为：通过揭示理性主义固有的有害含义、通过展现某些以前专门针对启蒙的人文主义理想的批判性因素能够被有效地合并到这些理念当中，来捍卫理性主义”；本书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赞扬萨德：萨德并没有把暴露启蒙本质的恐怖这个任务留给启蒙的反对者去做，而是让他的著作成了“拯救启蒙的马刺”。<sup>[175]</sup>但这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希望，还无法让人相信错误的、失败的、已被证实有盲目性的启蒙将会自我恢复；它仅仅表明了真正的启蒙对错误的启蒙的一种洞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想维护一种道德观念，认为正是启蒙本身导致了这些灾难，但他们同时也没有放弃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是有某种别的力量，即支配性力量已经使真正的启蒙偏离了它的轨道，或者正在阻碍着启蒙的道路。他们想谴责给启蒙带来的灾难，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把灾难归咎于一种资产阶级才具有的、支配自然的启蒙形式。他们想通过说启蒙归根到底就是支配性的来解释那种灾难，但是他们实际上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说启蒙陷入了支配之中、或与支配相勾连来解释那种灾难。在经过这样的解译之后，“启蒙的自我毁灭”这一表述作为一种道德立场就很容易引起歧义。他们所说的灾难毋宁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启蒙还都不是真正的启蒙，而只是自命为真正的启蒙罢了。

334 为了更详细地来谈这些问题，就必须分析本书的另一个关键主题。第一个主题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这个主题所赋予的。这个主题就是启蒙或者说启蒙的那些典型代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油印本的内容说明说：“作者的基本目标是批判地分析当今这个大规模工业联合、垄断控制、技术进步和标准化的时代的文明。他们要在人类得以确立对自然的支配的历史和进程中寻找现代文化显在的危机的起源。他们研究的两个焦点就是神话和理性主义。”这段话里隐含着一个大胆的断言：他们能够证明，当代文化危机是到那时为止的一切人类文化的基本原则的危机，而这种基本原则就是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这种论断背后就藏着一个主题，即人类文化史上起决定性的事件并不是现代的发展，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人类向支配自然的跃迁。这个转折点使得那些伪装当代文化之古老遗产的特征得以发展。这种遗产的不

间断发展已经在当代文化中十分危险地暴露了出来，而且表明寻求新的转折点已经十分必要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没有对他们的文化理念的普遍有效性进行质疑，也没有考虑到西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或西方的理性化和东方的冥思体验之间的区别等问题。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确实认为，人性的拯救只能沿着“思想史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这条道路，只能沿着“从荷马到现代”的“统治精神”<sup>[176]</sup>这条道路来实现，其他任何途径均不可能。

我们也许可以试着（参考他们写作于同一时期的许多作品）对《启蒙辩证法》中支配自然这一论题做如下连贯完整的重述。

原始社会是纯粹的自然。甚至人类，就他们当时的存在而言，也是自然的，在自然的掌控之中，为他们所无法理解的本能所控制。当人类开始思想的时候，他们也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思想意味着在某一点上打断自然的当下结构，并建起一座大坝将其阻断，从此就将内部自然从外部自然中区分了出来。

在人开始从原始世界中浮现出来的那个阶段，自然似乎还是一种幸福，其吸引力远远大于新的个性化的幸福。只有通过使用巨大的对抗力量才能避开原始世界的潜流回潮。这些对抗力量的源泉就是思想。思想试图通过削弱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这两个方面在自然面前确立自己的位置。它将内部自然限制在当下愿望达成的范围内，完全否认许多欲望，贬低内部自然本身，以此来削弱内部自然；它使外部自然祛神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开始消解那种认为自然中除了蕴含着恐怖还蕴含着难以穷尽的幸福的理念——这种思想与人类从原始世界浮现出来同时产生，以此来削弱外部自然。

335

这样就开启了一个拒斥自然、毁伤自然的进程，走向了幸福的许诺和自然至高无上的反面。它不仅拒斥和毁伤了人类内部自然的虔诚体验能力，而且拒斥和毁伤了外部自然的各种诱惑力；不仅拒斥或毁伤了人类内部自然的恐惧感，也拒斥和毁伤了外部自然的恐怖感。对欲望和恐惧的这种消解旨在使人能够以一贯的镇静去为了生存而榨取自然，

遵令而行的劳动有着严格的呼应关系，而对自然进行的社会控制为二者奠定了必然的强制性基础。<sup>[178]</sup>

337 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不增加恐怖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的幸福？阿多诺赞扬了霍克海默《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sup>[179]</sup>中提到的“萨德主义的拯救”。在《启蒙辩证法》中，我们也能发现种种例证，证明他们对本能的升华有一种隐含的吁求。希望以人性方式回想自然的思想作为一种预期的解决办法，多次出现在《启蒙辩证法》的许多地方，它同时也指向了这个解决方向。在谴责支配自然的精神中提出的完整的、朴然未分的幸福的图景，难道不比在对升华了的幸福的满足中出现那种幸福的图景更鲜活吗？挣脱了枷锁并能够自我持存的这样一种自我观念，难道只不过是对于那些难以想像的、将可以构想的东西抛诸脑后的事物的追求吗？

书中还有一个看似有道理的观念，即认为启蒙是反对一切从原始世界遗存下来的东西以及与之相关的幸福观念和无纪律观念的进步性斗争。正是这个思想把第一章与两篇附论、后两章的讨论以及随后的“笔记与札记”连接成了一体。与两篇附论相同，文本的其余部分也讨论对人的自身自然的支配，只是零散地、非常抽象地讨论到对于外部自然的支配，以及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同人与内部自然的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

对于文化工业的讨论可以归结出如下的教益：

整个文化工业所作出的承诺就是要逃出日常的苦役，就像在卡通片里，黑暗中父亲拿着梯子去解救遭绑架的女儿一样。然而，文化工业的天堂也同样是一种苦役。逃避和私奔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最后总归得回来。快乐本该帮助人们忘记屈从，然而他却使人们变得更加服服帖帖了。<sup>[180]</sup>

文化工业甚至使得从受现实的自我否定原则支配的世界的逃离也成了

正的理性思维开始之前的世界，也指思想支配自然的世界。

书中有很多为思想支配自然的世界而哀叹的段落，这些段落写得  
出神入化：文明的道路

就是通往顺从和劳作的道路，尽管在它的上方总是闪耀着满足之光，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奥德修斯对此心领神会，他既不屑于死亡，也不屑于幸福。他知道在他面前只摆着两条逃生之路。一种就像他让水手们做的那样：用蜡塞住水手们的耳朵，让他们竭尽全力地划桨，要想活命，就绝对不能听到海妖们的诱惑之声，一直到他们无法再听到这种声音为止。整个战船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划桨的水手们必须强壮有力，必须集中精神勇往直前，不得左顾右盼。他们也必须顽强不懈，内心坦荡，努力前行，从而竭力避开诱惑。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奥德修斯作为让他人为其劳作的领主，却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他把自己牢牢绑在桅杆上，去听那歌声，这诱惑之声越是响亮，他越是把自己绑得更紧——这种情形就像后来的有产市民在幸福向他们日益靠拢、他们自身权力膨胀的同时，却要坚决放弃自己的幸福一样。奥德修斯听到的东西并未对他产生任何后果，他可以只用点头来示意他将从这捆绑中解脱出来。但一切都太晚了，“充”耳不闻的水手们，只知道那歌声是危险可怕的，却不知道它是多么的美妙悦耳。他们把奥德修斯牢牢地绑在桅杆上，只是为了拯救奥德修斯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使他们的压迫者连同自己一起获得了再生，而那位压迫者再也无法逃避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实际上，奥德修斯无可救药地绑在自己身上的那条磨炼他的绳索，也使塞壬脱离了常规：她们的诱惑显得毫无作用，成了一个纯粹冥想的对象，成了艺术。被缚者就像出席了一场音乐会，他静静地聆听着，像别的晚上光临音乐会的观众一样，他兴高采烈地呼唤着解放，但这终究会像掌声一样渐渐平息下来。这样，艺术享受和手工劳动随着史前时代那个世界的逝去就发生了分离……文化财富与

可以冷漠地看待自然，或将自然视为敌人。恐惧成了（这一过程）反对的对象：

从奥林匹亚宗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直到资产阶级无神论，在这些西方文明的转折关头，每当新生民族和新生阶级更加坚决地压制神话，人们对未被了解的、充满威胁的自然的恐惧，以及对自然物质化和对象化带来的后果的恐惧，都会沦落为泛灵论的迷信，而且，征服自然就会成为人类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的绝对目的。

欲望也是（这一启蒙）反对的对象：

人们不得不对自我干一些可怕的事情，直到同一的、有目的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类本性形成为止，这些事情在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会重复出现。人们必须依循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来对自我加以把握，而丧失自我的诱惑却又总是盲目而又坚决地维护着这种把握……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把自己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每时每刻都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up>[177]</sup>

336 去神话化、理性化、启蒙和文明的这个过程，并不是那种现在看来似乎已经存在于原始世界之中的幸福的实现过程。相反，这个过程的持续进行似乎使所有的幸福形式都成为受谴责的对象，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幸福都有可能退回到更古老的、自然的状态。自然大体上似乎显现出一种威胁，而不只是指自然的危险的方面，后者只有精心搜寻才能清楚地看到。这样，思想就只强调了自然与人的欲望相敌对的方面，而没有指出自然顺应人的欲望的方面。人类对原始世界的浮现因而发展成了一场被延长了的反自然的斗争。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讲到了纯粹自然的延续，并把它变成了一个集合名词（collective term），既指所谓真

那个世界的一个部分。文化工业成功地用没有梦想的艺术冒充了梦想的实现，成功地用戏谑愉快的放弃来补偿了放弃本身。从开始的章节和两篇附论的观点来看，文化工业意味着将艺术提供的幸福允诺的化简成一种“娱乐”构成的“药水浴 (medicinal bath)”的情形，而艺术早已被中和成了冥想 (contemplation) 的对象了。<sup>[181]</sup>

阿多诺 1936 年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的“论爵士乐”，就受到了施虐—受虐性格这个概念的启发。他在这篇文章中解释说，爵士乐现象的本质就是主体对自身的戏谑嘲讽。在《启蒙辩证法》中，这个解释现在被推广用于对既包括“低俗文化”又包括“高雅文化”的文化工业的解释之中。在《启蒙辩证法》中，作者证明文化工业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过早来临的高潮的症状，在这里关注统治自然的主体，依然在掩饰自己对自己的嘲讽。

已经沦为自然之牺牲品的统治自然的理论，必然会推演出“反犹太主义的人类学理论”（阿多诺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反犹太主义看作一种可以证明他们对失败文明所作分析的行为现象。 338

但是，反犹太主义体现出来的社会和个人的精神形式——它是前历史和历史相互交织的产物——却仍旧模糊不清。如果深植于文明的苦难还没有被明确地诊断出来，那么个人即使是毅然决然地作出牺牲，也无法通过认识去根除这种苦难。所有理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解释及其反证——尽管它们总是正确的——并不能提供一种诊断，因为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集体屠杀就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仪式。从中可以看出，将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意识和意义已经无能为力，真理也已走入穷途末路。这种视杀戮为消遣的荒唐行为，可以证明人们所遵循和顺从的只是顽固不化的生活。

反犹太主义的盲目性和无目的性促使它把自己说成是一种出气筒，一种真理标准。愤怒在毫无还手之力的受害者身上发泄出来。既然受到迫害的人们可以在不同情况下互相替换——或是吉普赛

人，犹太人，或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等等——那么，一旦他们发觉自己拥有规范权力，他们也会相互替换着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sup>[182]</sup>

反犹主义代表另一种“归化文明”的人们对没能使自己归化的人的仇恨。在第六节（根据原来的计划，这一节本是反犹主义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中，作者甚至说，澄清理性和权力并将思想从统治中解放出来，将“会使人们跳出那个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带向疯狂的反犹主义社会，而走向人类社会”，而且将使“犹太人问题”在与纳粹的理解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关键所在”。<sup>[183]</sup>

在他们对他们定义的“反犹主义”行为方式的精彩分析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运用萨德和尼采的思想、运用弗洛伊德和弗洛姆的思想来分析权力认同这样的施虐、受虐现象和这些反应得以形成的方式及其心理机制。他们采用的那种分析方法使他们有可能至少为他们的理论——即，失败的启蒙的核心就是一种已经沦为自然牺牲品的支配自然的形式——提供某种支持。

他们认为启蒙的过程就是对一切能唤起原始世界的事物、对一切未被文明化的事物（不管它是通过幸福还是通过恐怖来唤起这种回忆）的一种前进性的毁灭。同样，他们认为凡是以愤怒和冷酷来反对虚弱和恐惧、或者反对幸福和憧憬的地方，就会有反犹主义在起作用。

但是，女人被划定为弱者；而且她们的软弱总是使她们陷入少数人的境地，尽管她们在数量上超过了男人。就像那些早期民族国家被压迫的土著居民，或者在组织上和武器上都比征服者更加原始落后的殖民地民族，或者在‘雅利安人’统治下的犹太人一样，女人的孤助无力状态是压迫的合法权问题……软弱无力、一时无措、困兽惊魂、神志不清的迹象，都会带来一种嗜血的欲望。对憎恨妇女的辩解，就是要把妇女说成是智力上和身体上的下等人，并且像憎恨犹太人一样，在女人的额头上戴上了统治者的污名。在他们

看来，女人和犹太人已经有几千年没有握有统治权了。她们可以生存，却也可以被灭绝掉；她们的恐惧与软弱，是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相似性，是赋予其生活的特别因素。这种情形使强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必须在尽力异化于自然过程中付出自己的全力，同时也必须经常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sup>[184]</sup>

在另外一个段落中，他们也同样暗中批判性地化用了“应该给摔倒者再推上一把”的格言：

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所有实践经验中所固有的模仿痕迹都被遗忘抹平了。禁止回归自然的无情禁律变成了一种宿命；这种否定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它再也无法得到有意识的实现。那些被文明刺花了双眼的人们，只有在某种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中才能感受到自己所具有的已经成为禁忌的模仿特征，而他们是从其他人那里才看到这些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们是合理化环境中仅剩的一些个别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是一些令人尴尬的残余因素。那些看似被排除在外的陌生东西，实际上却令人那么熟悉。这些就是在文明压抑下相互直接接触所形成的传染性行为，诸如触摸、抚慰、佞依、哄诱等。今天，这些本能冲动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有失体统。它们似乎要把那些早已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度变成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为此，它们总是试图对顾客阿谀奉承、对债务人威逼恫吓，对债权人苦苦央求，以求打动他们……但是放纵的模仿行为却是古老的统治方式的标志，它深深地烙在了被统治者的生活之中，并通过婴儿时期里的无意识的模仿过程，从衣衫褴褛的犹太乞丐到富得流油的银行家，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去。与此同时，这种模仿行为也会引起人们的愤怒，这是因为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它表现出了一种古老的恐惧形式，而人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把这种恐惧形式彻底忘掉。<sup>[185]</sup>

340

对在这样的统治之下已然失去了的东西的憎恨，必然与对唤起统治的痛苦的东西的憎恨联系在一起：

自由主义允许犹太人占有财产，却不给他们任何发号施令的权力。即使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也应该享受到幸福，这曾是人权的最初构想。但是，被蒙骗了的大众已经感觉到，只要阶级存在，这种普通意义上的许诺便只不过是一句谎言而已，继而他们的愤怒便会油然而生。这是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他们必须压制住那些特别有关于幸福的可能和观念，但越是这样，这观念就越是显得切合现实。尽管他们对这种观念作了根本否定，但无论何时何地，就在它似乎马上得以实现的时候，人们总会再一次重复他们对自己的愿望的那种压抑力量。对引起这种重复的任何事物来说，不管它本身有多么不幸——流浪汉（Ahasver）和迷娘（Mignon），逗留在希望之乡的异客，让人唤起性爱的美人，或者使人联想起胡乱杂交的被放逐的禽兽等——都会把文明人的破坏欲望吸引到自己身上，而这些文明人从来就不能彻底实现痛苦的文明进程。那些杂乱无章地支配自然的人们，在备受蹂躏的自然里，看到了一幅软弱无力却又极富诱惑力的幸福表象。没有权力的幸福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样一来它就成为了真正的幸福。资助布尔什维克的营私舞弊的犹太银行家们不切实际的密谋，就是一种先天无能的象征，就像美好生活是一种幸福的象征一样。与这种幻想同出一炉的是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看起来总在思考——这是一种别人难以消受的奢侈行为——而且“他”的这种活动显不出付出汗水的辛劳和体力上的努力。银行家和知识分子，金钱和精神，这些流通领域的代表人物，构成了他们被权势摧残的虚假形象，这种形象又被权势用来使自身永世长存。<sup>[186]</sup>

显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人们试图以种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不仅仅是其他不被信任的各类人当中的一类少数人——他们自

己甚至在“反犹主义”这个章节中对此也做出了种种解释。在他们看来，犹太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源于如下这一事实：法西斯主义宣称犹太人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种族。“当今的犹太人是一个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自身招致了一种毁灭意志迫害的群体——这种意志源自虚伪的（false）社会秩序。犹太人被那些十恶不赦之人侮辱为十恶不赦之人，他们现在确实成了被遴选出来的民族。”<sup>[187]</sup>（实际上，总的来说正是非犹太环境的敌意使得犹太教保持了活力，1960年代伊萨克·多伊彻 [Isaac Deutscher] 评论说，虽然可怕，但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是，正是希特勒为犹太身份认同的复兴做出最大的贡献。）

341  
犹太人有一个典型特征使自身与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在他们与文明进程的关系方面——相区分。犹太人与妇女、黑人、土著、吉普赛人等等这些族群不同，他们同文明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仅向下指向未被统治的自然，而且向上指向使自己高踞于自然之上的心灵和精神。犹太教的上帝实际上在其从一神信仰向普遍形式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丧失全部的自然神特征。

产生于古代前泛灵论时期的恐惧，从自然过渡到绝对自我的观念，这种观念作为造物主和统治者，彻底征服了自然。所有的权力和荣耀都赋予这种观念这样一种异化特征，但在所有这些神秘莫测的权力和荣耀当中，绝对自我都是思想可以抵达的，而思想正是通过与至高无上的先验存在之间的联系而获得普遍意义的。上帝作为精神，变成了与自然对立的原则：它不仅仅像所有神话中的神一样表现了自然的盲目循环，而且也能从这种循环中抽身出来。然而，这种精神的抽象和超然性质，却加剧了呈现于其中却无法被预知的恐惧心理；并且，不能容忍一切对立因素的“我在”，越是要在他的必然力量中摆脱盲目性，就越是在一种模糊不清的命运中感到茫然无措。

基督教用基督是道成肉身，在实践上基督的归基督、恺撒的归恺撒等信

条使有限世界得以绝对化；与之相反，犹太人的上帝则彻底与有限世界相对立。“对基督教反犹主义者而言，真理就是绊脚石，真理并不能够通过理性化的方式来抗拒罪恶，而只能用无法得到拯救的观念来反抗它自称能够左右的世俗过程和神圣秩序。”<sup>[188]</sup> 如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决定深入研究犹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提到拉比扮演的角色，提到对神圣经卷和宗教、道德以及伦理问题的深深的敬意，提到犹太人出于对精神生活和宗教事务的考虑而对商业事务和日常生活的本质的忽略——当然，这种忽略的前提是，他们非常满足于他们从事资本主义活动的那种天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勾勒出来的普通犹太人形象就是这样一些主体的形象，未被驯服的自然和未被驯服的精神（Geist）在他们那里融合了起来。他们以这种方式——其他少数民族却做不到——代表了失败了的文明的对立面，代表了这样一种心灵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心灵真正成为自然的对立面，而自然也真正成为心灵的对立面。

342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他们是专注于本能的防御性和超验性的享乐主义思想家，这种观点发展成对如下观念的小心翼翼的证明：犹太教乃是一种历史性的限定性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形式。辩证法研究计划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使他们在阐述神学主题方面达成了一致。这些主题包括：霍克海默在“犹太人与欧洲”的结论中给犹太人的忠告——回想起他们抽象的一神论，回想起他们对于偶像崇拜的反对，回想起他们曾拒绝将任何有限的事物视为无限的事物；他在“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和“理性与自我持存”中诊断出来的那种状态——统治阶级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对于本能和思想的蔑视；阿多诺对于资本主义以及“反动”艺术和哲学的神话内在性的反思，对构想与表现的结合、意识与感性结合的反思。所有这一切现在都以一种片断的、草稿的形式组成了一种历史哲学，组成了对时代的一种评估。这种历史哲学和评估的隐含基础就是神学。

这两位作者把最严重的歪曲当作已被歪曲了的事物的镜子，并在“反犹主义要素”这一章还极其细致地阐明了自己的相反立场（counter-

position)。此处的核心部分是第五节和第六节，前者讨论作为一种癖好的反犹主义，后者讨论作为一种虚假投射的反犹主义。在第六节中，他们写道：

在货真价实的对象和不容置疑的感性材料之间，在内与外之间，存在着一条主体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能跨越过去的鸿沟。为了能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主体必须返回到事物本身，而不在于他从事物中得到什么。主体根据他在感觉中所投射的外部事物的迹象，来创造他身外的世界：即事物在纷繁复杂的特性和状态中所保持的同一性；同时，他学会了用既承认外在印象的综合统一，又承认逐渐脱离于外在印象的内在印象的方式，在回忆中建构了“自我”。真正的自我是投射的最终产物。在只有借助人类似生理肌体的发达力量来加以完善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才能作为一种统一的，同时也是离心的功能得以发展。即便是一种独立地被对象化了的自我，也只能等同于对象世界向它现出的意义。主体内在的深度无非是由感觉到的外部世界的微妙性和丰富性构成的。然而如果这一约束被割断了，自我也就僵化掉了。如果自我成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对既定事实的单纯记录，而不对这一事实做出反馈，那么它就会缩成一个点；如果自我用它毫无根基的基础来唯心主义地创造世界的话，那么它只能把自身表现成为单调乏味的重复。这两种情况都放弃了精神。只有通过某种中介，没有意义的感觉才能激发思想发挥出它全部可能的创造力，而另一方面，思想也能毫无保留地使自身彻底专注于最突出的印象 (predominant impression)。有了这一中介，就可以克服那种体现着整个自然之典型特征的病态的孤单。因此，调和的可能性，并不在于不受思想影响的某种确定性，也不在于知觉和对象之间前概念的统一性，而在于它们之间值得注意的对立。主体已经把外部世界装进了自己的意识里，而同时却又把它认作是别的什么东西，这在主体精神内部构成了差异。因而，反思，即理性的生活，便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投射产生了出来。<sup>[189]</sup>

343

上面这段，同时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如下问题的最详尽回答，即，如何构想人类内部对于自然的记忆——他们多次提到要将此答案作为摆脱灾难的出路。人类的构想和行为只要去这样创造它，自然就会充满精神，就会是活生生的。但是，人的构想和行为塑造自然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一种集体幻象，实际上，那就是自然的实际所是。人类在自然中体验着他们向自然敞开的所是。借助意识使得人从远处与自然亲近，只有这样才能以一种被超越的形式使在回忆中想像出的失落的幸福现实化。这种亲近就是“真正的模仿行为”，就是“适应他者的模仿行为的有机形式”。<sup>[190]</sup>“你与我相遇，我也与你相遇”：由马丁·布伯<sup>[191]</sup>表述的来自宗教哲学的洞见，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变成了唯物主义的和人类学的洞见。

尽管他们的答案还只是一些零星的提示，但这个答案也表明了他们的一个姿态，说明他们反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那些历史事件代表了一系列争斗，这些争斗恰恰伴随着对疯狂掠夺自然所得的成果的颇为成功的盗取。

1944年出版那个油印本的时候，盟军已经胜券在握，可战争还在继续着。但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他们那时已经在进行着的“进展之中的研究工作”丝毫不是只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存在才获得其实际意义的。他们对局势的这种估计与乔治·奥威尔的估计非常接近。后者在1946到1948年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写了反乌托邦小说《1984》。在《1984》中，伦敦成了大洋洲的首府，奥威尔通过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真正的可怕之处，这种可怕之处不是它的残暴，而是它攻击客观真理这个概念所使用的那种方式。

霍克海默本人早就朦胧地意识到辩证法一书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我们一生的任务就是理论工作”，1941年11月他写信给洛文塔尔时，这样说。

现在需要我们好好体味并讨论这颇富成果的最近十年……我们以前的工作的意义，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意义，将第一次因我们现在的创造而变得清晰。由于在外部持续着的、并正向内部 [就是指美国] 渗透的恐怖，由于我们周围也没有人能够指望得上，我们的责任无疑是非常巨大的。<sup>[192]</sup>

1943年6月初波洛克给霍克海默报告说又有人对研究所有所怀疑了，霍克海默就在一封给朋友的长信中，为自己一一细数，看是不是自己已经尽力做了一切能使研究所摆脱这种指控的事情。除了其他方面，他写道：

当我意识到，我们的一些美国朋友对研究所寄予希望，希望它致力于贴近现实的社会问题研究、田野工作和其他经验调查，我们也尽力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可是，我们最关注的研究还是我们的学者各自在精神科学 [人文科学] 和文化的哲学分析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也许有许多人不同意我们的哲学立场，他们认为现时代不再需要如此超然的研究了。（我个人的观点是，这种理智工作与那些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必须做的事情不同，但是只有这种工作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真正哲学的匮乏才是危机的真正原因。即使没有战争，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个危机。）<sup>[193]</sup>

尽管霍克海默有时候对绝大多数公众对其工作成果的冷漠深感绝望，但说到底，他还坚持着他的观点，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活动是有意义的。他在1943年9月给马尔库塞的信中说：“普遍的政治局势越是按照我们通常估计的那样发展，我就越感受到我们哲学工作的重要性。”<sup>[194]</sup>

马尔库塞和基希海默在1944年11月通过邮局收到了《哲学断片》——他们是分别收到的，他们当时的反应是相同的，就是对这本书

困惑不解。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向霍克海默表示谢意。此后，他们也没有怎么提到这本书。最后证明，他们的这种反应是这本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遭际的先兆。

## 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理性之蚀》

阿多诺通过他的《新音乐哲学》原稿为启蒙的辩证法创造了一种在音乐领域展开的范式；当他在1948年给这篇稿子加入第二部分“斯特拉文斯基与复辟时代”的时候，他将这部最终完成了的《新音乐哲学》称为“关于《启蒙辩证法》的一篇附论”。同样，霍克海默通过五次题为“社会与理性”的讲座（这是他于1944年2月和3月应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之邀而作的）完成了《启蒙辩证法》的霍克海默版本。他在1943年11月写信给波洛克说：“1月，我将与泰迪一起准备讲座。我想把它搞成启蒙辩证法有点大众味的版本，启蒙辩证法哲学已经在我们目前完成的这本书的一些章节中初现端倪了。”<sup>[195]</sup> 1947年这次系列讲座的讲稿被编辑成书。其实，这本书的主要合作者除了阿多诺之外，还有洛文塔尔和古尔兰德。但是只有霍克海默是书的署名作者。书的前言这样说道：

这个系列讲座打算以概要的形式介绍作者与西奥多·W·阿多诺合作进行的综合性哲学理论的一些方面。很难说哪些思想是阿多诺的，又有哪些思想是属于本书作者的；我们的哲学是融为一体的。我的朋友列奥·洛文塔尔的不知疲倦的合作和他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给出的忠告已经为本书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sup>[196]</sup>

本书的标题《理性之蚀》，明显承继了霍克海默给《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撰写的最后一篇稿子“理性的终结”的主题，同时也能让人想起他早期的格言集《破晓与黄昏》的标题。<sup>[197]</sup>

霍克海默对于启蒙辩证法的简述所具有的那种风格，容易表述他的思想。同样具有霍克海默本人风格的是本书对反对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两者的旧有立场的新阐释，即，将原有的那种反对意见扩展到对美国实用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批判——但在批评的同时，霍克海默还像以前一样向他的形而上学派对手和实证主义对手表达了最大的敬意。最后一点凸现霍克海默个人风格的方面，体现在以下的事实当中：阿多诺那种通过使 [所批判的] 概念恶化发展从内部炸开这些概念的主题，几乎在这本书中不起什么作用；相反，本书极力强调过去历史中好的方面，这种强调十分不辩证，以至于看上去本书最后的主要结论就是要复兴好的过去。显然，霍克海默对新托马斯主义的这种复兴的要求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托马斯主义的这种复兴要求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还会起到破坏作用，因为如果按照托马斯主义来进行这种复兴的话，只能加速好的历史残余的毁灭。

《启蒙辩证法》实际上是通过两个启蒙概念来展开的。现在，在霍克海默的这本书中，这两个概念被表述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历史地说，理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从一开始就已存在，但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前者占了上风。”<sup>[198]</sup> 比如说，在实用主义者，或尼采，或马克斯·韦伯，或“常人”看来，这个意义上的理性 [即主观理性] 并不做出目的判断，相反只做工具判断，这种工具只是为以其他方式定下的目标而服务的。霍克海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性形式既是主观的，又是工具性的，因为它总是在寻觅达到目标的合适的方法，而那些目标最终是和主体的自我持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既是客观的，又是独立的客观理性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这种理性能够在自我持存之外发现更为广泛的目的，并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对这个更为广泛的目的进行理性判断。

346

像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经院派和德国唯心主义这些哲学体系都建立在客观理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哲学体系目标是想确立一种涵容一切的体系，或者为一切事物创造一种等级制

度。这里的一切事物包括人和人的目标。依据他的生活的和谐性与这种总体性的关系，就可以确知一个人生活之合理性处在哪个等级上。这种客观结构，而不只是人及其目的，将成为个体行动和思考的量杆。这种理性的概念从来不排除主观理性，而是仅仅将后者视为总体理性的一种部分的、有限的表达，而只有总体理性才能为一切事物和存在提供衡量标准。[总体理性]强调的重点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种思想的最高目的就是让“合理”事物构成的客观秩序（正如哲学所构想的那样）与人的存在——包括自利和自我持存——协调起来。<sup>[199]</sup>

这里提到的这些广泛的哲学体系都肯定了意义不仅在世界之中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人类生活中也是客观存在的。对这种哲学体系的这类阐释并不见于《启蒙辩证法》。在《启蒙辩证法》那里只有一点真正启蒙的火焰摇曳于受内在性钳制的历史之上，这些积极的方面也只是犹太宗教、自由资产阶级的理想、批判理论家对限定性否定的忠诚。在《启蒙辩证法》中，真理只是作为评估理智的客观化的标准而被秘密引入的，但却从来没有得到细致的探讨。在《理性之蚀》中，真理被追溯到了神话，而对于《启蒙辩证法》来说，神话一直体现着自然所行使的统治。哲学、宗教、神话——所有这些都是中介，思想通过这些中介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这些中介可以追溯到它们的史前根源。“在很多情况下”，现代文明之下蕴藏着的古代禁忌和神话

347

依然在许多情况下提供着内在于愉悦之中和内在于对事物的爱之中的那种温情，这种爱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拥有一个花园的愉悦感，可以回溯至古代，那时，花园只属于诸神，而且也只为着他们而培育。对自然和艺术的美感均与这种古老的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出于嘲弄或自大，现代人将这千丝万缕斩断，那么即使美感还能暂时继续存在，但美感的内在生命其实就已经枯竭了。我们并不能让我们自己信服对一朵花

的欣赏或是对一个房间氛围的美的感受只是根源于一种独立的审美本能。人的审美反应在史前阶段与各种偶像崇拜形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事物的神性和神圣性的信仰要先于他对事物美的欣赏。对自由和人性这类概念也可做这样的解释……这类概念必须保留否定性的因素，那是针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古代阶段的否定，同时，这类概念还保存着那种植根于它们那些令人恐惧的起源的源初绝对意义。否则它们不仅无法引起人们注意，而且还将是不真实的。<sup>[200]</sup>

但是如何确定哪种传统因素的转化可被视为是真正理性的转化？不必有一种独立于神话、迷信和宗教的其他资源吗？霍克海默在谈“独立思想家”<sup>[201]</sup>（他所说的“独立思想家”与那些善意的形而上学家不同，独立思想家不会通过人为地复兴传统意义的方式抹去遗留的传统意义的最后痕迹）之时，他心里面就没想到这种其他的资源吗？在霍克海默看来，恰恰是那些资产阶级的阴郁的预言家——最重要的就是萨德和尼采——说出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真相。因此，[除了这些阴郁的预言家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供意识形态批判施展自己的地方了。可“独立思想家”如何比霍克海默所批判的新托马斯主义者、或被他当作宗教实用主义的传统遗存的其他守护者更能保卫这“最后一点意义”呢？说到“最后一点意义”——即“这类观念”（真、善、美）“能吸引独立思想家去反对各种可能的权力”<sup>[202]</sup>，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像“人的尊严”这样的词语包含着一种辩证式的进步，在这个词语中，一方面神权思想被保留下来又被超越了；另一方面这类词语也成了陈词滥调，若是有人探究它们的特殊含义的话，它们的空洞就会暴露出来。可以这么说，他们的生活依靠无意识记忆。即便被启蒙了的一群人要与那可以想见的最邪恶的事物作斗争的话，主观理性也将使他们连指明邪恶的本性和人类的本性都做不到。但正是人的本性使得对邪恶的战斗成为必要。许多人马上会问真

正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理性是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理性与个人的利益相一致，即使对大多数人来说，个人的利益也许比环境本身无言的诉求更难于领会。<sup>[203]</sup>

这个主题好几年以来一再地出现在霍克海默不同的文章中——这是一个类似于感性生存论 (aesthetic existentialism) 的主题。在唯物主义者霍克海默看来，人类对幸福的欲求是一个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事实。<sup>[204]</sup> 哪怕是最细小的欲望对哲学来说也是神圣的。<sup>[205]</sup> 现在，人的本性和对环境的沉默的诉求包含了一种必然要求，只有当主观理性归于沉默之时，这种要求才能被听到。在这里，与其说霍克海默清晰表达了他的观点，毋宁说他只是暗示了他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独立思想要想拯救“最后的意义残迹”，不应是通过复兴某种东西，而是通过去终止某些具有破坏性的、使人转移注意力的东西。独立思想不应谋求在知识层面复兴已经老套的观念，而应该尝试把自身同这些观念在人类本性 [自然] 中的对等物联系起来。

在霍克海默看来，“在人类内部回忆自然”的提法，包含一种具体的含义：这就是在沉思和本能之间建立起联盟。最终，思想将能够逆着那条客观理性被主观理性战胜的路，逆着自然的主观化、形式化、工具化和去本质化的路，探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并将自身确立为自然的机能，而不是成为自我炫耀的理智的工具。

尽管伟大的文明理念——公正、平等、自由——可能被扭曲了，但是它们毕竟是自然向其困境表达的抗议，是我们所拥有的惟一得到明确表述的证词。哲学对这些理念应该采取一种双重态度：(1) 哲学不能按照它们所宣称的那样来看待它们，应该拒绝将它们当作无限真理和终极真理。只要还有形而上学体系在将这些证词当作绝对和永恒的原则来表述，哲学就应当揭示它们的历史相对性。哲学拒绝崇敬那些有限的东西，无论它们是诸如国家、领袖、胜利或金钱等等这样的拙劣政治口号和经济信条，还是人性、幸

福、美、甚至还有自由这样的伦理和美学价值。只要它们自命为独立的终极，那么就应该受到哲学的置疑。(2) 应该承认基本的文化理念具有真理价值，并承认哲学应该在它们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当中来衡量它们。哲学反对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割裂。哲学在其历史情境中直面现实，并致力于得出现实的概念性规律，这样才能批判现实与其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超越它们。哲学正是从这两种否定性进程的相互作用中获得了它的肯定性特征。<sup>[206]</sup>

这清楚地表明了霍克海默哲学的悖论寓意。这种哲学尽管外表变化了，可是其实质核心却并没有变。这种哲学就是意识形态批判，它的批判标准是从资产阶级理念中得来的，而且它的确也在努力严格遵循这种标准；但如果考虑到理性的自我毁灭和神话对目的理性的支配，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又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自然的反抗能够使这些资产阶级理念——它们已经被去本质化，甚至已经成为了纯粹的口号——从底层存在中得到补充，那么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依旧还是可能的。但是现代哲学所认可的那种“强大的有组织的研究体制”<sup>[207]</sup> 却使这种补充成为不可能。相反，哲学沉思指导的“自发”<sup>[208]</sup> 研究却能通过表达自然的抗辩，来抵制文化的衰败。 349

“自然的反抗”这个中心性讲稿构成了《理性之蚀》的灵魂。在沉思“被实用主义思想所压制”的过程中，“自然已经失去了它引发人敬畏之感的特征，已经失去了神秘的本质 (*qualitates occultae*)，自然已经被完全剥夺了通过人的心灵而发言的机会，甚至以那些居于特权地位的(思辨思想家)群体的被扭曲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机会也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自然就要实施自己的报复了。”<sup>[209]</sup> 霍克海默认为，自有文明以来，就伴随着出现了对压制自然的对抗和反抗，这些对抗和反抗所采取的形式是社会革命、个人犯罪和心理学意义上的错乱。霍克海默说有一些中产阶级作家是“明快的”，而有一些则是“阴郁的”。如果我们借用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社会反抗不仅有“明快的”，也就是革命，也有“阴郁的”，即“暗中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抗和

《权威与家庭研究》所使用的这一术语意思相同)。他认为“我们时代精心策划的种族狂欢”就是“纳粹式的自然反叛对文明的反抗”，在这种狂欢中被放纵的本能却成为了压制性权力的工具。<sup>[210]</sup>（弗洛伊德、本雅明，甚至更为突出的还有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等人，<sup>[211]</sup>都曾以同样的方式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反抗资本主义利润原则的一种狂怒的反抗表现。)

《理性之蚀》和《启蒙辩证法》虽然都是在论述相同的主题，但是与后者相比，前者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认为人已经无法理解自然，人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体验欢乐、幸福的能力，已经无法进行自我评价，也根本无法体验自己的成就带来的快乐了，而这才是自然真正的报复。

350 这个适应过程现在已经成为预谋的和总体的过程了……个人自我持存的前提是他必须适应必需的体制的持存……我们为了支配自然而发明的欺诈伎俩越多，我们就越可能——只要我们还能幸存下来的话——成为这些欺诈伎俩的奴仆。个人已经被提纯了，包括客观理性神话在内的神话留下的一切残余都被剔除净尽，个人只能依照适应性的一般模式机械地做出反应……我们有着数不清的法规、规则和条令要服从，这些法规条令驾驶着我们，就像驾驶着汽车一样……我们的自发性已经被一种思维框架所替代，这种思维框架强迫我们抛弃一切思想感情，这恰恰会削弱我们对戕害我们的非人要求的警惕性……[尽管早期也要求服从，但现在这种服从与早期的服从的]差异在于顺从的程度，现在这种顺从态度已经弥漫于人的全部存在之中，已经改变了人所获得的自由的本质。<sup>[212]</sup>

“我们文明实现的成功太完善了，以至于成了虚假的文明。因此我们时代里的调节机制会渗入一种怨恨和被压抑的暴怒的因素。”<sup>[213]</sup>这是霍克海默的希望。马克思、卢卡奇，还有早期的霍克海默曾经都在无产

阶级那里寄予过希望——希望这个阶级能通过他们的革命力量来改变他们的悲惨境遇，希望这个阶级是一个蓄势待发的雄狮，而现在霍克海默则在受文明压迫的奴隶当中看到了希望，他们中最主要的受压迫者就是疯人、罪犯和那些“暗中的”造反者。霍克海默反对以“对人的信任”去实施“谴责我们目前所说的理性”的行动，他认为那是法西斯煽动者的伎俩，这些煽动者“只是在表面上公然对抗文明，支持自然的反抗”。<sup>[214]</sup>

从底层存在中复兴资产阶级理念这种观念是成问题的，它实际上使得霍克海默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不再提起与“暗中的”反抗方式的联盟了。本书剩下的章节就只有对客观理性的失落、对蔑视思辨和沉思的抱怨了——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对“客观真理”的吁求；自此之后，霍克海默更多地诉诸形而上学原则，在这一点上甚至比阿多诺诉诸于希望与救赎的神学主题还更为连续。因而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危险，诉诸形而上学原则很可能削弱思考启蒙解放作用的敏锐性，有可能挫伤分析理性工具化这个概念所概括的经验的兴趣。“你在书中只是暗示了你的思路。如果你能尽快阐明你的全部思路就好了”，在读了他的《理性之蚀》之后，马尔库塞写信给霍克海默这样说。

我现在特别担心的是：理性形式突变成完全的操控和支配，但它毕竟还是一种理性形式，因此体制的真正恐怖更多地在于它的理性方面，而不是非理性方面。你必须得为实际的读者提供这种发展转变的过程，这说起来容易，可除你之外没人愿意，也没人能做到这一点。<sup>[215]</sup>

## 反犹主义研究计划

1937年，瑞士人贡纳·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受委任开展分析美国“黑人问题”的工作，美国方面为他提供了全部的研究自由，毫

351

无限制地为他提供研究资助。美国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保守的国家，但是即使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个资助行动也是有独立主见和果敢首创精神的。美国曾经对印第安人实施过种族灭绝，但这件事情已经差不多被人遗忘了；美国还对拉丁美洲执行帝国主义的国家政策，但是这件事情在同为帝国主义的欧洲列强眼中并无大碍，因此惟有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才是让美国最头痛的，对自认为是民主标准模范的美国来说，这是它最大的污点。这个研究计划的理念以及对该研究的资助，实际上都是当时任卡内基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B.凯珀尔（Frederick B. Keppel）策划的。1940年代，凯珀尔还是惟一一位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反对强化移民审批制度的移民申请审查署的成员，这个移民申请审查署负责决定“敌方国家”居民提交的签证申请是否最终可以通过的工作。可以说，要不是他，很多已经获得签证的难民都得被拒于美国的国门之外。

差不多与米尔达尔完成其工作同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它是美国四个犹太人保护机构中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的一个<sup>[216]</sup>——也批准了资助社会研究所开展反犹主义研究的项目。这件事情的意义和卡内基公司已经做的那件事情的意义一样重大。当时已有大量关于种族问题和反犹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出版；比如，在反犹主义研究方面就有《异教世界中的犹太人：反犹主义问题》，此书于1942年问世，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卡尔·J.弗雷德里希<sup>[217]</sup>都参与了该书的撰写。但是这类研究的规模还不够大，达不到美国的国家规模，因此无法真正了解这类问题在美国的社会关联性。

1938年11月9日到10日，德国全境内的犹太教堂被焚烧和破坏，3万犹太人被捕并被送入集中营，史称“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就在“水晶之夜”五天之后，有人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这样问罗斯福：“您将会放宽我们的移民控制从而能使这个国家接纳犹太难民吗？”总统回答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列入考虑之中。我们一直施行的是配额制。”<sup>[218]</sup>移民配额制度规定每年可以允许27230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移民入境。这个数量尽管很小，但是除了1939年和1940年之

外，这个指标却从来没有全额实现过。德国入侵苏联几天之后，移民入境程序甚至更加严格了。自那时起，每个移民必须有两个担保人：一个负责担保移民的经济独立，而另一个则负责担保他的道德可靠性。

难怪欧洲犹太人会认为，沉默的大多数和那些政治领袖联合了起来，他们似乎都同意犹太人应该安于他们的天命，逃离对他们犹太人来说是很困难的。秘密执行的“最终解决”还是败露了。但是关于此事件的新闻却不为公众所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相信那是真的，这些人就是受到切身伤害的犹太人自己。英国情报部对广泛流布的这类消息有所保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揭露暴行的经验表明，这类消息根本不值得理睬，因为它们只是一些编造出来的恐怖故事。他们还担心，关于德军在被占领国家内发生的对犹太人的灭绝屠杀的报道会在自己国家中引发反犹太主义的复兴。

国家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地区对这类事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德国的盟国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些国家的观察家们把注意力放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指责说，这类运动不仅在大陆引发了可怕的后果，而且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也存在着类似的运动。这些观察家断言，他们看到了在那里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或多或少采取了一种隐蔽的形式，即，与对民主的支持纠缠在一起。这证实了一个疑虑：反犹太主义比一般人们所想像的要普遍得多。“一方面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反犹太主义情绪盛行，可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不情愿承认自己也有着这种情绪”，在一篇题为“不列颠的反犹太主义”的文章中，乔治·奥威尔这样总结他对当时情况的感受。这篇文章发表在1945年4月的《当代犹太人档案》上，这份刊物也是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出版的。

反犹太主义是罪恶的、不光彩的事情，是文明人难以容忍的事情，这种认识与科学探讨不符，实际上许多人会承认，他们害怕过深地进入这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害怕发现反犹太主义现象不仅是普遍的，而且他们也深受其影响。<sup>[219]</sup>

美国心理学家艾伦·L·爱德华兹 (Allen L. Edwards) 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过“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态度”。这个词也是 1941 年发表在《反常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报》上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当时，对支持法西斯原则及其老套主张的人却拒不承认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这种现象进行分析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举例来说吧，研究者对大学生的观察引起了他们对掩盖起来的认同态度的注意：这些被测大学生的肯定性表态一旦被归为“法西斯主义的”，他们就会收回他们做出的表态。那些实际上受到法西斯主义影响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态度的真正性质，常常对这种态度深表恐惧，讳莫如深。

353 美国参战之后，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AJC) 这类犹太人组织都强调了犹太人有义务参加战时服务。《当代犹太人档案》的“大事记”栏目刊出了一页长的一份单子，记录了作为高层人员参军的犹太人的姓名和军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名单实际上成了一份犹太人阵亡者名单。尽管我们很难说清楚其流行程度如何，但当时的确有一种偏见，认为犹太人不仅逃避兵役，而且是战争的最大获益者。而这份名单的作用正是用来反驳那种偏见的。

在美国被迫参战之后，在洛杉矶的诺伊曼写信给在纽约的霍克海默说：“反犹主义研究项目已经使我忙得焦头烂额了。”

当然，希望不是很大。首先可以明确地说，反犹主义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其次，许多基金会都在动用它们的全部基金和力量投入到了战时服务当中（卡内基公司已经这么宣称了）。这种观点当然是缺乏远见的，因为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战争期间，或是在战争之后，反犹主义将因为同明确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融为一体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还有许多人认为，应该利用战争初期给犹太人带来的喘息机会……随着反犹主义的壮大，犹太人将会醒过来并发现，最热情的爱国宣言都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也许能拿到的用于推进我们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有限资助利

用起来，我们要让这笔钱尽快发挥作用，最好是在几个月内就展现出我们把握全部问题的能力。<sup>[220]</sup>

1942年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科研部一位新主任走马上任，随后研究所的反犹主义研究计划获得财政支持的前景突然一下子好转了，这主要得归功于诺伊曼的不懈努力。当时身处太平洋—帕里萨德的霍克海默正和阿多诺一道为他们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工作。霍克海默对此前景表示很怀疑，并致信给在纽约的洛文塔尔说：

我想我必须去纽约一趟。若无必要，不要让我待在纽约超过一天。我急需你帮我这个忙，我求你，我在纽约期间，就算我犹豫动摇了，你也千万不要忘了我的这个请求……给我留出的花在我们工作上的每一天时间，不，每一小时的时间，都必须全部投入工作，而不能浪费在任何客套的礼节拜会上。如果我把本应投入我们工作的时间浪费在其他事情上，而不是为了延续我们的存在花去了这些时间，那将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不认为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之间的这类谈判是打断我工作的充足理由。在我们接触到了格莱伯（Graeber）并对此事务进行了所有推测之后，我基本可以确定，这次与以往相同，最终我们还是会失望的。但不管怎么说，在诺伊曼来信之前，我就已经有这样一种感觉了：今年秋天，或是初冬，我一定得去一次纽约。既然我们还不能一下子解散研究所，那么我们就必须向我们那些不同的朋友证明并做出实际行动，让他们相信我还没有撂挑子，我在位子上还能控制局面，只要我们瞅准了机会我们就会以实际行动打破目前研究所的沉寂状态。既然我已经确定我的工作在今后的两年中都必须要在洛杉矶进行（除非有大的什么变故），我这次的行动就能为我们不久的将来争取到一个平静的环境。因此，诺伊曼的信不仅促成了这次旅行，而且为此次旅行定下了日期。如果我不得不去纽约，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呢？我必须这么做，特别是因为当有这样一个旅

354

行安排摆在我面前时候，我几乎无法工作了。<sup>[211]</sup>

在此后不久，他的确去了纽约。尽管他同已被诺伊曼的报告说服了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代表进行了会谈，但因为委员会再过两个星期也不会召开决定性会议，而到了那时，他确信，“反对者”已经“成功地封死所有达成理解的道路了”，<sup>[222]</sup>所以霍克海默仍有疑虑。霍克海默还去华盛顿访问了美国国务院。这次访问给他留下的印象同样使他疑虑重重。他和诺伊曼去华盛顿的目的是想为“消除德国沙文主义”的研究计划搞到一封推荐信，他们说这项研究工作作为一项可被承认的半正式战时服务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揣测这样一来可以使这个计划更有可能获得洛克菲勒基金或卡内基公司的资助。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之前的几个月是平静的。霍克海默很快回到了西部的太平洋—帕里萨德，诺伊曼是谈判开始时的主要负责人。他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科研部主任大卫·罗森布卢姆 (David Rosenblum) 计划让罗伯特·林德担任该研究计划的联合负责人。林德，与他之前的托尔斯坦因·维伯伦和他之后的 C. 怀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大卫·里斯曼 (David Riesman) 一样，代表了美国社会学少数派思潮，这个少数派对社会持批判态度，从不同方面致力于让社会学取得普遍的成功。诺伊曼对此原有所保留，他认为委员会可能会因林德的政治观点而反对林德出任联合负责人的提议，而里斯曼对此保留意见的回答是：“只要这个人不是一个有派性的共产主义者，他肯定是会被接受的。既然他认为只有乐意对问题追根溯源并具有左派观点的人才能解决反犹主义问题，那么他就更有理由接受了。”<sup>[223]</sup>诺伊曼提名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和波洛克这些研究所的研究员参加这项研究计划，并介绍了阿多诺与拉萨斯菲尔德合作的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此时，罗森布卢姆却说“不管怎么说”拉萨斯菲尔德“整个庞大的研究工程”“没取得什么成果”。这证明有一些占据要津的人实际上专门找霍克海默及其小圈子成员试图加以掩饰的那些方面，而不是他们试图拿来为自己辩护的那些方面来评价研究所。

355

在接下来的一次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会谈中，他们再次达成关于研究计划的协议。但是研究所并没有如他们期待的那样得到书面的认可。协会方面要求研究所负责人拿出一个预算和一份详尽的草案。诺伊曼和马尔库塞再次在准备新的草案这件事情上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份新草案是在研究所纽约分部办公室里匆匆忙忙搞出来的，那时诺伊曼和马尔库塞还没有在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迫切要求之下最终接受华盛顿的正式工作。如霍克海默所愿，波洛克被提名为该计划的负责人和研究所纽约分部的代理负责人。1942年11月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你是一位经济学家，因此你能够推进研究所转变，使之具有更重视经验的态度。这有助于在不侵害我们的理论思想表达的情况下取得有实用价值的成果。”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次研究应该遵循“权威与家庭研究”的模式，研究工作的理论核心应该得到给人印象深刻的经验要素的补充。霍克海默还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去掉诺伊曼设计的那个专门探讨工人阶级中反犹主义问题的子计划。他认为，这个子计划是诺伊曼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添进已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的研究草案之中的。他还对波洛克说：“顺便说一句，这种只是为了找出一些反犹主义动向而考察整个工人运动的想法，在我看来，在科学上是极其荒谬的。”<sup>[224]</sup>

1943年1月，委员会还没有在研究预算和新草案的基础上对研究计划做出最后的决定，而此时犹太人委员会新主席的选举就要来临了。1月底，约瑟夫·M.普洛斯考尔（Joseph M. Proskauer）当选，波洛克当时认为研究计划彻底没希望了。普洛斯考尔反对共和党，而且是反对将欧洲发生的事件公之于众的许多犹太人中的一个。因此有理由推测，他也偏向于对美国的反犹主义保持缄默。但实际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采取的是一条折中的、支持同化的路线，普洛斯考尔任期内他所遵循的路线还包括对美国内部存在的反犹主义进行反击，正如1943年10月犹太人委员会声明的那样，反击的方式是揭露美国反犹主义的“可怜的反民主和反美特征”。<sup>[225]</sup>

2月中下旬，罗森布卢姆打电话通知，委员会目前已经最后做出了

有利于研究计划的决定。1943年3月2日波洛克给霍克海默拍了一封电报：“已经完全达成协议。罗森布卢姆看上去很热心。相信这将成为一项更大的合作计划，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强烈建议纽约分部研究员3月15日、研究所全体成员4月1日开始投入这项研究工作。”<sup>[226]</sup>

波洛克、洛文塔尔和罗森布卢姆经过磋商，还达成了如下协议：

1. 双方都应参与到研究计划当中。该计划以一年为期（1943年4月至1944年4月），经费总计10,000美元。

2. 欧洲事务应该得到研究。

3. 狭义上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

(a) “极权主义类型及其政治作用”。这个领域的研究由纽约方面来完成，波洛克任负责人，罗伯特·麦克伊维尔担任联合负责人（由于林德工作过于繁重，便由他接替），列奥·洛文塔尔、保罗·马辛、阿尔卡迪·古尔兰德等人是该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

(b) “心理学研究”。这项研究将在西海岸由霍克海默在阿多诺等人的协助下指导完成。

4. 在发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草案中被称为研究实验中心部分的摄影计划，由于财政问题被临时取消。这个计划本来想通过这种新的、隐秘的方式来观察反犹主义，形成一种观察研究模式。<sup>[227]</sup>

从这个时候开始，在西海岸进行的辩证法研究计划和在东海岸进行的反犹主义研究就联合起来了。二者的联合方式使我们既不能说《哲学断片》是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一个理论跳板，也不能说反犹主义研究计划是《哲学断片》的一个巨大的、多少是独特的附论。这两个研究计划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间合作的顶峰。原来一开始，反犹主义研究项目只是他们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后来他们一度放弃了这个研究。现在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外部资金支持，反犹主义研究计划可能永远也不会被拾起来进行下去，如果没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支持的刺激，《启蒙辩证法》也很可能不会为“反犹主义”专辟一章。可以理解，霍克

海默对这个题目既充满兴趣，又犹犹豫豫。他们原来的自我形象是一个理论家的小群体；其成员都生活在“辉煌的孤独”之中，都是一些超越个人所属文化的外乡人，他们认为对犹太教思想中的某些主题的兴趣使得他们与犹太教发生了联系，但是现在对反犹主义和犹太教进行这样一种大规模的研究将会改变这种自我形象。现在他们的自我形象不得不变成一种更为冷静的形象：必须承认，他们属于犹太人中的一个少数人群，他们的犹太身份是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局外人根本不考虑他们内部的差异和他们的同化程度，当然也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愿意被同化。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就学术研究合同的磋商的最终胜利使得反犹主义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明朗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个主题的一些思考有一些融入了《哲学断片》，有一些则成为了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尽管局外人对反犹主义研究计划中的经验研究部分十分看重，但这个研究团体中的哲学家却对之不以为然。

当霍克海默开始着手进行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工作时，他写信给马尔库塞说：

既然我已经决定我们洛杉矶方面应该考虑心理学部分，那么我就得去研究文献。不必说你也知道，我根本不相信心理学能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对这个学科的怀疑态度。另外，在计划书中我使用的心理学这个词其实是指人类学，而人类学又是指关于人的一套理论，它研究的是在充满斗争的社会环境下发展的人。对支配图式在人的思想中、在其本能中，甚至在哲学生活中的呈现进行研究才是我的意图所在。人们在其中变得对暴力恐怖宣传越来越怀疑的这种趋势本身就是暴力恐怖的结果，不仅是加之于身体的暴力恐怖，而且是加之于精神的暴力恐怖。即使在最细微的心理领域也存在着支配，而支配是按照一些模式来运作的。如果我们成功地描述这些模式，那么也就完成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了。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得不研究大量愚蠢无聊的心理学文献，如果你看了我的笔记，甚至是看了我已经

寄给波洛克的有关我们这里研究进展的那些文件，你一定认为我已经疯了。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还没有被所有这些心理学和人类学假设搞疯。如果我们想形成符合当今知识水平的一套理论的话，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假设进行考察。<sup>[228]</sup>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担心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不重视纯理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反犹太主义研究的理论工作一方面在辩证法研究计划和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之间的灰色地带进行，一方面在以“反犹太主义心理学”的名目之下进行，这样一来他们在传统术语的保护之下尽可能多地塞入他们自己的东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在《启蒙辩证法》前言中说专业学科不会产生什么理论结果，但是他们对专业学科还是十分留心的，而且非常关心专业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这些学科首先就是指文化人类学。这个领域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358 自 1930 年代以来，研究所就通过弗洛姆同她建立了联系，后来在需要扩展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的时候霍克海默又邀请她进入顾问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很明确是对现代科学的一些假说的讨论开始的。这些讨论所关注的正是潜藏在反犹太主义根基内的毁灭性倾向。他们本想抨击目前的研究现状并批判地扩展这类研究，但这样的打算实际上被他们的另一种想法取代了：他们认为有必要向研究成果的读者做出让步。

洛杉矶小组进行的第二组研究的主题是文明社会中破坏性倾向的心理学，对 1930 年代以来在美国西部大量出现的反犹太主义鼓吹者的言论和文章进行内容分析，旨在揭示到底是什么把大众的破坏性倾向激发了起来。这项研究主要是由阿多诺来进行的。洛文塔尔 1943 年夏在洛杉矶度过的那几个月期间，也协助过阿多诺进行这项研究。这第二个研究领域的最初成果由三组分析构成：一个是洛文塔尔对乔治·阿里森·费尔普斯 (George Allison Phelps) 的分析，一个是马辛对约瑟夫·E. 麦克威廉斯 (Joseph E. McWilliams) 的分析，另一个是阿多诺对马丁·路德·托马斯 (Martin Luther Thomas) 的分析。霍克海默对阿多

诺的分析的评价是：它并“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美国方式来进行”，但是这个研究“尝试的方法是我们所能采用的最好方法，它不致使我们生搬硬套”。<sup>[229]</sup>阿多诺曾经建议说“无论是否受到欢迎，无论被访者的热情程度是多么不同”，他们“也应该发动起实地工作人员去进行访谈和记录”。<sup>[230]</sup>但是这个建议没有奏效。阿多诺原来还想出版一个大众手册，以素描的方式揭露法西斯主义者的惯用伎俩（这些伎俩往往解除了公众的警惕性，从而让他们无法反对这些法西斯主义者），尽管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可是却发展成了阿多诺对马丁·路德·托马斯的无线电广播内容的分析。研究中包含的这一类信息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情感力度，对于犹太读者来说这种感受更为强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原来希望，这样一个小册子能够促成他们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最危险的反犹主义机制的衰落。这种机制表现在以下方面：犹太人似乎总是虚弱的，他们也承认有关虚弱的犹太人的刻板定型，并因而不断招致新的侵袭和暴力。

后来出版了一个计划好的大众手册的学术版，这就是洛文塔尔和古特曼的《骗人的先知们》。<sup>[231]</sup>1944年6月反犹主义研讨会在旧金山召开。在会上，阿多诺做了一场题为“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讲座，大致介绍了对三个鼓吹者的理论分析。这次会议的策划人是精神分析师恩斯特·西美尔（Ernst Simmel），他是德国移民，自1934年起就在洛杉矶从医。恩斯特·西美尔1946年编辑出版了《反犹主义：一种社会病》，阿多诺的讲演稿就刊在其中。书中还收入了霍克海默和奥托·费尼赫尔（Otto Fenichel）等其他与会者的讲演稿。奥托·费尼赫尔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师，于1933年逃离德国。费尼赫尔的讲座题目是“反犹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原理”，他的这个讲座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反犹主义要素”水平相当，并且从很多方面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有关联。后来阿多诺也写过一个题目类似、但更全面的文章“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这篇文章于1951年发表在《精神分析和社会科学》第三卷上，这份刊物的编辑吉萨·罗海姆（Géza Róheim）也是一位移民精神分析师。

359

实验心理学研究构成了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中洛杉矶小组通力合作的第三组研究。发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计划曾经提议引入一种摄影实验的方法，希望成为了解反犹太主义现象的新方式的典范，这种新方式通过“尽可能接近日常生活的具体条件的一系列实验环境”，能够“形象展示反犹太主义在现实中的反应机制”。<sup>[232]</sup>霍克海默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但暂时还无法实现，仅仅是一种计划而已。

作为这个计划替代的另一计划是在与 R. 奈维特·桑福德 (R. Nevitt Sanford)、埃尔丝·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 (Else Frenkel-Brunswik) 和丹尼尔·J. 雷文森 (Daniel J. Levinson) 的合作中形成的。霍克海默在阅读心理学学报的时候就留意到桑福德了。那时，桑福德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还是那里的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曾发表过多篇论文，涉及犯罪心理学和据以判断战争乐观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的理论，同时这些文章往往根据那些被考察者态度的深层心理学根基得出自己的结论。研究所是通过埃尔丝·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同桑福德建立起联系的。埃尔丝·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是霍克海默的熟人，她告诉他说桑福德非常乐于接受“欧洲思想”。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 1938 年作为难民离开奥地利，此时和桑福德一样是伯克利的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和她的后夫 E. 布伦斯维克曾是夏洛特·比勒尔和卡尔·比勒尔的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员，保罗·拉萨斯菲尔德、玛丽·雅胡达和赫尔塔·赫左格也都曾在那里供职，这个研究所还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充满热情的左翼青年学习如何从事老到的经验研究的一个场所。

1943 年 5 月霍克海默在伯克利会晤了桑福德。随后他写信给波洛克说：“在我的监督之下，桑福德的工作将会得出对心理学、美国反犹太主义者的反应及其类型的新的理解方式。我深信，犹太人对反犹太主义者心理学的忽视，虽然不一定是欧洲抵御反犹太主义失败的惟一原因，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sup>[233]</sup>

360 桑福德、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和雷文森（他们三个自己就接受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指导思想、他们相似的关于人格的理解（这种人格

概念不仅与行为模式、思想信仰模式紧密联系，而且也与影响着行为和信仰的深层的、无意识倾向紧密联系)、他们在显性反犹太主义和隐性反犹太主义之间做出的区分、他们把问卷、访谈和心象描述的心理学测验结合起来的研究方式——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研究所的思想很合拍。1943年12月纽约方面和洛杉矶方面的研究已经差不多要超出预算范围了，这时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不得不对这一问题做出决定：是否要提出申请为伯克利小组追加500美元。借此机会，霍克海默向波洛克强调了伯克利小组对这项计划的未来研究工作和研究所实现自己的抱负所具有的重要性。

伯克利的这个团队肯定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小组的领导是心理学的天才教授。两位研究员是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心理学家，具备统计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必要知识。要是哪天我要去旧金山和这些朋友进行一系列建立在更大基础上的实验的话，我们就能出版一本关于反犹太主义分析、反犹太主义的衡量标准的书了。不仅就它对于我们特殊的问题而言，而且就它对研究社会一般现象而言，这样一本书都是一个新思路。它将使我们在初来这个国家时在我们第一本小册子里所宣传的那个将欧洲概念与美国方法相结合的理念成为现实。<sup>[234]</sup>

在霍克海默看来，桑福德就是伯克利研究计划中的拉萨斯菲尔德。

在研究过程中，伯克利小组逐渐开始对外自称“公众舆论研究小组”，而其研究的中心目标则是得出一个借以衡量反犹太主义主张和态度的标准，揭示反犹太主义与人格结构之间的关联。伯克利小组认为反犹太主义可以通过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的相互影响得到解释，这是他们的研究起点。他们纯粹出于研究策略上的考虑，决定把研究集中在人格结构所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和连带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也是很难分析的。他们觉得他们特别有资格完成这样一种“显微镜下”的反犹太主义分析。

1943年12月伯克利小组发表的中期报告说：

361

批量研究技术使我们详尽掌握了关于存在于社会中以及附加临床研究中的被测主体中的某些关系（反犹太主义和其成员或成员人格等之间的关系）出现频率所包含的信息；另外，临床研究和个案研究使得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个体中形成和反抗反犹太主义的那些心理力量，为我们在下来的问卷中将采用的新问题提供了前提基础和新的批量研究的方法。<sup>[233]</sup>

“批量研究技术”使研究者必须对反犹太主义言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最长的—份问卷中包括52个陈述，以下是其中的一些陈述：“犹太人似乎热衷于奢侈、过度的感性生活方式”；“犹太人要是真的想让别人不再迫害他们的话，他们就得做出真正的努力，停止阴谋活动和煽动活动”；“要想有一个好的邻居，最好是不让犹太人占据这个邻居的位置”。每个陈述可能有三种同意或反对的反应，不同程度的反犹太主义或反反犹太主义通过上述方式得到了表现。和研究所早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的一些公开性问题——如“你最欣赏的在人世的、或已不在人世的伟大人物是谁”等———样，此次问卷中也设计了一些心象描述的问卷问题，这类问题的答案可以使研究者就被调查者的人格结构得出暂时的结论。“临床研究、个案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进行每次持续一到两个小时的访谈，而且得使用经H. A. 默里（H. A. Murray）改进过的罗莎赫测试方法。默里的测试方法是用图画替代了原来的墨迹进行测试，测试的目的是将被测主体的注意力引向人以及人际关系。在伯克利进行的这部分研究的最初阶段，他们选取了77名女性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10名接受了临床测试。

霍克海默对这部分研究抱有很大的希望，尽管他对这项研究总的态度时而轻蔑，时而又充满热情。他无非是希望借这项研究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就反犹太主义从根本上是对民主抱有敌意的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科学的证明（伯克利的大规模研究是富于成果的，借着这些成果我

们不仅可以衡量反犹主义，而且可以唤醒国家的行政力量以及所有自由主义力量，特别是可以唤醒这个国家里受过教育的人)”。<sup>[236]</sup>

计划规定纽约方面主要研究欧洲问题以及对美国相关情况进行观察，但后来实际上实施的研究主要部分是解决反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成因。<sup>[237]</sup> 为了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表明他们收集着有价值的材料，研究者在霍克海默的建议下对德国移民的情况做了调查研究，以便确证他们对德国民众对反犹主义和纳粹采取的行动做出的反应的一般感觉。纽约分部的任务可以说是由波洛克负责的，但主要是由马辛和古尔兰德完成的。在研究期间得到了洛文塔尔的帮助，基希海默也一度参与其中。

362

当霍克海默 1944 年 2 月前往纽约作那 5 场题为“社会与理性”的报告的时候，研究计划的各个部分甚至连一半都还没有完成。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惊奇，因为第一年的研究汇报草案中包括了许多的计划：关于当代反犹主义的计划、关于近代欧洲的历史教训的计划、关于美国的相关状况的计划、关于打击反犹主义的发展前景的计划——尽管当时研究所已经减员，但是它除了与伯克利小组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外，并没有同外界其他学者建立合作关系来开始所有这些计划的研究工作。

就在研究所考虑能否争取到机会拓展研究计划的时候，新的不确定因素出现了。这个不确定性当时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此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中的学术专家大卫·罗森布卢姆去世了。“我对提交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汇报书有些担心”，霍克海默（此时他也返回了洛杉矶）写信给在纽约负责准备提交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汇报书的波洛克说，“如果这份东西写出来没有展现我们的优势，也没有什么激情的话，那将会给读者再次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这群人只是没有什么学术头脑的一群欧洲学者，试图胁迫美国公众把这些笨拙且高度理论性的东西当作简便实用的东西买下来。”<sup>[238]</sup> 由于波洛克有着某种失败主义的倾向，而且也缺乏灵活性，为了让波洛克对汇报的写作风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霍克海默提示他说，重要的是应该把自己放在听取汇报的人的位置上，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语气。

认为一个人应该在他的位置上干得更好，这样一种想法应该抛弃；同样应该抛弃那种经常有的错误想法：别人毕竟无法意识到他所面临的危险，总是不愿意为避免危险做出任何努力，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一句话，别人都是不明智的和不好怀的。相反，要大多数情况下别人也确实意识到了危险并努力在克服这些危险。至于那些已经麻木的人、压抑着他们的恐惧的人，使得他们这样的原因是——特别在犹太人问题上——他们已经暗中察觉了这个过程所注定的结果，而且压迫力量是压倒性的，而且他们也认识到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每一种反抗都是双刃剑。而在科学领域，当少数人受到怀疑的时候，他们恰恰是正确的。只是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而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伟大权威不断直接或间接地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就旨在解决贴近现实的社会问题。<sup>[239]</sup>

363 霍克海默接着说，研究所首先赞同为反对反犹太主义的伟大斗争做出真正严肃贡献的努力；他们形成了一套科学地证明反犹太主义之反民主根源的方法；曾构想过出版一本戳穿法西斯主义鼓动的小册子；发展出了一套“参与型访谈”的方法——即由经专家训练的那些访谈者群体隐秘地询问调查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方法，其好处是利用了日常环境的优势。在这里，霍克海默强调的重点不仅是研究所为针对反犹太主义的斗争所做出的实际努力——研究所质疑了民主党人的团结，努力加强民主党人和犹太人的自信心，并为研究和启蒙相结合做出了努力——而且是研究所在方法论和技术水平上的竞争力。波洛克还有所保留，他认为他们缺少专家来考察反反犹太主义的防御策略的收效（而这是美国犹太人协会所要求的）。对此，霍克海默的答复是，对广播广告等此类手段的效果的检验方法等一般问题可以咨询拉萨斯菲尔德。但是就另一些方面而言，他们本人就是“全美国这个领域中最出色的专家”。

我们得出了检验标准，我们设计过摄影试验（我认为这是可

以在任何时候、针对任何群体检测其反犹太主义真实程度的惟一方法)……如果委员会可以从某个大摄影厂帮我们搞来胶片,或者给我们提供 10000 美元或 15000 美元的资助,那么一年半前就可以进行拍摄了,而且现在可能已经有了一种真正科学的工具来以自然科学的那种精确性检测反犹太主义意识和无意识的消长状况了。<sup>[240]</sup>

1944 年 5 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纽约组织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关于反犹太主义问题的会议。美国各地学者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霍克海默也是其中一员。会议上讨论了成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科学部的事宜。但是要等到夏天研究所才能交上第一年的研究汇报书,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是否为该计划的深入展开提供支持的决定也要到夏天才能做出。会议的成果是题为《反犹太主义:提交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报告》的四卷本(打印本)会议录,其中包括 150 页的报告书和许多个人研究论文,其中给人——当然是指发起人和专家学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桑福德和雷文森的研究论文“反犹太主义的检测标准”。这篇文章已经在戈登·W·阿尔波特编辑的《心理学学报》上发表过。阿尔波特也是美国最有名望的心理学家之一,是人格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这篇研究报告中的两点之一是涉及“犹太人易受攻击性的经济因素”这一部分。一些曾在 1941 年《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计划草案中提到的观点——当然这些观点也是全新的——在这一部分得到了深化。这一部分主要涉及的是对反犹太主义者所提出的明显自相矛盾的指责的现实分析。

推理如下:犹太人特别易于成为放债者、坐商或行商,他们比别人更容易得到这类职业,他们铤而走险,冒很大风险从事这些职业,然而往往比那些非犹太人更易获得成功。对被压迫的大众来说,犹太人似乎成了他们悲惨命运的直接原因,看起来似乎在展示扩张主义者和资本主义无情的面目。

同时,就他们所有成功的经济战利品来说,中产阶级犹太人身

上一直有着某种不遵从主流传统 (non-conformity) 的标记, 这使得人们把他们与同是中产阶级的其他人区别了开来。自犹太人聚居时代 (ghetto times) 以来, 犹太人不仅全力以赴动用各种手段希望在经济阶梯上和社会成功方面获得个人晋升, 而且他们也一直很重视特殊的犹太伦理价值和宗教价值——例如在学术和知识界的成功、社会改良和“精神的事务”等等这些; 结果, 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僵死的经济行为模式或给他们规定的社会行为方式的标准。<sup>[241]</sup>

五年之前霍克海默就曾经在《犹太人与欧洲》中说过这些因素, 但是口气是沾沾自喜而略带谴责的——但是较之于与日俱增的官僚科层化和垄断化经济, 今天个人主义的犹太资本主义已经落后了, 这些因素在这篇文章中成了让人同情的不幸境遇的一种写照。

因此, 犹太人成了两头受气的、左右为难的攻击对象。在中产阶级那里, 他们被说成是象征着没落的老式资本主义的全部腐朽事物——贪婪、反社会的态度、凶狠的、不择手段的竞争……同时, 在新兴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那里, 犹太人又被视为体现了应被“运动”摧毁的自由主义的诸多价值观……如, 不服从、特立独行、少数派权利等等。<sup>[242]</sup>

拟订之中的研究所汇报书没有从调查中得出任何结论, 这点也许会让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感到失望。除此之外, 这份报告还停留在研究计划的阶段, 它的各个部分也没有很好地整合在一起, 我们对此不会感到奇怪, 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 研究时间分配和研究项目的规模之间很不成比例, 第二, 两个特别显眼的研究主题被略去了。

365 对美国反犹主义进行考察的这部分研究提到了法西斯主义鼓吹者使用的煽动方法, 介绍了反犹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典型表现是通过对上层阶级、产业工人和儿童进行“参与型访谈”得出的。这项研究忽略

了对美国典型的“社会反犹主义”的特征、成因和作用这一问题的考察。所谓“社会反犹主义”尽管不是大张旗鼓的，但却无疑是有效的，它体现在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之中：例如某些俱乐部、饭店、大学生组织禁止犹太人参加的规定；给犹太人规定的进入某重点大学限额的规章，其他许多专业对犹太人的限额规定等等。在一次旧金山召开的关于反犹主义的精神病学讨论会上，霍克海默曾说过就社会反犹主义而言美国甚于欧洲，这样的言论促使人们相信，尽管美国和第三帝国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可是危险的是，它们之间的心理学基础却相去不远。

显然，霍克海默不敢将他和阿多诺共同发展起来的这个主张和思想公之于众，那样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在德国过去只有一小部分是反犹的（正如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如果隐蔽的、潜藏的反犹主义现在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德国少数反犹主义分子经过几年努力已经能将反犹主义推向工业化的集体谋杀的新阶段，那么美国有着先进得多的经济结构，从未受到过任何自由主义运动的置疑，有着无所不包的、更具破坏性的文化工业，充满激情，而且有着充满暴力的历史，在这个国度，广泛得多的、严重得多的反犹主义暗流则很可能在较之于德国小得多的政治经济危机条件下一下子变成公开的暴力反犹主义，难道人们不能产生这样的担心吗？进而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如何去解释西海岸鼓吹者的失败呢？与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清洗美国印第安人并使他们留在定居点上的政策相比，反犹主义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在美国建立起来的与欧洲传统大为不同的文明之多样性的特征又是什么呢？尽管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很切合美国的实际，可是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样的讨论会对东道国颇为不敬，而且也与研究所赞助者的利益相悖。从另一些方面来看，报告书的暂时性特征也不宜于进行此类讨论，因此就把这些问题忽略了。

另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对“犹太人心理学”的忽略。“犹太人心理学”主要讨论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犹太人的性格特性问题。从迫害者加之于犹太人的身份角色和犹太人自身的散居者角色这一角度来看，这些性格都是可以谅解和解释的，而且在现实中表现非常突出。另一方面是

反犹太主义心理在犹太人那里引发的心理作用的特殊问题。

366 在刚开始他的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的工作时，霍克海默就曾让波洛克给他拿出一份清单，要求详尽列出有关犹太人心理学和反犹太主义心理学的所有心理研究项目。马辛和古尔兰德每人给霍克海默写了一份材料。马辛在他的这份材料中认为，集权主义的反犹太主义与犹太人本身联系不大；古尔兰德在他的材料中则勾勒了犹太人的一系列特殊性格特征和行为特征，如果将这份东西公开发表将会引起灾难性后果。在读了两份材料之后，更强化了霍克海默的想法：迫切需要的研究是对“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分别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sup>[213]</sup>进行考察。将工人研究的访谈看过一遍之后，阿多诺认为不是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指责都是可以予以反驳的；毋宁说，犹太人的一些性格为这些指责提供了根据，这些性格特征是抱怨的真正基础，或者说至少易于招致敌意。我们也可以在阿多诺的这样一种观点里看到关于“犹太人心理学”的某个方面的构想。他建议他们应该另出一本手册，“列清这些性格特征，并对之予以解释，提出如何克服的一些建议”，这样就能补充那本关于法西斯主义鼓吹者惯用伎俩的手册。<sup>[214]</sup>

但实际上这个主题从来没有成为研究所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考虑到犹太人对这个题目的极度敏感性，另一方面是想避免有人批评研究所把反犹太主义问题变成了犹太人问题。阿多诺在草拟研究报告书的过程中写下的笔记，暗示过另外一种关于“犹太人心理学”的构想：犹太人面对着现实环境抱残守缺，这使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或者说使得他们根本没想到要去应对。

研究所继续实践着一贯奉行的那种被视为策略性的自我审查制度。比如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建议在一份提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文件复本中把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化”、“生产方式”等词语替换成“社会主义”、“国家化”和“产业设备”这样的表达。这种方式是对纽约分部的建议的一种折中办法。纽约分部曾建议整个删除一个段落，因为那个段落明确论述说法西斯主义宣传根本不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只是在攻击它所想像的一个幻影。阿多诺写信给纽约的秘书，商

讨已经给出的建议：“如果在我们做出这些修改之后他们还是有所保留，那就让他们彻底删掉吧，我们可不想承担责任。”<sup>[245]</sup>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终于决定为该项计划进入拓展阶段的研究提供资助，并决定建立由霍克海默任主任的科学部。于是霍克海默 1944 年 10 月前往纽约，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他进驻可以看到帝国大厦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总部，在那里建立起了科学部。这个科学部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反犹太主义的范围和成因，并开发出一套检测方法，这套方法可对目前用来打击反犹太主义的那些手段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最终做到使该部门的理论研究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实践计划相统一”。<sup>[246]</sup>

第二期研究计划的资金担保从 1944 年春天延续到 1945 年 5 月，这多少弥补了霍克海默前往纽约对 [西海岸] 研究工作造成的影响，使得伯克利小组进行的研究和其他研究可以从容地继续下去。第二期研究计划的资金担保使纽约分部成为了经验研究的中心。霍克海默还为“工人与反犹太主义”这个研究项目找到了另一个资助者——犹太人劳动委员会。霍克海默曾提议缩小“工人与反犹太主义”的研究规模，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到对社会群体的分析研究当中。古尔兰德在犹太人劳动委员会 (Jewish Labour Committee) 里面有朋友，1943 年与该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古尔兰德汇报说，谢尔曼先生是美国犹太人劳动委员会的驻外负责人，对研究所的计划很感兴趣。谢尔曼相信，反犹太主义一直在产业工人中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工人访谈”计划之所以一直没有执行只是因为没有人手去进行。<sup>[247]</sup>

波洛克和谢尔曼进行了一次会晤，其间波洛克告诉他“我们对纯理论的考察和那种超大规模的民意调查 (super-poll) 不感兴趣，我们的兴趣所在只是以质的原则和量的原则为指导的一种研究”，这些话使谢尔曼产生了兴趣。“谢尔曼似乎被我们的话打动了，因为我们的兴趣是访谈工作不能由被访者对其一无所知的调查者来进行，而必须由了解访谈的、得到被访者信任的人来进行。我们将我们当中的两到三个外访调查人组织起来投入此项工作，让他们指导那些由犹太人委员会和其他工人团体负责指派的访谈者。”<sup>[248]</sup>

“反犹太主义与工人研究计划”的执行工作从1944年6月一直持续到11月。此项研究的调查工作在美国的各大工业中心（纽约、费城、底特律、匹兹堡、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展开，采用的调查手段就是波洛克所说的“参与型访谈”。270名工人背下14个开放式问题的条目（例如，“你在与犹太人的接触中留下了什么特别的印象”、“你在人群中是怎样辨认出一名犹太人的”、“你对底特律暴动是怎么看的”、“你去教堂吗”），这些工人通过这些问题确证了他们工作同伴在日常情境中对犹太人的态度或其反犹太主义态度之后，在笔记上记录下结果。之所以把被背熟的这些问题的相似性和日常对话情境的开放性相结合，是想为对结论性材料的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提供方便。发放给访谈其同伴的工人的指导书上说：“这项工作是社会研究中的先驱性实验。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人们对整个‘犹太人问题’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想问题。民意调查不会给我们答案，访谈也不会。而只有友好的交谈才能给我们提供真正的答案。”

368 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得到了566套访谈记录。对它们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质的原则的基础上的。最后研究者拿出了一本四卷打印本的研究报告，差不多有1500页，题为《美国工人中的反犹太主义》。<sup>[219]</sup> 这个研究报告各部分的作者分别是古尔兰德、马辛、洛文塔尔和波洛克，写作期间大量参考了阿多诺的建议和便函。“我的感觉是，只要我们不将工人研究计划搞得与同类其他研究计划相同，而是利用这项研究的发现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立场，不惮于面对别人深深感受的恐怖，那么这项计划才是值得进行的”，阿多诺写信给霍克海默这样说。在信中，阿多诺还指出已经收集上来的这些材料有着极大的价值，依据这些材料可以展开理论思考。<sup>[250]</sup> 拉萨斯菲尔德和赫尔塔·赫左格的应用社会研究办公室像往常一样为此项研究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帮助。

与委托从事此项研究的委员会的意图相反，它的主题，正如在导言中所强调的那样，“不是美国工人大众中的反犹太主义程度问题”，而是这种反犹太主义的“性质问题”。但是，如果仅从其代表性的结论来看，他们

还是证明了反犹主义在工人中的广泛传播，而且也确证了如下主题：反犹主义还会进一步增长。正是这一主题曾激发起了犹太人劳动委员会的资助热情。

30.8%的被访者可以被划归“明确对犹太人抱有敌意”的一类；38.5%的被访者反感犹太人，但并不赞成彻底的种族隔离，另有30.5%的被访者可以被划归“和犹太人亲善”的一类。波洛克1945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题为“偏见和社会阶级”的报告，这场报告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后果”系列报告之一。在这个报告中，波洛克总结说：

在我们抽查的大多数被测者看来，犹太人的形象似乎在本质上都差不多。尽管他们的行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批评、怨恨、敌视和憎恶却都指向了幻影式的犹太人。大多数工人认为，犹太人是欺诈的店主、毫不留情的地主或出租代理人、没有道德可言的当铺老板，要么就是在顾客第一次过失之后就使保险无效的保险征收者、在顾客第一次过失之后就取消后续服务的分期销售的售货员。此外他们还认为，犹太人拥有所有的商号，至少是大多数犹太人都从事商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犹太人疯狂地热衷于金钱，都是自私自利贪得无厌之徒，利用他人牟取好处，专事欺诈，牟取暴利，撒谎成性，没有道德，如此等等。大多数工人拒绝承认有犹太工人庞大群体的存在。没有犹太工人，他们都不工作，他们都想方设法不当工人。另外人们又都指责犹太工人逃避繁重劳动，推卸责任、拍老板马屁、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做出任何事情，但从不为他们的工人同伴伸出援手。最终的指责是，摆架子，行为不端，总要表现出胜人一筹、野心勃勃、傲慢自大。战争时期流行的所有那些指责……都能在我们的被测者那里找到……有一个令人感到好奇的意外之处是，访谈者没有碰到一个工人认为犹太人很容易成为激进派和共产主义者。

369

为了对研究结果进行类似的精确评估，为了得出可能的对策，就有

必要在工人阶级反犹主义和中产阶级反犹主义之间做出区分。阿多诺在给工人研究的报告提出的建议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真实体验在工人形成否定性态度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在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形成否定性态度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要大，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吗？就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而言，工人较之于那些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成员更容易避免给自己加上伪民主的条条框框，对这样一个事实不需要解释吗？这可能使人们相信，较之于其他阶级，在工人中更少存在隐性反犹主义，工人的反犹主义态度中更少非理性因素，而相对于其他阶级而言，这种反犹主义可以更容易地通过经济和政治知识的教育被打消。

但是这些设想从来没有超越假说的阶段。工人计划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所的负责人委托拉萨斯菲尔德搞出一个可以出版的研究报告，另外阿多诺则努力整理便函和备忘录，使得这些详细的材料臻于完善。可是最后，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其他在研究所的人都一致认为，拉萨斯菲尔德对报告写作的指导监督并不符合研究所的标准，因为他只是强调量化研究部分，而忽视了实质研究的部分，不能将量化分析和实质分析充分地统合成为一整体。因此，这个研究报告和魏玛德国工人研究报告一样没有出版。

同它以前的规模相比，现在的研究所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在承担工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搞得自己捉襟见肘。古尔兰德、马辛、波洛克和洛文塔尔在华盛顿把兼职工作之外的时间全部投入了工人研究。一开始，纽约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里就只有霍克海默一个人绝望地待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被那里的忙乱工作搞得晕头转向，拼命试图将研究所成员集中起来，一直不断地在设计研究计划，他想让他的计划能在短期内取得看得见的效果，化为行动，又想让计划满足他长期的理论工作的需要。他于1944年10月底抵达纽约，希望研究计划在夏季结束之前能有长足进展，这样阿多诺和他以后就能全身心地继续他们主要的理论研究工作了。“我的健康不算很糟糕”，霍克海默在纽约的第二个月写信给阿多诺说：

但是我现在不得不将我的全部精力都调动起来，这样才能把这忙乱的日子夜夜撑下来。可是在此期间我连一个合理的思想都阐明不了……我的计划……如下。我需要几个助手，他们必须能够尽快以这里的惯例开始研究工作：由委员会直接或间接安排的对广播节目的细致研究；对委员会认为措辞不合适的其他组织使用的激烈宣传材料的研究。另外，在运用委员会提议的某个或众多宣传方法之前和之后，都要对地方群体和社会群体进行访谈。一旦这类研究开始之后，我希望能形成一种气候，能为我们策划我们的长时段多学科研究提供有利条件。研究所的所有成员一月底之前都将全部投入研究，这也是现在展开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原因。在此之前只要研究所投入，要想开展任何工作都是不成问题的。由于黎文（心理学家库尔特·黎文 [Kurt Lewin]）的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行动，所以我不想空着手面对委员会。因为我们没有测估行情的专家，因此我们的处境变得复杂了。所以说，我的计划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sup>[251]</sup>

整个这段时间内，阿多诺不断地给予霍克海默热情的鼓励。阿多诺从西海岸给霍克海默写信，寄去便函和笔记，其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建议和充满友情的、富于同情心的安慰之辞。在读了霍克海默的报告之后，阿多诺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他很理解霍克海默的处境，这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和拉萨斯菲尔德那一方合作时得到的体验，与你现在的感受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在这样一个工作中，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着什么，你不知道你能够做出什么，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理论变得毫无意义：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通向科学发现目的的工具，尽管这项工作还是与“研究计划”相联系的，可是它对这些人来说差不多就是目的本身；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既无法理解我们，而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sup>[252]</sup>

他为霍克海默推荐了一些能够从事广播研究项目的研究者，并且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感觉，伯克利的研究做得很好，能够积极整合一切因素。但是和现在的所有事情一样，要想真正开始研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头几个月纽约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你也不要太过失望；那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事情很快会明朗起来。”阿多诺还询问霍克海默是否收到了他最终改定的工人研究计划方案，并因霍克海默给他寄去了作为“研究前提”的霍尔尼那本“可怕的”书而表达了谢意。对愿望满足理论这类精神分析的核心学说的阐释是霍尔尼那本书的主要内容。他建议和巴黎的阿尔甘出版社合作继续出版他们的学刊，并建议让阿尔甘出版社出版他们的《哲学断片》（盟军已于1944年8月解放了法国，9月末英美军队抵达德国边境）。

1945年2月，阿多诺在霍克海默五十岁生日那天把他题献给霍克海默（这种姿态与他们两人一年前将他们的《哲学断片》题献给波洛克一样）的《伦理随想录》一书送到了霍克海默手中。这本书完全是他“自己的”工作。阿多诺写下了这样的题词：“为马克斯·霍克海默的五十寿辰而作的五十条格言，洛杉矶—纽约，1945年2月14日。”这部书稿实际上是后来全部完成的《伦理随想录：对被毁损的生活的反思》一书的第一部分。1945年的圣诞节霍克海默收到的圣诞礼物就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这部分也有题辞：“给马克斯：为了他的旅行归来”），而此书的第三部分则分别写作于1945年和1947年。

10月底——霍克海默刚刚抵达纽约之时——阿多诺有重要的消息向他汇报。

也许你还记得，我曾经向你提起过我曾深思熟虑的一个新想法。关键在于通过间接迂回方式辨认出潜在而真实的反犹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使用任何提及犹太人的问题或明显与反犹主义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如对黑人的厌恶态度和政治法西斯主义等问题）。伯克利问卷中“投射心理问卷项目”代表了调查方向的一个开端。我想比他们走得更远一些，创造出一种“非犹太的”

问卷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获得有关反犹太主义的可靠信息。我不用向你详细解释这种方法的优点。当然，问题是找出那些间接的表现，它们不仅暗示着反犹太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暗示着它的充分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得几乎一切都与现在非反犹太主义相关，以至于它们之间任何可能的区别都可以忽略不计。我将这种方法做如下描述：在单独一项问卷栏目中，我们可以设计两类连续的问卷问题，第一种是“非犹太”的问卷问题，第二种是与犹太人、民族优越感等相关的问卷问题，当然这类问题中也包含其他问题，这样不致直接暴露研究重点。我们可以比较对两类问题做出回答的每个参与者的不同反应，与反犹太主义和非反犹太主义关系密切的那些间接问题应该设计得层层深入，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具有高度可靠性的研究工具。<sup>[25.3]</sup>

伯克利小组一直对此抱有兴趣，他说，他们早就自己开始这项研究工作——这“总是个好的信号”。

霍克海默对此也很热心，迫切地想早日看到草拟出来的问卷，非常希望在纽约和芝加哥尽快组建起一个类似于伯克利小组的研究组。他计划新的研究组应该制定出新的问卷，着手于个体心理测试的工作——这种心理测试最早是由伯克利研究小组开始引入的——并大规模地开展和伯克利研究小组相平行的研究工作。

12月中旬阿多诺将一大摞标有“F量表”（即法西斯主义量表）的文件寄给了霍克海默，这摞文件中包括伯克利方面提供的有关新问卷的材料。里面有许多问题还需做些改动，还需要通过以适合于被调查者的理解力和心理接受程度的方式来表述。阿多诺本人设计出来了80到100个问题，他“通过某种转译方式蒸馏掉了”这些问题中“‘与反犹太主义有关的因素’”。<sup>[25.4]</sup>有关问卷的大量的、未完成的材料使得霍克海默一度想要放弃。他写信给阿多诺说，他害怕，

我们想让问卷短小、简明。可是现在问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

艰深精密，以至于根本不适用于任何群体。是否能够在这儿的委员会里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使用单一的问卷对极具社会意义的群体在不同城市的抽样进行研究。目前，这是我们的主要计划，当然，只有这项计划才能让委员会拨给我们可观的财政预算。<sup>[255]</sup>

阿多诺力图打消霍克海默对问卷中包含大量问题的担心。最终的问卷中只包含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它们应该是最广泛适用的那些问题，它们应该有选择性地被用于不同的群体，而且在运用之前应该得到充分的检测。另外，就“间接分析本身”而言，“这种分析应该呈现为一种全新的理念，它不可能像工人研究那样靠着短小简明的问卷来完成”。短小的问卷不可能得出有利于形成“在统计意义上合理的结论”的充分材料，而这对他们的研究来说恰恰是关键性的。

373 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们应该在别处以更大规模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对黎文那帮人进行“还击”了。但要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必须满足这样一种条件，即“间接测定”的理念必须令人信服地得以展现，必须以真正实实在在的方式得以展现，并因此获得认可，不再被地方性的偏狭眼光视为某种“假设”。<sup>[256]</sup>

在制定问卷的最终形式的过程中，伯克利小组不断地追索着每日出现在无线电广播、报纸和讨论中的某类语句，把这些语句当作他们的某种向导。阿多诺后来在回顾他在美国的学术经历时说：

在伯克利，我们那时自由地搞出了F量表问卷模式，这种模式和书呆子气的那种科学理念完全不同，它不必对它的每个步骤都进行说明。我们四个人作为研究计划的领导者都具有“精神分析背景”，我们还都熟悉自由联想的方法，这也许是那种自由气氛的原因所在吧。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像《权威主义人格》(Au-

thoritarian Personality, 在该书中柏克利小组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样的这项工作正是以与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方法完全不同的方法完成的,《权威主义人格》就曾经招致过众多的非议,但是它对美国素材和美国方法的熟悉是无可否认的……我们为了捕捉住我们脑中闪现的思想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不仅捕捉着具有整体性维度的思想、意念的“意识流”和意念群,而且也构思着问卷中个别的问题条目。这些想法越是看上去与我们研究主旨不相关,我们就越是思考它们,同时我们出于理论上的原因期望找出民族优越感、反犹主义和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各种反动观点之间的联系。那时我们不断地通过“前检验”测试这些问题条目,既利用它们把问卷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种范围在技术上是必要的),也利用它们把那些证明是没有充足选择性的问题条目排除在外。<sup>[257]</sup>

从一开始,阿多诺就非常看重他对F量表的被测表现出的在保守主义和激进造反之间摇摆不定的那种心理的阐发,而且他时刻记着霍克海默时常对他的提醒,霍克海默经常说,委员会的柏克利研究计划的“直接价值”在于“证明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破坏性性格之间的联系”,在于“从实验上证明反犹主义对民主文明的威胁”。<sup>[258]</sup>他写信给霍克海默说,“为了将这个问题转译成‘操作性强的用语’”,

我特别将无意识的、理性化的或者前意识的动机之间的区别明显地指了出来。“破坏性的”造反冲动是一种无意识冲动,保守心理和墨守成规只是那种冲动的理性化,这是我多少有些鲁莽的一个论点。在我看来,最好的方式是构想出成对的问题,其中每一个都指向同一种情结,一类问题涉及情结的无意识形式,而另一类问题涉及情结的理性化形式,比如说吧,无意识情结与对习俗和家庭这类权威力量的认可相关,而理性化了的情结则与“自我保全”相关,如此等等。所有回答都相互矛盾抵触,或者说,在“理性”层

374

面做出符合惯例的回答的人们有可能在本能层面做出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回答——这是我的预测。我请布夫人（埃尔丝·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将所有这些问题划分开来，列入“非理性”范畴和“理性化”范畴，尽可能将它们按对排列。当然，这些对子是不会在问卷中连续出现的。<sup>[259]</sup>

阿多诺强调说，在“保守”和“伪保守”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这个看法和伯克利小组的那些研究人员的观点是相对的。在阿多诺看来，那些研究者简单地将反犹太主义等同于保守——“特别是雷文森，他具有进步论者所具有的那种黑白截然分明的思想”。<sup>[260]</sup>阿多诺在这点上与伯克利的研究人员的思想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保守的”并不用来形容英国统治阶级成员——阿多诺是为这类人辩护的。他们按照该词的美国含义来理解“保守”，用这一词语来指代这样的人：即便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也支持无限制的自由竞争，他们将生活的贫困和失败归因于个人的缺点，他们理想中的国家干涉只有利于成功之人。而阿多诺则试图为政治和经济的保守主义概念赋予某种心理学深度，这正是他在保守主义和伪保守主义之间所做的区分的价值所在。

在结合 F 测试模式进行思考的过程中，造反这个属于研究所研究传统的范畴再次出现在阿多诺的思想里。弗洛姆曾经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对造反和革命，也就是说对伪革命和真革命进行了区分。与此相似，阿多诺也区分了伪保守和真保守。

研究所原来形成的那些思想早已成为了《权威与家庭研究》的核心思想，早已成为了关于魏玛德国工人阶级的研究的指导性思想了。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们将会被继续当作指导性的思想，在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中得到深化发展。但总的来说，这些思想是逐渐地在反犹太主义研究之中体现出它们的重要性的。研究所以前在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中也针对有着不同党派立场的被测设计了一些问题，调查者可以预计到被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反映了他们本人的观点，而是反映着党派的观点，只是对当时常见于党派报章之上的那些评论的学舌。同时，工人阶级研

究问卷中也有一些不明显涉及政治领域、不触动被测党派忠诚所决定的行为模式的问题；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问题的答案获得个体人格结构方面的信息。在弗洛姆所写的《家庭与权威研究》问卷分析部分的导言中，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论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提出并设计问题”——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实验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预期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有利于我们得出关于无意识欲望的结论，有利于我们得出被测者的本能结构的结论”。<sup>[261]</sup>

回过头来看，研究所关于魏玛德国工人阶级的研究的确是一种有意识的尝试，它尝试着回答如下问题：被工人阶级接受的社会主义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地反映在本能结构之中，在危机环境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指望工人支持左翼观点。伯克利研究小组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围绕着魏玛工人阶级研究中的这个问题的一个适度的变体——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一个平和得多的变体——而展开。也就是说，伯克利研究小组的问题是：美国人的民主观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地反映在个体的本能结构之中，在危机环境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指望美国人支持民主观点。

阿多诺充满激情的通信表明，如果他们的宣传能够奏效，自然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社会偏见的种种现象。霍克海默对阿多诺的通信报以同样的激情：

就群体而言，我们应该把比原先所计划的要多得多的人群都考虑进去。桑福德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不存在财政预算上的困难。计划还应涉及……商业组织和技术专家阶层、官僚阶层，这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的群体。桑福德还建议开展关于罪犯和狱警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个绝妙的想法。这样一来研究就能够直接转化成宣传，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能够相当充分地证明罪犯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是极端反犹主义者，那么这个结论就已经更能够起到宣传效果了。我还想去收治心理疾病患者的医院调查研究精神病患者。<sup>[262]</sup>

这些计划是短视的。特别是当我们想到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中关于“犯罪理论”的笔记——这份笔记讨论了罪犯“比较虚弱和脆弱的自我人格”<sup>[263]</sup>——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在《启蒙辩证法》中这种“自我”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它既是摆脱自然获得自由的一种表现，又是对自然本性的一种自我否定的锤炼——的时候，就更能发现这些计划的目光短浅之处了。另外，如果他们想要证明的结论得到了证明，那么这种结论将会使反犹太主义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那时反犹太主义只不过就是在让人见而侧目的那些倒错的反社会者中存在的问题，而不再是普通公民中、“顺从的反社会之人”中存在的问题了（后来他们只考察了囚犯和精神病患者两类特殊群体。实际上这项调查研究表明，在桑·昆廷（San Quentin）监狱中的110名被测囚犯中，民族优越感与政治的和经济的保守主义——尽管不是特别明显的反犹太主义——表现得要比其他群体显著得多。较之其他群体而言，研究者更难在这个群体中发现无偏见的主体。可是研究者并没有出于宣传的目的而特别强调和推广这个结论）。

可另一方面，阿多诺在对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论“反犹太主义人格”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基础是她在旧金山精神分析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的评论中，又强调说：

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幻觉，这个幻觉使我们认为那些行为良好的人是与反犹太主义无关的。可是即使在欧洲也不是这么回事。在这里这更是一个幻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上层阶级具有暴力反犹太主义倾向。在我上次逗留东海岸期间，我发现了对这个想法的有力证明。<sup>[264]</sup>

他们既可以把这种评论用于社会的上层，又可以用于罪犯和精神病患者，这表明他们构织了一个复杂的预期之网。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通过这个预期之网，可以上升到理论的推测和假设很少，但可以付诸针对个体的经验研究的东西却很多。

当然，较之于后来出版的研究成果而言，他们对这些难题的敏感性要高得多，具体的研究结果就要得出的时候，他们即使无法解释那些难题但也能够意识到那些难题的真正存在。阿多诺对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关于反犹主义人格的文章所持的保留态度，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阿多诺对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就反犹主义和非反犹主义做出的分析判断表示了他的怀疑态度。无论这种分析的结果如何，精神分析总是使人们去谴责被分析的人。“不仅攻击性是坏的，而且善意也是坏的，善意只是得到了补偿的攻击性的一种症状。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种危险，因为它将会影响到成果发表的方式，后者可能会在政治上与我们的目标相对立”。他对她关于非反犹主义的评判也持有同样的怀疑态度。

在我看来，对反犹主义女青年和非反犹主义女青年的描述根本就是老生常谈……在我们的理论看来，这种老生常谈中所包含的思想乃是法西斯主义心理的一种主要特征，因此我们要避免继续沿用这种思想方式，即便这种思想听上去是在同反犹主义唱反调。顺便说一句，“成就”这个观念在非反犹主义女青年的心理机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我看来这个观念和您就极端反犹主义者的情况所指出的那些特征一样，也是危险的保守主义的一个征兆。换句话说，我很怀疑观点的不同是否能够被解释为人格结构的根本不同。当然，它只是一种异端的、非正式的意见，仅对我们来说才有意义。<sup>[265]</sup>

377

伯克利计划实际上是连接整个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个纽带，是一个延续时间很长的研究项目。1944年12月，当研究所在纽约的余部仍然忙于分析对工人的研究，而将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继续下去的研究草案尚不明朗的时候，霍克海默写信给阿多诺说：“考虑到研究所，我倒希望委员会责成我将第一阶段的研究的文档草稿”——第一年研究完成后的四卷研究成果：《反犹主义研究》——“修订成一部关于反犹主义的教材，其实规模应与米尔达尔专论黑人问题的那部著作相当。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许多材料吸收进来并解决一些技术性难题了。”<sup>[266]</sup>这说明，他们当时已经感到有必要搞出一个可以发表的统一作品，用统摄性的结构将众多研究子项目和思想整合起来。这种必要性是符合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研究所的构想的。他们认为研究所一面强调理论，一面应该通过出版物的教育性质和启蒙性质来证明研究所在从事战时服务方面、在着手解决国家所面对的战后打击法西斯主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以后还是要把真正的理论工作延续下去。

我们人手很少，因此你肯定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对你的胃口，当然这些事情也不对我的胃口。说到底整个事情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如果可能的话，全部研究计划至少应该在明年夏天告一段落。要使研究得出实际（在该词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成果，我们就必须继续推进下去。<sup>[267]</sup>

1945年春，当工人研究马上就要完成的时候，研究所决定为反犹太主义研究再制定最后一组研究项目。包括阿多诺和顾问团成员在内的许多人为这组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建议。玛格丽特·米德、保罗·F. 拉萨斯菲尔德、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和鲁道夫·M. 洛文斯坦因（Rudolph M. Loewenstein）都是顾问团成员。阿多诺此时也前往纽约，他的目的主要是要让霍克海默了解这组计划的重要性。

这组计划中除了继续进行的问卷和心理测试研究之外，还包括9项子计划：

378           关于反犹太主义的本质和范围的伯克利研究计划。[任务是：]  
(a) 搞清楚易受反犹太主义影响的人的性格结构；(b) 形成一套测试这些人容易接受反犹太主义的程度的手段。

在儿童中进行的反犹太主义研究。[任务是：] 发现在日后对形成反犹太主义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特殊童年经验和年龄段。

对与种族仇恨相关的精神病进行临床考察。[任务是:] 发现反犹主义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中的心理动力机制 (类似于相应主体反黑人和反白人的情感机制)。

对退役军人的焦虑和社会攻击性的研究。[任务是:] 对在退役军人群体中存在的焦虑和社会攻击性进行研究; 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印行的教育材料对退役军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反犹主义漫画分析。[任务是:] 发现反犹主义漫画试图满足何种动机和感情。

勾画出一个法西斯主义鼓吹者的艺术方案。[任务是:] 创造一个法西斯主义鼓吹者的实实在在的艺术形象, 该形象可以被报纸、招贴和电影所采用。

着手准备出版关于反犹主义宣传的手册。[任务是:] 编写出一部有效地戳穿反犹主义宣传伎俩的手册。

一部权威性的有关反犹主义的论文。[任务是:] 创作出一部科学、标准的关于反犹主义的著作。

为测定种族偏见进行一次实验性的纪录片摄制。[任务是:] (a) 创造出一种新的手段, 去测定种族宣传的易感性; (b) 测定既有的偏见; (c) 得出对心理投射机制的洞见。

调查和测试实验。[任务是:] 用形成的一套方法检测被测人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印行的教育材料的态度, 以及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sup>[268]</sup>

这项研究的人员构成如下：霍克海默（总负责）、玛丽·雅胡达（东海岸研究组成员）、T. W. 阿多诺（西海岸研究组成员）、作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的吉纳维芙·克纳普费尔（Genevieve Knupfer）和萨缪尔·H. 弗洛瓦尔曼（Samuel H. Flowerman），此外还有后来加入的十几位合作者。在后来加入的那些人中，只有洛文塔尔是与研究所有密切关系的合作者，而保罗·马辛只是与研究所保持着松散关系的合作者。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被聘为实验纪录片的摄制顾问，但是他的这个位子常常被人轻视，人们并不认为他是研究小组的成员。

另外加入的成员中最重要的要算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了。他那时是索尼亚·山克曼精神发育迟缓学院（Sonia Shankman Orthogenetic School）的院长，该学院的职能就是对那些有严重情感疾患的儿童进行教育和训练。同时他还是芝加哥大学教育学副教授。在此次研究中，他被任命为反犹主义漫画研究的负责人，以及退役军人研究的联合负责人，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一起指导此项研究。爱德华·希尔斯在随后的几年中成为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的合作者，和后者一道建构起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生于维也纳，并与阿多诺同岁。1938年春，德国刚刚吞并奥地利不久，他就被逮捕并被送往达豪（Dachau）和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当时羁押政治犯的最大的集中营就在那里。出人意料的是，他于1939年获释，随即移民美国。到了美国，经历了几个星期的犹豫之后，他开始写出他那段经历的回忆录，并对那段经历进行分析。他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他害怕他的愤怒有可能毁掉他分析的客观性。当国家社会主义快要失败的时候，当盖世太保对他记下的那些方式的滥用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的时候，他决定以“极端环境下的个体行为和大众行为”为标题发表他的那些分析。这篇文章以其特有的方式表明，纳粹党卫军通过折磨和羞辱而成功地改变了囚犯们的人格，最后竟能使囚犯们安于集中营的生活，甚至认同于党卫军——即使是政治犯也无法逃脱这种命运。

文章的表述方式使得文章具有了某种爆炸性。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他的《余生录》中这样回顾说：

很不幸，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将这篇文章连投了好几家杂志，这些杂志是我认为最有可能发表它的，可是结果每一家杂志都对这篇文章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不尽相同。一些编辑的理由是，在集中营期间我没有记下书面的记录，其实意思就是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记下的关于集中营种种境况的每一句话。另一些编辑的理由不是这些资料无法查实，就是我的那些发现不可能重演了。也有一些编辑直接表示，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的结论却是不可理喻的夸张说法。还有一些编辑补充说，结论或许是对的——根据我同一些专业人士就这些问题交换看法时的经验来看，但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对于他们的读者来说太难以接受。<sup>[269]</sup>

最后《反常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报》的编辑戈登·W.阿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1943年10月把这篇文章作为该杂志的重头文章发表了出来。后来这份杂志又重印了这篇文章并以小册子形式发行，引起了国际的注意。战争将近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在德的美国军事部门的官员必须阅读该文。

380

几年之后，贝特尔海姆又根据他在集中营获得的关于犹太人的那些经验，写作了题为“反犹太主义者的牺牲想像”的文章。<sup>[271]</sup>文章要着手处理一个爆炸性的方式问题：犹太人对反犹太主义者强烈的心理机制的反应就是在自己这方面形成一套扭曲现实的心理机制，他们使得自己的对立方一成不变地成了既强大又可鄙的压迫者，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于是一直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很想让贝特尔海姆来纽约，这样就可以与他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这不仅是因为由于战争，在后续研究开始之初，他们当时能够与之合作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可谓凤毛麟角，而且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贝特尔海姆真的是一位非常宝贵的科学家。可是，实际上他

们真正成功的合作只有在芝加哥进行的关于退役军人的研究。

研究所的附属成员当中，洛文塔尔和马辛作为助手参与了“反犹太主义论文”的撰写，按照计划，这篇论文应由主编霍克海默任主编，麦克伊维尔和阿尔波特任副主编。这篇“论文”和有关反犹太主义的手册是分配给研究所的两项研究子项目。

于是，研究所的余部似乎都得到了适合自己的研究任务，而负责其余研究子项目的研究者也按照各尽其能的原则得到了安排——比方说吧，与美国犹太人协会保持密切关系的纳森·埃克曼（Nathan Ackerman）就加入了玛丽·雅胡达主持的反犹太主义精神病个案研究小组。这样一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似乎可以在管理层面上、以给研究注入思想的方式推进整个研究了，似乎很快就能够将他们的精力继续投入到两人的理论合作之中了。

#### 注释：

[1] Horkheimer to Adorno, 14 September 1941.

[2] Leo Lowenthal, in Rainer Erd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Gespräche über Franz L. Neu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p. 98.

[3] Horkheimer to Benjamin, 23 February 1939.

[4]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41).

[5] Horkheimer to Marcuse, 14 October 1941, referring to himself, Adorno and Marcuse.

[6] Pollock to Horkheimer, 1 October 1941. “君特·施坦恩”就是君特·安德斯（Güther Anders），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威廉·安德斯之子。

[7] Kirchheimer to Horkheimer, 16 July 1942.

[8] Horkheimer, ‘Report to the Trustees of Kurt Gerlach Memorial Foundation’.

[9] Cited in Erd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p. 100.

[10] Cf. Peter von Haelberg, ‘Wiesengrund-Adorno’, in Heinz Ludwig Arnold (ed.), *Theodor W. Adorno, special issue of Text + Kritik* (Munich, 1977), p. 12.

[11] Erich Fromm,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 *ZfS*, 4 (1935), pp. 365–97.

[12] Adorno to Horkheimer, 21 March 1936.

[13]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1974), p. 60. 阿多诺的译者注：“罗宾德拉纳德·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孟加拉诗人, 有神秘主义民粹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弗朗茨·韦弗尔 (Franz Werfel), 写作宗教—人道主义哀歌的奥地利作家”。

[14] *Ibid.*, p. 62.

[15] Max Horkheimer, *Dämmerung* (Zurich, 1934),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 vol. 2, p. 341 [*Dawn and Decline*, trans. Michael Shaw (New York, 1978), p. 35.]

[16] Max Horkheimer, 'Materialismus und Moral', *ZfS*, 2 (1933), p. 183.

[17] Cf. Arthur Schopenhauer,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vol. 1, p. 441.

[18] Horkheimer, *Dämmerung*, p. 444; Max Horkheimer, 'Montaigne und die Funktion der Skepsis', *ZfS*, 7 (1978), p. 19; Horkheimer to Benjamin, 28 January 1935.

[19] Adorno to Horkheimer, 2 June 1941.

[20] 多亏了这一合作, 弗洛姆才能安排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为《社会学研究》撰稿, 社会学研究所中霍克海默圈子也常以此证明他们与美国知名学者间的合作。

[21] See also Theodor W. Adorno, 'Die revidierte Psychoanalyse',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70–86), vol. 8.

[22] *ZfS*, 8 (1939), p. 246.

[23] Cf. M. Mitscherlich, 'Freuds erste Rebellin', in *Emma*, 12 (1978), pp. 34–5.

[24]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Ernst Simmel und die Freudsche Philosophie', in Berhard Gärlich, Alfred Lrenzer and Alfred Schimide (eds.), *Der Stachel Freud* (Frankfurt am Main, 1980).

[25] Cf. Horkheimer to Adorno, 21 June 1941.

[26] Fromm to Horkheimer, 16 November 1939.

[27] Cf. Rainer Funk, *Erich Fromm* (Reinbek bei Hamburg, 1983), pp. 99–100.

[28] Horkheimer to Fromm, 18 October 1946. [1934年6月30日, “在希特勒的命令下, 冲锋队领导人、勒姆 (Röhm)、恩斯特 (Ernst)、海因内斯 (Heines), 还有许多知名纳粹‘保守派’在慕尼黑以及慕尼黑附近的几个城市未经审讯就被处死, 同时格林在普鲁士开始了更为残酷的大屠杀。”见 E. J. Passant, *A Short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45 (Cambridge, 1959), p. 195.] 施特莱西尔的死刑是在 1946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三) 执行的。

[29] Erich Fromm,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1942), pp. 233, 238.

[30] *Ibid.*, p. 246.

[31] Horkheimer to Neumann, 10 July 1940.

[32] Adorno to Horkheimer, 5 August 1940.

[33] 这里说的是洛文塔尔一家、马尔库塞一家和霍克海默一家。Horkheimer to Lowenthal, 10 August 1940.

[34] Horkheimer to Neumann, West Los Angeles, 30 April 1941.

[35] Horkheimer to Pollock, 30 May 1941.

[36] Horkheimer to Adorno, 26 June 1941.

[37] Friedrich, Pollock, 'Bemerkungen zur Wirtschaftskrise', *ZfS*, 2 (1933), p. 347.

[38] Max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2 (1939), pp. 121, 128.

[39] Max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1978).

[40] *Ibid.*, pp. 101, 102 [译文有改动]。

[41] *Ibid.*, p. 97, pp. 112–3 [译文有改动], pp. 114, 116, 107.

[42] Horkheimer to Adorno, 21 June 1941.

[43] Friedrich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y and Limitations', *SPSS*, 9 (1941), pp. 200–25; repr. In Arato and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Pp. 71–94. 从学刊以英文出版第二期开始, 以后每期刊物都有一个专门的论题。第二期刊物的主要论题是大众传播。刊物为 1941 年秋季那一期计划的论题是官僚科层体系, 为 1942 年春季那一期计划的主题是方法论, 为夏季准备的论题是舆论。

[44] 'Arbeiterbewegung im Staatskapitalismus'.

[45] Horkheimer to Pollock, 30 May 1941.

[46] Adorno to Horkheimer, 8 June 1941.

[47] Adorno to Horkheimer, 2 July 1941.

[48] Horkheimer to Pollock, Pacific Palisades, 1 July 1941.

[49] Horkheimer to Neumann, 20 July 1941.

[50] Max Horkheimer, *SPSS*, 9 (1941), pp. 167–7.

[51] Adorno to Horkheimer, 18 August 1941.

- [52]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 I. Lenin* (London, 1930, repr. 1972), cited in Dwight MacDonald, 'The End of Capitalism in Germany' in *Partisan Review*, 7 (1940), p. 201.
- [53] Neumann to Horkheimer, 23 July 1941.
- [54] Horkheimer to Neumann, 2 August 1941.
- [55]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 1944* (New York, 1963), p. 227
- [56] 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trans. Edward Shils (London, 1940) .
- [57] Neumann to Horkheimer, 28 August 1941.
- [58] Horkheimer to Neumann, 30 August 1941.
- [59] Cf. Erd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p. 113.
- [60] [Thomas Hobbes, *Behemoth; or an Epitome of the Civil War of England, from 1640 to 1660* (London, 1679), *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ed Ferdinan Tönnies (London, 1889; 2nd edn, London, 1969) .]
- [61] Neumann, *Behemoth*, p. 354.
- [62] Claire Russell, 'Die Praxis des Zwangskartellierung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97 (1937), p. 500, cited in Neumann, *Behemoth*, p. 266. 卡莱尔·卢塞尔作为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成员被列该研究所学刊(1937)上。
- [63] Neumann, *Behemoth*, p. 354.
- [64] “通过欢乐而获得力量”是纳粹的一个休闲组织。参看上书。
- [65] *Ibid.*, pp. 431-2.
- [66] *Ibid.*, pp. 633-4.
- [67] Franz L. Neuman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5 (1950), p. 176.
- [68] Horkheimer, draft of a letter to Laski, March 1941.
- [69] Horkheimer to Neumann, 2 June 1942.
- [70] Neumann, *Behemoth*, pp. 463-4.
- [71] *Ibid.*, p. 471.
- [72] *Ibid.*, p. 472-473.
- [73] 托马斯·曼 (1875-1955), 小说家, 莱昂·福伊希特万格 (1884-1958), 德国小说家, 《犹太人聚斯》(*Jew Süß*) 的作者。
- [74] 海因利希·曼 (1871-1950), 小说家和散文家, 托马斯·曼的哥哥。

[75] Ludwig Marcuse, *Mein zwanzigstes Jahrhundert* (Zurich, 1975), p. 267. 路德维希·马尔库塞 (1894–1971), 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 1946–1972 年间在洛杉矶任哲学教授; 马克斯·赖因哈特 (Max Reinhardt, 1873–1943), 出生于奥地利的戏剧导演, 1924 年在柏林著名的科尔福尔施坦达姆 (Kurfürstendamm) 开办了一家喜剧院, 一直办到 1933 年; 列奥波德·耶斯纳 (Leopold Jessner, 1878–1945), 1919–1930 年任柏林国家剧院的导演; 弗利茨·科特纳 (Fritz Kortner, 1892–1970), 出生于奥地利的作家和导演; 恩斯特·多伊彻 (Ernst Deutsch, 1890–1969), 德国演员; 贝尔特霍尔德·费尔特尔 (Berthold Viertel, 1885–1953), 奥地利导演和作家, 在《火炬》(*Die Fackel*) 杂志为卡尔·克劳斯充当助手; 布鲁诺·弗兰克 (Bruno Frank, 1884–1945), 德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萨纳利-苏尔梅尔在法国土伦附近。

[76] 汉斯·艾斯勒 (1898–1962), 作曲家, 曾师从勋伯格, 1928 年起在柏林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 (Marxistische Arbeiterschule) 教授音乐, 也曾与布莱希特合作。1933 年到 1948 年他在美国过着流亡的生活。1950 年以后, 他在西德的艺术研究院和高等音乐学校 (Hochschule für Musik) 开始教授作曲。] 1942 年夏天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 研讨会往往促进了把霍克海默圈子的人和布莱希特圈子的人的交往, 参看讨论记录和霍克海默的编者前言, in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2, pp. 559–86.

[77]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27 August 1941.

[78] Horkheimer to Neumann, 1 February 1942.

[79] Horkheimer to Neumann, 8 July 1942.

[80] Horkheimer to Pollock, 22 June 1941.

[81] Walter Benjamin's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Benjamin, *Illumination*, trans. Harry Zohn (Glasgow, 1973), pp. 255–66.

[82] Horkheimer to Adorno, 4 August 1941,

[83] Horkheimer to Marcuse, 17 October 1941; cf. p. 252.

[84] Horkheimer to Marcuse, 26 November 1941 and 6 December 1941.

[85]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11 February 1942.

[86] Horkheimer to Adorno, 28 August 1941,

[87] Max Horkheimer, 'The End of Reason', *SPSS*, 9 (1941), pp. 366–88; repr. In Arato and Gebharde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pp. 26–48.

[88]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in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eds),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mimeograph (New York, 1942.)

[89] Herbert Marcuse,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SPSS*, 9 (1941), p. 430.

- [90] Horkheimer to Marcuse, 6 December 1941.
- [91] Horkheimer to Kirchheimer, 16 August 1942.
- [92] Marcuse to Horkheimer, 11 November 1942.
- [93] Horkheimer to Marcuse, 10 November 1942.
- [94] Horkheimer to Marcuse, 10 November 1942.
- [95] Marcuse to Horkheimer, 10 November 1942.
- [96] Cf. Horkheimer to Neumann, 2 June 1942.
- [97] 阿多诺的 ‘Zur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一文, 1949 年以 “勋伯格与进步” ( ‘Schönberg und der Fortschritt’ ) 为标题, 作为《新音乐哲学》(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 的第一章发表, 除精简了一些论政治的部分、增加了一些关于音乐的部分之外, 并没有大的改动。
- [98] Horkheimer to Adorno, 28 August 1941.
- [99] Adorno to Horkheimer, 4 September 1941.
- [100] Horkheimer to Adorno, 28 August 1941.
- [101] ‘Zur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typescript, p. 88; 与西奥多·W.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Frankfurt am Main, 1974) 文本相同, 见 p. 122; cf.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trans. Anne G. Mitchell and Wesley V. Bloomster (New York, 1973), pp. 128-9.
- [102] Ibid., typescript, p. 25;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pp. 58-9; cf.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pp. 57-8.
- [103] Ibid., typescript, pp. 32-33; *Philosophie*, pp. 65-6; cf. *Philosophy*, pp. 64-6.
- [104] Ibid., typescript, p. 74; *Philosophie*, p. 110; cf. *Philosophy*, pp. 107, 115.
- [105] Ibid., typescript, p. 35; *Philosophie*, p. 68; cf. *Philosophy*, pp. 68-9.
- [106] Ibid., typescript, pp. 65, 66; *Philosophie*, p. 102; cf. *Philosophy*, p. 106.
- [107] Ibid., typescript, pp. 65, 66; *Philosophy*, p. 103, 102
- [108] Ibid., *Philosophie*, p. 100; cf. *Philosophy*, p. 103.
- [109] Ibid., typescript, pp. 65-6; *Philosophie*, p. 102; cf. *Philosophy*, p. 106.
- [110] Ibid., typescript, pp. 35-6; *Philosophie*, pp. 68-9; cf. *Philosophy*, pp. 69.
- [111] Ibid., typescript, p. 74; *Philosophie*, p. 111; cf. *Philosophy*, p. 115.
- [112] Ibid., typescript, p. 90; *Philosophie*, p. 125; cf. *Philosophy*, p. 132.
- [113] Ibid., typescript, p. 36; *Philosophie*, p. 39; cf. *Philosophy*, p. 69.
- [114] Ibid., typescript, p. 83; *Philosophie*, p. 117; cf. *Philosophy*, p. 123.

- [115] Ibid. , typescript, p. 79, *Philosophie* , p. 114.
- [116] Ibid. , typescript, p. 6, *Philosophie* , p. 40, cf. *Philosophy* , p. 69.
- [117] Ibid. , typescript, p. 35, *Philosophie* , p. 68.
- [118] Ibid. , typescript, p. 43, *Philosophie* , p. 80.
- [119] Ibid. , typescript, p. 74, *Philosophie* , p. 110, cf. *Philosophy* , p. 115.
- [120] Ibid. , typescript, p. 75, *Philosophie* , p. 111, cf. *Philosophy* , p. 116.
- [121] Horkheimer to Adorno, 28 August 1941; see also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in Horkheimer and Adorno (eds),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 pp. 54–5.
- [122] Horkheimer to Adorno, 28 August 1941.
- [123] Adorno to Horkheimer, 2 October 1941.
- [124] Horkheimer to Laski, 10 March 1941.
- [125] Adorno to Horkheimer, New York, 10 November 1941. See also Geoffrey Gorer,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the Marquis de Sade* (London, 1932) .
- [126] 瓦尔特·本雅明曾于1940年4月写信给格蕾特·阿多诺说：“那将给热情洋溢的误解打开宽敞的大门。”
- [127] Adorno to Horkheimer, New York, 12 June 1941.
- [128] Horkheimer to Adorno, Pacific Palisades, 21 June 1941.
- [129] 'Autoritärer Staat',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
- [130] Theodor W. Adorno, 'Veblen's Attack on Culture', *SPSS* , 9 (1941), p. 404.
- [131] Ibid. , p. 402.
- [132] Theodor W. Adorno, 'Spengler Today', *SPSS* , 9 (1941), p. 319.
- [133] Adorno to David, New York, 3 July 1941.
- [134]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in in Horkheimer and Adorno (eds),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 p. 40; cf. 'The End of Reason', in Arato and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 p. 37.
- [135]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Pacific Palisades, 23 May 1942.
- [136] Max Horkheimer and (?) Theodor W. Adorno, *Memorandum über Teile des Los Angeles Arbeitsprogramms, die von den Philosophen nicht durchgeführt werden können* (1942), Max Horkheimer Archive, VI 32. 1 ff.
- [137] Horkheimer to Weil, Pacific Palisades, 23 March 1942.
- [138] Horkheimer to Pollock, Pacific Palisades, 12 October 1942.
- [139] Pollock to Horkheimer, 5 November 1942.

- [140] Horkheimer to Pollock, 10 February 1942.
- [141] Horkheimer to Tillich, 12 August 1942.
- [142] Horkheimer to Marcuse, 17 August 1942.
- [143] [Jacob Burckhardt (the Yonger), *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ed. Jakob Oeri, 4 vols (Berlin, 1898–1902) .]
- [144] Theodor W. Adorno, 'Reflexionen zur Klassentheorie',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p. 381.
- [145] Cf.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2, pp. 75–6.
- [146] Horkheimer to Marcuse, 3 April 1943.
- [147] Horkheimer to Marcuse, 19 December 1942. Horkheimer to Marcuse, Pacific Palisades, 14 October 1942.
- [148] Horkheimer to Marcuse, Pacific Palisades, 14 October 1941. [在这里指的书包括这些: Johann J.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ö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 (Stuttgart, 1861) - cf. *Myth, Religion, and Mother Right; Selected Writings of J. J. Bachofen*, trans. Ralph Manheim (Lodon, 1967); J.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3<sup>rd</sup> edn, 12 vols (Lodon, 1907–15); Lucien Lévy-Bruhl, *La Mentalité é primitive* (Paris, 1922) -cf. *Primitive Mentality*, trans. Lilian A. Clare (London, 1923); Robrt H. Lowie,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1934); Bronislaw Malinowski,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London, 1926); Salomo Reinach, *Cultes, Mythes, et Religions*, 5 vols (Paris, 1905–25) - cf. *Cults, Myths and Religions*, trans. Elizabeth Frost (London, 1912); Ervin Rohde, *Psyche. Seelencult und Unsterblichkeitsglaube der Griechen* (Freiburg im Breisgau, 1890) -cf. *Psyche*, trans. W. B. Hillis (London, 1925; New York, 1966) .]
- [149] Horkheimer to Tillich, 12 August 1942.
- [150] Horkheimer to Pollock, 27 November 1942.
- [151] Horkheimer to Pollock, 11 April 1943.
- [152] Horkheimer to Pollock, 20 March 1943.
- [153] Horkheimer to Pollock, 17 June 1943.
- [154] 参看霍克海默的讨论记录,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 pp. 594–605.
- [155] Theodor, W. Adorno, 'Fragmente über Wagner', *Zfs*, 8 (1939), pp. 1–49, and 'Zur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 [156] 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1947);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

ming

[157] (London, 1979), p. xi.

[158] *SPSS*, 9 (1941), p. 139.

[159]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p. 259.

[160] 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1977), pp. 328–55. ]《启蒙辩证法》英译本在第 49 页脚注 6 中引述了克拉格斯。中文版(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克拉格斯则出现在附论 1 的尾注 7 中。

[161]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 223. 中文版参看第 253 页。

[162] *Ibid.*, pp. 3, xvi.

[163] *Ibid.*, pp. 11–12; cf. p. 6. 中文版第 9 页。

[164] *Ibid.*, pp. 6 and 13. 中文版第 10 页。

[165] Georg Luká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 Anna Bostock (London, 1971).

[166]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 57. 参看中文版第 57 页。

[167]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p. 50–51. 参看中文版第 50–51 页。

[168] *Ibid.*, p. 92; 参看中文版第 101 页。

[169] *Ibid.*, p. 117; 参看中文版第 126 页, 译文根据原文有改动。

[170] *Ibid.*, p. 35; 参看中文版第 32 页, 中文版作“历史循环过程”, 本处译文根据原文译出。

[171] *Ibid.*, pp. 84, 93; 参看中文版第 93 页和第 102 页, 译文有所改动。

[172] Julien Benda, *La Trahison des Clercs* (Paris, 1927), trans. Richard Aldington as *The Great Betrayal* (London, 1928); the American title was *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 Horkheimer to Pollock, Pacific Palisades, 7 May 1943.

[173] Adorn to Lowenthal, 3 June 1945.

[174]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 xvi. 参看中文版第 7 页。

[175] *Ibid.*, p. 117; 参看中文版第 126 页, 译文有改动。

[176] *Ibid.*, pp. 117 and 31; 参看中文版第 28 页。

[177] *Ibid.*, pp. 31–3; 参看中文版第 28–30 页, 译文有改动。

[178] *Ibid.*, pp. 33–4; 参看中文版第 31–32 页, 译文有改动。

[179] Max 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ur Anthropologie des bü

rgerlichen Zeitalters) ', in *ZfS*, 5 (1936), pp. 161–234.

[180]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 142. 参看中文版第 158–159 页。

[181] *Ibid.*, p. 167.

[182] *Ibid.*, pp. 170–1, 参看中文版第 191–192 页。

[183] *Ibid.*, pp. 199–200; 参看中文版第 224 页。

[184] *Ibid.*, pp. 110, 112; 参看中文版第 119 页, 第 121 页, 译文有改动。

[185] *Ibid.*, pp. 181–2 [translation corrected]; 参看中文版第 203–204 页, 译文有改动。

[186] *Ibid.*, p. 172 [translation corrected]; 参看中文版第 192–193 页, 译文有改动。

[187] *Ibid.*, p. 168; 参看中文版第 188 页, 译文有改动。

[188] *Ibid.*, pp. 176–7, 179; 参看中文版第 198 页和第 201 页。

[189] *Ibid.*, pp. 188–9; 参看中文版第 211–212 页。译文有改动。

[190] *Ibid.*, p. 180; 参看中文版第 202 页。译文有改动。

[191] Martin Buber, 'Der Glaube des Judentums' (1933), repr. in Kurt Wihelm (ed.), *Jüdischer Glaube. Ein Auswahl aus Zwei Jahrtausenden* (Bremen, 1961), p. 513.

[192]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29 November 1941.

[193] Horkheimer to Pollock, 9 June 1943.

[194] Horkheimer to Marcuse, 11 September 1943.

[195] Horkheimer to Pollock, 19 November 1943.

[196]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47), p. vii. 本书最早是以英文出版的, 直到 1967 年才以德文出版, 这个德文版内容略有改动, 书的标题也换成了《工具理性批判》(*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197] 也就是“黄昏”这个意象。这个格言集的英文标题是 *Dawn and Decline*。

[198]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 6.

[199] *Ibid.*, p. 4.

[200] *Ibid.*, p. 35.

[201] *Ibid.*, pp. 61, 81.

[202] *Ibid.*, p. 61.

[203] *Ibid.*, p. 32.

[204] 'Materialismus und Metaphysik', *ZfS*, 2 (1933), p. 31, in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 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86), p. 45.

[205] Horkheimer to Tillich, 12 August 1942; see above, p. 318.

[206]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 182.

[207] Ibid., p. 49.

[208] Ibid., p. 100.

[209] Ibid., p. 103.

[210] Ibid., pp. 94, 102.

[211] 恩斯特·云格尔 (Ernst Jünger, 1895–1998), 德国小说家和随笔作家; 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1872–1922), 法国戏剧家。

[212]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p. 95–100.

[213] Ibid., p. 100.

[214] Ibid., pp. 187, 119.

[215] Marcuse to Horkheimer, 18 July 1947.

[216] 其他三家犹太人保护机构是: 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反诽谤联盟和犹太劳动委员会。

[217] Isacque Graeber, Steuart Henderson Britt et al. (ed.), *Jews in a Gentile World: The Problem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1942).

[218] Arthur D. Morse, *While Six Million Died* (London, 1968), p. 149.

[219] George Orwell, 'Anti-Semitism in Britain', *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 8 (1945).

[220] Neumann to Horkheimer, 20 December 1941.

[221]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27 August 1942. 伊萨克·格莱博尔 (Isacque Graeber), 《异教世界中的犹太人》(*Jews in a Gentile World*) 的编者之一, 1941年受聘于研究所, 为研究所争取基金资助。

[222] Horkheimer to Adorno, 17 September 1942.

[223] Neumann to Horkheimer, 17 October 1942.

[224] Horkheimer to Pollock, 9 November 1942.

[225] See *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 6 (December 1943), p. 657.

[226] Pollock to Horkheimer, 2 March 1943.

[227] Pollock, 'Memorandum no. 18', 24 February 1943, an item in the Horkheimer-Pollock correspondence.

[228] Horkheimer to Marcuse, 17 July 1943.

- [229] Horkheimer to Pollock, 26 October 1943.
- [230] Adorno to Horkheimer, 3 February 1943.
- [231]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n, *Prophets of Deceit: A Study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American Agitator* (New York, 1949) .
- [232] *SPSS*, 9 (1941), p. 142.
- [233] Horkheimer to Pollock, 19 May 1943.
- [234] Horkheimer to Pollock, 17 December 1943.
- [235] *Approach and Techniques of the Berkeley Group* (December 1943), p. 4 (Max Horkheimer Archive, VI 34. 37–43) .
- [236] Horkheimer to Pollock, 25 March 1944.
- [237] See 'Speech of Dr. H. of April 16th 43', published in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2, p. 168.
- [238] Horkheimer to Pollock, 25 March 1944.
- [239] Ibid.
- [240] Ibid.
- [241]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Studies in Anti-Semitism: A Report on the Cooperative Project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for the Year Ending March 15, 1944*,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August 1944), p. 29.
- [242] Ibid, pp. 30–1.
- [243] Horkheimer to Pollock, 19 May 1943.
- [244] Adorno to Horkheimer, 'Memorandum re: Manual for Distribution among Jews', 30 October 1944.
- [245] Adorno to Mendelssohn, 18 December 1943.
- [246]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Progress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Department* (22 June 1945) (Max Horkheimer Archive, IX 66) .
- [247] Report by Gurland cited by Pollock, 'Memorandum re: Jewish Labor Committee', 23 December 1943, part of the Horkheimer-Pollock correspondence.
- [248] Pollock, in *ibid*.
- [249] *Anti-Semitism among American Labor: Report on a Research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44–1945*,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45) (Max Horkheimer Archive) .
- [250] Adorno to Horkheimer, 2 December 1944.
- [251] Horkheimer to Adorno, 9 December 1944.

- [252] Adorno to Horkheimer, 14 December 1944.
- [253] Adorno to Horkheimer, 26 October 1944.
- [254] Adorno to Horkheimer, 9 November 1944.
- [255] Horkheimer to Adorno, 19 December 1944.
- [256] Adorno to Horkheimer, 30 December 1944.
- [257] Theodor W. Adorno, 'Wissenschaftliche Erfahrungen in Amerika', in Adorno, *Stichworte* (Frankfurt am Main, 1969), pp. 136–7.
- [258] Horkheimer to Adorno, 9 December 1944.
- [259] Adorno to Horkheimer, 18 December 1944.
- [260] Ibid.
- [261]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p. 237.
- [262] Adorno to Horkheimer, 26 October 1944.
- [263] Cf.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 226.
- [264] Theodor W. Adorno, *Notes by Dr Adorno on Mrs Frenkel-Brunswik's Article on the Antisemitic Personality* (enclosure with the letter from Adorno to Horkheimer of 25 August 1944) .
- [265] Ibid. , pp. 1 and 7.
- [266] Horkheimer to Adorno, 19 December 1944.
- [267] Ibid.
- [268]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Progress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Department*, 'List of Scientific Projects', 22 June 1945 (Max Horkheimer Archive, IX 66) .
- [269] Bruno Bettelheim, *Surviving,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79), p. 15.
- [270] Bruno Bettelheim, 'The Individual and Mass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1943), pp. 417–52, repr. , as offprint (Indianapolis, 1943) .
- [271] Bruno Bettelheim, 'The Victim's Image of the Anti-Semitism; the Danger of Stereotyping the Adversary', in *Commentary*, 5 (1948), pp. 173–9.

怀着对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勃勃雄心——对哲学工作的渴望——没有必要建立起一个理论家共同体——走访殖民地

盟军 1945 年 4 月进入德国领土，德国随即于 5 月投降，此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却都一心铺在他们那巨大的反犹主义研究计划之中。他们两人此时已经是美国公民了。研究计划完全是按照美国的情况制定的：为这项研究计划提供资助的组织所关心的是如何改善在美犹太人的境遇，这项研究计划也为霍克海默圈子提供了机会，使之能够通过把“欧洲思想”和美国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在美国社会研究领域赢得声誉。

阿多诺惊讶地发现，他长期盼望的纳粹主义的失败却根本无法使他感到兴奋。他向霍克海默承认说，他的“力比多”那时更多地投入到了“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上”，而不是“世界历史进程上”，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可能同世界历史进程是相抵触的”。然而，尽管未来一片漆黑——“我们对此看法一致”，可是他还是看到了一些让他们高兴的理由：

首先，世界从一个灾难到下一个灾难之间过渡的任何一个喘息之机都是值得庆幸的。其次，希特勒和希姆莱（Himmler）毕竟只是别处的极端恐怖的名字，至少这里现在尚未出现这种恐怖。现

在，事情的结果比你想像的要好，也许它们比我们两人所预料的都好。<sup>[1]</sup>

就霍克海默而言，他在几个月之后将会接受如下的观点：即两种德国的区别（主要由左翼德国移民进行）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是一般意义上的德国——体现了“从阶级社会阶段向有组织的欺诈社会阶段”无限制的过渡所表现出的症状。

382           这个提法的意思无非是说，人民不过是畜群，他们的本性视他们的领头人而定，或者换个现代一点的说法，他们可以被驱使着干任何官员想让他们干的事情，因为官员深谙心理学方法……谁能够控制那些应对纳粹负责的德国人呢？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同样热情地去接近斯大林或是通用公司。<sup>[2]</sup>

这是否意味着霍克海默和他的圈子不相信一个新德国的可能性呢？他们拒绝介入并影响德国的发展吗？研究所没能找到赞助人来资助他们已经草拟的有关德国的研究计划，于是就不再对德国感兴趣了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埋头建构的理论——他们将他们正在建构的理论视为《启蒙辩证法》的延续，他们认为这种理论乃是对现时代社会普遍趋势的辩证批判——使得他们的兴趣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吗？纳粹已被击败，但他们感到在曾经清除过犹太人的欧洲不如在美国那么自在，是这样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战争已经结束，研究所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之间业已建立起了有利的合作关系，研究所的过渡期似乎已经到来了，使得原有的理论家共同体得以恢复的问题似乎应该被提出来了。但是与研究所有关的所有人没有公开提出这个问题。

在战争期间，研究所非常乐意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诺伊曼、马尔库塞和基希海默等研究所研究人员都在为政府工作——这证明了研究所也投身于美国的战时服务。这三个人在战争结束时还与研究所保持

着联系。在霍克海默五十岁生日时，这三位华盛顿“特使”还发来电报，并为不能赶到纽约致歉。他们三人当然都一如既往地希望再次成为研究所的成员。对诺伊曼和马尔库塞来说，脱离研究所让他们很痛苦。但是基希海默脱离研究所并不那么痛苦，因为他在研究所从来没有获得过与那两人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还是可以邀请他接受一个兼职的任命。但是显然有一个因素一直阻碍着他们回归研究所。这三位研究所曾经的成员不可能得知1945年春费利克斯·韦尔已经允诺会给研究所提供10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三人看来，研究所的领导人小心谨慎地避免先开口向他们发出再回来工作的邀请。反犹主义研究计划期限将临；在霍克海默看来，新的资金的使用安排应该着眼于“使研究所免于介入大规模研究，从而能集中精力搞关键性工作”的方面。正如费利克斯·韦尔所赞成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暂时只能“在几年之后为研究所的成员提供相应的经济保障”，<sup>[1]</sup>只能永久性地彻底关闭研究所驻纽约的办事处，使研究所彻底摆脱新的财政负担。

“霍克海默圈子”这个词在1940年代中期专指四个人，他们每个人都与霍克海默有着特殊的关系：波洛克，研究所的合作领导人，“亲密的”、忠诚的伙伴；阿多诺，理论工作上的可靠伙伴；洛文塔尔，各种研究计划的忠心合作者；以及韦尔，忠诚的资助者。而与其他人的疏远和分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弗洛姆仍然被当作修正主义者而被拒之门外，尽管外界所编辑的丛书仍然把他的书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书列在一起出版。马尔库塞还继续和霍克海默保持着联系，但是也疏远了。研究所偶尔就一些法律问题咨询诺伊曼。基希海默的情况也一样，研究所只是偶尔就某些问题咨询他。战争结束之后，这三个人继续为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都在美国大学里找到了终身职位。格罗斯曼拿到了研究所给他的一笔数目不大的补助金。1940年代期间，魏特夫与研究所的联系越来越少，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取代社会研究所和太平洋关系研究所而成为他中国历史研究计划的资助者之后，他与研究所的关系就于1947年正式终止了。1951年有人证明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成员里有

共产党员曾为中国共产党效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击垮蒋介石。这件事情之后，魏特夫被麦卡锡附属委员会传唤。该委员会是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附属委员会（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的小组委员会。作为一个已经脱党了的共产党员，他对他的行径深表歉意，他曾揭发研究所前研究员莫西·芬克尔斯坦因（Moses Finkelstein）是一名共产党员。

384 研究所一直关注着德国的最新事态，一直关心着德国。尽管如此，在对此最留心的霍克海默看来，在保持关注的同时还是应该保持一种真正的保留态度。即使那些最无顾忌的人也会因为时局的各种限制而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德国已经被毁掉了，已经被分割为许多占领区。当时美国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出版也要服从于审查制度。自由旅行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官方活动否则任何人不得入境。甚至要离开美国也是困难重重。最初平民是得不到护照的。除非是政府公干不得旅欧。另外，当时根本无法预测盟国将会怎样处理德国。西方盟国发出的消除纳粹余孽的指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他们的态度。这些指令的侧重点在于安全事务，很少透露出德国新政府官员的任命标准的有关信息。军事管制政府的官员们常常采用最简便的方法来稳定局势：他们完整地把德国原有的组织机构保留下来，让它们继续各行其职，继续让那些办事得力的公务员待在他们的位子上。即使进行人事变动，也是常常用不那么出名的纳粹主义者、用纳粹主义的同路人替代那些出名的纳粹主义者。马尔库塞在回忆他为战略事务局（OSS）工作的那段时期的时候说：“举例来说，被我们排在‘经济战犯’名单最前面的那些人很快就官复原位，回到了重要的、掌握着德国经济的重要岗位之上。”<sup>[4]</sup>

对政治活动的禁止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盟军占领期间，许多城市里以前建立起来的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并因此而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当时的情况对纳粹继续存在的条件和许多非政治领域里的保守主义势力（首先是经济领域和行政方面的保守主义势力）很有利。此外，盟国并没有鼓励德国移民回国的打算，即使是这样的长期打算也没有。他们作着相反的打算倒是真的。

这从释放战犯过程中所采用的程序上可以反映出来。英国是最后一个释放反法西斯主义政治犯的。只有很少的有影响力的占领国采取了彻底民主的路线，而最后这一小部分占领国的影响也很快萎缩了。在美国一开始进入德国的时候，就有一大批德国经理相信美国的资本将会投入到德国的重建工作之中，仅仅两年之后，他们的想法就证实了。这种情况也证明阿多诺听说德国投降之后于1945年5月9日写给霍克海默的那封信里面所说的是对的：

与我们就实际事务的争论的通常结果一样，我们都是正确的。希特勒不可能维持下去，我的这个资产阶级论点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他的溃败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其结果成了一种反讽。换句话说，经济上更为发达的国家的生产力肯定会比“后发国家”的技术手段和恐怖手段的高度发展更为有力；与历史的一般趋势相符，战争总是通过用工业对抗军事的方式来赢得胜利的。由此得出的推论是，你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力量的论点也是正确的，只不过这种力量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就像拿破仑失败之后欧洲才成了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样，就像这个年轻的、大胆的失败者将他的生意转让给了一个更强大的公司一样。<sup>[5]</sup>

这些事态远非他们所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像霍克海默及其圈子成员这样的平头百姓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况且霍克海默圈子通过判断时局，都一致认为现在仓促返回德国一点好处都没有。1945年3月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了一次“国家社会主义的后果：国家社会主义溃败之文化面面观”的系列讲座。霍克海默主讲“极权主义和欧洲文化的危机”，阿多诺主讲“艺术的命运”，波洛克主讲“偏见与社会阶级”，洛文塔尔主讲“集权主义恐怖的后果”。这些讲座表明，研究所对德国和欧洲的学术兴趣依然持续着，而且他们在讲座中显然也暗示说，德国和欧洲问题最好是在美国得到研究。比如说，阿多诺讲座的中心论点如下：希特勒只是一种历史趋势的执行者，而那种趋势似

385

乎早就先于希特勒而存在着，而且在他之后也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这个趋势就是中产阶级的野蛮化、文化（特别是艺术的）的普遍中立化、文化和艺术逐渐被文化工业所取代。“现成的娱乐工业的俗套替代并拙劣地模仿着真正艺术的想像力，正是真正艺术想像力的缺乏最终使德国人、贝多芬的人民变成了希特勒的人民。”<sup>[6]</sup>

如果像阿多诺在他的讲座中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就是进行否定，就是将灾难作为灾难来看待，那么美国不就是文化工业批判的更好的研究对象吗？

从另一方面来看，阿多诺提请听众加以警惕的是欧洲文化的人为的保守性和标准化特征。欧洲文化是否能够克服它那就要发展到尽头的异化形式，取决于这种文化内部是否还存在着不能被异化形式所涵盖的某种残余。阿多诺在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身上看到的更多是希望，尽管那里的法西斯主义要比美国的法西斯主义严重得多。

有些人批评知识分子圈子里盛行的艺术现代主义，但是也正是这同一些人却构成了这样一个小圈子，他们的民间理念（folk ideas）比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那些最新奇的作品离人民的生活还要遥远。德国人更愿意去给希特勒打仗，而不愿意听希特勒的马屁精们演出的戏剧和歌剧，这听上去有些悖论的意味。当战争灾难让德国的音乐生活荡然无存的时候，战争也仅仅是把因希特勒一伙建立起对文化的专政而无法说出的一种判断表达出来罢了。<sup>[7]</sup>

对阿多诺来说，他难道不该在德国的战争结束之后尽快地做出努力去保护欧洲文化，使欧洲文化（至少是音乐领域之内的欧洲文化）得以存活并延续下去吗？

实际上在霍克海默圈子里，阿多诺是第一个提出研究所学刊复刊建议的人。1945年1月他就与在苏黎世设有分部的古根海默（Guggenheimer）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古根海默认定战争一结束一定有许多德国人乐意读纳粹反对者所写的德语作品。这个想法激励了阿多诺，他同意

古根海默出版他和汉斯·艾斯勒合作完成的《电影构成要素》，他论瓦格纳的专著也交由该出版社出版，并建议古根海默接手研究所学刊的继续出版工作。阿多诺还让霍克海默授权同一出版社出版他们的合作著作《哲学断片》。

所有这些建议都没能实现。霍克海默更加倾向于“等待观望”。他告诉阿多诺说，他将委托与研究所有合作关系的自由撰稿人诺尔伯特·古特曼 (Norbert Gutermann) 和一位美国编辑一起合作，根据包括2月和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社会与理性”的讲座稿在内的各种讲座稿，整理出一个可供出版的英文本底本。当他这么向阿多诺说的时候，也表现出了他的那种等待观望态度。

另一个力主复刊的人是马尔库塞。反法西斯的智囊机构战略事务局于1945年春解散，它那些最重要的部门都划入了其他的部局。马尔库塞原来所属的那个部门被划入了国务院。可是国务院的研究和情报署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 Division) 强烈反对这个新部门的所谓共产主义倾向，这个新部门的财政因而也被暂时冻结。马尔库塞写信告诉霍克海默说，即使这个部门被解散，他也没有什么好惋惜的。

过去几年中我在“闲暇时”写下和收集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可以用于写作一本新书……当然，这本书的中心是“缺席的革命”这个问题。你也许想起了以前我在圣摩尼卡就语言形式的转变、“科学操控”的作用和系统经验的结构等问题写的那些手稿。这些材料现在被扩充成了这本书的一个部分。所有这些是否符合你的计划呢？你认为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同时或者之后还有时间进行别的研究吗？你打算继续把学刊办下去吗？<sup>[8]</sup>

其实他转弯抹角地想问的是，如果他丢了情报局的工作，是否能够再成为研究所和霍克海默的研究员；研究所能否恢复他在1942年被迫中止的工作。霍克海默间接地为这个拐弯抹角的问题给予了否定的答复。他说，西海岸的一切事情都有定规，他和阿多诺把时间全部都投入

到了反犹主义研究之中，甚至波洛克和费利克斯·韦尔也被他们拉进来提供帮助。这就等于说，现在根本没有理论研究工作的余地，当然也没有大规模合作研究的可能了。说到学刊，霍克海默的答复透露出他对此没有什么热情。如果复刊的费用可以接受的话，学刊也许会尽快在荷兰出版。然而，困难在于当时禁止德国进口出版物。换句话说：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这只是一个好听的托词，霍克海默借以掩盖他在复刊事宜上的拖拉作风。

对霍克海默来说，他最关心的是打探出法兰克福的情况。当他听说马尔库塞将要私下前往英国去探望母亲的时候——那时他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通过正式途径前往欧洲——他对马尔库塞突然奔赴欧洲的大胆举动感到颇为震惊。霍克海默请求马尔库塞了解一下前往法兰克福进行一次实地考察是否有价值，有没有必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那里建立一个“前哨”。<sup>[9]</sup>

从马尔库塞这边来看，他是无法完成霍克海默提出的这个要求的。相反，从伦敦和巴黎返回之后，马尔库塞比以前更为强烈地要求继续把学刊办下去。在伦敦，他拜会了卡尔·曼海姆和理查德·洛文塔尔等人，在巴黎他拜会了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和让·瓦尔 (Jean Wahl) 以及其他许多年轻的存在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的。

他们所有人都问我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再也看不见学刊的名字了。他们说，这是惟一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在真正“前卫”层面讨论真正问题的一份出版物。目前普遍性的方向迷失和孤独感是那么严重，因此相比以往，学刊的重新出版是更为迫切的事情。即便学刊不可能以正式途径进入德国，但考虑到德国以外有足够多、足够重要的读者群，我们也得重新出版学刊。<sup>[10]</sup>

他认为，要想办好学刊，最好是像 1930 年代办刊那样，把英文、法文和德文的文章都收进来。他建议出版一期关于德国的特刊，排在这期特刊前面的文章应是对目前德国境内各党派抛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建方

案、方针的分析文章。他可以为这些分析搜集和提供材料。

霍克海默同他谈了这件事情，商定他们两人各拟一份关于今后学刊理论方向的草案。但实际最后只有马尔库塞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是在1947年初。这份草案大概是由十几页打印稿组成的，它反映了马尔库塞在战后时局基础上对当时学刊定位的理论思考。

将近两年之后，霍克海默写信给马尔库塞说，他决定和阿多诺一起，按照与马尔库塞“论题”相同的风格写出这份草案。把大量材料整理之后就可以写作了。“问题是我们不想局限于政治方面。它同时也应该成为一份哲学规划书”。<sup>[1]</sup>但这份哲学规划书后来也没有写出来，以后也就没有再讨论学刊复刊的问题了，而且学刊最终也没能继续出版。

有两个根本原因造成了霍克海默在学刊复刊一事上采取拖延的方式，以至复刊未果。其一是害怕遭人攻击，其二是担心学刊可能会收入一些与他们圈子观点不相符的文章。研究所学刊原来停刊并不是因为财政紧张；实际上是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投稿内容的不满。马尔库塞1947年2月的那个草案一定让阿多诺大为吃惊，更别说霍克海默了。虽然那份草案只是给内部人看的东西，其目的也只是澄清他们自己的观点，可是它讨论政治问题的方式太直接了，所以在读了这份草案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要将其变成可出版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马尔库塞在这份稿件的一开始这样写道：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它乃是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早熟的、特殊的形式）在军事上失败之后，世界分成了两个集团，一个是新法西斯主义集团，一个是苏维埃集团……原来的统治阶级虽然经历了战争，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存活了下来的那些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变成法西斯主义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将会从属于苏维埃主义集团。

新法西斯主义阵营和苏维埃阵营是经济上的敌人，也是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敌人，两个阵营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就其根本的统治形式而言，这两个阵营都是反革命和敌视革命的……在这种

形势之下，推进革命理论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毫不留情，毫不含糊地反对这两大阵营，必须坚决支持与这两大阵营理论相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sup>[12]</sup>

马尔库塞对全球政治局势做出的判断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是他提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由，以及他毫不掩饰地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词的方式却使得《哲学断片》的这两个作者很不高兴，首先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坚持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完全是一种受虐狂表现；其次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社会批判的基本原理正在脱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389 霍克海默甚至长期避免使用“社会批判理论”这个词。对美国政客来说揭露“非美”思想已经成为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武器，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要想摆脱困境，霍克海默必须避免使用这个词。1930年代期间众议院成立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CUA），这个暂时性机构的目的是调查法西斯主义活动和其他颠覆活动，但是从一开始该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议员马丁·代斯（Martin Dies）就利用委员会来反对罗斯福政府和新政。1945年该委员会成了一个永久性质的机构。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杜鲁门成为美国总统，他任总统之后，成立了公职人员忠诚临时调查委员会（Temporary Commission on Employee Loyalty），采取了其他种种手段以抢占共和党的先机。1947年3月他在决定给希腊提供经济和军事帮助以达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全力抑制共产主义的目的的时候，首次阐明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有了英美的帮助，君主主义者在希腊内战中击败了共产主义者。现在被杜鲁门上升到一种主义的东西成了“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国家所奉行的政策：容忍并支持其他国家的极权主义统治，目的是将其作为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这种政策一直在姑息、支持着葡萄牙的撒拉查（Salazar）独裁和西班牙的佛朗哥独裁。

美国两党内的鹰派人物都敌视新政和国内的激进分子，他们成功地诽谤这些激进分子为苏联的第五纵队。他们还以各种方式让人们回

忆起这些人在罗斯福时期对共产党没有足够的怀疑和警惕。“平政”（Fair Deal，杜鲁门以此来标榜自己将“新政”延伸到社会政策方面的计划）的支持者都敌视苏联，因为它正在质疑“全世界最伟大的民主”（罗伯特·E.库什曼 1948 年这么说）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这些人表示随时准备着打击敌人，回击对“他们国家内的美国生活方式”提出批评的批评者，把他们当作共产党驱逐出境。这两股仇恨势力凝聚成了不断升级的政治迫害。尽管这种政治迫害还没有造成逮捕、拷打和死亡，但是它的受害者必须忍受人格诋毁、失业和贫困，它造成了政治和社会生活整体氛围的毒化。

1947 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两位朋友汉斯·艾斯勒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就遭到了政治迫害。他们两人是这场政治迫害中“连坐”的牺牲品。汉斯·艾斯勒被传唤至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就因为他是戈尔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的弟弟。戈尔哈特曾被两个脱党的共产党员路易·布登茨（Louis Budenz）和路丝·费舍（Ruth Fischer）指控，这两个人中，前者曾是《工人日报》的编辑，后者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汉斯·艾斯勒于 9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华盛顿接受了公开质询。在质询过程中，汉斯·艾斯勒宣称自己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自己只是一个作曲家和音乐家，但是他还是忠于他的哥哥的。多亏了来自  
390  
众多音乐家和知识分子的证明支持，1948 年 3 月，汉斯·艾斯勒获准离开美国——但是条件是他永远不能再返回美国。布莱希特是汉斯·艾斯勒的亲密朋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自收到某德国移民的揭发以后就对布莱希特实施了监控。9 位被传唤到华盛顿参加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有关电影工业部门共产主义渗透的听证会”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当中，就有布莱希特。许多被传唤至听证会的美国公民搬出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他们有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权利——以示抗议，但是结果却受到了藐视国会的指控。另一些人拒绝到场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那样其实无异于自我控告。布莱希特于 1947 年 10 月 30 日接受质询。他像艾斯勒一样，要回答那个臭名昭著的问题：“你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吗？”他的回答是，他从来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只是一名诗人。

(同他们一样，常常遭布莱希特讥笑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宣称自己只是哲学家。)针对布莱希特的质询最后没有对他提出控告，但是质询听证会的一部分当晚在广播上进行了转播。说到底，这次“不友好的听证”质询的目的就是对那些被疑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同路人的人进行诽谤，并进而将他们置于公众舆论之下。麦卡锡的名字已经成为了那个代名词，他以肆无忌惮而有效的方式运用了反共策略，并借此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那次听证会之后，布莱希特逃往瑞士。美国当局拒绝给他美国在德国占领区的签证。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中立的美国公民，因此与艾斯勒和布莱希特不同，他们没有被驱逐出境和被拘留的危险。但是这些事件使他们更加小心翼翼了。托马斯·曼发起了一个支援汉斯·艾斯勒的委员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阿多诺放弃了最早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的《电影构成要素》合作作者的身份，因为他不想因这本并非是他自己写成的书——正如1969年他在本书的德文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而成为迫害的牺牲品，他和艾斯勒仅仅因为都是音乐家才成为了好友，他们之间是不谈政治的。

391 诸如马尔库塞拟出的草案提到的学刊复刊策略，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不仅草率鲁莽，而且也过于传统。马尔库塞提出的那些方案内容表面很有新意，但是它们实际上都强调某种正统性。他宣称，文化认同现象已经使得在更大范围对社会“黏合”问题——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社会“黏合”问题——进行探讨成为必要。他强调，来自剥削的压力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转嫁给边缘群体、外国人和那些不能被编入工人阶级的“局外人”，转嫁给“‘无组织者’、‘非熟练工人’、农业工人、临时工，被转嫁给少数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被转嫁给囚犯，等等”。<sup>[13]</sup> 马尔库塞还间接地表达了一些完全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观点相符的意见——例如理论不能与任何反共产主义集团有瓜葛等等此类的意见——但他然后又说道：

共产主义政党是，而且将来也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力量。对

这些政党的谴责必须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谴责。在做这样的谴责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理论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政党才可能变成现实，必须寻求苏联的帮助。这样的意识必须在谴责的每一个词句之中得到表现。更进一步：我们在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当中，在批判共产主义政策的同时，要更多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新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自由的确优于集权统治，但是民主的资产阶级自由却是以延长剥削几十年、阻挠社会主义自由的实现为代价换来的。<sup>[14]</sup>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不再持这种观点了。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这次喘息并不意味着延长了的剥削，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到来的推迟。相反，它首先是一次反思理论、创造理论的机会。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表明他们的如下看法：他们不再认为理论是一种进步力量；相反，他们至多将理论视为一种可以激发思考的力量。

马尔库塞还对两阶段论提出了批判。所谓两阶段论，就是指第一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尔库塞指出，技术进步必然会使这两步得以实现的信念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总是在技术上占优势，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想成功地实现共产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阶级专制，大跃进式地进入社会主义 [原文如此]。接下来，他分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并对无政府主义、瓦解和灾难表示欢迎，认为生产组织结构和人类本性结构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在革命的自由进程中发生变化。这种观点中包含着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思想相一致的地方——例如人类本性的突变性改进。但是这种观点和苏维埃共和国、无政府主义等概念融合在一起注定要让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心惊胆战。马尔库塞的这番论述把他们两人一直不想丢弃的那些思想方面暴露了出来。一些人或多或少从悲观主义人类学出发，认为从坏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推出更好的社会条件来。与这些人相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坚持认为，实现好的社会条件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并不寄希望于任何政治、社会组织或群体能够实现这种改进。他们寄希望于个体。

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这种思想而言，我们很难说，它究竟是出于客观洞见，还是出于必须把论题转换到一个不会直接引起爆炸性后果的论域的考虑。他们转入了对他们全部思想进行详细阐释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假装绕开了他们的中心论题，他们知道那个中心论题是特别容易引起震怒并招致非议的。甚至《伦理理想录》也没有讨论那个从坏社会中诞生好社会的难题，尽管这本书里面包含了对他们自己的弱点和无法克服的两难困境的全部反思。马尔库塞于1947年10月来到洛杉矶拜访霍克海默，但在谈到他的那部草案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显然被回避了。致力于缺席的革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哲学断片》的两位作者再也无法联合起来了，尽管他们就批判理论是有着共识的。马尔库塞完全不能理解《哲学断片》，甚至在1948年收到寄来的这本书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根本不能对它发表什么评论。

霍克海默对马尔库塞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犹犹豫豫、谨小慎微。马尔库塞对德国批判理论的这位创始人的行为也报以同样的态度。1946年9月19日至21日，第八次德国社会学家大会——第一次是在魏玛时期召开的——在法兰克福召开。马尔库塞给霍克海默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借了斯特林堡的一出剧名说战后德国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幽灵奏鸣曲”，而社会学家把这次大会也搞成了一场“幽灵奏鸣曲”。魏玛时期德国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列奥波特·冯·维泽1946年4月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家中组织了一次碰头会，在这次碰头会上通过了恢复社会学协会（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的决定，由维泽本人担任该协会的主席。这次大会的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社会学的当前任务”应该成为本次大会的中心论题。在法兰克福大会的开幕词中，维泽批评道，集体利己主义和对权力的贪欲乃是现时代最大的愚蠢。他认为，社会学理想的未来全依赖于一个“神圣的梵蒂冈”的存在：应该在一个中心性的组织机构中形成全局规划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应该在这个组织机构中“搭起一个高平台，搭起社会进程总系统研究的稳固平台，而且其中各方面细节也可时时得以修正”。<sup>[15]</sup>在维泽看来，这种前景将取代各种“主义”，他说到此处之时，特别点出了马克思主义。维泽的这个规划现在

看上去有些古怪，它基本上是弗里德利希·孟尼克在《德国的大灾难》中提出的那个建议的“社会学专家治国论”版本。孟尼克曾经提议成立歌德文化协会将全德国的地方组织统一起来，这个提议曾在1945—1946年间在德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传播。

只有一个人对维泽的讲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就是想以论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在维泽那里通过授课资格答辩的海茵茨·毛斯(Heinz Maus)。他在“二战”期间并未移民国外，他曾在1932年受业于霍克海默和曼海姆，自那时起他就成为了霍克海默热心的支持者，1939年的时候还将自己论叔本华的论文的一部分寄给了霍克海默。1939年他的这篇专论叔本华的文章以“中庸之道的梦幻地狱”<sup>[16]</sup>为题发表在叔本华诞辰150周年的纪念论文集集中，从那以后毛斯一直同霍克海默保持通信关系。毛斯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捍卫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加以解释的过程“长期以来被人错误地理解为工业化过程”(霍克海默和他的圈子那时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错误)；阶级斗争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毛斯还援引了霍克海默的一些话，说霍克海默曾写信告诉他就目前德国社会学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恐吓社会学’，恐吓早已转化成了对儿童的教育方法……以至于转化成了对成人的改造方法，恐吓使成人变成了被规划好的交往群体中的一员，离开这个群体他将会失去他的用处，将会丧失他的一切权利”。<sup>[17]</sup>

霍克海默并不知道，当时毛斯是多么频繁地把他的名字和马克思的名字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毛斯只是写信告说，霍克海默对社会学协会这次会议的情况的忧虑是完全有理由的。毛斯一直努力促成霍克海默及其圈子中人物的著作在德国出版——他自己就翻译过一个丛书系列。但毛斯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他所做到的只是在《展望：国际评论》(*Umschau ; Internationale Revue*)发表了摘自《启蒙辩证法》的两篇短小的节选、波洛克一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和霍克海默的“艺术与大众文化”。<sup>[18]</sup>这是一份出版于1946年到1948年之间的一个刊物，他当时就是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他的努力之所以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为出版者坚持要对文本细加考订，另一方面是因毛斯这个热情的出版

代理和犹犹豫豫的霍克海默之间的分工造成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曾于1933年出版过阿多诺的《克尔凯郭尔》的出版商C. B. 摩尔1950年时甚至连原稿都没看就答应出版他的《新音乐哲学》。霍克海默在一封写于1949年初的信中给阿多诺说：“卢登—洛宁出版社不断地写信给我，要求再版研究所的系列出版物。我还没有给他们答复，因为我不想牵扯到一些事情”。<sup>[19]</sup>

394 此时，霍克海默几乎无法开展他的理论建构工作。他以往一有机会就会提到他要写一部关于辩证法的书，而现在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哲学断片》，于是就转而宣称他要继续他的哲学研究工作。但是他所谓的哲学工作现在看来还只停留在笔记阶段。在《启蒙辩证法》之后，他只写了一些急就章式的文章，例如1944年在旧金山精神分析研讨会上提交的“精神分析方法的背景”、为恩斯特·西美尔去世而写的纪念文章“恩斯特·西美尔和弗洛伊德主义哲学”、题为“今日之权威主义和家庭”的论文（1949年刊于文集《家庭：功能和命运》）等文章。这篇“今日之权威主义和家庭”的结论是，家庭瓦解趋势导致了父亲被集体所取代，并因而产生了极权主义的社会部署。<sup>[20]</sup>此外，霍克海默因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48年在巴黎组织的“引发战争的不安定因素”学术会议而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后来他又将这个发言稿扩写成了一篇论文。

这些文章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阿多诺参与完成的。在他们两人中，阿多诺——通过写作《伦理随想录》——主动承担了独自继续他们的哲学工作的任务。这本书于1951年在德国出版。在本书的“题辞”中，阿多诺写道：

这本书是在我们不得不——由于外界环境的原因——中断我们共同工作的那段时期写成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表明，它是对那种中断的某种抗拒，并因而能够表达【我对霍克海默的】感谢和忠诚。它是 *dialogue intérieur*（内部讨论）的见证；这本书中所包含的论题既来自抽时间写下它的人，也来自霍克海默。<sup>[21]</sup>

《伦理随想录》由许多格言构成，这些格言就像《启蒙辩证法》里面那些断片的续篇。毫无疑问的是，这本书里面并没有观点的改变，他的主要思想仍然建立在对新德国的展望和旧有希望的复兴的基础之上。同马尔库塞写于1947年2月的那篇草案的目的相似，《伦理随想录》也是为霍克海默而作的，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形成他们对当前形势的共识。这本书再一次澄清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希望同马尔库塞拉开距离的原因，他们那样做除了因为财政方面的某些原因之外，更是由于一些客观的、理论的原因。当马尔库塞在说摆脱剥削和压迫的解放的时候，他是指那些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当阿多诺说到解放的时候，他更多地想到的是从他本人的境遇出发理解的某种解放形式，这种形式的解放乃是摆脱了恐惧、摆脱了暴力、摆脱了因循守旧而产生的那种羞辱的解放；在他所说的“更好的社会条件”中，“每个人都不会因为与众不同而感到恐惧”。<sup>[22]</sup> 马尔库塞试图通过乌托邦的方法保卫正统马克思主义，而阿多诺则努力证明那种冷静的、孤独的社会批判的存在必要性。“存在主义者”马尔库塞使自己成为高声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义愤的发言人，而阿多诺，从他的“生命哲学”立场出发，使自己全身心地成为一名不因循的知识分子。

这个格言集里的所有论题既不是无关紧要，也不是夸大其词，讨论的也不是宏大艰深得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所有这些论题都是知识分子能够而且必须予以思考的。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指向对现代激进知识分子（用一个与阿多诺反思“激进音乐”形成类比的提法）的反思。阿多诺在《新音乐哲学》中曾说过，先锋派作家为了满足创造属于自我的语言的自负，为了使这种自负变得可以忍受，总是被迫为自己创造出自己的语言，而同时又总是表演着杂技演员般的高难度动作，也就是说，在创作活动中总是会发现这种语言的脆弱性和偶然性。阿多诺发现，前卫思想家也处于与此类似的悖论性境遇之中。在《伦理随想录》第五则格言中，他说：

395

善于交际和不公正沆瀣一气，因为它总是让我们相信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中我们还能相互交谈，而偶然的、亲切的只言片语则有助于使沉默永恒化，既然在交谈中向对方做出的种种让步只能使自己降尊纡贵……对知识分子来说，要表明他们的团结一致，惟一的方式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孤独。一切合作、一切有价值的人类社会交往和参与都是对非人道的默许。

然而，第六则格言的“反题”又这样说道：

离群索居的人总会冒这样的风险：他总是相信自己比别人好，甚至将对社会的批判滥用成一种出于私人兴趣的意识形态……他与大多数事务保持的这种距离，乃是这种事务加之于他的一种奢侈。因此，他之从事务中退出这种运动带有它所否定的事物的特征。这种退出被迫发展成一种难以同资产阶级的冷漠相区别的冷漠……私人性的生存使这个人貌似活得像个人，但是实际上却背叛了人的价值，因为所有貌似都偏离了总体现实化——总体现实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还需要独立思考。

阿多诺认为，这种情况下“惟一负责的做法”就是“否定自己对于自身存在的意识形态滥用，除此之外便是尽可能谦逊地、不张扬地、不自命不凡地行事，这样做不是因为自己的良好教养，而是因为对在地狱中苟延残喘的羞耻。”<sup>[23]</sup> 同样，还有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要尝试寻找一种表达方式，能够将自己“在这种速度、拥挤、密度和静止之中的——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在偶然之中的——所处的困境”表达出来。

阿多诺的《伦理随想录》相当于霍克海默的《破晓与黄昏》。这本《伦理随想录》表明，现在霍克海默圈子里的成员将自己视为一个不墨守成规的知识分子群体，视为“群处的不墨守成规者 (social non-conformists)”<sup>[24]</sup>，他们与那些“顺从的反社会者” (conformingly anti-social)、那些将自身说成“正派的”个体的人们（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在非理论文本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是对立的。这种情况未必表明他们放弃了跨学科的社会整体分析,因为无论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是革命阶级的一员,都不会影响这项工作本身。

他们一度认为正是反犹主义研究项目救了研究所。研究所把这项计划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使得其他工作暂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这个工作远非研究所的余残部所能应付,甚至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应付不了。因此,他们俩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矛盾的态度,一会儿觉得工作到处是失败,一会儿又觉得成功之处也不少。1945年夏季霍克海默已经把把这个研究计划的各个部分和子项目设计出来了,他原先认为这样一来他便能返回洛杉矶,只需偶尔花一些时间去纽约对工作进行短期检查就可以了。他希望在主持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同时,还可以在洛杉矶继续和阿多诺合作进行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

可是霍克海默作为学术研究组织者的工作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1945年秋,曾担任过纽约犹太人社群关系委员会执行主席的大学讲师、以前曾是一位心理学家的萨缪尔·弗洛瓦尔曼加入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科研部。在霍克海默把科研部主任的权力移交给弗洛瓦尔曼手中之前,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关责任的纠纷矛盾日益升级。

玛丽·雅胡达和弗洛瓦尔曼一起工作,霍克海默认为她是他的一个同盟者,有着“指挥官一样的能力”,也许会设法坚持他倡议的那些提议,他在一封给她的信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雅胡达很快就发现自己对霍克海默的忠诚受到了考验,她自己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她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告诉霍克海默,她深知他是一名出色的哲学家,他对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设想的新颖性和穿透力是其他设想无法相比的;可要是,比如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副主席约翰·斯劳森(John Slawson)将来要求她说对霍克海默的“摄影实验”研究计划的看法的话,她不得不如实地承认,“他并不擅长设计大规模的实际研究项目”。<sup>[25]</sup>

这封信在两个敏感之点上触怒了霍克海默:他作为一位理论家曾经宣称自己还是个方法新异的经验研究专家;他还曾经宣称,尽管他已经把主任职位交给了弗洛瓦尔曼,但是这不意味着他现在的身份仅仅

是提供一些参考意见的首席研究顾问，并不意味着他不对研究负责了，相反，他还将这个研究看得很重。他对雅胡达的信反应激烈：

397

我们之间在学术问题上的区别，就像黑格尔逻辑学与整理哲学性混杂内容的“一种有秩序地工作着的设备”（an orderly working outfit，霍克海默在这封德文信中所用这个英文表述）之间的区别一样明晰。在这个所谓的“研究”领域，我们之间的矛盾也许是富有成果的，这多亏了您凭着您的智慧和专业能力为计划确定了一个研究立场，尽管毫无头脑和专业性可言的我一直在汲汲于为计划赋予它的意义。如果您想以一个现代社会学助理的身份对我加以训诫，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现代社会学助手在我看来就是那种不想让他的雇主解雇他而必须随身带上他的半吊子精密设备的人，他不仅被他的设备完全同化，而且还把它当成学术诚实、学术责任和学术高尚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向他自己、向别人大肆炫耀。<sup>[26]</sup>

在洛杉矶方面与纽约方面之间、在对大规模长时段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兴趣与追求速效的、以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为导向的研究兴趣之间存在的冲突，从未达成真正的谅解。多亏有拉萨斯菲尔德从中斡旋，才达成了一种妥协办法，弗洛瓦尔曼负责短期研究。可是，因为大规模的合作研究工作基本上须在纽约进行，研究结果的出版人也集中在纽约，而霍克海默又很少去纽约，因此霍克海默和弗洛瓦尔曼之间的紧张关系、洛杉矶和纽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研究结束。

反犹主义研究计划最终分解为许多小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工作分别独立进行，其结果都被当作各自不相关的专题研究来对待。霍克海默本打算将第一期的研究和第二期的研究融贯一体，完成一种综合性的反犹主义研究，在他看来这个研究对研究所意义重大，但实际上没能实现。一系列单独的研究思路取代了霍克海默的研究理念。1947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免去了霍克海默首席研究顾问的职位。从此以后

他的主要任务则成了出版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让研究所及其成员在此次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恰如其分的认可。

1948年4月，霍克海默登上了玛丽女王号轮船，对欧洲进行为期一月的访问。此次前往法兰克福大学出任访问教授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尽管在他看来这个机构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拿美国最老牌的、最大的资本主义集团最微薄的一点资金来败坏学术和文化生活。他作此次访问的正式身份是美国公民，此行目的是参与对德的民主再教育计划——对德国青年和教师进行“再教育”，这个计划作为一种“再教育”形式，不仅依靠审查制度或官僚体制来完成，而且要教给德国人懂得美国公民的优越性。正如霍克海默1934年赴美为自己探察形势一样，现在他想为自己探察一下欧洲、特别是法兰克福的形势。他想为研究所争取曾属于它的财产所有权，同时也想把自己在德国和瑞士的私人财产的产权争取回来（霍克海默双亲躲避纳粹逃往瑞士，不久在那里去世）。马尔库塞和诺伊曼曾抽出大量时间协助霍克海默完成这次有官方目的旅行，霍克海默写信给马尔库塞说，他也想看看“这里是否有学生或知识分子能被我们所影响”。最后，霍克海默还想在意大利北部或者法国南部找到一个地方，“即使低工资也可以勉强生活的”<sup>[27]</sup>一个地方，待在那里可以使他集中精力继续他的哲学工作。

赴欧当天霍克海默写信给洛杉矶的阿多诺，强调说弗洛瓦尔曼会为了窃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而不择手段地行事，而阿多诺则应该尽力阻止并将计划继续推进下去。在信的这部分结尾时，他写下的那段话具有他们两人的典型风格：“如果你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去做别的重要的事情。”<sup>[28]</sup>从他这方面说，他去德国也有自己的目的，他明白他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为他们的哲学工作创造理想的环境，为实现这一点把该做的都做了，不要留下什么缺憾。他用的还是老伎俩：尽量对外界保持一种形象，让外界看到他可以作为一个谦逊的学者独立地、不依傍与学生、听众和体制的联系而工作，但同时又尽最大可能积极谋求体制内的身份，尽可能地谋求保障、影响和认可。

5月，霍克海默从苏黎世写信给阿多诺说，他已经看过了法国和瑞士。“你还可以想像在这里生活即使贫困但还不致堕落。尽管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一团糟，尽管这里有出现新的恐怖的威胁，但是我们在这里直接体验到的那种人道却胜过了我们那些关于人道的想法，尽管在我们头脑中那些关于人道的想法是能够成为现实的。”<sup>[29]</sup>

几天之后，霍克海默第一次访问了法兰克福大学。“校长，两位系主任，还有别的人，他们所有人向我热切地致意，尽管他们的做法是体面的，但毕竟里面包含着圆滑世故、让人尴尬的东西”，他写信给妻子说，“他们拿不准是该把我当作来自美国的有影响力的访问者来对待呢，还是当作他们牺牲的同胞的兄弟来对待——如果他们能记起这些同胞说明他们还不健忘。他们必须把我当作后者。”<sup>[30]</sup>

这个印象相当准确。1946年10月，法兰克福大学董事会执行主席、助理秘书克林格尔霍夫尔（Klingelhöfer）出于对大学利益的考虑，曾经正式邀请社会研究所重返法兰克福。在克林格尔霍夫尔的信中还附有法兰克福市长、社会民主党人瓦尔特·科尔布（Walter Kolb）的邀请信。费利克斯·韦尔写了回信。在回信中，韦尔询问社会研究会以前的协会注册登记是否已经自动重新生效，研究所旧址的土地所有权是否已经自动重归研究会所有；研究所图书馆的剩余部分是否将被归还给研究所。这些事情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韦尔本来完全有理由在这些条款之上再提出许多其他要求。取消研究会注册协会资格、将研究所成员驱逐出境，所有这些事情毕竟是不合法的，因此研究会自动恢复以前享有的待遇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德国方面的有关行政部门和其他一些机构完全有能力促成这件事情的解决。但没有任何部门过问这件事情，甚至就是在此时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大学的这次邀请根本不能当真。签署这份邀请信的克林格霍夫尔在1938年还签署过一项文化部法令，该法令命令取缔研究所的书刊。威廉·戈尔洛夫在一封建议让研究所重返法兰克福的信中就明确提到社会研究会掌握的“巨大的资源”。1933年时任校长的戈尔洛夫曾签署过宣布大学和社会研究所脱离关系的声明。

霍克海默本人借此次访问法兰克福大学之机，为重建社会研究会，为研究所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利而奔走。他还动议组建研究所重建委员会。当时就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公开表达他们的遗憾之情，认为没有更多的移民投入德国向他们敞开的怀抱，但同时必须逼迫这类人，他们才能为鼓励移民回国真正采取一些措施。霍克海默的行为丝毫没有傲慢僭越的意思，但是这无疑让这类人感到脸上无光。

“他们必须把我当作后者”——霍克海默作为他们牺牲了的同胞的兄弟回来了，想起这些人意味着还不健忘——霍克海默在1948年5月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说。没过一个月，他这样给她写道：

清除纳粹运动的矛头现在指向了校长普拉茨霍夫（Platzhoff）。法院的主席曾给我来信，信中说他获悉我在此处，邀请我过去一叙，并请我在这个案件中为他提供帮助。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还需仔细斟酌，权衡一下，我是否应该作为惟一真实有效的起诉证人、作为大学的敌人而出现呢？介入这类事务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没有丝毫好处。这里有很多像普拉茨霍夫一样堪称猪猡的人，很早以来他们就被请回来教育年轻人了。<sup>[31]</sup>

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马尔堡和达姆施塔特等地主持讲座和研讨班，从未拒绝过一次要他讲演或参加会议的邀请。他最初的结论是：

如果你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因彻底的绝望而疯狂，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今天的一些德国人证明：经历了历史之夜后应该保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更为危险。但就是在这个阶段，没有别的地方比德国更为重要。如果理智生活的最后一点残余在这里彻底消亡的话，最应保存的东西也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就实际事务而言，我将德国视为这样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决断将在这个地区做出。在这里可怕的反

动力量已经开始集结，如果在某些有目的的人为因素，或某些悬而未决的因素的作用下，我们无法击溃这种反动，那么西方列强的反俄政策将会借着巨大的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能量在全欧洲得到贯彻。<sup>[32]</sup>

霍克海默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 8 名社会学家（包括戈登·阿尔波特、乔治·古尔维奇 [Georges Gurvitch] 和哈里·萨利文在内）磋商会，会议主题是“影响国际理解的紧张对抗”。霍克海默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法西斯主义的教训”，该文浓缩了他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德文作品中的辛辣批判。

即便首恶被推上法庭受到审判，即便他们受到了判决，其中一些被处以极刑，德国的大多数同情纳粹主义的人比洁身自好远离纳粹的人过得要好多，生活要优裕得多。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说，清除纳粹运动的体制化已经使得这个运动适得其反了（同魏玛时期的“共和国保护法”一样）。同纳粹有牵连的人能让自己在清除纳粹运动中尽快过关，交上不值钱的几千马克，然后就可以径直回到自己以前的岗位上去了。现在在政府和大学中占据要津的没几个人曾经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去冒生命危险反对纳粹党。

作为普通的欧洲人，他能从战后德国的事态中为将来汲取什么教益呢？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极权主义时期做出头鸟是不明智的，以积极的行动参与到最可怕的暴行当中去或许是有风险的，但是多犯小的罪行却是绝对安全的。

401 霍克海默小心谨慎，避免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但在文中他还是对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本能式的惧怕痛加指斥，而这也是托马斯·曼在战争期间一再批评的，托马斯·曼称这是时代最根本的蠢行。“东西之间的对抗曾经为昨天的侵略者提供方便、使之成长

壮大并能够发动攻击。而今天的政治家们仍旧无法摆脱只从这种对抗出发看问题的角度，这种思考方式诱惑力太大了，以至于使这些政治家们对威胁着世界和平的其他因素视而不见。”<sup>[33]</sup>

霍克海默对其他危险的描述集中了新批判理论的各种论题，其中的主要思想就是关于集体对个体的直接侵害的思想，这种侵害使个体无法实现其个体性。尽管捍卫个体使之免于集体的威胁的思想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现象而发的（尤其是在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但毕竟和美国一贯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十分契合。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民主实际上意味着个体的发展，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集体至上。

那些不愿谈论资本主义的人也无法研究法西斯主义，霍克海默1939年就曾在“犹太人与欧洲”一文中指出过这一点。<sup>[34]</sup>而现在他也不再谈资本主义了。这首先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如果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那么就可能会招致美国的厌恶、失去美国的支持，而他之所以能在德国以美国公民身份进行活动恰恰是美国支持的结果，更何况有了美国的支持还可以重建社会研究所。（由汉斯·维尔纳·里希特 [Hans Werner Richter] 和阿尔弗雷德·安德希 [Alfred Andersch] 创办的《呼唤》杂志 [Der Ruf] 的命运就是例证之一。1947年美国军事管制政府对民主抱有“虚无主义”思想为由取缔了该杂志。这个事例说明美国当局对言论思想的容忍度极其有限，更遑论支持。威廉·福克纳的小说也是一例，这些小说描述的是美国南部的旧式大家族的衰落，以及毫无廉耻可言的暴发户的兴起。1947年华盛顿当局为德国图书进口进行初次遴选的时候就禁止将它们引入德国，原因是这些小说可能让德国读者对美国产生否定性的印象。）迁到美国的阿姆斯特丹奎里多 (Querido) 出版社于1947年将《哲学断片》出成了一本正规的书籍，这个标题为“启蒙辩证法”的版本较之于1944年的油印本有大量的改动。“资本主义”被改成了“既有条件”；<sup>[35]</sup>“资本”被改成了“经济系统”；<sup>[36]</sup>“资本主义剥削者”被替换为“工业贵族”；<sup>[37]</sup>“阶级社会”则被替换为“统治”或“秩序”；<sup>[38]</sup>“统治阶级”也变成了“统治者”。<sup>[39]</sup>而像“那将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sup>[40]</sup>这样的句子则被彻底删除。这种自我审查的形

式并不新鲜；它是研究所的老传统了。这种审查是程度不断加深的的一个过程。问题是这样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人们对他们思想的曲解，可能让读者抓不到他们分析问题的要点和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有一些要点和理论基础原来是，现在实际上仍是他们思想的中心。他们阐述思想的过程中没有政治和经济科学领域的专家协助，这种情况使引起曲解的危险更为严重了。1947年和1948年《启蒙辩证法》的文化工业那部分在《展望》杂志上刊出，这让阿多诺十分兴奋，他给当时尚在欧洲的霍克海默写信说，“我相信我们论文化工业的东西给他们留下了特别持久的印象，我已经能理解你的愿望了，我也认为我们应该完成一套真正明晰和坚实的社会理论来解释复杂的整体。我感觉，是时候了”。<sup>[41]</sup>但这实际上只是阿多诺的一厢情愿而已。

在返回美国的途中，霍克海默盘算着如何在不丢掉“美国前哨”的情况下为他们自己开创出一个“德国前哨”。马尔库塞认为，把他们的美国机构的分部设立在法兰克福，这样他们既可以保留美国国籍又可以在德国占据正式教席了。<sup>[42]</sup>表面上看，这一构想遇到了困难，因为在此期间美国军事管制政府已经基本放弃再教育计划了。1948年6月，美国开始采取一项旨在稳定西德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开始了货币改革。秋天“马歇尔计划”的第一期援助资金被投放到了德国。这批资金没有起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却是美国对德路线的一个信号，这表明反共产主义路线正在取代反法西斯主义路线，德国正在被纳入西方阵营。美国思想的输出乃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国际性策略。实际上，这个策略有助于研究所获得财政支持。将“德国前哨”扩展成美国研究所的分部从这时起就成为霍克海默的基本方针了。这个分部将成为美国与德国这个在所有领域都需要帮助的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1949年夏天，霍克海默再次访问法兰克福大学，这次随行的有波洛克。访问期间，霍克海默在社会民主党人、法兰克福市长瓦尔特·科尔布的陪同下，驱车去同威斯巴登的政府部门进行了商谈。作为此次商谈的结果，政府部门同意霍克海默重新获得社会哲学的教席。霍克海默、波洛克和科尔布在商业、工业和科学俱乐部<sup>[43]</sup>共进晚餐，在席间

他们就在法兰克福开设纽约社会研究所分部的计划进行了磋商。把美国研究所的分部开设在法兰克福将会使这个城市成为现代社会研究的中心，也意味着建立纽带，将德国的社会科学和这个领域最先进的研究成果及技术联系起来。

1946年研究所就与哥伦比亚大学脱离了所有关系，而此时哥伦比亚大学正想在战后重新开始与研究所的合作关系。霍克海默以自己身体欠佳为由推掉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早在1944年研究所分部就已经将117大道的办公用建筑交给了美国海军部，实际上从1944年开始这里就被美国海军征用了。在离开117大道之后，研究所分部迁到了“晨曦道”(Morningside Drive)附近的一幢建筑里。之所以最后与哥伦比亚大学脱离关系，是因为研究所只想保留纽约的分部，这样可以节省花费，同时在洛杉矶谋求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立联系。(不管怎么说，纽约分部一直是研究所的总部，而且在需要的时候总能同哥伦比亚大学取得联系。)但是想要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任何一个院系建立起更进一步的联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1949年研究所领导人成功地争取到了许多有名望的学术人士(主要是社会学家)的帮助，他们联名签署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在法兰克福重建研究所，并声明该研究所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研究机构的下属部门。1949年10月，呼吁书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官方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刊出。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既不丢掉美国前哨又可以使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得到以前的待遇——研究所挂靠大学，同时成员可以在大学里任教职——是完全可能的。

以“偏见研究”为总标题出版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所有研究成果，现在成了研究所的主要任务。这项工作的完成对研究所当时的处境具有战略意义。因为这项出版工作可以向德国证明研究所的作用和它在美国的重要地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希望研究所的名字出现在伯克利研究成果的首页，以此表明这项研究成果是研究所(与伯克利舆论研究小组共同)合作的结果。但是，他们应当为阿多诺的名字出现在作者名单的首位而感到满意，霍克海默作为研究所的所长，为“偏见研究”系列的最主要一卷撰写了序言。对研究所来说，除了为研究系列成

果——或至少是伯克利研究结果——出一个精缩版之外，在当前形势下再出一个德文版显得尤为重要。

当德国的冬季学期就要开始的时候，霍克海默感到他自己因身体原因无法前往，就派阿多诺前往法兰克福替他开课。与霍克海默战后首次接触欧洲的印象相比，阿多诺的这种印象要强烈的多。他从巴黎写信给霍克海默说：

在返回欧洲的途中我感受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抓住了我。残破贫困的外衣仍然挡不住巴黎之美，这种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炫目……这里仍然保留的东西也许是历史地注定的，它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事实是这种历经劫难留存下来的东西毕竟仍然存在着，不协调只是暂时的，这一切都是历史画面的一部分，它让人们感到了些许希望，让人们相信不管发生什么，有人性的东西总是会留存下来的。<sup>[44]</sup>

阿多诺于1949年11月抵达法兰克福，这年他已经46岁了。战时，他的双亲经古巴移民美国，此时他的母亲还尚在人世，孀居纽约。阿多诺是作为霍克海默的代表来法兰克福的，在流亡期间他并没有获得教授头衔，甚至是一个在经济上不能自立的人，但在那段时间里他将他的全部精力和才智献给了霍克海默和研究所。

汉斯一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取得教授头衔之后，向大学当局提议，法兰克福大学空出来的这惟一一个哲学教授教席应由阿多诺接替。与霍克海默一起执教并左右哲学教学的前景打动了阿多诺。“你的这次复出值得庆贺，我要向你、向我们自己表示祝贺”，当霍克海默得知此事之后，他写信给阿多诺这样说。

我也相信事情会一直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能获得这个教授教席的话，那么我们的夙愿就会实现，这个梦想在几年之前在我们眼中还只是一个幻想而已。这个教授席位将会为我们创造出

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境：我们这两个难于同现实妥协并因而几乎注定无权的人却将获得在难以估量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机会。我们一旦占据两个，而不是一个教授席位，这个量变就会成为质变，我们就会真正具有权力。但如果法西斯主义再来的时候——它会抬头的——我并不认为我们将能改变整个运动的方向，只有那些愚人才会这么想。我知道，如果大洪水来临，我们甚至连防洪坝都筑不起来。我们之间如此亲密无间的联系将会公之于众，这对我们两人来说不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公开的联系将会加强我们理论工作的重要性，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把握，我知道如果条件有利的話，我们将能在法兰克福完成我们共同的理论工作。话说回来，法国不算远，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在那里长期逗留。<sup>[45]</sup>

从“特聘”教授（1949）、“编制外”教授（1950）和“编制内特聘”教授（1953）到最终成为正式教授（1956），阿多诺又经历了七年时间。<sup>[46]</sup>这是法兰克福大学和文化部的过错，文化部对阿多诺的态度和对研究所及其领导人的态度一样，只把他当作是大学的一个点缀。同时霍克海默也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在霍克海默眼中，阿多诺只是他的副手，即便阿多诺在学院里的成功最终有助于实现他本人的夙愿，他也不想为了阿多诺的学院生涯而冒太大的风险。说到底，阿多诺本人在这件事情上也做得不对。他更愿意置身于霍克海默的阴影之下，他并没有避免提及他和霍克海默的相似性，相反却主动向本系的同事表示他们两人占据两个学科相近的教授教席不大合适（两个教授教席都指派给移民的想法已经让许多同事感到十分厌恶了）。他甚至还提议伽达默尔的继任者应该是一个代表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

为了对研究所的事业和“霍—阿”休戚与共的联盟有所帮助，阿多诺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的效果不那么好，这种适得其反的做事风格也曾体现在他在纳粹德国为现代音乐所做的那些事情上。现在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一般都得到了霍克海默的支持，但是当霍克海默发现苗头不对的时候，总能及时予以制止。比如说，阿多诺曾竭力阻止《墨

405

丘利》(Merkur)杂志发表马克斯·本泽(Max Bense)的“黑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左派”。<sup>[47]</sup>他写信给《墨丘利》编辑汉斯·佩施克(Hans Paeschke)说:

我们现在正同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希望在法兰克福建立研究所分部,尽管本泽的批评文章不会影响谈判的结果,但它毕竟会为谈判本身制造许多麻烦……我相信,我完全有理由请您理解我们,这篇文章把我们和其他几个理论家相提并论,但实际上我们与这些人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正在为“辩证法”一书撰写第二卷,这卷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卢卡奇的批判分析,而且出于许多客观原因我已经同以前的朋友恩斯特·布洛赫完全分道扬镳了。在《心灵与形式》上发表“荷马”也没有我们的同意和授权。我们的著作显然能充分说明我们和俄国人之间的区别,这也是本泽所忽略的一个事实。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我必须重申我的要求。<sup>[48]</sup>

他声明他和霍克海默对他们所有的哲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著作共同负责,尽管有些著作仅署着他们中一个人的名字。他还声明了他们对俄国的立场。

对刊物的认识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正式做出如下声明。我们的哲学,作为对现时代的一般思想倾向的辩证批判,坚决反对苏联正在奉行的政策和主张……人们害怕毫不含糊地反对苏联政府及其人造卫星所遵循的政策将会为国际反动势力造成有利条件,但是现在这种惧怕完全丧失了它的合理性,因为这个国家的赞扬者——对他们来说“世界大同主义”现在是最糟糕的词语——不得不从小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中看出一个令他们窘迫的事实: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相同的。我们竭力反对把我们的著作说成是苏联辩护词的那种解释,我们相信,只有在允许对现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的地方才会出现更好的社会,而在为了维护现有的糟糕社会而取消

一切关于更好社会的想法的地方，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我们著作在东部地区的出版皆属未经我们授权的擅自行为。

本泽的文章还是发表了，但文章的发表并没有造成什么有害的结果。霍克海默并不愿意发表阿多诺草拟的那些声明。阿多诺一直留意《月刊》杂志 (*Der Monat*)，并尽一切可能使之成为反映他们意图的一个窗口，但在霍克海默看来这个杂志和《墨丘利》一样可疑，“它既吹捧逻辑实证主义，又吹捧海德格尔”。<sup>[49]</sup>这说明霍克海默对局势的洞察力比阿多诺强。《月刊》杂志的缘起是美国文化自由大会，而这个大会乃是接替了战略事务局 (OSS) 角色的反共产主义的中央情报局的合作伙伴，甚至这份杂志内部的人对这个渊源关系也不太清楚。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6月26日至30日在柏林召开，而中央情报局则是其资助者。用《月刊》杂志的主任编辑麦尔文·拉斯基 (Melvin Lasky) 的话说，这次大会是“在自由城市中举行的自由人的大会”。拉斯基把随后两期的《月刊》办成了此次大会的专刊。阿多诺对《月刊》上反共产主义的词语并不敏感，他还像在其他杂志上发文章一样，把稿子投给《月刊》。

从一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被媒体所关注，对此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黑森广播公司 (Hessische Rundfunk) 希望为他们两人作一次访谈录音，访谈讨论主题是《权威主义人格》。欧根·科贡 (Eugen Kogon) 和瓦尔特·迪尔科斯 (Walter Dirks) 所主持的公认的左派天主教刊物《法兰克福杂志》 (*Frankfurter Hefte*) 曾要求他们授权翻译发表他们的作品。《墨丘利》、《月刊》、《法兰克福杂志》、《新评论》 (*Neue Rundschau*) 和《哲学档案》 (*Archiv für Philosophie*) 都乐意发表他们的文章。但是在大学里左右哲学方向的那种前景是彻底消失了。在那里建立研究所的计划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他们两人——首先是霍克海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上阿多诺——都在选择美国还是选择法兰克福的问题上踌躇不决。

阿多诺现在看到了一些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方面，最初他之所以忽

视这些方面只是因为他当初的热情使他不愿意承认它们罢了。最主要的是，他承认了他们不仅对德国民主和德国政治的想法是具有理想色彩的，而且对德国的一切、对德国和整个欧洲都理想化了——实际上欧洲在政治上现在毫无独立性可言。他现在感到了霍克海默和他曾推断的那种欧洲战后氛围：“不拿这张门票，就得拿那张门票，除此之外别无选择。”<sup>[50]</sup> 他用比发表在 1950 年 5 月号的《法兰克福杂志》上的“德国文化的复兴？”<sup>[51]</sup> 一文更强烈的口吻对霍克海默说，学生的理智热情尽管看上去十分令人兴奋，但实际上或多或少是在寻求一种替代性满足的理智热情，可以说那只是塔木德学校式的理智热情。诱人的思想氛围下面掩盖的事实是，人们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思想的新颖性的反应要强烈得多，他们思想包含的真正意图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稳定安全之外，德国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别的什么条件，尽管稳定安全“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这里的思想比我们的要落后得多，尚未摆脱形而上学批判。你曾经说的那些话是对的——和这个殖民地比起来，那里 [指美国] 才是对社会进行分析的更好的地方。”<sup>[52]</sup>

但是法兰克福能够提供更好的稳定保障，而且研究所的办公地址在那里不成问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重建研究所，保障和办公地址都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因此霍克海默最终还是在 1950 年 2 月回到了法兰克福。他返乡了，尽管他的返乡是犹豫不决、有所保留的。此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去过几次美国，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出于战略目的而行动并在内心里犹豫盘算，这是霍克海默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他对犹太人处境（这个说法与西蒙娜·薇伊 (Simone Weil) 所说的“劳动处境”相似) 的一种反映方式，在这种处境下的人总是感到朝不保夕，并为了寻求保障而学会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技能。回到法兰克福，他们作为移民和要求取得过去一切权利的人，就要面对那些一直待在这个大学的人了。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在第三帝国时代就在学院里一帆风顺，而另一些人如果不是战后申请补偿就很难在学院立足。但无论是移民，还是法兰克福大学的老人，他们相互之间都很少接触，甚至就不接触。那些能代表学校的人每做一项行动都要进

行算计。而想在法兰克福重操旧业的移民们也不得不算计他们的行动。在霍克海默看来，惟一现实的策略是应奉行一种疏远的政策，以便造成一种印象，让外人以为他们还是美国人，他们只是出于许多义务才做出让步待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千万不能让人以为他们在这儿正在谋求他们没能在美国获得的教授头衔。

阿多诺认为德国只是一个殖民地，这里的理智生活不现实，只是某种替代品。但毕竟它还能被看作替代品，尚不至于像美国的理智生活那样被当作无价值的活动遭到蔑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德国境况的评价是一致的。如果他们在这个殖民地获得成功，能获得承认的话，毕竟还是可以在小范围内施加一些影响的。在美国即使情况再好，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也总是没人理会。“我越来越倾向于待在我们的故乡”，霍克海默 1957 年去美期间写信给阿多诺这样说。“我在这儿再清楚不过地感受到了我们的孤独……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顺便说一句，他们正在组建一个庞大的研究机构，如果我们再拿不定主意的话，我们或许能以合作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其事。我也见到了拉萨斯菲尔德。我的上帝呀！你完全是对的。”<sup>[53]</sup> 尽管他们满心希望在德国获得他们的“位置”，但在这些希望中也混杂着某种预见性的忧虑。阿多诺意识到霍克海默成为众人瞩目人物之后可能的危险——如果那样霍克海默就再也没可能与他一起合作进行他们共同的哲学工作了。

完成教学任务之余我们实际上有充足的时间……但我们各自都存在一些内在的难题无法解决。就你那方面而言，你没有铁一样的意志去拒绝涌向你的人群，很难为我们两人留出足够的时间——你将被迫充当起思想牧师的角 408 色，你不得不向那些失望的人们高喊“停住！”……而就我这方面来说，不断的交流成了我最大的负担；我感觉我现在就像一台超负荷工作的留声机，用已经不再清晰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我自己的思想。但我觉得我只有与人们保持距离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希尔斯一玛利亚可真是 *topos noetikos* [从事思想的地方]。因而说到底，我在这里所感觉到的和我们以前所写的东西比直接的现实更为重要，原因

很简单：直接现实必定是次要的，很难成为对我们有意义的东西……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并不认为离开我们自己的地方真的有好处。<sup>[54]</sup>

## 《偏见研究》

当霍克海默 1950 年 2 月抵达法兰克福时，代表着研究所研究成果的几卷《偏见研究》已经出版完成了。其余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偏见研究》的编者是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萨缪尔·弗洛瓦尔曼，赞助者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它并没有反映出研究所拟订的那个研究总计划，而只是先后由霍克海默和弗洛瓦尔曼牵头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科研部的初步研究结果。研究计划第二阶段的各部分研究项目构成了《偏见研究》系列的四个分册，第一阶段的各研究项目则包含在一个分册中。《研究》的这几部分分别由不同的学者撰写：T. W. 阿多诺、埃尔丝·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丹尼尔·J. 雷文森和 R. 奈维特·桑福德负责《权威主义人格》；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和默里斯·雅诺维茨 (Morris Janowitz) 负责《偏见动力学：关于退伍老兵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纳森·阿克曼和玛丽·雅胡达负责《反犹主义和情感障碍：一种精神分析的阐释》；列奥·洛文塔尔和诺伯特·古特曼 (Norbert Gutermann) 负责《说谎的先知：美国煽动者的煽动手段研究》；《毁灭的预演：帝国时期德国的政治反犹主义研究》则由保罗·W. 马辛负责。

此外还要出版《偏见研究》系列的其余几卷。剩下的几卷已经不再是霍克海默 1945 年春制定的大规模研究计划的研究结果了。作为这个  
409 计划一部分的“儿童中的反犹主义”是由埃尔丝·布伦斯维克负责的，这项研究的各项工作已经完成，但是没有出版。相反，其余几卷由集体和社团研究组成。这是由弗洛瓦尔曼的偏好决定的，充分反映了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思潮主流。

之所以把这个系列丛书定名为“偏见研究”而不是“反犹主义研

究”是有原因的：这个犹太人机构一心想融入美国社会，这个题目则避开了犹太二字，另外编者还认为，经历了这次对千万人机械化、体制化的谋杀之后，“偏见”这个听上去没有什么的词已经可以表达那种恐怖了，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种婉辞。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委婉的说法，这个词被小心翼翼地使用，因为编者怀着某种希望，他们认为号召打击偏见比号召打击反犹主义更能得到民主党人的响应。

霍克海默和弗洛瓦尔曼为这套丛书撰写了总序，刊在每分册的前面。在总序中，霍克海默和弗洛瓦尔曼不得不承认所有长时段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两难困境：因其时效性而选取的主题在研究成果出版之时已经不再那么具有时效性了。他们指出，在世界和历史范围内都存在对犹太人的迫害，现在在这个迫害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人们应该借助科学的分析寻求防止或减轻下次迫害爆发的方法。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不容乐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认为更大规模的迫害随时都有可能再次爆发，甚至也许就是在美国，尽管在这里的犹太人最少受到威胁。他们之所以要把重点放在主体方面、放在心理方面，是因为希望为社会提供实际的帮助。打击偏见也就是进行“再教育”，个体和他们的心理将是对偏见进行打击的开始之处。这种观点顺应了典型的美国信条。

原来计划丛中偏重分析偏见的客观环境的两卷应该成为整个丛书的一个总纲，使整个丛书给人一种整体感。但这个任务显然过于繁重，以至于这两卷无法胜任。最后那些明显应该予以分析的重要因素——美国或西方文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都没能得到分析。

马辛负责的那本书是一部关于德意志帝国政治反犹主义的历史，整本书采用了传统史学的写作风格。而前面三个分卷则是对美国人心理的经验研究。与头三卷形成对照的是，马辛的这本书勾勒了德国的一段历史，在那段时期西方自由主义模式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无能 and 袖手旁观并使反犹主义逐渐成为控制社会抗议的政治工具。马辛的作品和前面三卷的差异实在是太明显了。

洛文塔尔和古特曼的那本书对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美国

煽动者的广播讲话和宣传册子进行了精神分析式的内容分析。1930年代晚期以来在西海岸就出现了许多煽动者，但是他们的宣传并不那么成功。洛文塔尔和古特曼撰写的分册看上去很像精心策划的一个手册，专门罗列解释法西斯主义鼓动者使用的各种伎俩。这本书主要是对鼓动者的言论文本的分析，并没有对实际的听众反应做分析。阿多诺曾建议他们需要留意鼓动者的聚会，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丛书的编者本该单出一个系统的总纲，这样各分册就能在一个共同的理论背景下被安排出版了，但是由于没有做到这点，使得这些卷很难得到恰当的整体评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本丛书的第一卷几乎成了总纲的替代品，它涉及了研究计划的各个方面，而霍克海默在申明他自己的主张的总序中给这一卷留出的篇幅也是最长的。

霍克海默和他的助手们没有理由对这次研究不满意。伯克利研究是本次研究惟一跨两阶段的研究项目，而且也代表了研究所的主要成就。1943年的时候霍克海默就希望研究所与伯克利研究小组的合作能够实现一种综合，将欧洲思想和美国方法结合起来。拉萨斯菲尔德1947年7月读了反犹主义量表和法西斯主义量表的那一部分，根据阅读印象他这样评价伯克利研究：

我想，将你们的思想和经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在这里第一次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些主要概念得到了清晰的表述，而且在文本中清楚地证明了你们的假设是对的。所以你真是一箭双雕：研究得出了真实有效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理论思维对经验研究所具有的价值。<sup>[55]</sup>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大部分理论都包含在伯克利研究之中。这不仅是因为阿多诺撰写的定性分析那部分运用了他们的基本理论，而且因为在校阅阶段阿多诺“尽可能地使桑福德和雷文森在对访谈进行定量分析的那部分中纳入了我们的思想”。<sup>[56]</sup>此外，本书还为了统一性而做了大规模的修订。本来他们也打算把伯克利研究成果分卷单独出版，后来

在工作进展过程中决定出成一册，这册书的各部分分别由不同的研究者撰写。（甚至法西斯主义量表 [F-scale] 那一部分也不是由四位作者共同完成的，尽管目录上表明是四人合作。这部分是桑福德一人完成的。埃尔丝·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一直希望她为访谈那部分所做的工作得到恰当的认可，因而不加区别地把四位作者的名字一起印在首页的做法很不满意，坚持把每个作者的名字分别印在他们“自己”负责的那部分。这样一来，阿多诺就失去了 F 量表那部分的署名权，而在他于 1947 年 7 月写给霍克海默的备忘录中，曾清楚地说 F 量表这部分的研究是他的主要工作，是“整个研究的核心”，除了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拿出的访谈分析模式之外，F 量表“在美国人眼中是最有效的工具”。最后达成了一项妥协，每个作者分别在自己撰写的那部分署名，而 F 量表那部分则是共同署名。）

《权威主义人格》是这次计划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写作开始于美国向法西斯主义开战并与苏联结成同盟的那段时期。而本书的写作接近尾声将要出版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已经被击溃了，那时美国人战后的主要考虑是结束世界范围内的新政，美国具有民主的使命感得到了加强，变成了一个专横的世界强国的反共产主义的使命感。所有这一切尽管没有在书中得到表现，但是却反映在它的标题上。最初的书名是“法西斯主义性格”。1947 年阿多诺告诉霍克海默说，伯克利研究小组的成员们竭力建议将书名换成一个“无害”的词，比方说“性格与偏见”。<sup>[57]</sup>翌年又拟订书名为“潜在的法西斯主义”。1950 年 1 月本书正式出版时采用的这个名字（《权威主义人格》）明确无误地表明，它乃是最大可能的妥协的产物——“偏见研究”这个标题只在霍克海默的前言中出现过一次。而本书内容却讨论了法西斯主义者、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充满偏见的人格以及法西斯主义量表。这个为适应当时形势的伪装式的标题无论如何都会让人联想起弗洛姆阐发的、被研究所在初次出版的集体研究成果中使用的那个术语，尽管在出版《权威与家庭研究》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尚未被列入研究所的研究计划之内。

本书的主题准确地体现了分配给伯克利计划的两项研究任务：（1）发

现反犹主义易感者的性格结构，(2) 找出某种手段来测定反犹主义的易感性。所以实际上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法西斯主义性格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测定”。这两项研究任务是同步进行的：通过问卷、持续几小时的访谈和投射测验等方式确定并标定法西斯主义性格；探索出一套有效的手段用来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辨认和测定法西斯主义。“当你看完本书的时候”，阿多诺对全书进行校阅之后非常满意地说，“你将会了解反犹主义者是什么样子的”。<sup>[56]</sup> 举个明确的例子说吧，问卷、访谈和投射测验的结果表明，反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类型是存在着的，而且实际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法西斯主义量表则是一个工具，如有必要，借着这个工具甚至可以在不必提及意识形态偏见的情况下测知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传播范围和程度。阿多诺和其他研究者至少是这样看待这个工具的。

然而，本书对法西斯主义的测定也许会受人置疑，人们可能怀疑那些测定标准能否恰当地适用于定性测试；这些标准能否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人群，如果不借助访谈和投射测定的不断检验，这些标准是否能够进行测定。

1945年1月至1946年6月间进行了问卷调查，2099份问卷由不同人群——大部分是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填写。在调查中连续使用了三种问卷形式，这三种问卷分按照它们包含的问题多少被称作问卷78、问卷60和问卷45或问卷40。每一种新形式的问卷的主导思想都是一样的，即希望通过越来越少的问卷项目得到更好的问卷结果。每种形式的问卷都包含了三种量表，量表的问题项分散在问卷之中，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给被测造成一种印象，认为问卷只是一般的民意测验。三种量表分别是：种族中心主义量表（E-scale），包含针对反犹主义（A-S）的问题项、涉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项和关于爱国主义的问题项；测定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PEC-scale）；法西斯主义量表（F-scale），这部分量表中只包含“心理”问题项。

法西斯主义量表从未被独立使用，相反只在作为整体的问卷框架内得到运用。（比如说，在最后一种问卷形式中，问卷45包含有10个有关种族中心主义的问题项和30个法西斯主义的问题项；问卷40中，10

个种族中心主义问题项里的 5 个有关反犹太主义的问题项被略去了。)因而法西斯主义量表从未得到过真正的考察。那么研究者真正考察测定的又是什么呢? 将法西斯主义量表运用于大规模问卷, 并仅仅在此基础上测定出各类人群的潜在法西斯主义倾向, 这样做行得通吗? 重要的是借助能够反映极其重要信息的种族中心主义量表, 考察反民主倾向表现的那些种族中心主义形式, 考察受到种族中心主义左右的那些群体。“不应截然划分潜力和表现之间的区别”, 作者坚持认为,

假定个体身上已经存在由情绪决定的反民主倾向, 那么我们也应当期望这些倾向会由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诱发出来。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分但在反犹太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的被试会成为例外, 因为他们对少数民族团体的偏见受到了抑制, 对此需要给予特别的解释。<sup>[59]</sup>

因此, 法西斯主义量表的重要性主要在于, 在整个大规模测定的问卷方法框架之内, 它能够反映出重要的信息, 让研究者得知种族中心主义态度植根于人格结构的程度之深, 也能让他们知道应该对政治经济态度予以充分重视。 413

在伯克利研究小组看来, 由非意识形态的、纯粹“心理”问题项构成的法西斯主义量表实际上也为理解人格结构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认识途径。也正是因此, 研究小组特别留意到了这类量表中的一些成问题的方面。伯克利小组进而对法西斯主义量表做了改动和删节。他们排除了一些问题项。被排除的问题项可分为两类, 一类过于合理, 以至于带有强烈偏见的被测和无偏见的被测都认同这些问题项, 而另一类则过于激烈和具有明显的攻击性, 以至于两类被测都无法认同。保留下来的问题项都差不多, 法西斯主义量表最终确定下来的那些问题陈述都是“不讲礼貌、恶习染身的人是很难和正派人相处的”、“比起艺术家和教授来, 商人和业主对社会更加重要”, 以及“虽然科学有其地位, 但是, 有

许多东西是人类大脑所不能理解的”<sup>[60]</sup> 这样一些陈述。这类陈述中包含的事实成分比重很大，因此它们可能引起的反应至多是不强烈的反对、至少是不强烈的认同。对这类陈述的强烈反对态度被认定属于积极态度。

另一方面，此类陈述的老生常谈特征使得调查能够排除复杂的或不明确的因素。那些认同两个相反陈述的人可能表现了对事实的复杂态度，而在得分上要低于同时否决这两个陈述的人，因为它们明显是不正确的。另外，认同两个相反陈述的人将会被解释为具有非理性的矛盾性特征，这也就是说它具有笼统判断的倾向。此外，那些怕被误解或不想被认为是具有攻击性的人倾向于否定陈述，而这类人会获得高分。

尽管伯克利小组对这个量表中的一些问题项有异议并对之做了修订，但并没有怀疑法西斯主义量表指导思想的可行性。

例如，当我们发现反犹太主义的个体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持有反习俗的道德价值观。于是，一种解释是，该个体特别顽固地坚持习俗的价值观，他的人格中的这种一般倾向为某种反犹太主义提供了动机基础。与此同时，他会以某种方式来表现自己，例如以蔑视和惩罚犹太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理由是犹太人违反了习俗的价值观。这种解释得到了种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支持，这些量表表明，反映因袭主义的项目与明显的偏见形式相联系。因此，相应地说，坚持习俗的价值观被认为是个体的一个变量（它可以通过法西斯主义的量表项目来揭示），它在功能上与各种偏见的表现形式相联系。<sup>[61]</sup>

414

统计结果表明，种族中心主义测定结果和法西斯主义心理倾向测定结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各项量表测试中得分最低的和得分最高的共计 80 人，这些人被选中进行了访谈和投射测试。访谈和投射测试表明，两类测定结果之间的密切关系取决于设计各种量表时预期的同一类被测的心理过程，也取决于设计问卷、进行访谈过程中交替使用的

方法。

访谈和投射测试的结构都反映在使量表得以完善的各种变量之中。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得知法西斯主义性格的基本特征如下：完全认同主流价值，主要是保守的中产阶级价值，比如公认的正确、温和的行为和外貌、效率、整洁和成功等等价值，同时对人类又抱有一种悲观的和蔑视的态度，相信不可控制的、危险的事件会在世界上发生、相信性堕落到处可见；具有极端的等级思想和感情，在他所属的集团之内服从理想化的权威，对别的群体、对那些非常态的、被区别开来的弱小的事物抱有蔑视态度；反内向性特征，也就是说拒绝内省的特征，敏感并耽于幻想；自发地倾向于迷信，倾向于接受对现实的保守的错误理解。

分析采用的公式可以说是精神分析式的，这从分析当中和证明的结构中可以看得到。这种公式可作如下表述：脆弱的自我、外在具体的超我和与自我异化的本我三者共同构成了法西斯主义性格的标志。成规俗套、典范人格和左右判断的偏见支撑着法西斯主义者的自我；法西斯主义者认同权力，他之所以要求民主、道德和理性，目的只是要毁灭它们；他满足自己的本能，但同时却在道德上谴责本能，并坚持在外在于他的群体中禁绝本能。

临床访谈部分包含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家庭背景、童年、性、社会关系和学校。这一部分的访谈深入考察了影响精神结构构成和社会政治观点形成的那种社会过程，并生动地展示了这个过程。例如，如果父母的相互关系只是统治与顺从的关系，并且他们的角色和职责都是固定的，如果父母强令他们的子女无条件的服从，并希望通过因循主义方式实现自己在社会上的追求，那么他们的孩子很难形成自己的自尊心，很难摆脱对那些激怒他们的人的攻击性情感，并且很难与他人构成亲近的人际关系。（儿童的反犹主义研究没有完成。如果此项研究完成的话，将能够就此类社会过程在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问题得出更深入的结论。这些深入结论可能会修正和补充被测者的记忆。）

415

从临床访谈的主题出发，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访谈计划，以及用于

解释访谈材料的同样以精神分析为向导的 56 个范畴（这些范畴根据高变量和低变量被区分开来），使得定性分析的结果都被溶入了量化的模式之中。然而过于追求量化结果使得他们没能抓住由投射测验补充的深入访谈的重点，相反只是给出了一系列个案研究来展示人格结构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的关系。埃尔丝·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从对群体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些抽象的模式”，<sup>[62]</sup> 却并没有给出案例分析。在结论中，这些模式构成了一种“综合性描述”，这种描述根据量表把“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当作理想类型进行了区分。阿多诺本来希望访谈分析由“大量的横断面研究构成”，从而补充与意识形态倾向和心理倾向测定有关的那些部分中的量化研究，而所谓的“横断面研究”是指“建立在关于该被测的大量材料——问卷、访谈、默里测试和罗夏墨迹测试等材料——基础上的对个体被测的详细分析”。<sup>[63]</sup> 就阿多诺的这种方法而言，它是最切题的、最完美的一种方法，若不采取这种方法就很难使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得到圆满的解答，将能够证明反犹太主义并不是直接体现的，它并不一定体现在人的言行里，即使他有着相关的观点和心理结构，它甚至也不一定体现在受相同客观情境和外在影响作用的所有人身上。相反，反犹太主义是某种普遍态度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不仅影响着犹太人，不仅影响着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甚至可以说影响着整体历史、社会和人性的普遍态度。这种普遍态度植根于某种特殊的心理结构之中。一个人究竟是法西斯主义者、是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者，还是都不是，归根到底，恰恰取决于这种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必定要通过某些观点和行为方式表达自身，即便它们看上去相当个人化，只是一些中性方面。说到底，正是这种心理结构使研究判断成为可能。

然而阿多诺本人并没有完成任何对被测个案的大量材料的细节分析，甚至也没有完成对此的——定性的——研究。当然，他主要考虑最终还是使意识形态和人格结构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中心。“在反犹太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等量表涉及的领域中，尤其是考虑从法西斯主义量表和访谈的临床部分产生的那些研究结果时，被测的显性的意见和态度具有哪些含义？”他这样提出问题。在他看来，涉

及意识形态问题的那些访谈的章节乃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起点。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是“以理论阐述为基础并由访谈记录予以说明的现象学”方法。这种方法能够

允许我们利用“现场”访谈的丰富性和具体性来获得我们在其他地方难以获得的材料；它使我们在其他研究中因疏忽而未被顾及的东西，通过灵活的交谈而重新获得；被试的一些罕见的或独特的陈述，可以通过反弹过程的讨论得到解释。尤其是被试的一些陈述，虽然具有极端的性质，但它可以使那些存在于“正常”领域内的潜在因素清楚地显示出来，恰如疾病帮助我们理解健康一样。同时，据此方式，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一种主观的或者称之为推测性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地位，而我们的许多项目便是从中派生出来的。如果想从分析中得出结论的话，那么解释应当被认为是研究的假设，而研究之所以能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正是因为假设使然：前些年讨论过的一些规则就是建立在本章将要予以深入推进的一些假设之上的。<sup>[64]</sup>

阿多诺想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充分发掘“现场”访谈的丰富性和具体性，但是他本人一次访谈也没有参加过。他完全不熟悉被他采用作被试来说明意识形态和人格结构之间关系的那些人，当然也不熟悉他们生活的环境。与对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研究和更早些时候研究所承担的经验研究一样，这次研究也仍然是在与研究“对象”分离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此次研究严格地遵循着分工制。米尔达尔采用的就不是这种方法。米尔达尔在他的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地在全美国范围内进行实地采访，调查他的“黑人问题”，从而收集关于被访的“现场”印象和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说，阿多诺的方法要保守得多，如非必要他并不追求直接经验，尽管他一再地抱怨找不到“现场感”。

阿多诺所谓的定性分析的确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既不是从访谈，也不是从什么理论中得出的。如果熟悉阿多诺和研究所的

工作的话，不难看出对启蒙思想持批判态度的社会理论的中心论点构成了这些思想的基础，这里所说的那些中心论点包括面对现代性集体社会个体的无能感、对文明的不满等等诸如此类的论题。他对访谈材料的接触给他带来的思想不见得比萨特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带给他的思想多。萨特在此文中顺便说，他曾向一百多个反犹主义者提出置疑，要求他们指明他们反犹的理由。萨特的这种方法并没有方法论的担保，并没有诉诸任何精细的经验研究，但是在某些时候他的研究所提供的洞见则比伯克利小组的研究要深刻得多。这个欧洲人使用的是“欧洲”方法，而阿多诺本人则是与使用着“美国方法”的小组进行合作。现在阿多诺看到萨特居然能得出与他相似的结果，这让阿多诺非常激动。《权威主义人格》最后一章的一个注脚这样说：

在我们称之为权威主义人格和让-保罗·萨特所说的“反犹主义描述”特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当我们将所有的研究数据汇总起来，并予以分析以后，萨特关于反犹主义描述的了不起的论文就可供我们引用了。他的现象学描述与我们定量分析所揭示的一组特征如此相似，以致我们不得不对他抱以敬佩之情。<sup>[65]</sup>

阿多诺完全不必对他的定性分析抱憾——特别是联系他的（也是霍克海默的）其他相关论点，比如说“反犹主义要素”、他的“关于权威主义的几点评论”中的那些论点来看，更有理由这样说。那些“评论”原先就是作为本书的一部分来构想的，但是最后阿多诺并没有把它们放在这里发表出来。这些评论主要涉及柏克利研究计划相对于其他理论和研究的特殊地位。

阿多诺自己认为他面临着如下难题：他和霍克海默都认为，反犹主义乃是那种盲目、倒错和造反性性格的表现，失败的、残缺的文明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那种性格，那性格甚至总是被用来维持——有时是恢复——理性化的权力的存在条件，这种条件的典型特征就是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混合。他们从事反犹主义研究，主要是想——他们甚至把

这个研究计划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兴趣所在——引起有缺陷的民主的那些受益者，以及追求真正民主、且只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框架内（即便已经进入了大商业时代）构想真正民主的那些人的警醒。这两类人现在必须意识到，阻碍民主完善并以其非常坏的影响使不完善的民主得以持续的那些因素——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也是危及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努力的因素。这体现的是霍克海默的希望之重要意义——他希望他们可以“从实验上证明反犹太主义对民主文明的威胁”。

这是一个绝望的希望。萨特道出了犹太人在民主中的真正生存状态：民主之于犹太人乃是“狂热的敌视者和冷淡的保护者”。“他达到法制社会的巅峰的时刻”，萨特在涉及犹太人心理状态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三部分中写道，“另一种无形的、弥散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片刻之间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且将他拒之门外。”<sup>[66]</sup> 这另一个世界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它乃是阿多诺所说的“文化气候”的一部分。反犹太主义正是社会群体骑墙态度的一个典型反映，它冠冕堂皇的理性标准被沿街叫卖，在那种表面上没有偏见和成见的氛围中被滥用成理性化。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反犹太主义者的矛盾是当前文化上所“认可”的刻板偏见与正式通行的民主和平等标准之间的冲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冲突是某种前意识或受到压抑的本我倾向与超我或已经外化为习俗的替代物之间的冲突。<sup>[67]</sup>

作为文化气候组成部分的反犹太主义，为在前面提到的那类冲突中受到困扰并有疯狂的危险的人提供了“某种被许可的红灯区，在那里精神错乱是合法的”，<sup>[68]</sup> 在这些人的合理化过程中他们根本不可能形成强大的自我。这种解释通过指出集体错觉在既有文化中的功能而使这种集体错觉的“常态化”得到了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尝试。正是因为与正式的、占统治地位的民主标准形成对照的这类错觉在不完全抛弃那些理性化的标准的条件下，不断明确地强调现有文化的偏见性成见，它

们才成了常态的错觉。在他定性分析的框架内，阿多诺认定，使毁灭性趋势合理化的合理化滥用乃是“对合理化演绎进行虚假检验 (sham trial of rationalization)”的一个典型表现。

419

在我们的访谈中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种虚假的辩护，那就是断言犹太人非常聪明，因此人们必须在这一点上钦佩他们。此处的运作机制包括两种贯穿于当代文化的价值观念：一种价值涉及宽宏大量、无私、公正和爱的理想，对此价值，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身体力行；另一种价值涉及成就、成功和地位等标准，对此价值，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在生活中予以追求。可以说，这两种价值观念是被颠倒地用在犹太人身上的。如果犹太人符合这些假想的或现实的标准，他们就会受到赞扬，因为这些标准是反犹主义者所遵循的；与此同时，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些标准，就会受到谴责，而反犹主义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抛弃这些标准。被试虽然也运用良心的措辞，但其目的是为了拾回曾经用来选择敌人的道德信用，以便抚慰自己的良心。甚至对犹太人的赞扬也被用做他们确认犹太人罪过的证据。<sup>[60]</sup>

在“篡夺情结 (usurper complex)”的名下，阿多诺给出了这样的例证，它说明法西斯主义性格有一种加入反民主文明的造反者行列、认同更强的力量的本能。那些思想集中在权力和暴力上面的人认为，罗斯福的政策虽然确是专政形式，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阿多诺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他说罗斯福政府在这些人的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强力政府。

伪保守主义者具有关于“合法性”的潜在意识，所谓合法的统治者是指这样一些人——实际掌握生产机器的人，而不是那些将权力建基于形式政治的人。这个主题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史前史阶段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此应该予以认真对待，因为它与社会现实并

不冲突。只要人民的生活依靠国家的经济结构，那么它就归根结底依靠那些掌握工业的人，而不是依靠那些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伪保守主义者认为，所谓的民主政府并不真实。对此情况，他们反对的并不是经济不平等和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主形式本身。他们不想解决这种矛盾，而是希冀废除民主形式本身，直接让他们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人实施控制。<sup>[70]</sup>

在这儿，阿多诺关于伪保守主义所说的这些观点，也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伪民主支持者。他们表面认同美国传统价值和体制，而且有意无意地竭力使这些价值和风俗融入到代表沉默的大多数或曰“道德的”大多数的观点之中。

在美国，“保守主义”以前一般被认为是中产阶级、资本家阶级、自由主义阵营的立场，这与过去贵族统治的欧洲的情况是不同的。可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在美国，与自由主义或伪社会主义者相比，保守主义者要更“假”。当然，阿多诺常常把“伪保守主义”、“伪自由主义”、“伪民主”，甚至“伪社会主义”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他特别指出“伪保守主义”尤其能够充分地解释被访的政治经济态度。实际上“伪保守主义者”根本无法认同传统价值和习俗，他们的保守主义和守成主义纯粹是毁灭冲动和造反冲动的一种合理化的掩饰。而“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实现那种认同，与此同时他们也能够一心一意地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形式和个体主义形式，并且具有严肃的民主态度和行为。

但是阿多诺怀疑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找不到这种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了。在他看来由于条件的变化那些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转入了自由主义的阵营——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一个保守主义者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仇视工人和少数族裔群体的人。在美国自由主义阵营总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支持以新政为代表的社会改革理念，赞成国家介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被访中具有伪保守主义政治经济观的大多数人相应地都被视为伪保守主义者。这样认定可以使与伯克利小组所预期的相反的许多事实得到解释。伯克利小组曾预期种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

420

可能相互关联。比方说，(种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社会区分和等级思想状况的牺牲品不仅仅是黑人和犹太人，而且还有工人。但是结果明显地反映出，E量表和PEC量表之间(也就是种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联程度要低于E量表和F量表之间(也就是种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联程度。被访中许多人持保守的政治经济观点，但是这些人中并没有许多人在E量表上获得高分。

这个结果并不特别令人吃惊。在一个机会无限的国度，社会主义从未像在欧洲国家那样获得过特别显著的重要性。资本主义的魅力在这里不减当年。因此，资本主义不必需要民族主义来充当挫折感和怨恨的发泄口。左翼学者总是想通过解释种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性格结构之间的关联的方式使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名誉扫地，这个结论也仅仅是他们的偏见吗？

421 阿多诺并不这样看。调查明确地反映出来，与那些无偏见的人相比，怀偏见的人更多地表现出对政治经济领域的普遍懵懂无知和对成见和个人化解释的普遍依赖——就是在无偏见的人那里也不是不存在那种无知和依赖。阿多诺评论说：

如果种族中心主义量表能对高分者和低分者作出统计学意义的区分(也即“高分者”在这个量表上得分更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它是文化使然……至于我们说它们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证据，我们依据的是这样的事实：它们在统计上、心理上和其他方面都是得高分的、如果它们在低分者的访谈中也以相当的频率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生活在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时代。<sup>[71]</sup>

出于这种原因，在阿多诺看来，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乃是比E量表和F量表更重要的反映法西斯主义心理倾向的指标。被访表现出的这种保守主义与那种在欧洲比在美国更常见到的真正保守主义相左，因而阿多

诺将之归类为伪保守主义。由于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被视为民主派，而且被认为是和自由主义者一样的美国好公民——1945年之后，他们甚至被认为是比自由主义者还要好的美国公民——所以阿多诺的这种归类实际上掩盖着一个欧洲左派对美国文明、美国生活方式的批判。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和文化工业的批判者，他实际上被迫预见到美国文明将对失败了的文明进行某种新形式的反抗——但，那将是一种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阿多诺创立的类型学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类型这一章是伯克利研究的中心文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一套类型学，从而提供可能的特别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一点也是整个反犹主义研究计划的重中之重。类型研究通过从各种类型的心理动力模式中提取典型的方式得出了一组被表明为“法西斯主义性格”的变量。在进行这种类型归类的同时，研究还对各种无偏见者的性格进行了分类归类。阿多诺区分了两大类人：一类人是使自己被标准化的人，通过成见来思考；而另一类则是“真实”的个体，他们有能力体验活生生的经验，反对对人的经验进行标准化。在这两类人之间则是不同程度的过渡类型。这构成了阿多诺的主要的分类原则。

阿多诺认为最具潜在危险性的类型是“操纵型”——要比“表面反感型”、“保守主义型”、“权威主义型”、“精神病型”和“怪人”危险得多。这是对近期经验的考察，也是对《启蒙辩证法》和《理性之蚀》中心思想——这是霍克海默圈子的实证主义批判的顶峰——的具体化。

[“操纵型”的特征是]以一种强制的、过分现实主义的方式把每个事物和每个人都看成可以操纵的对象，也即可以由他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来加以处置的对象。他们把重点放在“操纵”上，但对事情的内容则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模式既可以在许多生意人中间找到，也可以在新生的管理和技术阶层中找到。他们的人数正在增加。在德国，许多法西斯主义的反犹分子就具有这组特征。其中，希姆莱可能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具有适度的理智，

加上他们缺乏感情，致使他们成为残忍的人。他们观察事物的组织方式事先具有权威主义倾向，所以他们会用毒气室杀人而不用机枪扫射。他们用管控手段对付犹太人，而受害者根本与他们不认识。<sup>[72]</sup>

说到底，反犹主义态度还不是“操纵型”最关键之所在，最关键的地方是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缺乏对生命、对人类、对受歧视的受害者最起码的尊重。关键不是反犹主义，而是缺乏真正的反反犹主义。这种缺乏甚至使那些从未沾染过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思想的人——他们甚至是最可信赖的、最和善的朋友中的一部分——也变成了“潜在的反犹主义者”（霍克海默语）。

因此，美国反犹主义的衰落根本不能让伯克利小组成员或阿多诺可以高枕无忧——尤其是因为他们发现了长久以来就存在着反犹主义的替代品：反共产主义。一方面，阿多诺有些过分胆小；在他校阅伯克利研究文字材料的过程中，他甚至要求负责撰写有关桑·昆廷监狱囚犯那一章的威廉·R·莫里斯（William R. Morris）删去引述囚犯的激烈词语。但另一方面，在解释访谈材料的时候他又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423 最近几年，美国宣传机器从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意义上致力于营造反共主义情感，除了美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外，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连续的思想压力。与此同时，公开的反反犹主义通过报章、杂志、书籍和电影也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气候。但潜在的基本性格结构却不会因这些波动而发生转变。如果这些波动是可以测知的话，那么它们将能够说明政治宣传的极端重要性。当宣传导向和人们反民主潜质一致的时候，宣传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心理攻击性的对象选择。<sup>[73]</sup>

《权威主义人格》的作者们并没有直接说明支撑着反犹主义的那种

人格结构的普遍程度，对未来的对策也没有明说；但是在霍克海默的前言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这种性格结构很可能取代个体主义的、民主的性格类型而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这种性格结构将继续存在下去，所以伯克利小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格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结构性整体，这个事实意味着任何防范措施都必须针对作为整体的偏见人格。“重点似乎不应放在针对某少数群体的歧视上，而应该放在成见、情感冷淡、认同于权力和普遍毁灭性这样的现象上。”<sup>[74]</sup>

该怎么办呢？必须改变社会，这是伯克利研究小组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任务的完成应该寄希望于社会主义者和心理学家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改革真正对偏见人格结构起到矫正的作用）。但是如果现代人正逐渐成为这样一种由空前完备的社会整体性管控所操纵的集合——阿多诺在论述伯克利研究的意义那一章中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一章后来并没有在《权威主义人格》中出现——的话，这种主张不是一个无效的陈述吗？在阿多诺看来，现代人不可能“自发的”陷入反犹主义，<sup>[75]</sup>甚至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对象；心理学家在考察研究现代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因为他在他的对象个体身上看到的将是整个社会。

这项研究以阿多诺毫无遮拦地写下的那些话作结，这段文字指出，现在需要的正是对突然转变的本能希望和乌托邦的希冀，只能期待着主导力量发生方向转变从而引发乌托邦式的突变。

由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是以一种伪民主的形式强加于人们头上的，因此不知内情的人还满怀希望带着它走向未来。可以预测，如果现存的经济模式仍然得到维持的话，人们会继续受此模式的影响。我们希望读者不要低估本书所关注的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力量，忽视这种力量是愚蠢的。同样我们也希望读者注意，我们的大多数被试者并没有表现出极端的种族中心主义模式，而且我们提出了各种方法来避免这种极端模式，忽视这样的事实同样是不明智的。尽管存在这样的误区，也即就外部提供的价值而言，有偏

见者在我们的社会里会得到有利于他们的回报，但这不等于说宽容者就只能在到达天堂之后才能得到他们的回报。实际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就内部提供的价值而言，宽容者得到了基本需要的满足。当然由于他们反对盛行的社会准则，因此他们不得不以承受非议而为这种满足付出代价，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他们要比有偏见者更少压抑，更多快乐。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法西斯主义者常常求助于情感来进行煽动，而民主主义者常常求助于理智来进行宣传。如果说恐惧和破坏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主要情感源泉的话，那么爱就成了民主主义者的主要理智源泉。<sup>[76]</sup>

作者对民主事业的支持却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抨击，认为有能力实现变革的不是美国民主，而是美国民主的受害者。

他们对反民主可能性的这种诊断表明，这项研究的重点指向不是反犹太主义，也不是在更为一般意义上说的对少数族裔的偏见，而是普遍存在的保守政治经济态度；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秩序，因为健康的社会秩序可以通过适当的宣传、资讯和教育措施修正自身，也不会有那种难堪的缺陷。这样的诊断很难让以融入美国社会为主旨的美国犹太人协会感兴趣。这一点在发表于美国犹太人的刊物《评论》上的关于“偏见研究”系列、特别是《权威主义人格》的那篇非常详细的评论中可以反映出来，尽管评论对研究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评论的作者是纳森·格拉泽尔（Nathan Glazer），他也是《评论》的编辑和《孤独的人群》的作者之一。《孤独的人群》和《权威主义人格》是同年出版的。《孤独的人群》，副标题是“转变之中的美国人的性格”，直接借用了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的概念，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本书的某些思想和《权威主义人格》有些相似，比如说它也在传统导向型、外在导向型和内在导向型等性格之间作了区分。（霍克海默曾给马尔库塞写信谈到过作为《孤独的人群》作者之一而一举成名的大卫·里斯曼。马尔库塞曾请霍克海默给他寄去一本书，就在这本书中霍克海默偶然地读到了里斯曼的文章。“我拿起你

要我寄给你的这本书之后”，霍克海默写道，“找到了里斯曼先生那篇关于反犹太主义的文章，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留下这本书。里斯曼何许人？他的思想和我们的一些论点出奇地相似。他一定是个才智过人的，而且很可能仔细地研究过我们的作品。”<sup>[77]</sup>）

除了提到许多优点之外，格拉泽尔赞扬了阿多诺定性分析做得很漂亮，但是话锋一转又以这些定性分析为证，批评说《权威主义人格》的作者在经过证明的情况下采用了某一特殊的社会理论，进而以这种特殊的理论为标准得出了许多被定性为隐性法西斯主义时代症状的性格类型。

能否证明“对团结的不满”或“对限制收入的不满”是“隐性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呢？在这儿，我们看不出来这些心理和明确法西斯主义观点有什么联系。这些态度为什么不能被理解为权威主义人格中能够促进按照民主方式行事的态度呢？某个人反对团结，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团结一致有可能对他的自由构成非法侵害；也许他是想保护自己的个体独立性，他的独立行动的自我意识使他拒绝成为大众的一部分。同样，甚至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结论——例如，非权威主义者对感性和物质快感更感兴趣——可以使得我们推导出对收入限制的不满也不是什么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特征。实际上，人们可以为了追求地位和权力而赚钱，也可以为了追求快乐而赚钱。<sup>[78]</sup>

对研究的不满表达得再明显不过了。偏见应该予以打击，但是不是以伯克利研究的这种方式去打击，这种研究的方式已经开始置疑美国的生活方式了。

爱德华·希尔斯 1954 年为《〈权威主义人格〉的范围和方法研究》撰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权威主义、‘右派’和‘左派’”。《〈权威主义人格〉的范围和方法研究》的编者是理查德·克里斯蒂和玛丽·雅胡达。这篇文章对研究的批评更进了一步。希尔斯曾参与过贝特尔海姆主持

的芝加哥退役军人研究项目，是在冷战和麦卡锡主义氛围中转变成反共产主义的保守派，但表面上却声称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当时不在少数。就他的这篇批评文章而言，也不能说他说的全错。在无偏见者的那种类型中，阿多诺实际上区别了“刻板”、“抗议”、“冲动”、“随和”和“真正的自由主义”等类型，并强调只有最后一种类型才实现了超我、自我和本我之间的理想平衡。但是他没有归纳出“伪左派”和“伪保守主义”的相对差异。实际上人们很容易把“刻板型”或“抗议型”无偏见者归入“伪左派”这个范畴之中。但是，在这里“无偏见”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呢？“无偏见的”是个婉辞，用来指代那些真正的“伪左派”。人们也许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伪左派人格背后也可能潜藏着法西斯主义人格结构，因而也应该把这些人格类型列入偏见性格类型表之中。实际上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法西斯主义人格”中“法西斯主义”一词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味。但是阿多诺和伯克利研究小组的成员们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想造出左派法西斯主义这么一个词来指代那种基于法西斯主义人格结构的伪共产主义和伪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原因也很简单，在他们的被访者当中这种性格结构的人的确很少，相应地这种性格结构对美国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在美国，共产党（CPUSA）的势力一直很小，而且战后共产党就被取缔了。希尔斯的指责也是针对这种术语上的偏袒而发的。他之所以抓住这一点不放，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威主义人格》引起反应的特定政治环境。那些批评者的矛头往往都集中在它的方法论和技术方面。

“偏见研究”的其他著作与《权威主义人格》相比黯然失色。但其中与《权威主义人格》论题最接近、思想也最丰富的要算是《偏见动力学》(Dynamics of prejudice)了。作为研究对象的退役军人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这个群体在适应战后经济方面有着特殊的困难，这个方面也是进行这项研究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个群体的特殊性，研究者也很容易发现使该群体倾向于以种族褊狭的形式（特别是反犹和反黑人）发泄自己的攻击性情感的原因和条件。接受访谈的150名芝加哥退

役军人被分作来自底层阶级的和来自底层中产阶级的两类（他们中没有政府官员），对他们的访谈构成了研究的经验基础。访谈时间要比伯克利研究的访谈时间长，每次访谈持续四到七个小时。访谈由六名社工进行（一般如有可能访谈都在被访者的家中进行），采访人全是女性，都接受过精神病学训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紧张的访谈”充满“轻松的”气氛，<sup>[79]</sup>这样就可以使被访者畅所欲言，倾诉他们过去的战争经验和当前的适应困难。当访谈随后进入种族主题——访谈是按照先间接、后直接的方式进行的——时，被访者将会表达他们的深层观点。

同样以精神分析思想为指导的退伍军人研究和《权威主义人格》之间有两点重要的不同。首先，退伍军人研究强调偏见对于偏见者的积极意义，并给予同情；其次，在退伍军人研究中，包括军队在内的既有体制被视为具有积极作用，没有怨恨感的人视既有体制为理所当然，而只有那些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为别人所控制的人、那些以种族褊狭作为自己紧张情绪发泄口的人才对之无法容忍。贝特尔海姆和亚诺维茨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控制的连续体

[这是]从内化控制到外在控制 [的连续体]；先是自我控制、427  
再是超我控制、再是乐意接受外在控制、再是勉强屈服地接受外在控制，而最后还有一种控制，这种控制非常弱，很难说得上是有效的控制。宽容到不宽容连续体的最后一组类型，也就是激烈的反犹主义者，已经超出了这种控制连续体的范围。<sup>[80]</sup>

他们并没有对美国社会进行一个总的评价，而是简单地指出：“目前的数据材料表明，缓慢向上层运动的那些群体非常接近于宽容，而迅速向上层或者向下层运动的那些群体，与种族间的仇视有明确的关联。”但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作者们却得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不禁会认为，向上运动的阶层，以及对现状的认同，与种族中心主义呈正相关；而向下运动的阶层，以及与现状的认同，则与反种族中心主义呈正相关。”<sup>[81]</sup>

研究的性质使我们很难判断这种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各自选择访谈对象的阶级差异造成的，也很难断定贝特尔海姆（他的访谈手段更紧凑集中，采访者和被访者也有直接的接触）是否比伯克利小组成员更能在了解被访者与社会体制关系基础上洞察到那种破坏性趋势。但是这里无法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芝加哥的研究者们并不具有伯克利的研究者们所具有的那种社会批判态度，他们将融入美国生活方式的能力视作是人格发展良好的标志，而对伯克利的研究者来说，这只是适应了充满缺陷和不公、且充满偏见之温床的社会的标志。

纳森·埃克曼和玛丽·雅胡达是《反犹太主义和情感障碍》的作者，埃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和其他一些学者也参与了撰写。埃克曼和雅胡达没有按照霍克海默的计划去在专家提供的信息材料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研究，那样将要对来自反犹太主义的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进行大量的分析，而且是直接和患者本人见面的精神分析。他们限制对象数量，仅限于由精神分析学家报上来的 27 个病例。精神分析学家们在访谈中已经对患者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性记录。除此信息材料之外，还有福利部门提供的有关患者的 13 份报告作为补充。汇集起来的材料的局限性和非直接性使本书无法构成《权威主义人格》的重要旁证、更确切的解释、补充或修正。《权威主义人格》中就专门有一章“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有关的心理障碍：对精神病诊所患者的研究”，而且几乎与埃克曼和雅胡达的这本书的篇幅相当。埃克曼和雅胡达对他们材料的分析很仔细谨慎，所以读者——除了一些保留之外——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威主义人格》在精神病诊所 121 名患者的材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大体是正确的：偏见和精神疾患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集体偏见的出现基本上与某种普遍的人格特征相关，而这种普遍人格特征与精神病分类等级无关，只是在精神患者身上有着更为明显的表现。<sup>[82]</sup> 心理障碍者和“正常人”都会有因自卑和自责产生的沮丧感、自卑感和内疚感，只是在前者那里以夸张的形式反映出来；恐惧感，特别是对失去保障的恐惧，既出现在“正常人”中，也出现在心理障碍者中，只不过后者的形式更为激烈。

被这本书证明是错误的命题和假设却在《权威主义人格》专论精神病患者的那章里得到了相反的阐释。例如，《权威主义人格》中一个假设是偏见人格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基础是非理性态度，这种非理性态度又是神经症病患的产物。因而偏见人格在精神病患者当中是一种特别常见的现象。相反，无偏见者的态度往往是理性和与现实协调的产物。这种人是“正常”主体。相反在《反犹太主义和情感障碍》中的假设是，偏见者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能够很好地适应他们的文化，能够与构成他们文化一部分的偏见相认同。而与他们父母、与许多主流习俗相悖的无偏见者经常出现在精神病患者当中。这种研究结果说明，无论是主动适应恶劣的条件还是拒绝适应，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埃克曼和雅胡达也找到了一些能够支持《权威主义人格》所提出命题的证据：低分者常常是精神疾病中的神经症患者，因为他们的自我过度发达，而高分者往往是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接受的严苛的教育使得他们的自我停留在欠发达状态。

在“偏见研究”系列各卷中，只有一卷间接地涉及了社会理论并直接包含着社会批判内容，那就是阿多诺直接参与撰写的《权威主义人格》。而它也是这个系列中在受到专业领域的研究方法质疑的同时还招致政治性批评的惟一一卷。当时有关反犹太主义或偏见的理论在哪些方面对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之间的关系有所深化呢？

《权威主义人格》及“偏见研究”中的另外那两卷，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就是对偏见的主观因素方面所进行的分析。另外，1940年代进行的社会心理学导向的偏见研究在美国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进行反犹太主义研究期间，有两部分分析反犹太主义和偏见问题的重要研究文献问世，阿多诺给予极高的评价，它们是：萨特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1946）和尤金·哈特利（Eugene Hartley）的《偏见问题》（1946）。那么客观因素方面分析的情况又如何呢（阿多诺1944年制定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的总纲时就明确提出过进行客观因素的分析的建议）？

情况很糟。阿多诺总是倾向于认为他所实践的心理学分析形式同

时能够充分代表研究所需的社会分析，或者说至少是构成社会分析的关键性部分。这种态度很类似他最早在分析新音乐时所提出的独特的观点：伟大艺术家作为一个单子的创作行为与客观的历史运动是一致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个体心理学坚持关于自我、本我和超我或无意识和本能压抑的正统理论，根本不对这种理论进行置疑——个体心理状态能否被用来解释社群心理，也不对这种理论进行必要修正从而使之成为社会学化的心理学。在阿多诺看来，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个体心理学能够在个体身上解析出起作用的那些客观力量，因为个体乃是社会格式化了的但却对此毫无意识的个体。在他所撰写的论《权威主义人格》之重要意义的那一章里（未发表），他这样写道：

要发现客观经济法则是怎么运作的，与其对个体经济“动机”进行研究，不如对他的无意识构成进行探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广泛的、审慎计划的专业研究。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使我们获得对当代偏见的本质的真正科学解释。我们的研究至少为这项任务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和许多假设。<sup>[83]</sup>

阿多诺的意思是，反犹太主义者的心理可以用来解析反犹太主义的经济社会原因；对反犹太主义者进行完整而彻底的心理学研究将能够建构起关于反犹太主义的“文化人类学”。<sup>[84]</sup>

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也出现在阿多诺一直捍卫的内在批判这个概念中。内在批判不借助超验方面是无法完成的。同理，通过对主观方面进行彻底的分析而进行的客观方面分析，若不借助对客观方面的基本认识也是无法完成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当时业已掌握了的那些认识——或者说他们泛泛接受了的那些有关客观方面的知识——是能使他们修正“内在批判”的最新知识和真正的专门知识吗？直到他们进入反犹太主义研究项目的研究阶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没意识到对客观因素进行紧跟知识发展前沿的专门分析是非常迫切的吗？让他们绝望的是他们找不到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的合作

者。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们不断地压抑这种绝望，并竭力用套话来描述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以便掩盖这种绝望。当他们返回法兰克福的时候，作为《启蒙辩证法》和“偏见研究”的作者、历史哲学家、文化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现代社会学研究专家，作为负有盛名的学者，他们似乎很愿意作为一个集体来传播他们的成果。但阿多诺仍然有一些严肃的打算，他不想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

### 注释：

[1] Adorno to Horkheimer, 9 May 1945.

[2] Horkheimer to Adorno, 24 November 1944.

[3] Horkheimer to Adorno, 6 April 1944.

[4] Jürgen Habermas et al. (eds), *Gespräche mit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p. 21. Cf. Ulrich Borsdorf and Lutz Niethammer (eds), *Zwischen Befreiung und Besatzung. Analysen des US-Geheimdienstes über Positionen und Strukturen deutscher Politik 1945* (Wuppertal, 1976), pp. 175–6.

[5] Adorno to Horkheimer, 9 May 1945.

[6] Theodor W. Adorno, *What National Socialism Has Done to the Arts* (1945) (Max Horkheimer Archive, XIII 33), p. 10 [English in original].

[7] *Ibid.*, p. 18.

[8] Marcuse to Horkheimer, Washington, DC, 6 April 1946.

[9] Horkheimer to Marcuse, 30 August 1946.

[10] Horkheimer to Marcuse, 18 October 1946 [English original].

[11] Horkheimer to Marcuse, 29 December 1948.

[12] Herbert Marcuse, *Paper of February 1947* (Max Horkheimer Archive, VI 27a. 245–67).

[13] *Ibid.*, pp. 10, 8.

[14] *Ibid.*, pp. 14–5.

[15] *Verhandlungen des 8 Deutschen Soziallogentages* (1946), p. 35.

[16] ‘Die Traumhölle des Justemilieu’.

[17] *Verhandlungen des 8. Deutschen Soziallogentages*, p. 44.

- [18] 本文最早用英文发表在 *SPSS* (1941) 上, pp. 290–304, repr. in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86), pp. 273–90.
- [19] Horkheimer to Adorno, 3 January 1950.
- [20] Max Horkheimer,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Today', in Ruth Nanda Anshen (ed.),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New York, 1949).
- [21]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1974), p. 18.
- [22]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Frankfurt am Main, 1951), p. 31.
- [23] Adorno, *Minima Moralia* (London, 1974), pp. 25–8.
- [24] Adorno, *Minima Moralia* (Frankfurt am Main, 1951), p. 121.
- [25] Jahoda to Horkheimer, New York, 21 November 1945.
- [26] Horkheimer to Jahoda, 28 November 1945.
- [27] Horkheimer to Marcuse, 28 February 1948.
- [28] Horkheimer to Adorno, 25 April 1948 [English in original].
- [29] Horkheimer to Adorno, 21 May 1948.
- [30] Horkheimer to Maidon Horkheimer, 21 May 1948.
- [31] Horkheimer to Maidon Horkheimer, Garlton Hotel, Frankfurt, 20, June 1948.
- [32] Horkheimer to Jahoda, Paris, 5 July 1948.
- [33] Cited from the German translation, 'Lehren aus dem Faschismus', in Max Horkheimer, *Gesellschaft im Übergang. Aufsätze, Reden und Vorträge 1942–1970*, ed.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1972), pp. 56, 57.
- [34] [Max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8 (1939), p. 115.]
- [35]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mimeographed volume (New York, 1944),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1947). 'Das Bestehend': imco edition. p. 209/Amsterdam edition, p. 200.
- [36] *Ibid.*, pp. 214/205.
- [37] 'Kapitalistische Aussauger', 'Industrieritter', *Ibid.*, pp. 216/207.
- [38] *Ibid.*, pp. 213/205.
- [39] *Ibid.*, pp. 213/205.
- [40] *Ibid.*, pp. 208/200.

- [41] Adorno to Horkheimer, 1 July 1948.
- [42] 在德国,只有加入德国国籍才能成为正式教授。
- [43] Klub für Handel, Industrie und Wissenschaft.
- [44] Adorno to Horkheimer, 28 October 1949.
- [45] Horkheimer to Adorno, 9 November 1949.
- [46] *Ausserordentlicher Professor*; *ausserplanmässiger Professor*; *planmässiger ausserordentlicher Professor*; *ordentlicher Professor*.
- [47] 'Hegel und die kalifornische Linke' .
- [48] Adorno to Paeschke, 12 December 1949. 这里阿多诺所说的“荷马”是指《启蒙辩证法》的第一个附论;《感觉与形式》(*Sinn und Form*)是东德的一个文学刊物。
- [49] Horkheimer to Adorno, 6 December 1949.
- [50] Adorno to Horkheimer, 9 May 1945.
- [51] 'Auferstehung der Kultur in Deutschland?'
- [52] Adorno to Horkheimer, 27 December 1949.
- [53] Horkheimer to Adorno, 28 January 1957.
- [54] Adorno to Horkheimer, 27 December 1949. 希尔斯—玛利亚 (Sils Maria) 是瑞士恩加丁 (Engadine) 一处疗养和滑冰胜地。从 1881 年到 1888 年尼采在那里居住了八年,参看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1974), p. 371. 阿多诺对希尔斯—玛利亚及其与尼采关系的讨论见阿多诺 'Aus Sils Maria';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70—86), vol. 10, part 2, pp. 326—9.
- [55] Lazarsfeld to Horkheimer, New York, 19 July 1947 [English in original] .
- [56] Adorno to Horkheimer, 10 June 1949.
- [57] Theodor W. Adorno, *Memorandum on the Berkeley Situation*, 21 July 1947.
- [58] Adorno to Horkheimer, 2 July 1949.
- [59] Theodor W.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1950), p. 224.
- [60] *Ibid.*, p. 255.
- [61] *Ibid.*, p. 225—8.
- [62] *Ibid.*, pp. 473.
- [63] Adorno to Horkheimer, 23 May 1945.
- [64]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p. 603—4.
- [65] *Ibid.*, p. 971, 脚注 1:“反犹主义描述”是让—保罗·萨特《犹太人问题的反思》

的一部分的英文标题。见 *Partisan review*, 13 (1946), pp. 163–78.

[66] Jean-Paul Sartre, *Anti-Semite and Jew*, trans. George J. Becker (New York, 1973), vol. 1, pp. 79–80.

[67]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629.

[68] *Ibid.*, p. 617

[69] *Ibid.*, p. 634.

[70] *Ibid.*, pp. 686–7.

[71] *Ibid.*, p. 656.

[72] *Ibid.*, pp. 767–8.

[73] *Ibid.*, p. 726.

[74] *Ibid.*, p. 973.

[75] Theodor W. Adorno, *Remarks o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1948) (Max Horkheimer Archive, VI 1 d), p. 28.

[76] *Ibid.*, p. 976.

[77] Horkheimer to Marcuse, 3 April 1943 [English in original].

[78] Nathan Glazer,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Profile', *Commentary* (June 1950), p. 580.

[79] 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New York, 1950), p. 10.

[80] *Ibid.*, p. 138.

[81]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204.

[82] *Ibid.*, pp. 964–7.

[83] Adorno, *Remarks o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15.

[84] *Ibid.*, p. 26.



#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下册)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 著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这些词汇不仅能让人想起社会科学中的某种范式，而且它们还能让人联想起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开始的一串名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实证主义论争”，还有文化批评——也许还有德国流亡者、第三帝国、犹太人、魏玛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

显然，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流派，不仅仅是一段学术史。

上架建议：社会科学

ISBN 978-7-208-09225-9



9 787208 092259 >

定价：98.00元(上下册)

易文网：[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文景网：[www.wenjingbook.com](http://www.wenjingbook.com)

#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下册)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 著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 (德) 魏格豪斯 (Wiggershaus, R.) 著；孟登迎、赵文、刘凯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书名原文：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SBN 978-7-208-09225-9

I. ①法… II. ①魏…②孟…③赵…④刘…  
III. ①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018 号

责任编辑 石楠  
封面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 著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62  
插页 4  
字数 777 000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25-9/C·359  
定价 98.00 元



# 目 录

[下]

## 第六章 重建社会里的批判性装饰..... 573

参与战后重建——对于西德公众政治意识的研究..... 573

霍克海默——一夜之间的功成名就..... 586

阿多诺关于批判的经验社会研究的构想——研究所的危机——马尔库塞的梦想..... 595

研究所的稳固——返回法兰克福后最先出版的两本书：《社会学》(Sociologica)、《组群实验》..... 614

告别独立自主：对曼内斯曼公司的研究——阿多诺退出经验研究..... 630

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爱欲与文明》..... 649

## 第七章 处于争论中的批判理论..... 671

作为独立的跨学科研究者——走向偶然音乐，以及其他领域中的相应方法..... 671

文学笔记..... 685

通向一种无需担心缺乏基础的哲学..... 699

于尔根·哈贝马斯——研究所最后一位社会理论家，受阿多诺赏识却被霍克海默认为太左..... 708

实证主义争论..... 742

保守主义争论..... 761

海德格尔批判..... 772

## 第八章 剧变时代的批判理论..... 789

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延续：《否定的辩证法》..... 789

批判理论家和学生运动..... 804

哈贝马斯走向社会交往理论—阿多诺遗著《美学理论》..... 835

后记..... 863

参考文献..... 868

档案和征引文献目录..... 868

I. 档案: ..... 869

    社会研究所在各类小册子、备忘录、报告和信函中的  
    计划书..... 869

    文件..... 870

    通信..... 871

    社会研究所研究报告..... 872

II. 研究所出版物, 研究所最重要的合作者的出版作品, 法兰克福  
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版物..... 875

III. 二手材料..... 915

IV. 有关背景的著作以及构成背景的组成部分的著作..... 924

索引..... 911

译后记..... 980

### 参与战后重建——对于西德公众政治意识的研究

当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和他们的夫人在法兰克福安顿下来，并且开始扩展“德国前哨阵地”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看作是犹太人、左派知识分子和批判社会学家，身处于一种差不多已经完全清除了他们这种人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种环境中的所有迹象一直以来都明确地指向对旧秩序的恢复。德国—犹太人文化所显现的那种独特的共生性 (symbiosis) 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摧毁了。除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外，法兰克福大学全盛时期——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非常有名的讲师和教授中，没有一位重返法兰克福。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之所以怀着耐心和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被迎接，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几个特殊的例外。

与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他是极少数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之一——不同，<sup>[1]</sup> 阿多诺不是在劳工运动或反对派，而是在统治权力本身当中寻求支持。正如霍克海默在写给黑森州的总理格奥尔格—奥古斯特·齐恩 (Georg-August Zinn) 的感谢信当中所说的，他们在寻找“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那类时常只能在理论上徒然地盼望，依然追求纯正教育之实践目标的朋友”。<sup>[2]</sup>

霍克海默在其教授职位恢复之后，不久就被选为哲学系主任，从

1950 年秋到 1951 年秋，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在这个职位上，他对法兰克福大学的重建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他与神学的关系在侧重点上已经有了变化。他不但为重新建立起来的新教和天主教神学保证了教授席位，随后也为犹太教研究提供了一个教授席位。

432 这再一次显示了霍克海默在交际和组织方面的才能。这个研究机构，一度被认为不能专心于他们真正应该干的工作而早已被人们所遗弃，现在却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吸收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一次又一次地保持了他们的活力，使他们的严肃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为了赢得经费和官方的补助，霍克海默甚至准备强调这个机构对于战后重建的参与。在一封他写给那些有可能赞助的人的便笺中，他把这个研究机构赞美为：不但能提供先进的社会学研究路线，能将“德国社会哲学和人文学科传统的扩展”与“现代美国社会学提供的最先进的经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而且是为国家紧迫问题提供学术建议的中心。<sup>[3]</sup>

对于研究所新近历史和研究计划的这些陈述，旨在向预期的赞助者提供信息，包括如下一些评论：

社会研究在各个方面，尤其在研究社会结构和研究生产过程里面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等领域，以及在舆论研究和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方面，最近几十年里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由于政治上的事件，德国还不能在人们渴望达到的程度上参与这项研究。如果说其他工业国家的经验还能为德国提供一些可供遵照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些学科对德国公共生活和对德国经济合理化所起的作用，怎么高估也不算过分。

社会分析可以解释战后的许多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难民问题。它们能为城市和工业区的重建提供重要的认知基础。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可以帮助年轻人更深入地理解在我们自己的人民当中以及各民族之间出现的关系紧张，并因此可以帮助他们为克服这些困难提出独立自主的见解……

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社会研究可以为各种新职业

开辟道路。这些新方法对于科学家的训练要求，并不亚于对工程师、化学家或医生的要求，对于它们的评价也不应该比其他这些职业低。不仅有政府行政部门和所有形成观念的传媒，诸如新闻出版、电影和广播等，而且有商业部门也都在支持着很多的社会研究团体。社会研究可以在他们的工厂中创造出最佳的社会状态，可以预先确定和计算出公众对他们的商业部门有什么需求，还可以监控和改善他们广告的影响力。人们在德国也可以期待类似的发展过程。<sup>[4]</sup>

1950年夏天，《法兰克福新报》(*Frankfurter Neue Zeitung*) 在霍克海默的合作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社会学进行反对偏见的斗争：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HICOG)支持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sup>[5]</sup> 文章声明社会研究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教育和知识领域(像研究所对偏见的研究)，更希望有可能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了让工人们可以获得最高的生产力，应该在何地、以何种方式恰当地建立一个工厂”。

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欺骗？是不是霍克海默为了通过异常危险的违禁交易来筹资，就对研究所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现代化理性重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明显的吹捧？难道他真的想要把研究所变成一个由政府和企业资助的、可以在重建过程中充当矫正角色的机构吗？难道，它是一个事业问题，就像稍后的学生运动被描述的那样，是一次“经由制度的长征”？或者，是研究所的领导人在自欺欺人？他们想把研究所变成一种将重建(reconstruction)转变为复兴(restoration)的工具吗？或者，由于研究所要求超越专断主义(principle of self-assertion)以及个人的、集体的利己主义，要求建立更人道的社会环境，它只能用那些听起来比别人陈旧的贺辞更少空洞感的语词来粉饰自己罢了？由于研究所得仰赖于财政赞助，为了维持它的存在，这会不会成为他们更加谨慎地去进行研究的理由，而不是依照他们的学者气质和学术才能所必需的那样去做，会不会不给批判理论家提供支持？

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显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真诚的和公开的讨论。谁会在这里讨论呢？返回法兰克福的人是研究所的残部：只有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按说现在已经实现了原来的目标：摆脱重负。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之间是一种日常化和共生的关系，使得他们的讨论绝不可能唤起对所谓的习惯策略的质疑，或者对那些有关他们自身行为之意义和目标的思想——后者已经退化为纯粹的客套话——的置疑。

434 霍克海默没有认识到，一个在财政上不再独立的研究所迟早会被迫承担研究合同，而在此情况下他就重建了研究所。同样，他也没有注意到，批判理论家在恢复时期很难不陷入道德上的困境。研究所不能期望从费利克斯·韦尔那里再得到金钱上的资助。他的生意早已不兴隆了，再说他已经留在了美国。在这里所能做的选择，难道就是那位被批判理论家们看不上眼的拉萨斯菲尔德采用的策略，即利用研究合同，甚至是令人讨厌的合同，为研究所提供完成其自身计划的机会？同时，它又不能为了自身的计划而引发太大的混乱，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研究合同不被批准。

在新研究所成立的最初阶段，有一件事是富有象征意味的。彼得·冯·哈塞尔贝格 1933 年之前曾是阿多诺的学生，1950 年后与研究所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为阿多诺和油漆制造商霍伊彻斯特（Hoechst）公司的生产经理安排了一次会面。哈塞尔贝格设法让生产经理对研究所的工作产生兴趣，但是阿多诺却给这个人上了一堂有关研究所工作方法和目标的课，最终使此人确信：这样的研究所对霍伊彻斯特公司没有任何作用。在这里，阿多诺显示出他在“管理社会研究”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的能力缺欠，就像他以前在做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时那样。但是哈塞尔贝格并不想就此放弃。他转而去求助霍克海默。霍克海默的意见是：我不适宜做工业社会学的研究；难道我们现在也应该支持它？在这段时期，霍克海默一方面以一个批判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试图让研究所的工作合乎商业和行政部门的口味。他也许认为，在建立新研究所期间，这依然是一种可靠的伪装形式，但似乎没有必要把这种事看

得太过认真。

就建立研究所这一点来说，霍克海默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社会研究所 1950 年春天的备忘录中包含一个五年预算，其中 50000 美元留作建筑新研究所和置办新装备的费用，109800 美元作为每年的运转费用。（年薪从搬运工和秘书的 1000 美元到研究所领导，如霍克海默本人的 7000 美元不等。）研究所仍然有临时的住所，一部分利用已被炸为废墟的旧研究所建筑，一部分利用法兰克福大学评议会的几间办公室。1950 年，有一位叫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的美国高级特派员，把 200000 德国马克交给研究所自由支配，还给了 235000 马克作为重建费用。这种强有力的支持源于那些负责美国对德政策的人的信仰——社会学，尤其是美国公民所描述的那种强调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因素。（1949 年在达姆施塔特 [Darmstadt] 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 [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也得到了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财政资助，但它只坚持了没几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明斯特大学资助建立了多特蒙德社会学研究机构 [Sozialforschungsstelle Dortmund]。美国人对政治科学的赞助甚至超过了对社会学的支持。）

法兰克福市政府希望用旧研究所的位置来扩充法兰克福大学，就将紧邻大学的另一处地方换给了研究所。他们支付给社会研究协会 100000 马克的弥补差价，并且清理了新地点上的废墟。在霍克海默的请求下，法兰克福大学也为研究所的重建捐助了其余的 55000 马克。1950 年 10 月底，这些资金全部被集中起来。除了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和法兰克福市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以外，社会研究协会和某些私人捐赠者也提供了资金。建筑工程在 11 月之前破土动工。

435

霍克海默通过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社会学机构设在同一座大楼内，差不多成功地完成了重建社会研究所的工作。虽然当时还无法确定他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但他请求市政府允许将这座大楼增高到四层。这个要求很容易地被批准了，他们希望这个城市将会以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机构而自豪。附加的第四层楼最终建起来了，但

联合国的那个机构却设在了科隆，并在那儿持续了7年（从1951到1958年）。

由于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资助，研究所以以在1950年夏天开始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对西德人政治意识的研究。研究结果后来结成《组群实验》(*Gruppenexperiment*)一书出版。<sup>[6]</sup>这个舆论研究项目旨在调查德国人对外国、对占领德国的军事力量、对（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及其所犯罪行带来的连带责任问题、民主问题和德国在全世界的地位等问题的态度。这种舆论研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选择，不仅因为舆论研究是一种美国进口货，在西德引起了强烈的兴趣，还因为民主教育一直是美国对德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研究所可以将1949—1950年出版的《偏见研究》(*Studies in Prejudice*)展现为他们的代表性成果。它将自身看作是半美国化的研究机构，而且，最初研究的大部分资金就来自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

忠诚于老研究所的学术传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那种浮泛的意见统计并不感兴趣。就像他们在《权威主义人格》中所指出的，他们试图穿透和超越观念的表面，并最终识别出民众当中存在的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的潜能。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研究意味着什么，他们又该怎样进行呢？在伯克利大学的反犹太主义研究当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运用性格结构 (*character structure*) 的方法。通过间接的和反射的方法可以显示性格结构，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揭示人们对具体政治话题的态度时，就不可行了。在实际上没有讨论这些主题的情况下，无法揭示人们对于具体话题的看法。因此，必须要达到的是，被测试的人应该公开表达他们对于此类具体话题的意见。

436 提出最终将这种研究方法用于研究计划，是一种富有霍克海默特色的想法。甚至在反犹太主义的研究计划期间，摄影研究计划也是最合他心意的部分，因为它是一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没有太多脱离的研究手段，因此可以真正洞察那些对参与研究实验的人起作用的社会机制。现在霍克海默提议采用一种不同于平常的、更现实的提问方式，以人们处在列车车厢中的情形为模型，来研究德国人对待政治话题的态

度。在车厢中，讨论常常是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展开的，他们甚至以令人惊异的开放性来讨论那些最微妙的话题。这种模型在此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共同经受的苦楚或对于痛苦的共同记忆会使大家比平时更快地联系起来。

对于霍克海默来说，定出一个由公众舆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组成的目录，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他肯定看到过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讨论团体访谈之利弊的文章，此文发表在1949年的《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艾布拉姆斯是受商业资助的伦敦舆论研究所的主管，他采用这种还不合常规的办法来考查广告活动。他指出，组群访谈的优点之一，是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受访者不适应正规提问方式的前意识（pre-conscious）观念就会显露出来；组群的气氛引导受访者表达他们感觉偏狭的、并因此会在正规访谈中压抑的思想和情感；组群访谈中表达的东西呈现在一种可认识的语境中；日常生活特有的矛盾观点并置现象，在组群访谈中再次出现了；组群中的成员趋向表达与个人会谈中的“私人”观点不同的“公共”观点，而后者更容易为他们的实际行为提供证明；而且，在一群有相近意向的人，甚至在同一组群当中，受访者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会比在正规的访谈情境中少一些谨慎和防御。艾布拉姆斯把这些看作是分析数据时最重要的问题。对他来说，只要关注的不是各种不同意见的累积，而是各种态度构成的结构和动力，那么这一问题就似乎不成其为严重的障碍——组群只能困难地依照随机抽样或比例抽样原则建立起来。甚至连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在研究他们的病人时，也没有注意到从普遍的人群当中进行随机抽样的问题，不过他们还是发展出了一套解释人心灵的普遍理论。

无论艾布拉姆斯的文章是否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计划观念产生过影响，它为那些对定性分析感兴趣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原创性的和新颖的观念。霍克海默一如既往地对此类新奇思想持开放态度。有关组群动力学的话题自1940年代以来显著增加，而且他对此非常熟悉；至少，他可以通过他的同事、流亡者库尔特·黎文的研究

熟知这一点，他在纽约反犹主义研究期间曾把库尔特·黎文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研究所 1944 年研究劳动时采用的参与性访谈的方法，就是一个典范，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日常情境中的讨论引向那些还没有被注意到的特定话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他们在这一领域获得的印象、经验和想法中，推导出组群讨论的程序，作为一种新修正、新发展的“现实的舆论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所自身的计划。根据 1952 年新建的研究所准备的第一份章程，组群讨论的程序就是从“问卷调查、心理投射技术和组群访谈”当中发展起来的。（研究所的同仁们喜欢用“组群讨论”（group discussion），而不喜欢在英语世界当中用得更普遍的“组群访谈”（group interview）一词，是为了明确，这不是对一群个体同时进行面试的问题，而是确认能从组群讨论的框架中引发出什么意见的问题。）

法兰克福的同仁们最早在德国使用的这种程序，在 1950 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它大体上是按如下步骤进行的。大约十个参加者组成的一群人聚集在人们通常愿意聚集的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针对某个话题讨论大约两个小时。为了保持匿名性，如果有必要，可以给参加者一些写有假名的卡片。还可以为引发讨论提供一些“基本刺激”（basic stimulus）。（在研究所的组群研究中，可以播放一封虚构的公开信的录音，这封信是由一位在联军队伍中服役五年之后的士兵写给当地报纸的。“基本刺激”以与研究《权威主义人格》的问卷调查表相同的方式汇集起来，它依据的不但是人们说出的直接经验或常识，而且还有诸如种族优越感、忏悔情结和权威情结等分析范畴。）做现场调查的研究者配有一台录音机，并配有一名助手记录未被磁带录下的所有反应或事件，而研究者则发挥着中立主持人的作用，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讨论能尽可能自由地展开并引发自然而然的陈述。在讨论的第二部分，现场调查者会根据具体情境，介绍关于讨论话题的某个具体领域的定型化的论点和反论点。通过填充一张简短的调查问卷表，提供出基本的统计信息。

在测试阶段，所用的基本刺激会改变数次——人们认为可以提供心

理刺激，但不能提供过度刺激。经验的收集围绕如何避免组群构成中的错误、最有效地使讨论进行而展开。我们知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同事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例如，他们当中最为投入的蒂德利希·奥斯默尔(Diedrich Osmer)，他是研究所一个部门的领导，接受过正规的训练，达到了学士学位的同等要求。而且，他除了在研究所工作以外，还到一家钢琴商店兼职。还有一位来自弗莱堡的学心理学的学生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有一天途经法兰克福的时候，停留下来参观了研究所，随后就去贯彻实践课的一部分内容——1951年在研究所攻读心理学学位。因此，这项计划同时体现了在经验社会学研究方面对新一代社会学家进行的实实在在的训练。这代表了社会研究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刚开始时的特点。

1950至1951年冬天，研究所开始在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及奥格斯堡等城市的市区和乡村中开展初步调查研究，调查德国人政治意识的一些重要方面。在人群自发聚集和相互谈话的地方——小酒吧侧房、旅店、难民营、大工厂的食堂、燃料库、俱乐部会所，大约有1,8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通常以8-16人为一组群，在一块儿讨论那位联军士兵的公开信中所提到的各种政治话题。在这项计划的调查阶段，有20多个研究助手以及新闻界的速记员参与，后者负责将那些从录音带记录下的内容打出来。而分析阶段要处理由1,635个参加者所进行的总共121组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要处理多达6,392页的讨论抄本，其中包括人们在组群讨论中谈到的话，以及讨论主持人和助手的评述。

在实践中，霍克海默所说的那种诱人的列车车厢模型存在的误导性，不久就变得显著起来。由于这些组群是任意组合的，成员之间完全不认识，在职业、兴趣和生活阅历等方面没有丝毫共通的地方，因此通常无法为讨论创造一种自由的气氛。对于121个讨论组群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法兰克福组群——其组成方式类似于艾布拉姆斯在他的文章中所提议的那样——利用了预先设定的(pre-structured)、在社会学或意识形态方面相对比较同质的多个组群。比如，他们集合起来的人群，要么来自同一村庄的农民，要么是一个俱乐部中彼此认识的成员，不然就不

过是一群有着相同职业、相同政治信念或相同生活阅历的陌生人(比如像年轻的教师、青年社会主义者或逃亡者),而讨论的气氛很快就显现出类似于那些熟识好久的人们期盼的情形。

439 霍克海默的列车车厢模型,在他五年之后出版的成果中被说成一个对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灵感的概念,显示出一个在分析材料过程当中也明显存在的问题。霍克海默的模型假定,吸收公共舆论而形成的支配个体的思想以及个体对公共舆论的态度,将会在易于沟通的组群气氛当中全部呈现出来。尽管此处采用的手段不同于柏克利研究中的方法,但关键的思想还是要让自我稽查的机制失效。但是,在预先设定的组群中进行的、研究进而要仔细考察的各种讨论当中,会出现一种明显的情形,即,组群讨论越容易产生支配性意见,就越能证明有必要去分析组群的动力学和个体的性格结构。即便舆论在个体参与者心灵状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充分说明,即使能产生有效的意见表达的真正交流环境得到了充分说明,组群动力学和个体的性格结构也绝不是那么容易能得到解释的。

组群访谈后四到五周,会对参加过组群会面者当中四分之一的人进行单独访谈。这些接受访谈者不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在分析中也不用考虑他们。要对单个会面的结果和组群讨论中表达的意见作比较,也是不容易、不可能的,因为在讨论中会有大量的人保持沉默,还因为很少有发言者能对每个话题都发表他们的看法。平均看来,完全沉默的人超过了发言的人,构成了占61%的多数。另外,由于无法系统地记录每个组群的特性,也就无法对每个组群的动力学结构进行分析。

因此,从可用的材料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定性的证据,能说明个人意见的原动力是在组群条件下产生的。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满足于将这项研究仅仅看作是对西德人就某些具体政治话题发表的“民意”的研究?难道没有充足的理由将组群讨论程序看作培育微型集体气氛的方法,看作是对可以表达民意的情境的模仿?难道有理由将这项研究的目标看作是在揭示《权威主义人格》中描述为“文化气候”的东西——个体不是或多或少地受它感染,就是或多或少可以免除它;

揭示萨特在他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当中描述为“无形的、弥散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另外的社群；揭示阿多诺用黑格尔的术语“客观精神”所描述的东西？在进一步的分析阶段，阿多诺在为他的一名助手所写的研究草案当中，有如下的陈述：

我们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知识的供给而不是知识的要求。然而，它对知识存在于“大众传播”当中的制度形式并不感兴趣，而更关注人们在其社会存在中直接碰到的、更为模糊的但却无处不在的形式：他们呼吸的知识空气。因此，研究的关注点绝不是直接指向主观的意见，而是指向那些已经在客观上预先确立或指定的、在社会上广泛散播的意识因素，它明确指向“客观精神”，即“德意志意识形态”。<sup>[7]</sup>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满足于这类目标。通过组织组群讨论唤起的客观精神，即便与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与对客观因素的分析毫不相关，那么至少能为研究各个“活”人提供社会心理学依据。对他们来说，呈现“客观精神”而使它与任何客观因素无关，那么就意味着要放弃他们宣称的唯物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在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结构赋予了个性特征的个体当中制造某种抽象化的东西。

因此，调查和对于调查的分析都因持续缺乏明晰性而出现了缺陷。尽管首要的目标是通过组群讨论来确认客观精神，但每个说话者的态度构成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共同基础。这些态度并不被看作相关组群各个方面，而被看作由参与者构成的总体因素。除此之外，虽然考察了客观精神对个人精神状态所起的作用，但是，试图发展出一种可以如此进行考察的程序的种种努力，从未超越最初阶段而有所进展。而且，既然推进的目标是要为一种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的调查（曾经计划用这种方法拓宽柏克利的研究）准备基础，组群研究也就呈现为一种暂时性的和实验性的特征。

尽管有些助手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从一开始就有一点是确定无

疑的：他们获得的材料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涉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愿意接触的事情。用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范畴来加工手抄本，很像在 1930 年代后半期调查工人阶级时收集的那种材料，尽管在这两个课题之间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关联。在紧张进行的十个星期的集体工作当中，完成了一个对讨论手抄本进行编号的“记分手册”。在进行定量分析时，将所有的个人而不是讨论组群当作统计单位，并在独立于讨论组群的统计组群——比如以 20 到 30 岁的人，小学生或农民各为一组——的归类下加以比较。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定量分析人们对于民主的态度时设置了七个“测试话题”：对民主政治（波恩和战后德国的国家类型）的态度，对罪行（共同承担战争暴行和纳粹主义的责任）的态度，对犹太人的态度，对西方占领国（美国、英国、法国）的态度，对东部的态度，对重整军备的态度，对德国人自身的态度。

441 那些参与了讨论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在讨论中发言的人），无论对苏联还是对西方列强的态度都主要是否定性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发言者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矛盾态度。对于民主政治明确持反对意见的人是对民主无任何保留意见的人的两倍，甚至更多。同时，有一半的发言者拒绝为第三帝国的暴行分担任何的罪责。有两个统计组群——农民和大学师生（academics）——尤其凸显出他们的否定性态度。所有农民都无一例外地拒绝分担国家的罪责；大学师生事实上也一律拒绝这一点。在对犹太人问题发表见解的农民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证明具有激烈的或相当强烈的反犹倾向。而参与讨论的大学师生，尽管他们在参与其他话题的讨论时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但显然在回避有关犹太人的话题。事实上，对这一话题表达意见的人当中，有 90% 以上的人显示出激烈或相当强的反犹倾向。

整个数量统计的结果，并不能说广泛代表了西德民众的态度，而且，这一结果还受限于发表过意见的参与者。结果呈现的具体数字比例如下：（涉及东德问题之外的所有话题时）16% 的人持肯定态度，40% 的人持矛盾态度，44% 的人持否定态度。在谈到东部的话题时，持拒绝

态度的人——被归入到持积极态度的一类——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尽管做了一些努力去保留这种评价态度的不明朗性（non-committal），并且对以这种方式所标示的态度是否可以被视为对民主政治或讨论话题的态度这一问题未作定论，但是，人们一直接受的解释——甚至在原文当中——却是：被调查的态度就是看待民主价值的态度。因此，对于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来说，这个调查结果几乎没有给他们的信心提供依据。

研究所的 18 位同事促成了总共 11 本有关定性分析的专著。其中包括阿多诺对罪疚和防御的研究；对于怀疑民主政治的研究，试图阐明出现普遍“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现象的动机和原因；以及另一项研究，即对人们面对重整军备的复杂态度进行社会—理论的阐释。（后面一项研究在定量分析中被给予特别奇特的对待：接受重整军备通常被评价为积极的态度，而反对重整军备通常被评估为消极的态度，因为阿多诺和他的助手们似乎把当时依然非常流行的“没有我们！”这句口号，看成与反对后希特勒政府有关的事情。这项研究没有考虑到其中涉及的极端复杂的原因和动机，尤其是那些反对重整军备的人的动机。古斯塔夫·海涅曼 [Gustav Heinemann] 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 1950 年 10 月 11 日辞去了联邦政府内阁部长的职务，以抗议阿登纳 [Adenauer] 的重整军备计划，并在 1951 年 11 月创建了欧洲和平紧急委员会。<sup>[8]</sup>）

这就是刚刚建立的社会研究所在 1950 年代初开展第一个研究项目时的情形：遵循研究所早期在调查权威和偏见时所采用的相同路线，实施较大规模的集体研究项目。研究所在初期阶段的其他研究项目被遮蔽了。在其他这些项目中，产生了考察德国处境的《偏见研究》的译本。这本书不久即被有比例地压缩，成了一部只包括德语版《权威主义人格》的作品。但是，即便是这个小规模的版本，尽管费了数年之功，也根本没有超出《权威主义人格》的节译本，霍克海默本人对后者很不满意，因而留下来没有发表，只有很少一些油印复写本在流通。<sup>[9]</sup> 另外一个项目是由列奥·洛文塔尔商定的，他留在了美国，1949 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之音的研究部主任。研究所与拉萨斯菲尔德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部（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at Columbia U-

442

niversity) 合作, 考察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节目中的德国广播和东欧电台 (莫斯科广播电台和东德广播电台) 的德语广播产生的不同效果。广播研究项目——社会研究所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展的纯粹的合同研究——是以专家会见听众的方式进行的。但获得的成果是贫乏的。这些成果没有让美国之音有丝毫的长进。但在这一点上, 也没有给批判理论家带来良心上的烦恼。

从整体上来看, 研究所在重建后的最初 18 个月内所做的全部工作, 都是在各方面尚处于暂时状况下进行的, 应当说是相当显著的。位于森肯贝尔格公园 (Senckenberg Park) 的新研究所大楼, 在 1951 年 11 月 14 日正式开放, 霍克海默此时应当为取得的成功而感到自豪。

## 霍克海默——一夜之间的功成名就

正式的开幕仪式在研究所演讲厅举行, 参加开幕式的有来自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官员代表, 有美国高级特派员委员会、法兰克福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代表, 还有商业界和文学界以及学者代表团的著名人物。在开幕式上发言的来宾, 有黑森州的教育部长路德维希·麦茨格尔 (Ludwig Metzger), 法兰克福市长瓦尔特·科尔布 (Walter Kolb), 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代表, 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列奥波特·冯·维泽和科隆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勒内·柯尼希 (René König)。代表研究所发言的是研究所主任和他的三个年轻助手, 他们以热情洋溢的声明结束了演讲。霍克海默此前正好当选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他发表了一个丝毫不会触犯别人、不会让所有在场的州府、市府和学术机构的代表们产生误解的演讲。

413 这是个政治味极浓的时代, 不同于霍克海默于 1931 年作为社会哲学教授和社会研究所所长发表就任演讲时的情形。自 1950 年以来, 朝鲜战争一直在持续进行。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达到了极致。1951 年 3 月,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将军——他在下一年

当选为美国总统——公开宣布使用原子弹合乎道义，因为美国并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从朝鲜战争中发现了一个提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地位的机会，于是在1950年提议建立西欧武装力量，包括德国分遣队。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重整军备。同时还在“殖民地”西德推行反共产主义。1950年9月19日，联邦政府宣布了一个针对“公务员的反民主政治活动”的规定。<sup>[10]</sup>这个规定将对于各种组织的支持定义为“与公务职责冲突”的事情，还特别提到了13个组织，其中包括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sup>[11]</sup>后者为了避开这道禁令，解散自身并建立了一个以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Ernst Rowohlt）为首的继承性组织；这些组织还包括纳粹政权受害者协会。<sup>[12]</sup>设在黑森州的这个组织的领导层在1948年鼓动法兰克福市市长瓦尔特·科尔布实现了他的意图，即邀请霍克海默出席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举行的德国国民议会百年庆典。甚至，那些公开承认他们不反共的人会招致诽谤和歧视。天主教作家赖因霍尔德·施奈德（Reinhold Schneider）支持就重整军备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并支持认真地去尝试与东德达成一种理解，但因为在西部德国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他的两篇论文均是在东部德国发表的。结果，从那时起，许多西德的杂志、报纸和广播机构就拒绝出版施奈德的任何著作。

政府和官方机构动用警察，试图阻止西德和东德之间的政治接触。西德警察拘捕了正从东柏林圣灵降临节（Whitsun）集会上返回的10,000名西德青年，并且在东西边界将他们扣留了24小时之久，直到他们同意登记自己的姓名并忍受所谓“健康”检查为止。1951年5月，大约另外10,000名西德青年在从东柏林“德国会议”返回的途中，又被警察拘捕，由于他们拒绝登记自己的姓名，竟被在东西德边界上的海伦贝格（Herrenburg）扣留了两天之久。为了阻止人们参加于1951年8月5日到9日在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青年和学生世界和平节”，数量众多的西德军警强行关闭了那时还开放着的两个德国之间的边境。1952年5月，青年自由德国<sup>[13]</sup>的成员，年仅21岁的菲利普·缪勒（Philip Müller）在埃森（Essen）举行的一次被禁止的示威中，被西德警察射杀身亡。

444

与此相比，由多数选民投票选为总理的阿登纳，在其就职演讲中却要求尽可能快地废止对“两类德国人”——在政治上完美无瑕的德国人和不完美的德国人——进行的区分。与西德宪法——基本法——相关的第131条法律条款，1951年5月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承认而通过，确认了先前被认为“有罪的”那些人所应享有的种种社会保障权，他们在第三帝国覆灭的时候已经是文职公务员了。法律为那些仍然被控有罪的人重返文职公务员职位提供了可能。甚至有空缺岗位时，“有罪的”人会予以优先考虑。在德国由于大学教授也是公务员，每当准备指定一个教授职位的时候，就必须对照内务部提供的职位清单来进行检查，看看在受“131条款”保护的那些教授当中，是不是有优先适合这一职位的候选人。1952年通过的“忠诚法”(Treuepflichtgesetz)，又确保把纳粹政权受害者协会的成员排除在文职之外。

这些例子显示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文化气候。研究所重新开放之前一个月，马尔库塞从美国写信给霍克海默，“这儿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那年夏天他去欧洲旅行期间，曾在法兰克福逗留过几天，还与霍克海默谈过话。“但我想这里的沉闷与德国的沉闷之间可能只有相对的时间距离。此刻，那里的空气肯定还是比较自由一些（虽然算不上清新）。”<sup>[11]</sup>

这就是霍克海默发表就职演讲的背景。他没有利用新职位给自己带来的机会而跨出学术界限半步。他指出，社会科学有助于消除偏见带来的罪恶和预设的种种限制，有助于使世界结构更切近和符合人们的真正需求。如果没有某种与支配不相干的自由思想——后者是哲学和社会学所关心的，那么，就永远无法打开一条通向更自由、更人性的社会的道路，而且世界会从一场大灾难摇摇晃晃地走向下一场灾难，尽管会有周期性的重建。谈论自由思想对于一个更自由的世界的重要性，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行话并没有多大差别，这些行话将“自由=西方”和“专制=东方”这两种价值作对比。霍克海默指出，人类的未来——从流行的演说和政治当中吸取的另一个流行语，取决于能否发展出对于人道主义的现代解释。霍克海默在提到纳粹主义时甚至用了一个传统的、神

话性的隐喻：“恶魔般的力量”将他和他的同事从法兰克福驱赶出去，“恐怖”不幸发生了。

他在谈到研究所的目标和任务时说，他在1931年的就任演讲中提到的许多话依然有效，比如，需要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理论家之间的通力合作。“我们今天也许可以加一条，即必须摘掉有色眼镜，无论是由单个学科还是由某个民族和学派的传统所构造的有色眼镜。”在研究所的教学计划中，无论是倾向于更理论化的早期德国社会学，还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最新的、最有效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方法，都会受到同等的重视。这扩展了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对于欧洲思想和美国方法的结合，这种描述早前已经退化为纯粹的套话，而且适用于研究所及其领导作为连接美国和德国之桥梁的角色。霍克海默现在恰恰以他从前的同一种方式开展工作。他用《社会研究学刊》的名称取代了格吕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献》。在就职演讲中，他用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所做的外观上很中立的唯物主义改造，来取代格吕恩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诉求。而且，他用跨学科和将哲学与各类科学学科结合起来的要求，来取代卢卡奇提出的要求——应该超越资产阶级科学对劳动的划分，后者是从卡尔·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那里接过的论题。因此，他现在也用了流行的托辞，与僵化的和教条的左派理论立场相较，这种表述打开了一条不受阻碍的通道，同时也让那些权威人士听起来悦耳又含糊。

在结束演讲的时候，霍克海默表达了批判理论的基本意图，采用的方式是将社会变化转变为对社会学家的道德要求，就像希波克拉底誓约（Hippocratic Oath）\* 对医生的要求：

当我说到那些必须联系单个研究的更广博的观点时，我的意思是，在出现的每个问题当中，甚至在社会学的态度本身当中，通

---

\* 由刚开始行医的医生向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进行的宣誓，内容是涉及医生职业道德。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古希腊的名医，被称为医药之父。——中译者注

常也存在一种超越现存社会的隐含的意图。如果没有这种意图(尽管几乎不可能详尽描述它),我们既不能将这些问题纳入到正确的轨道,也不能引发一丁点的社会学思考。人不是成为证据过多的牺牲品,就是成为纯粹观念的牺牲品。对现实的某种批判态度,可以说是社会理论家工作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批判元素正好是从现有的最积极的东西——希望——当中发展出来的,它使得社会学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培养学生去承受这种与现实的张力,后者是我们学科的精髓之所在,让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有“社会性的”人——这也包括能够忍受孤独,在我们看来,这也许是教育最重要的和最终的目标。<sup>[15]</sup>

1931年,霍克海默就提到过一些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有些正在展开,有些随即就要展开。但他在重开典礼上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在关于德国人政治意识的最初研究成果当中,他甚至也没有提到这一点,尽管他对这方面决不会有隔膜。比如说,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在1951年出版了一部德国各研究机构有关民意调查的成果,其中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最需要援助。“公众舆论”形成了一个显示那个时代症候的阶层体系:首先是战争造成的寡妇和孤儿;其次是那些曾遭受轰炸的人;第三类,是那些被从东部驱逐出来的人;第四类,则是1944年7月20日的反抗斗士,当时有一个试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在此之后才是犹太人。

霍克海默在1931年曾提到过一种新的、有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即运用庞大的经验研究机构解决社会哲学问题。与此相反,他现在却称赞他的年轻同事,甚至说,“我们只能盼望这些新鲜的血液很快地安排我们这些在这里显得多余的家伙,并将我们送回到哲学当中。”

欧洲思想与美国方法应该相融合的原则,依然是空洞的套话。甚至与反犹太研究计划时期相比,霍克海默显然不再设想在研究所还会出现这样一种研究——既能推动理论,又能充分地唤起他的雄心,推动他去完成一项值得尊敬的研究。

然而，他为自己的哲学研究设想了什么样的前景呢？他可以设计出一个能够带来灵感的研究计划吗？在研究所开幕式一周之后，即1951年11月20日，他发表了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我们在这个演讲中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些到场的荣耀的客人当中，有林堡（Limburg）的主教和外交使团的成员。《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写道：“在讲台上，院长们礼服上的垂布都显得很绚丽。但新任校长马克斯·霍克海默教授那身暗红色礼服上的金色绣花图案，在所有人当中显得最为耀眼。”校长职位移交仪式的气氛比研究所开幕式似乎显得更正式一些。穿上职位礼服，佩带上职位勋章，凸显出德国大学远离大众习俗的程度。在这些演讲中，总会出现一些令人困窘的片断。法兰克福镇镇长莱斯克（Leiske）代表市长大人致辞时用这样的话来赞美“您（也就是霍克海默）的崇高”：“您以一种值得效仿的和解姿态回到了您的祖国，而且再一次在这所大学里拥有了您的职位。这样的忠诚需要忠诚来回报。因此，我们都觉得，您当选为我们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的最高学术职位，乃是我们应尽归还和补偿之职责的最高表现。”

霍克海默就是在这些情境中，身穿校长职位的礼袍，发表了“论理性概念”的演讲。《理性之蚀》经阿多诺压缩之后，已经成了《启蒙辩证法》的普及本，校长的演讲是从《理性之蚀》（此书已由海茵茨·毛斯译成德语，但还未在德国出版）中节选的。人们并不想把校长就职仪式上的演讲当作衡量一个人学术著作的期待标准；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人们看到的只是自己非常期待的一个人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演说和其他应景的篇章，而且，这些东西通常依据的都是阿多诺拟写的草稿。

值得注意的是，霍克海默的演讲不但丝毫没有超越《理性之蚀》中所提到的观点，甚至不打算把此处所言与德国的处境联系起来。这种演讲在纽约或洛杉矶发表似乎也无不可。《法兰克福汇报》对其所做的令

---

\* 法兰克福大学这一时期的正式名称是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中译者注

人困惑但确切的报道，显示出它最终听起来是多么富有学术气。德国的“新日历”上并没有“解放前——解放后”之类的日子，有的是“货币改革前——货币改革后”（就像彼得·林姆考尔夫（Peter Rühmkorf）指出的）。德国正在将自己融入西方阵营并忙于重建——霍克海默非常渴望为这一进程贡献力量。德国此时急于抑制记忆，西方各战胜国在强迫德国向前政权受害者提供财产归还和补偿，在这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勉强和不足。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明确谈论理性这一概念的危机，并呼吁用理性去完成对总体性的自我反思，这听起来肯定是十分抽象且不着边际的。这样的谈论的确已经减轻了墨守成规者和“在政治上被控有罪的人”的痛苦，他们不必再捂起耳朵以免听到那些指责。而且，能不能鼓励学生去思考不同于矫饰的知性主义的思想？阿多诺于1950年在《法兰克福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德国文化的复兴？”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然而，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自己的习惯标准和他们自己的要求，以及用魏玛共和国时期批判理论思想的标准和坚决性来衡量他们是一回事，而用联邦共和国时代的语境，尤其用他们所依仗的学术背景来衡量他们，则是另一回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50年代说的话和发表的言论尽管不着边际且含糊不清，也不令人反感，但其中依旧潜伏着批判理论，依然带有左派社会批判鲜明风格的痕迹。

对于学哲学的学生来说，在那个时候能听到人们提及社会或与社会相关的事情，就很不一般了。例如，1947年战后第一次于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举行的德国哲学家讨论会上有两位权威性的人物，一位是海德格尔——他并未出席，直到1951年，他由于政治上受控告一直被法国主管当局禁止授课；另一位是尼科莱·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他致了开幕词。哈特曼无视人们将“时事话题哲学化（topical philosophizing）”的种种愿望，只一味地谈论他永恒的“范畴研究”，这项研究已经开展了数十年之久，甚至没有受到第三帝国的干扰。但社会学家也没有提出具有解放性的任何思想，虽然这门学科非常严重地遭受了纳粹的清除整肃，而且人们还期待受信任的

民主党人转向旧职位或占据新职位。当重建的社会研究所开放时，西德共有八个社会学席位，其中有些还是与其他学科联系在一起的跨学科席位。<sup>[16]</sup>只有三个席位由流亡者或反法西斯主义者控制。霍克海默就是这两个流亡者当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勒内·柯尼希，他于1949年继承了列奥波特·冯·维泽在科隆的席位。柯尼希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迫流亡到瑞士居住并在那里任教，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民主派，而在学术上却是德国社会学最坚定的先驱，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一贯依据经验的、独立的和非哲学的学科。奥托·施塔默尔（Otto Stammer）于195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系获得了一个社会学教授职位。施塔默尔曾是一名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新闻工作者、教师和积极参与竞选的人，在纳粹党接管政权之后他被禁止教书和发表文章。他的学术生涯是在第三帝国的末期才开始的。他曾在赫尔曼·黑勒的指导下做研究，<sup>[17]</sup>就像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那样，属于与劳工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家的传统。另外五位社会学教授在纳粹主义保护下都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职位，他们是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赫尔穆特·薛尔斯基（Helmut Schelsky）、格尔哈德·马肯洛特（Gerhard Mackenroth）、麦克斯·格拉夫·佐尔姆斯（Max Graf Solms）和维尔纳·齐根福斯（Werner Ziegenfuss）。

确立和任命社会学教授席位的方式，总体上典型地体现了大学里的状况：教授们全部来自比较保守的社会阶层，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情况正好相似。即使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尽管在纳粹时期让自己卷入了犯罪，当时没有给他教授席位，但这并未减损他的声誉；相反，在他的禁令期满之后，他的声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却日益上升。海德格尔直到1958年以荣誉教授的身份退休之前，依然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活跃于学术界，甚至在1951年之前他还发表过一些耸人听闻的演讲。他被解除教授席位，并没有影响到那些拥有教授席位的人捍卫他的思想方式。无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如何掩饰自己，在许多学生看来，他们依然代表了一束亮光，即便只是因为他們所做的事不同寻常，因为霍克海默在开幕典礼上的讲话——感谢有新功能的研究所大楼的建筑师

449

们——也合乎他们自己的想法：从外面看它时，你不会感到单调乏味。

但实际上，他们在那里依然显得默默无闻。这儿没有批判理论，也没有法兰克福学派。海因茨·毛斯（此时已经是霍克海默的助手）在为《法兰克福评论》（*Frankfurter Rundschau*）所写的报告中所表达的愿望，依然无法实现：“霍克海默的著作……主要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学刊》上。至少，像“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和“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这几篇文章，是很值得重新刊发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教学也不能替代它们。1950年夏天，霍克海默作完“自圣西门以来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批评”的演讲之后，只做了一些哲学演讲，如“现代哲学问题”、“17世纪的哲学”等。而且，自1951年夏天起，他开始主持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研讨班，紧跟着又举办了一些附加的研讨班，讨论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训练的基本概念。与霍克海默一样，阿多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并不很受学生欢迎。自1950年夏天重返自主的教学工作以后，他在几年间只上过哲学课。他先讲了两个学期的美学课，然后讲了“胡塞尔和当代认识论问题”、“柏格森”、“政治哲学史”和“唯心主义问题”等课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联合主持的研讨班，成了魏玛共和国末期、法兰克福大学全盛时期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合作教学的苍白之影，也是关于哲学的，而且主要集中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写的几本书在德国随处可以找到。《启蒙辩证法》、《新音乐哲学》和《伦理随想录》等书，在联邦共和国的情境中，已经与它们所处的传统切断了联系，而且也无法有效地融入到两位作者当前从事的活动当中，因此，几乎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修正和扩展。在发表于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当中，阿多诺是以一名有社会学背景的音乐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出现的。

尽管他们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会因此抛弃了那些最好的著作吗？难道阿多诺曾经的担心——他曾经认为自己和霍克海默在德国除了安全之外不会有更多的奢望，因为那儿的思想氛围还处在存在论批判（the critique of ontology）的反面，德国的殖民地位也不适宜进行社会分析，而且有太强的诱惑会促使他们充当知识领路人的角色——已经证

明是真的了吗？难道他们俩部分因为迫不得已，部分因为要响应德国弥补失去时间的巨大需求（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需求），都得完全依靠以前的著作吗？或者，他们倾向于这么做也是由于受到了令人悲伤的事实的激励，即他们实际上是仅有的两位能够成功重塑自身形象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左翼理论家？新建立的研究所，难道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去贯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美国最终认为最关键的要求：对客观因素进行专题的和具体的分析？研究所重新开放之时，霍克海默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再一次全身心地献身于哲学研究，这难道正好是对他个人提出的日常约束吗？这个人抱怨自己没有专心于自己渴望的哲学研究工作（分心是他自己造成），并且显然不想让一群与他自己有同等资格的成员聚集成一班人马——确切地说，组成一个理论家的群体，并以此种方式指定研究所去开展那些不连贯的经验研究项目。但从实际研究的方面来看，事情又会如何呢？阿多诺在他临终的最后几年强调说，尽管人们容易责备批判社会学家只满足于书面工作，实际上他们也觉得必须进行所谓的田野调查。他在实践方面都做了哪些事情？在两人当中，他的年纪较轻而且更多产一些，是不是他给整个研究计划提出了与他自己的严格标准相一致的方向？或者他至少在尝试那样做？

## 阿多诺关于批判的经验社会研究的构想——研究所的危机——马尔库塞的梦想

霍克海默在11月14日的研究所重开仪式上，后又在11月20日的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就职仪式上均发表了演讲。阿多诺则于12月14日在首届德国舆论研究研讨会上发表了一个介绍性的演讲：“经验的社会研究的当前状况”<sup>[18]</sup>，这个讨论会是由设在贝格施特拉塞之魏恩海姆（Weinheim an der Bergstrasse）的法兰克福促进公民事务协会<sup>[19]</sup>组织的。这种分工显示了一种迹象，表明《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在未来

所充当的角色的分化。霍克海默除了继续在教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之外，最终充当了纯粹仪式性的角色。而就阿多诺来说，他在教书的同时还充当社会学家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在 1950 年代还并不是很引人注目，但作为音乐批评家和美学家，他依然在学术界之外具有很高知名度，并且获得了文化和文学批评家的新头衔。

451 阿多诺在两方面成了社会学家。一方面，他就像自己曾在反犹太主义研究项目中所做的那样，是一名积极从事社会研究的实践者。1950 年代，他有时还非常认真地参加了研究所的经验研究项目。在从 1950 年末到 1952 年初这段时间里，他还帮助当时陷入困境的达姆施塔特社会科学研究所以 (Darmstadt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sup>[20]</sup> 出版了由 9 本专论组成的内容广泛的组群研究成果。(达姆施塔特研究所是由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一位官员于 1949 年创立的，旨在为年轻的德国社会科学家提供学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机会。)

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活跃的理论家。这里要强调的是经验的社会研究与社会学的理论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化最终依据的是批判的经验社会研究大纲。阿多诺在联邦共和国生活的 20 年当中，完成了一系列此类的研究，包括 1951 年 2 月在马堡 (Marburg) 的研讨会上就政治社会学发表的“社会学的当前状况”的演讲，<sup>[21]</sup> 他与研究所的助手们为 1954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词典》撰写的“经验的社会研究”，<sup>[22]</sup> 以及在他临终前一年以广播演讲稿为底本写成的那篇“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

魏恩海姆会议——其全称是“经验的社会研究”，尽管是阿多诺帮助组织的，或许是他坚持的——主要讨论舆论和市场研究的方法和问題。一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分别来自商业的舆论研究机构，各大学和大学研究机构，统计部门，广播机构，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和其他组织。这次会议是由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所属的反应分析部、美国高级特派团所属的舆论研究部提议召开的。现代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乔治·盖洛普 (George Gallup)，在 1936 就抽取小规模但有代表性的 6,000 个选民作为标本，正确地预测出了美国总统的选举结

果，这使抽样统计方法一夜成名，他给模仿他的调查方法的德国倡导者发来了贺电。

75岁高龄的德国社会学老前辈列奥波特·冯·维泽答应主持这次会议。他的开场白表现出一种抽象的味道，面对经验的社会研究，超脱地保留了前德国的社会学。研讨会就一些专门化的社会科学方法、问题和机构议题举办了24场演讲。来自美国高级特派团舆论研究部的列奥·P.克雷斯皮(Leo P. Crespi)教授——他的问卷调查结果通常是“绝顶机密”，在发言中强调了舆论研究对于促使社会机构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发挥作用所起的重要意义。来自米兰舆论研究所(Milan DOXA Institute)的P.L.费齐兹(P.L.Fegiz)教授，则概括地描绘出一个在欧洲联盟内部出现的图景，其中有关欧洲消费者习惯和趣味的调查表，会让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并尽可能的便宜。然而，452在所有这些演讲开始之前，阿多诺就在他的介绍性演讲中试图将经验的社会研究从“研究系统”中抢回来，并使其服务于对德国社会学人文传统有坚定批判性的社会理论。

阿多诺指出，在唯心主义时期，哲学思想能够掌握所有当时可知的真实材料。在各种唯心主义体系坍塌之后，它们的核心概念已经远离它们的理论语境和物质关系，在人文主义社会理论的控制下，成了蒙昧主义的工具。

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的残余迫切需要用经验方法作为矫正措施。经验方法的真正重要性就在于它们所包含的批判动机当中。经验的社会研究一定不能让这种动机枯萎，也不能在考察社会关系中欺骗自身。科学不能通过借助于某些意识形态概念为自己粉饰出一种调和的社会现实图景，然后心满意足地接受现存的社会状况来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它必须提出对于现存事物之严酷性的意识。社会学不是一门人文学科。它自身必须关注的问题，在本质上或根本上不是意识问题，甚至不是潜意识问题，也不是构成社会的人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社会化的各

种客观形式，它们决不可能产生于精神当中，不能被看作一种人类内部的内在状态。德国的经验研究必须以严谨的、毫不做作的态度去揭示社会事实的客观性，远远超越于对个体意识甚至集体意识的揭示。<sup>[23]</sup>

这是从宽泛意义上对经验研究做出的详尽阐述，与受意识形态激发的思考形成了对照。但它同时也是对舆论研究的一种批评，在这一点上，舆论研究并不能揭示社会事实的客观性。阿多诺为此举了一个实例：

453 如果依照某些所谓的人文社会学权威的观点，我们要面对这样的陈述——所谓的农村人对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之所以抗拒，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具有保守精神，那么，我们将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我们要……举例来说吧，将那些熟悉农民的调查者送入乡村，当农民们说自己留守农场是出于对故土的热爱和对父辈习俗的忠诚时，鼓励这些调查者继续提出更深一层的问题。我们要用经济因素来比照他们的保守性，并且要研究各种技术革新是不是并不会给一定规模之下的经营带来利润，是不是这类革新需要一定规模的投资，技术上的合理化为这种经营提供的条件，会变成不合理的东西。<sup>[24]</sup>

阿多诺所举的这个例子，依据的是达姆施塔特的社群研究（community study）。由于他参与了部分的合作研究，他已经比较熟悉研究达姆施塔特周围的乡下社区的材料，而且还给一本研究《处在城乡生活交叉地带的兼职农民及其家庭》（*The Part-Time Farmer and his Famil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Rural and Urban Life*）的专著写过导言。<sup>[25]</sup>达姆施塔特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既搜集大量结构性的、客观体制性的数据，也搜集大量主观的和社会心理学的数据。阿多诺所举例子似乎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必须接受主观研究方式和客观研究方式的共同检验。在主观研究中额外再问一些不满足于接受那些显然认可意识形态

的表面事实的问题，并且，将这些信息与从客观研究中获得的论据结合起来，就可以描绘出一种超越了调查者自身意识——后者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一致——的社会存在图景。显然，阿多诺在这里关注的概念，是弗洛姆和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所早年的霍克海默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概念曾被用于阐释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理论公式，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下，这种阐释转为对经济过程、精神和文化诸因素之间关系的分析。只有在这种语境中，舆论研究对于阿多诺似乎才有一些意义。

但是，他在所举例子的末尾处又补充说，当然并不是所有经验社会学的调查都有批判功能时，这时他又想说什么呢？

无可否认，我相信，即使那些有明确限定话题的市场分析，如果真正想取得它们需要的成果，也必须与这种长见识的、非意识形态的精神相结合。这种客观的联系，关系到信息的供给和对盲目的、教条的、任意的论题的分解，正是它把作为哲学家的我与经验的社会研究联系在一起。<sup>[26]</sup>

市场调查除了提供可被用来为更有效的广告、更成功的包装和更好的销售计划作依据的相关数据之外，它还能提供什么呢？在市场调查中，除了顾客之外还对谁做了调查呢？阿多诺随后在讨论舆论研究规范时说，“研究可以受私人资助但要面对最严格的科学标准”<sup>[27]</sup>，这其实是不充分的。大会在发表了有关经验的社会研究适用的诸多领域——政治和社会舆论研究、市场调查、工厂调查、受众研究等——的演讲之后，进行了一般讨论，一些与会者在此时提出了异端性的评论。哥廷根大学社会学系的蒂特里希·高尔德施密特 (Dietrich Goldschmidt) 说，“如果一个企业家允许在他的工厂中进行意见调查，人们肯定会说，他需要操纵工人的手段。但是如果人们牢记这种舆论研究的真正目的——即要根除恶劣条件并改善人际关系，那么显而易见，公司主管应该同工人一起接受质询。”<sup>[28]</sup> 来自阿伦斯巴赫 (Allensbach) 舆论研究所

454

的 E. P. 诺伊曼 (E. P. Neumann), 在热情地谈论盖洛普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每周一次发表在一百多份报纸上——之时, 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逻辑推演, 而且说, 国会议员作为人民的代表, 最终会从舆论研究中受益。

阿多诺激动地强调说: 每一个愿意将人们看成是有理性的、有人性的人, 都在促成对于人们经受的事情的颂扬; 每一个认为经验的社会研究太过机械、太过粗糙、太过愚蠢的人, 都是把社会学对象的这些特征转移到了社会学自身上; 经验方法倍受嘲笑的不人道性 (inhumanity), 仍然要比对野蛮 (inhuman) 的教化 (humanization) 更人道 (humane) 一些。当他这么说的时侯, 又想传达什么意图呢? 或者是要说, 接受调查的人依然作为客体, 甚至稍后依据研究及其应用中收集的信息, 仅仅被假充为客体; 在这种情况下, 所用的方法是“不人道的”, 而且这种受奴役状态在持续。或者, 另一方面是在说, 接受调查的人, 至少可以在稍后的某个时刻得到一次查看调查结果的机会, 并将其当作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以显示直到此刻为止对他们自身来说还相当模糊的联系。只有在 这种情况下, 阿多诺在他的演讲开头所做的陈述, 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关注的人依然是人类, 即使他们卷入到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甚至还很模糊的关系当中, 他们也有做自由的自我决断的机会和自发性; 而且我们知道, 正是这种自发因素和意识限定着数字规则。”<sup>[29]</sup>

阿多诺从揭露经验的社会研究与人文社会学的矛盾当中受益, 反击了对经验的社会研究的讽刺和偏见, 他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如下事实: 即他并没有运用意识形态, 去把社会科学转变成商业或公共管理的纯粹附属物。但是, 在他以批判社会学的名义解救市场研究的努力中, 不正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吗? 在被调查者的客体地位是持续还是中断对他来说还不成为方法论问题的时候, 他自己难道在经验层面上看不到“批判的社会研究”与“行政的社会研究”——阿多诺审慎地使用拉萨斯菲尔德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第一期上引入的这些术语——有哪些最重要的不同吗?

阿多诺显然在犯这样的错误。他认为经验的社会研究乃是通向严谨的批判的社会研究的必经之路，并加以捍卫。但他的这种捍卫只集中在两点上。他强调经验的社会研究不只是一套复杂的调查技术，认为经验的社会研究“早就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能够抵消提问的表面性”：间接询问、测试、详细深入的访谈、组群讨论程序——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研究所曾经引以为荣地使用过、且现在仍在使用的办法。

他还强调了诸如拉萨斯菲尔德曾重点提到过的“舆论领导者”的角色以及美国日益增强的要求定性分析的意识，目的是想把社会理论描述为经验的社会研究的构成要素。“显而易见，如果这种社会学不是停留在软弱的梦想——其软弱性恰恰对当局者有利——当中的话，那么对它来说词语的变化就绝不是纯粹的陈词滥调，它必定会统合棘手的真实性的全部力量。”<sup>[30]</sup>

阿多诺在结束演讲的时候，由此已经到达了一种代表着霍克海默早期规划的阿多诺式变体的立场。实际上，阿多诺在魏恩海姆的演讲，差不多就是人们期望霍克海默在研究所的开幕式上要讲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阿多诺准备接管霍克海默——他现在只充当纯粹仪式性的角色——的工作，以确保研究所从现在起，至少在另一个人领导之下，将实施那些有助于推进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方案吗？他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迫切需要扩展“批判的社会研究”，使之超越那些原本渗透于深层结构中的方法，超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吗？他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至少需要把经验研究的某些长期反馈纳入到为受调查者和被分析者提供的信息之中吗？由于这一点看起来不切实际，就可能出现如下情况：批判理论家们愿意进行那些受调查者和被分析者从长远看来也不能理解的深奥的“批判的社会研究”。但是，当他们的研究结果不仅能为批判理论家们所利用，而且也能对那些来自商业、公共行政部门和学术机构的客户或赞助人所利用之时，批判理论家的知识最终会不会变成一种统治工具，而不会促成普遍的启蒙呢？怎样才能避免这一点呢？

而且，如果阿多诺可以不带任何批判限定地谈论经验实证的自然

科学的胜利，并去描述被新医学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被普遍接受的情况，那么这种社会理论将处在哪种状态？理论真的能处理基本的研究问题吗？它能够先进到和具体到足以清晰阐释形形色色的数据吗？至少，社会研究所开展的那些项目，起码在部分上是受社会理论指导的吗？

456 这些问题在此时依然是未决的。重建后的社会研究所失去了自己真正的成员，几乎没有开始运转。霍克海默被选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一年后又再次当选，这意味着他在履行教学任务和校长职责时，几乎没有时间顾及研究所的工作。阿多诺尽管比霍克海默担任的教学任务少一些，但由于他本人参与了达姆施塔特的组群研究项目，承担了额外的工作量。即便如此，他还是接管了霍克海默的许多工作，并热情地投身于研究所的事务。作为一名已经拥有美国国籍的公民，到1952年，他已经用完了法律所允许的可以连续在自己出生国生活三年的时间。如果他再不去第三国旅行或者回美国住一段时间的话，将会失掉美国国籍。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已经设法通过了一种“个人法 (individual law)” 的允许，他可以在他的出生国连续居住五年。而阿多诺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不享有这样的特许权。

霍克海默、波洛克和阿多诺三人，看起来都得在某个大约相同的时刻返回美国，研究所的领导们与弗里德里希·哈克尔 (Friedrich Hacker) 签署了一份实施一项或多项研究计划的合同，以确保他们的收入来源。哈克尔是出生于维也纳的一名精神病医师，移居美国并以自己对攻击行为的一流研究，在1970年代成了知名人物。他在比华利山庄酒店 (Beverly Hills) 开设了一个精神治疗的诊所，并且希望通过与社会研究所主要人物的合作，获得学术声誉和广告效应。

“我怀着一种无比沉重的心情在旅行，”阿多诺1952年10月从他旅行的第一站巴黎写信给霍克海默。“Ceterum censeo [另外我认为]，我们只属于大西洋的这一边。”而且他还断言：“马克思：绝对是这样。别无其他！”<sup>[31]</sup>第二天，他和他的妻子在勒阿弗尔坐上了开往纽约的轮船，并在纽约见到了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随后继续到洛杉矶旅行。

现在要做的就是满足哈克尔的要求，他正指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一同到来（但他对他们签署研究合同的真正原因，对研究所履行合同的特殊方式毫无所知），并要付全部费用。如果有必要的话，在霍克海默不去那里的情况下由阿多诺全权代理，直到阿多诺保住他的国籍返回德国。阿多诺在抵达洛杉矶的时候写道：“让人感到难受的是，我不知道何时才能拿回我的护照，当然不是六个月，我感觉起码至少得一年时间”。<sup>[32]</sup> 他觉得自己为哈克尔基金所做的工作是一种牺牲，并认为哈克尔这个人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的美国之旅痛苦地证明了如下事实——他们回归德国还不彻底。在到达目的地之后，他立刻重复了他的“另外我认为 [Ceterum censeo]”：“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努力集中在那边——这里面临落空的危险，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非常严峻的，这种想法须臾也未离开过我……如果一个人在对于妄想狂现实的妄想狂式幻想和具有健康共识的愚蠢性之间作选择，妄想狂依然具有更强的生产力。”四个月，他甚至更为迫切地写道：

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几乎不能期望成为可以避开邪恶的实践的主体，所有依赖于保持连续性的事物都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并不是所有支撑我们精神的东西都失去了。但是从各方面来看，只有我们可以在字面上或比喻意义上谈论这一点的时候，它才可能存在……尽管我们有很棒的可以存活的运气，但是产生那种运气的条件已经随风而逝，我们决不允许我们自己把它们变成拜物教偶像。返回的流亡者应该环顾四周，去发现他可以完成什么工作。这条老规则对我来说，要比今天这些制度化的对相反事物的需求更明智。那种需求是小资产阶级所拥护的，他们只会把自己备受创伤的尊严滥用为最恶劣的盲从守旧的借口。

阿多诺以他独特却充满感情的戏谑方式继续写道：“甚至施拉格鲍姆 (Schlagbaum) 酒吧里的所有樱桃酒与我们哲学的共通点，都多于我们哲学与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文集的共通点。”<sup>[33]</sup> 然后，他的情绪进入了

高度兴奋的状态：

我不知道我可以代表我们两人对那些真正与生和死相关的事情说些什么，尽管我认为我可以；我宁愿在欧洲冒着被打死的风险，也不愿意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建立”什么伟业，或者退缩到私人生活当中，即使这些发展……几乎不能给人提供拥有私人生活的机会。

接着，是简单而严肃的语气：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本能去安排各种事情，当你把校长的事务置之脑后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时间去思考和生活，而这两者是同一件事情。我从根本上确信（尽管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尽管在法兰克福也要承担各种责任、承受生活中的各种纠缠，但与那种只包含孤独（隔绝）的消极面的生存方式相比，我们会找到更多的和平和宁静。<sup>[34]</sup>

458 阿多诺答应哈克尔将会开展一项对于占星术的社会心理作用的研究。对阿多诺来说，这代表着对《偏见研究》的扩展，扩展到一个介于两个研究领域——洛文塔尔和古特曼对于法西斯煽动者的演讲和文章的分析与伯克利大学对于《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之间的那个领域。阿多诺曾在“反神秘主义”一文（《伦理随想录》中的文章）中提到过占星术，<sup>[35]</sup>而且他原有的看法——可以通过文化工业产品和大众传媒研究刻板守旧的、反民主的思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用来观察这种趋向于强化法西斯主义控制的复杂现象。此外，阿多诺已经以这样一种方式——只要有需要，他自己本人就可以实施——拟出了计划，因为他无法确定霍克海默会不会在可见的将来到美国与他合作。

对于阿多诺和哈克尔双方来说，这种情形都显然是令人不快的；而且这种情形在1953年5月达到了极点。阿多诺收到了一封由哈克尔诊

所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签署的信件，其中要求他放弃一半的薪水，承担一半的工作量，以便他可以免除那些对他来说显然是一种负担的行政职责和社交关系——他因此而辞职。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阿多诺还是成功完成了一个单人研究项目：对右派共和党报纸《洛杉矶时报》“占星术专栏”三个月以来的材料内容进行纯粹的定性分析。阿多诺在逗留美国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从事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57年德国出版的《美国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上，标题为“降到地球的群星：《洛杉矶时报》占星术专栏——对于次等迷信 (Secondary Superstition) 的研究”。<sup>[36]</sup>

阿多诺本人没有提到占星术专栏的读者或作者。他没有提到任何客观数据。对占星术专栏的“纯粹”阐释，成了一个可以运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整体思想的经典个案。这个“栏目直接用于指导那些有依赖性的或者感觉有依赖性的读者。它预先假定了自我的软弱以及真实社会的无力”。“占星术……隐瞒、供养并开掘……普遍的和疏离的依赖性。”<sup>[37]</sup>

阿多诺自己将这种研究设想为定性分析方法的模型。对孤立的文本进行的这次定性分析，最后证明是不成功的。在这项研究中，星星所引发的联想被解释为一种实际上未被意识到但因而也是被默认的掩饰，它要掩饰的是与全能的父亲形象相关的禁忌关系。这又一次反映出，阿多诺的这种解释方法很像心理深层分析那种预见和千篇一律的方法。“微观逻辑”方法，以及他所声称的使自己完全沉浸在材料之中，所有这些都依然是无根据的自吹自擂。他的这种解释过于宽泛，因此解释本身抑制了有限的证据案例，在某种程度上证据几乎提供不出反抗。真正缺乏的，是将阿多诺定性分析的才能嵌入到具有伯克利研究特征的那样工作环境之中的机会。

459

当阿多诺在洛杉矶以占星术研究项目维持生计的时候，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研究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赫尔穆特·普勒斯纳 (Helmuth Plessner) 每周抽出两到三天从哥廷根旅行到法兰克福，来代替阿多诺做一部分工作。普勒斯纳比霍克海默长三岁，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于1933年失去了在科隆大学的哲学教职，并于1934年移居荷兰。

1939年他成为荷兰一所州立大学的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得到了格罗宁根（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大学授予的教授席位。在德国入侵时，他因躲藏在地道中而得以活命，最终，在他60岁的时候，哥廷根大学委任了他一个社会学和哲学的教席。普勒斯纳由于1928年出版了他的《有机生活的各个阶段和人》（*The Stages of Organic Life and Man*）<sup>[38]</sup>，随后就与舍勒一道，成为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与舍勒不同，他从社会历史的观点来进行社会分析。在普勒斯纳的指导下，哥廷根大学社会学系从1952年开始，已经对德国大学教师的地位进行经验的和统计学的研究，该项研究成果于1957—1958年分三册出版。但普勒斯纳认为自己首先是社会哲学家和文化社会学家，并且很看重社会学哲学的重要意义。赫尔穆特·薛尔斯基后来称他为“德国的怀恨者”，他因此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许多相通之处。但这两个人都以相当保留的态度看待他，而且一直如此——这是他们对待任何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第三方的一贯态度。

由于阿多诺的缺席，又由于霍克海默要履行校长职责，要毫不松懈地完成教学任务，他几乎没有时间为研究所工作。普勒斯纳的半职帮忙甚至也不能完成那些绝对必需做的事。霍克海默认为，社会研究所最需要的是出版成果，可是这些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应该能维持研究所辉煌历史中确立的水准。他们可以出版的两项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偏见研究》的德文版和对于西德政治舆论的组群研究，都远没有作好出版的准备，而且没有人持续关注它们。

460 由于面临所有这些问题，霍克海默又得再次承受在两种计划当中作选择的考验：要么不失面子赶快隐退，要么拖着荣耀慢慢隐退。为了让有关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最终能得出一个结论，他在1953年4月底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向那些主要由黑森州和法兰克福市的公务员组成的听众提交有关这一项目研究成果的论文。霍克海默认为，可以将这些论文作为一本书出版，而不需要对收录的文章负太大的学术责任，同时将完整的油印本送给选定的个人和机构。但他对这些论文非常不满意，因此抛弃了出书的计划，转而启动重出学刊的计划，想通过这个

刊物中其他高质量的投稿来平衡研究报告的不足。

就像以前一样，这份学刊每年最多出三期。霍克海默这样告诉阿多诺，每期由四部分组成：

(1) 论文。有我们写的（如有必要也可以改写以前学刊中的资料），或者由我们约请的研究所的朋友们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像阿尔波特（Allport）、坎特尔（Cantril）、柯林纳贝尔格（Klineberg）、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或你为我们争取到的其他人）。

(2) 原文。我这里考虑的主要是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文献中节选的东西，它们要么没有被完全、要么根本没有被译成德语。我们不必限于至关重要的资料，相反地……

(3) 研究所所作的经验研究的摘要。我们可以考虑来自实践训练课程、广播研究、专家调查、学生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及最后进行的组群研究的成果，如果它们不能结成一本小书出版的话。

(4) 评论。

霍克海默还补充说：“如果我们办不起来这个学刊，我担心我们处理不了出版的问题；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学刊意味着以一种在我们看来非常理想的方式整理研究所的成果。如果你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那该多好！”<sup>[39]</sup>阿多诺作出了热情的回应。他允诺“即使不重印旧的原文，也不会缺乏资料，尽管那样也可能很好。”无论如何，第一期必须能“真正代表我们的风格”。<sup>[40]</sup>

霍克海默最后也发现了似乎有望解决人员问题的办法。他最早在1953年1月向阿多诺表达了他的短期退隐计划。普勒斯纳和研究所的两个年轻助教蒂德利希·奥斯默尔和埃贡·贝克尔（Egon Becker）组成了三头执政，如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退隐后，他们就来领导研究所的工作。退隐计划再次引发了旧有的争论。然而，这次的争论不是发生在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以及波洛克之间，而发生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之

间。阿多诺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如果他们放弃研究所，他们就会丢掉一项重要的安全因素，另外，普勒斯纳写给他的一封有关组群研究的信表明，普勒斯纳已经将整个事情当成了负担；这使得霍克海默转向更为谨慎的计划。“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将研究所委托给社会学协会之类的组织，也就是说可以将它委托冯·维泽的名誉职位。给冯·维泽一些适当的酬劳，可以照料我们的人员，直到你返回来。如果这样可行，我可以充当首席顾问之类的角色，而且我们稍后可以决定你是否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或者接管实际的领导职务。”<sup>[41]</sup>阿多诺对这种建议和冯·维泽都持保留态度，但在给霍克海默的回信中写道：

然而，我没有更好的建议，原因是在于缺乏合适的人。因此我的建议是：在我回来之前姑且应付局面，且不要作任何组织上的改变。我们必须看到我们那时所做的事，如果你那时成了首席顾问，接管实际的主管事务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好主意，至少暂时是这样。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与现实进行的艰难斗争当中，研究所和大学都是我们的主要资源，当我们不再掌管行政权力的时候，各个方面都会立刻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接受这些缺陷以及未来几个月里研究所的工作甚至会拖延的事实；我认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很快理顺各项事务，不会让你劳神。<sup>[42]</sup>

在霍克海默还没有收到这封信之前，他已经向法兰克福大学评议会展示了他的心电图，以显示他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并且，被允许与冯·维泽展开谈判。但他预先又将此告知了普勒斯纳。最后，他和普勒斯纳达成一致，让普勒斯纳在下一个学期暂时以代理主任的角色接管研究所，以代替阿多诺的职务。霍克海默刚一恢复精力，就向冯·维泽付酬 1,000 马克，条件是后者能在夏季学期为研究所每两周上一次普通社会学课程或作一次讲演。“所有这一切都要表明研究所是德国社会学教学的中心。”<sup>[43]</sup>

在这样的时刻，霍克海默那种甚至不惜舍弃不墨守成规（nonconformist）的研究、教学和行动来获得社会承认的野心，以及他对于自身

能够达到顶峰和创造超凡成就的自信，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这种态度的一种典型后果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 (Alexander Mitscherlich)，作为后纳粹时期极少数坚定地支持弗洛伊德的人之一，招来了同事们的敌意——以及欺骗和背叛的指控，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他作为观察员和专家证人行事，也是《没有人性的科学》(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这一文集的编辑之一。<sup>[44]</sup> 依照霍克海默的说法，他“在所有地方，在教师当中甚至在研究组群中，均被视为新的古姆贝尔”。<sup>[45]</sup> (统计学家和数学家爱弥儿·尤利乌斯·古姆贝尔 [Emil Julius Gumbel]，曾在 1920 年代招来同事、学生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敌意，就因为他出示了有关政治谋杀的文献和对有政治动机的罪过的有罪起诉，并且揭露了右翼及其被授予优惠待遇的途径。) 然而，当米切利希于 1953 年初请求正式加入研究所的时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想要他。与心理分析学家合作与他们的传统是相符的，也符合研究所对于跨学科、尤其是胜任社会心理学的要求——在研究所重新开张时，就重申过这些要求。但是，除了霍克海默原本就不情愿给那些多少已经确立了影响、基本上必须被视为对手的学者们提供正式的职位而外，还因为他害怕让米切利希加入研究所“可能会引发我们一直在避免的公开的攻击”。民族主义者 (die Rachsucht der Völkischen，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 的报复性“是真正的《旧约全书》，会持续至第三和第四代人”。<sup>[46]</sup> 但是，如果研究所的主任们不准备保护这类事件的某个人，难道这个保护性的机构因此只顾自身吗？霍克海默另外还有一个理由——米切利希之前为研究所做的演讲，虽然“对我们关于反犹太主义的第五个论题有非常认真的分析性说明”，但他事实上并没有说出什么独创性的见解，这个理由看来只是此后所作的合理化解释而已。由于研究所的两位领导派米切利希去洛杉矶哈克尔的诊所替代阿多诺的努力没有成功，就以拖延的方式来应付他的聘用问题。

462

然而，与普勒斯纳达成的协议几乎不能缓解研究所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当重开学刊的旧计划被重新唤醒的时刻，霍克海默采取了另一个看起来会让奇迹变为现实的办法：他询问赫伯特·马尔库塞是否愿

意回到法兰克福来。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之间的联络从未中断过。马尔库塞对霍克海默的忠诚依然如故，在他看来霍克海默依然代表着进行理论研究的唯一机遇。这使得霍克海默很容易以这样一种方式款待马尔库塞，让他的前任助手保持希望，并成为研究所的友好扩展。

1950年春天，人们除了尚不清楚谁会接任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哲学教席之外，也不清楚谁将接任伽达默尔的哲学教席，而且，那个最适合的候选人卡尔·洛威特 (Karl Löwith) 已经决定改去海德堡大学，就在这个时候，霍克海默给马尔库塞写信说，“(我)自然……竭力要求任命你本人来接替伽达默尔的教席”。将阿多诺安排到这个教席上困难会更大一些，因为他与霍克海默合写过《启蒙辩证法》，会被认为与霍克海默的关系太过亲近。“或许”，霍克海默继续写道，“两个人都没有可能，我们将聘到一个二流或三流的存在主义者”，进而他提到了一些海德格尔的支持者。“你会对这样的任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sup>[47]</sup> 马尔库塞非常肯定地回答——“如果只为了让我们能再次在一块工作这个期待。可是，如果我认为应该让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都聚在同一所大学里工作，那我对世界精神的基本判断就是非常错误的。”<sup>[48]</sup> 但他在此时收到了霍克海默的来信：“在此期间我已经成功地（秘密确定人员！）将泰迪列入了名单。”<sup>[49]</sup> 然而，如果阿多诺得到了教席，经费就可以投给“更宏大的计划”——西德政治意识研究，这就有了获得第二个社会哲学教席的美好前景。这当然（霍克海默当然没有明说）是为马尔库塞设立的。然而，到1953年的时候，伽达默尔的继承人不是阿多诺而是格尔哈德·克吕格尔 (Gerhard Krüger)，后者自1946年以来一直是图宾根大学的教授，并且与阿多诺同龄。克吕格尔的主要兴趣在柏拉图和康德，而且对研究这些古典作家的著作感兴趣，还为出版家克勒讷 (Kröner) 编辑过莱布尼茨的著作选。

当马尔库塞的妻子在1951年春天去世之时，他曾问过霍克海默有什么计划，得到的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和令人困惑的答复。他的计划是“我们想恢复适当的工作”。“究竟会在这边还是在那边，过几个月就会知

道。如果你可以写出你自己的计划，那也是很好的。你会更愿意在德国担任教授职务还是在哥伦比亚研究所供职，或者有可能将这两者最终结合在一起吗？你是如何看待这边和那边的总体发展的？万一我们决定中断这里的事务，你认为在那边会有一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适合隐居的、谦逊的生存的环境吗？<sup>[50]</sup> 马尔库塞自己的一些表白促成了整个事情的悬而未决，处在一种尽管炽热但听天由命的愿望当中。他有一种观点，认为适当的哲学工作对他来说比教授职位更重要。1951年8月他在法兰克福拜访了霍克海默，这更强化了这种态度。他在法兰克福的几天再次表明，“我们之间半个小时的讨论，比我用几个星期进行单独的或专业的研究所取得的東西还要多。”

我希望在没有现实物质烦恼的情况下献身于我们固有的工作，并以这种方式度完我的余生。在你那里最适合做这些工作——如果你有时间的話。定位问题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上帝……如果你乐意当着上帝的面说出来，我非常乐于帮助你——但必须是值得说的东西。在这期间，我肯定能够在明年夏天过来工作更长一段时间。我希望能预先准备好研究弗洛伊德的手稿（《爱欲与文明》于1955年出版），并能和你一同完成它，我正在集中精力干这些事情：采用明显的非政治的架构，是为了尽最大可能说得更清晰一些。<sup>[51]</sup>

六个月之后，他们二人又在纽约会面，而且在此之后马尔库塞引用了他们之间相互熟悉的称谓：“亲爱的 Max（如果我可以）”（虽然他保留了 Sie 的形式，即正式的“您”，但这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间的习惯称谓）。马尔库塞在1952夏天到欧洲进行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访问。7月底他从希尔斯—玛利亚写信给霍克海默，感谢他对弗洛伊德研究手稿花费的时间。

此后，霍克海默在1953年春天问马尔库塞是否准备回法兰克福，好像情况确实相当严峻。马尔库塞比以前更坚定地想完全放弃他在美

464

国国务院的工作。经过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一年带薪工作，他对于哈佛俄国研究中心提供的类似资助已没有多大热情，因为那将意味着“需要再花一年的时间去研究俄国的事情，而我已经对此感到十分厌倦。”<sup>[52]</sup>他原则上同意回来。霍克海默给他写信说，“对于你非常心甘情愿来，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主要的原因是研究所没有帮助简直无法继续维系下去了。波洛克将在夏天离开，而我正在争取泰迪能回来，但他还不得不在那儿停留至少几个月。但即使他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一个我们自己的人。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打算再次创办一份学刊，以作为研究所开展各种活动的核心。一旦这件事情到位了，就将建立起一项可靠的行动方针，以保证在我们都离开的时候这里的助手依然可以跟上来。你会满意这些助手，但他们都还太过年轻还无法独立做事。<sup>[53]</sup>

马尔库塞在战后初期的梦想——与霍克海默一道工作并再次重办学刊——看起来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这个梦想就是在一位管理型学者霍克海默的保护和领导下从事自由的、清晰的思考，它曾经将本雅明、弗洛姆、诺伊曼、基希海默、洛文塔尔和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联系在一起，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继续这种合作的机会这时依然是一个残存的梦想。这个梦想没有成真，事实上丝毫不是上帝的过错。而是因为，当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正准备认真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从马尔库塞离别霍克海默之时就有的旧关系模式再一次出现了。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和研究所并不想对马尔库塞提供任何经费承诺，尽管在他的妻子长期患病期间，他们曾经通过提供信用的方式帮助过他；马尔库塞现在已经55岁了，并不想在机会奇缺的时候去德国；再说阿多诺也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妒忌之意。为马尔库塞提供旅行经费并通过研究项目资助他与社会研究所进行合作

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马尔库塞设计的以社会研究所为基地，在德国和美国开展关于“哲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并没有成功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

这件事因此就拖延了，而且由于阿多诺的返回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对于霍克海默也就失去了紧迫性。来自哈克尔诊所执委会的信告知阿多诺可以待到1953年7月31日。他和他的妻子在7月中旬就收到了两年有效期的护照。他于8月6日完成了占星术研究。于8月19日与他的夫人坐上了从纽约开往瑟堡的航船。阿多诺感到了三重的放松：首先，哈克尔的计划可以抛之脑后了；第二，他能够回到霍克海默和法兰克福那边了；第三，他正在离开那个对他来说变得过于激烈的美国。麦卡锡主义仍然盛行，尽管已经不如前几年那样引人注目。在这个春天，对于“美国之家”<sup>\*</sup>图书馆的检查开始了，而这些图书馆都藏有《偏见研究》的复本。“假如你怀着敌意去读它，你可以在它里面发现任何重要的东西，尽管，丛书的自由主义——在各方面都是反极权主义的——的精神，对于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sup>[54]</sup>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阿多诺通读了由玛丽·雅胡达和里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 Christie)收集的投给《〈权威主义人格〉的范围和方法研究》一书的稿件，这本书计划在9月出版，但是他在这项成功上所感受到的快乐不久就变成了痛恨。“希尔斯先生<sup>[55]</sup>的稿子或许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粗糙的东西”，他写信给霍克海默。几天之后他又写道：“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在亲爱的米茨(Mitzi)编辑的书尚未出版之前，我很可能就离开这里了”。<sup>[56]</sup>

阿多诺从此再没有到美国旅行过。当他和他的妻子的护照在1955年届满时，他们就成了德国公民。

因此，马尔库塞并没有回到法兰克福。无论他怎么想，他对于霍克海默的热爱，对于与他一同工作并合办学刊的梦想，还依然保持着。整

---

\* “美国之家”(America Houses)是美德文化交流机构，其前身是1948年在慕尼黑成立的“美国图书馆”。——中译者注

整一年之后，他还在给霍克海默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此之际，你将会听到……”

我已经接受了布兰代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提供的教职：在政治科学系担任全职教授。这至少给我提供了做最终决定的财政基础——我当然不想在那儿耗费掉我余下的职业生涯。但我现在可以坐等你那边情况的发展。一旦你写信来：我随时会在那里脱身。

请尽快写信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今年夏天什么时候会面。因为你知道，我还想与你谈谈其他的事情……

466 泰迪已经写信告诉过我有关学刊的事宜。研究弗洛伊德的手稿现在已经完成——我现在必须干完这项工作。如果我们决定将其中的一部分放入学刊，还有充足的时间吗？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事了。<sup>[57]</sup>

## 研究所的稳固——返回法兰克福后最先出版的两本书：《社会学》(Sociologica)、《组群实验》

第二届西德联邦议院，即德国国会下议院的选举，就在阿多诺返回联邦共和国之后的那个月——1953年9月——进行。货币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赋予资本占有者不公正的利益——这些政策1930年代就由“弗莱堡学派”（以瓦尔特·奥伊肯 [Walter Eucken]，威廉·勒普克 [Wilhelm Röpke] 和阿尔弗雷德·米勒-阿马科 [Alfred Müller-Armack] 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提出来，自1948年以来又由康拉德·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 [Ludwig Erhard] 坚定地实践过。但是价格的稳定、失业人数的下降以及大众购买力的持续增长，使得这种复兴的资本主义秩序也对其他人产生了吸引力。甚至那些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中还没有得到任何实惠的人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从中受益。当所有其他党派的选票都在1953年减少的时候，投

给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 (CDU/CSU) 的共同选票却在大幅增加。基督教社会联盟 (CDU/CSU) 拥有 45.2% 的选票, 虽然不是彻底压倒、但也远远超过了社会民主党所拥有的 28.8% 的票数。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发展。四年之后, 路德维希·艾哈德的书《全体富裕》出版,<sup>[58]</sup> 在这一年基督教社会联盟 (CDU/CSU) 在第三届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50.2% 的选票。

当阿多诺还在美国的时候, 黑森州的文化部长收到了哲学系主任写来的一封申请信, 要求以阿多诺的名义设立一个有终身教职的“特设”教授席位。“系里提出这个申请考虑到如下事实, 即设立这样一个席位纯粹是出于归还和赔偿的理由, 当阿多诺教授离开这所大学时此席位将会废止, 因此……将不会影响设立其他席位的计划。”<sup>[59]</sup> 在 9 月底, 部长任命阿多诺就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哲学和社会学特设教席”。这个席位被称之为“赔偿席位 (Wiedergutmachungslehrstuhl)”, 即使在正式的用法中, 这也是一个易遭中伤的术语。

对纳粹政权受害人进行归还和赔偿, 是由西方同盟国强迫联邦共和国提供的。盟国在要求联邦政府做出提供归还和赔偿的保证, 并将此与它们对占有法令的撤回、对新的国家主权的承认相挂钩。有些公众人物, 如库尔特·舒马赫 (Kurt Schumacher), 卡洛·施密德 (Carlo Schmid) 和西奥多·豪斯 (Theodor Heuss) 等人支持归还和赔偿。<sup>[60]</sup> 但这绝不是普遍现象。这一点通过问卷调查表可以显示出来, 也可以从许多政客的行为中显示出来。在联邦议会执政联盟的 208 名成员中, 只有 106 名投票赞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以色列在 1953 年达成的归还协议。甚至到 1950 年代中期, “Aryanizers” (那些已经购买了犹太人财产的人) 和联邦议会、州议会的执政联盟的成员们, 仍然竭力反对美国军政府在 1947 年制定的赔偿法; 此法公开宣告: 那些因其所有人在受迫害的压力下被转手的可查的财产, 应当以同等的售价返还给它先前的所有人。(被迫将他们的财产返还给财产原主人的那些人, 以及那些坚持自己要求的人, 他们自己会作为“归还的受害人”, 在 1969 年用公共费用获得了赔偿。)<sup>[61]</sup>

467

阿多诺希望由哲学系为他提出一个任命他为全职教授的申请，这一申请纯粹依据他的客观资格而无关乎归还的请求，他凭借这一申请获得教授职位，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1956年2月，他感觉到必须提醒哲学系主任考虑他对全职教授职位的合法要求。在1956年5月的一次委任会议上，讨论了阿多诺的“归还讼案”，以及他依据国家社会主义不公赔偿法第三修正案提出的恢复全职教授职位的要求，一些参加这次会议的人表达了保留意见。从事东方研究的赫尔穆特·里特（Hellmut Ritter）教授提到了阴谋操纵问题。他说，所有想在法兰克福大学谋职的人，都有霍克海默先生的保护，而且都是犹太人。里特后来以书面形式向霍克海默作了道歉，并在系主任的坚持下也向阿多诺道过歉，系主任被激怒了。但是，这既不是里特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此事所作的评论，他也并非这所大学里惟一一位做出这样评论的职员。

因此，当阿多诺在1957年7月1日被授予哲学和社会学的全职教授席位之时，他并不感到非常的快乐。他从未收到其他大学提供的教席邀请，如果有的话，还可以以此来巩固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地位。他以后也没有接到这样的邀请。阿多诺又一次经受了犹太人旧有的体验：在被赋予特权的同时又受到诬蔑和伤害。（相较于其他受纳粹迫害、不得不比他还要更久地等待归还和赔偿的、数不尽的流亡者和受害者，或者相较于在最终忍辱获得少量赔偿或一点也没有获得赔偿之前就受够了侮辱性手续之苦的人，他算是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作为一个内阁大臣，他将是一个犹太内阁大臣——既是尊贵的‘阁下’同时又是贱民”，萨特在他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已经描写过这种体验。<sup>[62]</sup>就像以前一样，阿多诺因此会感觉到自己在依赖霍克海默的保护和指点。

由于有一名同事屡次表达“对犹太人的仇恨”（Jew-hatred），霍克海默在1956年5月以名誉教授身份申请提前退休。系主任强力挽留他“不要在此刻离开我们”，而且正式要求文化部长为霍克海默提供一个特殊的职位；依照这一要求，到65岁生日之前他的教学量可以减半，但会继续付给他全额薪水。霍克海默曾经当过一年的系主任和两年的校长，

而且他不仅履行了自己职位的管理职责，还为克吕格尔教授履行了三年职责，除此之外他还领导着哲学系；他在1954年已经被芝加哥大学任命为教授，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迫害他失去了十年可以用于自己的研究和调查的时间。1956年12月6日颁布的一条部长法令，实际上奖励给霍克海默足以持续到他退休的许多年休假。然而，他只有一次使用了这项特权，因为他不想放弃讲课费，在年休假里讲课费将被停发。

“当然，我非常关心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当我们最终又一次一块回来的时候，我希望能够为你提出合理的建议，”阿多诺1953年6月从洛杉矶写信给霍克海默。但是，甚至在他返回之后，也看不到任何长远的计划，可以服务于他们建立在明确的社会理论之上的研究项目。然而，他们要求拥有这样一个计划的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被放弃也没有被推迟，只是因为恢复时期以及研究所失去财政独立性之后，这项计划不可能付诸实施。相反，在霍克海默任校长的时期，身在美国的阿多诺所推荐的一种可以应付的改良策略变种出现了。

1955年出版的成果展现了批判理论、霍克海默的圈子和社会研究所在1950年代的情况。“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丛书的最初三卷出版了：论文集《社会学》(*Sociologica*) 在霍克海默60岁生日那天呈现在他的面前；《组群实验》<sup>[63]</sup>是一项研究西德人政治意识的研究报告；而《企业内部氛围》<sup>[64]</sup>是一项研究曼内斯曼(Mannesmann)公司工人的研究报告。除此之外，阿多诺出版了一本社会和文化批评文集《棱镜》；<sup>[65]</sup>马尔库塞出版了《爱欲与文明》；<sup>[66]</sup>还出现了由西奥多·阿多诺、格蕾特尔·阿多诺和弗里德里希·普兹泽斯(Friedrich Podszus)合编的瓦特·本雅明的两卷本《文集》。<sup>[67]</sup>

在所有这些出版物中，霍克海默作为一名作者并不占有特殊地位。但是他更显然是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作者而出现的。《社会学》作为研究所重建后出版的第一部出版物，如同它的献辞所指出的，是为了纪念“一位对研究所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人”而出版的，他“充满智慧的领导、不屈不挠的开创精神和对于客观情况的熟练掌握，使得研究所能

469

在艰难中存活下来”。<sup>[68]</sup>这篇献辞——显然是阿多诺所写——的结尾希望霍克海默能找到空闲时间，去“阐明所有那些在他心中亟待阐明的哲学和理论。他本人唤醒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此创造了材料上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他有能力从他的著作中得出所有的结论，毫无疑问这正是今天的世界所真正需要的”。阿多诺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会能与霍克海默一块继续研究《启蒙辩证法》，并且推进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愿望依然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要在这篇献辞中公开宣布出来。

这本书几乎完全包含了最初为新学刊第一期合刊或第一卷所准备的文章。霍克海默一直在努力让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参与到他们的研究工作当中来。[这做得很成功，他们授予了波洛克社群研究合作者的荣誉，并将他的《自动化：评价其经济和社会效果的材料》(*Automation: Materials to Evaluate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sup>[69]</sup>一书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5册出版。]同样，阿多诺也一直在努力让霍克海默参与他们的研究。阿多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的首篇文章，就是献给霍克海默的，而且最初打算作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学刊第一期所写的合作稿。然而，霍克海默的合作不过是提了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和修改意见。另外，如阿多诺所指出的，他已经写出了有关《理性与自我持存》的“审查版”，即《理性的终结》。甚至在1940年代后期，霍克海默也不想看到这篇文章在没有经过修改的情况下在德国出版。<sup>[70]</sup>阿多诺已经安排瓦尔特·迪尔科斯——他从1920年就认识，是左翼天主教刊物《法兰克福杂志》的编辑，他也在一段时间里共同编辑“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参与调查最近出版的有关工人课题的成果。因此，新学刊几乎被设计成是对老学刊不间断的继续。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54年底放弃了出版学刊的计划。《社会学》的序言强调，研究所收集的诸多研究资料在一篇期刊论文中得不到充分讨论，但是这几乎不能成为取消这份学刊的主要理由。甚至在收集投给第一期合刊的稿件之时，就已经决定了要以书籍的方式去独立出版对

于西德人政治意识的合作研究成果，以及对于曼内斯曼公司工作气氛的研究成果。收到的投稿质量较差也不会是取消办刊的决定性因素。霍克海默对于马尔库塞研究弗洛伊德的书《爱欲与文明》格外满意，从中精选了一篇讨论“自由和本能理论”的文章，此文就是本书最后一章的缩写。霍克海默希望无论如何应该将此书的完整德译本作为研究所的一本出版物出版。阿多诺对瓦尔特·迪尔科斯有关“消除纳粹化的成果”的研究报告有很高的评价。霍克海默在他对于新学刊的最初想法中，就提议将诸如格奥尔格·弗里德曼或哈德莱·坎特尔这样的作家看作是可以写出“代表性文章”的研究所的朋友作家。布鲁诺·贝特爾海姆得到了研究所两位领导的共同尊重。

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他们自己的理论。《社会学》中的一位作者瓦尔特·本雅明最有可能满足这种期待，但他已经过世了。弗朗茨·诺伊曼也去世了。自从诺伊曼离开美国国务院后，1948年又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于1950年成为公法和政府法的正教授。在联邦共和国早期，他作为顾问和客座讲师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参与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建立工作。他于1954年9月2日在瑞士死于意外的车祸。计划将他的论文集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出版的事，最终没有实现，原因“仅仅”在于这部书的序言引发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之间的争执。阿多诺的看法是，诺伊曼的书如果由马尔库塞而不是由他本人来写序言，就将与研究所毫无关系。除了马尔库塞之外，适合写序的其他理论家就只有奥托·基希海默了，他投了一篇名为“政治公正”的文章，后者就是他稍后出版的重要著作的题目。阿多诺与基希海默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近，而且他1949年刚回到法兰克福与基希海默见面后，知道基希海默还去拜访他以前的老师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一名曾经挖空心思使用统治权力、早已被统治权力冷置一旁的法律教授，自此之后对他可能就更疏远了。施米特在1936年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我们要将德国精神从所有的犹太化歪曲中解放出来，对于精神概念的歪曲可以让犹太移民把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主任的伟大斗争称为非精神性的事情。”<sup>[71]</sup>可以将基希海默

与马尔库塞作比较：马尔库塞在 1947 年拜访过海德格尔，之后再也没有去过，<sup>[72]</sup> 而基希海默却屡次去拜访施米特。因为马尔库塞过去与海德格尔有过交往，研究所都对他一直持保留态度；而基希海默却继续尊敬施米特——一位像海德格尔那样从未表明自己对于纳粹主义观点有丝毫改变的人，研究所当然要对基希海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471 因此，影响研究所放弃恢复学刊计划——霍克海默曾经希望这能标示“理性研究的开始”——的决定性原因，可能是担心（尤其在霍克海默本人看来）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得不到充足的稿源来适当地显现自己的地位。他在 1954 年 8 月从美国写信给阿多诺：

与旧学刊作比较似乎不会对新学刊产生太多的不利因素。我考虑的不仅仅是文章，还有评论部分。困难在于，在早期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以同样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学刊当中。但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现在只有迪尔科斯和达伦道夫（Dahrendorf）两个人。当然，我们最终必须在其中发表与我们自身彼此相关的文章，但是首先，我回来以后需要一些拖延的休假，其次，我想要的不是这些文章，而是一个更宽泛的出版物。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学刊对研究依然散发的光亮投下阴影。<sup>[73]</sup>

霍克海默寄望于两位研究所的同事。一位是瓦尔特·迪尔科斯，他于 1956 年离开科隆并成了西德广播公司文化部的领导。另一位则是 25 岁的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在霍克海默的信到达的时候，他刚好拿到了邀请自己的通知，这让阿多诺感到很吃惊。阿多诺告诉霍克海默，达伦道夫已经接受了萨尔布吕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arbrücken）提供的一个绝佳的工作，并且说他感觉自己并不属于霍

---

\*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1930 年代以恶毒地提倡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而臭名昭著的纳粹煽动家。“二战”结束后被逮捕并受纽伦堡战争法庭审判，以反人类罪的罪名被判处绞刑。——中译者注

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领域，以此强调他的决定是不可撤回的。对于达伦道夫来说，他们的思想太过“历史化”，而他希望沿着正规的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思路来开展研究。阿多诺写道，“他可能最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论点，即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们的思想不会有继承者了。”<sup>[74]</sup>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促使霍克海默收回了出版学刊的计划：担心研究所即使有了阿多诺的协作也不会有充沛的创造力，而且感觉他在自己最为关注的社会哲学领域，在揭露社会冲突和攻击贬低他们重要性的学术联合体方面，也无法再度展现足够的敏锐性。他好像在掩饰自己对于阿多诺的提议——应该出版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译本，并将阿贝·麦斯利埃（Abbé Meslier）的文章放在研究所的文丛中出版——的反应：“阿贝·麦斯利埃的文章可能不适合。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或至少用其中关键的章节出版，可能还有一点意义；但其中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说法甚至比萨德侯爵还要冷酷。”<sup>[75]</sup>在霍克海默心中，很难说清哪一种担心更重一些：担心会产生对启蒙进行自我破坏的时髦解释，却不能用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来取代它；担心对于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所产生的攻击性效果不是深思的和平静的，而是冷酷无情的。总之，最终导致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呈现出保守态度——比如，他 1960 年代批驳阿尔及利亚争取解放的斗争，批驳那些批判美国对越战争的观点。

472

对于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最终只是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二卷发表，该书用了一个很慎重的——考虑到它具有易被误解的重要主题——名称：《组群实验》。阿多诺在 1954 年 8 月写信给霍克海默，此时他在美国联系芝加哥大学的教席，“在与弗雷德（Fred）通信之后，我彻底重写了介绍组群研究的绪论，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它现在已经相当完善了。在这项研究中争论的惟一焦点是我们是否想包括抄本，对此这是我非常赞同的，而弗雷德却反对，但我们仍然可以在稍后再决定这件事。”<sup>[76]</sup>阿多诺并不能完成将一系列完善的抄本包括在此书中的任务。虽然如此，这本书仍然厚达 550 页。阿多诺在为定性研究部分所写的绪论中写道：

实际上，我们想在此逐字逐句地重写一些典范的抄本。只有空间因素阻挠着这一意图的实现。定性调查结果所具有的实际说服力，以及它们的确定性结论，至少在分析这些调查结果的方法的发展还没有远远超过目前阶段之前，还只能通过对原始材料的认识来传达。解释单个证据片断时出现的任意性表象，只不过消溶在对整体的、连贯的讨论的活生生的体验里边了。<sup>[77]</sup>

这与阿多诺在伯克利研究期间曾经捍卫的思想是一致的，他那时要求有一系列的“描绘”，换句话说，对于实验中的个人的详细说明，应以收集有关他们的材料为基础。

阿多诺的愿望既没有在《权威主义人格》也没有在《组群实验》中得到实现。然而，尽管这本书的标题及其对于这种研究的先锋性和与此相关的不足性的再三提及，显示出对于自身不足的某种谦逊和洞察，但还是提出了骄傲的宣告：

经验的社会研究面临着某种悖论。它运用的方法越精确，这些方法在用“操作术语”限定的对象代替真正接受调查的对象方面所冒的风险就越大。换句话说，问题本身被限定在可以通过调查表发现的范围，而忽略了它与社会相关的方面……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历史显示出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存在相反的危险，即容易出现任意性和未经检验的教条判断。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拒绝那些从其研究中“发现事实”的现代方法。然而与此同时，从新方法发现的喜悦并不能掩饰如下事实，即，在寻求对社会知识来说非常重要的客体的过程当中，方法正好容易攻击它自己引以为荣的地方——客观性和对于真实客体的认识……经验的社会研究面临一项任务：即运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诸种方法去克服造成它自身不足的深层原因，并将社会研究磨砺成一种获取真正的社会知识的手段……这是一件将科学的客观性同对本质的深刻洞察结合起来的事，它一

直试图在规避精确的测量。

下述报告中描述的社会研究所开展的工作，就是对这种努力的一个试验性的贡献……长期以来，在访谈中应用深度心理学、投射测试、详尽的个案研究和其他纠正、补充惯常调查方法的技巧，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里所描述的我们研究所采用的组群方法，与所有这些计划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并不满足于到稍后的阶段去增补和修正，而是在早期就开始不断增补和调整，同时使观点得到 *in statu nascendi*（即时地）确立。<sup>[78]</sup>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由这类舆论研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这项研究的书籍出版物包含了一则附录，对这一本专著中的两本进行了定性分析。这两本书是福尔克尔·冯·哈根（Volker von Hagen）对“讨论组群中的整合现象”的研究，以及阿多诺关于“自责与防御”的研究。<sup>[79]</sup>阿多诺的研究紧承他在《权威主义人格》当中对于访谈材料的定性分析。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的范畴，经过对原始材料进行阐释才能使社会现象得到解释。对原始材料的这种阐释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指责：由于紧紧依靠大量引用的理论而纯属武断，过于自信地宣布它与正统社会研究的区分，以及通过制造类型学来下结论。

阿多诺的分析依据的主要是 25 个抄本，其中 20 本包含的大量论述，涉及为法西斯主义、战争、集中营和战争罪行分担责任，以及以何种态度看待犹太人和被迫离国者的问题。将分析限制在 25 个抄本之内似乎是一种明智的精练节约的方法，因为定量分析和抽样分析均已表明，这 25 本抄本中显现的反应类型，一次又一次地以僵化和单调的面目出现在所有的讨论材料当中，这种僵化和单调正是整个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特征。 474

阿多诺在介绍他的“自责与防御”研究的序言中写道：

被压抑的自责观念不应该太过狭窄地被理解为一种心理学的感受：防御机制只有在一个人所干的侵权行为被有意识地看成侵

权行为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几乎没有一位参与此类实验并发现他们自身处于防御状态当中的人会说，“他们确实应该被杀。”相反，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个体通常会过分认同集体，而且在对于犯罪的认识方面与之一致。人们会拒绝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犯罪的认识，目的在于不要失去认同集体的机会，集体在心理上能够让无数的人战胜他们自己那种不堪承受的无力感。人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那些发觉自己处于防御状态的人，即使他们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也决不赞成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演。防御本身就是他们感受到了震惊的征兆，因此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前景。<sup>[80]</sup>

然而，在研究的其余部分，这些令人鼓舞的前景却由于阿多诺的假设而被消除了实现的基础。阿多诺的假设是，依然存在操纵大众心理的“人类学环境”和易受极权制度感染的可能性，这些条件和可能性是整个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所引起的。希望的征兆也被他的相关陈述——“道德防御引发的鉴别力可能与人们不得不压抑的无意识自责的程度相符”<sup>[81]</sup>——给削弱了。

阿多诺把对后自由主义社会状况的这种“人类学”反应称为“集体性的自恋”。霍克海默、弗洛姆和阿多诺等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曾试图把这一反应归属于施虐—受虐、权威主义人格、个体的毁灭和无助、对自由的恐惧以及纷乱的社会阶段等概念之下。这一反应在战后继续存在。这一观点通过阿多诺于1959年发表的演讲而得到广泛传播，这次演讲中有一段后来被多次引用的陈述——“‘重新评价过去’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民主当中潜在的纳粹主义残余，与残留的反对（against）民主的法西斯主义趋向相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sup>[82]</sup>

475 各种各样的防御机制都在阿多诺的研究视野当中。其中包括：试图计算和量化罪行；声明在一个已被分化为国家和权力集团、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世界上，不可能对罪行和无罪做出毫无偏见的审判；对于一个习惯于奴性地顺从权威、根本不适应民主政治、患有“德国神经官能症”——那些参与讨论的人们总喜欢如此称呼——的民族来说，应该考

虑他们要求减轻环境压力的愿望。其中一项最具煽动性的辩护，就是阿多诺简洁称之为“将事实转变成意识形态”的东西：

我们知道陈腐的、僵化的因而是错误的概括方式在极权主义思维方面发挥的作用。反犹主义就是将许多否定性的套话转到一个整体的群体身上，而不考虑其中涉及的诸多个体，如果不是运用了错误的概括方法，这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到今天，在提到外国民族时还继续用这种集体的单数……如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这样的用法，已经从军队进入了我们的日常语言，就是明显的例证。法西斯主义及其错误的概括方法的崩溃，已经为许多人打开了认识这种习惯的视野——就涉及他们自身而论。这似乎成了当今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人们施行于自身的事情通常是让他感到最愤恨的事情。这种情况的无意识动机与投射机制密切相关，在此不需要讨论；只是想说一点：人们一谴责错误的概括，就很容易使自身与国家社会主义拉开距离，而且，一旦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就可以实现这种谴责，人们就很容易将自身置于正义的一边，并使昔日的施虐者变成今日的受害者。<sup>[83]</sup>

道德同事实一起，也被转变成意识形态。一种用于反对归还和赔偿的论点就是：鉴于罪行的严重性，归还无论怎样都是不可能的。有人为了替种族主义手段辩护，就争辩说他们至少是真诚的，并且也帮助过犹太人去建立以色列。

决定不出版完整的手抄本丛书，这对阿多诺的研究所具有的说服力及其作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模型所具有的分析价值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定量分析部分，没有给出对各种态度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而且，在研究“罪责与赔偿”的部分，也没有提供估价或解释特定个体的依据。毫无疑问，此处缺少的就是阿多诺关注的客观精神。但是，如果我们尽可能深入地通过特定的个人作陈述，然后将这些个人归入某种意识形态症候群（syndrome）或其他特征当中，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

忽视客观精神要素的构成问题——阐释者在单个个体身上要考查的问题，也不能忽视这些要素的出现频率问题。让人无法感到满意的还有，即使那些定量和定性分析已经勾画出了各自相应的类型特征（定量分析方面是“否定性的”、“矛盾的”和“肯定性的”，定性分析方面是“怀偏见的”、“矛盾的”和“乐意达成和解的”），但还不能相互吻合。有人指责组群研究夸大了反民主态度的重要性，对此，这里有好几种回应方式。例如，对诸如民主、犯罪、犹太人以及与西方盟友的关系之类的话题所作的赞同或部分赞同的陈述，主要是在讨论开始之时进行的；此时，无法确定讨论主持人（他起先被认为具有官方地位）的反应，无法确定其他参与者的观点，这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民主的信条。因此，在估价和解释中混入这些陈述，导致了对于结果的实际歪曲。然而，这最后也指向了一个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评估这些观点对每位说话者及其所属的阶级或组群的影响，评估它们在交谈情境中所起的作用。

用个体的、鲜活的经验代替不同的人对材料的系统采集和整理，这使得大量的材料在变得更加清晰的同时，也变得更加模糊。一台庞大的学术机器，虽然有它的创业目标来为它辩护，但仍像一道令人生畏的屏障，强行隔开了潜在的听众和研究，这种研究应当被公正地称作是对后希特勒时代德国人不会哀悼所作的最初的、在1950年代又是最敏锐的分析。

对于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很快招致了右翼对研究所的批评。这些批评发表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科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上。作者是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R.霍夫施泰特尔（R. Hofstätter），《组群实验》中提到过他本人。霍夫施泰特尔1913年出生在维也纳，曾受到心理学家卡尔和夏洛特·比勒尔夫妇以及哲学家罗伯特·赖宁格（Robert Reininger）和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的影响。1937年到1943年，他曾是一名军队心理学家，先在奥地利军队后到德国军队当中当差。他已经取得了任教资格并被提升到高级文职岗位。战后他曾在奥地利东南部的格拉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raz）、稍后又在美国教心理学。

1956年以后，他一直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社会科学院担任心理学教授。

他的批评带有很强烈的优越感。这一批评打趣地断言，组群实验只是“酒后吐真言”（in vino veritas）这一主题的变种，也就是说只是“激怒吐真言”（in ira veritas）（通过“基本刺激”让参与者产生所谓过度刺激的一种游戏）。在霍夫施泰特尔看来，这与运用人所共知的方法一样可疑。当他还是心理学军医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他运用人所共知的方法来替代他本人的方法，因为他的研究方法被讥笑为“脱离生活”。尽管霍夫施泰特尔的批评相当准确地瞄准了几个重要之点，但却也忽视了这项研究整体的方法论意图。组群实验在讨论正统研究的局限性和正统的研究当前对自身方法的自我批评的那部分使用了“实证原子论”这一表述（用来描述把公众意见看作个人观点的总和这一惯用程序），霍夫施泰特尔抓住这一表述，并讽刺地评论说，“实证原子论”是一种否定的评价，按照作者的标准，的确应该被理解为测定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指标。

477

霍夫施泰特尔用了组群实验中的数字，但将那些沉默者归为没有消极态度的一类，忽略了那些为数不少的有矛盾态度的个案，并且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依据组群研究自身的标准，一般只有15%的参与者可算是支持独裁主义和不民主政治的人。他继续写道，“依据德国的这些调查结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比其他的西方国家更有理由来谈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遗产’或‘持续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性格倾向’”——好像在一个恐怖和谋杀横行了12年之久的国家（在其他国家都是以潜在状态存在）与破坏力量仍然主要以潜在状态存在的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似的。他用这种方式低估了来自右翼的威胁，并且宣称这是正常情况，从而使自己获得论证上的胜利，随后“附带地”提到他担心“那种专注客观精神的思想会处于屈从极权主义专制的危险当中”。<sup>[81]</sup>他将“多达150页的定性分析”形容为“只不过是一种控诉或者一种对于真诚的精神自责的愿望”，而且反驳说“根本没有任何的个人感情可以真正满足持续考查百万人被灭绝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分析学

者的义愤”似乎是“错位的或无意义的”。霍夫施泰特尔认为，这些巴伐利亚贵人们的反应使他们采取了对罪行问题的这种解决办法，也造成了组群实验的局限性——他们仅仅抓住忏悔而忽视了这个问题的道德方面。最终导致了一种与集体犯罪论题相同的免罪效果。所有人都是有罪的——于是没有人是有罪的，而且所有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和存在的命运；这样一来，每个人必须对此采取将就的态度，谁也没有权力谴责他人，一切都只能依赖私人生活的疗救作用。

霍夫施泰特尔运用的是一套现在流行的、经过试验和测试过的程序：淡化来自右翼的危险，将“揭露”这些危险的“人士”描述为极权主义的道德家和理想主义者，并将对危险的真诚反思断言为私人事务。

478 大概因为霍夫施泰特尔的批评具有拙劣伪装式的论辩性，使得阿多诺有机会就同一论题做出回应。阿多诺在他的结论中，清楚指明了争论的核心之所在：“通过宣称这种方法无用，以此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sup>[85]</sup>他揭露道，霍夫施泰特尔对于“揭露者”和“谴责”的讨论是一种集体自恋的诉求：把对已经灌输到人们内心的种种机制和意识形态的谴责表述为对个体的谴责，从而煽动人们反对这种谴责。

霍夫施泰特尔认为“单个的人不可能为奥斯威辛的恐怖承担罪责”。是那些自身被迫承受了奥斯威辛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那些给自己和自己国家带来耻辱的人，更不愿意相信这种恐怖。“罪责问题”对受害者来说“充满绝望”，而对幸存者来说则不尽然。用存在主义的绝望范畴模糊这种区别是个不小的成就，这一范畴的流行看来不是没道理的。我们不应该在刽子手的房间里提及绞刑，不然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心存怨恨。<sup>[86]</sup>

霍夫施泰特尔和阿多诺之间的这场争论作为“实证主义争论”在联邦共和国内第一次使得某种现象明朗化了，这种现象在后来的社会学史上一直存在：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之间的争论就是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之间对抗的竞技场。

许多有益的计划在1950年代就被考虑到了，这些计划在重建社会的条件下仍坚定地反映着研究所的传统。然而，这些计划从未得到实现。其中有一项就是出版一套美国社会学著作的德文译本。阿多诺在1954年8月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有这样的话：

战后德国出现了对于社会科学的兴趣的明显复兴……很大程度上从美国发展并提炼出来的社会研究技巧，对德国社会学产生的影响已经相当可观……然而，包括学生和非专业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美国社会学家对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的贡献，而且也没有看到，美国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也是相互依赖和彼此影响的。当前的计划通过向德国公众展现中立派思想家们——虽然他们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那里得到启发，但试图清晰地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总体性——的著作……旨在结束这种隔阂。

初步拟定的书目有六种：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的《社会习俗》（*Folkways*）；托尔斯坦因·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理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夫妇（Robert and Helen Lynd）的《中型城镇和转变中的中型城镇》（*Middletown a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约翰·杜威（John Dewey）还未译成德文的著作选集；阿多诺等人撰写的《偏见研究》；以及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sup>[87]</sup>

479

这项计划可以利用美国社会学来帮助德国加强那种倾向于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的理论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与此同时，还有助于填补西德战后社会学无法系统应对社会科学新思潮的巨大缺陷。但是，反对出版这套丛书的力量似乎很大，人们对此好像不感兴趣。迄今为止，凡勃伦的书是所列著作中惟一被译成德语的作品。

## 告别独立自主：对曼内斯曼公司的研究——阿多诺退出经验研究

正当他们依然计划重版学术期刊，准备为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增补最后的润色之时，却发生了第一件对社会研究所来说可称为严重失误的事情：它接受了曼内斯曼公司提供的一份研究合同。在 1940 年代，研究所的几位领导差不多都坦率地断言，由于在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缺乏独立性，在一些其他的流亡者当中出现了搞腐败的人，并且宣称研究基金在区分墨守成规的学者与反对墨守成规的学者方面有成熟的辨别力 (developed capacity)。当他们自己寻求赠款时，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赞助。尽管接受此次赞助的研究进行得十分谨慎，但人们还是容易发现：研究所在不丧失自己完整性的情况下在观点上表现出了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当前利益之间的共同点。1950 年，研究所的一个好心的朋友试图与霍伊彻斯特 (Hoechst) 化学公司商议合同，曾被霍克海默愤怒地拒绝了。1954 年，一直在研究所担任行政主管的波洛克，再次描述了研究所即将面临关闭的情况，霍克海默又接到了一个相似的提议。由于认识了赫尔穆特·贝克尔 (Helmut Becker)，霍克海默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赫尔穆特·贝克尔当时是一名律师，也是许多组织和机构的顾问，后来成为设在柏林的麦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 教育研究所的主任。

曼内斯曼绝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它曾经是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创立成员之一，并且资助过纳粹党。二次大战期间它还接管过被占领国家的工厂。1945 年之后，它成为一个非卡特化 (decartelized) 的联合工业集团。在盟国看来，被少数人操纵的德国重工业的集中是德国具有发动战争的巨大潜能的前提条件，因此，对德国重工业进行非卡特化是波茨坦协定中最为重要的条款之一。然而，美国军政府从一开始就确保了非卡特化是为国有化 (socialization) 提供的替代性选择。迫于美国的压力，曾经对自己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进行过国有化改造的英国工党政府，也禁止北莱茵河—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议会贯彻国有化政策，尽

管这些政策不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 (KPD) 的要求, 而且也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工人派的愿望。无论哪个州通过的劳资联合委员会法赋予劳资联合委员会在商业事务中的发言权, 军政府都会暂缓整个法律或其中相关条款的执行。此外, 以前的公司代表被委托去解散卡特尔企业联合, 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对正常商务规程的干扰。

曼内斯曼集团的情况也是如此。威廉·赞根 (Wilhelm Zangen) 作为“战时经济的领导人”, 作为战后曾被划归有罪并被判刑入狱的一类人, 却于 1949 年初成了他自己以前的一个曼内斯曼下属工厂的董事会主席, 托管部门不顾劳资联合委员会的抗议, 还让他负责清算旧曼内斯曼集团的工作。他立刻开始将旧的公司重新联合起来。到 1960 年前已经完成了曼内斯曼有限公司的“重建”。<sup>[88]</sup> 当霍克海默与曼内斯曼签订合同的时候, 在劳资联合委员会与曼内斯曼控股公司董事会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法律争论: 这个由多家被盟国拆分的小公司组成的控股公司是否受工人参与法的影响。工人参与法赋予工人代表和公司业主代表以平等的董事会代表权, 这也意味着应有一名工人代表成为其中一位执行董事。

尽管研究所的同仁们在工业社会学方面没有丝毫的经验, 但在这个极端时期的压力下, 霍克海默还是接受了合同。然而他对这项研究很少过问。事实上, 这次研究的顺利完成完全是个偶然。早期最富有牺牲精神的研究助手蒂德利希·奥斯默尔, 因为要研究那些从问卷调查和组群讨论中搜集的超负荷的材料, 以致劳累过度而病倒, 就在此时, 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出场了。1950 年代初期, 他曾在研究所接受过训练, 随后作为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 (Elizabeth Noelle-Neumann) 的研究助手在阿伦施巴赫 (Allensbach) 的舆论研究所工作。他现在回到社会研究所是为了获取洛克菲勒津贴; 只要他能在一个学术机构获得研究助手职位, 就会提供给他这项资助。31 岁的弗里德贝格曾经从事过问卷调查, 甚至还从事过工业社会学的调查, 因此, 当霍克海默为他提供研究所经验研究部的管理职位时, 他很快就接受了。他所

481

做第一项工作，就是成功完成了这项曼内斯曼研究课题。

曼内斯曼公司执行董事会想要的是如下一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公司的职工都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而且为什么想要这些？”他们想知道与他们工作场所的社会气氛有关的资讯，想知道对创造这种气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都有哪些。依照赫尔曼·温克豪斯（Hermann Winkhaus）——1955年初是曼内斯曼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会的成员——在一次公司研讨会上的演讲，真正对管理起关键作用的是与更深层的原因——根植于观念和情感深处——有关的资讯；后者隐藏在舆论形态背后，因为只有以此为基础，研究成果才能被有效地用于解决公司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研究所因为具有调查经验，具有成熟的组群讨论的技巧，并且其规划目标能够穿透表面的舆论，所以就成为最有希望的选择。<sup>[89]</sup>

研究所起草了一份研究计划，这份计划只涉及雇员而不包括管理者，只涉及雇员们的主观意见和行为而不涉及客观情况，考察他们自身在工厂中的具体情况而不理会他们在工厂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与先前那些研究一样，访谈和组群讨论的方法被结合在一起使用。

1954年7月，在曼内斯曼下属两所工厂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在管理者和工人代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设计出调查表初稿，进行试验性的运用，同时用于试验的还有那些曾用于组群讨论的基本选项。基本选项的初稿遭到了霍克海默的反对，之后由阿多诺作了修改。当阿多诺将自己完成的第二稿送给霍克海默的时候，试图平息霍克海默的担忧：

在汤姆、迪克和哈里之间发生的这种讨论是完全正常的和常见的，他们在其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如此；这里根本不存在由于提供了对雇主的苛刻评论而让我们受到指责的危险。此外，我们已经确保让这份报告清楚地透露出，这些陈述和立场是直接来自汤姆、迪克、哈里已发表在公司小报上的那些文章中总结出来的。<sup>[90]</sup>

7月和8月，主体研究工作在曼内斯曼的5个主要工厂中进行，其

中在4个工厂的研究是在工人参与主持之下进行的。单个的口头访谈平均要持续50分钟，并附有一张问卷调查表，来自法兰克福德国人口调查机构（Deutsches Institut für Volksumfragen）的15名有经验的采访者对1176名工人进行了访谈。

从公司的大约35000名员工中任意选择一部分人，在访谈前不久，由他们的老板、领班或工人代表去告知他们每一个人，并把他们叫到访谈的房间，这种房间是在工厂里面单独分离出来的。另外，总共有539个参加者由社会研究所的助手引导，分为55个组进行讨论，这些讨论通常也是在工厂之内进行的。在预备性研究当中表明能有效地激发工人对工厂的满足感和不满的所有那些问题项，全部保留在主体研究所运用的新近修改的基础刺激当中。在被取消的问题项当中，有一段可以提供具体历史回顾的重要提问，这个问题是这样提出的：“想想1945年，那时情况是怎样的呢？正是我们工人在重建一切。老板们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许多工人被抛入兵营或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被剥夺了权利。工人们依靠自身让世界继续。当工人拥有了发言权并能提出他们的建议的时候，证明我们能够参与管理——证明对经济是有益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希望工人参与的原因。”

阿多诺在8月中旬写信给身在芝加哥的霍克海默，“曼内斯曼研究的相关调查工作已经完成，研究的进展很令人满意，许多讨论已经着写好了，是非常有趣味的材料。我预料我们会对这项研究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sup>[91]</sup>

1955年1月，社会研究所给处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曼内斯曼控股公司提供了一个报告草稿，随后在6月提供了长达410页的主体报告。几个月之后，研究成果大纲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三卷出版，这个大纲由主体报告的各部分组成，包括“问题”和“工作场所气氛的要素”两篇，还有一篇“概要综述”。

问卷中直接问题的设计吸取了由工人们列举出来的他们认为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八个要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中，关于工资、工作稳定性和对于工作的认可等方面的内容显然处于领先的位置，而与直接管

理自己的上司处好关系和工作安全等方面则紧随其后。

与之相比，由于调查者并不认为受询问者能够依据自己的见识去直接指明影响他们与工厂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将那些影响工人看待工厂的态度、影响工作场所交往气氛的特定因素所起的作用，放在了间接评价的位置。工人们对于具体细节问题——例如，就劳动场所的质量而言，“你有没有更想干的另一份工作？”——所做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都呈现了工厂当中某个特定领域的状况；这类问题的回答被当作衡量对各个领域满意或不满意的尺度。5个细节问题被用来评估5个领域，“从以前的经验出发而做出的判断是其中最重要的”领域。运用这种程序可以断定，在对自己工作是否稳定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与对工厂持肯定或否定态度这两项之间，存在着非常牢固的联系。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自身工作是否有安全感是决定工人对工厂之态度的最重要因素。紧随其后的因素，是对直接管理自己的上司对自己的态度以及对劳动条件的满意或不满。与之相较，对于薪水和晋升机会的看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如果人们接受这种程序及其得出的成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的工业调查相符——就会导致一种自相矛盾的结论：即在回答那些对于雇员来说通常最重要、对于管理最抱怨的直接问题时，工资得放在第一位。但是，在关于影响工作场所气氛的最重要的间接评定因素时，工资只被排在第四位。对于工人的思想及其行为之间存在的矛盾，这项研究既没有提供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解释，倒是其他的调查结果强调了这种矛盾的存在。

在这项研究中，有关个人与工厂的关系的补充信息包含着一些事实，例如，将近3/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自己非常了解厂里的事情。也有3/4的人认为直接管理他们的老板的做法是正确的；对于大部分受访者来说，更高一级的老板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研究所的助手们从组群讨论中得出结论，工人“并不抵制老板，但是他们抵制坏老板。因此，与此同时出现的批评提供了一个好老板的轮廓：他首先应该是公平的，他应该肯定好的工作，待人有礼貌，而且努力与工人维持一定程度的私

人接触。<sup>[92]</sup> 在组群讨论过程当中，工人们再三表达出对仓促紧张、加班和星期天工作以及产品需求、目标及机械的至高无上性的不满，同时还渗入了另一种欲望的表达，希望把他们当人而不仅仅是当工人来看待。

虽然有（或因为有）这些即朴实又不切实际的愿望，而且有战后初期唤起的那些残存的希望，如劳资委员会和工人参与的观念，但是，这些受访者也没有获得自觉的主导性角色。劳资委员会在经济领域无能为力，一般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远离日常的工作环境；这意味着，尽管相当多的受访者认为它能充分体现自己的利益，但这种所谓的多在绝对意义上只能代表 1/3 的人，在数量上紧随这部分人的另外一部分人，却将工人代表或领班视为他们的最佳代表。

就工人参与这一点来说，这项研究显示多数受访者既提不出明确的合法要求，也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要求。这些回答表达出参与的期待和希望，而且涉及与每位工人自身工作相关、或者至多与他们自己的工厂或公司相关的事情。只有 1/10 的受访者认为工人的参与同整体的经济或管理水平相关。当他们被直接问到雇员在哪些方面应该有发言权时，59% 的人提到了工资，36% 的人提到了社会问题，而 26% 的人提到了与工作本身相关的问题。分别只有 9%、5% 和 4% 的人提到了利润的分配、交易和投资问题。这个报告只做了慎重地陈述，但对如何分析和评估这种问询方法对调查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给出任何的结论：

484

我们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工人们认为离他们“更近”的领域更重要，他们就不准备参与离他们“更远”的领域。相反，这种讨论显示出，一旦那些训练有素的工人代表向工人们说明：正是那些上层机构具有发布指示的最高权威，而且，只有实现了在这些上层机构当中的平等参与才能实现最紧迫的要求，那么，工人们就会支持在离他们较远的领域争取平等参与权的要求。<sup>[93]</sup>

主体报告中更详尽的部分和一张单独的图表，显示出与出版的书籍稍微不同的描述。在 1176 个受访者当中，59 人是领薪金的办事人员，110 人是领班，他们一般比体力工人对公司抱有更肯定的态度，这就极大地夸大了“肯定”的结果——依据这个结果，有 3/4 的受访者对公司持肯定或非常肯定的态度。70% 的领薪职员 (salaried employees)，60% 的领班，但只有 45% 的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足够多的报酬。

主体报告还提供了其他的细节。例如这样一个事实，在钢铁生产和加工厂工作的工人，到那里还不到 3 年时间，他们是从东德的省份被赶出来的，而且年龄在 20 到 40 岁之间，他们对公司持非常保守的态度。这类信息对管理是有用的，但对于工人自己来说，即使他们知道这些信息，也绝不可能利用它们。

485 在对于组群讨论的分析上，报告主体部分也比概要部分要充分一些。虽然这一报告中既没有定量分析，也没有那种特别精深的定性分析，但是主体报告中的分析却使对受访者态度的描述更具深度。

各种因素可能会让曼内斯曼公司相信，或者促使他们相信，诸如更好的管理训练之类完全可以进一步改进业已良好的工作氛围、促进工业的平稳提高并增加生产力，后者反过来可以给职员增加工作的安全感。报告当中那些促使这种观念形成的因素，就是它所提供的有关工人态度的细节；它再三强调研究会受制于主观反应，而丝毫不会考虑客观的事实；整个结果及其包含的最为显著的特性在于：工人完全满足于现状；对工人委员会没有丝毫明显的兴趣，在许多人看来后者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几乎一点也不关注在离他们较远的董事会和经理层当中是不是有工人的代表；在公司方面看来，工人的希望主要集中在那些明显与个人相关的事情上。

毫无疑问，曼内斯曼就是以这种方式看待此项研究的。曼内斯曼的行政主管赫尔曼·温克豪斯在前面提到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订立的合同，让曼内斯曼内外的人们对于其后的动机感到有些迷惑。这相当不公平！公司主管一直将关爱雇员当作公司

工作的组成部分，并将其与科技的、商业的竞争相提并论。它不是，而且依然不是一个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理念问题，而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司作为社群中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必须履行的所有职能的问题。这包括对公司职员应负的责任，关注他们如何成功地将自身整合到公司工作的结构当中，并以多样化的方式确保他们工作的安全。

在我们的工厂中，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被战争及战后的经验和要求打上了独特印记的一代年轻人。我们面对的是东德的难民，他们通常不但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和财产，也失掉了自己选择的职业。从各个方面来看，我们面对的都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再相信自己在社会中有确定的地位，因此他们期望他们的工厂不仅能给他们提供面包和工作，而且能够提供归属社会的道路……

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依赖于工厂内部的社会稳定，依赖于职工对他们工作的喜爱并在公司感受到的归属感。讨论优良的领导问题以及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进行有计划的研究，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所有的这些考虑促使我们运用最现代的科学的舆论研究方法，对隶属于我们公司不同工厂的车间的工作气氛进行研究。我们的劳动大军要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对他们工作于其中的工厂的看法和期待。研究结果能够让我们发现该如何促进社会安定，如何在管理层和雇员之间创造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如何为公司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从而履行公司在社会当中承担的各种责任。

486

这种惯常的、严肃的、文雅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体现出高级管理人员和雇主代表的典型特征。这种利用研究的方式，正好与工会对一种研究——提供工人对于工人参与没有多大兴趣的证据——的抗议一样，被寄予了同等热烈的期望。研究所的领导试图通过一次小型的新闻宣传活动来让人们容易接受这类研究。霍克海默在1955年2月19日的《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和《经济报》(*Deutsche Zeitung*)上发表

了一篇题为“大工厂中的人们：工业中的舆论研究”，瓦尔特·迪尔科斯在3月5日的《新鲁尔报》(*Neue Ruhrzeitung*)上发表了题为“工人想要什么？工资、稳定还是‘良好的氛围’”的短文，两者采用了同样的论点。这是关系到科学和真理的一件事；基于科学性和精确性而得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每个人公平地拥有利益；工人们对于参与切近自己的事务表现出比参与公司高层事务更大的兴趣，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仁爱先自家中始，然后才推及别人；而人性化的工厂条件对于每位参与者都是有益的。

霍克海默在他长达四页的报纸文章中这么说道：

尽管有人会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价值有所保留，但是，关于公司以至最小的工人团体的信息，在这个国家也必须受到与它们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同等程度的鼓励。激励公司业主为这种研究提供机会的动机并不重要：他可以认为人际因素会为人们所最渴望的生产力和利润率的增长创造条件或者认为人际因素限制了增长，或者他可以认为人际因素自身即是目的；他可以将这一问题看作是“领导”问题或“合作”的问题。工人们对于发展科学方法的兴趣与管理人员一样强烈。尽管工人们对此抱有一种可以理解的不信任态度，但他们也需要有关他们自身工作生活 and 如何改善影响工作生活的因素的清晰的信息。工厂与他们密切相关。在这里，与公司的组织形式结合，事情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公正性。

487 诸如此类表达整个论文主旨的句子，说得非常明确。工人们被描述成能根据这种研究改良他们自身工作生活的人，似乎他们运用和奉行这种研究的机会略微类似于管理人员；似乎这种研究并不是很明确地关注和留意主观反应，也不注意揭示客观关系；似乎它提供的能够说明管理者（包括管理代表们）的意见和行为的证据，与说明工人们的行为的证据是相符的；似乎它已经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份适合的主体报告稿，而这实际上这只是给曼内斯曼公司的执行委员会提供的，最多也只

是给极少数工会专家提供的；似乎那些迫切需要从历史的、政治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说明的数据未呈现出的解释 (uninterpreted presentation)，将会有助于工人的解放；似乎代表工人利益开展的研究，不可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不同于为曼内斯曼董事会设计和实施的那种方式——来计划并付诸实施。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中宣称，曼内斯曼研究已经填补了德国社会学版图中的一块空白，并且，工人总数（实际上不详）和“工人阶级的意识”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了变化而第一次被人发现。当他说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人们几乎会以为自己是在听一位企业家表达对于自己职员的准外在生活世界 (semi-exotic world) 的理解和关注。

阿多诺说曼内斯曼的研究将会留下一个真正美好的印象，此时他或许正在思考其中采用的一种方法——将访谈成果中的定量分析与组群讨论抄本中大量的定性分析相结合，即，将典型性与依据精神分析学所做的分析成功地结合起来，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有关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中一直比较缺乏，但却一直是《权威主义人格》和弗洛姆领导的魏玛德国工人阶级研究的显著特性。

然而，从这种研究当中显现出的却是另外的东西：对于访谈的定量分析，是由对组群讨论材料所做的浮浅分析补充而成的。因此，“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三卷不同于社会研究所以前出版的所有研究：它是令人难忘的专业的、纯粹定量的问卷分析。这项成果呈现出的专业主义应归功于研究所的一位新同事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他或许更适合霍克海默的要求，因为在霍克海默看来，他似乎是一位与批判理论没有丝毫联系的纯粹的经验主义者。

批判理论只在以“问题”为标题的导言部分有所体现，这显然打上了阿多诺的印记。这篇导言指出，还缺少对那些对车间气氛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工厂经理和分区的领导——和他们观点的分析。进一步讲：构成公司气氛的那些行为模式的性质，只有具体地联系起激发了这些行为反应的刺激的性质来看，才能得到理解。在下面的从句中隐藏着一个观点，隐约暗示了报告里所没有的那种社会历史维度：由有资格的人

488

表述的、已经出现在与工人参与相关的话题当中的意见，以及冷漠的基本态度，两者“在没有出现基本民主条件”的许多方面都有了发展。<sup>[94]</sup>在为已经接近完成的这项合同研究项目的因循守旧做特别辩护过程中，报告也指出，这种研究避开了提高生产力与公司内部关系人性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回避了工人们通常在多大程度上会关心改善他们车间气氛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意识到自己仅仅被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工具而受操纵的问题，这些全是因为展现这些问题的方式会影响到有关车间气氛的研究结果。“社会学要尽可能地脱离幻想的束缚，它陈述的是事例（即使与人们希望听到的东西有矛盾），这样社会学越严格，就越能更好地实现人性的目标”，<sup>[95]</sup>在这个阿多诺式口号的掩盖之下，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混乱的观点，它更接近于薛尔斯基的观点及其社会学口号——社会学是“探寻事实”的，是对社会事实的所作的反意识形态的（anti-ideological）研究。这种观点是混乱而危险的，因为它无法确定提出根本性问题的权利，也不能为认识阐释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意义提供洞见，不能为那些既没有权力也没有特权的人提供理论。

几年之后，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在他1963年写成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13卷出版——当中，专门强调有必要“依据有关工厂、工厂里工作条件和权力结构的各种主要的、客观的事实”来评估车间的工作气氛。他指出，必须将工作场所的气氛看作是冲突——产生于职工在交际中形成的种种主观期待与工厂主观性调节的客观情况之间的冲突——的产物，而不能只记录工作场所内部的各种气氛要素，而必须根据社会整体过程来解释这些要素。这种观点也有可能澄清在两个事实，即工人通常视高工资为最重要的目标与工人在工作场所直接接触到的情况，先在地构成了工人对待工厂的态度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曼内斯曼研究当中，就能观测到这一矛盾。“在这两个事实中，管理者和职工之间的利害冲突同时是以一种掩盖这种冲突的方式显现出来的。”<sup>[96]</sup>在这两个事实当中，都存在对雇主和雇员利益间矛盾的某种歪曲。此次工作场所氛围研究把自己严格限制在雇员主观反应——必须承认这确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只是众多重要指标中

的一项——上，并谨小慎微地对这些反应加以分析阐释，但事实上此次研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造成了对根本利益冲突的掩盖，而仅仅专注于根本利益冲突的那些症状。

尽管曼内斯曼研究并非为了给工人提供了解他们处境的认识而设计，但它也绝没有反映商业意识形态，例如在关注如何在工厂里制造团结和谐氛围的问题上就没有反映那种商业意识形态。社会学家支持商业意识形态——例如奥托·纽洛（Otto Neuloh）和他的同事的著作所表现的那样——而得出的成果也是显著的。纽洛属于阿多诺那一代的人，他从1927到1945年担任政府职业介绍所的学术顾问，1946年是明斯特大学多特蒙德社会研究部的创立者之一，并从1947年以后担任该大学工业社会学系的学术主管和主任。在《支配德国劳资关系的工厂规章及其包括工人参与在内的表现形式》（1956）和《新型工厂》（1960）<sup>[67]</sup>这两本书当中，纽洛及其合作者把一项研究计划的成果发表了出来，这些成果正是以商业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拉尔夫·达伦道夫在自己关于工业和工厂社会学的专著中认为这项研究乃是“对工人参与，更一般地说，对现代（钢铁）产业工人态度的四个伟大分析”之一。纽洛和他的同事将工厂视作“欢宴（convivium），并将“生活过程”从“工作过程”当中分离开来。他们想让社会学家首先把工厂里的各种工作看作是人们的参与协作，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社会学家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所发现的那种非正式团体所发挥的重要社会角色。梅奥一直在西部电气公司的霍索恩工厂（Western Electric Company's Hawthorne works）寻找提高工人生产力的方法，从那时起，他所说的“非正式团体”就成为工厂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四个研究工业社会学的主要项目当中，还有另外一项研究。这就是由泰奥·皮尔克（Theo Pirker）、西格弗里德·布劳恩（Siegfried Braun）、布尔卡尔特·路茨（Burkart Lutz）和弗洛·汉摩尔拉特（Fro Hammelrath）组成的研究小组在1952—1953年为贸易联盟的经济科学研究所（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 Institut）所进行的工厂问卷调查。他们的成果于1955年以《工人、管理和工人参

与》<sup>[98]</sup> 为标题出版。还有一项与曼内斯曼研究相当且在许多方面都很出众的研究，是由海因里希·波比茨 (Heinrich Popitz)、汉斯·保罗·巴尔特 (Hans Paul Bahrdt)、恩斯特·奥古斯特·尤勒斯 (Ernst August Jüres) 和汉诺·柯斯廷 (Hanno Kesting) 于 1953—1954 年开展的，他们研究的是社会和科技对于钢铁工业中的工业劳动的影响。他们的成果在 1957 年以《科技和工业劳动》及《社会中的工人形象》<sup>[99]</sup> 两本书出版。四位作者都是纽洛创立的多特蒙德社会研究部的同事，像弗里德贝格一样属于更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这项研究是由波比茨领导的，他的哲学论文《异化的人：青年马克思的当代论题批判和历史哲学》<sup>[100]</sup> 是德国战后第一波马克思阐释浪潮的组成部分，这一浪潮是由《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发现所引发的。

他们的研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其中第二部分依据与鲁尔钢铁厂 600 名工人的访谈，探讨工人对于自己的工作、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工人参与和社会整体等的印象。这种研究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与曼内斯曼研究中的那种情形相比，研究者们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要亲密许多。四位作者自身也是访谈组群成员，他们详细了解每一个车间，并在旅馆里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了解参加这项研究的每个工作者。其他的六个访谈者，也很熟悉他们要面见的工人的工作车间。由讨论组成的访谈至少要坚持两个小时，而且通常要更长一些。根据在车间、旅馆、私人家里和酒吧的众多交谈，组织起种种提问的模式。大部分访谈都是在车间进行的，而且通常都是在为此特意留出的房间中进行的。

诸如此类方法非常适合社会研究所的规划目标。曼内斯曼研究就在其“关于方法的评论”部分指出，通过与这些被访者进行直接接触，访谈者获得了一系列超出了答案本身的总体印象。在记录这些印象的同时，又要排除掉访谈者的主观因素是很难的。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阿多诺式理念，宣称“访谈者”完善的主观反应能力在此成为最适合于这种对象的“研究工具”，它的动力学和复杂性是无法估量的。<sup>[101]</sup> 然而这种访谈——实际的田野调查——由 15 名来自德国舆论研究所的、富有经

验的访谈者来进行的时候，就成了一场乏味的竞赛，他们只是在问卷结束部分增加了他们对于那些受访者所表现的合作程度的总体印象，如接触的品质、人的真诚性、他如何依恋工厂、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参与工会的活动。从研究报告来看，不可能判断出这一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研究所“助手”们的“完善的主观反应能力”，尽管这些人被委托来进行组群讨论。此外曼内斯曼研究还决定部队组群讨论材料作任何定性分析。

《社会中的工人形象》的内容，也比曼内斯曼研究在语言的使用上、在引用语的公布上以及在对有争议的讨论话题的详细表述方式等方面要自然得多。波比茨主持的研究对于资本与劳工之间斗争的话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后者显然已经被毫无理由地排除在社会研究所的关注之外。无论我们怎样只想把关注点集中在每个特殊工作场所的氛围上，那种氛围毕竟同时还代表着由每个工厂特殊境遇所决定的劳资利益矛盾冲突的特殊形式。然而，波比茨的研究所具有的自然性 (naturalness) 和公正性 (impartiality)，显然是研究者们确信自己毋庸置疑地持有社会主义的或类似左派的态度性的结果。而在介绍曼内斯曼的文章和霍克海默的报纸文章当中，对劳资关系的谨慎涉及被搞成了一些更明晰的话题：只有顽固的教条主义才会否认“自此灾难时期始，也就是自四十年前开始，劳动大军的性质、地位以及在整体社会内部所起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劳工运动的许多旧观念”已经“被俄国专制主义降格为权力的工具，从而被剥夺了它们原有的意义”；但是“像我们所进行的这种经验研究决不妄想”去辨别“这是否已经影响到它们的真实内容，影响到这个概念本身”。<sup>[102]</sup>相反，波比茨和他的同事在他们的成果陈述中公开拒绝社会主义的阶级理论，并乐意直言不讳地声明：

491

雇主不仅是工人参与问题的反对者，而且通常是工人的对手。

大多数人都以为雇主和职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两极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人们可能会经过相互

让步而达到妥协；很可能有人为了最终达成某种事情不得不使出自己浑身的力气。但是很多的工人甚至已经抛弃了这种期望。他们认为“高层”和“底层”之间的两极性是不能改变的。<sup>[103]</sup>

在波比茨的研究中，众多工人面对那些看来不可抗拒的对手而辞职，表现为一种松懈感和沮丧感。

492 在许多谚语——比如，“金钱让世界运转”——的表达方式背后，实际上有一种意识形态传统。财产、占据发号施令的地位以及知识，三者以相互决定和不能分离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许多工人眼中，这些依然是资本主义权力的标志。人们在今天仍然可以感觉到好几代工人被反复灌输的一种观念，即对手的力量就在于这种暴力的三位一体当中，要想战胜这样的强敌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sup>[104]</sup>

对于雇主来说，要直接熟悉并亲近工人不是变得更容易了，而是比以往更困难了。因此，一些旧规则就继续存留下来，雇主仍被描述为“资本家”。“出于教育目的，雇主被夸大描述并被塑造成警告性的对立形象，对当今持怀疑态度的工人还产生着恐吓效应，在这种事实当中存在着某种反讽”。<sup>[105]</sup>

曼内斯曼研究在（对待阶级理论方面）显得很奇特。在它的导论部分还为阶级理论的持续有效性留有可能，可到了本文当中所有阶级理论的残余形式或其他替代思想都不再被提起。与之相反，波比茨的研究无条件地拒绝阶级理论，这构成了一个基础，使得研究能够深入细致地考察工人们思想和观点，考察这些思想和观点中的那些固定形式，进而考察这些形式属于何种社会“理论”。这项研究以从汇报——即由四名工人就他们工作所做的汇报——当中选取的四段长篇引文开始。这是活生生的记录。研究的结尾则是通过广泛的定性分析，按照在被访工人中形成的社会印象的不同类型，或者说按照具有不同社会印象的工

人类型，分类引用了大量精炼的访谈实录。这是工人对自己生存状况——“condition ouvrière”——做出反应的各种方式的现象学，它完全建基于经验之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且在 1950 年代的西德确属独一无二。<sup>[106]</sup>

曼内斯曼研究随后引发的一个后果是，德国工业合理化委员会 (Rationalisierungs-Kuratori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开始为社会研究所提供工业社会学助研基金。在此之前，它已经为勒内·柯尼希领导的科隆社会学研究所和管理研究所及赫尔穆特·薛尔斯基领导的汉堡大学社会学系提供了这种资助。这使阿多诺感到非常不安。他看到了即将成为效忠于“一种我们对之抱有相当保留态度的工业研究的”危险，可能导致“与薛尔斯基和柯尼希在他们那种水准上的竞争”。<sup>[107]</sup>但是，研究所 1958 年发表的下一个计划书却骄傲地宣称——这显然是霍克海默的话，在曼内斯曼有限公司开展的有关工作场所气氛的研究，以及为了说明采矿业的波动及工人对于旧时代的看法而进行的两个进一步的研究计划，均“服务于德国工业和政府管理的实际目标。”该计划书还宣称社会研究所已成为第一所引入文凭资格考试的研究机构，这里的学生熟悉那些其他德国大学可能无法匹敌的社会研究方法。这份文本为霍克海默早先提出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和将社会当成一个整体的有关思想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注解——这个提法在霍克海默在研究所重开典礼的演讲中已经出现过，此文继续写道：

493

拥有文凭资格的社会学家并不是目光短浅的专家，而是能够将专家扎实的知识与对当今社会问题和社会整体相互联系的洞见结合起来的人。他们将满足官方机构持续增多的需要，满足诸如董事会和工会等工业团体，以及诸如广播和新闻媒体等机构的需要。这种考试需要的高标准，旨在为选拔出真正有才能的学生提供可能。

我们可以对研究所的两种研究进行区分。一方面，有一些纯粹是合

同项目，旨在确保资金的持续，如广播研究、对于工作场所气氛的研究以及其他为曼内斯曼进行的合同研究，包括对采煤业波动状况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与研究所自身的兴趣点相关的项目。在 1950 年代，这样的例子有对于西德政治意识的研究，对于大学和社会的研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对组群讨论程序的进一步考察。到 1960 年代，进一步的例子有，对与 F 量表（法西斯主义量表）相应的 A 量表，或权威主义量表的完善，以及对联邦共和国政治意识和政治教育所做的研究。为了扩展第二组的研究主题——它们也部分地得到了外界的资助，如德国科研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阿多诺搞出了一个长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系列研究计划。（1964 年，这成为他的《本真性的行话》（*Jargon of Authenticity*）一书的副标题，该书对严肃的德语表达进行了内容上的定性分析。<sup>[108]</sup>）但对于霍克海默来说，至少从开展曼内斯曼研究的时候起，这种区别显然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相反，他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机构的显赫历史所留下的模糊图像建立起一个受人尊敬的研究机构，吸引那些有人道主义信念、在社会上有作为的社会学家们，使他们在工业和管理部门找工作时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沿着这些方向来拓展研究对于霍克海默一定是一种安慰，他有一种与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结成友善关系的强烈渴望。他已经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职位，因为他将此看作保留他的美国国籍的一种办法。494 在 1950 年代中期，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另外一条“个人法”得到通过，以便恢复他终究被剥夺了的美国国籍。他也希望拥有被允许在美国和德国可以终身生活的双重国籍的权利。在德国，他争取到了像黑森州总理格奥尔格·奥古斯特·齐恩以及联邦总统西奥多·豪斯等人，他们参与了他的活动。诸如此类的要求必然会减弱他在推进唯物主义和批判社会理论方面的努力。霍克海默仍然暧昧地生活着，而且他仍然蔑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尽管比早年显得更加隐蔽。作为老师和演说者，作为煽动者和协调者，他首先做的就是宣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无论这种传统的轨迹变得如何暗淡和虚弱，将它解救出来并传递给

这个被管控的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sup>[109]</sup>

阿多诺也没有认真对待他曾经计划的经验的、批判的社会研究。他在进入工作时带入了很猛的势头和关于批判的、经验的社会研究方式的思想，因此，自从对西德政治意识进行组群研究之后，他从未潜心于任何一种对于社会研究所的各种项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他仅仅加工了研究报告并为它们写写导言或序言——他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读者，而只是因为《组群实验》和《企业内部氛围》在整整十年当中是研究所“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系列的仅有出版物。一本在他死后出版的手稿，“社会研究中的协同工作”——注明是1957年，可以帮助我们对他有限地参与研究所工作的原因做出一些结论。他在参与方面的缺乏部分应归因于霍克海默所持的麻痹态度，直到1960年代他依然对研究所的事务具有最终的发言权，阿多诺自己无法摆脱霍克海默的束缚；另外也应归因于阿多诺本人的其他兴趣，后者根本归不到他的社会学工作之下。

“社会研究中的协同工作”是对阿多诺所宣称的那种对经验的社会研究进行的自我批评的激进化表述，在《组群实验》中他说自己将会对这种研究进行更具创造力的发展。他现在将批判和经验看成是对实践中无法协调的两种成分的划分。“任何从自身工作中懂得社会研究的实践一面的人，就必然会注意到，在被讨论到的研究领域，旧式单个学者进行研究的方式是不能替代协同工作的。‘一个人的研究’总是可疑的，且大都是业余的。”<sup>[110]</sup> 举例来说，仅仅为了采集样品开展访谈，就不是单个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任何人要想得到他或她的同等人的重视，任何人要想获得研究合同，都免不了要运用调控，这种调控只有通过协同工作才可能进行，协同工作通常被用来抵消那些以特定范畴对数据进行评价和分类时出现的主观歪曲。

495

但是，我们必须为这种“流水线式的”社会科学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消除的过程不但牺牲了个人的武断，而且牺牲了反省性个体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客观洞见。这些洞见消失在抽象过程当

中，后者引导几位个体去公式化地阐明一种清除他们的一切具体差异的共通意识。也许，社会研究者那些非常令人担忧的经验，以及最终导致近年的自我批评激增的东西，是这样—个事实，即，一项有广阔前景、包含了基本的相互关系观念且提出了敏锐问题的研究，在从草案到施行的进展过程当中，尤其是经历了预备测验的瓶颈筛选之后，它最好的东西都被剥夺掉了。这些充满坚实内容和活力的研究事业就这样失去了自身的力量，原因不是由参与研究的个体的任何过失、恶意或心胸狭隘所造成的，而是研究机制自身在运作中的客观限制所带来的后果。<sup>[111]</sup>

在协同工作中，每个人必须从别人停止的地方继续开展工作。如果每一位研究人员能够表明他或她自己的态度，客观的规则就一定奏效。如果研究主管试图在最后补正对于他们在开始时引入的个人因素的研究，而这些人格因素在研究流程中已经沦为这种研究过程的体制化形式的牺牲品——阿多诺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他自己作为研究结果的推荐者和研究程序导论的作者的体验，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这种研究与数据的联系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他们的观念依然是含糊的，充其量只能寄望于被当成假设来接受，寄望于在今后那些通常从不会开展的调查中被检验。

经常有人议论说，缺乏能为研究写“应景文章”的人，但这不能被说成是因为文学才能的缺乏所致。这类报告的写作并不只是文学实践的事情，而需要对于这种研究的完整理解。相反，这种解释存在如下的难点：这种总结报告必须提供一种连贯的意义，但报告所完全依赖的这种方法的内在意义正好是对内在意义的否定，内在意义会被分解为纯粹的真实性。理论因此只是既定的应酬话，因为这种研究的内在倾向一点也没有把从事实中获取理论作为它的目标。<sup>[112]</sup>

从阿多诺对于他自己在经验的社会研究中的经历所持的看法当中，可以得出如下暗含的结论：在未来可以一个人独自做研究，但同时又免于让自己受到业余的或纯粹闲聊的指责——即继续从事理论工作。但又是哪一种理论呢？这种理论如何能防止自身堕落为单纯的思索呢？两年之后，阿多诺开始写作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后者可以说已经替代了他打算与霍克海默继续合作《启蒙辩证法》的计划。在将近二十年——阿多诺在此期间一直不情愿被安排到经验的社会研究项目当中，以一种成长的、但绝不是无限的热情参与了这些研究——之后，他现在终于回到了他在普林斯顿广播项目从事研究工作时期的立场；重要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根据经验来解决。

然而是不是一直没有伯克利那种项目？阿多诺已经达成了将心理分析理论与社会研究方法、弗洛伊德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目标，难道他还不为此感到骄傲吗？难道他与伯克利舆论研究小组的合作也只不过是“流水线的协作”吗？难道不是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批判经验主义那些决定性的试验没有能够以“客观激励他们的事业”的名义而开展，没有能够出于一种对太过脱离一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担忧而开展吗？阿多诺的批评提到了既定的研究制度，但没有提到可以创造批判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形式的计划。他的批评使得自己更容易专注于哲学理论，但也使他之后一直能够坚持在批判社会学中开展现场调研的必要性，尽管他不能确切地说明这种研究包含什么意义。

## 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爱欲与文明》

当出版社或潜在的赞助者对研究所的出版计划还没有多少兴趣之时，或者还没有出现合适的译者之时；当研究所的主管已经向体制化的研究制度妥协之时；当他们仅为运转自己陷入其中的制度就耗尽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依然至少尽可能地保全了知识共

同体的遗产？而人与人之间结成的这种共同体与一个可以激发他们动机的原因有关联，它被阿多诺看作是惟一可以替代“协同合作”和“单个人研究”的选择。纵然马尔库塞没有能回到法兰克福是因为阿多诺的妒忌，是因为霍克海默不愿承担长期的财政承诺，是因为马尔库塞自己想获得经济保障这一正常的需求，除此之外，在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相对疏远的关系之间，是不是至少还存在某种一致性？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对于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曾用过的标题是“超越现实原则：精神分析的哲学”和“精神分析的哲学：走向没有压抑的文明”）在德国出版的经历，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情景。

这本写弗洛伊德的书，源自马尔库塞于1950—1951年之间在华盛顿精神病学校所做的一系列演讲。1951年11月马尔库塞写信给他于8月份在法兰克福新近拜访过的霍克海默：“你问到过我关于弗洛伊德那本书的计划。因为我想冒险进入一个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从客观上看都非常危险的领域当中去试一试，我就决定先写下我首先想到的所有东西，然后再重写它。因此，除了我在法兰克福向你提到的想法而外，我还毫无计划。”<sup>[113]</sup>霍克海默看到过初期阶段的手稿，而且马尔库塞一直告知他此书的进展情况。1954年夏天的晚期，霍克海默去美国处理他的芝加哥教授职务的相关事宜的时候，碰到过马尔库塞。他在写给阿多诺的信中说，“顺便提一句，我觉得赫伯特（即马尔库塞）的著作相当不错。尽管我们对心理学方法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我们应该完全接受这本书当中的许多精彩论述。除了在学刊上发表一系列的摘要之外，再出版一个完整的译本肯定就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著作列入计划中的‘德译作品系列’。”<sup>[114]</sup>几天之后，面对翻译丛书出版资金可预见的困难，他写道，“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将赫伯特的书作为我们研究所的出版物而出版，无论是出英语版还是德语版。这并不妨碍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先在学刊上发表。”<sup>[115]</sup>霍克海默回到法兰克福之后，马尔库塞写信给他，说，“如果这本书能作为研究所的著作并以德文面世，那就太好了，它属于研究所及其领导者。”<sup>[116]</sup>

在这套献给霍克海默 60 岁生日的《社会学》文丛当中，马尔库塞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节译被排在第二位，紧随阿多诺的文章之后。然而，甚至在这本书的英文版还未问世之前，出版德文版的计划就蒙上了阴影。阿多诺在 1955 年 8 月写信给霍克海默：

《异议》(*Dissent*) 当中有赫伯特所写的一篇批驳精神分析修正主义者的长文，基本上包含了我们对于此事的看法，虽然文中只字未提我们，我觉得这一点很奇怪。我坚决反对单方面的团结，说到他这本书，其中有一章就是由此文构成的。我强烈建议，我们对这本书绝对不要做任何事情！<sup>[117]</sup>

一年之后，将马尔库塞研究弗洛伊德的这本书的德文版作为研究所丛书出版的计划彻底化为泡影。阿多诺在 1957 年夏天写给马尔库塞的一封信中说： 498

说实在的，我对你研究弗洛伊德的英文版著作表现出来的某种直率和“直接”（就我们现在对和解 [mediation] 这一概念含糊不清的理解来说）有所担心，尽管它并没有影响你所持的基本立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希望你能写出德语版。这只是一个在语言的不同标准之间出现的差异问题。你只需要用德语阐明你的想法，留意令我不安的那类事情，而且以一种我们所有人都会完全支持你的方式去改变它们……就我这方面来说，根本不存在不愿意出版此书的问题。相反，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将此书作为我们丛书出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我的看法到现在也没有一丁点的改变。<sup>[118]</sup>

但马尔库塞毕竟不是本雅明，也与本雅明的处境不同。也许为了满足阿多诺的要求而修改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会取得一些改进——就像本雅明为了适应《社会研究学刊》的需要对他讨论波德莱尔的文章做过改动

一样。但是，从马尔库塞的要求来看，这样做会有改进吗？马尔库塞研究弗洛伊德的这本书的德文版，被冠以《爱欲与文化》的标题，由出版人恩斯特·克莱特 (Ernst Klett) 于 1957 年出版。(在随后的版本中，标题被改为《本能结构和社会》[*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 马尔库塞与研究所主管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了。

现在看来，关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可以被视为马尔库塞主要的理论著作。而且，与本章早先提到的 1955 年发表的文章相比，甚至与他在此前和此后几年发表的著作相比，此书都是最有资格被认为延续了批判理论的成果。在《理性和革命》(1941) 一书中，马尔库塞试图系统地将黑格尔从极端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手中夺回来，并试图证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当中的批判倾向。他在 1946 年就提议在已经计划好的新学刊上出一期专刊，对战后德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以及各重要党派的纲领进行系统评价。1947 年，正是他，也只有他，为新学刊的定位草拟了一些相关的讨论话题。稍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学会和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伙伴们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对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准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试图在《单向度的人》(1964) 当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的批判。与之类似，他在《爱欲与文明》中运用了本能动力学，试图为批判理论提供同样的基础。

《爱欲与文明》就是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书留有一个片断，仅仅宣称要为积极的启蒙概念铺设地基，而在马尔库塞这本书里，第二部分“超越现实原则”紧随第一部分“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马尔库塞试图驳倒弗洛伊德的那个广为接受的命题：没有对本能的放弃或抑制，没有对现实原则的承认，文明就是不可思议的。他用弗洛伊德自己理论当中的元心理学 (metapsychological) 因素，试图说明一种没有压抑的文化的的确是可能的，而且这种文化是可以利用早先的压抑文化构成的客观条件的。他谴责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尤其是弗洛姆通过将他们的关注点由潜意识转向意识、从生物学因素转向文

化因素，从而切断了本能动力学的社会根基。他们将社会看成一种制度性地确立起来并与个体对抗的文化环境，在他们的理论配置中没有超越统治制度的任何概念基础。相反，马尔库塞自己却宣称，得益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他将本能层次观念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批判标准，依靠它可以来评判社会并探讨如何塑造个人。

马尔库塞对“文明辩证法”所做的分析如下。我们以前的整个文化进程均受到如下事实的影响，即对于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并不以尽最大可能来满足个体的需要为目标，而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对短缺的逐步征服也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统治利益，并深受这种统治利益所影响。”除了基本的压抑，除了“为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作的必要‘变更’”之外，<sup>[119]</sup>还有一种“额外压抑”(surplus repression)。文化的进步都带有额外压抑的印记，而且实际上，由于对自然的控制范围不断增大，这种额外压抑也在相应增强，从而削弱了本能力量当中的性欲成分并增强了毁灭性的因素。

必须加强对攻击的防御；但为了使这种对日益扩大的攻击进行卓有成效的防御，就必须加强性本能，因为惟有强大的爱欲才能有效地“约束”破坏本能。但这恰恰是发达文明所无法做到的，因为文明的存在正是依赖于对爱欲的广泛的、强化的管制和控制。<sup>[120]</sup>

凭借这种诊断，马尔库塞认为，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在性行为 500  
和文化之间具有不可避免的“生物学”冲突的思想，已经被下面这种思想所取代：

在病态文明中受到束缚、感到困乏的爱欲具有统一力量和满足力量。这种思想意味着自由的爱欲并不排斥文明的持久的社会关系，它所拒绝的只是在一个否定了快乐原则的原则所指导下的超压抑的 (supra-repressive) 社会关系组织。<sup>[121]</sup>

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空想和乌托邦”、“替代普罗米修斯”的“俄耳甫斯”和那西索斯”的形象”以及“审美之维”和“由性转向爱欲”等章节。因而，马尔库塞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供着一本类似于布洛赫《希望原则》的书。布洛赫此书第一卷由“小白日梦”、“期待意识”和“镜中理想”组成，已经于1954年出版；第二卷“更好世界之轮廓”出版于1955年，而第三卷“圆满时刻之种种构想”，则在1959出版。<sup>[122]</sup> 马尔库塞此书的最后一章“爱欲与死欲”，试图从对手那里抢来死亡的话题，甚至视死亡为可以改变的东西——而以往关于死亡的话题都教导人们，所有的愉悦都是短暂的，并且会在社会强迫人进入死亡之前就引导人去顺从死亡。哲学应该以“大拒绝”——马尔库塞从A. N. 怀特海(A. N. Whitehead)那里借用了这个引人注目的套语，怀特海曾打算用它来界定艺术的主要特性——的姿态来回应死亡，并坚持人类全面实现自我的要求和本能。<sup>[123]</sup>

在真正的人类生存条件下，在十岁、三十岁、五十岁或七十岁时的病死与生命得到实现之后的“自然死亡”之间的差别，很可能是一种值得竭尽全部本能能量去争取的差别。对文明提出巨大控告的，不是那些死去的人，而是那些在他们必须死亡或愿意死亡之前就死去的人，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人们会动用压抑性秩序的所有机构和价值标准来平复这种罪恶产生的内疚感。<sup>[124]</sup>

(马尔库塞在这里兜了一个圈子，回到了他为自己研究弗洛伊德的这本书确立起点时的境况。献辞页上写着：“以此纪念索菲·马尔库塞(So-

- 
- \*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古希腊神话人物，因从天上盗取火种给人类而触怒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受神鹰折磨，但他始终坚毅不屈。——中译者注
- \*\* 俄耳甫斯(Orpheus)，古希腊神话人物，太阳神阿波罗之子，善弹竖琴，其琴声能感动草木、禽兽和顽石。——中译者注
- \*\*\* 那西索斯(Narcissus)，古希腊神话人物，是一位美少年，因自恋自己在水中的美影以致憔悴而死，化为水仙花。——中译者注

phie Marcuse), 1901—1951。”马尔库塞在 1951 年已经开始本书的写作，正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癌症，在此之前她与死亡有过一年半的面对面斗争。)

马尔库塞在他早期的文章中，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运用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并且谈到“全面革命”和“认识整个人类”的问题，又在《爱欲与文明》中起草了一份介绍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革命的绪论。此书名称意味着诉诸爱欲 (eros)，以之作为反击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的手段，当作将文明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从不会失去目标的担保。(马尔库塞通常在提及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的讨论，诸如，一旦额外压抑被废除，依据以前的文明成就，基本压抑的特征将会变成一种不再有任何压抑方式。他并未讨论这将意味着什么。)

501

现实原则必须在人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重建。这就表明它对快乐原则的征服一开始就是不完全、不稳固的……文明所欲控制和压抑的东西即快乐原则的要求，在文明本身中仍然继续存在。无意识中保存着受挫的快乐原则的追求目标……被压抑物的这种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而且过去仍然在对未来提出要求，因为它使人产生了以文明成就为基础重建天堂的愿望。<sup>[125]</sup>

马尔库塞论证说，持续不断的隐秘的快乐史所构成的连续性，每个人在孩童时期以及人类在其童年阶段拥有的早期的快乐记忆，不但保证了对于快乐的需要是不能被毁灭的，而且是一种对全部快乐的需要。

压抑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基本的压抑和额外的压抑之间的区别是否意味着没有额外压抑的文明化进程曾经有可能存在过；带有支配和额外压抑印记的各种文明成就，是否应该受到批判性考察和根本性的修正；那些被宣判应该去忍受隐秘的、禁忌的历史的东西，是不是不应该成为各种歪曲的牺牲品，而这些歪曲不可能在某一天像脱掉那讨厌的镣铐那样很容易地被扔掉——诸如此类的紧迫问题，有些根本不是由

马尔库塞提出的，有些完全可由从弗洛伊德那里承继的系统发育学的 (phylogenetic) 思考来回答，有些可以用一些流行的口号来回答，比如需要“对巨大的工业设施进行合理的组织”，将性欲转变为爱欲，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用“‘力比多’劳动”来替代“异化劳动”等等。<sup>[126]</sup>

502 马尔库塞的著作最终是否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所依赖的那些资源产生了冲突呢？阿多诺曾经在《新音乐哲学》中将“某人返回的姿态”看作是“所有音乐，甚至在一个该死的世界中的音乐的表达”。<sup>[127]</sup>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精神把自己视为不顺从的天性 (unreconciled nature)，这正是从启蒙的辩证法中生发出来的方式。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当中将旧的生活方式依然潜伏在现代文明的表面之下，看作是出于自身目的去热爱某种事物的力量之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恩斯特·西美尔写了讣告，捍卫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唯物主义”，阿多诺的“修正了的精神分析”一文也是如此。<sup>[128]</sup> 所有这些论述不是被马尔库塞都扼要地概括为他的立论前提，即本能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好的”本能结构即爱欲自身当中就包含着一种理性吗？马尔库塞不正是由此坦率地断定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自身的立论前提吗——尽管那只是他们两人间接地、羞怯地、格言式地陈述过的论点？他们的观点是，自然中积极的方面——从神话直到启蒙和理性时代——最终依赖于对公正、善良和真实产生的一种自发的、在那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天然的感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反复强调只有自反性思考才可能表达被压抑的自然（天性），对自然的支持只有一种可能方式，即解放表面上与它对立、独立于它的思想。那么，能不能把思想的贡献想像成是对自然中“好”的形式所给定的某些东西的另一种实现和表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他们的谨慎，难道不只是在避免与他们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的公开对峙吗？一方面，需要一种不受一种可能带有误导性的是非感 (sense of what was right and wrong) 所左右的标准，以便对自然的“善”和“恶”进行区分。另一方面，同样需要一种不受同样可能带有欺骗性的合理性形式所左右的标准，以便某些对启蒙辩证法、对根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在文明之中的融合有着清晰洞察的人做出

合理的判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涉及批判理论基础的那些问题慎之又慎，他们只把重点放在确定性否定的作用上，而且强调只在表达事实，因而他们强调的重点是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并为此观点辩护。但如果围绕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而展开的工作没有进展，批判理论的基础问题不就会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吗？马尔库塞的这本书，难道不值得从这一点得到讨论吗？

早就应该如此。霍克海默曾经抱怨 1930 年代的后五年缺乏理论的经济分析，尤其缺乏与辩证法项目相关的分析。至迟在 1954 年，当阿多诺重新启动他的旧计划——出版一本研究所讨论大众文化的论文集——之时，他在一封写给洛文塔尔的信中还抱怨道：“这里肯定遗漏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即，对于文化工业支柱所做的理论的经济分析。”<sup>[129]</sup> 正像对这种分析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被强调但在实际工作中被抑制一样，讨论批判理论基础的需要现在也突然变得紧迫起来——而且这种需要所受的抑制甚至比理论的经济分析所受的抑制还要强烈。

在阿多诺搬到美国西海岸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当中，他同霍克海默在他们的通信中已经就理论基础问题交换过看法，这些看法比他们通信或手稿中的其他任何章节都要坦率。他们当时的处境促使他们得这样做：他们马上就要一起合作动手完成他们的杰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再大的问题也可以在他们的协作过程中得到解决——只要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不会在他们的协作过程中最终得到解决——如果存在解决可能的话。

阿多诺再次向持怀疑论的霍克海默鼓吹神学主题的至关重要性。关键就是要“静静思考奥秘”。他继续写道：

我有一种无力、非常无力的感觉：我们依旧可以静思奥秘，但是我现在确实还不能阐明可以进行静思的方式。神学正在收缩并且很快会消失这一假设是一个主题，而从最根本的一点来看，确信神学与否定的关系及其与肯定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没有差异，又是另外一个主题。（马尔库塞的书就是根据这种区别而写成的，它

只在这一点上对我有促进。)但我首先认为,我们经历的所有自认为真实的事情——不是盲目的、而是在观念上对我们有推动的事情——以及那些把自身作为真理标准 (*index sui et falsi*\*) 而呈现给我们的东西,都只是把这种(宗教)灵光作为其他灵光的映象 (*reflection*) 来传送的。<sup>[130]</sup>

这里提到的马尔库塞的书是《理性和革命》,例如,这本书中有这样的陈述——马克思所用的“诸多范畴是否定性的,但同时也是肯定性的:它们依照肯定的解决办法而展现出事物否定的状态,将现存社会中的真实情形揭示为向一种新形式转变的前奏”。<sup>[131]</sup>阿多诺的《伦理随想录》的最后一个格言是:“面对绝望,惟一能够被可靠地实践的哲学,就是努力将所有事物都当成它们可以从救赎立场来呈现自身的东西来思考。知识并没有光芒,但光芒会通过救赎撒播到世界上……完善的否定性一旦被正视,就会描绘它的对立面镜像。”<sup>[132]</sup>这难道与马尔库塞正在写作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各自接下来的句子中呈现了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构成新社会的基础是现存社会本身固有的,而且正准备把它转变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然而对于阿多诺来说,从救赎的观点出发把世界视为正被取代和被异化的世界,这种预见“弥赛亚之光”的洞察力,一方面看是最简单的和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在阿多诺看来,就是因为任何此类洞察都必须处于超越存在范围的某一点上,但同时每一种可能的洞察都会带有歪曲的印记,尽管它试图摆脱歪曲。马尔库塞认为,在否定的现象当中内在地具有肯定的本质,而且将具有肯定本质的隐秘历史视作历史中真实的、最终获胜的一面。与之相反,阿多诺并不认为这种隐秘历史可以提供任何保证。只在达到完善的否定性的时刻,否定和肯定双方,以及救赎的胜利之光才会立即抵消它们之间的区别,并在同一时刻展现它们自身。只有从救赎出现的时刻,并因此在反

504

---

\* 拉丁语: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也就是指真理。——中译者注

思过去当中——就像生命在死亡时刻会闪现过去——才有可能正确地否定和肯定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阿多诺坚持要对虚假状况进行内在批判这一难题 (aporia), 使得他陷入了一种附带括弧的神学。这种神学就像一张汇票, 尽管人们都强调它本身的票面特征, 但人们都期待把它兑换掉。

阿多诺在同一封信中告诉霍克海默, 当他试图阐明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时, 显得有些奇怪而天真, 而且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难怪他没有在他所写的书中探究这些问题——宁愿原则上用隐喻的方式暗示了批判理论的根本理由 (ultimate justifications), 因而只是在那些听起来有些暂时和含糊的阐述中才探讨些问题。

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叔本华式理解的霍克海默, 将他的观点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之上, 即, 人类有一种对快乐的本能的需要, 对其他有限存在怀有本能的同情心和团结心, 而且, 一旦人性摆脱了被操纵的命运和生存竞争, 就会重现这些特质。这又涉及另一个假设, 即, 有一种理性源自人的天然品性。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于 1941 年 9 月的通信中, 又出现了另一个主题。虽然他们俩都只是简要地提到了这一主题, 但他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方式表明, 经于尔根·哈贝马斯随后发展的这种观点——理性处于语言之中, 而且批判理论应当在语言那里寻找它的最终基础——在当时还未完成, 还没有被人领会。

霍克海默 1941 年在写作关于理性的那篇文章\* 时, 曾经询问过阿多诺对于“卡尔纳普那些人”关于理性和语言的同一性论题的看法。在霍克海默看来, 理性和语言的同一性思想弥漫在整个资产阶级哲学史当中。17 世纪法国人根本不把理性称为 *raison*, 而干脆就叫 *discours*。但卡尔纳普论题背后的意图, 则主要是想全然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

我问自己, 我们是否非得从哲学家手中取出这个论题。语言在 505

---

\* 即《理性与自我持存》。——中译者注

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说话者的心理意图，它想获得以往只被归属于理性的那种普遍性。对这种普遍性的解释必定会得出关于合理 (correct) 社会的思想。因此，如果语言只服务于现状，它肯定会发现自己处在自相矛盾当中，这一点在它们自身的许多具体的语言结构当中是很明显的。我想听听你对这一想法的反应，尽管我在此只能相当形式化地、含糊地暗示这一问题。因为我所借助的这种方式并不能使我自己说服自己。在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实践与必然想获得那种恰当的一般性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不要以为我还没有获得许多可用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更具体事例，抛开这个论题的实证性不说，仅这个论题本身就非常吸引人。“语言批判”因而是一种主格批判 (subjective genitive)。但是我对这条思路并不十分满意，即便从毛斯纳 (Mauthner) 到卡尔·克劳斯都是沿着这个思路下来的。

由于服务于现存的不公正，语言沦为两种矛盾的牺牲品。首先，职能化和图式化的过程，导致语言与其可以表达丰富意义的能力之间生了矛盾。

卡尔·克劳斯……总是试图在所有情况下将图式化宣布为一种错误，这就使图式化看上去无害了。但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只与资产阶级理念对抗已经显得不够了。与语言批判相比，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对抗；它制造了一个反题 (antithesis)。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甚至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成问题的。它也还是被隐秘地调向权力、秩序、计划和管理等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卡尔·克劳斯那里都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第二种矛盾，在现实社会中，语言成了这种矛盾的牺牲品：

向某人言说，基本上意味着将他看作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的

可能成员。言语建立了共享真理的某种关系，因而言语也是对其他存在，其实就是对一切存在形式按其能力的内在肯定。言说否认任何可能性的时候，它必然会同自身产生矛盾。集中营守卫无论讲什么话，都是极端不合逻辑的，当然，除非这种言说是在谴责言说者所履行的职责。<sup>[133]</sup>

霍克海默本人立即考虑到反驳理由，即第二种情况中的一般性概念至多只能与其他一些理念一样，被描述为资产阶级的一般性概念。有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即这种一般性概念来源于康德，而且它不能提供任何指导。既而他困惑地补充说：“也许是这样吧，那么看来剩下的事情全得依靠经验，而不是依赖于对经验的表达了。”如果那样的话，逻辑会真正成为纯粹形式的理性。他询问阿多诺对他第二种看法的意见，而阿多诺也给予坚决的肯定。

我完全同意至今尚存的所有语言都具有对抗本性的论题……如果说人类仍然尚未成熟 [mündig]，那么这种说法意味着，如其字面所说，人类还不具备言说能力。而克劳斯的幻想是人类失落了言说能力。你对于语言哲学看法的新变化与我们的心理学批判也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心理学中，行善的一般性这一乌托邦被丢弃了，因为无论如何这种行善的一般性都不能为逻辑所充分表述，而邪恶的一般性，即简单的共性却完全浮现了出来。我愿意热情地支持在语言哲学中出现的这种新倾向，当然，也包括它的辩证对立面。事实上，我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我几乎无法理解你的犹豫。这不应该被称为语言批判，而是某种类似于“语言与真理”或“理性与语言”的东西。

阿多诺就霍克海默和实证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给出了这条建议，随后又用自己的感受督促霍克海默，他说道：

我觉得，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比得上以一种特殊方式潜藏于直言言谈中的真理关系带给我的如此强烈的感受。对我来说，发现正在讲话的人可能是一个恶棍或者在撒谎，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且现在基本上还是如此。我对于真理寓于语言的感受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征服了所有的心理学，并容易让我对言说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轻信，后者与我的经验构成了显而易见的矛盾，通常只有当我看到有关人士写出来并明确地认识到他不能说话的时候才能克服这种矛盾。我对于说谎的几乎无法遏止的厌恶只与这种意识相关，而与任何的道德禁忌无涉……当你问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我只能说，也许我心灵最深处的动力——深到我几乎无望地受它们的摆布——就建立在你所描述的层面上。<sup>[134]</sup>

507 尽管热情地确认了霍克海默的想法，但他们都没有写出任何文字反映这些思考。<sup>[135]</sup>在《启蒙辩证法》和其他著作中，只出现过这样一些的想法：语言已经被剥夺了意义，人们今天不能真诚地讲话，所有的沟通都虚假的，只会将人与对象和其他人分离开来。尽管这个想法并非《启蒙辩证法》和阿多诺研究工作的核心思想，可它的目的也不是严格否定获得植根于语言之中的真理和理性的可能。真理和理性寓于语言，这并不是批判理论所吸取的核心观点。这番通信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为如下问题提供暗示性的回答：在他们一起写作关于辩证法的著作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否一直反对（被视为主格批判的）“语言批判”的思想，如果他们反对，那又是为什么？他们或许一直反对“语言批判”，因为在语言基础上争取自由人的联合体、争取真理的这种论据在霍克海默看来太过唯心主义了。《启蒙辩证法》仅仅表明，阿多诺试图呈现某种隐藏着的神学的策略终于成功了，他处理如何为批判理论辩护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僵化成一个公式，在这个公式中，黑格尔的确定性否定概念与霍克海默对犹太一神教本质的论述（在《犹太人与欧洲》的结尾给予了特别强调的<sup>[136]</sup>）结合了起来。当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和他的任职演讲中，以及随后对占支配地位的“主观理性”和

“客观理性”进行对比之时，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明确坚持自己对客观理性的所有权，看来，他在回避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他却利用机会对占主导地位的“主观理性”提出了坚决的批判。

马尔库塞通过《爱欲与文明》试图填补这个鸿沟。而阿多诺在没有使自己融入马尔库塞探讨问题时所持的立场的情况下就对此书做出的批评，等于是在劝告马尔库塞必须沿着与他阿多诺本人和霍克海默相同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继续把基础隐藏起来，不要把它作为坐实而确定的东西呈现为思想的中心焦点。

马尔库塞对阿多诺的批评感到莫名其妙。马尔库塞总是会捍卫亚里士多德式的热烈，后者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这种或那种尽可能委婉的方式克制地表达的想法。他总认为真理和正确的东西就有着基本的存在品质。情况一直如此。即使对相距遥远地生活着的理论家共同体来说，他们的相互保留也太深了，而且乐意讨论这些保留的愿望也太微弱了。

#### 注释：

[1] 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 (Wolfgang Abendroth, 1906–1985) 自 1951 年以来一直是马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创立了社会科学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堡学派”，积极投身于 1960 年代的议会外反对运动 (the Extra-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和 1970 年代的和平运动。

[2] Horkheimer to Zinn, 8 March 1955.

[3] *Memorandum über 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M.* (November 1950) (Max Horkheimer Archive, IX 70). 草稿 (致赞助者的信)，1951 年 6 月 (Max Horkheimer Archive IX, 75)。由这位研究所主管起草的几乎同样的文稿，也被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到镇议会的许多市政权威所引用，以此批准向社会研究所的拨款。

[5] ‘Soziologie im Kampf gegen das Vorurteil. HICOG fördert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 HICOG 是“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 (the Office of the US High Commissioner for Germany)”的首字母缩写。

[6] *Gruppenexperiment. Ein Studienbericht*, ed. Friedrich Pollock (Frankfurt am Main, 1955) .

[7] Theodor W. Adorno, 'Entwurf für Osmer', 没有日期。

[8] Notgemeinschaft für den Frieden Europas.

[9] *Autorität und Vorurteil*, 2 vols.

[10] 'Politische Betätigung von Angehörigen des öffentlichen Dienstes gegen die 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

[11] Kulturbund zur demokratischen Erneuerung Deutschlands.

[12] Vereinigung der Verfolgten des Nazi-Regimes.

[13] 东德共产主义青年团 (The East German Communist youth organization)。

[14] Marcuse to Horkheimer, New York, 18 October 1951.

[15]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J. W.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Ein Bericht über die Feier seiner Wiedereröffnung,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e Arbeiten* (Frankfurt am Main, 1952) (Max Horkheimer Archive), p. 12.

[16] 这里和随后的信息主要依据 M. Rainer Lepsius 的报告,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ologi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pecial issue, 21; *Deutsche Soziologie nach 1945: Entwicklungstendenzen und Praxisbezug*, ed. Günther Lüschen, pp. 25–70.

[17] 赫尔曼·赫勒 (Hermann Heller, 1891–1933), 1928–1932 年任柏林大学、1932–1933 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和宪法学教授。流亡中死于马德里。参见前面第三章第 211 条注释。

[18] 'Zur gegenwärtigen Stellung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

[19] Frankfurter Institut zur Förderung öffentlicher Angelegenheiten.

[20] Darmstädter 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Forschung.

[21] 'Die gegenwärtige Situation der Soziologie'

[22] Theodor W. Adorno, J. Decamps, L. Herberger, H. Maus, S. Osmer, I. Rauter and H. Sittenfeld, 'Sozialforschung, empirische', in *Händwörterbuch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ed. Erwin von Beckerath et al. , vol. 9 (Stuttgart, 1956), pp. 419–35.

[23]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Frankfurt am Main, 1972), pp. 481–2.

[24] *Ibid.* , p. 482.

[ 25 ] *Nebenerwerbslandwirt und seine Familie im Schnittpunkt ländlicher und städtischer Lebensform*.

[26]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p. 482.

[27] Institut zur Förderung öffentlicher Angelegenheiten,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Meinungs- und Marktforschung. Methoden und Probleme* (Frankfurt am Main, 1952), p. 227.

[28] *Ibid.*, p. 83.

[29]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p. 479.

[30] *Ibid.*, pp. 492-3.

[31] Adorno to Horkheimer, Paris, 20 October 1952.

[32] Adorno to Horkheimer, Los Angeles, 12 November 1952.

[33] 施拉格鲍姆 (Schlagbaum) 是法兰克福大学附近的一处酒吧。阿多诺此处指的是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 即《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的作者; 参考上面第五章“偏见研究”部分。

[34] Adorno to Horkheimer, 12 March 1953.

[35]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1974), pp. 238-44.

[36]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2 (1957), pp. 19-88; repr. in *Telos*, 19 (Spring 1974), pp. 13-90. 德语减缩版的标题是“*Aberglaube aus zweiter Hand*”, 发表在1959年的《精神》(*Psyche*) 杂志, 1962年收入 Adorno and Horkheimer, *Sociologica II. Reden und Vorträge von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am Main, 1962) .

[37] In Adorno and Horkheimer, *Sociologia II*, p. 150 [cf.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2 (1957), p. 36] and p. 163.

[38] Helmut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Berlin, 1928) .

[39] Horkheimer to Adorno, 17 April 1953.

[40] Adorno to Horkheimer, 25 April and 3 June 1953.

[41] Horkheimer to Adorno, 19 January 1953.

[42] Adorno to Horkheimer, 24 January 1953.

[43] Horkheimer to Adorno, 13 March 1953.

[44] 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Fred Mielke (eds), *Wissenschaft ohne Menschlichkeit. Medizinische und eugenische Irrwege unter Diktatur, Bürokratie und Krieg* (Hei-

delberg, 1949) .

[45] Horkheimer to Adorno 16 February 1953.

[46] Horkheimer to Adorno 16 February 1953.

[47] Horkheimer to Marcuse 17 March 1950.

[48] Marcuse to Horkheimer. Washington, DC, 4 June 1950.

[49] Horkheimer to Marcuse 3 July 1950.

[50] Horkheimer to Marcuse. 26 March 1951.

[51] Marcuse to Horkheimer. New York, 18 October 1951.

[52] Marcuse to Horkheimer 9 February 1953.

[53] Horkheimer to Marcuse, 28 April 1953.

[54] Adorno to Horkheimer, 10 May 1953.

[55] 参看以上第五章注释第 78 条所在页的内容。

[56] Adorno to Horkheimer, 24 June 1953.

[57] Marcuse to Horkheimer, 3 June 1954.

[58] Ludwig Erhard, *Wohlstand für Alle*, ed. Wolfram Lange (Düsseldorf, 1957); trans. Edith T. Roberts and John B. Wood under the title *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 (London, 1958) .

[59] Dean Patzer to the Hessian Minister, Frankfurt am Main, 1 August 1953.

[60] 库尔特·舒马赫 (Kurt Schumacher, 1895–1952), 1930–1933 年是国民议会成员, 1933–1945 年被关押于各个集中营, 1946–1952 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卡洛·施密德 (Carlo Schmid, 1896–1972), 社民党政治家, 1949–1972 年是国民议会成员, 1949–1966 年、1969–1972 年任联邦议会副主席; 西奥多·豪斯 (Theodor Heuss, 1884–1963), 作家和政治家, 1930–1933 年国民议会成员, 是 1946 年德国自由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 1949–1959 年任联邦德国首任总统。这三位均对联邦德国宪法的制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61] Cf. Do: rte von Westernhagen, 'Wiedergutmachung?', *Die Zeit*, 5 October 1984, p. 34.

[62] Jean-Paul Sartre, *Anti-Semite and Jew*, trans. George J. Becket (New York, 1965), p. 80.

[63] *Gruppenexperiment. Ein Studienbericht*, ed. Pollock.

[64] *Betriebsklima. Eine industrie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aus dem Ruhrgebiet* (Frankfurt am Main, 1955) .

[65] Theodor W. Adorno, *Prismen.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Berlin, 1955);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ass., 1981).

[66]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1955)

[67] Walter Benjamin,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55).

[68] *Sociologica I.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 am Main, 1955).

[69] Friedrich Pollock, *Automation. Materialien zur Beurteilung der ökonomischen und Sozialen Folgen* (Frankfurt am Main, 1956).

[70] Max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in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eds),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mimeograph (New York, 1942), 'The End of Reason', SPSS, 9 (1941), pp. 366–88, repr.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1978), pp. 26–48.

[71] Cited in Jürgen Habermas,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London, 1983), p. 41.

[72] Cf. 'Flaschenpost? Horkheimer, Adorno, Marcuse und Nachkriegsdeutschland', in *Pflasterstrand*, 17 May 1985.

[73] Horkheimer to Adorno, 14 August 1954.

[74] Adorno to Horkheimer, 17 August 1954.

[75] Horkheimer to Adorno, 22 January 1957.

[76] Adorno to Horkheimer, 17 August 1954.

[77] *Gruppenexperiment*, ed. Pollock, p. 275.

[78] *Gruppenexperiment*, ed. Pollock, p. 275.

[79] *Ibid.*, pp. 30–1.

[80] *Gruppenexperiment*, ed. Pollock, p. 281.

[81] *Ibid.*, p. 310.

[82] Theodor W. Adorno, 'Was bedeutet: 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 .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0, part 2 (Frankfurt am Main, 1977), pp. 555–72.

[83] *Gruppenexperiment*, ed. Pollock, pp. 339–40.

[84]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1 (1957), pp. 101–2.

[85]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9/2 (Frankfurt am Main, 1975), p. 393.

[86] *Ibid.*, pp. 392–3.

[87] [William G. Sumner,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

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Boston, 1907); Thorstein B.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1899); Robert Lynd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29); Robert Lynd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1937); Theodor W. Adorno, Else Frenkel 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1950); and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Toward the Codific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Glencoe, hi., 1951).

[88] cf. Eberhard Schmidt, *Die verhinderte Neuordnung 1945–1952*, 8th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81).

[89] Cf. Hermann Winkhaus, 'Betriebsklima und Mitbestimmung', *Arbeit und Sozialpolitik*, 9 (April 1955).

[90] Adorno to Horkheimer, 30 June 1954.

[91] Adorno to Horkheimer, Frankfurt am Main, 17 August 1954.

[92] *Betriebsklima*, p. 48.

[93] *Ibid.*, p. 69.

[94] *Ibid.*, p. 16.

[95] *Ibid.*, pp. 13–14.

[96] Ludwig von Friedeburg, *Soziologie des Betriebsklimas. Studien zur Deutung empirischer Untersuchungen in industriellen Grossbetriebe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pp. 18, 51.

[97] Otto Neuloh, *Die deutsche Betriebsverfassung und ihre Sozialformen bis zur Mitbestimmung* (Tübingen, 1956) and *Der neue Betriebsstil. Untersuchungen über Wirklichkeit und Wirkungen der Mitbestimmung* (Tübingen, 1960).

[98] Theo Pirkcr et al., *Arbeiter, Management, Mitbestimmung. Eine industri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Struktur, der Organisation und des Verhaltens der Arbeiterbelegschaften in Werken der deutschen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 für die das Mitbestimmungsgesetz gilt* (Stuttgart, 1955).

[99] Heinrich Popitz et al., *Technik und Industriearbeit.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n der Hüttenindustrie* (Tübingen, 1957) and *Das Gesellschaftsbild des Arbeiters.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n der Hüttenindustrie* (Tübingen, 1957).

[100] *Der entfremdete Mensch. Zeitkri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

- [101] *Betriebsklima*, p. 103.
- [102] *Betriebsklima*, pp. 15–16.
- [103] Popitz et al., *Das Gesellschaftsbild des Arbeiters*, p. 153.
- [104] *Ibid.*, p. 154.
- [105] *Ibid.*, p. 156.
- [106] Cf. Oskar Negt, *Soziologische Phantasie und exemplarisches Lernen. Zur Theorie der Arbeiterbildung* (Frankfurt am Main, 1968, expanded edn 1971), p. 45.
- [107] Adorno to Horkheimer, 3 September 1955.
- [108] 本书的副标题“德意志意识形态”让人想起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后在英文译本中被去掉了。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 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k Will (London, 1973) .
- [109] On this point, and on Horkheimer in general in the post-war period, see Gunzelin Schmid Noerr, ‘Kritische Theorie in der Nachkriegsgesellschaft’, 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Frankfurt am Main, 1985), p. 457.
- [110] Theodor W. Adorno, ‘Teamwork in der Sozialforschung’,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pp. 494–5.
- [111] *Ibid.*, pp. 496–7.
- [112] *Ibid.*, pp. 409–10.
- [113] Marcuse to Horkheimer, 26 November 1951.
- [114] Horkheimer to Adorno, 1 September 1954.
- [115] Horkheimer to Adorno, 10 September 1954.
- [116] Marcuse to Horkheimer, 11 December 1954.
- [117] Adorno to Horkheimer, Frankfurt am Main, 30 August 1955.
- [118] Adorno to Marcuse, 16 July 1957.
- [119]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 36, 35. 中译本参看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页。
- [120] *Ibid.*, pp. 80–1. 中文版参见第56页。
- [121] *Ibid.*, p. 43. 中文版参见第27页，此处译文有改动。
- [122]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trans. Neville Plaice, 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 (Oxford, 1986), 3 vols.
- [123]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 166. 中文版参见第98–100页，此处译文有改动。
- [124] *Ibid.*, pp. 235–6. 中文版参见第174页，此处译文有改动。

- [125] Ibid., pp. 15–16, 18. 中文版参见第 6–8 页。
- [126] Ibid., pp. 216–17, 220. 中文版参见第 159–160 页。
- [127]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Frankfurt am Main, 1974), p. 122; cf.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trans. Anne G. Mitchell and Wesley V. Bloomster (New York, 1973), p. 129.
- [128] Theodor W. Adorno, 'Die revidierte Psychoanalyse',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 [129] Adorno to Lowenthal, 8 December 1954; in Leo Lowenthal, *Schriften*, ed. Helmut Dubiel, vol. 4; *Judaica, Vorträge, Briefe* (Frankfurt am Main, 1984), p. 178.
- [130] Adorno to Horkheimer, 4 September 1941.
- [131]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Boston, 1960), p. 295.
- [132] Adorno, *Minima Moralia*, trans. E. F. N. Jephcott, p. 247.
- [133] Horkheimer to Adorno, 14 September 1941.
- [134] Adorno to Horkheimer, 23 September 1941.
- [135] On this topic, cf. Gunzelin Schmid Noerr, 'Wahrheit, Macht und Sprache', in Alfred Schmidt and Norbert Altwicker (eds), *Max Horkheimer heute; Werk und Wirk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pp. 349–70.
- [136] Max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8 (1939), pp. 115–37.

### 作为独立的跨学科研究者——走向偶然音乐<sup>\*</sup>，以及其他领域中的相应方法

阿多诺通过他的《新音乐哲学》，建立了一种指向历史哲学的音乐美学传统。他在联邦德国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出版的大部分书，讨论的都是音乐：《新音乐哲学》（1949）、《寻找瓦格纳》（1952）、《不谐和音》（1956）和《音质形象》（1959）。<sup>[1]</sup>《现代音乐哲学》和《不谐和音》于1958年出了第二版。1952年于达姆施塔特首次提交的演讲“论音乐教育”，打击了“青年音乐”的支持者们，后者早在1950年代就在呼唤一种复活的“新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sup>[2]</sup>作为勋伯格派一名经验丰富的捍卫者和超一流的鉴赏家，阿多诺是在达姆施塔特举办的讨论新音乐<sup>[3]</sup>的国际假期课程的重要参与者，他在那里遇到了先锋派。他将达姆施塔特共同体研究从失败中救了回来，直至1950年代在社会研究所参与经验研究，而且通过他的众多演讲和文章使批判社会研究的思想保持了活力。他的广播谈话“诗和社会”，1951年在柏林由RIAS（在美洲区）播出，在联邦德国开创了一种依据批判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新方法，而当时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还是以内在论和存在

---

\* “偶然音乐”：法语 *musique informelle*。——中译者注

论为依据的阐释。在《伦理随想录》中，他树立了“非纯粹的”、格言式的哲学的典范，那在1950年代是独一无二的。与此相应，他在1956年出版了他在英国时就开始的对于胡塞尔的研究成果：《反对认识论：元批判——胡塞尔和现象学矛盾研究》(*Against Epistemology: A Metacritique-Studies in Husserl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Antinomies*)<sup>[4]</sup>，这是一本符合严格学术规范的著作。通过1955年出版的《棱镜：社会和文化批判》，<sup>[5]</sup>他更提供了能最清晰地表现他的思想的多样性和个性的证据——这使他必须冒在他那些从事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同事当中失掉名誉的危险，如同齐奥尔格·西美尔在他那个时代所处的境遇一样。阿多诺的音乐作曲——大部分写于1945年之前，而且大都由带有钢琴伴奏的联篇歌曲所组成，从1950年代起被越来越频繁地演奏。他只发表了少数论文学的文章，而且只在一些无名的杂志或以笔名发表。他所写的大多数东西都是随笔和演讲，发表在面向普通公众的期刊——如《法兰克福杂志》、《新评论》或《墨丘利》——和普及性著作当中，而不是专业的著作和期刊当中。他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广播谈话而写的。

宽泛地说，这应该是阿多诺给了解他在1950年代整个行为光谱的那些人留下的印象。但是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人们只注意到了其中的某些方面，尽管在阿登纳任总理的那段令人窒息的时期，这些方面提供了持久的希望之光。生于1922年的彼得·布鲁克纳 (Peter Brückner)，是一位稍后在学生运动方面成为重要人物的左翼知识分子。他描述了自己对于1950年代的记忆：

在我的大学时代快要结束之时，我发现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写的一些东西，我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或以什么方式发现的；但我还是记住了“米彻尔利希”(Mitscherlich)这个名字。直至1950年代中期以前，我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放不下阿多诺的《伦理随想录》，以及他随后所写的关于音乐社会学的文章——“法兰克福学派”成为我整个教育过程中的特有经历。但是，就像我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一样，这是一件多多少少带有私人色彩的事情。<sup>[6]</sup>

奥斯卡·耐格特 (Oskar Negt) 生于 1934 年, 后来师从阿多诺, 获博士学位, 并且促进了继续开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 他非常不愿意学习法律, 于 1955—1956 年冬天从哥廷根来到法兰克福学习哲学。他满怀着好奇心地去听阿多诺的演讲。“他在古老而破旧的生物学演讲厅谈论美学。这些东西听起来全部都很陌生, 像炼金术般的未知, 它激起了我的抗拒, 因为将一片抽象的沙漠更换为另一片抽象化的沙漠正好不是我所期望的东西。”多亏有霍克海默, 才让耐格特不至于再次卷铺盖离开法兰克福去往慕尼黑, 耐格特觉得那里提供的哲学似乎涵盖面更广, 思想更开明:

【霍克海默】所做演讲对他的听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能马上激发起他们的信心, 从一种观念的最细微的思路着手, 扭转并转换它, 使其成为可理解的思想。在哲学理论领域, 霍克海默也同样是一个创业者, 他谨慎地组织材料, 而且正好知道如何使用同情心和魅力去吸引人们的兴趣。他这些方面的天赋具有相当的优势。另一方面, 阿多诺却把人都吓跑了, 他拒绝将他的听众看作一种媒介, 而且, 尽管对客体的坚持和调解是他的辩证思想的核心话题, 但是他拒绝为教学目标建立桥梁, 拒绝当一名集市上的哲学家……霍克海默是创业者, 布洛赫是政治预言者和讲故事的人; 阿多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钟表匠。<sup>[7]</sup>

510

而出生于 1929 年的于尔根·哈贝马斯, 则是带着博士论文并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从波恩来到法兰克福的。他熟悉当代的哲学情境, 但他后来回忆说那时他根本不可能对那种连贯的信条即“批判理论”有任何了解。“阿多诺写一些文化批评的文章, 发表一些对黑格尔的讨论。他表现出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就这些。”但后来, “当我第一次见到阿多诺, 看到他是那样激动地突然开始谈商品拜物教, 看到他是怎样将概念运用于文化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的时候, 我立即被震撼了。随后我

想：试着去做吧，就仿佛（阿多诺以同样正统的方式在谈论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同代人。”<sup>[8]</sup> 《时代》（*Die Zeit*）周刊——这份刊物那时候在政治上属右翼，已经发表过卡尔·施米特等人的文章——“文学增刊”的一位编辑，在未告知评论作者的情况下给一篇评论阿多诺《棱镜》的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大意是：法兰克福的社会学家“魏森格隆德—阿多诺”是“‘无阶级社会’的宣传员”。<sup>[9]</sup> 这表明反共产主义者的恼怒反应激烈到了何种的程度，即使他们矛头所指的这个人在1953年的反共杂志《月刊》上还发表过“被保姆牵着的音乐”<sup>[10]</sup> 之类的文章，明确表达过自己对“东方的文化管家”和“边界那边”掌权的“专政”的批判。

阿多诺的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极富教育和启迪作用，他甚至爱不释手，却让另一个人留下一种令人不快的炼金术般难解的印象，而在第三个人看来却又为他提供了能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视为同代人的那种令其激动不已的前景，但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此书又带有上流社会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意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阿多诺自1920年代以后的所有著作都表现出这一特性：他习惯于融苦痛与浪漫精神于一体；习惯于将艺术品的社会阐释和阐释社会结合起来，对社会的阐释恰恰以艺术品所包蕴的对幸福的预示为准绳；习惯于把能够清楚说出苦难而产生的快乐和受虐狂式否定快乐的可能所产生的痛苦结合起来；习惯于将大灾难理论与自由的、深奥的和热烈的气息结合在一起。

511 这些讨论……只关注音乐问题。纯粹的对位法问题在其中引发了诸多无法解决的冲突的这样一个总体世界，应该怎样来建构？当今生活的颤栗和僵化连这样一个不受经验必需性影响的领域——人类希望在其中找到一个可以摆脱可怖规范之存在的避难所，可见生活的根基是多么紊乱失调。<sup>[11]</sup>

阿多诺在1948年夏天写于洛杉矶《新音乐哲学》的前言当中，用这个说法想预先消除那些对他的这本书的批评——那些批评在他看来非常明显而且重要：首先，在欧洲发生过这一切事情之后，在所有这些事情

依然有迹象表明会发生之时，将时间和学术精力用于推敲现代作曲技巧等深奥问题，这显得有些玩世不恭；其次，书中那些有关艺术的深奥论断经常宣称与现实有着直接关联，而现实却对这些论断没有丝毫的兴趣，此时这纯粹是一种挑衅。他如此思想，以至于所有因这种思想而存在的事物无不是人类命运的证明，无不攸关人类的命运。这一点最能清楚地说明，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人们去拥护阿多诺而反对其他人。《伦理随想录》（阿多诺的反犹同事曾在致歉信中对这本书作了这样的评论，他说，就像阿多诺出版的许多作品一样，他“不喜欢它这本书，或者说并不认为它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中写于1944年的一条格言“不要敲击”这样说：

技术使得各种表情和姿态精确而粗暴，同时使人也变成那个样子。它驱走了一切显得犹豫、深思熟虑和礼貌的活动……因此，这种能力，比方说，轻缓、慎重但牢固地把门关上的能力丧失了。汽车和冰箱的门总是被砰砰地关上，其他东西的门自己也容易啪地被摔上，那些进门的人就这样养成了从来不回头看的坏习惯，也不去保护那些接待了他们的房间的内部。没有可以向外推开的平开竖铰链窗户，只有可以猛推的滑动窗体，没有和缓的门闩，只有转动的把手，街前的房子没有前院和门阶，没有环绕着花园的围墙，这对于主体意味着什么呢？而且，哪个驾驶员不是纯粹因为受了他的发动机的威力的诱惑，便去碾死街上的害虫、行人、孩子和骑自行车的人呢？运转的机器要求使用它们的人先具备法西斯主义的所表现出的猛烈的、强有力的和动荡的痉挛状态。<sup>[12]</sup>

阿多诺目睹了整个的大灾难，也看见了人类的所有希望，而且在他讨论的每一个话题中都集聚了这些灾难和希望。他的哲学探讨因此呈现出某种夸大的和毁灭性的色彩，没有给那些温和的事物留下自由的空间。然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他的思想并没有辜负他们对哲学应该具有某种令人敬畏感的期望：不是试图去减轻那种源于哲学的惊异感，而是设

法增强这种感觉；它结合了当代艺术中许多最大胆的因素，旨在沉思中进一步扩充这些因素。

512 在一封庆祝霍克海默 70 岁生日的公开信——发表于《时代》周刊，标题为“致霍克海默的公开信”——当中，阿多诺写道：

尽管有一种冲动使得我着迷于对艺术和当今艺术的可能性进行阐释，在这种冲动当中有某些客观方面也在设法阐释自身——这种冲动是考虑于社会中的各种明显趋向，对于纯真审美行为不足的疑虑，但就我早年所受的训练和早期的发展来说，我还是一个艺术家，一位音乐家。

阿多诺返回德国时所遇到的情况，对于他作为一个音乐理论家所开展的活动是非常有利的。在 1940 年代后期，西德开始成为先锋音乐的焦点。这一事件包括：在达姆施塔特举办关于新音乐的国际假期课程，在联邦各州的公共广播系统设立的深夜音乐节目，多瑙厄申根（Donauerschingen）音乐节，慕尼黑的万岁室内乐团（Musica Viva），它们使联邦共和国成为新音乐的胜地。这些发展的原因与迅速成功的维也纳学派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勒内·雷伯韦兹（Rene Leibowitz）在 1948 年第一次参加了达姆施塔特的课程。他已经在安东·魏伯恩的指导下学习，而且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通过组织一些违法的演出、分发乐谱和他自己的作曲，设法在那儿建立了维也纳学派。他对于勋伯格和魏伯恩的作品以及他自己的十二音阶音乐的演奏，在战后德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在 1949 年出版之后，这部著作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为这场大势已成的音乐运动提供了支持。阿多诺在他返回德国后的每个夏天都参加达姆施塔特的课程，或者作为课程的指导者，或者作为讨论的参与者。

但是，他现在并没有成为这场音乐运动——既吸收了十二音阶的技巧，也吸收了《新音乐哲学》对它所做的批评——的学术先锋；也决不会成为通过十二音列作曲法的艰苦训练而进入自由王国的一场音乐运

动的领导人。相反，在勋伯格之后，轮到魏伯恩被偶像化了。在十二音体系的音乐之后，序列音乐（serial music）现在变成了音乐先锋派的口头禅。不只是音符的高度，还有它的长度、音量、音调、节奏以及作品的所有因素——从物理学借来的“参数”这个术语就是为这些因素确立的——现在也受制于序列原则。依照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那些将“革命的”勋伯格与“反动的”斯特拉文斯基区别开来的方面，即“对整个音乐材料进行合理整体组织的观念，<sup>[13]</sup>都被系统地激进化了。阿多诺所做的明显矛盾的解释的另一面被忽略了：理性的客观性对于现代艺术品来说仍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只有在艺术品作为主观性产物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阿多诺 1956 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不谐和音：管控世界中的音乐》<sup>[14]</sup>，是他在 1950 年代最为尖锐的著作。除了两篇较早写成的文章而外，还包括从 1950 年代起写的两篇：“音乐家的批评”和“新音乐的老化”。<sup>[15]</sup>这两篇文章批评了如下两种互补的现象：一方面，通过那些吹捧“青年音乐”的人的“群体”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序列工程师”，排除了主体，也排除了所有的表达形式。阿多诺因而察觉到，在音乐领域出现的这一现象也在哲学和社会学当中有着对应现象：存在论和实证论、意识形态的思辨和实证论的经验主义，它们相互补充，呈现为某种客观主义的变体——纷纷给已经倒在地上的主体、个体再踢上一脚。

但如果序列音乐——不仅在西德而且在国际上也被看作是最先进的形式——是一个“进入体系中的航程”，那么它是不是并不一定会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呢？事实证明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而且阿多诺在依据意识形态批判去判断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时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广播公司在 1950 年代注意到了听众对于新音乐的大量渴求。但是它被安排在深夜的广播节目中，听众主要是数量很少的一些专家和乐迷。“一封漂流瓶中的信，没有收信人”，这是对当时音乐状况的描述，这种描述不无某种自我满足和自傲。<sup>[16]</sup>序列法作曲家似乎认为《新音乐哲学》是对这种观点的确证，即他们正实践着这样一种音乐，它“依然真正忠诚于它自己的标准，根本不在乎自己产生的影响”。《新音乐哲

学》被当成了象牙之塔的证明，这座象牙塔因与纳粹主义手中产生的音乐体制化截然相反而大受欢迎，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阿多诺认为艺术已经迷失了方向，变成了意识形态。然而，“只要艺术仍然像人类的声音那样发出战栗声”，<sup>[17]</sup>他就面临着一个区分的难题，即如何区分那种包容残暴的艺术与坚决同非人道相对立的残酷艺术 (inhuman art)。他给出的答案源自他思想中一贯的中心主题：所有救赎都将来自僵化进程的加剧，但同时所有救赎也要依靠还残余的主体性和自发性。然而如何去辨认主体性在艺术品当中的这种残余、这种微小的残留呢？通过艺术品包含一种非机械的、活生生的元素这一事实来辨认——这是阿多诺同义反复式的回答。

514 阿多诺试图为这种对活生生的元素的需求提供多少有些先验论色彩的理据，并视其为音乐的某种可能性的条件。但是，这同样也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标准把接受既定状况的“就是如此”的那种态度同对这些状况的坚决反对的态度区别开来。在他对于斯特拉文斯基的批评中，他试图证实自己的立场：

音乐作为一门在时间之内发生的艺术，受时间连续性所要求的特定媒介形式所限制。因此，它像时间那样，是不能还原的。从一开始，它就已经致力于自身的延续，致力于成为新东西，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自身。音乐中可以被称为卓越的东西就是这种方式，即在每一时刻，它已经成为某种东西——某种不同于它自己的东西。音乐这种指向超越自身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强加于它的形而上的法则，而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根本特性……即使在它处于客观的绝望 (objective despair) 状态之时，它也不放弃反神话 (anti-mythological) 的本质，它将绝望转变成自己的关注点。音乐并不确保他者的存在；但是，声音同样也不能逃避它已经允诺那种存在这一事实。自由本身是音乐的一种内在需要。那是它的辩证本质。或许是因为客观的绝望具有超强的威力，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否认音乐对于自由的承诺——摆脱最宏大的主题，那种迫使音乐突然静寂下来的主题。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他所写的实际上就是被抑制的音乐。但他的音乐不能忍受会有人没有希望这种观念——所以他的音乐越是密集地安排自身，它反而越不能做到这一点。<sup>[18]</sup>

序列音乐的两位坚决的支持者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 和皮埃尔·布莱茨 (Pierre Boulez) 1957 年在达姆施塔特成了当代音乐史新阶段开端的标志：施托克豪森创作出新的《第 14 号钢琴曲》，布莱茨发表了题为“*Alea*”（“掷骰子”）的演讲。这个新阶段被称为偶然音乐 (aleatoric music) 阶段。偶然，意味着作曲和阐释都需要偶然的因素：比如，作曲的某些部分可以互换，或者可以在演奏中对作曲家只以草稿方式记录的部分展开自由的阐释。偶然音乐包含着达达主义 (Dadaism) 和禅宗佛教的元素，这主要是由约翰·凯奇 (John Cage) 和毛里西奥·卡赫尔 (Mauricio Kagel) 引入的。凯奇在 1958 年通过为 12 家电台演奏他自己的《想像的风景第 4 号》，对序列音乐的正统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击。这部作品还像使用正常乐器那样按着四四拍演奏，创造了一种“有秩序的混乱”。<sup>[19]</sup>

阿多诺把这种发展解释为反主观主义的序列音乐的自我批判。他更加倾向于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一发展，因为“新音乐的老化”已经被有些人错误地理解为是对音乐结构和音乐理性的批评。他因此乐于将新潮流当作朝自我反思的方向推进音乐作品的事物来接受，而且将自己变成了这种音乐的先锋思想家。在 1960 年的一个名为“维也纳”的广播节目中，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坚持客观构造的形式把主体拉入那种形式当中，而新古典主义的暧昧形式却以把主体猛烈驱除出去的方式篡夺了它的合法性”。在广播中，他同样欢迎当代音乐，认为它将第二代维也纳学派从陈腐和小资产阶级成分中解放了出来，它是一种解放的先进方式。作为一名喜欢辩论的思想家，他承认自己同情那种自作主张运用组织技巧的意愿。“在管控世界中，不同的东西只有运用管理的方法，才能经受得住冬天的考验，才能发现它自己的声音。对一种宗派主义已成普遍法则的文化当中的所谓小圈子表达厌恶，多少显得有点虚

515

伪。”他乐于接受这样的事实：最先进的音乐最终已经摆脱了时尚的禁忌。

音乐第一次主动地把一直只能以客观方式达到的、高居于作品自身之上的东西吸纳进了自身之中，这种东西就是美学真实的历史价值——美学真实并不像历史主义所说的那样嵌入在时间当中，而是时间本身就居于其中……因此，嘲笑那种与本世纪前半叶发展速度相比就像飞驰一样的发展速度，或者嘲笑新近的各种思潮趋向在改变它们渴望为之献身的那些口号时呈现出的疯狂速度，都是愚蠢的。高雅艺术似乎正在放弃它的角色，不再拜物教式地断言自己具有恒久价值。与此同时，它也用它自己的速度批判自身。新音乐形成体系的发展过程——十二音阶技法的确立——为它奠定了独断的基础，这一基础不单单服从客观法则，而且从外部把这种法则强加于它。只要这种体系不再严肃地声称自己的合法性，只要它在衰落，并接受自己的衰落，这种独断基础中的毒害就会减弱。在实践中，它正在变成与现代伟大艺术体系——立体派的情形相似的状况：不是变成本质本身，而是变成被解放了的意识的紧身衣。把随意吸收而为法则的作曲家们，渴望一次又一次地打破规则的魔咒。<sup>[20]</sup>

1961年夏，阿多诺在克兰尼希施泰因（Kranichstein）举办的讲座上试图指明最近音乐所应遵从的方向：它应“vers une musique informelle”（向一种偶然音乐）、向着“自由的音乐风格”发展，应该重新制定后序列音乐阶段的规划，来发展一种自由无调音乐。爱德华·施托伊尔曼和恩斯特·克雷内克（Ernst Krenek）对此非常吃惊。施托伊尔曼是阿多诺在维也纳时的钢琴老师和勋伯格派的重要阐释者之一，而恩斯特·克雷内克1920年代以来就参与阿多诺的讨论，尽管未形成流派但也是最伟大的现代作曲家之一。“你又一次成了年轻人，与所有最新潮流打成一片，而我已是老人——一个保守派，”施托伊尔曼在阿多诺

60岁生日时给他写信时这么说。<sup>[21]</sup>而克雷内克写的信则显得非常暴躁：

音乐哲学家……被摒息倾听，当他跳跃、跃进登陆先锋领地之时他被当作盟友受到了欢迎——这与作曲家不同。作曲家如果登陆那里，他就会发现自己涉嫌“或多或少被迫抓住新近出现的事物，以便不被丢到垃圾堆里去”。<sup>[22]</sup>

阿多诺对勋伯格、贝尔格、魏伯恩的热爱从未改变，他一次又一次地特别提到他们，并从他们那里获得自己的方向。施托伊尔曼和克雷内克两人对此都未予重视。不过，阿多诺与先锋音乐最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确令人吃惊。他呼吁“重新开始那一进程，该进程被勋伯格以他了不起的创新（也就是十二音阶技法）抑制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推进了它”，再一次呼吁“坚定支持未修正的、不妥协的自由之理念”。<sup>[23]</sup>然而这不可能像重现1910年的风格那么简单。“人们不能以那个时代最为大胆的作品——勋伯格最有创造力的作品——的风格来继续创作。”当音乐获得自由之时，而且当追随那一风格的东西只会再次废止自由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要继续以那种风格来创作呢？

过去的残余，比如自由无调性的半音阶元素，在材料的内在要求未被充分认识的情况下，较之于以往更加难以被容忍……正是勋伯格发现了无调音乐和勋伯格十二音阶音乐中的整体节奏结构和韵律结构，正是他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调性。这一点现在决不该被忘记；前后不一致不应该被容忍。<sup>[24]</sup>

尽管1950年代的阿多诺将序列技法当作一个与排除音乐意义和“构成性”（composedness）密切相关的体系，但到了1960年代，他则认为这种体系是音乐生产力的一种进步，控制了素材，具备了区分正确与错误的东西的能力——简言之，它是一个应受欢迎的启蒙过程。

在克兰尼希施泰因这个地方，我创作出自己刚好构想出的一部乐曲，其目的就是要在避免音乐确定性的情况下统一所有起作用的因素，并且这样问，“在这儿哪是先行部分，哪又是后续部分呢？”这是不恰当的。当代音乐不能受那些看起来与主题和延长部一样普遍的范畴——好像它们是不可改变似的——的强行约束。不必强行规定，它不必先验地 [a priori] 非要包括这类传统的元素，乃至像紧张、紧张的解决、延长部、展开、对立、确证等段落。更糟糕的是，在新素材中缅怀这些范畴常常会造成严重的不协调，那些本来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的东西反而被当作错误纠正了。<sup>[25]</sup>

难道留给人们的不只剩下可以控制的音调的组合了吗？或许通过使用传统的形式，或者那些净化了人的各种直观触觉的声音，这些音调本来可以具有它们所被赋予的超验力量，就像那些受到禅宗启示的作曲家所做的那样。这不就是被阿多诺多年以来诊断为社会中的个体被削弱的那种情况么？在这个社会中，作曲家也会受到影响。阿多诺本人就说过：“在现阶段的人类学当中，对非修正主义 (non-revisionist) 音乐的要求乃是一种过分的期待。”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当代艺术的“禁忌困境”。然而也正是在音乐中，他看到了目前可以获得成功的第三条道路的机遇。

他举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表明他的想法——他在这儿又一次回到了勋伯格。在《期待》(Erwartung) 和与之关系最紧密的其他作品当中，勋伯格显然认为对母题和主题的处理是“相对音乐本身的自发溢流而言的某种外在东西，是某种操作形式”，就如序列决定论自 1950 年代后半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操纵形式一样。

这样一来，无主题的构造 (athematic fibre) 统摄着独角戏的始终。这种构造不仅仅把自己托付给偶然，而是在自身之内积极地保存着母题和主题的精神。对于主题和主旋律的处理因此而改变：

它被扩展了。新的观念出现了……涵盖了每一种这样的音乐：这种音乐在局部的、相对独立的复合部分之间制造连接，虽然没有可被察觉的相似性和变奏，但使这些部分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引人注目地凸现出来。同时，也不是严格地摒弃了这些相似性和变奏，它们时常通过最审慎的可能方式而得到提示。出现在这类音乐当中的动力和关系并不以任何预定的或高于一切的秩序为先决条件，甚至也不以诸如主题原则这样的法则为先决条件，相反地从自身内部创造出连贯性。在这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主题的后裔，尽管主题在它们那里仅仅通过未展开的方式——即便不会间隔性地重复——而得到处理。<sup>[26]</sup>

这个例子具有启发性。诸如“音乐的自发溢流”或者“这类音乐当中的动力和关系……从自身内部创造出连贯性”的措辞抛弃了理论的自负，并用毫不隐瞒的隐喻作为理解的辅助。除此之外，这个例子展现了这样一种努力：试图对能从一段乐曲中习得的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清晰表述，以期有助于解决当前的作曲难题：积累的经验以及对难题具体的感受使实践的解决成为可能。那种能达成这种解决方式的路径，只可以在回顾时才能被描述出来，甚至只能以一种非常不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是阿多诺想探讨得更深入一些：他想要详细说明达到“自由的音乐风格”的办法。他提出的方法回应了前面提到的他在克兰尼希施泰因的那些经验，这种方法就是：“使用新素材作为标准”而让旧有音乐学范畴的“对等物”“得到发展，从而使旧素材中的那些旧范畴不合理地表现的东西——它们因此很快就变得不充分了——在透明的范畴中得到表现”。<sup>[27]</sup>可是，阿多诺在定义这些对等物的时候从来都只是这么说——它们只能由可以从材料中听出内在趋向的“作曲的耳朵”来确定。因此，像《新音乐哲学》所展现的，他的理论努力可以归结为诉诸有教养的天性因素的存在。对“作曲的耳朵”的这种诉求，也是阿多诺对一种由来已久的著名说法——雕塑家可以自由地砍凿出那些隐藏在石头里

的艺术形象——的一种发挥性的阐释。

在“通向一种偶然音乐” (*Vers une musique informelle*) ——这是继《新音乐哲学》之后阿多诺最重要的音乐理论作品——当中，他把自己全部主题引发的争论整个交给读者去自由思考。僵化的精神 [Geist] 和被压抑的自然之间的毁灭辩证法 (*fatal dialectic*)，必须被富于启发性的精神和充实的自然之间的、摆脱了支配的辩证法所取代。僵化的精神是被断开的自然的碎片，它在自身内包含自然萌芽的条件下才会存在；因此只要它存在，它也就包含着改进的潜能。被压抑的自然盲目的；它包含着对光明的渴望，而只有通过精神才能点燃那点光亮。阿多诺那些主题的整个浪漫主义问题式 (*Romantic problematic*) 就这样包含在这种分析当中，体现在音乐美学——关于当代音乐和当代音乐前景的音乐美学——之中。从历史哲学出发，他也得出了对主体予以祛神话化 (*de-mythologization*) 和予以清算的辩证法，得出了地狱音乐和天堂音乐、黑暗音乐和自由音乐之间的神学辩证法；此外，他还指出了一个问题，即在耳朵自发性地听——这种听在过去往往被误解——的时候人们如何去认识，以及在这种自发性当中人们怎样才能辨认出哪个方向是素材希望遵循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把作曲家未知的本性和素材中未知的本性之间的关联性当作最根本的基础，或者，主体之间就温和的操作形式所达成的不断出错的一致是不是最后的定论。就后一种情形而言，问题就源于那种能促使这些主体达成一致、促使他们去关注温和的东西。

对这种音乐的“大胆思考”被充分哲学化了，这种思考对于阐明“冒险式作曲”<sup>[28]</sup>理论的诉求是显然是必需的，对于赋予那些被一般公认的智慧以新鲜的关注也是必需的，而在当时，还没有其他人像阿多诺这样重视这些公认的智慧。

## 文学笔记

在绘画和文学方面，西德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达姆施塔特学派的学派，也没有能够形成国际先锋派的团体。由威廉·波密斯特 (Willi Baumeister)、弗里兹·温特 (Fritz Winter) 和鲁普雷希特·盖格尔 (Rupprecht Geiger) 发起的慕尼黑“禅宗 49”团体，只反映出了德国人在抽象绘画领域不甘落伍的需要。具象诗 (concrete poetry) 的支持者大都在杂志上发表他们的“文本”，这体现了文学非常有限的一个方面，甚至只能体现他们自己的兴趣。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在联邦德国非常少见，甚至只残存于那些有争议的孤独者们专属的领域。沃尔夫冈·科本 (Wolfgang Koeppen) 的小说《草中鸽》(1951) (*Tauben im Gras*)、《温室》(1953) (*Das Treibhaus*) 和《罗马之死》(1954) (*Der Tod in Rom*)，在技巧、形式和语言方面均得益于福克纳 (Faulkner)、乔伊斯 (Joyce) 和多斯·帕索斯 (Dos Passos)，而且同时表现了与纳粹创伤、德国战后重建相应的精神反应，但也带有明显抑制过去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的特征。科本的书如他自己所述，充满着“恐惧和无望”，但是却被赋予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政治解释。《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 对《温室》所作的评论是：“你只能用火钳子来握住这本书。”科本在 1933 年之后进入冬眠状态，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国外，就像阿多诺好些年的处境一样，但是他没有移民。在 1930 年代中期，他甚至出版过两部小说，其中第二部《摇摇欲坠的围墙》(*Die Mauer schwankt*) 是由犹太出版商布洛诺·卡西尔 (Bruno Cassirer) 出版的，这个公司的所有者在 1935 年停止了业务。在战争期间，科本在美国既没有钱也没有朋友，只能求助于电影工业。在联邦德国他依然孤独。他不属于任何的圈子；他不也不能构成任何流派。

汉斯·亨尼·雅恩 (Hans Henny Jahnn) 的情形也与此相似。1920 年代，他发表了几部遭到激烈批评的戏剧，<sup>[29]</sup> 以及一部非常独特的表现主义小说《佩鲁德加》(*Perrudja*)。到 1933 年，他的书立刻被禁。雅恩漂泊到丹麦，在波恩荷尔摩岛 (Bornholm) 上生活。1949 年和 1950 年，他出

版了《船》(*Das Holzschiff*)<sup>[30]</sup>和两卷本的《古斯塔夫·安尼阿斯·霍恩在他四十九岁之后留下的笔记》(*Niederschrift des Gustav Anias Winde-Horn nachdem er 49 Jahre alt geworden war*)。这两部小说构成了忧郁而松散的小说三部曲《无涯之河》(*Fluss ohne Ufer*)的前奏和主要部分。

520 1956年又有小说《铅之夜》(*Die Nacht aus Blei*)面世。在1950年代,雅恩,这位风琴制造者、荷尔蒙研究者和早期音乐的编者,也是一位批判残忍虐待动物和灭绝种群的批评家,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贡献给了反对原子弹的斗争。在联邦德国进行“修复”(Restauratorium)<sup>[31]</sup>的环境中,他也是一名注定要失败的孤独战士。1950年,阿多诺和雅恩可能在达姆施塔特“我们时代的人的形象”的讨论会上见过面。如果他们真的见过,那么,尽管他们在批判文明的激进性方面很接近,都诉诸本能与思想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在人性之中重新思考人作为受造物的一部分所具有的行为方式,但雅恩在细腻方面的欠缺以及他拒绝向舆论和社会礼俗让步的态度,至多只能让阿多诺感到震惊。虽然雅恩算是《启蒙辩证法》和《伦理随想录》所期望的一位孤独者,但实际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确被这类人吓着了。<sup>[32]</sup>

因此,并不只是因为阿多诺的注意力和精力确实有限,还由于他只想在艺术中遵循自己的爱好,所以在1950年代期间,他满足于谨慎确保自己从历史哲学和社会角度出发对艺术品的阐释能得到承认,这一点与在西德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占支配地位的其他思潮有着显著的差别。他以现代经典和某些现代主义的先驱为例来说明他的阐释。

“抒情诗与社会(Lyrik und Gesellschaft)”是阿多诺所做的一个演讲,在1951年到1958年之间出版了各种版本;这个演讲在某种程度上是“音乐的社会地位”<sup>[33]</sup>的翻版,后者更加平和,而且更为谨慎地介入到了文学论争当中(《论流行音乐》除外,此篇是阿多诺发表于《社会研究学刊》当中的惟一一篇没有在西德再版的文章)。阿多诺再一次提出了他早前受黑格尔和卢卡奇的美学历史化的激发而产生的思想,而后者对于1950年代的西德来说还是相当新鲜的。他认为从社会角度解释诗就意味着把诗当作“历史哲学的日晷”来读;当作“艺术作品内部

包含着矛盾的统一体即社会整体”的显现来读；当作对于“处于主观的……精神之内的个人与社会的历史关系”<sup>[34]</sup>的表现来读。阿多诺用艺术家和艺术哲学家的熟悉格言来表达思想的方式再次出现了：诗歌必须充满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带着“向苦难和梦想相结合的范围”摸索的梦想来写，同时为如下事实——“只要梦想没有破灭，和平就可能实现”——提供佐证。<sup>[35]</sup>诗歌的写作同时必须将自身沉浸于自己的个性当中，以便摆脱自我的局限并共享语言的魅力，把语言当作共同的潜在情绪、仁爱的通则以及未被扭曲的人性的特定媒介。<sup>[36]</sup>

阿多诺把从诗集《第七圈》(*Der siebte Ring*)中选出来的两首诗——爱德华·默里克 (Eduard Mörike) 的“一次徒步之旅 (Auf einer Wanderung)”和斯泰凡·格奥尔格 (Stefan George) 的“风的喧闹声中” (Im windes-weben) ——当作例证，揭示了什么叫做通过从社会角度解释一首诗来确认这首诗所记录的历史阶段。他在默里克的诗中发现了一个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里，抒情诗只有作为对生活直观性梦想的一种不足信的、脆弱的诉求时才能继续存在——由于生活所处的社会越来越明显地破坏着这个梦想。抒情诗面对在激发这种梦想方面日益增多的困难，通过参与一个对以前用以保持这种梦想的手段进行纯化和强化的过程，已经对此作出了反应。

这个有点忧郁症的克莱弗尔楚尔茨巴赫 (Cleversulzbach) 教区的牧师\*，通常被人们视为质朴的艺术家，他的诗篇是大师级的杰作，没有一位艺术至上的大师的作品能出其右。他熟知崇高风格所具有的空洞性和意识形态性，也同样熟悉 19 世纪比德迈耶尔时期的低俗风格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迟钝和对总体性的漠视——而他的大多数诗篇都写于那个时代。崇高的风格推动他的才智去再一次创造一些意象，这些意象既不会让人联想到客厅或酒店，也不会

---

\* 这里这个诗人指爱德华·默里克。默里克在 1834 年到 1843 年之间是克莱弗尔楚尔茨巴赫教区的牧师。——中译者注

让人想起喧嚣吵闹或唠唠叨叨。崇高在风格中的最后回响正在他那里逐渐淡出，仅留下一些回忆；它进退维谷束手无策，但与呈现眼前生活的所有符号产生关联，这些符号在它们自身受到历史潮流责难的特定时刻会承诺支持（promised endorsement）。这两种图景都映入了漫游诗人的眼帘，恰恰在它们逐渐消失之时。他已经融入到逐渐步入工业时代的抒情诗的悖论当中了。<sup>[37]</sup>

大约与阿多诺对默里克的自由体诗“一次徒步之旅”进行阐释的同时，爱弥儿·施泰格尔（Emil Staiger）也发表了对默里克“一盏灯”（Auf eine Lampe）这首诗的阐释，该诗通过抑扬格三音步形式表达了诗意的宁静生活。施泰格尔是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文学批评家，他在1945年后发表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所谓的“对作品进行内在”阐释的权威著作。在纳粹统治之时，这种方法曾经为诸如马克斯·科默莱尔（Max Kommerell）这样的批评家提供了避开意识形态专横要求的途径，而在1945年后，又成了回避那种享有广泛声望的真正的的新思想的一种方法。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yser）撰写了有关这种方法的示范教材，并附有他关于文学研究的导论《语言艺术品》（*The Linguistic Work of Art*），于1948年发表<sup>[38]</sup>。施泰格尔在他首次出版于1946年的《诗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勾勒出一种遵从海德格尔的“基础诗学”——一种研究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的纯粹理念本质的现象学。<sup>[39]</sup>他一方面将这些东西当作适合于一般人之可能性的文学批评术语，另一方面又当作是向诗歌创作提供多重可能性的领域。施泰格尔认为，阐释的任务就是从一首向我们传达着特定美感的诗中去找寻证据，以证明它对我们的吸引力是正当的——即证明“所有的事物在整体之内是如何达成一致的，整体是如何与细节达成一致的”。<sup>[40]</sup>进行这种阐释需要依赖语言学、传记以及思想史和通史——即所谓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施泰格尔所选取的默里克的诗句，让他构想出了这样一位诗人的形象，这位诗人站在两个时代交汇的地方，站在浪漫主义的终点和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麻木令他痛苦——的开端上。

只有他，诗人，从那种不显眼的美中觉察到了它【艺术对象，即灯】。他已经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来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是日常生活让他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谁能抵抗时代的精神？但他思想中高贵的才能仍未被熄灭。这些才能随后被艺术品所触动，同时，当他依然在那里的时候，已经逝去的美丽世界再次复活了，而且似乎再次出现了——我们可以用“神之回忆”（Göttliche Reminiszenz）一诗中的词句来形容：“沉迷于奇异性的魅力当中”。由于诗人自己早已丧失了他与这些事物的亲密性。而美依然让他愉悦，正如他的诗能让我们愉悦一样。我们现在可以在文字的意义之上，依据默里克所处时代的情境来更好地理解快乐。他并不是里面悬挂着灯的房子的主人。那里好像根本再不会有主人了。但是他仍然感觉他在那里居住着，他敢于，或至少有一半敢于将自己看作是传授了秘密知识的人。也许正是这一点造成了痛苦与美的混合，从而为诗提供了魔力。<sup>[41]</sup>

差不多与他具有同样天分的批评家，因此在某些基本的、具体的方面以相同的方式来看待默里克的诗。就阿多诺自己这方面来说，他预料到会受到这样一种批评指责：对落入粗鲁的社会学主义（socialism）的担心使他对诗与社会的关系做了升华处理，结果却到了使这种关系完全消失的程度。施泰格尔明确表示，他不希望让自己对诗歌个体性的、历史性的品质的即时感受受到任何诗学原则的限制。一个批评家正从一种文学社会学当中退却，而另一个却不得不使诗歌直接同它的时代历史联系起来。他们的差别就在这里吗？

施泰格尔的解释是独立自足的。在这种阐释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这样一种情绪，伟大的心灵通过这种情绪可以完满实现其伟大性并接受既有的条件，它是一种对如下事实充满好奇的情绪：“人的生活向人的生活敞开，甚至超越了时空的鸿沟”<sup>[42]</sup>，是在这个高峰和那个高峰之间进行的尼采式的悲悯。阿多诺的解释充满着探索隐藏于艺术表现背后

的方法的躁动。对阿多诺来说，默里克就是他企图要理解的当代人，一位他试图理解的那种方法的先驱者，也是一个再也不能达到的典范。施泰格尔作为一位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也把默里克当作他的榜样来谈论。施泰格尔试图在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对改变了的方法的更好理解——已经改变了的社会较之于默里克所处的那个社会为艺术表现提供了更好的成功机会。阿多诺的解释称不上完全是社会解释，因为支配这种解释的是《启蒙辩证法》中的那种思想：艺术表现方法中更细致的精确性，是由社会进步的矛盾形式引入并因之而成为可能的。但也正是这一点赋予阿多诺的文学理论著作某种程度的社会相关性，使它关注时事并全力以赴在艺术中推动现代主义计划，以之作为对自由社会的期待，这一点正是 1950 年代其他几乎所有关于文学理论的著作所缺乏的东西。

比如，胡戈·弗里德里希 (Hugo Friedrich) 于 1956 年出版的《现代诗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Modern Poetry*) 一书，仅在 1950 年代就售出 60000 册。弗里德里希是位于布莱斯高郡 (Breisgau) 的弗莱堡大学的罗马语言学教授，而且与阿多诺是同代人。他在自己的书中试图揭示现代诗的结构一致性，所用的相关例子是从波德莱尔到 T. S. 艾略特及圣一琼·佩斯 (Saint-John Perse) 等诗人的诗作。他在此书的序言中承认，“我自己并不是先锋派。我对于歌德的喜爱胜于 T. S. 艾略特，但这并不是问题之所在。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才能辨认出现代主义的大胆和坚韧的表征。”<sup>[43]</sup> 他对更早些时候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更确切地说，对占统治地位的趣味认为具有典范性的那些更早些时候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从这种比较中提炼评判标准，希望借以描述他在现代诗中发现的反常元素。他认为现代派表达了对以物质进步为核心的社会的厌恶，对世界进行的科学祛魅活动的厌恶。对这种厌恶以他所描述的“反常”方式展现自身这一事实，弗里德里希只看到这样一种解释：在现代主义杰出代表，如马拉美 (Mallarmé) 那里，“这样一种对世界不满的形式——这种形式恰恰通过它所承受的张力才成为现代的——往往总是从高傲的灵魂当中产生。”至于其他方面，他坚持认为，“体现时代特征

的风格和结构的内在动力正在起着作用”。<sup>[44]</sup> 这种观点是中立化探究的结果，它也是某人的观点，他看不到现代诗歌乃是对戕害他的种种经验的表达，看不到现代诗乃是历史哲学的日晷仪，相反只视之为与并未削弱其有效性的既定传统并存的新奇现象。

这种情形与另一位人物哥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就不同，后者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是现代诗歌及诗歌艺术性和独立性的热情捍卫者，他对于中心的蔑视是毫不掩饰的，而中心的失误甚至已经受到汉斯·塞德迈尔（Hans Sedlmayr）这样保守的艺术理论家的有力谴责。“诗人的话并不捍卫任何观念、任何思想和任何理念：它只存在于自身的表达、风采和气息当中”——这就是他的信条。在1964年写给彼得·林姆考尔夫的一封信（回应他给阿多诺纪念文集所写的稿子）当中，阿多诺这样评价：“从政治上讲，哥特弗里德·本有效忠的暴行，但是在更高的政治意义上，他与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要比其他许多人多些。”<sup>[45]</sup> “更高的政治意义”大概是指“与艺术政治学有关的方面”。524

哥特弗里德·本在1933年把极权主义的政府当作那种与自足的诗歌相匹配的政府来欢迎，而且他还在1933年4月24日所作的一次广播演讲中声明：“让西方出名的所有事情，注定使西方发展，而且甚至在今天还起作用的事情——让我们彻底地搞清——都是在奴隶制国家中创造出来的……历史上有大量的例证表明，法老式的权力被与文化联系起来行使；讴歌这一事实的诗歌如天顶穹隆的星辰般循环出现”。<sup>[46]</sup> 哥特弗里德·本在1948-1949年完成了两部诗集《静力诗》（*Statische Gedichte*）和《醉潮》（*Trunkene Flut*）的修订。他那让人眼花缭乱的演讲和论述文学理论的文章，尤其是1951年在马堡大学所做“诗歌问题”的演讲，被很多青年人欣然接受，并被认为富有启发性和新奇性。1951年10月，他在达姆施塔特被授予格奥尔格·毕特希纳奖（Georg Btichner），仅一年之后，他又通过他的《早期散文和演讲集》的出版完全澄清了这一事实：他认为拥有奴隶的国家可以为他的诗提供最恰切的基础。

“在我们的时代，西方人克服了恶魔的使用形式”，他在“关于斯泰

凡·格奥尔格的演讲”中写道，“如果我们经常说的不是形式，而说是教养、秩序、训练或安排的必要性——因为历史运动试图通过所有这些术语来塑造它自身，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术语已是非常熟悉——那么我们就已经进入格奥尔格的领域了。”<sup>[47]</sup> 在1934年的第一版中，读者读到的就是“已经成形的 (geprägt hat)”，而不是“试图要定形的 (zu prägen versucht)”文本了。当哥特弗里德·本为了再版而编辑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几乎感到不需要再做多少改动，而且不是将它当作历史文献，而是当作还没有失去相关性的早期著作出版。他甚至未做丝毫的改变，以至于他甚至有了新的希望，希望他在1933年受到热烈欢迎的东西重新回来。在1934年，他将新时代的精神看作“是从格奥尔格的艺术和褐衫党纵队当中发出来的惟一指令”，到1950年代他仍然将此看作“格奥尔格的艺术当中发出的惟一指令”。他所删掉的无非是“褐衫党纵队”，因为再版的时候他们的行军实际上已经终止了。

阿多诺对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投入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认为与完全拒绝现代艺术、赋予既定形式以保守或反动意义的那些人相比，哥特弗里德·本几乎算不上是敌人。考虑到哥特弗里德·本和恩斯特·云格尔在联邦德国建立初期的几年里重新焕发的魅力，可以断定那个曾经让本雅明念念不忘的问题依然是一个当代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在那些与法西斯主义有密切关系的艺术当中就有现代主义的变体。但是这一问题对阿多诺来说显然不是最紧迫的。他优先考虑的是如下事实：先锋派的作品和观点会造成动荡局面，而且使艺术成为一种挑战的形式，不受趋势和后果所左右。对他来说，先锋艺术大概没有自由社会那么重要；但是他对新音乐的激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一瞥，都使艺术的进步成为他更明显的选择。如果艺术首先对在现实中最近出现的绝望情境给予了真实的表达——他可能最终会这么认为，那么这种现实就不能长期持续。

阿多诺对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中与《新音乐哲学》相应的、不断发展的现代主义并没有进行任何内在的批评，他也没有打算对这一领域中的进步和反动做出区分。正是爱弥儿·施泰格尔的一名学生彼得·

聪狄 (Peter Szondi) ——他深受黑格尔《美学》、卢卡奇的论文“现代戏剧的社会学”以及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的影响——在他的《现代戏剧理论》(*Theory of Modern Drama*) (1956) ——尽管没有神学的和救世主式的观念——中揭示出：对于单个作品中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分析，能够证明作品中技巧问题的处理方式同时也是对社会难题的一种回应。<sup>[48]</sup> 在对从易卜生到亚瑟·米勒 (Arthur Miller) 的戏剧所进行的样本分析当中，25 岁的聪狄说明了，在戏剧形式与史诗主题 (subject-matter) 之间，在建立于对话交往基础之上的结构与日益增多的个体孤独问题之间产生的矛盾，最终会导致一条新的戏剧形式原则。当今时代已经改变的主题——这是聪狄进行的辩证分析和现象学分析教给我们的——把剧作家引向一个新的形式世界，即便剧作家从根本上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些形式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们对当代的判断的。

在 1960 年代早期，阿多诺成为一名在文学和音乐领域当代现代主义的捍卫者。在 1958 年春从维也纳旅行返回途中，他写信给霍克海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艺术记忆来自贝克特的《终局》(*Endgame*) 所产生的表面上很宏伟的效果。这确实是一个你绝对应该阅读的重要文本——就因为其中的一些意图与我们的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它是相当令人不快的，以至于对它嘘声一片。”<sup>[49]</sup> 萨缪尔·贝克特和汉斯·G. 赫尔姆斯 (Hans G. Helms) 的《FA: M'AHNIESGWOW》刺激阿多诺认识到在文学领域出现了超越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的发展。在阿多诺看来，贝克特的《终局》超越了卡夫卡的小说，赫尔姆斯的《FA: M'AHNIESGWOW》超越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Finnegans Wake*)，序列音乐超越了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和十二音体系的技法。<sup>[50]</sup>

正如序列作曲家将序列原则绝对化一样，贝克特和赫尔姆斯也将他们前辈的原则绝对化了，并且试图使那种原则达到一种脱离个体、统摄作品方方面面的必然性的程度。贝克特属于阿多诺那一代人，而且在 22 岁时就进入了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的朋友圈。作为一名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他在 1942 年才好不容易逃脱了盖世太保的逮捕，作为一

526

名农夫在法国南方一个偏僻闭塞的山村中生活，直到法国解放。1953年，在从事了几乎 25 年的文学活动之后，他以《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一剧取得了突破。对他来说，这部戏是他的真正创作的副产品，在那时他真正想创作的是他的小说三部曲。三部曲的头两部《莫洛伊》（*Molloy*）和《马洛纳之死》（*Malone Dies*）写于 1948 年，1949 年写了《无名者》（*The Unnamable*）。《无名者》以下面几句话收尾：“在沉默中你不知道，你必须继续进行，我不能继续进行，我将继续。”<sup>[51]</sup> 贝克特确实继续了——在这些戏剧和文本中，尽管词语的话语意义从未被完全破坏，但通过运用语音上的安排、主旋律、重复、类比与回声，在戏剧中通过手势和哑剧，越来越多地实现了在那些空洞的词组之间的关系。

《终局》写于 1950 年代中期，是比《等待戈多》更让人感到苦涩的版本，在深渊四周盘旋，但仍旧是一场游戏。以嘲弄方式处理过的戏剧范畴和音乐形式原则使内容结构最小化。比如，尽管在《终局》中仍然有独白，但只不过是一系列暧昧而空洞的暗示。没有拉开的大幕，取而代之的是汉姆（Hamm）从自己脸上拿开的一方手帕。这就开始了一场戏，一场对“终局”之后不再可能的所有事物都残酷无情的戏，然而也是一场将那不再可能的一切搬上舞台的戏。贝克特参与导演他的戏剧，这变成了他对剧本创作的继续，其中包含了无数的细小变化，但都指向一个方向。“一些奇特的事情发生了”，米歇尔·黑尔特（Michael Haerdtter）1967 年在关于柏林版《终局》排练情况的报道中写道，“在最后三周，贝克特对《终局》做了简洁的舞台陈述，使其简明化，不断重复它的主题，并使其富有节奏感。它不会是向人们展现毛骨悚然的感觉的荒谬场景。相反，它会是超越于舞台惯例的东西，它水晶般的完美会直接感动人们。”<sup>[52]</sup> 几乎找不到比阿多诺 1961 年所写的对该戏的分析更确切的文字了：

对话的过程……听起来，这些对话进展所依循的法则不是陈述和回答的逻辑，甚至也不是陈述和回答的心理关联，毋宁说是对

类似于音乐终止的结局的一种聆听方式，这种聆听方式已经从话语的规定类型中解放了出来。这出戏在每个句子之后都在听，聆听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东西。<sup>[53]</sup>

在有些场景中，贝克特使用明显的自发效果去平衡复现和类比的音乐式安排。阿尔班·贝尔格尽管根据十二音阶技法作曲，但在这种方法中还为调性元素留有很大余地，与贝尔格相似，贝克特戏剧的水晶般的结构当中也有许多明显的、尖锐意义的插入部分——即使在这出戏剧当中这一点被玩世不恭、厌倦或结结巴巴的只言片语掩盖着。比如，在《终局》里，就有这样一段：

汉姆：（松开他的丝绒帽）。他在干什么？

克洛夫（Clov）掀起奈格（Nagg）的箱盖子，弯腰，向内观看。停顿。

克洛夫：他在哭呢。

他盖上盖子，直起身子。

汉姆：那么他还活着。（停顿。）<sup>[54]</sup>

在阿多诺看来，赫尔姆斯的文本甚至比贝克特的剧作更进一步。乔伊斯本质上仰赖的是由心理学或深层心理学提供的联想链接。赫尔姆斯则依靠由语言学提供的联想性关联，但这意味着要依赖博学。奇怪的是，阿多诺现在却又把他本人曾称之为对学者型文人（*poeta doctus*）的某种拙劣摹仿，视同语言素材本身创造出来的联想性关联所具有的优势。与贝克特相比，赫尔姆斯更为激进、更为先锋，在阿多诺看来，赫尔姆斯正以这种方式努力摆脱内心独白，内心独白因而不再代表文学作品的规则，而成了它的材料。由于偶然本身被引入成为一个起作用的因素，主观意识的不可靠性就得到了公开的承认。

在主观地构成的领域当中，必要性总是倾向于同主观意识分离

并与之形成对立。结构不再认为自己是自发主观性的一项成就——诚然，没有自发主观性，结构也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而更愿意成为被从材料中宣读出来的东西，而这些材料无论如何总是以主观意识为中介的。<sup>[55]</sup>

528 如果当诗人沉湎于语言偶然性之时他的权力可以被视作已达极致，这意味着什么呢？阿多诺对此最为详尽的解释所采用的例子并非来自赫尔姆斯或贝克特，而是来自荷尔德林（Hölderlin）。（他曾经为写《文学笔记》的第四卷而计划进行两项研究——一项是关于贝克特的《无名者》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保尔·策兰（Paul Celan）的《言语栅栏》（*Sprachgitter*）的研究，这两项研究本来可以依据当代文学提供例证，但却没能完成。）对于阿多诺的文学哲学来说，后期荷尔德林之于文学，犹如勋伯格之于音乐。

与音乐不同，文学中的非概念的综合是对媒介的反弹：它变成了一种构成性的分解。传统的综合逻辑也因而被荷尔德林所悬搁。本雅明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点……正如施泰格尔正确地强调的那样，荷尔德林的方法，这种因与希腊语的联系而得到强化的方法，尽管也不乏明显地构成的主从句结构，但并列结构也和精心安排的骚动混乱一样显而易见，从而偏离了主从句法的逻辑体系。荷尔德林难以自拔地被卷入这类形式之中。语言转变成一种串联，其要素以某种不同于判断式组合的方式组合起来，这种转变是音乐性的转变。<sup>[56]</sup>

串联技法必须以严格精确的外在形式来实现，它的典范就是品达（Pindar）等古希腊诗人。在这里串联技法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了极端的语言学规则如何能够引导人们从那些显然必须遵从的事物中得到解放。诗人破坏语言看起来就和诗人使自己完全遵从语言完全是一回事。但是“语言”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被运用的。要破坏的是日常

的、交际的和具体化的语言。而要让自己遵从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语言。

意图的“明确……已然随处可见”（瓦尔特·本雅明语，《德国人》（*Deutsche Menschen*）），但荷尔德林的语言摆脱了意图，这是一种理想语言：启示的语言……正是他与语言的距离在他那里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追求理念的荷尔德林开启了一个进程，通向贝克特那种无意义的仪规句 [Protokollsätze]。<sup>[57]</sup>

说贝克特的词句是无意义的仪规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阿多诺把赫尔姆斯和贝克特视为相当于序列音乐作曲家的作家，但也将会为此而受到惩罚——他说不清楚把不再可能的无论什么东西推到经典地位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不再可能了”是阿多诺依据的一句含糊其辞的套话。它通常意味着传统的方法已经受阻行不通了：人们再不能以和声作曲了，再不能使用华彩乐段，再不能引入七度和音作为提供特殊增强效果的和弦了。人们再不能在舞台上严肃地表演独白了；再不能使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而获侥幸成功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不再可能了”也意味着，习俗、偏见和障碍将不复存在：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不谐和音，可以用多重视角叙事，可以不必担忧稽查制度的监控而自由地表达痛苦，可以蔑视和谐。但是，这后一个方面是否在相同的程度上适用于赫尔姆斯和贝克特呢？显而易见，在这里越来越无意义并不等于越来越缺乏和谐，句子或词语组群的意义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多诺得出结论说，品质和内容的丧失有时必须被当作在掌握素材方面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来接受，但他得出这个结论的跳跃性太大了。在这儿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把“让语言自己开口说话”当作标准来谈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成问题的。何为语言？语言对于阿多诺来说，当然与对于海德格尔所意味的东西不同。在阿多诺看来，语言不是支配主观意识的东西，毋宁说是仅当主观意识是自由的条件下才存在的某种东西。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得在那种加重了痛苦的水晶体形式与那种纯粹的

529

贫困形式之间做出区分。

阿多诺仿佛在仓促之中也为文学开发了一种艺术形式的理念，这种理念允诺了看似不可能的东西的实现——允诺了不可遏抑的主观的客观化，<sup>[58]</sup> 允诺了一种对不受制于强迫冲动的个体进行社会化的方式的期待。在阿多诺的阐释中根本不存在悲观主义问题。他用荷尔德林反对海德格尔从而为乌托邦辩护。他将贝克特的黑色作品阐释为对建构无差别之点的某种表现，在这个无差别之点上，地狱这个一切变化不复存在的地方与弥赛亚这一切事物都各就其位的境况之间的差别都消失了。阿多诺在兰波（Rimbaud）、超现实主义者和最激进的贝克特在文学中所完成的对于内心独白、无目的的内在性的消解之中，在来会反弹的语言之流中，看到了通向个体与善的普遍性的最终和解和通向自由社会的道路。人们对阿多诺感到不快的地方是他对先锋文学的强调，阿多诺把先锋文学当作对不能忍受的、非必需的现实形式的锋芒毕露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反对这种文学，也不是有距离地去把握它，也不是只将它视之为永恒的人类危机的新变调。同样，他支持现代艺术的派性，以及他对乌托邦主义的捍卫，使他成了学术界的局外人。其余那些对现代艺术真正感兴趣的人，通常是艺术家们自己，或者是不属于大学的报纸和杂志的通讯记者们。甚至与他们相比，阿多诺显得更具攻击性、坚定性，也更令人不安。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对贝克特《等待戈多》的解释是个显著的例外，此文最早发表于1954年的《新瑞士评论》（*Neue Schweizer Rundschau*），后收入他的文集《人的老化》。<sup>[59]</sup> 除此之外，即使以德语发表的对贝克特最好的分析，也只能与吉尔达·采尔特纳—纽科姆（Gerda Zeltner—Neukomm）的《当代法语小说的冒险》持有相同的论调，该书于阿多诺完成对《终局》的分析的前一年出版：

我们最初将贝克特的内心独白——不再受任何客观的相关性的限制——描述为是纯粹抒情的和主观的，这需要给予限定。这种主观的声音，向更遥远的、甚至不存在的目标进行着搜索和探查，是非常初步的，因此完全变得一般化了：它本身就是人类悲哀的声

音。在当代法国小说中内心独白不是回到个人主义，而是向更深领域开进，以获取普遍的有效性和原型特性。

她认为贝克特表现了一种从内部突破作品限度的非常现代的企图，也就是说通过“词语的自我超越……为了沉默，真正的因而无法名状的存在 (Being) 就可能开始了”。<sup>[60]</sup> 仅就阿多诺的阐释所得出的那种弥赛亚式的结论而言，这里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种分析在各自的最高概念——存在概念和自由社会概念——和语气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 通向一种无需担心缺乏基础的哲学

作为一名（专家型）哲学家，阿多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并不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在于哲学并不是研究机构可以借以改进自己声望的一个行动领域，部分是因为这一主题的听众非常有限，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阿多诺大多数明确的哲学行动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做演讲和主持研讨班。另外，阿多诺想成为一名专家型哲学家的愿望甚至弱于他想成为一名专家型社会学家的愿望。除了他有关克尔凯郭尔的书的新一版（1962）和《黑格尔研究三篇》（*Three Studies on Hegel*, 1963）这样的论文集之外，他在1966年发表《否定辩证法》之前只出版过一部较为狭义的哲学书：《反对认识论：元批判——胡塞尔和现象学矛盾研究》（1956）。<sup>[61]</sup> 这本书采用了他在牛津研究胡塞尔的长篇论文中所涉及的几个复杂论题，并给予了重写。它也包括了一篇触及到问题核心的较长的序言，就如同他对《新音乐哲学》所写的序言一样。

阿多诺在哲学上所用的方法类似于他讨论社会学、音乐和文学的那一套方法。他一心想要创造出一种哲学，以增大感知主体的合理性 (rationality) 并使主体对客体结构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就这种哲学而言，增大合理性也就意味着易于接受客体的合理性。文学与音乐不同，

它特别要受到如下事实的限定，即语言的话语元素不容侵蚀，这使得文学不至于不再是语言而成了纯粹的声音。哲学的边界甚至更狭窄，因为它从来都只能是一种概念知识。阿多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布洛赫以及本雅明持有批评的观点，认为他们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即兴创作当中有某种不负责任的缺点。到目前为止，哲学的顶峰还依然停躺在黑格尔那里；黑格尔的朋友荷尔德林则体现着文学的顶峰。在阿多诺看来，在哲学领域，黑格尔之后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与勋伯格、卡夫卡或贝克特的作品相匹配的思想。

然而，在阿多诺的眼中，只有一个在哲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人能够接近勋伯格在音乐上的成就，这个人就是爱德蒙德·胡塞尔。阿多诺早在他 1931 年发表就职演讲的时候，就认为胡塞尔是惟一一位严肃地探求摆脱传统的现代哲学家；然而，他失败了。阿多诺坚持这一评价，甚至在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都拒绝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那篇以他的长篇论文手稿为基础的有关胡塞尔的评论文章之后，他还坚持这一观点。霍克海默批评此文，不仅因为它与社会理论和唯物主义哲学缺乏明显的联系，还因为阿多诺认为胡塞尔不能被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而且阿多诺对唯心主义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内在批判。与之相反，阿多诺在他 1940 年所写的一篇有关“胡塞尔和唯心主义问题”的文章——发表于《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当中，甚至是这样说的：

对我来说，胡塞尔哲学正是一种从唯心主义内部破坏唯心主义的尝试，一种用有意识的方法去突破先验分析屏障的尝试，同时也是一种尽可能地把这种分析继续下去的尝试……他反抗唯心主义思维，但试图以纯粹的唯心主义手段，也就是说只通过对思想和意识的结构的分析来突破唯心主义的屏障。<sup>[62]</sup>

甚至在 1960 年代，阿多诺仍然认为胡塞尔在现代哲学当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 1962 年所写的文章“哲学还能为什么？”当中，有这么

一段：

以进步论知识为依据，始终公开地朝向客体的思想，现在却不容许系统化的科学预先作为它的指定规则，并以这种方式在与客体的关系当中获得了解放。思想把自身当中聚集起来的摘要式经验转而加诸客体，撕碎了掩盖在这些客体之上的社会面纱，并重新感知客体。如果哲学能够摆脱主流思想的恐怖主义所传播的恐惧——从本体论上 (ontological) 害怕思考所有不纯粹事物，从科学方面害怕思考任何并非“建基于”被认为有效的科学证明基础之上的事物，那么，哲学也许甚至可以认识到这种恐惧要禁止的是什么，未被败坏的意识实际上想达到什么目标。就像某个人梦见自己醒来一样，哲学现象学一度梦见它“面向事物本身 (Zu den Sachen)”，这个梦的实现只能借助这样一种哲学，它不希望通过“沉思普遍本质”这种魔术式的一招而获得“事物”，而是要同时考虑主观和客观的和解，并且不允许自己依赖于那种已经被现象学各流派常用的方法的潜在优先性——这些流派方法常被用来制造那些纯粹的迷信和自造的概念，而不会引出哲学现象学渴望的“事物本身”。<sup>[63]</sup>

532

阿多诺在 1930 年代所完成的关于胡塞尔的研究，源于他的一个信念：他相信只有“通过与最新近的那些试图解决哲学和哲学术语问题的尝试进行严谨的辩证交往”，才能实现“哲学信仰的真正改变”。<sup>[64]</sup> 他论证把胡塞尔，而不是舍勒或海德格尔当作自己的出发点乃是正当的，舍勒和海德格尔已经渐渐使得胡塞尔在 1920 年代学术圈的听众当中隐而不彰，而阿多诺断言这些胡塞尔的后继者所创立的存在论恰恰建立于现象学之上。他们没有深入地发展现象学，而只把它当作理论基础来用，也没有留意现象学本身的脆弱性。

在阿多诺看来，胡塞尔并没有成功地摆脱唯心主义和那种认为意识可以掌握世界总体性的意识哲学。但是，胡塞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通

过将唯心主义带向自我毁灭的极端开启了对唯心主义的抨击。卢卡奇已经在他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揭示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相矛盾之处，<sup>[65]</sup>并用这些矛盾达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无产阶级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的实现；同样，阿多诺想呈现现象学的自相矛盾之处，这些矛盾显见于胡塞尔哲学里太多的荒谬建构和概念联结当中，阿多诺想用这些矛盾而达到唯物辩证法，从而——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解决这些矛盾。

他从胡塞尔那里借用了两组与他的思想也很接近的、非常重要的论题：真理的客观性、逻辑判断等观念；以及真实知识和逻辑判断等都经由主体思维所规定这样的思想。胡塞尔支持挽救客观性于全然消融于心理主义的努力，但也支持这样一种原则：注意力应该转向主观活动，客观事物正是通过主观活动而呈现的。胡塞尔创造了一种可以实现这种主观活动的系统方法：“现象学还原”。这意味着，凡是超越了对世界的前哲学“自然态度”原初给定的事物范围的其他一切事物都要予以排除，首先就是要排除对于客体自身存在的确信。现象学还原之后留下的东西，是被真正体验过的、真正客观的“现象”，是“事物本身”。这些事物被认为属于事物意识(awareness-of-things)的领域，事物意识既不属于意识的内在领域也不属于超验的外部世界，而是一个中间地带。

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事物意识这一中介领域，被阿多诺批评是为两种抽象的结合：一是用源初既定现象(originally given phenomena)这个概念来抽象性地概括所有事实上存在的事物，二是用意识这个概念来抽象化地概括众多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个体的活动。胡塞尔把这些抽象概括与它们所抽象概括的对象相分离。结果造成了抽象的实体化。意识正把某物当作被给定的事物，因为它已经忘记了在创造这个事物的过程中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意识和客体表面上相一致的地方，就是被还原了的意识自身所处的地方。

对于阿多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来说，这种抨击也很重要。例如，阿多诺把逻辑与现存世界的分离称之为“玩具钱逻辑”，而把认识与思维着的人相分离称之为“无主体的经验”或“非人的经验”。他之所

以专注胡塞尔，部分是因为他感到霍克海默完全可以胜任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部分也是因为涉及的论题在胡塞尔那里也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因而他为哲学信仰的改造提供了一个更具价值的出发点。对阿多诺来说，胡塞尔那伟大的祖先——确切说是在揭露矛盾的祖先——就是康德。阿多诺在他 1957-1958 年的冬季讲习班的“认识论导论”课程中断言，康德试图通过使客体性经由主体性来拯救客体性，试图把超验内转成为超验之物，试图把经验之外的东西置于那些能构成知识的条件的层次上。

如果说黑格尔通过他的宇宙论的和辩证的哲学而达到了唯心主义的巅峰，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则表现了黑格尔哲学最连贯、最简化的形式，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哲学的滑稽模仿 (absurd parody)。正如阿多诺在他于 1931 年的就职演讲中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过的，“胡塞尔纯化了唯心主义每一条过度思索的痕迹，并将其推向它可能达到的现实性之极致”，<sup>[66]</sup> 胡塞尔剥夺了“哲学装饰”的所有形式。对阿多诺来说，在这种“晚近资产阶级的 (late-bourgeois)、宿命论的”<sup>[67]</sup> 唯心主义的变种当中，与传统决裂似乎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了。他在 1937 年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对胡塞尔提出的批评，关注的并不是用存在的第一性来代替意识的第一性，而是

要展现对绝对第一概念的探求，即便是对存在的概念的探求， 534  
也必然会带来唯心主义后果，也就是说最终返回到意识；另一方面则要展现，那种实际上推导出这种唯心主义结论的哲学必然卷入此类矛盾，从而使思考问题的方式表明自身显而易见的虚假性。这里能够断言的内容就是，存在和意识的“难题”尽管尚未得到解决，但已经不再需要解决了。<sup>[68]</sup>

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疑难 (aporias) 的敏锐揭示，为依然可以构想的惟一解决方法扫清了道路，这种解决方法是这样一种主客体辩证法，在其中辩证法不再像在黑格尔那里被具体化为精神的绝对辩证法。只要唯物

辩证法强调的是一种能够担当唯心辩证法的矫正物的源泉，谈论唯物辩证法就是有成效的。然而，严格说来，阿多诺并没有涉及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用他的音乐意图来类比一种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主体自由地向客体敞开，因而是一种自由辩证法，也是一种 *dialectique informelle*（偶然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这条惟一的通道仍然敞开着，既然胡塞尔哲学已经表明，如果主体和客体的中介未被发现，那么“事物本身”和主体的生活实践就不能出现，出现的只能是自我绝对化的那种意识的各种投射形式。出于同样的原因，胡塞尔有关存在论的方案也是那种自我绝对化的、使自身与自身、与世界相异化的主体的站不住脚的投影。

当阿多诺终于能将他二十年前写作完成的胡塞尔研究付梓出版之时，(西)德国的哲学景象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没有出现根本的改变。战前海德格尔和“物质现象学”(material phenomenology)这一新的变体，即以萨特为其最知名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支配着整个舞台。雅斯贝尔斯又使存在主义哲学发生更进一步的变化。普勒斯纳、盖伦和薛尔斯基则是当时影响着社会学的哲学人类学的权威代表人物。与之相比，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和批判哲学，在法西斯统治下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并被逐出德国，因此还必须重新夺得自己的地盘。批判哲学能有当时的成就，就是得益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结束流亡并返国。但德国新实证主义者中却没有一位再返回德国。直到1960年代，新实证主义——已经在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取得了垄断地位——对德语国家的哲学景观也只产生过间接的影响。因此，阿多诺自认对现象学矛盾的研究和对以这些矛盾为起点的 *dialectique informelle*（偶然辩证法）的设计依然是最新的。这并没有错。在导言中，他只是再次强调了此书中四项研究的共同之处，并且用一句令人难忘的公式申明了这一点，它们都是对起源哲学即 *prima philosophia*（第一哲学）的批判。这也是过往的一切哲学（包括认识论）曾经之所是。

535

由于第一性的和直接性的概念通常是间接的 (mediated)，因

此也就不是第一性的了。直接性、实在性除非经过思想，是不会必然提交给理智的反思的，尽管哲学思想总是希望通过直接性和实在性逃避贯穿自身始终的中介（mediation）。这一点既被记录、也被完美体现在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巴门尼德残篇有关存在的形而上学之中——它说，思想即存在。这样的前苏格拉底形而上学自然也对它的埃利亚学派教义——存在即绝对——予以否定……自那时起，所有存在论（ontology）都是唯心主义的。最初存在论是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唯心主义的存在论，继而它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成了唯心主义，而它最终变成唯心主义是为了抗拒理论反思上的绝望意志，试图摆脱精神自行确立为自在之物并限制进入自在之物的各种限定。

## 胡塞尔想

借助对精神的反思来重建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纯化纯粹存在的每一条痕迹。标志着一个时代开端的形而上学观念再一次在它走向终结的时候出现了，被极度理想化并变充满智慧，但因此也变得更不可避免、更稳定、更单调、更脆弱：在唯名论条件下、在使概念返指思维主体的条件下去发展一种关于存在的学说。<sup>[69]</sup>

各种存在论哲学完全无视这一矛盾而继续行动，好像传统哲学，第一哲学还能够得以为继似的——好像在胡塞尔之后这一切又都是可能的了似的。新实证主义者则放弃了对于从事哲学的人的要求，认为他们自己是科学的分析者。这两种倾向都不能有助于阿多诺所认为的那种尽其努力犹有可能的不自由的哲学的实现，也不能助于祛神话化行动（*de-mythologization*）的进一步开展，不能有助于揭露真实的哲学经验中尚被忽视的各种惯例和限制。

《黑格尔研究》填补了一个裂隙——阿多诺在他的胡塞尔研究中谈

到唯心主义巅峰的时候曾提到过这个裂隙。这些研究文章这样来解释他的观点：尽管黑格尔具有保守性，但他也让哲学获得了人们能自由操纵的手段，哲学因这种手段而成为可能，并再也无需受担心缺乏根基的恐惧的折磨，再也无需受缺乏安全立足点的折磨，哲学成为不再要求自治的哲学。正如阿多诺在他的就职演讲所说的，他并不认为通过实践超越哲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有有效的，相反，他在探索一种新的哲学。在他的手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一种工具，可以用它来批判将抽象概念上升为自治存在的行为，来揭示所有不自由的哲学，所有不向“真实”经验敞开的哲学，都会聚在哲学唯心主义即第一哲学当中。

但是，这是哪一种“进步的见识”呢——根据这种见识，思想被假定会开放地转向客体？在阿多诺看来，胡塞尔之后的哲学并未取得任何进步。此外，他还强调——这种强调与《启蒙辩证法》导言一致——自由思想必须拒绝让被规划的知识为自由思想本身立法。所有这种进步见识与各类科学学科的关系依然是令人难以捉摸。阿多诺虽然强调了科学学科对于哲学的重要性，但是非常坚决地拒绝它们的认知方法，甚至在他看来，要认识这种严格规范的知识形式带来的种种后果或就它们展开深入的研究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人们要在阿多诺本人的著作中去考察可以从那种不断公开地指向客体、与进步知识相一致，并且重新感知客体的思想形式中获得了多少收获，如果人们对于在一个不开放的社会中思想究竟能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一问题不予考虑，那么人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已经提出了许多思想模型。对巴赫（Johann Sebastian）的再评价就是其中之一。“巴赫抵御他的信徒”<sup>[70]</sup>，该文将巴赫当作现代早期能自由应对以前音乐的人。还有对海涅（Heine）的重新评介，即“受伤的海涅”<sup>[71]</sup>——“伤口”这里指海涅的诗作，它们创作方式的轻松自如隐藏着一个事实，即这种轻松传达着异化的体验。再一个例子就是讨论法西斯主义倾向对于民主政治的威胁：他在“‘重估过去’意味着什么？”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认为民主政治内部残存的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比残存的反民主的法

西斯主义倾向更危险。”<sup>[72]</sup> 这些都是以一种随笔文体的方式来重新考虑事物的事例，它们并不是以体系化的知识探索和流行的科学研究为依据，而是建立在直觉的、偶然的阅读和自己的体验和联想之上。事实上，《文学笔记》第一卷是以一篇“作为形式的随笔”的随笔开始的，这就表明了他对于普遍知识的态度，而且这篇文章也开启了他这一卷对于音乐美学、哲学、社会学和当代问题的讨论。对他来说，这篇随笔恰恰就是自由思想的形式。

毋庸多说，这是以完全不激进的方式 (radically un-radical) 对非同一性意识的恰当评价，这种意识避免一切简化为一种原则的行为，更强调碎片化、局部而不是整体……随笔作家思想所具有的细致柔顺的品质，迫使他在达到了一种更胜于推理思维所能提供的思想强度的程度；就随笔而言，它不同于推理思维，它不是盲目地、机械地展开，而是在每个时刻都要反思自身……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各种概念编织在一起，使这些概念可以被设想为是它们自身在客体中相交织……通过逾越正统的思想学说，使得正统思想试图加以隐蔽并使之隐而不彰的某些东西在客体当中可以看得见了。<sup>[73]</sup>

537

但是，这种观点怎么与如下的观点相一致呢？这种观点认为对当今主流状况的哲学批判必须理解虚假的整体、邪恶的总体性，必须理解被阿多诺一次又一次作为一个体系加以谴责的现今主流状况。另外，这种观点怎么与如下的另一种观点相一致呢？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理论必须继续构造一种可以替代目前这种建立在劳动分工原则之上的学术体系的批判形式。阿多诺对随笔形式中的自由思想的想法，类似于认为作曲家使自己完全顺从于音乐材料，作家完全使自己顺从于语言，这种看法也许是一种乌托邦，这种观点尽管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阿多诺的著作中经受了长时间的考验，甚至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它是一个乌托邦，但却是这样的乌托邦，它被转译成了一种经验的知识形式，这种形

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组织化的科学的成功发现，同时也给科学提供新鲜的视域，让科学去进行更明确、更审慎的发现和应⽤。通过对随笔形式的捍卫和实践，阿多诺似乎避开了前面提到的那个难题。然而，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依靠对这一问题的成功克服来解决：比如，批判理论的内容是否可以继续与哲学人类学相匹配，批判理论是否可以利⽤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把社会当作整体来研究，从而避免僵化为一种听上去吸引人、但只是对所有事物予以拒绝的反程序（counter-programme）的危险，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 于尔根·哈贝马斯——研究所最后一位社会理论家， 受阿多诺赏识却被霍克海默认为太左

曾被阿多诺寄予厚望的拉尔夫·达伦道夫在1954年离开了研究所。第二年，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加入了研究所，他是一位对社会批判抱有虚心态度、年轻且进行专业经验研究的学者。“我们准备让弗里德贝格参加主题为社会学中的经验问题的授课资格答辩”，阿多诺告诉霍克海默说，“如果其他的社会学家通过了这次授课资格答辩，那么他也绝对可以去讲授理论社会学。”<sup>[71]</sup>一年之后，于尔根·哈贝马斯成了阿多诺的研究助手和社会研究所的同事。他是一个社会哲学家，兴趣正好集中在当代理论以及现代性的病理学上，这一主题正是阿多诺的随笔与霍克海默的演讲和讲座粗略涉及的领域。

538

这引发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各种因素的联合，与1932—1933年马尔库塞加入研究所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有些类似。依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他通过阅读海德格尔及其他保守的文化批判者发现了现时代的危机并因而开始了学术生涯，直到接触青年黑格尔，特别是青年马克思之后，特别是阅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之后，他的思想方法才开始变得精辟深刻。然而，就在他加入研究所的前一年，他还曾为《法兰克福汇报》写过一篇评论，把

盖伦和薛尔斯基的现代社会学教材<sup>[75]</sup>描述为经典著作，该书的两位作者恰恰被阿多诺视为批判理论的首要对手。阿诺德·盖伦最初以他于1940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人》而获得世界认可。<sup>[76]</sup>这本书为赞颂纪律和秩序提供了人类学的理由，所以他与纳粹的合作像海德格尔一样似乎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阿多诺把赫尔穆特·薛尔斯基视为特别危险的人物，因为他比其他人更少公开地展现自己的法西斯倾向。然而，薛尔斯基在他的《性社会学》一书前言中明确支持反启蒙运动的研究项目。<sup>[77]</sup>

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年出生于杜塞尔多夫，在古姆尔斯巴赫（Gummersbach）长大，他的父亲是那里的商业理事会的理事。德国1945年5月的投降对他来说意味着一种解放的体验。他不仅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由卢佛尔特（Rowohlt）出版的长期遭禁的西方文学和德国文学，而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是东柏林出版并由当地共产主义书店分发的。他期待着学术和道德在德国的复兴，但又非常失望地发现这种复兴在第一届西德联邦议会选举期间几乎是看不到的，而且重整军备的问题很快就被提上了议程。

一方面，哈贝马斯来自在政治上遵奉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因此对社会民主党抱有怀疑态度，更不要说对共产主义者了。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战后“再教育”的产物，而且是那样认真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右翼政党的怀疑并不比对社会民主党的怀疑弱，他认为右翼政党并没有与过去的大灾难彻底决裂。起初，他看不到任何可以让自己产生认同的政治力量。自1949到1954年，他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研习过哲学、历史、心理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他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老师是埃里希·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和奥斯卡·贝克尔（Oskar Becker），前者是一位跟随过狄尔泰的人类科学理论家，后者是胡塞尔的学生，属于海德格尔那一代，在数学和逻辑学领域中有非常卓越的成就。除了西奥多·李特（Theodor Litt）之外，所有在他学习课程期间对他有重要影响的教授们都曾经相信纳粹党或至少是遵奉传统者，在

纳粹政权期间像往常一样继续开展着他们的工作。

539 哈贝马斯的著述事业在195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文章均讨论与哲学和社会学相关的书和话题，主要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杜塞尔多夫的《商报》(*Handelsblatt*，德国商业的主要喉舌)、《法兰克福杂志》、《墨丘利》等报刊上。所有这些报纸和杂志差不多都是面向普通公众的。他早期有一篇文章，十分引人注目，使左派知识分子为之一振并开始注意他。这篇文章就发表在1953年的《法兰克福汇报》上，这是对海德格尔同年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所做的批判性评论。<sup>[78]</sup>哈贝马斯后来接受德特勒夫·霍斯特尔(Detlef Horster)和威廉·冯·雷金(William van Reijen)的访谈时这么说：

直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出版之时，我在政治上的和哲学的信条，可以说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它们是两个几乎与对方无关的领域。后来我发现海德格尔(我过去一直生活在他的哲学当中)曾在1935年演讲过这些内容并在现在出版——毫无疑问，这本书真正震撼了我的思想。于是我就此写出了自己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很天真，而且我想，我们这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怎么能那样做呢？<sup>[79]</sup>

这篇文章的写作充满了痛苦，因为他不能隐瞒他从自己正在谴责的人那里获得的恩惠。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工作不是去揭示海德格尔自《存在与时间》到《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那些基本范畴的稳定性。相反，这些范畴提出的诉求具有明显的可变性。因而今天他谈操心、回忆、守护、雅致、爱、聆听、让步，而1935年他又在同一个地方要求暴力行动——而在此八年之前海德格尔就颂扬私人的、孤独的存在所做的半宗教式决断乃是没有上帝的世界之虚无中的有限自主。主张本身根据政治形势至少两次改变了其语调，但是，对于本真性的

召唤这一哲学主题和反对衰落的争辩却依然未变。<sup>[80]</sup>

海德格尔在他的书中虽未作评论但提到过，“这场运动——即纳粹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性”乃在于“带有行星天命的技术与现代人的相遇”<sup>\*</sup>。这让哈贝马斯看到了一个事实，即海德格尔令人讨厌的地方不仅仅是他在1935年作为大学校长发表的演讲，而且还有他的哲学本身：一种来自其哲学客观结构的对于纳粹的赞颂。哈贝马斯指责海德格尔用存在的历史去鼓励消除人人在上帝面前皆平等的理念，消除个人自由的理念，消除为技术进步提供实用的、理性主义的补救的理念。

从哈贝马斯早期的其他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民主倾向的文化批判家。他非常熟悉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和阿诺德·盖伦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他曾经写过一篇探讨《绝对和历史：谢林思想的二元性》的论文，<sup>[81]</sup>因而也注意到了在1800年前后几十年间那些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家发起的对异化的批判。而卡尔·洛维特在流亡日本时期所写的《从黑格尔到尼采》（*From Hegel to Nietzsche*）一书，<sup>[82]</sup>也促使他注意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马克思。1953年他在波恩大学哲学系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直读得神魂颠倒。他也发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写的《启蒙辩证法》，其中让他感受最深的是两位作者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来分析当代境况的思想方法。然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马克思的思想对当代具有重要意义，并不单单因为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地是因为它是关于物化的理论——他从哲学人类学出发点这样看。

哈贝马斯的第一篇长文“合理化的辩证法：生产与消费中的贫困”发表在1954年的《墨丘利》上，该文已经包含了后来一直是他著

---

\* 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先生后来在商务印书馆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中把此句译为：“规定地球命运的技术与近代人的汇合”，见第19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译者注

作中心论题的两个主题。其一是有关社会合理化作为对技术进步的实践的和理性的矫正所具有的特性的论题——这一主题在他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中就已经提到了：

这些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不就证明了，只有限制完全因工业考虑而形成的技术、经济组织，那些自然的、社会的机能才能有发展的余地吗？社会合理化建议最初是一种限制性建议：从进步的组织化发展中划出一块地盘，从而为自主却并非自动地发展的事物留出余地。这种建议丝毫没有把这些机能也予以组织化的意图。<sup>[83]</sup>

第二个论题，哈贝马斯思考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并将二者一起归入补偿这个概念之下。法国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就持这种观点，他赞许地认为，工人分享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富足”和“完美化”，这就在消费领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替代物，可以替代他们在由于技术进步而在生产领域所丧失的满足感。哈贝马斯批判性地运用了弗里德曼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并将其看作是借异化消费补偿异化劳动的证据。

他将社会学家通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展现为令人吃惊的状态：与特定文化相联系的那些传统的需要，现在被塑造成了需求的蓄水池，而任何刺激消费的因素几乎都能利用这座蓄水池。他认为广告产业只能为这种令人吃惊的事态提供一半说明。而另一半说明是由消费的贫困状态提供的。消费的贫困状态是工业化劳动的贫困的结果。他以保守主义文化批评的语言这样评论道：

541 工业化的劳动越来越远离了制造对象，摧毁了手工技艺，即“手的智慧”，让人们熟悉物质原料并将其缩减到统计上可论证的最小量。同样地，它也日益拉开了大众消费与消费品之间的距离。人们对这些产品的“善好”和品质的感觉越来越弱，因为人们只能越

来越空洞地和短暂地接触那些物品，并且人们对于物品本质的感觉也更为模糊，与物的亲近越来越不真实……人们不再熟悉物品，不能感受物品，因为他们不再可以独立地操纵它们，也不再留恋它们，也不知道它们归属何处。<sup>[84]</sup>

正如哈贝马斯用一句可以写入《启蒙辩证法》的话来说的那样，异化劳动为工人的闲暇时间所创造的东西只能“逗人一乐，但却不能让人实现愿望”。消费的补偿本性制造着对于不断翻新的补偿方式的永不满足的需求。

在对于补偿性消费的批判上，哈贝马斯同保守派的文化批评家和法兰克福的批评家是一致的，而且他们一致提出，社会朝向无所不包的异化状态灾难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所有曾经可以由好奇的环境来限定产品之实用性的渠道均被消除了。他紧随保守思想的地方在于，他认为对他已经诊断出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存在于一种新的风尚、一种新的文化意向和“一种新态度的结晶”之中。但是他通过这些概念所理解的东西与保守主义理论家所关心的东西是不同的。哈贝马斯想要尽可能地消除劳动的异化特性，为的是消费者可以变成文化的参与者；而盖伦、弗赖尔和薛尔斯基则是想要稳定工业社会中大众的行为模式——尽可能以不做出让步作为交换条件，只让随后几代人习惯于客观化（物化）的、非人化的劳动和生产模式。

青年哈贝马斯为生产领域的发展所设定的目标是一个适度的目标，他用薛尔斯基“退化过程”（retrograde processes）这一概念来描述生产领域的发展。他期望于工人的是，他们应被给予“一些带有限定职责并要求丰富的首创精神的目标性任务”。<sup>[85]</sup>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批判这样一种社会——在此社会中所有的产品都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生产出来的商品。也就是说，他的目的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但是，对于那些最初受过保守思想训练的人来说，很容易错失某种批判进路的可能性——即便他是《启蒙辩证法》的读者。毕竟在为奎里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而准备油印本的时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本人也专心致

志于删除每一处明确提到资本主义、垄断主义和阶级社会的表述。他们在后来联邦共和国出版的著作中继续进行着这样的工作，因为还考虑到了西德显而易见的经济奇迹。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之内，他们不仅极力删除所有谈及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段落，而且也删削所有那些明确提及对现行社会形式予以彻底拒绝的内容。像“敌对的社会，必须被否定，应当完全彻底地揭露至它敌视快乐的最深层的细胞，这种社会只能通过推行禁欲的结构形式而得到呈现”这样的句子，在阿多诺“论音乐的拜物教特征和聆听的衰退”一文被收入其论文集《不和谐音》再版的时候，就被他删除了。<sup>[86]</sup>

但如果考察一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50年代的联邦共和国能找得到的作品，而且即便不是从系统的社会理论的观点，只从初学者和反对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作品的话，人们就会发现其中有比文化批评更多的东西，而且也会发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研究中到处充斥着一种社会理论的要素，而这种社会理论很可能已经被当作研究的出发点了。如果有人抓住这些要素，并将它们统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如下的图景。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管理社会”和“交换社会”。在经济领域，如同在社会其他领域一样，个体的自主性日益受到限制。大公司之间的自由竞争在不断地减少。资本的有机组合还在日益增加——也就是说，与活劳动 (living labour) 的比例相较，物化劳动 (objectified labour) 的比例在增长。<sup>[87]</sup>同时，个体自身之间的有机组合也在增加——也就是说，以劳动力转换为商品为开端的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并使主体——无论在这一生产过程之中还是之外——亲身接触事物和人的机会日益减少。由于个人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越来越依赖经济的、社会的和政府的组织，由于文化只由文化工业和管理机构负责——这些组织机构压制文化并将其转变成剥夺人们独立经验的工具，所以个体日益被剥夺了自主性。所有个体由于不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不满，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所有未被转化成商品、未经管控的东西，倾向于认同那些可以使他们活下去的东西，对个体来说别无出路：只有被管控的资本主义。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决定在没有一套对于社会理论的连贯表述大纲的情况下也要进行研究，而且，他们徘徊在两种观念之间：一方面认为社会理论还没有形成，另一方面则认为这种社会理论的本质精神已经由马克思和他们自己阐释过了。这一点使得一些不明确的因素容易残存下来，而且这些不明确性在1950年代的读者当中强化了一种印象，即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从事的文化批评充其量只给社会理论提供了暂时的基础。如果商品交换原则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个体的自主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如果对自然的支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在西欧和东欧的工业社会也有同样的邪恶根源，那么阿多诺怎么可能去欢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怎么可能认为扭曲性的影响（*distorting influence*）首先源于商品交换的原则呢？如果在西欧和东欧的工业社会当中，社会制度同样对人类支配自然的灾难性的持续、对人永远受人统治负有责任的话，那么，东欧有什么相当于商品交换法则的东西呢？而且对自然的支配、商品交换的法则以及它在东欧的对应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当阿多诺在每一个可能的语境中都提到普遍对于具体的支配，物化的存在对于生命的支配，抽象对于性质的支配的时候，不正预示了一种隐藏的假设——存在着一条神秘的结构原则，即便阿多诺对这一结构原则如何运作或来自何处都没有作出说明，但是它决定着发达工业社会每一个可能存在的层面的表现特征——吗？

543

哈贝马斯身上最吸引阿多诺的东西就是他的写作才华（阿多诺对研究所里的各个研究助手都缺乏这一才能多次表示过遗憾之意）；哈贝马斯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坚决批判已经崭露头角（阿多诺也是在1960年代才开始对海德格尔提出严厉批判的）；他与阿多诺本人对许多事情都持有相同的批判态度（这不足为怪，因为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的思想有一系列共同的主题，例如，他们对于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思想具有的普遍倾向的批判，对于自治哲学 [*autonomous philosophy*] 观念、自我持存本能的实体化以及主体优先性的批

判,等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并不批评盖伦和薛尔斯基这样的学者,这一情况并不使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感到奇怪,更不要说他们从他们或弗赖尔那里所能学到的东西了。那些知道自己的许多同事有法西斯历史或在思想上与法西斯主义有亲密关系的人,或者那些依据意识形态批判来理解这种联系的人,都保持了沉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公众领域也保持沉默,他们仅仅只是试图阻止那些人在学术界的影响,例如1958年他们在回复想提名盖伦的海德堡大学一位教授的咨询时就给出建议,阻止任命盖伦为这所享有声望的大学的教授,或者亲自参与德国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的选举,薛尔斯基当时在这一协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根据勒内·柯尼希在他的自传《生活于矛盾中》的记载,薛尔斯基是支持那些被证实为纳粹党的学者重返大学教职的推动性力量,而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己装扮成一位支持年轻人的、依靠经验的、“反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家的人。<sup>[88]</sup>阿多诺在回应霍夫施泰特尔对《组群实验》的批评——霍夫施泰特尔在批评中支持镇压的思想——时,曾提及后者支持法西斯的历史,在1950年代这是一个罕见的公开提及某种被普遍压抑的事情的例子。而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在马堡大学开设讨论第三帝国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学者和法学学者的出版物的课程,则是另一个例子。<sup>[89]</sup>

哈贝马斯到法兰克福的时候,他对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印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在他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之后,他也丝毫没有感觉到这里有什么堪称体系的批判理论。的确,哈贝马斯本人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要求,希望在联邦德国保持研究所昔日的神圣光环,并继续做一些在黑暗中支撑这种光环的实际工作——因为在他看来,在冷战和对立阵营形成时期,研究所可能会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性的印象。“霍克海默非常害怕我们会打开研究所地下室里那只装有全套杂志的箱子”,哈贝马斯回忆道,“对我来说那里没有连贯统一的理论。阿多诺写些文化批评的文章,发表一些对黑格尔的讨论。他表现出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就这些。”<sup>[90]</sup>

1956夏天,霍克海默和米切利希组织了庆祝弗洛伊德百年诞辰的

各种活动，这才给了哈贝马斯深刻的启示，使他认识到，尽管在他研究心理学期间几乎对弗洛伊德所知甚少，但弗洛伊德不仅是重要的理论家，是有广泛影响的心理分析体系的创始人，而且也是——和马克思一样——要分析当代状况就必须予以严肃对待的人。哈贝马斯以毫不隐瞒的惊讶和可以说是于事无补的同情心来回应支撑批判理论的根本动力，回应那种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况进行彻底批判所依赖的乌托邦视角。他在马尔库塞有关“来自心理分析的进步理念”的演讲中，第一次公开与这一视角相遇，这种视角统摄了有关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讲演。但是他仍然不知道霍克海默圈子里的一位同伴马尔库塞，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早期就与这个圈子是多么亲近，也不知道马尔库塞提出的救赎和解放的观点是多么的接近阿多诺的观点。哈贝马斯在他关于马尔库塞所做的弗洛伊德系列演讲的报告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们已经脱离了马尔库塞对于时代的分析 [见前面对他的讲演的报告]——他自己是在准救赎框架中做出这种分析的。在有关原始父亲的假设中，马尔库塞为他的这种分析给出了最令人吃惊的表述，原始父亲不是根据平等原则，而是依据等级原则来为原始部落去组织和分发生活必需品的。他象征化地指出了某种武断的堕落过程，即从力比多文化，或力比多文化的可能性向以支配为基础的文化的堕落，马尔库塞得出结论说正如这种堕落有一个开端一样，它也可能有一个终点。进步的辩证法在今天已经使非压抑的文化具有了客观上的可能性，“一旦人们最终选择了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明天或者后天就能变为现实”。这种近乎千禧年色彩的宣言可能比啰嗦的讨论更适于引发激动，但这种把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神奇地转变为弗洛伊德理论术语的做法，也会在他的听众中引起种种的疑问。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结构的成败与否都取决于非压异性升华这一概念。对这一概念的异议非常多，而马尔库塞自己最了解它们。然而，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里以18世纪的狂放不羁再次展现释放乌托邦能量的这种勇气，还是会给

545

人们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希望至少会引起一种反省，甚至在那些最坚强的听众中引起一种反省：意识到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无意识地共享着习惯的顺从，这种顺从强化着我们思想中的现有状态，而对这些思想现状背后隐藏着的“观念”，对这些思想现状能够经历史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却不加审思。<sup>[91]</sup>

这一陈述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对于那些在 1933 年之后长大的人来说，德国的乌托邦传统和社会批判传统不仅由于纳粹的统治而变得非常陌生，而且，在重建和冷战时期，这种陌生感依然保持着。

在成为研究所的成员之后不久，哈贝马斯与阿多诺密切合作，为研究所“大学与社会”项目第一部分的工作报告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论，这个项目是在 1952 年开始的。这篇绪论的简缩版被冠以“大学改革的持续痛苦”的标题发表在《墨丘利》上。<sup>[92]</sup> 这时似乎出现了一个契机，年轻一代的代表一方面可以推进某些阿多诺式的论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主题放在新的哲学语境中去讨论。阿多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以下方面：哈贝马斯使科学和学术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从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不仅仅从异化理论当中汲取概念，他还将从历史语境之中发展起来的乌托邦理念同与之相抵触的现实进行比较。

18 世纪转折时期大学里的实际情形究竟是什么样子，甚至那些大学的哲学捍卫者的实际遭遇是什么样子的呢？在那个启蒙世纪的晚期，康德遭申斥，他的作品因冒犯宗教教条也被禁；费希特在关于无神论的争论中丢掉了他的教授职位；黑格尔是在他进入大学之前，或者是在拿破仑战争的混乱期离开大学之后，才写出了他最勇敢的著作……然而，也正是资产阶级发展的这个阶段才具有创造大学理念的特权。在这一时期至少有可能完成对大学能发展成什么和大学应该成为什么的反思，这种反思，部分是通过学术机构的自治、成员的思想解放和学生自由结社的方式完成的；部分

则是通过将学术自由的原则——即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学习自己选择的知识的原则和自我教育的原则——规定为不可剥夺的的权利的方式完成的。<sup>[93]</sup>

对于科学的批判，是个典型的哈贝马斯式论题，它统摄了整篇导论。促成这一批判的因素可能来自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可能来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当时并不知道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和“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这两篇文章），甚至也可能来自海德格尔，但他批判科学的语气与这些前辈的语气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他并不认为“理论”或“思想”，或多或少刻板地与“资产阶级”科学或“已经遗忘存在”的科学截然对立的“理论”或“思想”会通向真正的知识。相反，他重视的是科学自身怎样复原它们与现存的、目的性的实践之间的联系。促成这一看法的动力可能来自有关科学曾经是什么的“保守”观点：直到中世纪，在所有关于科学的陈述中都会必然包含“正确生活的指导”之类的意思。

如果这些迹象不是欺骗性的，那么今天社会中的大学问题就源于如下的事实，社会现在只把思想当作是在那儿为它服务的东西。社会给思想报之以奖金，好像是补偿它以这种方式被驯化所付出的代价似的……为了获得某种中立的可行性方式，科学被从活生生的实践当中疏离出来，变成一种纯粹的理论，而且不断地让自身变得更加孤立。它通过将自己的成果委托给那些与科学不符、可以滥用成果的机构，歪曲了它自己的批判来源……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受失败之痛，从来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失败，不能将它们的持续存在归功于社会，后者正在将它的那些最边远的前哨变成“科学”，而且与此同时还在将科学中立化，直到它不能再充当促进生活的催化剂为止。<sup>[94]</sup>

在这项研究中，哈贝马斯惟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运用阿多诺式的主题

——把思辨激进化到自我反思的程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在科学中恢复与实践之间的活生生的、目的性关系。每一类专门化的科学必须反思自身的基本原理，同时必须反思它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这种自我反思应当揭示“纯粹理论背后隐藏的实践根源”，并且应当领悟到“一种符合实践的理论一定不能让自己只满足于可行性”这一事实。<sup>[95]</sup>

547

哈贝马斯作为研究所的成员所写的这第一个文本，就其所涉及的核心论题来说，就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展现了他要在强大的体系化追求和学术兴趣的指导下进行单打独斗的决心。在哈贝马斯眼里，从来没有诸如“资产阶级科学”这类范畴，已有的科学只展现了有用的或较有用的那些方面。这个文本体现出他自己的特色，也表明他决心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所有这些都体现在如下事实当中：他赋予对社会中立化和科学自我中立化的批判以核心的地位。而对阿多诺来说，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重要的，虽然在他看来文化——艺术意义上的文化和思辨思想——的中立化是一场确定无疑的大灾难。

哈贝马斯在这一组主题上的创造力，体现在他随后所写或与人合写的两项大规模的研究成果——《大学生与政治》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up>[96]</sup>——当中。由于以不存偏见的——当然也不是幼稚的——方法来看待科学，这些研究虽然受到批判理论那种乌托邦式的弥赛亚观念的启发而走向了激进民主思想，但也似乎非常严肃地致力于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规划。

《大学生与政治》，即“法兰克福大学学生政治意识的社会学调查”，是研究所就大学与社会问题展开的系列研究的一部分。它也属于社会研究所的大经验研究规划这一传统。这一调查想推断出深层的政治态度构成的系统类型，以便估计学生当中的民主潜能，它继续了《组群实验》、《权威主义人格》、《权威与家庭研究》以及对魏玛德国工人阶级研究的工作。同时，《大学生与政治》也是哈贝马斯本人的民主旨趣——这种旨趣带有战后进行的民主“再教育”的印迹——的延续。另外，由于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追随以及他与马尔库塞的相遇，这种民主明显激进化为了一种“民主理念”。

《大学生与政治》是一项经验研究的成果，该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于尔根·哈贝马斯、克利斯托弗·厄勒尔 (Christoph Oehler) 和弗里德里希·维尔茨 (Friedrich Weltz)。这项研究以确定访谈指导大纲为开端，此工作由维尔茨主持。接下来是依据“政治意向”(political disposition)、“政治倾向”(political tendency) 和“社会想像”(image of society) 等范畴对材料的分类，最终提出一种系统类型学，这一类型学是在对访谈材料的分析处理过程中得出的。最后写成导论——并应霍克海默的要求附了一个补充研究，这项补充研究是由弗里德贝格进行的。

问卷过程中的随机取样来自法兰克福大学 1957 年夏季学期录取的 7000 多名大学生中的 171 人。访谈在 1957 年 9 月选举第三届联邦议会选举酝酿期间进行，此次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赢得了绝对多数。访谈在研究所大楼里进行，平均每次访谈持续两个半小时，以访谈指导大纲为基础，但通常也采取自由提问的方式，因此在某些程度上具有对话的性质。被访者被告知这个调查只关注“研究中的各种问题”，而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尽可能被放到不起眼的位置，以防止被访者受诱惑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假装表现自己对政治感兴趣。被访者的陈述都尽可能逐字逐句被记录在访谈笔记中。访谈笔记是供分析的基本材料。除了主体部分中的一小部分和附录之外，本书的全文都出自哈贝马斯之手。

548

这篇绪论所具有的覆盖面广、公理自明的特性，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做法（以后者为主导），以及对捍卫现象学方法学的自信，都会让人想起阿多诺。对“资产阶级”学者在政治科学和宪法方面的研究予以系统考察，对被访者不进行深层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而之以对他们的“社会想像”进行阐释（这继承了海因里希·波比茨及其合作者对工人进行的那项研究），所有这些又都是全新的。这里的民主概念也是一个新东西，因为在《权威主义人格》，甚至在《组群实验》中，民主概念在研究委托方和主流形势面前只能让步，隐藏了那些激进地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革命的标准，而现在这里的民主概念被

哈贝马斯灌注了激进的内容，公开地成为了一种明确的衡量标准。

这篇题为“论政治参与这个概念”的导论，<sup>[97]</sup>概述了截止此次问卷之时的民主的发展历程，为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提供了一个大背景。哈贝马斯的立场主要基于几位仇视现代大众民主的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批评家——恩斯特·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卡尔·施米特、维尔纳·韦伯（Werner Weber）、吕蒂格尔·阿尔特曼（Rüdiger Altmann）——的著作，从而为“自由宪政国家作为一种为生存提供的集体手段的发展”勾画了一幅程式化的图景。民主曾经对少数人来说才或多或少是有现实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少数人只有受到这些少数人中的代表所颁布的法律的限制才能获得物质存在的方式。但实际上这毋宁说只是民主的一个消极方面，就这一方面而言，民主只意味着运用政治以保护被视为私人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个共同体。与古代的民主概念相比，它是消极的：对雅典人来说，共同体的公共事务较之管理生活必需品而言更为重要。与民主的激进意义相比，它也是消极的，激进民主认为一个民族对其物质存在的基础拥有支配权。20 世纪的状况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特征：一方面是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独立劳动的组织，二者迫使国家越来越多地干涉社会事务和私人事务。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会导致对生产的共享式的公共管理，或对产品使用和分配的共享式的公共调控。相反，管控性国家正在成长中，在这种国家里，超出公共控制的各种协会和团体作为代表人民的喉舌，对议会可以施加直接的影响。这样导致的无法避免的后果就是——像哈贝马斯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一句辛辣的批评所指出的——“在一个实际上十足的政治社会内部”造就了“诸多不关心政治的公民”。<sup>[98]</sup>

由于公开的阶级对抗的式微，矛盾具有了新形式：矛盾如今呈现为大众的去政治化与社会政治化本身日益加剧并行这种新形式。在影响政治的机会的分配方面，法律保障的平等与实际的不平等之间原来就存在的不对称状况相应地加剧了，以致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甚至也消失了，社会权力变成了直接的政治权力。这

同一过程还产生了一种后果，即此过程本身在人们的头脑中愈益不重要、愈益不清楚。社会实际上再也不能与国家分离，即便自由宪法一直规定它是与国家分离的。即便就其内容而言它是政治社会，但这样的社会却日益将它的公民职能化，使他们服务于各种公共目的，但又在他们的意识中把这些目标私人化了。<sup>[99]</sup>

依照这种分析，当今的时代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操纵性政治化和真正政治化之间，在专制福利国家和实质民主之间徘徊。依照对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流行解释，有关基本自由权利的众多条款确保了对公民的人身保护和公民的人身自由——然而在法律上讲，人民却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明确表达自己对于某个具体事务的意志。联邦一级惟一的政治参与机会就是国家联邦议会选举。但国家联邦议会早已丧失了对行政机构、官僚体系和各政党的控制权，影响它们的是各种院外组织和既得利益团体。因而选举的无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况且选举已经被各种竞选活动降格为某种纯粹招徕顾客的行为。

哈贝马斯引述了约瑟夫·A.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莫里斯·雅诺维茨、哈罗德·D.拉斯维尔、大卫·里斯曼以及赫尔穆特·薛尔斯基等人的观点，他们把民主等同于那些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中的普遍状况。在这种观点看来，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是健康的（如雅诺维茨所说），对制度表示赞成的非政治性的公民组成的行为模式的存在，被认为从长远眼光来看应当给予积极评价，因为它构成了制度的基础（如薛尔斯基在其《怀疑的一代》<sup>[100]</sup>中指出的那样）。这些观点相反，哈贝马斯诉诸于一种民主理念——并明确承认这一观念受惠于“批判理论”。他引用《启蒙辩证法》的一条格言，阐明批判理论的自由包括如下事实：“它认可资产阶级的诸种理想，无论是那些仍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传播着——尽管是以扭曲的形式——的理想，还是那些虽然一直以来以各种方式被操纵但仍被认为可赋予技术和文化制度以客观意义的理想。”<sup>[101]</sup> 民主理念，即合法的国家权力乃是由全体公民自由而明确的一致同意所间接授予这一理念，深深扎根于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内

部。它继续赋予德国的现存机构以现实意义；目的必然是要传达民主理念的合法性意义，即便这种合法性意义不过是由种操纵方式创造出来的。

哈贝马斯因此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复杂巧妙的政治参与概念。如果民主被视为一个旨在创造一个由有责任感的公民构成的社会并把社会权力转化为理性权威的历史过程，那么参与才能够超出它本身仅有的价值。因此，政治参与同时也就是促成某些可以真正实现全民参与的条件创造，依赖这些条件，对于社会存在再生产的全面管理拒绝将经济上的不平等作为参政机会不平等的根源。

这是衡量学生参与政治的标准，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标准；导论指出当前惟一的参政机会在于“议会之外的各种行动”当中，群众组织的成员可以将政府组织置于街头政治的压力之下，工业管理机构、国家和各种院外团体内部有职务的精英们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一般来说，大学生不属于任何群众组织，即使他们属于什么组织，但他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属于有职责的精英层。

551 在写作《大学生与政治》的那个时期，人们感受到的挫败感——甚至是对有着群众组织支持的议会外行动的挫败感——的强度日益显现。第一波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始于德国政府公开宣布愿意为德国军队提供核武器的时候。为了回应康拉德·阿登纳总理讲话中提到的“战术的核武器基本上只是火炮的进一步发展”，18位最杰出的德国核科学家，在1957年4月发表的《哥廷根宣言》中就核武器的种种危险向公众发出了警告。1957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决定给欧洲成员国装备核武器装置之后，市议会议员和教授们就起来抗议，而且工人、商店管理人员和工会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罢工甚至总罢工的决议。1958年3月25日，联邦议会在经过了四天的辩论之后，多数议员同意允许西德军队在北约框架内装备核武器，这实际上是对既成事实的事后批准。在卡塞尔（Kassel）的亨舍尔（Henschel），有几千名制造业工人举行了罢工。52%的西德和西柏林成年人支持罢工，以阻止军队取得核武器。4月中旬，有150000人在汉堡参加了示威。5

月 20 日，在法兰克福和其他各地也出现了 20000 名大学师生发起的示威，反对给西德军队配备核武器。一个月后，法兰克福的学生报纸《铁饼》(diskus) 上发表了哈贝马斯所写的一篇文章，是对此前不久发表的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和联邦议会中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弗朗茨·伯姆 (Franz Bähm) 所写的一篇文章的反驳声明。伯姆是新自由主义者，曾给《组群实验》写过序，社会研究基金董事会的主席。他说这些抗议企图制造恐慌，片面地试图与反西方的独裁者和压迫者合作，都是反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煽动民心的阶级暴乱，是“政治讨论的野蛮化和对基本法的破坏”，是在为新形式的纳粹主义铺路。这些全都是从独裁思想的武库里拿来陈词滥调，正如一位作者在给这个报社的来信中指出的那样，独裁思想要求“我们应该生活在一种民主之中，就仿佛我们处在专政之下”。哈贝马斯的文章反驳道，这些抗议反对的是“那些以我们的名义进行裁决的政治家”。哈贝马斯为公民投票的要求作了辩护，因为这些要求乃是对如下事实所做出的回应：联邦共和国并非“古典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

主要由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这场运动，将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对公民投票的要求上。但是公民投票被 1958 年 7 月 30 日的宪法法院 (Constitutional Court) 所禁止——这着实让围绕在赫尔伯特·魏纳尔 (Herbert Wehner)、卡洛·施密德、弗里茨·埃勒尔 (Fritz Erler) 和维利·勃朗特 (Willy Brandt) 周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派松了一口气。这个群体看到了 1957 年的普选结果并希望把社会民主党改为一个人民党，而且在他们看来，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作出表明军事承诺的姿态。1958 年 7 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压倒性多数获得了北莱茵河—威斯特伐利亚地区议会选举的胜利，这也表明支持反核武器运动并不能赢

552

的运动。现在看起来，哈贝马斯对群众发动议会外活动的那种希望甚至有些不切实际了，他低估了这类组织中起作用的那些遏制势力。而他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教授在议会内发起运动的期待，似乎成是对这样一种民主——动用一切可能手段阻止政治参与——的讽刺性抨击。

这项对于大学生的研究所运用的标准的严格性，还是很有用的。与通常的民意测验不同，这项研究试图在那些将会成为未来精英的后备军中测定民主潜能的范围。对研究材料的解释分三阶段进行：测定主体最基本的主动参政愿望（政治意向 [Habitus]）；测定主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政治倾向）；进而测定意识形态母题的表现及特征（社会观点）。运用的方法，正如对研究技术做说明时指出的那样，是“描述类型学”方法。对单个问题的答案或按不同论题设计的一组问题的答案都进行了分类，这样分类为这种类型学提供了基础。每个问题的设计，都是“事先依据社会心理学机制充分考虑到想像的客观情境，考虑到主体可能产生的反应而得出的”。常识上很正确的东西却与研究者的现象相差甚远，而且总会导致大错误。

在政治意向方面，研究发现了如下几种主要类型：非政治性公民、非理性地疏远政治的公民、理性地疏远政治的公民、天真的公民、有思想的公民和关注政治的公民。政治倾向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形式上的民主主义者、权威主义者和漠不关心者。社会观点可分为以下几类：衰落中的学术中产阶级的观点、内在价值观点、知识精英的观点、社会平等的观点以及一般资产阶级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是，只要各种政治意向和各种政治倾向能通过相应的社会观点固定为不同观念形态，那么就能对超出现状的隐含政治潜能作出总结了。如果我们设定，只有当一个有责任承诺的人或有思想的公民的政治取向完全与真正的民主趋势和社会平等观相符的时候，他的强烈的民主倾向才能被显现出来，那么，在全部被访者当中就只有4%的人才称得上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曾被归类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52名受访者，若从他们的政治倾向上再加以考察，“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则仅余6人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抽样中6%的人是顽固的权威主义者，他们在责任承

诺和有思想的公民权方面的政治取向，与权威主义的政治倾向和精英主义的社会观念结合在了一起——这类人有 11 人，是从 37 位曾被归类为权威主义的人中再经政治倾向考察而再筛选出来的。即使把标准放松，这些比例也并不会变得使人乐观。“有明确民主潜能”者占 9%，而“有明确权威主义潜能”者占 16%。就这两极的中间而言，倾向于专制的一方同倾向于民主的一方的比例相当。在受访的学生当中，显现权威主义倾向的人更多地来自那些有学术传统的家庭，而显现出民主倾向的人更多来自于没有任何学术传统的家庭。对于前一部分学生，无论是从客观的事业前景还是从主观的野心来说，他们的目标是获得高端专业人士的地位，而对于后一部分学生，他们目标是获得比较适度的地位。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依照这些调查来看，在各方面都是较弱的群体总是决绝地、明确地通过适当的手段来捍卫危机之中的民主，但这个群体又会受制于如下事实：与具有权威主义潜能的群体相比，这一群体随后会在更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由纯粹公民角色提供的适度的回旋空间之中。”<sup>[163]</sup>

只有 171 名被测主体，这种小规模取样，意味着表格中的百分比数字掩盖着一些微不足道的实数。但当数据被拿出来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人以代表性的印象。因此 1959 年夏天弗里德贝格着手进行一项补充研究。研究工作是由 59 名社会学专业学生参与进行的。他们用标准化的调查表对 550 名学生进行了访谈。这项补充研究确证了主体研究部分在政治倾向方面的结论是具有代表性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可以确证对于深层政治潜能分布的主体研究成果也具代表性。被归类为坚定民主主义者的那些人所持的社会平等社会观，却与社会主义信仰或对权力关系的清醒认识毫无关系。相反，它意味着社会差异被当成了某种外在的东西，它一方面被归因于世人的势利心态，另一方面则被归因于自卑感。与此同时，也否定了学者们享有特权的说法。因此总体结果显然不是太消极。

在对已经出现的异端的、批判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彻底清算之后，那些受过清算的传统还未被“削价出售”，因此就留下了一个问题：是

554 不是会出现一种政治意识研究无法评估的不满和抗议的潜能呢？毕竟，1950年代是摇滚乐和阿飞男（teddy boys）的年代，这表明自开展《组群实验》的研究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虽然不能用政治行动和政治知识之类的范畴来解释这些现象，但卷入到这些现象当中的那些人，也许会热情地欢迎更广泛的民主并将此视为一种解放。

霍克海默的反对延迟了这项研究的出版。他激烈地批评了这个导论。“此文内容与《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Rundschau*）里的文章有相似的主题”，他在1958年夏末这样对阿多诺说，提到了哈贝马斯1957年所写的“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的综述报告”，<sup>[104]</sup>并把此文视为用来立即建议免去哈贝马斯在研究所的职位的一个理由。哈贝马斯主张以实践的历史哲学来代替自足的哲学，前者的目标就是要把历史哲学转变成批判的和实践的活动，而在霍克海默看来，这种主张只能受专政以柄，而毁灭文明的最后残余。

“革命”这一词语，或许在你的影响下，已经被“将形式民主发展成实质民主、自由民主发展成社会民主”所替换，但是，就普通读者的想像而言，几乎不可能通过民主方式来理解这种假定的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政治影响的“潜能”。这样一个“被自由宪法钳制在资产阶级社会枷锁中的”民族，怎样才能在不借助暴力的情况下转变成所谓的政治社会呢？在哈（指哈贝马斯）看来转变时机早就成熟了？绝对不允许研究所出现这类报告——研究所就是靠这个设枷锁的社会所提供的公共基金来生存的。<sup>[105]</sup>

霍克海默也激烈地批评了对“经验材料”往往是不负责任的、半瓶子醋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这种材料的“有偏见的评价”。在他看来，这项研究的整个方法意味着对有些人——比如，对那些“表达出对于可忍受的状况的渴求和对把自己限制于专业领域的厌恶”的人——是不公平的，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为“为那些不想从国家的政治变革中期待任何积极东西的个人的观点”<sup>[106]</sup>提供了榜样。在1950年代，霍克海默成为

“不要实验！”这一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口号的坚定拥护者，而且他的观点是：研究所不可能通过出版这类作品而获得声誉。阿多诺为支持此项研究而争辩说，他自己已经在其中投入了很多的工作；前言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并不赞成这篇导论”，哈贝马斯的导论确是“tour de force [杰作]”；尽管“我们对这种在社会民主方面的因循态度”有诸多保留，但导论比他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材料更切近现时代政治领域的真正问题；研究在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也被着重地指出过，在法兰克福进行的研究是一个担保，宁愿让研究结果获得过多的同情，也不愿让结果遭到太多的否定；参与者也尽可能地考虑到了诸多异议和建议；他们尽全力在研究中努力实现“我们一贯的要求：把从我们这里获得的——暂时的也好，不充分也罢——理论母题与经验研究相结合”。<sup>[107]</sup>但霍克海默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大学生与政治》没有被收入“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出版，而且甚至不是由这一丛书共同出版者“欧洲出版公司”(Europäischer Verlags-Anstalt)出版的。哈贝马斯的导论因此部分地遭受了同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序言同样的命运。重要的出版是为那些“负责任的人”保留的。如果这些负责任的人腾不出时间来写——那更好。那就不会出任何毛病。霍克海默在1959年8月底写信给阿多诺时说，“如果我们的书出版了，其中这类问题”——即以成熟的选举民主政治为目标，而反对权威主义民主——“得到了严肃的对待，那么它肯定承载了一种职责。这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我们不明白，研究所里有些成员为什么仅仅因为出版了一个研究报告就想凭着一篇政治文本进入学界。”1961年《大学生与政治》由卢希特汉德(Luchterhand)出版社收入“社会学文本”丛书中出版，海因茨·毛斯是这个出版社的共同创始人。此书除了在附录中评论研究方法时提到研究所之外，其他地方再没有提到研究所。社会研究所——霍克海默认为它的同一性受到了哈贝马斯的威胁——实际上在此书中处于一种匿名状态，而且以这种方式，在这本将来要成为重建后的研究所曾经进行的最成功的经验研究的出版物当中否定了研究所本身。

在此期间，哈贝马斯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和功能变化进行分析，他希望以此分析能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授课资格。为哈贝马斯感到骄傲的阿多诺也乐意接受这个论题的提议。但霍克海默却像神话故事中的国王不愿意在婚姻上向自己女儿让步一样，向哈贝马斯强加了一个条件：哈贝马斯必须先做一项有关里希特（Richter）的研究。这就会花他三年时间。但哈贝马斯让步了——霍克海默因而实现了他的目的：除掉那类他认为会煽动研究所人员从事茶杯中的阶级斗争的人。他曾经这样评论这类人，“他面前或许有一个好的，甚至灿烂的著述事业，但是他只会给研究所造成极大的损害”。<sup>[108]</sup>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那里，他是马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后来哈贝马斯描述阿本德洛特时说他是“同路人部落中一位有党派追求的教授”。阿本德洛特的思想扎根于劳工运动之中。他曾在法兰克福跟随胡戈·辛茨海默学习，<sup>[109]</sup>而且在发配到“999 处罚营”之前就因参与抵抗活动而被纳粹监禁过，他后来又从“999 处罚营”逃到希腊加入希腊游击队。在战后时期，他也许是联邦德国所有大学中惟一一位公开而坚定申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阿本德洛特立刻同意为哈贝马斯指导授课资格论文，早在 1953 年，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进行的不同寻常的政治批评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时候，多亏了德国科研协会，研究所的财政独立性才得以维持，而哈贝马斯也完成了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在《大学生与政治》的理论性导论中概略描述的论题，在这里得到了详细的阐述，这些论题也包括对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至其巅峰的公共领域哲学的探讨。这项研究表明，研究所的一位成员第一次尝试提出“作为整体的社会理论的构想，这种构想也为”《组群实验》导言曾提出过的“舆论概念留出了余地”。这本书也是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关“管控世界”和从来都是弱势的个体如何落入体制化控制的方式的阐述提供实质性理论内容的一种尝试。决定了本研究视角的实践旨趣不容忽视。有没有可能使以福利国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走向民主化？这是一种表述该项研究之核心问题的方式，而这项研究的副标题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这

一范畴的探讨”。

此书具有历史系统性和跨学科性，而且它的结构也意味深长。中心章节“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与意识形态”之前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两章，之后就是“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两章。《大学与社会》序言中对描述现代大学史起着重要作用的观念，在这里再次体现为一种结构原则：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为现代带来了这样一种理念：即，涉及普遍利益的事务应经过公共讨论——然而，社会状况后来使这种理念要付诸实践变得越来越困难。

由人文主义传统而传承下来的希腊公共讨论范式，再次成为资产阶级特定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理念，在此阶段之内，倚重其自身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并通过文学公共领域的先驱或通过在社会交流机制中与贵族的接触而获得教育的资产阶级，在对抗国家时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什么可以影响资产阶级社会，除非它经过了资产阶级公民个人的公开政治讨论。为了使私人财产完全摆脱国家支配——国家越来越倚赖于财产的所有者才能运作，财产所有者通过强硬手段让他们本人支配的生活再生产领域被视为只受相关人员做出的公共裁决所影响的事情。服务于资本主义财产私人所有权利益的东西，证明同时已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中内在的统治倾向，被一种决定何为总体利益中实际需要的利益的那种非暴力的方法给冲淡了。

557

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持续统治的基础上，统治阶级仍然会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这些政治制度将它们自己废止的理念作为它们的客观意义来接受：比如，建立法律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veritas non auctoritas facit legem*）；把统治分解为随和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只有依靠一种对公众舆论的有说服力的洞察才能奏效。

如果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社会所需要的本质虚假的意识的表现，如果说它们因为自己以一种乌托邦的方式超越现实而在某一方面可以自称是真理，不管它们是不是仅仅在替自己辩护，那么，

只有从这个时期开始才有意识形态的存在。<sup>[110]</sup>

马克思坚持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观念，把它当作一面镜子，去映照在那样的社会状况下，完全非资产阶级的认识（realization）是否有可能。<sup>[111]</sup>这一方向是由现实发展所决定的。这种发展的首要特征，就是非资产阶级社会阶层，也就是缺乏财产和教育的阶层的比例日益增长，找到了进入公共领域政治的途径，而且开始对公共领域的机构、新闻媒体、政党和议会产生影响，并能够运用报章杂志这个由资产阶级锻造出来的武器去反对它。从这以后，会逐渐出现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它将使对社会再生产的指导和管理成为一件为所有人共同关注的事情。继而，“政治社会”就会使生产方式社会化。

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内在辩证法当中归纳出了其社会主义的对应模式。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当中，公与私的经典关系彻底颠倒了过来。公众的批判和控制扩展到了公民社会中的一部分私人领域——那些对生产方式有控制权的个人以前占有这些领域，亦即扩展到了社会必要劳动的领域。根据这种新型的公共领域模式，自治的基础不再是私有财产；自治再也无法建立在私人领域当中，它必须建立在公共领域自身当中。私人自治是原始自治的衍生物，它通过行使社会主义扩大化的公共领域的各种职能，独自构成了市民公共社会……资产阶级（*bourgeois*）与人（*homme*）、财产占有者与人类的同一性，被公民（*citoyen*）与人（*homme*）的同一性所取代；私人的自由就是作为社会公民的人的一种角色功能。国家公民的角色再也不等同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人的自主职能，因为公共领域不再是把财产所有者们的私人社会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相反，自主的公众域通过有计划地对已经被吸纳进社会的国家进行塑造，为自身确保（由各个私人构成的）一个拥有人身自由、个人闲暇和迁徙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当中，人们彼此之间非正式的、个人的交际将会第一次真正摆脱社会劳动的

束缚（曾经的“必然王国”）而成为真正“私人性的”行为。<sup>[112]</sup>

然而，“公共领域的辩证法”实际上变得不同于马克思提到的那种辩证法，仅仅显示了它为之奋斗的世界的本来面目。公共领域已经扩展了，但也因而成了利益竞争的战场，它越来越背离运用争论这种非暴力方式作为决定何为普遍利益中实际需要的利益的理想。公共领域一经扩展并纳入了非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就会将更广泛的公众贬损为一群受瞬间热情支配、没有能力鉴别什么是理性和真理的乌合之众；就会将公共领域重新定义为是由一群富有经验的和有责任感的精英所构成的领域。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更广泛的公共领域被剥夺了权力并被尽可能地改变了其功能，它被确认为它曾被谴责的样子，或被搞得更甚于此：不成熟，优柔寡断，毫无耐心。渗入公共领域并向国家提出他们集体利益要求的非资产阶级阶层，被展现为一群篡权者的形象，阻挠着旨在辨别何为理性和真理的公共辩论的继续进行。

哈贝马斯在表述这个问题时陷入了困境。在自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框架之内，资产阶级怎能如此恰当地决定何为普遍利益中实际需要的利益呢？在公共讨论中依据“某种理性甚或有效性”确定的那种利益，会不会只不过是它自身的普遍利益呢？<sup>[113]</sup> 鉴于“平民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变量在某种意义上被抑制”——此书前言中曾提及这一点但却明确将它排除在讨论之外，难道没有必要将处在这些语境中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自由模式相对化吗？<sup>[114]</sup> 保留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念，并使他自己的思考专注于把这种理念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现实进行比照，这难道不会导致对于干扰或者似乎破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那些因素的错误判断吗？哈贝马斯似乎退缩了，他不像基希海默那样去介入，基希海默在纳粹上台之前最后几年中曾以最尖锐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介入性结论：对于宪法和宪政现实的分析表明，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各种民主形式只有依赖于某个社会阶级无可匹敌的至高权力才可能存在。哈贝马斯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民主制度是依赖于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模式

559

的，他的这种退缩与思想史上某些原本可能促使他着手探讨这一论题的激发因素的不足有密切的关系。不但基希海默自 1920 年代后期和 1930 年代早期所做尖锐的研究，而且有社会民主党背景和工联主义背景的那些法律和宪法专家们自己之间以及他们与专制主义的对手们之间所进行的所有讨论，都成了社会民主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传统不但被纳粹主义破坏或拖延式地打断，而且晚至 1960 年代还仍受压制。在联邦德国，只有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坚持了这一传统，他是大学教授当中的一个局外人。可哈贝马斯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只知道基希海默、诺伊曼或弗兰克尔 (Fraenkel) 近年所写的著作。哈贝马斯提到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以来惟一一本对民主进行批判的著作是卡尔·施米特的《论专政》。<sup>[15]</sup>但施米特对民主的反民主式批判，在经历了发生过的以及施米特本人参与其中的所有事情之后，似乎更容易导致对未被扭曲的民主在对抗性社会中的不可能性这一难题的回避。

560 为了替代具体的宪政发展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一论题，哈贝马斯引入了一种思想，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古典自由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对应模式都共有一个成问题的前提：存在一种社会再生产的“自然秩序”，围绕这种“自然秩序”形成的普遍同意可以确实按照普遍利益来构建一个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利益冲突和官僚决策的必要性都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在无需进行很多争论的情况下得到调节。这样一来，民主政治内部的精英统治理论将会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某种相对化形式的模型取代阶级冲突意识。按照这些精英统治理论，群众选出的代表会通过非公共的商谈方式使群众同意妥协，从而再次当选。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自由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对应模式还共享着一个更深层的成问题的前提：公众能轻易地控制国家机器。这个前提与第一个前提假设紧密相关。因为如果在生活的再生产中有一种“自然秩序”，那么就无需一套精细的机构使来保障它。然而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某种管控型国家发展了起来，理性公众的监督似乎对这种国家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权限或该领域人员

圈子的扩展达到了可适用于社会主义公共领域的程度，相反，是国家与社会的相互牵制破坏了批判性公共领域的旧有存在基础，同时也无法提供一个新的基础。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组织及机构等方面出现的公共性的兴旺，在寻求并常常得到公众的支持，而这类公众都是由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消费者构成的，他们不再习惯于公共讨论，而且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只视为私人意见。

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落的扩展性论述得出了一线希望之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一方面带来了一些可以利用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大的毁灭的潜能，在他看来，这两者因为太过强大会导致控制它们的结构利益冲突完全可能失控。在这一背景之下，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发现是否还存在着把起作用的内在批判性公共领域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组织，这类组织相对于那些不包含内在批判性公共领域的组织可以起监督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统治和权力的实施是一种否定的历史常量，还是一个朝向实质性变化的历史范畴”<sup>[116]</sup>，将取决于从各种组织内部释放出来的批判公共性对官僚决策的监督是增大了还是减少了。（在1980年代，这种希望出现了新的变种：它取决于各种对增长持批判态度的亚文化群体是否能够通过草根组织形成自治的公共领域，或者，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实行权力和自我约束的深思熟虑的结合，取决于以权力和金钱为其统治手段的国家和经济能否敏锐地觉察到那些指向特定目的、与生活世界相关的激进民主舆论结构（opinion-formation）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取决于重心是否转变为以团结为基础来进行控制。<sup>[117]</sup>）

561

对于信仰民主政治的人来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一部促人觉醒的书，哈贝马斯那一代人中许多杰出人物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同时给予此书高度赞扬——比如莱内特·迈因茨（Renate Mayntz）在《美国社会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拉尔夫·达伦多夫在《法兰克福杂志》上，库尔特·松特海默在《法兰克福汇报》上都撰文称赞。这些评论家能够为他们自己和读者提供的惟一的慰藉，就是作者给自己设置了非常高的标准——在达伦多夫看来，这种标准太乌托

邦了。但是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种标准，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这种至关重要的诊断结论。人们也可以像达伦道夫那样强调统治绝不是无限的，“对抗性力量”的存在也很明确。但是，只有一个确定性的诊断结论，即战后欧洲民主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现状远离了它们所宣称的和人们想要的东西。

就哈贝马斯的具体提议而言，他自己努力在组织内部去创建批判性公共领域的经验并不令人振奋。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及奥斯卡·耐格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等研究所其他同事传授给学生的批判思想，在法兰克福，也在其他城市如马堡、柏林、哥廷根和明斯特产生了影响，对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SDS）内的知识左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法兰克福的大学生，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内的工作看作是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事业的跳板，而是当作忠诚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作和基于其上的政治活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于党的学生组织的不满，随着这群左派知识分子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内部的影响日益加强也在加剧。1959年民主党在巴特戈德斯贝尔格（Bad Godesberg）召开非常会议，在仅有16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基础性政纲，该政纲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点遗迹，而且丝毫没有表现出对1933年以来以及战后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予以思考的努力。196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支持除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以外的其他学生组织，除非它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巴特戈德斯贝尔格政纲’”<sup>[118]</sup>。三个月之后，在波恩就成立了由各类社会民主党大学生群体建立起来的社会民主大学联盟（Sozialdemokratischer Hochschulbund, SHB）。1961年10月，阿本德洛特和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其他一些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朋友、支持者和前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协会”（Sozialistische Förderer-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Förderer und ehemaligen Mitglieder des SDS）。一月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宣布：“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朋友、支持者和前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义支持

者协会’的成员身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身份是相矛盾的，正如对任何人来说他不可能既是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成员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一样。”这是一个奇怪的公告，它公开驱逐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行为好像表明别人已经执行了身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就不能是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成员这个决议似的，好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身份和“支持者协会”身份的不兼容性就是这个决议的结果似的。党的执委会对这项决定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由于已逐渐开始支配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左派知识分子早就确实愿意与党的执委会达成谅解，比方说，也曾声明他们既反对盲目反共但也支持与德国共产主义势力保持批判性的距离，所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这种行为的惟一解释就是，党的执委会是被其他各种事情给激怒了。这些事情包括：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毫不妥协地坚持开展反对为西德国防军（Bundeswehr）装备核武器的活动；又如展览活动等，他们举办展览把再次在联邦共和国里取得公职的一些纳粹律师的档案文件公之于众——这种活动既受到了《法兰克福汇报》的攻击——该报用陈词滥调称这是共产主义者授意的活动，也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攻击，他们以发布新闻的形式表明此次活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无关；再如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报刊《立场》（*Standpunkt*）重印了阿本德洛特对“巴特戈德斯贝格政纲”的批判文章。因此党的执委会要驱逐的东西正是组织内部由左派知识分子发起的批判的公共领域。党的基层成员容忍了执委会处理这种事情惯用的高超手段。对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驱逐得到了贯彻。只有知识分子对这个决定提出了批评。如果他们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他们的批评若采取的是“支持者协会”的那种形式，那么他们也就会被开除出党——比如，阿本德洛特、奥斯比·K.弗莱希特海默（Ossip K. Flechtheim）就是如此。作为某种毫无群众组织基础的议会外批判群体（critical public），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继续存在着，按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说法，这样的组织注定是无力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湮没无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据赫尔伯特·魏纳尔的回忆，该

党在 1962 年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和基督教社会联盟 (CSU) 代表就组成大联合政府事宜进行了几次秘密磋商。德国自由民主党 (the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DP) 在《明镜》周刊 (*Spiegel*) 事件\* 之后, 坚持要求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Franz Josef Strauss) 退出政府, 以作为自由民主党继续留在联合政府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打算任命施特劳斯为部长, 而拒不接受阿登纳为法定期满的联邦总理, 也不同意引入在英国实行的那种最高票当选制, 以此作为把自由民主党排除出联邦议会的手段。批判性知识分子可能有时无法容忍德国社会民主党, 但他们更忍受不了工会, 更不要说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那样的党派了, 在它们内部甚至根本没有党内讨论的诉求, 而且它们的青年组织向来只是党派政治事业的跳板。

霍克海默自 1958 年以来一直在瑞士卢加诺 (Lugano) 湖边的蒙塔日诺拉 (Montagnola), 与波洛克毗邻而居。已于 1960 年取得了法兰克福市的城市自由居住权的霍克海默, 一直阻止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通过授课资格答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不是在法兰克福, 而是由达姆施塔特的卢希特汉德出版社出版的。书中也没有提到社会研究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甚至比《大学生与政治》更为成功。

哈贝马斯于 1961 年成为马堡大学的无薪教师。他的就任演讲是“古典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sup>[119]</sup> 该文后来被作为开场白收入他的论文集《理论与实践》并非偶然。受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于 1958 年写成的《人的条件》<sup>[120]</sup> 的激励, 哈贝马斯把在 *τέχνη* 和 *πραξις*

---

\* 1962 年 10 月 16 日,《明镜》(*Spiegel*) 周刊因引用北约秘密文件报道军事演习、批评联邦德国国防军装备水准低下而遭国防部查抄, 其主编、编辑人员及文章作者以“特嫌”罪被联邦国防军逮捕。由于司法部对此事一无所知, 此事乃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 (Franz Josef Strauss) 一手主使, 因此是明显的越权行为。民众和部分官员纷纷抗议政府滥权, 次年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宣告《明镜》无罪, 斯特劳斯因侵犯新闻自由而辞职, 阿登纳总理本人也受牵连于 1963 年黯然下台。——中译者注

之间”做出亚里士多德式的区分作为日渐清晰地表述他的社会理论、澄清批判理论地位的关键。

在海德格尔的两位学生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和卡尔·洛威特的主动提议下，哈贝马斯甚至在完成他的授课资格答辩论文之前就被海德堡大学授予特别教授职位，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寻常的程序。他1962年在海德堡大学所做的就职演讲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在这个演讲中他认为，黑格尔找出了这次革命的世界精神之灵魂，旨在认可其成就的同时否认这些成就乃革命者之功，或是哲学家和革命者联盟之功。

弗里德贝格也于1962年离开研究所。一直以来他差不多独立维持着研究所的日常运转，而阿多诺总是征求霍克海默的建议和同意，甚至在一些琐事上也是如此。弗里德贝格于1960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了他的授课资格，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第一个学生是靠《车间氛围社会学》<sup>[121]</sup>获得此职的。他本来愿意以教授身份参加在吉森（Giessen）的研究所继续以前的研究工作，但是吉森方面提供的条件并不有利，此时他又收到了柏林的邀请，柏林给出的条件非常有利，于是他去了柏林。这样一来，研究所既失去了哈贝马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理论家，又失去了弗里德贝格——一名专业的经验主义者。

就在这个时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以表明他们对社会理论已有放弃之意。《社会学 II》（*Sociologica II*）收入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讲话和演讲，也恰好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于同一年出版。这是他们两人返回德国之后所出版的惟一一本已经完成的合作研究成果。简单的前言试图隐藏某种失望。收入本书的文章“既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观念，亦非对一以贯之的研究活动的反映”。霍克海默草拟的前言本来对此做了详尽的解释，但这篇前言并未

564

---

\* τέχνη，古希腊文“技艺”，它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技艺，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该词是一个认识概念，表示对任何一种制作和制造之基础的精通，因而包含着“理论”的涵义；πραξις，为古希腊文“实践、行为”之意。——中译者注

刊于本书之中。作者所呈现的是“个人观察，而非《启蒙辩证法》构想的那种社会理论”，这可能并非他们这本书传记式选编方式的结果，或是他们自身弱点的结果，原因可能在事情本身的性质、社会的条件当中。“连贯理论总是在其对象的连贯性和不连贯性当中预先假定某些潜在动力可能的实现，而这些潜在动力也总是通过超越主导条件的方式刺激理论观念成为远离纯粹事实的东西。”任何地方也不存在“理性的社会整体”，这一事实也减少了得出结论性理论的机会。霍克海默以某种听天由命的炫耀口吻来结束他草拟的这篇前言：“客观形势越不利于不连贯的理论，作者就越要把比他们所能想见的大得多的精力投入到他们的学术职责当中去，投入到讲座、讲演、谈话和学术讨论会当中去。”<sup>[122]</sup>而在这段话之前提出的诸如我们不能退回到庸俗实证主义，我们不应放弃“与实现理性人类状况的旨趣密不可分”的思想此类的要求，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放弃之前的虚晃一枪。霍克海默这里讨论的不是辩证的社会理论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而是某种调和而零散的理论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这是令人惊讶的。

由阿多诺所写的这个版本的序言同样令人惊讶。几个月以前，就在德国社会学协会图宾根会议上发生的“实证主义争论”期间，他还曾作过这样的发言：“社会学抛弃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是认输了（resignatory）：人们对改变整体绝望了才不再敢构想整体。”<sup>[123]</sup>然而这是一个暧昧的表述：由于这话出自批判理论代表人物之口，人们必然会认为这话指的是社会学的捍卫者在反对那种满足于搞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可是读一下阿多诺为《社会学Ⅱ》所写的序言，人们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批判理论家自己都放弃了对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所有努力。阿多诺为社会理论设计的蓝图的关键之点似乎一直都是：思考邪恶整体以拯救被它所压抑的差异，抓住对抗性体系以拯救被它所扭曲的多样性。然而，现在他的观点则是：

565                    日益集中的趋势已经简化成了市场供需机制这一假象；帝国主义的扩张通过把市场经济推向其规律统治范围之外的区域而延

长了市场经济的寿命；经济上的干涉主义和计划的条块分割已经渗透到了市场规律运作的区域当中——所有这一切，撇开社会的总体社会化 [Vergesellschaftung] 不谈，总是把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系统而非一个成问题的系统。社会本身日益增长的非理性，在今天威胁世界的大灾难和社会自我毁灭的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当中显露出来的非理性，与理性的理论是不相容的。总之，理论现在很难继续用社会本身再没话要说这句托词来理解社会了。<sup>[124]</sup>

阿多诺以如下方式表述了霍克海默曾提到过的挑战：

作者念念不忘的是思考社会和体察社会的那种方式，它不形成结论性的理论，也不以教条形式重复自身，它所要做的无非是对显而易见的并因而不自觉地展现自己底色的个案进行观察。思考与理论的关系相当于吃饭的人与面包的关系：理论被思考消耗，思考靠理论养活，理论消失在思考中。

这里既没给“结论性的理论”，也没给批判理论留下地盘。阿多诺明言自己的立场还是以批判的方式思想，这种方式吸收了理论性的东西。他和霍克海默拿出的仅仅只是“对尚付阙如的，或至少是不明晰的社会理论而言无关紧要的旁注”，而不是他们一直以来力图呈现的那种社会理论。为了为此进行辩护，阿多诺出人意料地把他们拿出的这种“旁注”理想化成他们合作的实际目标。尽管以社会体系的非理性为由否定了批判理论，可这种否定就真能充分表明他们两人都想达到的目的吗？霍克海默的前言草稿让阿多诺感到不好处理的地方是其中的一个假设：对理性的人类状况缺乏兴趣将影响到社会理论存在的可能性。

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回答，当今社会状况糟糕至极，它正走向大灾难，而且也看不到什么明显的躲避灾难的其他出路，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中，最可能的兴趣——从字面讲也是每个人的切身利

益——之所在，只能是在某种理论中给这种状况找出充分的解释。在与此相同的程度上人类已经变成了具体主义的（concretistic）人，人类正在等待着救赎的消息。

此外：

恰如一个硬币总有两面一样，就世界的目前情形而言，其另一面是：尽管局势的确正趋于灾难化，但它同时也许会在今天或明天引发某些实践活动可能性的复兴，虽说这种可能性在今天还是受到压制。只要世界仍是对抗的世界，只要它本身还延续着矛盾，那么改变世界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成为一个延续的传统。<sup>[125]</sup>

阿多诺认为，把现今日益非理性的社会视作“一个连贯的体系”是不可能的，认为它“再没有话要说”也是不可能的。但同样人们可以反过来说，这种看法并不能为得出辩证的社会理论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提供充足的理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他们过分自夸的社会理论实际上很没有把握，这一点使他们忽略了所有超出《社会学 II》序言中那些干巴巴词句的东西。

## 实证主义争论

尽管霍克海默对哈贝马斯抱有敌意，而且阿多诺也软弱顺从，但他们与哈贝马斯的关系也没有公开破裂。哈贝马斯的声望迅速提高，而且在返回法兰克福——这有赖于阿多诺的支持——接替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和社会学教席之前，还一直保持着与阿多诺的某种远距离合作关系。

社会研究所的其他同事，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和奥斯卡·耐格特等人，已经在“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中出版了涉及面非常广泛的人文研究著作：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马克思理论中

的自然概念》出版于1962年，奥斯卡·耐格特的《孔德和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则于1964年面世。<sup>[126]</sup>然而很早就流露出要发展他自己的批判理论的哈贝马斯此时却卷入了“实证主义争论”之中。这场随后在社会科学史中延续下去的论争源于1950年代。在阿多诺看来，这场争论就是1930年代在维也纳学派和霍克海默圈子之间开始的论争的继续，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和维也纳团体常在法兰克福、巴黎和纽约会谈争论。在霍克海默那篇最著名的文章中，这场争论被描述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冲突。哈贝马斯1962年1月在柏林大学讨论会上以“社会学的批判使命和守成任务”为题<sup>[127]</sup>发表讲演，此时他比阿多诺更为公开地点出了争论焦点之所在。

一年之后，哈贝马斯把自己早期一系列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理论与实践》。他希望这些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对社会科学中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研究的历史性推进。<sup>[128]</sup>他于同年在《见证》(Zeugnisse)上发表“科学分析理论和辩证法：对波普尔与阿多诺之间的争论的补充”。《见证》是为了庆祝阿多诺六秩华诞而出版的一个文集，其版式与“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完全相同。<sup>[129]</sup>此文或多或少公开地表明他完全站在阿多诺一方。 567

1961年德国社会学协会在图宾根举办了一次内部研讨会。会上围绕卡尔·波普尔和西奥多·阿多诺就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所做的陈述展开了讨论。拉尔夫·达伦道夫这样评论道：

无论是在研究方向上还是在理论立场上都显而易见的那些差异——此外还有基本道德和政治态度上的差异，都使得德国社会学领域中的这一代教师之间产生了分歧。这不是什么秘密。经过近几年的讨论之后，有关社会学的逻辑科学基础的讨论似乎成了一种适当的方法，它能使原有的差异愈加清晰地浮现出来，也因而能使这些差异为研究带来许多成果。可是图宾根讨论会并没有确证这一假设。尽管与会者双方，向他们各自声称的那样，都乐意毫不犹豫地采用同一个限定的范围，可总的来说，讨论还是缺乏观点的实

际分歧所应有的那种集中。此外，这次研讨会的大部分来稿都过于固守狭隘的论题范围，所以双方观点所隐含的道德和政治立场没有得到清晰的表现。<sup>[130]</sup>

“观点分歧”所引发的无非是互相指责对方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各种指控。这种情况甚至在图宾根会议之前的1959年于柏林举行的第十届德国社会学会议上就已经很明白了。霍克海默连续撰文讨论“社会学与哲学”，而柯尼希则在一系列文章中谈论“社会学界立场的改变”。霍克海默强调，如果社会学不关心整体命运，如果它不能履行让“社会按照它的目标”——人类共存之确当形式——“反思自身”，那么社会学就无法“对抗极权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从外部和内部威胁着整个欧洲世界”。<sup>[131]</sup>柯尼希肯定认为这说的就是他本人，因为他一贯反对霍克海默的这些主张，柯尼希坚持认为这些主张对“纯粹的”、专业的社会学而言不再适用。他于是在自己的演讲中给予回击。他说，恰恰是已经在工厂或办公室里谋到了职位，“盼望着机器开动起来”的那些社会学专家才能成为批判的专家，他们“在真正能有所图的每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不仅在含糊的文学领域，而且在他们断定前途看好的每个事实上——都是批判专家”，柯尼希评论道：

但是需要对他们使用的批判概念做一番考察。批判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方面或那方面“谴责”一下的事情，比如把既有现实套入一个模糊的概念。索莱尔 (Sorel) 已经指出这种乌托邦式的攻击方式当其运用于实践之时最终只能导致绝对的暴力和恐怖，因为，用盖格 (Geiger) 的话说，“今日之造反者可能便是明日的独裁者”。还有一种对极权主义的批判隐秘地包含着极权主义，这种批判大多体现在受马克思启发的文化批判当中。相反正如盖格所看到的那样，权力批判只能从完全不同的路向上发展起来，也就是说从经验的社会科学当中发展起来。经验的社会科学能针对现实衡量出独裁者的意识形态托辞，因而其工作方向是真正的“启蒙”。<sup>[132]</sup>

在玩用现实来反对独裁者的意识形态，反对——更为积极地反对——乌托邦意识形态和造反者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纯粹的”社会学家柯尼希发现自己与当时的专家统治论鼓吹者薛尔斯基以及新自由主义科学理论家波普尔是一致的。薛尔斯基具有“现实主义的社会学 [realsoziologisch] 眼光”，支持社会学从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向个人家庭和事业领域的退却，认为这是“使社会思想的抽象和图式返归个人存在经验和客观性之本”。<sup>[133]</sup>甚至连薛尔斯基也曾经至少在著作的一个章节里谴责过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极权主义倾向。薛尔斯基在 1953 年出版的《德国家庭的当前变革》中写道：“武断地反对权威主义家庭的这种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在用官僚权力反对家庭的亲密性以及家庭内部的自然的个人权威。”<sup>[134]</sup>

在图宾根研讨会上，波普尔和阿多诺彼此亲切叙旧，二人此次都仅满足于扼要重述各自对科学哲学的态度。波普尔受新康德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于 1934 年在维也纳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当时他 32 岁。他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对者。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把经验主义和现代逻辑结合起来的方式与对难题可能的理论解决办法进行批判性检验的方式是不同的，表现出了对研究中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批判路向和可证伪性，即运用批判性讨论以获得对难题可靠但绝非最终的解决办法的方式，在波普尔看来乃是自伽利略以来现代科学家们一直实践着的典型批判方法，这一方法也可移植到历史学和政治学之中。

569

在他提交给图宾根会议的论文中，波普尔再次提醒社会学家要当心“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指“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以及“自然科学方法的归纳神话”在社会科学中的移植。相反应该移植过来的则是他的批判科学哲学。具体而言，这意味着要以经济学为特定模型，因为经济学这个学科长期以来较其他社会科学具有更完美的形式性，一直提供着对社会现实特别有力的抽象。波普尔认为经济学实践着“客观理解的方法，或情境逻辑”。<sup>[135]</sup>在这里，理论对“客观地合乎情

境”的行为的重构得到了详细阐述。这类理论重构是理性的，适用于经验批判的，因而也是能予以改进的。出于情境分析的目的，个人的愿望、动机和记忆等等必须被转化为客观目标和客观形式，从而使个人的愿望、动机和记忆等适用于这个或那个理论、这种或那种信息。理解意味着寻找既定行为的情境逻辑，后者使得科学家能够说，“如果我有相同的目标、理论和信息，我就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行动。”因此这不是对主观愿望与客观限制、主观思想与客观条件在社会行为中相互关联的方式进行研究的问题，而是把主观因素转译为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相类似的因素的问题。然而，这一转译程序在波普尔批判科学哲学框架之内如何可能，依然相当模糊。

波普尔强调理论的第一性和经验研究的纯粹矫正功能，因而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实证哲学家更接近于批判理论。但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的自然科学知识进步的历史事实才是他所有哲学反思的出发点和批判标准。他还把以实验或测试和理论或系统演绎双管齐下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经验和分析方法等同于科学理性本身。但他也承认现在尚不能由经验证明的假设的可能性，这表明他更重视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性。

阿多诺并打算对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系统比较，也不打算以对波普尔的立场做内在批判的方式阐明自己的立场，他只是列出了一系列要点以表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实际上是把批判理论当作非科学而予以拒绝的。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不认为仅仅依靠与充其量不过是临时性的社会总体概念保持持久联系而得出的那些个别的观察会产生多大的价值。570 它不认为非演绎性理论可以成为理解矛盾的、对抗性的社会的适当方式。它否认个人的经验会比正式的、有组织的科学体系所确定的结果更准确。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还对如下一种见解——社会学评价不仅不能被内省型知识中立化，相反这种评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构成知识——持否定态度。阿多诺在他提交的第二篇论文的结论部分争辩道，“对现实矛盾性的体验并不是某种武断的出发点，严格说来它更是最初构成社会学可能性的动机”，他还说：

社会学抛弃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是认输了：人们对改变整体绝望了才不再敢构想整体。但如果社会学随后希望致力于理解那些确凿的事实和数据以服务于存在者的话，那么，在不自由的条件下，这样的进展却将日益贬低那些让社会学自认为战胜了理论的细致见解，使它们彻底变成琐碎无益的东西。<sup>[136]</sup>

波普尔和阿多诺两人都主张去体验社会的矛盾性；但他们对这方面的体验和反应却是从不同方式进行的。在讨论中，阿多诺承认他自认为社会现实已经迫使他回到了左派黑格尔主义的立场。<sup>[137]</sup>人性和现实情形让摆出“好像在明天就能改变世界”架式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说谎者。在这一点上波普尔批评他忍受着必定是从源于过度扩展的乌托邦和革命希望的破灭产生的“悲观主义”。<sup>[138]</sup>相反，像波普尔这类相信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但也没什么渴望的人，却能成为一名乐观主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争论达到了典型的对峙状态。波普尔提出的观点是人只能做可能做的事情，同时表明他与阿多诺在更理性的社会这一理想上是一致的，但他认为这种理想是某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但人必须予以期待以便达到它可能实现的程度。他指责自己的对手将不可能的东西表述为理论上可能的东西：阿多诺即便不是一名鼓动造反的乐观主义革命者，也是一名绝望的反改良主义者，散播着对社会主流状况和那些真正可能的东西的不满，结果却采取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形式，而这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哈贝马斯的方式则与阿多诺完全不同。他之所以能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争论，原因在于他的思想与阿多诺的思想，与霍克海默圈子的其他理论家们的思想大相径庭——这一点至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能将内在批判方法用之于波普尔，而阿多诺只是并不经心地尝试过这种方法。作为研究批判的公共领域和政治伦理活动意义上的实践问题的理论家，哈贝马斯对待波普尔及其实证主义批判的方式基本上与马克思对待自由主义的方式相同，就是用资产阶级公共领

571

域观念来反衬非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实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哈贝马斯接受了波普尔关于科学客观性应建立在批判的、理性的讨论之上的思想，并将其与人们之间交流时进行自由对话对“理解理性” (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 的需要相比较，倘若自然科学中的知识进步模式被抛弃，这种对于“理解理性”的需要就可以成为波普尔所持的那种观念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条件。<sup>[139]</sup>

逻辑经验主义或新实证主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观念，即科学只应专注于科学操作而无须关心是否产生了真正的科学发现。与此相一致的是科学发展基本上是由科学自身内部所决定的这种直到 1960 年仍占优势的观点。这样的理解把科学当作了由客观知识构成的非历史的、非社会性的“世界 3” (波普尔语)，其内部结构与发展只服从于逻辑。波普尔扩展了这种观点并将科学进步问题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尽管这一做法受到“证伪关系”的限制。所谓“证伪语境”是指，从错误原则这个基础出发，对理论假设进行认识论的、逻辑的考察和实验的检验，以便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但波普尔对“发现关系”，对心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则不予考虑，断定这些无关乎科学发现的逻辑。哈贝马斯在海德堡期间曾根据他的朋友卡尔·奥托·阿贝尔 (Karl-Otto Apel) 的建议对美国实用主义者进行过研究，而且尝试着把他们的工作评价为实践哲学的某种民主的、美国式的变体。哈贝马斯采取了如下步骤。他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看作实证主义哲学自我批判的第一阶段；进而他借助于某种实用主义观点把自然科学中的发现模式引入比波普尔所构想的关系还要普遍的关系之中，从而使第一阶段激进化；最后把波普尔提出的批判的、理性的讨论的思想纳入他本人勾勒出的实证主义观念之中。他为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提供了实证主义辩护，从而为辩证类型的研究之逻辑基础和实际基础留出地盘，最终给已经被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绝对化了的技术唯理论加上了文化限制。

在对以经验检验方式构成的科学哲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所谓的“基础问题”，这个难题就是逻辑经验主义曾指出过的，基本

的感觉材料不能被视为某种直观或直接的自明性的东西。波普尔曾提议把他的理论可测验度标准运用于“基础陈述”，当作对这一问题的可能的解决办法。某一基础陈述是否有充分的经验根据，可以由共同参与证伪某特定理论的所有观察者暂时但总是不断调整的多数赞成而得到断定。但是，多数赞成必然以期待行为的社会标准化形式为导向。在哈贝马斯看来，实验条件的特性和假设性规则的特性（有条件地对显著行为的预测）都意味着可以从实证主义方面理解波普尔所发现的发现步骤，也就是说，意味着可以把发现理解为社会范围内劳动活动领域的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将研究过程看作社会制度化的诸多活动——社会群体就是靠这些活动维持他们本质上就不稳定的生活——组成的广泛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就根本不会出现所谓的基础问题（basis-problem）。因为，基础陈述的经验有效性不再单单来自个人观察的经验根据，而且还来自对于信念领域的各种个人看法的早先综合——这些感知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能以广泛的根据来证明自己。这种情况在实验条件下才会出现，而实验条件严格来说，模仿的是那些已经自然内置于社会劳动制度当中的对于行为后果的控制。然而，如果经过实验检验过的类似于法则的种种假设的经验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源自工作过程这一背景，那么，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科学认识也肯定接受通过相同的劳动生活参照对自己做出的解释——即，科学认识是一种活动，一种对自然的具体统治。<sup>[140]</sup>

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作为一种活动的劳动这一基础之上，存在着使客观过程成为可理解的过程的兴趣。经验分析型的研究也因而必将以这类兴趣为导向。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这种技术型兴趣才能说明该种科学的规范力量——这种规范力量既被新实证主义又被批判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理性，并因而被他们说成是原则上价值中立的。所以，哈贝马斯用人类学论据来解决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的争论：经验分

析型科学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构成要素，它们对于社会再生产的特有功能实际上也就是它们可能性的条件。因此，哈贝马斯展现的是为实证主义型科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为之进行过大量精细说明的那些科学——提供的一种先验—实用的（transcendental-pragmatic）基础。

573 但是对于哈贝马斯对实践行为的科学方式的可能性、对理性实践的相关认识、对有关目标和意图的理性共识、对历史过程的实践控制等的辩护而言，这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经验分析科学所谓自己垄断科学理性和客观性的断言，被那种认为它们具有价值中立性的观点给驳倒了。它们也有客观的生活参照（life-reference），但由于客观的生活参照在世界上太显而易见了，以至于科学和科学哲学家都对它视而不见。这种健忘在技术性认识兴趣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事实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后果得到解释。

就交换关系也影响工作程序并使生产方式依赖于市场这一点来说，对社会群体圈子起构成性作用的生活参照物——即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具体关系，已经被撕裂成碎片……一方面，正是在交换价值中，实际上投入的劳动和消费者可能的享乐都消失了，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参照的多样性和以认识为导向的兴趣之多样性，亦迷失于那些主观化价值品性外表被剥除之后还依然存在的客体之中。这就更容易排除那种不知不觉中占优势的特殊兴趣的控制，从而有助于功利化的进程，把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合并到劳动过程当中，并将它们转化成生产力。<sup>[141]</sup>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理论和技术就是这样结合成自然科学的。

经验分析科学再也不能依据它们所宣称的对于价值中立和科学客观性的垄断来搪塞它们运用于社会领域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了，再也不能说不存在科学的替代方案，再也不能说对出现的难题的解决只是个

时间问题了。因此，至少已经产生了一个空隙，可以向其中引入某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这种新型科学免却了经验分析社会科学的某些根本困难。比方说，即便无法区分出手段一目的关系并以之作为人类行为的解释模式，它也不会茫然无措。相反，可以证明的是，手段也许是充满价值的，而目的则可能暧昧不明，只有在更大的社会语境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倘若如此，就不能以这种不同类型的科学不具有价值中立性为由而摒弃它。相反，可以进行一种尝试，在某种可替代的、“在先验层面可假定的参照系”之中建立辩证类型的社会科学。

这种参照系不同于对客观化过程进行技术控制的领域的那个参照系，它的特征几乎不能那么精确地得到表现。哈贝马斯通过对这一参照系的界定，旨在获得一种适合先验—实证主义的或认识论—人类学基础的人类形成过程的概念。在回应波普尔的学生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的文章时，哈贝马斯把他所积累的各种理论资源汇总为对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的原创性和综合性的描述，同时这一描述也紧扣论争主题。他的理论资源包括罗特哈克尔的“生活方式”理论、盖伦的“活动领域”理论、伽达默尔作为交往性存在的人之基础的“对话”理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与科学之关系理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薛尔斯基和里特等人被科学所破坏的文明中各类科学所扮演的角色理论、汉娜·阿伦特的理论、技术与实践间关系理论、弗洛伊德的作为自我反思治疗法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对阿尔伯特的答复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哈贝马斯写道：

在作为严格行为科学的社会学中，与社会群体自我理解相关的问题是无法明确说明的。但这些问题并不因此而无意义，对它们的讨论也不会停止。这些问题在客观上源于如下事实：生活再生产不仅提出了在技术上可解决的问题，相反，它还包括与目的理性对手段的使用相应的适应过程。社会化的个体只有通过群体同一性才能持存，而群体同一性与必须不断构成、破坏、再构成的动物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只要社会群体还以与它们所包括的个体保持极

不稳定的平衡这种方式来调节它们的新陈代谢，那么这些社会群体就只有通过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通过对社会劳动体系的再适应而保证自己的存在。每个人在其生命历程的危机之中，都重复着同一性即将失去和口头交流不畅的这类经验。可是，这类经验并不比人类历史上的集体经验更真实，后者是社会总体主体在面对自然时为自己塑成的。与这个经验领域有关的问题，由于不能通过在技术上可利用的信息而得到解决，因此无法通过经验分析研究来解释。然而社会学自其18世纪产生伊始便试图讨论这些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社会学就不能不采用以历史为导向的解释；同样，很显然，由于受制于这些问题加之于它们自身的难题，社会学也不能回避交往的形式。我指的是一种辩证的交往情境网络，个体在这种网络中在物化（reification）和非定型性（formlessness）的各种危险之间发展起他们脆弱的同一性……在对于意识的评价当中，同一性问题将自身既呈现为一个生存的问题，同时又呈现为反思的问题。辩证哲学以前就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sup>[142]</sup>

在这一切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乌托邦的最初版本，它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种从政治公共空间的发展中产生的关于统治的简化和理性化观念的人类学变体，包括一种被科学促成的对于“全面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的复原，以及“用日常语言的自然解释学来说，这种理性就像它过去那样，仍然在自然地起作用”。哈贝马斯所说的日常语言的自然解释学是指，日常语言乃是使自我反思成为可能的一种中介：在必要之时，日常表达总能用日常语言来解释。哈贝马斯说，作为言说主体，“我们总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导向达成同意，并因而导向理解性的某种交往当中”。<sup>[143]</sup>

1965年夏，哈贝马斯作为接替霍克海默的继任教授发表了“认识与人类旨趣”的就职演讲。这个演讲表明他最终在与实证主义的冲突中采取了攻势（哈贝马斯和阿多诺都还使用“实证主义”这个概念，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无视科学主义阵营中的变化与进步——这一阵营仍把科

学研究的当代统治形式视为绝对，而毋宁说是为了保留一个普遍性概念，以明确指出所有立场所共有的核心因素)。哈贝马斯自觉地将自身置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之中，自信地说他再次在一代人之后继续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差异的这个论题，该论题曾是“马克斯·霍克海默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就职演讲概述了“批判的科学哲学”，<sup>[111]</sup>后者揭露了科学实证主义理论要求占据各种各样的科学范畴的命令，同时运用一系列论点要求不但终止科学实证主义的侵占过程，而且试图提出自身的反侵占。

在美国，科学间的划分通常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别。薛尔斯基在1963年关于德国大学理念与结构及大学改革的研究著作《寂寞与自由》(*Loneliness and Freedom*)中，也把德国和现代欧洲的科学发展及其学院架构分作这三个部分。<sup>[112]</sup>在洪堡改革之后的那段时期，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liche]科系已典型地从哲学科系中发展出来，而哲学科系也因而成了只包括非自然科学学科的“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liche]科系，但“人文学科”不包括医学、法学和神学，它们作为非品格教养型的认识形式(nicht-bildende Formen der Wissenschaft)独立发展出各自的科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等学科继而从人文学科科系中发展出来，或者与人文学科相平行地发展起来，构成了社会科学综合体系。进而，例如在美国，就发展起来了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三层架构。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对德国学院体系的这种解释掩盖了科学能够提供品格教养(Bildung)意义上的教育这种理念的衰落史，而这种理念一度体现着德国唯心主义和洪堡的大学改革的特征。起初，数学和自然科学也都被视为品格教养型科学，因为在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看来，它们仍是与被心理内在力量推动并激活的自然整体相关的。<sup>[113]</sup>狄尔泰令人难忘地在人文学科中复兴了品格教养这一教育理念，但这一观念在惯于把历史与传统变为陈迹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已是明日黄花。当各门社会科学依次形成新体系的时候，它们从未认为自己具有品格教养的特性。如果说它们宣称自己具有实践相关性的话，那么这种相关性

仅与管理性事务有关。

汉斯·弗赖尔在1930年代出版了《作为一种现实科学的社会学》，该书尝试提出一种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学体系。弗赖尔也是惟一一位赋予社会学以保留作为品格教养的教育这样一种特殊职能的论者。社会学的职能便是提供“社会现实的科学性自我发现”，“事件通过人类意识的自我发现，人类在生存上便属于事件”。正是哲学基础和逻辑分析帮助社会学抓住它的根本任务，即“理解、解释、积极介入生活”<sup>[147]</sup>的任务。虽然弗赖尔把康德对于自然科学、历史与社会学的可能性条件的探讨作为先决条件，但他自己的答案却并非康德式的。

弗赖尔本人这样给出他本人的答案：他将“有意识的求知意志”、某种“明显的认识态度”视为认识形式的科学品质的先决条件。他依据对对象的三种不同结构类型和这些对象与生活之间的三种不同关系区分出三种认识态度类型：

人希望生活在大地上，他希望耕作土地，也就是说，希望把大地归入人类的创造之中。若没有这种关于意志——即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的技术意志——的相当原始的事实，自然科学的认识态度则是不可理解的。哪些要素构成了复杂的自然过程的那些因素，何种规律支配着这些过程，它在自然过程当中的存在将从既有情境A中创造出特殊情境B的物质系统有哪些类型——所有这些问题都代表着隐藏着的自然科学发现之方向，并决定着自然科学所有概念的发展。这种认知态度并不意味着出于实用目的各种动机的介入，相反此种认识态度由认识对象本身所决定，由人与对象间活生生的关系所决定。可以肯定的是，现代西方科学却以特别极端和肆无忌惮的方式贯彻了这种对自然的进行暴力考察或预谋考察的社会思潮，其目的是一步一步地对自然实施支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自然科学中这种历史的思想方式，我们所习见的并认为天经地义的这种思想方式，其基础也是事物本身所决定的普遍有效的认识态度。<sup>[148]</sup>

对于理解和内心接受的认知态度，是与重要的心智构造相对应的。对于现实的自我承认（self-recognition）以及企图改变社会的自我承认的认知态度，则与正在发生的历史相对应——也就是说，与人类本身在其生存之中所属的重大事件相应。

（1945年之后，弗赖尔为社会学所铺设的基础终于归于沉寂——他的这本书仅在1964年才首次再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像海德格尔一样，最初认为纳粹运动有可能复兴存在，尽管他对纳粹有所保留，但他从来没有表明自己与法西斯主义是保持着某种距离的，即便1945年之后也是如此。但既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曾被人忘却，那么在同一环境之中，弗赖尔也应被人所记起，他曾是那么自信，并不无充分理由地在他的书中把“德国”或“欧洲”社会学与“美国社会学”相对立，并对那些把“让我们成为美国式的！”作为座右铭的社会学方法予以猛烈地嘲讽。然而，在战后的联邦共和国这种态度根本没有立足的余地。）

哈贝马斯知道弗赖尔的著作，而且来自批判和保守两方面的激发因素都可以在哈贝马斯对于批判社会学基础所做的思考当中得到融会贯通。当哈贝马斯再次着手处理批判的科学哲学之时，他紧密联系该领域的最新发展，而他的概述也更具现实性，较之于他的前辈也更具吸引力。这次概述在随后的几年被扩充为《社会科学的逻辑》和《认识与人类旨趣》。

哈贝马斯主张，研究过程中这三个范畴一方面涉及逻辑规则与方法论规则之间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则涉及认识论旨趣，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在经验分析型科学当中，被许可的验证体系之逻辑结构和适用的检测条件类型都意味着，对现实的把握基础乃是以客观化过程的技术控制为导向的旨趣。在历史和解释性科学中，理解意义和阐释文本的方法论框架，以及将传统应用到某个人自身与这些因素密不可分的处境的尝试都意味着，对现实的把握基础乃是以保存并扩展可达成一致同意可能性的、指向行动的主体间性为向导的旨趣。而就以批判为导向

578

的科学而言，其方法论框架——由客观化的研究程序或法理性知识和一种理解的方法构成——则意味着，对现实的把握依据一种对表面客观但实则可变动的依赖关系的消解为导向的旨趣。客观性的先验框架和可能性条件在第一种科学中由对技术的认识旨趣所决定，在第二种科学中由对实践性事务的认识旨趣所决定，而在第三种科学中则由对解放的认识旨趣所决定。对科学的实证主义理解歪曲了我们对这些先验认识旨趣的看法。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就可能被误解为这样一种纯粹理论，它仿佛不是为了获得对自然的统治而形成的，而仅仅是为了做出客观的发现。同时人文学科可能陷入历史主义的实证哲学之中，而社会科学则会僵化为社会技术学。

在哈贝马斯看来（他的出发点是康德），科学与世界关系的这些先验条件源于经验条件。它们的基础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史”<sup>[149]</sup>之中，而“人类的自然史”通过劳动和语言而得以延续，并被权力关系塑形。哈贝马斯说，人类作为语言的存在正是从自然之中成长起来的。而语言结构乃是对解放的某种预期。对于作为语言存在的我们来说，在自律与责任之中先验地认识到某种旨趣是可能的。“我们的第一判断往往毫不含糊地表达着普遍而不受约束的多数意见”。语言是“理性”形式同时也是“是理性意志”的具体化。在被解放的社会中，统治将消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由“某种非权威的、普遍实践的话语”构成，而自然也将任凭人类的技术支配。<sup>[150]</sup>

哈贝马斯的这一概述和他以往的表述一样都是规划性的，这个概述看上去指明了从实证主义中挽救科学的道路。说到自然科学，哈贝马斯在这里从皮尔斯和波普尔那里汲取教益；在人文学科方面，他则受益于狄尔泰和伽达默尔；而在谈到社会科学时，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主要资源。这种阐释科学的特殊方式似乎由于其先验—实证的演绎而更具深度。它谈论经验的和分析的科学、历史的和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而不是简单地谈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规范性认识同可以借此规范性认识而产生的反思程序之间做出区分，所有这些似乎都使哈贝马斯的科学哲学的方法

和研究领域都不是肤浅地从外部强加的，也使他的科学哲学没有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学术组织的那些偶然形式上。历史的和解释的科学以及批判的科学这些概念也似乎为他提供了基础，此基础正是构想终极目标和实践的政治活动领域中的理性化所必需的。较之于“被实证主义分开的理性主义”而言，这种批判的科学哲学的蓝图似乎论证了一种完整形式的理性主义，包容了社会—文化结构的特殊理性化。语言中包含着作为人类存在条件的理性思想，这种假设似乎也为独立于历史传统的社会批判创造了某种标准。这就是哈贝马斯借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观念——人是语言存在，所有说着同一种语言的言说者都共同栖居于此种语言之中——而得出的结论。

然而哈贝马斯的概述在多大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呢？他的假设立刻招致许多质疑。<sup>[151]</sup>用这种科学哲学反思各种现代科学（它们的形式被实证主义的误解所扭曲），用它去发现人类再生产的先验结构——即为处理外在自然、内在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完全有效标准的那种先验结构，这是可能的吗？自16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劳动和技术领域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至于无法想像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的先验结构只是由同一种认识旨趣构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17世纪不曾经历过某种特定的技术形式、某种对外在自然的特殊关联方式——其他在质上截然不同的关联方式与之共生共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开端么？那种质上完全不同的关联方式之所以不同，并非因为它隐藏于文化面具之下，而是因为它既把自然看作在技术上可利用的因果网络，而且同时也将其视为一种需要理解的过程，而理解者本人也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取得发展的劳动工艺能被视为社会物质再生产的范例模式吗？它真的代表劳动本身，即摆脱了文化面具的劳动吗？——或者说就是它扭曲了劳动形式吗？

哈贝马斯为什么不承认他想“引入某种新‘方法’而与已完善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抗衡”呢？<sup>[152]</sup>与类似规律性的互动关系相关的信息在其所影响的意识之中形成了某种反思过程，如果这一点乃是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真正关注所在的话，那么已完善地发展起来的已有社

会科学方法将会在某些领域发生改变而在其他领域得到补充。如果把社会科学中的认识建立在以理解为其必需的解放旨趣之上，而这样一种基础为此类科学提供了它所特有的客观性形式的话，那么数据收集的方法就不得不尽其可能地考虑如何开动自我反思的过程——这一点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开始反犹主义研究计划时所考虑的一样，尽管他们的思考尚未上升到方法论原则的高度，也没有把他们对此的思考继续下去。<sup>[153]</sup>至少在一项研究的最后阶段，批判的社会科学家是会把他的“实验主体”当作他所期待的样子来面对的——至少当这些“实验”主体在批判的社会科学家本人的标准衡量之下都是些社会自然形成的种种限制之下的受苦人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仅限于呼吁社会科学家在自我理解方面改变自身是不够的，同样在另外一方面仅仅希望得到恢复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将在某一天使得科学研究结果融入社会的生活世界视域也是不够的。

霍克海默一方面与阿多诺、另一方面与哈贝马斯在他们的基本论题和对理性社会与好的生活的理解之上产生的差异，可以解释另一个问题。哈贝马斯所写的大部分东西都对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里得来的思想进行了明确表述和体系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表述口吻也是不同的，这并不是仅仅因他们对学院制度或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态度所造成的结果。霍克海默 1958 年在信中谈到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的综述报告”一文时已经触及了他们根本论题之间的差异：

有这么一种现象，它认为自然，认为在“青年马克思”那里的这一原则，即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革命学说的框架内”批判地对待每一个对象——“当然也包括自然”都必定是可能的这个原则，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只不过是对夸大了的自由概念的简单颠倒，因而它最终把自然当作纯粹的支配对象、当作新陈代谢方面，或者如哈[指哈贝马斯]将其与生产性劳动对举时所说的那样，作为“人类的自然变换”方面而排除到和解之外。在哈看来，只有对人

类的统治才能被算作“妄语”，而由个体所产生的对一切造物的掠夺性暴力则不是。<sup>[154]</sup>

这的确点出了哈贝马斯的典型思想。他认为如果对自然的盲目限制不再扩展为人对人的统治的话，如果相反人类作为有言说能力的存在摆脱统治而自由联合，而且同时比以往更为成功地控制自然的话，那么向自己提出要求的启蒙形式还是可以实现的。在一篇为纪念阿多诺六十华诞而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哲学化理智”——中，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提出批评，他指出《启蒙辩证法》在那些最隐晦的段落中向没有压抑就没有文明的这种反启蒙立场做出了让步。<sup>[155]</sup>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在霍克海默的叔本华主义形式当中，在阿多诺的性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当中，浮现出来向某种难以名状的向自然投降的主题。哈贝马斯在这点上与波普尔一致，指出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人的思想中都存在着某种悲观主义，它根源于与自然和解的那种夸大了的思想之中。而哈贝马斯使语言作为可能的乌托邦的基础，从而断言有关对外在自然——我们当然无法与这外在自然对话——的“压迫”的说法都是对常规和普遍不可避免的事态的非精确表述；他还说，有关解放、通过不受约束的交往而解除统治性的社会关系的观念，将会成为固化于语言结构之中的某种规范性潜能。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之间辩证法的难题，也是使得《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含混和矛盾之中的难题，被哈贝马斯打发掉了，哈贝马斯提议与自然和解的思想应被解放的理念所取代。

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的就职演讲当中，谈到了自然的诱惑力，即以力比多形式存在于每个个体当中并要求乌托邦式满足的那个方面。个体的这类要求被社会体系所采纳并被转化为好生活的社会定义之一。但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不是同一种自然的两面吗？对理智而言能长期地使二者分离么？如果不把与外在自然的力比多关系考虑进来，难道能只把力比多这方面纳入好生活的定义吗？与外在自然的纯工具关系维持不变，但同时这并不使人对内部包含自然的所有事物——包括心

灵——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是可能的吗？形成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分界标准的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应用于动物世界是不是成问题呢？进一步区分的必要性在这里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承认惟一的出路就是与自然交往，或者说就是通过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然后又强调后者才是惟一的选择，但还坚持着解放的观念，这也会造成被这种理论本身斥为夸大的那种思想。

582 还有另一个人物，在其核心论点上更接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而不是哈贝马斯。此人便是恩斯特·布洛赫。他的声誉在1960年代日渐提高，1965年1月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做过一次题为“实证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演讲，吸引的人群蔚为壮观。<sup>[56]</sup>但阿多诺与布洛赫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出来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盟友关系，而是某种相互轻视的关系。布洛赫把阿多诺视为一名背叛了的学生。而阿多诺也反对布洛赫，因为他认为布洛赫的哲学探讨具有一种任性的、“狂暴的”风格。而且阿多诺还不能接受布洛赫把“希望”拔高到原则地位的做法，不能接受他在“*natura naturans*”——具有主体身份的、无法被反思的“自然”——这个提法中包含的顺从自然的观念。布洛赫一生都与学术体制和哲学与科学哲学中流行的争论保持着距离，未曾关心过实证主义争论和海德格尔批判之类的论战，也可能是这一点使他与阿多诺不同；布洛赫像一块巨石般矗立于学术圈和知识界，正如哈贝马斯所描绘的那样，他是“马克思主义的谢林”。另外，阿多诺的确害怕与“共产主义者”布洛赫保持联络。布洛赫那时已经成为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支持莫斯科的公开审判，认为这是捍卫世界上惟一的而且是处在威胁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举措。

因此，说到底没人比哈贝马斯在理论和政治争论方面更接近于阿多诺。

## 保守主义争论

阿多诺的《本真性的行话》出版于1964年，这是他1960年代最成功的著作之一：书名很快就成了流行词。紧跟着阿多诺又在1966年出版了《否定的辩证法》，此书第一部分就是对海德格尔存在论更为哲学化的讨论。在这段时期内，阿多诺的精力全部集中于海德格尔，而哈贝马斯此时则继续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进行更激烈的论争。哈贝马斯比阿多诺更为激烈的地方在于，他要对抗的是薛尔斯基和盖伦这些明确反民主派的实证主义代表，这一反民主派认为自己不属于启蒙传统，而是属于反启蒙传统。

薛尔斯基、盖伦和弗赖尔都是保守的文化批判者。就他们作为实证主义者而言，他们的立场代表了对现代文化和工业文化本身的某种工具主义的、蔑视的态度。哈贝马斯早在他给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大学与社会》第一部分写序言的时候，就提到过薛尔斯基在其《性社会学》中为反启蒙所做的公开辩护，并对年轻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进行了总结。583  
他说，实证主义已经丧失了其先进性并转向保守，

（它）实际标出了处在“老派”保守主义和“新派”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的一个鸿沟，他们虽然批判地理解现在，但同时却又回望遥远的过去，或者说回望他们所推测的过去，他们明确地支持主流现状，只使用测量和量化的方法，并宣称自己是既怀疑又务实的，这一点就使“新派”保守主义和“老派”保守主义有了区别。这些保守的实证主义者听任他们自己被“现实主义”所指导，而这种“现实主义”正是保守思想一直引以为荣的东西。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即权力在其中总是存在的这样一个时代，总有某种听上去合理的“权力意识”——特别在德国历史学派更加明确了这种“权力意识”之后——被当前主流环境给煽动起来，并因此乐意放弃那

些过去的、被美化的关于权力形式的标准观念。<sup>[157]</sup>

自1950年代以来，与“纯粹的社会学家”勒内·柯尼希（他1958年出版的《社会学词典》<sup>[158]</sup>截至1960年已售出10万本）同时代的那些青年保守主义者，已经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最有成就的竞争者。这是事实，不但体现在学院政治方面，而且体现在出版领域和他们对于非学术领域产生的冲击上。薛尔斯基的《性社会学》作为“罗沃尔茨德国百科全书”（Rowohlts deutsche enzyklopädie）平装丛书的第二卷于1955年面世，至1957年已售出1万册。（薛尔斯基人是这套丛书的国际顾问董事会成员，他的这本书是一本面向普通公众的高质量著作。直到1968年和1969年，阿多诺才在这套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音乐社会学导论》和《新音乐的神经元》。<sup>[159]</sup>）1957年，在同一丛书系列中出版的另一本著作《科技时代的精神》是由薛尔斯基的朋友和以前的老师阿诺德·盖伦所著，此书截至1960年就已售出4万册。<sup>[160]</sup>而由欧洲出版公司小规模出版的那些社会学研究著作，根本无法与这种情况相提并论。《社会学附论》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的第四册出版于1956年，是运用一系列“思想模式”讨论个体概念和个体领域的新风格的社会学导论。<sup>[161]</sup>但此书第一版印刷的3000册在5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售完。阿多诺所写的书直到1960年代在销售方面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只是到了1963年底，阿多诺的《棱镜》（*Prisms*）一书发行了25000册普及平装本（他的书第一次发行这么多）之后，阿多诺才能庆祝销售上的胜利，正如他写信给克拉考尔所说的：与第一版印行1万册的《批判九型》<sup>[162]</sup>（“舒尔坎姆普”丛书第十卷）一起出版的《介入》，都已售出了18000册，他想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584 三位保守主义批评家当中最年轻、最少妥协是薛尔斯基，他的著作把目标瞄向了范围更广的公众。薛尔斯基的著作由于很少关注方法论和认识论，也摆脱了专业限制和数学—统计的枯燥，所以可以称得上是大众实证主义。薛尔斯基把自己标榜为务实博爱的代表，标榜为德国战后现实和确立新方向所必需的反意识形态需要的倡导者，反对同代人

从华而不实的理想、从好为人师者关于意识和自我反思的主张出发所提出的过分要求。

与弗赖尔和盖伦一样，薛尔斯基的反启蒙立场为他赋予了一种理解启蒙辩证法的精明方法。后来被马尔库塞抨击为压抑性去升华（repressive desublimation）的东西，薛尔斯基在《性社会学》中已经相当尖锐地揭露了出来。

对于我们时代是否真正显现出一种高度色情化的争论一直存在。有些人认为高度色情化体现在现代广告和宣传中无处不在的色情影像中，体现在杂志、电影、流行歌曲、广告电视等媒体对于性刺激最大限度的坦率展现当中。然而这是否就体现了色情化这一问题，在我看来这似乎无法切中以下的现实，即这些带有现代大众传媒恒定压力的色情形象和俗套，减弱了个人自身的性幻想机能，使其达到了实际萎缩的程度，并因而抑制了它。<sup>[163]</sup>

他对通过教育传授陈词滥调，或者通过增强意识感剥夺意识等现象的批判，更是敏锐：

精神疗法和心理护理，深思熟虑的性教育和有组织的婚姻指导，节育和儿童指导所，团体教育和人际关系，现代心理福利技术或“社会工程”构成的整个机构，正在取代制度和习俗在塑造人性本能领域所起的日益萎缩的作用……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通过心理学普及而出现的精神习俗化。较之于深思熟虑的和有组织的普及心理学的尝试所能产生的效果而言，现代人的心理学解释和自我解释在更大、更深入的程度上代替了产生仪式和提供象征、产生区隔和进行分类、制定规范和确立标准的那些社会生活中的强制力量。旧有制度中这种强制力量的衰退，也正是这类阐释和自我阐释产生的起因，也是它的研究对象的来源。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心理学的科学价值与它作为一种社会功能所具有的意义相比，

585

今天已经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心理学家在深层意义上说因而也变成了社会官员和代理人。<sup>[164]</sup>

这种敏锐的批评是自相矛盾的。整部书都是对教育者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指责他们扰乱了传统行为模式明显的自然性从而让人们陷入了不安之中，而且还给努力消除科学发现普及化影响的科学家制造了麻烦。自相矛盾的是，这个反启蒙的、反对“将实际上具有高度的科学专业化的发现”普及化的敌人，正在用一种平装本来吸引更多公众的兴趣；其次显得自相矛盾的是，这本平装册子却又被当作如下事实的证据：“在许多科学领域之中，我们正在再次发现传统的实际价值。”<sup>[165]</sup>因而，那些实际上被认为并不能对薛尔斯基此书论题有什么认识的读者，却被认为可以通过有意识的、人为的科学努力去恢复有自然有效性的传统，并在这种努力的启发下回到对于传统的草率承认当中。另一方面，在薛尔斯基的分析中表现出了某种满足。事情已经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了。最终，传统的衰落只不过表明，启蒙理念和启蒙本身需要太多的群众，它只是为新秩序在铺平道路。

人同时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个体，除此之外再找不到其他更能表明人与其本能关系的说法了。我们因而再次发现，性问题上非常广泛的惯例化和社会标准化的描述可以轻而易举地顺从于如下的信念：这一事实为知识、文化和道德单独提供一个新机会，使它们再次对人的性活动拥有新的强制性。

然而，他对这一事实——性压抑已经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去升华的压抑形式——的相信是有限度的。

性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的依赖性、性表现的细节以及性行为方式的社会标准化和惯例化，无疑并不代表人格的高度，而只有人格才标志着每个人通过一种冲动、一种内在目标方式与自己本能

构成的关系。这也正是有关这种行为的社会学层面的所有报道都带有批判口吻的原因所在。<sup>[166]</sup>

薛尔斯基在他的分析过程中已经非常清晰地指出，在他看来，人格的高度存在于人们通过压抑他们对快感的追求而获得快感的所有地方，因而也提供了一种道德模式： 586

各种社会组织、仪式和规范体系——这些有用的缓解措施创造出了生活方式——把反常之人排除出去。如果这类人遵从规范，那么就得以牺牲他们对性快感的追求为代价，因此，他们不得不作为极其虚伪的人生存在规范之内。若无法遵从规范……结果就是被社会孤立……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无法获得使他自己可以处置他的本能并安排他的生活的社会位置，相反只能丧失社会位置，丧失自我；本能机制在他们那里成了自治的东西。这些人格只能成为本能心理学的标本。本能心理学把一切规范的东西——与本能相比而言的规范的东西——都视作压抑、稽查、规训等等这些的某种形式，也就是说视之为一种“去自然的 (de-naturing) 现象”，这种观点忽视了行为的社会层面当中里那些最基本的范畴，即构成了“第二自然”的那些提高了生命形式。<sup>[167]</sup>

获得人格的高度，只有精英才能做到。按照薛尔斯基援引盖伦 1952 年发表的“摆脱异化的自由之起源”一文的说法，精英以开放的眼光进入体制之中，并把体制视为“保护我们，消耗我们，也将比我们存在得更长久的伟大秩序和伟大命运”，<sup>[168]</sup>至少是听任他们自己被他们自己的造物消耗殆尽，而不是像动物那样被纯粹自然所消磨。而对这种伟大性的反思也是可以传达给大众的，尽管他们的性化行为 (sexualization)——被操纵、被标准化了的性化行为——和他们对于在消费品及其他东西上花钱的迷恋都是不能被薛尔斯基所容忍的——从长远眼光看来，大众的这些特征是危险的，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也是不正常的。体制应

该使人们不再直接地、有意识地与他们的本能相遇，但又仍旧能让人进行生存斗争。对于缺乏足够伟大性、缺乏开放眼光而无法让自己自由地，甚至带着快感地被机构消耗以获得更高形式的自由的那些人而言，对一切这类人而言，让他们重新尝一尝生活的严酷滋味是特别重要的。根据薛尔斯基、盖伦和弗赖尔的看法，现代异化对人的异化还不够，还没能让他们放弃对快感的追求，还没能让他们放弃对直接自由的要求，最终只不过为人们提供了某些只是补偿性的其他方面的过度满足，这些满足让人们忘记了生活的严酷性。

587

左派总是热切地关注着能表明他们的预料与历史潮流——至少是历史潮流的某个方面——相符的那些趋势，右派也是如此。青年保守主义者认为，目前存在着这样一个机会：“维持这套能确保生活、福利和舒适的制度涉及的各种技术组织工作”<sup>[169]</sup>不仅能够消除启蒙思想家关于改进世界的情绪，而且能够消除已经推行甚久的“生活上的利己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在过渡时期的已经高度发达的阶段，即在工业主义的文化限值当中这个充满危机的关口，隐约出现了一些情况，它们为德国保守主义——尤其是曾因“保守主义革命”和它与纳粹的部分合作而蒙羞的德国保守主义——提供了某种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即“工业社会的稳定化”、<sup>[170]</sup>“文化结晶”<sup>[171]</sup>以及首位技术统治论保守主义理论家恩斯特·于尔根（Ernst Jünger）在1933年之前就曾提到的“有机结构”的完成。

“人类摆脱了自然的限制，为的是使自身服从他自己的创造所产生的限制”，薛尔斯基在他的讲演“科学文明中的人”（1961）中作如是说，那个时候人们广泛讨论的就是这种用技术约束取代政治的纲领性的主张。借助人自己的科学技术创造对世界和人类自身进行重构，这显然会导致如下荒谬的立场：使得过程成为可能的手段也将决定过程之目的，因为人类思想已不再能够预见人类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正在开展的自我创造。盖伦在题为“文化结晶”的演讲中提到的观点几乎与薛尔斯基的观点是同时出现的。盖伦认为，不必为科学不再能够创造出连续性的世界图景而烦恼，“因为实际上所有科学都是连续相关的，但

并非在人们的头脑中——那是实现综合的最终之地，而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现实当中。”薛尔斯基和盖伦欣然接受这种综合后的现实和对现实的科学加工，把它们当作工业、技术和科学时代的一种大体制 (mega-institution)，既无法通过理智或道德，也无法通过情感来实现，而只能在“社会情境的上层建筑”当中才能形成。如果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日益增长的效率意识使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发生变革的话，那么，终有一天对于民主参与的补偿也许会因全面福利制度而变得多余，而且“闲暇和舒适这块胡萝卜”也将再次被“异化的大棒”所替代。<sup>[172]</sup>程式化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服务于已经毫无同情心的社会结构时可能会再次出现，而且也有必要出现。这些都需要它们的代表和理论家们的“自我改善”，而“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尽管他们有的只是“对他们的纯粹人性的相互赞美”，尽管他们在这个已经机械化的自然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舒适的地方，但至少也会从他们的舒适和纯粹的人性中被惊醒过来。<sup>[173]</sup>

588

(196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抗议运动，另一方面则是地下运动，都开始把当时的主要矛头从工作、秩序和消费的价值转向了后物质价值 (post-material values)，而维利·勃朗特 (Willy Brandt) 这位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联合政府的首相也将自己的诉求表述为“敢于要求更多的民主”，<sup>[174]</sup>这似乎破坏了薛尔斯基曾对工业社会及其强制性的期待。与之相比，盖伦的传统保守主义观点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盖伦曾指出，工业时代只能加速传统体制的腐朽，而惟一能做的就是对领导和指导等传统体制的残余进行保护。十年之后，形势再次发生了彻底转变，以现代方法延续了薛尔斯基工作的一位年轻人一举成名，此人便是尼柯拉斯·卢曼 [Niklas Luhmann]。卢曼属于哈贝马斯那一代人，最初曾是一名公务员。1960年代初他在哈佛大学的假期课程上遇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1960年代中期，薛尔斯基让卢曼在多特蒙德的明斯特大学的研究中心任部门主管；他在1968年成了新的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而这所大学很大程度上是薛尔斯基创立的。卢曼对在盖伦和薛尔斯基那

里基本上还仅仅是一些纲领性的思想进行了扩充，创造出了一套系统的社会理论。依照这种理论，对复杂社会系统的控制形式既无法在理智中、道德上，也无法在情感中进行统合，并且超出了个体的理解范围，但这种控制形式并非需要改变的某种灾难和可怕的情形，相反却是战胜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产生的种种难题的适当方式。卢曼是当代保守实证主义或实证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而且，他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也是1960年代的那些争论的直接延续。)

与持有实证保守主义立场的人的理论讨论，要比与持有实证主义立场的人的讨论难进行得多，毕竟实证主义者还是将自己视为启蒙传统的追随者的。1965年曾在广播上播出的盖伦和阿多诺之间的争论最终便成了两种经典观点的对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对话听起来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伊凡·卡拉马佐夫那段故事里的宗教大法官在与不再沉默的耶稣之间的交谈。

589 盖伦：阿多诺先生，当然，您又在这里看到了解放的难题。您真的相信生活中那些基础性的难题、广泛的反思以及错误等责任——因为我们试图摆脱它们已经经历过——都具有深刻而持续影响力吗？您真的相信我们应该期待每个人都须经历这一切吗？我非常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阿多诺：我可以给您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的！我对客观幸福和客观绝望有一种特别的看法，我还要说的是，如果人们不理睬那些难题，如果他们不想承担全部责任，不想进行完全的自我决断，那么他们在这个世上的福利和幸福都不过是一种幻象。而且这一幻象中有一天将会破裂。当它破裂的时候，后果将是可怕的。

盖伦：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说“是”而我却说“不”，或者相反——在此我想说，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所能知道和所能说的一切有关人类的观点，都表明您的观点是一种人类学的和乌托邦

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是高尚的，甚至是宏大的……

阿多诺：这一点也不是很乌托邦，但我只想谈：首先，在你的理论中，人们因之而寻求缓解的那些困难……驱动人们去寻求这种减轻苦恼的方式的痛苦，正好是来自各种体制，也就是说，来自对世界的组织方式，这些组织方式与人相异化的，对人实施着无所不在的支配……在我看来，人们正发是在给他们造成伤害的权力之中寻找避难所，这恰恰是最基本的人类学现象。深层心理学甚至有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即“认同攻击者”（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ttacker）……

盖伦：阿多诺先生，我们的讨论已经快结束了，时间快要用完了。我们无法进一步扩展我们的讨论……但我还想提出另外一个反控。尽管我感觉我们在某些深层前提上是统一的，但我还是觉得让人们对整个灾难形势中幸存和仅留的那点东西深感不满，这是危险的，而您恰恰倾向于这么做。<sup>[175]</sup>

这场辩论看上去是在僵持状态中结束的。这是个欺骗性的结果吗？盖伦不是失败者吗？“融入敌对的生活！”这一态度的捍卫者现在在这里却表现为某种提供保护的角色。自称是一名“经验哲学家”的盖伦却不准备让事情接受经验的检验。在他看来，革命一再发生，而体制也在“后文化”中严重衰败——“人民群众”从未表明他们对这些情况具有做出自我决断的能力。

或者是阿多诺输了？相信人们有自我决断能力的阿多诺却不相信他们可以完全懂得他们有这样去行动的自由，相反却认为不得不把这种自由给他们。然而，他也预见到了如果不给予他们这种自由会有什么样的可怕结果。这种评述仍旧是很悲观的，它暗示的不是革命和解放，而是混乱和崩溃。说到底，它是一个终结这种讨论的僵局。

从盖伦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的哈贝马斯，再一次把更多的关注投向

了作为对手的盖伦，并扩展了自己的观点，努力在与盖伦的争论当中使自己的观点更加合理。

哈贝马斯很欣赏盖伦在他的《人》一书中的论述方式，在此书中盖伦把涉及舍勒、普勒斯纳和美国实证主义者和社会理论家乔治·米德 (George Mead) 等人论题的研究结果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了一种系统的人类学，展现出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地改造他们所不满意的生活条件并创造出维持生存的机会，展现出人怎样建立起一套行为模式体系，该行为体系既源于过剩精力而又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本能冲动。这是一个真正让人生活而不只是让人生存的系统。哈贝马斯也很欣赏盖伦在《原始人》(*Primeval Man*) 和《晚近的文化》(*Late Culture*)<sup>[176]</sup>当中所使用的重构体制起源的方法：为满足原始需要而产生的手段——就这些手段已经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并使那些似乎是自然的需要得以满足而言——反过来又成为次级需要的目标。由于对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开始变成自然而然的事，而且不再是满足目的的手段，相反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禁止或调整原始需要成为可能——甚至可以完全抛弃这些原始需要。这样制度化就达到了顶点：创造存在者，同时又创造先验的本质和具体化，从而指向一种能够成为行为动机的“世俗超越性”。

这种解释所忽视的东西，就是青年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以及我们自己创造的产品脱离了我们的控制从而成为统治我们的客观力量。而且，这种解释还排斥了如下这个问题：根据人类所占有的资源——那些从历史记录中可以确定的资源，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也许是可能的。在盖伦看来，人类的特征表现为本能、过剩精力和大同主义的缩影这一事实，也就意味着注定会有混乱，而只有可替代的本能才能使人类免于这种混乱。这些类似于本能的東西就是制度，而在盖伦看来，适当的制度因而必然具有某种刚性和毋庸置疑的自然性，正是这种刚性和自然性确保制度在功能上类似于动物的本能。但是，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总的批评，对人类学发现和理论的这种系统的组装，既不意味着人类天生就是无法控制的怪物，也不意味着制度必然会具有替代性本能的那种冷酷特征。因为这个原因，加之还可以找到

一些对现时代的危机现象所做的完全合理的解释，因而盖伦把现时代的这些危机现象归因于制度的衰败是不合理的。就已经存在的各种特属于现代的危机现象来说，我们既无法确定可以用僵化的旧制度来控制它们——尽管这也许曾经被证明是可行的；也无法确定其他生活方式——甚至是早期的生活方式——可以既是有效的同时也是令人满意的。最后，我们同样不能确定人类的生活方式领域不存在一种像学习过程那样的事情，而危机就附属于这一过程，因为正是危机能够促生进步。

这些思考基本上也就是紧扣盖伦文本的思考。如果这个推理过程就是要推论出替代性的本能是必要的话，那么，认为人类的特征表现为本能、过剩精力和大同主义的缩影的这种观点立即就会变成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的牺牲品。哈贝马斯在“悲观主义人类学审判席前具有教育意义的‘乐观主义’”一文中对薛尔斯基进行了分析，他强调指出，对具有悲观主义形式的人类学的批判立场关键不在于乐观地反人类学，而在于通过历史哲学而彻底放弃所有关于永恒性的人类学信条。<sup>[177]</sup>历史是一个基本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会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子。在历史这个领域中，至少在当时当地可以看到这些制度是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被反对它们的造反行动剥夺其客观力量的，而且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效率也可以与独立活动的日益增长、与社会交往中的团结一致相结合。但历史还可以表明，使得开放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可能的这些“沙漠绿洲”无法长时间抵抗那些具有准本能的领导体制的社会群体所发起的攻击。这些能证明自身的机会在这时——当然也不仅仅在这时，而是在每一个常规的、日常的社会中都会出现——唤起了大量的机会：这就是捍卫那些弱者以反抗强者的机会。但是这真正需要勇气和自我控制。毕竟，“英雄的人”只有支持那些依循准本能而行动的那些人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强大。历史和日常生活往往证明，严格体制化的社会对于拥有宽松体制的社会所带来的危险，远远大于严格体制的衰败给人类的继续存在所造成的危险。

然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哈贝马斯反对盖伦所提议的对于人性进行似是而非的意向性还原，指出“当我们认识到

592

只有这些一直很脆弱的危险的交流手段才能抵抗普遍性脆弱的威胁时，人类最终留给我们的才是大胆无畏”，这时哈贝马斯似乎在呼吁一种强力。<sup>[178]</sup>

## 海德格尔批判

海德格尔是他们在联邦德国的那些对手中最少做出回应的一位。1959年，在海德格尔七十寿辰那天，哈贝马斯的文章“伟大的影响：一位编年史家对于马丁·海德格尔70岁寿辰的记录”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哈贝马斯在他1953年发表的关于海德格尔的第一篇批判文章中，仍认为《存在与时间》是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以来哲学中最重大的事件。1959年他更适度地指出，海德格尔至少在学术界是黑格尔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存在与时间》也许可以首先被看作一种为哲学提供自身内部基础的徒劳的尝试，而且，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被描述为是对自斯宾格勒至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以来的文化批评中的那些老生常谈式的概念所进行的存在论的确证。海德格尔所支持的精英主义却在第三帝国治下庸俗化了，这使他非常失望，因而他让自己远离社会实践，远离科学，甚至远离哲学，退缩到神话思想者（mythical thinker）的角色当中。在他的著作中再也没有任何能够激发对已被实证主义分割的理性进行重新整合的思想了。这种整合只有通过科学、技术以及对一个将科学技术当作首要生产力所塑造出的社会进行分析可能完成。

也许海德格尔思想的特征可以由它所无法达到的东西间接地描述出来：它很少结合社会实践，也很少结合对科学成果的解释来理解自身。就后一方面而言，这种思想展示了科学基础的形而上学局限，并把它们连同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一并指为“错误”……既然守护者居住在被毁坏的地球的废墟之外。<sup>[179]</sup>

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哈贝马斯对于海德格尔的定论。与自认为处于启蒙传统中的实证主义不同，也与保守实证主义不同，海德格尔非常有效地展现的存在论呈现出了某种保守的非实证主义的图景。

哈贝马斯稍后开始关注伽达默尔，比他关注海德格尔甚至更为细致。<sup>[180]</sup> 伽达默尔 (Gadamer) 认为自己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而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古典语文学家，他通过他的重要著作《真理与方法》致力于从哲学和艺术的经验领域出发来让科学相对化。伽达默尔让哈贝马斯感兴趣的地方是，他是一名解释学的哲学实践者，他使海德格尔式的乡土气变得城市化了。<sup>[181]</sup> 伽达默尔也是这样一位人文哲学家，他无意间为某种改造过的、更为自由的现代科学观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阿多诺不像哈贝马斯，阿多诺与科学的关系是一种矛盾关系，因此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仍是一个挑战。当马尔库塞战后首次旅欧时，霍克海默就托他捎回两本书，一本是柯根 (Kogon) 的《党卫军国家》(SS State)，另一本就是海德格尔的《真理的本质》。<sup>[182]</sup> 马尔库塞不仅带回了这些书，而且把霍克海默点名要的海德格尔所写的其他书也捎了回来，而且在他旅欧期间他还与海德格尔作了一次长谈。阿多诺 1949 年再次回到法兰克福之后，他还试图鼓励霍克海默为《月刊》杂志就海德格尔刚刚出版的《林中路》<sup>[183]</sup> 撰写一篇评论。他曾对海德格尔做过许多思考，在写信给霍克海默时还附上了他的一些思考笔记，他说，海德格尔“赞同那些迷误的小径 [林中路, Holzwege]，其方式与我们并无不同”<sup>[184]</sup>。阿多诺希望霍克海默来写这篇书评，因为毕竟霍克海默那时正在研究海德格尔和卢卡奇。但实际上，这篇文章最终并没有写出来。

正是由于阿多诺对“林中路”的同情使得他得以自始至终严肃地对待海德格尔。像哈贝马斯一样，阿多诺批评了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假斯文式的厌恶，他认为那样只能确证科学的力量。他还批评了海德格尔对高速公路和现代技术世界的厌恶，指出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只能提供“心灵安慰”，只能减少批判现实的迫切性。阿多诺还像哈贝马斯一样，重点指出了海德格尔使纳粹时代典型的毁灭综合症永恒化的方式，这种综合症就是赞美简单、自然的生活，而同时却无情地加速经济实力的集

中进程和科技发展的进程。

然而，阿多诺与哈贝马斯不同，他依然比较同意那种不依赖于学术制度、不顾及科学方法的束缚，试图推进那些最重要事情的思想模式。阿多诺认为，这种冲动无论曾经是怎样被扭曲的，但后来依然保留在存在论的海德格尔那里，就像霍克海默在 1930 年代所写的文章中评述的那样。

594

存在论需求 (ontological need) 中留存的东西就是对这种最好美德 [即，假定期待洞见事情的核心] 的回忆，与其说这种记忆被批判哲学所遗忘，不如说批判哲学因为试图建立科学的缘故而狂热地消除了这类记忆；但意志不允许思想剥夺这类记忆，正是因为这种记忆的缘故人们才思考思想。<sup>[185]</sup>

像以往一样，阿多诺与科学的关系是充满矛盾的。当他批评科学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他真正所指的是 (a) 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b) 以其既有形式存在的各类科学（而无论该形式被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掌握与否），还是 (c) 因劳动分工而形成的个别科学学科。另一方面，这种态度也反映出对思辨以及随笔式的、不受约束的思想的捍卫，这种思想也强调概念训练，但它至少没有像远离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那样远离过海德格尔的“对存在的回忆”。与哈贝马斯不同，阿多诺的大部分哲学作品既没有利用科学的任何具体研究成果，也没有对科学哲学进行过任何反思。哲学思考成了一种独立的发现工具。

与哈贝马斯相反，阿多诺试图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进行一种内在批判。他希望通过对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之伪具体性进行内在批判，从而为某种真正具体的哲学提供辩护。卡尔·海因茨·哈格 (Karl Heinz Haag) 曾是阿多诺的学生，那时也是阿多诺的研究助手，哈格在其著作中尖锐地剖析了海德格尔将就不如意情况的方式：由于海德格尔不能从传统意义上将存在构想为唯名论批评的结果，他就把存在界定为实体的“不性” (not-ness)，界定为纯粹的中介 (pure mediation) 和传递性的存在 (transitive being)，仅仅在向“现有”存在实体突然转变之时出现。

存在之思仅在它是主语属格意义上的存在之思这一范围内，它才是宾语属格意义上的存在之思。思想就是对思想所认为的那个对象的思考。无论是实体还是思想，都呈现为存在——一种不确定的、过渡的、纯粹的存在——的命运。存在，从纯粹性上说恰恰与纯粹直接性(pure immediacy)相反，即，是某种被完全“中介化”的事物，且只有在各种中介当中才有意义，但它一直被假定本质上是直接性的。<sup>[186]</sup>

就海德格爾的存在概念而言，它所含的中介可以说被扩展到一种非客观的客观性、一种可传递的超验存在(transitive transcendent)。阿多诺在这里看到了对辩证事实的某种存在论的曲解：此在，这个作为构成性因素的主体，已经预先假定了它所构成的东西的真实性。在他看来，海德格爾试图以非辩证方式说明辩证结构，试图对既无法由理性有效性(vérités de raison)又无法由事实有效性(vérités de fait)构成的哲学所具有的悬而未决的特征进行适当的阐发。

海德格爾……确实把哲学的这种特性——也许是因为它濒临灭绝——改造成了一种特殊性，一种似乎更高级的客观性：一种承认自己既不是在判断事实，也不是在判断对其他事物进行判断的方式的哲学，一种甚至也完全不能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哲学，仍然会在事实、概念和判断之外寻找它的实证内容。思想的这种悬而未决的特征因而被提升为思想试图表达的不可表达性。不能被客观化的东西则被提升为它自身本质的概述对象——因此也被褻读了。在海德格爾想甩掉的传统压力下，这种不可表达的东西在“存在”一词中变得可以表达而且坚实，而对具体化的抗议则变成了被具体化的、脱离思维的和不理性的。海德格爾由于把哲学不可表达的方面当作他的直接论题，因而为哲学筑起高坝，堵绝了意识回撤的一切通道。作为惩罚，他想要挖掘的井也干涸了。在他看来，这虽是一口被填埋了的井，但较之于来自以往所有大概都已毁灭了的哲学——那些间接指向不可表达之物的哲学——的见解而言，它还能渗出几滴水来。<sup>[187]</sup>

595

阿多诺通过对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存在论进行这样的内在批判——这也是他 1950 年代发表的胡塞尔批判的某种延续，试图超越于科学的自我反思将哲学指向真正的具体化：表达那些不会放弃思想的不可表达之物。阿多诺对于海德格尔的分析可以总结如下：他的存在论背后客观地存在着他的一种思考的旨趣，这种思考在性质上不同于科学、不同于科学哲学和逻辑学，它是一种转向本质的思考，摆脱了内在意识的思考。海德格尔不仅不理睬科学，而且不理睬柏拉图以降的整个西方传统，这就使得海德格尔过分地固着于传统形而上学——只有从传统形而上学当中解救自我反思。阿多诺认为，具体的哲学可以是“以概念反思为中介的完整、未经简化的经验”。他的确在这方面成功超过了海德格尔，超越的程度必须通过在《否定的辩证法》来判断。该书出版于 1966 年，阿多诺正是以此书开始了他所谓的对海德格尔的内在批判。

596 进行内在批判的努力，并没有使他放松对来自相反立场的危险的警惕。哈贝马斯早就谴责过被实证主义者分割过的理性主义，他们自认为自己处于启蒙、促进技术文明的传统之中，而这种传统有一种把意识、把人分离成两种类别的危险倾向：一类是社会工程师，一类则是各种封闭机构中的居民。<sup>[188]</sup> 对于持专家治国论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或多或少被公认的规划。而对于不同于专家治国论保守派人士阿明·默勒（Armin Mohler）称之为“园丁保守主义”，或艾哈德·艾普勒（Erhard Eppler）称之为“价值保守主义”的这些保守主义者而言，从内在批判出发进行批判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优点在于，尽管他们对民主和社会主义有憎恶和蔑视，但在描述这些遭受的曲解方面有时会比左派的描述更清晰、更准确。在《本真性的行话》当中，阿多诺最终把海德格尔所扮演的角色——依然还在发挥重大影响的角色——简化为这样一种表述：“理性当中的非理性就是本真性的工作氛围。”<sup>[189]</sup> 这一点与专家治国论保守主义者的立场是相合的：应该使某种人造自然性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在技术文明中被建立起来。

考虑到像海德格尔和盖伦这样可疑的人物在联邦共和国受人如此尊敬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力，再看到他们还如此不满意，就不能不感到惊

讶了。在阿登纳时期内，在以“制度完备的社会”（die formierte Gesellschaft）<sup>[190]</sup> 为座右铭的艾哈特政府的平稳过渡期内，在继之而来的大联合政府的平稳过渡期内，西德重建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海德格尔和盖伦难道还不能甘心向工业社会的枯燥和冷漠屈服吗？也许这是部分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希海默所说，这是在“决断性的一刻”<sup>[191]</sup> 无法看到“终极安全和最终确定性”所致。1952年，国家控制经济的时代行将结束，在这一年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部长、号称“经济奇迹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就强调说，“在特殊社会形势下出于某些社会原因而推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必须尽可能快地废止。”<sup>[192]</sup> 这种观点一直是他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例如，1960年代，人们再次从艾哈德的顾问吕蒂格尔·阿尔特曼（就是他发明了“制度完备的社会”的格言）发表于《商报》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如下表述：重要的事情是让“这个社会认可取得经济和技术的奋斗成就的严酷性”，承认“没有社会天堂，而所有试图让经济隶属于某种社会秩序的那些规划纯属幻想”。<sup>[193]</sup> 在1965年这个选举年，汉斯·维纳尔·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发表了他的《要求一个新政府，或、别无选择》。<sup>[194]</sup> 罗尔夫·霍希胡特（Rolf Hochhuth）论述“阶级斗争”的一篇文章，在此书出版之前就出现在《明镜》周刊特别显著的位置。在这篇文章中，艾哈德被说成是倡导从上面发动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艾哈德作为总理对此文的回应是：“这里有某种已经变得很愚蠢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对我来说，他不再是一个作者，而只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像小狗那样狂吠的小人物。”<sup>[195]</sup>

## 注释：

[1]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Tübingen, 1949), translated as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trans. Anne G. Mitchell and Wesley V. Bloomster (London, 1973); *Versuch über Wagner* (Berlin, 1952), translated as *In Search of Wagner*,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81); *Disson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Göttingen, 1956); *Klangfiguren.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 (Berlin, 1959).

- [2] “新的民族共同体” (*Volksgemeinschaft*), 一个纳粹用语。
- [3] *Darmstädter Internationale Ferienkurse für Neue Musik*.
- [4] Trans. Willis Domingo (Oxford, 1982) .
- [5]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London, 1967) .
- [6] Oskar Negt, ‘Heute wäre er 75 geworden; Adorno als Lehrer’,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11 September 1978.
- [7] Oskar Negt, ‘Heute wäre er 75 geworden; Adorno als Lehrer’,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11 September 1978.
- [8] ‘Dialektik der Rationalisierung’, Jürgen Habermas in an interview with Axel Honneth, Eberhardt Knödler-Bunte and Arno Widmann, in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45/46 (October 1981), p. 128.
- [9] Marianne Regensburger to Adorno, 11 May 1955.
- [10] [ ‘Die gegängelte Musik’, cf. *Die gegängelte Musik. Bemerkungen über die Musikpolitik der Ostblockstaaten* (Frankfurt am Main, 1954) . ]
- [11] Adorno,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p. xvii.
- [12]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1974), p. 40.
- [13] Adorno,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p. 53.
- [14] Adorno, *Disson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 [15] ‘Kritik des Musikanten’ and ‘Das Altern der Neuen Musik’ .
- [16] Hans Vogt, *Neue Musik seit 1945* (Stuttgart, 1972), p. 23.
- [17] Theodor W. Adorno, ‘Strawinsky’,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70–86), vol. 16, p. 386.
- [18] *Ibid.*, pp. 386–7.
- [19] H. K. Jungheinrich’s term.
- [20] Adorno, *Gesammelte Werke*, vol. 16, pp. 451, 453.
- [21] In Max Horkheimer (ed.),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1963), p. 360.
- [22] *Ibid.*, p. 361.
- [23]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6, p. 498.
- [24] *Ibid.*, p. 499.
- [25] *Ibid.*, p. 504.
- [26] *Ibid.*, pp. 515–6.

[27] Ibid. , p. 504.

[28] Adorno on 'Mahler' ,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 vol. 16, p. 329.

[29] 阿尔弗雷德·克尔 (Alfred Kerr) 在 1926 年 5 月 5 日的《柏林日报》撰文, 这样描述雅恩的悲剧《美狄亚》(*Medea*): “这个关于一位德国年轻人的恐怖故事, 采用了霍夫曼斯塔尔 (Hoffmansthal) 的《埃勒克特拉》(*Electra*) 中的立场, 悲观而激烈地指向极端的兽性。”

[30]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The Ship* , trans. Catherine Hutter (London, 1970) .

[31] 林姆考尔夫语。

[32] 1960 年代后半期, 阿多诺有一位经历过前纳粹时代的学生威廉·埃姆里奇 (Wilhelm Emrich) 曾支持过雅恩, 而雅恩已于 1959 年去世。埃姆里奇运用阿多诺式的推论, 以巨大的决心为雅恩辩护。

[33] Theodor W. Adorno,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ZfS* , 1 (1932), pp. 103-24. 356-78.

[34]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 vol. 11, pp. 60, 51, 55.

[35] Ibid. , pp. 58, 54.

[36] Ibid. , pp. 56, 58.

[37] Ibid. , p. 63.

[38] Wolfgang Kayser, *Das sprachliche Kunstwerk. Ei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eme, 1948) .

[39] Emil Staiger, *Grundbegriffe der Poetik* (Zurich, 1946) .

[40] Emil Staiger, *Die Kunst der Interpretation. Studien zu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 3rd edn (Zurich, 1961), P. 15. [On Staiger, cf. P. Salm, *Three Modes of Criticis: The Literary Theories of Scherer, Walzel, and Staiger* (Cleveland, 1968) .

[41] Staiger, *Kunst der Interpretation* . P. 27.

[42] Ibid. , p. 30.

[43] Hugo Friedrich, *Die Struktur der modernen Lyrik Von Baudelaire bis zur Gegenwart* (Hamburg, 1956), p. 8.

[44] Ibid. , pp. 86, 108.

[45] In Peter Rühmkof, *Die Jahre, die Ihr kennt: Anfälle und Erinnerung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2), P. 153.

[46] Gottfried Benn, 'Der neue Staat und die Intellektuellen', in *Gesammelte Werke in Vier Bänden* , ed. Dieter Wellershof, vol. 1: *Essays, Reden, Vorträge* (Wiesbaden, 1959), P. 447.

[47] Gottfried Benn, 'Rede auf Stefan George', *Frühe Prose und Reden*, in *Gesammelte Werke*, vol. 1, P. 473.

[48] Peter Szondi, *Theorie des modernen Dramas* (Frankfurt am Main, 1956) .

[49] Adorno to Horkheimer, Frankfurt am Main, 17 April 1957.

[50] Theodor W. Adorno, 'Versuch, das *Endspiel* zu verstehen,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1, p. 303, 'Voraussetzungen. Aus Anlass einer Lesung von Hans G. Helms',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1, p. 440.

[51] Samuel Beckett, *Molloy*, *Malone Dies*, *The Unnamable* (London, 1959), p. 418.

[52] Michael Haerdter, 'Samuel Beckett inszeniert das "Endspiel"; Bericht von den Proben der Berliner Inszenierung'. in Clancy Sigal et al., *Materialien zu Becketts 'Endspiel'* (Frankfurt am Main, 1968), p.85.

[53]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1, p. 308.

[54] Samuel Beckett, *Endgame* (London, 1958), pp. 41-2.

[55] Adorno, *Gesammelte Werke*, vol. 11, pp. 440-1.

[56] *Ibid.*, p. 471.

[57] *Ibid.*, p. 478. "仪规句" (Protokollsatz) 是维也纳逻辑经验主义学派的一个术语。

[58] 'Mahler',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6, p. 329.

[59] Günther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Über die Seele im Zeitalter 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unich, 1956) .

[60] Gerda Zeltner-Neukomm, *Das Wagnis des französischen Gegenwart-romans. Die neue Welterfahrung in der Literatur* (Reinbek bei Hamburg, 1960), pp. 150, 152.

[61] Theodor W. Adorno,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Ästhetischen* (Frankfurt am Main, 1962), *Drei Studien zu Hegel* (Frankfurt am Main, 1963) and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dien über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 Antinomien* (Stuttgart, 1956) [trans. Willis Domingo (Oxford, 1982) ] .

[62] Theodor W. Adorno, 'Husserl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37 (1940), pp. 6 and 17.

[63] Theodor W. Adorno, 'Wozu noch Philosophie?', in *Eingriffe. Neun kritische Modelle* (Frankfurt am Main, 1963), pp. 22-3. 阿多诺引用了胡塞尔的格言: "Zu den Sachen selbst!", 见胡塞尔的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Logos*, 1 (1910), pp. 289-314. 阿多诺在 1940 年《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 将此句

翻译为“回到事物本身”(‘Back to the subject-matter itself’), 见 *Journal of Philosophy*, 37 (1940), p. 18. 赫伯特·斯皮格尔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在《现象学运动历史导论》中译为“走向事物”(‘To the Things’),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3rd edn (The Hague, 1982), p. 109.

[64]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 340.

[65] In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 pp. 83–222.

[66]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p. 328.

[67]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p. 288.

[68] Adorno to Horkheimer, 23 October 1937.

[69]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pp. 16 and 13.

[70] [In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 Samuel Weber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pp. 133–46.]

[71] ‘Die Wunde Heine’,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1, pp. 95–100 (originally given as a radio lecture on the centenary of Heine’s death).

[72] ‘Was bedeutet; 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0, part 2, pp. 555–72.

[73] ‘Essay als Form’,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1, pp. 9–33; ‘The Essay as Form’, trans. Bob Hullot-Kentor and Frederic Will, in *New German Critique*, 32 (1984), pp. 157, 170–1.

[74] Adorno to Horkheimer, 4 April 1955.

[75] Arnold Gehlen and Helmut Schelsky (eds), *Soziologie. Ein Lehr- und Handbuch zur modernen Gesellschaftskunde* (Düsseldorf, 1955).

[76] Arnold Gehlen, *Der Mensch. Seine Natur und seine Stellung in der Welt* (Berlin, 1940)

[77] Helmut Schelsky, *Soziologie der Sexualität* (Reinbek bei Hamburg, 1955).

[78]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Ralph Manheim (New York, 1961).]

[79] Jürgen Habermas,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1), vol. 1, p. 515.

[80] Jürgen Habermas,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am Main, 1971), pp. 72–3.

[81] Jürgen Habermas, *Das Absolute und die Geschichte. Von der Zwiespältigkeit in*

*Schellings Denken* (University of Bonn, 1954) .

[82] [Karl Löwith,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The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trans. Donald E. Green (London, 1965) .]

[83] Jürgen Habermas, 'Die Dialektik der Rationalisierung. Vom Pauperismus in Produktion und Konsum', *Merkur*, 8 (1954), p. 707; repr. in Jürgen Habermas, *Arbeit, Erkenntnis, Fortschritt. Aufsätze 1954–1970* (Amsterdam, 1970) .

[84] *Ibid.* , p. 717.

[85] *Ibid.* , p. 721.

[86] 此处的英译部分是依照《不和谐音》中修订过的文本译过来的。载于《社会研究学刊》1938年第7期的原文标题是：“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rens”，第325页有这么一句：“Schlug ehemals Askese den ästhetischen Anspruch auf Lust reaktionär nieder, so ist sie heute zum Siegel der progressiven Kunst geworden. Die antagonistische Gesellschaft, die verneint und bis in die innersten Zellen ihrer Glücksfeindschaft freigelegt werden muss, ist darstellbar allein in kompositorischer Askese. Kunst verzeichnet ...”，在1956年的《不和谐音：宰制世界的音乐》(*Disson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 Göttingen, 1956) 版本中这句被改为：“Schlug ehemals Askese den ästhetischen Anspruch reaktionär nieder, so ist sie heute zum Siegel der avancierten Kunst geworden; freilich nicht durch eine archaisierende Kargheit der Mittel, in der Mangel und Armut verklärt werden, sondern durch strikten Ausschluss all des kulinarisch Wohlgefälligen, das unmittelbar, für sich konsumiert werden will, als wäre nicht in der Kunst das Sinnliche Träger eines Geistigen, das im Ganzen erst sich darstellt anstatt in isolierten Stoffmomenten. Kunst verzeichnet...”。安德鲁·阿拉托和埃克·盖博哈特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精粹读本》(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 Oxford, 1978) 所用的就是这个被改动过的段落，它是这样翻译的(见第274页)：“如果说禁欲主义曾经以反动的方式击溃了审美要求的话，那么它今天则成了高等艺术的标志：无疑，这种转变并不是通过对可以显示贫乏和贫困的方式进行古旧化的节俭，而是通过对所有那些只为自身直接享用的美味佳肴——仿佛艺术中的感官不承载那种只在整个过程、而不是在孤立的局部阶段显示自身的理智似的——的排除来实现的。艺术记录了……”

[887] [See Karl Marx, *Capital* , vol. 1 (Harmondsworth, 1976), p. 762.]

[88] René König, *Leben im Widerspruch. Versuch einer intellektuellen Autobiographie* (Munich, 1980) .

[89] Wolfgang Abendroth, *Ein Leb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Gespräche* , ed. B. Di-

etrich and J. Perels (Frankfurt am Main, 1976), p. 236.

[90] 'Dialektik der Rationalisierung', Jürgen Habermas in an interview with Axel Honneth, Eberhardt Knödler-Bunte and Arno Widmann, in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45/46 (October 1981), p. 128.

[91] Jürgen Habermas, 'Triebchicksal als politisches Schicksal',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4 July 1956.

[92] 'Das chronische Leiden der Hochschulreform'.

[93]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Universität und Gesellschaft I - Studentenbefragung*, mimeo (Frankfurt am Main, 1953), pp. xxxiv-xxxv.

[94] *Ibid.*, pp. lvi, lviii.

[95] *Ibid.*, pp. lxiv-lxv.

[96] Jürgen Habermas, L. von Friedeburg, C. Oehler and F. Weltz, *Student und Politik. Eine Sozialogische Untersuchung zum politischen Bewusstsein Frankfurter Studenten* (Neuwied, 1961), 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Neuwied, 1962), translated 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and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1989).

[97] 'Über den Begriff der politischen Beteiligung'.

[98] Habermas et al., *Student und Politik*, p. 24.

[99] *Ibid.*, p. 34.

[100] Helmut Schelsky, *Die skeptische Generation. Eine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Jugend* (Düsseldorf, 1957).

[101] Habermas et al., *Student und Politik*, p. 49.

[102]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the Federation of German Trade Unions.

[103] Habermas et al., *Student und Politik*, p. 234.

[104] Jürgen Habermas, 'Literaturbericht 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1957), pp. 165-235.

[105] Horkheimer to Adorno, Montagnola, 27 September 1958.

[106] Horkheimer to Adorno, Montagnola, at the end of August 1959, on receiving the printed version of *Students and Politics*.

[107] Adorno to Horkheimer, 15 March 1960.

[108] Horkheimer to Adorno, 27 September 1958.

[109] [Hugo Sinzheimer (1875-1945), Professor of Labour Law in Frankfurt am

Main, 1920–33, in 1919 Social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on the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Weimar National Assembly.]

[110]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88. 中文版参考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7 页，译文有改动。

[111] Ibid., p. 124. 中文版参考第 141 页。

[112] Ibid., pp. 128–9. 中文版参考第 146 页，译文有改动。

[113] Ibid., p. 179.

[114] Ibid., p. xviii. 初版序言，中文版参考第 2 页。

[115] Carl Schmitt, *Die Diktatur. Von den Anfängen des modernen Souveränitätsgedankens bis zum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 (Munich, 1921).

[116]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250. 中文版参考第 297 页。

[117] Cf. Jürgen Habermas,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V* (Frankfurt am Main, 1985), pp. 159–60.

[118] Cited in Tilman Fichter and Siegwald Lönnendonker, *Kleine Geschichte des SDS: Der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von 1946 bis zur Selbstauflösung* (Berlin, 1977), p. 46, from which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here is drawn.

[119] '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ä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

[120]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60 as *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

[121] Ludwig von Friedeburg, *Zur Soziologie des Betriebsklimas. Studien zur Deutung empirischer Untersuchungen in industriellen Grossbetriebe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122] Adorno to Horkheimer, 31 January 1962, enclosure.

[123] Theodor W. Adorno et al.,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trans. Glyn Adley and David Frisby (London, 1976), p. 121, see p. 570 below.

[124] Adorno to Horkheimer, 31 January 1962.

[125] Ibid.

[126] Alfred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 am Main, 1962); Oskar Negt, *Struktur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Gesellschaftslehren Comtes und Hegels* (Frankfurt am Main, 1964).

[127] 'Kritische und konservative Aufgaben der Soziologie'.

- [128]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 1963), translated a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ohn Viertel (Cambridge, 1988) .
- [129] Jürgen Habermas, 'Analy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Dialektik. Ein Nacht-rag zur Kontroverse zwischen Popper und Adorno', in Horkheimer (ed.),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 [130] Adorno et al. ,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p. 123.
- [131]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Sociologica II* (Frankfurt am Main, 1962), pp. 12 and 13.
- [132] René König, *Studien zur Sozi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71), pp. 89, 101, 90.
- [133] Helmut Schelsky, 'Vom Sozialen Defaitismus der Sozialen Verantwortung', *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 2 (1951), p. 334.
- [134] Helmut Schelsky, *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Familie in der Gegenwart. Darstellung und Deutung eine empirisch-Soziologischen Tatbestandsaufnahme*, 5th edn (Stutt-gart, 1967), p. 327.
- [135] Adorno et al. , *Positivist Dispute*, pp. 91, 102.
- [136]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dorno et al. , *Positivist Dispute*, pp. 120, 121.
- [137] *Ibid.* , p. 128, see p. 599 below
- [138] *Ibid.* , p. 129.
- [139] 'Dogmatism, Reason, and Decision: on Theory and Praxis in our Scientific Civi-lization', in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p. 280.
- [140] Jürgen Habermas, 'The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a Post-script to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Popper and Adorno', in Adorno et al. , *Positivist Dispute*, p. 114.
- [141] *Ibid.* , p. 157.
- [142] Jürgen Habermas, 'A Positivistically Bisected Rationalism; a Reply to a Pam-phlet', in Adorno et al. , *Positivist Dispute*, pp. 222–3.
- [143] *Ibid.* , pp. 219, 215.
- [144]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a General Perspective', in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Cambridge, 1987), pp. 302, 308.
- [145] Helmut Schelsky, *Einsamkeit und Freiheit. Idee und Gestalt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und ihrer Reform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63) .

[146] Se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Kosmos-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 5 vols (Stuttgart, 1845–62); *Cosmos; A Sketch of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 trans. E. C. Ott6, B. H. Paul and W. S. Dallas (London, 1848–58), 5 vols.

[147] Hans Freyer, *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 (Leipzig, 1930), pp. 205, 7.

[148] *Ibid.*, pp. 203–4.

[149]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 312.

[150] *Ibid.*, p. 314.

[151] For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inaugural lecture in Frankfurt am Main, see also Axel Honneth, *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1985) .

[152] 'A Positivistically Bisected Rationalism; a Reply to a Pamphlet', in Adorno et al., *Positivist Dispute*, p. 199.

[153] On this topic, see Wolfgang Bonss, *Die Einübung des Tatsachenblicks. Zur Struktur und Veränderung empirische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2) .

[154] Horkheimer to Adorno, Montagnola, 27 September 1958.

[155] Jürgen Habermas, 'Ein philosophierender Intellektuell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September 1963.

[156] 'Positivismus, Idealismus, Materialismus' .

[157]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ät und Gesellschaft I - Studentenbefragung*, pp. lvi-lvii.

[158] René König (ed.), *Sozi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58) .

[159] Theodor W. Adorno,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Music*,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1976), and *Nervenzpunkte der neuen Musik* (Reinbek bei Hamburg, 1969), consisting of selections from *Klangfiguren* ) .

[160] Arnold Gehlen, *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Sozialpsychologische Probleme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Reinbek bei Hamburg, 1957) .

[161]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Soziologische Exkurse. Nach Vorträgen und Diskussionen* (Frankfurt am Main, 1956) .

[162] Theodor W. Adorno, *Eingriffe. Neun kritische Modelle* (Frankfurt am Main, 1963) .

- [163] Schelsky, *Soziologie der Sexualität*, p. 126.
- [164] Ibid., pp. 110–11.
- [165] Ibid., p. 8.
- [166] Ibid., p. 127.
- [167] Ibid., p. 74.
- [168] Ibid., p. 63.
- [169] Helmut Schelsky, 'Über das Restaurative in unserer Zeit', in *Auf der Suche nach Wirklichkeit. Gesammelte Aufsätze* (Düsseldorf, 1965), p. 417.
- [170] Helmut Schelsky, 'Zur Standortbestimmung der Gegenwart' (1960), in *Auf der Suche nach Wirklichkeit*, p. 435.
- [171] Arnold Gehlen, 'Über kulturelle Kristallisation' (1961), in *Studi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 (Neuwied, 1963), p. 321.
- [172] Hans Freyer, *Schwelle der Zeiten.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der Kultur* (Stuttgart, 1965), p. 331.
- [173] Arnold Gehlen, *Urmensch und Spätkultur. Philosophische Ergebnisse und Aussagen* (Bonn, 1956), p. 258.
- [174] [See Dennis L. Bark and David R. Gress, *A History of West Germany, vol. 2: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1963–1988* (Oxford, 1989), p. 157.]
- [175] Theodor W. Adorno and Arnold Gehlen, 'Ist die Soziologie ein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Ein Streitgespräch', in Friedemann Grenz, *Adornos Philosophie in Grundbegriffen. Auflösung einiger Deutungsprobleme* (Frankfurt am Main, 1974), pp. 249–50.
- [176] [Arnold Gehlen, *Urmensch und Spätkultur. Philosophische Ergebnisse und Aussagen* (Bonn, 1956) .]
- [177] Jürgen Habermas, 'Pädagogischer Optimismus vor Gericht einer pessimistischen Anthropologie. Schelskys Bedenken zur Schulreform', in *Neue Sammlung*, 1 (1961), pp. 251–78.
- [178] Jürgen Habermas, 'Arnold Gehlen: Imitation Substantiality',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trans. Frederick G. Lawrence (London, 1983), p. 121.
- [179] Jürgen Habermas, 'Martin Heidegger: the Great Influence', in *ibid.*, p. 60.
- [180]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1960);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London, 1975) .

[181] The reference is to Habermas's chapter, 'Hans-Georg Gadamer; Urbanizing the Heideggerian Province',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pp. 189–97.

[182] Eugen Kogon, *Der SS-Staat. Das System der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Berlin, 1947), trans. Heinz Nord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The Germa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e System Behind Them* (London, 1950);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Essence of Truth' (1943), trans. John Sallis, in *Basic Writings*, ed. David Farrell Krell (London, 1978), pp. 117–41.

[183]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1950) .

[184] Adorno to Horkheimer, Frankfurt am Main, 26 November 1949.

[185]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1966),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London, 1973), p. 73. 参看中文译本《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9 页，译文有改动。

[186] Karl Heinz Haag, *Kritik der neueren Ontologie* (Stuttgart, 1960), p. 73.

[187]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 pp. 109–10. 中译本第 107 页，译文有改动。

[188] Jürgen Habermas, 'Dogmatism, Reason and Decision; On Theory and Praxis in our Scientific Civiliz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p. 282.

[189] Theodor W. Adorno,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1964), *Jargon of Authenticity*, 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 Will (London, 1973), p. 47.

[190] On this phrase, see Dennis L. Bark and David R. Gress, *A History of West Germany* (Oxford, 1989), vol. 2;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pp. 38–40.

[191] 'Verfassungswirklichkeit und politische Zukunft der Arbeiterklasse', in Otto Kirchheimer,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Fasch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6), p. 75.

[192] Cited by Oskar Negt in 'Gesellschaftsbild und Geschichtsbewusstsein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militärischen Führungsschichten', in Gert Schäfer and Carl Nedelmann (eds), *Der CDU-Staat. Analysen zur Verfassungswirklichkeit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69), p. 367.

[193] Cited by Gert Schäfer, 'Leitlinien stabilitätskonformen Verhaltens', in Schäfer and Nedelmann (eds), *Der CDU-Staat* , p. 444.

[194] Hans Werner Richter, *Plädoyer für eine neue Regierung oder Keine Alternative* (Reinbek bei Hamburg, 1965) .

[195] *Der Spiegel* , 21 July 1965, p. 18.

### 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延续：《否定的辩证法》

1966年12月，阿多诺从蒙塔日诺拉给霍克海默写信说：

你已经收到了《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胖孩子，与此同时，能听到你的反应我当然会非常激动——尽管我不想强迫你以比你或我通常读此类书更快的速度来读它。我希望你不会认为这是对哲学的回归。相反，它有意做一种尝试：试图从哲学内部扩充（适度放置）传统的哲学问题框概念……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方面可能是有无必要进入所谓的专门化哲学领域来进行这种扩充；但这正好是我对于内在批判的热情——也不仅仅是一种热情——而且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的合法性。<sup>[1]</sup>

这封信再明显不过地暗示：阿多诺是多么愿意通过直接干预现时代而对现时代进行概括，但在直接表述这种冲动方面又是多么的无能为力。这封信写于联邦德国历史上的危机时期。由于打乱了经济奇迹进程而出现的第一次衰退所带来的后果，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与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执政已于1966年秋分崩瓦解。两年前成立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已经分别以7.9%和7.4%的选票当选

进入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议会。在这种形势之下，1966年11月底社会民主党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大联合政府。与自由民主党不同，社会民主党同意应该给予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个部长职位，对他牵涉的《明镜》周刊事件和其他丑闻既往不咎。<sup>[2]</sup> 社会民主党也认可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出任总理。基辛格曾是纳粹党员，曾任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与被占领国家帮纳粹做宣传的广播公司之间的联络官员。在巴特戈德斯贝尔格会议上倡导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革的发起人之一维利·勃兰特，成了外交部长和副总理。正如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生杂志《铁饼》上所说，“我们有理由为新政府担心……政府计划当中目前为人们所知的东西，与其说是民主政治的安全将在紧急状态期间得到保障，不如说是紧急状态将被强加于民主政治之上。”<sup>[3]</sup>

马克思于1875年写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的批判。阿多诺有段时间也计划写一篇戈德斯贝尔格纲领批判，并想在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尔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编辑的《交通手册》（*Kursbuch*）出版它，而恩岑斯贝尔格尔对这个想法也非常热心。然而，由于害怕给“那些继续破坏已经被严重动摇的民主的人们”提供帮助，阿多诺在此计划未付诸实施之前就退缩了。霍克海默助长了这些疑虑。这样阿多诺才能问心无愧地投身于整合自己美学思想的工作中——因此可以一边继续间接地表述他的政治冲动，一边保留他的政治怀疑状态。

自1959年以来他一直在写作《否定的辩证法》。“此刻我耳边回响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哲学计划，自《反认识论》以来最重要的计划”，他在1963年给作曲家恩斯特·克雷内克（Ernst Krenek）的信中这样说。写作此书的工作严格依照如下每日工作程序进行。在清晨的钢琴练习之后，他在社会研究所——处在角落的所长办公室——度过整个上午和下午。那间办公室既不安静也不浪漫，因为它外面就是 Senckenberg-Anlage街，这是法兰克福市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连续几年之中阿多诺一直在周二和周四主持关于哲学和社会学的研讨班和讲座课程，除了

这些研讨班和课程之外间或还有一些独特的社会学事件，比如，以学生们日常经验为出发点的欢笑讨论班和争吵讨论班；他还与霍克海默一起定期主持高级学员的哲学研讨班（Philosophisches Hauptseminar）。他的晚上在家度过——所谓的家是一套租来的房子，离研究所只有五分钟行程，家里惟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大钢琴，他晚上在家里读读书。为了写作，阿多诺不断地在他一直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做笔记。随后他念出笔记上所记的内容。稿子被按双倍行距打印，并且页面周围都留出很大的空白——打出来的稿子里的句子常常都是不完整的。他随后修改这些稿子，有时候修改之后再打印出来的内容会所剩无几，全被新写的内容所替代。这种过程有时要重复四次之多。<sup>[4]</sup>

1965年底，阿多诺请求休假一年，这还是自1953年以来第一次提出休假请求，为的是能完成他认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那些草稿：“在我还能完全支配我的能力的时候”完成“关于辩证法基本原理的大篇幅的书，和一部关于美学的书”<sup>[5]</sup>。他观看了布莱希特新导的《三毛钱歌剧》（*Threepenny Opera*），发现这出戏极其乏味和老套，<sup>[6]</sup>这加重了他的疑虑，他怀疑为现时代而创作的东西是否能够行之久远。他探讨辩证法和美学基本原理的长篇大作，也源于一种解决如下悖论——比如在他的《现代音乐哲学》中所发现的——的尝试：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作品恰恰是那些再也不能被创作出来的作品。阿多诺试图根据他的音乐老师阿尔班·贝尔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试图创造出一些伟大的形式，事实上是一些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正是对作品本身的反叛。

像《现代音乐哲学》和《反认识论》一样，这些努力的最初结果就是由一篇长导论和系列论文组成的《否定的辩证法》。除了长篇导论之外，这本书包括三个部分：“与本体论的关系”，“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以及“模式”，前两个部分是在巴黎法兰西学院讲演的基础上写成的，而第三个部分则吸收了1930年代所写的草稿和文章中的论题。

为什么它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理论或社会理论呢？无论阿多诺怎样强烈地希望强调“实体思想（substantive thought）的第一性”<sup>[7]</sup>

并预示会有一种超越于伪装的哲学的具体化——可为什么是实体哲学而不是唯物的社会理论呢？导论是这么介绍的：

一度显得过时的哲学，由于实现它的契机未被人们所把握而得以继续存在。人们对它的概括性判断（summary judgement）——它仅仅解释了世界，而且在现实面前屈从并严重削弱了自身——在改变世界的企图失败之后就变成了一种理性的失败主义……也许正是一种不充分的解释才许诺要把它付诸实践。<sup>[8]</sup>

在第二部分的前几页，在“与黑格尔左派的关系”——“黑格尔左派”是黑格尔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专家的学生的哲学，黑格尔的这些学生在哲学层面与错误的思想搏斗，但不过是试图用批判思想来替代幻想——那一节，阿多诺又一次说明：

教条化和思想禁忌对理论的清算促成了可恶的实践。理论是否能重新赢得它的独立性取决于实践本身的兴趣。这两种要素的相互关系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而是随历史情况而波动……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理论上依然存在的不充分之处正好成了历史实践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在理论上重新得到反思，而不是让思想无理性地服从实践第一性。<sup>[9]</sup>

600 然而，与1931年阿多诺他的就职讲演“哲学的现状”中所说的一样，他也在《否定的辩证法》当中强调哲学不能再期待可以把握总体性。但如果哲学不能把握总体性，那么与社会理论相比就没有了任何优势——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理由去探讨黑格尔左派哲学而不是无体系的社会理论呢？写完了一部哲学著作又接着写一部长篇美学著作《美学理论》（尽管阿多诺在有生之年并未完成此书，这部著作在他身后出版），而在写作《美学理论》的同时还写了一部论道德哲学的书，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个三部曲（阿多诺说它们“代表了我的思想的精髓”），阿多诺这样做

又是为什么呢？<sup>[10]</sup>难道一种无体系的社会理论确实不是更重要、更富于创造性么？

“为什么是实体哲学而不是唯物的社会理论？”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在于，阿多诺那里确实存在类似于克拉考尔曾经描述布洛赫的那种情形，即“狂乱地跑向上帝”。没有在社会理论层面对世界进行更完美的解释，相反，急躁使阿多诺的思想固执于一种理念——即，可以获得还没有落入虚假总体性符咒之下的东西——来展开。根据序言所说，否定的辩证法

试图用逻辑一致性来代替同一性原则，用那种关于不被同一性所控制的事物的观念来代替被推于最上位的概念的最高权威。运用主体的力量来冲破构成性主体性（constitutive subjectivity）的谬见——这就是笔者自从信任自己的精神冲动起就为自己确定的任务。现在，他不愿意再拖延了。<sup>[11]</sup>

在社会理论层面需要描述或至少勾勒一种改变有缺陷的整体的方式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在“哲学理论”层面上被如此地召唤出来。<sup>[12]</sup>另外，在跨学科合作层面无法实现的东西，似乎在哲学理论的层面上通过一种已经被纳入到多学科方法的单一研究又可以实现了。

“否定的辩证法”是阿多诺原有的哲学规避计划的一个新说法，也是“间断的辩证法”这个概念的新说法，“间断的辩证法”在他早期论克尔凯郭尔的书中曾被特别强调过。“间断的辩证法”当中的主体间真理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与自发主体拥有的那种神话式的无限能力是对立的。否定的辩证法乃是自满的精神和他那本论克尔凯郭尔的书中所说那种“期望的超验”（transcendence of longing）<sup>[13]</sup>机能的走向衰退的逻辑。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要终结统一性的观念和自我修正的功能。

但在阿多诺本人所诊断出的“管控世界”当中，在统一性观念的符咒之下“揭示”那些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和非同一性的东西如何可能呢？而且如果“事物的恰当状态”不受辩证法束缚，<sup>[14]</sup>那么该用什么来

601

防止已经被释放的非同一性——统一性观念和辩证法不再对它们具有任何权力——不会退化为无定形的、孤立的和盲目的自然状态呢？用什么来“调解”差异并使一种相互关系和普遍性可以摆脱强制？如果辩证法是运用概念去揭示未被概念化的那些东西，而不是把它们化约为概念的一种发现方式，<sup>[15]</sup>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构想出一种思想上的推进，走向一种摆脱了强制的普遍性，走向荷尔德林所说的那种“差异即善”<sup>[16]</sup>的境界。

由黑格尔在唯心主义体系框架内发展起来并被当作实体哲学化探讨原则的辩证法，一直掩盖着客体抵抗主体、非同一性抵抗同一性的经验。正是这一点使某种摆脱同一性哲学的辩证法、反体系的辩证法成为可能，甚至在阿多诺看来成为必要。“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并且“矛盾是从同一性方面来看的非同一性；辩证法中矛盾原理的第一性使统一性思想成为衡量异质性的尺度”。<sup>[17]</sup>

然而，驱动辩证法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下层的某种抵抗。那些依其所述是哲学起源和最高原则的概念，也是辩证法背后的推动性力量。正是在它们宣称要拥有整体性的过程中，它们失败了。但如果这些概念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第一原则，那么也就根本说不上是第一原则了。相反，它们更次要，尽管还是作为“更高”、更活跃、更有推动力的原则。支持阿多诺全部论证的思想过程以如下顺序展开：

说到底，对同一性的批判是对客体优势的探索。不管同一性思维怎样否认，它都是主观主义的。对这种思维的修正，即把同一性看作谎言，并没有使主体和客体达到一种平衡，也没有把功能概念提高到在认识中独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角色；甚至在我们仅仅限制主体时，我们也剥夺了主体的权力。主体自身的绝对性是一种尺度，根据这种尺度，非同一性最微不足道的残余在主体看来也像是一种绝对的威胁。最低限度也会把主体全盘弄糟，因为主体自称是整体。

主观性在不能独立发展自身的环境下会改变自己的性质……

由于中介 (mediation) 这个概念内在的这种不平等性, 主体以完全不同于客体的方式进入了客体之中。客体虽然只能靠主体来思考, 但仍总是某种不同于主体的东西; 而主体在天性上一开始也就是一种客体。即使作为一种观念, 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 但我们可以想像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成为一个客体也就是成为主观性意义的一部分; 但成为一个主体却不会同样成为客体性意义的一部分。

我是一个实体存在, 这种表述甚至暗含在“我想那种应该可以伴随我的一切概念的东西”这种逻辑意义当中, 因为时间次序是这种表述存在的一个可能性条件; 而且, 在短暂的时间里不会有时间次序。代名词“我的”意指一种作为诸客体之中的一个客体的主体, 没有这个“我的”, 便永远不会有任何“我思”。<sup>[18]</sup>

在这背后有一种朴素的洞见: 没有人类, 世界或许也可以存在, 但是人类没有世界绝不能够生存。否定的辩证法意味着对他者 (the Other) 的留意。和在黑格尔那里不同, 否定的辩证法并不完满地成为一种体系, 也不代表从一个范畴到另一范畴的进步。相反, 它一次又一次在各种情形之中告诫人们, 要从那些根本不能让自身摆脱的“同一性”思维和自满精神中“解放非同一性”, 从那些只能对之加以歪曲并造成不可预见后果的思维中解放“非同一性”。<sup>[19]</sup> 实体化 (hypostatizations) 决不会长久地取得成功, 而惟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必须认识并接受客体、他者、异物: 这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结论。

如果一个人……想把一切实存的东西都推动成纯粹的现实性, 那么他就会倾向于敌视差异性 (otherness), 敌视那些被称为异化的、并非毫无意义的异己之物。他就会倾向于一种这样的非同一性, 它不独独可以作为意识的, 而且可以作为和解的人类的一种解脱……我们不能从现存的辩证法中消除在意识中被体验为异物的那种东西: 否定性的强制和他律, 还有我们应当爱、但意识的魔

咒和近亲繁殖不允许我们去爱的那种东西被损坏了的形象。艾兴多夫 (Eichendorff) 的“漂亮的异己者”一词产生于被认为有厌世情感、承受了异化之痛的浪漫主义。和解的状况不会是吞并异己物的哲学帝国主义。相反，它的幸福在于：异己物以它被赋予的亲近性来说，依然是疏远的和不同的东西，既超越了异类，又超越了它本身之所是。<sup>[20]</sup>

然而，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应该期待客体的优势，<sup>[21]</sup> 消极意义上的客体优势。同阿多诺以往的所有思想一样，此处的这些概念都是双极的。积极意义上的客体优势意味着差异化的主体一方对通过定性差异而感受到的客体的开放性。消极意义上的客体优势则意味着客体通过已变成自治性的社会强制力量——缺乏全面主体 (overall subject) 的社会状况——对于无权个体的统治。

哪里存在着积极意义上的客体优势，哪里也就有“主体过剩”。<sup>[22]</sup> 客体必须被认为是没有主体的客体。但也只有在有差异化感知自由的主体存在的地方，在有差异地感知着的主体把客体既不当作特许之物也不当作必然之物去关注、既不逢迎也不欺骗地去关注的地方，人们才能在强调的意义上谈论客体优势。否则，主体必须“服从于客体”并使自身成为一种能够把“模仿反应机能”与概念规范融为一体的器官。<sup>[23]</sup> 阿多诺曾断言，马勒就具有这种无与伦比的能力，他能“使无限主体性的东西客体化”。<sup>[24]</sup> 自他 1920 年代写作音乐评论以来，他就把无限主体性的东西的客体化视为艺术——同样也是社会——的任务。在有差异地感知着的主体内部对客体进行客体化——这就是这项任务历经多年之后形成的综合形式，《否定的辩证法》现在就要为这种综合形式提供最先进的解决办法。

全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批判范围内的“等待练习”，它以同一性思维之道还治其身，但又不敢试着从中逃离。导论解释了哲学经验的概念，第二部分探讨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及其与某些范畴的关系，这两部分继续围绕被反思的启蒙 (reflected en-

lightenment) 这一哲学母题而展开, 所谓被反思的启蒙也就是《启蒙辩证法》曾希望为之提供基础的那种积极的启蒙概念。这两个部分延续了这一基础准备工作。

本书第三部分探讨各种“模式”, 它旨在证明, 对被反思的启蒙的要求, “通过概念方式”而超越概念、通过概念而“达到非概念”的要求, 对“概念反思这一中介当中那种完整的、不可化简的经验”<sup>[251]</sup>的要求, 是否得到了满足。这些模式还想要证明, 是否可能以上述方式有效地区分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应当被爱的东西的歪曲形象——它以肯定意义体现客体优势; 另一方面是人们已无从辩识的社会中的各种功能交互关系的支配即他律——它以消极意义体现客体优势。

模式、典型思想的概念,<sup>[261]</sup>代表了以一种反体系的方式掌握虚假总体性体系的努力, 在具体事例中为这种体系划定界限, 这些界限体现着对“他者”扭曲和抵抗的程度; 同时, 也代表了一种在他者内部解除“非同一性事物的连贯性”的努力。<sup>[271]</sup>第一个模式包含着对围绕自由概念而展开的道德哲学的种种思考, 集中在“实践理性元批判”一章。第二个模式则是对围绕世界精神和自然史而展开的历史哲学的种种思考, 集中在“有关黑格尔的题外话”一章。第三章“形而上学沉思”则处理死、生、幸福、不朽、复活、超越和希望等观念和终极问题。阿多诺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选择这些独特的概念。他此处所用的方法并没有采用像他对否定的辩证法的解释可能会让人们预期的那种方式——依据那些短暂的、粗糙的和细微的东西, 这一点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还有, 所有这些模式, 没有一个针对的是那种总会让人立即想起的与非同一性事物概念、与客体优势概念相关的现象: 由人支配的外部自然。一方面, 阿多诺想要避开这一话题也是情有可原的。他曾反复自我批评, 承认自己不了解自然科学, 因此不能消除让哲学远离自然科学的遗憾。另一方面, 他很可能从一种非常不同于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之联系的视角来思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就像阿多诺本人通过别的论题所表明的那样, 甚至在没有任何对各门科学学科——经济、科技史和文化史领域——的研究进行参照的情况下也能这么做。就阿多诺的兴趣而言, 即

604

便有这类盲点也不足为怪，但就理论背景而言，这确乎是一个敏感的弱点，使他认为世界历史的最终致命大灾难源于自满精神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支配，在这里，真正领悟的观念和健康的世界条件的观念非常接近于浪漫主义的自然哲学。

第一个模式，即对意志——主体——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人以深刻印象。各门科学学科由于要探索科学法则而被迫支持决定论，从而把自由意志问题留给了哲学，而后者则用各种前科学的、自贬的（apologetic）思想来回答它。因此，哲学无非确认了那些被科学呈现为被决定了命运的主体们所犯的罪行。

605 如果自由意志的命题使依附性的个人承受了他们无法对付的社会不公正，如果它不停地用他们不能实现的又迫切需要的东西来羞辱他们，那么另一方面，不自由的命题就相当于在形而上学上延长了现状的统治地位。不自由的命题断言自身是永远不变的，如果个人不准备屈服的话，那么它就请求他屈服，因为这是他只能做的一切……否定意志自由将彻底意味着把人毫无保留地还原于他们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商品性规范形式。同样错误的是先验的决定论，即那种在商品社会中并从这个社会中抽象出来的自由意志学说。个人本身构成了商品社会的一个要素，归于他的那种纯粹自发性就是社会征用的自发性。主体需要全身心做的一切只是一种对他来说不可避免的选择：意志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sup>[28]</sup>

阿多诺把这一点同对自由和自由匮乏的辩证法的表述进行对比，为的是提供一种批判性的标准，可以借以评定社会化个体的自由或自由匮乏。

按康德的模式，就主体意识到自身并和自身相同一而言，主体是自由的；但是就主体从属于并永久保留同一性的强制而言，主体

在这种同一性中又是不自由的。作为模糊的、非同一的自然，他们是不自由的；然而，作为这种自然，他们又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的不可抗拒的冲动——不过是主体与自身的不同一性——将使他们摆脱同一性的强制特点。<sup>[29]</sup>

在一个对抗性的世界里，同一性的强制本性和冲动的破坏性本性都是占优势的——它们又都是自由匮乏的表现。而真正的自由则意味着顺应人的冲动，并因而超出自我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与他人和解。阿多诺画了一幅有点苍白无力的乌托邦，在其中“每一个人无畏的、积极的对总体的参与”将“不再把这种参与制度化，而是允许它产生现实的后果”。<sup>[30]</sup>他就用这种想像与那种构成社会的方式作对比，在那种构成方式中，意志自由的观念使得把罪责推给社会中那些无权力成员的做法总是合法的；而且他还用这种想像来与那种以压抑的心理把自由和责任相互关联起来的哲学传统进行比较。

阿多诺的论断有一个核心的线索，这便是对康德这位以自由为主题的哲学家的批判。阿多诺把自由和自由之匮乏的概念——已经被变成固定用于讨论所谓的孤立个体的概念，放回到了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当中。他强调要关注他自己时代的经验，其中首先是那些最严重地践踏尊严的那些事件所留下的、至今还折磨着人的经验，那些有关个体的软弱无力以及纳粹集中营的那种最具毁灭性的体验。他以这种方式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不仅在联邦德国的哲学领域里是反传统的，而且对于德国国内当时的整个思想氛围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这些结论显示出了某种人道的现实主义。

道德问题被简明扼要地提出来，但不是是在它的令人作呕的拙劣模仿、即性压抑中，而是用下列论点提了出来：任何人都该受折磨；决不应该有集中营——但所有这些事情还在亚洲和非洲继续着并被隐匿起来。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文明的博爱（humanity）对于那些被它无耻地污蔑为不开化的人们来说，依然是不人

606

道的。

如果一个道德哲学家抓住这些论点并因为逮住了道德批评家——道德批评家也引用道德哲学家满意的断言的价值——而兴高采烈，那么，他的有说服力的结论就是虚假的。这些论点作为在听说某个地方发生的严刑拷打的消息后产生的回应和冲动是真实的。它们不一定被合理化；作为一种抽象原则，它们会很快落入它们的推导和效力的恶的无限性中……

冲动——赤裸裸的肉体的畏惧以及与布莱希特所说的“痛苦的躯体”相一致的感觉——是道德行为中内在固有的，却被无情的合理化的企图否认了。最迫切的事情再一次成了沉思的，从而嘲笑了它自身的迫切性……【与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的东西独自存在于极端中，存在于自发的活动中（这种活动不耐心进行论证，不容忍恐怖继续下去），存在于不被命令所吓倒的意识的意识中——这种意识向人们表明为什么恐怖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鉴于一切个人现实的软弱无力，上述矛盾独独成了今天道德的舞台。<sup>[511]</sup>

由此得出的结论表现出对于自发的抵抗和自发的革命行为的辩护。按照阿多诺给出的例子，对那些要为拷打折磨负责的阶层，连同那些给予他们命令的人，还有那些赞助他们的大企业家来说，对所有应该立即枪决——在一场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中应当立即枪决的人来说，自发的抵抗和自发的革命要比纽伦堡审判在精神上更为正确。在这背后潜藏着一种信念，即真理更容易在释放出强烈冲动的危机环境条件下被发现，真理更容易在操作型性格类型被证明是最危险的性格类型的这个时代里被发现——之所以说这种性格是最危险的，乃是因为此类性格的人会用行政的方法除掉他们的受害者，而他们冷静的理智和情感的彻底匮乏使他们变得异常残忍。阿多诺完全明白，这类观点很可能被误解，它们是那么接近存在主义哲学，他完全明白法西斯主义对造反的利用方式。在这些段落中，他变成了一位勇敢的哲学家，在恰当的语境中表达出他最基本的直觉。

如果人们敢于给康德的智性特点的  $x$  以其真实的内容，而这内容又反对疑难概念总的不确定性的话，那么或许在正当行动的冲动中就会有历史上最先进的、准时发光且又迅速熄灭的意识。它是对可能性的具体的、间歇性的预知，既不异化于人们也不与人们相同一。<sup>[32]</sup>

这就是阿多诺所完成的堪称“人道现实主义”(humane realism)的最丰满表述。

阿多诺在道德哲学方面围绕自由概念展开的思考，涉及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关系、处于具体社会历史形势之中的人与其同胞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些思考被证明乃是通过概念去理解超概念事物的一种努力，但又决不将其化约为概念。更确切地说，这种努力试图认可已被抽象毁坏了的东西，认可“前自我的冲动”、“身体的”冲动以及“附加物”(Hinzutretende)，<sup>[33]</sup> 但又不抛弃同一性、同一化思维以及由社会共存所体现的统一性。正如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所捍卫的观点，野蛮事物可以提供支配自身的某种精神力量，去反抗已经变得与它自身完全不同的它自身行为的客观化；正如《启蒙辩证法》曾支持主体内部对于自然的回忆，正如霍克海默的主观工具理性批判曾坚决捍卫沉思与本能之间的联盟——《否定的辩证法》也捍卫如下观点：“光明的自由意识”得益于“对古代的冲动记忆，而这种冲动并不是任何固定的自我所能驾驭的”。<sup>[34]</sup> “在某种早已过去的东西和某种成长起来但未被认识而有一天能被认识的东西之间”有一道“闪光”。<sup>[35]</sup> 但联系“前自我冲动”与对超越自我并能代表真正个体性之物的期待的线索依然模糊不清——恰如相信驯雅力量可以控制肉体冲动、本能和野性中不受约束的自我保存这一信念一样模糊不清。

另外两个模式也包含了阿多诺某些早期思想的演化发展。在“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一章里，开始就有奥斯维辛之后一切文化都是垃圾的格言，<sup>[36]</sup> 随后还提到要在复活身体的唯物主义渴望或者世界乌托邦观

念里让神学主题获得唯物主义的复原——在这样一种乌托邦世界里，不仅一切现存苦难都被消除，而且已经流逝的那些不能挽回的往事也可以重新来过。其实，本雅明和霍克海默在1930年代的通信中就已经谈到过后一个主题，它为一种人道的、现实主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背景。阿多诺认为，斯特林堡 (Strindberg) 的名句“只有憎恨邪恶的人才能热爱善良的东西”最充分不过地表达了这种观念。本雅明和马尔库塞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表达——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就说过，“仇恨和牺牲精神，这二者都是从被奴役的祖先这一形象那里汲取力量，而不是从解放了的孙子们的形象那里汲取力量”；<sup>[37]</sup>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说过，“如果正义和自由将要占上见，那么忘却也就是宽恕那些不应该被饶恕的事情”。<sup>[38]</sup>

“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没有丝毫的宁静感。它们是以“奥斯维辛之后”这一格言开场的。这里没有那种“无论如何”之类的口吻，而是这样一种语调：

这种不可抵抗地迫使形而上学加入它一度打算反对的东西的过程，已达到了它的消失点。自青年黑格尔以来，哲学还未能制止住它严重陷入各类实际生存问题的态势，除非它为了被许可的思虑而出卖自己。儿童在对抢劫者地区、尸体、令人厌恶的甜腻的腐烂气味、该地区使用的脏话等内容的入迷中感到了这一点。这一领域无意识的力量也许像幼儿期性欲一样强大……无意识的知识把被文明教育所压抑的东西私下传给儿童，以耳语似的声音说：“就是这么回事。”悲惨的物质生活激发出差差不多同样苦受压抑的崇高旨趣的火花，它引起了“这是什么？”和“它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打算用“粪堆”和“猪圈”之类的话来使儿童记住使他震惊的事情，这种人也许比黑格尔更接近绝对知识，尽管黑格尔的著作向读者许诺只有以优雅的姿态才能把握这种绝对知识。<sup>[39]</sup>

但当形而上学的另一极也被回忆起来的时候，就出现了某种“无论

如何”的语气：

什么是形而上学体验？如果我们不屑把它摆到所谓的原始宗教经验上来认识，我们就很可能像普鲁斯特那样在幸福中去想像它，而这幸福是像“风口”、“领主谷”之类的村名所许诺的。人们认为到那里去就能如愿以偿，仿佛那里有这种东西。实际上到了那里这种许诺便像彩虹一样消失了。但人们并不失望，而是感到更接近了它，并认为正因为如此才看不见它……

对儿童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在他喜爱的村庄里使他高兴的东西仅仅是在这里找到的，只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他是错误的，但他的错误创造了经验模式。这是一种概念的模式，这种概念最终是事物自身的概念而不是对事物可怜的抽象。<sup>[46]</sup>

两种经验所共有的就是一种越界，它充满感性和物质性，但又超越了感官和物质。像这样一些段落概括地提供了一种想像，描述已经卷入虚伪生活的生活当中可能恰当的东西，而社会理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对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之后的生活这个主题成为了证明如下事实论据——即，依然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出发对本质性的事情进行哲学化的探讨。

609

《否定的辩证法》描画出了这个人的特殊肖像：他专注于用具体的哲学化方式来看待他所写的书——这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在此书中他的具体哲学仅仅充当了他陈述及论证自己方法论的附录。从整体上看，《否定的辩证法》——如它的标题所示，并不指本书的内容——因此在是哲学理论当中，只是科学哲学和传统认识论的一种对应物。与此同时，这种折中也使得本书有别于对科学和理论均抱有敌意的存在论。但本书认为把科学研究囊括进来会威胁那些推断出来的洞见或使之不再可能，这种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一概念在应对各种科学哲学的过程中只是保证了对那些非确定性经验的坚持，而且指出了这样一种方向，即这种坚持应该借助否定性概念——“非同一性”——的方

式来进行，但“非同一性”的确切含义却总是在“隐秘”的两极和“它应该就是个体性”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但从否定的辩证法来看，只有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研究工作才是富于成效的。阿多诺之所以排除科学研究，之所以要用历史哲学来围剿社会理论，只有急躁和个人偏好可以解释——尽管就阿多诺本人而言，他用历史哲学来围剿社会理论的工作只完成了一部分。

## 批判理论家和学生运动

在阿多诺发表《否定的辩证法》的同一年，马尔库塞发表了“论压抑性的宽容”的德文版。一年之前，该文的英文版就已面世，与马尔库塞的两位友人美国左派罗伯特·P·沃尔夫（Robert P. Wolff）和巴林顿·莫尔（Barrington Moore）的文章一起收入了一本名为《纯粹宽容批判》的册子。<sup>[41]</sup>正如马尔库塞本人在1965年初写此文时给霍克海默的信中所说的，这是一篇“立场鲜明的”文章。

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当中，马尔库塞就曾试图呈现老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忽视的那些东西，试图把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置入制度背景之中。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有效的方式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其方式体现着他自己的个性并与其他法兰克福理论家的风格明显有别。他以一种坦率的浪漫主义描述了一位敏感的理论家的日常经验：

610

否认自由，甚至否认自由的可能性，相当于在自由强化压制的地方承认自由。人民被容许在任何仍处于和平和宁静的地方打破平静，干丑事或丑化事物，流露亲昵关系，冒犯得体的礼节姿态，而且容许的程度令人惊恐。它之所以令人惊恐，乃因为它们表现出那种合法的、甚至有组织的努力，即人们根据自己的权利排斥他人的权利，甚至在一个很小的、专属的生存领域阻挠自治。在过度发

达的国家里，日益增多的一部分人口成了一批巨大的被征服的受众——不是被极权主义的政体所征服，而是被某些公民的自由权所征服，这些人用以娱乐和晋升的大众传媒强迫他人分享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见解和他们的口味……大众的社会化始于家庭，并且束缚了意识和良知的发展。<sup>[12]</sup>

从内容方面来看，马尔库塞在本书中不得不说的东西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而且似乎也在暗示原有的角色协作和分工仍然在继续。与阿多诺的那些著作的结论部分一样，该书标题所概括的诊断与书中提到的可以促成质变机会的背景构成了明显的反差，因为目前正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依照《爱欲与社会》当中所阐述的思想，马尔库塞把这种机会视为“对需求进行重新界定”的机会。<sup>[13]</sup>而早在《单向度的人》的最后几页——该部分内容围绕着教育专政这个概念而展开——当中，马尔库塞就指出，幻想解放的前提就是对目前那些大量自由存在的、使压抑型社会永世长存的东西进行压抑。在引用本雅明这句名言“只因那些绝望的人们，希望才给予了我们”来结束全书之前，马尔库塞，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当时美国支持越南的独裁政权镇压民族解放斗争，而在国内继续压制黑人，同时已经通过福利国家政策为驯化资本主义搞了最基本的努力——进一步提出了一种面向边缘群体的理论：

然而，处在保守的民众地层之下的，是流浪者和局外人、别的种族和别的肤色的受剥削者和受迫害者、失业者和（因年龄、体力等）不能被雇用者的下层居民。他们生存在民主过程之外；他们的生活就是对结束不可容忍的生活条件和制度的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造反也是革命性的。他们的造反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这个社会制度所腐蚀；这是违反游戏规则的基本力量，而且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揭露了这种游戏不过是被操纵者的游戏。当他们汇聚一

起赤手空拳而毫无保护地走到大街上，要求最起码的公民权时，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的是警犬、石块、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支持着每一次为法律和秩序的受害者们所进行的政治示威。他们开始拒绝加入这个游戏，这一事实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sup>[41]</sup>

这种向着实践责任理论的转向，在《单向度的人》里还仅仅是试探性地有所反映，而到讨论宽容的这篇文章里就被热情地表达了出来。1948年马尔库塞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曾经激烈地批评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认为支撑“存在主义虚无主义语言”的基础不过是“自由竞争、自由行动和所有人机会均等这样的意识形态”。但在他讨论宽容的这篇文章当中，马尔库塞又站在了萨特一边，因为萨特于1961年为弗朗茨·法依（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撰写了序言，表达了对此书无条件的支持，并且将其描述为“反殖民革命的共产党宣言”。<sup>[42]</sup>法依的书和马尔库塞论“强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一文的德文版都发表于1966年，这是西德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有计划开展运动的文献标志。

马尔库塞把他这篇“立场鲜明”的“强制性宽容”题献给他的布兰代斯大学的学生们。这并不仅仅是对参与他研讨班的聪明学子们的答谢，而且是他对在政治上已经很活跃的这些学生们的某种声援。自1960年代早期以来，在争取公民权的斗争中，美国南部的许多斗争者就一直采用静坐和上街战术推动在餐馆、商店和公共运输系统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学生们——而且不只是黑人学生们——在这些活动当中一直是白人暴力的受害者。在柏克利大学兴起了自由演讲运动，学生们为拥有在大学校园募集钱款以支持民权组织和其他事业的权利而斗争。1964年12月，800名学生在静坐罢课中被拘捕，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逮捕人数最多的一次。学生反越战，并通过焚烧他们手中的征兵卡来对抗征兵。

萨特在其为法依的《全世界受苦人》所撰写的序言中说：“任何温

顺也不能抹去暴力的痕迹；只有暴力自身才能摧毁它们。土著人通过武力将殖民者驱逐出去，才能治疗自己的殖民地神经症。”<sup>[16]</sup> 他反对那些期待游击队战士像骑士一样行事并以此显示他们的仁爱的法国左派。尽管马尔库塞并不支持法依的观点——被压迫者要成为人就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压迫者，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的：

从其所起的历史作用看，革命暴力和反动暴力之间、被压迫者实施的暴力和压迫者实施的暴力之间是有差别的。从伦理学上看，612这两种暴力形式又都是野蛮和邪恶的——可历史何尝是根据伦理标准而形成的呢？仅仅在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一无所有者反抗有产者的时候才开始动用这些伦理标准，只会弱化对暴力的抗议，只会是为现行暴力的辩护。<sup>[17]</sup>

马尔库塞把批判帝国主义的激进主义同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激进主义结合了起来。甚至在这个社会的中心，现行暴力还处于统治地位，而作为整体的社会则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他的结论似乎是有效的。对被作为整体权力的美国压迫着的那些人，对把美国当作发达工业社会而任其征服的人，对通过与少数族裔和被剥夺了权利并屈从于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以采取对压抑性制度的斗争的人们，对并不完全以此方式采取此类斗争的人们来说，都是如此。马尔库塞论宽容的这篇文章结尾时说：

我相信，如果合法手段被证明是不够用的，那么被压迫和被压抑的少数人就有一种反抗压迫的“自然权利”。法律和规则无论何时何地无非是保护既定等级的法律和规则；援引这种法律和这种规则的绝对权威来反对那些蒙受其苦并反抗它的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报仇，而是为了分享人性，这是很荒谬的。他们的审判者就是合法的政府机构、警察，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良心。如果他们动用暴力，他们也并不是启动一连串暴力连锁反应，而是在

试图中止现有的暴力枷锁。由于他们将要受到惩罚，所以他们知道风险，而一旦他们愿意冒此风险，那么任何第三者，尤其是教育家和知识分子都没有权利向他们宣讲克制。<sup>[18]</sup>

如果说诸如此类的陈述尚需要解释——特别在西德当时的语境中阅读的时候——的话，那么他所做的其他陈述，即贯穿于全文的呼吁左派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施行教育专政的要求，则显得有些怪异且自相矛盾。

613 与虚假意识及其受益者进行斗争的弱小而无权的少数人必须得到帮助：他们的继续存在，较之于保存被滥用的权利和特权——这赋予压迫这些少数人的那些人以宪法权力——而言更为重要。至此应该清楚的是，那些没有公民权的人去行使公民权，其先决条件就是从阻挠他们行使公民权的那些人手中收回公民权。<sup>[19]</sup>

可是，除了统治阶级的权威和机构之外，又有谁能收回或者实施公民权呢？在马尔库塞假定的这样一个对宽容的单方面约束总在幕后起作用的社会中，所有对偏袒性的宽容的诉求都只能起到强化当权者观点的作用，这些当权者总是看似公正的。在此类情形之下，只有一种要求是有用的：即呼吁所有人行使他们的公民权的要求。比方说，要是舆论自由权和知情权同大众传媒的资本主义结构产生了冲突，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大众传媒民主化并发起捍卫此要求的斗争。而要求以某种公开形式的“支持稽查制度”去取代弥散于媒体的“看不见的稽查制度”则是不对的。在马尔库塞这些思想背后，似乎存在着把反抗这一自然权利挪入意识、教养和教育领域的错误转移。也许只有暴力才能治愈因被殖民化而患上殖民神经官能症的人，或者也许只有暴力才能保护人们在许多境况下免受暴力侵害，可我们不能用左派的操纵对抗右派的操纵。也许马尔库塞只是想表明如下显而易见的事实：必须从那些以他人代价据自由为己有的人手中解救自由，为获得被限制的自由权利而做的

斗争，必须使另外一些以他人为代价而被分享着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可是当争论的焦点并非什么有伤害之事，而只是更多民主和更多自由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使用支持稽查制度或反稽查制度这样有害的概念呢？当非暴力形式的公民的不服从——消极抵抗、占领广场或建筑物，以及其他不造成伤害的行动——乃是题中之义的时候，他为什么谈论着一般意义上的暴力呢？就这些行为并不认可他们习惯于追求的目标而言，律师、政客和大部分公众都会异口同声地把它们描述为暴力行为。但是在作为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社会之反对派的哲学家那里，这难道不是注定要引起误解吗？阿多诺尚未读过“论强制性宽容”，但通过三手或四手渠道私下对马尔库塞这些论断有所耳闻，他告诉霍克海默说他们必须尽早找机会同马尔库塞严肃地谈一次，这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吗？阿多诺写道，马尔库塞站到了一个相当残酷无情的立场上，甚至不回避一切异议应予禁止这样的观念，并以这样的方式谈论着这些令霍克海默和他本人感到很恐怖的事情。<sup>[50]</sup>霍克海默肯定会觉得他推搪马尔库塞的策略是完全有理由的，难道不是这样吗？马尔库塞再三表示希望来法兰克福大学教书，迟至1965年，他得到了一个机会，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给他发出了邀请，此时他给霍克海默写信说，对他而言返回德国却不回到法兰克福是不可思议的。

614

就在马尔库塞那篇“立场鲜明”地讨论宽容的文章的德译版发表的那一年，他也“姿态鲜明地”介入了西德学生反对派发起的事件当中。1966年5月22日，马尔库塞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于法兰克福大学组织的会议上发表演说，题为“越南——对一个样板的分析”。2000多名学生及一些教授、工团主义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奥斯卡·耐格特也是演讲者和大学生组织的主席成员。这次会议以举行大规模抗议越战的示威而结束，这种示威此前在西德还未发生过。马尔库塞的演说除了具有丰富的见解之外，还提供了他对于当今时代的精辟解释。

他的演说又重提他在《单向度的人》中曾经提出过的问题：第三世界是否能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一种新的方案，可以替代在西方和苏联的

工业化进程当中都存在的这种压抑性的技术理性？就此他还问道：

在这些国家有可能出现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形式吗？这种工业化形式可以避免早期资本主义那种压抑的、剥削的工业化，并以人应有的 (*à la mesure de l'homme*) 方式，而不是通过一种从一开始就统治人们、人们就必须屈从的方式来建构起它的科技机构。我们能否把这种新的工业化形式当作“后发者”所拥有的一种历史优势来谈论呢？

他在这里给出的答案，比他在《单向度的人》当中提供的答案少了一些悲观色彩：

令人遗憾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形式这一伟大选择由于以下事实而受到了妨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得或多或少依赖发达工业国家——不是西方的就是东方的——来进行它们的原始资本积累。但至少我相信，从客观上讲，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军事解放运动，表现出发生激进变革的强大潜在力量。<sup>[51]</sup>

由于那样一种政治体制在第三世界尚有待发展，还预测不到会有哪种前景可以替代马尔库塞在东方和西方工业社会所看到的那种技术体系。不过，马尔库塞认为，他对于否定性、大拒绝以及对自由生活的要求所具有的强大力量的坚信，越发明显地得到了确证。

615 越南意味着什么？……越南意味着过度发展的工业社会领域的所有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解放运动引发了问题，并威胁到理性、制度和这些过度发展的工业社会的道德。越南已经成为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的未来的象征，已经成为人统治人的未来的象征。民族解放运动在越南的胜利将会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胜利将意味着——在我看来这是它最重要的方面——人类将继续对自己迄今所能创造的最强

大的技术机器进行根本的反抗。<sup>[52]</sup>

他向学生们保证，自己会同他们结成出自本能的和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在西方社会范围内为了意识解放而工作并不是一种革命行动，但由于那些当权者已经变得神经紧张了，它倒成了一场运动。道德和伦理不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即便我们认为那是无望的”，我们也“必须抗议”在越南发生的事情，“仅仅为了能像人那样活着也必须反抗，或许它能让我们像人一样为他人而存在”。<sup>[53]</sup>在他第一次出现在西德学生面前的时候，他就这样明确地声明了是什么指导着自己对大学生反对派的看法，是什么决定着他们对他们行动的评价：不是出于理论理由、战略的精明或避免风险的考虑，而是他对于渴望拥有人应有的生存需求的尊敬。三年之后，当警察把学生们从社会研究所中驱逐出去的时候，马尔库塞再次向阿多诺阐明了自己对于学生反对派的基本态度：“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目前的形势不是革命的，甚至不是革命前夜的形势。但是这种情形是如此的恐怖，如此的令人窒息和耻辱，以至于对它的反抗迫使你做出某种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反应：你对它忍无可忍，你感到窒息，你必须获得空气……就是我们（或至少是我）某天也想呼吸的空气。”<sup>[54]</sup>

法兰克福大学越南会议召开一年之后，马尔库塞于1967年7月作为一位新左派的著名导师登上了柏林的舞台。《明镜》周刊的一篇文章以马尔库塞论宽容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为标题，公开宣布了马尔库塞的到来。柏林自由大学学生联合会<sup>[55]</sup>的前任主席克努特·内弗尔曼（Knut Nevermann）在这篇文章中说：“马尔库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就是支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后台。”就在此前不久的6月2日，一位名叫贝诺·奥内索尔格（Benno Ohnesorg）的大学生中枪身亡。奥内索尔格参加了在柏林歌剧院前举行的反对伊朗国王的游行示威。当国王进入歌剧院之后，警察开始驱散示威者。在一次被称为“猎狐”的行动中，奥内索尔格在一幢大楼的庭院中被一名便衣警察用枪打死。柏林市长表达了他对警察的感谢之情。随后的示威游行遭到禁止。几乎独家

616

操控柏林报纸市场的斯普林格报业也对学生大加嘲笑。警察把系有黑色缎带的轿车的车牌号记录下来，随后扎破了这些车子的轮胎。

1967年6月2日的事件是1965年以来出现的事态发展的高潮，并将自由大学变成了西德的伯克利。大学生联合会邀请记者埃里希·库贝(Erich Kuby)等人出席1965年5月7日在柏林自由大学举办的德国投降暨脱离纳粹统治二十周年纪念会，并请库贝参加将由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担任主席的小组讨论，后者自1962年以来一直是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自由大学校长却以库贝几年前诽谤过自由大学为由取消了小组讨论。这位校长几个星期之后还与西德大学校长会议主席一道，以个人身份出席了在柏林德意志大厅(Deutschlandhalle)举行的德国大学生联谊会<sup>[56]</sup>成立150周年纪念活动。大学生政治组织和大学生联合会都认为针对库贝的禁令仅仅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合法的举措，他们感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受到了侵犯，并开始使冲突公开化。对5月7日活动的禁止——这次会议后按计划改在技术大学举行——标志着一系列事件的开端，大学当局越来越多地限制学生政治活动的空间，同时另一方面学生也越来越地在政治上动员了起来。

第二年，自由大学的两个系趁学术委员会提议课程整改之机，对学生注册申请学位时间的长度进行了限制。这意味着一种对学习时限的强制性限制，或者，就像学生所描述的，意味着从大学的登记册上强行清除学生。高退学率和学业长时间延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恶劣的研究条件和管理不当的教学，因此这个举措就是一种挑衅。1966年6月22日学生们通过在德国大学发起首次大规模静坐示威来回应当次出现的大学压迫性整改的迹象，参与静坐的学生有3000多人。首次出现的大学压迫性整改的迹象无论如何都是挑衅性的，因为在一个民主构成的工业社会中，学生们已经为大学制定出了非常全面的计划，但却无人理会。柏林大学生首先要与之进行公开斗争的威胁存在于如下事实当中，即，当前教授们已经与他们的“顾主”即那些将要雇用受大学教育的学生们的公司达成了一致，他们强求合理化的措施以增加效率；而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具有学究气的大学制度与具有官僚政治色彩的大公司特色结

合了起来。学生们希望通过为学生们和那些非教授的教职人员确立参与权来避免这种后果。

当这种局势最终因1967年6月2日的事件达到危机临界点的时候，柏林的大学生们除了得到他们自己学校的少数教授支持之外，更多地得到了大学之外的声援。对于贝诺·奥内索尔格之死的义愤传遍了联邦德国的每一所大学。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大学城爆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大学生成为西德国内政治的一个主要因素。在那些有能力决定整个环境气氛的学生少数派当中，大学改革和社会改革被坚定地确立为同等重要的要求。对于枪杀奥内索尔格的义愤成为一种刺激性因素，释放了很长一段时期里在青年一代心中酝酿的复杂的不满情绪：他们不满的是，当局为了维持经济繁荣而在长达二十年内拖延了社会改革，1966年底大联合政府的形成似乎会将这种延缓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在6月2日以后的几周里，批判理论家们和大学生抗议运动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典范。在6月9日举行的贝诺·奥内斯索尔格葬礼那天，自由大学学生联合会在汉诺威——实际上是被驱逐到那里的——举办了一次名为“大学与民主：形势和反对派组织”的会议。这是大学左派第一次的全国性群众大会，而且学生联盟也邀请“最近表示对我们支持的教授们”参加。哈贝马斯就在这些被邀请的教授之中。

哈贝马斯在他的演说中，试图界定大学生的政治角色并试图澄清那种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努力会引发的种种困难。作为《大学生与政治》的主要作者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作者，作为一名批判的科学哲学家和“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就大学在民主改革理念问题进行长期讨论的伙伴，也只有他注定会被那些非学生的民众选为可以进行这些自我理解（self-comprehension）和阐释尝试的人选。他理论思想的核心因素为他的分析和结论的得出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在学生反对派当中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因素：一种是恢复科学的教育潜能的要求——恢复社会的实践解放潜能的要求；一种是维护或恢复大学自我反思维度的要求——恢复社会的实践维度的要求。马尔库塞和耐

格特反对频繁地指责抗议运动正在退化为幻想行为，他们要求运动应与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团结起来，并称要想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乏味政治现状当中使对被压抑的历史力量和革命希望的意识得到传播，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哈贝马斯更慎重一些，他把这种团结视为对政治公共领域关键要素的恢复：“我坚持认为，大学生抗议具有某种补充功能，因为嵌入民主之中的控制机制在这里根本无法起作用，也不能正常地起作用。”他以越南为例说：“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些发生在柏林的事件中，学生对错误解释战争的斗争就是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这场战役首次把我国的官方世界图景撕开了一道裂口，从而使来自另一方的信息得以逐渐进入。”他提到“科学的自我反思是科学发展的途径，它与对实践问题的理性讨论和政治决断是一致的，因为事实上它们具有共同的批判形式”<sup>[57]</sup>这一信念，借此进一步强化他要求官方鼓励大学里对政治问题的批判性讨论的呼吁。

接着，哈贝马斯转而谈及威胁着大学生运动的，必须予以重视的主观方面存在的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割裂越来越严重；政治信仰和职业准备生涯之间的矛盾，永远不可能提供行动指南的实用主义学院体系和对实践总的指导的迫切要求之间的矛盾，成为大学生角色的主要特征。他提出了一条艰难但却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在冷漠、过分因循守旧和政治冷淡或非理性的行动方针——大部分学生属于此类情况——这个方面与行动主义、不停地准备革命和理论纯洁化——这类学生少得微不足道——这个方面之间像走钢丝那样谨慎地行进。令他欣慰的是，与他同在这个讲坛上的学生领袖对他所谈到的冲突和危险表现出了值得效法的消融能力。在结束讲演之时，他再次警告不要受虐狂式地坚持通过改变体制的隐性权力使之变为公开的镇压权力。学生反对派应限制在“示威权”范围内，这种权力有助于“让我们的论点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认为那些论点是更有合理性的”。<sup>[58]</sup>

对哈贝马斯最有力、最根本的挑战来自鲁迪·达什克（Rudi Dutschke）。达什克是自由大学的一名学社会学的学生，当他还是东德新教教会的积极成员之时他就拒绝服兵役。因此，他再也不能在东德继续学

业，而且就在快要修起柏林墙之前逃到了西柏林。他于1964年加入了“颠覆行动”小组，与这个小组中深受批判理论影响的文学界人士和对经济史分析感兴趣的大学生们进行合作，在西德的各个城市都组建了基层组织并通过直接行动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活跃。1965年初达什克与“颠覆行动”柏林小组其他成员一道转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目的是在其中建立一个激进主义派系，从而赋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以某种反专制、激进主义的新特色。作为具有激进民主思想的一位活跃的公众发言人，达什克被媒体称为“红色鲁迪”和造反学生领袖的化身。在这次汉诺威会议上，达什克断言，哈贝马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早已过时，只有思想对现实的渗透是不够的，现实也必须渗入思想。达什克把哈贝马斯的观点激进化了，他认为使得贫困加剧的现实原则一旦被取代，技术进步的进程就会产生创造他称之为新唯意志论的新需要。达什克的重点并不是潜藏在社会经济发展之中的解放趋势，而是意志本身。他指责哈贝马斯代表了某种概念独立的客观主义，这毁了应该期待被解放的主体。此外他还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行动中心，有力地校正大学生联合会、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以及其他已有大学生组织内部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这些行动中心将会“通过情报传递和直接行动——无论针对的是国家紧急状态法，德国国家民主党（NPD），越南问题，还是希望就在眼前的拉丁美洲问题——在大学和城市之中扩大政治化”。

在刚刚发生了首例死亡事件的紧张政治形势之中，哈贝马斯看到存在着严重的危险性，即恰恰是那些最具有影响并具有修辞天赋的学生领袖们，最可能在理性解决冲突的这个绷紧的钢丝上失足。哈贝马斯本来已经走到他的汽车旁准备离开会场，但他又返回来用强烈的措词重申他已经两次以克制方式提出过的警告，呼吁学生千万不要受虐狂式地挑战体制化的权力。他把达什克所表达的唯一意志论称为“左派法西斯主义”。他做出这样的解释，提出了与会者难以接受的问题——而此时达什克已经离开了会场，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得到讨论，因为会议早已开不下去了。这个严厉的指责不可能被接受，在那些最积极的学生看

来它的严厉性恰恰证明哈贝马斯本人是错误的。那时总有一些人喜欢用“法西斯”这个说法来诽谤学生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们最信得过的、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这么一位大学教授，现在却因为给敌人提供有用的武器而获取名声。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哈贝马斯说，“大概在1967年中期之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层就再不能与我进行坦诚的对话了。”<sup>[59]</sup>

620 汉诺威会议之后一个月，阿多诺于7月7日来到柏林做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是在6月2日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的。这次讲演是应自由大学德文系和文学与比较文学系之邀所作，题目为“歌德《伊芙琴尼亚》当中的古典主义”，安排在自由大学主报告厅里进行。枪杀贝诺·奥内索尔格事件发生之后，阿多诺就曾于6月6日在他的美学课上以开场白形式发表了对柏林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看法，他表达了对奥内索尔格的同情，“无论报道是怎么说的，他的死和他所参加的政治示威游行都是不相称的”。他还要求，“柏林事件的调查应该由与杀害和挥打橡胶警棍的人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嫌疑的那些团体来进行，由那些在调查结果中不可能有任何既得利益的团体来进行。”这就是阿多诺在他教授生涯中惟一一次实际的“介入”。他曾拒绝给第一公社散发传单作证。被媒体称为“恐怖公社”的第一公社因为其行为可能会损害联盟组织已于1967年5月被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当中清除了出去。据柏林的公诉人所言，这些相关的传单在煽动纵火。而实际上，传单借刚刚发生于布鲁塞尔百货公司那场使300人丧生的大火说事，格调不高地、讽刺挖苦地批判了消费社会对越南战争的冷漠。阿多诺也拒绝了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请求，后者曾请他取消在柏林的关于《伊芙琴尼亚》的演讲而代之以政治讨论。因此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就在主报告厅前散发传单，传单中透露出后来发展成为恐怖主义的抗议运动趋势，也透露出对批判理论家们的谴责——后来方方面面都会提出的谴责。传单说：

对弗里茨·特奥弗尔（Fritz Teufel）的纵火审判，证明了司法

程序中被纵容的非理性主义，只有法庭能给出的甚至稍微有点合理的论点被一个证据链所削弱，这场审判才能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阿多诺教授是提供这些证词的理想人选，因为他一直贩卖的是“社会的商品性”、“物化”、“文化工业”之类的概念，这些都是他的听众被邀请以彻底的绝望去分享的保留剧目。可是，来自同事和学生们的请求是徒劳的，阿多诺教授不愿屈尊证明公社的传单只是对绝望的一种讽刺性表达。他拒绝提供帮助。这种态度确实是一种谦逊的古典主义，因为阿多诺的永恒性法则就是公社鼓动的轻率举动的前提。

讲演开始之前，彼得·聪狄把阿多诺介绍给听众。聪狄是支持学生反对派的教授之一。他认识阿多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自己是阿多诺的学生，尽管他从未跟随他学习过。他还说自己在对学生赖纳·朗格汉斯（Rainer Langhans）和弗里茨·特奥弗尔（Fritz Teufel）的审判开庭前一天已经提交了长达 14 页的证言。这样聪狄才使得阿多诺的演讲基本上没被打断。在演讲结束时，一名学生准备送给阿多诺一只红色充气泰迪熊（阿多诺在朋友中就被称为“泰迪”），可另外一名学生从她手里打掉了这只玩具熊。阿多诺气愤地说这是“极其野蛮的行为”。

621

两天后，他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成员进行了一次私人讨论。他事先要求不要对这次讨论录音。他在讨论时所说的话如果公开发表的话，会使他成为抗议运动的一位著名导师；他已经是一位无名的导师了。成为学生反对派的一名导师不一定就意味着完全认同学生反对派的声明、要求或行为——无论怎样反对派绝不是一个统一的反对派；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积极投身于学生的抗议运动事业，甚至也不一定意味着学生对自己的热情承认。

与哈贝马斯相比，阿多诺对大学改革或复兴政治参与这些具体的想法没有特别的兴趣，他一心想的就是保存和开发思辨哲学和先锋艺术所划出的地盘。因此他在同情与厌恶学生抗议运动之间犹豫不定。

《否定的辩证法》完成之后他就忙于他的美学著作，而且他希望的是，如他在2月份写给霍克海默的回信中所说，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安宁”，以完成他们的“著作，并在没有恐惧和压力的状态下走完此生”。<sup>[60]</sup>而这与抗议运动所要求的态度鲜明的角色是矛盾的，而且他的举止习惯和思想风格也都无法使他适应抗议运动。两年后在一次《明镜》周刊的访谈中，他公开地谈到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才能和实力：“我努力表达我发现的东西和我思考的东西。但是我无法让它符合别人把它解释成的样子，或者符合它最终可能变成的样子。”<sup>[61]</sup>这恰恰与批判理论应该能够反思自己的社会作用这种由霍克海默、后来由哈贝马斯发展起来的思想是不合拍的。对有的人来说，这听起来肯定有点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而对别的人来说，它带有象牙塔的味道。这便是阿多诺非常接近于艺术家姿态的证据，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独立性，尽管独立完全是不可能的。阿多诺在这次访谈中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有些傲慢，但也是某种试图消除敌意的自我辩护：

如果我以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为之的那种方式提供实践指导的话，那么其代价就是牺牲我自己的创造力。人们可以极力反对劳动分工，但众所周知，即便是马克思本人，虽然他青年时代猛烈地抨击过劳动分工，但随后也承认没有劳动分工就无法开展任何工作。

622 正如我们所说，马尔库塞是在1967年7月作为新左派的著名导师进入柏林政治舞台的。他到柏林之后希望同阿多诺就他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间在他们对美国、越南和学生运动的看法上已经产生的严重分歧进行讨论。而在马尔库塞住在加州、霍克海默住在瑞士、阿多诺住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无法通过通信方式解决这些分歧的。而就在马尔库塞抵达柏林之前，阿多诺就飞回法兰克福了。7月12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组织的以马尔库塞为中心的历时四天的活动开始了。在听众爆满的主演讲大厅，马尔库塞作了题为“乌托邦的终结”

和“反对派的暴力问题”的演讲，并参加了“变迁时期社会的道德和政治”和“越南：第三世界和首都的反对派”的小组讨论会。<sup>[62]</sup>

就在批评学生反对派为左派法西斯主义的指控已经被搁置了几周之后，能使马尔库塞这位批判理论的最重要的元老之一，这位著名的流亡者完全站在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感情主义（humanist emotionalism）一边，将会使形势变得对学生反对派有利。除了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理论家之外，与会者也都对马尔库塞寄予了非常强烈的希望，尽管他们至多也只是对他的著作有粗浅的了解罢了。而那些最积极行动的学生，则希望马尔库塞能回答他们本人不能给被他们动员起来的大学生们解答的那些紧迫的问题。在马尔库塞这次活动之前刚刚发行的一期《明镜》周刊上登载了一篇对达什克的访谈，在访谈中达什克指出，批判理论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这个极为迟缓而复杂的变革时期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描述一个具体的乌托邦。

但马尔库塞也同样让学生们大失所望。他坦率地告诉他们说，他们并不是彻底变革历史的主体。他否认他们是被压迫的少数，而且进一步否认他们是一只直接的革命力量。他要让他们明白，希望只能寄托在各种被分裂的力量身上。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在首都发生的许多事件中看到了学生反对派与第三世界解放斗争之间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学生形成看待自己的方式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种联系不仅对打破对学生运动的错误界定和带有偏见的报导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更根本的东西。可是他对这种联系的看法注定会让学生们感到失望。学生们认为他们自己在自己国家范围内反抗着那些权威力量，而这种反抗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构成由第三世界解放斗争所引发的对于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动摇。马尔库塞在第一次讲演中阐明了他的“新人类学”观点，并阐述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具有“审美与爱欲维度”的基本特性。他进一步指出：

我看到，在现存社会的两极——即最发达的社会和为了解放而斗争的第三世界那里——都出现了一种指向这些新需求的趋向……

比如，没有必要将对和平的需要强加给那些参加解放斗争的越南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那种需要……而另一方面，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存在着那些可以提出这些新需要的群体——少数民族，或者说即便他们不能提出这些新需要，他们也能探求这些需要，因为不这样他们便会实实在在地切身感到压迫窒息。这里我们回头看看“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在这儿我们看到某种特别有趣的现象，即对分享“富裕社会”的福祉的拒绝。这也正是在各种正在提出的需要当中发生的一种质变。<sup>[63]</sup>

难怪在听众群当中有人首先对他的论述作出的如下评论：“我们真正关心、但还没有从你那里得到答案的问题是：激进变革需要什么样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sup>[64]</sup>可是马尔库塞对此并没有说些什么，相反他承认他面对这种循环论证也无能为力，这个循环论证就是：要使新需要得以产生，那么再生旧需要的那种机制就必须先被废止；而同时在另一方面，要废止这些机制，就必须首先产生废止这些机制的需要。他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正如他已经在论宽容的文章中，随后又在柏林事件发生几周后刊于《明镜》周刊上的访谈“作为国家摄政者的教授？”<sup>[65]</sup>中（几乎是以过度的方式）所阐述的那样，只有教育专政。这根本不能让那些势不可挡的反权威主义的学生反对派感到满意。在他第二次讲演——“反对派的暴力问题”——当中，马尔库塞说那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诉求是不负责任的，强调了对批判理论细加阐释的必要性，并指明反对派的当务之急是意识的解放——这种解放既需要讨论也需要示威，它要求“人的全面”的解放。因此，从与听众的期待相关的观点来看，马尔库塞现在所说的话，与哈贝马斯曾经在汉诺威发表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马尔库塞在谈及第三世界解放斗争时指出，感情用事（emotionalism）恰恰是对西方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种逃避。听众们对他公开宣称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些方面并没有进行讨论——也不可能召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专门来讨论这些问题。

马尔库塞出现在柏林之后，克努特·内弗尔曼说，“马尔库塞让我

们看到了一个积极的乌托邦”。事实上，就学生反对派，尤其那些学生领袖的期待而言，马尔库塞的论述在具体性和吸引力方面，离达什克在柏林演讲之前发表在《明镜》周刊上的访谈所说的目标还很远。达什克曾经谈及大学生委员会的民主、行动中心以及以消极方式抗议斯普林格报业和反大学（counter-university）计划，把这些提议当作直接行动和“大拒绝”——他也提出过“大拒绝”——的样板方案。

看来，学生反对派和批判理论家们之间势必形成不愉快的关系，尽管这些理论家们的立场和反应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阿多诺的反应是相当远离政治事务的学院教师的反应，他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确保批判思想能传播给在联邦德国重建时期日益觉醒的议会院外反对派。他在公众场合不谈及他对自己思想著作所造成的影响的判断，既不公开地认同这些影响，也不与这些影响保持距离。而作为对政治哲学有特殊兴趣的学院派教师和作者的哈贝马斯，思考的则是科学、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他支持抗议运动。有时候他也试着指明这个运动的目标和方法、时机和危险，但其方式很机敏，在客观上产生了使他与运动保持距离的效果。马尔库塞有一套令人难忘、令人着迷的概念（“大拒绝”、“抗议的天赋权利”、“新感性”），而这些概念与其说植根于理论之中，不如说植根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能基础的洞见之中，植根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激情之中，这种激情带上了公开支持所有反对派群体的偏见——即，如果暴力是必然的，反对派所做的只不过是必然性的表现。

霍克海默倾向于把学生运动等同于反美主义和亲极权主义，并对学生运动和越南解放斗争一并予以拒绝。但不无反讽的是，学生对他的尊敬却随着运动的日益激进而与日俱增，因为他的一些早期作品被视作一个宝库，学生们可以从中援引任何契合于当前情绪的词句。当然，这根本不会让他感到满意。1960年代初霍克海默仅仅允许《启蒙辩证法》意大利文的出版，在这个版本中他可能做了一些轻微的改动。但他拒绝以德文再版此书，尽管非舍尔出版社已经准备于1961年开始大量再版印行。阿多诺曾经试着向马尔库塞解释霍克海默的犹豫：

一方面，因为此书中包含着许多立场鲜明的陈述——特别是那些与体制化了的宗教相关的陈述，所以如果那么多人领会了其中之义，我们担心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保证文本不作改动，不想在其中掺入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这就是当时的情况。<sup>[66]</sup>

但是，就像《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盗版带来的烦恼使卢卡奇决定再版此书一样，对盗版的愤怒也促使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德文版 1967 年面世之后重印了他在《社会研究学刊》上的文章。他这么做是出于文献保存的目的，并且为这些文章加上了一篇序言，提醒“今天的年轻人”，“面对个人自由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时，保护、保存，并且尽可能地扩展个人所具有的那点有限而短暂的自由，这项任务远比对它提出某种抽象的谴责、或以毫无希望的行动危及它的存在更为紧迫。”<sup>[67]</sup>但他并没有再版那些被大学生断章取义从中截取口号的文章，例如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的“犹太人与欧洲”一文，其中就有“那些不愿意谈论资本主义的人就应该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的句子，<sup>[68]</sup>还有《黎明与黄昏》这部格言集，其中就有“革命事业不是通过宴会、荣誉称号、有趣的研究和教授的薪水来推动，相反要忍受穷困、羞辱、忘恩负义和前途未卜的监禁——几乎只有超常的信念才能看清。因此仅有才能的人很少会自己选择接受这种挑战。”<sup>[69]</sup>

由于引发学生运动的原因依然存在，学生抗议运动的激进化及其向议会院外反对派的推进力量的发展仍在继续。这些原因有：大学内并未实施民主改革；国会制度在大联合政府治下持续不断地被侵蚀，事实之一便是决定引入国家紧急状态立法，在玩弄简单多数选举体系的概念，或者要求一个政党应该至少赢得占总数 10% 的选票才能被分配席位；联邦德国对越南战争提供了道义和财政上的支持；在柏林公共舆论还被无耻地操纵在斯普林格公司和报业界手中；以“制度完备的社会”模式为目标的普遍导向。抗议在联邦德国各地的大学蔓延开来之后，一般的政治行动在 1967—1968 年冬和 1968 年春开始取代纯粹的大学政治

的优先地位。对于大学生激进分子来说，大学显得越来越像是一般政治冲突的基地和舞台。

1968年2月，柏林技术大学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组织了一次讨论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随后进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活动采纳了威廉·明岑贝尔格（Willi Münzenberg）提出的运用集会会议唤起团结情感的建议，并有意区别于早先那种只专注于理论分析和探讨的学生会议——例如马尔库塞1966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参与的会议。这次集会是在一面标有越南民族解放战线字样的大旗下进行的，旗子上还写有几个月前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斗中遇害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话，并饰以精美的纹章图样：“所有革命者的责任就是干革命。”4月发生了暗杀鲁迪·达什克未遂的事件，在此次事件中一名名叫约瑟夫·巴赫曼（Josef Bachmann）的23岁工人手持左轮手枪连射三发子弹，达什克伤势严重。这次事件立刻被学生们视为由斯普林格报业煽动起来的欲置学生于死地而后快的那种反对情绪的直接后果。他们以堵塞封锁斯普林格公司作为回应。全西德约有60,000名青年参与了复活节阻止斯普林格报业报纸发行的活动。在西德还发生了自魏玛共和国晚期以来就再未有过的街垒战。在慕尼黑，一位摄影师和一名学生不幸受伤。

626

接着就到了1968年5月。在巴黎，这个月的许多夜晚拉丁区都有路障，工会和左派政党在这个月号召于5月13日发动总罢工。萨特在与一位一夜成名的造反的社会学专业学生达尼埃尔·柯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讨论时，呼吁学生们不要畏缩，要坚决地把想像变成力量，去扩展可能性的王国。在西德，针对有关国家能够宣布紧急状态的立法的斗争成为5月的标志。5月11日，大约100,000人在波恩示威。5月20日，从柏林掀起了占据研究所和大学的浪潮，并开始蔓延全国。5月27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和民主紧急状态保护组织（该组织得到了强大的工团组织“IG Metall”的支持）以及民主与裁军运动组织一起，号召在工厂和大学进行政治性的总罢工和总罢课。在法兰克福，当校长以关闭大学来回应学生的罢课号召之后，该校的主楼于5月

27日被2,000名学生占领,领导这些学生的是法兰克福大学里与达什克类似的一位名叫汉斯-于尔根·柯拉尔(Hans-Jürgen Krahl)的学生,他是阿多诺的博士生而且非常精通理论。法兰克福大学的正式名称“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被宣布取消,这所大学被重新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在这所被占领的大学里,前不久被提出的“政治大学”的规划开始成为现实,并成为批判性大学应该效法的模式。哈贝马斯的几位研究助手——耐格特、奥弗(Offe)、奥弗尔曼(Oevermann)和韦尔默(Wellmer)——都参与或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以“暴力与历史”、“议会院外反对派的政治理论”、“非政治的大学”以及“科学的政治化”诸如此类的论题为主题。三天之后,警察就清除了这座大楼里的学生并占领了它,可在此期间一群学生公开了校长办公室的档案。在圣灵降临节那天,法兰克福大学召集了讨论反对派的现状和组织问题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集会,时间恰好是枪杀贝诺·奥内索尔格和汉诺威会议召开的一年之后。随后从会场出发的反对警察占领大学的游行示威,在没有发生意外事件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这几周的时间里,政治冲突已经将大学政治推向造反学生的背景性地位,而且他们在各个方面也面临着无力和失败——复活节之后斯普林格的报纸依然像往常一样被发行、购买和阅读,5月30日的联邦议会通过了紧急状态的立法,对越南战争的厌恶依旧是少数反对派的事情。在这个时期,批判理论家们在法兰克福就学生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先是阿多诺,然后是哈贝马斯。

1968年4月8日,阿多诺离任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职务,并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第十六次德国社会学会议上致开幕词。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是阿多诺开幕词的主题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这个主题的选择与卡尔·马克思的150周年诞辰有关,但也显示了对学生运动的一种尊敬。除了哈贝马斯之外,德国的社会学家们都被这场运动震惊了,迄今为止根本没有人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他们毕竟是在柏林之外最重要的学生反对派中心开会,也正是学生们的抗议使与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关的那些结构性问题被再一次纳入了公共

讨论的范围。

阿多诺在他近期的社会学研究“今日社会冲突笔记”——与他的学生之一乌尔苏拉·耶利希 (Ursula Jaerisch) 合写, 1968 年刊于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六十华诞纪念文集——之中, 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 阶级冲突已经转入隐性, 正在转入社会的边缘, 这一思想很可能为新左派的理论分析提供富于希望的新方向。可是阿多诺在社会学会议开幕演讲——“晚期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中却没有再提这一思想, 尽管这一思想对分析当前局势大有可为。相反, 他现在表示要放弃被从《社会学 II》导言中删去的一种假设——任何连贯的理论都无法理解当下社会。他在这里再次提到的景象, 是某种甘受普遍诅咒支配的社会景象。这一景象包含了一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因素, 他现在将这一点阐述得比以前更为明确了。社会所承受的诅咒部分地被归咎于国家干涉主义, 后者被认为间接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当他注意到个体也在经历一个崩溃过程之后, 才在演讲中驱除了这种社会景象, 阿多诺说:

只在最近在所有不同的青年群体当中才开始出现了反潮流 (counter-tendency) 的迹象: 对于盲目的因循守旧的反抗, 理性选择目标的自由, 对于充满欺骗的世界现实的厌恶, 对于变革可能性的思考和认识, 所有这些青年中的反潮流迹象就在最近几年里开始出现。社会日益增长的破坏自身的强烈愿望是否能够战胜这种反潮流的力量, 尚有待观望。<sup>[70]</sup> 628

继而他又拾起被这个段落所打断的思想线索, 好像没说这段评论似的。他就这样表达了自己对抗议运动的最基本的同情, 与此同时也暗示他并不认为这种同情能左右他的思考。社会学会议最终并没有就如何解释抗议运动和西方社会现状这一问题形成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观点。会议闭幕那天, 和受暗杀达什克未遂事件刺激的学生们堵塞封锁斯普林格报业正好是同一天。

圣神降临周的星期六，即6月1日，是法兰克福大学生和中学生集会的第一天。当天晚上，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哈贝马斯又一次向聚集在未被警察占领的学生食堂前面的学生反对派发表了讲话。按照计划，他的演讲主题是抗议和反对的可行范围有多大。这一次他还是把对抗议运动的持续分析和批判结合起来讲。当他涉及国内批判之时，他所提出的批判再一次显得非常深刻。在经历了一年的对于全国性的抗议运动的体验并有了1967—1968年一个冬季学期的在美国作访问教授的经验之后，哈贝马斯确信学生反对派开启了一个思考在深层社会结构当中如何获得根本性变革的新视角。与在汉诺威会议上一样，他认为，抗议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公共领域的政治化：回到可能具有巨大实践后果的那些公共讨论的问题上，改变使专家治国论的主张大行其道的非政治化程序。哈贝马斯讲话中的新东西在于，他现在看到有节制地打破规则的挑衅主义手段是合法和必要的，通过这种手法可以迫使讨论在被拒绝的那些领域进行下去。他讲话中最主要的新东西是，他对如何解释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新看法：他将不再直接把新无政府主义观点和直接的行动划归为某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并加以反对。

629 他的解释乃是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冲突转移理论和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这种理论部分是某种诊断，部分是某种乌托邦——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结合中，还包含着对社会化方式和阶级归属对青年人的态度及行为的影响所做的美国式经验研究的成果。1967年他在纽约歌德学院的一次讲演中已经就这种新解释做了详尽的介绍：

比起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心理学更为了解，受到的教育更为自由，更具有开放的态度……此外，这代人开始在更为宽松的经济条件下成长，而且较之于其前代更少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心理压力，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事实中建立一种假设性联系以解释激进主义青年特有的敏感性。他们对个人生活历程方面、对以竞争和成功为标志的

社会以及生活领域的官僚化方面的所付出的代价都很敏感。在他们看来，同其中包含的可能的科技优势相比，这些代价过高了……那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父亲权威衰落了，开放的教育方式普及了，这些为成长中的孩子们提供了经验，要求他们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向。而这种寻找很可能呈现为这样的形式：一方面青年们不可避免地必然与关于成功的意识形态标准发生冲突，而另一方面他们必然会与那种适用于闲暇与自由、满足与和解的科技潜能——还没有被社会释放出来——相融合。<sup>[71]</sup>

然而，哈贝马斯再一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出于对计划于第二天在警察占领的校园中举行的抗议游行的担心，也出于他对抗议运动的忧虑，他才做出了这样的批评。抗议运动曾批判实践问题被排除出了公共领域，这非常契合于哈贝马斯。可就是这个运动现在却在非政治化，而且它在非革命时期走上了危险的造反这根钢丝，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前景堪忧。他把新近出现的示威方式表述为某种仪式化的勒索，描述为少年对粗心大意但不乏慈爱的父母的青春期反抗，这个时候他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他激烈地谴责一些学生领袖把占领校园和实际的夺权混为一谈，还指出这种想法恰恰符合医学上神志混乱的标准，此时，他的批判也是严厉的。哈贝马斯批评学生们被“自明之理”指导并用这些“自明之理”来中止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领域当中那些复杂而未定的争论，用一些简化了的确定性——一些信念——取代了这些争论。比如，确信如下一些观点：资本使用问题，即便是国家控制的资本使用产生的难题都是不可克服的；社会经济领域的阶级冲突可以激化为政治冲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稳定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灾难性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这样说的时侯，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是极其严厉的。哈贝马斯断定，正是这些信念导致了被他批评为灾难性的那些抗议策略。

630

哈贝马斯的这些指控令人感到惊讶。之所以惊讶，首先是因为，哈贝马斯在这里列举的这些主张更适合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领导

层中的那些“传统派”，而像达什克和柯拉尔（Krahl）这样的“反权威主义”成员则是新抗议方式的拥护者，达什克受马尔库塞影响颇深，柯拉尔的思想根基恰恰就是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其次是因为，哈贝马斯对革命的必要条件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把这些条件等同于被剥削的大众公开反抗的构成要件——就被剥削大众而言，社会是一直依赖于他们的合作的，继而哈贝马斯以这些条件尚未得到满足为由得出结论说，革命形势尚未出现，打算以暴力方式夺取权位而不再仅仅使用象征式勒索手段强制地把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论点上的所有行动都是不应得到认可的。但是，无论哈贝马斯是否准确描述了那些对最激进的学生们的行动有决定性影响的信念；无论他们使用的策略是否真的就是这些信念产生的结果；无论他提到的革命形势的必要条件是否太过狭隘——他都正确地指明了，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认为自己的行动范围取决于需要予以革命化的形势。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分析越来越透露出它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它对形势的判断，根据这些看法和判断抗议运动势必继续下去，不管它持续多长时间，直到最终扩展成一场也由工人向前推进的革命。

这反映出哈贝马斯和那些最激进的学生之间最终存在的根本分歧。对后者来说，对富裕社会的暴力一击并非是不可能的，公共领域的政治化要服务于彻底反权威、反资本主义的变革的目的。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革命化只有在下列情境中才是可以想像的：对于可获得的富裕的厌恶，有朝一日甚至可以让那些早已融入这一制度的劳动人口也会对官僚制度化了的工作和生活形式感到愤怒。那些当权者，为了从不再准备做多余牺牲的劳动者当中继续获取必要劳动，就不得不同意把枯竭的公共领域再度政治化。在政治上新兴的公众阶层进而可以在某些社会行动目标上达成一致。哈贝马斯认为，抗议运动的作用只能是，运用来自底层或来自外部的压力在政党、工会、工团以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内部使民主得到加强或恢复，使大众媒体作为批判喉舌的功能得到加强或恢复。这将通过某种极端的调节方式来促进复杂社会的民主化，促进权力的去官僚体制化。这种由传播和直接行动

631

的策略所产生的突破，已经被柏林的达什克和其他属于颠覆行动小组的人在1964—1965年间清楚地展示过了；从那时起达什克就代表了西德学生运动的这种突破，它已经作为运动动力机制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得到了保持。它受到了新感性和追求社会主义的本能基础的理论家马尔库塞的欢迎，而且势所必然地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提出非同一性和肉体冲动的理论家阿多诺的同情和理解。而在这位提倡通过交往确立包容性理解并解放内在自然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看来，它引发了对非理性事物的恐惧，引发了对在必要情况下不通过概念化和讨论而坚持自己权力的表达和行动的恐惧。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大学组织的话题上，批判理论家和批判性的学生之间从未达成谅解。学生们期待左派教授会倾其所有资助学生们相信马上要发生的革命。一本名为《左派答于尔根·哈贝马斯》<sup>[72]</sup>的书于此年出版，书以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圣灵降临节那天的集会上发表的论点开始，继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各类成员和左派大学教师的评论文章。此书并未成功地开启一场理论辩论，尽管哈贝马斯的研究助手、同时也是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有密切联系的新左派代表奥斯卡·耐格特在导言中指出，他认为本书的意义在于展示了“新左派内部展开的公开辩论”。他的论点组织严密，也不回避对哈贝马斯的坚决批评。在隶属于哲学系的社会学系内建立一个由学生、教授和其他教职员平分代表人数的部门委员会的努力，在法兰克福大学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学生和教授之间互不信任，还因为这个努力已经不能满足那些决定着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基调的集团提出的要求，他们的要求超出了这个目的，而旨在实现科学的直接政治化。

到了1968—1969年的冬季学期，形势变得更为紧张。先是教育系学生举行罢课，抗议早先的技术统治论式教改对他们的影响，并组织了其他可供选择的课程。社会学、斯拉夫语、罗曼语和德语等等学科的学生立即加入了抗议。社会学行动小组散发的一张传单上写着：

12月5日下午7点将在第六演讲厅召开全体社会学学生大

会，与教授们就社会学课程的立即改组重新展开辩论。(1) 一种可能，即形成一套章程，确保学生参与对研究和教学法的管理；(2) 一种可能，即按照最近出现的那种方式，暂时中止社会学系的教学，联合组织起将能够摧毁权威主义教学现状的研究和教学团体，起草一份新的教学和科研计划。学生参与到这些联合工作的团体中去，这应被视为正常的研究课程。

传单继续写道：“我们对变成左派的宫廷小丑丝毫没有兴趣，这些人对权威主义国家只在理论上予以批判但在实践中却墨守成规。我们打心底里赞同霍克海默的话”——接着传单就引用了前文引述过的《破晓与黄昏》里那段话作为结尾。阿多诺把这份传单送给霍克海默并附上一段文字：“这说明我们走得有多么远。”

在与社会学教授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三天，学生们占领了位于米利乌斯大街 (Myliusstrasse) 的社会学系，将其改名为“斯巴达克斯 (Spartacus) 系”。每天傍晚他们都要选举第二天的罢课委员会，负责为各类行动小组安排场地，调整各个跨系的行动小组并制作要在墙壁上张贴的传单和小报。在十几个工作小组中，社会学、哲学、法学、数学及教育学学科的学生们进行着有关“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认识论、科学哲学和实证主义”、“组织与解放”等等论题的讨论。这是一场“积极的罢课”。这是伯克利大学的学生们以“反大学”为名首倡的运动的扩展，这一扩展 1967—1968 年到了柏林就被冠以“批判性大学”的称号进行下去，而到 1968 年春天法兰克福大学则以“政治大学”之名继续这个运动了。作为对国家紧急状态法的回应而发生的占领校园浪潮，结果成了超越目前发生的事态的开端。就目前事态而言，按照德国人的标准看，那是大致规范的教学科研和学生自我组织的研究学习奇怪地共同存在。

这本来可以很好地为实现民主大学改革提供新的策略：利用学生自主组织课程的优先权，把扩展研究形式与内容当作一种手段来施加压力以促进最新的改革方式的落实。然而这场“积极罢课”的实验却受

到两种既得利益的支配，两种利益的拥护者都不准备通过某种双重策略团结起来，而双重策略是可能包含着实用的改革方法的。一方是那些从“被解放了的地区”借来游击战术的学生，他们想在学校里建立基地，为“发现和发展长期的城市社会革命策略提供合作机会”。<sup>[73]</sup>而另一方是那些更谨慎、态度更含糊的学生，他们则希望他们的研究能更好地与他们自己的经验与旨趣相结合，这些经验和旨趣经过抗议运动已经被政治化了，而且他们希望他们的研究在更大的程度上能拥有为他们本人所控制的新内容和新形式。

一开始，哈贝马斯和弗里德贝格（他于1966年后已经从柏林返回法兰克福，而且担任社会学系和社会研究所两个部门的主任）差不多像往常一样经常来“斯巴达克思系”。而后来他们开始更多地去哲学系。有一天大学校长瓦尔特·吕埃格（Walter Rüegg）给哈贝马斯打了一个电话。社会学系所处大楼的所有者医学委员会威胁要撤销大楼的租赁合同，而吕埃格也安排在次日早晨请警察对此座大楼进行清除。当哈贝马斯询问这条消息是否应被当作一条不可抗拒的命令时，他的回答是，“是的。”第二天凌晨四点或五点当警察以据报有人非法破门进入为由准备清理大楼时，他们发现大楼已经腾空了。

一个月后，闹剧接着上演了。1969年1月31日，阿多诺从他在研究所的拐角办公室的窗子望见几十名学生绕着拐角飞快地行走，随后就消失在研究所的大楼里。他立刻断定他们想占领大楼。学生们早就以“改进的收复”为名去过社会学系，但发现那里已经关闭。于是，他们一直在研究所寻找一个可以举行讨论的房间，此外就再无其他目的了。弗里德贝格请求这76名学生离开大楼但学生置之不理，于是他就和阿多诺（他们与统计学家鲁道夫·贡泽尔特 [Rudolf Gunzert] 一起组成了研究所的管委会）联络了警察。警察拘捕并带走了这76名学生，并在当天释放了除柯拉尔之外的全部学生。柯拉尔被指犯有非法破门侵入的罪名。几个月后，接着就对他进行了一场令人厌恶的审判。

1969年4月马尔库塞给阿多诺写信时提到了研究所的这次清场事件：

简单地说：我认为，如果我接受研究所的邀请而又不与学生对话，那么我也就选择了我在政治上无法认同的一种立场……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学生受了我们的（至少是你的）影响……我们知道（而且他们也知道）形势并不是革命的形势，甚至不是革命前夜的形势。可这形势如此可怕，如此令人窒息也令人羞辱，以至于对这一形势的反抗迫使你产生了某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你忍无可忍，你快要被闷死了，你必须得到空气。这种空气不是“左派法西斯主义”（矛盾搭配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的空气，而是我们（或者说至少是我）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呼吸的那种空气，当然它也不是当权派的空气……对我来说，选择就是：要么到法兰克福并与学生谈话，要么干脆就不要去——“对我来说这好极了（此句原文为英文——作者注）”，也许我们可以在今年夏天到瑞士的某个地方会面并澄清所有这些想法。如果马克斯·霍克海默也能与我们在一起讨论就更好。非常有必要在我们之间作出澄清。<sup>[71]</sup>

两个月后马尔库塞告诉阿多诺说：

你写信说到“研究所的兴趣”并加上着重式的提醒“我们的老研究所，赫伯特”。不，泰迪。学生们要以强力方式把他们的方式加入进来的地方恰恰不是我们的老研究所。你和我都知道研究所1930年代所做的工作与它在今天德国所做的工作在本质上有着多么大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并非源于理论发展：你那么不经意地提到那些“认可”——可它们真的如此不重要吗？你知道我们都一致反对理论的任何直接政治化。但是我们的（老）研究所有着某种内在政治内容和某种内在政治动力，而它比以往更为迫切地需要一种具体的政治立场。这并不是指提供些“实践的建议”，就像你在《明镜》周刊上指责我时所说的那样。我从未那么做过。和你一样，我认为在我的书斋中给人们的行动提建议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随时准备为了事业抛却头颅。在我看来，

急需的政治立场就是：为了保存我们的“老研究所”，我们在今天必须以不同于我们在1930年代做事的方式来写作和行动……

你在介绍你的“冷淡”概念时写道，我们那时甚至可以容忍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转而去实践，“这只是因为实践对我们来说是被禁止的”。是的，可是今天，我们没被禁止去实践。这种形势上的差别就是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差别。后者给了我们自由和权利。但资产阶级民主（由于其固有矛盾）阻碍质的变革，即便变革的途径是议会民主制度本身，在这个范围内而言，议会之外的反对也就成了“抗辩”——“公民的不服从”、直接行动——的惟一形式。这类形式的行动也不再遵循传统的图式。对于这些方式我与你有同样多的谴责，但我接受这事实并支持这些方式对于它们对立面的反抗，这恰恰是因为维护并维持现状，及其要求人类生活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之间深刻的分歧也许就在此了。在我看来，只要美国人还驻扎在莱茵河岸，谈论让“中国人来到莱茵河”就绝无可能。<sup>[75]</sup>

635

尽管马尔库塞对研究所的清场事件和他的基本观点可能是对的，但用这些方法又是不可能理解西德的情境的，特别是法兰克福大学的情况。一种对工具化甚至销毁科学的要求已经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在全力把抗议的潜能转变成准政治的亚文化和伪政治的分裂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抗议运动的政治行动和政治努力普遍失败以及想直接改革大学事务的各种尝试数次受挫造成的后果。1969年4月，阿多诺的“辩证思想导论”这门哲学课程被扰乱和打断，对此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造反派女成员是负有责任的。她们是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并于1968年成立了一个妇女委员会。一位名叫汉斯·迈斯(Hans Meis)的博士在读到《世界》(Die Welt)对此事件的报道之后，致信阿多诺并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大众的情绪：

我已经欣慰地看到那些“勇敢的”教授已仓皇逃遁！“学生

们”已经给了你和那些左派教授应得的惩罚！完全照你一直做的去做，接着就会很快并更彻底地发生辩证法的颠倒！霍克海默教授已经在卢加诺了……这种颠倒发生的时候，你也能找到个可以逃遁的地方；就快开始了。甚至现在政府中那些众多的昏昏欲睡的人最终也会醒来。我不同意那些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者所说的话，他们想要有把“焚尸炉的免费票”送给左派教授和学生们的这么一个新希特勒。但不再让你和你的同事们贩卖废话以毒害青年正是成千上万人的希望。

对运动的反应在稍后才出现。一开始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改革时期开始了，这一定程度上是抗议运动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抗议运动的瓦解，改革一方面把年轻人的主张导入了传统渠道，另一方面也将这些主张变成了亚文化抵抗。1969年3月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当选联邦总统。在其政治生涯早期，他曾为了抗议阿登纳重整军备计划而辞去内政部长职务，他还是全德人民党(Gesamtdeutsche Volkspartei, GVP)的创建者之一，该党曾一度是坚持德国中立的惟一政党。海涅曼在7月就职之时倡导实行更大范围的民主。9月选举出第六届联邦议会之后，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依然是势力最强的单一党派，而德国国家民主党也获得了4.3%的选票，但一个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联盟毕竟已经建立了起来。和古斯塔夫·海涅曼一样，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也承诺实行更大范围的民主，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座右铭：“不要害怕实验！”当这个几乎像几年前发生的抗议运动一样令人吃惊的改革时代刚刚开始之际，阿多诺就离开了人世。他在瑞士度假期间于8月6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几个月之后，1970年2月，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最重要的理论家汉斯—于尔根·柯拉尔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那时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已是名存实亡，不久之后便宣告解散。)奇特的是，抗议运动的消逝和这些人的逝去竟然这么一致。很难拿其他人与这些人相提并论，正是他们为最终难以遏抑的某种吁求，为“复归”的迂回进路创造了长期的思想基础。

## 哈贝马斯走向社会交往理论 — 阿多诺遗著《美学理论》

阿多诺在他的哲学课被打断后不久，在《明镜》周刊的一次访谈中说，“我可以在公共场合毫无愧意地说，我正在进行一项长期的美学研究”。最终未能完成的《美学理论》是他力图完成的代表自己思想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此书成为了他的遗作，它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比它更成功，也更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于1968年出版的两部书：《认识与人类旨趣》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认识与人类旨趣》写于1964年到1968年之间，本书原本计划作为一篇导言，后面还应有两卷的内容是对分析哲学发展的分析。哈贝马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一种通向非唯心主义的新社会理论的方法。《认识与人类旨趣》重建了近来发展的实证主义的学术序曲，并力图在认识论上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提供证据。哈贝马斯用这本书作为1968—1969年冬季学期“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哲学研讨班的讨论基础，学生们在这个研讨班里尝试去实践和分享如何构成论题和表述问题。但研讨班的这些学生以此书陷入了科学固有的那些问题为由来批评这本书。《技术与科学》试图提出一种方法来对实证主义在其中产生并继而承担起意识形态功能的社会内在关联进行分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本书就如何清楚认识那些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化必需的条件这一问题，形成了一些结论。正是从这部著作中学生直接提炼出了技术和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口号。

637

《认识与人类旨趣》是《理论与实践》所收文章的延续，中心内容就是把批判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定为一种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认识形式。它也是哈贝马斯参与其中的实证主义论争的延续，同时还是他的就职演讲“认识与人类旨趣”的延续。本书以问题史的形式构成批判的科学哲学的导论。批判的科学哲学与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不同，它力图形成一种综合的理论，涵盖已发生分化的、处于整个科学范围之内

的、已为工业社会所利用的所有认识形式。与他以前的著作相比，这本书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更生动、更细致地展现了进入以批判为导向的各类科学所关注的特定客观领域各种程序。哈贝马斯以精神分析为例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自我反思的层次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能够认识到语言同工具性行为之间的特殊联系，而且将这种联系理解成一种客观的结构，并为之确定了超验的角色。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s)的方法论，后者涉及语言同交际之间的联系。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研究的正好是一种基础性的联系：即语言畸形和行为病理学之间的联系。这时，元心理学以一种日常语言理论为前提，这种语言理论有两个任务：首先要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阐明各种符号在主体间交流的有效性和语言互动调解作用；其次要把融入语言游戏之语法的可理解的社会化行为充分展现为一个个性形成的过程。因为依据这种理论，语言结构既决定着语言，又决定着行为举止，所以，行为动机也就被理解成了通过语言解释过的需求。于是，动机就不是在主观性背后起作用的推动力，而是由主观指导的、以符号为中介的，同时又相互关联的意图。

于是，证明这种常规情况是动机结构的特殊情况就成了元心理学的任务，而动机结构既依赖于公共沟通的需求解释，也依赖于受压抑的和私人化的需求解释。分裂的符号和防卫的动机展开了它们在主体头上施加的压力，支配着替代性的满足和符号化行为……

分裂的符号并没有完全脱离与公众语言的联系。然而，这种语言联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隐蔽的联系。它通过语义学上错误的等同化(identification)，从而打乱公共语言使用的逻辑而获得了力量。在公共文本的层次上，受压制的符号客观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依据的是个人生活史的诸多偶然情境所促成的各种规则，而不是主体间相互承认的规则。所以，病症对意义的掩饰及其带来的

对交流的干扰，最初无论对他人还是对主体自身都是无法知晓的。只有在主体间性的层面上，它们才会变得可以理解；而主体间性只有在医生和病人共同用反思的方法冲破交往障碍时，才会在作为自我的主体同作为本我的主体之间建立起来……于是，个人语言的扭曲状态以及受压抑的行为动机的症状式的替代性满足也随之消失，这些动机现在已经变得容易受意识控制了。<sup>[76]</sup>

哈贝马斯从语言游戏规则角度出发，把关于症状形成及其治疗的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为一个非符号化和重新符号化的过程，这是受了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位同事阿尔弗雷德·洛伦泽尔（Alfred Lorenzer）的启发。以此解释推展开去，哈贝马斯还试图从弗洛伊德那里引出一套关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瓦解的理论。

弗洛伊德把制度理解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用强大的外部力量代替了对于扭曲的、自限性的交往的持续的内在强制。他把文化传统相应地理解为受到各种标准稽查的、向外展现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中，那些已经与交往脱离了的各种动机被不断驱动到那些被排斥的符号周围并将这些符号引向替代性满足的轨道。正是这些动机，而不是外在的威胁和直接的制裁，现在成了运用合法的权力来支配意识的各种力量。它们同样也是这样一些力量：当自然控制方面的新的潜力使旧的合法性失去可信性之时，受意识形态牵掣的意识可以通过自省把自身从这些力量当中解放出来。<sup>[77]</sup>

对弗洛伊德来说，由此产生的目标是“为文明的各种规范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哈贝马斯则把这一思想重新表述为“一种遵照如下规则的社会关系组织，即每一种在政治上富有成果的规范的有效性都取决于在摆脱了统治的交流当中所达成的共识”。<sup>[78]</sup>

正好在这一点上，这个与哈贝马斯的判断——当今的统治制度依赖

的基础是将实践问题排除出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而抗议运动坚持参与有关于如何导向一种理想生活的公开讨论——有关联的论断击中了现行制度的弱点。

639

新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思想）损害了一种同我们的文化实存的两个基本条件中的一个条件相关联的旨趣：即对语言的旨趣，说得精确一点，即对通过日常口语交流而出现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形式的旨趣。这种旨趣涉及维护理解的主体间性问题，也涉及建立一种可以摆脱支配的交往形式的问题。技术统治论思想可以让这种旨趣消失，以支持可以扩展我们技术能力的旨趣。<sup>[79]</sup>

可是，从某种知识人类学的角度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所做的这种论证还牵扯到许多问题。比如，一方面假定存在一个统一的普通主体（generic subject），另一方面又认为主体间性结构为一种实践的、有助于解放的认识旨趣奠定基础；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就是一个问题。另外，在技术的、实践的认识旨趣与有助于解放的认识旨趣之间也存在一个相互不一致的问题：前者对人类的再生产所具有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后者显然包含着比生产和自我持存更重要的东西——即，人类自由而有尊严地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对于人类成年期自主行动和摆脱教条主义的理性的旨趣”<sup>[80]</sup>是人类再生产的基础之一，难道它不会必然对技术的、实践的认识旨趣产生影响吗？

哈贝马斯对这些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的回应，就是去替代那种建立在交往理论基础之上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代替他通过知识人类学来论证和处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尝试。他把人们相互交谈和互动作为他的出发点，力图证明对某种未被扭曲的交往的期望乃是交往行为的、也就是说以达成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的可能性条件。他的朋友、哲学家卡尔—奥托·阿贝尔在这个思考进路上给了哈贝马斯非常重要的建议。理想状态在普遍语用学框架中被认作语言交流的可能性条件，这些理想状态也被视为不再属于历史传统的一些规范，可以为批判提供合理的基

础。这样一来批判理论就可以拿这些充满生机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的生活过程进行两相比较。几年之后，这种从普遍语用学角度可以找到自身理由的批判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在《合法化危机》当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阶段，社会系统的成员如果能够而且愿意通过话语的意志形成（discursive will-formation）来决定社会交往的组织形式，并且充分了解他们社会的限制条件和功能要求，那么，它们将如何对他们的需求作出共同的、有约束力的解释（而且他们将会公认那些规范的合理性）？<sup>[81]</sup>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是对技术和社会生活世界之间联系日益衰退的讨论的延续。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于他对现代世界和被扭曲的启蒙最初进行的病理学分析，那时他还是罗塔克尔（Rothacker）<sup>[82]</sup>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当时的讨论已经把各种论题汇集为一个整体了。哈贝马斯试图以比在他之前的马克斯·韦伯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更为确切的方式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形式，即目的性行动系统显示出的理性，已经逐渐扩展为一种生活形式（life-form）的历史总体性。韦伯曾把这现象解释为与对传统的“祛魅”过程相伴随的“理性化”过程；而马尔库塞则把它解释为技术与权力的融合。

技术作为权力，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力看上去具有科学理性的形态和技术的必然性，显出不容置疑的样子。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认为，将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桎梏的力量就蕴藏于生产力自身当中；但是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同时似乎也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支柱。批判理论以前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将继续发挥作用，而大多数社会成员也都感到他们与现存制度而不是一个有可能更好的社会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批判理论的这一原有的看法在马尔库塞那里呈现出令人气馁的判断形式，他认为，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仅证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功能上的必要性，而且这种进步本身的目的就是获取权力。

641 与韦伯和马尔库塞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科学和技术理性向历史总体性的转化并非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自圆其说的过程，相反这是一个加剧这些难题的过程。为了提供一个背景，他勾画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的主旋律就是如下一个难题：尽管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却是合法的。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中，这个难题的解决依靠的是有各种世界图景配套的政治权力，而这些世界图景给人们，甚至给那些不得不更多压抑自己基本需要的人带来一种感觉：他们正在分享一种旨在提供尽可能让人满意的和善共处的生活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技术和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那些依托于传统世界图景的政治权力框架的束缚。自由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虽然祛除了和善共处观念的神秘性，但仍旧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它成为证明社会制度合法化的决定性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有两大趋势对发达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其一，政府日趋频繁地采取干预主义行动，为的是维持与自由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日益不符的、陷入重重危机的社会制度；其二，科学和技术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随着各种传统的合法化形式被逐渐削弱，尽管“各种目的性行为的子系统”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复杂性也在日益增长，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基也被冲毁了。干预主义政府现在力图借助一套“替代方案”——即通过维持一种能提供社会保险、能确保人们按比例成功地向上层流动的制度体系——来满足自身对于合法性的需要。为了确保这一点，并以此确保群众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忠诚，势必会有相当大的范围需要通过政府的干预去控制，以致纵深扩展并进入到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当中。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对合法化的需要。

问题于是就出现了：如何解释民主社会的公民回避有关实践目标的公共讨论，如何解释当权者的行为只受寻求技术和管理问题的答案所左右这一事实。对当权者来说，经济、技术和科学的规模和复杂性的激增增大是一个有利条件，它容易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这些领域

的固有规律产生了一种政治必须完全服从的绝对作用力 (force of events), 以便可以继续提供它的替代方案。正如将实践和教育相关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之外对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来说根本不成问题一样, 技术统治论幻想对于那些非政治化的群众来说, 成为了他们非政治化行为和不过问对整个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决策过程的理由。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要说的是, 技术统治论思想比以往的各种意识形态更少意识形态色彩, 但同时它也更为有害。我们再也无法从它这里追溯任何关于合理互动、关于摆脱了统治关系的互动的基本主题。

反映在技术统治论意识中的, 不是道德联系的错位, 而是对作为存在关系范畴的这种“道德”的排除。实证论的共同体意识使口语交流的指涉系统失去了效用, 在这种指涉系统当中, 在扭曲的交流条件下产生的各种权力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可以通过反思过程揭示出来。在技术统治论意识中可以找到合法化依据的人民大众的非政治化, 同时也是人在目的性活动范畴以及在有同等适应能力的行为范畴当中的自我具体化或自我对象化 (self-objectification), 这就是说, 科学的物化模式进入了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 并且获得了驾驭人类自我认识的客观权力。技术统治论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 是对实践和技术之间差别的消除, 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形态的映象——而不是清晰的映象。这种新型的关系形态是在一种被剥夺了权力的制度框架与一个已经形成了自身生活方式的目的性行为系统之间产生出来的。<sup>[83]</sup>

642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这种分析与《启蒙辩证法》和《单向度的人》当中那种令人沮丧的判断以及“管控世界”这个概念都是不相符的。但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当中, 却非要生硬地将这种分析与下面另一种分析作对比:

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通过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这一媒介，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鉴于持续发展的目的性活动的子系统在社会文化方面产生的反响，这种针对适合人们愿望的、指明行为导向的原则和规范的公开的、不受限制的和摆脱了统治的交流，这种在所有政治层面和形成共识的再政治化过程当中开展的交流，才是一些接近“合理化”的东西赖以实现的惟一中介。<sup>[81]</sup>

学生运动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抗议力量，要求对早已枯竭的公共领域实行政治化，可这种力量根本不能表明它就是国家调控资本主义借以加剧它所不能解决的难题的过程。

甚至在与尼柯拉斯·卢曼 (Niklas Luhmann) 进行的争论当中，哈贝马斯也只是断言新的合法化模式将产生于一种抗议机制。这种抗议机制表现为一种对已经失去自身可信性的各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前资产阶级根源的替代模式，一种日益强迫自身融入各类社群的替代模式：

643

正在出现的这种可选择模式就是对整个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程序的民主化。这些决策程序将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取代欺骗性论证意义上的合法化，将容许各种行动标准合理地提出严肃对待有效性的要求，并且可以通过话语方式确证或取消这些主张。<sup>[82]</sup>

只有到了1973年出版的《合法化危机》中，哈贝马斯才开始认为他在这里发现的不仅仅是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的弱点。

因此，行政行为领域与文化传统领域之间的结构差异就构成了一种系统的限制，限制着通过有意识的操纵来弥补合法性欠缺的努力。当然，如果想由此提出一种危机的论断，就必须同另一个角度联系起来考虑，即国家行为的膨胀会造成对合法性需求的超

比例增长这一副作用。我认为，超比例增长是有可能的，原因不仅在于行政事务的膨胀使得国家行为的新功能需要得到大众的支持，而且还在于这种膨胀导致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界限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且作为政治系统限定条件的文化事务，现在便落入到行政计划领域。这样，一直避免成为公共问题、尤其是实践话语的一些惯例，也就成了议题 (thematized)。

可是文化传统一旦被策略性地使用，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只能通过对传统的批判性吸收才能得以保存——以至于它对有效性的要求只能通过话语来证明。

在每个领域，行政计划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干扰作用和宣传效果。这些效果削弱了传统自发形成的辩护潜能。一旦传统的无容置疑性被摧毁，有效性要求的稳固性就只有通过话语才能保持。因此，对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化事务的鼓噪，促进了那些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但是，这种发展显示出通过公共领域的结构而得到非正式保护的公民私人性受到了威胁。积极参与的努力以及可选择模式的过量涌现，尤其是在学校(中小学和大学)、新闻、教会、剧院、出版社等文化领域中，都显示出这种威胁：公民请愿的数量越来越多，也都显示了这种威胁。<sup>[86]</sup>

把阶级结构的潜在性维持下去的策略似乎注定会破坏自身，因为社会文化领域内日益增多的国家干预显然具有破坏文化和使意义逐渐丧失的后果，而这种后果不可能由社会补偿和消耗性价值的补给来抵销。这样，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就逐渐走向对批判理论原有论题的更精确的重新表述。所谓原有论题是指：社会的总体社会化 (Vergesellschaftung der Gesellschaft) 会扼杀它自己的基础。哈贝马斯对技术和实践进行了区别，后来他又由此发展出对体制和生活世界的区

644

别，从这个基础出发，他试图把老式批判理论对于社会的更敏锐的描述与一种消除了批判理论那些容易让人丧气的倾向的危机理论结合起来。哈贝马斯严厉批评了抗议运动，因为他将自己阐释的重要性就归属于它。他更加严密地重新区分了技术与实践，并把这一区分仍然与当前社会趋势联系起来，这一指导方向其实在抗议运动出现之前就显示出来了。他从抗议运动及其各式各样的延续性形式——草根团体、另类运动、妇女运动、公民自发的各种请愿行动——之中得出的思考就是：完全有理由断定在既存的实践维度之中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理性化形式，而且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社会批判理论和反对技术统治论改革双方的能力协作来强化这种特殊的理性化形式。

阿多诺 1969 年 5 月在他接受《明镜》周刊访谈时表现出一种挑衅的姿态，他宣称自己偏爱象牙之塔，更愿意从事美学著作的写作，仿佛前几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对他的工作一点也没有产生影响似的。可是他的偶然音乐、偶然文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观念真的没有因为抗议运动而发生任何改变或者重新定义么？在这个文化革命以及对艺术的超越和取消即便在文化工业中也要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代，与哈贝马斯相比，阿多诺的思想是不是少了点系统性，是不是还少了点那种能够吸纳当代体验——“受那种试图解释当今艺术和艺术之可能性的迫切愿望所激发”<sup>[87]</sup>的——条理化的能力？

《否定的辩证法》是以这样的话开头的：“一度显得过时的哲学，由于实现它的契机未被人们所把握而得以继续存在。”与此类似，《美学理论》写道：“当艺术被禁止的时刻，当艺术被判定应该死去的时刻，它却在被管控的世界中重新获得了生存的权利，这种权利对艺术本身的否定类似于某种管理行为。”<sup>[88]</sup>萌发于学生运动的破坏偶像论不仅让西方人联想起马尔库塞 1937 年发表于《社会研究学刊》上对“文化的肯定性特征”的批判文章和本雅明 1936 年论艺术作品的文章，而且也会使 645 他们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传统。这种偶像破坏论使阿多诺感到惊恐，他认为这不过是对超越艺术和取消艺术的拙劣摹仿，偶像破坏论恰恰陷入了一种幻觉，总是认为立即就能实

现根本的变革，而实际上破坏了使艺术革新激进化的真正机会。让阿多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 1967 年以来总是有人批评他在 1950 年代编辑的本雅明文集（选本），为什么有人指责他掩藏了那个唯物主义的本雅明，掩藏了那个捍卫艺术在阶级斗争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本雅明。在阿多诺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本雅明就不是本雅明本人了，而那种解释只能来自布莱希特的影响，那种反艺术的（anti-art）品格根本不适合本雅明。

在阿多诺早期给《社会研究学刊》所撰文稿之中，对不间断的启蒙一直抱有某种感伤：音乐受到启蒙并且在其自身的领域中完全支配了自然，它将会对未被启蒙的社会构成一种挑衅。在《新音乐哲学》中，他让自己寄希望于十二音阶体系时期勋伯格作品里存在的那些令人愉悦的野蛮因素，可勋伯格后来又退回了秩序感。在“新音乐的老化”<sup>[89]</sup>一文中，他对战后序列音乐的发展抱有怀疑态度。在“通向一种偶然音乐”中，他呼吁要在音乐中开创一个新异的、后序列的开端。在这之后就有了《美学理论》；这是一部捍卫现代艺术事业的总结式论著——战后时期其他艺术理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在那个时期，现代艺术的英雄时期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历史。这意味着什么呢？阿多诺在 1960 年代末发现了超越勋伯格学派、超越乔伊斯、超越毕加索的进步了吗？看到了那种通过更激烈地从传统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的真正自由的艺术的出现吗？阿多诺为当时的艺术家们打开了一个怎样的前景呢？阿多诺现在已经引入了一大堆可以用来评判艺术品的可能性标准：品质；技法成就的水准；有别于一切传统的特质；意义的丰富性（即写作、作曲、绘画当中意义的丰富性）；从历史哲学角度来看作品的内容；真理内容；被赋予形式的对立性；自由度等等，他怎么接受这些可能的标准呢？抗议运动是否促使阿多诺改变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状况的看法——无论他是多么不愿意承认，并因而改变了他对艺术所面临的机遇与危险的看法，而这些机遇与危险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与社会普遍状况相一致？《美学理论》当时有没有可能担当矫正者的角色，一方面矫正抗议运动中鲁莽的文化革命尝试，同时又加强抗议运动所包含

的对于文化中立化的批判？

646 阿多诺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既表明他热衷于一般的现代艺术，却对最新近的现代艺术迷惑不解，也显示了他对艺术发展的那些挫折阶段的理解，以及他对艺术中导致失败后果的发展道路的关注。根据他那更为精细的哲学著作的中心论题——坚决不能让抽象因素和抽象所由来的因素完全分离，他解释了那些令人折服的现代艺术作品所蕴藏的秘密：它们从来没有完全脱离它们正在予以消除的事物。

艺术的前艺术之维，同时是对艺术反文化特性的提醒，是对于它自身作为经验世界之对立面——让经验世界不受干扰——的怀疑。不过，重要的艺术作品努力把这种不利于艺术的前艺术维度合并到自身当中。在缺乏反艺术维度的地方——在神圣的室内音乐家没有小提琴手的持续跟随的地方，在一出无幻觉（*illusion-free*）戏剧没有任何舞台魔术迹象的地方——由于担心太过幼稚，艺术会做出让步。甚至在贝克特的《终局》（*Endgame*）一剧中，帷幕在充满期待的情境中徐徐升起；这些不考虑帷幕的演出和制作方法都在试图用雕虫小技否认它们自身的本性。实际上，帷幕升起的时刻，就是人们期待奇异景象的时刻。即使贝克特的剧作希望借助那些日落以后依然存留的灰色调，来驱除马戏表演的鲜亮色彩，但就它们在舞台上表演这一方面来说它们仍然忠实于马戏表演，而且我们都知道，它们当中塑造的反英雄主角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马戏团小丑和滑稽电影的影响。尽管这些戏严峻而素朴，但它们决没有完全摒弃戏装和布景……总的来说，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甚至连那些最为抽象的绘画，在材料和视觉组织方面，怎么仍然保存着那些它们试图消除的具象派（*representationalism*）的痕迹。<sup>[90]</sup>

在阿多诺看来，能够解释贝克特伟大性的东西，同时也是贝克特之前的艺术高峰以及前现代艺术家们的晚期作品所共有的特征。

如果没有矛盾和非同一性的提醒，和谐在美学意义上兴许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人们将米开朗基罗、后期伦勃朗或贝多芬晚期的反和谐态度，归因于和谐概念本身的内在发展动力及其最后的不足，而不是归因于主观激情方面的发展，这就不能算是依据历史哲学对那些大大偏离的东西所做的不适宜的概括。不和谐是关于和谐的真实所在。如果按照和谐该当是什么的最严格的标准来看，和谐是无法获得的。只有这种无法获取性成为艺术本质的构成部分时——这种情况见诸于著名艺术家那些所谓的成熟风格当中，这些迫切需要的标准方可达到。<sup>[91]</sup>

因此，阿多诺认为，伟大的现代艺术的特征都具有以下两个紧密相连的因素：在那些依旧被坚持的幻想中脆弱性在与日俱增；随之而来为那些一度被禁止之物提供了进入艺术的入口。在这两种因素真正结合的地方，现代艺术就具有了一种苦涩的美和进取性的忧郁。

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审美享乐主义指控有些艺术颠倒了阴暗元素的公认职能（postulation）——比如，指责超现实主义将黑色幽默抬高到纲领性的地位这种方式，这其实指控的是如下事实：人们期待艺术中最阴暗的元素能激发起某种愉悦的东西。但是，这只不过意味着，艺术及其恰当的快乐感只有在其坚持自身立场的能力当中才可以被感受到。这种快乐从内部散发到作品的感性表象之中。就像和谐作品的精神甚至会穿透最冷酷无情的现象一样，阴暗元素作为文化表面那种欺骗性感觉的对立面，自波德莱尔以来已经变得很有感性魅力了。不谐和音中包含的愉悦感大于谐和音包含的愉悦感：这一事实以适当的方式回敬了享乐主义。在不谐和音当中，敏锐的感受被更有力地强化，可以区别于它本身和肯定性的单音重复，从而变成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对乐观性的废话充满厌恶，它将新艺术引入到一种可描述人类宜居之地球的无人之境。现代艺术的这一方面首次在勋伯格的《月光下的皮埃罗》

(*Pierrot lunaire*) 当中得到了展现，一种水晶般的、想像的要素与不谐和音的整体在其中合而为一。否定 (negation) 可以把自身转变成愉悦感，而不是转化为肯定的东西。<sup>[92]</sup>

贝克特和策兰是被阿多诺完全认可的仅有的两位现代艺术家。他们对他们予以否定的旧形式的退化性残余持有某种宽容包纳的态度，而且吸收了以往被压抑的东西，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文本的密度。因此，按照阿多诺的历史哲学标准来看，他们并不是阿多诺本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而是勋伯格、毕加索和乔伊斯这些英雄时期的现代主义的同代人。阿多诺把真正属于他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描述为更先进也更贫乏的艺术家，他认为他们缺乏贝克特式原子的丰富性，尽管他们肯定会坚持不懈地使艺术延续下去，可艺术似乎也的确要在他们这里走向终结。除此之外，阿多诺再没有对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做什么评述了。

648

某些艺术的最近发展呈现出的新奇性，可能是对和谐的厌恶产生的，甚至有人试图把和谐当作已经被否定的东西消除掉。这种否定之否定，确实给这种程序带来了致命的缺陷：转向对一种新的确信的自我满足，因此在战后几十年的众多绘画和乐曲当中会发现张力的匮乏。这种虚假的确信就是对意义的丧失进行技术定位。在现代艺术的英雄时代被视为现代艺术之意义的东西，保留了被确定的秩序元素；取消它们实际上会产生一种没有阻力的、空洞的同一性。

而且：

这种发展可能最终会导致感官享受禁忌的剧增，尽管有时候很难辨别这种禁忌多大程度上是依据形式法则，多大程度上仅仅是能力缺乏造成的……最终，这种感官禁忌甚至会扩及令人愉悦的东西的对立面，因为，甚至在离得最远的地方，也可以分享这种

对愉快事物的具体的否定感。为了达成这种反应形式，不谐和音促使自己去尽力接近它的必然结果——和谐；它排斥残暴的意识形态所展现表面上的温情，而更喜欢接受具体化的意识（reified consciousness）。不谐和音冷却成一种漠不关心的东西，虽然它是一种新的、没有往事记忆痕迹的、没有感受的、没有本质的直观形式。<sup>[93]</sup>

但是，如果从艺术素材中持续排除过去的所有残余——这是阿多诺在“通向一种偶然音乐”中所赞成的——没有使艺术面对它的对象的自由、它与“摹仿禁忌”决裂的力量、它与法外之物和被禁止之物的同化能力有所增益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仍然坚持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办法，人们才可能理解人们必须是绝对现代的、必须寻求新异这个原则呢？

不能仅仅根据（艺术品）的社会影响力日渐减弱来解释它们似乎变得越来越冷漠这一事实。相反，有证据表明当这些作品转向自身的纯粹内在性之时，也就丧失了对艺术品来说至为根本的一种元素——摩擦系数：对它们自身也变得更加漠不关心了。尽管会有这种事实——非常抽象的绘画可以不触众怒地挂在官方的各类接待厅里，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是向一种原先的、令人愉悦的具象派的回归，即使切·格瓦拉也被选来用于同客观对象进行调和。<sup>[94]</sup>

但具象性真的就仅仅是先在地自得吗？它不也早就很让人感到不舒服了吗？因为具象性可能容易引起不满，所以出于政治原因抽象绘画没有成为西德绘画中的主流，不是吗？难道各种不同形式的具象派绘画之间的差别，就仅仅源于被再现的对象之间的差别吗？阿多诺把所有类型的具象绘画都当作顺从者的复归而打发掉的这种随意的做法，只能被理解为寄希望于突然变革的那种思想回潮的结果，只能被理解为

这样一种期待：突变将来自对忧郁——在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所说的忧郁——的摹仿。但阿多诺本人也说，“一般而言很难区分，抛弃一切表达形式的人究竟是物化了的意识的中介呢，还是表达了一种无法言传的、不可表达的表达，后者恰恰是对于物化的谴责。”<sup>[95]</sup>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具体作品之间的差别吗？这与对物化的完美摹仿是完全不同的，而后者正是阿多诺之所以给贝克特和策兰以如此之高的评价的原因。他对于这两位作家的评价已经显示出，艺术不是依照“你不能再作那个”的规则向前发展，而是按照“你不能再那样做”的规则向前发展。如果对于艺术发展的讨论不被预先简化为要求艺术成为沉默的、冷淡的和冷漠的，并最终要求艺术自我根绝的话，那么，必定可以看到艺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更为广泛，更为不确定，也更具有向着艺术中一切材料的本质敞开的开放性，这种艺术发展完全能够在现有条件下保持自己。

除了期待突然变革这个思想上的回潮之外，阿多诺特有的关于自然和与自然和解的思想也是促使他坚决捍卫现代艺术的进步观念的思想要素。这一进步观认为，就现代艺术发展而言，其基础就是对一切传统的或外在于艺术的东西——无论它是质的因素还是内容的因素——的排除。

事实上，艺术在过去二百年间经历的精神化过程，虽然给了它更多的自由，但艺术并未疏远与自然的关系——像物化意识那样——而是以自身的方式让自身去接近自然美……艺术旨在凭籍人的手段来让那些非人性的事物说话。艺术作品中的纯粹表现，摆脱了物化的干扰因素以及所谓的天然材料的局限，从而与自然结合在一起；譬如在安东·魏伯恩那最可信的作品中，著作凭借它们的主观敏感性将它们自身化入其中的那种纯粹的声音，又把自身转化为天然的音响。诚然，这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大自然之声音；它是大自然的言语，而不只是对自然的部分反映。在理性化阶段，对艺术作为一种非概念语言（non-conceptual language）的主观转化，

是惟一可以反映某种接近于创造语言之事的形式，当然，在这种方式中也带有反映被歪曲的悖论。艺术试图模仿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表现方式。意向只是艺术的载体。艺术作品越是完美，就越要更多地减少意图。自然在间接上是艺术的真实内容，但是会直接产生虚假内容。如果说自然的语言是无声的，那么艺术试图让沉默的东西开口说话。艺术要实现这一点会面临失败，这是因为在以下两种观念——要求竭力进行这种努力 的观念，与这种努力所针对的思想观念（一种全然不自觉的状态）——之间存在着不能克服的矛盾。<sup>[96]</sup>

与之前的作品相比，《美学理论》以更加详细的方式把人类对自然的支配的批判以及对被管控的社会的批判结合了起来，以期形成一种对社会的批判，通过其物化的（reified）结构，这样的社会拒绝赋予自然以社会协调的成果——宁静，而这正是自然所渴慕的。正是这两种主题 的联合赋予了阿多诺美学哲学——和他的社会哲学、历史哲学、认识论一样——一种伤感的基调。也正是从这种联接出发，阿多诺得出 了他这样的主张：他要投身于——或者说支持——被启蒙了的启蒙。阿多诺的艺术哲学所秉持的道德，以及他在《美学理论》中延续《启蒙辩证法》的所秉持的道德就是：艺术作品是主体的全部史前人类学，它正以一种给人启迪的方式在完成着启蒙运动。

与意指性的（significative）语言相比，（艺术作品）的语言更为悠久，但它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仿佛艺术作品在构成过程中使自身去适应主题，并重复展示这种构成过程产生或被剥夺的方式。它们不是在表达主体的地方，而是在主观性——一种灵性（Beseelung）——的原初史面前感觉震撼的地方才获得了表达……这描述了艺术作品与主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是持久的，恰恰因为原初史在主体内心里头还活着。在历史的各个阶段，这种密切关系都会不断地从头再来。只有主体适合充当表现的工 具——无论它多么间接，

可是它把自身想像成直接的。在这里被表现的内容与主体类似；激发艺术的种种因素是主观的，但它们同时也是非个人的（apersonal），对自我的整合有影响但又不被这一过程完全同化。艺术作品的表现是主体身上的非主观的元素，并不是主体自身的表现（Ausdruck），而是主体做出来的表现（Abdruck）。再也没有比动物——猿猴——的眼睛更具有表现力的东西了，它们好像在客观上为自己不是人类这一事实而感到悲哀。当各种冲动被转化到艺术作品当中，并且凭借这些作品的统合能力被同化时，它们在美学统一体当中还依然是超审美的自然的象征——虽然，作为这些象征的余像（after-images），这些冲动不再呈现出自然的样态。在所有真切的审美经验中都流露出这种矛盾心理。在康德对于崇高感的描述——某种介于自然和自由之间的发自内心的震撼感——当中，这种矛盾心理得到了无与伦比的表达。<sup>[97]</sup>

但是这种艺术概念只能涵盖它的深层结构。如果把它做为评判艺术发展的直接标准，那么，生成新的艺术反应形式的潜力就会被片面地简化为一种社会的辩证“进步”，而新形式的表现实际上是不可预知的。

在阿多诺本人那里，有两个要素一再发生非常剧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阿多诺相信现代艺术的发展包含了可以用诸如理智主义、彻底清晰化等范畴来阐明的逻辑；而另一方面，他又对艺术有这样的一般看法，即艺术不一定是进步的，而毋宁说其发展是对隐藏的历史动因的反应，是围绕他从未达到的目标而进行的转动。

从根本上说，艺术作品是谜一般的东西，这并非根据它们的合成法，而是根据其中包含的真理内容。那些读完了一部艺术作品之后的人曾经反复提出的问题——“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变成了另一个寻求绝对（the absolute）的问题——“它是不是真的？”所有艺术作品对这一问题都不作推理性的（discursive）回应。答案中要避

免的禁忌是由推理性思想发布的结论性信息。艺术以一种抗拒这种禁忌的模仿形式，试图提供答案，但是由于它必须保持不偏不倚，因此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因此变成了像原始世界的恐怖那样神秘的东西，它们没有消失，只是转变了自己的形态而已。所有艺术都保留着这些恐怖的震动图……可以在其中设想这种谜一样的特性的外在形式，就是意义本身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不能缺少语境，即使这种语境会变到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程度。然而，这种语境以其结构的客观性提出了对意义客观性的同等要求。这个要求不仅不能被证明，而且甚至与经验是相矛盾的。从每一部艺术作品中透出的这种神秘的特性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外注视着，但是这些答案好像斯芬克斯(sphinx)之谜的答案一样，却总是相同的——即使艺术之谜只在差异中，而不是在一致中才可能做出欺骗性的承诺。不论这种承诺是不是骗人的：它就是艺术之谜的所在。<sup>[98]</sup>

不同于哲学，艺术包含了一种对于快乐的隐密的承诺。它实现了否定的辩证哲学一直努力实现的力量：“要通过主观努力揭示出某种客观事物”<sup>[99]</sup>。艺术只有以牺牲虚幻性为代价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这也就是所有艺术哲学同时都是对艺术的批判的原因之所在。对激进的现代艺术作品的考察也是如此，这些艺术品通过打破结构原则而自觉不自觉地保存着幻想。即便艺术作品没有在前概念层面把握否定的辩证哲学试图通过概念予以把握的东西，它们至少通过迫使否定的辩证哲学反思如下问题而使该哲学的动机得以强化：“艺术作品，作为存在物的形象而又不能把不存在之物召唤成存在物，它们自身如何能够成为不存在之物的不可抗拒的形象——如果非存在物的确不能显现自身的话。”<sup>[100]</sup>

毫无疑问，阿多诺不过是把理论转化成了一种美学形式。如果说艺术是摹仿的避难所，那么“理论”就是概念知识的担保书。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他还说过：哲学的

实现与无产阶级的超越只有相互通过对方才有可能完成。<sup>[101]</sup>哲学和艺术也只有共同处在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如果真有的话——当中，才会变成多余的东西。至于其他时候，它们是一对搭档，背对背地展现为模仿与理性的结合以及受到启蒙的启蒙的标志。两者都处在危险形势当中，两者都震撼了僵化的感知和行为方式，两者都旨在维持或再次唤醒一种惊奇感。

在他 1962 年那篇论义务的文章中，阿多诺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眼下真正的政治被阻碍着，各种关系都已僵化，丝毫没有出现软化的迹象，精神被这一情况逼迫到了它无须使自身粗糙化的地步”，而艺术的任务就是“无声地记录被禁止进入政治的事物”。他将这视为他强调艺术独立性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1960 年代末他依然对艺术作如是观。文化革命的渴望甚至在对艺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想超越并废止艺术，阿多诺对这种热望是不信任的。所以他不可能认同抗议运动的这个目标，尽管抗议运动可能把他看作试图纠正运动偏离目标的人。哈贝马斯发现了基于学者间不受支配的交往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化模式空间，可阿多诺却看不到表现非同一性的任何机会。作为一名批判的科学哲学家，哈贝马斯希望在大学出现民主改革，而阿多诺却对现代艺术成为激发受启蒙的启蒙的动力不抱任何奢望。在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这个时代，对科学和大学改革感兴趣的哈贝马斯似乎在两个人当中更现实些。然而，这个领域里变革的机会恰恰因为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性而越来越少了。

阿多诺寄希望于艺术形式的破坏力量，这种力量由于自身的冲突状态而持续地被向前推进，也不不断地被削弱，在社会中越来越不被认真对待——阿多诺这种希望是绝望的希望。哈贝马斯希望把政治公共领域与科学的自我反思的范导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希望未尝不是绝望的，因为社会日益以选择性的方式、越来越坚决地把科学自我反思的范导力量用作生产力，用作一种意识形态，而它的范导和反思原则或变化形式日益受到排挤，成了一种“自律的”和无关紧要的角色，就像艺术长久以来被赋予的角色一样。范式的转换，即从主体哲学、心灵与自然相互

和谐的乌托邦转向交往行动理论、详细讨论那些建基于一致同意之上的规范性的行为内容的乌托邦，打开了看待社会和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它第一次让人们有可能系统地认识到人类在创造的路途上取得的进步，这一认识能够促成对人类——如果这样的人类是可能的话——本质目标的一致同意而无需担心有被支配的危险。阿多诺的思想进路未被也不可能设想被吸纳入这个新范式，因为哈贝马斯认定阿多诺的思想进路本质上是错误的。阿多诺所说的艺术重要性中的一些方面被哈贝马斯以某种方式消化吸收了，成为了他的一些命题，比如：生活世界的形成，是既解释世界也解释它们自身的科学和哲学潜能的结果，是严格的普世主义的法律道德概念所形成的启蒙潜能的结果，也是审美现代主义极端经验的结果。不仅只是艺术一个维度，而是有着这三个维度，这一提法使生活世界形成的前景更为可信。但是不可信的一点是，这里排除了一个深层纬度，那就是在阿多诺那里至关重要的自然美。哈贝马斯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它尚未由某个严格范式提出、强调并进而化约为无关紧要的问题，即，关于对外部自然的支配和内部身体性自然的支配之间的关系、关于对自然的支配和对社会条件的支配之间的联系的问题。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尚未着手解决的主题材料中，这个难题还没有得到相对具体充分的研究。

阿多诺的逝世是一个中断。弗洛姆还健在，但他与霍克海默圈子其他成员之间依然保持着疏远的关系。1950年代期间，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再一次以激烈言辞相互批评。马尔库塞批评弗洛姆扮成了宗师模样。洛文塔尔健在，但195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与他断绝了关系，因为他曾试图要求从研究所获得享受养老金的权利。1956年之前，洛文塔尔一直住在研究所驻纽约的办事处，由于霍克海默想在美国保留一个基地，这个办事处由他的前任秘书爱丽思·迈尔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末。1956年洛文塔尔成了伯克利某著名大学的教授。霍克海默健在，可他早已与自己的过去保持了某种距离，对他来说谈论那些全然不同的事情的渴望——尽管那让空头理论家们着迷——就意味着对达到人类既能活得自由，又能活得平等而团结的社会条件的一切机会的拒绝。马尔

654

库塞也健在。霍克海默对他有这样的评论：马尔库塞的声望凭的就是那些观念，那些观念“比起阿多诺和我的要粗糙和简单”，<sup>[102]</sup>这样的评论，除了包含着对一度忠实于他、但现在不再满足于对被管控世界发发牢骚的某个人的尖刻挖苦，还有一层意思，即认可他们在思想上有着很多的共同基础。但是马尔库塞并不是这个体制化地形成的思想流派的焦点。阿多诺的死代表了批判理论的终点，无论批判理论是多么不统一，它都很特殊地汇集在社会研究所这个外在形式之下，汇集在一种植根于反资产阶级情绪和承担批判社会之使命感的发现欲望之下。阿多诺死后两三年内，研究所的年轻成员都纷纷离开法兰克福，这就突出了阿多诺的死所体现的断裂的深远影响。弗里德贝格在1969年成为黑森州的文化部长，并且开始为在管理层面改革教育而斗争。耐格特在1970年成为汉诺威大学的教授。1971年哈贝马斯接受了出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科学与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之职的邀请。这个研究所设在靠近慕尼黑的斯塔恩贝格(Starnberg)。哈贝马斯希望到那里把有关理论的跨学科著作中的那些观念付诸实践，在他看来，在社会研究所是没有发展这一事业的机会的，虽说他还曾被任命为研究所的联席主任。他在1971年写信给霍克海默说：

阿多诺故去后这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就不用我说了。我去斯塔恩贝格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那儿对我来说有着非常多的研究机会。在那儿我可以提供十五个研究职位，并且在相当宽的财政限度内自由选择要承担的研究计划。与此相比，在法兰克福，我根本没有现实的机会，让自己愿意一起工作的助手加入研究所一起工作。另一方面，社会学系不久要担负并完成教师、律师和经济师的基础培训任务。如果我还待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先投入到这个显然很急迫的工作中去。<sup>[103]</sup>

655

惟一留下来的人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一定意义上，他是唯物主义哲学领域年轻一代的专家（后来他和约瑟夫·迈尔一道成为霍克海默

的财产管理人，后者自研究所纽约时期起就是霍克海默的学生和同事)。

那研究所呢？甚至在阿多诺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做出了决定：把工会研究作为它未来的工作重心。以前遵循的路线因此被放弃，1969 以后的研究几乎全是由新职员来进行的。1971 年由阿多诺和弗里德贝格编辑的“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 22 卷——米夏尔拉·冯·弗雷霍尔德 (Michaela von Freyhold) 的《权威主义与政治冷漠：测定与权威相关的行为形式的量表研究》<sup>[104]</sup>——出版了。此后这套丛书就中止了。1974 年后研究所只出版了工会研究和研究所对产业工人的研究成果。因为一方面研究所没有理论家了，另一方面也没有其他更多的研究合同。除了来自市政府和州政府授予的定期赠金之外，研究所还从与特定项目相关的国家基金那里筹措经费。<sup>[105]</sup>

#### 注释：

[1] Adorno to Horkheimer, 15 December 1966.

[2] [On the *Spiegel* affair, see Dennis L. Bark and David R. Gress, *A History of West Germany*, vol. 1: *From Shadow to Substance*, 1945–1963 (Oxford, 1989), pp. 499–509.]

[3] *diskus*, 8 (1966), p. 2.

[4] 这一细节是由阿多诺以前的学生和助手鲁尔夫·梯德曼 (Rolf Tiedemann) 提供的，他后来是阿多诺文集的编辑者和财产的保管者。梯德曼也是一位本雅明研究专家和《本雅明哲学研究》(*Studien zur Philosophie Walter Benjamins*) 一书的作者，此书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丛书之一出版于 1965 年。

[5] Adorno to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23 November 1965.

[6] Adorno to Kracauer, 27 April 1965.

[7]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London, 1973), p. xix. 参看中译本《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序言”第 1 页，中文版把该词译为“内在思想的第一性”。

[8] *Ibid.*, p. 3. 中文版第 1 页，此处有改动。

[9] *Ibid.*, pp. 143–4. 中文版第 140–141 页，有改动。

- [10] Theodor W. Adorno, *Asthetische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1970), *Aesthetic Theory*, trans. C. Lenhardt (London, 1984), p. 493.
- [11]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p. xx. 中文译本“前言”第2页, 有改动。
- [12] *Ibid.*, p. 29.
- [13] Theodor W. Adorno, *Kierkegaard* (Frankfurt am Main, 1974), p. 251.
- [14]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p. 11.
- [15] *Ibid.*, p. 10.
- [16] [ 'Unterschiedenes ist gut'; Friedrich Höblderlin, 'Pläne und Bruchstücke', no. 44, in *Sämtliche Werke*, ed. Friedrich Beissner (Stuttgart, 1951), vol. 2/1, p. 327. ]
- [17]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p. 5. 参看中文译本第3页, 有改动。
- [18] *Ibid.*, p. 183. 参看中文译本第181-182页, 有改动。
- [19] *Ibid.*, p. 6.
- [20] *Ibid.*, p. 191 [the sentence citing Eichendorff was omitt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参看中文译本第189页, 有改动。
- [21] Cf. *ibid.*, p. 374.
- [22] 'Ein Mehr an Subjekt', *ibid.*, p. 40. 参看中文版第40页。“在与通常的科学理想的尖锐对立中, 辩证认识的客观性对主体的需要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 [23] *Ibid.*, pp. 43, 45. 参看中文版第42、44页。
- [24]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70-86), vol. 16, p. 329.
- [25]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pp. 15, 9, 25. 参见中文译本第12页。
- [26] *Ibid.*, p. 81. 参见中文译本第80页。
- [27] *Ibid.*, p. 26.
- [28] *Ibid.*, pp. 263-4. 在英文译本中, 已经用“商品 (Commodity)”一词来替代“货品 (merchandise)”, 以指代那些物品 (Ware); 比较“物品拜物教 (Warenfetischismus)”与“商品拜物教 (commodity fetishism)”。中文版参见第261-2页。
- [29] *Ibid.*, p. 299. 中译本参见第297页。
- [30] *Ibid.*, p. 264. 中译本参见第262页。
- [31] *Ibid.*, pp. 285-6. 中译本参看第283页, 有改动。
- [32] *Ibid.*, p. 297. 中译本参看第295页, 有改动。
- [33] *Ibid.*, pp. 221, 193, 226.
- [34] *Ibid.*, p. 221. 中译本参看第217页。
- [35] *Ibid.*, p. 229. 中文版参看第225页。

- [36] Ibid. , p. 367. 中文版参看第 367 页。
- [37]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Glasgow, 1973), p. 262.
- [38]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1955), p. 232.
- [39]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pp. 365–6. 中文版参看第 366–367 页, 有改动。
- [40] Ibid. , p. 373. 中文版参看第 374 页, 有改动。
- [41] Robert Paul Wolff, Barrington Moore, Jr, and Herbert Marcuse,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Boston, 1965; repr. with 'Postscript' by Marcuse, Boston, 1969) .
- [4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1964), pp. 244–5. 此书德语版于 1967 年出版。中文版参看张峰、昌世平译《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06–207 页。另参看刘继译《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19–220 页。
- [43] Ibid. , p. 245. 参见张峰中译本第 207 页。
- [44] Ibid. , pp. 256–7; cf. pp. 390–1 above. 参见张峰中译本第 216 页, 刘继中译本第 230–231 页, 有改动。
- [45] Jean-Paul Sartre, 'Preface', in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Harmondsworth, 1967); cf. p. 9.
- [46] Ibid. , p. 18.
- [47] Herbert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ce', in Wolff et al. ,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p. 103.
- [48] Ibid. , pp. 116–17. 马尔库塞后来解释说, 这段引用围绕“自然权利”而讨论只是为了表明这是政治理论中的一个传统的技术性用语。
- [49] Ibid. , p. 110.
- [50] Adorno to Horkheimer, 8 December 1966.
- [51] Herbert Marcuse, 'Die Analyse eines Exempels', *Neue Kritik* (June/August 1966), p. 37.
- [52] Ibid. , p. 33.
- [53] Ibid. , p. 38.
- [54] Marcuse to Adorno, La Jolla, California, 5 April 1969
- [55] The AStA, Allgemeiner Studentaasschuss.
- [56] The *Burschenschaften*, 这个“联谊会”是右翼色彩的击剑联谊会。
- [57] Jürgen Habermas, *Bedingungen und Organisation des Widerstandes. Der Kongress*

in *Hannover. Protokolle, Flugblätter, Resolutionen* (Berlin, 1967), pp. 44–6.

[58] *Ibid.*, p. 48.

[59] Jürgen Habermas,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1), pp. 519–20.

[60] Adorno to Horkheimer, 13 February 1967.

[61] *Der Spiegel*, 19 (1969).

[62] 'Das Ende der Utopie', 'Das Problem der Gewalt in der Opposition', 'Moral und Politik in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 'Vietnam - Die Dritte Welt und die Opposition in den Metropolen'.

[63] Herbert Marcuse, *Das Ende der Utopie. Vorträge und Diskussionen in Berlin*, 1967 (Berlin, 1980), pp. 27–8.

[64] *Ibid.*, p. 20.

[65] Herbert Marcuse, 'Professoren als Staatsregenten?', *Der Spiegel*, 35 (1967), pp. 112–18.

[66] Draft of a letter to Marcuse, enclosure with the letter from Adorno to Horkheimer, 7 September 1962.

[67]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86), p. viii.

[68] Max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8 (1939), p. 115.

[69] Max Horkheimer, *Dämmerung. Notizen in Deutschland* (Zurich, 1934),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 vol. 2, p. 381; cf. *Dawn and Decline; Notes 1926–1931 and 1950–1969*, trans. Michael Shaw (New York, 1978), p. 41.

[70]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p. 368.

[71] 'Studentenprotest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Jürgen Habermas, *Protest-bewegung und Hochschulreform* (Frankfurt am Main, 1969), pp. 175–6.

[72] [Oskar Negt (ed.), *Die Linke antwortet Jürgen Habermas* (Frankfurt am Main, 1968).]

[73] Hans-Jürgen Krahl, 'Zur Ideologiekritik des antiautoritären Bewusstseins',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historischen Dialektik von bürgerlicher Emanzipation und proletarischer Revolution. Schriften, Reden und Entwürfe aus den Jahren 1966–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71), p. 279.

[74] Marcuse to Adorno, *La Jolla*, 5 April 1969.

[75] Marcuse to Adorno, London, 4 June 1969.

[76]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m Main, 1968);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New York, 1972), pp. 255, 257-8. 本书中文译本标题为《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此段译文参考该书第256页, 有较大改动。

[77] *Ibid.*, p. 282. 参看中译本第278-279页, 有改动。

[78] *Ibid.*, p. 284. 参看中译本第280页。

[79] Jürgen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68), p. 91. 参看中译本《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李黎、郭官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第72页, 有改动。

[80] 'Dogmatism, Reason, and Decision: On Theory and Praxis in our Scientific Civilization', in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ohn Viertel (Cambridge, 1988), p. 256.

[81]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73);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Cambridge, 1988), p. 113. 中文译本参见《合法化危机》, 刘北成、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50页, 有改动。

[82] 埃里希·罗塔克尔 (Erich Rothacker, 1888-1965), 波恩大学哲学教授, 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人类学和人文科学理论。

[83]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pp. 90-1. 参看中译本《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李黎、郭官义译,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第70-71页, 有较大改动。

[84] *Ibid.*, p. 98. 参看中译本第76页, 有较大改动。

[85] Jürgen Habermas and Niklas Luh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1), pp. 265-6. 中文参见《合法化危机》, 刘北成、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94, 95页, 有改动。

[86]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pp. 71, 72. 参看中译本第95页, 有较大改动。

[87] Theodor W. Adorno, 'Öftener Brief an Max Horkheimer', *Die Zeit*, 12 February 1965.

[88] Adorno, *Ästhetische Theorie*, p. 373.

[89] 'Das Altern der Neuen Musik', in Theodor W. Adorno, *Disson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Göttingen, 1956), pp. 120-43.

[90] Adorno, *Ästhetische Theorie*, pp. 126–7. 可参考王柯平中文译本《美学理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版, 第 146–147 页。由于该中文译本所据英文版 (Lo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tr. By C. Lenhardt) 与本书英译者的译文多有出入, 因此, 此处所译出的相关段落与王柯平先生译本有较大差异, 特此说明。

[91] *Ibid.*, p. 168. 参看中译本第 194 页。

[92] *Ibid.* pp. 66–7.

[93] *Ibid.* pp. 238 and 30. 参看中译本第 159 和第 26 页。

[94] *Ibid.* pp. 315–16.

[95] *Ibid.*, p. 179.

[96] *Ibid.* p. 121. 参看中译本第 139 页。

[97] *Ibid.* p. 172. 参看中译本第 199 页。

[98] *Ibid.* pp. 192–3.

[99] *Ibid.* p. 173.

[100] *Ibid.* p. 129. 参见中译本第 149 页。

[101]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 trans. Gregor Benton,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1975), p.257. 此处有以下这句话:“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 就不能成为现实; 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 就不可能消灭自身。”参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6 页。

[102] *Der Spiegel*, 30 June 1969, p. 109.

[103] Habermas to Horkheimer, 22 April 1971.

[104] Michaela von Freyhold, *Autor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Apathie. Analyse einer Skala zur Ermittlung autoritätsgebundener Verhaltensweisen* (Frankfurt am Main, 1971).

[105] See *Leviathan*, 4 (1981), special issue entitled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und Rationalisierung. Neuere Studien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in Frankfurt/M'.

到 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批判理论基本上不再充当抗议运动的指导者。一些团体转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方式，其他团体彻底离开了理论。另外，一个改良主义时代似乎开始了。批判理论的一代年轻一代的代表分散在各个方面，而且以更确定的立场继续发挥着影响力。但是，最早在 1972 年，预示着联邦德国春天结束的第一个征兆已经很明显了。1972 年初，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同联邦德国各州总理一起，通过了一项针对激进教师和公务员的禁令。<sup>[1]</sup> 禁令旨在杜绝新一代具有批判性的学生“激进主义”代表从事“制度内的长征”，这项禁令很快就导致了一些不受控制的稽查和开除公职的事件。“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术语在德国依然是一个人所熟知的概念，而且从学生造反那天起就被有些人当作便利的标签来使用，他们喜欢把不满、抗议和指向激进改革和恐怖活动的努力归咎于是受了年轻的知识骗子的煽动。1977 年发生了一系列谋杀，如对联邦首席检察官西格弗里德·布巴克 (Siegfried Buback) 及其司机的谋杀，对德莱斯德纳尔银行董事会主席于尔根·彭托 (Jürgen Ponto) 的谋杀，对德国工业联合会会长汉斯—马丁·施赖耶尔 (Hans-Martin Schleyer) 的保镖的谋杀，而汉斯—马丁·施赖耶尔本人遭绑架并于 10 月 16 日被杀害。<sup>[2]</sup> 在同一个月，巴登—符腾堡州总理汉斯·菲尔宾格 (Hans Filbinger) 在庆祝图宾根大学 500 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说

时，以及黑森州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Dregger)在ARD电视台向全德播放的巴伐利亚州电视节目上，都说法兰克福学派是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恐怖主义以及要求对其根源进行政治和学术分析的要求，成为了对所谓恐怖主义同情者、对批判社会的那些人、谈论社会主义的那些人进行诽谤的借口。保守的学院派，以及那些转向保守的学者，感到已经到了对左派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进行清算的时候了。

君特·罗尔默泽尔(Günther Rohrmoser)是受雇于菲尔宾格的社会哲学家。他在“二战”后期担任过海军军事法庭的法官，有一次枉断死刑的经历，但直到1970年还为此辩护，说那时的法律和今天的法律一样公正。他在1970年出版了《批判理论的贫困》<sup>[3]</sup>一书，此后他以不同的方式不断散播如下观点：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是恐怖主义分子在思想上的养父，他们用文化革命摧毁西方基督教传统。恩斯特·托比什(Ernst Topitsch)和库尔特·宋特海默(Kurt Sontheimer)这样的学者们则把自己看作教育者和自由民主派，他们也延续着罗尔默泽尔的思路。1972年，这位在格拉茨任哲学教授的批判理性主义者托比什指出，在“理性讨论”和“非支配性对话”的口号掩盖之下，“某种前所未有的、甚至在纳粹专制压迫下也未曾有过的带有明显政治信念的恐怖主义”<sup>[4]</sup>已经在大学里逐渐确立了。在1960年代以《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sup>[5]</sup>这本研究著作而引人注目的宋特海默在1970年代宣称，左派革命理论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并认为联邦共和国受到左翼思想的威胁，与魏玛共和国受反民主的右派思想威胁在方式上完全相同。<sup>[6]</sup>罗尔默泽尔的一名学生，现任科隆大学教育学教授的亨宁·君特(Henning Günther)与几个人合写了一个粗糙的小册子，标题是《否定的暴力：批判理论及其后果》，此书让自己俨然成为一种学术分析，<sup>[7]</sup>表达了一种被教授们和政客们广泛接受的观点。就像联邦共和国重建的第一阶段那样，在这个第二阶段，有许多措施被采用来打击形形色色的违宪反对派，这些措施同样以难以察觉的方式被扩展成反对合法反对派的种种手段。保守的反民主派把所有改革的努力都诋毁为

对“根本的自由民主秩序”的背离，他们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包括维纳尔·迈霍夫（Werner Maihofer）在内的力主“军事民主”和强力国家的“自由派”的支持。当时迈霍夫担任内政部长之职。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法兰克福市市长、基督教民主党人瓦尔特·瓦尔曼（Walter Wallmann）把西奥多·W.阿多诺奖金授予了哈贝马斯，瓦尔曼颁发此奖可以看作是试图抵消那种“公众敌意的公开表达”所产生的影响的尝试。此时，克劳斯·奥弗、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特别是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奥斯卡·耐格特，以及更为年轻的批判理论家们，都继续坚守着批判理论。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从来都不是对某个统一现象的描述，因此只要可以被视为批判理论组成部分的那些本质要素还在以与现时代同步的方式发展着，就不存在批判理论的衰落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三者的不可分性说明，1930年代以来，在德语国家，理论上丰富多产的左派思想中心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社会研究所，而诸如恩斯特·布洛赫、君特·安德斯、乌尔利希·索纳曼（Ulrich Sonnemann）这些单打独斗的理论家们则可以被视为与这个中心有着一定的关系。界定法兰克福学派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这个称呼去特指老批判理论的那个时期，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乃是老批判理论的某种机构性象征。相反，批判理论则应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它有别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社会研究所这个中心，它应指某种思维方式，即坚决废除支配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其他学说广泛联系的思维方式。从阿多诺反体系思想和随笔文体到霍克海默的跨学科社会理论研究计划，无不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

自1970年代以来，这两极特征便由哈贝马斯和耐格特两人以给人印象至深并独具原创性的方式体现着。哈贝马斯在慕尼黑附近（慕尼黑大学拒不授予他荣誉教授称号）的施塔恩贝格设立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和技术世界生存状况研究所试图再一次严肃认真地开始跨学科社会理论的研究计划。当他十年之后返回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教授的时候，他认为这项计划已经失败了。不管怎么说，他发表了《交往行为

理论》。<sup>[8]</sup> 这本书旨在为这两卷书的结尾勾勒的那个计划和一种合乎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规范基础和基本的概念框架，而这项跨学科的研究计划旨在寻找可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已经在以下两种必然要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原创的、倾向于交流的生活世界结构——之间造成了严重冲突。而在与作家兼电影导演亚历山大·克吕格（Alexander Kluge）的合作中，耐格特则试图从组织理论和“无产阶级”抵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哲学出发，让阿多诺的微观逻辑分析及其对非同一性——受压抑的和未被记录的事物——的怀疑主义认识论能够奏效。耐格特和克吕格将他们合著的《公共领域和经验》题献给阿多诺并于1972年出版，其中包括对以歪曲的、剥夺性的形式组织社会经验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分析，也包括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共同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目标就是协调的人类感性”。<sup>[9]</sup> 在《历史与新异》（1981）一书中，耐格特致力于对资本的对立面——现存劳动力的历史——进行分析。<sup>[10]</sup> 他对个体劳动能力历史的分析同时也是在尝试“创造抗衡微观权力物理学的东西”<sup>[11]</sup>，福柯对那种东西已有详细论述。

这本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之历史的书所能接近的道路在这里便告终止了。更多有关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材料，可参阅威廉·冯·赖金（Willem van Reijen）的《作为批判的哲学》。<sup>[12]</sup> 于尔根·哈贝马斯1984年12月在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举办的讨论会上所作的题为“法兰克福学派受容史三论”的演讲，全面地概括了法兰克福学派被接受的情况及其影响。<sup>[13]</sup> 尽管批判理论从来都是具有很强的容纳性并愿意融合外在的影响；尽管它所产生的而且直到目前仍在产生着的激励因素在其发展的各个形态和阶段中呈现出非常多样化的状态；尽管理论与社会科学界及哲学界之间的许多边界现在已经变得相当模糊，社会科学界和哲学界因而也呈现出较以往丰富得多的多样性——但是，批判理论仍然具有一副可以辨认的面孔，哈贝马斯和耐格特这样的“哲学家们”就是它的代表，他们有非教条的却坚定的思想方法，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观点。

## 注释：

[1] 此禁令名为“Radikalenerlass”，即“对激进公务员的雇佣禁令”。由于在德国教师是公务员，所以这条针对公务员中“激进主义者”的禁令意味着，有激进观点的学生将被禁止进入学校担任教职。参看 Dennis L. Bark and David R. Gress, *A History of West Germany* (Oxford, 1989), vol. 2: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1963–1988*, p. 250.

[2] 施赖耶尔是德国雇主联盟 (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ände, BDA) 的主席，也是德国工业联合会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的会长。

[3] Günther Rohmoser, *Das Elend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eiburg im Breisgau, 1970) .

[4] Ernst Topitsch, ‘Die Neue Linke-Anspruch und Realität’, in Willy Hochkeppel (ed.), *Die Rolle der Neuen Linken in der Kulturindustrie* (Munich, 1972), p. 34.

[5] Kurt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 (1960; Munich, 1978) .

[6] Kurt Sontheimer, *Das Elend unserer Intellektuellen. Linke Theor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mburg, 1976) .

[7] H. Günther, C. Willeke and R. Willeke, *Die Gewalt der Verneinung. Die Kritische Theorie und ihre Folgen* (Stuttgart, 1978) .

[8]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Thomas McCarthy (Cambridge, Mass., 1984–9) .

[9] [Oskar Negt and Alexander Kluge, *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 Zur Organisationsanalyse von bürgerlichen und proletarischen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1972), p. 486. ]

[10] [Oskar Negt and Alexander Kluge, *Geschichte und Eigensinn* (Frankfurt am Main, 1981) . ]

[11] Alexander Kluge, in ‘Die Geschichte der lebendigen Arbeitskraft. Diskussion mit Oskar Negt und Alexander Kluge’,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June 1982), p. 102.

[12] Willem van Reijen, *Philosophie als Kritik. Einführung in die kritische Theorie* (Königstein, 1984).

[13] [Jürgen Habermas, ‘Drei Thes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n Axel Honneth and Albrecht Wellmer (eds), *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Folgen. Referate eines Symposiums der 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 vom 10.–15. Dezember 1984 in Ludwigsburg* (Berlin, 1986) pp. 8–12. ]

# 参考文献

## 缩写

MHA 马克思·霍克海默档案

SPSS 《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ZfS 《社会研究学刊》

## 档案和征引文献目录

### I. 档案：

社会研究所在各类小册子、备忘录、报告和信函中的计划书

文件

通信

社会研究所研究报告

II. 研究所出版物，研究所最重要的合作者的出版作品，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版物

III. 二手材料

IV. 有关背景的著作以及构成背景的组成部分的著作

## I. 档案

社会研究所在各类小册子、备忘录、报告和信函中的计划书（只收入较长和较为重要的文本，按时间顺序排列）

*Denkschrift über die Begründung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5pp. Enclosure with letter from Felix Weil to Kuratorium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22 September 1922 (MHA; IX 50a. 2; extract printed in the following pamphlet).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forschung (ed.). *Institute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1925. 29pp. (University Library, Frankfurt am Main).

Felix Weil/Gesellschaft für Sozialforschung to 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Volksbildung, 1 November 1929 (letter). 31pp. (MHA; IX 51a. 1b).

Friedrich Pollock. '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In *Forschungsinstitute*. 2 vols. Ed. Ludolph Brauer,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Adolf Mayar and Johannes Lemcke. Hamburg; Hartung, 1930. Vol. 2, pp. 347-54.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 d.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5 pp. (probably 1931) (MHA; IX 5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Branc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 Short Description of its History and Aims*. New York, 1934. 15 pp. (MHA; IX 51a. 2).

*Dr Horkheimer's Paper Delivered on the Occasion of an Institute Luncheon given to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on Jan. 12<sup>th</sup>, 1937*. 12 pp. (MHA; IX 53. 3).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port on its History, Aims and Activities, 1933-1938*. New York, 1938. 36 pp. (MHA; IX 51a. 4).

*Institutsvortrag 1938*. Repr. under the title 'Idee, Aketivität und Programm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2, pp. 135-64.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Supplementary Memorandum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stitute from 1939 to 1941, supplemented to December, 1942*. 5 pp. (MHA; IX 60b).

*Statement of Prof. Dr Max Horkheimer, Research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on June 9, 1943. Re.: Certain Charges made agains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6 pp. (MHA; IX 63).

Institut of Social Research. *Ten Years on Morningside Heights; A Report on the Institute's History, 1934 to 1944*. 36 pp. (MHA: IX 65. 1).

*Memorandum über 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M.* November 1950 (MHA: IX 70).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J. W.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Ein Bericht über die Feier seiner Wiedereröffnung,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e Arbeiten*. Frankfurt am Main, 1952 (MHA).

*Memorandum über Arbeiten und die Organisatio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Mai 1953* (MHA: IX 77).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M.* 1958 (Library,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M.* 1978 (Library,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有关研究所活动及计划和研究所成员及合作者的更进一步的信息见于：其他论文和报告；社会研究国际协会和社会研究协会活动年度报告；霍克海默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M. 巴特勒的报告；霍克海默提交给库尔特·格拉赫纪念基金董事会的报告，等等)

#### 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办公室所藏社会研究所档案文件

(参看我在致谢中的说明)

Kuratoriumsakten 3/30-17;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See also the list of individual documents in Ulrike Migdal,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1, pp. 130-3.)

#### 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城市档案馆 (Stadtarchiv) 所藏社会研究所文件

*In the Magistratsakten, 1. Ablieferung:*

S 1694 Gründung des Vereins/Instituts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1922-6.

U 1178 Erwerb eines Grundstücks [Land purchase], 1922-6.

*In the Magistratsakten, 2. Ablieferung:*

6603/10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3 ff.

6610 Bd. 1 Lehrkräfte der Universität/Rektoratsübergabe (Horkheimer) [University teaching

staff/Appointment of rector (Horkheimer) ], 1951–2.

In the files of Dept 3 of the City Archives:

Kulturamt 498 B175; Da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1922 ff. ).

Stadtkämmerei 251 Wiederaufbaudarlehen [Reconstruction Loan], 1949–61.

Stiftungsabteilung 73 McCloy-Spende [McCloy Grant], 1950 ff.

####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前哲学系所藏档案文件

Theodor Adorno file, 1924–68.

Habilitation file for Walter Benjamin (published in Burkhardt Lindner, 'Habitationsakte Benjamin', *Lili.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53/54 [1984] ).

Max Horkheimer file, 1922–65.

#### 重要通信及具重要性的私人信件

Max Horkheimer to Theodor W. Adorno, 1927–69 (MHA; VI 1-VI 5).

Max Horkheimer to Walter Benjamin, 1934–40 (MHA; VI 5. 152–366, VI 5a).

Max Horkheimer to Juliette Favez, 1934–40 (MHA; VI 7-VI 8).

Max Horkheimer to Erich Fromm, 1934–46 (MHA; VI 8-VI 9).

Max Horkheimer to Henryk Grossmann, 1934–43 (MHA; VI 9. 220–409).

Max Horkheimer to Rose Riekher, later Maidon Horkheimer, 1915–67 (MHA; XVIII 1-XVIII 3).

Max Horkheimer to Marie Jahoda, 1935–49 (MHA; VI 11. 216–86).

Max Horkheimer to Otto Kirchheimer, 1937–47 (MHA; VI 11).

Max Horkheimer to Paul F. Lazarsfeld, 1935–71 (MHA; I 16, II 10, V 111).

Max Horkheimer to Leo Lowenthal, 1933–55 (MHA; VI 11-VI 25).

Max Horkheimer to Herbert Marcuse, 1935–73 (MHA; VI 27. 377–402, VI 27a. 1–293, VI 118).

Max Horkheimer to Franz Neumann, 1934–54 (MHA; V 128. 230–68, VI 30).

Max Horkheimer to Friedrich Pollock, 1911–57 (MHA; VI 30-VI 38a).

Max Horkheimer to Felix Weil, 1934–49 (MHA; I 26. 148–313, II 15. 1–200).

Max Horkheimer to 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Volksbildung, Geneva, 21 April 1933 (MHA; I 6. 41–2).

Max Horkheimer to Paul Tillich, Pacific Palisades, 12 August 1942 (MHA; IX 15. 3).

Theodor W. Adorno to Siegfried Kracauer, 1925--65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 am Neckar).

Theodor W. Adorno to 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 1933--8.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filed under: 'Philosophy *Wiesengrund*' as part of the Papers of the 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 now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London).

Theodor W. Adorno to Paul F. Lazarsfeld (the letters referred to are filed as part of the Horkheimer-Adorno correspondence).

Theodor W. Adorno to Mr David, New York, 3 July 1941 (MHA; VI 1b. 81 ff. ).

### 社会研究所研究报告

*Studies in Anti-Semitism; A Report on the Cooperative Project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for the Year ending March 15, 1944.*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August 1944 (MHA; 121a).

*Anti-Semitism among Labor; Report on a Research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44--1945.*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4 vols (MHA).

*Die Wirksamkeit ausländischer Rundfunksendungen in Westdeutschland.*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2. (This an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reports from the newly founded Institute a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Umfrage unter Frankfurter Studenten im WS 1951/52.*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2.

*Gruppenexperimente über Integrationsphänomene in Zwangssituationen.*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3.

*Universität und Gesellschaft I-Studentenbefragung.*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3.

'Universität und Gesellschaft II- Professorenbefragung'. In *Probleme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Ed. Hans Anger. Tübingen; Mohr, 1960.

*Universität und Gesellschaft III-Expertenbefragung.*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3. Abstract in Ulrich Gembardt, 'Akademische Ausbildung und Beruf',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11;2 (1959).

*Image de la France. Un sondage de l'opinion publique allemande.*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3 vols. 1954.

*Die subjektiven und objektiven Abkehrgründe bei sieben Zechen des westdeutschen Steinkohlenbergbaus.*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5.

- Zum politischen Bewusstsein ehemaliger Kriegsgefangener.*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7.
- Aufnahme der ersten Belegschaftsaktien der Mannesmann AG.*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7.
- Mechanisierungsgrad und Entlohnungsform.*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58.
- Entwicklung eines Interessenverbandes.* Research report, typescript. 1959. (Published as a Frankfurt philosophy dissertation by Manfred Teschner, 1961.)
- Grenzen des Lohnanreizes.*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2 vols. 1962.
- Zum Verhältnis von Aufstiegshoffnung und Bildungsinteresse.*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62. (Published as vol. 4 of the 'Schriftenreihe des Landesverbandes der Volkshochschulen von Nordrhein-Westfalen', 1965)
- Totalitäre 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Presse.*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66.
- Nichtwähler in Frankfurt am Main.* In E. Mayer, 'Die Wahl zur Stadtverordnetenversammlung am 25. Oktober 1964 in Frankfurt am Main. Wähler und Nichtwähler', *Statistische Monatsberichte* (Frankfurt am Main), 28 (1966), Sonderheft 19.
- Angestellte und Streik.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Einstellungen organisierter Angestellter zum Dunlop-Streik.*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68.
- Kritische Analyse von Schulbüchern. Zur Darstellung der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sländer und ihrer Positionen i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Hectographed research report. 1970.

#### 被提及或多次使用过的其他档案材料

- T. W. Adorno. Critique of *Die totalitäre Propaganda Deutschlands und Italiens*, pp. 1–10 by Siegfried Kracauer (MHA; VI 1. 317–20).
- T. W. Adorno. *Zur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New York, 1941. 93 pp. (Theodor W. Adorno Archive; Ts 1301 ff. ).
- T. W. Adorno. *Notes by Dr Adorno on Mrs Frenkel-Brunswick's Article on the Antisemitic Personality.* August 1944. Enclosure with letter from Adorno to Horkheimer, 25 August 1944 (MHA; VI 1b. 213 ff. ).
- T. W. Adorno. *What National Socialism Has Done to the Arts.* 1945. 22 pp. (Part of the Institute's lecture series of 'The Aftermath of National Socialism'. ) (MHA; XIII 33).
- T. W. Adorno. *Remarks o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by Adorno, Frenkel-Brunswick, Levinson, Sanford.* 1948. 30 pp. (MHA; VI 1d. 71–100).
-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Progress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Department.* 22 June 1945. 27

pp. (MHA; IX 66).

*Approach and Techniques of the Berkeley Group*. 1943 (MHA; VI 34. 37–43).

*Draft Letter to President Hutchins*. (Probably October or November 1940. ) (MHA; VI 1a. 2).

M. Horkeimer and F. Pollock . *Materialien zur Neuformulierung von Grundsätzen*. New York, August 1935. 6 pp. (MHA; XXIV 97).

M. Horkeimer and (?) T. W. Adorno. *Memorandum über Teile des Los Angeles Arbeitsprogramms, die von den Philosophen nicht durchgeführt werden können*. 1942 (MHA; VI 32. 1 ff. ).

P. F. Lazarsfeld.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Draft of Program*. (Apparently 1938. ) (MHA; I 16. 153–66).

H. Marcuse. *Paper of February 1947* (MHA; VI 27a. 245–67).

*Minutes of Adorno's Seminar on Walter Benjamin's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Summer semester 1932. (Courtesy of Kurt Mautz. )

F. Pollock. *Rapport Annuel sur le Bilan et le Compte de Recettes et Dépenses de 1937, présenté à la 6<sup>ème</sup> Assemblée Générale Ordinaire du 9 avril 1938*. 32 pp. (MHA; IX 277. 7).

F. Pollock. *Memorandum for P. T. on Certain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43 (MHA; IX 258).

F. Pollock. *Prejudice and the Social Classes*. 1945. 33 pp. (MHA; IX 36a. 1).

Sample (for a letter to donors). June 1951 (MHA; IX 75).

F. Weil. *Zur Entsteh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Based on a lecture given by Felix Weil on 14 May 1973 in Frankfurt am Main, put at my disposal during a seminar of the Catholic Students' Association, Frankfurt am Main, by Wolfgang Kraushaar. )

*Studentenakte Felix José Weil* (Archives of Tübingen University, 258/20281 a). (For information on this file, I am grateful to Helmut R. Eisenbach. )

## II 研究所出版物，研究所最重要的合作者的出版作品，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版物

### 社会研究所出版物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丛书

- 1 Henryk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Hirschfeld, 1929.
  - 2 Friedrich Pollock.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 Leipzig: Hirschfeld, 1929.
  - 3 Karl August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s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einer grossen asiatischen Agrargesellschaft. Vol. 1; Produktivkräfte, Produktions- und Zirkulationsprozess*. Leipzig: Hirschfeld, 1931.
  - 4 Franz Borkenau. *Der Ü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ürgerlichen Weltbil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r Manufakturperiode*. Paris: Alcan, 1934.
  - 5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Paris: Alcan, 1936.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Leipzig: Hirschfeld, 1932. Paris: Alcan, 1933–5. New York: Alcan, 1936–9.
-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40–1.

“Public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Morningside Heights, New York City” 丛书

- Georg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 Mirra Komarovsky. *The Unemployed Man and his Family; the Effect of Unemployment upon the Status of the Man in Fifty-Nine Families*. Introduction by Paul F. Lazarsfeld.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40.
- Mimeographed volumes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New York, 1942.
-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New York, 1944.

社会研究所主持出版的出版物

Felix José Weil. *Argentine Riddle*. New York: Day, 1944.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丛书

1 *Sociologica I.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5. 2nd edn, 1974 (Basis Studienausgabe).

2 *Gruppenexperiment. Ein Studienbericht*, ed. Friedrich Pollock, introd. Franz Böhm.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5. 2nd edn, 1963.

3 *Betriebsklima. Eine industrie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aus dem Ruhrgebiet*, ed. Ludwig von Friedeburg.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5.

4 *Soziologische Exkurse. Nach Vorträgen und Diskussionen*.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6. (Cited from 5th edn, 1972 [Basis Studienausgabe] .)

5 Friedrich Pollock. *Automation. Materialien zur Beurteilung der ökonomischen und sozialen Folgen*.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6. 7th edn, 1966.

6 *Freud in der Gegenwart. Materialien zur Beurteilung der Universitäten Frankfurt und Heidelberg zum hundertsten Geburtstag*.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7.

7 Georges Friedmann. *Grenzen der Arbeitsteilung*, trans. Burkart Lutz.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9. [French original; *Le Travail en Miettes*.]

8 Paul W. Massing. *Vo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ed. and trans. Felix J. Weil.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9. [German translation of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Harper, 1949).]

9 Werner Mangold. *Gegenstand und Methode des Gruppendiskussionsverfahrens*.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0.

10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Sociologica II. Reden und Vorträge*. Frankfurt;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3rd edn, 1973 (Basis Studienausgabe).

11 Alfred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Cited from 3rd rev. edn, 1971 [Basis Studienausgabe] .)

12 Peter von Haselberg. *Funktionalismus und Irrationalität. Studien über Thorstein Veblens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13 Ludwig von Friedeburg. *Soziologie des Betriebsklimas. Studien zur Deutung empirischer Untersuchungen in industriellen Grossbetrieben*.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Cited from 2nd edn, 1966. )

- 14 Oskar Negt. *Struktur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Gesellschaftslehren Comtes und Hegels*.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4. 2nd edn, 1974.
- 15 Helge Pross. *Manger und Aktionäre in Deutschland. Untersuchungen zum Verhältnis von Eigentum und Verfügungsmacht*.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5.
- 16 Rolf Tiedemann.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Walter Benjamins*, introd.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5.
- 17 Heribert Adam. *Studentenschaft und Hochschule.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studentischer Politik*.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5.
- 18 Adalbert Rang. *Der politische Pestalozzi*.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 19 Regina Schmidt and Egon Becker. *Reaktionen auf politische Vorgänge. Drei Meinungsstudien aus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 20 Joachim E. Bergmann. *Die Theorie des sozialen Systems von Talcott Parsons. Eine kritische Analyse*.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 21 Manfred Teschne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im Unterricht. Eine soziologische Analyse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an hessischen Gymnasien*.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8.
- 22 Michaela von Freyhold. *Autor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Apathie. Analyse einer Skala zur Ermittlung autoritätsgebundener Verhaltensweisen*.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特辑

- 1 Ludwig von Friedeburg and Friedrich Weltz. *Altersbild und Altersvorsorge der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n*.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8.
- 2 Manfred Teschner. *Zum Verhältnis von Betriebsklima und Arbeitsorganisation. Eine betriebssoziologische Studie*.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1.
- 3 Peter Schönbach. *Reaktionen auf die antisemitische Welle im Winter 1959/60*.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1.

研究所其他出版物

Max Horkheimer (ed.).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社会研究所发起或进行的研究成果出版物

Max Horkheimer and Samuel H. Flowerman (general eds). *Studies in Prejudice*. New York; Harper, 1949–50.

T. W.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R. Nevitt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0.

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of Veterans*. New York: Harper, 1950.

Nathan W. Acherman and Marie Jahoda.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0.

Paul W. 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Harper, 1949. (The German translation, *Vo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appeared as vol. 8 of the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series.)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n. *Prophets of Deceit; A Study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American Agitator*. New York: Harper, 1949.

Jürgen Habermas, Ludwig von Friedeburg, Christoph Oehler and Friedrich Weltz. *Student und Politik.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m politischen Bewusstsein Frankfurter Studenten*. Neuwied; Luchterhand, 1961.

## 西奥多·W.阿多诺

### 相关文献

Schultz, Klaus. 'Vorläufige 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Th. W. Adornos'. In H. Schweppenhäuser (ed.), *Theodor W. Adorno zum Gedächtnis. Eine Samml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1, pp. 177–239.

Pettazzi, Carlo. 'Kommentierte Bibliographie zu Th. W. Adorno'. In H. L. Arnold (ed.), *Theodor W. Adorno, Text + Kritik*, special issue, Munich: Edition Text und Kritik, 1977, pp. 176–91.

Lang, Peter Christian. 'Kommentierte Auswahlbibliographie 1969–1979'. In Burkhardt Lindner and W. Martin Lüdke (eds), *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Th. W. Adornos. Konstruktio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pp. 509–56.

Goertzen, René. 'Theodor W. Adorno. Vorläufige Bibliographie seiner Schriften und der Sekundärliteratur'. In Ludwig von Friedeburg and Jürgen Habermas (eds), *Adorno-Konferenz 198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3, pp. 404–71.

### 论著 (专著)

1933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Ästhetischen*. Beiträge zu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

- te, 2. Tübingen; Mohr. (Cited from the 1974 edn,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7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2, repr. 1974). )
- 1947 (with Max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Querido.
- 1949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Tübingen; Mohr. (Cited from the 1958 edn,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
- 1950 (with Else Frenkel-Brunswic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1951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Berlin; Suhrkamp.
- 1952 *Versuch über Wagner*. Berlin; Suhrkamp. (Cited from the 1964 den, Munich; Droemersch Verlagsanstalt Knauer. )
- 1955 *Prismen. Kulturitik und Gesellschaft*. Berlin; Suhrkamp.
- 1956 *Disson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Kleine Vandenhoeck-Reihe, 28/29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 1956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dien über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n Antinomien*. Stuttgart; Kohlhammer.
- 1957 *Noten zur Literatur I*. Bibliothek Suhrkamp, 47. Berlin; Suhrkamp.
- 1959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 Klangfiguren*. Berlin; Suhrkamp.
- 1960 *Mahler. Eine musikalische Phzsiognom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1 *Noten zur Literatur II*. Bibliothek Suhrkamp, 7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2 *Einleitung in die Musiksoziologie. Zwölf theoretische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2 (with Max Horkheimer) *Sociologica II. Reden und Vorträge*.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0.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 1963 *Drei Studien zu Heg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3 *Eingriffe. Neun kritische Modelle*. Edition Suhrkamp, 1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3 *Der getreue Korrepetitor. Lehrschriften zur musikalischen Praxi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3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I. Quasi una fantasia*.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4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Zur deutschen Ideologie*. Edition Suhrkamp, 9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5 *Noten zur Literatur III*. Biliothek Suhrkamp, 146.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6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7 *Ohne Leitbild. Parva Aesthetica*. Edition Suhrkamp, 20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8 *Impromptus. Zweite Folge neu gedruckter musikalischer Aufsätze*. Edition Suhrkamp, 267.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8 *Berg. Der Meister des kleinsten Übergangs*. Österreichische Komponisten des 20. Jahrhunderts, 15. Vienna; Lafite, Österreichischer Bundesverlag.
- 1969 *Sitichworte. Kritische Modelle 2*. Edition Suhrkamp, 347.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9 (with Hans Albert, Ralf Dahrendorf, Jürgen Habermas, Harald Pilot and Karl R. Popper)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Neuwied; Luchterhand.
- 1970 *Ästhetische Theorie*, ed.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0 *Aufsätze zur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Method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0 *Erziehung zur Mündigkeit. Vorträge und Gespräche mita Hellmut Becker 1959–1969*, ed. Gerd Kadelbach. Suhrkamp-Taschenbuch, 1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0 *Vorlesungen zur Ästhetik. Gehalten in Frankfurt. Oktober-Dezember 1967*, ed. V. C. Subik. Vienna; Gruppe Hundsblume.
- 1970 *Über Walter Benjamin*, ed. R. Tiedemann. Bibliothek Suhrkamp, 26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1 *Kritik. Kleine Schriften zur Gesellschaft*, ed. R. Tiedemann. Edition Suhrkamp, 469.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2 *Vorlesung zur Einleitung in die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Junius-Drucke. (Transcript of recordings made during a lecture course held in the winter semester of 1957–8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 1973 *Vorlesung zur Einleitung in die Sozi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Junius-Durcke. (Transcript of recordings made during a lecture course held in the summer semester of 1968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 1973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 vol. 1; Zur Einleitung, ed. Rudolf zur Lipp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Transcript of recordings made during a lecture course held in the summer semester of 1962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 1973 *Studien zum autoritären Charakter*, trans. Milli Weinbrenn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A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consisting of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and, almost complete, the chapters written or co-written by Adorno, together with 'Die psychologische Technik in Martin Luther Thomas's Rundfunkreden'.)

1974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 vol. 2, ed. Rudolf zur Lipp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Transcript of recordings made during a lecture course held in the summer semester of 1962–3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1974 *Noten zur Literatur IV*. Biliothek Suhrkamp. 39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ZfS 和 SPSS 中的论文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ZfS, 1 (1932), 103–24; ZfS, 1, no. 3 (1932), 356–78.

'Über Jazz'. [Pseud.; Hektor Rottweiler.] ZfS, 5, no. 2 (1936), 235–59.

'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rens'. ZfS, 7, no. 3 (1938), 321–56.

'Fragmente über Wagner'. ZfS, 8, no. 1/2 (1939), 1–49.

'On Kierkegaard's Doctrine of Love'. SPSS, 8 (1939–40), 413–29.

'On Popular Music'.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rge Simpson.) SPSS, 9, no. 1 (1941), 17–48.

'Spengler Today'. SPSS, 9, no. 2 (1941), 305–25.

'Veblen's Attack on Culture'. SPSS, 9, no. 3 (1941), 389–413.

### 文集和以前未出版材料的版本

(a)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20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86. (Contains everything published by Adorno himself, and completed works that remained unpublished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1 *Philosophische Frühschriften*. 1973.

2 *Kierkegaard*. 1979.

3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81.

4 *Minima Moralia*. 1980.

5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Drei Studien zu Hegel*. 1970.

6 *Negative Dialektik,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1973.

7 *Ästhetische Theorie*. 1970.

8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 1972.

9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I. Erste Hälfte*. 1975.

10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I. Zweite Hälfte*. 1975.

10.1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 Prismen, Ohne Leitbild*. 1977.

10.2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I; Eingriffe, Neun kritische Modelle*,

Stichworte, Kritische Modelle 2, Kritische Modelle 3. 1977.

- 11 *Noten zur Literatur*. 1974.
- 12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1975.
- 13 *Die musikalischen Monographien; Versuch über Wagner, Mahler, Berg*. 1971.
- 14 *Disonanzen, Einleitung in die Musiksoziologie*. 1973.
- 15 *Komposition für den Film, Der getreue Korrepetitor*. 1976.
- 16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III; Klangfiguren.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 Quasiuna fantasia.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I,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II*. 1978.
- 17 *Musikalische Schriften IV; Moments musicaux, Impromptus*. 1982.
- 18 *Musikalische Schriften V*. 1984.
- 19 *Musikalische Schriften VI*. 1984.
- 20 *Vermischte Schriften*. 1986.

(b) Publications of the Theodor W. Adorno Archive

The Adorno Archive plans to publish, in some twenty volumes, the fragments, lectures, philosophical diaries and letters that form Adorno's unpublished posthumous papers.

#### 讨论打印稿

Horkheimer, Max.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2.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73-1949*, ed. Gunzelin Schmid Noerr.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5, pp. 349-605. (Transcripts of discussions, mostly between Horkheimer and Adorno.)

Eturas fehlt... Über die Widersprüche der utopischen, Schnsucht. Ein Gespräch mit Theodor W. Adorno, 1964 In: Rainer Traub/Harald Wieser (eds.), *Gespräche mit Ernst Bloch*. Frankfurt an Main; Suhrkamp, 1975.

Adorno, Theodor W. and Gehlen, Arnold. 'Ist die Soziologie ein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Ein Streitgespräch (1965)'. In Friedemann Grenz, *Adornos Philosophie in Grundbegriffen; Auflösung einiger Deutungsproblem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4.

#### 通信

'Offener Brief an Max Horkheimer'. In *Die Zeit*, 12 February 1965, p. 32. Benjamin, Walter. *Briefe*,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6.

Adorno, Theodor W. et al. *Über Walter Benjamin*, e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8, pp. 103-60; 'Aus Briefen Adornos an Benjamin'.

Adorno, Theodor W. and Krenek, Ernst. *Briefwechsel*, ed. Wolfgang Rog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4.

Löwenthal, Leo.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Ein autobiographisches Gespräch mit Helmut Dubi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The appendix contains three letters from Adorno.)

Löwenthal, Leo. *Schriften* 4, ed. Helmut Dubi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4, pp. 183–81; 'Briefwechsel Leo Lowenthal-Theodor W. Adorno'.

Bloch, Ernst. *Briefe 1903–1975*, ed. Karola Bloch et al.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pp. 407–56. (Letters from Bloch to Adorno, 1928–68.)

Der Schatz des Indianer-Joe. Singspiel nach Mark Twain, ed. R.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 作曲作品

*Kompositionen*, ed. Heinz-Klaus Metzger and Rainer Riehm. Munich; Edition Text und Kritik, 1980.

1 *Lieder für Singstimme und Klavier*.

2 *Kammermusik, Chöre, Orchestrales*.

#### 以英文出版的作品

*Aesthetic Theory*, trans. C. Lenhardt, ed.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henomenology and Mor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Against Epistemology: A Metacritique—Studies in Husserl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Antinomies*, trans. Willis Domingo. Oxford; Blackwell, 1982.

'Alienated Masterpiece; *Missa Solemnis*'. *Telos*, 28 (1976).

(with Leo Löwenthal and Paul W. Massing) 'Anti-Semitism and Fascist Propaganda'. In Ernst Simmel (ed.), *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6.

(with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0, repr. New York; Norton, 1969, abridged edn, New York; Norton, 1982.

'Commitment'. *New Left Review*, 87/88 (December 1974), 75–89. Trans. Francis McDonagh,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300–18.

(with Hanns Eisler) *Composing for the Fil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Actes du quatrieme congres mondial du sociologie*, Milan and Stresa, 8-15 Sept., 1959. *General Theme: Society and Sociological Knowledge*, vol. 1. Lond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59, pp. 33-56.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trans. Samuel Weber and Shierry Weber. In Paul Connor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19-34. (From Prisms.)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on'. *Telos*, 37 (Fall 1978), 97.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trans. Anson G. Rabinbach. *New German Critique*, 6 (1975), 12-19.

(with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London: Verso, 1979.

'The Essay as Form', trans. Bob Hullot-Kentor and Frederic Will. *New German Critique*, 32 (1984), 151-71.

'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in Listening'.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270-99.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3 (1951), 408-33.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118-37.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 *Quarterly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3 (1954), 213-35. Repr. as 'Television and the Patterns of Mass Culture', in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White (eds), *Mass Cultur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pp. 474-88.

'Husserl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37 (1940), 5-18.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Music*,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6.

'Is Marx Obsolete?' *Diogenes*, 64 (Winter 1968), 1-16.

*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 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 Wi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Letters to Walter Benjamin'. *New Left Review*, 81 (September-October 1973).

'Lyric Poetry and Society'. *Telos*, 20 (Summer 1974), 56-71.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1,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trans. Anne G. Mitchell and Wesley V. Bloomster. London: Sheed & Ward, 1973.

(with others)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trans. Glyn Adley and David Frisby. London: Heinemann, 1976.

*Prisms*, trans. Samuel Weber and Shierry Weber. London: Spearman, 1967.

'The Psychological Techique of Martin Luther Thomas' Radio Addresse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9, part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5.

'The Radio Symphony; an Experiment in Theory'. Radio Research 1941. New York: Harper, 1941, pp. 110-39.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5, pp. 378-9.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trans. Donald Fleming.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2 (1968), 338-70. Repr.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38-70.

*In Search of Wagner*,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A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Music'. *Kenyon Review*, 8 (1945), 208-17.

'Society'. *Salmagundi*, 11/12 (Fall-Winter, 1969-70), 144-53.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rans. Graham Bartram.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237-57. (From *Sociologica* II.)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New Left Review*, 46/47 (December 1967-January 1968), 79-90.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its Consciousness', trans.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452-65.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the Los Angeles Times Astrology Column-a Study in Secondary Superstition'.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2 (1957), 19-88. Repr. in *Telos*, 19 (Spring 1974), 13-90.

'"Static" and "Dynamic" as Sociological Categories'. *Diogenes*, 33 (Spring 1961), 28-49.

'Subject and Object', trans.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In Andre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497-511.

'Theses against Occultism'. *Telos*, 19 (Spring 1974), 7-12.

'Theses on the Sociology of Art'.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2 (1972), 121-8.

'Theses upon Art and Religion Today'. *Kenyon Review*, 7 (1945), 677–82.

'Transparencies on Film', trans. Thomas Y. Levin. *New German Critique*, 24/25 (1981–2), 199–205.

'Wagner, Nietzsche and Hitler'. *Kenyon Review*, 9 (1947), 155–62.

'Why Philosophy?', trans. Margaret D. Senft-Howie. In Walter Leifer (ed.), *Man and Philosophy*. German Opinion on Problems of Today, 4. Munich: Hueber, 1964, pp. 11–24.

## 瓦尔特·本雅明

### 相关文章

Tiedemann, Rolf. 'Bibliographie der Erstdrucke von Benjamins Schriften'. In Siegfried Unseld (ed.), *Zur Aktualität Walter Benjami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2, pp. 227–97.

Lindner, Burkhardt. 'Kommentierte Bibliographie (1950–1970) und Benjamin Bibliographie 1971–1978'. *Text + Kritik*, 31/32 (1979), 107–20 (special issue on Walter Benjamin).

Brodersen, Momme. Walter Benjamin. *Bibliografia critica generale (1913–1983)*. Aesthetica, pre-print no. 6. Palermo, 1984.

Witte, Bernd. *Walter Benjami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85, pp. 147–54.

### 专著 (本雅明生前发表的著作, 以及身后发表的部分作品)

1920 *Der Begriff der Kunstkritik in der deutschen Romantik*. Neue Berner Abhandlungen zur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5. Berne: Scholem. (Cited from the 1973 paperback edition.)

1923 (translator) Charles Baudelaire, *Tableaux parisiens*. *Deutsche Übertragung mit einem Vorwort über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von Walter Benjamin*. Drucke des Argonautenkreises, 5. Heidelberg: Weissbach.

1925 *Goethes Wahlverwandtschaften*. Munich, n. d. (Offprint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issues (April 1924 and January 1925) of series I (I. Folge) of the journal *Neue Deutsche Beiträge*.)

1928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Berlin: Rowohlt. (Cited from the 1963 edition published in Frankfurt am Main.)

1928 *Einbahnstrasse*. Berlin: Rowohlt.

1936 Detlef Holz (pseud.). *Deutsche Menschen. Eine Folge von Briefen*. Lucerne: Vita Nova.

1965 *Zur Kritik der Gewalt und andere Aufsätze. 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von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6 *Versuche über Brecht*, e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Cited from

the 5th, enlarged edition of 1978.)

1970 *Berliner Chronik*, ed.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2 *Über Haschisch. Novellistisches, Materialien*, ed. Tillman Rexrot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4 *Charles Baudelaire.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 Zwei Fragmente*, e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Moskauer Tagebuch*, ed. Gary Smit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ZfS 中的文章

‘Zum gegenwärtigen gesellschaftlichen Standort des französischen Schriftstellers’. *ZfS*, 3, no. 1 (1934), 54–78.

‘Probleme der Sprachsoziologie’. *ZfS*, 4, no. 2 (1935), 248–68.

‘L’Œuvre d’art à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on mécanisée’. *ZfS*, 5, no. 1 (1936), 40–68.

‘Eduard Fuchs, der Sammler und der Historiker’. *ZfS*, 6, no. 2 (1937), 346–81.

‘Üb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 *ZfS*, 8, no. 1/2 (1939), 50–91.

### 文集

*Schriften*, ed. Theodor W. Adorno and Gretel Adorno.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55

*Illuminationen.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d. Siegfried Unsel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1.

*Angelus Nov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6.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 *Abhandlungen*. 3 vols. 1974.

2 *Aufsätze, Essays, Vorträge*. 3 vols. 1972.

3 *Kritiken und Rezensionen*. 1972.

4 *Kleine Prosa, Baudelaire-Übertragungen*. 2 vols. 1972.

5 *Das Passagen-Werk*. 2 vols. 1982.

6 *Fragmen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1985.

7 *Nachträge*. 2 vols. 1989.

## 通信

*Briefe*,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6.

*Walter Benjamin-Gershom Scholem, Briefwechsel 1933-1940*, ed.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Bloch, Ernst. *Briefe 1903-1975*, ed. Karola Bloch et al.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pp. 649-68. (Letters from Bloch to Benjamin, 1934-7.)

本雅明与研究合作者的通信选本可见 *Passagen-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ed. Rolf Tiedemann, pp. 1081-1205 (‘Zeugniss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以及 *Gesammelte Schriften* 第一卷中为本雅明在 *ZfS* 上发表的文章所配的学究气的参考文献。

## 以英文出版的著作

‘The Author as Producer’, trans. Edmund Jephcott.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254-69.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arry Zohn and Quintin Hoar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Doctrine of the Similar’, trans. Knut Tarkowski. *New-German Critique*, 17 (1977), 65-9.

‘Eduard Fuchs: Collector and Historian’, trans. Knut Tarnowski, *New-German Critique*, 5 (1975), 27-58. Trans.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225-53. Trans. Kingsley Shorter, in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 349-86.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ed. and intro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Moscow Diary*, trans. Richard Sieburth, ed. Gary Smi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introd. George Stein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issent*, 17, no. 5 (1970).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ed. Peter Demetz. New York; Schocken, 1986.

'The Storyteller and Artisan Cultures'. Trans. Harry Zohn,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277–300. (From *Illuminations*.)

'Theories of German Fascism', trans. Jerolf Wikoff. *New German Critique*, 17 (1977), 120–8.

*Understanding Brecht*, trans. Anna Bostock, introd. Stanlidy Mitchel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 埃里希·弗洛姆

### 相关文献

Fromm, Erich. *Gesamtausgabe*, vol. 10. Stuttgart; Deutscher Verlags-Anstalt, 1981. (Contains a list of works, compiled by Rainer Funk.)

### 专著

1930 'Die Entwicklung des Christudogmas. Eine pszchoanalztische Studie zur sozialpszchologischen Funktion der Religion'. *Imago* (Vienna), 16 (1930), 305–73. (Cited from the reprint in *Das Christudogma und andere Essays*, trans. Carola Dietlmeier, Munich; Szczesny, 1965.)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Published in Britain as *The Fear of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2.]

1947 *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New York; Rinehart, 1947.

1950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The Forgotte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reams, Fairy Tales, and Myths*. New York; Rinehart.

1955 *The Dogma of Christ, and other Essays on Religio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55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Rinehart.

1956 *The Art of Loving*. New York; Harper.

1959 *Sigmund Freud's Mission*. New York; Harper.

1960 (with D. T. Suzuki and R. de Martino) *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1961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Ungar.

### 参考文献

- 1964 *The Heart of 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66 *You Shall Be as Gods; A Rad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its Tra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1968 *The Revolution of Hope*.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70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Essays on Freud, Marx, and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1970 (with Michael Maccoby) *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73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1976 *To Have or to Be?*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80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 am Vorabend des Dritten Reiches. Eine sozial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 ed. Wolfgang Boness.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发表于 *ZfS* 和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的文章

- ‘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ZfS*, 1, no. 1/2 (1932), 28–54.
-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 *ZfS*, 1, no. 3 (1932), 253–77.
-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utterrechtstheorie’. *ZfS*, 3, no. 2 (1934), 196–227.
-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 *ZfS*, 4, no. 3 (1935), 365–97.
- ‘Sozialpsychologischer Teil’.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5. Paris: Alcan, 1936.
- ‘Zum Gefühl der Ohnmacht’. *ZfS*, 6, no. 1 (1937), 95–118.

#### 文集

- Gesamtausgabe, ed. Raine Funk. 10 vols. Stuttgart: Deutscher Verlags-Anstalt, 1980–1.
- 1 *Analytische Sozialpsychologie*.
  - 2 *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 3 *Empir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Gesellschafts-Charakter*.
  - 4 *Gesellschaftstheorie*.
  - 5 *Politik und sozialistische Gesellschaftskritik*.

- 6 *Religion*.
- 7 *Aggressionstheorie*.
- 8 *Psychoanalyse*.
- 9 *Sozialistischer Humanismus und humanistische Ethik*.
- 10 *Register*.

#### 以英文发表的其他著作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2.

'A Counter-Rebuttal'. *Dissent*, 3, no. 1 (1956).

*On Disobedienc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1.

*Greatness and Limitations of Freud's Thought*. London: Cape, 1980.

'The Human Implications of Instinctive "Radicalism" '. *Dissent*, 2, no. 4 (Autumn 1955).  
*May Man Prevail?*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The Method and Function of an Analytic Social Psychology; Notes o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rans.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447-96.

(ed.)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5; London: Allen Lane, 1967.

*The Working Class in Weimar Germany: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trans. Barbara Weinberger, ed. Wolfgang Boness. Leamington Spa: Berg, 1984.

#### 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的作品

1911 *Dänemarks Stellung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Handelsbeziehungen zu Deutschland, England und Skandinavien*.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 3. Kiel: Academia Christiana Albertina.

1913 *Die Bedeutung des Arbeiterimmenschutzes. Eine Studie an der Entwicklung der englischen Fabrikgesetze*. Habilitation thesis. Jena: Fischer.

1913 *Theorie und Praxis des Syndikalismus*. Munich: Duncker and Humblot.

1913 'Der Syndikalismus in England'. *Der Staatsbürger*, 4, no. 1.

1918 *Die Frau und das Genossenschaftswesen. Erweiterter Vortrag*. Jena: Fischer.

1920 Allgemeine Gutachten IV. In Ignaz Jastrow (ed.), *Die Reform d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n. Fünfzig Gutachte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60. Munich:

Duncker and Humbolt, pp. 75–95.

## 海因里克·格罗斯曼

### 相关文献

Rosenbaum, Wolf. 'Bibliographie'. In Henryk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e Kritik, 1967, pp. 18–23.

### 专著

1914 *Österreichs Handelspolitik mit Bezug auf Galizien in der Reformperiode 1772–1790*. Studien zur Sozial-, Wirtschafts- und Verwaltungsgeschichte, 10. Vienna: Konegen.

1929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1. Leipzig: Hirschfeld.

1969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Afterword by Paul Mattick.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 ZfS 上的文章

'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enproblem'. *ZfS*, 1, no. 1/2 (1932), 55–84.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mechanistischen Philosophie und die Manufaktur'. *ZfS*, 4, no. 2 (1935), 161–231.

### 通信

Some letters in: Grossmann,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

## 卡尔·格吕恩堡

### 相关文献

Neuning, Günther. 'Anhang 3 (Schriften Carl Grünbergs)' and 'Anhang 4 (Herausgebertätigkeit Carl Grünbergs) zur Biographie'. In *Indesband zum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Grünbergs Archiv)*, Graz, Austria: Akademische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 1973.

## 著作选目

- 1888 'Jean Meslier und sein Testament. Ein Beitrag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Sozialismus'. *Neue Zeit* (Stuttgart), 6, 337–50.
- 1891 'Einige Beiträge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Sozialismus; I. Francois Bois sel'.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n Staats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no. 2, 7–252.
- 1894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ie Auflösung des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 2 vol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 1898 'Anarchismus';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In Ludwig Elster (ed.), *Wörterbuch der Volkswirtschaft*, Jena; Fischer, vol. 1, pp. 66–71; vol. 2, pp. 527–76.
- 1900 *Der Socialpolitische Gehalt der österreichischen Civilprocessgesetzgebung*. Vienna; Manz.
- 1911 *Die Agrarverfassung und das Grundentlastungsproblem in Bosnien und der Herzegowina*. Leipzig; Duncker & Bergmann.
- 1916 *Die Internationale und der Weltkrieg*. Leipzig; Hirschfeld.
- 1922 *Agrarverfassung, Begriffliches und Zuständliches*.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 8. Tübingen; Mohr.
- 1924 *Festrede, gehalten zur Einweih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am 22. Juni 1924*. Frankfurt Universitätsreden, 20. Frankfurt am Main; Blazek & Bergmann.
- 1971 (with Henryk Grossmann) *Anarchismus, Bolschewismus, Sozialismus. Aufsätze aus dem 'Wörterbuch der Volkswirtschaft'*, ed. Claudio Pozzoli.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 格吕恩堡所编辑的文献

-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Leipzig; Hirschfeld, 1911–30; repr. Graz, Austria; Akademische Druck-und Verlagsanstalt, 1966–73.

## 于尔根·哈贝马斯

### 相关文献

- Görtzen, René. '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von Jürgen Habermas 1952–1979'. In Thomas McCarthy, *Kritik der 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se. Zur Theorie von Jürgen Habermas*, trans. Max Loo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pp. 523–51.

### 参考文献

Görtzen, Ren é. *Jürgen Habermas; Eine Bibliographie seiner Schriften und der Sekundärliteratur 1952–198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2.

### 著作选目

1953 '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 Zur Veröffentlichung von Vorlesungen aus dem Jahre 1935'.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 July 1953.

1954 *Das Absolute und die Geschichte. Von der Zwiespältigkeit in Schellings Denken*. Doctoral dissertation. Bonn; University of Bonn.

1954 'Die Dialektik der Rationalisierung. Vom Pauperismus in Produktion und Konsum'. *Merkur*, 8, 701–24.

1955 'Come back-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July 1955. (Review of Arnold Gehlen and Halmut Schelsky (eds), *Soziologie*, and of W. Bernsdorf and F. Bülow (eds) *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1956 'Notizen zum Missverhältnis von Kultur und Konsum'. *Merkur*, 10, 212–28.

1956 'Triebchicksal als politisches Schicksal. Zum Abschluss der Vorlesungen über Sigmund Freud an den Universitäten Frankfurt und Heidelber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4 July 1956.

1957 'Das chronische Leiden der Hochschulreform'. *Merkur*, 11, 265–84.

1957 'Literaturbericht 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4, 165–235.

1958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In A. Diemer and I. Frenzel (eds), *Fischer-Lexiko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58 'Soziologische Notizen zum Verhältnis von Arbeit und Freizeit'. In Gerhard Funke (ed.), *Konkrete Vernunft. Festschrift für E. Rothacker*. Bonn; Bouvier.

1959 'Die grosse Wirkung. Eine chronistische Anmerkung zu Martin Heideggers 70. Geburtstag'. *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26 September 1959.

1961 (with L. von Friedeburg, C. Oehler and F. Weltz) *Student und Politik.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m politischen Bewusstsein Frankfurter Studenten*. Darmstadt; Luchterhand.

1961 'Pädagogischer "Optimismus" vor Gericht einer pessimistischen Anthropologie. Schelskys Bedenken zur Schulreform'. *Neue Sammlung; Göttinger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 und Gesellschaft*, 1, 251–78.

1962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Darmstadt; Luchterhand.

- 1963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e Studien*. Neuwied; Luchterhand. [Contains, among other essays: '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ä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Marburg inaugural lecture); 'Hegels Kritik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revised version of the Heidelberg inaugural lecture); and '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Marxismus als Kritik'. ]
- 1963 'Analy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Dialektik. Ein Nachtrag zur Kontroverse zwischen Popper und Adorno'. In Max Horkheimer (ed.),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 1963 'Ein philosophierender Intellektueller. Zum 60. Geburtstag von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September 1963.
- 1964 'Gegen einen positivistisch halbierten Rationalismus. Erwidern eines Pamphlet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16, 336–59.
- 1965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er Antrittsvorlesung)'. *Merkur*, 19, 1139–53.
- 1967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Beiheft 5.
- 1968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8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8 'Die Scheinrevolution und ihre Kinder. Sechs Thesen über Taktik, Ziele und Situationanalysen der oppositionellen Jugend'. *Frankfurter Rundschau*, 5 June 1968.
- 1969 *Protestbewegung und Hochschulrefor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69 'Odyssee der Vernunft in die Natur. Theodor W. Adorno wäre am 11. September 66 Jahre alt geworden'. *Die Zeit*, 12 September 1969.
- 1970 *Arbeit, Erkenntnis, Fortschritt. Aufsätze 1954–1970*. Amsterdam (pirated edition).
- 1971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1 (with Niklas Luh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3 *Kultur und Kritik. Verstreute Auf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3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6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6 'Was heisst Universalpragmatik?' In K. O. Apel (ed.), *Sprachpragmatik und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7 'Linke, Terroristen, Sympathisanten. Ein Briefwechsel mit Kurt Sontheimer'. *Süddeutsche Zeitung*, 26–27 November 1977.
-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81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I-IV)*.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81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Erweiterte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Contains, among other essays, the two articles on Adorno, material on Marcuse- 'Einleitung zu dem Band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1968), the review article 'Herbert Marcuse über Kunst und Revolution' (1973), 'Gespräch mit Herbert Marcuse' (1978) and 'Psychischer Thermidor und die Wiedergeburt der rebellischen Subjektivität' (1980), on Walter Benjamin- 'Bewusstmachende oder rettende Kritik' (1972), 'Die Frankfurter Schule in New York. Max Horkheimer und di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80), and 'Ein Glückwunsch. Rede aus Anlass des 80. Geburtstags von Leo Löwenthal' (1980). ]
- 1983 *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84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85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Contains a reprint of 'Die Verschlingung von Mythos und Aufklärung. Bemerkungen zu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nach einer erneuten Lektüre' (1983). ]
- 1985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V*.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访谈

Various interviews appear in: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I-IV)*.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Dialektik der Rationalisierung. Jürgen Habermas im Gespräch mit Axel Honneth, Eberhardt Knödler-Bunte und Arno Widmann'.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45/46 (October 1981).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79.

'Consciousness-Raising or Redemptive Criticism; the Contemporaneity of Walter Benjamin', trans. Philip Brewster and Carl Howard Buchner. *New German Critique*, 17 (1977), 30-59.

'The Entwinement of Myth and Enlightenment; Re-Reading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Thomas Y. Levin. *New German Critique*, 26 (1982), 13-30.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72.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76.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and Jerry A. Stark.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90.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trans. Seyla Benhabib. *New German Critique*, 22 (1981), 3-14.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90.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8.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trans. Frederick G. Lawrence. London; Heinemann, 1983.  
'Problems of Legitimation in Late Capitalism', trans. Thomas Hall.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363–87.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1964)', trans. Sara Lennox and Frank Lennox. *New German Critique*, 1 : 3 (1974), 49–55.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homas Burger and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9.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 *Inquiry*, 13 (1970), 205–218. Repr.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348–62.

'A Test for Popular Injustice;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Intellectuals', trans. Mark Franke. *New German Critique*, 12 (1977), 11–13.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Thomas McCarthy. 2 vols.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4–9.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ohn Viertel. Boston, Mass. : Beacon Press,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 Scientific Civilization'.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330–47.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Mass. : Beacon Press, 1971.

## 马克斯·霍克海默

### 相关文献

Schmid Noerr, Gunzelin. 'Bibliographie der Erstveröffentlichungen Max Horkheimers'. In Alfred Schmidt and Norbert Altwicker (eds), *Horkheimer heute; Werk und Wirkun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6, pp. 372–85.

Görtzen, René. 'Auswahlbibliographie der Horkheimer-Rezeption'. In Alfred Schmidt and Norbert Altwicker (eds), *Horkheimer heute; Werk und Wirkun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6, pp. 384–99.

论著 (著作)

1925 *Kants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als Bindeglied zwischen theoretischer und praktischer Philosophie*. Habilitation thesis. Stuttgart; Kohlhammer.

1930 *An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Kohlhammer.

1931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37. Frankfurt am Main; Englert & Schlosser.

1934 (pseud.; Heinrich Regius) *Dämmerung. Notizen in Deutschland*. Zurich; Oprecht & Helbling.

1947 (with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Querido.

1947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Surve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Western Germany; A Report on Recent Development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53 *Zum Begriff der Vernunft. Festrede bei der Rektoratsübergabe d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am 20. November 1951*.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7.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62 *Um die Freiheit*.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with Theodor W. Adorno) *Sociologica II. Reden und Vorträge*.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0.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trans.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Contains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Eclipse of Reason*, together with selected lectures and *Aufzeichnungen in Deutschland*.)

1968 *Kritische Theorie. Eine Dokumentation*, ed. Alfred Schmidt,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72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Aufsätze, Reden und Vorträge 1930–1972*, ed.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Fischer.

1972 *Gesellschaft im Übergang. Aufsätze, Reden und Vorträge 1942–1970*, ed.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Fischer.

1974 *Aus der Pubertät. Novellen und Tagebuchblätter*. Munich; Kösel.

1974 *Notizen 1950 bis 1969- Dämmerung. Notizen in Deutschland*, ed.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30 年至 1942 年间发表于 *ZfS*, *SPSS* 以及研究所其他出版物上的作品

‘Ein neuer Ideologiebegriff?’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Grünbergs Archiv], 15 (1930), 33–56.

‘Hegel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In *Festschrift für Carl Grünberg zum 70. Geburtstag*. Stuttgart: Kohlhammer, 1932.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ZfS*, 1, no. 1/2 (1932), 1–7.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ZfS*, 1, no. 1/2 (1932), 125–45.

‘Materialismus und Metaphysik’. *ZfS*, 2, no. 2 (1933), 162–97.

‘Materialismus und Moral’. *ZfS*, 2, no. 2 (1933), 162–97.

‘Zum Problem der Voraussage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ZfS*, 3, no. 1 (1933), 407–12.

‘Zum Rationalismusstreit in der gegenwärtigen Philosophie’. *ZfS*, 3, no. 1 (1934), 1–53.

‘Zu Bergsons Metaphysik der Zeit’. *ZfS*, 3, no. 3 (1934), 321–42.

‘Bemerkungen zur philosophischen Anthropologie’. *ZfS*, 4, no. 1 (1935).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ZfS*, 4, no. 3 (1935), 321–64.

‘Allgemeiner Teil’.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5. Paris: Alcan, 1936.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ur Anthropologie des bürgerlichen Zeitalters)’. *ZfS*, 5, no. 2 (1936), 161–234.

‘Zu Theodor Haecker: Der Christ und die Geschichte’. *ZfS*, 5, no. 3 (1936), 372–83.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ZfS*, 6, no. 1 (1937), 245–94.

(with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6, no. 3 (1937), 625–47.

‘Montaigne und die Funktion der Skepsis’. *ZfS*, 7, no. 3 (1938), 1–54.

‘Die Philosophie der absoluten Konzentration’. *ZfS*, 7, no. 3 (1938), 376–87.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8, no. 1/2 (1939), 115–37.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hilosophy’. *SPSS*, 8, no. 3 (1940), 322–37, repr. in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e below).

‘The 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Wilhelm Dilthey’. *SPSS*, 8, no. 3 (1940), 430–43.

‘Art and Mass Culture’. *SPSS*, 9, no. 2 (1941), 290–305; repr. in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e below)

‘The End of Reason’. *SPSS*, 9, no. 3 (1941), 366–88, repr.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26–48.

'Autoritärer Staat'. In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eds),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mimeograph). New York;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42.

'Theismus- Atheismus'. In Max Horkheimer (ed.),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 文集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achtzehn Bänden*, ed. Alfred Schmidt a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5.

Published to date:

- 1 Aus der Pubertät. Novellen und Tagebücher 1914–1918. 1988.
- 2 Philosophische Früh Schriften 1922–1932. 1986.
- 3 Schriften 1931–1936. 1988.
- 4 Schriften 1936–1941. 1988.
- 5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Schriften 1942–1950. 1986.
- 6 Zur Kuhte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 1949–1969. 1991.
- 7 Vorträge und Aufzeichnungen 1949–1973. 1985.
- 8 Vorträge und Aufzeichnungen 1949–1973. 1985.
- 9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14–1931. 1985–90.
- 12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 1985.
- 13–14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49–1972. 1988–89.

## 通信

Benjamin, Walter. *Briefe*,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2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6.

Löwenthal, Leo. *Schriften*, vol. 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4, pp. 182–267.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eo Löwenthal and Max Horkheimer.)

Bloch, Ernst. *Briefe 1903–1975*, ed. Karola Bloch et al.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pp. 669–87. (Letters to and from Max Horkheimer and Herbert Marcuse.)

## 讨论

Various discussions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7.

Minutes of discussions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2.

以英文发表的其他作品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amily Today'. In Ruth Nanda Anshen (ed.),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New York: Harper, 1949, pp. 359–74.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trans. People's Translation Service. *Telos*, 15 (Spring 1973), 3–20. Repr.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95–117.

'O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Diogenes*, 53 (Spring 1964), 73–81.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 [Contains: 'Art and Mass Culture';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The Latest Attack on Metaphysics'; 'Materialism and Metaphysics'; 'Notes on Science and the Crisis';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6, no. 3 (1937), 625–47);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hilosophy'; 'Thoughts on Religion';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Lectures and Essays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4.

*Dawn and Decline; Notes 1926–1931 and 1950–1969*, trans. Michael Shaw, afterword Eike Gebhardt.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8.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

'Ernst Simmel and Freudian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9 (1949), 110–13.

'The Lessons of Fascism'. In Hadley Cantril (ed.),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0, pp. 209–42.

'Notes on Institute Activities'. *SPSS*, 9, no. 1 (1941), 121–43.

'Preface'. *SPSS*, 9 (1941), 195–9.

'On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407–43.

'Schopenhauer Today'. In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eds),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pp. 55–71.

'Soci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In Ernst Simmel (ed.), *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6.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In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1986, pp. 188–243. Repr.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206–24.

相关文献

Luthardt, Wolfgang. 'Auswahl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Otto Kirchheimers'. In Otto Kirchheimer, *Funktionen des Staats und der Verfassung. 10 Analys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2. (This selected bibliography is reprinted from Frederic S. Burin and Kurt L. Shell (eds),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Essays of Otto Kirchhei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479–83. )

论著 (著作)

1930 *Weimar-und was dann? Entstehung und Gegenwart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Berlin; Laub.

1930 *Die Grenzen der Enteignung. Ein Beitrag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Enteignungsinstituts und zur Auslegung des Art. 153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Berlin; de Gruyter.

1935 (pseud; Hermann Seitz) *Staatsgefüge und Recht des Dritten Reiches*. Der deutsche Staat der Gegenwart, 12.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9 (with Georg Rusche)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with A. R. L. Gurland and Franz Neumann) *The Fate of Small Business in Nazi German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pr. New York; Fertig, 1975.]

1947 (anonymously) *A Constitution for the Fourth Republic*. Foundation pamphlet, 2. Washington, DC; Foundation for Foreign Affairs.

1961 *Political Justice; The Use of Legal Procedure for Political En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olitik und Verfass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7 *Politik Herrschaft. Fünf Beiträge zur Lehre vom Staa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9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Essays of Otto Kirchheimer*, ed. Frederic S. Burin and Kurt L. S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Kirchheimer's life and work by J. H. Herz and E. Hula. )

1972 *Funktionen des Staats und der Verfass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Faschismus. Die Auflösung der demokratischen Recht*

sordnung, ed. Wolfgang Ithard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发表于 *SPSS* 和 *Sociologica* 的文章

‘Criminal Law in National-Socialist Germany’. *SPSS*, 8, no. 3 (1940), 444–63.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SPSS*, 9, no. 2 (1941), 264–89.  
Repr.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49–70.

‘The Legal Order of National Socialism’. *SPSS*, 9, no. 3 (1941), 456–75.

‘Politische Justiz’. In *Sociologica I.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  
stalt, 1955.

#### 以英文发表的著作

‘Franz Neumann; an Appreciation’. *Dissent*, 4, no. 4 (Autumn 1957).

#### 列奥·洛文塔尔

##### 相关文献

Dubiel, Helmut. ‘Bibliographie’. In Leo Löwenthal,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Ein autobiog-  
raphisches Gespräch mit Helmut Dubi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 论著 (著作)

1949 (with Norbert Gutermann) *Prophets of Deceit; A Study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Amer-  
ican Agitator*. New York; Harper.

1957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Erzählkunst und Gesellschaft. Die Gesellschaftsproblematik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9. Jahrhunderts*. Neuwied; Luchterhand.

#### 发表于 *ZfS* 和 *Sociologica* 的文章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 *ZfS*, 1, no. 1/2 (1932), 85–102.

‘Conrad Ferdinand Meyers hero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ZfS*, 2, no. 1 (1933), 34–62.

‘Die Auffassung Dostojewskis in Vorkriegsdeutschland’. *ZfS*, 3, no. 3 (1934), 343–82.

‘Das Individuum in der individu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Bemerkungen über Ibsen’. *ZfS* 5,

no. 3 (1936), 321–63.

'Knut Hamsun. Zur Vorgeschichte der autoritären Ideologie'. *ZfS*, 6, no. 2 (1937), 295–345.

'Die biographische Mode'. In *Sociologica. Aufsätze, Max Hor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5.

### 选集

*Schriften*, ed. Helmut Dubi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1 *Literatur und Massenkultur*. 1980.

2 *Das bürgerliche Bewusstsein in der Literatur*. 1981

3 *Zur politischen Psychologie des Autoritarismus (Falsche Propheten. Studien zum Autoritarismus)*. 1982.

4 *Judaica, vorträge, Briefe*. 1984

5 *Philosophische Frühschriften*. 1987.

### 访谈

'Wir haben nie im Leben diesen Ruhm erwartet'. In Matthias Greffrath, *Die Zerstörung einer Zukunft. Gespräche mit emigrierten Sozialwissenschaftler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9.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Ein autobiographisches Gespräch mit Helmut Dubi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Other works available in English

(with Seymour M. Lipset, eds) *Culture and Social Character; The Work of David Riesman Reviewed*.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1. 'German Popular Biographies: Culture's Bargain Counter'. In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eds),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pp. 267–83.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Popular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5 (1950), 323–32. Repr. in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White (eds), *Mass Culture: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7.

'Knut Hamsun'.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319–45.

'Terror's Atomization of Main'. *Commentary*, 1. no. 3 (January 1946).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ed. Martin Jay. Berkeley,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赫伯特·马尔库塞

### 相关文献

Sahmel, Karl-Heinz. 'Ausgewählte 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von und über Herbert Marcuse'.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6 (1979), 271–301.

Kellner, Douglas.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 480–97.

### 早期论文；论著（著作）

1928 'Beiträge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Philosophische Hefte* (special issue on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45–68.

1929 'Über konkrete Philosophi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11–28.

1929 'Zur Wahrheitsproblematik der soziologischen Methode. Karl Mannheim: *Ideologie und Utopie*'. *Die Gesellschaft*, 6, 356–69.

1930 '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Die Gesellschaft*, 7, 15–30. (On S. Marck, *Die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part 1. )

1930 'Transzendentaler Marxismus'. *Die Gesellschaft*, 7, 304–26.

1931 '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ans Freyers *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 *Philosophische Hefte*, 83–91.

1931 'Zur Kritik der Soziologie'. *Die Gesellschaft*, 8, 270–80. (On S. Landshut, *Kritik der Soziologie*.)

1931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lichen Wirklichkeit'. *Die Gesellschaft*, 8, 350–67.

1931 '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Frage nach den Quellen der Marxschen Dialektik bei Hegel'. *Die Gesellschaft*, 8, 541–57. (On S. Marck, *Die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part 2. )

1932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32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Die Gesellschaft*, 9, 136–74. (On the publication of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933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 参考文献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57–92.

1933 'Philosophie des Scheiterns. Karl Jaspers 'Werk'. *Unterhaltungsblatt der Vossischen Zeitung*, 14 December 1933.

1941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5 (with Robert P.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sychoanalyse und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Zeit-Messungen. Drei Vorträge und ein Interview*.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Die Permanenz der Kunst. Wider eine bestimmte marxistische Ästhetik; Ein Essay*. Munich; Hanser.

1980 *Des Ende der Utopie. Vorträge und Diskussionen in Berlin 1967*.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e Kritik.

发表于 *ZfS*, *SPSS* 和研究所其他出版物的文章

'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ZfS*, 3, no. 2 (1934), 161–95.

'Zum Begriff des Wesens'. *ZfS*, 5, no. 1 (1936), 1–39.

'Ideengeschichtlicher Teil'.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5. Paris: Alcan, 1936.

'Autorität und Familie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bis 1933.'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5. Paris: Alcan, 1936.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ZfS*, 6, no. 1 (1937), 54–94.

(with Max Horkheimer)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6, no. 3 (1937), 625–47.

'Zur Kritik des Hedonismus'. *ZfS*, 8, no. 1/2 (1938), 55–89.

'An Introduction to Hegel's Philosophy'. *SPSS*, 8, no. 3 (1940), 394–412.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 *SPSS*, 9, no. 3 (1941), 414–39. Repr.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138–62.

'Trieblehre und Freiheit'. In *Sociologica I.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5.

'Trieblehre und Freiheit; Die Idee des Fortschritts im Lichte der Psychoanalyse'. In *Freud in der Gegenwart. Ein Vortragszyklus der Universitäten Frankfurt und Heidelberg zum hundertsten Geburtstag*.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6.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7.

'Zur Stellung des Denkens heute'. In Max Horkheimer (ed.),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 选集

Schrif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Suhrkamp Verlag.

Published to date:

- 1 *Der deutsche Künstlerroman. Frühe Aufsätze*. 1978.
- 2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1989.
- 3 *Aufsätze aus der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79.
- 4 *Vernunft und Revolution*, 1989.
- 5 *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 1979.
- 6 *Die Gesellschaftslehre des Sowjetischen Marxismus*, 1989.
- 7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1989.
- 8 *Aufsätze und Vorlesungen 1941–1969. Versuch über die Befreiung*. 1984.
- 9 *Konterrevolution und Revolte. Zeit-Messungen. Die Permanenz der Kunst*. 1987.

#### 本文涉及的访谈

'Professoren als Staatsregenten?' *Der Spiegel*, 35 (1967), 112–18.

Habermas, Jürgen, Bovenschen, Silvia, et al. *Gespräche mit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Comes the Revolution'. *Partisan Review*, 32, no. 1 (Winter 1965), 159–60. (Reply to Berman's review of *One-Dimensional Man*.)

'The Concept of Negation in the Dialectic'. *Telos*, 8 (Summer 1971), 130–2.

'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elos*, 4 (Fall 1969), 3–34.

'Dialectic and Logic Since the War'. In Ernest J. Simons (e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347–58.

'The Eclipse of the New Left?', trans. Biddy Martin. *New German Critique*, 18 (1979), 3–11.

'Epilogue to the New German Edition of Marx's 18<sup>th</sup>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 *Radical America*, 3, no. 4 (July/August 1969), 55–9.

'Eros and Culture'. *Cambridge Review*, 1, no. 3 (Spring 1955) 107–23.

'Ethics and Revolution'. In Richard T. deGeorge, (ed.), *Eth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Anchor, 1966, pp. 130–46.

'Existentialism; Remarks on Jean-Paul Sartre's *L'Être et le Néa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8 (1948), 309–36.

*Five Lectures: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 trans. Jeremy J. Shapiro and Shierry M. Web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The Ideology of Death'. In Hermann Feifel (ed.), *The Meaning of Death*,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pp. 66–76.

'The Individual in the Great Society'. *Alternatives*, 1, no. 1 (March/April 1966); *Alternatives*, 1, no. 2 (Summer 1966).

'Language and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Dissent*, 8 (1961), 66–74.

'Lord Acton;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4 (1949), 557–9.

'Love Mystified'. *Commentary*, 43, no. 2 (1967), 71–6. Repr. in *Negations* (see below).

'Murder is not a Political Weapon', trans. Jeremy Herf. *New German Critique*, 12 (1977), 7–8.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 1968. [Contains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Aggressivenes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The Concept of Essenc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Love Mystified: a Critique of Norman O. Brown'; 'On Hedonism';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Marcuse's section of Horkheimer and Marcuse,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6, no. 3 (1937), 625–47),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

'A Note on Dialectic'.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444–51. (The 1960 preface to *Reason and Revolution*.)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Laws'. *Partisan Review*, 26 (Winter 1959), 117–29. Repr. as 'Karl Popper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Laws', in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see below).

'The Obsolescence of Marxism'. In Nicholas Lobkowitz (ed.),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pp. 409/18.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Economics', trans. Douglas Kellner. *Telos*, 16 (Summer 1973), 9–37.

'Preface'. In Raya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New York: Twayne, 1958, pp. 15–2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In Raymond Aron and Bert Hoselitz (eds), *UNESCO Symposium on Social Development*, Paris: UNESCO, 1961, pp. 139–60.

'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 Reconsideration'. *Praxis* (Zagreb), 1/2 (1969), 20–5.

'Recent Literature on Communism'. *World Politics*, 6 (1954), 515–25.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56 (July/August 1969), 27–34.

'A Rejoinder to K. Löewith's Review of *Reason and Revolu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 (1942), 564–5.

'Remarks on a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Daedalus*, 94 (1965), 190–207. Repr. in Gerald Holton (ed.), *Science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 218–35.

'A Reply to Erich Fromm'. *Dissent*, 3 (1956), 79–81.

'A Reply to Lucien Goldmann'. *Partisan Review*, 28 (1971), 397–400.

'Repressive Tolerance'. In Robert Paul Wolff, Barrington Moore, Jr, and Herbert Marcuse,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pp. 81–123. Repr. in Paul Connerly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301–29.

'Review of Georg Lukács' *Goethe und seine Zeit*'.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

*logical Research*, 9 (1950), 142–4.

‘Revolutionary Subject and Self-Government’. *Praxis* (Zagreb), 5 (1969), 326–9.

‘Sartre’s Existentialism’.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9 (1948). Repr. in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see below).

‘On 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 (1965), 279–91. Repr.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466–76.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Freudian “Revisionism”’. *Dissent*, 2 (1955), 221–40.

‘Socialism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 2, no. 8 (April 1955), 139–52.

‘Socialist Humanism?’ In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p. 96–106.

‘Statement on Vietnam’. *Partisan Review*, 32 (1965), 646–9.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trans. Joris de Br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Contains: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eedom and the Historical Imperative’, ‘Karl Popper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Laws’, ‘Sartre’s Existentialism’, and ‘A Study on Authority’.)

‘Theory and Therapy in Freud’. *The Nation*, 185 (1957), 200–2.

‘A Tribute to Paul A. Baran’. *Monthly Review*, 16 (1965), 114–15.

‘World Without Logic’.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20 (1964), 25–6.

## 弗朗茨·诺伊曼

### 相关文献

Luthardt, Wolfgang. ‘Ausgewählte Bibliographie der Arbeiten von Franz Leopold Neumann’. In Franz Neumann, *Behemoth. 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4*, ed. Gert Schäfer,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pp. 777–84. Repr. in Franz L. Neumann, *Wirtschaft, Staat, Demokratie. Aufsätze 1930–1954*, ed. Alfons Sölln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 著作选目

1929 *Die politische und soziale Bedeutung der arbeitsgerichtlichen Rechtsprechung*. Berlin: Laub.

1931 *Turi frecht auf der Grundlage der Rechtsprechung des Reichsarbeitsgerichts*. Berlin:

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1932 *Koalitionsfreiheit und Reichsverfassung. Die Stellung der Gewerkschaften im Verfassungssystem*. Berlin: Heymann.

1934 *Trade Unionism, Democracy, Dictatorship*. Preface by Harold J. Laski. London: Workers' Educational Trade Union Committee. [Published in United States as *European Trade Unionism and Politics*, ed. Carl Raushenbuch. New York: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1936.]

1935 (pseud.: Leopold Franz) *Die Gewerkschaften in der Demokratie und in der Diktatur*.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13. Karlsbad: Graphia.

1942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Gollancz.

1944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2<sup>nd</sup> re. edn, with new appendix.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ed. Herbert Marcus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78 *Wirtschaft, Staat, Demokratie. Aufsätze 1930–1954*, ed. Alfons Sölln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Die Herrschaft des Gesetzes. Eine Untersuchung zum Verhältnis von politischer Theorie und Rechtssystem in der Konkurrenzgesellschaft*, trans. and ed. Alfons Sölln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Translation of the 1936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Theories,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in the Competitive Societ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36 (supervisor: Harold J. Laski).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6 as *The Rule of Law* (see below)).

发表于 *ZfS*, *SPSS* 以及研究所其他出版物上的作品

'Der Funktionswandel des Gesetzes im Rech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ZfS*, 6, no. 3 (1937), 542–96.

'Types of Natural Law'. *SPSS*, 8, no. 3 (1940), 338–61.

'Intellektuelle und politische Freiheit'. In *Sociologica I.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5.

通信

A few letters in Rainer Erd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Gespräche über Franz L. Neu-*

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4.

#### 以英文出版的其他著作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5 (1950), 161–80.

'The Intelligentsia in Exile'.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423–41. (From Neumann's chapter, 'The Social Sciences', in W. Rex Crawford (e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 pp. 4–25.)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ed. Matthias Ruete. Leamington Spa; Berg, 1986.

#### 弗雷德里希·波洛克

##### 著作

1926 Sombarts 'Widerlegung' des Marxismus. Beihefte zum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3, ed. Carl Grünberg. Leipzig; Hirschfeld.

1929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2. Leipzig; Hirschfeld, 1929.

1964 *Automation. Materialien zur Beurteilung der ökonomischen und sozialen Folgen*.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5.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6.

1975 *Stadien des Kapitalismus*, ed. Helmut Dubiel. Munich; Beck. (Contains Pollock's ZfS and SPSS articles.)

##### 发表于 ZfS, SPSS 以及研究所其他出版物上的作品

'Zur Marx'schen Geldtheorie'.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3 (1927), 193–209.

'Sozialismus und Landwirtschaft'. In *Festschrift für Carl Grünberg zum 70. Geburtstag*. Stuttgart; Kohlhammer, 1932.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ZfS*, 1, no. 1 (1932), 8–27.

'Bemerkungen zur Wirtschaftskrise'. *ZfS*, 2, no. 3 (1933), 321–54.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SPSS*, 9, no. 2 (1941), 200–25. Repr.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78, pp. 71–94.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PSS*, 9, no. 3 (1941), 440–55.

‘Automation in USA. Betrachtungen Zu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In *Sociological I.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55.

‘Die sozialen und ökonomischen Auswirkungen der Anwendung der Elektronenrechners in der hochindustrialisierten Gesellschaft’. In Max Horkheimer (ed.),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6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n Verlags-Anstalt, 1963.

#### 以英文发表的著作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 trans. W. O. Henderson and W. H. Chaloner. Oxford; Blackwell, 1957.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Public Opinion’, trans. Thomas Hall.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225–36.  
(From *Gruppenexperiment*.)

#### 费利克斯·韦尔

##### 著作

1922 *Sozialisierung. Versuch einer begrifflichen Grundlegung nebst einer Kritik der Sozialisierungspläne*. Praktischer Sozialismus, ed. Karl Korsch, vol. 7. Berlin; Verlag für Gesellschaft und Erziehung, 1921.

1944 *Argentine Riddle*. New York; Day.

1967 *How to Conduct your Case before a California Assessment Appeals Board: A Guide for Property Taxpayers*. Pacific Palisades, Cal.; Tax Facts.

##### 发表于 *Grünberg's Archiv* 和 *ZfS* 的重要文章

‘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rgentinien. Ein Beitrag zu ihrer Geschichte’.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1 (1925), 1–51.

‘Rosa Luxemburg über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Einige unveröffentlichte Manuskripte’, ed. Felix Weil.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3 (1928), 283–98.

‘Neuere Literatur zum “New Deal”’. *ZfS*, 5, no. 3 (1936), 404–10.

‘Neuere Literatur zur deutschen Wehrwirtschaft’. *ZfS*, 7, no. 1/2 (1938), 200–18.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 相关文献

Ulmen, Gary L. 'Chronological Bibliography of the Published Writings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In Gary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Mouton, 1978, pp. 509–23.

#### 专著

1924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zur Schwelle der grossen Revolution*. 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2. Berlin; Malik. [Repr. Frankfurt am Main; Rote Texte, 1972.]

1926 *Das erwachende China. Ein Abriss der Geschichte und der gegenwärtige Probleme Chinas*. Vienna; Agis.

1931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s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einer grossen asiatischen Agrargesellschaft*.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3. Leipzig; Hirschfeld, 1931.

1936 (pseud.; Klaus Hinrichs) *Staatliches Konzentrationslager VII. Eine "Erziehungsanstalt" im Dritten Reich*. London; Malik. [A novel.]

1947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eatures in China's Social Herit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1949 (with Feng Chin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Ästhetik*, ed. Andreas W. Mytze. Berlin; Verlag Europäische Ideen.

#### 发表于 *ZfS* 和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的文章

'The 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ZfS*, 4, no. 1 (1935), 26–59.

'Wirtschafts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Entwicklung der Familienautorität'.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Forschungsberichte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5. Paris; Alcan, 1936.

'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 *ZfS*, 7, no. 1/2 (1938), 90–122.

'Bericht über eine grössere Untersuchung der sozialökonomischen Struktur Chinas'. *ZfS*, 7, no. 1/2 (1938), 123–32.

'The Society of Prehistoric China'. *ZfS*, 8, no. 1/2 (1939), 138–86.

### 访谈

'Die hydraulische Gesellschaft und das Gespenst der asiatischen Restauration. Gespräch mit Karl August Wittfogel'. In Mathias Greffrath (ed.), *Die Zerstörung einer Zukunft. Gespräche mit emigrierten Sozialwissenschaftler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9.

法兰克福学派圈子在所讨论的阶段发表的文章或成果中所提及的其他著作

(批判理论第二代的文献信息可参看 Willem van Reijen, *Philosophie als Kritik. Einführung in die kritische Theorie*, Königstein im Taunus: Athenäum, 1984.)

Haag, Karl Heinz. *Kritik der neueren Ontologie*. Stuttgart: Kohlhammer, 1960.

—*Philosophischer Idealismus. Untersuchungen zur Hegelschen Dialektik mit Beispielen aus der Wissenschaft der Logik*.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Negt, Oskar. *Soziologische Phantasie und exemplarisches Lernen. Zur Theorie der Arbeiterbildung*.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8. (Cited from the expanded edition of 1971.)

—and Kluge, Alexander. *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 Zur Organisationsanalyse von bürgerlicher und proletarisch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Zweitausendeins, 1981.

—and Kluge, Alexander. *Geschichte und Eigensinn*. Frankfurt am Main: Zweitausendeins, 1981.

Wellmer, Albrecht. *Methodologie als Erkenntnistheori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Karl R. Popper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7.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Positiv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9

### III. 二手材料 (选择范围较小, 只涉及最主要著作)

Adorno, Theodor W.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trans. Donald Fleming.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2 (1968), 338–70. Repr.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38–70.

Arendt, Hannah. *Walter Benjamin-Bertolt Brecht. Zwei Essays*. Munich; Piper, 1971.

Arnold, Heinz Ludwig (ed.). *Theodor W. Adorno. Text + Kritik*, special issue (1977).

Beier, Christel. *Zum Verhältnis von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Erkenntnistheorie. Untersuchungen zum Totalitätsbegriff i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Adorno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Benjamin, Walter. 'Ein deutsches Institut freier Forschung'.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2, pp. 518–26.

— '“Kierkegaard” . Das Ende des philosophischen Idealismus'.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2, pp. 380–3.

Bernstein, Richard J.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Bonss, Wolfgang. *Die Einübung des Tatsachenblicks. Zur Struktur und Veränderung empirische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2.

— 'Kritische Theorie und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Anmerkungen zu einem Fallbeispiel'. In Erich Fromm,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 am Vorabend des Dritten Reiches. Eine sozial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 ed. Wolfgang Bonss. Stuttgart; Deutscher Verlags-Anstalt, 1980.

—and Honneth, Axel (eds). *Sozialforschung als Kritik. Zum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Potential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2.

Brandt, Gerhard. 'Ansichten kritischer Sozialforschung 1930–1980'. *Leviathan*, special issue, 4 (1981).

Breuer, Stefan. *Die Krise der Revolutionstheorie. Negative Vergesellschaftung und Arbeitsmetaphysik bei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m Main; Syndikat Autoren- und Verlagsgesellschaft, 1977.

Brunkhorst, Hauke. 'Paradigmakern und Theoriendynamik d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Soziale Welt*, 3 (1983).

—and Koch, Gertrud. *Herbert Marcuse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Junius, 1987.

Buckmiller, Michael. Die "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 1923 und die 'Gründ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 In van Reijen, W. and Schmid Noerr, G. (eds). *Grand Hotel Abgrund. Eine Photobiographi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Hamburg; Junius, 1990.

Buck-Morss, Susan. *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Theodor W. Adorno,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Hassocks, Sussex; Harvester, 1977.

Bulthaupt, Peter (ed.). *Materialien zu Benjamins Thesen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 Beiträge und Interpretation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5.

Christie, Richard and Jahoda, Marie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

- 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1954.
- Claussen, Detlev. *Spuren der Befreiung-Herbert Marcuse. Ein Materialienbuch zur Einführung in sein politisches Denken*. Darmstadt; Luchterhand, 1981.
- Connerton, Paul. *The Tragedy of Enlightenment : an Essay on the Frankfurt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Dahmer, Helmut. *Libido and Gesellschaft. Studien über Freud und die Freudsche Link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 Dallmayr, Winfried (ed.). *Materialien zu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4.
- Dubiel, Helmut. *Identität und Institution. Studien über moderne Sozialphilosophien. Konzepte Sozialwissenschaft, 5*.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1973.
- *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ische Erfahrung. Studien zur frühen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 Düver, Lthar. *Theodor W. Adorno. Der Wissenschaftsbegriff der Kritischen Theorie in seinem Werk*. Bonn; Bouvier, 1978.
- Eisenbach, Robert Hellmuth. 'Millionär, Agitator und Doktorand. Die Tübinger Studentenzeit des Felix Weil (1919)'. *Bausteine zur Tübinger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3 (1987).
- Erd, Raniner (ed.). *Reform und Resignation. Gespräche über Franz L. Neu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 Feuer, Lewis S. 'The Frankfurt Marxists and the Columbia Liberals'. *Survey* (Summer 1980).
- Friedeburg, Ludwig von and Habermas, Jürgen (eds). *Adorno-Konferenz 198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3.
- Fuld, Werner. *Walter Benjamin. Zwischen den Stühlen. Eine Biographie*. Munich; Hanser, 1979.
- Funk, Rainer. *Erich Fromm 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83.
- Gamm, Gerhard (ed.). *Angesichts objektiver Verblendung. über die Paradoxien Kritischer Theorie*. Tübingen; Konkursbuchverlag, 1985.
- Geyer, Carl-Friedrich. *Kritische Theorie.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Freiburg; Alber, 1982.
- Glazer, Nathan. 'The Study of Ma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Profile'. *Commentary* (June 1950).
- Görllich, Berthard. 'Die Kulturismus-Revisionismus-Debatte. Anmerkungen zur Problemge-

schichte der Kontroverse um Freud'. In Bernhard Görlich, Alfred Lorenzer and Alfred Schmidt (eds), *Der Stachel Freud. Beiträge und Dokumente zur Kulturismus-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Grenz, Friedemann. *Adornos Philosophie in Grundbegriffen. Auflöschung einiger Deutungsprobleme. Mit einem Anhang: 'Ist die Soziologie ein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Ein Streitgespräch'*, von Theodor W. Adorno und Arnold Gehl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4.

Gunnior, Helmut and Ringguth, Rudolf. *Max Horkheim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3.

Günther, Henning, Willeke, Clemens and Willeke, Rudolf. *Die Gewalt der Verneinung. Die Kritische Theorie und ihre Folgen*. Stuttgart; Seewald, 1978.

Habermas, Jürgen. 'Drei Thes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n Axel Honneth and Albrecht Wellmer (eds), *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Folgen. Referate eines Symposiums der 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 vom 10.–15. Dezember 1984 in Ludwigsburg*.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6, pp. 8–12.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Erweiterte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 (ed.).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8.

Hansen, Klau (ed.). *Frankfurter Schule und Liberalismus; Beitrag zum Dialog zwischen kritischer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politischem Liberalismus*. Baden-baden; Nomos, 1981.

Heimann, Bodo. 'Thomas Manns Doktor Faustus und die Musikphilosophie Adornos'. *Deut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38 (1964).

Heintz, Peter. 'Zur Problematik der "autoritären Persönlichkeit" '.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9 (1957), 28–49.

Heiseler, Johannes Henrich von, Steigerwald, Robert and Schleifstein, Josef (eds). *Die 'Frankfurter Schule' im Lichte des Marxismus. Zur Kritik der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von Horkheimer, Adorno, Marcuse, Haberma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Marxistische Blätter, 1970.

Held, Davi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From Horkheimer to Habermas*. London; Hutchinson, 1980.

Herz, John H. and Hula, Erich. 'Otto Kirchheim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In

- Otto Kirchheimer,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Essays*, ed. Frederic S. Burin and Kurt L. S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 Hesse, Heidrun. *Vernunft und Selbstbehauptung. Kritische Theorie als Kritik der neuzeitlichen Rationalitä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4.
- Honneth, Axel. *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 and Wellmer, Albrecht (eds). *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Folgen. Referate eines Symposiums der 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 vom 10. – 15. Dezember 1984 in Ludwigsburg*.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6.
- Jacoby, Russell. *Social Amnesia; A Critique of Conformist Psychology from Adler to Laing*.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 Jaerisch, Ursula. *Sind Arbeiter autoritär? Zur Methodenkritik politischer Psych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5.
- Jay, Martin. Adorno. London; Fontana, 1984.
-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London; Heinemann, 1973.
- Kaiser, Gerhard. *Benjamin. Adorno. Zwei Studien*.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Fischer, 1974.
- Kaltenbrunner, Gerd-Klaus and Riedel, Manfred. 'Der Denker Herbert Marcuse'. *Merkur*, 236 (1967).
- Katz, Barry.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2.
- Kecskemeiti, Paul. 'Prejudice in the Catastrophic Perspective; Liberalism, Conservatism, and Anti-Semitism'. *Commentary* (March 1951).
- Kellner, Douglas.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1984.
- Kluke, Paul. *Die Stiftungs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1914 – 1932*. Frankfurt am Main; Kramer, 1973.
- Knapp, Gerhard P. *Theodor W. Adorno*. Berlin; Colloquium, 1980.
- Kolleritsch, Otto (ed). *Adorno und die Musik*. Vienna; Universal, 1979.
- König, René. '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e Kritische Theorie'. In Kurt Fassmann (ed.), *Die Grossen der Weltgeschichte*, vol. 11, Zurich, 1978.
- Korthals, Michiel. 'Die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des frühen Horkheimer. Missverständnisse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Horkheimer, Lukács und dem Positivismus'.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June 1985).

- Küsters, G.-W. *Der Kritikbegriff der Kritischen Theorie Max Horkheimer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Untersuchung zur Theorie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0.
- Lacis, Asja. *Revolutionär im Beruf. Berichte über proletarisches Theater, über Meyerhold, Brecht, Benjamin und Piscator*, ed. Hildegard Brenner. Munich; Rogner & Bernhard, 1976.
- Lazarsfeld, Paul F.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2 (1968), 270–337. Repr.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70–337.
- Lindner, Burkhardt. 'Habitationsakte Benjamin'. *Lili.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Göttingen), 53/54 (1984).
- (ed.). 'Links hatte noch alles sich zu enträteln... 'Walter Benjamin im Kontext. Frankfurt am Main; Syndikat Autoren- und Verlagsgesellschaft, 1978.
- and Lüdke, W. Martin (eds). *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 Adornos. Konstruktio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 Löbig, Michael and Schweppenhäuser, Gerhard (eds). *Hamburger Adorno-Symposium*. Lüneburg; Klampen, 1984.
- Löwenthal, Leo.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Ein autobiographisches Gespräch mit Helmut Dubi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Trans. as 'I Never Wanted to Play Along: Interviews with Helmut Dubiel', in Martin Jay (ed.),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5–159.
- Löwith, Karl. Review of F. C. Fischer, *Die Nullpunktexistenz*, and 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 *Kierkegaard*.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28 January 1934.
- Lunn, Eugene. *Marxism and Modernism: A Historical Study of Lukács, Brecht, Benjamin, and Adorn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 Luthardt, Wolfgang. 'Bemerkungen zu Otto Kirchheimers Arbeiten bis 1933'. In Otto Kirchheimer,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Faschismus: Die Auflösung der demokratischen Rechtsordnung*, ed. Wolfgang Luthard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
- Liotard, Jean-Francois. 'Adorno con diavolo'. In Jean-Francois Lyotard, *Intensitäten*, trans. Lothar Kurzawa and Volker Schaefer. Berlin; Merve, 1977.
- McCarthy, Thoma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London; Hutchinson, 1978.
- Maier, Joseph. 'Contributions to a Critique of Critical Theory'. In Baidya Nath Varma (ed.), *The New Social Scienc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6.
- Maor, Maimon. *Max Horkheimer*. Berlin; Colloquium, 1981.

- Marcus, Judith and Tar, Zoltán (eds). *Foundation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4.
- Martin, Kurt (*alias* Kurt Mandelbaum). 'Staatskapitalismus? Probleme der Planbarkeit 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in Rückblick auf die Diskussionen im alten Frankfurt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In Werner Schulte (ed.), *Soziologie in der Gesellschaft. Referate aus dem... 20. Deutschen Soziologentag, Bremen, 16.—19. September 1980*, Universität Bremen, Tagungsberichte, 3, Bremen; University of Bremen, 1981, pp. 903—7.
- Mattick, Paul. *Critique of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in Class Society*. London; Merlin Press, 1972.
- Mayer, Hans. 'Die im Dunkel und die im Licht. Die Geburt der "Kritischen Theorie" und di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Die Zeit*, 31 October 1980, pp. 42—3.
- Der Repräsentant und der Märtyrer. Konstellationen der Literatu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1.
- Migdal, Ulrike.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1.
- Mörchen, Hermann. *Adorno und Heidegger. Untersuchung einer philosophischen Kommunikationsverweiger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1.
- Morrison, David E. 'Kultur and Culture: the Case of Theodor W. Adorno and Paul F. Lazarsfeld'. *Social Research*, 45 (1978), 331—55.
- Negt, Oskar. '50 Jahre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Der neue Egoist* (Hanover), 2 (1976).
- Neuning, Günther. 'Biographie C. Grünberg'.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index volume for reprint, Zurich, 1973.
- Perels, Joachim (ed.). *Recht, Demokratie und Kapitalismus. Aktualität und Probleme der Theorie Franz L. Neumanns*. Baden-Baden; Nomos, 1984.
- Pflasterstrand*, 209 (1985), 37—8. 'Flaschenpost? Horkheimer, Adorno, Marcuse und Nachkriegsdeutschland'.
- Post, Werner. *Kritische Theorie und metaphysischer Pessimismus. Zum Spätwerk Max Horkheimers*. Munich; Kösel, 1971.
- Puder, Marti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Adornos'. *Neue Rundschau*, 82 (1971), 465—77.
- Reif, Adelbert. *Erich Fromm. Materialien zu seinem Werk*. Vienna; Europaverlag, 1978.
- Reijen, Willem van. *Philosophie als Kritik. Einführung in die kritische Theorie*. Königstein im Taunus; Athenäum, 1984.
- and Schmid Noerr, Gunzelin (eds). *Vierzig Jahre Flaschenpost: 'Dialektik der*

- Aufklärung* 1947 bis 1987.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71.
- Ritsert, Jürgen and Rolshausen, Claus. *Der Konservatismus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 Rogmann, Klaus. *Dogmatismus und Autoritarismus. Kritik der theoretischen Ansätze und Ergebnisse dreier westdeutscher Untersuchungen*. Kölner Beiträge zur Sozialforschung und angewandte Soziologie, 1. Meisenheim am Glan; Hain, 1966.
- Rohrmoser, Günther. *Das Elend der Kri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 Adorno, Herbert Marcuse, Jürgen Habermas*. Freiburg im Breisgau; Romabach, 1970.
- Rose, Gillian. *The Melancholy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Theodor W. Adorno*. London; Macmillan, 1978.
- Russo, Valeria E. 'Profilo di Franz Borkenau'. *Rivista di Filosofia* (Turin) (June 1981). (Contains a bibliography of Borkenau's writings.)
- Scheible, Hartmut. *Wahrheit und Subjekt. Ästhetik im bürgerlichen Zeitalter*. Berne; Francke, 1984.
- Schiller-Lerg, Sabine. *Walter Benjamin und der Rundfunk. Programmarbeit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Munich; Saur, 1984.
- Schivelbusch, Wolfgang. *Intellektuellendämmerung. Zur Lage der Frankfurter Intelligenz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Die Universität, das Freie Jüdische Lehrhaus*.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1982.
- Schmid Noerr, Gunzelin. 'Kritische Theorie in der Nachkriegsgesellschaft'. 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8,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5.
- Schmidt, Alfred. 'Die geistige Physiognomie Max Horkheimers'. Introduction to Max Horkheimer, *Notizen 1950 bis 1969 und Dämmerun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74.
- Zur Ide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Elemente der Philosophie Max Horkheimers*. Munich; Hanser, 1974.
- and Altwicker, Norbert (eds). *Max Horkheimer heute: Werk und Wirkun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6.
- Schmidt, Friedrich W. 'Hegel i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 In Oskar Negt (ed.),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1.
- Schmucker, Joseph F. *Adorno. Logik des Zerfalls*.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77.
- Schoeller, Wilfried F. (ed.). *Die neue Linke nach Adorno*. Munich; Kindler, 1969.
- Scholem, Gershom.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London; Faber, 1982.
- Schwarz, Ullrich. *Rettenden Kritik und antizipierte Utopie. Zum geschichtlichen Gehalt*

- ästhetischer Erfahrung in den Theorien von Jan Mukarovsky, Walter Benjamin und Theodor W. Adorno. Munich; Fink, 1981.
- Schweppenhäuser, Hermann (ed.). *Theodor W. Adorno zum Gedächtnis. Eine Samml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1.
- Shils, Edward.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Tradition, ökologie und Institutionalisierung'. In Talcott Parsons, Edward Shils and Paul Lazarsfeld, *Soziologie-autobiographisch.* Stuttgart; Enke, 1975.
- Skuhra, Anselm. *Max Horkheimer; eine Einführung in sein Denken.* Stuttgart; Kohlhammer, 1974.
- Slater, Phil.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 Marxist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 Söllner, Alfons. *Franz L. Neumann-Skizzen zu einer intellektuellen und politischen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 Geschichte und Herrschaft. Studien zur materialistischen Sozialwissenschaft 1929 – 194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2.
- Neumann zur Einführung.* Hanover, 1982.
- Stoessel, Marleen. *Aura. Das vergessene Menschliche. Zu Sprache und Erfahrung bei Walter Benjamin.* Munich; Hanser, 1983.
- Szondi, Peter. *Über eine 'Freie (d. h. freie) Universität'. Stellungnahmen eines Philologen,* ed. Jean Bollac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Contains 'Über Adornos Vortrag "Zum Klassizismus von Goethes Iphigenie" ', pp. 55–6.)
- Tar, Zoltán.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Critical Theories of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New York; Wiley, 1977.
- Text und Kritik*, 31/32 (1979). Special issue on Walter Benjamin.
- Theunissen, Michael. *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Zur Kritik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de Gruyter, 1969.
- Tiedemann, Rolf, Gödde, Christoph, and Lonitz, Henri (eds), *Walter Benjamin 1892 – 1920.* Marbacher Magazin 55/1990.
- Tiedemann, Rolf. *Dialektik im Stillstand. Versuche zum Spätwerk Walter Benjami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3.
-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Walter Benjami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 Ulmen, Gary L.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Mouton, 1978.

Vogler, Jan et al.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Moscow, 1975 [in Russian].

Wellmer, Albrecht. *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 ‘Kommunikation und Emanzipation. Überlegungen zur “sprachanalytischen Wende” der Historischen Theorie’. In Urs Jaeggi and Axel Honneth (eds),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Positiv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9.

Wiggershaus, Rolf. *Theodor W. Adorno*. Munich; Beck, 1987.

Wilson, Michael. *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und seine Faschismusanalys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2.

Witte, Bernd. *Walter Benjamin, 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85.

Wohlfarth, Irving. ‘Zu Walter Benjamin Briefwechsel mit Gershom Scholem’. *Merkur* (February 1981).

Wolin, Richard.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Zeitschrift für Musiktheorie*, 1 (1973). Special issue on Adorno.

#### IV. 论及背景的著作以及对背景构成有影响的著作

Abelshauer, Wern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8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3.

Abendroth, Wolfgang. *Ein Leb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Gespräche*, ed. Barbara Dietrich and Joachim Per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

——et al. *Die Linke antwortet Jürgen Habermas*, ed. Oskar Negt.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8.

Achinger, Hans. *Wilhelm Merton in sein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Kramer, 1965.

Adorno, Theodor W. (ed.).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Verhandlungen des 16.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vom 8.—11. April 1968 in Frankfurt am Main*. Stuttgart; Enke, 1969.

Agnoli, Johannes and Brückner, Peter. *Die Transformation der Demokratie*. Frankfurt am Main; Voltaire-Verlag, 1967.

*Aktiver Streik. Dokumentation zu einem Jahr Hochschulpolitik. Am Beispiel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Darmstadt; Melter, 1969.

Alemann, Heine von. 'Leopold von Wiese und das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Köln 1919 bis 1934'. In Wolf Lepenies (ed.),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vol.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Aragon, Louis. *Le Paysan de Paris*. Paris; Gallimard, 1926. *Paris Peasant*, trans. Simon Watson Taylor. London; Cape, 1971.

Arato, Andrew and Breines, Paul. *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9.

Baumgartner, Hans Michael and Sass, Hans-Martin.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1945–75. Standpunkte, Entwicklungen, Literatur*. Meisenheim am Glan; Hain, 1978.

Becker, Carl Heinrich. *Gedanken zur Hochschulreform*.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19.

*Bedingungen und Organisation des Widerstandes. Der Kongress in Hannover. Protokolle, Flugblätter, Resolutionen*. Voltaire Flugschriften, 12. Berlin; Voltaire-Verlag, 1967.

Bettelheim, Bruno. *Erziehung zum Überleben. Zur Psychologie der Extremsituation*. Munich;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2.

— *Surviving,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Knopf, 1979.

— 'The Victim' Image of the Anti-Semite; the Danger of Stereotyping the Adversary'. *Commentary*, 5 (1948), 173–9.

Bloch, Ernst. *Erbschaft dieser Zeit*. Zurich; Oprecht & Helbling, 1935; expanded ed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2. *Heritage of Our Times*, trans. Neville Plaice and Stephen Pla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Geist der Utopie*. 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8.

(Gesamtausgabe, vol. 16; *Geist der Utopie. Erste Fass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Böhm, Franz and Dirks, Walter (eds). *Judentum. Schicksal, Wesen und Gegenwart*. 2 vols. Wiesbaden; Steiner, 1965.

Borsdorf, Ulrich and Niethammer, Lutz (eds). *Zwischen Befreiung und Besatzung. Analysen des US-Geheimdienstes über Positionen und Strukturen deutscher Politik 1945*. Wuppertal; Hammer, 1976.

Boveri, Margret. 'Im Dienst der Macht. Kurt Riezler'. *Merkur* (December 1974).

— *Der Verrat im 20. Jahrhundert*, 3; *Zwischen den Ideologien-Zentrum Europa*.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57.

—*Der Verrat im 20. Jahrhundert*, 4; *Verrat als Epidemie; Amerika-Fazit*.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60.

Bracher, Karl Dietrich.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lustes in der Demokratie*. Königstein im Taunus; Athenäum, 1978.

Brecht, Bertolt. *Arbeitsjournal*, ed. Werner Hecht.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4.

Broszat, Martin. *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9.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69.

Buber, Martin et al. *Gabe Herrn Rabbiner Dr. Nobel zum 5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Kauffmann, 1921.

Buckmiller, Michael. 'Karl Korsch und 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Links* (September 1986), 30-1.

—*Karl Korsch und das Problem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Hanover, 1976.

Burian, Wilhelm. *Psychoanalyse und Marxismus. Eine intellektuelle Biographie Wilhelm Reichs*. Frankfurt am Main; Makol, 1972.

Cahn, Peter. 'Zum Frankfurter Musikleben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In Gerhard König and Adam Seide (eds), *Ein halbes Jahrhundert Kunst und Literatur. Was da ist in Frankfurt anhand von Beispielen*, Frankfurt am Main; Eichborn, 1983.

Cantril, Hadley (ed.).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 Common Statements and Individual Papers by a Group of Social Scientists Brought Together by UNESCO*.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0.

Caute, David. *The Great Fear; The Anti-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8.

Coon, Horace. *Columbia; Colossus on the Hudson*. New York; Dutton, 1947.

Cornelius, Hans. *Das philosophische System von Hans Cornelius. Eigene Gesamtdarstellung*. Berlin; Junker & Dünnhaupt, 1934.

—*Transzendente Systematik.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der Erkenntnistheorie*. Munich; Reinhardt, 1916.

Dahrendorf, Ralf. *Die angewandte Aufklärung. Gesellschaft und Soziologie in Amerika*.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68.

Deák, István. *Weimar Germany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 and its Cir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Deakin, Frederick W. R. And Storry, George R. *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 Deutscher, Isaac.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ed. Tamara Deutsch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Dirks, Walter. *Der singende Stotterer. Autobiographische Texte*, Munich; Kösel, 1983.
- *War ich ein linker Sprimmer? Republikanische Texte, von Weimar bis Bonn*. Munich; Kösel, 1983.
- Drüner, Hans. *Im Schatten des Weltkrieges. Zehn Jahre Frankfurter Geschichte von 1914–1924*.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der Stadt Frankfurt am Main, 9. Frankfurt am Main; Hauser, 1934.
- Dünner, Joseph. *Zu Protokoll gegeben. Mein Leben als Deutscher und Jude*. Munich; Desch, 1971.
- Eckert, Christian. 'Aufriss und Aufgaben des Forschungsinstituts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Kölner Vierteljahreshfte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 (1921).
- 'Das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Köln'. In Ludolph Brauer,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Adolf Mayer and Johannes Lemcke (eds), *Forschungsinstitute*, 2 vols, Hamburg; Hartung, 1930.
- Eisenberg, Götz and Linke, Hans-Jürgen (eds). *Fuffziger Jahre*. Giessen, Focus, 1980.
- Erdmann, Karl Dietrich. *Die Weimarer Republik*.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80.
- Evers, Hans Gerhard (ed.). *Das Menschenbild in unserer Zeit*. Darmstädter Gespräche, 1. Darmstadt; Neue Darmstädter Verlagsanstalt, 1950.
- Fekete, Éva and Karádi, Éva (eds). *Georg Lukács. Sein Leben in Bildern, Selbstzeugnissen und Dokumenten*, trans. Miklós Pogány. Stuttgart; Metzler, 1981.
- Feuersenger, Marianne (ed.). *Gibt es noch ein Proletariat?*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 Fichter, Tilman and Lönnendonker, Siegwald. *Kleine Geschichte des SDS. Der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von 1946 bis zur Selbstauflösung*. Berlin; Rotbuch, 1977.
- Flechtheim, Ossip K.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
- Fleming, Donald and Bailyn, Bernard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Flowerman, Samuel H. and Jahoda, Marie. 'Polls on Anti-Semitism; How Much Do They Tell Us?' *Commentary* (April 1946).

Fraenkel, Ernst. *Reformismus und Pluralismus. Materialien zu einer ungeschriebenen politischen Autobiographie*, ed. Falk Esche and Frank Grube. Hamburg: Hoffmann & Campe, 1973.

Franzen, Winfried. *Martin Heidegger*. Stuttgart: Metzler, 1976.

Freud, Sigmund. *Civili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Group Psychology,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and Other Works*, trans. James Strachey. Pelican Freud Library, 12.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Freyer, Hans. *Schwelle der Zeiten.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der Kultur*. Stuttgart: Deutscher Verlags-Anstalt, 1965.

—*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 Logische Grundlegung des Systems der Soziologie*. Leipzig: Teubner, 1930; repr. Stuttgart: Teubner, 1964.

Friedeburg, Ludwig von et al. *Freie Universität und politisches Potential der Student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Berliner Modells und den Anfang der Studentenbewegung in Deutschland*. Neuwied: Luchterhand, 1968.

Gadamer, Hans-Georg. *Philosophische Lehriahre. Eine Rückschau*.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77.

Gay, Peter.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Gehlen, Arnold. *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Sozialpsychologische Probleme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57.

—*Sozialpsychologische Probleme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Tübingen: Mohr, 1949.

—*Studi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 Neuwied: Luchterhand, 1963.

—and Schelsky, Helmut (eds). *Soziologie. Ein Lehr- und Handbuch zur modernen Gesellschaftskunde*. Düsseldorf: Diederichs, 1955.

Gehring, Hansjörg. *Amerikanische Literatu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45–1953. Ein Aspekt des Re-Education-Programms*. Stuttgart: Deutscher Verlags-Anstalt, 1976.

Geiger, Theodor. 'Zur Kritik der arbeiter-psychologischen Forschung'. In Theodor Geiger, *Arbeiten zur Soziologie. Methode, moderne Grossgesellschaft, Rechtssoziologie, Ideologiekritik*, ed. Paul Trappe. Soziologische Texte, 7. Neuwied: Luchterhand, 1962.

Giedion, Sigfried. *Bauen in Frankreich, Bauen in Eisen, Bauen in Eisenbeton*. Leipzig: Klinkhardt & Biermann [1928].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trans. Erwart Matthews.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 for 1938–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Glaser, Hermann (ed.). *Bundesrepublikanisches Lesebuch. Drei Jahrzehnte geistiger Ausein-*

andersetzung. Munich; Hanser, 1978.

—and Stahl, Karl Heinz (eds). *Opposit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Ein Tagungsbericht*. Nürnberg: Nürnberger Gespräche, 4. Freiburg; Rombach, 1968.

Glatzer, Nahum N. 'The Frankfort Lehrhaus'. *Leo Baeck Institute of Jews from Germany, Year Book 1965*. New York; Leo Baeck Institute, 1965.

Gleichmann, Peter R., Goudsblom, Johann and Korte, Hermann (eds). *Human Figurations. Essays for/Aufsätze für Norbert Elias*. Amsterdam; Amsterdams Sociologisch Tijdschrift, 1977.

Graeber, Isacque and Britt, Stuart Henderson (eds). *Jews in a Gentile World: The Problem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2.

Grebling, Helga. *Konservative gegen die Demokratie. Konservative Kritik an der Demokrat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nach 1945*.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Greffrath, Mathias (ed.). *Die Zerstörung einer Zukunft. Gespräche mit emigrierten Sozialwissenschaftler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9.

Greiffenhagen, Martin. *Das Dilemma des Konservatismus in Deutschland*. Munich; Piper, 1977.

Grosz, George. *Briefe 1913–1959*, ed. Herbert Knust.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9.

—*Ein kleines Ja und ein grosses Nein. Sein Leben von ihm selbst erzählt*.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4.

Grube, Frank and Richter, Gerhard. *Das Wirtschaftswunder. Unser Weg in den Wohlstand*. Hamburg; Hoffmann & Campe, 1983.

Grunenberg, Antonia. *Bürger und Revolutionär. Georg Lukács 1918–1928*. Cologne;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6.

Haas, Willy. *Die literarische Welt. Erinnerungen*. Munich; List, 1957.

Hanak, Tibor. *Lukács war anders*. Monographien zur philosophischen Forschung, 114. Meisenheim am Glan; Hain, 1973.

Harms, Bernhard. *Das königliche Institut für Seeverkehr und Weltwirtschaft an der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zu Kiel*. 1916.

—*Das königliche Institut für Seeverkehr und Weltwirtschaft an der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zu Kiel, Kaiser Wilhelm Stiftung. Vierte, anlässlich der Feier der Grundsteinlegung für das neue Haus des Instituts veranstaltete Ausgabe*. Kiel; Broschek, 1918.

— 'Das königliche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und Seeverkehr in Kiel'. In Ludolph Brauer,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Adolf Mayer and Johannes Lemcke (eds), *Forschungsinstit*

tute, 2 vols, Hamburg; Hartung, 1930.

Hartley, Eugene. *Problems in Prejudice*.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6.

Heiber, Helmut. *Die Republik von Weimar*.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78.

Heidegger, Martin.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Bonn; Cohen, 1929, 4th edn, supplemented by the Davos debat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73.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 James S. Churchil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2.

—*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Niemeyer, 1969.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27, 15th edn, supplemented with the author's marginalia, 1979.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Oxford; Blackwell, 1962.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i. Br. am 27. 5. 1933*. Freiburger Universitätsreden, 11. Breslau; Korn, 1933.

Heidegger, Martin. *Was ist Metaphysik?* 1929, 10th ed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69. 'What is Metaphysics?', trans. David Farrell Krell, in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ed. David Farrell Kre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p. 91–112.

Heister, Hanns-Werner and Stern, Dietrich (eds). *Musik der 50er Jahre. Argument-Sonderband*, 42. Berlin; Argument-Verlag, 1980.

Heller, Agnes et al. *Die Seele und das Leben. Studien zum frühen Lukác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Heller, Hermann. *Europa und der Faschismus*. Berlin; de Gruyter, 1929.

—*Rechtsstaat oder Diktatur? 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68. Tübingen; Mohr, 1930.

Hellige, Hans Dieter. 'Generationskonflikt, Selbsthass und die Entstehung antikapitalistischer Positionen im Judentum. Der Einfluss des Antisemitismus auf das Sozialverhalten jüdischer Kaufmanns- und Unternehmersöhne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und in der K. u. K.-Monarchi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4 (1979)

Hempel, Henri Jacob (ed.). *Wenn ich schon ein Fremder sein muss. Deutsch-jüdische Emigranten in New York*. Frankfurt am Main; Ullstein, 1984.

Herhaus, Ernst. *Notizen während der Abschaff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März, 1970.

Hilferding, Rudolf.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Referat und Diskussion*. Sozialökonomische

- Studientexte, 10. Berlin; Rotdruck, 1973. (Reprinted from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tags 1927 in Kiel*, Berlin, 1927, pp. 165–224.)
- Hochkeppel, Willy (ed.). *Die Rolle der Neuen Linken in der Kulturindustrie*. Munich; Piper, 1972.
- Hofstadter, Richar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Knopf, 1963.
- Hughes, H. Stuart. *The Sea Change; The Mi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6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 Hühnerfeld, Paul. *In Sachen Heidegger. Versuch über ein deutsches Genie*. Hamburg; Hoffmann & Campe, 1959.
-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Die Feier der Einweihung des wiederaufgebauten Institutsgebäudes, verbunden mit einer Gedenkfeier für den Begründer des Instituts, Bernhard Harms, am 22. Juni 1951*. Kiel, 1951.
- Jacoby, Henry. *Von des Kaisers Schule zu Hitlers Zuchthaus. Erlebnisse und Begegnungen. Geschichte einer Jugend links-auss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dipa, 1980.
- Jahoda, Marie, Lazarsfeld, Paul F. and Zeisel, Hans.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Ein soziographischer Versuch über die Wirkungen langandauernder Arbeitslosigkeit. Mit einem Anhang zur Geschichte der Soziographie*. Leipzig; Hirzel, 1933, repr. Allensbach,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1960; rep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5. Trans., *Marienthal; The Sociography of an Unemployed Community*, ed Paul F. Lazarsfeld. London; Tavistock, 1972.
-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10 (1965).
- Janowsky, Oscar I. (ed.). *The American Jew: A Reappraisal*.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4.
- Kasdorff, Hans. *Klages im Widerstreit der Meinungen. Eine Wirkungsgeschichte von 1895–1975*. Bonn; Bouvier, 1978.
- Keil, Hartmut (ed.). *Sind oder waren Sie Mitglied? Verhörprotokolle über unamerikanische Aktivitäten, 1947–1956*, trans. Anita Eichholz.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9.
- Kent, Donald Petersen.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 Kesten, Hermann (ed.). *Ich lebe nicht in der Bundesrepublik*. Munich; List, 1964.
- Kettler, David. 'Culture and Revolution. Lukács in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18–19'. *Telos*, 4 (Winter 1971).
- Klages, Ludwig. *Der Geist als Widersacher der Seele*. Leipzig; Barth, 1929.

- Mensch und Erde. Zehn Abhandlungen.* Stuttgart; Kröner, 1956.
- Vom kosmogonischen Eros.* Munich; Müller, 1922.
- 'Vom Traumbewusstsein'. In Ludwig Klages, *Sämtliche Werke*, ed. Ernst Frauchinger, vol. 3;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Bonn; Bouvier, 1974.
- Knütter, Hans-Helmuth. *Die Juden und die deutsche Link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Düsseldorf; Droste, 1971.
- Koch, Thilo (ed.). *Porträts deutsch-jüdischer Geistesgeschichte.* Cologne; DuMont Schauberg, 1961.
- Kommerell, Max.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1919–1944*, ed. Inge Jens. Olten; Walter, 1967.
- König, René. *Leben im Widerspruch. Versuch einer intellektuellen Autobiographie.* Munich; Hanser, 1980.
- Studien zur Soziologie. Thema mit Variation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71.
- Korn, Karl. *Lange Lehrzeit. Ein deutsches Leben.*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79.
- Korsch, Karl. 'Briefe an Paul Partos, Paul Mattick und Bert Brecht. 1934–1939', ed. Michael Vuckmiller and Götz Langkau.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2 (1974).
- Gesamtausgabe*, ed. Michael Buckmiller. 2vols.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 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 Fred Halliday, New York;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 Kracauer, Siegfried.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London; Dobson, 1947.
- 'The Challenge of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6 (Winter 1952–3).
- Das Ornament der Masse. Essay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 Schriften*, vol. 1, ed. Karsten Wit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Contains: *Soziologie as Wissenschaft*, *Der Detektiv-Roman*, *Die Angestellten*.)
- Schriften*, vol. 7, ed. Karsten Wit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Contains: *Ginster. Roman, 1928*, *Georg. Roman, 1934*.)
- Krahl, Hans-Jürgen.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historischen Dialektik von bürgerlicher Emanzipation und proletarischer Revolution. Schriften, Reden und Entwürfe aus den Jahren 1966 bis 1970.* Frankfurt am Main; Neue Kritik, 1971.
- Kreis, Gabriele. *Frauen im Exil. Dichtung und Wirklichkeit.* Düsseldorf; Classen, 1984.

- Krockow, Christian von. *Die Entscheid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Ernst Jünger, Carl Schmitt, Martin Heidegger*. Stuttgart: Enke, 1958.
- Krohn, Claus-Dieter.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7.
- Küster, Otto. *Erfahrungen in der deutschen Wiedergutmachung*. Tübingen: Mohr, 1967.
- Laqueur, Walter. *Weimar: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 New York: Putnam, 1974.
- and Mosse, George L. (eds).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 Lazarsfeld, Paul. *Jugend und Beruf*. Jena: Fischer, 1931.
- 'Wissenschaft und Sozialforschung. Ein Gespräch mit Paul F. Lazarsfeld'.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28 (1976), 794.
- Lederer, Emil. *Kapitalismus, Klassenstruktur und Probleme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1910–1940. Ausgewählte Aufsätze*, ed. Jürgen Kock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9.
- *Planwirtschaft*. Tübingen: Mohr, 1932.
- *State of the Masses: The Threat of the Classless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40.
- Leichter, Käthe. *Leben und Werk*, ed. Herbert Steiner. Vienna: Europaverlag, 1973.
- Lepenies, Wolf (ed.).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Studien zur kognitiven, sozialen und historischen Identität einer Disziplin*. 4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 Lepsius, M. Rainer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1918–1945'.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pecial issue, 23 (1981).
- Leschnitzer, Adolf. *Saul und David. Die Problematik der deutsch-jüdischen Lebensgemeinschaft*. Heidelberg: Schneider, 1954.
- Leser, Norbert. *Zwischen Reformismus und Bolschewismus. Der Austro-marxismus als Theorie und Praxis*. Vienna: Europaverlag, 1968.
- Lessing, Theodor. *Der jüdische Selbsthass*. Berlin: Jüdischer Verlag, 1930.
- Levenstein, Adolf. *Die Arbeiterfrag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ozialpsychologischen Seite des modernen Grossbetriebes und der psychophysischen Einwirkungen auf die Arbeiter*. Munich: Reinhardt, 1912.
- Levin, Murray B. *Political Hysteria in America: The Democratic Capacity for Repres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 Lewin, Kurt.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Selected Papers on Group Dynamics, 1935–1946*, ed. Gertrud Weiss Lewin. New York: Harper, 1948.

- Loewenstein, Rudolph M. *Christians and Jews: A Psychoanalytic Study*, trans. Vera Damman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1.
- Löwith, Karl. 'Curriculum Vitae'. In Karl Löwith, *Sämtliche Schriften*, ed. Klaus Stichweh and Marc B. de Launay, vol. 1. Stuttgart: Metzler, 1981.
-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Ein Bericht*. Stuttgart: Metzler, 1986.
- Lukács, Georg. 'Der Bolschewismus als moralisches Problem', introd. Judith Marcus Tar. *Brecht-Jahrbuch* (1979).
- *Briefwechsel 1902–1917*, ed. Éva Karádi und Éva Fekete. Stuttgart: Metzler, 1982.
-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Dramas*, ed. Frankfurt Benseler. Darmstadt: Luchterhand, 1981.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 Lüschen, Günther (ed.). 'Deutsche Soziologie seit 1945'.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pecial issue, 21 (1979).
- Lynd, Robert S.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
- Lyon, James K. *Bertolt Brecht 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Magnum: Zeitschrift für das moderne Leben* (Cologne). Special issue, *Woher-Wohin. Bilanz der Bundesrepublik* (1961).
- Mann, Katia. *Meine ungeschriebenen Memoiren*, ed. Elisabeth Plessen and Michael Man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76.
- Mann, Thomas. *Die Entstehung des Doktor Faustus. Roman eines Roma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49.
-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68.
- *Schriften und Reden zur Literatur, Kunst und Philosophie*.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68.
- Mannheim, Karl. *Die Gegenwartsaufgaben der Soziologie. Ihre Lehrgestalt*. Tübingen: Mohr, 1932.
- Marcuse, Ludwig. *Mein zwanzigstes Jahrhundert. Auf dem Weg zu einer Autobiographie*. Zurich: Diogenes, 1975.
- Marx-Engels-Archiv. Zeitschrift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in Moskau*, ed. D. Ryazanov (Frankfurt am Main). 2 vols. 1926–8.
- Massing, Hede. *Die grosse Täuschung. Geschichte einer Sowjetagentin*. Freiburg: Herder,

1967.

Maus, Heinz.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n Werner Ziegenfuss (ed.), *Handbuch der Soziologie*, Stuttgart: Enke, 1956.

—*Die Traumhöhle des Justemilieu. Erinnerung an die Aufgab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ed. Michael T. Greven and Gerd van de Moetter.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81.

Mayer, Gustav. *Erinnerungen. Vom Journalisten zum Historike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Zurich: Europaverlag, 1949.

Mayer, Hans. *Ein Deutscher auf Widerruf. Erinnerungen*, vol.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2.

Meng, Heinrich. *Leben als Begegnung*. Stuttgart: Hippokrates, 1971.

Meyer-Levin é, Rosa. *Inside German Communism: Memoirs of Party Life in the Weimar Republic*, ed. David Z. Mairowitz.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Michel, Ernst (ed.). *Die Akademie der Arbeit i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1921—1931*. Frankfurt am Main: Union, 1931.

Middell, Eike et al. *Exil in den USA. Mit einem Bericht: 'Shanghai, eine Emigration am Rande'*. Frankfurt am Main: Röderverlag, 1980.

Mitscherlich, Margarete. 'Freuds erste Rebellin. Karen Horney'. *Emma: Magazin von Frauen für Frauen* (Cologne), 12 (1978), 34—5.

Morse, Arthur D. *While Six Million Died*.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8.

Mosse, George L. *Germans and Jews: The Right, the Left, and the Search for a 'Third Force' in Pre-Nazi Germany*. New York: Fertig, 1970.

Myrdal, Gunnar.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4.

*Neue Blätter für den Sozialismus. Zeitschrift für geistige und politische Gestaltung*, ed. Eduard Heimann, Fritz Klatt and Paul Tillich (Frankfurt am Main). 1930—3.

Neuloh, Otto. *Die deutsche Betriebsverfassung und ihre Sozialformen bis zur Mitbestimmung*. Tübingen: Mohr, 1956.

—*Der neue Betriebsstil. Untersuchungen über Wirklichkeit und Wirkungen der Mitbestimmung*. Tübingen: Mohr, 1960.

Neumann, Franz et al. *The Cultur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

Neumark, Fritz (ed.). *Individuum und Organisation. Darmstädter Gespräche*, 4. Darmstadt: Neue Darmstädter Verlagsanstalt, 1954.

- Neurath, Otto.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 ed. Marie Neurath and Robert S. Cohen. Vienna Circle collection, 1. Dordrecht; Reidel, 1973.
- Noth, Ernst Erich.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Hamburg; Classen, 1971.
- Oppenheimer, Franz (ed.). *Erlebtes, Erstrebtes, Erreichtes. Lebenserinnerungen*. Düsseldorf; Melzer, 1964.
- Otto, Karl A. *Vom Ostermarsch zur APO. Geschichte der ausserparlamentarischen Opposit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1960–70*.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77.
- Parker, James. *Antisemitismus*. Munich, 1964.
- Pfeiffer, Arnold (ed.). *Religiöse Sozialisten. Dokumente der Weltrevolution*, 6. Olten; Walter, 1976.
- Pirker, Theo et al. *Arbeiter, Management, Mitbestimmung. Eine industrie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Struktur, der Organisation und des Verhaltens der Arbeiterbelegschaften in Werken der deutschen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 für die das Mitbestimmungsgesetz gilt*. Stuttgart; Ring, 1955.
- Plessner, Monika. 'Die deutsche "University in Exile" in New York und ihr amerikanischer Gründer'. *Frankfurter Hefte* (March 1964).
- Popitz, Heinrich et al. *Das Gesellschaftsbild des Arbeiters.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n der Hüttenindustrie*. Tübingen; Mohr, 1957.
- Preller, Ludwig.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Mittelbach, 1949.
- Pross, Helge.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41*.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55.
- Radkau, Joachim. *Die deutsche Emigration in den USA. Ihr Einfluss auf die amerikanische Europapolitik 1933–1945*. Studien zur modernen Geschichte, 2.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1971.
- Radnitzky, Gerard.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Metascience*. 3<sup>rd</sup> edn. Chicago; Regnery, 1973.
- Regler, Gustav. *Das Ohr des Malchus. Eine Lebensgeschichte*. Cologne; Kiepenhauer & Witsch, 1958.
- Reich, Willi. *Arnold Schönberg oder Der konservative Revolutionär*.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74.
- Reinhardt, Stephan (ed.). *Lesebuch; Weimarer Republik. Deutsche Schriftsteller und ihr Staat von 1918 bis 1933*. Berlin; Wagenbach, 1982.
- Riezler, Kurt. *Tagebücher, Aufsätze, Dokumente*, ed. Karl Dietrich Erdman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2.
- Ringer, Fritz K.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

- ty, 1890–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Rogin, Michael Paul. *The Intellectuals and McCarthy; The Radical Spect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7.
- Rosenberg, Arthur. *Demokratie und Klassenkampf. Ausgewählte Studien*, ed. Hans-Ulrich Wehler. Frankfurt am Main: Ullstein, 1974.
- *Die Entsteh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d. Kurt Kersten.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1.
-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ed. Kurt Kersten.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Anstalt, 1961.
- Rühmkorf, Peter. *Die Jahre die Ihr kennt. Anfälle und Erinnerung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2.
- Ruppin, Arthur. *Soziologie der Juden*. 2 vols. Berlin; Jüdischer Verlag, 1930.
-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 Winter 1970). Special issue,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 Sartre, Jean-Paul. *Anti-Semite and Jew*, trans. George J. Becker. New York; Schocken, 1965. [ *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 Paris; Morihien, 1946. ]
- Schäfer, Gert and Nedelmann, Carl (eds). *Der CDU-Staat. Analysen zur Verfassungseirktlichkeit der Bundesrepublik*.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9.
- Schäfers, Bernhard (ed.). *Soziologie und Sozialismus. Organisation und Propaganda. Abhandlungen zum Lebenswerk von Johann Plenge*. Stuttgart; Enke, 1967.
- Schelsky, Helmut. *Auf der Suche nach Wirklichkeit*. Gesammelte Aufsätze. Düsseldorf; Diederichs, 1965.
- *Ortsbestimmung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Düsseldorf; Diederichs, 1959.
- *Soziologie der Sexualität. 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Geschlecht, Moral, und Gesellschaft*.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55.
- *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Familie in der Gegenwart. Darstellung und Deutung einer empirisch-soziologischen Tatbestandsaufnahme*. Dortmund; Ardey, 1953.
- Schmidt, Eberhard. *Die verhinderte Neuordnung 1945–1952. Zur Auseinandersetzung um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Wirtschaft in den westlichen Besatzungszonen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8th edn.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81.
- Schnädelbach, Herbert.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1831–193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3.
- Schneeberger, Guido. *Nachlese zu Heidegger. 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 Berne; Schneeberger, 1962.

Schoenberg, Arnold. *Theory of Harmony*, trans. Robert D. W. Adams. [Abridged.]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8.

— *Style and Idea*, ed. and trans. Dika Newl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Scholem, Gershom. *From Berlin to Jerusalem; Memories of My Youth*,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80.

— *Über einige Grundbegriffe des Judentum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 'Zur Sozialpsychologi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900–1930'. In Rudolf von Thadden (ed.), *Die Krise des Liberalismus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8.

Schraepfer, E. and Michaelis, Herbert (eds).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Eine Urkunden- und Dokumentensammlung*, vol. 3; *Der Weg in die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1959.

Schulz, Walter. 'Über den philosophiegeschichtlichen Ort Martin Heideggers'. In Otto Pöggeler (ed.), *Heidegger. Perspektiven zur Deutung seines Werks*, Cologne: Kiepenhauer & Witsch, 1969, pp. 95–139.

Silone, Ignazio. *Der Faschismus. Seine Entstehung und seine Entwicklung*. Zürich: Europaverlag, 1934.

Simmel, Ernst (ed.). *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6.

Smith, R. Harris.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Söllner, Alfons (ed.). *Zur Archäologie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Analysen politischer Emigranten im amerikanischen Geheimdienst*, vol. 1; 1943–1945.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82.

Sontheimer, Kurt.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78.

Staiger, Emil. *Die Kunst der Interpretation. Studien zu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Zürich: Atlantis, 1955.

Stollberg, Gunnar. *Die Rationalisierungsdebatte 1908–1933. Freie Gewerkschaften zwischen Mitwirkung und Gegenwehr*.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1.

Stolper, Toni. *Ein Leben in Brempunkten unserer Zeit-Wien, Berlin, New York-Gustav Stol-*

per 1888–1947.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Stuchlik, Gerda. *Goethe im Braunhied. Universität Frankfurt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Röderberg, 1984.

Szondi, Peter. *Über eine 'Freie (d. h. freie) Universität'*. *Stellungnahmen eines Philologen*, ed. Jean Bollac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Tillich, Hannah. *From Time to Time*. New York: Stein & Day, 1973.

Tillich, Paul. *Gesammelte Werke, vol. 4: Philosophie und Schicksal. Schriften zur Erkenntnislehre und Existenzphilosophie*. Stuttga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rk, 1961. [Includes German translations of various wor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Philosophy and Fate*, Chicago, 1948; 'Realism and Faith', *The Protestant Era*, Chicago, 1948; 'Participation and Knowledge: Problems of an Ontology of Cognition', in *Sociologica I.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 am Main, 1955; 'Existenti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 (1944);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xistentialist Thought', *Journal of Philosophy*, 53 (1956); 'Estrangement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Thought', *Review of Religion*, 9 (1944).]

—*Gesammelte Werke, vol. 12: Begegnungen. Paul Tillich über sich selbst und andere*. Stuttga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rk, 1971. [Includes German translations of various wor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in Charles W. Kegley and Robert W. Brettal (eds), *The Theology of Paul Tillich*,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pp. 3–21; 'How Much Truth is in Karl Marx?', *Christian Century* (Chicago), 65 (1948), 906–8; 'Marx' View of History', in *Culture in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Paul Rad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631–41;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Pastoral Psychology*, 2, 15 (1951), 62–6, etc.]

—*Die sozialistische Entscheidung*. Potsdam; Protte, 1933.

Töpner, Kurt. *Gelehrte Politiker und politisierende Gelehrte. Die Revolution von 1918 im Urteil deutscher Hochschullehrer*.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Geistesgeschichte, 5. Göttingen; Musterschmidt, 1970.

Vagts, Alfred. *Deutsch-Amerikanische Rückwanderung. Probleme-Phänomene-Statistik-Politik-Soziologie-Biographie*.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supplement 6. Heidelberg; Winter, 1960.

Vogt, Hans. *Neue Musik seit 1945*. stuttgart: Reclam, 1972.

Wagenbach, Klaus, Stephan, Winfried and Krüger, Michael (eds). *Vaterland, Muttersprache. Deutsche Schriftsteller und ihr Staat seit 1945. Ein Nachlesebuch für die Oberstufe*. Berlin; Wagenbach, 1979.

- Walter, Hans-Albert.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50*, vol. 1; *Bedrohung und Verfolgung bis 1933*. Darmstadt; Luchterhand, 1972.
-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50*, vol. 2; *Asylpraxis und Lebensbedingungen In Europa*. Darmstadt; Luchterhand, 1972.
-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50*, vol. 4; *Exilpresse*. Stuttgart; Metzler, 1978.
- Weber, Hermann.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
- Wehr, Gerhard. *Paul Tillich*.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9.
- Wende, Erich. *C. H. Becker. Mensch und Politiker. Ein biographischer Beitrag zur Kultur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Deutscher Verlags-Anstalt, 1959.
- Werk und Wirken Paul Tillichs. Ein Gedenkbuch*. Stuttga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rk, 1967.
- Westernhagen, Dörte von. 'Wiedergutmacht?' *Die Zeit*, 5 October 1984, pp. 34–5.
- Wiese, Leopold von. 'Zur Einföhrng. Die gegenwärtigen Aufgaben einer deutsche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Kölner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 (1921).
- Wilbrandt, Robert. *Ihr glücklichen Augen. Lebenserinnerungen*. Stuttgart; Mittelbach, 1947.
- 'Sind die Sozialisten sozialistisch genug?' *Sozialismus und Kultur* (Berlin), 3 (1919).
- Sozialismus*. Jena; Diederichs, 1919.
- Wissenschaftliche Schriftenreihe des Instituts zur Förderung öffentlicher Angelegenheiten*, vol. 13;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Meinungs- und Marktforschung. Methoden und Probleme*. Frankfurt am Main; Roter Stern, 1977.
- Wolff, Frank and Windaus, Eberhard (eds). *Studentenbewegung 1967–69. Protokolle und Materialien*. Frankfurt am Main; Roter Stern, 1977.
- Wolff, Kurt (ed.). *Gespräche mit Sozialisten*. Munich, 1971.
- Wyss, Dieter. *Psychoanalytic Schools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rans. Gerald Onn. New York; Arnoson, 1973.
- Young-Bruehl, Elisabeth.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Ziegler, Heinz O. *Autoritärer oder totaler Staat*. 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90. Tübingen; Mohr, 1932.
- Zudeick, Peter. *Der Hintern des Teufels. Ernst Bloch-Leben und Werk*. Moos, Baden-Baden; Elster, 1985.

# 索引

本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译者注

- Aalto, Alvar 阿尔瓦·阿尔托 203
- Abendroth, Wolfgang 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 431, 543-4, 555-6, 559, 562, 627
- Abrams, Mark 马克·艾布拉姆斯 151, 269
- Ackerman, Nathan 纳森·埃克曼 380, 427-8
- 'Actuality of Philosophy, The' "哲学的现状" (阿多诺) 93-4
- Adenauer, 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21, 441, 443, 444, 509, 550-1, 562
- Aderler, Friedrich 弗里德利希·阿德勒 22, 34
- Aderler, Max 马克斯·阿德勒 22, 34, 61
- Aderler, Victor 维克托尔·阿德勒 166
- 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西奥多·魏森格隆德-阿多诺 3-4, 41, 52, 66-95, 644-53
- Aesthetic Theory* 《美学理论》600, 636, 645, 650-1
- and anti-Semitism 与反犹太主义 308-10; project on 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273, 274, 276-7, 369-74, 376
- on art 论艺术 187, 645-53
- 'Art for Mass Consumption' "面向大众消费的艺术" 213
- an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与《权威主义人格》415-24
- and Benjamin 与本雅明 81, 91, 92, 94, 97, 163-4, 191-5, 210-18
- and Bloch 与布洛赫 67, 69, 70, 75-6, 90, 91, 97, 190-1, 581-2
- correspondence with Kracauer 与克拉考尔的通信 86
- and the *dialectics project* 与辩证法项目 177, 187-9, 263, 314-50

and Frankfurt University 与法兰克福大学 403-4  
 and Fromm 与弗洛姆 266-7  
 and *Group Experiment* 与《组群实验》472-8  
 and Habermas 与哈贝马斯 555  
 and Heidegger 与海德格尔 593-6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46, 82, 93, 106, 156-65  
 on Husserl 论胡塞尔 531-5, 536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与独立研究 508-19  
 and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与社会研究所 252  
*Jargon of Authenticity* 《本真性的行话》582, 596  
 and Lazarsfeld 与拉萨斯菲尔德 235-43  
 and literature 与文学 519-30  
 in Los Angeles 在洛杉矶 312-13  
 and Lowenthal 与洛文塔尔 64, 65-6  
 and Marcuse 与马尔库塞 134, 221-2  
 and Marcuse's *Eros and Civilization* 与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503-4  
*Minima Moralia* 《伦理随想录》266, 371, 392, 394-6, 458, 503, 508, 509, 511  
 on nature 关于自然 187, 649-50  
*Negative Dialectics* 《否定辩证法》496, 530, 582, 595, 597-609, 644  
*Notes on Literature* 《文学笔记》536-7  
 and Oxford University 与牛津大学 157-8  
 and philosophy 与哲学 530-7  
 radio debate with Gehlen 与盖伦的广播辩论 588-90  
 'Resurre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y' "德国文化的复兴" 447  
 and social research 与社会研究 450-6  
 and the student protest movement 与学生抗议运动 619-21, 627-8  
 'Teamwork in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中的协同工作" 494-6  
 and the West German political study 与西德政治研究 439-41  
 'Why Philosophy?' "哲学还能为什么?" 531-2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与《社会研究学刊》118, 121-2  
*see also music;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又见音乐;《哲学断片》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Adorno on 阿多诺论美学的建构 91-3  
*Aesthetic Theory* (Adorno)《美学理论》(阿多诺)600, 636, 645, 650-1  
 aleatoric music 偶然音乐 514-15  
 Alexander, Eduard Ludwig 爱德华·路德维希·亚历山大 15

Alexander, Gertrud 格特鲁特·亚历山大 15

alienation 异化 586, 587

Allport, Gordon 戈登·阿尔波特 239, 363, 379, 380, 400

Altmann, Rüdiger 吕蒂格尔·阿尔特曼 596

American Congress for the Freedom of Culture 美国文化自由大会 406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JC)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274, 276, 295, 351, 352-3, 354, 355, 357, 363, 382, 479

Anders, Günther 君特·安德斯 529, 552, 658

Andersch, Alfred 阿尔弗雷德·安德希 401

    Anthropology, and egoism 利己主义和人类学 181-3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Horkheimer and Adorno on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论 308-10, 338-43

    project 项目 273, 274, 275-7, 295, 319-21, 326-7, 350-80

    and the west German political study 与西德政治研究 441

*See also Studies in Prejudice* 另参见《偏见研究》

*Anti-Semitism among American Labor* (Gurland, Massing, Lowenthal and Pollock) 《美国劳工中的反犹主义》(古尔兰德、马辛、洛文塔尔和波洛克) 367-9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ckerman and Jahoda) 《反犹主义与情绪失常》(埃克曼与雅胡达) 427-8

Apel, Karl-Otto 卡尔-奥托·阿贝尔 571, 639

Aragon, Louis 路易·阿拉贡 200-1

Archive (Journal) 《档案》(杂志) 29, 30, 50, 64, 66, 116-17

'Are the socialists socialist enough?' (Wilbrandt) “社会主义者真正够得上社会主义者吗?” (维尔布兰特) 10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311, 563, 574

Aron, Raymond 雷蒙·阿隆 387

art 艺术

    Adorno on 阿多诺论艺术 187, 645-53

    Benjamin on 杰雅明论艺术 204-8, 211-13

    Marcuse and Lowenthal on 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论艺术 218-22

Ascoli, Max 马克斯·阿斯考利 256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亚细亚生产方式 176

astrology project 占星术研究项目 458-9

Austria, Social Democracy in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28

authoritarian forms of society 独裁的社会形式

-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 《权威主义人格》 373, 411-24, 428, 435, 437, 439, 442  
and *Group Experiment* 与《组群实验》 472, 473
- authority 权威  
and the family, research on 与家庭研究 137-41, 149-56  
research into women students' attitudes to authority 女性学生对于权威态度的研究 165
- Bach, Johann Sebastian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536
- Bachmann, Josef 约瑟夫·巴赫曼 626
- Balázs, Béla 贝拉·巴拉兹 78
- Ballod, Karl 卡尔·巴洛特 10
- basis-proble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的基础问题 571-2
- Bataille, Georges 乔治·巴塔耶 349
- Baudelaire, Charles 查尔斯·波德莱尔 523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波德莱尔 195, 196, 206, 208-10, 213, 214-15, 216
- Bauer, Bruno 布鲁诺·鲍尔 55
- Bauer, Otto 奥托·鲍尔 22, 34, 166, 223
- Baumeister, Willi 威廉·波密斯特 519
- Beard, Charles A. 查尔斯·A·比尔德 176
- Bebel, August 奥古斯特·倍倍尔 31, 32
- Becker, Carl Heinrich 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 19, 35
- Becker, Egon 埃贡·贝克尔 460
- Becker, Helmut 赫尔穆特·贝克尔 479
- Becker, Oskar 奥斯卡·贝克尔 538
- Beckett, Samuel 塞缪尔·贝克特 525-30, 646, 647
- Beginning of the Bourgeo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Horkheimer) 《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霍克海默) 51
- Behemoth* (Neumann) 《巨兽》(诺伊曼) 228, 285-6, 290, 293
- Being and Time* (Heidegger) 《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 5, 39, 96, 98-101, 577, 592
- Benda, Julien 朱利安·本达 332
- Benedict, Ruth 鲁思·本尼迪克特 269
- Benjamin, Walter 瓦尔特·本雅明 52, 69, 82-9, 260, 262, 310-12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81, 91, 92, 94, 98, 160, 163-4, 210-18  
Adorno's criticism of 阿多诺的批评 531

- on art 论艺术 204-8, 211-13
- and Bloch 与布洛赫 189, 190
- Concept of Art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 《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85
- death 死亡 310-11
- 'Dialogue on Contemporary Religiosity' "关于当代虔诚的对话" 217
- 'Eduard Fuchs, Collector and Historian' "爱德华·福赫斯: 收藏家和历史学家"  
163, 196, 210, 311
- 'Experience and Poverty' "经验与贫乏" 206
- Goethe's Elective affinities* 《歌德的〈亲和力〉》86-7
-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163-4 194, 195, 196, 210, 311-12
- and the Institute in exile 与流亡的研究所 134-5
- One-way street* 《单向街》192, 201
- Origin of German Tragedy* 《德国悲苦剧的起源》86, 87-8, 95
- Passenger-Werk* 《拱廊街》89, 160-1, 190, 191-7, 206, 208-18
- 'Programme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 "未来哲学论纲" 85-6
- 'Small History of Photography' "摄影小史" 205
-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历史哲学论纲" 216, 281, 311, 327, 607
- 'Wayward Young Neighbours, The' "任性的青年邻居们" 86
- Benn, Gottfried 哥特弗里德·本 523-4
- Bense, Max 马克斯·本泽 405-6
-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182
- Berg, Alban 阿尔班·贝尔格 72-3, 74, 75, 516, 527
- Berkeley anti-Semitism project 柏克利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360-1, 362, 367, 370-1,  
372, 373, 374, 375, 377, 378, 440
- and character structure 与性格结构 435
- and *Study in Prejudice* 与《偏见研究》410-11, 413, 420, 421, 423
- Berlin Free University 柏林自由大学 616-17
- Bernfeld, Siegfried 西格弗里德·伯恩费尔德 54, 55, 166
- Bernstein, Eduard 爱德华·伯恩斯坦 31, 32, 219
- Bettelheim, Bruno 布鲁诺·贝特海姆 379-80, 426, 427, 470
- Biehahn, Walter 瓦尔特·比哈恩 34
-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259
- Bloch, Ernst 恩斯特·布洛赫 65, 77, 80, 82, 85, 658
-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67, 69, 70, 75-6, 90, 91, 97, 190-1, 581-2
- Heritage of Our Times* 《我们时代的遗产》189-90

*Principle of Hope* 《希望的原则》 500

Bohlen, Krupp von 克虏伯·冯·波伦 20

Böhm, Franz 弗朗茨·伯姆 551

Bolshevism, Lukacs on 卢卡奇论布尔什维克主义 78-9

Bonss, Wolfgang 沃尔夫冈·彭斯 171, 175

Borkenau, Franz 弗朗茨·伯克瑙 124-5, 256

Boulez, Pierre 皮埃尔·布莱兹 514

bourgeois anthropology, and egoism 资产阶级人类学, 与唯我论 181-3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Idea and Ideology' (Habermas)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观念与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 556-61

Brandt, Willy 维利·勃朗特 588, 636, 656

Braun, Otto 奥托·布劳恩 35

Brecht, Berthold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82, 89, 191, 211, 292, 599

and US anti-communism 与美国的反共产主义 389-90

Briffault, Robert 罗伯特·布里富尔特 137-8

Brückner, Peter 彼得·布鲁克纳 509

Buback, Siegfried 西格弗里德·布巴克 656

Buber, Martin 马丁·布伯 53, 110, 343

Budenz, Louis 路易·布登茨 389

Bühler, Charlotte and Karl 夏洛特·比勒尔和卡尔·比勒尔 166, 167, 359, 476

Burckhardt, Jacob 雅克布·布克哈特 318

Busoni, Ferruccio 费卢西奥·布索尼 72

Butler, Nicholas Murray 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 144-5

Cage, John 约翰·凯奇 514

California, Horkheimer in 霍克海默在加利福尼亚 249

Cantril, Hadley 哈德莱·坎特里尔 239, 240, 214, 470

*Capital* (Marx) 《资本论》(马克思) 89, 186, 195, 316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及 89

and ethnocentrism 与民族优越感 420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及 401

Pollock on 波洛克论及 119

state capital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国家资本主义, 与国家社会主义 280-91

Carnap, Rudolf 鲁道夫·卡尔纳普 101, 166

- Cassirer, Ernst 恩斯特·卡西尔 101
- Celan, Paul 保尔·策兰 528, 647
-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Kirchheimer) “政治妥协的结构转型” (基希海默) 235
- China 中国 117, 175-6, 257-8, 383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 and Fromm 与弗洛姆 56-7, 58, 152
  - and Judaism 与犹太教 341
- Christie, Richard 里查德·克里斯蒂 425, 465
- civil rights 公民权 613
- class 阶级
- and anti-Semitism 与反犹太主义 369, 376
  - and family structure 与家庭结构 139-41
- class conflict,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阶级冲突 50
- Cohn-Bendit, Daniel 达尼埃尔·柯恩-本迪 626
- Cologne 科隆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科隆社会科学研究所 19-21
  -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科隆社会学研究所 27, 28
  - university 科隆大学 20
-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144-6, 250, 251, 263-4, 278
-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与法兰克福研究所 402-3
  - and Marcuse 与马尔库塞 296-8
  - and Neumann 与诺伊曼 293
-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 German see KPD 德国共产党参见 KPD
  - Hungarian 匈牙利共产党 78-9
- Communists 共产主义者
- and character type 与性格类型 173-5
  - see also United States, anti-communism 另参见美国, 反共产主义
- Composing for the films* (Adorno and Eisler) 《电影作曲原理》(阿多诺与艾斯勒) 322, 386, 390
- Concept of the Unconscious in the Transcendental Theory of Mind* (Adorno) 《先验心灵学说中的无意识概念》(阿多诺) 81-2
-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595-92
- and anti-Semitism 与反犹太主义 373, 374, 419-20

- dispute 争论 382-92
-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与法兰克福学派 657
- Cornelius, Hans 汉斯·柯奈留斯 64, 65, 66
-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70, 81-2
-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44, 45, 46, 47
- Cosmogonic Eros, The (Klages)* 《宇宙化生的爱欲》(克拉格斯) 8-9, 200
- 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人民代表委员会 10
- Crespi, Leo P. 列奥·P. 克雷斯基 451
- Criminal law, Kirchheimer on 基尔海默论刑法 232, 233-5
- 'Criminal Law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Kirchheimer)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刑法"(基尔海默) 235
-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1, 2, 186, 279, 401, 658, 659
- and critical social research 与批判的社会研究 455
-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关于批判理论 445-6
- and Marcuse's *Eros and Civilization* 与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498-9
- Neumann on 诺依曼论批判理论 290-1
- See also student protest movement 另参见学生抗议运动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Kant) 《纯粹理性批判》(康德) 67
-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 357-8
- of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的文化人类学 429
- 'Cultural Asp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project) "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面面观"(项目) 277
- culture 文化
- and the German research project 与德国研究计划 274-5
- Marcuse on 马尔库塞论文化 220-2
- culture industry 文化工业 337, 458
-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见《启蒙辩证法》401-2
- Dahrendorf, Ralf 拉尔夫·达伦多夫 471, 489, 537, 561, 567
- Darmstad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达姆施塔特社会科学研究所 451
- community studies 社群研究 453, 456, 508
- Dasein* ( 'Being-there' ) 此在 51, 95, 98-101, 594
- Dawn (Horkheimer) 《破晓》(霍克海默) 39, 47, 106, 127, 268
- democracy 民主
- and anti-Semitism 与反犹太主义 417-18

- and political disposition 与政治意向 552-3
-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与政治参与 548-50
-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125
- Deutscher, Isaac 伊萨克·多伊彻 340
-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gma* (Fromm) 《基督教义的发展》(弗洛姆) 116
-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启蒙辩证法》 319, 322-50, 356, 357, 393, 394, 401-2, 421, 430, 447, 469, 496
- and language 与语言 506-7
- dialectical theology 辩证神学 98
- dialectics project 辩证法项目 177-91, 314-50
- Dietzgen, Joseph 约瑟夫·狄慈根 178
- Dilthey, Wilhelm 威廉·狄尔泰 77, 97, 102, 576
- Dirks, Walter 瓦尔特·迪尔科斯 469, 470, 471, 486
- Donovan, William J. (‘Wild Bill’) 威廉·J. 多诺万 (‘野蛮的比尔’) 294
- Dos Passos, 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 519
- Dostoevsky, F. F. 陀思妥耶夫斯基 78, 219-20
- Draht, Martin 马丁·德拉特 230
- dreams, Klages on 克拉格斯论梦 197-200
- Dregg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 656
- Dubiel, Helmut 赫尔穆特·杜比艾尔 132
- Dünner, Joseph 约瑟夫·杜纳尔 40, 112
- Dutschke, Rudi 鲁迪·达什克 618-19, 622, 624, 626, 628, 630, 631
- Dynamics of prejudice* 《偏见动力学》 426-8
- Eckert,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埃克特 20, 27-8
- Eckstein, Gustav 古斯塔夫·埃克施泰因 22
- Eclipse of Reason* (Horkheimer) 《理性之蚀》(霍克海默) 313, 319, 322, 325, 332, 344-50, 393, 431, 447, 501
- economics, Pollock on 波洛克论经济 61-4
- Edwards, Allen L. 艾伦·L. 爱德华兹 352
- ‘Egoism and the Freedom Movement’ (Horkheimer) “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霍克海默) 180-3, 314, 336, 342
- Ehrlich, Paul 保罗·埃尔利希 12
-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380, 443
- Eisler, Gerhart 戈尔哈特·艾斯勒 389

Eisler, Hanns 汉斯·艾斯勒 72, 74, 254, 292, 322, 386  
 and US anti-communism 与美国的反共产主义 389-90

Eisner, Kurt 库尔特·艾斯纳 96

Elias, Norbert 诺伯特·埃利亚斯 111

Eliot, T. S. T. S. 艾略特 523

Elster, Ludwig 路德维希·埃尔斯特 22

*Endgame* (Beckett) 《终局》(贝克特) 525, 526-7, 530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与法兰克福研究所 31-3

Fromm on 59 弗洛姆论恩格斯  
 and Pollock 60 与波洛克  
 and state capitalism 与国家资本主义 281

English Fabian Society 英国费边社 11

enlightenment, critique of 对启蒙的批判 327-30, 333-7, 338

Enzensberger, Magnus 马格努斯·恩岑斯贝尔格 598

Eppler, Erhard 艾哈德·艾普勒 595

Erhard, Ludwig 路德维希·艾哈德 466, 596

*Eros and Civilization* (Marcuse) 《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 463, 468, 470, 496-504, 507, 608

Escape from Freedom (Fromm) 《逃避自由》(弗洛姆) 264, 270, 272-3

existential philosophy 存在哲学 136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534

'Experience and Poverty' (Benjamin) “经验与贫乏”(本雅明) 206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11

family, the, research on 对于家庭的研究 137-41, 149-56

Fanon, Frantz 弗朗茨·法依 611

fascism, *see also* Nazism 法西斯主义 另见纳粹主义  
 Adorno on 122 阿多诺论法西斯主义  
 F-scale 法西斯主义量表 372, 373, 374, 410-11, 412, 413-14, 416  
 in Germany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 109  
 and individual attitudes 法西斯主义与个人态度 352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法西斯主义与社会研究所 256-7  
 Kirchheimer on 基希海默论法西斯主义 235-6  
 and the United States 法西斯主义与美国 248

- writings of Horkheimer circle on 霍克海默圈子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作 142, 143
- Faulkner, William 威廉·福克纳 401, 519
- Favez, Madame 法薇女士 248-9, 253, 259-60
-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see* West Germany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参见 西德
- Fegiz, P. L. P.L. 费齐兹 451
- Fehér, Ferenc 费伦克·费艾尔 78
- Feiler, Arthur 阿尔托·费勒 256
- Fenichel, Otto 奥托·费尼赫尔 359
- Ferenczi, Sandor 山德尔·费伦茨 266
- Feuchtwanger, Lion 莱昂·福伊希特万格 292
- Feuerbach, Ludwig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55
- Fichte, Johann Gottlieb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 185, 545
- Filbinger, Hans 汉斯·菲尔宾格 656, 657
- Finlay, Moses (Finkelstein) 莫西·芬莱 (芬克尔斯坦因) 249, 383
- First World War, and Horkheimer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霍克海默 42-4
- Fischer, Ruth 路丝·费舍 389
- Flechtheim, Ossip K. 奥斯比·K. 弗莱希特海默 562
- Flowerman, Samuel H. 萨缪尔·H. 弗洛瓦尔曼 378, 396, 397, 409
- Fogarasi, Béla 贝拉·福加拉西 15
-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4, 659
-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Kautsky) 《基督教之基础》(考茨基) 58
- Fraenkel, Ernst 恩斯特·弗兰克尔 223, 224, 230
- France, research on the family 法国对于家庭的研究 139, 141
- Frankfurt 法兰克福
- Free Jewish School 自由犹太人读书之家 53, 54, 65
  -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研究所 54-5
  - Jewish community 犹太社群 17
  - Post-war return of Institute to 战后重返研究所 402, 403, 431-5
  -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精神分析研究所 47
  - university 法兰克福大学 17, 18, 20, 34-5, 110-11, 113, 129, 434-5; Adorno at 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 403-5; 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 Horkheimer at 44-7, 397, 398-9, 407, 442, 446-7; 与学生抗议运动 and the student protest movement 626
  - 'Frankfurt Contributions to Sociology' "法兰克福社会学文献" 482, 487-8, 494, 655
  - 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financing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财政 20

- move to Geneva 迁往日内瓦 109-10, 127-35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迁往美国 143-8  
 Paris branch 巴黎分部 133  
 research facilities 研究设备 29  
 role as mediator 所起的中介作用 32  
*see also*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另参见 社会研究所  
 Frankfurt Psychoanalytical Institute 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 41  
 Frankfurter, Felix 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227  
 free will, Adorno on 阿多诺论自由意志 604-5  
 freedom, Adorno on 阿多诺论自由 605, 607  
 Freiburg School 弗莱堡学派 466  
 Frenkel-Brunswik, Else 埃尔丝·福伦克尔-布伦斯维克 359-60, 374, 376, 408-9,  
 410-11, 415  
 Freud, Sigmund 西蒙·弗洛伊德 129, 436, 638  
     and Fromm 与弗洛姆 54, 56, 151, 153, 186, 166-7, 268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39, 48  
     and Horney 与霍尔尼 269-70  
     and Marcuse's *Eros and Civilization* 与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499, 502  
 Freyer, Hans 汉斯·弗赖尔 540, 543, 576-7, 582, 584, 586  
 Freyhold, Michaela von 米夏尔拉·冯·弗雷霍尔德 655  
 Freytag, Gustav 古斯塔夫·弗莱塔克 123  
 Friedeburg, Ludwig von 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 438, 480-1, 487, 488, 490,  
 537, 547, 553, 563, 616, 633, 654  
 Friedmann, Georges 乔治·弗里德曼 470, 540  
 Friedrich, Carl J. 卡尔·J. 弗里德利希 255-6, 351  
 Friedrich, Hugo 胡戈·弗里德里希 523  
 Friedrich, Walter 瓦尔特·弗里德里希 110  
 Frölich, Ernst 恩斯特·弗勒里希 34  
 Frölich, Paul 保罗·弗勒利希 13  
 Fromm, Erich 埃里希·弗洛姆 41, 165, 168, 176-7, 247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160  
     biographical details 生平资料 52-60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gma* 《基督教义的发展》116  
     and the dialectics project 与辩证法项目 177  
     *Escape from Freedom* 《逃避自由》264, 270, 272-3

-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在社会研究所 251, 253; break with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与社会研究所决裂 265-73
- and Lowenthal 与洛文塔尔 64, 65
- and Marcuse 与马尔库塞 653-4
- and Marcuse's *Eros and Civilization* 与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 499
-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迁往美国 146
- and psychoanalysis 与精神分析 53-5, 177, 186
- and research on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与德国工人阶级研究 169-75
- and *Studies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与《权威与家庭研究》 150, 151-4, 155, 272, 374, 375
- 'The Social Determination fo Psychoanalytic Theory' "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决定因素" 161
-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与《社会研究学刊》 117, 118, 119-20
- Fromm, Seligmann 赛里格曼·弗洛姆 52
- Fuchs, Eduard 爱德华·福赫斯 195
- Fukumoto, Kuzuo 福本恒夫 15
- Gadamer, Hans-Georg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404, 462, 463, 563, 574, 579
- Gallup, George 乔治·盖洛普 451
- gardening conservatism 园丁保守主义 595
- Gehlen, Arnold 阿诺德·盖伦 538, 540, 541, 534, 574, 582, 853, 584, 586, 587, 588-92
- Geiger, Rupprecht 鲁普雷希特·盖格尔 519
- Geiger, Theodor 西奥多·盖格 116
- Gelb, Adhémar 埃德马尔·戈尔布 44
- George circle 格奥尔格圈子 69
- George, Stefan 斯泰凡·格奥尔格 521, 524
- Geraberg meeting (1923) 格拉贝尔格会议 (1923) 14-16
- Gerlach, Kurt Albert 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 21, 28, 40
-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andfurt Institute 与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形成 16-19
- Gerloff, Wilhelm 威廉·戈尔洛夫 110, 129, 130, 399
- German Idealism 德国唯心主义 576
-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38-9, 50-1
- and Lukacs, Georg 与格奥尔格·卢卡奇 78
- German Novel about the Arist, The* (Marcuse) 《关于艺术家的德国小说》(马尔库塞) 96

- 'German October' (1923) “德意志十月” (1923) 14
- German working class, research on 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研究 113-16
- Germany 德国
- and anti-Semitism 与反犹太主义 310
  - decartelization of industry 解散卡特尔企业联合 479-80
  - post-war 德国战后 383-5, 402, 432
  - Socialization Commission 社会化委员会 9, 10-11
  - See also Frankfurt, National Socialism (Nazism); West Germany 另见法兰克福; 国家社会主义 (纳粹主义); 西德
- gesalt psychology 格式塔心理学 45, 46
- Giddings, Franklin Henry 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 144
- Giedion, Sigfried 赛格弗里德·吉登 203
- Glazer, Nathan 纳森·格拉泽尔 424-5
- Glöckel, Otto 奥托·格吕克尔勒 22, 23, 166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86-7, 124
- Goethe's Elective Affinities* (Benjamin) 《歌德的〈亲和力〉》(本雅明) 86-7, 92, 160
- Gouldner, Alvin 埃尔文·古尔德纳 427
- Grabenko, Yelena 叶莲娜·格拉本科 78
- Green, Julian 朱利安·格林 204
- Groddock, Geory 格奥尔格·格罗多克 266
- Grossmann, Henryk 亨利耶克·格罗斯曼 29, 30, 33, 34, 37, 61, 117, 119, 186, 247
- and the Horkheimer circle 与霍克海默圈子 383
  -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 148, 293, 295
- Grosz, Georg 格奥尔格·格罗茨 13
- Group discussion and the West German political study 组群讨论与西德政治研究 436-41
- Group Experiment* 《组群实验》 468, 472-8, 494, 543, 551
- Grünberg, Carl 卡尔·格吕恩堡 17, 21-3, 24-36, 39, 40, 61, 64, 118, 132
- illness and death 生病与死亡 33-4
  - retirement 退休 35, 37
- 'Guilt and Defensiveness' (Adorno) “自责与防御” (阿多诺) 473, 474, 475-8
- Gumbel, Emile Julius 爱弥儿·尤利乌斯·古姆贝尔 461
- Gumperz, Hede 黑德·库姆佩尔茨 15
- Gumperz, Julian 朱利安·库姆佩尔茨 15, 30, 31, 143, 145-6, 149, 251, 262-3
- Günther, Henning 亨宁·君特 657
- Gunzert, Rudolf 鲁道夫·贡泽尔特 633

- Gurland, Arkady 阿卡迪·古尔兰德 286, 293, 353, 356, 361, 366, 367, 368, 369
- Gurvitch, Georges 乔治·古尔维奇 400
- Guterman, Norbert 诺伯特·古特曼 386
- Prophets of Deceit* 《说谎的先知：美国煽动者的煽动手段研究》408, 409-10
- Haag Karl Heinz 卡尔·海因茨·哈格 594
- Hass, Willy 维利·哈斯 206
- Habermas, Jürgen 于尔根·哈贝马斯 2-3, 104, 133, 504, 510, 537-63, 636-44, 652-3, 654, 658
- and Gadamer 与加达默尔 592-3
- and Gehlen 与盖伦 590-2
- and Heidegger 与海德格尔 592
-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554, 555, 563
-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认识与人类旨趣》636-40
- and the positivism dispute 与实证主义争论 566-7, 570-5, 577-82
- and the student protest movement 与学生抗议运动 614, 617-19, 628-31, 633
-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636-7, 640-3
-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交往行为理论》658
- Theory and Practice* 《理论与实践》566-7
- Hack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哈克尔 456-7, 458
- Hacker project 哈克尔研究计划 465
- Haenisch, Konrad 康拉德·黑尼希 17-18
- Haerdter, Michael 迈克尔·黑尔特 526
- Hagen, Volker von 福尔克·冯·哈根 473
- Hahn, Hans 汉斯·哈恩 166
- Halbach 哈尔巴赫 20
- Hallgarten, Wolfgang 沃尔夫冈·豪尔嘉登 254
- Hamsun, Knut 克努特·汉姆生 188, 218-20
- Harms, Bernhard 伯恩哈德·哈姆斯 20
- Hartley, Eugene, *Problems in prejudice* 尤金·哈特利《偏见问题》429
- Hartmann, Ludo Moritz 卢多·莫里茨·哈特曼 22
- Hartoch, Anna 安娜·哈尔达齐 170
- Haselberg, Peter von 彼得·冯·哈塞尔贝尔格 434
- Hata, Sahachiro 萨哈希洛·哈塔 12

- 'Hegel and the Californian Left' (Bense) “黑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左派”(本泽) 405-6
- Hegel, G. w. F. G. w. F. 黑格尔 52, 76, 96, 102, 131, 178, 179, 320, 545
-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精神现象学》 327, 592
-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39, 41, 45, 51, 80, 95, 97-102, 104, 448, 462, 521, 532
- Being and Time* 《存在与时间》 5, 39, 96, 98-101, 577, 592
- critique of 批判 592-6
- Heine, 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536
- Hein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海涅曼 441, 635-6
- Heinmann, Eduard 爱德华·海曼 256
- Heller, Hermann 赫尔曼·黑勒 109, 110, 112, 224, 230, 232, 448
- Helms, Hans G. 汉斯·G. 赫尔姆斯 252-6, 528, 529
- Heritage of Our Times* (Bloch) 《我们时代的遗产》(布洛赫) 189-90
- Herzong, Herta 赫尔塔·赫左格 168, 170, 359, 368
- Heuss, Theodor 西奥多·豪斯 494
- Hilferding, Rudolf 鲁道尔夫·希法亭 10, 22, 63, 102, 166
- Hindemith, Paul 保罗·欣德米特 67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118, 121, 122-3
-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历史唯物主义 88, 216
- Grünberg on 格吕恩堡论历史唯物主义 26-7
- Historical School 历史学派 27
- history, and nature, in Adorno 阿多诺的历史观和自然观 95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ukács) 《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 52, 75, 76, 79-81, 88, 95, 96, 178, 538
-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rama* (Lukács) 《现代戏剧发展史》(卢卡奇) 77
- History and Originality* (Negt) 《历史与新异》(耐格特) 658-9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27, 162, 259, 310, 340, 446
- Hitler-Stalin pact 希特勒-斯大林协定 257
-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125, 286-7
- Hochhuth, Rolf 罗尔夫·霍希胡特 596
- Hofstätter, Peter R. 彼得·R. 霍夫施泰特尔 476-8, 543
- Hölderlin, Johann 约翰·荷尔德林 527-8, 531, 601
- Homer, *Odyssey* 荷马《奥德赛》 323-4, 329
- Honigsheim, Paul 保罗·霍尼希斯海默 132-3

Horkheimer circle 霍克海默圈子 64, 104-5, 124, 134, 160, 178, 291, 292, 383  
 and positivism 与实证主义 186, 566

Horkheimer, Max 马克思·霍克海默 30, 66, 654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46, 82, 93, 106, 156-65  
 and American citizenship 与美国公民权 493-4  
 and anti-Semitism 与反犹太主义 308-10, project on 计划 353-4, 362-3, 364, 365-7  
 at Frankfurt University 在法兰克福大学 44-7, 397, 398-9, 407  
 and Benjamin 与本雅明 163-4, 194, 195, 196, 210, 311-12  
 biographical details 生平细节 41-52  
*Dawn* 《破晓》 39, 47, 106, 127, 268  
 and the dialectics project 与辩证法项目 177-91, 263, 314-50  
 as director of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作为法兰克福研究所主任 36-41  
 'Egoism and the Freedom Movement' "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 180-3, 314, 336, 342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与法兰克福研究所 21, 106-10, 431, 433, 442-50  
 and Fromm 与弗洛姆 54, 265-6, 267-9, 271-2  
 and Habermas 与哈贝马斯 554, 555, 563  
 and industrial sociology 与工业社会学 486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与社会研究所 246, 248-9, 250-4, 261-5  
 and the Institute's move to Geneva 与迁往日内瓦的研究所 127, 130-2, 133-5  
 'Jews and Europe, The' "犹太人与欧洲" 256, 257-9, 280, 281, 342, 364, 401, 507  
 and Kirchheimer 与基希海默 234  
 'Latest Attack on Metaphysics, The' "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 183-5  
 in Los Angeles 在洛杉矶 291-3, 456  
 and Marcuse 与马尔库塞 295-8, 383, 462-6  
 on materialism 论唯物主义 135-6  
*Materials for the Reformul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对基本原则进行重新阐释的一些材料》 106-7  
*Montaigne and the Function of scepticism* 《蒙田和怀疑主义的功能》 268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迁往美国 143-8  
 Move to west coast of America 迁往美国西海岸 265  
 on Nazism 论纳粹主义 381-2, 444-5  
 novellas 小说 43

- 'On the Concept of Reason' "论理性概念" 447
- and Pollock 与波洛克 42, 44, 60, 10-8
- 'problem of Truth, The' "真理问题" 179-80
- on rationalism 论理性主义 136
- on reason and language 论理性和语言 504-7
- 'Reason and Self-Preservation' "理性与自我持存" 313, 317, 342
- and research on the family 与家庭研究 137, 138-9
- research projects 各种研究项目 273-9
- 'Society and Reason' lectures "社会与理性"的演讲 325, 332, 345, 362, 386
-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与知识社会学 56
- on the Soviet Union 论苏联 63, 64
- and state capitalism 与国家资本主义 280-4, 289
- and the student protest movement 与学生抗议运动 624-5
- and *Studies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与《权威与家庭研究》150, 151, 154-6, 167-8
- 'Tradition and Critical Theory'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183, 185-6
- visits to Europe (1948-9) 去欧洲参观 (1948-9) 397-402
- and the West German political study 与西德政治研究 436, 437, 438-9, 440
- on the working class 论工人阶级 114-15
-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与《社会研究学刊》116-17, 118, 120-1, 123-4
- see also *Eclipse of Reaso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另参见《理性之蚀》；《哲学断片》
- Horkheimer, Moses (Moritz) 莫西·霍克海默(莫里茨) 41-2
- Horney, Karen 卡伦·霍尔尼 153, 269-70, 371
- Hug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9
- 'Humanity and the Earth' (Klages) "人性和大地"(克拉格斯) 199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洪堡 576
- 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 匈牙利共产党 78-9
- Husserl, Edmund 埃德蒙·胡塞尔 45, 97, 104, 159, 574 531-5, 536, 595
- Hutchins, Robert M. 罗伯特·M·哈钦斯 274
- 'Idea of Natural History, The' (Adorno) "自然史观念"(阿多诺) 94-5
- Ideology, criticism of 意识形态批判 218-22
- industrial sociology 工业社会学 480-93

- inequality,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不平等 47-50
-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所 148, 246-56  
 finances 财政 176, 249-50, 261-5  
 and Neumann 与诺伊曼 228-9  
 and post-war return to Frankfurt 战后返回法兰克福 402, 403, 431-5  
 and trade union research 工会研究 655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se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国际社会研究  
 所参见社会研究所
- Jaerisch, Ursula 乌尔苏拉·耶利希 627
- Jahnn, Hans Henny 汉斯·亨尼·雅恩 519-20, 552
- Jahoda, Marie 玛丽·雅胡达 169, 359, 378, 380, 396, 425, 427-8, 465
- Jargon of Authenticity* (Adorno) 《本真性的行话》(阿多诺) 582, 596
- Jarnach, Philip 菲利普·雅尔纳赫 71
- Jaspers, Karl 卡尔·雅斯贝尔斯 102
- Jay, Martin 马丁·杰伊 1, 7
- jazz, Adorno on 阿多诺论爵士乐 160, 211-12, 213-14, 242-3, 337
-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273
- Jewish community 犹太人社群  
 in Frankfurt 在法兰克福 17  
 in Germany 在德国 53
- Jewish Labour Committee 犹太人劳动委员会 367, 368
- Jews 犹太人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与法兰克福学派 4-5, 6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犹太人 131, 257-9  
 images of 犹太人的形象 276-7, 368-9  
 psychology of 犹太人的心理 365-6  
 in the United States 犹太人在美国 248  
 see also anti-Semitism 另参见 反犹太主义
- 'Jews and Europe, The' (Horkheimer) "犹太人与欧洲" (霍克海默) 256, 257-9,  
 280, 281, 342, 364, 401
- Jogiches, Leo 李欧·约吉谢斯 14
- Johnson, Alvin 阿尔文·约翰逊 254
-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se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社会研究杂志见 ZIS
- Joyce, James 詹姆士·乔伊斯 519, 525, 526, 527

Judaism 犹太教

and Benjamin 犹太教与本雅明 83-4

and Fromm 犹太教与弗洛姆 52-3

and Lowenthal 犹太教与洛文塔尔 64

'Juliette, or Enlightenment and Morality' "朱莉埃特, 或启蒙与道德" 330-1

Jung, C. G. C. G. 荣格 211, 330

Jünger, Ernst 恩斯特·云格尔 349, 524, 587

Kafka, Franz 弗朗茨·卡夫卡 282

Kagel, Mauricio 毛里西奥·卡赫尔 514

Kahn-Freund, Otto 奥托·卡恩·弗莱文特 230

Kant, Immanuel 伊曼纽尔·康德 46, 52, 67, 69, 85, 99, 323, 506, 545, 605

Kantorowicz, Ernst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110

Karplus, Gretel 格雷特·卡尔普鲁斯 82, 89, 191, 193, 194, 215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9, 10, 23, 29, 31, 58

Kayser, Wolfgang 沃尔夫冈·凯塞尔 521

Keppel, Friedrich B. 弗雷德里克·B·凯珀尔 351

Kerényi, Karl 卡尔·克伦尼 330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肯尼斯 158

Kiel 基尔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Marine Transport 世界经济和航运研究所 20, 21

university 基尔大学 21

Kierkegaard, S. S. 克尔凯郭尔 70, 76, 91, 92, 93, 162

Kiesinger, Kurt Georg 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 598

Kirchheimer, Otto 奥托·基希海默 229-36, 247, 249, 264, 448

and the anti-Semitism project 基希海默与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362

and Carl Schmitt 基希海默与卡尔·施密特 470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政治妥协的结构转型" 235

'Criminal Law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刑法" 235

and the Horkheimer circle 基希海默与霍克海默圈子

and the Institute 基希海默与研究所 293, 295-6, 299

'Legal Order of National Socialism, The' "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 236

*Limits of Expropriation* 《剥夺的界限》 231-2

and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与《哲学断片》 344

*State Structure and Law in the Third Reich* 《第三帝国的国家结构和法律》 232

- Weimar-and what Then?* 《魏玛——之后呢?》 321
- Klages, Ludwig 路德维希·克拉格斯 197-200, 201, 207, 327
- Klee, Paul 保尔·克里 206
- Kluge, Alexander 亚历山大·克吕格 658
- Knapp, Georg Friedrich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 22
-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Habermas) 《认识与人类旨趣》 636-40
- Knapfer, Genevieve 吉纳维芙·克纳普费尔 378
- Koepfen, Wolfgang 沃尔夫冈·科本 519
- Köhler, Wolfgang 沃尔夫冈·克勒 44
- Kolb, Walter 瓦尔特·科尔布 398, 402, 442, 443
- Kolisch, Rudolf 鲁道夫·柯里什 72
- Komarovsky, Mirra 米拉·柯玛洛夫斯基 169
- Kommerell, Max 马克斯·科默莱尔 110, 113, 191, 152
- König, René 勒内·柯尼希 442, 448, 492, 543, 583
- and the positivism dispute 勒内·柯尼希与实证主义争论 567-8
- Korn, Karl 卡尔·考恩 110-11, 113
- Korsch, Karl 卡尔·柯尔施 11, 15, 23, 29, 30, 34, 52, 80, 89, 159
- and the dialectics project 卡尔·柯尔施与辩证法项目 177-8
-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卡尔·柯尔施与社会研究所 260
- and Marxism 卡尔·柯尔施与马克思主义 55
- Marxism and philosophy*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15, 29, 52, 178
- Kotzenburg, Dr Karl 卡尔·科岑贝尔格博士 23
- KPD (German Communist Party) KPD (德国共产党)
- development of 德国共产党的发展 14, 23-4
- and Felix Weil 德国共产党与费利克斯·韦尔 13, 14
-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与法兰克福研究所 31, 33
- and the Geraberg meeting 与格拉贝尔格会议 15-16
- Kracauer, Siegfried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89, 90, 91-2, 94, 134, 191
-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66, 67, 68-70, 70, 71, 73, 75, 82, 86, 163, 600
- and Lowenthal 与洛文塔尔 64, 65, 66
- and Lukács 与卢卡奇 76, 80-1
- ‘Totalitarian Propaganda in Germany and Italy’ “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主义宣传”
- 161
- White-Collar Workers* 《白领工人》 113, 114
- Krahl, Hans-Jürgen 汉斯-于尔根·柯拉尔 626, 630, 633, 636

- Kraus, Karl 卡尔·克劳斯 505, 506
- Krenek, Ernst 恩斯特·克雷内克 516, 598
- Krieck, Ernst 恩斯特·克里克 129
- Krüger, Gerhard 格尔哈德·克吕格尔 463
- Kuby, Erich 埃里希·库贝 616
- Kun, Béla 库恩·贝拉 78
- Lacis, Asja 阿西娅·拉西斯 89, 192
- Landauer, Gustav 古斯塔夫·兰道尔 91
- Landauer, Karl 卡尔·兰道尔 47, 54
- Lang, Olga (later Wittfogel) 奥尔加·朗格 (后来的魏特夫夫人) 258
- Langerhans, Heniz 海因茨·朗格汉斯 30, 34
- Langhans, Rainer 赖纳·朗格汉斯 620
- Language 语言
  - Adorno on 阿多诺论语言 529
  - Habermas on 哈贝马斯论语言 581
  - and reason 语言与理性 504-7
- Laski, Harold 哈洛德·拉斯基 223, 225, 226, 227, 309
- Lasky, Melvin 麦尔文·拉斯基 406
- Lasswell, Harold D. 哈罗德·D. 拉斯维尔 275, 278
- 'Latest Attack on Metaphysics, The' (Horkheimer) "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 (霍克海默) 183-5
- Lazarsfeld, Paul 保罗·拉萨斯菲尔德 141, 165-70, 175, 176-7, 246
  -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237-43, 245, 455
  - and the anti-Semitism project 与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275-6, 359, 363, 368, 369, 370, 377, 410
  -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与社会研究所 248
- Lederer, Emil 艾弥尔·勒德雷尔 10-11, 113-16, 254, 256
- 'Legal Order of National Socialism, The' (Kirchheimer) "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 (基希海默) 236
- Legitimation Crisis* (Habermas) 《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 643
- Leibowitz, Rene 勒内·雷伯韦兹 512
- Leichter, Käthe 卡特·莱希特 140, 167, 169
- Leites, Nathan 纳坦·莱特斯 232
- Lenya, Lotte 洛特·莱妮娅 82

- Leonhard Steirer* (Horkheimer) 《莱昂纳德·施泰勒》(霍克海默) 43
- Leviathan* (Hobbes) 《利维坦》(霍布斯) 286-7
- Levinson, Daniel J. 丹尼尔·J. 雷文森 359-60, 363, 374  
 and *Studies in prejudice* 与《偏见研究》408, 410
- Lewin, Kurt 库尔特·黎文 370, 372, 436
- Liebknicht, Karl 卡尔·李卜克内西 96
- Limits of Expropriation* (Kirchheimer) 《剥夺的界限》(基希海默) 231-2
- Lindemann, Hugh 胡戈·林德曼 20
- literature, Adorno on 阿多诺论文学 519-30
- Litt, Theodor 西奥多·李特 538
- Loewenstein, Rudolph M. 鲁道尔夫·M. 洛文斯坦因 377
-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571
-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 533
- London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 伦敦舆论研究所 436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伦敦经济学院 110
- Loneliness and Freedom* (Schelsky) 《寂寞与自由》(薛尔斯基) 575
- Lonely Crowd, The* (Glazer) 《孤独的人群》(格拉泽尔) 424
- Loos, Adolf 阿道夫·鲁斯 74, 206
- Lorenz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洛伦泽尔 638
- Löwe, Adolph 阿道夫·洛维 37, 95, 110, 129
- Lowenthal, Leo 列奥·洛文塔尔 31, 41, 46, 104, 112, 127-8, 130, 246, 654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69, 70, 159, 160  
 and the anti-Semitism project 与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353-4, 356, 358, 362, 368, 369, 380  
 on art 论艺术 218-20  
 biographical details 生平细节 64-6  
 and *Eclipse of Reason* 与《理性之蚀》245  
 and Fromm 与弗洛姆 54, 117  
 on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38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在社会研究所 251, 253, 255, 261-2, 263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迁往美国 146-7  
 and Neumann 与诺伊曼 223  
 and the New York Institute 与纽约研究所 301-2  
*Prophets of Deceit* 《说谎的先知: 美国煽动者的煽动手段研究》408, 409-10  
 and the radio research project 与广播研究项目 442

- and *Studies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与《权威与家庭研究》150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与《社会研究学刊》116, 118, 122-3
- Löwith, Karl 卡尔·洛维特 98, 462, 563
- Luhmann, Niklas 尼柯拉斯·卢曼 588, 642
- Lukács, Georg 格奥尔格·卢卡奇 13, 15, 23, 29, 52, 75-81, 445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66, 67, 68, 69, 70, 89, 90, 91, 94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历史与阶级意识》52, 75, 76, 79-81, 88, 95, 96, 178, 538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51  
and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 55  
*Theory of the Novel* 《小说理论》329
-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14, 96, 445
- Lynd, Robert S. 罗伯特·S.林德 144, 145, 167, 239, 273, 282  
and the anti-Semitism project 与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354, 356
- McCarthy, Joseph 约瑟夫·麦卡锡 390
- McCloy, John 约翰·麦克洛伊 434
- Macdonald, Dwight 德怀特·麦克唐纳德 285
- MacIver, Robert 罗伯特·麦克伊维尔 144-5, 273, 278, 279, 296, 356, 380
- McWilliams, Joseph E. 约瑟夫·E. 麦克威廉斯 358
- Mahler, Gustav 古斯塔夫·马勒 72, 73, 74, 187-8, 212, 603
- Maidon (Rose Rieker) 麦顿(罗泽·里科尔) 44, 45, 46, 47, 107-8, 143, 268
- Maier, Joseph 约瑟芬·迈尔 655
- Man, Hendrik de 亨德利克·德·曼 110
- Mandelbaum, Kurt 库尔特·曼德鲍姆 30, 34, 123, 124, 142
- Mann, Heinrich 海因利希·曼 292
- Mann, Thomas 托马斯·曼 124, 247-8, 264, 292, 323, 390, 400
- Mannesmann study 曼内斯曼研究 479-89, 490, 492, 493
- Mannheim, Karl 卡尔·曼海姆 50-1, 95, 110, 111, 112, 129, 223, 286, 387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159, 160, 161, 162
-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 1, 41, 55, 133, 246, 654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134, 160  
on art 论艺术 218, 220-2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与哥伦比亚大学 236-4  
and the dialectics project 与辩证法项目 177

- Eros and Civilization* 《爱欲与文明》 463, 468, 470, 496-504, 507, 608  
and Fromm 与弗洛姆 653-4
- German Novel about the Artist, The* 《关于艺术家的德国小说》 96
- Habermas on 544-5 哈贝马斯论马尔库塞
-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295-301, 383, 462-3
-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在社会研究所 251
-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迁往美国 146-7
- and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与《哲学断片》 344
- Reason and Revolution* 《理性和革命》 263, 264, 498, 503
- and the student protest movement 与学生抗议运动 609-15, 619, 622-4, 633-5
- and *Studies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论《权威与家庭研究》 150, 151
- war work by 战事工作 299-301, 384, 386
- on the working class 论工人阶级 390-1
- Marcuse, Ludwig 路德维希·马尔库塞 260, 292
- Marcuse, Sophie 索菲·马尔库塞 500
- Marshall, John 约翰·马绍尔 243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15, 176, 178, 195, 210, 445, 652
- Capital* 《资本论》 89, 186, 316
-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与法兰克福研究所 31-3
-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48, 51, 52
- and Marcuse 与马尔库塞 102-4
- and Philosophy 与哲学 39
- and Pollock 与波洛克 60
- and the public sphere 与公共领域 557-8
- on religion 与宗教 220
- and the working class 与工人阶级 115
- Marx-Engels Archive publishers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出版者 31-3
- Marx-Engels Institute, Moscow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24, 30, 32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5-6
-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与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形成 18-19
- in Frankfurt 在法兰克福 35
- Grünberg on 格吕恩堡论马克思主义 26-7, 28-9
-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40
-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与社会研究所 255
- Neumann on 诺伊曼论马克思主义 290-1

- Marxism and philosophy* (Korsch)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柯尔施) 15, 29, 52, 178
- masochism 受虐狂  
and religion 与宗教 156  
sado-masochistic character 施虐-受虐狂性格 151, 153
- Massing, Hede 黑德·马辛 15
- Massing, Paul 保罗·马辛 30, 31, 34, 356, 361, 368, 369, 380, 409
- materialism,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唯物主义 135-6
- Mattick, Paul 保罗·马蒂克 178
- Maus, Heinz 海茵茨·毛斯 392-3, 417, 449
- Mayer, Gustav 古斯塔夫·迈耶尔 21
- Mayntz, Renate 莱内特·迈因茨 561
- Mayo, Elton 埃尔顿·梅奥 489
- Mead, George 乔治·米德 590
- Mead, Margaret 玛格丽特·米德 357-8, 377
- Meinecke, Friedrich 弗里德利希·孟尼克 392
- Meis, Dr Hans 汉斯·迈斯博士 635
- 'Memorandum' "备忘录" 321-2
- Meng, Heinrich 海因里希·门格 54, 55
- Menger, Anton 安东·门格尔 21, 22
- Mennicke, Carl 卡尔·孟尼克 95, 110
- mental illness, and prejudice 精神病和偏见 428
- Merton, Richard 理查德·默顿 35
- Merton, Robert K. 罗伯特·K. 默顿 377
- Meslier, Abbe 阿贝·麦斯利埃 471
- Metzger, Ludwig 路德维希·麦茨格尔 442
- Meyer, Ernst 恩斯特·迈耶尔 13
- Meyer, Gerhard 格哈尔特·迈耶尔 123, 124, 142
- Meyer-Leviné, Rosa 罗莎·迈耶尔-莱文娜 24
- Mills, C. Wright C. 怀特·米尔斯 354
- Minima Moralia* (Adorno) 《伦理随想录》(阿多诺) 266, 371, 382, 394-6, 458, 503, 508, 509, 511
- Mitscherlich, Alexander 亚历山大·米切利希 461-2, 544
- Mohler, Armin 阿明·默勒 595
- Monnier, Adrienne 阿德里奈·莫奈 205
- morality, tuning into ideology 道德转变为意识形态 475

- Morgenstern, Soma 佐玛·摩尔根施泰因 75
- Mörike, Eduard 爱德华·默里克 521, 522-3
- Morris, William R. 威廉·R.莫里斯 422
- Moscow, Marx-Engels Institute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24, 30, 32
- Müller, Philip 菲利普·缪勒 444
- Munich 慕尼黑
- Horkheimer in 霍克海默在慕尼黑 44
- Soviet Republic of 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 44, 60-1
- Müntzel, Herbert 赫伯特·孟泽尔 157
- Münzenberg, Willi 威廉·明岑贝尔格 625
- Murray, H. A. H. A. 默里 361
- music, Adorno on 阿多诺论音乐 70-5, 81, 90-1, 121, 133, 175, 187-8, 192, 241-6, 302-8, 513-19
- Composing for the films* 《电影构成要素》322, 386, 390
- Disonances; Music in the Administered World* 《不协和音：管控世界中的音乐》513, 542
- 'Marginalia on Mahler' "关于马勒的旁注" 187-8
- musical compositions 音乐作曲 508-9
- '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论音乐的拜物教特征" 212, 217
- 'On Jazz' "论爵士乐" 160, 210, 211-12, 213-14, 245, 337
- 'On Popular Music' "论流行音乐" 244-6
- 'On Wagner' "论瓦格纳" 210, 213-14
-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现代音乐哲学》264, 298, 302-8, 326, 344, 393, 394-5, 512-13
- 'Radio Symphony, The' "广播交响乐" 243-4
- Schoenberg 勋伯格 71-5, 89, 90, 121, 215, 236-7, 292
-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Music, A' "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 244
- Myrdal, Gunnar 贡纳·米尔达尔 351-2, 377, 416
- myth 神话
-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神话 202-3, 211
- and Enlightenment 神话与启蒙 329-30
- Horkheimer and Adorno on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论神话 321-2
- National Socialism (Nazism) 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 collapse of 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 381-2, 384-5

- disputes on the theory of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争论 280-91
- growing influence of 国家社会主义日益增强的影响 66, 109, 112-13, 247
-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国家社会主义 381-2, 444-5
- Writings of Horkheimer circle on 霍克海默圈子论述国家社会主义的著作 141-2
- nature 自然
- Adorno on 阿多诺论自然 187, 649-50
- domination over 对自然的控制 185, 542-3, 650
- in *Eclipse of Reason* 《理性之蚀》对自然的论述 349-50
- and enlightenment 自然与启蒙 334-7
- Habermas on 哈贝马斯论自然 580, 581
- Negative Dialectics* (Adorno) 《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 496, 582, 595, 597-609, 644
- Negt, Oskar 奥斯卡·耐格特 509-10, 561, 614, 617, 626, 631, 654, 658-9
- Nelson, Benjamin 本雅明·纳尔森 249
- Nenning, Günther 京特·内宁 22
- neo-Kantianism 新康德主义 45
- neopositivism 新实证主义 534, 535, 571
- Neuloh, Otto 奥托·纽洛 489
- Neumann, E. P. E. P. 诺伊曼 454
- Neumann, Franz 弗朗茨·诺伊曼 223-9, 246, 251, 263, 264, 448
- and the anti-Semitism project 诺伊曼和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353, 354-5
- Behemoth* 《巨兽》228, 285-6, 290, 292
- biographical details 生平细节 223-6
- death 死亡 471
- and the Horkheimer circle 与霍克海默圈子 383
- and the Institute 与社会研究所 293-5
- and the Institute's research projects 与社会研究所的研究项目 277-8
- and Kirchheimer 与基希海默 230
- and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 255-6
- and state capitalism 与国家资本主义 282, 283-91
- Neurath, Otto 奥托·诺伊拉特 166, 169
- Nevermann, Knut 克努特·内弗尔曼 615, 623
-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新社会研究院 254-5, 256
-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Horney) 《精神分析新方法》(霍尔尼) 269
- Nietzsche, F. W. F. W. 尼采 69, 84, 97, 338, 339, 345, 347
- Nobel, Nehemiah 尼希米·诺贝尔 52, 53, 54

Noelle-Neumann, Elizabeth 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 480

'Odysseus, of Myth and Enlightenment' "奥德修斯, 或神话与启蒙" 329-30

Ohnesorg, Benno 贝诺·奥内索尔格 615-16, 617, 619-20, 627

'On Jazz' (Adorno) "论爵士乐" (阿多诺) 160, 210, 211-12, , 213-14, 245, 337

*One Dimensional Man* (Marcuse) 《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 609-10, 614-15, 642

*One Way Street* (Benjamin) 《单向街》(本雅明) 90, 192, 201

Oppenheimer, Franz 弗兰茨·奥本海默 23

*Origin of German Tragedy* (Benjamin) 《德国悲苦剧的起源》(本雅明) 86, 87-8, 95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 343, 352

Osmer, Diedrich 蒂德利希·奥斯默尔 437-8, 460, 480

Oxford University, Adorno at 阿多诺在牛津大学 157-8

Paeschke, Hans 汉斯·佩施克 405

Pareto, Vilfredo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 159

Parsons, Talcott 塔尔科特·帕森斯 351, 379, 588

Pascal, Blaise 布莱兹·帕斯卡尔 125

*Passagen-Werk* (Benjamin) 《拱廊街》(本雅明) 89, 160-1, 190, 191-7, 206, 208-18

*Paysan de paris, Le* (Aragon) 《巴黎的农民》(阿拉贡) 200-1

Perse, Saint-John 圣-琼·佩斯 523

Phelps, George Allison 乔治·阿里森·费尔普斯 358

Philippovich, Eugen von 奥根·冯·菲利波维奇 22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哲学断片》264, 322, 325-6, 344, 356, 357, 371, 386, 388

and Marcuse 与马尔库塞 392

philosophy 哲学

Adorno on 阿多诺论哲学 530-7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哲学 84-5

Plenge, Johannes 约翰内斯·普兰格 23, 60

Plessner, Helmuth 赫尔穆特·普勒斯纳 459, 462, 590

poetry, Adorno on 阿多诺论诗歌 520-4

political awareness, West German study 西德政治意识研究 435-42, 459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character type 政治倾向和性格类型 172-5, *see also* fascism

也参见法西斯主义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tudy of 政治参与研究 548-50

- Pollock, Friedrich 弗里德利希·波洛克 15, 66, 246
-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159, 160
  - and the anti-Semitism project 与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263, 324-5, 355-6, 363, 367, 368-9
  - biographical details 生平细节 60-4
  - conception of state capitalism 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280-91
  -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构成 21
  - and Horkheimer 与霍克海默 42, 44, 60, 106-8, 159-60
  -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与社会研究所 249-50, 261, 262, 263, 316-17
  -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 迁往美国 147-8
  - and Neumann 与诺伊曼 291
  - and *Studies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与《权威与家庭研究》150
  - teaching at Frankfurt university 在法兰克福大学教学 34
  -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社会研究学刊》118-19, 124
- Ponto, Jürgen 于尔根·彭托 656
- Popitz study 波比茨的研究 489-90, 491
- Popper, Karl 卡尔·波普尔 567, 568-70, 571-2, 578, 581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实证主义 201
  - and conservatism 与保守主义 582-3, 588
  - dispute 争论 566-82
  - Heidegger on 海德格尔论实证主义 592
  - Horkheimer's critique of 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184-5 188
- Poverty of Critical Theory, The* (Rohrmoser) 《批判理论的贫困》(罗尔默泽尔) 657
- prejudice *see Studies in Prejudice* 偏见参照《偏见研究》
-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普林斯顿广播研究计划 168, 239-46, 434, 496
- Prophets of Deceit* (Lowenthal and Guterman) 《说谎的先知》(洛文塔爾与古特曼) 408, 409-10
- Proskauer, Joseph M. 约瑟夫·M. 普洛斯考尔 355
- Proust, 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201
-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266-71
- and anti-Semitism 与反犹太主义 359-60, 429
  - and Fromm 与弗洛姆 53-5, 59, 177, 186
  - in Habermas 哈贝马斯关于精神分析 637-8

-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Negt and Kluge) 《公共领域与体验》(耐格特和克吕格) 658
-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Rusche and Kirchheimer) 《惩罚与社会结构》(卢舍和基希海默) 233-4
- Rabinkow, Salman Baruch 萨尔曼·巴鲁赫·拉宾考 52, 54
- rackets, theory of 欺诈理论 318-19, 381
- radio research projects 广播研究项目 442, 493
-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 168, 239-46, 434, 496
- 'Radio Symphony, The' (Adorno) “广播交响乐”(阿多诺) 243-4
- rationalism,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理性主义 136
- Rauschnig, Hermann 赫尔曼·劳施宁 256
- reason 理性
-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理性 313-14, 345-6, 350, 504-7
- and language 理性与语言 504-7
- Reason and Revolution* (Marcuse) 《理性与革命》(马尔库塞) 263, 264, 498, 503
- Reich, Wilhelm 威尔海姆·赖希 54, 55, 153, 159
- Reichmann, Frieda 弗丽达·赖希曼 53, 54, 65
- Reik, Theodor 西奥多·里克 56
- Rein, Gerhard 格哈德·莱恩 44
- Reinhardt, Karl 卡尔·赖因哈尔特 110
- Reininger, Robert 罗伯特·赖宁格 476
- religion 宗教
- and masochism 宗教与受虐狂 156
- and socialism 宗教与社会主义 55-7, 58
- Renner, Karl 卡尔·伦纳 22, 223
- 'Repressive Tolerance' (Marcuse) “论压抑性的宽容” 609, 610-13
- Revolutionaries 革命者
- characters 革命性格 155, 170
-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革命者 49-50
- Richter, Hans Werner 汉斯·维尔纳·里希特 401, 596
- Rickert, Heinrich 海因利希·李凯尔特 97
- Rieker, Rose *see* Maidon 罗泽·里科尔另见 麦顿
- Riesman, David 大卫·里斯曼 354, 424, 457
- Riezler, Kurt 库尔特·里泽勒尔 41, 95, 104, 129-30

- Rimbaud, Artur 阿图·兰波 529
- Ritter, Helmutt 赫尔穆特·里特尔 467
- Rohrmoser, Günther 君特·罗尔默泽尔 657
- Roosevelt, 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317
-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罗斯福 247-8, 351, 419
- Rosenblum, David 大卫·罗森布卢姆 354-5, 355-6, 362
- Rosenzweig, Franz 弗朗茨·罗森茨威格 53
- Rothacker, Erich 埃里希·罗特哈克尔 538, 574, 640
- Rühmkorf, Peter 彼得·林姆考尔夫 447, 524
- Runes, Dagaobert D. 达高伯特·D.隆内斯 264
- Rusche, Georg 格奥尔格·卢舍 228, 233-4
- Ryazanov, David 大卫·梁赞诺夫 31-261
- Ryle, Gilbert 吉尔伯特·赖尔 158
- Sachs, Hanns 汉斯·萨克斯 269
- Sado-masochistic characters 施虐-受虐性格 151, 153, 337, 474
- Sanford, R. Nevitt R. 奈维特·桑福德 359-60, 363, 3 75  
and *Studies in Prejudice* 与《偏见研究》408, 410, 411
- Sapir, Edward 爱德华·萨丕尔 269
-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4, 51, 534, 611, 626  
*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 《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417, 418, 429, 439, 467  
-8
- Sauer, Fritz 弗里茨·绍尔 34
- Schachtel, Ernst 恩斯特·沙赫特尔 140, 170, 269, 273
- Scheler, Max 马克斯·舍勒 21, 40, 47, 65, 81, 91, 230, 459, 532, 590  
and Adorno 与阿多诺 68, 69
- Schelsky, Helmut 赫尔穆特·薛尔斯基 459, 488, 492, 534, 538, 541, 543, 582-8  
and the positivism dispute 与实证主义争论 568, 575
- Scherchen, Hermann 赫尔曼·雪亨 70-1, 72
- Schleyer, Hans-Martin 汉斯-马丁·施赖耶尔 656
- Schlick, Moritz 莫里茨·施利克 476
- Schmidt, Alfred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655
- Schmidt, Fritz 弗里茨·施密特 36
- Schmitt, Carl 卡尔·施米特 224, 226, 230, 232, 470, 510  
*Dictatorship* 《论专政》559

- Schneider, Arthur 阿尔托·施奈德尔 97, 443
- Schoenberg, Arnold 阿诺德·勋伯格 71-5, 89, 90, 121, 215, 236-7, 292, 516, 517
- Schoenberg circle 勋伯格圈子 81
- Scholem, Gershom 格尔绍姆·朔勒姆 53, 84, 85, 89, 134, 191, 211
- Schopenhauer, Arnold 阿诺德·叔本华 42, 268
- Schumann 舒曼 44, 45
- Schumpeter, Joseph 约瑟夫·A.熊彼特 11
- Schwarzschild, Leopold 利奥波德·施瓦茨齐尔德 256
- Science 科学
  - and Adorno 科学与阿多诺 593-4
  - and positivism 科学与实证主义 569-76, 578-9
- Sedlmayr, Hans 汉斯·塞德迈尔 523
- Seidler, Irma 伊尔玛·塞德勒 77
- Sekles, Bernhard 贝尔纳德·赛克莱斯 67, 71
- serial music 序列音乐 525-6
- sexual morality, research project on 性道德研究项目 126
- Shils, Edward 爱德华·希尔斯 397, 425
- Sibelius, Jean 简·西贝柳斯 188
- Simmel, Ernst 恩斯特·西美尔 77, 358-9, 393-4, 502
- Simmel, Georg 格奥尔格·西美尔 68, 508
- Simon, Ernst 恩斯特·西蒙 53, 65
- Simpson, George 乔治·辛普森 244
- Sinzheimer, Hugo 胡戈·辛茨海默 110, 112, 223, 556
- Slawson, John 约翰·斯劳森 396
- Smend, Rudolf 鲁道夫·斯门德 230
-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26
-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主义
  - in Austria 在奥地利 28
  - and character type 与性格类型 173-5
  - and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 28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ee SPD 社会民主党 见 SPD
- 'Soial Determination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The' (Fromm) "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决定因素" (弗洛姆) 161
- Social engineering 社会工程 63
- Social Justice,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社会公正 47-50

Socialization, in Germany 德国的社会化 9, 10-12  
 Socialization Commission 社会化委员会 9, 10-11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Recherches sociaux 社会研究国际协会 132, 147, 148, 249  
*sociologica* 《社会学》 468-7  
*sociologica II* 《社会学 II》 564  
 sociology, and the universities 社会学与大学 19  
 sociology of knowledge,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知识社会学 56  
*sociology as a Science* (Kracauer)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克拉考尔) 68-9  
*sociology as a Science of Reality* (Freyer) 《作为一种现实科学的社会学》(弗赖尔)  
 676-7  
*Sociology of Sexuality* (Schelsky) 《性社会学》(薛尔斯基) 538, 582, 583-6  
 Sohn-Rethel, Alfred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塔尔 162, 188, 266  
 Sombart, Werner 维尔讷·宋巴特 60, 151  
 Sontheimer, Kurt 库尔特·宋特海默 561, 657  
 Sorge, Christiane 克里斯蒂安娜·左尔格 15, 30  
 Sorge, Richard 理查德·左尔格 15-16, 21, 30  
 Soviet Union 苏联  
     and the KPD 苏联与德国共产党 14  
     Pollock in 波洛克在苏联 61-4  
 Spann, Othmar 奥特马尔·施潘 60  
 Spartacus League 斯巴达克斯联盟 14  
 SPD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社会民主党) 10  
     on the achievement of socialism 论社会主义的成就 63  
     and Kirchheimer 与基希海默 230-1  
     and the KPD 与德国共产党 14, 24  
     and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 18-19  
     and the Moscow Institute 与莫斯科研究院 32  
     in West Germany 在西德 561-2, 597-8  
 Speier, Hans 汉斯·斯皮尔 254  
 Spengler, Oswald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60, 312, 592  
 Staiger, Emil 爱弥儿·施泰格尔 521-2, 523, 525  
 Stammer, Otto 奥托·施塔默尔 448  
 Stanton, Frank 弗兰克·斯坦顿 239, 240, 241, 243  
 state capitalism, and National Socialiam 国家资本主义, 与国家社会主义 280-91  
*State Structure and law in the Third Reich* (Kirchheimer) 《第三帝国的国家结构和法

- 律》(基希海默) 232
- Stein, Lorenz von 罗伦佐·冯·施坦恩 21-2
- Steiner, Rudolf 鲁道夫·施泰纳 69
- Steinhausen, Hermann 赫尔曼·施坦恩豪森 275
- Stephan, Rudi 鲁迪·斯特凡 71
- Sternberger, Dolf 道尔夫·施坦恩贝尔格 134
- Sternheim, Andries 安德里斯·施坦恩海姆 137, 138, 140, 150, 169
- Steuermann, Eduard 爱德华·施托伊尔曼 72, 515-16
- Stockhausen, Karlheinz 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 514
- Stouffer, Samuel 塞缪尔·斯托弗 241
- Strauss, Franz Josef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562, 597
- Stravinsky, Igor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71, 513, 514
-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he* (Habermas)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 547, 556-61, 562, , 564, 617
- Strzelewicz, Willy 维利·施特塞尔莱维茨 34, 52, 80
- student protest movement 学生抗议运动 588, 609-36, 644-5, 656
- Students and Politics* 学生与政治 547-55, 617
- Studies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权威与家庭研究》139, 140-1, 149-56, 165, 167-8, 169, 171, 176, 178, 246
- and Fromm 《权威与家庭研究》与弗洛姆 150, 151-4, 155, 272, 374, 375
-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265
- and the anti-Semitism research project 与反犹太主义研究计划 275
- Studies in Prejudice* 《偏见研究》408-30, 435, 442, 458, 459, 465
- Sullivan, Harry 哈里·斯塔克·萨利文 269, 400
- surrealism, and Benjamin 超现实主义, 与本雅明 89, 190, 197, 200-1
- Surviving* (Bettelheim) 《余生录》(贝特尔海姆) 379-80
- Szondi, Peter, *Theory of Modern Drama* 彼得·聪狄《现代戏剧理论》525, 620-1
- 'teamwork in Social Research' (Adorno) “社会研究中的协同工作”(阿多诺) 494-6
- technology 技术
- Adorno on 阿多诺论技术 511
-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技术 201-3, 207
- terrorism 恐怖主义 656-7
- Teufel, Fritz 弗里茨·特奥弗尔 620
- Thomas,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托马斯 358

- Tillich, Paul 保罗·蒂里希 34, 37, 47, 55, 91, 93, 95, 110, 112  
 and Adorno 蒂里希与阿多诺 157, 159  
 and Horkheimer 蒂里希与霍克海默 317
- Toller, Ernst 恩斯特·托勒 44
- Topitsch, Ernst 恩斯特·托比什 657
- 'Totalitarian Propaganda in Germany and Italy' (Kracauer) “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主义宣传” (克拉考尔) 161
- trade union research 工会研究 655
- 'Tradition and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 183, 185-6
-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先验哲学 46, 51, 81-2
- 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 先验主体性 97
- Trauerspiel*, Benjamin on 本雅明论《悲苦剧》 87-8, 89, 93
- truth, turning into ideology 真理转向意识形态 475
- Truth and Method* (Gadamer) 《真理与方法》(加达默尔) 593
- unconscious, concept of, Adorno on 阿多诺论无意识概念 81-2
- unemployment 失业  
 and family authority, research project 失业与家庭权威研究项目 165, 168-9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失业状况 248
- United States 美国  
 and anti-communism 美国与共产主义 254, 388-90, 422-3  
 and anti-Semitism 美国与反犹太主义 350-3, 364-5, 419-21  
 Horkheimer's move to 霍克海默迁往美国 143-8  
 Jewish immigrants 犹太移民 257, 259  
 and post-war Germany 美国与战后德国 402, 443  
 and Roosevelt 美国与罗斯福 247-8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罗斯福政府 149, 419  
 and war work by Institute members 与研究所成员提供的战事工作 294-5, 299-301, 382
- universities 大学  
 Berlin Free 柏林自由大学 616-17  
 Cologne 科隆大学 20  
 Kiel 基尔大学 21  
 in post-war Germany 战后德国的大学 448-9

- and sociology 大学与社会学 19
- see also Columbia; Frankfurt 另参见哥伦比亚; 法兰克福
- 'University and Society' "大学与社会" 545-6, 556, 582
- Unnamable*, The (Beckett) 《无名者》(贝克特) 526, 528
- USPD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USPD (独立社会民主党) 10, 30
- Utopian Spirit* (Bloch) 《乌托邦精神》(布洛赫) 67
- value conservatism 评价保守主义 595
- value-freedom, in the sciences 科学中的价值中立 572-3
- Veblen, Thorstein 托勒斯坦·凡勃伦 254, 312, 354
- Verlag, Malich 马立克出版社 13
- Vienna Circle 维也纳圈子 101, 166, 184, 566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614, 615, 623, 627
- Wagner, Richard 理查德·瓦格纳 210, 213-14
- Wahl, Jean 让·瓦尔 387
- Waiting for Godot* (Beckett) 《等待戈多》(贝克特) 526, 529
- Wallmann, Walter 瓦尔特·瓦尔曼 657
- Web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韦伯 52, 592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27, 28, 40, 68, 69, 77, 80, 151, 225, 327, 345, 640
- Webern, Anton 安东·魏伯恩 72, 74, 512, 516
- Wehner, Herbert 赫尔伯特·魏纳尔 562
- Weil, Felix 费利克斯·韦尔 66, 108, 147, 227, 234, 315-16
-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与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形成 19
- and the Geraberg meeting 与格拉贝尔格会议 15, 16
- and the Institute 与社会研究所 35-6, 382-3, 433
- and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 28
- and research areas 与研究领域 58
- and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 13
- and the Society for Social Research 与社会研究学会 398-9
- support for other socialists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者的支持 13-14
- thesis on socialization 关于社会化的论文 11-12
- upbringing 教育 13
- Weil, Hermann 赫尔曼·韦尔 12-13, 16-17
- Weil, Käte 卡特·韦尔 21

- Weil, Simone 西蒙娜·薇伊 407
- Weill, Kurt 库尔特·魏尔 82
- Weimar and What Then?* (Kirchheimer) 《魏玛——之后呢?》(基希海默) 321
- Weimar coalition 魏玛大联合 35
-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23
- Weiss, Hilde 希尔德·魏斯 30
- Wertheimer, Max 马克斯·韦特海默尔 44, 45, 94, 110, 254
- West Germany 西德 443-4, 466-7, 596, 656
- in the 1960s 在1960年代 597-8
- and political protest 与政治抗议 550-2
- SPD in 西德社会民主党 561-2
- study of political awareness in 西德政治意识研究 435-42, 459-60
- universities 西德的大学 448
- What is Socialization?* (Korsch) 《何为社会化?》(柯尔施) 11
- Whitehead, A. N. A. N. 怀特海 500
- Wickersdorf, Free School Community at 威克斯多尔夫自由师生社团 83
- Wiese, Leopold von 列奥波特·冯·维泽 20-1, 112, 132, 392, 442, 448, 451, 460-1
- Wiesengrund, Oscar 奥斯卡·魏森格隆德 66-7
- Wiesengrund-Adorno, Theodore see Adorno, Theodore 西奥多·魏森格隆德—阿多诺, 参见阿多诺, 西奥多·魏森格隆德
- Wilbrandt, Robert 罗伯特·维尔布兰特 9-10, 11, 23
- Wilhelm II, Kaiser 威廉二世皇帝 12
- Winkhaus, Hermann 赫尔曼·温克豪斯 481, 485
- Winter, Fritz 弗里兹·温特 519
- Wissing, Egon 埃贡·维辛 308
- Wittfogel, Karl August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15, 30, 34, 40, 80, 117-18, 127, 247
- and the Horkheimer circle 与霍克海默圈子 383
- and the Institute in exile 与流亡中的研究所 134
-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迁往美国 148
- research trip to China 到中国进行研究访问 175-6, 'theory of Oriental Society' "东方社会理论" 176, 257-8
- Wittfogel, Rose 罗泽·魏特夫 15, 30
- Wolfflin, Heinrich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203
- women 女人

- characters of 女人的性格 154
- psychology of 女人的心理 269-70
- research into women student's Attitudes to authority 对女学生面对权威的态度  
的研究 165
-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 Horkheimer on 霍克海默论工人阶级 38-9, 49, 50
- Marcuse on 马尔库塞论工人阶级 390-1
- research on 对工人阶级的研究 57-8, 113-16, 169-75, 375
- Wretched of the Earth, The* (Fanon) 《全世界受苦人》(法依) 611
- Wyneken, Gustav 古斯塔夫·维内肯 83, 84
- Young People and Careers* (Lazarsfeld) 《青年与职业》(拉萨斯菲尔德) 166-7
- Zangen, Wilhelm 威廉·赞根 480
- Zasulich, Vera 维拉·沙苏利奇 33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学刊》66, 113-26, 133
- Zeltner-Neukommz, Gerda 吉尔达·采尔特纳-纽科姆 530
- Zemlinsky,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齐姆林斯基 73, 74
- Zetkin, Clara 克拉拉·蔡特金 13
- Zickel, Reinhold 赖因霍尔德·齐克尔 72
- Zilsel, Edgar 埃德加·齐尔塞尔 166
- Zinn, George August 格奥尔格-奥古斯特·齐恩 431, 494

## 译后记

此书的翻译，经历了七八年的时间。此书厚达 700 页的篇幅，一开始也曾让我们这些初涉译事的译者有点望而生畏。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历史涉及的理论家为数众多，涉及的理论流派及理论表述复杂多样，均增加了此书的翻译难度。我们在翻译过程当中，请教了不少同行，查阅了不少相关资料，确实学到了比翻译更多的东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我们青年学者想深入了解西方思想，翻译是一个必经的思想训练过程，尽管其中充满艰险但也充满思想的快乐。我们深知自己在学识、外语和翻译经验方面有诸多的局限，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译出的文字也会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因此真切希望各位学界同仁给予认真指正。

此书“导言”部分和第一、二、四、五章由赵文初译，第三章由刘凯初译，第六、七、八章及“后记”部分由孟登迎初译，赵文和孟登迎对整个译文进行了数次相互校对。“参考文献”相关内容由赵文译出，“索引”由孟登迎译出。应该说，这既是我们三人集体合作的结晶，也是我们献给母校（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数十年来培育我们的各位老师的一份薄礼。

在此，首先应该感谢陈燕谷老师和曹卫东兄，他们的信任让我们有机会真正去深入接触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历史。另外，还要衷心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周敏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勇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院冯建三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陈永国教授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马海良教授等师友，他们为此书的翻译提供了持久

的支持和帮助。

世纪文景的编辑石楠先生，为此译作的出版付出了辛苦而认真的努力，在此一并致谢。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2009年11月16日